

列寧文選

兩卷集

第一卷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 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本版列寧文選兩卷集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中文版排印的，其譯文係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一九四六年在莫斯科刊印的俄文新版譯出。

正文下面的腳註凡沒有標明譯者的，都是列寧即的。



W. J. ... (unclear)

2/596/32
目 錄

一九四六年俄文原版序.....15

斯大林論列寧與列寧主義

斯大林同志在紀念列寧逝世第一週年時發表於工人報上的一封信
(載於24與25頁之間)

追悼列寧(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第二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
演說).....25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底組織者和領袖.....30

論列寧(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列姆里軍校學生晚會上的演說).....37

與第一屆美國工人代表團談話(摘錄)(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46

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選民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
一日在蘇聯國立大戲院).....53

在克列姆里宮招待高級學校工作人員時的演說(一九三八年五月
十七日).....59

檢閱紅軍時的演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紅場).....62

1462950

列 寧 文 選

論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底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	69
<u>馬克思學說</u> 底歷史命運.....	75
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	79

爲在俄國建立社會民主 工人黨而鬥爭

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回答 俄國財富雜誌上反對馬克思主義者的論文）.....	91
<u>俄國社會民主黨人</u> 底任務.....	157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成立。黨內布 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之出現

做什麼？（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	177—346
初版序言.....	177
（一）教條主義與『批評自由』.....	180—200
（甲）什麼是『批評自由』？.....	180
（乙）『批評自由』底新擁護者.....	183
（丙） <u>俄國</u> 的批評派.....	188
（丁） <u>恩格斯</u> 論理論鬥爭底意義.....	195
（二）羣衆底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底覺悟性.....	200—223
（甲）自發高漲底開始.....	201
（乙）崇拜自發性的態度。 <u>工人思想報</u>	205
（丙）『 <u>自力解放社</u> 』和 <u>工人事業雜誌</u>	214

(三) 工聯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	223—263
(甲) 政治鼓動以及經濟派縮小政治鼓動的觀點	224
(乙) 馬爾丁諾夫究竟是怎樣加深了普列漢諾夫底意見	233
(丙) 政治的揭露和『培養革命積極性』	237
(丁) 經濟主義與恐怖主義有什麼共同點呢？	242
(戊) 工人階級是爭取民主制的先進戰士	245
(己) 又是『非謗者』，又是『捏造者』	260
(四) 經濟派底手工業方式與革命家底組織	263—311
(甲) 什麼是手工業方式呢？	264
(乙) 手工業方式與經濟主義	267
(丙) 工人組織與革命家組織	273
(丁) 組織工作底規模	288
(戊) 『陰謀』組織與『民主主義』	294
(己) 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302
(五) 全俄政治報『計劃』	311—334
(甲) 誰因從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氣呢？	312
(乙) 報紙能否成爲集體的組織者呢？	317
(丙) 我們究竟需要何種樣式的組織？	328
結束語	335
附錄： <u>火星報想與工人事業雜誌實行統一的企圖</u>	338
<u>對做什麼？</u> 一書所作的一個更正	346
✓ 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	347—566
序言	347
(一) 代表大會之準備	351
(二) 代表大會上派別分立底意義	353
(三) 代表大會底開始。——組委事件	357
(四) 解散『南方工人』社	365
(五) 因語言平等問題而發生的事件	368
(六) 土地綱領	376
✓ (七) 黨章。馬爾托夫同志所提出的草案	383
✓ (八) 火星派內部發生分裂以前關於集中制問題的討論	395

✓ (九) 黨章第一項	396
✓ (一〇) 冤枉受到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的人	418
(一一) 繼續討論黨章。總委員會底成份	429
(一二) 關於黨章問題討論底終結。中央機關補選問題。『工人事業』社代表退出大會	435
(一三) 選舉。代表大會之終結	449
(一四) 代表大會上鬥爭底一般情景。黨內的革命翼和機會主義翼	477
(一五) 在代表大會以後。兩種鬥爭手段	491
(一六) 勿因小節而亂大謀	511
(一七) 新火星報。組織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	522
(一八) 稍微談談辯證法。兩個變革	551
附錄： <u>古塞夫</u> 同志和 <u>捷依契</u> 同志間的衝突	557

日俄戰爭與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	569—680
序言	569
(一) 一個迫切的政治問題	573
(二)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論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給予了我們什麼呢？	576
(三) 什麼是『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呢？	582
(四) 剷除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	587
(五) 應怎樣『推進革命』呢？	592
(六) 無產階級在與不澈底資產階級鬥爭中陷於束手無策地位的危險，究竟能從何處發生呢？	596
(七) 『把保守派排斥於政府以外』的策略	608
(八) 解放派與新火星派	613
(九) 什麼是在革命時期做一個持極端反對派態度的政黨呢？	621
(一〇) 『革命公社』與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624
(一一) 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某些決議和『代表會議』某些決議拿來作個簡略的比照	633

(一二) 民主革命底發展規模是否會因資產階級退出而減弱呢?	638
(一三) 結論。我們敢不敢取得勝利呢?	646
書後。再論解放派，再論新火星派.....	656
(一) 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現實主義者爲什麼要褒獎社會民主黨內的『現實主義者』呢?	656
(二) 馬爾丁諾夫同志又來『加深』問題了	663
(三) 庸俗資產階級的專政觀和 <u>馬克思</u> 底專政觀.....	671
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	681
<u>莫斯科</u> 起義底教訓.....	691
論抵制	698
革命底教訓	706

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布爾什維克正式 形成爲獨立馬克思主義政黨

政治評論	715
論 <u>馬克思主義</u> 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	721
<u>斯托雷平</u> 與革命	726
論取消主義和取消派	735
幾個爭論問題(公開黨和 <u>馬克思主義</u> 者)	737—759
(一) 一九〇八年的決議	737
(二) 一九一〇年的決議	741
(三) 取消派對一九〇八和一九一〇年決議的態度	744
(四) 取消主義底階級作用.....	748
(五) 『爲公開黨而鬥爭』的口號	751
(六)	755

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爲	760—781
(一) 論『派別組織性』	761
(二) 論分裂	765
(三) 論八月聯盟底瓦解	770
(四) 一個調和派份子對『七人團』的忠告	773
(五) 托洛茨基底取消主義觀點	776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前夜 工人運動高漲時期

紀念 <u>蓋爾村</u>	785
論 <u>俄國各政黨</u>	792
革命高漲	804
兩種烏托邦	812
<u>俄國地主的大地產和農民的小地產</u>	817
<u>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u>	819
論民族自決權	821—878
(一) 何謂民族自決?	821
(二) 歷史的具體的問題提法	826
(三) <u>俄國</u> 民族問題底具體特點及 <u>俄國</u> 資產階級民主的改革	829
(四) 民族問題上的『 <u>求實主義</u> 』	833
(五) 自由資產階級與社會黨機會主義份子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	839
(六) <u>挪威</u> 脫離 <u>瑞典</u> 而分立	848
(七) 一八九六年 <u>倫敦</u> 國際代表大會底決議	854
(八) 空想的 <u>馬克思</u> 與求實的 <u>盧森堡</u>	858
(九) 一九〇三年的綱領及其取消者	865
(一〇) 結束語	874
表明工人運動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觀材料	879

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俄國第二次革命

戰爭與俄國社會民主黨	889
論大俄羅斯人底民族自傲心	896
論歐洲聯邦口號	901
機會主義與第二國際底破產	905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 (通俗的論述)	916—1032
序言	918
法文版與德文版序言	920
(一) 生產集中與壟斷	927
(二) 銀行及其新作用	941
(三) 財政資本與財政寡頭	956
(四) 資本輸出	970
(五) 各資本家同盟彼此分割世界	975
(六) 列強分割世界	984
(七)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特殊階段	994
(八) 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	1005
(九) 對帝國主義的批評	1014
(一〇) 帝國主義底歷史地位	1027
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	1033
遠方來信。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底第一階段	1044
簡要註釋	1057

一九四六年俄文原版序

馬恩列斯學說是蘇聯人民爲保護社會主義祖國榮譽、自由和獨立而奮鬥，爲在蘇聯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的強大武器。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使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底思想政治生活更加澎湃高漲起來。這一本書把研究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精通布爾什維主義的工作，提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它吸引蘇聯廣大民衆，特別是吸引蘇聯智識份子羣衆來獨立加深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底偉大創作。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時起，大家對於馬列主義創始人作品的興趣大大增長了。

蘇聯人民反對德日兩國的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完成，再次燦爛證明了蘇維埃制度實力雄厚，不可摧毀，而蘇維埃制度底進步和先進思想體系萬分正確，深符歷史發展規律。列寧底著作以通曉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來武裝我們的幹部，教導他們瞭解社會生活中的複雜現象。馬列主義底革命理論『賦予實際工作者確定方針的能力，明白認識的前途，進行工作的把握，確信我們事業必勝的信心』（斯大林語）。

兩卷集中包含有如下的列寧基本著作：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做什麼？，進一步退兩步，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論歐洲聯邦口號，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

綱領，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四月提綱），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國家與革命，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糧食稅，論合作制等等*。其中每部著作，都是代表着列斯黨歷史和馬列主義理論發展中的一個階段。同時，兩卷集中包含有列寧專論保衛社會主義祖國問題的極重要著作。這些著作對於蘇聯人民有非常巨大的動員作用和組織作用。

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一書中（一八九四年），列寧澈底揭破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實則是反對人民者的真面目。列寧證明說誠心願意消滅沙皇制度而使人民免除一切壓迫的真正人民之友，並不是民粹派，而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在這裏初次提出了工農革命聯盟思想，認為工農聯盟是推翻沙皇制度、地主以及資產階級的主要手段，並指出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基本任務。列寧在這部著作中指示說：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聯合起來推翻沙皇制度，然後就與勞動羣衆聯合起來爭得不容有人剝削人現象存在的自由生活。

在做什麼？一書中（一九〇二年），列寧規定了建設工人階級馬克思主義黨的具體組織計劃。他在這部著作中澈底粉碎了『經濟主義』，揭破了機會主義、尾巴主義和自流主義的思想，指明了理論、覺悟性以及黨是工人運動領導力量底偉大意義，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黨是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結合的原理，天才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黨底思想基礎。

在進一步，退兩步這一部有名的書中（一九〇四年），列寧反對小組習氣而捍衛了黨性，反對孟什維克搗亂派而捍衛了黨，粉碎

*列寧所著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和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兩書，均印成單行本出版。

了組織問題上的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而奠定了布爾什維克黨，即新式戰鬥革命黨底組織基礎。在這部著作裏，列寧『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中破天荒第一次闡明了關於黨的學說，說明黨是無產階級底領導組織，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基本武器，沒有這個武器，便無法在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中獲得勝利』（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文版，第七一頁）。列寧所著進一步，退兩步一書，教導我們瞭解組織性和紀律性底偉大作用。

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這一部有歷史意義的書中（一九〇五年），列寧在思想上粉碎了孟什維克的小資產階級策略，天才地論證了布爾什維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以及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中的策略。這本書中的基本策略原理，就是認為無產階級應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起領導作用，認為無產階級在它與農民聯盟條件下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時的領導權，應轉變為無產階級在它與其餘被剝削勞動羣衆聯盟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時的領導權。

『這是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相互關係問題上的新方針，這是認為到資產階級革命終結時就要在無產階級週圍重新配置力量以便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理論，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文版，第九八頁）。

這裏已確立了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理論底基石。這一本書底莫大意義，就是列寧在這裏用新的革命論來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並奠定了布爾什維克黨革命策略底基礎，而我國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就是運用這個革命策略戰勝了資本主義的。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書中（一九一六年），列寧對帝國主義給了一個有根有據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說明帝國主義

是資本主義底最高最後階段，是腐朽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列寧根據關於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材料，規定了新的理論方針，認為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切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而可能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列寧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一九一五年）和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一文（一九一六年）中把這個天才結論表述出來了。

『這是新的完備的社會主義革命論，是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單個國家內獲得勝利，關於社會主義勝利條件，關於社會主義勝利前途的理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文版，第二一一頁）。

列寧所著的四月提綱，是布爾什維克黨為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的英明計劃。

在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一文中（一九一七年），列寧警告俄國勞動羣衆說，如果人民不握取政權，不把國家救出危亡之境，我們祖國就有遭受德國帝國主義者奴役的危險。列寧在這部著作中證明說：俄國『不走向社會主義，就不能前進』；鐵面無情的戰爭用十分激烈的方式向我們祖國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列寧當時寫道：把祖國救出危亡之境，鞏固其國防能力，建設社會主義等任務，是彼此密切關連而分離不開的。社會主義將在經濟上把俄國再造起來，將造成一種使人民表現大衆英勇精神的物質基礎，沒有這種精神，便無法把我國變為具有國防能力的國家。

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一九一七年），列寧揭穿了機會主義者（考茨基等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與革命問題觀點底資產階級實質。列寧在這部著作中恢復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論國家，論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列寧以研究俄國兩次革命底經驗為基礎，而創立了蘇維埃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政治形式的學說。

在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一書中（一九一八年），列寧規定了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各個基本任務，即在國民經濟中實行統計和監督，創立社會主義新生產關係，提高勞動紀律，組織社會主義比賽，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工農聯盟，發展無產階級民主制等任務。

在外寇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發表的著作中，列寧燦爛地規定了人民在戰時條件下的任務，前綫和後方底任務。

英勇果敢，大胆無畏的奮鬥精神，誓與民衆一起去和祖國敵人撕殺的決心——這就是列寧要蘇維埃人在戰時條件下具備的基本品性。變全國爲統一的軍營，在『一切都爲前綫』的口號下，用革命精神進行調整準確的工作——這就是後方底任務。『既然戰爭成了不可避免的——就要把一切都用之於戰爭，而稍許鬆懈和缺乏毅力，都應照戰時的法律來懲辦』。毫不留情地對付敵人，牢實鞏固已獲得的勝利，以求完全粉碎敵人——這就是列寧向前綫提出的要求。斯大林同志教導說：『紅軍底戰士、指揮官和政治工作人員們，必須牢牢記着我們導師列寧底遺訓：『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因勝利而昏迷，不要自驕自傲；第二件事，就是要鞏固自己的勝利；第三件事，就是要澈底消滅敵人』』。

列寧在自己的著作中，把蘇維埃人民實力雄厚而不可戰勝，蘇維埃國家生氣勃勃而不可摧破的根本原因，作了一個很深刻的分析。『當一國人民中的大多數工農已經知道，已經感覺到，已經看到他們所捍衛的是自己的政權，蘇維埃政權，即勞動者的政權；他們所捍衛的是自己的事業，這一事業的勝利就會保證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兒女有享受一切文化福利，一切人類勞動成果的可能，——那末，這樣一個國家的人民，是永遠不可戰勝的』。

列寧在論合作制以及其他晚年論文中，總結了黨和蘇維埃政權所已執行的工作，並擬定了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其方

法就是使國家工業化，並經過合作社吸收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編入兩卷集的列寧著作，表明了布爾什維主義發展史中的各個基本階段，表明了行動中的馬列主義。

在列寧作品前面，登載有斯大林同志底七篇作品，作為本集導言。在這些作品中，斯大林同志用非常雄勁而鮮明的筆墨描繪了列寧底儀範，描繪了這位人類最大天才，布爾什維克黨和工人階級領袖，勇敢無畏的革命家，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組織者，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新社會創造人底儀範。列寧是『最高典型的領導者，是個山鷹，他在鬥爭中不知恐懼為何事，而大胆引導我們黨沿着俄國革命運動新關道向前邁進』（斯大林語）。

斯大林在他這些作品中，描繪了列寧這位偉大愛國志士，英明戰略家，抗拒外寇而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事業組織者底儀範。

凡編進兩卷集的列寧著作，都是全部刊載，只有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一書算是例外：從這部著作中，我們只選載了第一編。

兩卷集中所有的材料，通常都是按寫作時間的先後次序排列，只有頭前一部份專論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作品算是例外。兩卷集內容分期法，全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相適合。第一卷所編入的，是列寧從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間的著作；第二卷所編入的，是列寧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二三年三月間的著作。

所有的列寧作品，都是按列寧全集俄文第二第三兩版所載原文刊載。只有下列幾部著作算是例外：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與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是按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所載原文刊載的；一九一七年的著作，是按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三卷集）所載原文刊載的；致土拉城同志書，是按列寧文存第三十四冊所載原文刊載的；標題為『社會主義祖國在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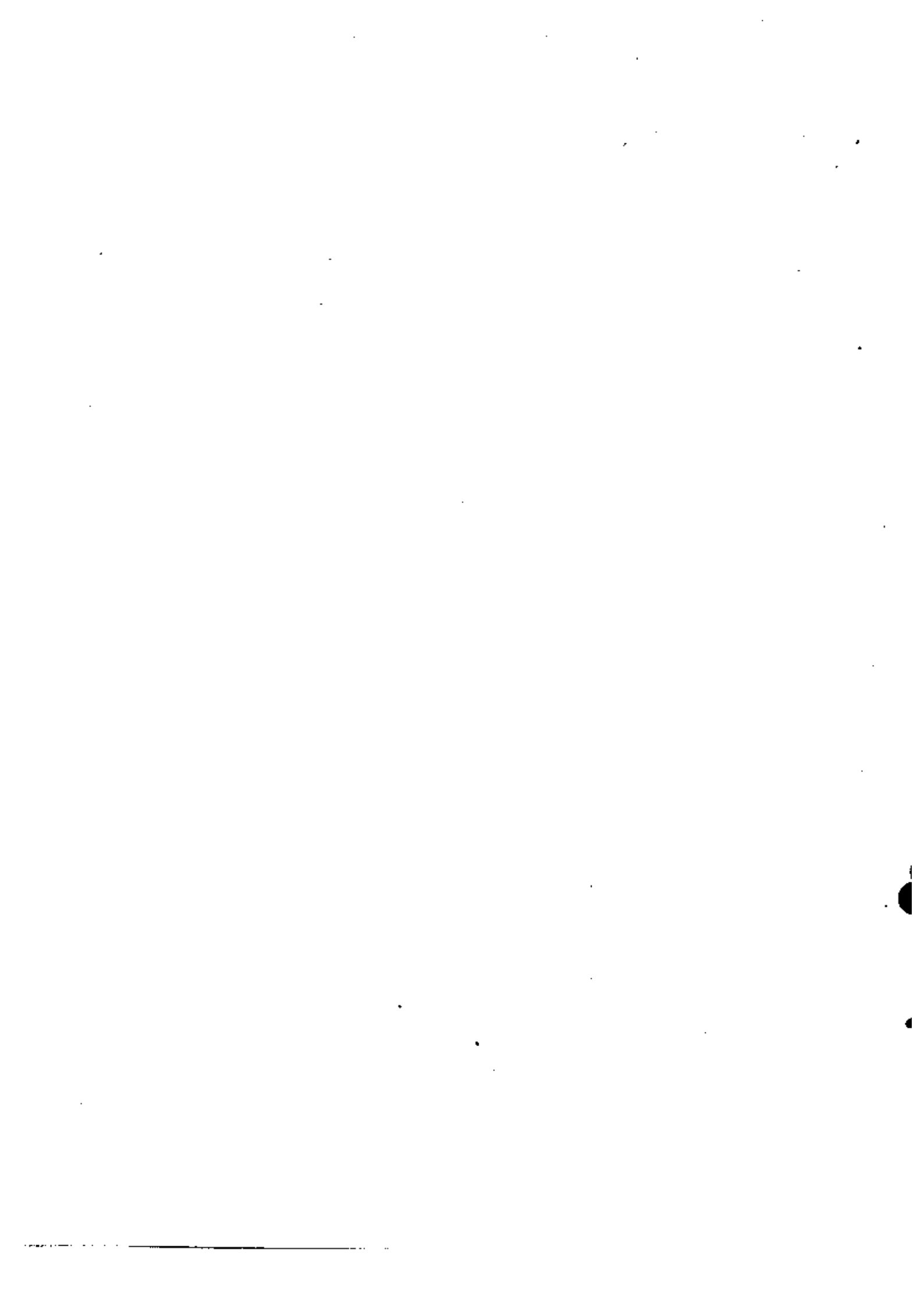
急中！』的宣言，是按國內戰爭時代的列寧著作一書所載原文刊載的；致各省縣蘇維埃電，是按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發表於真理報第五十四期的原文刊載的；標題為『謹防奸細！』的宣言，是按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發表於真理報第一百一十六期的原文刊載的；俄共（布）中央標題為『大家都去與鄧尼金門爭！』的書信，是按一九三三年印成單行本的原文刊載的。

兩卷集中的論文，除標明其寫作和公佈時間外，還附有一些備考性質的簡註。凡列寧本人所加的附註，概未標明是誰加的附註。凡兩卷集編輯部所加的附註，則附有『編者』二字。凡列寧正文和列寧附註中的日期，都是依照列寧當時所用的年曆載明的。

列寧文選兩卷集，是每一個研究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馬列主義基礎的人所必備的參考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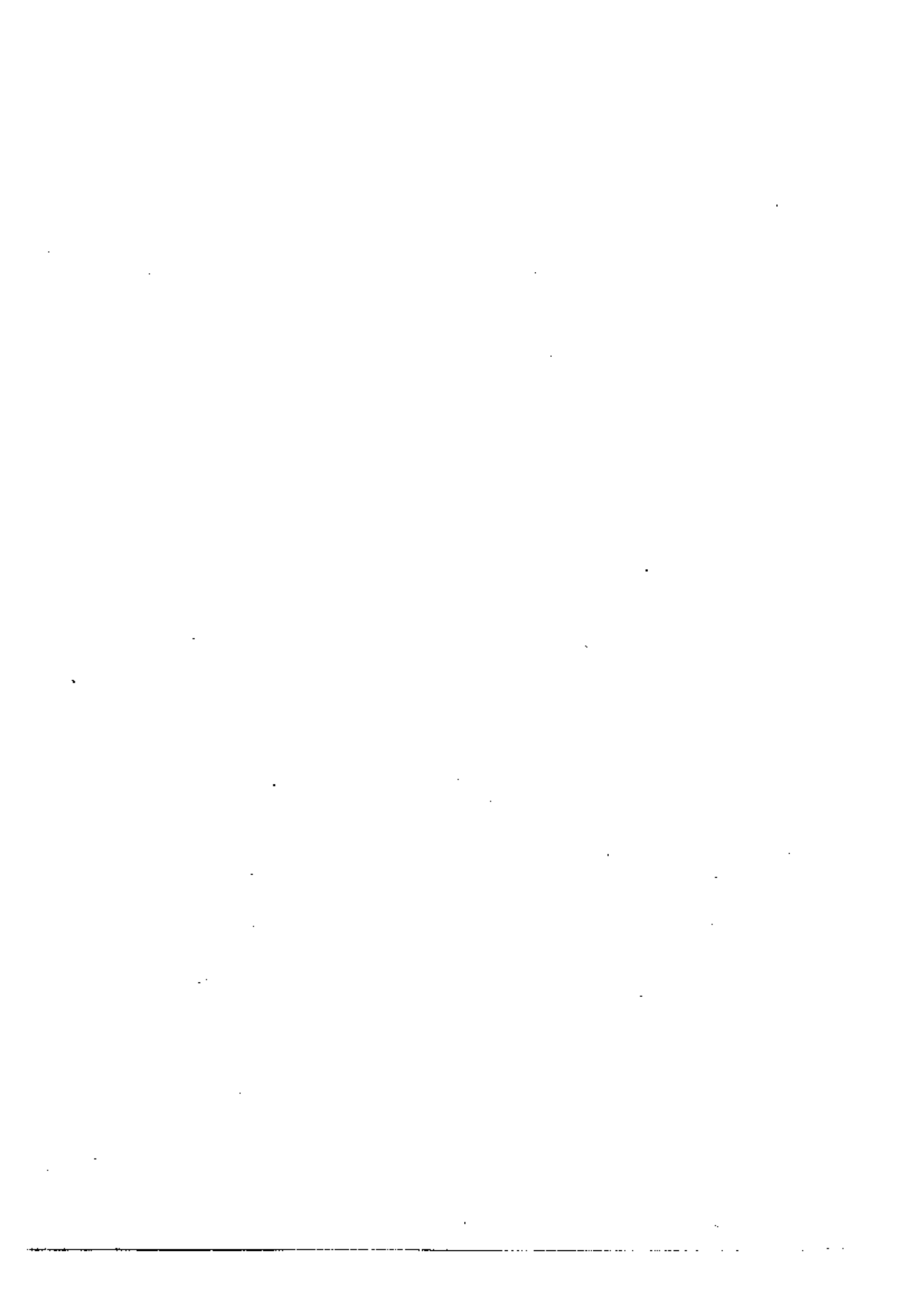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十月。

聯共（布）中央附設馬恩列學院



斯 大 林

論列寧與列寧主義



追悼列寧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第二次全
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演說¹

同志們！我們共產黨員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偉大無產階級戰略家底軍隊，列寧同志底軍隊，就是由我們這些人組成的。在這個軍隊裏做一員戰士，是再光榮不過的了。以列寧同志為創始人和領導者的這個黨底黨員稱號，是再高尚不過的了。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做這個黨底黨員的。並不是任何人都經得住身為本黨黨員所必經的種種患難與風波的。工人階級底子弟，在貧困與鬥爭中養成的子弟，受過千辛萬苦和作過英勇努力的人，就是首先應當成為本黨黨員的人。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主義者底黨，共產主義者底黨，同時也就稱呼為工人階級底黨。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說：要珍重黨員這個偉大稱號，並保持這個偉大稱號底純潔性。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你的這一個遺囑，我們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列寧同志在二十五年中教養了我們黨，並把我們黨教養成了世界上最堅固最有鍛鍊的工人黨。沙皇政府及其衛兵們底打擊，資產

階級與地主底瘋狂暴行，高爾察克與鄧尼金底武裝襲擊，英國與法國底武裝干涉，一切資產階級報紙異口同聲的造謠與誣衊，——所有這一切惡毒攻擊在這二十五年間總是落到我們黨底頭上來。可是，我們黨好似一座巨大的石山，屹立不搖，打退敵人們不可勝數的打擊，並引導工人階級向勝利前進。在殘酷的戰鬥中，我們黨鍊成了自己隊伍底統一與團結。正是賴有這種統一與團結，我們黨才爭得了對於工人階級敵人的勝利。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說：要保護我們黨底一致，如同保護眼珠一樣。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你的這個遺囑，我們也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工人階級底境遇痛苦不堪。勞動羣衆備受折磨和苦難。奴隸與奴隸主，農奴與農奴主，農民與地主，工人與資本家，被壓迫者與壓迫者，——自古以來，世界總是這樣構成，而且現時在絕大多數國家裏仍然是這樣。在數千百年當中，勞動羣衆數十百次企圖過擺脫壓迫者，而成爲自己生活底主宰。但他們每次都遭到失敗，受辱丟臉，不得不實行退却，不得不忍氣吞聲，隱忍着恥辱與冤屈，憤火與忿怒，而翹首望着渺茫的天空，希望在那裏找得救星。奴隸制的枷鎖仍然完整如故，或者舊枷鎖只是由一些同樣苦重恥辱的新枷鎖所替代。只有在我們國家裏，被壓迫被壓制的勞動羣衆才擺脫了地主和資本家底統治，而建立了工人和農民底統治。同志們，你們知道，而且現在全世界都承認，這個偉大門爭是由列寧同志和他的黨所領導的。列寧底偉大，首先就是他創立了蘇維埃共和國，而在事實上向全世界被壓迫羣衆表明出：得救的希望並沒有喪失；地主和資本家底統治是不會長久的；勞動統治的世界是可以由勞動者自身努力來創立的；勞動統治的世界是要在地上創立，而不是在天空

裏創立的。這樣，他就激起了全世界工農爭取解放的熱望。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底名字也就成了被剝削勞動羣衆所最愛戴的名字。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說：要保護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你的這個遺囑，我們也將不遺餘力來光榮地實現！

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是在工農聯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工農聯盟是蘇維埃共和國底首要和根本的基石。工人和農民不結成這個聯盟，就不能戰勝資本家和地主。工人沒有農民援助，就不能打倒資本家。農民沒有工人領導，就不能打倒地主。我國全部國內戰爭史都是說明這一點。可是，爲鞏固蘇維埃共和國而進行的鬥爭還遠未終結，而不過是採取了一種新的形式罷了。從前工農聯盟是具有軍事聯盟形式，因爲它當時是以反對高爾察克與鄧尼金爲目標的。現在工農聯盟應具有城鄉間，工農間經濟合作的形式，因爲它現時是以反對商人與富農爲目標的，因爲它現時是以工人和農民互相供給一切必需品爲目標的。你們知道，誰也沒有像列寧同志那樣堅決實行過這一任務。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說：要竭力鞏固工農聯盟。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你的這個遺囑，我們也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蘇維埃共和國底第二個基石，就是我國各族勞動者聯盟。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巴什基里亞人與別洛露西亞人，格魯吉亞人與阿捷爾拜疆人，阿爾明尼亞人與達格斯坦人，韃靼人與基爾吉茲人，烏茲別克人與土爾克明人，都是同樣與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利益攸關的。不僅無產階級專政使這各族人民免除枷鎖與壓迫，而且各族人

民也以其對於蘇維埃共和國的無限忠誠，以其願為蘇維埃共和國捐軀的決心來使我們蘇維埃共和國能免除工人階級敵人方面的侵害與襲擊。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同志始終不倦地對我們說明我國各族人民自願聯盟之必要，說明我國各族人民在共和國聯盟內親密合作之必要。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說：要鞏固並擴大共和國聯盟。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你的這個遺囑，我們也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無產階級專政底第三個基石，就是我們的紅軍，我們的紅海軍。列寧屢次對我們說過：我們從資本主義國家方面爭得的喘息機會也許是為時很短的。列寧屢次對我們說過：鞏固紅軍和改進紅軍狀況，是我們黨底最重要任務之一。那些與克爾遜最後通牒以及與德國危機相連的事變已再度證實出，列寧在這裏，也如經常一樣，是說得完全正確的。同志們！我們來宣誓：我們將不遺餘力來鞏固我們的紅軍，來鞏固我們的紅海軍。

處在資產階級國家汪洋大海包圍中的我國好似一座巨大石山巍然屹立着。接連不斷的波濤總是衝擊着它，威脅着要把它淹沒，把它沖毀。但這座石山仍然屹立不搖地支持着。它為什麼這樣有力量呢？這不僅是因為我國支持在工農聯盟上，我國是各自由民族聯盟底體現，我國是由雄強的紅軍與紅海軍所保護着。我國之所以強有力，堅固而結實，是因為它獲得全世界工農深刻的同情與牢不可破的贊助。全世界工農羣衆都想把蘇維埃共和國保持下去，認為這是列寧同志用他百發百中的手法射入敵人陣營的一枝箭，是他們可望擺脫壓迫與剝削苦痛的靠山，是指給他們解放之路的一座準確的燈塔。他們想把它保持住而決不會讓地主與資本家來破壞它。我們的

力量就在這裏。世界各國勞動者底力量，就在這裏。全世界資產階級底弱點，也是在這裏。

列寧從來也沒有把蘇維埃共和國本身當作自在的目的。他始終都把它當作加強西方與東方各國革命運動的必要環節，當作促進全世界勞動者戰勝資本的必要環節。列寧知道：只有這樣的見解，才不僅從國際的觀點上看來，而且從保持蘇維埃共和國本身的觀點上看來，都是正確的。列寧知道：只有用這樣的方法，才可激起全世界勞動者底熱忱來進行爭取解放的決戰。正因為如此，所以他這位無產階級最英明的領袖，還在無產階級專政成立以後第一天，就奠定了工人國際底基石。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始終不倦地擴大並鞏固了全世界勞動者聯盟的共產國際。

你們在這幾天已經看見數十萬勞動者來拜謁列寧同志靈柩的情形。再過一些時候，你們就會看見有數百萬勞動者底代表們來拜謁列寧同志坟墓的。可以斷言，在數百萬勞動者底代表們後面，一定會有全世界各地數千萬，數萬萬勞動者底代表們接踵而至，來證實列寧不僅是俄國無產階級底領袖，不僅是歐洲工人底領袖，不僅是殖民地東方底領袖，而且是環球整個勞動界底領袖。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說：要忠實於共產國際底原則。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將奮不顧身來鞏固並擴大全世界勞動者聯盟的共產國際！

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二十三期。

選自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四六至五
一頁。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底 組織者和領袖

有兩部分馬克思主義者。這兩部分人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工作，都是以『真正』馬克思主義者自命。但這兩部分人畢竟大不相同，甚至根本不同，因為他們的工作方法是絕對相反的。

第一部分人通常只以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堂皇宣佈馬克思主義為限。他們不善於或不願意領會馬克思主義底實質，不善於或不願意實行馬克思主義，却把馬克思主義底革命的生動原理變成毫無意思的死硬公式。他們的活動不是以經驗，不是以估計實際工作為基礎，而是以摘引馬克思個別語句為基礎。他們不是從分析實際生活中求得指令和指示，而是從比擬和歷史譬喻中求得指令和指示的。言行不符——這就是他們的根本毛病。因此，他們總是灰心失望，永遠不滿意於時常使他們受騙『上當』的命運。他們這一部分人底名字，就是孟什維主義（在俄國），機會主義（在歐洲）。梯什科（約吉赫斯）同志在倫敦代表大會上³給了他們一個很中肯的評論，說他們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

第二部分人恰巧相反，他們認為問題重心不是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而是實行馬克思主義，實現馬克思主義。規定適合於環境的一種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手段，因環境變更而變更這種方法和手段，——這就是他們所最注意的事情。他們並不是從歷史比擬和歷史譬喻中求得指令和指示，而是從研究實際環境中求得指令和指示。他們的活動不是憑藉引證和格

言，而是憑藉實際經驗，依據經驗來審查自己每一步驟，從自身錯誤中來學習並教導他人建設新生活。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他們的活動中，言行總是一致，而馬克思學說始終都保持着它那種生動的革命力量。這一部分人完全與馬克思所說的話相合，即：馬克思主義者不應以說明世界為限，而且應當更進一步去改變世界。這一部分人底名字，就是布爾什維主義，共產主義。

這一部分人底組織者和領袖，就是弗、依、列寧。

(一)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底組織者

俄國無產階級黨形成時所處的條件，是與西方工人黨形成時所處的條件大不相同的。在西方，例如在法德兩國，工人黨是在工會和政黨合法存在的條件下，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實現以後的環境中，是在有資產階級國會的情況下，是當資產階級已取得政權而與無產階級直接對立的時候，從職工會中產生出來的；反之，在俄國，無產階級黨則是在極殘酷的專制制度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尚待發生的時候形成的，當時，一方面有許多資產階級的『合法馬克思主義』份子參加於黨的組織，他們渴望利用工人階級來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另一方面，優秀的黨工作人員又常被沙皇憲兵從黨隊伍中間捉去，而當時革命運動底自發生長又需要有一個堅忍不拔，團結堅固，充分祕密而能夠引導運動去推翻專制制度的戰鬥革命家中堅。

當時的任務，就是要分清良莠，要和異己份子隔絕，要在各地組織有經驗的革命家幹部，給予他們以明確的綱領和堅定的策略，並把這些幹部集合成爲統一的戰鬥的革命職業家組織，這個組織應當充分祕密，足以抵擋憲兵的襲擊，但它同時又應當與羣衆有充分密切的聯繫，足以在必要時把羣衆引去進行鬥爭。

孟什維克，即那些『躺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人，却很簡單地解決問題：既然工人黨在西方是從那些為改善工人階級經濟狀況鬥爭的非黨職工會中產生出來的，那末在俄國也應當儘可能按照這個樣子來做，就是說，暫時只局限於各地方『工人與廠主及政府進行的經濟鬥爭』，而不要建立全俄戰鬥組織；然後…然後，如果到那個時候還沒有職工會出現，就要召集一個非黨工人代表大會並把它宣佈為黨。

孟什維克底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計劃』，對於俄國條件雖是一種空想，但它終究預定要做一番廣泛鼓動工作來降低黨性思想，來消滅黨幹部，使無產階級陷於沒有自己政黨的地位，使工人階級聽憑自由派去宰制，——這一點恐怕是孟什維克，並且大概有許多布爾什維克，在當時所沒有料想到的哩。

列寧在俄國無產階級及其黨面前的莫大功勞，就是他早在孟什維克組織『計劃』剛才萌芽，而這個『計劃』底創作者自己只是勉強明白想像到這個『計劃』底輪廓的時候，已經就揭破了這個『計劃』底全部危險性，而揭破它以後，就立刻開始猛烈進攻反對孟什維克在組織上的放蕩性，並把實際工作者底全部注意力集中到這個問題上來。因為這是黨底生命問題，黨底生死存亡問題。

創辦全俄政治報，作為吸引黨力量的中心；在各地組織堅定的黨幹部，作為黨底『常備部隊』；經過報紙來把這些幹部集合為一個整體，團結成為一個具有鮮明界限，明確綱領，堅定策略和統一意志的全俄戰鬥黨，——這就是列寧在他的有名著作做什麼？和進一步，退兩步中所發揮的計劃。這個計劃底優越處，就是它完全適合於俄國實際情形，很巧妙地綜合了優秀實際工作者底組織經驗。在為這個計劃而鬥爭中，大多數俄國實際工作者都決然擁護列寧，而不惜實行分裂。這個計劃底勝利，也就奠定了舉世無雙，最有團結，最有鍛鍊的共產黨底基礎。

我們某些同志（不僅孟什維克！）都往往責難列寧，說他酷愛爭辯和分裂，說他向調和派進行了毫不調和的鬥爭等等。毫無疑義，這兩點都是有過的事實。可是不難瞭解：如果當時我們黨不是把非無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份子逐出黨外去了，那它就會不能免除內部的軟弱性和散漫性，就會不能獲得它所特具的那種力量和堅固性。在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無產階級黨一定要與自己內部及工人階級中間一切反對革命，反對黨的機會主義份子進行鬥爭，才能發展和鞏固起來。拉薩爾說得對：『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起來的』。

提出責難的人們通常都以當時『統一』局面興盛的德國黨為例。可是，第一，並非任何統一都是強有力的表現；第二，現在只要看看舊時德國黨早已分裂成爲三個黨⁴的事實，就能完全懂得謝德曼和諾斯克兩人與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兩人『統一』是如何虛偽，如何似是而非了。如果德國黨內革命份子及時和黨內那些反對革命的份子決裂了，那對於德國無產階級也許會好一些哩……而列寧引導黨去和那些反對黨，反對革命的份子作毫不調和的鬥爭，是做得萬分正確的。只是由於實行了這種組織政策的結果，我們黨才能够在自己隊伍中間造成了內部的統一和驚人的團結，而得以安然走出克倫斯基執政時的七月危機⁵，順利完成領導十月武裝起義的重任，平安渡過布列斯特時期的危機⁶，組織對於協約國的勝利，並獲得一種空前未有的隨機應變的本領，能够隨時改編自己的隊伍，集中數十萬黨員去做無論那一種巨大工作而不會使黨內發生慌張。

（二）列寧是俄國共產黨底領袖

然而俄國共產黨在組織方面的優越，還只是事情底一方面。如果黨工作底政治內容，黨的綱領和策略不適合於俄國實際情形，如果黨的口號不會鼓舞工人羣衆，不會推動革命運動前進，那末黨就會

不能發展和強固得這樣迅速。現在我們就要說到事情底這一方面。

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〇五年革命）發生時所處的條件，是與西方各國，例如法德兩國革命發生時所處的條件不同的。西方革命是爆發於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時期和階級鬥爭尚未發展的時期，當時無產階級底力量還弱，人數尚少，還沒有自己能規定其階級要求的黨；而資產階級當時的革命性還足以使工人和農民相信它，並把他們引入反對貴族的鬥爭。反之，俄國革命則是開始於資本主義機器工業時期和階級鬥爭已經發展的時期（一九〇五年），此時俄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已比較衆多，並且已被資本主義團結起來，已經和資產階級作過多次戰鬥，已經有它自己比較資產階級黨更團結得堅固的黨，已經有它自己的階級要求；而俄國資產階級——況且是靠着政府定貨生存的——却十分害怕無產階級底革命性，竟設法勾結政府和地主去共同反對工農。至於俄國革命因俄國在滿洲戰場上遭受軍事失敗而爆發出來的事實，就只是加速了事變，但絲毫也沒有改變事情底本質。

當時環境要求無產階級來領導革命，把革命農民團結在自己周圍，進行堅決鬥爭來同時反對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以謀全國完全民主化，並保障自己的階級利益。

可是，孟什維克，即那些『躺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人，却按另一種方式來處決問題說：既然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而資產階級革命又應由資產階級底代表來領導（請看法國革命和德國革命底『歷史』），於是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爲俄國革命底領導者，於是領導權就應讓給俄國資產階級（即叛賣革命事業的資產階級），農民也應讓給資產階級去支配，而無產階級則應該始終站在極左的反對派立場上。

這是附和庸俗自由派唱出的鄙陋調子，而孟什維克却把它捧出來作爲『真正』馬克思主義底定論！

列寧在俄國革命面前的莫大功勞，就是他澈底揭破了孟什維克所用歷史比擬方法底空虛性，以及孟什維克想把工人事業交給資產階級去隨便支配的『革命方案』底全部危險性。主張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而不是主張資產階級專政；抵制布里根杜馬和舉行武裝起義，而不是參加杜馬和在杜馬裏進行正常工作；主張在杜馬終於召集成功時成立『左派聯盟』和利用杜馬講台來協助杜馬以外的鬥爭，而不是主張成立立憲民主黨的內閣和用反動態度『保護』杜馬；和立憲民主黨這個反革命勢力作鬥爭，而不是和它聯盟，——這就是列寧在他的有名著作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和立憲民主黨底勝利和工人政黨底任務中所發揮了的策略計劃。

這個計劃底優越處，就是它直截而堅決地規定了無產階級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的階級要求，因而促進了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包含有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底萌芽。在為這個策略計劃而鬥爭中，大多數俄國實際工作者都是一往直前地堅決擁護了列寧的。這個計劃底勝利，也就奠定了我們黨現時用來動搖世界帝國主義基礎的那個革命策略底基石。

事變向前的發展；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全部國民經濟的動搖；二月革命和有名的兩個政權並存局面；臨時政府成為資產階級反革命底策源地和彼得堡市代表蘇維埃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底萌芽；十月革命和解散所謂立憲會議；廢除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和宣佈蘇維埃共和國；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而世界帝國主義却與那些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合伙來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最後，那些被無產階級拋棄在水裏，被革命浪潮沖到資本主義岸邊去的孟什維克攀住所謂立憲會議來救命的可憐狀態，——所有這些都只是證明列寧在兩個策略中所規定的革命策略原理正確。黨擁有這樣的遺產，所以它能不怕水底暗礁而大胆往前游去。

* * *

在現今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黨底每一個口號和領袖底每一句話都要按事實來檢驗的時候，無產階級向自己的領袖們提出特別重大的要求。歷史上有過一些無產階級的領袖，風暴時期的領袖，實行家式的領袖，他們是奮不顧身和見義勇為的，但他們在理論上却軟弱無力。羣衆是不容易忘記這種領袖底名字的。例如德國的拉薩爾，法國的布朗基，就是如此。但整個運動決不能專靠回憶往事來生存：運動需要有明顯的目的（綱領）和堅定的路線（策略）。

還有一種領袖，即和平時期的領袖，他們在理論上是頗有力量的，但他們在組織工作和實際工作方面却軟弱無力。這種領袖只在無產階級上層中間享有威信，而且也只是到相當時候為止；當革命時代一來到，實際情況要求領袖拿出革命實踐口號的時候，理論家就退出舞台，而讓位給新起人物。例如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德國的考茨基，就是如此。

要保持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黨領袖的資格，就須一身兼備有雄厚的理論力量與無產階級運動底實踐組織工作經驗。當阿克雪里羅得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他嘗評論列寧說：『列寧恰好是一身兼備有優秀實行家的經驗，理論的素養以及廣闊的政治眼界』（見阿克雪里羅得為列寧所著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一書所作的序言）。『文明』資本主義底思想家阿克雪里羅得先生現在又會怎樣評論列寧，這是不難猜知的。但在我們這些深知列寧而又能以客觀態度觀察事物的人看來，列寧毫無疑義是完全保存着他這一固有品質的。這也就可以說明為什麼列寧，為什麼恰好列寧是現在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最有鍛鍊的無產階級黨底領袖。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刊載於真理
報第八十六期。

選自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三〇五至
三一五頁。

論 列 寧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
列姆里軍校學生晚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得到通知，說你們這裏舉行回憶列寧的晚會並邀請我也來作一個報告。我認爲把列寧底活動拿來做一個有連貫的報告，是沒有必要的。我想，倒不如只把一些表明列寧爲人和爲活動家的幾個特點的事實通知大家。這些事實相互間也許沒有什麼內在的聯繫，但這並不能妨礙我們得到一個關於列寧的概念。無論如何，我這一次所能給予你們的貢獻是不會比上面所約許的更多的。

山 鷹

我最初和列寧認識，是在一九〇三年。固然，這次認識還不是親身晤面的認識，而是相隔兩地，在通信上的認識。但這次認識在我腦海裏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在黨裏工作的整個時期中，這個印象始終都是沒有消失過的。那時，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亞。當我知道列寧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特別是一九〇一年以後，在火星報出版以後的革命活動時，我就深信列寧是個非常的人物。當時在我看來，他不是我們黨底一個普通領導者，而是我們黨底實際創造人，因爲只有他一人瞭解了我們黨底內部實質和迫切需要。我每次拿列寧去與我們黨底其他領導者比較時，總覺得列寧底戰友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以及其他等人，是遠不及列

寧的；列寧和他們比較起來，並不簡單是一個領導者，而是最高典型的領導者，是個山鷹，他在鬥爭中不知恐懼爲何事，而大胆引導我們黨沿着俄國革命運動新闢道路向前邁進。這個印象竟這樣深深印入了我的心靈，使我覺得必須寫封信給一位僑居國外的知己朋友，把這個印象告訴他，並要他給我一個評論。過了不久，當我已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時，——這是一九〇三年末，——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極力稱揚的答覆及列寧一封簡單而內容豐富的信，原來我的朋友已經把我那封信交給列寧看過了。列寧底這一封信雖是比較不長，但是對於我們黨底實際工作給了一個大胆無畏的批評，並把我們黨在最近時期內的全部工作計劃作了一個格外明白簡要的說明。只有列寧才善於把最紛亂的事情描寫得這樣簡單，明瞭，扼要和大膽——他的每一句話都不是一句尋常說出的話，而是一顆打中目標的子彈。這一封簡單而大胆的信，使我更確信列寧是我們黨底山鷹。可惜，我按老祕密工作者習慣已把列寧底這一封信同其他許多信札一樣燒掉了，這是我不能寬恕自己的。

從此時起，我就開始與列寧相識了。

謙 遜

我第一次會見列寧，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塔墨爾福斯（在芬蘭境內）舉行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上。我本來指望會看見我們黨底山鷹，會看見一個偉大人物，這個人物不僅在政治上偉大，而且想必在體格上也是偉大的，因爲列寧當時在我想像中是一個魁梧奇偉的巨人。當我看見他原來是一個最平常，低於中等身材，絲毫——真是絲毫——無異於平常漢子的人的時候，我又是如何感覺失望呵…

按一般慣例，『大人物』通常都是開會遲到，使會場上的人都望眼欲穿，等他出現；而且臨到大人物出現時，大家就彼此警告

說：『噓… 靜一點… 他來了』。我當時覺得這個儀式並不是多餘的事，因為它能令人肅然起敬。當我知道了列寧比代表們到的還早，躲在屋角裏很謙恭樸質地同那些參加代表會議的最平常的代表們進行最平常的談話的時候，我又是如何覺得失望呵。老實說，我當時覺得這未免是有點兒違背了某些必要的規矩哩。

後來我才明白，列寧這樣樸實謙遜，這樣很想不露頭角，至少是不惹人注目，不擺架子的特性，正是列寧底一個最大長處，正是他之為新羣衆底新式領袖，即人類最『下層』平凡大衆底新式領袖所固有的最大長處。

邏 輯 力 量

列寧在這次代表會議上作了兩個光輝的演說：一個是論時局，一個是論土地問題。可惜這兩個演說詞都沒有保存下來。這是兩個異常興奮，使代表會議全場歡欣鼓舞的演說。非常大的說服力量，簡單明瞭的論據，簡短通俗的語句，沒有半點矯揉造作的色彩，不玩半點令人昏眩的手勢，不用半句故意刺激聽衆的辭藻，——所有這些，都使得列寧底演說比通常『國會』演說家底演說高出萬萬。

可是，當時使我佩服的還不是列寧演說底這一特點，而是列寧演說中那種不可克服的邏輯力量，這演詞雖然是較為乾燥地，但是着實地抓住聽衆，一步一步地感動聽衆，然後就把聽衆俘虜得所謂精光光。我記得當時有很多代表這樣說：『列寧演說中的邏輯，簡直是一種萬能的觸角，好像是用螫子從各方面把你鉗住，使得你無法脫逃出去：你不是俯首投降，就要完全失敗』。

我認爲，列寧演說中的這個特點，就是他的演說藝術中最强有力的地方。

不灰心

我第二次會見列寧，是一九〇六年在我們黨底斯托哥爾摩代表大會上。大家知道，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僅佔少數，遭了失敗。當時，我第一次看見列寧處於失敗者地位。他絲毫也不像那些因失敗而灰心喪氣的領袖。恰巧相反，失敗倒使列寧精神倍增，鼓舞着自己的信徒去作新的戰鬥，爭取將來的勝利。我現在說的是列寧底失敗。但這究竟是怎樣的失敗呢？得瞧一瞧列寧底敵人，即斯托哥爾摩代表大會上的勝利者——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等人：他們很少像真正勝利者，因為列寧用他對於孟什維主義的無情批評，簡直把他們打得體無完膚了。我記得，當時我們布爾什維克代表們都集合在一塊，望着列寧，請他指教。在某些代表底議論中含有一種疲乏氣餒的情緒。我記得列寧如何冷嘲了這種議論，他說：『同志們，不要灰心吧，我們一定會獲得勝利，因為我們是正確有理的』。仇恨那些灰心失望的智識分子，確信自身力量，確信勝利前途——這就是列寧當時對我們說到的事情。令人感覺到，布爾什維克底失敗是暫時的失敗，布爾什維克在最近將來就會獲得勝利的。

『不因失敗而灰心』——這就是列寧活動中的一種特點，正因為有這種特點，所以他始終都能在自己週圍團結起忠實到底和確信自身力量的軍隊。

不驕矜

在下一代表大會上，即一九〇七年在倫敦舉行的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已成為勝利者了。當時，我第一次看見列寧處於勝利者地位。勝利通常是使某些領袖頭昏目眩，使他們高傲驕矜起來的。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往往就來誇揚勝利，泰然自得。但列寧絲

毫也不像這樣的領袖。恰巧相反，正是在勝利以後，他倒更加特別警惕和戒備起來。我記得列寧當時十分堅決地教導代表們說：『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因勝利而昏迷，不要自驕自傲；第二件事，就是要鞏固自己的勝利；第三件事，就是要澈底消滅敵人，因為敵人還只受到打擊，可是尚遠未被澈底消滅』。他冷笑那些粗心浮氣，硬說『孟什維克從此已經完結了』的代表。他不難證明出來：孟什維克在工人運動中還有相當的根基，我們還要切實和孟什維克作鬥爭，切不可誇大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不可輕視敵人底力量。

『不因勝利而驕矜』——這就是列寧性格中的一種特點，正因為有這種特點，所以他始終都能冷靜地估量敵人底力量而使黨免除一切意外的危險。

原 則 性

黨底領袖不能不尊重自己黨內多數底意見。多數是領袖所不能不顧及的力量。列寧之懂得這一點，並不亞於黨底其他任何一個領導者。但列寧從來也沒有做過多數底俘虜，尤其是當這個多數沒有原則立場的時候。我們黨底歷史上有過這樣的時期，當時黨內多數底意見或黨底眼前利益是與無產階級底根本利益相抵觸的。在這種情形下，列寧總是毫不猶疑，毅然決然站在原則性方面反對黨內多數底意見。而且在這種情形下，他甚至不怕簡直獨自一人去反對全體，因為他認為——正如他自己所常說的那樣——『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有兩件事實，把這點表明得特別明顯。

第一件事實。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一年_的時期，我們黨被反革命勢力擊破後陷於完全解體的狀態。這是人們認為根本用不着黨的時期；這是不僅智識份子而且有一部分工人也紛紛退出黨的時期；這是人們否認祕密組織的時期；這是取消派思想和瓦解現象盛行的

時期。當時，不僅孟什維克，而且布爾什維克，也分成許多派別組織和思潮，其中大部分都是脫離了工人運動的。大家知道，正是在這個時期產生了那種要完全取消祕密組織而把工人組織成爲合法自由主義斯托雷平黨⁹的思想。當時只有列寧一人沒有隨波逐流，而是高高撐持着黨性旗幟，以驚人的堅忍心和非凡的堅決性來收集黨的零散殘部，猛擊工人運動中所有各種反黨派別，以非常的勇氣和空前的毅力來捍衛黨性。

大家知道，在爲了黨性而進行的這個爭論中，結果是列寧獲得了勝利。

第二件事實。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的時期，帝國主義大戰熾烈的時期，當時所有一切，或幾乎所有一切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都傾心於流行的愛國主義熱狂，替本國帝國主義盡忠效勞。當時，第二國際已在資本面前降下了自己的旗幟，甚至如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和黑得等等一類的人物，都被沙文主義大浪沖倒了。當時，只有列寧一人，或幾乎只有列寧一人才發動了堅決鬥爭去反對社會沙文主義與社會和平主義，揭露黑得輩和考茨基輩底變節行爲，痛斥那些騎牆派『革命家』不澈底的態度。列寧明知跟隨他走的只有很少的少數，但他認爲這並沒有決定的意義，因爲他知道只有澈底國際主義的政策才是有遠大前途的正確可靠的政策；因爲他知道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大家知道，在爲建立新國際而進行的這個爭論中，結果也是列寧獲得了勝利。

『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這就是列寧所運用來奪得許多新的『天險』陣地而把無產階級優秀份子奪到革命馬克思主義方面來的公式。

確信羣衆

有一些黨理論家和領袖，雖知道各族人民底歷史，雖鑽研過革命歷史底始末，可是他們有時患着一種很不體面的病症。這種病症就叫作害怕羣衆，不相信羣衆有創造能力。在這個基礎上，有時也就產生出領袖對待羣衆的某種貴族態度，而羣衆雖不熟悉革命歷史，但負有破壞舊制度而建設新制度的使命。怕自發勢力洶湧起來，怕羣衆『破壞得太多』，想用保姆態度照書本去教訓羣衆，而不肯向羣衆學習，——這種貴族態度底基因就是如此。

列寧與這種領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個革命者，如像列寧這樣深信無產階級底創造能力，深信無產階級底階級本能適合於革命目的。我不知道還有哪一個革命者如像列寧這樣大胆無情打擊過那些傲然責難『革命紊亂狀態』和『羣衆擅自胡鬧』的份子。我記得在一次談話中曾有一位同志說『在革命以後就會奠定正常秩序』，於是列寧就諷刺地說：『一個想做革命者的人，而竟忘記革命秩序是歷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糕了』。

因此，列寧總是鄙棄那些瞧不起羣衆，想照書本去教訓羣衆的份子。因此列寧總是不倦地教誨說：要向羣衆學習，要理解羣衆底行動，要細心研究羣衆鬥爭底實際經驗。

確信羣衆底創造能力——這就是列寧活動中的一種特點，正因為有這種特點，所以他能於理解自發勢力而把自發運動引上無產階級革命底軌道。

革命天才

列寧是天生的革命巨匠。他真是極善於組織革命爆發的天才，極善於領導革命的能手。他在革命震動時代覺得比任何時候都更自由，更爽快。我並不是想說，列寧對一切革命震動都同樣嘉許，或

者說他無論何時和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主張革命爆發。全然不是。我只是想說，列寧底英明遠見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如在革命爆發時期那樣表現得圓滿和明顯。在革命轉折關頭，他真似鮮花盛開，成爲千里眼，預察到各階級底行動和革命進程底可能曲折，他看見這些東西，簡直是瞭如指掌。無怪乎我們黨內常說：『依里奇在革命波浪裏游泳，就好像魚在水裏游泳一樣』。

因此，列寧所提出的策略口號是『令人吃驚的』明確，列寧所製定的革命計劃是『衝昏頭腦的』勇敢。

我記得有兩件事實把列寧這個特點表現得格外明顯。

第一件事實。在十月革命前夜的時期，當時千百萬工人，農民和兵士羣衆爲後方和前線危機所激動，都要求和平與自由；當時將官團和資產階級準備武人專政，以謀『戰爭到底』；當時整個所謂『輿論』，一切所謂『社會主義黨』，都反對布爾什維克，誣指他們爲『德國偵探』；當時克倫斯基企圖把布爾什維克黨驅進——而且有一部分已驅進了——祕密狀態；當時尚屬強大，尚有紀律的德奧聯軍與我國疲倦瓦解的軍隊對峙着，而西歐『社會主義者』却安然與本國政府勾結，以謀『戰到完全勝利』…

在這樣的關頭舉行武裝起義，是什麼意思呢？在這樣的環境中舉行武裝起義，就是孤注一擲。但列寧並不怕冒險，因爲他知道，因爲他用自己的千里眼看見：武裝起義必不可免，武裝起義一定會勝利，俄國武裝起義一定會準備好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俄國武裝起義一定會激動西方受苦羣衆，俄國武裝起義將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國內戰爭，武裝起義結果一定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而蘇維埃共和國又一定會成爲全世界革命運動底堡壘。

大家知道，列寧底這個革命預見，後來是空前確切地實現了的。

第二件事實。在十月革命後的初期，當時人民委員會企圖使叛將杜鶴寧總司令停止軍事行動而開始實行同德軍談判休戰問題。我

記得，當時列寧，克里連科（後來的總司令）和我自己，特往彼得城內總參謀部去同杜鶴寧直接通電談判。時機十分危急。杜鶴寧和大本營堅決拒絕執行人民委員會命令。當時軍中指揮官是完全操於大本營掌握中的。至於兵士羣衆，那末誰也不知道那隸屬於蓄意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所謂各集團軍組織的一千四百萬軍隊，究竟會作何種表示。大家知道，當時彼得城裏面也醞釀着士官生暴動。此外，克倫斯基又帶隊進攻彼得城。我記得，列寧在拍電機旁邊稍許靜默了一下之後，面孔上忽然大顯光輝。他顯然是打定主意了。那時列寧就向我們說道：『我們到無線電台那裏去吧，無線電台一定能幫助我們的：我們下一道特令，把杜鶴寧將軍撤職而委任克里連科同志爲總司令；超過指揮官去直接號召兵士——叫他們把將軍包圍起來，停止軍事行動，同德奧士兵聯歡，把和平事業握到自己手裏來』。

這真是『冒險一躍』。但列寧並不怕這樣『一躍』，反而樂於這樣『一躍』，因爲他知道軍隊渴望和平，軍隊將把和平道路上所有各種障礙掃除乾淨而奪得這個和平；因爲他知道用這種方法來奠定和平，便不能不影響到德奧士兵，且一定會沒有例外地使所有一切戰線上要求和平的趨向加強起來。

大家知道，列寧底這一個革命預見，後來也是完全確切地實現了的。

天才的遠見，迅速把握並察知臨來事變真諦的才能——這就是列寧底一種特性，正因爲有這種特性，所以列寧能於規定出正確戰略，以及在革命運動轉折關頭上行動的明確路線。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二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三十四期。

選自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五二至六四頁。

與第一屆美國工人代表團談話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摘錄)

第一個問題。列寧和共產黨在實際上給馬克思主義補充了什麼新原則呢？如果說列寧相信『創造性的革命』，而馬克思却較爲趨向於等待經濟力登峯造極的發展，那是否正確呢？

回答。我認爲，列寧沒有給馬克思主義『補充』任何『新原則』，同樣他也沒有取消馬克思主義任何一個『舊』原則。列寧始終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實最一貫到底的學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馬克思主義原則爲依據的。但列寧不僅是馬恩學說底執行者。他同時又是馬恩學說底繼續者。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他針對着新的發展條件，針對着資本主義新階段，針對着帝國主義而向前發展了馬恩學說。這就是說，列寧在階級鬥爭新條件下面向前發展馬克思底學說，就對馬克思主義總寶庫添進了一些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給出的，比在帝國主義以前資本主義時期內所能給出的更新的東西，但列寧所添進於馬克思主義寶庫的這些新貢獻完完全全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規定的原則爲基礎的。正是在這個含義上，我們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現

在我把列寧向前發展馬克思學說時作出了一些新貢獻的幾個問題列舉於下：

第一，關於壟斷制資本主義問題，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新階段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資本論裏給了對於資本主義基礎的分析。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活於壟斷制以前的資本主義佔統治的時代，生活在資本主義平靜進化而『和平』推廣於全地球的時代。這個舊階段到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已經終結，此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不在人世了。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猜想到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新條件，即因資本主義新階段代替舊階段而產生，因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壟斷制的階段而產生的條件：此時，資本主義底平靜進化已由資本主義躍進性劇變性的發展所替代；此時，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和矛盾已表現得特別厲害；在這種發展極不平衡條件下，為爭取商品銷售場和資本投殖場的鬥爭，已使那些為週期重新分割世界及勢力範圍的週期帝國主義戰爭成為必不可免了。列寧在這方面的功勞，亦即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就在於他倚據着資本論底基本原理把帝國主義視為資本主義最後階段而給了它一個有根有據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揭示了它的癥結和那些使它必然滅亡的條件。列寧根據這一分析就得出了他那個著名的原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是可能在單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的。

第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規定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是用強力推翻資本政權的方法的基本思想。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是：（一）他發現了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為此而利用了巴黎公社和俄國革命底經驗；（二）他從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問題着眼來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公式，認定無產階級專政是領導者的無產階級與被領導者的非無產者階級（農民等等）被剝削羣衆間的特殊形式的階級聯

盟；（三）他特別着重指明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社會內最高式樣的民主制，是代表多數人（被剝削者）利益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形式，而與代表少數人（剝削者）利益的資本主義民主制相反。

第三，關於社會主義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的國家內順利建設底形式和方法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看作是多少長久而充滿革命搏戰和國內戰爭的時期，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在這個時期內實行種種必要的經濟設施，政治設施，文化設施和組織辦法，以便創立社會主義的新社會，無階級的社會，無國家的社會，來代替資本主義的舊社會。列寧完完全全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這些基本原理為立腳點的。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是：（一）他論證了在被帝國主義國家包圍着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內可能建成完備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要這個國家不會被週圍資本主義國家底武裝干涉所撲滅就行了；（二）他擬定了經濟政策底具體辦法（『新經濟政策』），使握有經濟命脈（工業，土地，運輸業和銀行等等）的無產階級能運用這些具體辦法把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業結合起來（『工業與農民經濟結合』），因而把全部國民經濟引向社會主義；（三）他擬定了經過合作制逐漸把農民基本羣衆引導和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軌道上來的具體辦法，認為合作制是無產階級專政運用來改造小農經濟並以社會主義精神從新教育農民基本羣衆的最強有力的工具。

第四，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所有一切人民革命中，在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已規定了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底基本大綱。列寧在這裏的新貢獻，就是他向前發展這些大綱而將其擴展成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周密體系，擴展成了無產階級不僅在推翻專制制度和推翻資本主義的事業中，並且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社會主義建設事

業中，都對城鄉勞動羣衆實行領導的周密體系。大家知道，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賴有列寧和列寧黨而在俄國得到了巧妙的應用。這也就是俄國革命引起了無產階級政權的一個原因。從前通常總是這樣：在革命時，工人在街壘上作流血的鬥爭，推翻舊制度，而政權總是落到資產階級手裏，資產階級後來壓迫和剝削工人。在英國和在法國的情形是如此。在德國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我們俄國這裏的情形却就不同了。在我們這裏，工人不僅作了革命底突擊力量。俄國無產階級既是革命底突擊力量，同時又曾力求成爲領導者，成爲城鄉一切被剝削羣衆底政治領導者，把這些羣衆團結在自己周圍，使這些羣衆離開資產階級，使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孤立起來。俄國無產階級既是被剝削羣衆底領導者，也就時時刻刻都爲奪取政權和利用這政權來謀自身利益以反對資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而奮鬥。正因爲如此，所以俄國革命每一次强有力的發動，無論是在一九〇五年十月或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都把工人代表蘇維埃這個具有鎮壓資產階級的使命的新政權機關底萌芽提到了舞台上來，以對抗那具有鎮壓無產階級的使命的舊政權機關，即資產階級國會。在我們這裏，資產階級曾兩次企圖恢復資產階級國會，消滅蘇維埃：第一次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預備國會』開會時期，即是在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以前，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立憲會議』開會時期，即是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但每次都遭受了失敗。爲什麼呢？因爲當時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陷於孤立，千百萬勞動羣衆已認定無產階級爲革命底唯一領袖，而蘇維埃又已由羣衆審查過，試驗過，認作是自己的工人政權了，如果拿這個政權來換一個資產階級國會，那對於無產階級就等於自殺。因此，無怪乎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在我們這裏是沒有發育起來的。所以革命在俄國就引起了無產階級政權。這就是實行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的思想體系的結果。

第五，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分析愛爾蘭、印度、中國、中歐各國、波蘭、匈牙利等國事變時，已規定了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基本的肇端的思想。列寧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是以這些思想為基礎的。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是：（一）他把這些思想集成為一個關於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嚴整學說；（二）他把民族和殖民地問題與推翻帝國主義的問題聯結起來了；（三）他宣佈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中的組成部分。

最後，關於無產階級黨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已規定了關於黨是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基本大綱，認為無產階級沒有黨就不能爭得解放，就是說，既不能奪得政權，也不能改造資本主義社會。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就是他針對着帝國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鬥爭新條件向前發展了這些大綱，而指明說：（一）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它高於無產階級其他各種組織形式（職工會，合作社和國家組織），而應該綜合和指導這些組織底工作；（二）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經過黨才能實現，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指導力量；（三）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由一個黨，即由共產黨來領導，才會是完滿的專政，共產黨決不而且不應當與其他政黨瓜分領導；（四）如果黨裏沒有鐵的紀律，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在鎮壓剝削者和把階級社會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方面的任務就不能見諸實現。

大體說來，列寧在他的著作裏針對着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鬥爭新條件把馬克思學說具體化並向前發展這個學說時所作出的一些新貢獻，就是如此。

因此，我們就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由此可見，決不可把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分開，更不可把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

代表團所提出的這個問題中往下還有一句：『如果說列寧相信『創造性的革命』而馬克思却較為趨向於等待經濟力登峯造極的發展，那是否正確呢？』我認爲這種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我認爲無論那個人民革命，只要它是真正人民的革命，都是創造性的革命，因爲它打破舊制度而創造新制度，建立新制度。當然，例如阿爾巴尼亞有時發生的某些部落反對其他部落的兒戲『起義』一類的所謂『革命』，是不能有絲毫創造性的東西的。可是，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也沒有把這種兒戲『起義』當作革命。此地所指的顯然不是這種『起義』，而是那種發動着被壓迫階級去反對壓迫階級的民衆革命。而這樣的革命却不能不是創造性的。馬克思和列寧所主張的正是這樣的革命，並且只是這樣的革命。這樣的革命當然是不能在隨便什麼條件下發生，而只能在具備有一定的便利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時發生的。

* * *

第十二個問題。你能不能給我們把共產黨所企圖創立的那個未來社會作一個簡括的說明呢？

回答。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一般說明，在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底著作內已經有過了。要是對於共產主義社會作一個簡括的解剖，那它就是這樣一個社會：（一）那裏，不會有對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只會有公有制，即集體所有制；（二）那裏，不會有階級和國家政權，而只會有工業的和農業的勞動者，他們組成爲經濟上共同調節的勞動者自由協會；（三）那裏，按計劃組織起來的國民經濟，無論在工業或農業方面，都是以高度技術爲基礎的；（四）那裏，不會有城市與鄉村間，工業與農業間的對立形勢；（五）那裏，生產品底分配將按照舊時法國共產主義者所主張的原則實行，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六）那裏，科學與藝術將獲得充分便利的發展條件，足以達到全盛的繁榮；（七）那

裏，每個人既不必爲糊口而操心，既不必奉承『世界上的強人』，就會成爲真正自由的人，以及其他等等。顯然，我們離這樣的社會還遠哩。

至於共產主義社會底完全勝利所必需的國際條件，那它們是會隨着資本主義各國革命危機和工人階級革命爆發底增長而形成和成熟起來的。決不能以爲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中的工人階級將走向社會主義，尤其是走向共產主義，而其他各國中的資本家却會毫不介意，袖手旁觀。更不能以爲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會甘願對某個國家裏社會主義勝利的發展，持簡單旁觀的態度。實際上，資本家會要極力設法來撲滅這樣的國家。實際上，某個國家裏走向社會主義，尤其是走向共產主義的每一嚴重步驟，都必然會引起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力求在各該國家裏爭取工人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洶湧熱潮。於是在國際革命繼續發展進程中就會形成兩個世界中心：一個是吸引着那些趨向於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社會主義中心；另一個是吸引着那些趨向於資本主義的國家的資本主義中心。這兩個中心爲佔有世界經濟的鬥爭，將決定全世界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底命運。因爲世界資本主義底最後失敗，也就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勝利。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二百一十期。

選自斯大林所著列寧主義問題一書，
第十版，第一六九至一七三頁，第一
九三至一九四頁。

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 選民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蘇聯國立大戲院

同志們！老實說，我並沒有想來說話。可是，我們敬愛的尼啓塔·賽爾格維奇簡直是強把我拉到了會場這裏來，他說：你作個很好的演說吧。說什麼呢，作什麼樣的演說呢？凡在選舉前所要講的一切，都已由加里寧，莫洛托夫，沃羅希洛夫，卡甘諾維赤等領導同志，以及我們其他許多負責同志，在發言中講過並反覆講過了。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補充這些演說呢？

據說對於選舉運動某些問題須要解釋。什麼樣的解釋，關於什麼問題呢？凡需要解釋的一切，都已經在布爾什維克黨、共產主義青年團、全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國防航空化學協進會以及體育事宜委員會大衆週知的宣言裏，解釋過和反覆解釋過了。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補充這些解釋呢？

當然，也許可以作一個隨隨便便的演說，一切都說，其實連什麼都不說（微笑聲）。也許這種演說能供聽衆消遣消遣。據說，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那裏，而且在我們蘇維埃國家這裏，也有善於作這種演說的能手（笑聲，鼓掌）。可是，第一，我不是善於作這種演說的能手。第二，現在我們布爾什維克大家都像俗語所說『忙不開交』的時候，是否值得做消遣時光的玩意呢。我以為是不值得的。

既然如此，當然也就作不出很好的演說來。

可是，我既已走到講台上來，自然無論如何也得說一點（熱烈鼓掌）。

首先，我要感謝（鼓掌）各位選舉人對我表示信任的盛意（鼓掌）。

我被推舉為代表候選人，而且蘇維埃首都的斯大林選區選舉委員會已把我登記為代表候選人。同志們！這是很大的信任。讓我來向你們致深切的布爾什維克的謝意，感謝你們對於我們布爾什維克黨，以及對於我本人，即這個黨底代表所表示的信任吧（熱烈鼓掌）。

我知道信任有什麼意思。這個信任自然是加與我一些新的補充的義務，因而也就是加與我一種新的補充的責任。而我們布爾什維克是決不拒絕負責的。我就很樂意地負起這個責任來（熱烈鼓掌多時）。

同志們！我自己也想向你們保證，你們儘可大胆指靠斯大林同志（熱烈歡呼，歷久不已。會場中有人高呼：『我們大家都擁護斯大林同志！』）。你們儘可指望斯大林同志定能完成他自己對人民的義務（鼓掌），對工人階級的義務（鼓掌），對農民的義務（鼓掌），對智識界的義務（鼓掌）。

其次，同志們！我要向你們恭賀這個臨到的全民節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日（熱烈鼓掌）。同志們！臨到的選舉不僅是選舉而已。這真正是我國工人、我國農民和我國智識界底全民節日（熱烈鼓掌）。世界上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選舉。從來也沒有過！歷史上未曾有過這種先例（鼓掌）。重要點並不在於我國當前的選舉是普遍、平等、不記名和直接的選舉，雖然這一點本身也有巨大的意義。重要點是在於我國將要舉行的普選，比之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裏的選舉，都是最自由最民主的選舉。

普選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裏，即所謂民主國家裏，也是舉行

的，也是實行的。但那裏是在什麼情況下舉行選舉的呢？是在階級衝突的情況下，是在階級敵對的情況下，是在資本家、地主、銀行家以及其他資本主義豺狼脅迫選舉人的情況下舉行的。這樣的選舉，即令它是普遍、平等、不記名和直接的選舉，也不可稱為完全自由和完全民主的選舉。

反之，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國家裏，選舉却是在完全另外一種情況下舉行的。在我們這裏沒有資本家，沒有地主，因而也就沒有富豪階級對貧窮階級的脅迫。在我們這裏，選舉是在工人、農民、智識份子合作的情況下舉行的，是在他們互相信任的環境中舉行的，是在可說是互相友愛的情況下舉行的，因為我們這裏沒有資本家，沒有地主，沒有剝削制，所以根本也就沒有什麼人脅迫人民，以圖歪曲民意的現象。

正是因此，所以我們的選舉是全世界上唯一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選舉（熱烈鼓掌）。

這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選舉，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勝利的基礎上才能發生，只有現在我們這裏，社會主義已不單是建設着，而是已深入人民生活中，已深入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時候，才能發生。十多年以前，尚可爭論我國能否建設社會主義。現在，這已經不是可爭論的問題了。現在，這已經是事實問題，已經是現實生活問題，已經是貫注於人民全部生活的風俗問題。在我們的工廠裏是沒有資本家而進行工作的。由人民中間出身的人領導着工作。這在我們這裏也就叫做事實上的社會主義。在我們的田場上是沒有地主，沒有富農，而由農業勞動者進行工作的。由人民中間出身的人領導着工作。這在我們這裏也就叫做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主義，這在我們這裏也就叫做社會主義的自由生活。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這裏就產生了新的選舉，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選舉，在人類歷史上不會有過先例的選舉。

既然這樣，那末怎能不向你們恭賀這個全民盛大節日，即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日呢！（全場熱烈歡呼）。

再則，同志們！我想給你們一個忠告，代表候選人給他的選舉人的忠告。如果拿資本主義國家來說，那末，在那裏的代表和選舉人間是存在着一種很特別的，可說是很奇怪的關係。當着進行選舉的時候，代表向選舉人獻媚眼，向他們阿諛逢迎，賭咒發誓說自己絕對忠實，說出一大堆各種各樣的諾言。看來，代表是完全依賴於選舉人的。只要選舉已經舉行，而候選人已變成代表的時候，這種關係就根本改變了。不是代表依賴於選舉人，而是代表完全獨立。在四年或五年間，即直到下次選舉時為止，代表是覺得自己完全自由，不依賴於人民，不依賴於自己選舉人的。他可以從一個營壘轉到另一個營壘中去，他可以從正路上轉到邪路上去，他甚至可以幹一些不很清白的勾當，他可以任意打筋斗，——他是獨立的。

這種關係可以說是正常的麼？同志們！無論如何都不可這樣說。我們憲法估計到這一點，所以它特別定出一條法律，根據這條法律，如果某代表竟耍起把戲來，如果某代表竟離開正軌，如果某代表竟忘記自己是依賴於人民，依賴於選舉人的，那末選舉人就有權先期撤回他們的這個代表。

同志們！這是一條很好的法律。當代表的人應當知道：他是人民的公僕，是人民派往最高蘇維埃的使者，他應當遵循人民所訓示他的路線來動作。如果代表竟離開正軌，選舉人就有權要求實行新選舉，就有權叫這種離開正軌的代表滾開（笑聲，鼓掌）。這是一條很好的法律。我的忠告，代表候選人對他的選舉人的忠告，就是要你們記着選舉人底這個權利，即先期撤回代表的權利，要監察自己的代表，要監督他們，如果他們要想離開正軌，就叫他們滾開，要求宣佈實行新選舉，而政府就務須宣佈實行新選舉。我的忠告，就是請你們記着這條法律，並在必要時運用這條法律。

最後，還有一個忠告，代表候選人給他的選舉人的忠告。如果拿選舉人可以向自己的代表提出的一切要求中的起碼要求來說，那末究竟必須向他們要求些什麼呢？

選舉人，人民，應當要自己的代表們始終稱職；要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墮落為政治上的庸人；要他們始終不愧為列寧式的政治活動家；要他們始終做一個像列寧那樣明顯確定的活動家（鼓掌）；要他們像列寧那樣在戰鬥中大胆無畏，對人民公敵毫不留情（鼓掌）；要他們在事情開始複雜化，當地平線上呈現某種危險的時候，一點也不慌張，絲毫也不慌張；要他們像列寧那樣絲毫也不慌張（鼓掌）；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需要周密認清環境，周密計較各個正反方面時，能夠像列寧那樣明哲鎮定（鼓掌）；要他們像列寧那樣正直忠誠（鼓掌）；要他們像列寧那樣愛護自己的人民（鼓掌）。

我們能否說，所有一切代表候選人都正是這樣的活動家呢？我是不會這樣說的。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人，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家。有一種人，使你簡直不能斷定他們究竟是什麼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是勇士，還是懦夫；是徹底擁護人民的人，還是擁護人民公敵的人。真有這樣的人，真有這樣的活動家。在我們布爾什維克中間，也有這樣的人。同志們！你們自己知道，醜兒是家家有的呀（笑聲，鼓掌）。俄國偉大作家戈果里用一句很中肯的話來形容了這種不確定的人，這種多像政治庸人，而少像政治活動家的人，這種不確定不成形的人：『這是些不確定的人，不三不四，簡直使你認不出他們究竟是什麼人，既不像人，又不像鬼』（笑聲，鼓掌）。關於這種不確定的人和活動家，在我國民間也有些很中肯的評語：『非牛非馬』（全場發笑，鼓掌），『既不是供神的蠟燭，又不是喂鬼的饅頭』（全場大笑，鼓掌）。

我不能完全有把握地說，在代表候選人中間（我當然很向他們

道歉)，以及在我們的活動家中間沒有這種人，沒有這種最像政治庸人的人，沒有這種按性格和面貌來說，都很像民間所說『既不是供神的蠟燭，又不是喂鬼的饅頭』的人（笑聲，鼓掌）。

同志們！我希望你們經常影響自己的代表，使他們覺得他們應當時刻記着偉大列寧底偉大儀範，處處做法列寧（鼓掌）。

選舉人底職能並不以選舉而終結。選舉人底職能，是在本屆最高蘇維埃存在的整個時期內都繼續着的。我已經講過了當某代表離開正軌時，選舉人便有權將其先期撤回的那條法律。由此可見，選舉人底義務與權利，就在於時刻監督着自己的代表，時刻提醒他們，無論如何都不可墮落到政治庸人的地步，而務須成爲像偉大列寧那樣的人物（鼓掌）。

同志們！我給你們的第二個忠告，代表候選人給他的選舉人的忠告，就是如此。（熱烈鼓掌，歷久不已，轉爲歡呼。全場起立，目送斯大林同志走往政府人員席位上去。會場上發出呼聲：『偉大的斯大林萬歲！』，『斯大林同志萬歲！』，『斯大林同志萬歲，烏啦！』，『第一個列寧主義者，聯盟蘇維埃代表候選人斯大林同志萬歲！烏啦！』）。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三百四十期。

選自斯大林所著論列寧一書，一九四七
年版，第五七至六五頁。

在克列姆里宮招待高級學校工作人員時的演說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

同志們！

讓我來舉杯敬祝科學，敬祝科學繁榮，敬祝科學人物康健。

敬祝科學繁榮，我所說的科學是不與人民隔絕，是不遠遠離開人民，而是決意服務於人民，決意把自己的一切成果交給人民的那個科學，是並非由於迫不得已，而是自願和樂意服務於人民的那個科學（鼓掌）。

敬祝科學繁榮，我所說的科學是不讓自己那些公認的老的領導者們自滿自足地閉門幽居，以科學術士自居，以科學壟斷家自居的那個科學，是懂得老科學人員與年輕科學人員聯合底意思、意義以及巨大力量的那個科學，是自願和樂意給我國年輕人材打開一切科學門戶，使他們能奪得科學高峯的那個科學，是承認將來屬於科學青年的那個科學（鼓掌）。

敬祝科學繁榮，我所說的這個科學中的人物，懂得科學原有傳統底力量和意義，並善於為科學利益來利用這些傳統，但終究不願盲從這些傳統，而當這些傳統趨於陳腐而阻礙它前進時，它儘有胆量和決心來打破舊傳統，舊標準和舊原理，而善於建立新傳統，新標準和新原理（鼓掌）。

在科學發展史中有不少勇敢人物，不管有何等障礙，都能不顧一切而打破舊說，創立新說。如加利略和達爾文以及其他許多科學勇士，是盡人皆知的。我想來說說這樣一位科學健將，這位科學健將同時又是現代最大的人物。我所指的，就是我們的導師，我們的教養者列寧（鼓掌）。請你們回憶一九一七年吧。列寧當時根據他對俄國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根據他對國際狀況的科學分析而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在俄國勝利是擺脫現狀的唯一出路。這是遠非常時科學界許多人物意料所及的結論。科學界的一位出色人物普列漢諾夫，當時以鄙視態度評論列寧，硬說列寧是『在講夢話』。而其他名不稱遜的科學界人物，硬說列寧『發瘋了』，要把他關到瘋人院裏去。當時科學界所有各種各色人物都咆哮起來反對列寧，說他是個破壞科學的人。可是，列寧却不怕反對潮流，不怕反對守舊習氣而邁步前進。結果是列寧勝利了的（鼓掌）。

你們看，這就是大胆進行鬥爭來反對陳腐科學，並為新科學開拓道路的科學勇士的模範。

有時候，開拓科學和技術新道路的，竟不是在科學界著名的人物，而是在科學界全不著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實踐家，工作革新者。這裏座中有斯達漢諾夫同志¹⁰和巴巴寧同志¹¹。他們是不著名於科學界的人物，是沒有學位的人物，是自己本行事業的實踐家。可是，誰不知道斯達漢諾夫和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在工業方面從事實際工作時，是把科學界技術界著名人物所規定的那些現行標準作為陳腐標準推翻，而施行了適合於真正科學和技術要求的新標準呢？誰不知道巴巴寧和巴巴寧探險家在流動冰上從事實際工作時，沒費特別工夫，就順便把關於北冰洋的舊觀念作為陳腐觀念推翻，而奠定了適合於真正科學要求的新觀念呢？誰能否認斯達漢諾夫和巴巴寧是科學中的革新者，是我們先進科學界中的人物呢？

你們看，在科學中竟有這樣的『奇蹟』。

我剛才所說的是關於科學。但是有各種各樣的科學。我剛才所說的那種科學，就叫作先進的科學。

敬祝我們先進科學繁榮！

敬祝先進科學界人物健康！

敬祝列寧和列寧主義健康！

敬祝斯達漢諾夫和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健康！

敬祝巴巴寧和巴巴寧探險家健康！（鼓掌）。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一百三十六期。

選自斯大林所著論列寧一書，一九四
七年版，第六六至六九頁。

檢閱紅軍時的演說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紅場

紅軍和紅海軍戰士，指揮官和政治工作人員，男工和女工，集體農莊男女莊員，智力勞動者同志們，在敵人後方，暫時陷在德國強盜壓迫下的兄弟姊妹們！我們那些破壞德寇後方的光榮游擊隊男女隊員們！

我代表蘇維埃政府和我們布爾什維克黨向你們致敬，並慶賀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四週年。

同志們！今天我們是在嚴重條件下來慶祝十月革命二十四週年。德寇棄信背義的進犯，及其強迫我們進行的戰爭，造成了威脅我國的危險。我們暫時失去了一些區域，敵人已進犯到列寧格拉和莫斯科底門前。敵人曾指望在第一次打擊之後，我們軍隊會立即潰散，我們國家會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敵人大大地失算了。我們陸軍和海軍雖然遭到暫時的失利，但還是在全部戰綫上英勇地擊退着敵人底攻擊，給敵人以嚴重損失，並且我們國家，我們全國組成了統一的戰鬥陣營，以便與我們陸軍和海軍一起實行粉碎德國侵略者。

我國曾有過比現在處境更加危急的時日。試回憶一九一八年，我們慶祝十月革命週年紀念時的情況吧。當時我國四分之三的領土都落在外國武裝干涉者手中。我們暫時失去了烏克蘭，高加索，中亞細亞，烏拉爾，西伯利亞和遠東等地區。當時我們沒有聯盟

者，沒有紅軍，——我們才開始創立紅軍，——糧食不足，武器不夠，被服缺少。當時有十四個國家圍攻我國。可是我們不曾灰心，不曾喪氣。當時我們在戰爭底火焰中組織了紅軍，並把我國變成軍營。當時，偉大列寧底精神鼓舞了我們去進行戰爭反對武裝干涉者。結果怎樣呢？我們擊潰了武裝干涉者，收回了一切失地，並爭得了勝利。

我國現時的狀況要比二十三年前好得多。我國比之二十三年前，無論就工業、糧食或原料方面來說，都要富足許多倍。我們現在有聯盟國與我們結成反對德國侵略者的統一戰線。我們現在有陷於希特勒暴政壓迫下的歐洲各國人民底同情和擁護。我們現在有精良的陸海軍挺身保衛祖國底自由和獨立。我們無論在糧食、武器或被服方面，都不感嚴重的缺乏。我們全國，我國各族人民都一致支援我們的陸軍和海軍，幫助他們粉碎德國法西斯蒂的侵略匪軍。我們的人員後備是無窮無盡的。現在偉大列寧底精神和他的勝利旗幟，也如二十三年前那樣，鼓舞着我們去進行衛國戰爭。

我們能够並且一定會戰勝德國侵略者，這難道可以懷疑麼？

敵人並不像某些驚惶失措的智識份子所形容的那樣厲害。鬼並不像人們所描畫的那樣可怕。誰能否認，我們紅軍會屢次把轟動一時的德軍擊得倉皇竄逃呢？如果不妄信德國宣傳家的誇張聲明，而去按照德國真實狀況來判斷，那就不難瞭解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是處在大破產的前面。現在德國籠罩着飢餓與貧困，在四個月的戰爭中，德國損失了四百五十萬兵士，德國流血殆盡，它的人員後備正在窮竭，憤恨的精神不僅浸入到那些陷在德國侵略者壓迫下的歐洲各國人民中，而且浸入到感於戰爭結束無期的德國本國人民中。德國侵略者正在緊張其最後的力量。毫無疑義，德國決不能長久支持這種緊張局面。再過幾個月，再過半年，也許一年——而希特勒德國就定會在其深重罪孽下破碎的。

紅軍和紅海軍戰士，指揮官和政治工作人員，游擊隊男女隊員同志們！全世界都望着你們，認定你們是能夠消滅德國侵略者匪軍的力量。陷在德國侵略者枷鎖下被奴役的歐洲各國人民都望着你們，認定你們是他們的解放者。偉大的解放使命落到了你們的肩上。要不愧為這個使命的擔負者呵！你們所進行着的戰爭是解放的戰爭，正義的戰爭。讓我們的偉大祖先——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頓斯可義，顯茲麻、明寧，季米特里、帕沙爾斯基，亞歷山大、蘇涅洛夫，米海宜爾、庫圖左夫底英姿，在這次戰爭中鼓舞着你們吧！讓偉大列寧底勝利旗幟指引着你們吧！

為完全粉碎德寇而戰！

消滅德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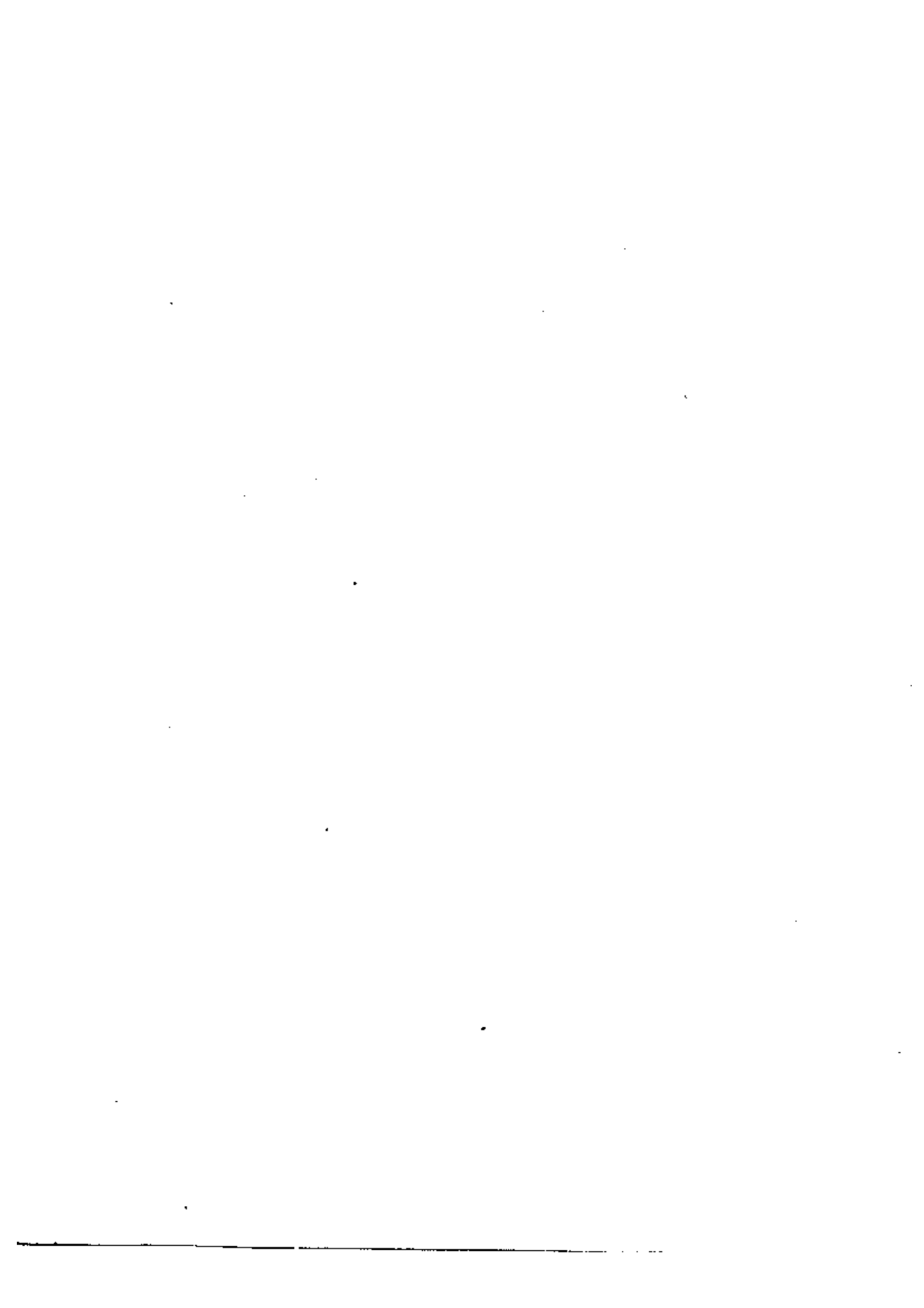
我們光榮的祖國萬歲！我們祖國底自由和獨立萬歲！

在列寧旗幟下向勝利前進！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三百一十期。

選自斯大林所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
一九四七年版，第三七至四〇頁。

列寧文選



論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底三個來源 與三個組成部分

馬克思學說在整個文明世界中都招致了全部資產階級科學（官場科學以及自由派科學）方面莫大的敵視和仇恨，這個科學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有害的宗派』。當然也決不能期望這個科學持另一種態度，因為在建築於階級鬥爭上的社會裏是不會有『公正』的社會科學的。全部官場與自由派的科學都是這樣或那樣來辯護僱傭奴隸制度，而馬克思主義却對這個奴隸制度宣佈了無情的戰爭。在僱傭奴隸制的社會裏期望公正科學，便是愚蠢可笑，正好比期望工廠主在應否以減少資本利潤來增加工資的問題上持公正態度一樣。

況且，哲學史和社會科學史已十分顯然地表明出：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與『宗派主義』相像的東西，它絕對不是一種什麼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出來的偏狹頑固的學說。恰巧相反，馬克思底全部天才，正在於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所已提出的種種問題。他的學說是直接繼承那些偉大的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底學說而起的。

馬克思學說之所以萬能，就是因為它正確。它十分完備而嚴整，給了人們一個決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動、任何辯護資產階級壓迫的思想相調和的完整世界觀。馬克思主義是人類在十九世紀所

造成的那些優秀成果，即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底當然繼承者。

現在我們就要來簡括說明馬克思主義底這三個來源及其三個組成部分。

馬克思主義底哲學是唯物主義。在歐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別是十八世紀末葉在法蘭西發生了反對一切中世紀廢物、反對農奴制機關與農奴制思想的決戰的時期，唯物主義成了唯一澈底的哲學，它忠於一切自然科學的學說，仇視迷信和虛偽習氣等等。因此，民主派底仇敵們就極力企圖『駁倒』、摧毀、誣毀唯物主義，而擁護那些歸根到底總是辯護宗教或維持宗教的哲學唯心主義派別。

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堅決地捍衛了哲學唯物主義，並屢次指明，所有一切離開這個基礎的傾向都是極端錯誤的。他們兩人底觀點，在恩格斯底兩部著作，即費爾巴黑論和反杜林中，有極明確詳盡的敘述，這兩部著作，也如共產黨宣言一樣，都是每個覺悟工人必備之書。

但馬克思並沒有以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為限，而是把哲學推向前進了。他用德國古典哲學中的成果，特別是用那引起了費爾巴黑唯物主義哲學的黑格爾體系底成果把哲學豐富起來了。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辯證法，即最完整深刻而無片面性弊病的發展學說，它認為反映着永恆發展的物質的人類認識是相對的。自然科學方面的最新發現，如鐳、電子、元素變化律等，都一反資產階級哲學家們那些『從新』回到陳腐唯心主義上去的思想，而燦爛證實了馬克思底辯證唯物主義。

馬克思加深並發展了哲學唯物主義，使其貫澈到底，將其對於

自然界的認識推廣爲對於人類社會的認識。馬克思底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先前人們對於歷史和政治的觀點是極其混亂和隨便武斷的，而現在却已有一個極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指出由於生產力發達的結果，一個社會生活制度便發展爲另一個較高的制度，例如從農奴制度中生長出資本主義。

人底意識反映着不依賴於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發展着的物質；同樣，人底社會意識（即哲學、宗教、政治等等的各種觀點與學說），也是反映着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是經濟制度的上層建築物。我們知道，例如，現代歐洲諸國的各種政體，都服務於鞏固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治。

馬克思底哲學是完備的哲學唯物主義，它給予了人類，特別是給予了工人階級一個偉大的認識工具。

二

馬克思既認爲經濟制度是政治上層建築物藉以樹立起來的基礎，於是他就特別注意研究這個經濟制度。馬克思底主要著作資本論就是專爲研究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制度而作的。

古典的政治經濟學，是在馬克思以前形成於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亞當·斯密和達維德·李嘉圖考察經濟制度時奠定了勞動價值論底始基。馬克思繼續了他們兩人底事業。他嚴整地論證並一貫發展了這一理論。他證明出：任何一個商品底價值，都是由消耗於生產這個商品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底數量所決定。

凡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見物與物間的關係的地方（商品交換商品），馬克思則揭發出人與人間的關係。商品的交換是表示經過市場來實現的各個生產者間的聯系。貨幣是表明這一聯系更加密切，把各個生產者底全部經濟生活都聯結成爲一個分不開的整體。

資本是表明這一聯系底繼續發展：人底勞動力變成了商品。僱傭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佔有土地、工廠以及勞動器具的人。工人用他的一部分工作時間來抵償維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費用（工資），而用另一部分工作時間去作無報酬的勞動，為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即利潤底泉源，資本家階級財富底泉源。

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底主要基石。

工人勞動所造成的資本，反轉來壓迫工人，破壞那些小業主，造成失業軍。大生產在工業中的勝利是一望而知的，而且在農業中我們也看得見同樣的現象：大規模資本主義農業所佔的優勢步步增加，採用機器的範圍也步步增加，農民經濟陷入貨幣資本鐵磨中，因受技術落後所壓迫而日益沒落破產。在農業方面，小生產的沒落雖取着另一種形式，但它的沒落終究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資本既打擊着小生產，同時就使勞動生產率增加起來，而造成巨大資本家同盟佔壟斷地位的局面。生產本身日益社會化，使幾十萬以至幾百萬工人聯結成爲一個有條不紊的經濟機體，——而公共勞動底產物則歸一小羣資本家所佔有。生產方面的無政府狀態，危機，瘋狂搶奪市場的鬥爭，以及民衆生活毫無保障的情形，日益加厲。

資本主義制度使工人對於資本的依賴程度增長起來，同時也就造成了統一勞動底偉大力量。

馬克思從分析商品經濟萌芽，分析簡單交換來開始考察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一直考察到資本主義底高度形式，考察到大生產。

所有一切新舊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過的情形，都是一年比一年更明顯地向更多更多的工人羣衆證明：馬克思底這一學說是完全正確的。

資本主義在全世界上獲得了勝利，但這一勝利不過是勞動對資本勝利底前階而已。

三

當農奴制度被推翻，而『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時候，立刻就暴露了一件事實，即這種自由是意味着壓迫和剝削勞動者的一種新制度。於是立刻就有反映這種壓迫和表示反對這種壓迫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發生。但初期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批評過資本主義社會，指斥過它，咒罵過它，夢想消滅它，夢想有較好的制度出現，勸導富人，說剝削是不合道德的事情。

但空想的社會主義不能指示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會闡明資本主義僱傭奴隸制底本質，也不會發現資本主義社會底發展規律，也不會找到能夠成爲新社會創造者的社會力量。

然而，在歐洲各國，特別是在法國，當封建制度，即農奴制度崩潰時發生的洶湧革命，却日益明顯地表明了階級鬥爭是全部發展進程底基礎和動力。

任何一次戰勝農奴主階級而爭得政治自由的勝利，沒有不是遇到拚命抵抗後才獲得的。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不是經過了資本主義社會各個階級間的生死鬥爭以後，才在較爲自由的民主的基礎上奠定起來的。

馬克思底天才就在於他最先由此得出了全世界歷史所訓示的結論，並把這個結論引伸到底了。這一結論就是階級鬥爭學說。

當人們還沒有學會從任何一種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詞句，聲明與約言裏面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底利益時，他們始終都是要做政治上受人欺騙和自欺的愚蠢犧牲品的。當那些主張改良改善的人們還不懂得，任何一個舊制度，無論它顯得怎樣荒謬腐敗，都是由某些統治階級底勢力支持着的時候，他們總是會受擁護舊制度的人們愚弄的。要打破這些階級底抵抗，就只有一個方法：

即必須在我們所處的社會中找出，啓迪並組織一種勢力來進行鬥爭，這種勢力能够——而且按自己的社會地位是應當——成爲足以掃除舊制度而創立新制度的力量。

只有馬克思底哲學唯物主義，才爲無產階級指明了擺脫迄今所有一切被壓迫階級所遭受的那種精神奴隸痛苦的出路。只有馬克思底經濟學說，才說明了無產階級在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無產階級底獨立組織在全世界上，從美洲到日本，從瑞典到南非洲，都日益增加起來。無產階級在其所進行的階級鬥爭中受到教育和訓練，擺脫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偏見，日益緊密地團結起來，學習估量自己的成功，鍛鍊自身的力量而不可遏止地增長起來。

一九一三年三月刊載於教育雜誌
第三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九
卷，第三至八頁。

馬克思學說底歷史命運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點，就是闡明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全世界歷史使命。自馬克思闡述這個學說以後，全世界事變進程是不是已經把它證實了呢？

馬克思最初提出這個學說，是在一八四四年。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而於一八四八年出版問世的共產黨宣言，已給了這學說一個完整的，有系統的，至今還是最好的闡述。自此時起，世界歷史顯然是分爲三個主要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一八四八年革命到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第二個時期是從巴黎公社到俄國革命（一九〇五年）；第三個時期是從這次俄國革命時起。

我們且把馬克思學說在每一時期內的命運考察一下。

一

在第一時期開始的時候，馬克思學說並未佔有統治的地位。它不過是無數社會主義派別或思潮之一而已。當時佔統治地位的，是那些在基本上與我國民粹派相似的社會主義派別：它們不懂歷史運動底唯物基礎，不會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每一階級底作用和意義，却用各種貌似社會主義的什麼『人民』、『正義』、『法權』等等

辭句來掩蓋各種民主改革底資產階級實質。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對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鬧叫囂，五花八門的社會主義派別，給了一個致命的打擊。在各國發生的革命，都把社會各階級底面目在行動上暴露出來了。共和派資產階級在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事變時槍殺工人，最終地證明了只有無產階級具有社會主義本性，而自由資產階級之害怕這一階級獨立動作，比害怕任何反動勢力還要厲害百倍。懦弱的自由派匍匐於反動勢力之前。農民以封建殘餘底廢除為滿足，轉到現存秩序方面去，而只是間或動搖於工人民主派與資產階級自由派之間。一切關於非階級社會主義和非階級政治的學說，都證明是些無謂的胡說。

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最終結束了這一資產階級改革的發展過程；只是由於無產階級的英勇，才使共和制度即階級關係顯現得最露骨的那種國家組織形式穩固起來。

在歐洲其他一切國家裏，較為混亂而不完備的發展過程也是引到了同一資產階級社會的形成。到第一時期（一八四八至一八七一年），即風暴與革命時期終結時，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死亡下去。新誕生了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第一國際（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二年）和德國社會民主黨。

二

第二時期（一八七二至一九〇四年）與第一時期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帶有『和平』性質而沒有發生過革命。西方已完結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東方向未成熟到實現這種革命的地步。

西方進入了『和平』準備將來改革時代的階段。到處都形成着根本上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政黨，它們學習利用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創辦自己的日報，自己的教育機關，自己的職工會以及

自己的合作社。馬克思學說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並且廣泛傳播起來了。積聚與團結無產階級力量，準備無產階級去作將來戰鬥的過程，慢慢地，可是一往直前地進展着。

歷史底辯證律是這樣：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也換上一套馬克思主義者的衣衫。內臟腐朽了的自由派，企圖在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形態下復活起來。他們把準備力量去進行偉大戰鬥的時期解釋成放棄這種鬥爭。他們把力求改善奴隸狀況以便進行反僱傭奴隸制鬥爭一事解釋成奴隸們為換得幾文銅錢而出賣本身自由權。他們懦怯地宣揚『社會和平』（即是同奴隸制度講和平），背棄階級鬥爭等等。在充當國會議員的社會黨人，工人運動的各種官僚以及『表同情的』智識份子中間，他們有很多信徒。

三

當機會主義者還在拚命讚美『社會和平』，拚命鼓吹說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風暴的時候，而極大的世界風暴底新泉源已在亞洲湧現出來了。緊跟着俄國革命發生的有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革命。我們現在正處於這些風暴盛行及其『反轉來影響』歐洲的時代。不管那些『文明』豺狼磨牙欲噬的偉大中華民國命運如何，但世界上決沒有一種力量能在亞洲恢復舊有的農奴制度，能剷除亞洲國家和半亞洲國家裏人民大眾底英勇民主精神。

有些不注意羣衆鬥爭準備條件和發展條件的人，看見歐洲反資本主義決戰長期遷延下去，就陷於失望和無政府主義的地步。現在我們看見，這種無政府主義的失望是多麼近視，多麼小氣呵。

亞洲八萬萬人民已加入了爲同是歐洲那些理想的鬥爭——從這一事實中所應得出的不是失望，而是勇氣。

亞洲各國革命向我們顯示出來的，同樣是自由派底懦怯卑鄙的劣根性，同樣是民主羣衆獨立性所具有的特別巨大意義，同樣是無產階級與任何資產階級間的鮮明分野。有了歐亞兩洲經驗之後，誰若還說什麼非階級的政治和非階級的社會主義，那他就只配放置在籠子裏，陳列在澳洲袋鼠一塊去供人觀賞了。

歐洲也跟着亞洲——不過不是按照亞洲方式——動作起來了。一八七二至一九〇四年的『和平』時期已是永逝不返了。物價的高漲和托拉斯的壓榨已使經濟鬥爭空前尖銳化，甚至使那些受自由主義腐化最深的英國工人也動作起來。就是在德國這個最『頑固的』資產階級地主國家裏，政治危機也在迅速成熟。狂熱的軍備競爭和帝國主義的政策，使得現代歐洲的『社會和平』活像一桶火藥。一切資產階級政黨解體與無產階級成熟的過程，是在一往直前地進展着。

自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後，全世界歷史三大時代中的每一時代，都使它獲得了新的證實與新的勝利。但行將到來的歷史時代，定會使馬克思主義這個無產階級學說獲得更大的勝利。

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刊載於真理報
第五十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
第五四四至五四七頁。

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

有名的成語說得好：如果幾何學定理觸犯了人們底利益，那末人們也一定要把它推翻的。觸犯了神學陳腐偏見的自然歷史理論，過去和至今還在引起最激烈的鬥爭。馬克思學說既然是直接致力於啓發與組織現代社會先進階級的事業，指明這一階級底任務，並證明由於經濟發展，現代制度必然要由新制度來代替，所以這一學說在其生命途程中必須用戰鬥來爭取每一步的進展，也就毫不足怪了。

不用說資產階級科學和哲學，不用說這種專由官家教授按官家方式講授，藉以愚弄那些從有產階級出身的青年子弟並『教練』他們去反對內外敵人的科學和哲學了。這種科學根本就不願聽見馬克思主義，却宣佈說馬克思主義已被駁倒，已被毀滅。無論藉駁斥社會主義來獵取名利的青年學者，亦無論拘守各種陳腐『體系』遺教的龍鍾老朽，都是一樣努力攻擊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工人階級中間的傳播與鞏固，必然使資產階級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攻擊更加頻繁，更加劇烈；但馬克思主義每次被官場科學『消滅』之後，却反而愈加鞏固，愈加堅強，愈加生氣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與工人階級鬥爭相聯繫，主要是流行於無產階級的學說中間，馬克思主義也絕不是一下子就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存在的頭半世紀中（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就和那些根本上與它相敵對的理論進行過鬥爭。在四十年代前半期，馬克思與

恩格斯打破了那些站在唯心主義哲學觀點上的急進少年黑格爾派。四十年代末，在經濟學說方面進行過反對蒲魯東主義的鬥爭。五十年代完成了這個鬥爭：批評了那些在狂風暴雨的一八四八年顯過身手的黨派與學說。在六十年代，鬥爭從一般理論方面轉移到更接近於直接工人運動的方面：把巴枯寧派從第一國際裏驅逐出去了。在七十年代初期，蒲魯東主義者米別赫在德國出了一個短時期的風頭，而在七十年代末葉，又有實證主義者杜林暫時顯露過頭角。但他們兩人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已是非常微弱了。馬克思主義已經是無條件地戰勝了工人運動中其他一切思想體系。

到前世紀九十年代，這一勝利在大體上是已經完成了。就是在蒲魯東主義傳統保持得最久的拉丁語系諸國內，工人政黨實際上也是把自己的綱領與策略建築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重新恢復起來的國際工人運動組織，即定期舉行的國際代表大會，立刻而且幾乎沒有經過什麼鬥爭，就在一切主要問題方面都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了。但當馬克思主義把一切多少完整而與馬克思主義相敵對的學說排擠出去以後，這些學說所表現的趨向便開始來另找出路。鬥爭底形式與誘因已經改變，但鬥爭還是繼續着。馬克思主義存在的第二半世紀（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是從馬克思主義內部一個反馬克思主義派別所進行的鬥爭開始的。

這個派別稱呼為伯恩施坦派，是因為以前的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伯恩施坦囂張得最厲害，並以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對於馬克思學說的修改，對馬克思學說的篡改，即修正主義。就是在俄國這個因國內經濟落後以及被農奴制殘餘所蹂躪的農民人口佔大多數，致使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自然支持得最久的國家裏，這個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顯然迅速地轉變為修正主義。我們的社會民粹派無論在土地問題上（全部土地市有的綱領），或在綱領和策略底一般問題上，都愈益以對於馬克思的種種『修正』，來代替他們根本與馬

克思主義相敵對而自成一派的舊體系底那些日益消亡沒落的殘餘。

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已被擊潰了。它已不是站在自己的獨立基地上而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基地上，以修正主義資格來繼續鬥爭了。我們且來把修正主義底思想內容考察一下。

在哲學方面，修正主義追隨於資產階級教授的『科學』尾後。教授們主張『回到康德那裏去』，於是修正主義者也就跟在新康德派後面跑。教授們重複那些說過千番百次的反哲學唯物主義的神道主義濫調，於是修正主義者也就傲慢地微笑着，咕嚕着（依據最近出版的教本逐字逐句咕嚕着），說唯物主義早已被『駁倒』了；教授們把黑格爾當作一條『死狗』來對付，聳肩驕視辯證法，而自己却又宣揚一種比黑格爾唯心主義還要淺薄鄙陋一千倍的唯心主義，於是修正主義者也就隨着他們跳到在哲學方面把科學庸俗化的泥坑裏去，並用『簡單的』（而且平靜的）『進化論』去代替『狡猾的』（而且革命的）辯證法。教授們拿他們那些唯心主義的和『批判的』體系去適應佔統治地位的中世紀『哲學』（即神學），以酬答他們所領得的官家薪俸，於是修正主義者也就依附於他們，努力把宗教變成爲一種『私人事情』，當然不是對現代國家說，而是對先進階級底政黨說是『私人事情』。

對馬克思學說所作的這些『修正』底真正階級意義根本就無須說明，因爲這是不說自明的。我們只要指出，在國際社會民主黨中，只有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從一貫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上批評過修正主義者在這裏胡吹瞎說的鄙陋論調，——這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普列漢諾夫。其所以必須堅決指出這點，是因爲現在有一些非常錯誤的企圖，想以批評普列漢諾夫在策略方面的機會主義爲藉口來販運陳腐反動的哲學廢物*。

*參看波格丹諾夫，巴查羅夫等人合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概論。這裏不是分析這本書的地方，我此刻祇要聲明一句：在最近將來，我就要寫幾篇論文或一本特別

說到政治經濟學時，首先就要指出，修正主義者在這一方面所作的『修正』是更繁雜周密得多，他們企圖拿『經濟發展中的新材料』來迷惑大眾。他們說，生產集中以及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的過程，在農業方面全不發生，並且在商業和工業方面也發生得非常緩慢。他們說，現在危機已更少見，更微弱了，而卡特爾和托拉斯大概會使資本有根本消除危機的可能。他們說，階級矛盾有緩和削弱下去的趨勢，所以資本主義『崩潰論』是沒有根據的。最後他們還說，連馬克思底價值論也不妨按照彭巴威爾克觀點來改正一下哩。

在這些問題上對修正主義者進行的鬥爭，正像二十年前恩格斯與杜林進行的論戰一樣，使國際社會主義底理論思想有了成效卓著的活躍，根據事實和數字來把修正主義者底論據作了詳細的解剖，證明了修正主義者一貫粉飾現代小生產的事實。不僅在工業方面，而且在農業方面，大生產在技術上與營業上比小生產佔有優勢的事實，是用不容辯駁的材料來證明了。但在農業方面，商品生產發展的程度比較薄弱得多，所以現代的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通常都不會把農業方面那些表明農業愈益捲入世界經濟交換範圍的特別生產部門（以至於單個生產手續）提出加以分析。在自然經濟底廢墟上，小生產是專靠飲食無限惡化，經常挨餓，延長工作時間，使家畜質量及其飼養惡化，總之，是專靠家庭手工業生產所用以反抗資本主義手工工場的那些手段來支持的。科學與技術方面的每一進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壞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小生產底基礎，而社會主義經濟學底任務就是要研究這一過程所表現的一切形式，往往是複雜而混亂的形式，要向小生產者證

小冊子來指出，本文上關於新康德派修正主義者所說的一切，實質上也是針對着這些新休謨派和新柏克立派的『新』修正主義說的¹²。

明，他們在資本主義統治時無法支持下去，小農經濟在資本主義統治時沒有出路，農民必須轉到無產者底觀點上來。從科學方面來說，修正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過失，就是他們用膚淺的態度把某些隨便抽出來的片面事實普遍化，却不顧及它們與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聯繫；從政治方面來說，他們的過失就是他們必然——不管是有意或無意——號召農民或推動農民去接受私有主底觀點（即資產階級底觀點），而不是推動他們去接受革命無產者底觀點。

在危機論與崩潰論問題上，修正主義底情形更是糟糕。只有在最短促的時期內，並且只有最近視的人，才會因受幾年工業興盛和繁榮所惑而想改造馬克思學說底基礎。危機之沒有消除，是實際情形很快就對修正主義者證明了的事實：在繁榮之後，接着就來了危機。個別危機底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變了，但危機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卡特爾和托拉斯是把生產統一起來了，但同時又顯然使生產方面的無政府性日益加厲，使無產階級生活的困苦以及資本的壓迫日益加厲，於是就使階級矛盾尖銳到空前的程度。資本主義走向崩潰的趨勢，無論指個別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來說，或指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完全崩潰來說，都恰巧是由那些最新的巨型托拉斯特別顯著和特別廣泛地表明出來了。不久以前在美國發生的財政危機，全歐洲失業人數可驚的增加，更不用說有許多標誌指明其快要到來的工業危機，——所有這一切都使修正主義者不久以前的『理論』已被所有一切人忘却，似乎連許多修正主義者自己也把它忘却了。只有這種智識份子的不堅定性所給予工人階級的那些教訓，才是不應忘記的。

講到價值論問題時所要說明的只有一點：就是除了一些非常模糊的暗示和讚嘆彭巴威爾克的論調而外，修正主義者在這方面絕對

沒有拿出什麼東西來，所以他們在科學思想的發展上，也就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跡。

在政治方面，修正派曾企圖真正修改馬克思主義底基礎，即階級鬥爭學說。他們說：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選制已把階級鬥爭底基地消滅下去，而使共產黨宣言上所說『工人無祖國』這個老原則成爲不正確的了。他們說，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由『大多數人底意志』佔統治，所以就不能把國家看作是階級統治底機關，也不能拒絕與社會改良派的進步資產階級結成聯盟去對抗反動派。

毫無疑義，修正主義者底這些反對意見，是個頗爲嚴整的觀點體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那些自由資產階級的觀點體系。自由派向來都說，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消除階級與階級區分，因爲所有一切公民都同樣擁有投票權與參政權。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全部歐洲史與二十世紀初期的全部俄國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這種觀點非常荒謬。在『民主』資本主義的自由下，經濟上的區別不僅不減弱下去，反而加強加厲起來。國會制度不僅不把甚至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是階級壓迫機關的事實取消，反而將其明白揭示出來。國會制度幫助去啓發和組織廣大民衆，其人數要比先前積極參加政治事變者多過無數倍，——但國會制度以此所準備的並不是使危機與政治革命歸於消滅，而是使國內戰爭在政治革命發生時最高限度尖銳化。一八七一年春的巴黎事變與一九〇五年冬的俄國事變¹³，已非常明顯地證明這種尖銳化是必然到來的。法國資產階級絲毫也沒有躊躇，立刻就與民族公敵，與蹂躪其祖國的外國軍隊勾結起來鎮壓無產階級運動。誰不懂得國會制度與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必然內在辯證規律引向於比先前更激烈地用羣衆強力手段去解決爭執，那他就永遠不能在這個國會制度基地上去進行原則上堅定的宣傳與鼓動，去真正準備工人羣衆勝利地參加這種『爭執』的解決。在西歐與社會改良主義自由派實行聯合妥協和聯盟的經驗，以及在俄國革

命中與自由改良派（立憲民主黨）實行聯合妥協和聯盟的經驗，都已十分確鑿地證明這種妥協只能模糊羣衆意識，因為這種妥協不是加強，而是減弱羣衆鬥爭底真正意義，把努力鬥爭的人與那些最不能鬥爭、最動搖、最富於叛變性的份子混在一起。法國的米勒蘭主義¹⁴，是在真正全國的廣大範圍內運用修正主義政治策略的最大嘗試，它給了修正主義一個使全世界無產階級永遠也不會忘掉的實際估計。

修正派對於社會主義運動最終目的所持的態度，是從他們經濟傾向與政治傾向中自然得出的結果。『最終目的算不得什麼，運動就是一切』，——伯恩施坦這句流行一時的話，要比許多長篇議論更能表明修正主義底實質。（臨時應付，遷就眼前事變，遷就細小政治變動，忘記無產階級底根本利益，忘記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整個資本主義演變底基本特點，爲謀暫時的實際利益或想像中的利益而犧牲無產階級底根本利益，——這就是修正主義的政策）。從這一政策底實質中，也就可以明白知道這一政策可能採取無窮繁雜的形式，而每一個稍微『新穎的』問題，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沒有預察到的變動，即令這種變動只是在極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時期內改變基本發展路線，也必然會引起某種修正主義的。

▽ 修正主義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它在現代社會中有其階級的根源。修正主義是國際的現象。每一個稍有見識稍有頭腦的社會主義者，都能十分明白：德國正統派與伯恩施坦派間的關係，法國黑得派與饒勒斯派（現在尤其是布魯斯派）間的關係，英國社會民主聯盟與獨立工黨間的關係，比利時普勞克爾與王德威爾得間的關係，意大利整體派與改良派間的關係，俄國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間的關係，實質上到處都是一樣，雖然按所有這些國家底現狀來說，彼此有極不相同的民族條件和歷史特點。現代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分野』，實際上現時在世界各國都已經是按着一條路線進行着，

這表明比之三四十年前已有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當時在各個國家內鬥爭的並不是統一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一些同樣的趨向。而現時在拉丁語系諸國表現爲『革命工團主義』的『左的修正主義』却也都依附於馬克思主義，而加以『修正』：意大利的拉布里奧拉，法蘭西的拉葛德爾，開口閉口都說他們反對向來被人瞭解得不正確的馬克思，而訴之於現在他們瞭解得正確了的馬克思哩。

我們在這裏不能分析這個修正主義底思想內容，它還遠不如機會主義派的修正主義發展那樣成熟，還沒有國際化，而且無論在那一個國家裏都還沒有與社會主義政黨作過一次巨大的實際搏戰。因此，我們在這裏只以分析上述那個『右的修正主義』爲限。

爲什麼修正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不可避免的呢？爲什麼它的根源比民族特點的區別和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區別還要深刻呢？這是因爲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裏，都存在有一些與無產階級並立的廣泛的小資產者階層，即小業主階層。資本主義是從小生產中誕生出來，並且經常從小生產中誕生着的。資本主義必然要重新產生出許多『中間階層』（工廠附屬物，如家庭包工，以及因適應大工業如自行車工業和汽車工業需要而散佈全國的小作坊等等）。這些新的小生產者也是不免要被拋入無產階級隊伍的。所以，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當然也就往往在廣大工人政黨隊伍中暴露出來。這種情形當然是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到無產階級革命發生的時候還要繼續存在，因爲若以爲必須有大多數人口『完全』無產階級化時才可實現無產階級革命，那就是極錯誤的想法。凡現時我們往往僅在思想方面經歷着的事情，即同那些修正馬克思理論的人進行的爭論；凡現時在實踐方面僅按工人運動個別局部問題暴露出來的事情，即我們與修正派間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分裂，——這在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發生時是工人階級一定要在更大得無比的範圍

內經歷到的，因為無產階級革命將使一切爭論問題尖銳化，將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對於決定羣衆行動有最直接意義的各點上，將迫使我們在鬥爭激烈時區分友敵，拋開那些惡劣的同盟者，以便給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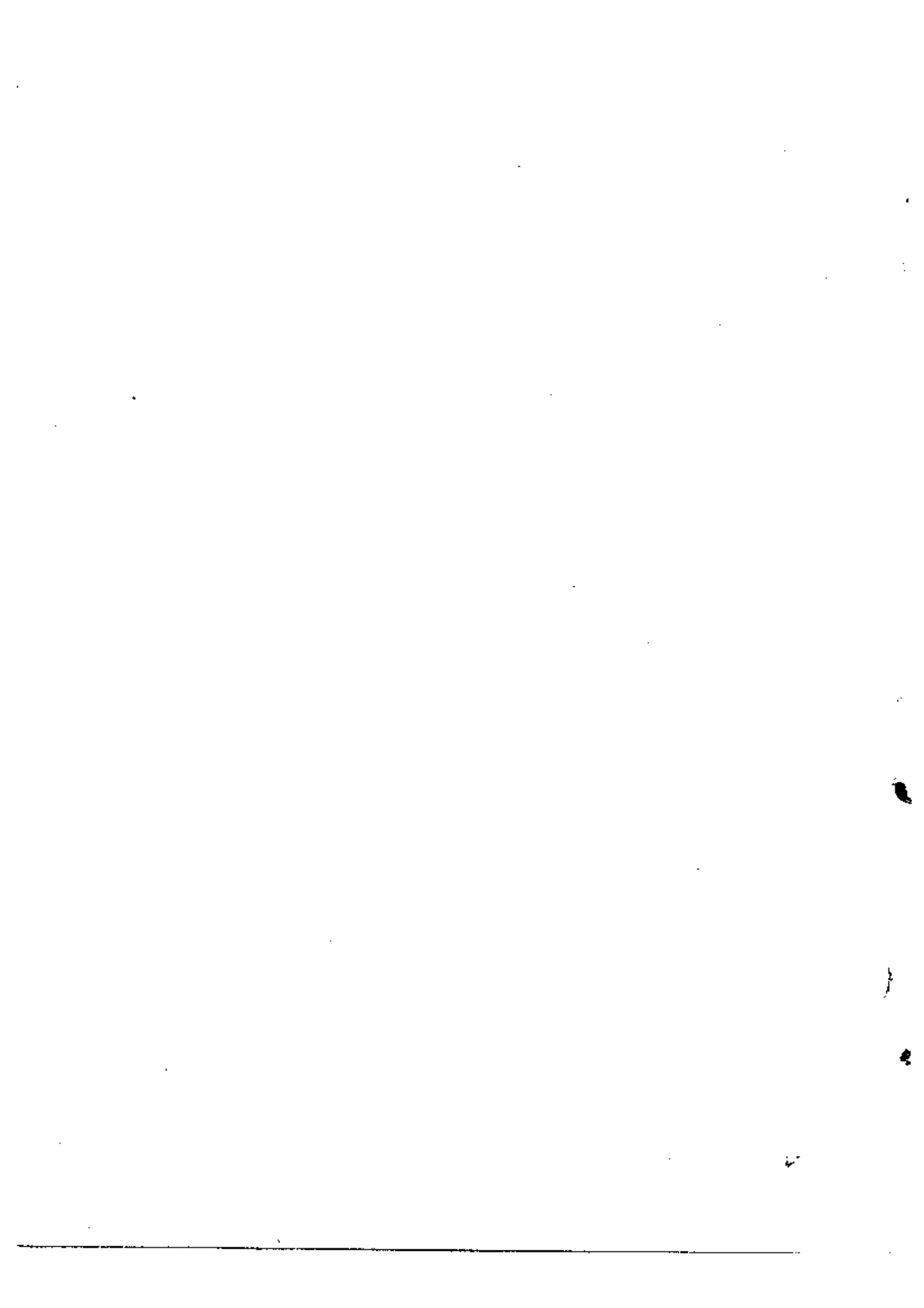
革命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在十九世紀末葉進行的思想鬥爭，不過是無產階級偉大革命搏戰底序幕而已；無產階級不顧市儈們如何動搖與懦弱，而向前邁進去爭取本身事業底完全勝利。

一九〇八年刊載於聖彼得堡出版的馬克思(一八一八年至一八八三年)文集。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五卷，第一五至二五頁。



爲在俄國建立社會民主
工人黨而鬥爭



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 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

（回答俄國財富雜誌上反對馬克思主義者的論文）

俄國財富雜誌開始了反對社會民主黨人的戰役。該雜誌魁首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還在去年第十期上，就已宣佈說要舉行反對『我國所謂馬克思主義者或社會民主黨人』的『論戰』。隨後就出現了克里元科先生所著論文化孤士一文（第十二期）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著文藝與生活一文（俄國財富一八九四年第一第二兩期）。至於該雜誌自己對我國經濟現實的見解，那末尤沙可夫先生在俄國經濟發展問題一文中（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是把它敘述得最完備的了。這些先生雖在其雜誌上一般以表白真正『人民之友』底思想和策略自命，其實却是社會民主黨人底死敵。現在我們就來把這些『人民之友』，把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把他們的思想，把他們的策略仔細考查一下。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最注意於馬克思主義底理論根據，於是他就來專門分析唯物史觀。在大體上敘述了許許多多解說這個學說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底內容以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以如下一段文句來開始批評。

『首先，——他說道，——自然要發生這樣一個問題：馬克思究竟在那一部著作中敘述了自己的唯物史觀呢？在資本論中，他作

出了把邏輯力量和淵博學識，和細心研究全部經濟學文獻以及相當事實的工作結合起來的模範。他把早已被人們忘掉，或現在誰也不知道的那些經濟學理論家揭示出來，他對工廠檢查員各種報告中，或專門家在各種專門委員會裏所陳述的極瑣屑的詳情細節，也沒有忽視；總而言之，他蒐羅了極浩繁的事實材料，一部分用來論證，一部分用來解釋他的經濟理論。如果說他真正創造了『嶄新的』歷史過程觀，根據新觀點來說明了人類底全部過去，並總結了迄今所有一切哲學歷史理論，那他當然就會要用同樣細心的態度來做成這件事情，就是說，他當然就會要真正重新審查所有一切關於歷史過程的著名理論，當然就會要給這些理論以批評的分析，當然就會要研究全世界歷史中的巨量事實。如馬克思主義文獻中通常所作的那樣把馬克思和達爾文比照一下，就更可確信這一意見了。達爾文底全部作品是什麼呢？這就是把浩如煙海的事實材料總結起來而具有綜合性的，彼此緊相聯系的幾點思想。而馬克思底相當作品又在那裏呢？這種作品是沒有的。不僅馬克思沒有這種作品，而且在全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也沒有這種作品，雖然這文獻是數量浩繁而牽涉很廣的』。

這一段議論就是極其顯然地證明，人們是怎樣很少懂得資本論和馬克思呵。他們被馬克思著作中的莫大實證力量所壓服，竟不得不在馬克思面前叩首恭維，讚美他，同時却完全忽略他那個學說底基本內容，而泰然自若地繼續歌唱那些『主觀社會學』的舊調。說到這裏，不能不回想起考茨基在其所著論馬克思經濟學說一書前面選載的一段很正確的題詞：

Wer wird nicht einen Klopstock loben?

Doch wird ihn jeder lesen? Nein.

Wir wollen weniger erhaben

Und fleissiger gelesen sein!*

* 誰不讚美克洛普施托克呢？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會來閱讀他的著作呢？不會

正是如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應當少讚美馬克思一些，而多用一點心來閱讀馬克思底著作，或者——更好一點說——多認真一點來思索自己所讀的東西。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出了把邏輯力量和淵博學識結合起來的模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這樣說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這句話裏作出了把燦爛詞句和空洞內容結合起來的模範，——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曾這樣評論說。而這個評語是完全公正的。的確，馬克思底這一邏輯力量究竟表現在那裏呢？它產生了怎樣的結果呢？讀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套議論時，簡直可以設想：這全部力量都不過是用於最狹窄的『經濟理論』而已。同時爲要更令人覺得馬克思表現其邏輯力量的範圍狹小起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着重指出『極瑣屑的詳情細節』，『細心研究』，『誰也不知道的那些理論家』等等。這樣看來，似乎馬克思對於這些理論構造方法方面並沒有加進任何值得指出而根本是新的東西，似乎他是把經濟學保留在過去經濟學家所原有的範圍內，而沒有將其擴大，沒有提出對於這科學本身的『嶄新的』見解。然而，每個讀過資本論的人，都知道這完全是撒謊。說到這裏，不能不回想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十六年前與一個鄙陋的資產者老爺柔科夫斯基爭辯時評論馬克思的文字¹⁸。也許是因爲當時的時候不同吧，也許是因爲當時的情感新鮮些吧，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當時那篇文章，無論在論調或內容方面，都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哩。

『『本書底終極目的，是要發現現代社會發展底法則（原文是 Das oekonomische Bewegungsgesetz 即進展底經濟法則）』，——馬克思關於自己的資本論這樣說，並且他嚴格遵行了自己的綱領』，——在一八七七年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這樣評的。我們唯願人們少恭維我們一些，而多用一點心來閱讀我們的著作吧！（列辛）。——譯者。

論的。我們就來更仔細考查這個嚴格——據批評者承認說——遵行了的綱領吧。這個綱領就是要『指明現代社會發展底經濟法則』。

這個定義本身，就使我們碰見幾個需要解說的問題。爲什麼在馬克思以前的所有一切經濟學家都是談論一般社會，而馬克思却說『現代(modern)』社會呢？他究竟是在什麼意義上使用『現代』一語，究竟是按什麼標誌來特別劃分出這個現代社會呢？其次，社會進展底經濟法則，又是什麼意思呢？我們時常聽見經濟學家說，——而這正是俄國財富所屬的那種政論家和經濟學家們所喜愛的思想之一，——只有財富生產才專受經濟法則所支配，而分配則依政治爲轉移，依政權和智識界等等對於社會的影響如何爲轉移。馬克思究竟是在何種意義上說社會進展底經濟法則，而且把這個法則叫作Naturgesetz，即自然法則呢？爲什麼許許多多祖國社會學家却又大書特書，說應把社會現象從自然歷史現象中作爲特殊部門劃分出來，說因此對於研究前者必須採用完全特別的『社會學主觀方法』呢？

所有這些疑難，都是自然並且必然要發生的，而且當然只有完全不學無術的人，才能在講到資本論時忽略這些疑難。爲要弄清這些問題起見，我們且先從資本論同一序言中再引證一段話來，這段話是只比上述引證稍後幾行的：

『我的觀點，——馬克思說道，——就在於我把社會經濟形態底發展，看成是自然歷史過程』。

只要把我們從序言裏引來的這兩段話簡單對照一下，就可看出資本論底基本思想正在於此，而這個思想——如我們已經聽見的那樣——是以罕見的邏輯力量來嚴格遵行了的。說到這裏，我們首先就要指出兩件事實：馬克思只說到一個『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換言之，馬克思說他所研究的，只是這個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底法則，而不是其他什麼社會經濟形態。這是第一。第二，我們且指出馬克思用以擬定其結論的方法：這種方法——如

我們剛才聽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說的那樣——就是『細心研究相當事實』。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我們那位主觀哲學家想以非常機巧手段來迴避不說的資本論這一基本思想。社會經濟形態概念底內容究竟是什麼呢？怎樣才可以而且應當把這種形態底發展認為是自然歷史過程呢？——這就是現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我已經指出，從那些舊的（不是對俄國說來是舊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底觀點看來，社會經濟形態概念是完全用不着的，因為他們是談論着一般社會，是和斯賓塞派爭論着一般社會是什麼，一般社會底目的和實質是怎樣等等。在這種議論中，這些主觀社會學家所憑藉的論據，就是說什麼社會底目的是為社會全體組成員謀利益，因此公平正義就要求有某一種組織，凡屬不合乎這種理想（『社會學應從某種空想開始』，——主觀方法首創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說的這句話，把他們那種方法底實質表明得最好不過了）組織的制度，都是不合常態而應被取消的。『社會學底重要任務，——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這樣說，——是要闡明那些使人類天性底某些需要能得到滿足的社會條件』。你們看見，這位社會學家所感覺興趣的，只是那個能夠滿足人類天性的社會，而完全不是什麼社會形態，何況這些社會形態還可能是以一種不合『人類天性』的現象，如少數人奴役多數人的現象為基礎的。你們同樣看見，從這位社會學家底觀點看來，根本就談不到把社會發展看作是自然歷史過程。（『社會學家既然認為某種東西符合於心願或不符合於心願，就應當找到實現這個符合於心願的東西，或取消那不符合於心願的東西的條件』，即『實現某種某種理想的條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這樣說道）。不僅如此，而且甚至根本談不到什麼發展，而只可談到那因為…因為人們不聰明，不善於好好理解人類天性要求，不善於找到實現這種合理制度的條件，而在歷史上偶然發生過的種種離開『心

願』的偏向和『缺陷』。顯而易見，馬克思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底自然歷史過程的基本思想，是根本摧毀這種妄想以社會學自命的幼稚道理的。馬克思究竟是用什麼方法製定出這個基本思想的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從社會生活各種部門中劃分出經濟部門，從所有一切社會關係中劃出生產關係，當作是決定其他一切關係的基本始初關係。馬克思自己把他對於這個問題的推論經過描寫如下：

『我爲要解決那些使我激動不安的疑難起見而着手進行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對於黑格爾法權哲學的批判審查… 我這番研究工作使我得出結論如下：法權制度，也如國家形式一樣，決不能用它們本身來解釋清楚，也不能用所謂人類精神一般發展過程來解釋清楚；恰巧相反，它們是根源於物質生活關係，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英法作家的先例，曾把這些關係底總和稱之爲『公民社會』。對於公民社會的解剖，應當在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研究政治經濟學時所得出的… 一般結論，可以簡括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 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就組成爲社會底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所藉以樹立起來，而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其相適應的那個現實基礎。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它們的… 那些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於是在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物中也就或遲或速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經濟生產條件方面所發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學精確眼光指明出來的物質變

革，去與人們所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言之，思想形式，——分別清楚。正如我們評判一個人時不能以他對於自己的揣度為根據一樣，我們評判這樣一個變革時代時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恰巧相反，這個意識正須從物質生活底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中求得解釋……大體說來，亞洲生產方式，古代生產方式，封建生產方式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可以看成為社會經濟形態發展中的幾個演進時代』¹⁶。

社會學中這個唯物主義思想，本來就是英明的思想。當然這暫時還曾是一個假設，但這個假設是第一次使人有可能用嚴格科學態度對待歷史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假設。在此以前，社會學家不善於向下探究如像生產關係這樣最簡單和這樣始初的關係，却逕直着手探考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而一碰到這些形式是由於當時人類某種思想所產生的事實，就停留於此；結果似乎社會關係是由人們自覺地建立起來的。但這個充分表現於 *Contrat Social*¹⁷ 思想（這思想底痕跡，在所有一切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中都表現得十分顯然的）中的結論，是和所有一切歷史觀察完全矛盾的。從來沒有過，而且現在也沒有這樣的事，說是社會組成員們竟會把他們在其中生活的社會關係總和，看作是由某種原則所貫徹的一定的完整的東西；恰恰相反，大眾是不自覺地適應於這些關係的，而且根本不瞭解這些關係是特殊的歷史社會關係，例如人們千百年來在其中生活的交換關係，只在最近時期才得到了說明。唯物主義既繼續加深分析而發現人們這些社會思想本身底起源，就排除了這個矛盾；而只有它關於思想行程取決於物質行程的結論，才是可與科學的心理學相容的結論。其次，從另一方面說，這個假設也是第一次把社會學提到了科學的高度。在此以前，社會學家總是難於把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網中的主要現象和次要現象分別清楚（這也就是社會學中的主觀主

義底根源），不能找到實行這種劃分的客觀準繩。唯物主義提供了一個完全客觀的準繩，因為它把『生產關係』劃分出來作為社會結構，而使人有可能把主觀主義者所認為不可應用到社會學上來的一般科學上的重複律，應用到這些關係上來。當他們還局限於思想社會關係（即在其形成以前經過人們意識*的關係）時，始終不能發現各國社會現象中的重複性和常規性，所以他們的科學至多也只是這些現象底記載，生硬材料底收集。分析物質社會關係（即不經過人們意識而形成的那種社會關係：人們在交換產品時彼此發生生產關係，而同時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這裏有社會生產關係存在着），立刻就可發見重複性和常規性，並把各國制度綜合為一個基本概念，即社會形態。只有運用這樣的綜合方法，才有可能由記載社會現象（和以理想為觀點來估計社會現象）過渡到用嚴格科學方法分析社會現象，劃分出——譬如說——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和另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東西，而研究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的東西。

最後，第三，這個假設之所以第一次造成了使科學社會學出現的可能，還因為只有把社會關係歸結於生產關係，把生產關係歸結於生產力高度，才給了堅固根據來把社會形態發展過程看作自然歷史過程。沒有這種觀點，當然也就不能有什麼社會科學。（例如，主觀主義者雖承認歷史現象底規律性，但不能把這些現象底進化看作自然歷史過程，這正因為他們僅以指出社會思想和人們目的為限，却不善於把這些思想和目的歸結於物質社會關係）。

馬克思在四十年代提出這個假設以後，就來按事實（這要請 nota bene**）研究材料。他從各個社會經濟形態中拿出一個形態，即拿出商品經濟制度來加以研究，並根據非常浩繁的材料（他用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功夫研究了這些材料）把這個形態底動作法則和發展

*這裏當然始終都是說社會關係底意識，而不是其他什麼關係底意識。

**注意。——譯者。

法則作了一個極詳盡的分析。這個分析是專以社會組成員間的生產關係爲限：馬克思一次也沒有借用什麼超出這些生產關係的因素來說明問題，同時却使我們有可能看見商品生產制的社會經濟組織怎樣發展，怎樣變成爲資本主義組織而造成兩個對抗的（這已經是在生產關係範圍內）階級，即造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怎樣發展社會勞動生產率，並由此而產生出與這個資本主義組織基礎根本處於不可調和矛盾地位的因素。

資本論底骨幹就是如此。可是，全部問題重心就在於馬克思並不以這個骨幹爲滿足，並不以通常意義的『經濟理論』爲限；他雖專以生產關係來說明該社會形態底結構和發展，但他又隨時隨地考察相當於這些生產關係的上層建築物，以肉和血把骨幹包裹起來。資本論之所以大受歡迎，也就是因爲『德國經濟學家』底這一著作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作爲活生生的東西表明給讀者看，將它的風俗習慣，將它的生產關係所固有的階級對抗底具體社會表現，將它的保護資本家階級統治權的資產階級政治上層建築物，將它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以及其他等等觀點，將它的資產階級的家庭關係，都全盤托出。由此可見，把馬克思和達爾文比照是完全確切的：資本論無非是『把浩如煙海的事實材料總結起來而具有綜合性的，彼此緊相聯系的幾點思想』。誰若在閱讀資本論時竟會看不見這些綜合性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馬克思了，因爲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說過這點——都指出過這些思想。不僅如此，這樣的比照不僅從外表方面（不知爲什麼竟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別發生興趣的這個外表方面）看來正確，而且從內容方面看來也是正確的。正如達爾文推翻了那認爲動植物種類是彼此沒有任何聯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變的東西的觀點，而第一次把生物學放置到完全是科學的基礎上來，確定了各物種底變更性以及其間的繼承性一樣，馬克思也推翻了那把社會看作是可按長官意志（或說

按社會意志和政府意志，這橫直都是一樣）來隨便改變的，偶然產生和偶然變化的個人機械結合物的觀點，而第一次把社會學放置到科學的基礎上來，確定了社會經濟形態是一定生產關係總和的概念，確定了這種形態發展過程是自然歷史過程。

現在，自資本論出現以後，唯物史觀已經不是什麼假設，而是已用科學方法證明了的原理；當我們還沒有看見另一種想用科學方法來說明某個社會形態——正是社會形態，而不是什麼國家或民族，甚至不是階級等等底風俗習慣——底動作和發展的嘗試以前，當我們還沒有看見另一種能如唯物主義這樣把『相當事實』排列得秩序井然，能這樣用嚴格的科學說明來描出相當社會形態底活的情景的嘗試以前，唯物史觀始終是社會科學底別名。唯物主義並非『多半是科學的歷史觀』，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樣，而是唯一的科學歷史觀。

雖然如此，却還有人讀了資本論以後，竟能在那裏找不到唯物主義，這豈不是再可笑不過的奇聞麼！唯物主義在那裏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帶着老實莫明其妙的神情問道。

他讀了共產黨宣言，却沒有看見，那裏對於現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以及哲學體系——的說明，是唯物主義的說明；却沒有看見，甚至對於社會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論的批評，也是在某種某種生產關係中找尋並找到了這些理論底根源。

他讀了哲學底貧困，却沒有看見，那裏對於蒲魯東社會學的剖解，是從唯物主義觀點出發的；却沒有看見，那裏對於蒲魯東所主張的各種各樣歷史問題解決法的批評，是從唯物主義原則出發的；却沒有看見，該書作者自己關於應在什麼地方尋找材料來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切指示，都是歸結於援引生產關係的。

他讀了資本論，却沒有看見，這本書是按唯物主義方法來對一個，且是最複雜的社會形態作了科學分析的模範，大眾公認而誰也

沒有超越的模範。於是他就坐着拚命思索他那個深奧的問題：『馬克思究竟在那一部著作中敘述了自己的唯物史觀呢？』。

每一個知道馬克思的人，都會拿另一個問題來反問他：馬克思究竟是在那一部著作中沒有敘述過自己的唯物史觀呢？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大概是只有當某個卡列夫¹⁸在其某本深奧的歷史作品中關出了『經濟唯物主義』一欄，而用相當號數把馬克思底唯物主義著作指明出來的時候，才會知道這些著作吧。

最可笑的，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責備馬克思，說他沒有『重新審查（sic!*）所有那些說明歷史過程的著名理論』。這真是十足的笑柄。試問這些理論十分之九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是一些純粹先驗論的，獨斷的，抽象的妄談什麼是社會，什麼是進步等等的議論（我故意舉出那些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相近的例子）。而且這些理論所依據的論據，就是根本荒謬的；其所運用的那個澈頭澈尾暗淡無光的形而上學性的基本方法，就是毫不中用的。從什麼是社會，什麼是進步的問題開始，就無異於從末尾開始。當你還沒有分別研究過任何一個社會形態，甚至還沒有能確定這個概念，甚至還沒有能着手來認真按事實研究，以客觀態度來分析任何一種社會關係的時候，試問你怎能得出一個關於一般社會和一般進步的概念呢？這也就是任何科學所由開始工作的那種形而上學方法底最明顯的標誌：人們還不善於着手來研究事實時，總是 a. priori** 臆造一些始終毫無結果的一般理論。形而上學派的化學家，還不善於按事實來研究化學作用時，就臆造一種關於什麼是化學親和力的理論。形而上學派的生物學家會談論什麼是生命，什麼是生命力的問題。形而上學派的心理學家會談論什麼是靈魂的問題。這裏所用的方法，就是很荒謬的。不預先分別說明各種心理作用，就不能談論靈魂；在這裏要達

*原來如此！——譯者。

**預先。——譯者。

到進步，就須摒棄那些談論什麼是靈魂的一般理論和哲學議論，而要有本事把對於表明某種心理作用的事實的研究放置到科學基礎上來。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底責備，正好似一個學生撰述靈魂問題『研究作品』的（甚至連任何一個最簡單的心理現象都弄不清楚的）形而上學派的心理學家，竟來責備那個科學心理學家，說他沒有重新審查所有那些關於靈魂的著名理論。他，這個科學心理學家，摒棄了關於靈魂的哲學理論，而逕直來研究心理現象底物質本體，即神經作用，結果是提供了——譬如說——對於某個或某些心理作用的分析和說明。於是我們這位形而上學派的心理學家讀到這部著作，就加以稱讚，說什麼作用是描寫得很好，事實是研究得很好，但他終究感覺不滿。且慢吧，——這位哲學家聽見大家說那個學者持着完全新的心理學見解，特別的科學的心理學方法時，就怒氣冲冲地說，——且慢吧，究竟他在那一部著作中敘述了這個方法呢？在這部著作中豈不是『僅僅只有一些事實』麼？在這中間豈不是絲毫沒有重新審查過『所有那些關於靈魂的著名哲學理論』麼？這是完全不相當的著作呀！

同樣，資本論在形而上學派的社會學家看來，也當然是不相當的著作，他看不見那些關於什麼是社會的先驗議論毫不中用，他不懂得，這種方法並不能研究和說明什麼問題，而只能把英國商賈底資產階級思想或俄國民主派底市儈社會主義理想，假冒為社會概念。正因為如此，所以這一切哲學歷史理論，就如蜉蝣一樣朝生暮死，至多也不過是當時社會思想和社會關係底徵象，而沒有把人們對於社會關係，即令只是個別，但是真實的（而不是那些『適合於人類天性的』）社會關係的瞭解，推進絲毫。馬克思在這方面所作出的一個偉大的進步，就在於他摒棄了所有這些妄談一般社會和一般進步的議論，而作出了對於一個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一種進步（資本主義進步）的科學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責備馬克思，

說他竟從頭前開始，而不從末尾開始，竟從分析事實開始，而不從最終結論開始，竟從研究個別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關係開始，而不從妄談什麼是一般社會關係的一般理論開始！於是他就發問道：『相當的著作究竟在那裏呢？』。呵呀，多麼聰明的主觀社會學家呀！

如果我們這位主觀哲學家只以疑問究竟在那部著作中論證過唯物主義一點為限，也許還只是個小不幸。可是，他雖然沒有在任何地方找到唯物史觀底論證，甚至沒有找到唯物史觀底敘述（也許正因為他沒有找到），却來實行把這個學說所從未企求過的東西加到它頭上。他引證了布羅斯說馬克思提倡一種完全新的歷史觀的一段話，然後就毫不客氣地推論下去，似乎這個理論企求『給人類解釋其過去』，說明了『人類全部（sic!!）過去』等等。真是十足的偽造呀！這個理論僅僅企求說明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組織，而沒有企求說明任何其他社會組織。既然運用唯物主義去分析和說明一個社會形態時已達到了這樣燦爛的成功，那末歷史唯物主義當然也就不復是什麼假設，而是經過了科學檢驗的理論；這種方法當然就必須通用到其餘各個社會形態方面去，雖然這些社會形態尚未經過專門事實研究和詳細分析，正如已在充分數量的事實方面得到了證實的物種變化論¹⁹思想通用於全部生物學一樣，雖然對於個別動植物種類，還未能確切斷定其變化的事實。正好似變化論完全沒有企求說明『全部』物種形成史，而只企求把這個說明方法提到科學高度上來一樣，歷史唯物主義也是從來沒有企求說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學的』——如馬克思所說（資本論）——說明歷史的方法。據此就可判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採用的是多麼機智，多麼鄭重，多麼體面的論戰手段：他首先就撒謊曲解馬克思，把一些妄誕的企求加到歷史唯物主義頭上，說它企求『說明一切』，企求找到了『打開一切歷史門戶的鑰匙』（這種企求，當然是馬克思在他為回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論文而寫的那封『信』²⁰裏，

就立刻用極辛辣方式將其推翻了的），接着就譏笑自己所臆造出來的這種企求，隨後把一段確切的恩格斯意思（其所以確切，是因為米海洛夫斯基這一次是摘錄原著，而不是傳達意思），認為唯物主義者心目中的政治經濟學『還待創造』，『我們由這政治經濟學中所得到的一切東西，還只限於』資本主義社會史等語摘引出來，然後便作出結論說：『這些話把經濟唯物主義底活動場所縮得很小了』！該要具有怎樣厲害的幼稚氣，或怎樣厲害的自是心，才能指望這種戲法不會被人發覺呵！首先撒謊曲解馬克思，接着就來譏笑自己所撒謊捏造出來的東西，然後，援引了一段確切意思以後，便厚顏不慚地宣佈，說這些意思把經濟唯物主義底活動場所縮小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這種譏笑辦法究竟是什麼種類和什麼品質的貨色，這可從下述例子中間看出：『馬克思無論何處都沒有論證過它們』，即是沒有論證過經濟唯物主義底根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道。『固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寫成一部哲學歷史性的和歷史哲學性的著作，甚至於寫成了這樣一部著作（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但這部著作是從來也沒有刊行過的²¹。』恩格斯說道：『這部著作第一部分是唯物史觀底敘述，這一敘述只是表明我們當時在經濟史方面的認識還不够哩』。由此可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作出結論說，——當『科學社會主義』和經濟唯物主義底基本要點發現出來，以及隨後在宣言裏敘述出來的那個時候，據其創作人之一自己承認，他們為做這樣一件事情所需要的認識還不够』哩。

這是多麼可愛的批評呵！恩格斯說他們自己當時對於經濟『歷史』的認識還不够，因此他們就沒有把自己的『一般』歷史哲學性的著作刊行出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把這點曲解成這樣，似乎他們當時『為做這樣一件事情』——如規定『科學社會主義底基本要點』，即在宣言裏發表了的對於『資產階級』制度的科學批評——所必要的認識還不够。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

懂得概括全部歷史哲學的企圖與用科學方法說明資產階級制度的企圖間的區別，或者就是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為批評政治經濟學所必要的認識還不够。如果這樣，那他就未免太刻薄寡情了：他竟不把他所用以斷定認識不够的理由，以及他所作的更正和補充拿出來給我們看看。馬克思和恩格斯決定不發表他們歷史哲學性的著作，而集中全力來對一個社會制度作科學分析，——他們這一決定，只是表明他們具有最高度的科學誠實心。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決定來譏笑他自己所附加的這些東西，硬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明知他們自己對於規定這些觀點的認識還不够時敘述了這些觀點，——他這一決定，却就只是表明他那種論戰手段既不證明其有聰明，又不證明其講體面而已。

另一個例子：『馬克思底 alter ego * 恩格斯對於論證經濟唯物主義為歷史理論，是要作得多些，——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道。——恩格斯有其專門歷史性著作：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底起源（因有(im Anschluss) 摩爾根底見解而作）。這個『Anschluss』真是妙極了。美國人摩爾根所著一書²²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宣佈經濟唯物主義基本原理許多年以後出現，並且是完全與經濟唯物主義無關而出現的』。於是他認為，『經濟唯物主義者就附和了』這本書，同時因為在史前時代沒有階級鬥爭，所以他們對於唯物史觀的公式就加上一個『修正』說：人類本身底生產，即兒女生產，是與物質財富生產並列的決定要素；兒女生產在勞動生產率還極不發展的原始時代是起着頭等作用的。

『摩爾根底偉大功績，——恩格斯說道，——就在於他從北美印第安人底氏族聯系中，找到了一個鑰匙來解決古代希臘史，羅馬史和日爾曼史中那些極其重要，至今尚未解決的謎題』。

『總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對此宣稱，——在四十年代末

*第二個我。——譯者。

發現並宣佈了一個完全新的唯物主義的和真正科學的歷史觀，這個歷史觀給予歷史科學的東西，正與達爾文理論給予現代自然科學的東西一樣』。可是，這個歷史觀，——隨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再次重複說，——從來沒有用科學方法論證過。『它不僅沒有在巨量的和紛繁的事實材料場所內檢驗過（資本論是『不相當的』著作：在那裏只有一些事實以及一些細心的研究工作！），甚至沒有充分論證過，甚至沒有用批評並排除其他哲學歷史體系的方法來論證過』。恩格斯底著作 „Herrn E.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只是順便說出的一些機智的嘗試』，於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認為可以完全迴避這部著作中所論及的大批重要問題，而不管這些『機智的嘗試』怎樣機智地指明了那些『從空想開始的』社會學底空虛性，也不管在這部著作中給了妄稱政治法律制度決定經濟制度的『強力論』，亦即俄國財富各政論家所極力鼓吹的『強力論』一個詳細的批評。的確，用幾句毫無意義的辭藻來胡亂說說這部著作，要比認真分析這部著作中按唯物主義觀點解決的問題，那怕是其中一個問題，都要容易得多；而且這樣來作，又沒有什麼危險，因為書報檢查局大概是永遠也不會准許此書譯本出版，於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就可以不必替自己的主觀哲學擔憂，而把這部書籍叫做玩弄機智的書籍了。

更標本和更值得注意的（為表明人所以具有口舌，是為隱瞞自己的思想，或者是給予空虛性一個思想形式），是他對於馬克思資本論的評論。『在資本論中有一些具有歷史內容的燦爛頁子，但是（這個『但是』真妙極了！這甚至於不是『但是』，而是鼎鼎大名的 „mais”，譯成普通話就是『耳朵不會生在額骨以上去』），這些頁子按此書任務來說，就局限於一個一定的歷史時期，並不是確立經濟唯物主義底基本原理，而不過是簡單說及某一類歷史現象底

^{*}杜林先生所舉行的科學變革（反杜林），——譯者。

經濟方面』。換言之：資本論，即專為研究資本主義社會而寫的著作，是給了這一社會及其上層建築物一個唯物主義的分析，『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寧願迴避這個分析：看呀，這裏僅僅說到『一個』時期，而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則想概括一切時期，並且是要概括到根本不具體說及任何一個時期。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即為要概括一切時期而不具體說及任何一個時期，當然是只能有一個方法：說一些『燦爛』而毫無意思的普泛語句和空話。而在巧於用空話來支吾搪塞的藝術方面，是誰也比不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原來，只是因為他——馬克思——『不是確立經濟唯物主義底基本原理，而不過是簡單說及某一類歷史現象底經濟方面』，所以也就不值得（單獨地）具體說及馬克思底研究工作。意思是多麼深刻呀！『不是確立』，而是『簡單說及』！——你看，用空話來抹煞任何一個問題，是多麼簡易呵！例如，馬克思屢次說明商品生產者底關係是公民平權和自由協約等等法權國家原則底基礎，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他是以此確立了唯物主義呢，還是僅僅『簡單』說及呢？我們的哲學家本着他所固有的謙虛態度，拒絕具體回答問題，而逕直從他自己那些想要說得燦爛，但不說出任何東西來的『機智的嘗試』中得出結論。

『所以毫不奧妙的，——在這個結論中說道，——這個企求闡明全世界歷史的理論，認為古代希臘史、羅馬史以及日爾曼史，在這一理論宣佈以後四十年時，仍然是些尚未解決的謎；而解決這些謎的鑰匙：第一，是一個完全與經濟唯物主義理論無關，一點也不知道這個理論的人所找到；第二，是藉助於非經濟因素找到的。

『人類本身底生產』這一名詞，即兒女生產，引起一種有點可笑的感想，而恩格斯則抓住這個名詞，以便至少保存其與經濟唯物主義基本公式字面上的聯系。可是，他不得不承認，人類生活在許多世紀內都不是按照這個公式構成的』。的確，你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底論戰手段真是『毫不奧妙』呵！這理論是說，爲了『闡明』歷史，不要在思想關係中，而要在物質社會關係中去尋找基礎。由於事實材料不夠的關係，曾沒有可能應用這個方法來分析歐洲上古史內某些極重要的現象，例如氏族制度，而氏族制度因此也就仍然是一個啞謎*。後來，摩爾根因在美洲蒐集了豐富材料，就有可能來分析氏族制度底實質，而得出結論如下：對於氏族制度的說明，不要在思想關係（例如法權關係或宗教關係）中，而要在物質關係中去尋求。很明顯的，這件事實不過是給予唯物主義方法一個燦爛證實而已。所以，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第一）解決最困難歷史啞謎的鑰匙是一個與經濟唯物主義理論『完全無關』的人所找到的事實爲理由來非難這個學說的時候，我們就只能驚奇人們是多麼不會辨別什麼是辯護他們的東西和什麼是無情打擊他們的東西呵。（第二）據我們的哲學家說，兒女生產並不是經濟因素。可是，你究竟在馬克思或恩格斯底什麼著作裏讀到了他們一定說是經濟唯物主義呢？他們在描寫自己的世界觀時，只是把它叫做唯物主義而已。他們的基本思想（在上面所摘引的馬克思那段話中就已完全肯定表明出來了的思想），是把社會關係分成爲物質關係和思想關係。思想關係只是基於不依人們意志和意識爲轉移而形成的那些物質關係的上層建築物，是人們爲維持本身生存而活動底形式（結果）。對於政治法律形態的說明，——馬克思在我們所摘引過的那段話中說道，——是要在『物質生活關係中』去尋求的。怎樣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難道認爲兒女生產關係是一種思想關係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對於此點的解釋是很標本的，所以值得拿來分析一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這裏也沒有錯過機會來譏笑一下：嘆，爲什麼這樣：既然有科學的歷史觀，而古代史却又是一個啞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呵，你從任何一本教科書裏都能知道，氏族制度問題是引起過許許多多理論來加以說明的最困難問題之一。

下。他說：『無論我們怎樣機巧運用『兒女生產』這一名詞，以圖在它與經濟唯物主義中間建立一種即使是字面上的聯系，無論它在複雜的社會生活現象網中怎樣與其他現象——包括經濟現象在內——錯綜着，但它畢竟有其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呵，你這一套話，——兒女生產有其生理根源，——莫非是要說給嬰兒們聽的麼！？你爲什麼要如此哄騙呢？）而這就告訴我們說，經濟唯物主義底理論家不僅沒有解決歷史問題，並且還沒有解決心理學問題。毫無疑義，氏族聯系在文明國歷史中已失掉了自己的意義，但關於直接的兩性聯系和家庭聯系，却就未必能有同樣把握來說了。固然，它們是因一般生活日益複雜化而大大變更了，可是只要有相當的辯證的技巧，就可以證明：不僅法律關係，而且經濟關係本身，也是基於兩性關係和家庭關係的『上層建築物』。我們不來作這件事情，不過我們還是要舉出遺產制度來說說』。

好極了，我們的哲學家終於由專說空話*而談到可以審查和不許如此輕易『哄騙』問題實質的一定事實了。我們且來看看，我們這位批評馬克思的人，究竟怎樣來證明遺產制度是基於兩性關係和家庭關係的上層建築物。『作爲遺產來傳授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道，——有經濟生產底產品（『經濟生產底產品』!!這是多麼通達呀！多麼響亮呀！多麼美麗的句法呀！），而遺產制度本身在某種程度內是被經濟競爭事實所制約的。可是，第一，作爲遺產來傳授的，還有非物質的財富，其表現就是關懷按父親精神來教育兒女的心理』。總之，教育兒女是列入遺產制度的！例如，在俄國民法中有這樣一條：『父母應努力以家庭教育來培養其（兒女）德

*你看，人們責備唯物主義者沒有解決歷史問題，却不企圖把唯物主義者對於各種歷史問題所給的許多唯物主義說明中的『任何一個』說明拿來分析一下；又如人們說本來可以證明一下，但我們不來作這件事情，——像這樣的說法，豈不真是專說空話麼？

性，並協助政府方針之實施』。我們的哲學家莫非是把這一點叫作遺產制度麼？『第二，——甚至於專以經濟範圍為限，——如果說沒有那些當作遺產傳授的生產底產品，便絕對不能有遺產制度，那末同樣也可以說，如果沒有『兒女生產』底產品，如果沒有這種產品以及與之直接結合着的複雜緊張心理要素，也是絕對不能有這種遺產制度的』。（呵呀，請你們注意句法吧：複雜心理要素與兒女生產底產品『結合着』！這簡直是妙不可言呀）。總之，遺產制度所以是基於家庭關係和兩性關係的上層建築物，是因為遺產制若沒有兒女生產，就絕無可能！是呀，這真是發現新大陸呀！直到現在，大家都以為兒女生產不能解釋遺產制度，也好似吃飯問題不能解釋私有制度一樣。直到現在，大家都認為：如果——舉例來說——從前俄國在食邑制度²³繁盛時代，土地不能當作遺產來傳授（因為當時土地只是看作一種有條件的私產），那末對於這件事實的解釋，就要在當時社會制度底特點中去探求。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必認為，這件事實，不過是由於那與當時地主兒女生產底產品結合着的心理要素尚未充分複雜而已。

只要把『人民之友』擦一擦，——我們可以把著名格言改一個樣式來說，——便可看出資產者底原形來。的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這一套說遺產制度是與教育兒女，與兒女生產心理等等聯繫着的議論，難道不就是說遺產制度也與教育兒女一樣，是永恆必要和神聖不可侵犯的現象麼！固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力謀替自己留下一個逃身之處，於是就說『遺產制度在某種程度內是被經濟競爭事實所制約的』，——但這不過是一種企圖支吾搪塞而不對問題作肯定回答的把戲，並且是用毫不中用的手法幹出來的把戲。既然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遺產制究竟是在何等『某種程度』內取決於競爭，既然他絲毫也沒有說明競爭與遺產制度間的這個聯繫究竟是由於什麼原因，——既然如此，那我們怎能理會他這個聲明呢？其實，遺產制

度是以私有制度爲前提，而私有制度是從交換關係出現時起，才產生出來的。成爲私有制度基礎的，是已在萌芽的社會勞動專門化和產品出賣現象。例如，當原始印第安公社底全體社員還共同製造他們自己必需的一切產品的時候，私有制也是不能發生的。當分工制侵入公社，而其社員已經各自單獨來生產某一種產品，並把這種產品拿到市場上出賣的時候，於是表示各商品生產者這種在物質上各自分立現象的私有制度就出現了。無論私有制或遺產制，都是在各自分立的小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經形成，交換已在開始發展的那個社會制度中的範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底例子所證明的，恰巧是和他所想證明的東西相反。

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裏還有一個事實的指證，但這又是一個妙不可言的笑話！『至於說到氏族聯繫，——他繼續修改着唯物主義說，——那末它們在各文明國歷史中，確實有一部分已在生產形式影響底光線下面褪色了（又是一個遁辭，不過是更加顯然而已。究竟是何種生產形式呢？一句空話！），但它們還有一部分則在它本身的繼續和綜合中發展爲民族聯繫了』。總之，民族聯繫乃是氏族聯繫底繼續和綜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關於社會歷史的觀念，大概是從一些用作小學教材的童話中借來的。所謂社會歷史，——按這個蒙童教本原理說來，——起初是有家庭，這是任何一個社會的細胞*，然後家庭便發展成爲部落，而部落又發展成爲國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顏厲色地重複這種幼稚的廢話，不過是表明——除其他一切以外——他甚至對於俄國歷史行程也沒有任何概念。在古代俄國還可以說有過氏族生活，而在中世紀，在莫斯科皇朝時代，這種氏族聯繫就毫無疑義已不存在了，就是說，當時國家完全不是建立

*這純粹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分散的小家庭，只是在資產階級制度下才成爲統治形式的家庭；這種家庭在史前時代是完全缺如的。資產者最共通的特色，就是把現代制度底特徵當作是所有一切時代和所有一切民族底共同特徵。

在氏族團體上，而是建立於地方團體上：地主和教堂接納了從各地來的農民，而這樣組成的村社就成爲純粹地域性的團體。但是在當時還很難說已有真正的民族聯系：當時國家是分成爲個別『領土』，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侯國，這些侯國保存有從前那種自治制度底鮮明遺跡，有其管理方面的特點，有時候還保存有自己特別的軍隊（地方諸侯是帶領着自己的軍團去作戰的），特別的稅關等等。僅僅在俄國歷史底新時期中（大約自十七世紀起），這種區域、領土和侯國才真正在事實上溶合爲一個整體。請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注意，這種溶合並不是由氏族聯系所引起，甚至不是由這種聯系底繼續和綜合所引起，而是由各個區域間日益加强的交換，由逐漸增長的商品週轉，由各個不大的地方市場集中爲一個全俄市場所引起的。既然這個過程底領導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資本家，所以這種民族聯系底創立也就無非是資產階級聯系底創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援引的兩件事實，只是把他自己打了一頓，而他給予我們的，却不過是標本式的資產階級鄙陋見解而已，——其所以是『鄙陋見解』，是因爲他用兒女生產及其心理來解釋遺產制度，並用氏族聯系來解釋民族；其所以是『資產階級的』，是因爲他把歷史上一個一定的社會形態（即以交換爲基礎的社會形態）中的範疇和上層建築物，當作是好似教育兒女和『直接』兩性聯系一樣普遍永恆的範疇。

這裏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我們的這位主觀哲學家只要試圖由空話進到具體事實的指證，就立刻滾到泥坑裏去了。而他在這個不很清潔的立場上，大概是很覺愉快：泰然自若地坐在那裏，整頓衣冠，梳粧打扮，把髒水向四週亂潑。例如他想推翻那說歷史是一串階級鬥爭事蹟的原理，就以深思神情宣稱這是『走極端』，然後就說道：『馬克思所建立而以進行階級鬥爭爲目的的國際工人協會，並沒有阻止法德兩國工人互相屠殺劫掠』，據他說來，這就是證

明唯物主義還沒有消除了民族自尊和民族惡感的魔鬼』。這種斷語只是證明批評者全然不懂得如下一件事實：工商業資產階級很實際的利益是這種惡感底主要基礎，而把民族情感當作獨立因素來說，就不過是抹煞問題實質而已。不過，我們已經看見我們的這位哲學家對於民族問題究竟有何種深奧的觀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會拿純粹布勒寧²⁴式的譏諷態度來對待國際，譬如說：『馬克思是雖已瓦解，但還有復活希望的國際工人協會底主腦』。當然，如果像俄國財富第二期上的國內生活欄記者用市儈鄙陋筆調所塗寫的那樣，把『公平』交易看作是國際同情底 *nec plus ultra* *，而不知道，無論公平交易或不公平的交易都始終是以資產階級統治為前提和內容；而不知道，除非消滅那以交換為基礎的經濟制度，就不能停止國際衝突，——如果這樣，那就不難瞭解，為什麼他一說到國際時，就只是一味無聊笑罵而已。既然這樣，那就不難瞭解，為什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如下一個簡單真理：若不在每一個國家內把被壓迫者階級組織和團結起來反對壓迫者階級，若不把這些民族工人組織團結為一個國際工人大軍來反對國際資本，就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克服民族惡感。至於說國際沒有阻止工人互相屠殺，那末只要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回想一下巴黎公社時期表明了有組織無產階級對當時進行戰爭的那些當權階級所取真正態度的種種事變就夠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進行的這全部論戰中特別令人憤慨的，就是他所採用的論戰手段。如果他不滿意國際底策略，不贊成那些使歐洲工人組織起來以求其實現的思想，那末他至少也應當爽直公開地批評這個策略和這些思想，把他自己關於更適當策略，更正確觀點的意見敘述出來。而他却沒有提出任何一個明確肯定的異議來，

* 撞限。——譯者。

只是在汪洋大海般的空話中間插進許多東拉西扯，毫無意思的譏笑句子。試問怎能不把這種手段叫做髒水呢？尤其是，如果注意到在俄國不允許公開辯護國際底思想和策略的事實，試問怎能不把這種手段叫作髒水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進行論戰時所運用的手段，也是如此：他不肯化費絲毫氣力，誠實確切地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某些原理表述出來，以便給予這些原理一個直截的肯定的批評，却只是抓住他自己所耳食的馬克思主義論據中的某些斷片，並撒謊曲解這個論據。請讀者自己來判斷吧：『馬克思非常聰明和非常博學多聞，所以他並不以為社會現象歷史必然性和規律性底思想是他所發現的……這是下級（指馬克思主義梯子下級而言）*人們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歷史必然性思想，並不是馬克思所發明或發現的新東西，而是早已確立的真理』），至少他們關於歷代以來為確立這個真理而耗費許多心力的事實，只有一點模糊的觀念』。

這種言論當然能給那些初次聽到馬克思主義的讀者們一個印象，而批評家在這些讀者面前，也就容易達到他的目的：曲解，譏笑和『戰勝』（據說，俄國財富編輯部中的同事正是這樣估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底論文的）。凡是稍許知道馬克思的人，都能馬上看出這種手段底全部虛偽性和空洞性。儘可不同意馬克思，但是決不可否認一件事實，就是馬克思萬分肯定確切地表述了他那些與從前社會主義者比較起來是『新東西』的觀點。新東西就在於從前那些

*說到這個毫無意思的名詞時，必須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別劃出馬克思（這個馬克思非常聰明和非常博學多聞，所以我們的這位批評家不能夠直截公開來批評他的某個原理），然後就指出恩格斯（『沒有這樣多的創作頭腦的人』），再其次就是較為獨立的人，如考茨基以及其餘的馬克思主義者。試問這種分類究竟能有什麼嚴重意義呢？如果批評家不滿意於馬克思底通俗化者，那末誰妨礙他按馬克思來把他們糾正一下呢？可是，他絲毫也沒有這樣作。大概，他本來是想說得尖刻一些，而結果却只是很平板哩。

社會主義者以為要論證自己的觀點，只須指明羣衆在現代制度下受壓迫的事實，只須指明使每個人都能領取自己所作出的東西的那個制度底優越性，只須指明這個理想制度適合於『人類天性』，適合於理性道德生活的概念等等，就算足够了。馬克思認為不能以這種社會主義為滿足。他並不以評論現代制度，不以估計和指斥這個制度為限，而給了對於這個制度的科學說明，把這在各歐洲國家和各非歐洲國家內表現得不同的現代制度歸結為一個共同基礎，即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並對於這社會形態底動作法則和發展法則作了客觀分析（他指明了在這個制度下剝削的必然性）。同樣，他並不認為可以滿足於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及其渺小的後裔，即主觀社會學家們所謂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適合於人類天性的斷語。他更以其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這種客觀分析來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變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性（至於他究竟如何證明了這一點，以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何反駁了這一點，且讓我們往後去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往往援引必然性的根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這裏所玩的曲解把戲，是很顯然的：他把這個理論底全部事實內容，全部實質撇開不談，而硬說這個理論全在『必然性』一語（『在解決複雜實際問題時，是不可僅僅援引它的』），似乎這個理論底證據就是歷史必然性要求如此。換言之，他故意一句話也不說及這學說底內容，而僅僅拚命抓住這個學說底名稱，然後就來譏笑他自己努力使馬克思學說變成的那個『簡直磨平了的銅錢』。我們當然不來探究這種譏笑辦法，因為我們已充分認識這套把戲。讓他去打舂斗，以博得布勒寧先生底歡心快感吧（無怪乎布勒寧先生在新時代報上撫摩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底頭頂兒哩），讓他向馬克思點頭恭維以後，又像小狗那樣暗中向馬克思叫吠：說什麼『馬克思和空想主義者以及唯心主義者的論戰，即令沒有這一點』，就是說，即令沒有馬克思主義者重複這論戰理由，『也是片面性的了』。我們無論如何也

不能不把他這種伎倆叫作小狗的叫吠，因為他簡直沒有拿出一個根據事實，可以審查的肯定異議來反對這個論戰，所以不管我們認為這個論戰對於解決俄國社會主義問題極端重要，而樂於進行關於這個題目的討論，但我們簡直不能來回答這種小狗的叫吠，而只能聳聳肩膀說道：

咳，哈巴狗，你既然向巨象狂吠，想必是很有力量的了²⁵！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隨後一個說到歷史必然性的議論，也是不無趣味的，因為它總算是局部地向我們揭示出了『我國著名社會學家』（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我國『文化社會』底自由派份子那裏與瓦龍錯夫先生²⁶同等博得的一個尊號）底實在思想行囊。他說『歷史必然性思想與個人活動意義間的衝突』：社會活動家若以活動家自居，那就大錯特錯了，其實他們是『被動者』，是『被那歷史必然性內任法則從神祕暗室裏拖出來的傀儡』，——這據他說就是從歷史必然性思想中所應得出的結論，因此他就把這個思想命名為『沒有用處的』和『漂浮無定的』思想。也許不是每一個讀者都明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是從何處拿來這套胡說，什麼傀儡等等的吧。原來，關於有定論與道德觀念衝突，歷史必然性與個人作用衝突的思想，正是主觀哲學家所愛用的法寶之一。關於這個問題，他耗費了無數紙筆，說出了許多庸俗感情的荒唐話，想把這個衝突解決得使道德觀念和個人作用佔到上風。其實，這裏並沒有什麼衝突：所謂衝突，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害怕（而且是不為無因地害怕）有定論根本推翻他所酷愛的庸俗道德而臆造出來的。有定論思想確定人類行為底必然性，推翻所謂意志自由的荒唐神話，但它絲毫也不推翻人類理性，人類良心以及對於人類行為的估計。恰巧相反，只有在有定論觀點下，才可能作出嚴格正確的估計，而不會把一切都推到自由意志頭上。同樣，歷史必然性思想，也絲毫

不損害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全部歷史正是由那些毫無疑義是活動家的個人行動所構成的。在估計個人底社會活動時所能發生的真正問題，就是究竟在什麼條件下，可以保證這個活動得到成功呢？究竟有什麼東西，能担保這個活動不致成爲沉沒於相反動作這一汪洋大海中的孤獨行動呢？社會民主黨人與俄國其他社會主義者各自解決得不同的另一個問題，也同樣在此，這個問題就是：以實現社會主義爲目標的活動，究應如何吸引羣衆來參加，才可產生嚴重果實呢？顯然，這個問題底解決，完全是直接以對於俄國社會力量配置情形的見解如何，以對於俄國現實所由構成的那個階級鬥爭的見解如何爲轉移，——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只是繞着問題兜圈子，甚至沒有企圖明確提出這個問題，沒有試圖給它以某種解答。大家知道，社會民主黨人解答這個問題的出發點，是認爲俄國經濟制度是資產階級的社會，而從資產階級制度實質本身裏所必然得出的擺脫這個社會的唯一出路，就是無產階級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顯然，莊重的批評所應當作爲目標來反對的，便是把我國制度看作資產階級制度的觀點，或者是關於這個制度實質及其發展規律的見解，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沒有企圖涉及嚴重問題。他寧願用一些毫無內容，說什麼必然性是一個太普泛的括弧等等的辭藻，來支吾搪塞。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呵，任何一個思想，當你把它當作乾魚對待，首先將其全部內臟剝去，然後却來和所剩下的外殼周旋的時候，都會成爲太普泛括弧的哩！這個掩蓋着現代真正嚴重迫切問題的外殼，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喜愛的領域，於是他——舉例說——就特別傲然自得地着重指出：『經濟唯物主義忽視或不正確地闡明關於英雄與大衆的問題』。看呵，關於現代俄國現實究竟是由那些階級底鬥爭，究竟在那個基礎上構成的問題——這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來想必是個太普泛的問題，於是他就避開不說。而關於英雄與大衆——不管這是工人大衆也好，農民大衆也

好，工廠主大眾也好，地主大眾也好——彼此之間，究竟存在有何種關係的問題，他却極感興趣。也許這確實是一個『有興趣的』問題，可是如果非難唯物主義者，說他們不應該集中全力來解決直接有關於勞動階級解放的問題，那就不過表明自己是酷愛俗人科學而已。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結束他對於唯物主義的『批評』（？）時，又來企圖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表示懷疑，說恩格斯認為資本論曾被那些職業的經濟學家默然抵制的意見未必正確（而且他為證明自己懷疑得有根有據起見，還援引一個可笑的理由，說什麼德國有許許多多的大學！），——於是就說道：『馬克思決非恰指這些讀者（工人）而言，並且對於科學界人物也是有所期待的』。這話完全不對，因為馬克思非常懂得，從資產階級科學家方面很少希望能碰見公正的態度和科學的批評，所以他在資本論再版跋言中對於此點已有完全肯定的說明。他在那裏說道：『資本論在德國工人階級大眾中間所迅速遇到的理解，就是對於我這一勞作的最好獎品。站在資產階級觀點上觀察經濟問題的梅葉爾先生，在他於普法戰爭時出版的一本小冊裏敘述了一個完全正確的意見，說一般人所視為德國人民世襲財產的那種慣作理論思索的卓越能力（der große theoretische Sinn），在那些所謂智識階級中間已經完全消失，而在德國工人階級中間却又在復活起來』。

還有一套曲解唯物主義，且又是完全按照第一個模型造成的顛倒是非的把戲。『這個理論（唯物主義理論），從來也沒有用科學方法來論證過和檢驗過』。提綱就是如此，而證據則是：『恩格斯，考茨基以及其他某些人（如在布羅斯底大作裏那樣）所有的那些具有歷史內容的個別良好頁子，本來無須經濟唯物主義商標也行，因為（請注意『因為』二字！）其實（sic!）在這些頁子中間顧到了全部社會生活總和，雖然這套混合音樂是以經濟聲浪佔優勢』。結論… 是：『經濟唯物主義在科學界中原來是沒有根據的』。

又是那一套老把戲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爲了證明這個理論沒有根據，首先就來曲解這個理論，硬說這個理論懷有不肯顧到全部社會生活總和的荒謬意向，——而實則完全相反，唯物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正是提出了關於不僅要分析社會生活底經濟方面，而且必須分析社會生活所有各方面問題的第一批社會主義者*，——接着他就指出：『其實』，唯物主義者是用『經濟』來把全部社會生活總和說明得『良好的』（這件事實顯然是打擊着作者自己的），——最後他就作出結論說，唯物主義『原來是沒有根據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呵，你這套顛倒是非的把戲，倒是怪有根據的呵！

這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拿來『駁斥』唯物主義的一切。我再重複說一遍：這裏並沒有什麼批評，而只有一堆妄自尊大的空洞廢話。無論去問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拿出一些什麼異議來反駁了認爲生產關係是其餘一切關係基礎的觀點呢？他究竟拿出什麼東西來駁斥了馬克思用唯物主義方法所規定的關於社會形態以及這些形態發展自然歷史過程的概念底正確性呢？他究竟怎樣證明了例如他所舉出的那些作家們對於各種歷史問題的唯物主義說明不正確

*這是在資本論以及在社會民主黨人策略中完全明白表示出來，而與從前的社會主義者不同的地方。馬克思直截提出了不要單以經濟方面爲限的要求。馬克思於一八四三年擬定那預備出版的雜誌底綱領時，寫信給盧格說：『社會主義的原則，整個說來，又只是一方面……而我們却還應同樣注意到另一方面，即人類底理論生活，因而就應當把宗教、科學等等當作我們批評底對象……正如宗教是人類底理論戰鬥目錄那樣，政治國家是人類底實際戰鬥目錄。所以，政治國家是在其本身形式範圍內，sub specie rei publicae（從政治觀點上），表明所有一切社會戰鬥，社會需要，社會利益的。因此，把最專門的政治問題，例如把等級制度與代議制度的區別問題，當作批評對象，也絲毫不是離開什麼hauteur des principes（原則高峯。——『譯者』），因爲這個問題是用政治語言來表明人底統治與私有制底統治之間的區別。所以批評家不僅可以，而且應當涉及這些政治問題（而這些問題在老朽社會主義者看來，是絲毫不足注意的）』。

呢？——誰都一定會答覆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並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來，並沒有拿出任何理由來駁斥過，並沒有指出過任何不正確處。他只是在那裏兜圈子，力圖用空話來抹煞問題實質，並順便臆想出一些毫無意思的遁辭。

當這樣一位批評家在俄國財富第二期上繼續駁斥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也是很難希望從他那裏聽到什麼嚴重東西的。全部區別，只在於他自己那套顛倒是非的發明能力已經窮竭，於是他就來借用他人玩弄的顛倒是非的把戲。

他首先就來高談闊論，說什麼社會生活底『複雜性』，說什麼甚至加里凡尼主義也與經濟唯物主義有聯系，因為加里凡尼底實驗是對黑格爾也曾『引起印象』的。多麼機智的說法呵！那末，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與中國皇帝聯系起來，也是可以的了！從這裏所能得出來的唯一結論，豈不就是有些人以專說荒唐話為其樂事麼？！

『客觀歷史行程底實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繼續說道，——根本不可捉摸，所以經濟唯物主義學說也沒有把它捉摸住，雖然這個學說大概是倚據於兩個基石：第一個是生產和交換形式決定一切的意義之發現；第二個是辯證過程底無可爭議性』。

總之，唯物主義者是倚據於辯證過程底『無可爭議性』！換句話說，唯物主義者是把自已的社會學理論建築在黑格爾三段論法上。我們在這裏看見的，又是以黑格爾辯證法來非難馬克思主義的那種老生常談，這種非難，看來是已被那些批評馬克思的資產階級批評家用得腐爛不堪了。這班先生既不能拿出什麼東西來按實質反駁這個學說，就拚命抓住馬克思底敘述方式，攻擊這個理論底淵源，想以此來摧毀這個理論底實質。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毫不客氣地來採用這種手段了。他所用作口實的，就是恩格斯所著反杜林一書內的一章。恩格斯在反駁那攻擊馬克思辯證法的杜林時說道：

馬克思從來也沒有想到要用黑格爾底三段論法來『證明』任何東西；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討現實過程；馬克思認為理論對現實的參照是判定理論正確與否的唯一準繩。如果在這裏有時發現某種社會現象發展過程符合於『正題——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黑格爾格式，那是毫不足怪的，因為這在自然界裏一般就不是罕見的現象。於是恩格斯就來援引自然歷史現象方面的例子（穀粒之發展）和社會現象方面的例子，譬如說，起初有原始共產主義，接着就有私有制度，然後就有資本主義勞動社會化；或者說，起初有原始唯物主義，然後就有唯心主義，最後就有科學唯物主義等等。誰都明白，恩格斯立論底重心，就在於斷定唯物主義者底任務是要正確和準確描繪真實歷史過程；而堅持辯證法，挑選一些例子來證明三段論法正確，却不過是科學社會主義所由以長成的那個黑格爾主義底遺跡，黑格爾主義表意方式底遺跡而已。的確，既然已經肯定聲明，說用三段論法『證明』什麼東西就是荒謬，說誰也沒有想到要這樣作，那末『辯證』過程底例子，又能有何意義呢？這難道不顯然只是指明學說底淵源而已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也感覺到這點，而說決不可把理論底淵源當作理論底罪過。可是，爲要在恩格斯這段議論中發現什麼比表示理論淵源要多些的東西，那就顯然必須證明：那怕有一個歷史問題，唯物主義者不是以相當事實爲基礎，而是以三段論法爲手段來解決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企圖證明過這點呢？絲毫也沒有。恰巧相反，他自己也曾不得不承認：『馬克思用事實內容把空洞辯證公式充實到了極點，以至可以從這個內容上把這個公式取去，好似可以從罐子上把蓋子取去，而絲毫不會改變什麼一樣』（至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這裏作爲例外的一點，即關於將來的問題，我們在下文裏還會說及）。既然如此，那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爲什麼如此熱心盤桓於這個絲毫不能改變什麼的蓋子呢？他又爲什麼要說唯物主義者『倚據於』辯證過程底無可爭議性呢？

他又爲什麼要在攻擊這個蓋子時簡直撒謊騙人，說他是在攻擊着科學社會主義底『基石』之一呢？

我當然不會來探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分析三段論法例子的情形，因爲，——我重複說一遍，——這對於科學唯物主義和俄國馬克思主義都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可是，有趣的問題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有什麼理由來如此曲解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辯證法的態度呢？其理由有二：第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玩了（或正確些說，從杜林那裏剽竊了）一套顛倒是非的把戲。

Ad 1*。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時，常常碰見社會主義科學中的『辯證方法』，碰見又是那些社會問題範圍（所談到的也只是這個範圍）中的『辯證思維』等等。他由於頭腦簡單（如果只是由於頭腦簡單，那還算不壞），竟以爲這個方法就是按黑格爾三段論法諸法則來解決一切社會學問題。他如果稍微細心看待問題，就會不能不知道他這個觀念是荒誕無稽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稱爲與形而上學方法相反的那個辯證方法，無非就是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其內容就是要把社會看作是處在經常發展過程中的活的機體（而不是什麼機械結合起來，因而使人可以把各個社會原素隨便配合的東西），爲要研究這個機體，就必須客觀分析組成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研究該社會形態底動作法則和發展法則。辯證方法對於形而上學方法（用這個概念來表示社會學中的主觀方法，毫無疑義也是可以的）的態度，我們在下文裏將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的議論爲例證來加以說明。現在我們僅僅指出，凡屬讀過恩格斯（在反杜林的論戰中。俄文版：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爲科學）或馬克思（資本論裏所載各個註解以及再版跋言；哲學底貧

*對於第一點的說明。——譯者。

困)關於辯證方法的定義和敘述的人，都知道這裏根本沒有說到黑格爾三段論法，而全部問題都只是要把社會進化看作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底自然歷史過程。爲證明這點起見，我把歐洲要聞一八七二年第五期上所載的一段描寫辯證方法的言論(短評：馬克思之政治經濟學批評底觀點) in extenso* 引證出來，這段言論是馬克思在資本論再版跋言中引證過的。馬克思在這個跋言中說，人們把資本論裏運用的方法理解得不好。『德國的書報評論家當然大喊大叫地說什麼黑格爾的詭辯法』。而馬克思爲要更明白敘述自己的方法，於是就從上述短評中摘引對於這個方法的描寫。馬克思所注重的，——在該短評中說道，——只是要找到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底法則，而他特別注重的，就是這些現象變化，這些現象發展底法則，這些現象由一個形式過渡到另一個形式，由一個社會關係制度過渡到另一個社會關係制度的法則。所以馬克思所注意的只是一點：用準確的科學研究來指明一定社會關係制度底必然性，盡量完備地指出他所作出發點和支撐點的事實。爲了這個目的，他只想在證明現有制度底必然性時，同時也證明出由前一個制度裏長成另一個制度的必然性，而不管人們相信或不相信這一點，不管人們意識到或意識不到這一點。馬克思把社會運動看作是自然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服從於那些不僅不依人們意志，意識和志願爲轉移，反而決定人們意志、意識和志願的法則。(請那些正因爲人們抱定有意識的『目的』，本着一定的理想，而主張把社會進化從自然歷史進化中劃分出來的主觀主義者先生們注意)。如果說意識的因素在文化歷史中起着這樣從屬的作用，那末正以這個文化爲對象的批評，當然也就決不能以某種意識形式或結果爲倚據。換言之，這種批評無論如何也不可把觀念當作出發點，而只可把外部客觀現象當作出發

*完完全全。——譯者。

點。批評家應當是把一定事實拿來和其他事實比較對照，而不是把這件事實拿來和觀念比較對照；批評家只是注重於盡量確切地把兩件事實研究清楚，使它們彼此對照顯現為發展過程中的兩個不同的階段，而特別是注重於同樣確切地把一整批聯續的相當狀態，它們的一貫交替以及各個發展階段間的聯系，都研究清楚。馬克思所反對的，正是那種認為經濟生活法則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一樣的思想。恰巧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其本身的法則。經濟生活是與生物界其他領域中的發展史相類似的現象。從前的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法則底本性，而把這些法則拿來和物理法則以及化學法則相比擬。而更深刻的分析，却證明各種社會機體，也如各種動植物機體那樣，是彼此懸殊的。馬克思既力求從這個觀點上來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也就以嚴格科學態度規定了任何一個確切研究經濟生活的工作所應當追求的目的。這種研究工作底科學意義，就在於闡明調節着這個社會機體底產生，存在，發展，死亡，以及它由另一個機體——更高機體——所替代的特別法則（歷史法則）。

馬克思從那些散見於報章雜誌的無量數的評論資本論的文章中挑選出來，並譯成了德文的，正是這一段描寫辯證方法的言論，因為這段言論，正如他自己所說那樣，把他的方法說明得十分確切。試問，這裏是否有一個字提到了三段論法，三級論法，辯證過程底無可爭議性等等胡說，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騎士姿態來加以攻擊的那些胡說呢？馬克思摘引了這段評語以後，接着就直截說道，他的方法是和黑格爾底方法『根本相反的』。在黑格爾看來，觀念底發展是按三段論底辯證法則來決定現實底發展的。當然，只有在這種情形下，才說得上三段論法底作用，才說得上辯證過程底無可爭議性。反之，在我看來，——馬克思說，——『觀念不過是物質底反映』。於是全部問題都歸結於『正面理解現實及其必然發展』；三段論法所剩下的作用，已不過是只能使俗人發生興趣的蓋

子和外殼而已（『我故意玩弄黑格爾的字眼』，——馬克思在這個跋言裏說道）。現在就要問，如果一個想來批評科學唯物主義『基石』之一的辯證法的人，無所不談，甚至於連蝦蟆和拿破崙都說到了，而獨不說及這個辯證法究竟有何內容，獨不說及社會底發展是否真正是自然歷史過程？把社會經濟形態視為特別社會機體的唯物主義概念是否正確？對於這些形態的客觀分析方法是否正確可靠？社會觀念是否真正不決定社會發展，反而為社會發展所決定等等，——那末試問我們關於這樣一個人，究應如何評判呢？是否可以說只是由於不瞭解呢？

Ad 2*。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辯證法這樣『批評』一頓以後，就把這種『用』黑格爾三段論法來論證問題的辦法硬加到馬克思頭上，並且當然是帶着得勝神情來攻擊這種辦法。『關於將來的問題，——他說，——是完全按辯證法提出社會內在法則來的』。（這也就是我們已在上文裏提到的那個例外）。馬克思關於因有資本主義發展底法則而使剝奪者必然被剝奪的議論，是帶着『純粹辯證性質』。馬克思關於土地和資本公有的『理想』，『在斷定其必然和毫無疑義這一點上，是完全支持在黑格爾三段論法末尾一環的』。

這個論據是完全從杜林那裏借來的，是杜林在其所著“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zialismus”**（第三版，一八七九年版，第四八六至四八七頁）一書裏運用過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句話也沒有提到杜林。也許是他獨自想出了這套撒謊歪曲馬克思的把戲的吧？

恩格斯給了杜林一個絕妙的答覆，既然恩格斯也曾引證過杜林底批評，於是我們也就以援引他這個答覆為限。讀者一定會看見，把這個答覆用來回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適當的。

*對於第二點的說明。——譯者。

**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譯者。

「『這個歷史概論（所謂英國原始資本蓄積濫觴史），——杜林說道，——還算是馬克思這本著作裏較好的地方，但假如它不是除科學拐杖而外還倚靠於辯證法拐杖，那就會更好了。在這裏，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因為沒有更好和更明白的理由，就起了接生婆的作用，全靠這個接生婆幫助，才把將來從現在底胎胞中拉了出來。從十六世紀時起用上述方式所實現的個人所有制之消滅，是第一個否定。隨後就有另一個否定接踵而至，這個否定就叫作否定之否定，同時又是『個人所有制』之恢復，不過是以土地和勞動工具公有為基礎的最高形式的『個人所有制』罷了。如果說馬克思先生同時又把這新的『個人所有制』稱為『公有制』，那末這裏正是表示出黑格爾的最高統一，在這個統一裏，矛盾就被揚棄（aufgehoben——這是黑格爾所專用的名詞），按黑格爾所愛玩弄的字眼來說，就是在同一程度內既被克服，又被保留下去。

…於是，對於剝奪者的剝奪，就好似是歷史現實的外部物質條件中的自然產物…未必有一個具有理性的人，會以信仰像否定之否定一類的黑格爾戲法為根據來確信土地和資本公有底必然性吧。可是，凡屬知道從黑格爾辯證法這樣一種科學材料中可以得到什麼結論，或——正確些說——從這樣一種材料中一定會得出什麼謬論的人，是不會以馬克思底朦朧怪誕觀念為驚奇的。而對於那些不知道這種把戲的人，我就要直截指出，黑格爾所說的第一個否定是從教義問答中抄襲下來的那個犯罪的概念，而第二個否定則是引向於贖罪的那個最高統一的概念。這樣一種從宗教方面抄襲來的比擬戲法，當然不可用作事實邏輯的根據…馬克思先生自安於他所謂在同一時候既是個人所有制，又是公有制的這個糊塗思想，而讓其信徒們自己去解決這個深奧的辯證法的啞謎』。這就是杜林先生所說的話。

總之，——恩格斯總結起來說，——馬克思若不借用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就不能證明社會革命底必然性，就不能證明施行土地

和勞動所造生產資料公有制底必然性；而他既將其社會主義理論建立在這種抄襲於宗教的比擬戲法上，於是就得出結論說，在將來社會裏，將存在有在同一時候既是個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即黑格爾所謂矛盾被揚棄的那個最高統一*。

我們就暫且撇開否定之否定，而來看看這個『在同一時候既是個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吧。杜林先生把這叫作是『朦朧世界』，而他——倒也奇怪——在這裏確實是說得對的。只是不幸得很，處在這個『朦朧世界』中的，並不是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按黑格爾來修改馬克思，把馬克思自己所毫末說過的什麼所有制最高統一硬加到馬克思頭上。

在馬克思那裏是說：『這是否定之否定。它同時又創立個人所有制，但這是以資本主義時代底成果，即自由工作者協作制以及自由工作者公共佔有土地與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各個人以本身勞動為基礎的零散的私有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過程，當然比事實上已建築在社會公共生產過程上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的過程，要長久得多，艱難痛苦得多。』不過如此而已。所以，以剝奪剝奪者為手段所創立的制度，也就

*用這一段表述杜林所持觀點的語句來形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底觀點，也是完全適當的，關於這點，在他那篇標題在柔科夫斯基先生裁判下的馬克思的論文裏還有下述一段可以證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反駁那斷言馬克思是私有制辯護者的柔科夫斯基先生時，曾指出馬克思底這個公式，並將其解說如下：『馬克思把黑格爾辯證法中兩個盡人皆知的戲法拿到自己的公式中來：第一，這個公式是按黑格爾三段論法則所造成的；第二，合題是以兩個對立方面——個人所有制與公有制——同一為基礎的。可見，『個人』一語在這裏是具有一種特殊的，純粹假設的意義，即辯證過程中一個組成部分底意義，而絲毫也不可引以為根據』。這是一個懷抱着最善良意向的人，在俄國公眾前面反對資產者柔科夫斯基先生而辯護『熱血志士』馬克思時所說的話。而他就是懷抱着這種善良意向把馬克思解說得這樣，似乎馬克思是把自己關於過程的觀念建築在『戲法』上面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從這裏求得一個不是於他無益的教訓：單靠善良意向是對於任何一件事情都嫌不夠的。

叫作在公共佔有土地和公共佔有由工作者自己創造出來的生產資料『基礎』上恢復個人所有制。凡是懂得德文的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呵，懂得俄文也行，因為譯文完全正確），都能理解，這話底意思是說：公共所有制普及於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而個人所有制則普及於其餘產品，即消費品。而爲了使六歲兒童都能明瞭起見，馬克思就在第五十六頁（俄文版第三十頁）上假定有一個『用公共生產資料來工作，有計劃地耗費其個人勞動力作爲一個公共勞動力單位的自由人們底協會』，即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公社，而說道：『全部勞動產品都是公共產品。其中有一部分產品又用作生產資料。這部分產品也就仍然是公有的』。可是，另一部分產品則由協會全體成員當作生活資料來消費。『因此，這部分產品應當由他們彼此分配之』。這甚至對於杜林先生也應當是很明白的吧。

可見，所謂在同一時候既是個人所有制，又是公共所有制的說法，什麼朦朧怪誕的思想，從黑格爾辯證法裏得出的謬論，糊塗思想，馬克思讓其信徒們自己去解決的深奧的辯證法的謎等，原來又是杜林先生隨意捏造和臆想出來的東西呵²⁷...

那末，——恩格斯繼續說，——否定之否定在馬克思那裏究竟起着何種作用呢？在第七百九十一以及往下各頁（俄文版，第六四八以及往下各頁）上，他把先前五十頁（俄文版三十五頁）裏關於所謂原始資本蓄積的經濟的和歷史的研究底最終結果拿來對照。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存在有——至少是在英國——以工作者對於自己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爲基礎的小生產。所謂原始蓄積在這裏就是剝奪這些直接生產者，即消滅那基於自身勞動的私有制。這種消滅所以成爲可能，是因爲這種小生產只能與生產和社會底狹隘原始界限相容，是因爲它自己在一定發展階段上就造成了把它自己消滅的物質基礎。這種消滅，這種從個人零散的生產工具進於社會集中的生

產工具的轉變，就構成爲資本濫觴史。當工作者已變成無產者，而其生產資料已變成爲資本時，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確立時，勞動更進一步的社會化，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更進一步的轉變（變爲資本），因而也就是說私有財產者更進一步的遭受剝奪，就採取着新的形式。『現在要受剝奪的，已不是那經營自己經濟的工作者，而是那剝削着許多工人的資本家。這個剝奪過程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內任法則底作用，因資本集中而發生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 這個集中過程，或者說，少數資本家剝奪許多資本家的過程愈發展，勞動過程底協作形式也愈擴大和發展，科學在工藝方面自覺應用，土地公共合理經營，勞動工具變爲只能公共使用，所有一切生產資料因當作合力社會勞動底公共生產資料使用而趨於節省的程度也愈發展。 那些把這個轉變所造成的一切利益都強佔和壟斷起來的資本大王人數不斷減少，同時大衆貧困，受壓迫、受奴役、退化以及被剝削程度也不斷增加，而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機構本身所訓練、聯合、組織起來，人數日增的工人階級底義憤也不斷增加。於是資本就變成了和它一同繁盛並在它羽翼下繁盛起來的那個生產方式底桎梏。生產資料底集中和勞動底社會化，已達到不能和其資本主義外殼並存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破裂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底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現在我就要問問讀者：什麼地方有辯證法的狡猾把戲和阿剌伯花樣呢，什麼地方有使一切差別都化爲烏有的混淆概念呢，什麼地方有供死守教義者來咀嚼的辯證法奇術和按黑格爾『洛果斯』學說模型玩弄出來的戲法呢，而據杜林說，馬克思豈不是若不運用這些東西就不能貫徹自己的意思麼？馬克思用歷史觀點加以證明，並在這裏簡括歸納起來的原理，就是正如從前小生產以其本身發展來造成使自己歸於消滅的條件一樣，現在資本主義生產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遭滅亡的物質條件。這是歷史的過程，如果它同時又是辯證法的

過程，那就無論杜林先生怎樣覺得這好似宿命論，也不能算是馬克思底罪過了。

馬克思只在說完其歷史的經濟的論據以後，才繼續說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佔有方式，因而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以自身勞動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之第一個否定。資本主義生產之否定，是由它自己依自然歷史過程底必然性來實現的。這是否定之否定』等等（接着就是上述引證）。

所以，馬克思把這個過程叫作否定之否定的時候，根本沒有想要以此證明這個過程底歷史必然性。恰巧相反：他只是用歷史觀點來證明了這個過程有一部分果然已經實現，而另一部分也一定會實現以後，才說這個過程同時也是按一定辯證法則發生的過程。不過如此而已。所以，杜林先生底斷語，什麼否定之否定在這裏起着接生婆底作用，什麼全靠有這個接生婆來幫助，才把將來從過去底胎胞中拉了出來，什麼馬克思要大家以信仰否定之否定的法則為根據來確信土地和資本公有制的必然性等，原來又是十足顛倒是非的把戲』（第一二五頁）²⁸。

讀者由此就可以看見，用恩格斯這一段駁斥杜林的燦爛議論來駁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適當的，因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認為馬克思完全是把將來支持在黑格爾公式末尾一環，認為對於將來必然性的信念只可建立在信仰上面*。

杜林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間的全部區別，只有兩個不大之點：第一，雖然杜林一說起馬克思來就是滿口涎沫，但他畢竟認為必

*說到這裏，我以為不妨指出：恩格斯底全部解釋，是登載於他談論穀粒，談論盧梭學說以及談論辯證過程其他實例的那一章裏的。看來，只須把這些實例拿來和恩格斯（以及馬克思，因為這本著作底手稿是預先讀給馬克思聽過的）這樣明白肯定的聲明——說根本就談不到用三段論法來證明什麼東西，或把這三段論法底『假設成分』當作現實過程底表現，——對照一下，就完全可以明白：以黑格爾辯證法歸罪於馬克思主義的責難，是荒謬絕倫的。

須在他那部歷史下一篇章裏提及馬克思在跋言中決然反駁了黑格爾主義罪名的事實，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把馬克思這個（上述那個）完全肯定確切說明本人對於辯證方法見解的言論瞞着不說。

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第二個新奇處，就是他專心注意於動詞時候底使用方式。爲什麼馬克思說到將來的時候，竟使用現在式呢？——我們的這位哲學家帶着得勝神情質問道。可敬的批評家呵，關於這個問題，你可到每一種文法教本裏找到答案：你會看見，當人們把將來看作是必不可免和毫無疑義的事情時，就用現在式來代替將來式。但是爲什麼這樣，爲什麼它毫無疑義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驚問道，想裝出一種慌張得極厲害的神情，竟想藉以把他自己所幹的那套顛倒是非的把戲彌縫起來。但馬克思對於這點也給了一個完全肯定的答覆。儘可認爲這個答覆不充分或不正確，但那時就須指明究竟在何處和究竟爲什麼不正確，而不要亂說一些什麼黑格爾主義的鬼話。

從前有個時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僅自己知道這個答案何在，而且還以此教訓過別人。柔科夫斯基先生儘可認爲，——他於一八七七年寫道，——馬克思關於將來的體系是種臆測的東西，可是他『沒有道德權利』來迴避『馬克思所非常重視的』勞動社會化問題。呵，當然呀！柔科夫斯基在一八七七年沒有道德權利來迴避問題，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一八九四年却已有這種道德權利了！也許是quod licet Jovi, non licet bovi*吧？！

說到這裏，我不能不回想起一個奇聞，就是關於祖國紀事雜誌²⁹所發表過的對這個社會化問題的見解。在該雜誌一八八三年第七期上登載有局外人先生³⁰致編輯部的信，這位先生也恰如米海

*上帝可作者，牯牛不可作之。——譯者。

洛夫斯基先生一樣，認為馬克思關於將來的『體系』是臆測的。『其實，——這位先生談論道，——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社會勞動形式，不過是幾百或幾千工人在一個場所內磨着，鎚着，轉着，推着，填着，拖着，並且還實現着其他許多手續。這個制度底一般性質，很可拿一句俗話來表示：『各人管自己，上帝管大家』。這怎麼說得上社會勞動形式呢？』

從這裏馬上就可看出，這個人是把問題弄清楚了！『社會勞動形式』，『不過是』『在一個場所內工作』！！既然在一個尚屬優良的俄文雜誌上都有這樣粗鄙的意見，而人們還想要我們相信資本論底理論部分已為科學界所公認了哩。是呀，『已被公認的科學』既不能用絲毫稍可注意的東西反駁資本論，就來向它點頭恭維，同時却繼續發表其最無常識的意見，並重復着小學經濟學中的最庸俗的爛調。我們必須稍許說說這個問題，以便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指明他按其經常習慣而完全迴避了的問題實質。

資本主義生產使勞動社會化，這並不是說人們在一個場所內工作（這只是過程底一小部分），而是說資本愈集中，社會勞動也愈專門化，每個一定工業部門裏的資本家人數也愈減少，而特別工業部門底數目則愈增多；——就是說，許多零碎的生產過程溶合為一個社會生產過程。例如，在手工紡織業時代，各個小生產者既然獨自紡紗並用自己紡出來的紗來織布，於是工業部門也就為數不多（紡紗業和織布業是溶合在一起的）。而當資本主義已把生產社會化了時，於是特別工業部門底數目也就增加起來：紗是單獨紡着，布也是單獨織着；而這個生產單獨化和生產集中化過程，也就使一些新部門——機器製造業，煤炭採掘業等等——相繼出現。在每個現時已成為更專門化的工業部門裏，資本家人數日益減少。這就是說，各生產者間的社會聯系日益鞏固，各生產者都團結為一個整體。零散的小生產者是各人獨自兼任幾種手續，所以他們也就比較

不依賴於他人：例如，一個手工業者既是自行種植亞麻，自行紡織，也就幾乎不依賴於他人。正是在這樣的零碎的小商品生產者的制度下（而且只是在這個制度下），『各人管自己，上帝管大家』的俗話，即市場搖擺不定的無政府狀態，是有根據的。而當勞動已因有資本主義而社會化的時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織布廠老板依賴於紡紗廠老板；而紡紗廠老板又依賴於棉花種植場底資本家，依賴於機器製造廠老板，依賴於煤礦老板等等。其結果就是無論那一個資本家都非有其他資本家不行了。『各人管自己』的俗話，顯然完全不適用於這樣一種制度：這裏每個人都為大家工作，而大家都為每個人工作（於是上帝就沒有存在的餘地——既不能以天空的渺茫幻影資格存在，也不能以人間的『財神』資格存在）。制度底性質已完全改變。在細小零碎企業存在的制度下，其中某一個企業停止工作，只是影響到社會中很少一部分人，而沒有引起大家的混亂，也就沒有引起大家注意，沒有激起社會的干涉。可是，如果有一個大企業專門從事於已很專門化的工業部門的生產，因而幾乎是為全社會工作，同時自己又依賴於全社會（為簡易起見，我特以勞動社會化已達到頂點時的情形為例），那末這個大企業一停止工作，社會所有其餘一切企業都一定會停止工作，因為它們只能由這個企業裏取得必需的生產品，並且它們只有當這個企業底商品具備時，才能實現自己的全部商品。於是，所有一切生產部門，都融合為一個社會生產過程，而同時每一種生產部門，都由單個資本家所經營着，聽憑他自由作主，由他把社會生產品攬為自己私有。於是生產形式就與佔有形式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中，——這難道還不很明白麼？後者一定要適應於前者，也一定要變成公有的，即社會主義的，——這難道不很顯然麼？而祖國紀事中的機智的庸人，竟把一切都歸結為在一個場所內工作。真是胡說八道呵！（我僅僅說明物質過程，僅僅說明生產關係底變更，而沒有說及這一過程底社

會方面，沒有說及工人底統一，團結和組織，因為這是一種從生現象，次要現象）。

我們之所以必須向俄國『民主主義者』來解釋這樣一種粗淺的道理，是因為他們已全身陷落到市儈思想泥坑裏，所以除掉市儈制度而外，根本就不能想像出其他任何一種制度。

但我們還是回轉來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吧。他究竟拿出什麼東西來反駁了馬克思所據以斷定資本主義底發展法則本身使社會主義制度必然到來的那些事實和理由呢？他是否證明了在實際上——在商品生產制的社會經濟組織中——社會勞動過程不是日益專門化，資本和企業不是日益集中，整個勞動過程不是日益社會化呢？沒有，他沒有拿出一個理由來反駁過這些事實。他是否搖動了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具有一種不能與勞動社會化相容的無政府狀態的原理呢？他絲毫也沒有說到這點。他是否證明過一切資本家所有的勞動過程統一為一個社會勞動過程的現象是能與私有制度和平共居呢？是否證明過除馬克思所指出的出路而外，還可找到和想像出其

科學方法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而當他一證明了這個組織在我們眼前發展的過程具有怎樣的趨勢，這個組織必然會滅亡而轉變為另一個組織——更高的組織——時，就以此收束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把馬克思學說底全部實質都迴避不說，而發出自己那個最愚蠢的『以後又怎樣呢？』的問題，並以深思的神情來補充說：『我應當老實承認說：我是不完全想像得到恩格斯會怎樣答覆的』。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呵，我們應當老實承認說：我們完全想像得到你這種『批評』底精神和手段哩！

或者又拿這樣一段議論來說吧：『在中世紀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那個基於自身勞動的個人所有制，甚至在經濟關係方面，也不是唯一的因素，並且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除它而外，還有許多其他的東西。但馬克思所解釋着的辯證法（莫不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撒謊歪曲了的辯證法麼？）却不主張來研究這些東西… 所有這些公式顯然不能表明歷史現實，甚至於不能表明單是這現實所有各因素底比例，而只能滿足人們愛把任何一種東西都想像為有其過去、現在、將來的東西的癖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呵，甚至你運用來顛倒是非的手段，也是千篇一律得令人作嘔哩！首先暗將一個要用三段論法來證明任何東西的意向加進到馬克思原只企求確定資本主義現實發展過程的公式裏去*，然後指出說馬克思底公式不符合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強加於它的這個計劃（第三階段只恢復第一階段底一方面，而把其餘各方面除開不算），並絕頂橫蠻地作出結論，說『這個公式顯然不能表明歷史現實』。

同這樣一個甚至不能（用恩格斯評論杜林時所用的字眼來說）

*馬克思所以把中世紀經濟制度底其他特徵除開不說，是因為這些特徵屬於封建社會形態，而馬克思所研究的，却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按其純粹狀態來說，確實是從（例如在英國）細小零散商品生產者及其個人勞動所有制制度開始的。

破例地準確引證一次的人，是否可以進行嚴重論戰呢？當人們甚至沒有企圖證明公式究竟有何處不正確，就向公衆硬說這公式『顯然』不符現實的時候，試問怎可加以反駁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批評馬克思主義觀點底真正內容，却一味賣弄自己的機智來談論什麼過去、現在、將來這三個範疇。例如，恩格斯在反駁杜林先生底『永恒真理』時說，『人們現在向我們鼓吹』三種道德，即封建制度的基督道德、資產階級的道德以及無產階級的道德，可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有其自身的道德理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對於這點說道：『我認爲，凡屬把歷史分爲時期的三級分法，都正是以過去、現在、將來這三個範疇爲基礎的』。這是多麼深奧的思想呵！可是，誰不知道，如果把任何一個社會現象看作是處於發展過程中的現象，那末在它中間是隨時都可看見過去底遺跡，現在底基礎以及將來底萌芽呢？可是，舉例說，難道恩格斯曾想斷言，說道德歷史（其實他也只是說『現在』哩）只限於上述三點麼？說在封建制度的道德以前沒有如像奴隸制的道德，而在奴隸制的道德以前沒有如像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道德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認真批評恩格斯想以唯物主義觀點闡明現代道德觀念潮流的企圖，却用一種極空洞的辭藻來款待我們！

講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開始就聲明他不知道唯物史觀究竟在那一部著作裏敘述過的這種『批評』手段時，我以爲不妨提起一件事實，就是這位作者有個時候也曾知道這種著作之一，並善於給以較正確的估計。在一八七七年的時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對資本論作過如下的評語：『如果從資本論上取消那種用不着的黑格爾辯證法的笨重累贅的蓋子（真是咄咄怪事！爲什麼『黑格爾辯證法』在一八七七年是『用不着的』東西；而在一八九四年，唯物主義却已是倚據於『辯證過程底無可爭議性』了呢？），那末，不管這部著作其他長處如何，我們也能看見作者在這部著作裏很好地研究了

解決形式與其藉以存在的物質條件間的相互關係這一總問題所必要的材料，並且在一定的範圍中很好地提出了這個問題』。而『形式與其藉以存在的物質條件間的相互關係』，也就是唯物主義學說給予了一定解決的社會生活各方面相互關係問題，即思想社會關係是物質社會關係底上層建築物的問題哩。讓我們再往下看吧。

『其實，全部資本論』（着重點是我加的）『都是專門研究既經產生出來的社會形態怎樣日益發展，怎樣日益加強其標本特徵，怎樣使各種發現、發明、生產方法底改善、新市場以及科學本身都被其征服，被其同化，怎樣迫使這些東西來爲它工作，以及這個形態怎樣忍受不住物質條件繼續往前變更的情形』。

好一個奇怪的變故呵！在一八七七年，『全部資本論』是專門按唯物主義觀點來研究一定的社會形式（難道唯物主義不正是以物質條件來說明社會形態麼？），而在一八九四年却已甚至不知道應在何處，應在那部著作裏尋找這個唯物主義底敘述了！

在一八七七年，是資本論『研究』『這個形態（即資本主義形態？可不是麼？）忍受不住物質條件繼續往前變更』（請注意！）；而在一八九四年，却已絕對沒有什麼研究，至於那認爲資本主義形態不能忍受生產力繼續往前發展的信念，則已『完全』是支持在『黑格爾三段論法末尾一環上』的了！在一八七七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寫過：『對於這社會形態與其藉以存在的物質條件的關係的分析，是永遠（着重點是我加的）都會留作爲這位作者所具邏輯力量和淵博學識底紀念碑的』；而在一八九四年，他却宣稱唯物主義學說是無論何時何地都未曾用科學方法來檢驗過和論證過的了！

好一個奇怪的變故呵！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發生了兩件事情：第一，七十年代的俄國農民社會主義，本來是因自由含有資產階級性質而『唾棄』自由的，是和那些拚命抹煞

俄國實際生活對抗性的『高頭大額的自由主義者』鬥爭過的，是夢想過農民革命的，現在它已經完全腐化而產生了一種鄙陋的市儈的自由主義，認為農民經濟底進步潮流是『令人興奮』的現象，却忘記了這種潮流是以農民羣衆被剝奪的過程爲伴侶（並且是以此過程爲條件）；第二，在一八七七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醉心於辯護『熱血志士』（即革命社會主義者）馬克思而反對自由主義批評者爲己任，却没有發覺馬克思方法與他自己的方法不能相容。當人們已向他解釋了辯證唯物主義與主觀社會學間的這個不可調和的矛盾時——當恩格斯底論文和書籍已向他解釋了這點時，當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向他解釋了這點時（在普列漢諾夫底著作裏往往可以遇見對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中肯批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僅不認真來重新審查問題，反而簡直放肆囂張起來。他現在已不是歡迎馬克思（如在一八七二年和一八七七年那樣），而是躲在那種形跡可疑的讚美辭藻的門限底下向他叫吠，並且喧嚷叫囂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因爲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不願以『保護那些經濟實力最弱者』，貨棧和農村改良辦法、手工業博物館和手工業協作社等等善意的市儈的進步辦法爲滿足，而始終想做『熱血志士』，即始終主張社會革命，想要訓練，領導並組織真正革命的社會份子。

講了這一小段追述往事的插話以後，大概是已經可以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對馬克思理論『批評』的分析結束了。我們就試把批評者底『理由』歸納起來作一總結吧。

他所想要打破的學說，第一是依據於唯物史觀，第二是依據於辯證法。

關於第一點，批評者首先就說他不知道究竟在那部著作裏敘述過唯物主義。他既沒有找到這種敘述，就來自行臆造什麼是唯物主義。爲要使人覺得這個唯物主義懷有一種過分的企求，於是他就來實行臆造，似乎唯物主義者是企求說明人類底全部過去，現在和將

來；隨後又因參照馬克思主義者親自的聲明，而發現他們認為已被說明了的只有一個社會形態，於是批評者就斷定：唯物主義者把唯物主義底活動場所縮小了，因此也就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爲要向大家說明規定這個唯物主義的方法，於是他就來實行臆造，說唯物主義者曾認為自己的知識還不足够規定科學社會主義，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自認（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知識不够，只是指對於一般經濟史而言；雖然他們從來沒有刊行過這部證明他們自己知識不够的著作。經過這番序幕以後，批評者就以如下的批評來款待我們：資本論之所以已被推翻，第一是因爲它只說及一個時期，第二是因爲資本論並沒有確立經濟唯物主義，而只簡單說及經濟唯物主義。這些論據大概是極其厲害而嚴重，所以必須認爲唯物主義從來沒有用科學方法來論證過。然後，批評者就援引一件事實來反對唯物主義，說是有一個與此學說完全無關的人，在完全另外一個國家內研究史前時代以後，也得出了唯物主義的結論。其次，爲要指明勉強把兒女生產附會到唯物主義方面來是完全不正確，說這不過是玩弄字眼而已，於是批評者就來證明，說經濟關係是基於兩性關係和家庭關係的上層建築物。這位嚴重批評者在這裏提出來教訓唯物主義者的指證，使我們獲得一個深奧的真理：遺產制度非有兒女生產不行；與這兒女生產底產品『結合着』的，是複雜的心理；兒女是按父親精神教育出來的。同時我們又順便聽見民族聯系是氏族聯系底繼續和綜合。批評者在繼續其關於唯物主義的理論鑽研時，既發覺馬克思主義者許多論據底內容都是認爲大衆在資產階級制度下『必然』遭受壓迫和剝削，都是認爲這個制度『必然』會變成社會主義制度，——於是批評者就立刻宣佈說，必然性是個太普泛的括弧（如果不說到正是人們認爲必然的話），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就是神祕論者和形而上學者。批評者並且還說馬克思和唯心主義者的論戰是『片面性的』，可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這些唯心主義者底觀點

對於主觀主義方法的態度，以及馬克思底辯證唯物主義對於它們的態度。

至於馬克思主義底第二個基石，即辯證法，那末只須這位大胆批評者用手推撞一下，就把這個基石推翻了。而這一推撞是推得很中肯的：批評者大賣氣力來駁斥那認為可以用三段論法證明什麼東西的見解，可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到辯證法並不在於三段論法，而恰巧是在於否認社會學中的唯心主義方法和主觀主義方法的事實。另一個推撞是專門用來反對馬克思的；批評者在奮勇的杜林先生幫助下，把一個不可思議的謬論暗中加到馬克思頭上，似乎馬克思曾用三段論法來論證過資本主義滅亡底必然性，——然後，批評者就用得勝神情來攻擊這個謬論。

以上所述，就是『我國著名社會學家』連番燦爛『勝利』底經過！觀瞻這些勝利，豈不真是『大有教益』（布勒寧）麼？

在這裏還必須說及一點，這一點雖與對於馬克思學說的批評沒有直接關係，可是極可表明批評者底理想以及他對於現實的見解。這就是他對於西方工人運動的態度。

我們在上文中已經引證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底聲明，他說唯物主義在『科學』中（也許是在德國『人民之友』底科學中罷？）原來是沒有根據，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這個唯物主義『在工人階級中間確實是流行得很快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怎樣解釋這件事實呢？他說：『至於說到經濟唯物主義在所謂橫的方面獲得的成功，以及它以尙未經批評眼光檢驗過的形態來廣泛流行的事實，那末這一成功底重心就不是在科學中，而是在那些由將來前途所規定的人生實踐中』。所謂實踐由將來前途『所規定』這一拙劣語句，其用意不過是想說：唯物主義之所以流行，並不是因為它正確說明了現實，而是因為它離開這個現實，轉到前途方面去了。往下又說：『這些前途所要求於領會它們的德國工人階

級和那些十分關懷德國工人階級命運的人們的，既不是知識，也不是批判的思索，而不過是信仰罷了』。換言之，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之廣瀾流行，是因為這個學說約許了工人們以美滿的未來！可是，每一個稍微認識社會主義和西方工人運動歷史的人，都可看出這種解釋是極端荒誕無稽的。誰都知道，科學社會主義其實從來也沒有描繪過任何未來情景；它僅僅以分析現代資產階級制度和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底發展趨勢為限。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就已寫過，並且確切執行了這樣一個綱領：『我們並不向世界說，『中止鬥爭吧，你的全部鬥爭都是無謂之舉』，而只是給它一個真正的鬥爭口號。我們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是為着什麼而鬥爭；而意識這個東西，不管世界願意與否，都是它所應該具備的』。例如，誰都知道：資本論這一部敘述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主要著作，始終只提出一些最廣泛的對於未來的暗示，只考查現時已存在而為未來制度所由長成的那些原素。誰都知道，在說明未來前途方面，舊時的社會主義者所約許的東西是多得無比，他們無微不至地描繪了未來社會底情景，想以這種制度底情景來引誘人類，說那時人們將不必進行鬥爭，說那時人們社會關係將不是建築在剝削制度上，而是建築在適合於人類天性條件的真正進步原則上。可是，——雖然有一大批敘述過這些思想的非常天才的人物以及非常確信的社會主義者，——他們的理論始終是與實際生活隔離，他們的綱領始終是與人民政治運動隔離，一直到巨大機器工業尚未把工人無產階級羣衆捲入政治生活漩渦，工人無產階級鬥爭底真正口號尚未發現的時候為止。這個口號是由馬克思這位『並非空想主義者，而是一位很嚴格，有時甚至很乾燥的學者』（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很久以前，在一八七二年評論馬克思時所說的話）發現，且絕對不是用指示什麼前途的方法，而是用科學態度分析現代資產階級制度的方法，用說明剝削現象在這個制度存在時必不可免的方法，用探討這個制度

底發展規律的方法發現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當然可以在俄國財富底讀者面前武斷，說爲要理解這個分析並不需要什麼知識，也不需要什麼思索，可是我們已經看見他本人（而我們往下還會從他那位經濟學家同事那裏看得更明顯）全然不懂這種分析所確立的淺顯真理，所以他的這種說法，當然也就只能令人發笑而已。而終究不容置辯的事實是：工人運動正是隨着大資本主義機器工業發展的地方和程度而傳播和發展着；社會主義學說底成功，恰巧是當它拋棄了妄談適合人類天性的社會條件的議論，而着手按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現代社會關係，說明現今剝削制度必然性的時候達到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簡直是一反真情，根本曲解唯物主義對於『前途』的態度，企圖避開唯物主義在工人中間盛行的真正原因，而用最鄙陋的市儈方法來嘲弄西歐工人運動底思想和策略。我們已經說過，他根本沒有拿出一個理由來反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制度因勞動社會化而必然轉變爲社會主義制度的論據，但他還是絕頂橫蠻地從事譏諷，什麼『無產軍』造就剝奪資本家的條件，『隨後，任何階級鬥爭都會停止，天下就會太平，人間就會幸福』。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有比這更簡單而且正確得多的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只須『人民之友』更詳細指出『明白而確定不移的』實現『符合心願的經濟進化』道路，那時這些人民之友就一定會被人『召去』解決『實際經濟問題』（參看俄國財富第十一期上尤沙可夫先生所著俄國經濟發展問題一文），而暫時… 暫時，工人應當等待一下，應當指靠於人民之友，而不應當抱着『沒有根據的自信心理』來開始進行反對剝削者的獨立鬥爭。我們的這位作者爲要根本打破這種『沒有根據的自信心理』，就拚命來痛斥『這個幾乎可以容納在袖珍字典中的科學』。的確，這還了得：既是科學，同時又是只值幾文銅錢而小得可以放置在袖口裏的社會民主主義小冊子！的確，那些只有當科學教導被剝削者進行爭取本身解放的獨立

鬥爭，教導他們拒絕任何抹煞階級對抗性並想獨攬一切的『人民之友』的時候，才來重視科學，因此就把這個科學敘述在一些使俗人很覺難堪的便宜小冊子中的人，是自信得如何沒有根據呵。如果工人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人民之友』，那就會是另一回事了，——那時，『人民之友』就會向他們昭示出真正十足，卷頭浩繁，大學校式的俗人科學，就會叫他們詳細認識那符合人類天性的社會組織，只要… 工人願意等待等待，而不抱着這種沒有根據的自信心理來自動開始鬥爭就行了！

* * *

在未說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第二部分『批評』以前——他這第二部分『批評』已經不是一般地反對馬克思理論，而是專門反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我們必須稍許說幾句離開本題的話。原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如他在批評馬克思時不僅沒有企圖把馬克思底理論確切敘述出來，反而簡直撒謊歪曲這個理論一樣，在這裏也完全橫蠻無理地撒謊歪曲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思想。必須先把真情實況恢復起來。而爲要做到這一步，最方便的辦法就是把俄國舊時社會主義者底思想拿來與社會民主黨人底思想對照一下。講到前一種思想底內容時，我且借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俄國思想一八九二年第六期上發表的論文中的語句來說，他在這篇論文裏也曾說到馬克思主義（並且——我們指出這點，該會使他慚愧吧——是以莊重口氣說到馬克思主義，而沒有涉及那些只按布勒寧口吻才可在受檢查的刊物上加以談論的問題，也沒有隨便踐踏過馬克思主義者），並與馬克思主義對立——或至少也是與它平行——來敘述了自己的觀點。我當然絲毫不想侮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說不想把他算作社會主義者，也絲毫不想侮辱俄國社會主義者，就是說不想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他們同等看待：我僅僅認爲前者和後者底論證程序實

際上是彼此一樣，其區別只在於果決性、直率性以及信念一貫性底程度而已。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敘述祖國紀事雜誌社底思想時寫道：『我們向來都以土地屬於農人和勞動工具屬於生產者作為道德和政治的理想』。你們看，出發點是最善良的，是充滿最善良的願望的……『至今還存在於我國的中世紀勞動形式*已大被動搖了，但我們沒有看見有什麼理由來完全取消這些形式，以取歡於何種學說——自由派的學說或非自由派的學說』。

真是奇怪的議論呵！無論什麼『勞動形式』都只有因它們被其他某種形式所替代時，才會被動搖的；而我們的這位作者却甚至沒有（而且在他那些同道者中也是誰都沒有）企圖來分析這些新形式和說明這些新形式，以及查明這些新形式排擠舊形式的原因。更奇怪的，是這套議論第二部分：『我們沒有看見有什麼理由來取消這些形式以取歡於學說』。而『我們』（即社會主義者，——請看上述附帶說明）究竟擁有何種手段來『取消』勞動形式，即改造現時存在於社會各組成員間的生產關係呢？難道關於按學說來改造這些關係的念頭不是荒謬麼？讓我們再聽下去吧：『我們的任務並不是定要從自己民族內部養成一種『特異的』文明，但也不是要把西方文明及其所有一切內在腐蝕矛盾都整個兒搬到自己這裏來：必須儘可能從各處採納優長，至於這些優長究竟是自己的或他人的，那就不是什麼原則的問題，而是實際方便與否的問題。這看起來是非常簡單，明白易懂，簡直根本沒有什麼可說的』。的確，這是多麼簡單呵！從各處『採納』優長，於是就萬事妥貼了！從中世紀形式中『採納』生產資料屬於工作者的原則，而從新形式（即資本主義形

*『所謂中世紀勞動形式，——作者在另一地方解釋道，——不僅是指村社的土地所有制，手工業以及協作社組織而言。所有這些都毫無疑義是中世紀形式，但同時，凡土地或生產工具屬於工作者的一切形態，也是應當算作中世紀形式的』。

式)中『採納』自由、平等、教育和文化。於是就沒有什麼可說了！社會學中的主觀方法在這裏是全形畢露的：社會學是從空想——土地屬於工作者的原則——開始，並指出那些使符合心願的事情見諸實現的條件：從四方八處『採納』優長。這位哲學家用純粹形而上學的觀點來觀察問題，認為社會關係不過是某些制度機械湊合起來的東西，不過是某些現象機械配合起來的東西。他把這些現象中間的一個現象——中世紀形式中的土地屬於農人的現象——割取出來，並以爲可把這個現象搬到任何其他形式中去，好似把磚瓦從某一所房屋上搬到另一所房屋上去一樣。但這是等於不研究社會關係，而割裂那些應加以研究的材料，因爲土地屬於農人的現象在實際上並不是如像你所設想的那樣孤單獨立存在着，而不過是當時生產關係連環中的一個環節，這些生產關係就是：土地由各個巨大的土地所有者，即地主所瓜分；地主把這個土地當作份地給予農民，以便剝削他們，於是土地就好像一種實物工資，因爲這個土地給予農民們以保證他們能替地主生產剩餘產品的必需產品；這個土地是保證農民能爲地主担任勞役的基礎。爲什麼作者沒有考察這個生產關係體系，却只限於把一個現象割取出來，並因此而把它的真象完全歪曲了呢？這就是因爲作者不善於觀察社會問題：他（我重複說一遍：我所以援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底議論，祇是把它當作例子來批評整個俄國社會主義而已）根本就沒有打算來說明當時的『勞動形式』，根本就沒有打算把這些形式當作某種生產關係體系，當作某種社會形態來看待。因爲他——用馬克思底話來說——根本不懂得那一定要把社會當作在動作着和發展着的活生生的機體來觀察的辯證法。

他既然根本沒有想到新勞動形式排擠舊勞動形式的原因問題，於是在談論這些新形式的時候也重複着完全同樣的錯誤。他認爲只須指出這些勞動形式『動搖着』土地屬於農人的現象，——更普泛

點說，就是使生產者脫離生產資料，——並斥責這是不符合於理想的事情，就算足够了。而他這個議論又是完全荒謬的：他把一個現象（喪失土地）割取出來，却沒有把這個現象當作完全是另一個生產關係體系底組成部分，這另一個生產關係體系，是以必然使各個商品生產者彼此競爭，使人們彼此不平等，使一部分人陷於破產，而使另一部分人發財致富的商品經濟為基礎的。他指出了一個現象，即大眾陷於破產的現象，却忽略了另一個現象，即少數人發財致富的現象，——於是他就使自己對於前後兩種現象都不能瞭解。

雖然如此，而他還是把這種方法叫作『尋求對於那些具體實際生活問題的答案』（俄國財富一八九四年第一期），實則恰巧相反；他既不善於而且不願意說明現實，既不善於而且不願意正視現實，於是就可恥地逃避實際生活及其窮人反對富人鬥爭的這些問題，却跑到善良的空想領域中去；而他還把這叫作是『尋求對於那些提得盡善盡美的迫切複雜的真正現實生活問題的答案』（俄國財富第一期），實則他甚至沒有企圖來分析並說明這個真正現實生活。

他並沒有這樣作，却用最無意思的從各個不同社會形態中抽出個別原素，從中世紀社會形態中抽出某某東西，從『新』社會形態中抽出某某東西等等的方法而臆造出一種烏托邦。當然，建築在這個基礎上的理論，也就不能不與現實社會進化過程隔離，其原因很簡單：我們的這些空想主義者所不得不在其中生存活動的，並不是由他們從各方採納來的原素所構成的社會關係，而是那些決定着農民與富農（殷實農夫）間的關係，決定着手工業者與包買主間的關係，決定着工人與工廠主間的關係而為他們所完全沒有瞭解的社會關係。他們想按自己的理想來改造他們所沒有瞭解的這些社會關係的企圖和努力，是不能不遭到失敗的。

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誕生』時期，社會主義問題在俄國情形，大致就是如此。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是以批評舊時社會主義者底主觀方法來開始活動的；他們並沒有以指出剝削制和斥責剝削制爲滿足，而且力求說明這個剝削制底根源。他們既看見俄國改良以後的³²全部歷史都是大衆陷於破產和少數人發財致富的歷史，既目覩小生產者羣衆大遭剝奪過程與到處技術進步過程並行的情景，既發現這兩個絕對相反潮流是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地方產生，按商品經濟加强的程度而加强的事實，所以他們也就不能不得出結論，說他們所遇見的是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組織，這個組織是必然產生出對於大衆的剝奪和壓迫的。他們的實踐綱領是已直接由這個信念所決定了的：其內容就是要加入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這個鬥爭，即窮人階級反對富人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就是俄國從最偏僻的鄉村起，直至最新的完善的工廠止的經濟現實底主要內容。怎樣加入呢？——答案又是已由這個現實本身所提示給他們的。資本主義已使主要工業部門達到大機器工業的階段；它既已這樣使生產社會化，就造成了新制度底物質條件，同時又造成了新的社會力量；工廠工人階級，即城市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雖然是和俄國全體勞動居民遭受着同樣的——按其經濟實質說來——資產階級剝削，但這個階級却處在特別便於謀本身解放的條件中；它已和那完全基於剝削制的舊社會沒有絲毫聯系；它的勞動條件和生活環境本身就把它組織起來，使它不得不用心思索，並給它以走上政治鬥爭舞台的可能。所以社會民主黨人自然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一切希望都寄託於這個階級，把自己的綱領歸結於發展這個階級底階級意識，把自己的全部活動都指向於幫助這個階級起來進行反對現代制度的直接政治鬥爭，並吸引俄國整個無產階級加入這個鬥爭。

* * *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他究竟是用什麼東西來駁斥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觀點，來駁斥社會民主黨人底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呢？

馬克思主義者底理論觀點，竟被這位批評家敘述成如下的樣子：

『真理——似乎馬克思主義者這樣說過——是在於按內在的歷史必然法則，俄國一定會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生產，包括一切內部矛盾，小資本被大資本所吞併，而那些脫離了土地的農夫則一定會變成無產者，一定會統一起來，『一定會社會化』起來，那時就會萬事妥貼，而幸運的人類就可坐着享福了』。

這樣說來，馬克思主義者們在理解現實方面是絲毫也無異於『人民之友』，而祇是在想像未來方面才有區別：他們大概是完全不注意現在，而只注意『前途』哩。至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底意思正是如此，那是絲毫不容置疑的，因為他說：馬克思主義者『完全相信，他們在其預察將來方面並沒有半點空想成分，而是一切都按嚴格科學底訓條來衡量過的』；最後還說得更加明白：馬克思主義者『信仰並信奉抽象歷史公式底不可變移性』。

總而言之，我們在這裏看見的，也就是所有那些不能絲毫按實質反駁馬克思主義者觀點的人早已極力運用來非難他們的一種最陳腐最鄙俗的論調。『馬克思主義者信奉抽象歷史公式底不可變移性』！！

這完全是撒謊和臆造呵！

無論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也沒有在什麼地方這樣論證過，說在俄國『應當有』資本主義，『因為』在西方有了資本主義等等。無論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也沒有把馬克思理論當作什麼必須普遍遵行的哲學歷史公式，沒有把它當作什麼比對於某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說明更多一些的東西。只有一個主觀哲學家米海洛夫

斯基先生，才巧於暴露自己根本不懂得馬克思，竟在馬克思那裏看見有一種普遍哲學理論，於是就從馬克思那裏得到一個完全肯定的解答，說他罵錯人了。沒有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曾在什麼時候不是以這理論與現實以及與一定的——即俄國的——社會經濟關係歷史相適合為基礎，而竟以其他什麼東西為基礎來論證過自己的社會民主主義觀點，而且根本就不能這樣來論證，因為對於理論的這個要求，是已由『馬克思主義』底創始人馬克思自己所完全明白肯定提出，並奠定為其全部學說基礎了的。

固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能以說他『親耳』聽見過恰巧信奉抽象歷史公式的論調為理由來任意駁斥這些聲明。可是，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真正從他自己那些對話者口裏聽見過各種荒謬謔言，那究竟與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或其他任何人有何相干呢？這難道不只是證明他湊巧挑選了自己的對話者麼？也許這位機智哲學家底機智對話者會以馬克思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等等自稱，可是，誰不知道在現今這個時候（這是大家早已看見的事實），隨便那個壞蛋都喜歡用『紅色』衣服喬裝起來呢？*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明達，竟不能把這種『喬裝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辨別清楚。或者說，如果他如此深知馬克思，竟沒有看見馬克思萬分着重提出來的這個對於自己全部學說的準繩（要把『那在我們眼前發生的現象』表述出來），那就不過又是證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聰明而已。

無論如何，他既然着手來在刊物上進行反對『社會民主黨人』的論戰，他就應當注意到一個社會主義者團體，這個團體早已帶着這個名稱並唯一帶着這個名稱，所以決不可把其他的人和這個團體混為一談，而且這個團體已有其從事於著作的代表，即普列漢諾夫

*我寫這段話，是完全假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確實聽見過有些人說他們自己信奉抽象歷史公式，是假定他絲毫也沒有撒謊歪曲。但我終究認為絕對必須在此附帶聲明一句：我是人云亦云而已。

及其小組¹²。如果他這樣作過，——而這樣作，顯然是任何一個稍微端莊的人所應當的，——並讀過第一本社會民主主義著作，即普列漢諾夫所著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書，那末他還在該書頭前幾頁上，就會看見該書作者以該小組全體組員名義發表的絕對肯定的聲明：

『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想以偉大名字底威信』（即馬克思底威信）『來掩護我們自己的綱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呵，你懂得俄文麼？你懂不懂得，信奉抽象公式和根本拒絕利用馬克思威信來論斷俄國事情，是有區別呢？

你懂不懂得，你把隨便聽見你那些對話者信口說出的斷語當作馬克思主義者底斷語，而把社會民主派中的一位卓越份子代表整個團體名義在刊物上發表的聲明置之不顧，是作得很不誠實呢？

往下還有更肯定的聲明：

『我重複說一遍，——普列漢諾夫說，——在最一貫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關於估計現代俄國現實問題是有發生意見分歧的可能』；我們的學說，『是應用這個科學理論來分析極複雜混亂社會關係的第一次嘗試』。

我想這是說得再明顯不過的了；馬克思主義者絕對只從馬克思理論中借用了闡明社會關係所必要的寶貴方法，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在估計這些社會關係時所引為標準的，全然不是什麼抽象公式等等謬論，而是這種估計本身底正確性及其與現實相符合。

你們或許以為作者雖然如此聲明，其實却有另一種想法吧？但這是不對的。他當時所要解答的問題是：『俄國是否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呢？』可見，這個問題完全不是按馬克思主義觀點，而是按我國那些哲學家底主觀主義方法規定，因為這些哲學家認為決定這種應當與否的，不是長官底政策，便是『社會人士』底活動或『適合於人類天性』的社會理想一類的胡說。現在就要問：一個信奉抽象公式的人，應當怎樣回答這類問題呢？他大概會要說什麼辯

證過程底無可爭議性，說什麼馬克思理論底普遍哲學意義，說什麼每個國家都必然要經過某某… 階段等等了。

而普列漢諾夫又是怎樣回答的呢？

他是按馬克思主義者所只能那樣回答的方式回答的：

他把應當與否的問題完全撇開不說，認為這是個毫無意思而只能使主觀主義者發生興趣的問題，却始終只說到現實社會經濟關係，只說到這些關係底現實進化過程。因此他也就沒有直接回答這個提得不正確的問題，而是回答如下：『俄國已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裝作見識高明的樣子，談論什麼信奉抽象歷史公式，什麼必然性底內在法則等等荒唐無稽的鬼話！而且他還把這叫作是『反社會民主黨人的論戰』哩！！

我絕對不懂，如果說這是論戰家，那末誰才算是憑空狂吠者呢？！

說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段言論時，還不能不指出一點，就是他硬說社會民主黨人底觀點是認為『俄國一定會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生產』。這位哲學家大概是認為俄國還沒有『自己的』資本主義生產。這位作者想必是贊成認為俄國資本主義只以一百五十萬工人為限的意見罷，——我們在下文裏還會碰見我國『人民之友』底這種幼稚思想，他們把其餘一切剝削自由勞動的現象，都不知歸併到何處去了。『俄國一定會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生產，包括其一切內部矛盾，那時脫離了土地的農夫就一定會變成無產者』。真是越說越糟糕！這樣說來，現在俄國是沒有『內部矛盾』的！直截了當地說，即是沒有極少數資本家剝削廣大民衆的事實？沒有絕大多數居民陷於破產和極少數人發財致富的現象？農夫還只是正待脫離土地？那末試問俄國在改良以後的全部歷史，若不是農民大眾遭受曠世未見的強烈剝奪，又是什麼呢？該要有多大的勇氣，才可當衆

說出這種東西來呵。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有這種勇氣的：『馬克思所談論的是現成的無產階級和現成的資本主義，而在我國却還須創造無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在俄國還須創造無產階級麼?!在俄國，在大眾貧困得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厲害的俄國，在這個對於勞動者的剝削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其橫蠻的俄國，在人們往往拿來和英國——按其貧民狀況說——比較（而且比較得完全正當）的俄國，在這個總是有千百萬人民忍飢挨餓，而同時——舉例來說——糧食出口又日益增加的俄國，沒有無產階級!!

我認爲：爲了這些典型式的語句，也許應當給健在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建立一座紀念碑哩！*

不過我們在下文裏還會看見，『人民之友』底經常一貫的策略，就是假裝看不見俄國勞動者痛苦不堪的狀況，硬說勞動者狀況僅僅是『陷於動搖』，所以只須『文化社會』和政府努力一下，就可把一切都引入正軌了。這些騎士們以爲，只要他們閉着眼睛，不願看見勞動羣衆狀況所以不好，不是因爲這個狀況『陷於動搖』，而是因爲勞動羣衆遭受極少數剝削者方面的最無恥的掠奪這件事實，以爲只要他們像駝鳥一樣把腦袋隱藏起來，而不願看見這些剝削者，那末這些剝削者就會消聲匿跡的了。而當社會民主主義者向他們說這是害怕正視現實的可恥怯懦心理，當社會民主主義者以這個剝削事實爲出發點，並說這件事實只可用俄國社會底資產階級組織，把民衆分裂爲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這個資產階級組織來解

*不過，也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在這裏也會試圖託詞搪塞，說他的意思並不想說俄國根本沒有無產階級，而只是想說俄國沒有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吧？是不是？那末你爲什麼沒有說出這點來呢？其實全部問題就在於俄國無產階級究竟是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組織所特有的無產階級呢，還是其他什麼樣的無產階級呢？如果你在整整兩篇論文中問一個字也沒有提及這個唯一嚴重緊要的問題，却寧肯胡說八道，亂扯一頓，那又怪得誰人呢？

釋，只可用那無非是資產階級統治機關的俄羅斯國家底階級性質來解釋的時候，當社會民主黨人說，因此唯一出路就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時候，這些『人民之友』就大哭大叫起來，說社會民主黨人想使人民喪失土地!!想破壞我國人民經濟組織!!

我們現在就說到他這至少是不體面的全部『論戰』中最令人氣憤的地方，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對於社會民主黨人政治活動的『批評』（?）。誰也懂得：社會主義者和鼓動家在工人中間的活動，決不能在我國合法報章上加以誠意討論；受檢查的莊重刊物在這方面所能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謹守緘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忘記了這個起碼規矩，毫不愧怍地利用其對讀者大眾說話的壟斷權來任意誣蔑社會主義者。

不過，除合法報章而外，也還可以找到鬥爭手段來反對這個放肆無理的批評者哩。

『據我所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帶着天真神情說道，——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可以分爲以下三類：旁觀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對過程袖手旁觀的），消極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只『減輕生育痛苦』。他們『對於耕田種地的人民不感興趣，而只把注意力和希望寄託於離開了生產資料的人』），以及積極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公開主張使農村更加破產的）』。

這是什麼話?!難道這位批評者先生不知道，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是以這樣一種對現實的見解爲出發點的社會主義者，即認爲現實是資本主義社會，認爲擺脫這個社會的唯一出路就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麼？他究竟是怎樣和根據什麼理由來把他們與那種毫無意思的鄙陋議論混爲一談呢？他究竟有什麼權利（當然是道德權利）把馬克思主義者這個名詞拿去稱呼那些顯然是不接受馬克思主義起碼基本原理的人，稱呼那些從來沒有在什麼地方以特別團

體資格發表過意見，從來沒有在什麼地方提出過任何特別綱領的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給自己留下了辯護這種惡劣手段的後路。

「也許，——他用濶少爺底輕浮態度譏諷着說，——這些人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自稱的」。究竟是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自稱的呢？是在彼得堡的自由派和急進派的客廳裏麼？是在私人信札上麼？就算是這樣吧。那末就請你在自己的客廳裏，在自己的通信中去和他們交談吧！而你却在報章上當衆發言反對那些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當衆發表過意見的人。而且你還敢於聲稱是在進行論戰反對『社會民主黨人』，雖然明知這個名稱是只爲一個革命社會主義者團體所具有，而決不可把其他任何人和這個團體混爲一談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這裏好像是一個被揭穿了過失的小學生那樣支吾躲閃，而拚命向讀者證明說：這與我毫不相干，我是『親耳聽到，親眼看見的』。好吧，妙極了！我們很願意相信，在你跟前盡是一些鄙夫和惡棍，但這與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有何相干呢？誰不知道，『在現今這個時候』，不僅社會主義的社會活動，而且任何一個稍許獨立和誠懇的社會活動，都要引起政治上的追究取締的時候，每有一個真正在某種旗幟——民意主義³⁴旗幟，馬克思主義旗

*我現在且來談談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裏偶然碰見的一個對於事實的指證。每一個讀過他的論文的人，都會承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把斯克沃爾錯夫先生（即饑荒之經濟原因一書底作者）也稱爲『馬克思主義者』。而這位先生自己並不這樣來稱呼自己，而且凡是對於社會民主黨人作品稍微有點認識的人，都知道從社會民主派觀點上看來，這位先生不過是一個最鄙陋的資產者罷了。他既然不懂得，他自己爲之擬製其進步『方案』的社會是資產階級的社會，因此所有那些真正是在農民經濟內也發現的『技術改善』，都不過是使少數人狀況改善，而使大多數人陷於無產者化的資產階級進步，——既然如此，那他算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者呢？他既然不懂得他們所對之提出『方案』的國家，是只能擁護資產階級和壓迫無產階級的階級國家，那他算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者呢！

幟，或甚至立憲主義旗幟——下面工作的人，就有幾十個假借這種名稱來掩護其自由主義懦怯性的清談家，甚至於有幾個簡直是專謀個人私利勾當的卑污下賤份子呢？只有那些最卑鄙齷齪的人，才會以各種骯髒份子玷污了（而且不是當衆，不是公開）其中某一派旗幟的事實來歸罪於這一派，——這難道不很明白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底全部敘述，澈頭澈尾都是曲解，歪曲和顛倒是非。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社會民主黨人作為出發點的『真理』是被他完全曲解了，被他敘述成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在什麼地方這樣敘述過，而且不能這樣來敘述的樣子了。如果他敘述了社會民主黨人對於俄國現實的真正見解，那他就不能不看見：能與這些見解『相合的』，只有一種態度，這就是要促進無產階級階級自覺底發展，組織並團結無產階級來進行反對現代制度的政治鬥爭。可是他那裏還留下有一個遁辭。他帶着受到冤屈的神情，用偽善態度指天誓日，並以甜蜜口吻揚言道：『我很樂意聽見這點，但我不懂你們提出抗議究竟是反對什麼』（他在俄國財富第二期上正是這樣說的）。『你們仔細讀一讀我對於消極馬克思主義者的評論，就會知道我的意見是說：從道德觀點上看來，一點也不容反駁』。

這當然不過是再來咀嚼從前那些可憐的遁辭而已。

請你說說，你將怎樣稱呼這樣一個人底行爲，這個人宣佈他是在批評社會革命民粹派（而另外一種民粹派還根本沒有出現，——我是拿這樣一個時期來說的），同時却說出如下一類的話來：

『據我所知，民粹主義者分爲以下三類：澈底的民粹主義者，他們完全接受農夫思想，並確遵農夫願望來把笞刑和打老婆的風俗普遍化，並且根本擁護皮鞭刑棍政府所施行的那種也會叫作人民政策的萬惡政策；其次，就是胆怯的民粹主義者，他們並不注意農夫意見，而只企圖用結社等等方法，把不合俄國國情的革命運動搬到俄國來，——不過這從道德觀點上看來，一點也不容反駁，如果不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

九十年代後半期，在提出與解決俄國革命問題方面呈現出異常活躍的景象。命名為『民權』的新的革命黨³⁵之出現，社會民主黨人影響和成績之增長，民意派內部的進化，——凡此種種，就在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和工人小組中以及在秘密刊物上，引起了關於綱領問題的活躍討論。在秘密刊物方面值得指出的，有『民權』黨底迫切問題和宣言（一八九四年），有民意社³⁶底飛傳報，有『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³⁷在國外出版的工作者，有在俄國加緊出版主要是供工人閱讀的革命小冊子的工作，有聖彼得堡社會民主黨人『為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³⁸在一八九六年彼得堡著名罷工時進行的鼓動工作等等。

在我們看來，現在（一八九七年末）最迫切的問題，是社會民主黨人底實際活動問題。我們着重指出社會民主派底實踐方面，是因為它的理論方面，看來已經渡過了一方面是政敵們頑固執拗，不願瞭解，而極力想在新派別一出現時就把它壓倒下去，另一方面是社會民主派熱烈捍衛自己基本原理的那個最緊張的時期。現在，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觀點，在其主要的與基本的方面，已經充分闡明了。而關於社會民主派底實踐方面，關於它的政治綱領，關於它的活動手段，它的策略，却還不能這樣說。我們覺得，正是在這一方面，流行着最多的誤會和隔閡，阻礙某些革命者與社會民主派完全

接近，這些革命者在理論上已完全離開民意主義，而在實踐上，又為實際生活本身所迫，趨向於在工人中間進行宣傳鼓動，甚至趨向於把自己在工人中間的活動放置到階級鬥爭基地上來，或是趨向於把民主主義任務當作全部綱領與全部革命活動底基礎。我們覺得，後一評語是適合於現時在俄國與社會民主黨人同時活動的兩個革命團體，即民意黨人和民權黨人的。

因此，我們認為，現在試圖把社會民主黨人底實際任務解釋清楚，把我們認為社會民主黨人底綱領是現有三個綱領中最合理的綱領，而那些用以反對這一綱領的意見則多半是出於誤會的理由說明一下，是特別適時的。

大家知道，社會民主黨人在實際活動方面的任務，是領導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並把這一鬥爭所表現的兩種活動組織起來：一種是社會主義的鬥爭（反對資本家階級，目標是破壞階級制度，組織社會主義社會），另一種是民主主義的鬥爭（反對專制制度，目標是在俄國爭得政治自由，並使俄國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民主化）。我們剛才是說大家知道的。的確，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自從以一個特別的社會革命派別資格出現時起，就始終十分明確指出他們活動中的這一任務，始終強調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兩種表現與內容，始終堅持說他們社會主義任務與民主主義任務有分不開的聯繫，而這一聯繫是在他們所採用的名稱上，就已明顯表現出來了的。然而直到現在，你們還往往看見，有些社會主義者對於社會民主黨人持着一種極端謬誤的觀念，責難社會民主黨人忽略政治鬥爭等等。我們且把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實際活動所有這兩方面底特徵說明一下吧。

我們先從社會主義活動開始說起。自從聖彼得堡社會民主黨人『為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開始在彼得堡工人中活動時起，社會民主派在這方面活動底性質，看來應當是完全明白的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社會主義工作，就是在工人中間普遍宣傳科學社會主義

學說，使其正確瞭解現代社會經濟制度及其基礎與發展情形，瞭解俄國社會各個階級及其相互關係，瞭解這些階級相互的鬥爭，瞭解工人階級在這個鬥爭中的作用，工人階級對於正在沒落的階級與正在發展的階級，對於資本主義底過去與將來所應取的態度，瞭解國際社會民主運動與俄國工人階級底歷史任務。而與宣傳工作緊相聯繫的，就是在工人中間進行的鼓動工作，這個鼓動工作在俄國現時政治條件下，按工人羣衆底發展水準來說，自然成爲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間進行鼓動工作，這就是說社會民主黨人要參加工人階級底一切自發鬥爭，參加工人爲工作時間、工資、勞動條件以及其他等等問題而與資本家發生的一切衝突。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動與工人羣衆底實際日常生活問題結合起來，幫助工人來理解這些問題，使工人注意到各種極重要的舞弊現象，幫助他們把他們向僱主提出的要求規定得盡量明確而切實，發展工人們對於本身團結的意識，對於全體俄國工人共同利益與共同事業的意識，使其瞭解他們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軍隊一個組成部分的統一工人階級。在工人中間成立小組，使其與社會民主黨人中央團體發生經常祕密聯系，印發工人刊物，組織一切工人運動中心地點底通信工作，印發鼓動傳單和宣言，訓練有經驗的鼓動工作人員，——大致說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社會主義活動方式，就是如此。

我們的工作，首先就是最注重城市工廠工人。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不應當分散自己的力量，而應當集中力量來在工業無產階級中間進行活動，因爲工業無產階級最能接受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在智力上和政治上最爲發展，並且按其數量以及在國內巨大政治中心裏集中程度來說，又是最爲重要的。因此，在城市工廠工人中間建立堅固的革命組織，是社會民主黨人底首要迫切任務，現在離開這個任務，便是極不合理了。然而，我們雖認爲必須集中自己力量來在工廠工人中間進行工作，反對分散力量，但我們絲毫也不想說俄國

社會民主黨人可以忽略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階級中的其他階層。全然不是。俄國工廠工人所處的生活條件，使他們往往要與那些散佈於各個城市和鄉村中，生活條件更惡劣得多的廠外工業無產階級，即手工業者發生極密切的關係。俄國工廠工人與鄉村居民也有直接聯繫（工廠工人往往有家屬住在鄉間），所以他們也不能不與鄉村無產階級，即千百萬的長工和日工，以及那些拘守一小塊土地，而從事於工役和尋求各種偶然『外款』，即同樣是從事僱傭勞動的破產農民接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認為，現在把自己的人員派遣到手工業者和鄉村工人中間去工作，是不合時宜的，但他們決不打算忽視這些階層，而要努力向先進工人解釋手工業者和鄉村工人底日常生活情形，使先進工人與較為落後的無產者階層接近時，對他們也灌輸關於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整個我國民主運動以及俄國無產階級底政治任務的觀念。當在城市工廠工人中間還有如此浩繁的工作要做的時候，派遣鼓動員到手工業者和鄉村工人中去工作，是不合算的，但社會主義的工人既然往往是與這些人不期而遇，就應善於利用這些機會並瞭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一般任務。因此，那些責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眼光狹小，說他們因只注重工廠工人而想忽略廣大勞動民衆的人，是極端錯誤的。恰恰相反，只有在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中間進行鼓動，才是把整個俄國無產階級也都喚醒起來（隨着運動擴大的程度）的最可靠的手段。在城市工人中間傳播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觀念，就必然會使這些觀念經過比較更細小的溝渠散播起來：因此必須使這些觀念在較有鍛鍊的人們中間種下較深的根蒂，使俄國工人運動與俄國革命底這個先鋒隊完全領會。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運用自己所有一切力量到工廠工人中間進行活動，同時決意贊助俄國那些在實踐上趨向於把社會主義工作放置到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基地上來的革命者，但他們並不隱諱，無論與其他革命派別訂立何種實際聯盟，都不可以而且不應當在理論上，綱領上，旗幟上實

行妥協或讓步。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深信，現在只有科學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學說，才是可做革命運動旗幟的革命理論，所以他們將用全力來傳播這個學說，使其不受曲解，而堅決反對任何一種想把尚屬年輕的俄國工人運動與那些較不確定的學說聯繫起來的企圖。理論的判斷證明，而社會民主黨人底實際活動則更表明：俄國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應成為社會民主黨人。

現在我們來講社會民主黨人底民主主義任務和民主主義工作。我們再重說一遍：這個工作與社會主義工作有分不開的聯繫。社會民主黨人在工人中間進行宣傳工作時，不能避開政治問題，而認為任何一種想避開政治問題或且延擱政治問題的企圖，都是極大的錯誤，都是離開了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底基本原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除宣傳科學社會主義而外，同時也要在工人羣衆中間廣泛宣傳民主主義思想，使其認識專制政府底一切行動，使其認識專制制度底階級內容，使其認識推翻專制制度的必要，使其瞭解，如不爭得政治自由並使俄國政治社會制度民主化，就沒有可能來為工人事業進行順利的鬥爭。社會民主黨人在工人中間根據迫近經濟要求進行鼓動時，並且把這種鼓動與根據工人階級迫近政治需要，政治困苦和政治要求進行的鼓動密切聯繫起來，例如進行鼓動反對那在每次罷工，每次勞資衝突中都表現出來的警察壓迫，反對官方對工人，對這些一般是俄國公民，特別是個最受壓迫最無權利階級的工人所施行的欺壓手段，反對每一個與工人直接接觸並使工人階級具體感覺到自己處於政治奴隸地位的專制制度重要人物和走狗。在經濟方面沒有一個工人生活問題不可利用來進行經濟鼓動，同樣在政治方面也沒有一個問題不可利用為政治鼓動底對象。這兩種鼓動在社會民主黨人活動中是互為表裏，不可分割的。無論經濟鼓動或政治鼓動，都同樣是為發展無產階級底階級自覺所必需的，無論經濟鼓動或政治鼓動，都同樣是為領導俄國工人底階級鬥爭所必需的，因

爲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無論前一種鼓動或後一種鼓動，都能喚起工人覺悟，組織他們，使他們紀律化，教育他們來進行一致活動並爲社會民主主義理想而鬥爭，因而也就使工人能根據迫切問題和迫切需要來試驗自己的力量，使工人們能從敵人方面爭得局部的讓步，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使資本家不能不顧及有組織工人底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擴大工人底權利和接受工人底要求，使政府在懷有敵對情緒而由強固的社會民主黨人組織所領導的工人羣衆面前經常發抖。

我們已指明社會主義的與民主主義的宣傳和鼓動有分不開的聯繫，我們已指明革命工作在這兩方面同時並進的必要。然而這兩種活動和鬥爭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就是在經濟鬥爭中，無產階級全然孤立，要同時反對地主貴族和資產階級，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遠非時常都能得到）小資產階級中間那些趨向於無產階級的份子底幫助。而在民主主義政治鬥爭中，俄國工人階級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態度的份子、階層和階級，都與它並列而起，因爲他們也是仇視專制制度，並用某種形式進行反對專制的鬥爭。這裏與無產階級並立的，有屬於資產階級，或屬於開明階級，或屬於小資產階級，或屬於那些被專制制度所壓制的民族或宗教以及教派等等的持反政府態度的份子。這裏自然就發生兩個問題：第一，工人階級對於這些份子應抱何種態度；第二，工人階級是不是應當與他們合併起來進行反專制的共同鬥爭呢？既然一切社會民主黨人都認爲政治革命在俄國應當先於社會主義革命，那末豈不是應當與一切持反政府態度的份子合併起來進行反專制鬥爭，而暫時把社會主義擱置起來麼？這不是爲加強反專制鬥爭所必需的麼？

我們且來分析這兩個問題。

工人階級在進行反專制鬥爭時對其他一切持反政府態度的社會階級和集團所應取的態度，早已由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中所敘述的社

會民主主義基本原則十分確切地規定出來了。社會民主黨人贊助社會中的進步階級去反對反動階級，贊助資產階級去反對那些特權等級土地佔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對官僚，贊助大資產階級去反對小資產階級底反動妄想。但這種贊助並不預定，並不要求去與非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和原則作任何的妥協，這是贊助同盟者去反對一定的敵人，而社會民主黨人給予這種贊助，是爲了加速推翻共同敵人，但他們自己並不期待從這些暫時同盟者方面獲得絲毫東西，同時也決不把絲毫東西讓給這些同盟者。社會民主黨人贊助一切反對現存社會制度的革命運動，贊助一切被壓迫的民族，被壓制的宗教，被賤視的等級等等去爭取平等權利。

在宣傳方面，社會民主黨人贊助一切持反政府態度的份子，是表現於社會民主黨人證明專制制度敵視工人事業時，將指明專制制度同時也敵視其他某些社會集團，將指明在某些問題上，在某些任務上，工人階級同情於這些集團等等。在鼓動方面，這種贊助是表現於社會民主黨人將根據專制警察壓迫政策底每次具體表現來向工人們指明，這種壓迫一般落在一切俄國公民頭上，尤其是落在特別受壓迫的等級、民族、宗教和教派等等頭上，以及這種壓迫特別打擊到工人階級身上。最後，在實踐方面，這種贊助是表現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決意與屬於其他派別的革命者締結同盟，以期達到某些局部目的，而且這種決心已在事實上屢次證明過了。

這裏我們也就講到第二個問題。社會民主黨人指出某些反政府集團與工人同情時，始終都把工人劃分出來，始終都解釋這種同情底暫時性與相對性，始終都着重指出無產階級底階級獨立性，因爲它可能在明天就成爲今天同盟者底敵人。也許有人會對我們說：『指出這點，就會使現在所有一切爭取政治自由的戰士力量減弱下去』。我們回答說：指出這點，只會使所有一切爭取政治自由的戰士力量加強起來。只有那些明白認識了相當階級實際利益的戰士，

才是強而有力的；凡是把這些在現代社會中已起着主要作用的階級利益蒙蔽起來，都只會削弱戰士底力量。這是第一。第二，在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工人階級應當把自己劃分出來，因為只有它才絕對澈底反對專制制度，只有它才與專制制度無妥協可能，只有工人階級才毫不猶豫，毫不返顧地絕對擁護民主主義。其他一切階級、集團和階層，都不是絕對反對專制制度，他們的民主主義始終是向後返顧的。資產階級不能不意識到專制制度阻碍工業與社會發展的事實，但它害怕政治和社會制度完全民主化，而隨時都能與專制制度結成聯盟來反對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根本上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趨向於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另一方面，它又趨向於反動階級，企圖阻止歷史行程，易受專制制度底種種嘗試和誘惑手段（例如亞歷山大第三所實行的『人民政策』）所驅，能爲着鞏固其小私有者地位而和統治階級結成同盟來反對無產階級。開明份子，一般『智識界』，不能不起來反對專制制度摧殘思想和智識的野蠻警察壓迫，但這智識界底物質利益把它聯系於專制制度與資產階級，使它的態度不澈底，使它爲求得官家俸祿，或爲分得利潤或股息而實行妥協，出賣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熱。至於被壓迫民族和被壓制宗教中間的民主主義份子，那末誰都知道，誰都看得見，這幾類居民內部的階級矛盾，要比每一類中所有各個階級共同反對專制制度和爭取民主制度的團結性深刻得多，堅強得多。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成爲——而且按其階級地位不能不成爲——一貫到底的民主主義者，堅決反對專制制度的戰士，而不會作任何讓步和妥協。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成爲爭取政治自由與民主制度的先進戰士，因爲第一，政治壓迫最厲害地打擊到無產階級身上，而不容對這個階級作絲毫讓步，因爲這個階級既沒有接近最高政權的機會，甚至也沒有接近官吏的機會，也無法影響社會輿論。第二，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澈底實現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民主化，因爲實行這種民主化，

就會使工人成爲這個制度底主人。因此，把工人階級底民主主義活動與其他各個階級和集團底民主主義溶合起來，就會削弱民主運動底力量，就會削弱政治鬥爭，就會使這一鬥爭弄成不那樣堅決，不那樣澈底而較能妥協的。反之，把工人階級這個爭取民主制度的先進戰士劃分出來，就會加強民主運動，加強爲政治自由的鬥爭，因爲工人階級將推進一切其他民主份子和持反政府態度的份子，將推動自由派去與政治急進派接近，將推動急進派去與現社會整個政治社會制度堅決斷絕關係。我們已在上面說過，俄國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應當成爲社會民主黨人。我們現在還要補充說：俄國一切真正和澈底的民主主義者，都應當成爲社會民主黨人。

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我們的意思吧。譬如拿官僚機關來說，官僚是專幹行政事宜並在人民面前處於特權地位的一個特殊階層。從半亞洲式的專制俄國起，一直到文明自由的文化英國爲止，到處都有資產階級社會必要成份的這個官僚機關。與俄國落後性及其專制制度相適應的，是人民在官僚面前完全無權，特權官僚完全不受監督。在英國有人民對於行政機關的堅強監督，然而即在那裏，這個監督也是遠不完滿，官僚仍保存有不少特權，往往是人民底主人，而不是人民底公僕。即在英國，我們也看見，有勢力的社會集團擁護官僚特權地位，不讓這個機關完全民主化。這是由於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爲這個機關底完全民主化，只有利於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最先進的階層，也擁護官僚某些特權，激烈反對一切官吏民選，反對完全廢除資格限制，反對官吏對人民直接負責等等，因爲他們感覺到，這種澈底的民主化將被無產階級利用來反對資產階級。俄國情形也是如此。俄國有許多極不相同的人民階層，都反對專權獨斷、不負責任、貪贓受賄和野蠻昏聩的俄國寄生官僚。可是，除了無產階級而外，沒有那一個階層會容許官僚機關完全民主

化，因為其他一切階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一般『智識界』）都與官僚有聯絡，都與俄國官僚有親屬關係。誰不知道，在神聖的俄羅斯內，急進派的智識份子，社會主義派的智識份子很容易變為皇朝政府底官吏，變為以在官廳慣例範圍內有所『裨益』而自慰的官吏，變為以這種『裨益』來辯護其政治冷淡態度，辯護其阿諛刑棍皮鞭政府行為的官吏呢？只有無產階級，才絕對敵視專制制度和俄國官僚；只有無產階級，才與貴族資產階級社會中的這些機關沒有聯絡；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根本敵視並堅決反對它們。

我們證明在社會民主黨人領導下進行階級鬥爭的無產階級是俄國民主運動底先進戰士時，竟遇見一種極流行而又極奇怪的意見，似乎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延擱政治問題和政治鬥爭。我們知道，這種意見是與真情絕對相反的。人們為什麼如此可驚地不瞭解社會民主黨人底原則，不瞭解這些屢次敘述過並在第一批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出版物中，即『勞動解放』社³⁹在國外出版的小冊子和書籍中說明過的原則呢？我們覺得，這一奇怪事實是由於下述三個原因：

第一，是因為舊時革命理論底代表人物根本不懂得社會民主主義底原則，他們擬定綱領和行動計劃，總是以一種抽象觀念為根據，而不是以估計現在國內動作而其相互關係已由歷史決定了的各個現實階級為根據。正因為人們沒有用這種現實主義態度來討論那些支持俄國民主運動的利益，才能發生這種認為俄國社會民主派忽略俄國革命者民主任務的意見。

第二，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把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社會主義活動與民主主義活動結合為一個整體，結合為無產階級底統一階級鬥爭，這不僅不會削弱，反而會加強民主運動和政治鬥爭，使其接近民衆底實在利益，把政治問題從『智識界底狹小書房』裏拖到街道

上去，拖到工人和勞動階級中間去，把關於政治壓迫的抽象觀念，換成對於政治壓迫使無產階級最感痛苦的各種具體表現的揭露，而社會民主派就是根據這些壓迫的表現來進行鼓動工作的。俄國急進派份子往往覺得，社會民主黨人不逕直號召先進工人進行政治鬥爭，而指出發展工人運動和組織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任務，就是離自己的民主主義立場後退，就是延擱政治鬥爭。可是，如果此處真有所謂後退，那就不過是法國俗語所說的那種後退：«il faut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爲要遠跳，須先後退）。

第三，誤會所以發生，是因爲在民意黨人和民權黨人兩者與社會民主黨人對於『政治鬥爭』概念本身的見解，是彼此不同的。社會民主黨人對於政治鬥爭有另一種見解，它比舊時革命理論代表人物底見解寬廣得多。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第四期民意社底飛傳報，就具體證明了這個似乎不近情理的說法。我們竭誠歡迎這個刊物，因爲它表明，在現代民意黨人中間進行着一種很有效果的深刻思想工作，但同時我們不能不指出一點，就是拉福洛夫底論綱領問題一文（第一九至二二頁）顯然表明老民意黨人對於政治鬥爭持有另一種見解*。『…這裏，——拉福洛夫談到民意黨人綱領與社會民主黨人綱領的關係時寫道：——重要的，有一點而且只有一點：在專制制度下面，除了組織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黨而外，是否有可能組織強大的工人黨呢？』（第二一頁，第二欄）；在稍前一點（第一欄）也同樣說：『…在專制制度統治下，是否可能組織俄國工人黨，而不同時組織革命黨去反對這個專制制度呢』。我們全不懂得拉福洛夫所

*在第四期上所發表的拉福洛夫論文，不過是拉福洛夫預定在材料彙刊上發表的那封長信中的『摘錄』而已。我們聽說，今年（一八九七年）夏天，在國外出版了拉福洛夫這一封信底全文以及普列漢諾夫底回答。可是我們並沒有看見這一封信，也沒有看見這個回答。民意社底飛傳報編輯部曾答應在第五期內發表編輯部對於拉福洛夫這封信的評論（見第四期，第二二頁，第一欄，附註），但我們也不知道該期是否出版。

認為根本重要的這些差別究竟何在。這是怎麼一回事？『除了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黨而外的工人黨』??難道工人黨本身不是革命黨麼？難道工人黨不反對專制制度麼？對於這個奇怪議論，在拉福洛夫論文中用如下一段話來加以解釋：『組織俄國工人黨的事情，是要在極殘酷的專制制度條件下進行的。如果社會民主黨人竟能不同時組織反專制制度的政治陰謀*——連同這種陰謀*所必需的一切條件——而做到這件事情，那末他們的政治綱領當然是俄國社會主義者底適當綱領，因為工人解放事業將可用工人自己的力量來實現。然而這是很成問題的，也許甚至是不可能的』（第二一頁，第一欄）。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民意黨人原來認為政治鬥爭與政治陰謀兩者是一件事情！必得承認，拉福洛夫在這些語句中，真是十分明顯地指出了民意黨人政治鬥爭策略與社會民主黨人政治鬥爭策略間的基本區別。在民意黨人中間，布朗基主義⁴⁰，陰謀主義底傳統非常強烈，所以他們以為政治鬥爭不外是政治陰謀而已。社會民主黨人却沒有沾染這種觀點狹隘的毛病；他們是不相信陰謀的；他們認為陰謀時代早已過去，認為把政治鬥爭歸結為陰謀，這在一方面就是萬分縮小政治鬥爭，在另一方面就是選擇最不適宜的鬥爭手段。誰都明白，拉福洛夫所說『西歐底活動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看來是無條件的狹範』（第二一頁，第一欄）一語，不過是辯論中的胡言暴語罷了。其實，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從來也沒有忘記俄國政治條件，從來也沒有夢想在俄國有可能公開建立工人黨，從來也沒有把爭取社會主義的任務與爭取政治自由的任務分開。但他們始終認為這種鬥爭不應當由陰謀派，而應當由倚靠工人運動的革命黨來進行。他們認為反專制制度的鬥爭不應當是組織陰謀，而應當是訓練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紀律化，組織無產階級，在工人中間進行政治鼓

*着重點是我們加的。

動，去痛斥專制制度底任何表現，去把警察政府底一切武士釘上恥辱牌，並迫使這個政府實行讓步。難道聖彼得堡『爲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底活動不正是這樣麼？難道這個組織不正是憑藉於工人運動，領導着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即領導其反資本和反專制政府的鬥爭，絕不組織什麼陰謀，而恰巧以社會主義鬥爭和民主主義鬥爭結合成彼得堡無產階級統一不可分離的階級鬥爭爲其實力泉源的那個革命黨底萌芽麼？難道『協會』底活動——不管這種活動爲時如何短促——不是已證明，社會民主黨人所領導的無產階級是政府所不得不顧及，並急於對它讓步的巨大政治勢力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頒佈的法律⁴¹，無論按其匆忙施行或就其本身內容來說，都顯然表明其意義是不得已而對無產階級實行的讓步，是從俄國人民底敵人手中奪得的陣地。雖然這個讓步很細小，雖然這個陣地很不大，可是要知道，爭得這個讓步的工人階級組織，也是不很廣大，不很堅固，沒有成立多久，沒有什麼豐富經驗或豐富物資的；大家知道，『鬥爭協會』僅成立於一八九五至九六年間，它對工人們的號召，僅限於膠印的和石印的小刊。如果這樣的組織將至少包括俄國工人運動各最大中心（聖彼得堡區域，莫斯科—弗拉基米爾區域，南俄以及各重要城市，如敖德薩，基也輔，薩拉托夫等等），擁有革命機關報，並在俄國工人中間享有如『鬥爭協會』在聖彼得堡工人中間所享有的那種威信，那末這個組織就會成爲現時俄國內的最大政治因素，成爲政府在其全部內外政策中所不能不顧及的因素，——這難道可以否認麼？這樣的組織，既領導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在工人中間發展其組織和紀律，幫助工人爲迫切經濟需要而鬥爭，並從資本手裏奪得接二連三的陣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有系統地和勇往直前地攻擊專制制度，攻擊每一個使無產階級感覺到警察政府血爪壓力的沙皇惡棍，則這樣的組織就會是既適合於我國條件的工人黨組織，又會是反專制制度的強大革命黨。預先來談論這個組織

將採用何種手段去對專制制度實行致命的打擊，例如，它將選定起義，還是羣衆政治罷工，或其他進攻手段呢，——預先來談論這個問題，並在現時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會是空洞的學理主義態度了。這就會好似將領們在尚未調集軍隊，動員軍隊出發討伐敵軍以前，就預先來召集軍事會議一樣。當無產階級軍隊已在堅強的社會民主黨人組織領導下，勇往直前爭取經濟和政治的解放時，這個軍隊自己就會給將領們指明行動底手段和方法。到那時候，而且只有到那時候，才可解決對專制制度實行最終打擊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究應如何解決，正是要依靠於工人運動底狀況，依靠於工人運動底廣度，依靠於運動自己造成的鬥爭手段，依靠於領導運動的革命組織底特性，依靠於其他各種社會份子對無產階級和對專制制度的態度，依靠於國外國內的政治條件，——總而言之，要依靠於千百種條件，而要預先猜測這些條件，是既不可能，又無益處的。

因此，拉福洛夫所說的如下一段議論，也極不正確：

『如果他們（社會民主黨人）無論怎樣都不僅要配置工人力量去反對資本，而且還要團結革命份子和革命團體去反對專制制度，那末不管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如何稱呼自己，但他們在事實上（着重點是作者自己加的）是採納了他們對方，即民意黨人底綱領。關於村社問題，俄國資本主義命運問題以及經濟唯物主義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都是對真正事業不關重要，只能促進或妨礙在準備基本點時規定局部任務和局部手段的一種細節而已』（第二一頁，第一欄）

這種說法，根本就不值一駁，因為誰也知道決不可說在俄國生活和俄國社會發展中各種基本問題的意見分歧，在瞭解歷史中各種基本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只能有關『細節』！早已有人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而在現時也未必有再來證明這

個真理的必要。階級鬥爭論，按唯物主義觀點來瞭解俄國歷史，按唯物主義觀點來估計俄國現時經濟政治情形，承認必須把革命鬥爭歸結於一定階級底一定利益，並分析這個階級對於其他階級的關係等，都是極重大的革命問題，把這些問題叫作『細節』，是絕頂荒謬的。從革命理論底老手方面聽見這種言論，真是出人意料，使我們簡直要說這是 lapsus *。至於上面所引那段議論底前半節，那末它的荒謬無理性，就更令人驚奇了。在刊物上聲稱：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僅配置工人力量去反對資本（就是說，僅僅作經濟鬥爭！），而不同時團結革命份子和革命團體去反對專制制度，——這樣聲稱，就是不知道，或是不願意知道世所共知的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活動的事實。或者，也許拉福洛夫不承認那些在俄國實際進行工作的社會民主黨人『革命份子』和『革命團體』吧？！或者（這也許更正確些）他把反專制制度的『鬥爭』瞭解為只是反專制制度的陰謀吧？（參看第二一頁，第二欄：『…問題是要…組織革命陰謀』；着重點是我們加的）。也許拉福洛夫認為誰不組織政治陰謀，那他就是不進行政治鬥爭麼？我們再重說一遍：這種觀點完全合乎古老民意主義底古老傳說，但它完全不合乎現代的政治鬥爭概念，也不合乎現代的實際情況。

關於民權黨人，我們還要說幾句話。在我們看來，拉福洛夫說得完全對：社會民主黨人『把民權黨人當作較為直爽的人，並決意贊助他們，不過不與他們溶合起來』（第一九頁，第二欄）；只是要補說一句：當作較為直爽的民主主義者和只要民權黨人表現為澈底的民主主義者。可惜，這個條件與其說是真實的現在，不如說是所願意的將來。民權黨人曾表示願意使民主主義任務擺脫民粹主義，並根本擺脫『俄國社會主義』底陳腐形式，但他們自己竟還遠未

*失言。——譯者。

擺脫舊的偏見，遠不徹底，因為他們竟把自己僅僅主張政治改革的黨稱呼爲『社會(??!)革命』黨(見他們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九日發表的宣言)，竟在自己的『宣言』中聲稱：『民權這一概念包括有組織人民生產』(我們不得不專憑記憶來引證)，這就證明他們又在暗地裏運用那種民粹主義偏見。所以拉福洛夫稱他們爲『戴假面具的政治家』(第二〇頁，第二欄)，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可是，也許把民權主義看成爲一種過渡的學說，是更公道些，它有不可否認的功勞，就是它以民粹派學說底特異性爲恥而與民粹派中的最可惡的反動份子公開進行爭論，這些份子在警察性的階級專制制度存在的時候，竟然說什麼符合心願的是經濟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見『民權黨』出版的迫切問題)。如果民權黨內除了那些爲着策略目的而把自己的社會主義旗幟掩藏起來，不過是戴着非社會主義者政治家假面具的(如拉福洛夫所假設的那樣，第二〇頁，第二欄)舊時社會主義者而外，真正別無其人，那末它當然是不會有什麼前途的。然而，如果這個黨內也有不戴着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會主義者政治家，非社會主義者民主派，那末努力去與我國資產階級中持反政府態度的份子接近，努力喚醒我國小資產階級，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等等這一階級底政治自覺，就能濟益不淺。這個小資產階級在西歐各處民主運動中都起過相當的作用，它在我們俄國改良以後的時代，已在文化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有過特別迅速的成就，而不能不感覺到警察政府壓迫人民和公然援助大工廠主、財政和工業壟斷大王的事實。爲此，民權黨人就要力謀和各種階層接近，不要仍舊以因脫離羣衆現實利益而軟弱無力的——這是迫切問題也承認的——那個『智識界』爲限。爲此，民權黨人就要拋棄那種想把各種社會份子溶合起來並藉口政治任務來排斥社會主義者的企圖，就要拋棄那種妨礙他們自己與人民中間資產階級階層接近的假廉恥心，就是說，不要只說說非社會主義者政治家底綱領，而是

要按照這個綱領去行動，喚醒並發展完全不需要社會主義，但日益感到專制制度壓迫難堪與政治自由必要的那些社會集團和階級底階級自覺。

* * *

俄國社會民主派還很年輕，剛剛在走出那以理論問題佔優越地位的萌芽狀態，才開始發展其實際活動。其他派別的革命者，已不得不放下對於社會民主黨人理論和綱領的批評，而來進行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實際活動的批評。必須承認，後面這種批評與理論批評極不相同，竟使人們有可能捏造一種滑稽謠言，說聖彼得堡『鬥爭協會』是個非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這種謠言可能出現的事實，也就證明那種指斥社會民主黨人忽視政治鬥爭的流行責難是荒謬無理的。這種謠言可能出現的事實，也就證明原先是社會民主黨人理論所未能說服的許多革命家已開始被社會民主黨人實踐所說服了。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還有許許多多剛才開始的工作要做。俄國工人階級底覺醒，及其自發趨向於知識，趨向於團結，趨向於社會主義，趨向於反對剝削者和壓迫者的事實，都日益顯著和日益廣濶地表現出來。俄國資本主義在最近時期內達到的巨大進展，保證工人運動毫不停頓地擴大和深入起來。我們現在大概是處在資本主義週期中的這樣一個時期，此時工業『繁榮』，商業活躍，工廠盡量工作，並有許許多多新工廠、新企業、股份公司、鐵路建築等等等，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就是沒有先見之明，也能預言在這工業『繁榮』後必然會發生經濟恐慌（多少急劇的恐慌）。這個恐慌將使大批小私有主陷於破產，使大批工人失業，而在全體工人羣衆面前用尖銳形式提出早已擺在每個有覺悟有思想的工人面前的社會主義問題和民主主義問題。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應當設法使俄國無產階級在這個經濟恐慌到來時更有覺悟，更加團結一致，懂得俄國工人

階級任務，能回擊現時賺得巨量利潤而隨時都想把虧折卸在工人頭上的資本家階級，能領導俄國民主勢力去進行決戰，反對那束縛俄國工人和全體俄國人民手足的警察專制制度。

總之，同志們，工作起來吧！不要荒廢寶貴的時間！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還有極多的事情要作：要滿足覺醒着的無產階級底要求，要組織工人運動，要鞏固革命團體及其相互聯繫，要供給工人們宣傳鼓動的刊物，要把散佈於俄國各處的工人小組與社會民主主義團體統一為一個社會民主工人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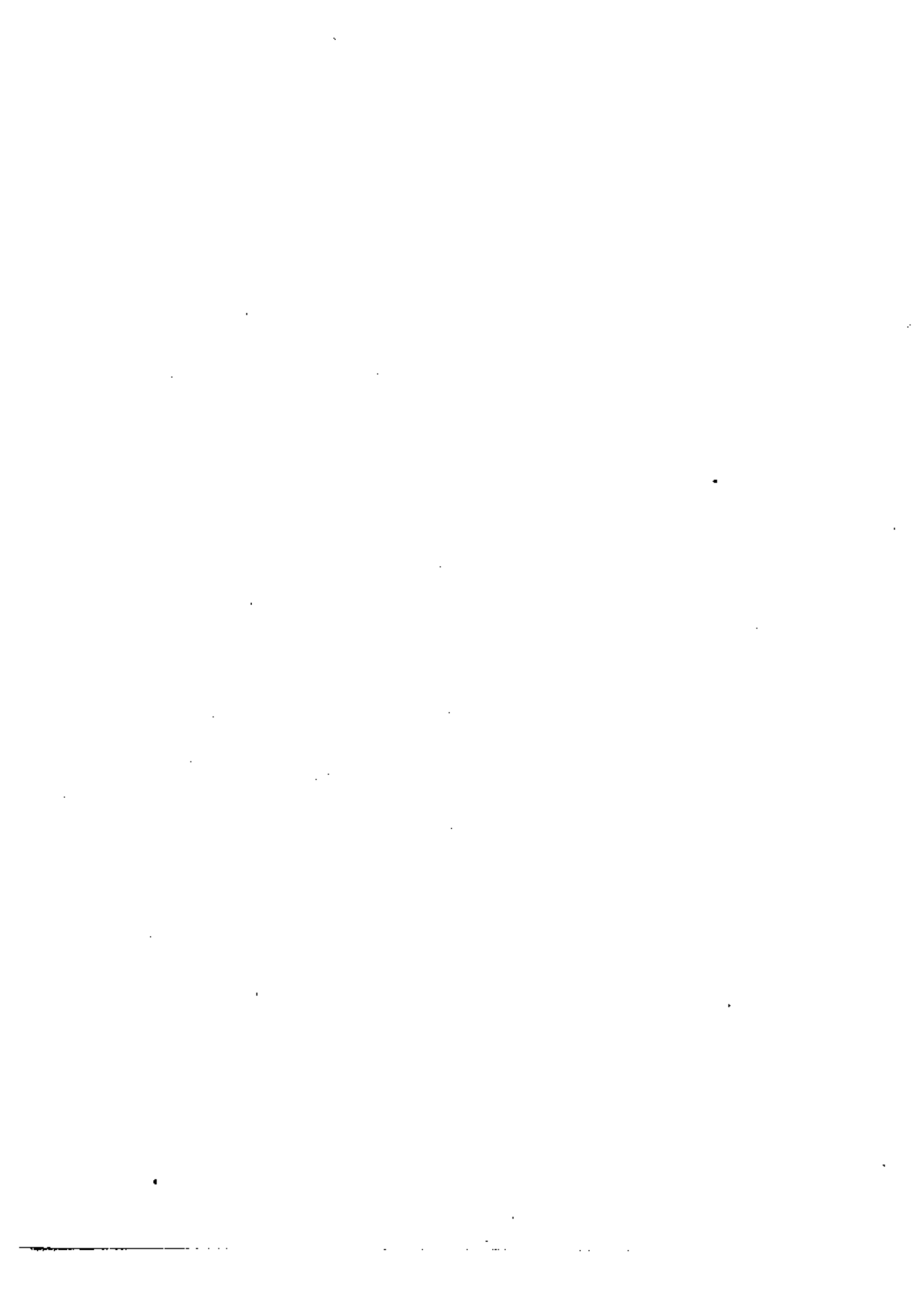
一八九八年在日內瓦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卷，第二九九至三二三頁。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成立



黨內布爾什維克派和
孟什維克派之出現



做什麼？

(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

『…黨內鬥爭給黨以力量與生氣，而黨底渙散及其明確界限底模糊，却是表明黨軟弱無力的最大明證；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起來的』…

(摘自拉薩爾一八五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致馬克思的信)

初版序言

照作者原定計劃，本書任務是要詳細發揮從何着手？（火星報第四期，一九〇一年五月）一文中所發表過的那些思想。首先應請讀者原諒的，是我們在那裏所給的約言（並且是在答覆許多私人詢問和信件時所重複說過的約言），未免履行得太遲。這樣遲緩的原因之一，就是去年（一九〇一年）六月間作過一次想把所有各旅外社會民主黨人團體統一起來的嘗試。我們當時自然應當等待這次嘗試底結果，因為這次嘗試如能成功，我們也許要用稍微不同的方式來說明火星報對於組織問題的觀點；至少，這樣的成功能保證很快消除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兩個派別並存的現象。讀者知道，這次嘗試終歸失敗，而且自從工人事業雜誌⁴²在第十期上表現出趨向於經濟主義的新轉變以後，這次嘗試也不能不終歸失敗，關於這點，我們在下面就要證明的。與這個雖很渙散而缺乏明確性，但因此也就更為牢固而能在各種形式中復活起來的派別作堅決的鬥爭，

已是絕對必要的事情。因此本書原定計劃也就有所改變並且大大擴展了。

本書底主要題目，本應是在從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個問題，即我們政治鼓動底性質及其主要內容問題，我們的組織任務問題，以及從各處同時着手建立全俄戰鬥組織的計劃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作者早已感覺興趣，所以作者還在進行想把工人報⁴³復刊而沒有成功的一次嘗試時（參看本書第五章），就已經企圖在這工人報上提起這些問題了。但是，原先打算在本書中間祇來分析這三個問題，並儘可能用直敘方式說明自己的觀點而不去採用或幾乎不去採用辯論方式的這個計劃，竟因有如下兩個原因而完全無法實現。一方面，經濟主義竟比我們所預料的要牢固得多（我們對於經濟主義這一名詞，如我們已在火星報第十二期上（一九〇一年十二月）發表的那篇可說是定出了本書大綱的論文，即與經濟主義擁護者的談話一文中說明過的那樣，是按其廣義來運用的）。現在已很明白，對於解決這三個問題所以存在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主要是由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兩派根本上的互相對立，而並不是由於什麼局部的意見分歧。另一方面，經濟主義者看見我們在火星報上實際宣傳着我們的觀點而表示茫然不解，就顯然證明我們往往簡直是各講各的話，因此我們若不從頭講起，便什麼也不能講通，於是必須試圖用無數具體的例證，用極通俗的方式，極有系統地來和一切經濟主義者作一番弄清我們彼此間一切根本意見分歧點的「解釋」。於是我就立意這樣試圖來「解釋」一下，雖然我明明知道，這會使本書篇幅大大增加，而且可以使出版日期延遲下去；但是除此以外，我再找不出別的方法來履行我在從何着手？一文中所給的約言。於是，除了請讀者原諒本書出版遲緩以外，還要請讀者原諒，本書在文字修琢方面也有很大的缺點，因為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必得非常匆忙從事，何況又受到過其他各種工作的阻撓。

分析上述三個問題，仍然是本書底主要題目，但是我在本書開端，不得不說明兩個較為普泛的問題：爲什麼像『批評自由』這樣一個『平常的』和『自然的』口號，在我們看來竟會真正是個戰鬥的信號呢？爲什麼我們甚至在社會民主黨對於羣衆自發運動的作用的這個根本問題上，都不能彼此取得一致呢？其次，敘述我們對政治鼓動性質和內容問題觀點的文字，竟變成了說明工聯主義政治與社會民主主義政治相互區別的文字；而敘述我們對組織任務觀點的文字，却變成了說明經濟派所認爲滿意的手工業方式與我們所認爲必須建立的革命家組織相互區別的文字。再則，對於全俄政治報『計劃』，人們所用來反對這個計劃的異議愈是沒有根據，人們愈沒有切實回答我在從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那個問題，即我們要怎樣才能够從各地同時着手建立我們所需要的那個組織的問題，則我也就要愈加努力堅持這個計劃。最後，在本書結尾的部分，我會指明如下幾點：我們用過我們力所能及的一切辦法來預防與經濟派完全決裂，但這一決裂畢竟成了必不可免的事情；工人事業雜誌已經具有一種特別的，甚至可說是『歷史的』作用，因爲它所最完備和最明顯地表現出來的不是澈底的經濟主義，而是那種構成俄國社會民主運動史上整個時期特點的離散狀態與動搖現象；所以我們與工人事業雜誌進行的那種彷彿過分詳細的辯論也有意義，因爲我們若不能澈底結束這個時期，便不能前進。

尼、列寧 一九〇二年二月

(一)教條主義與『批評自由』

(甲)什麼是『批評自由』？

『批評自由』這一口號，無疑是現時最時髦而為各國社會黨人和民主黨人彼此爭論中所最常用的口號。初看起來，爭論的一方，洋洋得意地援引批評自由，是再奇怪不過的了。難道在先進政黨中間有人聲言過反對西歐大多數國家所用以保證科學自由和科學研究自由的那個憲法條文麼？凡是聽見街談巷議中輾轉重複這個時髦口號而尚未領會爭論雙方意見分歧實質的人，一定會想道：『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吧！』。『這個口號大概是一種暗號，像外號一樣，日益用慣，幾乎成爲一種普通名詞了』。

的確，誰都知道，現代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已形成了兩個派別，這兩個派別之間的鬥爭，有時熾烈起來，火燄騰騰；有時又靜熄下去，而隱沒在動人的『休戰決議』灰燼下面燃燒着。對『舊的，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採取『批評』態度的那個『新』派別究竟是什麼，這已由伯恩施坦十分肯定地講明，而由米勒蘭十分肯定地表明了。

*我要順便說明一點。社會主義運動內部各個派別間的爭執，第一次從民族現象變成了國際現象，這在近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是一種非常足以告慰的現象。從前，拉薩爾派與愛森拿赫派⁴⁴間，黑得派與可能派⁴⁵間，費邊派⁴⁶和社會民主派間，民意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間的爭論，始終只是民族範圍內的爭論，反映着純粹民族性的特徵，可以說是在各個不同的方面上發生的。現時（這在現今已看得很清楚），英國的費邊派，法國的閻員主義派，德國的伯恩施坦派，俄國的批評派⁴⁷，都是一家弟兄，彼此稱揚，彼此學習，共同攻打『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國際革命社會民主派在這第一次與社會主義運動內的機會主義派進行真正國際搏鬥中，也許會充分強固起來，足以消除早已籠罩於歐洲的政治反動局面吧？

社會民主黨應當從主張社會革命的政黨變為主張社會改良的民主黨。爲了辯護這個政治要求，伯恩施坦運用了一大堆頗爲嚴整一貫的『新』論據和『新』理由。他否認有可能用科學方法論證社會主義和根據唯物史觀證明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認大眾日益貧困，日益無產階級化以及資本主義矛盾日益加劇的事實；他宣佈說『最終目的』這個概念根本不能成立，而絕對駁斥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他否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原則上互相對立；他否認階級鬥爭理論，而認爲這個理論不能適用於照多數人意志管理的真正民主社會等等。

於是，人們要求由革命的社會民主運動堅決轉向於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運動，同時也就一樣堅決轉向於用資產階級觀點來批評一切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而因爲在政治講台上，在大學教席上，在很多小冊子中，在許多學者著作裏，早已進行着這種批評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因爲在幾十年來，一切出身於智識階級的青年學子們都是有系統地受了這種批評的教育，所以毫不奇怪的，社會民主黨中的『新的批評主義』思潮一出世，就立刻成了全形，好像神話上所說的才藝女神從神皇腦袋裏鑽出來的故事一樣。這個思潮，按其內容來說，並不需要什麼發展和形成；它是直接從資產階級的刊物上搬到社會主義的刊物上來的。

其次。如果說伯恩施坦底理論批評和政治慾望還有什麼人不明白，那末法國人却已設法把『新方法』具體表明了。法國在這一次也證明了它真是不愧享有歷來的名譽：『在這個國家歷史上，階級鬥爭總是比任何地方都達到更要徹底的結局』（見恩格斯爲馬克思所著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作的序言）。法國社會黨人並不高談什麼理論，而是逕直動作起來；因爲法國具有在民主制方面較爲發展的政治條件，所以他們就能立刻過渡到『實踐的伯恩施坦主義』以及由此而生的一切結果。米勒蘭作出了實行這種實踐伯恩施坦主義

的燦爛榜樣，無怪乎伯恩施坦和福里馬爾兩人馬上就來極力辯護並讚揚米勒蘭呵！的確，既然社會民主黨其實不過是個主張改良的黨，並且應當有公開承認這點的勇氣，那末社會黨人也就不僅有權加入資產階級內閣，而且應該時時刻刻力求做到這點。既然民主制本來就是消滅階級統治，那末社會黨人閣員爲什麼不可用階級合作的言詞，來博得整個資產階級世界方面的稱讚呢？他爲什麼不可以甚至不顧憲兵屠殺工人的行爲早已千番百次指明了各階級民主合作底真義，也仍然留在內閣中呢？他又爲什麼不可以親自參加簽名給目前法國社會黨人無非是叫作絞架刑棍和流放所（knouteur, pendeur et déportateur）專家的沙皇致賀詞呢？而以使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面前這樣備受屈辱和唾面自乾爲代價，以使工人階級底社會主義意識——即保障我們獲得勝利的唯一基礎——敗壞爲代價所換得的，却只是些響亮的微小改良辦法草案，而這種改良真是微小到極點，甚至比從資產階級政府那裏所爭到過的還要少些！

誰不故意閉着眼睛，就不能不看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新的『批評主義』思潮，無非是一個新的機會主義形態而已。假使你判斷人們的時候，不是看他們自己穿上的漂亮服裝，不是看他們自己取定的響亮名號，而是看他們的行爲怎樣，他們在實際上所宣傳的是什麼，那你就明白：『批評自由』就是社會民主黨裏讓機會主義派享受的自由，就是把社會民主黨變爲主張改良的民主政黨的自由，就是把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成分灌輸到社會主義運動中去的自由。

自由是個偉大字眼，但是人們在工業自由的旗幟下進行過最帶侵略性的戰爭，人們在勞動自由的旗幟下掠奪過勞動者。『批評自由』一語的現時用法，也含有同樣虛偽的內容。假如人們真正確信自己把科學向前推進了，那他們就會不是要求新觀點與舊觀點並列的自由，而會要求用新觀點代替舊觀點了。而現在高呼『批

評自由萬歲！』的叫喊聲，實在是太像寓言中所說的那個空桶故事了。

我們緊握着手，循着險阻崎嶇的道路密集行進。我們四面都被敵人包圍着，並且我們幾乎時常都得冒着他們的礮火行進。我們根據自由通過的決議聯合起來，正是爲的要與敵人鬥爭，而不致退到鄰近的泥潭中去。住在這泥潭裏的那些人，一開始就責備我們獨樹一幟，責備我們選定了鬥爭的道路，而不是調和的道路。忽聽得我們中間有些人叫喊道：我們大家到這個泥潭裏去吧！而當人們開始來恥笑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反駁說：你們是多麼落後的人呵！你們竟敢否認我們有號召大家走上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呵，先生們，你們不僅可以自由號召，而且可以自由走往隨便什麼地方去，就是走往泥潭裏去也好；我們甚至認爲你們應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中，我們願竭力幫助你們搬到那裏去住。不過，要請你們放開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不要弄污自由這一偉大字眼，因爲我們也是可以用『自由』走往我們所願去的地方，我們不但可以自由去與泥潭鬥爭，而且還可自由去與轉向於泥潭裏去的那些人鬥爭。

（乙）『批評自由』底新擁護者

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底機關刊物工人事業雜誌，在最近出版的第十期上洋洋得意提出的正是這個口號（即『批評自由』），並且不是把它當作理論定理，而是當作政治要求，即爲回答『能否把那些在國外活動的社會民主黨人團體統一起來』這一問題而提出的。它說：『要達到堅固的統一，就要有批評自由』（第三六頁）。

從這個聲明中可以得出兩個十分確定的結論：第一，工人事業雜誌一般袒護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的機會主義派；第二，工人事業

雜誌要求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機會主義派活動底自由。我們且把這兩個結論考查一下吧。

工人事業雜誌所『特別』不喜歡的，就是『火星報和曙光雜誌』⁴⁸愛作預言，說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的山岳派與基朗特派必將實行決裂』*。

『我們覺得，——工人事業雜誌編者克里切夫斯基寫道，——關於社會民主黨隊伍中有山岳派和基朗特派的說法，根本就是一種膚淺的歷史比擬，從馬克思主義者筆下寫出這樣的話來，是很奇怪的，因為山岳派和基朗特派並不是如歷史家和思想家所可想像的那樣代表着彼此不同的性格或思潮，而是代表着彼此不同的階級或階層：一方面是中等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階層和無產階級。而現代社會主義運動中却沒有階級利益的衝突，這整個運動，它的所有一切（着重點是克里切夫斯基加上去的）派別，包括最激烈的伯恩施坦主義者在內，都是站在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及其爭取政治和經濟解放的階級鬥爭立場上』（第三二頁至三三頁）。

好一個大胆的斷語！克里切夫斯基是否聽見過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實，即正是由於近年來有『學士』階層廣泛參加社會主義運動，才使伯恩施坦主義得以非常迅速地傳佈起來呢？最主要的，是我們的這位作者究竟根據什麼理由來斷定說『最激烈的伯恩施坦主義者』也站在無產階級爭取政治和經濟解放的階級鬥爭立場上呢？

*把革命無產階級中的兩個派別（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比作十八世紀革命資產階級中的兩個派別（雅可賓派——『山岳派』——和基朗特派）的說法，是在火星報第二期（一九〇一年二月）社論中提出的。這篇社論底作者是普列漢諾夫。無論立憲民主黨人，『無名派』⁴⁹以及孟什維克，至今都很愛說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雅可賓派』。至於普列漢諾夫第一次提出這個概念來反對社會民主黨右翼的事實，現在人們却寧願默不做聲或把它忘掉。（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這是不得而知的。他堅決擁護最激烈伯恩施坦主義者的說法，是沒有拿出任何論據與理由來加以證明的。我們的作者，大概是以爲他既然重複着最激烈的伯恩施坦主義者自己關於自己所講的話，那末他的斷語也就無待證明了。但是，判斷整個派別時竟以該派別底代表人物自己關於自己所講的話爲根據，這難道不是再『膚淺』不過的麼？他隨後所說黨的發展有兩種不同，甚至絕對相反方式或道路的『哲理』（工人專業雜誌第三四至三五頁），難道不也是再膚淺不過的麼？你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承認完全批評自由，法國人却不承認，他們的例子也就充分表明出那種『不容忍態度底害處』哩。

我們回答道：克里切夫斯基底例子，正是表明有些簡直按『依洛瓦斯基方式』⁵⁰來觀察歷史的人也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據這些人底意見，要解釋德國社會黨底一致和法國社會黨底散漫，完全不必去考究兩國歷史底特徵，不必把武人專權的半專制制度和共和政體的代議制度底條件兩相對照，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令⁵¹所發生的影響，不必把兩國經濟生活以及經濟發展情形拿來比照，不必提起『德國社會民主黨空前的發展』是與社會主義歷史上空前努力的鬥爭——不僅反對理論上錯誤（米別赫，杜林*，大學教授社會主義者），而且反對策略上錯誤（拉薩爾）的鬥爭——同時並進的事實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法國人互相爭吵，因爲他們不肯容忍；德國人彼此一致，因爲他們都是些好孩子。

*當恩格斯抨擊杜林的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有許多人都傾向於杜林底觀點，當時甚至在黨代表大會上公開地紛紛發備恩格斯，說他態度激烈，不肯容忍，用非同志態度進行爭辯等等。莫斯特和他的同志們提議（在一八七七年的代表大會上）在前進報上不再登載恩格斯底論文，認爲這些論文『對絕大多數讀者沒有興趣』；而瓦爾特（Vahlteich）則提出聲明，說登載這些論文使黨受到了很大的損害，說杜林也是對社會民主黨有所貢獻的：『我們應當爲黨底利益而利用所有一切的人。假如大學教授們彼此爭論，那末前進報決不是進行這種爭論的場所』（前進報一八七七年六月六日，第六十五期）。你們看，這也是擁護『批評自由』的例子，我國那些非常喜歡援引德國人爲例證的公開批評家和秘密機會主義者，不妨來想想這個例子吧！

你看，用這種絕頂深奧的議論，就『推開了』一件完全駁斥祖護伯恩施坦主義者的立場的事實。伯恩施坦主義者是否真正站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立場上，對於這個問題，祇有歷史經驗才能給予最終徹底的解答。因此，在這一點上有最重要意義的正是法國的例子，因為只有法國的伯恩施坦主義者曾在自己的德國同僚們熱烈贊同下（而且有幾分是在俄國機會主義者熱烈贊同下：參照工人事業雜誌第二第三兩期合刊，第八三至八四頁），試圖過獨自站穩腳根。以法國人『不肯調和』為藉口的論調，除掉它那種『歷史的』意義（即諾茲德列夫式的意義）⁵²而外，就不過是企圖用氣忿的話來抹煞很不愜意的事實罷了。

而且，我們還決不打算把德國人奉送給克里切夫斯基及其他許許多多『批評自由』擁護者哩。『最激烈的伯恩施坦主義者』其所以還能見容於德國黨內，只是因為他們服從漢諾維代表大會通過的那個堅決駁斥伯恩施坦所作種種『修正』的決議，以及留比克代表大會通過的那個雖帶有很濃厚外交意味而終於對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警告的決議。至於從德國黨底利益上看來，這種外交態度是否適當，當時壞的和平是否要勝於好的爭執，固然是個尚可爭論的問題，換句話說，關於駁斥伯恩施坦主義的某種方法妥當與否，尚可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德國黨駁斥過伯恩施坦主義兩次，却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所以，認為德國例子證實了『最激烈的伯恩施坦主義者站在無產階級爭取經濟和政治解放的階級鬥爭立場上』這一說法，就等於完全不懂得現在有目共觀的實際情形*。

*必須指出，工人事業雜誌論到德國黨中的伯恩施坦主義時，始終只局限於轉述事實，完全『不肯』拿出自己對於這些事實的估計。例如，在第二第三兩期合刊第六六頁上講到斯多德牙爾代表大會時，竟把一切意見分歧都歸結為『策略』問題，並且只是指出絕大多數忠實於原先的革命策略。又如在第四第五兩期合刊第二五頁及以後各頁上，也只不過是把漢諾維代表大會上的演詞轉述一遍，並把伯伯

不僅如此。我們上面已經講過，工人事業雜誌向俄國社會民主黨要求『批評自由』並辯護伯恩施坦主義。大概它是看見了我們這裏有人冤枉欺侮過我們的『批評者』和伯恩施坦主義者吧。究竟是欺侮了誰呢？是誰欺侮的呢？是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究竟有什麼冤枉處呢？——關於這些問題，工人事業雜誌始終是默不做聲，從沒有提起過一個俄國的批評者和伯恩施坦主義者！這裏我們只能假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被人冤枉欺侮過的那方面恰巧就是工人事業雜誌自己（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上兩篇論文中都祇講到曙光雜誌和火星報對工人事業雜誌的侮辱，便是一個明證）。那末，始終堅決否認自己與伯恩施坦主義一致的工人事業雜誌，又爲什麼除非開口辯護『最激烈的伯恩施坦主義』和批評自由，便不能替自己辯護呢？或者被人冤枉欺侮過的是什麼第三者。那爲什麼又不肯說出這個第三者究竟是誰呢？

由此可見，工人事業雜誌還在繼續玩耍它一成立時起就始終幹着的（這點我們下面再講）那套捉迷藏的把戲。其次，請你們注意這第一次實際運用喧動一時的『批評自由』口號的情形吧。其實，在運用這個批評自由時所立刻表現出來的不但是缺乏任何批評，而且根本缺乏任何獨立判斷。正是這個把俄國伯恩施坦主義當作不便說出的病症（照斯塔羅維爾底中肯說法來講）瞞着不說的工人事業雜誌，現在却主張簡簡單單抄寫一張專醫此病德國變態的最新德國藥方來醫治它！並不是什麼批評自由，而是奴隸式的模仿，——甚至更

爾底決議摘引一下；這裏又是（也如在第二第三兩期合刊上一樣）把對於伯恩施坦觀點的敘述和批評留到『專文』上去談。很可笑的是第四第五兩期合刊第三三頁上說『…伯伯爾所申述的觀點博得了代表大會絕大多數底擁護』，而稍後一點却又說『達維德發言擁護了伯恩施坦底觀點…他首先就極力證明，說…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們畢竟是（sic!）站在階級鬥爭立場上的』…。這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間寫的；到一九〇一年九月的時候，工人事業雜誌已是顯然不復相信伯伯爾觀點正確，因而便把達維德底觀點當作自己的觀點來重複了！

壞些：是猴子式的模仿！現代國際機會主義底同一社會政治內容，依各國民族特點而表現為各種變態。在某一國家內，機會主義派早已獨樹一幟；在別一國家內，機會主義派忽視理論，而在實際上進行着急進派社會黨人底政策；在第三個國家內，革命黨裏面的幾個黨員投奔到機會主義營壘中去，他們為力求達到自己的目的起見，並不是進行擁護什麼原則和擁護什麼新策略的公開鬥爭，而是漸漸地，悄悄地，可說是不受處分地敗壞自己的黨；在第四個國家內，同是這種倒戈份子在受政治奴役的黑暗時期，在『合法』活動和『非法』活動相互關係全然特殊的情形下，運用着同樣的方法等等。講什麼批評自由和伯恩施坦主義自由，作為統一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條件，却不分析俄國伯恩施坦主義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和產生了怎樣特殊的結果，——這就等於講些空話來敷衍了事。

那末就讓我們把工人事業雜誌所不願說出的（或者也許是它所沒能瞭解的）東西，用幾句話來說明一下吧。

（丙）俄國的批評派

俄國在這一方面的基本特點，就是在自發工人運動一開始發生和先進輿論一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時，就有各種顯然不同的份子在共同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陳腐的社會政治世界觀）⁶³。這是指『合法馬克思主義』底蜜月時期而言。一般講來，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現象，而這種現象發生的可能，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是誰也料想不到的。在一個完全沒有出版自由的專制國家裏，在兇猛的政治反動勢力對於任何一點政治不滿情緒和反抗表示都肆意摧殘的時代，而革命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忽然打開了一條出現於受檢查的刊物上的道路，用來說明這個理論的語言雖然是伊索寓言式的，但終究是一切『感覺興趣者』所可瞭解的。政府慣于只把民意派（革命的民意派）底理論當作危險的理論，却照例沒有發覺這一

理論底內部演進過程，而歡迎一切反對這個理論的批評。等到政府醒悟過來的時候，等到書報檢查員和憲兵這支笨重軍隊終於發覺了新的敵人而加以攻擊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不少的（照我們俄國的尺度來計算）時間了。在這個時期，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一本一本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的雜誌和報紙相繼創辦起來，大家紛紛變成馬克思主義者，都來阿諛馬克思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獻殷勤，出版家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銷路特廣而興高采烈。當然，在受這種迷魂空氣籠罩的新起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是有過不少『趾高氣揚的作家』⁵⁴...

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時期當做過去的時期來平心靜氣地講它了。誰都知道，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我國刊物上面盛行過一時，是因為極端份子與十分溫和份子實行過聯盟。其實，這些溫和份子是一些資產階級民主派份子，而這個結論（由他們後來的『批評』發展過程所顯然證實了的這個結論）是在『聯盟』尙屬完整時期就有人意識到了的*。

既然如此，那末對於後來那種『混亂狀態』的最大責任，是否正應由那些與後來的『批評派』實行過聯盟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來負擔呢？這樣的問題以及對於它的肯定回答，往往可以從過分死板觀察問題的人們口中聽到。可是這些人完全不對。祇有自己毫無把握的人，才會害怕即令是同不可靠的份子實行暫時的聯盟，——而無論那一個政黨不作這樣的聯盟，都是不能存在的。我們與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聯合，乃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所作的一種初次的真正政治聯盟。我們之所以能非常迅速戰勝了民粹派並使馬克思主義思想（雖然是在庸俗化了的的形式下）廣潤傳播了起來，也就是因為我們實行了這個聯盟。而且締結這個聯盟，並不是沒有任何『條件』

*這是指士林（即列寧。——譯者）反對司徒盧威的論文而言，該文是根據標題為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作品中的反映的學術講演作成的⁵⁵。（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的。一八九五年被檢查局焚燒了的一本馬克思主義論叢，即俄國經濟發展問題的材料一書，就是一個明證。假使我們與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在文字上的聯盟可以比作政治聯盟，那末這一本書也就可以比作政治條約了。

破裂之所以發生，當然不是因為『同盟者』竟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恰恰相反，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正是社會民主黨所希望的天然同盟者，因為社會民主黨底民主任務由俄國現今時局提到了首要地位。但這種聯盟底必要條件，就是必須使社會主義者完全有可能把工人階級利益和資產階級利益敵對情形揭示給工人階級看。現在大多數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紛紛嚮往的伯恩施坦主義和『批評派的』思潮，却要剝奪這種可能而敗壞着社會主義的意識，使馬克思主義庸俗化，宣傳社會矛盾緩和論，硬說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是荒謬思想，把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縮小為狹隘的工聯主義運動和要求逐漸實行細小改良的『現實主義』鬥爭。這完全是等於資產階級民主派否認社會主義獨立權，亦即否認它的生存權；這在實際上就是想把剛開始的工人運動變成自由派底尾巴。

自然，在這種條件下，破裂是必不可免的。可是，由於俄國有其『特異』之點，所以這個破裂也就不過是表現於社會民主黨人從大家最易得到而傳佈很廣的『合法』刊物上消失不見而已。在這種刊物上，『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樹起了『批評底旗幟』，幾乎得到了『譴責』馬克思主義的壟斷權。『反對正統』，『批評自由萬歲』這些口號（現在工人事業雜誌所重複的口號），立刻成了時髦的字眼，竟使檢查局和憲兵機關也抵擋不住這種時髦，例如鼎鼎大名的（遺臭萬年的）伯恩施坦所著一書有三種俄文版本出現，又如祖巴托夫⁵⁶極力介紹伯恩施坦和普羅科坡維奇先生兩人著作等等的事實（參看火星報第十期），便可證明這一點。現在社會民主黨人担負有一個本來已很困難，再因純粹外力阻

礙而艱難已極的任務，就是要與新思潮作鬥爭。而這一思潮又不僅表現於刊物中。轉向於『批評』的趨勢，是與那些做實際工作的社會民主黨人傾心於『經濟主義』的迎展趨向相伴而來的。

合法批評和不合法經濟主義彼此間的聯系與互相依賴關係怎樣產生發展起來的問題，是個很有趣味的問題，值得作一專文來考察。這裏我們只須指出顯然是有這種聯繫就夠了。鼎鼎大名的«Credo»之所以應分博得了很大的名聲，祇是因為它坦白地表述了這種聯繫，而且吐露出了『經濟主義』底基本政治傾向：讓工人去作經濟鬥爭（正確些說：讓工人去作工聯主義的鬥爭，因為工聯主義的鬥爭也包括有那種偏狹的工人政治），而讓馬克思主義的智識份子同自由派溶合起來作政治鬥爭。在『民衆中間』進行的工聯主義工作乃是履行這個任務底前半部，而合法的批評便是履行這個任務底後半部。這種論調竟成了反對經濟主義的一個極好的武器，所以如果沒有«Credo»，都值得臆造出一篇«Credo»來的。

«Credo»並不是臆造出來的，但它被公布出來是未經它的作者們同意，甚至是違反了它的作者們意旨的。至少，參加過揭發這一新『綱領』的本書作者*已聽到過一種怨聲和責難，說為什麼把發言者所用以歸納自己所持觀點的一種草稿抄寫散發，並加以«Credo»頭銜，而且甚至與抗議書一同刊印出來！我們所以要講到這一段情節，是因為它揭露出我們的經濟派害怕公開發表的那種大可玩味的特性。這正是整個經濟派底特性，而不祇是«Credo»作者們底特性：表現過這種特性的有最坦白最誠心擁護經濟主義的工人思想報，有

*指反對«Credo»的十七人抗議書而言⁵⁷。本書作者參加過起草這個抗議書的工作（一八九九年末）。一九〇〇年春，抗議書連同«Credo»在國外刊印出來了。現在從赫斯科娃女士底文章中（彷彿是登在往華雜誌上）已經知道：«Credo»底作者就是她，而當時僑外『經濟主義者』中間起過極大作用的就是普羅科波維奇先生。（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工人事業雜誌（它是因人們把經濟主義的文件編入„Vademecum“⁵⁸上發表出來而表示憤激的），有基也輔委員會（它在兩年以前是不願讓人把它的«Profession de foi»⁵⁹連同那篇反對它的論文*一起登載出來的），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單個經濟派份子。

擁護批評自由的人表現出這種害怕批評的心理，並不只是由於他們故意玩弄狡猾手腕（雖然毫無疑義，他們有時也非玩弄一點狡猾手腕不行，因為把尚未強固的新思潮嫩芽拿出來讓敵人攻擊是很不合算的呀！）。不，大多數經濟主義者都是完全誠意地仇視（並且按經濟主義底實質講來，他們也應當這樣仇視）一切理論上的爭論，派別的意見分歧，廣闊的政治問題，組織革命家的方案等等。『讓僑居國外的人去幹這些事情吧！』——一個很澈底的經濟主義者有一次這樣對我說過，而他這句話是代表一種非常流行的（而且又是純粹工聯主義的）意見：我們的事情是我們這個地方的工人運動，是我們這個地方的工人組織；其餘的事情都如火星報第十二期上發表的那封信底作者們與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同聲一致說過的那樣是學理主義者虛構出來的，是由於『誇大思想作用』的結果。

現在就來問問：既然俄國的『批評派』和俄國的伯恩斯坦主義有這樣的特點，那末，凡是不僅口裏說說，而且願意真正反對機會主義的人，本應負起怎樣的任務呢？第一，應當設法恢復理論工作，這種工作是在合法馬克思主義盛行時代才開始，而現在又落到秘密活動家肩上了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工作，運動就不能有順利的發展。第二，必須積極反對深深敗壞人心的合法『批評』。第三，要積極反對實際運動中的離散狀態和動搖現象，要揭穿並駁斥一切自覺或不自覺降低我們綱領和我們策略的企圖。

至於工人事業雜誌無論對於第一，第二，第三件事情都沒有作過，這是大家所知道的；我們往下便要從各方面來詳細解釋這一個

*據我們所知，基也輔委員會底成份從那時起並沒有發生什麼變更。

盡人皆知的真情。現在我們只想指出，『批評自由』這一要求與我們俄國批評派以及俄國經濟派底特點，是處於一種非常刺目的互相矛盾的地位。例如，請你們看一看『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用以追認工人事業雜誌觀點的那個決議內容吧：

『爲了促進社會民主黨今後思想上的發展，我們認爲絕對必須在黨的刊物上自由批評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只要這種批評不與這個理論底階級性質和革命性質相抵觸就行了』（見兩次代表大會，第一〇頁）。

理由就是：決議案『第一部份是與留比克代表大會關於伯恩施坦問題的決議案相符合的』…『聯合會派』由於頭腦簡單，竟不知道他們這樣抄襲就是證明他們自己思想貧乏已極哩！…『但是…決議案第二部份，却比留比克代表大會更嚴格地限制了批評自由』。

那末，『聯合會』底決議案是用來反對俄國伯恩施坦派的吧？否則援引留比克大會，就會絕頂荒謬了！然而，說這個決議案『嚴格地限制了批評自由』，是全不正確的。德國黨在自己的漢諾維代表大會決議案上所逐條駁斥的，正是伯恩施坦所作的那些修正；而在留比克代表大會決議上，更指出伯恩施坦底名字而給他個人下了一個警告。而我們的『自由』做倣者，對於俄國『批評派』和俄國經濟派所特有的一切表現，都一字不提；既然這樣隱諱，那末空空洞洞地說什麼理論底階級性質和革命性質，就是要留下更多的曲解機會，況且『聯合會』又不願把『所謂經濟主義』（見兩次代表大會，第八頁，關於第一條）視爲機會主義。但這還只是順便說說。而主要的，就是機會主義者對革命社會民主黨人的態度，在德國和在俄國是彼此完全相反的。大家知道，德國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是主張保存現有的東西；主張保存大家都知道的，根據數十年的經驗來詳細闡明過的舊綱領和舊策略。『批評派』則想加以改變；既然這個批評派僅佔很小的少數，而他們的修正主義企圖又很怯懦，那

末黨內大多數反對『革新主張』時祇限於把它乾脆申斥一下，也就理所當然了。我們俄國的批評派和經濟主義派却主張保存現有的東西：『批評派』希望大家繼續把他們當作馬克思主義者，並保證他們在各方面享用過的那種『批評自由』（因為他們實際上從來沒有承認過任何黨性聯繫*，並且我們也就沒有一個為大家所公認而能『限制』——那怕是用規勸的方法也好——批評自由的黨機關）；經濟主義者要革命者承認『現時運動底正當性』（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第二五頁），即承認現有東西存在底『合理性』；要『思想家』不企圖使運動『離開』那條『由物質原素和物質環境底相互作用所決定』的道路（摘自火星報第十二期上所載的那封信）；要大家認為只有進行『工人在現今條件下唯一可能進行的』鬥爭才算適當，要大家認為只有『工人們目前實際上所進行的鬥爭』（工人思想附刊第十四頁）才是可能的。反之，我們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則不滿意於這種崇拜自發性，崇拜『目前』現有東西的態度；我們要求改變近年來所流行的策略；我們聲明說，『在統一以前，並為統一起見，首先必須堅決而明確地劃清界限』（火星報出版預告）。總之，德國人主張保存現有的東西，反對加以變改，而我們却要求改變現有的東西，反對崇拜這個現有東西以及與它調和的態度。

*單是缺少公開的黨性聯繫和黨性傳統這一事實，就已使俄國情形和德國情形根本不同，因而警告着每一個有理性的社會主義者不要盲目模仿他人。從下面這個例證中，便可知道『批評自由』在俄國達到了何等地步。俄國的批評家布爾加科夫先生竟譴責奧地利的批評家赫爾茨說：『赫爾茨所作的結論雖很有獨立精神，但他在這個問題（合作社問題）上的見解却顯係太受他自己黨底意見所拘束了，他雖在細節方面持着特殊的見解，但始終不敢離開一般原則』（資本主義與農業，第二卷，第二八七頁）。一個政治上備受束縛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口都為政治奴才心理和完全不懂黨性道德與黨性聯繫的習氣所敗壞到極點的國家裏的臣民，却傲然自備一個憲制國家裏的公民，說他『太受黨底意見所拘束』！彷彿我們秘密組織底任務只是要從事攪製關於批評自由的決議案哩……

這一個『小小的』區別，是我們的『自由』抄襲德國人決議的專家根本沒有覺察到的哩！

(丁) 恩格斯論理論鬥爭底意義

『教條主義，學理主義』，『黨底硬化是因勉強束縛思想而必然受到的一種懲罰』，——這就是工人事業雜誌社中那些捍衛『批評自由』的騎士們所拚命攻擊的敵人。他們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我們當然極表歡迎，不過我們還主張提出另一個問題：

誰做裁判人呢？

我們面前有兩個刊物出版廣告：一個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定期刊工人事業雜誌底綱領』（工人事業雜誌第一期單張），另一個是『勞動解放』社出版物復刊廣告。兩個廣告都標明是於一八九九年公佈，當時『馬克思主義底危機』早已顯現出來了。結果怎樣呢？第一個廣告絲毫也沒有指出這個現象，也沒有確切說明新機關刊物對於這一問題所打算採取的立場。關於理論工作及其在目前的緊急任務問題，無論在這個綱領或在一九〇一年『聯合會』第三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對此綱領的補充條文中（見兩次代表大會，第一五至一八頁）都毫未說及。在這整個時期內，工人事業雜誌編輯部始終都把理論問題置之不顧，雖然這些問題是全世界一切社會民主黨人所經常關懷的。

反之，第二個廣告首先就指出近年來人們對理論問題興趣減弱的事實，竭力要求『仔細注意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底理論方面』，並號召大家去『無情批評』我們運動中的『伯恩施坦主義以及其他反對革命的傾向』。已經出版的幾期曙光雜誌，就表明這個綱領執行的情形。

由此可見，所謂反對思想硬化等等的那些響亮詞句，祇是用來掩飾人們在理論思想發展方面的疏忽與窮蹙罷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例子非常明顯地證實了全歐普遍的現象（這是德國馬克思主義

者也早已指出了的現象)：鼎鼎大名的批評自由，並不是以一種理論來代替另一種理論，而是自由拋棄任何完整周密理論，是折衷態度和無原則性。凡是稍微知道我國運動實況的人，都不能不看見，隨着馬克思主義底廣潤傳播而發生了理論水準底某些降落。有許多在理論上很少素養或且毫無素養的人，因看見運動有實際意義和實際成效而加入了運動。由此可見，工人事業雜誌之得意洋洋地提出馬克思底一句格言——『一步實際運動勝於一打綱領』，該是何等不識時務呵。在理論思想離散的時代來重複這一句格言，就恰與遇見人家送葬時高喊『恭喜恭喜！』相似了。而且馬克思這一句格言是從他論哥達綱領的那封信中引來的，在這封信裏，馬克思嚴厲斥責了人們在說明原則時所抱的折衷態度：如果真要聯合的話，——馬克思當時向黨的領袖們寫道，——那末為達到運動底實際目的起見，儘可締結條約，但決不要拿原則來講交易，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底意思便是這樣，而我們這裏却有人假借馬克思底名義來極力減弱理論底意義哩！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當醉心於最狹隘實際活動的偏向與機會主義底時髦宣傳打成一片的時候，是必須始終極力堅持這種思想的。對於俄國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底意義更因有人們時常忘記的三種情況而特別增大，這三種情況就是：第一，我們的黨還剛在奠定起來，還剛在形成自己的面貌，還遠沒有同革命思想界中的其他各種會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的派別算清賬目。恰恰相反，正是最近以來，非社會民主派的革命思潮活躍起來了（這是阿克雪里羅得早已向經濟主義者預告過的）。在這種條件下，驟然看來似乎『並不重要的』錯誤，可能引起極可悲的惡果，祇有患近視病的人，才會以為派別的爭論和嚴格區別各派色彩，是一種不合時機或多餘的事情。這種或那種『色彩』底鞏固，能決定俄國社會民主黨將來許許多多年代成敗的前途。

第二，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根本上就是國際的。這不僅是說我們應當反對本國沙文主義，而且是說在年輕國家內剛剛開始的運動，祇有在它運用別國經驗的條件下，才能順利發展。但是，要真能運用別國經驗，單單認識這種經驗或單單抄襲別國最近的決議，是不夠的。爲此就必須善於用批評的態度來看待這種經驗，獨立地檢查它。誰只要想一想現代工人運動已發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廣大的地步，就會懂得，爲了履行這個任務，該要有多少豐富的理論力量和政治經驗（以及革命經驗）。

第三，俄國社會民主黨擔負有世界上任何一個社會黨都還沒擔負過的民族任務。我們在下面就要說到把全體人民從專制制度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這個任務所加於我們的種種政治責任和組織責任。現在我們祇想指出一點，就是祇有受先進理論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底作用。讀者若想要稍微具體知道這句話底意思，就請讀者回想回想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前輩，如蓋爾村，拜林斯基，契爾內舍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羣光榮革命家；就請讀者想一想俄國作品現在所獲得的全世界的意義；就請……不過，單是這些，也就够了。

現在我們把一八七四年恩格斯說到理論在社會民主運動中的意義問題時所發表的意見引證出來。恩格斯認爲社會民主黨底偉大鬥爭並不像我國許多人通常所設想的那樣只有兩種（政治的和經濟的）形式，而是有三種形式：與這兩種鬥爭並列的還有理論的鬥爭。他所給予實踐上和政治上都已強固的德國工人運動的指示，從現代各種問題和爭論方面看來，非常可供效法，因此我們希望讀者不要因我們從早已成了一部非常珍奇著作的德國農民戰爭*序言中摘引很長一段而埋怨我們：

*第三版，一八七五年來比錫版，合作書局發行。

『德國工人與歐洲其他各國工人比較起來，有兩大優越處。第一，他們屬於歐洲最有理論修養的民族，他們保持了德國那些所謂『智識階級』幾乎完全喪失掉了的理論思想。如果先前沒有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那末德國科學社會主義，即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學社會主義，便永遠不會創立起來。如果工人沒有理論思想，則這個科學社會主義就永遠不會像現在這樣深入於他們的肺腑。而這個優越處之無限重大，有如下兩件事實可作證明：一方面，英國工人運動，雖然單個行業有很好的組織，但前進得很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於一切理論的漠視；另一方面，法國人和比利時人因原始式的蒲魯東主義傳播而發生着混亂與動搖，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由於巴枯寧滑稽化了的蒲魯東主義傳播而發生着混亂與動搖。

第二個優越處，就是德國人參加工人運動，差不多比各國人都遲。正如德國理論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它是依靠着聖西門、傅立葉和渦文這三位偉大思想家，依靠着這三位雖其學說含有十分虛玄和非常空想性質，終究是自古迄今最大智士，而英明地預示了現在我們用科學方法證明其正確的無數真理的思想家而確立起來的一樣，德國實踐的工人運動也永遠不應忘記它是依靠着英法兩國運動而發展起來的，它能簡單利用英法兩國運動用高價換來的經驗，而在現時避免當時它們往往無法避免的那些錯誤。如果沒有英國工聯運動和法國工人政治鬥爭底榜樣，如果沒有特別是巴黎公社所給的那種偉大推動，那末我們現在便會處在什麼境地呢？

必須承認：德國工人之善於利用自己所處地位的這些優越處，真是罕見的。自從有工人運動以來，鬥爭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實踐經濟方面（反抗資本案）互相配合，互相聯繫，有條不紊地進行着。德國工人

運動之強有力而不可戰勝，也就是由於這一種可說是配合舉行的攻擊。

一方面由於德國工人有這種優越地位，另一方面又由於英國工人運動有其島國的特點，由於法國工人運動受到暴力的鎮壓，所以德國工人現在處於無產階級鬥爭底前導地位。事變究竟容許他們把這種光榮地位佔據多久，這是不能預斷的。可是，當他們還佔據這個地位的時候，他們大概是能好好執行這個地位所加予他們的種種責任的。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在鬥爭和鼓動的各方面都加倍努力。領袖們特別必須愈加增進他們對於各種理論問題的知識，愈加擺脫那些屬於舊世界觀的慣例詞句底影響，而時刻注意到：自從社會主義成爲科學以來，它就要求人們去把它當作科學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把由此獲得的日益明朗的意識，用有加無已的熱忱傳佈到工人羣衆中間去，必須日益加緊團結黨組織和職工會組織…

…假使德國工人將來也會照舊前進，那他們雖不能說會在運動頭前行進（要某一個國家中的工人在運動頭前行進，這並不符合運動底利益），但一定會在戰士行列間佔着光榮地位；而將來如有意外嚴重患難或偉大事變要求他們顯出更高度的勇氣，更高度的決心和毅力的時候，他們是定會穩有把握，應付自如的』。

恩格斯果然預料中了。過了幾年之後，德國工人遭到了意外的嚴重患難，即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令。而德國工人確實是穩有把握，應付自如，並勝利地渡過了這種難關的。

俄國無產階級將要遇到更嚴重無比的患難，將須與猙獰的怪物作鬥爭，而憲制國家中的非常法令與這個怪物比較起來，真是一種侏儒小醜。歷史現在向我們提出的最近的任務，是比其他任何一國無

產階級所有一切最近任務都更要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而且是（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把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結果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而我們可以指望，我們定能獲得我們前輩人物，即七十年代革命家們已經應分享有過的這個光榮地位，只要我們能用同樣忠誠無限的決心和毅力來鼓舞我們比當時更廣闊深入千百倍的運動就行了。

（二）羣衆底自發性和社會 民主黨底覺悟性

我們已經說過，必須用七十年代革命家那樣忠誠無限的決心和毅力來鼓舞我們比七十年代更廣闊深入得多的運動。的確，直到現在，彷彿還沒有一個人懷疑過：現代運動底強處是在於羣衆（主要是工業無產階級）底覺醒，而它的弱點却在於做領導工作的革命家缺乏覺悟性與首創精神。

但是近來有人作出了一個有把至今對於這個問題的一切公認觀點盡行推翻之勢的驚人發現。作出這個發現的是工人事業雜誌，它在同火星報和曙光雜誌進行論戰的時候並不限於一種局部的反駁，而力圖把『一般意見分歧』歸結於更深的根源，歸結於『對自發成分和『有計劃』自覺成分互相比較意義有不同的估計』。工人事業雜誌底控訴提綱是說：『輕視發展過程中的客觀成分或自發成分底意義』*。我們答覆道：假使火星報和曙光雜誌一起進行的論戰，除了激起工人事業雜誌想到了這個『一般意見分歧』之外，完全沒有

*見一九〇一年九月出版的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第一七頁和第一八頁。着重點是工人事業雜誌編者加的。

產生任何其他的結果，那末單是這一結果也就能使我們很覺滿意，因為這一提綱底意義真是重大，它非常明顯地暴露了現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所有一切理論和政治意見分歧底全部實質。

正因為如此，所以覺悟性對自發性的關係問題，是個具有莫大概括意義，而為我們所應當十分詳細地加以說明的問題。

（甲）自發高漲底開始

我們在前一章中，已經指出了九十年代中期俄國智識青年紛紛醉心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事實。約在那時候，在一八九六年有名的彼得堡工業戰爭之後，工人罷工事件也是這樣紛紛發生的。這一罷工運動廣佈於全俄各處的情形，便十分顯然地證明了，重新高漲起來的民衆運動是很深厚的；假使要說什麼『自發的成分』，那末首先當然應承認這種罷工運動是自發的運動。但自發性也是有各種各樣的。遠在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甚至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俄國已發生過罷工，而有『自發』毀壞機器等等的事實伴隨着。九十年代的罷工與這些『騷動』比較起來，甚至可以稱為『覺悟的』罷工，——足見工人運動在這個時期已有了怎樣長足的進步。這就向我們證明：『自發的成分』實際上無非是覺悟性底萌芽。甚至原始的騷動也表現出了某些覺悟性激發的成分：工人已經不如向來那樣相信壓迫他們的那個制度堅不可搖，而開始感覺到（雖不敢說他們已經開始瞭解到）必須共同反抗，堅決地拋棄盲目服從長官的態度。但這種行爲終究多半是拚命掙扎與報復底表現，而很難說是鬥爭。九十年代的罷工所表現出來的覺悟色彩，却就多得多了：此時已提出一定的要求，已預先計算到較為適當的時機，討論別處發生的某些事件和實例等等。如果說騷動還不過是被壓迫人們起義的表示，那末有系統的罷工所表現的却已是階級鬥爭底萌芽，但真正祇

是一種萌芽而已。這些罷工本身是工聯主義的鬥爭，而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這些罷工表明工人已感覺到他們與廠主利益對抗的情形，但是工人當時還沒有，而且本來也就不能有瞭解到他們本身利益與現代整個社會政治制度根本對立而不可調和的這種意識，即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在這一個意義上講，九十年代的罷工，雖然比較『騷動』要進步得多，但終究還是純粹自發性的運動。

我們已經講過，工人本來也就不能發生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祇能從外面灌輸進來。各國歷史證明：工人階級憑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對於必須組織工會，必須與廠主鬥爭，必須從政府那裏爭得頒佈工人所需要的某種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會主義學說是由有產階級出身的那些受過教育的份子，即智識份子所製定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以及經濟理論中長成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底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按其社會地位來講，也是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同樣，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學說，也是完全不依賴於工人運動底自發增長過程，而從革命社會主義智識界底思想發展中自然和必然產生出來的結果。到我們現在所講的那個時候，即是說到九十年代中期，這個學說不僅已成了『勞動解放』社十分確定的綱領，而且已經奪得了俄國大多數革命青年。

由此可見，當時一方面有工人羣衆底自發覺醒，趨於自覺生活和自覺鬥爭的覺醒，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用社會民主主義理論武裝起來而極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同時特別要指出人們常常忘記的（而且是人們不很熟悉的）事實，就是這個時期的第一批社會民主黨人，雖很熱心從事經濟鼓動（而且他們在這一點上完全注意到了

*工聯主義並不是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排斥一切『政治』。工聯會向來都進行過相當的（但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鼓動與鬥爭。關於工聯主義政治和社會民主主義政治之間的區別，我們將在下一章裏加以說明。

當時還是抄本的論鼓動一書中許多真正有益的指示），但是他們不僅沒有把經濟鼓動當作自己唯一的任務，恰巧相反，他們一開始就提出了整個俄國社會民主運動最廣大的歷史任務，特別是推翻專制制度的任務。例如，在彼得堡創立了『爲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的那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早在一八九五年末就編好了命名爲工人事業的第一期報紙。但這期報紙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夜裏已經準備付印的時候，忽然遭受憲兵搜查，從一個會員瓦涅夫*那裏奪去，於是第一屆工人事業就沒能出版。這一期報紙底社論（也許過了三十年來年之後，會有某俄國舊事雜誌⁸⁰從警察廳檔庫中找出它的原稿來）說明了俄國工人階級底各個歷史任務，並把爭取政治自由的任務當作首要任務。其次，有一篇標題爲我們的總長們究竟想些什麼的論文，是敘述警察摧殘識字運動委員會的；此外，還有許多不僅是從彼得堡城內，並且是從俄國其他地方寄來的通訊（如記載雅羅斯拉夫里省工人流血事件的通訊）。可見，九十年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所舉行的這個彷彿是『初次的嘗試』，並不是一個狹隘地方性的報紙，更不是『經濟主義』性的報紙，而是一個想把罷工鬥爭同反專制制度的革命運動匯合起來，吸引當時一切受反動黑暗政策壓迫的份子來幫助社會民主運動的報紙。凡是稍微知道當時運動實況的人都不會懷疑，這樣的報紙定能獲得首都工人以及革命智識份子完全同情，並會得到極廣泛的傳播。而這一創舉底失敗，祇是證明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由於革命經驗和實際素養不夠的關係，竟無力滿足當時的迫切要求。聖彼得堡工人小刊⁸¹也是如此；工人報以及一八九八年春季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所發表的宣言，更是如此。當然，我們根本也不想把這種缺乏素養當作當時活動家們底罪過。但

*瓦涅夫在預審期間，因被拘禁在單人牢房裏而得肺病，已於一八九九年在西伯利亞東部逝世了。因此，我認爲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證的消息公佈出來，對於這些消息底確實性，我們敢於担保，因爲這些消息是由極熟悉瓦涅夫的人們說出的。

是爲要利用運動底經驗，並從這個經驗中求得實際教訓起見，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各種缺點底原因和意義。因此絕對必須指出，有一部分（也許甚至是大多數）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活動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完全正確地認爲在那個時候，即是在『自發』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就可提出極廣闊的綱領和戰鬥策略*。當時大多數革命家缺乏素養，本是很自然的現象，決不能引起任何特別的顧慮。既然任務提得正確，既然有再仆再起試圖實現這些任務的毅力，那末暫時的失利也就不過是一種小小的不幸。革命的經驗和組織工作的敏捷性，是可以學得的東西。只要有養成這些必要品質的熱心就行了！只要覺悟到自己的缺點就行了，因爲在革命事業上，覺悟到自己的缺點，就等於改正一大半哩！

可是當這種覺悟開始消失（這種覺悟在上面說過的那些活動家中間本是很活躍的），而有一部份人，甚至有些社會民主黨人機關報，竟想把缺點推崇爲美德，甚至想爲自己盲從和崇拜自發性的態度奠定理論基礎時，於是這個小不幸就變成爲一個大不幸了。現在該把一般人用『經濟主義』這一過於狹隘而不能充分表明其內容的名詞形容得不很確切的這個派別，作個結束了。

*『火星報指斥九十年代末社會民主黨人底活動時，竟忽略了當時除爭取細小要求的鬥爭以外，缺乏進行別種工作的條件這一事實』，——經濟主義者在其致俄國各社會民主黨人機關報的一封信（載於火星報第十二期）中這樣說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實證明，所謂『缺乏條件』的斷語，是與真情絕對相反的。不僅在九十年代末，即在九十年代中期，除爭取細小要求的鬥爭以外，進行別種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條件也是充分具備了的；除領導者缺乏素養外，其他一切條件都是充分具備了的。『經濟主義者』不去公開承認我們這些思想家，我們這些領導者方面缺乏素養的事實，却想把一切都歸咎於『缺乏條件』，歸咎於決定運動道路，而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運動從此離開的那個物質環境底影響。試問這不是盲從自發性是什麼？這不是『思想家』酷愛自己的缺點是什麼？

(乙) 崇拜自發性的態度。工人思想報

在未講到這種崇拜自發性的態度在刊物上的表現之前，我們先要指出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實（這是我們從上面所說過的那些人方面得來的消息），根據這件事實，便可窺見，當時在彼得堡工作的同志們中間怎樣產生和發展了後來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兩派之間的齟齬。一八九七年初，瓦涅夫和他的幾個同志，在被發遣到流放所去以前，參加過一次非正式會議⁵²。到會的有『爲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中的『老年派』會員和『少年派』會員。當時所談到的問題，主要是組織問題，特別是關於『工人儲金會章程』問題，這個章程最終確定的條文是在工人小報第九第十兩期合刊上（第四六頁）發表了的。在『老年派』份子（即彼得堡的社會民主黨人所戲稱爲『十二月黨人』的份子）與一部分『少年派』份子（即後來密切參加過工人思想報工作的份子）之間，立刻就暴露出了激烈的意見分歧，發生了熱烈的爭論。『少年派』擁護後來發表了的那個章程底主要原則。『老年派』說，我們首先所需要的並不是這點，而是要把『鬥爭協會』鞏固成爲革命家底組織，並使各種工人儲金會以及在青年學生中間進行宣傳的小組等等都受它指揮。當然，爭論的人們並沒有認爲這個意見分歧就是分離底開端，恰恰相反，他們認爲這是一種間或和偶然發生的爭論。可是這件事實指明：即在俄國，『經濟主義』也並不是沒有與『老年派』社會民主黨人作過鬥爭而產生和傳佈起來的（而現時的經濟主義者却往往忘記這點）。至於這一鬥爭多半沒有留下『文件的』痕跡，那就只是因爲當時活動的各個小組，在成份上變更得異常之快，而沒有任何繼承性，因此意見分歧也就沒有用任何文件記載下來。

工人思想報的產生，便使經濟主義顯現出來了，但這也不是一下子做到的。須得具體認識當時俄國許許多多小組底工作條件及其

生命底短促（但祇有親身閱歷過當時情形的人，才能具體認識這點），才可瞭解，新派別在各城市裏的成敗，是有過多少偶然的原因，而這個『新思潮』底擁護者或反對者又是多麼長久地不能夠，並且簡直是根本無法斷定，這究竟真是一個特殊的派別呢，抑或祇是個別的人缺乏素養的表現呢。譬如工人思想報頭幾期的膠印版，甚至是絕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全沒讀過的。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援引工人思想報第一期上的社論，只是因為在依一興底文章（工人小報第九第十兩期合刊，第四七以及往下各頁）中把這篇社論轉載出來了，而依一興自然馬上乘機來努力——真是不量力的努力——誇獎這個新的報紙，因為這個報紙是與上面我們所說的各種報紙及報紙草案大不相同的*。這篇社論值得分析一下，因為它把工人思想報和一般經濟主義底全部精神都極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社論指出穿青色衣服的人⁶³決不能阻止工人運動發展之後，就繼續說道：『…工人運動之所以這樣堅強，是因為工人自己終究從領導者手裏奪出了自己的命運，而親自來處理這個命運』，往後就把這個基本提綱詳細發揮下去。其實，領導者（即社會民主黨人，『鬥爭協會』組織者）可說是被警察從工人手中奪去了的**，而人們却偏說工人與這些領導者作過鬥爭而擺脫了他們的束縛！人們不但不號召前進去鞏固革命組織和擴大政治活動，反而號召後退，去專作工聯主義的鬥爭。說什麼『人們因經常想不忘政治

*這裏要順便說說：在一八九八年十一月間——當時經濟主義，特別是在國外，已完全形成了——這樣誇獎工人思想報的，就是那個不久以後便成了工人事業雜誌編輯員之一的依一興。而工人事業雜誌却還否認過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有兩個派別存在的事實，直到現在還繼續否認這一事實！

**從下面一件鮮明事實中，便可知道這種比擬正確。這件事實就是：『十二月黨人』被捕後，施立塞與堡大路上的工人中間盛傳着一個消息，說這次破獲是一個接近於某個常與『十二月黨人』接觸的團體的奸細米海洛夫（牙科醫生）所促成，於是這些工人表示異常憤激，竟決定要殺死米海洛夫。

理想而抹煞了運動底經濟基礎』，說什麼工人運動座右銘是『爲改善經濟狀況而鬥爭』（！），甚至是『工人爲工人』。說什麼罷工基金儲蓄會『對於運動比一百個其他的組織還要貴重些』（請把一八九七年十月間說的這段話與一八九七年初的『十二月黨人』和少年派的爭論比較一下吧）以及其他等等。說什麼我們不應注重工人中間的『精華』，而應注重『中等』工人，即普通工人，說什麼『政治始終都順從於經濟』等等一類的語句*現在已經成爲一種時髦之談，並且對於許多被吸入了運動，大半不過是根據合法刊物的那種敘述來認識了某些馬克思主義片段的青年們，已發生了極大的影響。

於是覺悟性也就全被自發性壓倒了，而表現這種自發性的，就是那些重覆瓦龍錯夫先生『思想』的『社會民主黨人』，就是一部分盲從的工人，他們竟妄信人言，說對每一個處布工資增加一個哥比要比任何社會主義和任何政治都切實而寶貴些，說他們進行『鬥爭時，應當知道他們不是爲了什麼將來的後代，而是爲了自己本人和自己兒女去鬥爭』（工人思想報第一期社論）。這種辭句向來是西歐資產者們所愛用的武器，他們因仇視社會主義，而親自努力（例如德國的『社會政治家』基爾什一流的人）把英國的工聯主義搬到本國來，向本國工人說，祇有職工會的鬥爭**才是爲了自己本人和自己兒女，而不是爲了什麼將來的後代，爲了什麼將來的社會主義所進行的鬥爭，——而『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瓦龍錯夫』現在也來

*這也是從工人思想報第一期上的那篇社論中摘錄下來的。根據這點，就可斷定這些『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瓦龍錯夫』**底理論素養低到怎樣地步，當馬克思主義者在文壇中實行與早已因這樣瞭解政治與經濟間的相互關係而得到了『慣於反動勾當的能手』這個雅號的真正的瓦龍錯夫先生作戰的時候，而這些『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瓦龍錯夫』却重覆這種公然糟蹋『經濟唯物主義』的論調！

**德國人甚至有 „Nur-Gewerkschaftler“ 這一專門名詞，意即主張『純粹職工會的』鬥爭的人。

重覆這些資產階級的辭句了。這裏必須指出對於往下分析現代意見分歧 *很有用處的三種情況。

第一，我們上面所指出的那種覺悟性被自發性壓倒的現象，也是自發地發生的。這好像是強詞奪理的說法，但可惜這是一件沉痛的真情！這種現象的發生，並不是由於兩種絕對相反觀點公開鬥爭以及某一種觀點戰勝了別種觀點，而是由於『老年派』革命家日益被憲兵『奪去』，『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瓦龍錯夫』『少年派』日益得勢。就是沒有親身參加過現代俄國運動，而只聞過一些運動氣味的人，也很知道事實正是這樣。至於我們畢竟要特別努力使讀者能把這個衆所共知的事實澈底弄清，並為實地證明這點，而指出第一屆工人事業經過情形以及一八九七年初『老年派』與『少年派』爭論情形，那就是因為有些以『民主主義』自誇的人，總是利用讀者大眾（或很年輕的青年們）不知道這些事實。關於這點，我們以後還要講到。

第二，根據經濟主義在刊物上的最初表現，我們就可看見一種非常奇特，而且最能使我們瞭解現代社會民主黨隊伍中的各種意見分歧的現象，就是那些主張『純粹工人運動』的人，主張與無產階級鬥爭發生最密切，最『有機』（這是工人事業雜誌底說法）聯系的人，反對任何非工人出身的智識份子（那怕是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的人，為了辯護自己的立場，竟不得不採用資產階級的『純粹工聯主義者』底論據。這件事實向我們表明：工人思想報一開始就已着手——不自覺地——實現《Credo》綱領。這件事實表明（這

*我們這裏着重『現代』一語，是要請這樣一些人注意，這些人會虛偽地聳聳肩膀說道：現在斥責工人思想報是很容易的，不過這是早已過去的事呵！我們且回答這班現代的偽君子說：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這裏所暗示的就是你哩。——譯者）。關於這班偽君子全被工人思想報底思想征服的事實，我們往後就要加以證明的。

是工人事業雜誌始終不能瞭解的)：對於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對於『覺悟成分』作用，即社會民主黨作用的任何輕視，都是——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與否——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於工人的影響。凡是說什麼『人們誇大了思想體系底作用』*，說什麼人們誇大了覺悟成分底作用**等等的人，都以為祇要工人能夠『把自己的命運從領導者手中奪出來』，那末純粹的工人運動本身就能規定，而且真正會規定出一種獨立的思想體系。但這是極端錯誤的想法。爲了補充我們以上所說的話，我們還要引用考茨基論到奧國社會民主黨底新綱領草案時所說的一段十分正確而重要的言論***。

『我們的那些修正主義的批評家中，有很多人以為馬克思說過，經濟發展和階級鬥爭不僅造成社會主義生產底條件，而且直接產生出認爲社會主義生產必要的意識（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於是這些批評家就反駁道，爲什麼在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最高的英國，恰巧是最缺乏這種意識呢。根據草案來看，就可以想見：奧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起草委員會也贊成用上面那種反駁方法推翻的這一個冒充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草案上寫着：『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愈增加無產階級底數量，無產階級也就愈加迫不得已，並且愈有可能來作反資本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就會意識到』社會主義有實現的可能和必要。由此便可得出結論，認爲社會主義的意識是從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必然直接產生出來的結果。但這種結論是完全不正確的。當然，社會主義學說，也如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一樣，是根源於現代

*見火星報第十二期上發表的『經濟主義者』底一封信。

**見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

***新時代雜誌，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份，第二十卷，第一編，第三期，第七九頁。考茨基所說的綱領起草委員會草案，是由維也納代表大會（去年末）稍加修改後通過了的。

經濟關係，從反對資本主義所引起的羣衆貧窮困苦情形的鬥爭中產生出來的。但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是並排產生出來，不是彼此產生出來，而是在各不相同的前提下產生出來的。現代的社會主義意識，祇有根據深刻的科學知識，才能產生出來。的確，現代的經濟科學，譬如也像現代的技術一樣，是社會主義生產底前提。無產階級不管它的願望怎樣，終不能創造出現代的經濟科學，也不能創造出現代的技術；這兩種東西都是從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出來的。但科學底代表人物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智識階層（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現代的社會主義學說也就是在這一階層的個別份子底頭腦中間產生出來，他們把這個學說傳給較有智識的無產者，後者又在環境容許這樣作的地方把它灌輸到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中去。可見，社會主義的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而並不是從這鬥爭中自發產生出來的東西。因此，舊加因斐綱領說得非常正確：社會民主黨底任務是要把對於無產階級地位的意識，對於它的任務的意識灌輸於無產階級（直譯就是：充實無產階級）。假使這種意識是自然而然地從階級鬥爭中產生出來，那就用不着這樣辦了。新草案接受了舊綱領中的這個原理，而把它勉強附加到上面所引的那個原理上去。但這是完全悖理的…】。

既然工人羣衆自己決不能在他們運動進程中創造獨立的思想體系*，那末問題就只能是这样：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呢，還是社

*這自然不是說工人不參加這一創造工作。但他們不是以工人資格來參加，而是以社會主義理論家資格來參加，以蒲魯東和惠特林一類人資格來參加的，換句話說，祇有當他們多少能夠領會他們那個時代的知識並將其推往前進的時候，而且也只有在這個限度內，他們才能參加這一創造工作。爲要使工人能多多做到這點，就必須極力設法提高一般工人底覺悟程度，使他們不要自限於故意縮小的『工人讀物』範圍，而要學習多多理解一般讀物。更正確些說，不是『自限於』，而是『被

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呢。這裏沒有什麼中間的道路（因為人類沒有創造出什麼『第三種』思想體系，並且在充滿階級矛盾的社會裏，絕對不會有非階級或超階級的思想體系）。因此，對於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任何輕視與任何離棄，都是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人們談論什麼自發性。但工人運動自發的發展過程，正是趨向於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正是照着《Credo》綱領進行，因為自發的工人運動也就是工聯主義的運動，也就是純粹職工會的運動，而工聯主義正是表明工人受資產階級的思想奴役。因此，我們社會民主黨底任務是要反對自發性，是要工人運動脫離這種投到資產階級羽翼下去的工聯主義自發趨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社會民主黨底羽翼下來。因此，火星報第十二期上發表的那封『經濟主義者』來信作者們所說無論最熱心的思想家怎樣努力，終不能使工人運動脫離那由物質要素和物質環境底相互作用所決定的道路等語，就完全等於拋棄社會主義；如果這些作者能夠把自己所說的話大胆而澈底地思索一下，——而每個從事著作和社會活動的人都是應該這樣來思索自己的意思的，——那他們就會只有『把一雙沒有用處的手束起來放在空洞的胸膛上』，而…而讓司徒盧威和普羅科坡維奇一流先生們把工人運動拉到『阻力最少的路線上去』，即拉到資產階級工聯主義路線上去，或是讓祖巴托夫一流的先生們把工人運動拉到神父憲兵的『思想體系』路線上去。

試回憶德國例子吧。拉薩爾對於德國工人運動的歷史功績何在呢？就在於他使這個運動離開了它自發（在叔爾茨、德里奇“一類人誠意協助下）走上去的那條進步派的工聯主義與合作社主義的道路。爲了執行這個任務，就要進行一種與那妄說輕視自發成分，妄

限於』，因為工人自己也閱讀，並且也願意去閱讀那些專爲智識份子寫作的讀物，而只有那些（惡劣的）智識份子，才認爲『對於工人』，只要講些關於工廠規矩的情形，咀嚼些大家早已知道的東西就夠了。

說過程策略，妄說要素和環境相互作用等等廢話全然不同的事情。爲了執行這個任務，就要進行拚命反對自發性的鬥爭，也只是由於多年進行了這種鬥爭的結果，才使——舉例說——柏林城的工人由進步黨底支柱變成了社會民主黨底一個極好的堡壘。這種鬥爭至今尙未結束（雖然那些用普羅科坡維奇態度研究德國運動底歷史，用司徒盧威態度研究德國運動底哲學的人，也許會認爲已經結束了的）。德國工人階級現在也簡直可以說是分散在幾種思想體系之間：一部分工人是組織在天主教的和帝制派的工會中，另一部分工人是組織在崇拜英國工聯主義的資產階級份子所創立的基爾什、董克爾工會⁶⁶中，還有一部分人則組織在社會民主黨的工會中。後一部分工人要比其餘兩部分工人多得無比，但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體系只是由於它與其餘一切思想體系進行了不斷的鬥爭，才獲得了這個首位，而且也只有繼續進行這種不斷的鬥爭，才能保持住這個首位。

但是讀者也許要問：自發的運動，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綫進行的運動，爲什麼恰恰趨向於受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支配呢？原因很簡單：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其淵源要比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久遠得多，其所受過的製煉也較爲周到，其所擁有的傳播工具也更多得無比*。所以某一個國家內的社會主義運動愈幼稚，也就必須愈加積極反對一切鞏固非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企圖，也就必須愈加堅決警告工人，叫他們不要聽從那些大喊大叫反對『誇大覺悟成分』等等的惡劣建議人。經濟主義者來信底作者們與工人事業雜誌同一鼻孔

*人們常常說：工人階級是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的。這在下述一種意義上講，是完全正確的，就是社會主義理論比其他一切理論都更深刻更正確地判定工人階級困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領會這個理論，只要這個理論本身不屈服於自發性，只要它能使自發性受其支配就行了。這通常都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可是工人事業雜誌却恰恰忘記和曲解了這件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時時刻刻在各種各樣的形式下復活起來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畢竟自發而且最厲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

出氣，痛斥着運動幼年時期所特具的那種不肯容忍的態度。我們回答道：不錯，我們的運動確實尚屬幼弱，而它爲了趕快壯大起來，正是對那些以其崇拜自發性態度來阻碍它發展的人，採取一種絲毫不肯容忍的態度。裝做早已經歷過一切堅決鬥爭階段的老頭子，是再可笑再有害不過的了！

第三，工人思想報第一期向我們表明：『經濟主義』這個名稱（我們自然不想排斥這個名稱，因爲這個稱呼總算是已經用慣了），把新派別底實質表示得不十分確切。工人思想報並不完全否認政治鬥爭，例如在工人思想報第一期所刊載的那個工人儲金會章程中，就說是要與政府作鬥爭。不過工人思想報以爲『政治始終是順從於經濟』（而工人事業雜誌則以另一種說法來表示這個提綱，它在自己的發刊詞上說：『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是分不開的，這在俄國比其他各國表現得更明顯』）。假使所謂政治是指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而言，那末工人思想報和工人事業雜誌底這種說法便是全不正確的。我們已經說過，工人底經濟鬥爭往往是與資產階級，神權派等等的政治相聯系的（雖然這種聯系不是分不開的）。假使所謂政治是指工聯主義的政治而言，即是指一切工人都想從政府那裏爭得某些減輕工人地位特有困苦，但決不能消滅這種地位，即勞動受資本支配的地位的設施而言，那末工人事業雜誌底說法是對的。這個趨向確實是仇視社會主義的英國工聯會員，天主教工人，『祖巴托夫主義的』工人等等共同的趨向。政治是有各種各樣的。可見，工人思想報對於政治鬥爭的態度，也不是根本否認政治鬥爭，而是崇拜這種鬥爭底自發性，崇拜這種鬥爭底不覺悟性。工人思想報雖完全承認從工人運動本身中自發生長出來的政治鬥爭（正確些說：工人底政治願望和政治要求），但它完全不肯獨立製定特殊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即適合於社會主義一般任務和現代俄國條件的政策。下面我們就要指出，工人事業雜誌所犯的錯誤也是如此。

(丙)『自力解放社』⁶⁷和工人事業雜誌

我們把工人思想報第一期上那篇很少有人知道，而現在差不多已被遺忘了的社論拿來作了一個很詳細的分析，因為它最早而且最明顯地表現了後來以無數支流湧現出來了的那個總的潮流。依一興稱讚工人思想報第一期及其社論時，說它寫得『很激烈，很有鬥志』（工人小報第九第十兩期合刊，第四九頁），這是完全正確的。每一個堅信自己意見而以爲他提出了一種新主張的人，寫起文章來時總是『很有鬥志』，總是很鮮明地表白自己的觀點的。祇有那些慣於模稜兩可的人，才沒有一點『鬥志』；也祇有這樣的人，才會昨天稱讚工人思想報底鬥志，今天却因工人思想報底論敵具有『論戰的鬥志』而加以攻擊。

我們現在不來講工人思想報附刊（我們以後談到各種問題時，還會要來援引這一篇把經濟派思想表現得最澈底的作品），而祇要簡括地說說工人自力解放社底宣言（發表於一八九九年三月，轉載於一八九九年七月份的倫敦前夜雜誌第七期）。這篇宣言底作者們很公允地說，『工人的俄國剛開始覺醒起來，剛在那裏睜眼四望，而本能地抓住隨便一種鬥爭手段』，但他們也與工人思想報一樣從這裏得出了一個不正確的結論，殊不知本能性也就是社會主義者所應予以幫助的那種不覺悟性（自發性），殊不知在現代社會裏，『隨便一種』鬥爭手段始終都會是工聯主義的鬥爭手段，而『隨便一種』思想體系始終都會是資產階級的（工聯主義的）思想體系。這些作者也不『否認』政治，不過（不過！）他們跟着瓦龍錯夫先生說：政治是上層建築物，所以『政治鼓動應當是以擁護經濟鬥爭的鼓動爲基礎的上層建築物，應當在經濟鬥爭基礎上生長起來，並且應當順從於它』。

至於工人事業雜誌，那末它是直接從『辯護』經濟主義者來開始活動的。工人事業雜誌在其第一期（第一四一至一四二頁）上雖

也公然撒謊，說它『不知道』阿克雪里羅得在他那本有名的小冊子*上警告經濟主義者時『所講的少年同志，究竟是指什麼人說的』，但它與阿克雪里羅得及普列漢諾夫爲了這種謊話而進行激烈爭論的時候，却不得不承認，說它『原是想用表示疑惑的口氣替所有那些較爲年輕的僑外社會民主黨人辯護而反對這種不公正的責備』（即阿克雪里羅得說經濟主義者眼光狹小的責備）。其實，這個責備是很公正的，並且工人事業雜誌明明知道這個責備也落到了它的一位編輯員依一興頭上。我要順便指出：阿克雪里羅得在上述爭論中說得完全正確，而工人事業雜誌解釋我所著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一書時却說得完全不正確。我這一本書是在一八九七年，即是在工人思想報還沒有出版的時候寫的，當時我認爲並且有權認爲我上面敘述過的聖彼得堡『鬥爭協會』最初的方向是佔統治地位的方向。至少直到一八九八年上半年爲止，這個方向確實佔有統治地位。所以，工人事業雜誌沒有絲毫權利援引我這本書來否認經濟主義底存在與危險，因爲我這本書上所發揮的觀點是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間在聖彼得堡被『經濟主義』觀點所排擠了的***。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目前任務和策略問題。一八九八年日內瓦版。致工人報的兩封信，寫於一八九七年。

**見本卷第一五七至一七四頁。——譯者。

***工人事業雜誌除了第一句謊話（『我們不知道阿克雪里羅得所說的究竟是哪些年輕的同志』）而外，同時又爲辯護自己而在回答中寫出了第二段謊話：『自從我們寫了對於任務一書的書評時起，俄國某些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已經產生出或是頗爲明顯地顯現出一種經濟主義片面性的傾向，這種傾向與任務一書上所描繪的我國運動狀況相比要算是後退一步』（第九頁）。這是一九〇〇年間出版的回答上所說的話。但工人事業雜誌第一期（即登載有書評的那一期）却是一八九九年四月間出版的。難道經濟主義直到一八九九年間才產生出來麼？決不是，一八九九年間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初次發出了反對經濟主義的抗議聲（即反對「Credo」的抗議書）。而經濟主義底產生却是一八九七年間的事，工人事業雜誌分明知道這點，因爲依一興早在一八九八年十一月間（在工人小刊第九第十兩期合刊上）已經就稱讚過工人思想報了。

但是，工人事業雜誌不僅『辯護了』經濟主義者，而且自己也時常滑到他們的基本錯誤思想上去。其所以這樣滑去，是因為工人事業雜誌發刊詞中有如下一個語意模稜的提綱：『我們認為近年來發生的工人羣衆運動（着重點是工人事業雜誌加的）乃是俄國生活中最重要的現象，這個現象將在大體上決定『聯合會』文字工作底任務（着重點是我們加的）和性質』。至於羣衆運動是最重要的現象，這是不容置辯的。但全部問題就在於怎樣來瞭解這個羣衆運動『決定任務』一語。對於此語可能有兩種瞭解：或者是瞭解為崇拜這個運動底自發性，即是把社會民主黨底作用降低為專替這個工人運動當聽差（工人思想報，『自力解放社』及其他經濟主義者就是這樣瞭解的），或者是瞭解為工人羣衆運動向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任務，這些任務要比工人羣衆運動尚未產生時可以認為滿意的那些任務複雜得多。工人事業雜誌過去和現在都正是傾向於前一種瞭解，因為它根本沒有肯定地講過任何的新任務，却始終都認為正是這個『羣衆運動』使我們不必去明白認識和解決它所提出的種種任務。爲了證明這點，我們只要指出工人事業雜誌認為不可把推翻專制制度當作工人羣衆運動底首要任務，而把這一任務（說是爲了羣衆運動利益）降低到爲爭取目前政治要求的任務（回答，第二五頁）這一事實就夠了。

我們且把工人事業雜誌編輯員克里切夫斯基所發表於第七期上的那篇重複了同樣錯誤的論文，即標題爲俄國運動中的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一文*，撇開不說，而逕直來講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現

*例如，『階段論』或政治鬥爭中的『畏縮迂迴』論，在這篇論文中表述如下：『政治要求按其性質雖是全俄共同的，但在最初的時候』（這是在一九〇〇年八月寫的！）『應當適合於某一工人階層（請留心！）從經濟鬥爭中所獲得的經驗。祇有（！）根據這種經驗，才可以，才應當着手去進行政治鼓動』等等（第一一頁）。在第四頁上，作者忿然反對在他看來是毫無理由的那些指斥他們宣傳經濟主義邪說的責備，而喟然嘆息道：『試問有那一個社會民主黨人不知道按馬克思和恩格斯

在我們當然不去分析克里切夫斯基和馬爾丁諾夫對曙光雜誌和火星報提出的個別反駁。現在我們所想說到的祇是工人事業雜誌在第十期上所持的原則立場。例如，我們也不會去分析工人事業雜誌認為下面兩個原理『絕對相抵觸』的那種笑話。

一個原理是：

『社會民主黨並不用什麼預先製定的政治鬥爭計劃或方法來束縛自己的手足，來縮小自己的行動範圍；它承認所有一切鬥爭手段，只要這些手段適合於黨底實力』等等（火星報第一期）。

另一個原理是：

『沒有一種善於在任何環境和任何時期中進行政治鬥爭的堅強組織，就談不到什麼根據堅定原則和堅決執行的一貫行動計劃，也祇有這種行動計劃才配稱為策略』（火星報第四期）。

原則上承認一切鬥爭手段、一切鬥爭計劃和一切鬥爭方法（只要它們是適當的），是一回事；而在一定政局下要求一貫遵行一個計劃（如果想談策略的話），却是另一回事。把這兩件事混為一談，那就等於把醫學上承認各種治病方法與在醫治一定病症時要求採用一定醫法混為一談。可是問題也就在於工人事業雜誌自己既患了我們所稱為『崇拜自發性』的病症，却又不願承認醫治這個病症的任何『醫法』。因此它作了一個很好的新發現，說『計劃策略是

底學說，各個階級底經濟利益在歷史上有決定作用，所以（着重點是我們加的），無產階級為自己經濟利益進行的鬥爭，對於它的階級發展和解放鬥爭，應當有首要的意義呢？』。這『所以』一語是用得全不恰當的。從經濟利益有決定作用的原理中，絕不應作出一種說經濟鬥爭（即職工會的鬥爭）有首要意義的結論，因為一般說來，最重要的『有決定作用的』階級利益祇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革來滿足；例如，無產階級底基本經濟利益祇能經過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革命來滿足。克里切夫斯基所重覆的乃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瓦龍錯夫輩』底議論（——政治始終都順從於經濟等等），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伯恩施坦派底議論（例如沃特曼就是用這種議論來企圖證明：工人應當首先獲得『經濟力量』，然後才可想到政治革命）。

與馬克思主義底精神根本相抵觸的』（第十期，第一八頁），策略是『與黨發展過程並行的黨任務發展過程』（第一一頁。着重點是工人事業雜誌加的）。後面這一句話很有希望成爲一句著名的格言，成爲表彰工人事業『思潮』的一座永垂不朽的紀念碑。對於『往何處去？』這個問題，領導的機關報所給的答覆是：運動是運動發軔點與其往下一點之間的距離改變的過程。可是，這種絕頂深奧的議論並不祇是一個笑柄（如果這樣，那就不值得特別來講了），而是整個思潮底綱領，這個綱領由P.M.（在工人思想報附刊上）表述如下：『愜意的鬥爭就是可能進行的鬥爭，而可能進行的鬥爭就是目前正在進行的鬥爭』。這正是消極適應自發性的那個極端機會主義底方向。

『計劃策略是與馬克思主義底精神根本相抵觸的！』。這真是誣譏馬克思主義，真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民粹派反對我們時描繪出來而加以攻擊的那種諷刺畫。這正是把覺悟活動家底首創精神和毅力壓制下去，而馬克思主義却是相反，却是把社會民主黨人底首創精神和毅力大大推進，給他們展開最遠大的前途，把『自發』奮起鬥爭的工人階級中千百萬人雄強力量交給（假使可以這樣說的話）他們指揮！在國際社會民主運動底全部歷史中充滿有由各個政治領袖所提出的各種計劃，有的是證實某一領袖所持政治和組織觀點英明正確，有的是暴露另一領袖政治近視和錯誤。當德國遭遇到一個極大的歷史轉變——建立帝國，成立國會，施行普選制——的時候，李卜克內西提出了一個社會民主主義政策和一般工作的計劃，而施維采爾則提出了另一個計劃。當德國社會黨人遭受到非常法令的打擊時，莫斯特和加雪爾曼提出了一個計劃，決意要逕直號召採用強力和恐怖手段，而黑伯爾，斯拉姆以及（在某種程度內）伯恩施坦則提出了另一個計劃，竟向社會民主黨人宣傳，說他們是因自己過分激烈和過分革命而招致了非常法令，所以他們現在應當作出一

種模範行爲來換得赦免；當時那些準備和實行出版秘密機關報的人則提出了第三個計劃。現在，當選擇道路問題所引起的鬥爭早已完結，而歷史對所選定那條道路的正確早已下過最終判斷多年以後，回顧已往，當然不難用一句說什麼黨任務是與黨發展過程並行發展的話來表示深思的態度。但是在此混亂時期*，當俄國的『批評派』和經濟派把社會民主運動降低爲工聯主義運動，而恐怖派竭力主張採取重蹈覆轍的那個『計劃策略』時，單以這種深思爲限，就是自己『證明自己思想貧乏』。當許多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恰巧缺少首創精神和毅力時，當他們恰巧缺少『政治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的胆略』**，缺少更廣闊進行革命工作的『計劃』時，說什麼『計劃策略是與馬克思主義底精神根本相抵觸的』，那就不僅是在理論上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而且是在實踐上把黨拉向後退了。

『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工人事業雜誌往下又這樣教訓我們說，——祇是要以自己的覺悟工作來加速客觀發展過程，而不是要以主觀計劃來取消或代替客觀發展過程。火星報在理論上是知道這一切的。但因爲火星報對於策略持有一種學理主義觀點，於是馬克思主義極其重視自覺革命工作的正確意見，竟使它在實踐上偏向於輕視發展過程中的客觀成分或自發成分底意義』（第一八頁）。

這又是瓦龍錯夫先生及其伙伴們所慣犯的一種極大的理論錯誤。我們要來問問我們的這位哲學家：主觀計劃編製者對於客觀發展過程的『輕視』究竟能表現於什麼呢？顯然是表現於他忽略了這個客觀發展過程可能產生或鞏固，傷害或削弱某些階級、某些階

*梅林格所著德國社會民主黨歷史一書中有一章標題爲混亂之年，在這章內他描寫了社會黨人起初在選擇適合新環境的『計劃策略』時所表現的那種猶豫不決的態度。

**引自火星報第一期社論。

層、某些集團、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團等等，因而引起某種某種國際政治勢力的佈置以及革命政黨立場等等。果如此，那末這種編製者底罪過就會不在於輕視自發成分底意義，反而是在於輕視覺悟成分底意義了，因為他缺乏正確瞭解客觀發展過程所必需的『覺悟性』。因此，單是說什麼自發性和覺悟性互相『比較（着重點是工人事業雜誌加的）意義底估計』這一說法，就已暴露出完全缺乏『覺悟性』的事實。假如說某些『發展過程底自發成分』一般是人類意識所能覺察到的，那末對於這種自發成分的錯誤估計，就等於『輕視覺悟成分底意義』。假如說這種成分是人類意識所不能覺察到的，那我們既不知道這種成分，也就不能來談論這種成分。克里切夫斯基所講的究竟是什麼呢？假使他認為火星報底『主觀計劃』是錯誤的（而他恰巧宣佈說這些計劃是錯誤的），那他就應當指明這些計劃究竟忽略了哪些客觀事實，就應當因這種忽略而責備火星報缺乏覺悟性和——用他所說的話來說——『輕視覺悟成分底意義』。假使他雖不滿意於主觀計劃，但他除了援引『輕視自發成分底意義』（11）而外便沒有其他什麼論據，那他就只是以此證明：第一，在理論上，他是如早已備受別爾托夫⁶⁸譏笑的卡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一流人那樣瞭解馬克思主義；第二，在實踐上，他完全滿足於把我們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引誘到伯恩施坦主義路上去而把我們的社會民主黨人引誘到經濟主義路上去的那些『發展過程底自發成分』，所以他也就十分埋怨那些無論如何都要俄國社會民主黨離開『自發』發展道路的人。

往後所說的便是太滑稽的話了。『正好像人類不管自然科學如何進步而還是用古老的方式繁殖一樣，將來新社會制度底出現也不管社會科學如何進步以及覺悟戰士如何增加而仍然多半會是自發爆發底結果』（第一九頁）。正好像古老的箴言上所說，試問誰沒有充分本領來幹生育子女的事情？——同樣，『最新的社會主義者』

(如拿爾茨斯、杜波立洛夫⁶⁹之類)底箴言也是說，誰都有充分本領來幹參加新社會制度自發出現的事情。我們也認為誰都有這種本領哩。爲了參加這件事情，只要在經濟主義流行時跟着經濟主義跑，在恐怖主義出現時跟着恐怖主義跑就夠了。例如，在今年春天萬分必須警告大家不要傾心於恐怖手段的時候，工人事業雜誌因爲這個問題在它看來是個『新的』問題而弄得茫然不知所措。而現在過了半年之後，當問題已不甚迫切的時候，它却又一方面向我們聲明，說『我們認為社會民主黨不能夠並且不應該力求阻撓恐怖主義情緒底高漲』（見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第二三頁），同時它又向我們提出代表大會底決議，說『代表大會認為有系統的進攻性的恐怖行動是不合時宜的』（見兩次代表大會一書，第一八頁）。你看這是說得多麼鮮明而圓通呵！我們不去阻撓它，但我們却又宣佈說它不合時宜，並且我們這樣宣佈是說『決議』並沒有把非有系統的和防禦性的恐怖行動包括在內。應該承認，這樣一個決議極能免除危險並完全能担保不犯錯誤，正如一個言之無物的人完全能担保不犯錯誤一樣！爲要擬定這樣一個決議，只要善於做運動底尾巴就行了。當工人事業雜誌把恐怖行動問題說成一個新問題而受到火星報譏笑的時候，工人事業雜誌怒氣沖沖地責備火星報，說火星報『簡直不可思議地奢望把一羣僑外作家在十五年多以前提出的那種策略問題解決法強加於黨的組織』（第二四頁）。確實呀，預先在理論上解決問題，然後設法說服各個組織，黨和羣衆來相信這一解決法正確，——你看這是多麼奢望和怎樣誇大覺悟成份呵*！若是單祇舊事重提，對誰也不『強加以』什麼，對於每一次走向於經濟主義或走向於恐怖主義的『轉變』都唯命是聽那是多麼好呀。工人事業雜誌甚至把這一偉大的處世祕訣綜合成爲一個普遍理論，責備火星報和

*同時還不要忘記，『勞動解放』社『在理論上』解決恐怖行動問題時又還綜合過先前革命運動底經驗哩。

光雜誌，說它們『竟把自己的綱領拿來與運動對立，把自己的綱領當作在混沌狀態上面飛翔的精神』（第二九頁）。難道社會民主黨底作用不是恰巧要成爲不僅在自發運動上面飛翔，而且把這一運動提高到『自己的綱領』水準上去的那種『精神』麼？當然它的作用不是做運動底尾巴呀：假若做運動底尾巴，那末好則對於運動無益，壞則對它非常有害。而工人事業雜誌不僅是依從這種『過程策略』，並且把它奉爲原則，因此，與其把它這種傾向稱爲機會主義，倒不如稱爲尾巴主義（是導源於『尾巴』一字）。而且不能不承認：下了決心要永遠做運動尾巴的人，是永遠和絕對不會『輕視發展過程底自發成分』的。

* * *

總之我們已經確實知道，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新思潮』底基本錯誤就在於崇拜自發性，就在於不瞭解羣衆自發性要求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表現大量的覺悟性。羣衆底自發高潮愈增長，運動愈擴大，則要求社會民主黨在理論，政治和組織工作方面表現大量的覺悟性的程度也就會愈迅速無比地增加起來。

俄國羣衆底自發高潮來得非常迅速（而且現在仍是這樣迅速地發展着），竟使社會民主黨的青年顯得沒有執行這些巨大任務的充分素養。這樣缺乏素養是我們大家底不幸，是全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不幸。羣衆底高潮是繼續不斷，前後相承地擴大起來了，不僅在它所開始發生的地方沒有停止下去，而且普及到新的區域和新的民衆階層（青年學生，一般智識份子，甚至農民中間的風潮，都在工人運動影響下活躍起來了）。但革命家無論在自己的『理論』或實際工作方面，都落後於這個高潮，而沒有建立起一種繼續不斷，前後相承，能於領導全部運動的組織。

在第一章內，我們已經指出了工人事業雜誌忽視我們理論任務而『自發』地重復了『批評自由』這一時髦口號的事實；重復這一口

號的人缺少『覺悟性』，以致不能瞭解，『批評家』機會主義派和革命派彼此在德國所站的立場是與他們彼此在俄國所站的立場根本相反的。

在下面幾章中，我們就要來考察考察，這種崇拜自發性的態度怎樣在社會民主黨底政治任務方面和組織工作中間表現出來。

(三) 工聯主義的政治和社會 民主主義的政治

我們又從誇獎工人事業雜誌來開始說起吧。馬爾丁諾夫在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上發表了一篇論與火星報意見分歧的文章，標題為揭露的刊物與無產階級的鬥爭。他把這些意見分歧底實質表述如下：『我們不能單以揭露阻碍它（工人黨）發展的那個制度為限。我們還應當響應無產階級底各種日常切近利益』（第六三頁）。『…火星報…實際上是革命反對派底機關報，它揭露我國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而我們現在和將來都要與無產階級鬥爭發生密切有機聯系來為工人事業努力』（同上）。馬爾丁諾夫說出這一段話來，真使我們不勝感謝。他這一段話具有概括一切的重大意義，因為其實它並不僅是概括了我們同工人事業雜誌的意見分歧，而且概括了我們同『經濟主義者』在政治鬥爭問題上的一切意見分歧。我們已經證明過：『經濟主義者』並不是絕對否認『政治』，而不過是常常從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觀滑到工聯主義的政治觀上去。馬爾丁諾夫也完全是這樣滑過去了，因此我們也就同意選定他為經濟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迷誤底標本。我們往下就會證明，無論工人思想報附刊底作者們，或『自力解放社』宣言底作者們，或火星報第十二期上所載的那封經濟主義者來信底作者們，都是沒有理由因我們選定馬爾丁諾夫而責備我們的。

(甲) 政治鼓動以及經濟派縮小政治鼓動的觀點

大家知道，俄國工人經濟 *鬥爭廣闊發展和鞏固的過程，是與經濟方面的揭露（工廠方面和職業方面的揭露）『刊物』印發工作同時並進的。『傳單』底主要內容是揭露工廠中的情形，於是在工人中間很快就激起了從事這種揭露的真正熱情。工人們一看見社會民主黨人小組願意而且能夠供給他們一種敘述其貧困生活，苦重勞動和無權地位等等實情的新穎傳單，就來大投其工廠通訊。這種『揭露的刊物』不僅在某一傳單所揭露的那個工廠裏的工人中間發生很大的影響，而且在凡是聽到所揭穿的事實的一切工廠裏的工人中間發生很大的影響。既然各個企業和各種職業工人們底貧困苦痛情形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於是『敘述工人生活狀況的實話』也就使所有的工人都感覺興奮。甚至在最落後的工人中間也發展了急想『發表發表』的莫大熱情，急想用此種初步戰爭方式去反對專靠掠奪和壓迫手段支持的整個現代社會制度的高尚熱情。這種『傳單』往往真正是成了一種宣戰書，因為這種揭露工作發生了莫大的激勵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滅各種極顯著的可惡現象，並決意用罷工手段來擁護這種要求。結果，廠主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種傳單是一種宣戰書，往往不願等待戰爭本身到來就表示讓步。這種揭露刊物照例是一經出現就成為強有力的東西，發生強大的精神逼迫的作用。往往只要有傳單出現，就足以使一切要求或一部分要求得到滿足。總之，經濟方面的（工廠方面的）揭露工作，過去和現在都是經濟鬥爭底重要武器。而且這種揭露工作在必然使工人起來自衛的資本主

*為避免誤會起見，我們要說明一下：在以後的敘述中，所謂經濟鬥爭（按我們所習慣的名詞用法），到處都是指『實際的經濟鬥爭』而言，恩格斯在上面所舉的引證中稱這種鬥爭為『對資本家的反抗』，而各自由國家裏的人們却稱它為職工會的，工團的或工聯會的鬥爭。

義還存在的時候，是始終保持有這種意義的。現時在最先進的歐洲各國也還可看見這樣的情形，就是對於某一偏狹『行業』裏或某一落後家庭工業部門裏種種黑幕的揭露，可以成爲喚起階級覺悟，使職工鬥爭和社會主義運動開始發展起來的起點*。

近來，絕大多數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幾乎是把全副精力耗費在進行揭露工廠情形的工作上面。只要回想起工人思想報，就可知道：人們極端忙於這種工作，竟然忘記這種工作本身其實還不是社會民主黨的工作而只是工聯主義的工作。其實，揭露的工作祇包括某一個職業中的工人對老板的關係，而它所達到的成就不過是使勞動力底賣主學會較爲有利地出賣這種『商品』，學會在純粹商業契約的基礎上來與勞動力底買主鬥爭罷了。這種揭露工作可能（在革命家組織相當利用這種揭露工作的條件下）成爲社會民主黨活動底開端和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並且在崇拜自發性的條件下一定會）產生『純粹職工會的』鬥爭和非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運動。社會民主黨人領導工人階級鬥爭不僅是要爭取出賣勞動力的有利條件，而且是要消滅迫使窮人賣身給富人的那個社會制度。社會民主黨並不是代表工人階級單祇對待某一部分企業主，而是代表工人階級對待現

*我們在本章中所講的只是政治鬥爭，廣義的或狹義的政治鬥爭。所以我們只順便指出工人事業雜誌非難火星報『過分忌避經濟鬥爭』的那種可笑已極的議論（兩次代表大會，第二七頁；馬爾丁諾夫在他所著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階級小冊子中，也再三重復過這種議論）。假使提出這種非難的先生們把一年來火星報上的經濟鬥爭欄篇幅用普特或印張（這是他們所愛用的方法）計算一下，並把它拿來與工人事業雜誌和工人思想報上的經濟鬥爭欄總共的篇幅比較一下，那他們馬上就會看見：他們在這一方面也是落後的。大概，他們正因爲感覺到這種簡單的真情，所以不得已而提出一些顯然表明自覺愧怍的論據。他們寫道：『火星報不管願意與否（！），總只好（！）顧到實際生活底迫切要求，至少（！！）也得刊載一些敘述工人運動情形的通訊』（兩次代表大會，第二七頁）。真是把我們打得體無完膚的論據呵！

社會各個階級，對待國家這一有組織的政治力量。由此可知，社會民主黨人不但不能以經濟鬥爭爲限，而且不能容許把組織經濟揭露工作的事情當作他們的主要活動。我們應當積極從事於政治上教育工人階級的工作，從事於發展其政治意識的工作。現在，當曙光雜誌和火星報向經濟主義作了第一次的攻擊之後，『大家都同意』這點了（雖然我們在下面就會看見，有些人祇是口頭上同意而已）。

試問，政治教育工作究應有怎樣的內容呢？是否能單以宣傳工人階級與專制制度敵對的觀念爲限呢？當然不能。單只解釋工人受政治壓迫的事實還不够（也如單只向工人解釋他們利益與廠主利益相對立的事實還是不够一樣）。必須利用這種壓迫方面的每一具體事實來進行鼓動（正如我們已開始利用經濟壓迫方面的每一具體事實來進行鼓動一樣）。既然這種壓迫是打擊到社會裏各種各樣的階級頭上，既然這種壓迫是表現在各種各樣的生活和活動部門方面，包括職業，一般公民，個人，家庭，宗教，科學及其他等等方面的生活和活動在內，於是我們若不擔負起從各方面對專制制度進行政治揭露的工作，便不能執行我們發展工人政治意識的任務，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麼？爲要利用壓迫方面的具體事實來進行鼓動，豈不是必須把這些事實揭露出來麼（也如進行經濟鼓動時必須把工廠黑幕揭露出來一樣）？

這看起來是很明白的了！但正是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大家』祇是口頭上同意必須從各方面發展政治意識。正是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例如工人事業雜誌就不僅沒有負起進行（或是提倡進行）各方面政治揭露工作的任務，反而把已着手實現這個任務的火星報拉向後退。請聽吧：『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只是』（恰恰不只是）『最發展、最廣泛和最切實的經濟鬥爭形式』（工人事業雜誌綱領上所說的話，見工人事業雜誌，第一期，第三頁）。『現時擺在社會民主黨人面前的任務是要盡量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

（馬爾丁諾夫所說的話，見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第四二頁）。『經濟鬥爭是吸引羣衆參加積極政治鬥爭的最普遍適用的手段』（『聯合會』⁷⁰代表大會決議案和『修正案』上所說的話，見兩次代表大會，第一一頁和第一七頁）。讀者看見，這一切議論，自工人事業雜誌產生時起，直至最近『編輯部底通告』爲止，始終都是貫徹於工人事業雜誌，並且顯然都是表現着對於政治鼓動和政治鬥爭的同一觀點。你們試根據政治鼓動應順從於經濟鼓動這個流行於一切經濟主義者中間的意見來仔細考察這個觀點吧。說經濟鬥爭一般講來 *是吸引羣衆參加政治鬥爭的『最普遍適用的手段』，這是不是正確呢？是全然不正確的。所有一切警察壓迫和專制政府橫蠻政策底表現，也是同樣能『吸引』羣衆的一種『普遍適用的』手段，而並非單祇那些與經濟鬥爭相連的表現才是這種手段。地政官⁷¹肆行橫暴，農民遭受體刑，官吏貪污受賄，警察虐待城市『老百姓』，摧殘飢民，壓制人民求知慾，勒索賦稅，究辦異教徒，虐待兵士，以及侮辱學生和自由派智識份子等等事實，以及千百種諸如此類不與『經濟』鬥爭直接相連的壓迫行動，爲什麼一般講來是較不『普遍適用的』進行政治鼓動和吸收羣衆參加政治鬥爭的手段和緣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苦於（爲了自己或爲自己的親人）沒有政治權利，苦於專橫和強暴壓迫的各種切身事實總和中，職工鬥爭遭受警察壓迫的事實顯然只佔很小一部分。試問爲什麼要預先縮小政治鼓動底範圍，只是把一種手段稱爲『最普遍適用的』手段，而否認社會

*其所以說『一般講來』，是因爲工人事業雜誌上所講的正是全黨底一般原則和一般任務。固然，在實踐中，政治有時真是應當順從於經濟，但是祇有經濟主義者才會在預定應用於全俄各地的決議中說到這點。其實，也有『一開始』就『祇有根據經濟要求』才可能進行政治鼓動的情形，但工人事業雜誌終於已經明白這是『沒有什麼必要』的（兩次代表大會，第一一頁）。我們在下一章中就要證明，『政治派』和革命家底策略不僅不忽略社會民主黨底工聯任務，恰恰相反，祇有它才能保證這種任務徹底實現。

民主黨人同時還應採用其他手段，一般講來同樣『普遍適用的』手段呢？

在已經過去了很久很久的時候（一年以前！），工人事業雜誌曾經寫過：『經過一次罷工，或充其量是經過幾次罷工以後，政府一運用起警察憲兵來的時候，最近的政治要求就會成爲羣衆所能瞭解的要求了』（第七期，第一五頁，一九〇〇年八月）。現在聯合會已把這一機會主義的階段論摒棄而向我們表示讓步，說『根本不必自始就單祇根據經濟要求來進行政治鼓動』（見兩次代表大會，第一一頁）。將來寫俄國社會民主運動歷史的人，只要看看『聯合會』這樣否認它那一部分舊的錯誤見解的事實，就能比根據任何長篇議論都更爲認識得清楚，我們的經濟主義者該是把社會主義糟踏到何等地步了呵！聯合會真是幼稚已極，竟以爲它這樣拋棄其一種縮小政治概念的議論就能喚起我們去贊同其另一種縮小政治概念的議論！其實，若是在這裏也說經濟鬥爭始終必須儘量廣闊地進行，要始終利用經濟鬥爭來進行政治鼓動，但『根本不必』認爲經濟鬥爭是最普遍適用的一種吸收羣衆來參加積極政治鬥爭的手段，那豈不是較爲合乎邏輯麼？

聯合會以爲用『最普遍適用的手段』一語來代替『猶太工人同盟』（崩得）第四次代表大會相當決議上所說的『最好的手段』一語，是有什麼意義的。我們實在很難說這兩個決議中究竟是那一個好些：我們認爲兩種決議都壞。無論『聯合會』或崩得都滑到（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是不自覺地，祇是因受傳統影響而滑到）經濟主義，即工聯主義的政治觀上去了。至於這裏所運用的是『最好的』一語或是『最普遍適用的』一語，實際上是毫無差別的。假使『聯合會』說『根據經濟要求進行的政治鼓動』是最普遍採用着的（而不是『適用的』）手段，那對於我們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發展底一定時期說來，就會正確了，——即是對於經濟主義者，對於一八

九八至一九〇一年代許多（也許是大多數）實際工作者說來，就會正確了，因為這些做實際工作的經濟主義者確實是幾乎僅僅根據經濟要求而採用過（如果說他們一般是採用過！）政治鼓動。我們已經說過，工人思想報和『自力解放社』也是承認並且介紹過這種政治鼓動的哩！工人事業雜誌本應堅決指斥在進行經濟鼓動這件有益事情時把政治鬥爭範圍縮小的有害行爲，但它並不這樣來作，反而把最普遍採用的（經濟主義者所採用的）手段稱爲最普遍適用的手段！無怪乎當我們把這班人稱爲經濟主義者的時候，他們也就只好用什麼『捏造者』，『搗亂派』，『教皇使者』以及『誹謗者』*等罪名來譴責我們；只好向大家哭訴，說人家加予了他們一種灼膚的侮辱；只好用幾乎是賭咒發誓的口吻來聲明說：『現在根本沒有哪一個社會民主黨組織患有經濟主義毛病』**。咳，這班誹謗者，這班兇狠的政治派！經濟主義一語莫不是這班人故意捏造出來，以便專爲發洩其憎惡人類的根性而加予他人一種灼膚的侮辱的麼？

從馬爾丁諾夫口中向社會民主黨提出『必須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的任務，這究竟有什麼具體的切實的意義呢？經濟鬥爭就是工人爲爭得有利條件出賣勞動力，爲改善工人勞動條件及其生活條件而對廠主進行的集體鬥爭。這種鬥爭必然是職業性的鬥爭，因爲各種職業中的勞動條件極不相同，所以爲改善這些條件的鬥爭，也就不能不是按職業標準進行的（西歐的職工會，俄國的臨時職工聯合會和傳單等等）。因此，『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就等於力爭用『立法和行政辦法』（像馬爾丁諾夫在他那篇文章往下一頁，即第四三頁上所說的一樣）來實現這些職業要求，即又是按職業範圍來改善勞動條件。所有一切職工會現在而且

*這是兩次代表大會一書上所用的字眼，見該書三一，三二，二八及三〇等頁。

**見兩次代表大會，第三二頁。

向來都是這樣作法的。你們只要看一看維伯夫婦這兩位淵博的學者（和『淵博的』機會主義者）底著作⁷²，便可知道英國的工會早已就認識並且至今都實現着『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的任務，早已爲罷工自由，爲取消法律上對於合作社運動和職工會運動的一切障礙，爲頒佈保護女工童工的法律，爲頒佈衛生法和工廠法改善勞動條件等等而從事鬥爭了。

由此可見，所謂『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這句漂亮話，聽起來雖是『絕頂』深奧，『絕頂』革命，其實則只是包含有力求把社會民主主義政治降到工聯主義政治的那種傳統傾向！他們表面上是說要糾正火星報底片面性毛病，說火星報『把使教條革命化的事情看得比使生活革命化的事情還高』*，而暗地裏却把爲經濟改良的鬥爭當作一種新的東西來款待我們。其實，『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一語不過是意味着爭取經濟改良而已。如果馬爾丁諾夫自己仔細考察了他所說的那些話底意思，那他自己也是能作出這個並不深奧難懂的結論來的。『我們黨，——馬爾丁諾夫拖出他那尊最重的大砲來反對火星報時說道，——能够而且應當向政府提出具體要求，要它實行種種立法和行政辦法來反對經濟剝削，消除失業現象，消除飢餓等等』（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第四二至四三頁）。具體要求政府實行種種辦法，這難道不正是要求實行社會改良麼？我們現在又要問問沒有偏見的讀者：當工人事業雜誌份子（恕我使用這笨拙的流行名詞！）提出必須爭取經濟改良這個提綱來表明他們與火星報的意見分歧的時候我們稱他們爲暗藏的伯恩施坦主義者，是不是誣蔑了他們呢？

*見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第六〇頁。其實，馬爾丁諾夫只是用另一種方式來幹我們在上面已經描寫過的那種把戲，即將『一步實際運動勝於一打綱領』這一提綱應用於我國運動現今的混亂狀態中來。其實，這祇是把伯恩施坦所說『最終目的算不得什麼，運動就是一切』這一鼎鼎大名的語句轉述出來罷了。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過去和現在都把爭取改良的鬥爭包括於自己的活動範圍內。但他們利用『經濟』鼓動，並不僅是爲了要求政府實行種種辦法，而且是（並且首先是）要求政府停止其爲專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認爲他們應該不僅是要根據經濟鬥爭，而且要根據社會政治生活方面一切現象來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簡言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把爭取改良的局部鬥爭服從於爭取自由和爭取社會主義的整個革命鬥爭。而馬爾丁諾夫却不過是用另外一種形式把階段論復活起來，定要使政治鬥爭按所謂經濟道路發展。他在革命高漲時提出其爭取改良的所謂特殊鬥爭『任務』，就是把黨拉向後退，而助長『經濟派的』和自由派的機會主義。

其次，馬爾丁諾夫羞答答地用『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的漂亮提綱來掩飾爭取改良的鬥爭，而把僅僅是經濟方面的（甚至僅僅是工廠方面的）改良當作一種特別重要的東西提出來。他究竟爲什麼要這樣做，我們不得而知。也許是由於偶然疏忽吧？但是，如果他所指的不只是『工廠方面的』改良，那末我們剛才所引過的他那個提綱就會毫無意思了。也許是由於他以爲政府只是在經濟方面才可能實行和一定會實行『讓步』吧*？果如此，那就是一種很可怪的迷誤，因爲政府在笞刑，護照，贖金，異教，檢查制等等問題立法方面，也可能並且確實作過讓步。『經濟方面的』讓步（或假讓步），在政府看來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事，因爲它希望藉此來博得工人羣衆對它的信任。唯其如此，所以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無論如何也絕對不應使人能於得出一種意見（或發生一種誤會），以爲我們是把經濟改良看得貴重些，以爲我們正是把這種改良當作特別重要的東西看待等等。『這種要求，——馬爾丁諾夫解釋他以上所提出的那些關於立法和行政辦法的具體要求時說道，

*第四三頁上說道：『自然，我們之所以勸工人向政府提出某種經濟要求，是因爲在經濟方面，專制政府由於必要而甘願作某種讓步』。

——不會成爲一種空話，因爲這種要求既能給予一種鮮明結果，便能獲得工人羣衆底積極贊助』……我們並不是經濟主義者呀！我們不過是如伯恩施坦輩，普羅科坡維奇輩，司徒盧威輩以及P.M.等等先生們一樣盲目崇拜那些具體結果底『鮮明性』而已！我們不過是（與拿爾茨基、杜波立洛夫一起）向大家暗示說：所有不能『給予鮮明結果』的東西都是一種『空話』！我們不過是要大家覺得彷彿工人羣衆不能夠（彷彿工人羣衆不是——不管人們怎樣把自己的庸俗氣卸到他們身上——已經證明自己能夠）積極幫助對專制政府的任何反抗，幫助那些甚至絕對不能給予他們任何鮮明結果的反抗！

就拿馬爾丁諾夫本人所援引的那些關於消除失業和消除飢荒的種種『辦法』的例證來說吧。工人事業雜誌致力於——據它自己約許說——擬製確定『能給予鮮明結果的』『具體的（是說製成爲法案麼？）立法行政辦法的要求』，而火星報却『始終重視教條革命化而忽略生活革命化』，極力說明失業現象與全部資本主義制度有分不開的聯系，預告大家說『飢荒已在發生』，抨擊警察『反對飢民的鬥爭』和那些可惡的『臨時苦役條規』；同時曙光雜誌又把論述飢荒問題的一部分『國內時評』印成單行本的鼓動小冊子。可是，這班偏狹得不可救藥的正統主義者，這班對『生活本身』底要求熟識無覩的教條主義者，又是多麼『偏見』啊！他們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沒有——這還了得！——提出任何一個，真是根本沒有提出過任何一個『能給予鮮明結果的』『具體要求』！這班教條主義者該是多麼可憐呵！應該叫他們到克里切夫斯基輩和馬爾丁諾夫輩那裏去領教，藉以認識策略乃是隨着什麼什麼增長而增長的過程，藉以認識必須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

『工人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與政府作經濟鬥爭』!!），除了它的直接革命意義之外，還有一種意義：就是它能使工人經常感觸到他們沒有政治權利這個問題』（馬爾丁諾夫所著一文，第四

四頁)。我們把這段話抄下來，並不是要把上述那些反覆說過千百次了的東西又拿來重復一次，而是祇要來特別感謝馬爾丁諾夫，因為他發明了所謂『工人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這一個新鮮高明的公式。說得何等美妙動人呵！這裏真是用獨到的天才，用極巧妙地抹煞掉各經濟主義者間所有一切局部分歧與色彩差別的辦法，用簡單明瞭的語句來表明了經濟主義底全部實質，——開始是號召工人做『政治鬥爭以擁護共同利益，即是改良全體工人底地位』*，繼而是大談階段論，最後是在代表大會決議上說什麼『最普遍適用的手段』等等。『與政府作經濟鬥爭』也就是幹工聯主義的政治，而工聯主義的政治是尚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相隔十萬八千里的呵。

(乙) 馬爾丁諾夫究竟是怎樣加深了
普列漢諾夫底意見

『近來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出現的羅蒙諾索夫真多呵！』——有一位同志會這樣指出，意思是說許多傾心於經濟主義的人持有一種極奇異的傾向，總想『憑自己的頭腦』發明一些偉大真理（如說經濟鬥爭將使工人碰到無權問題），同時又用天生才子藐視一切的莊嚴態度鄙棄所有先前革命思想和革命運動發展過程已經提供出來的一切。我們的那位馬爾丁諾夫就是這樣一位天生的羅蒙諾索夫。你們只要瞧瞧他所著當前問題一文，就能看出他在怎樣『憑自己的頭腦』領會那早已由阿克雪里羅得說過了的東西（關於阿克雪里羅得這個人底名字，我們的羅蒙諾索夫當然是完全保持緘默的），就能看出例如他已在開始瞭解我們決不能忽視資產階級中某些階層底反政府態度這種道理（見工人事業雜誌第九期，第六一，六二及七一等頁，——參照工人事業雜誌編輯部對阿克雪里羅得的

*工人思想報附刊，第一四頁。

『回答』，見第二二，第二三至二四頁）等等。但也——咳！——不過是在領會到和不過是『在開始』而已，因為他終究還是根本沒有瞭解到阿克雪里羅得底意思，所以他還在說什麼『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在三年之久的時期內（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一年間），工人事業雜誌總是在設法去瞭解阿克雪里羅得底意思，然而——然而終究還是沒有瞭解這種意思！也許這也是由於社會民主黨人『也如人類一樣』始終只是抱定可能實現的任務吧？

但羅蒙諾索夫輩底特色不僅表現在他們對於許多東西不知不識（如果單祇這樣，那還只是個小不幸！），並且還表現在他們不覺悟到自己無知無識。這就未免是種大不幸了，正因為有這種大不幸，所以他們馬上就來實行『加深』普列漢諾夫底意思。

『自從普列漢諾夫寫了這本書（社會主義者在俄國除荒運動中的任務）時起，——羅蒙諾索夫——馬爾丁諾夫敘述道，——已經過去了許多時候了。社會民主黨人在十年中間雖然領導了工人階級底經濟鬥爭，但是他們…還沒能給黨的策略奠定一個廣闊的理論基礎。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成熟了。我們若是願意奠定這樣的理論基礎，當然是應當大大加深普列漢諾夫所闡發過的那些策略原則… 我們現在對於宣傳和鼓動的區別，應當作出一個與普列漢諾夫所作的不同的定義』（馬爾丁諾夫剛才引錄了普列漢諾夫所說『宣傳員給予一個人或幾個人許多觀念，而鼓動員却只給出一種或幾種觀念，但他是把這些觀念給予一大羣人』等語）。『我們認為宣傳就是用革命精神來說明整個現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現——至於在宣傳時所用的口吻是為幾個人或為廣大羣衆所能瞭解，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所謂鼓動，嚴格講來（請注意！），我們却認為是號召羣衆去作某種具體行動，是促進無產階級直接用革命手段干預社會生活』。俄國以及國際社會民主運動獲得了馬爾丁諾夫所發明的這一套

更嚴格更深奧的新名詞，真值得我們慶賀。直到現在，我們（同普列漢諾夫以及國際工人運動底全體領袖們一起）都認為：譬如宣傳員講到失業問題的時候，就應當解釋危機底資本主義本性，指出危機在現社會內必不可免的原因，說明必須把現社會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等等。簡言之，他應當給出『許多觀念』，以至於多到祇有少數人（比較上講）才能一下子盡都領會，通統領會。而鼓動員講到這個問題時，却只舉出全體聽衆所最熟悉和最顯著的例子，譬如某某失業工人家屬餓死，貧困增加等等事實，並極力利用人所共知的這件事實來給予『羣衆』一個觀念，即富者愈富和貧者愈貧的矛盾情形毫不合理的這個觀念，並極力激起羣衆對這種極不公平情形憤恨不滿的心理，而讓宣傳員去作徹底解釋這種矛盾情形的事情。因此，宣傳員底活動主要是刊物上的，鼓動員底活動主要是口頭上的。宣傳員所應具備的品質，是和鼓動員所應具備的品質不同。例如，我們稱考茨基和拉法格為宣傳家，而稱伯伯爾和黑得為鼓動家。想在這裏分出第三部份實際工作，或是第三種實際工作職能，並把『號召羣衆來作某種具體行動』歸入這種職能，那就極不合理了，因為若把『號召』看作單一的動作，那它不是自然和必然從理論著作，宣傳書籍和鼓動演說中得出的實際結論，便是一種純粹執行性質的職能。例如，拿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糧食關稅的鬥爭來說吧。譬如說，理論家在所寫的論關稅政策問題著作中，『號召』羣衆為商業契約，為商業自由而鬥爭；宣傳員在雜誌上也是這樣來作，鼓動員在當衆演說中也是這樣來作。這裏，羣衆底『具體行動』就是共同簽名向國會提出請願書，要求不增加糧食關稅。這些行動口號間接是出自理論家、宣傳員和鼓動員，直接是出自那些把簽名簿分送到各工廠各住房中去的工人。照『馬爾丁諾夫式的名詞』來講，豈不是要把考茨基和伯伯爾兩人都稱為宣傳員，而把分送簽名簿的人稱為鼓動員麼？

說到德國人的例子時，我聯想起了一個德國字：Verballhornung。這個字直譯起來就是『巴爾高式的修正』。依凡、巴爾高是十六世紀來比錫城裏的一個出版家。他出版了一本識字課本，並且照例也印上了一張畫有雄雞的插圖：不過他並不如通常那樣畫出脚上有距的雄雞，却畫了一隻脚上無距的雄雞，近旁又放有兩個雞蛋。課本封面上寫有一行字：『依凡、巴爾高刊行的修正版』。從那時起，德國人講到實際上是把東西改壞了的那種『修正』時，就說這是 Verballhornung。當你看見馬爾丁諾夫輩『加深』普列漢諾夫意思的情形時，你是會不由地想起巴爾高底故事來的…

爲什麼我們的羅蒙諾索夫『發明了』這種糊塗觀念呢？就是要說明：火星報『也如普列漢諾夫在十五年以前那樣，只注意到事情底一方面』（第三九頁）。『火星報至少在現時是因偏重宣傳任務而忽視了鼓動任務』（第五二頁）。假使我們把後面這句話，從馬爾丁諾夫式的語言譯成普通人類的語言（因爲人類還沒有來得及採用這種新發明的名詞哩），那就會是說火星報因偏重政治宣傳和政治鼓動任務而忽視了如下的任務：『向政府提出要它採取種種立法和行政辦法，而能給予相當鮮明結果的具體要求』（即社會改良的要求，假使還可把尙未發展到馬爾丁諾夫那種程度的舊人類底舊名詞使用一次的話）。請讀者把這個提綱與如下一段議論對照對照吧：

『這些綱領』（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底綱領）『還有使我們吃驚的地方，就是他們始終都偏重工人在國會（我國現時所沒有的國會）中活動底長處，而完全忽略（由於他們懷有革命虛無主義態度）工人參加我國現有的工廠主廠務立法會議工作…或至少參加城市自治機關工作的重要意義』…

這一段議論的作者是把羅蒙諾索夫—馬爾丁諾夫憑自己的頭腦所想到的那個思想說得稍微爽直，明確，坦白些。而這位作者就是工人思想報附刊（第一五頁）上的那個 P.M. 哩。

(丙) 政治的揭露和『培養革命積極性』

馬爾丁諾夫提出他那個『提高工人羣衆積極性』的『理論』來反對火星報，實際上就是暴露他極力想降低這種積極性，因為他把一切經濟主義者所崇拜的那種經濟鬥爭稱爲激發這種積極性的特別重要和『最普遍適用的』最優良手段，稱爲表現這種積極性的舞台。這種迷誤之所以特別值得注意，是因爲這遠非馬爾丁諾夫一人特有的本色。其實，『提高工人羣衆底積極性』，祇有在我們不以『根據經濟要求進行的政治鼓動』爲限的條件下，才可達到。而把政治鼓動擴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進行各方面的政治揭露工作。不作這樣的揭露工作，就不能培養羣衆底政治意識和革命積極性。因此，這種工作是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運動底最重要職能之一，因爲就是政治自由也絲毫不會取消這種揭露工作，而只會稍微把這種工作底方向改變一下。例如：德國黨正因爲它毫不鬆懈地努力於政治揭露運動，才特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擴大了自己的影響。當工人還沒有學會反應（並且正是用社會民主黨的觀點，而不是用其他什麼觀點來反應）所有一切而不管是與那一個階級有關的專橫和壓迫，暴力和舞弊事件時，工人階級底意識是不能成爲真正政治意識的。當工人還沒有根據各種具體而且確實迫切的（當前的）政治事實和事變來學會觀察現社會中其他各個階級在其思想道德和政治生活上的一切表現時，當工人還沒有學會用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估計所有各個階級，各個階層集團底活動和生活中所有各方面的表現時，工人羣衆底意識是不能成爲真正階級意識的。誰把工人階級底注意，觀察力和意識完全或主要集中在工人階級本身上，那他就不是社會民主黨人，因爲工人階級底自我認識是與那種不僅在理論上——甚至與其說是在理論上，不如說是根據政治生活經驗——完全明確瞭解現社會所有一切階級相互關係的認識緊相聯系的。所

以，我們的經濟主義者所謂經濟鬥爭是吸引羣衆參加政治運動的最普遍適用手段的宣傳，實際上是極其有害而且極端反動的。工人要想成爲社會民主黨人，就應當明確認識地主和牧師、顯宦和農民、學生和流氓底經濟本性及其社會政治面貌，就應當知道他們的強處和弱點，就應當理解每個階級和每個階層所用以掩飾其私利意向和真正『內臟』的流行辭句與各種詭辯，就應當懂得哪些制度和法律是反映着並怎樣反映着哪些人底利益。這種『明確的認識』，無論從那一本書裏也學不到，而只有具體情景，只有把現在我們周圍發生，大家都談到或是私下談到，表現於某些事變，某些數目字，某些法庭判詞等等的一切情形都就地立刻揭露出來，才能使人獲得這種認識。這種各方面的政治揭露工作，便是培養羣衆革命積極性底必要條件和基本條件。

爲什麼俄國工人對於警察虐待人民，對於迫害異教徒和鞭笞農民，對於檢查機關爲非作惡，對於拷打兵士，摧殘極平常文化事業等等現象，還很少表現出自己革命的積極反對態度呢？是不是因爲『經濟鬥爭』沒有使他『感觸到』這點呢，是不是因爲這點很少能『給予』『鮮明結果』，很少能給予『好處』呢？絕對不是。我們再重復說一遍：這種意見不過是想把自己的過錯加在別人頭上，把自己的庸俗主義思想（即伯恩施坦主義思想）加到工人羣衆頭上罷了。我們應當責備我們自己，責備我們自己還落後於羣衆運動，責備我們還沒能進行極普遍，明顯而迅速揭露這一切惡現象的工作。假使我們已做了這種工作（我們應當而且能夠來做這種工作），那末就連最平凡的工人也會懂得或感覺到：欺壓學生和異教徒，欺壓農夫和作家的，也就是他們自己隨時隨地遭受其蹂躪壓迫的那種黑暗反動勢力。工人自己一感覺到這點，就會願意而且會極端願意來響應，就會能今天辱罵檢查員，明天在鎮壓農民騷動的省長署門前舉行示威運動，後天懲治那些身穿袈裟而對異教徒橫施摧殘的憲兵。我們還很少實行，幾

乎一點也沒有實行把各方面揭露出來的新鮮罪狀傳播到工人羣衆中去。我們中間有許多人甚至還沒有認識自己所應盡的這個責任，却自發地尾隨於那種單以狹隘工廠生活範圍爲限的『日常平凡鬥爭』。在這樣的實際情形下瞎說『火星報有輕視日常平凡鬥爭漸進行程而偏重燦爛完備思想宣傳的傾向』（馬爾丁諾夫語·第六一頁），就等於把黨拉向後退，就等於辯護和讚美我們落後和缺乏素養的情形。

至於說對羣衆行動的號召，那末只要我們進行積極的政治鼓動和生動而鮮明的揭露，就會自然發生這種號召的作用。就地拿住真賊實犯，並且立刻到處當衆加以痛斥——這要比任何『號召』都更有效果，而且往往使得後來無法查明，究竟是誰『號召了』羣衆，究竟是誰提出了某種示威計劃等等。要實行號召，——不是說什麼一般號召，而是說具體號召，——祇能就地來作，並且只有當時親身去參加動作的人，才能辦到。而我們的任務，社會民主黨政論家底任務，却是要加深，擴大和加強政治揭露及政治鼓動。

我們就來講一講『號召』吧。在春天事變以前號召工人對當局判處學生當兵這一完全不能給予工人任何鮮明結果問題實行積極干預的唯一機關報，就是火星報。在一月十一日『派一百八十三個學生去當兵』這個命令一公佈之後，火星報立刻就發表了一篇專論這件事情的文章（二月出版的第二期），而且它在任何示威都還沒有開始以前就已直接號召『工人去幫助學生』，號召『民衆』公開回答政府這種橫蠻挑戰行爲。我們要問問大家：馬爾丁諾夫關於『號召』講得這樣多，甚至把『號召』看作一種特別的活動方式，但他對於我們上面所講的這個號召却一個字都沒有說及，——這件彰明較著的事實又應怎樣來解釋呢？既然如此，那末馬爾丁諾夫罵火星報帶有片面性弊病，說它沒有充分『號召』大家去爭取『能給予鮮明結果』的要求，這難道不是一種充滿庸俗精神的說法麼？

我們的經濟主義者——包括工人事業雜誌在內——之所以受到歡迎，是因為他們迎合落後工人底心理。可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革命的工人（而這種工人數目是與日俱增的），却會忿然排斥所有這些為『能給予鮮明結果』的要求而鬥爭等等的議論，因為他們懂得這不過是主張對一個盧布工資增加一個哥比的那種老調底變相而已。這種工人一定會向工人思想報和工人事業雜誌方面那些建議人說：先生們呵，你們真是白忙一陣，我們自己也應付得了的事情，你們拚命來干預，而你們自己的真正責任，却又懶不執行。你們說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是要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這未免說得太不聰明了，須知這只是一種開端，而社會民主黨人底主要任務並不在此，因為在全世界各國，包括俄國在內，警察往往是自己開始賦予經濟鬥爭以政治性質，而工人自己學會瞭解政府是擁護誰的*。你們當作新大陸來鼓吹的那種『工人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在俄國許多窮鄉僻壤中，都由那些聽見過罷工而幾乎絲毫沒有聽見過社會主義的工人們自己進行着。須知，你們總想以提出一些能給予鮮明結果的具體要求來加以維持的工人『積極性』，我們工人已經具備了，並且我們自己在我們日常的，職業的，細小的工作中，往往是絲毫不需要智識份子幫助而提出這種具體要求。但我

*『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這一要求，最顯明地表明了政治活動方面崇拜自發性的態度。經濟鬥爭獲得政治性質，往往是自發的，即是無須『智識份子這種革命細菌』干預，無須自覺社會民主黨人來參預的。例如，英國工人經濟鬥爭獲得政治性質，就是根本沒有需要過社會主義者參預的。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並不只是要根據經濟要求進行政治鼓動，而是要把這種工聯主義的政治變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鬥爭，利用經濟鬥爭所給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識，來把工人提到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意識的高度。而馬爾丁諾夫輩却不去提高和推進自發產生的政治意識，反而崇拜自發性，嘮嘮叨叨說，令人討厭作嘔地嘮嘮叨叨說，經濟鬥爭使工人『感觸到』他們毫無政治權利的問題。先生們呵，可惜這種自發產生的工聯主義政治意識却没有使你們『感觸到』你們真有社會民主主義任務的問題哩！

們不能以這樣的積極性為滿足；我們並不是一些單靠『經濟主義』政治稀飯所能喂飽的小孩子；我們想知道別人所知道的一切，我們想仔細認識政治生活底各方面，想積極參加所有一切政治事變。但爲了這點，就要智識份子們少講些我們自己也知道的東西*，而多給我們些我們還不知道，並且是我們自己根據自己工廠方面的經驗和『經濟方面的』經驗永遠也不能知道的東西，即政治知識。這種知識是你們智識份子所能獲得的，你們應該比過去更努力千百倍地來把這種智識供給我們，並且你們用以供給我們這種知識的方式，又不要僅以議論，小冊子和文章為限（這些東西，——恕我們說句老實話！——往往是枯燥無味的），而是一定要把目前我國政府和我國統治階級在各個生活部門方面所幹的勾當都具體揭露出來。請你們多多努力來執行你們這一責任，而少講些什麼『提高工人羣衆積極性』的空話吧。我們所有的積極性要比你們所想像的多得多；我們善於用街道上的公開鬥爭來擁護甚至不能給予任何『鮮明結果』

*工人對經濟主義者說的這一番話，決不是我們憑空想出來的，——爲了證實這點，我們且舉出兩個見證人，他們顯然很熟悉工人運動並且絕對不想偏袒我們『教條主義者』的，因爲一個見證人是經濟主義者（他甚至認爲工人事業雜誌是政治的機關刊物哩！），另一個見證人是恐怖主義者。前一見證人在工人事業雜誌第六期上發表了一篇極其真實而生動的文章，標題爲彼得堡的工人運動與社會民主黨底實際任務。他把工人分成三部份：（一）覺悟的革命家，（二）中間階層，（三）其餘的羣衆。中間階層『對於政治生活問題，往往要比對於自己切近的經濟利益更有興趣些，因爲這種經濟利益與一般社會條件的聯系是大家早已明瞭的』…『大家都很厲害地批評』工人思想報說：『你們講來講去，總是這一套，總是人家早已知道，早已讀過的東西』，『而在政治評論欄上又是半點東西也沒有』（第三〇至三一頁）。而且就是第三類工人，『這些較爲敏感、較爲年輕、受酒館和教會腐化影響較淺的工人羣衆，雖然差不多從來沒會有過獲得政治書籍的機會，也在那裏大談政治生活現象，思索學生鬧事的片斷消息等等』。而恐怖主義者則寫道：『把本城以外各地工廠生活中的瑣聞瀏覽一兩遍，便停止不看了…乾燥無味…在工人報上不談國家問題…就等於把工人當作小孩子看待…工人並不是小孩子哩』（自由雜誌，革命社會黨人社出版，第六九頁和第七〇頁）。

的要求！你們不够資格來爲我們『提高』積極性，因爲你們自己恰恰就欠缺積極性哩！先生們呵，少崇拜一點自發性，而多想一點法子來提高你們自己的積極性吧！

（丁）經濟主義與恐怖主義有什麼共同點呢？

在上面的附註中間，我們已把偶然趨於一致的一個經濟主義者和一個非社爲民主黨人恐怖主義者比照了一番。但一般講來，他們彼此間有一種並非偶然而而是必然的內在聯系。關於這種聯系，我們以後還要講到它，並且正是在談到培養革命積極性的問題時也要講到它。經濟主義者與現代恐怖主義者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即崇拜自發性的態度。關於這種態度，我們在前一章裏已經把它當作一般的現象講過，現在就要來考察它對於政治活動和政治鬥爭的影響。驟然看來，我們的斷語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一種人強調『日常平凡鬥爭』，另一種人號召單個人物作舍己犧牲的鬥爭，其間的差別該是多麼巨大呵。但這並不是不近情理的。經濟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各自崇拜自發潮流中的兩個極端：經濟主義者崇拜着自發的『純粹工人運動』，而恐怖主義者崇拜着那些不善於或沒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運動聯成一氣的智識份子自發表示的極熱烈的憤慨。凡是不再相信或從未相信過這種可能的人，除採用恐怖手段之外，確實是難於找到別的方式來表示自己忿激情緒和革命毅力的。由此可見，以上兩種崇拜自發性的態度，都無非是開始實現《Credo》上的著名綱領：讓工人們去『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請《Credo》作者原諒我們用馬爾丁諾夫的語句來表示他的意思吧！我們以爲我們有權這樣來作，因爲在《Credo》上也說到工人在經濟鬥爭中『感觸到政治壓迫制度』），而讓智識份子們獨自去進行政治鬥爭，當然是用恐怖手段去進行這個鬥爭！這是不可不堅持的一個完全合於邏輯和

不可避免的結論，雖然那些開始實現這個綱領的人自己也沒有意識到這一結論底不可避免性。政治活動有自己的邏輯，而不管那些號召採取恐怖手段或號召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的人懷有怎樣善良的意向。地獄是由善念鋪成，而在我們所講的這種情形下，善念也無法担保人們不致自發地滾到『阻力最少的路線』，滾到「Credo」所提出的那種純粹資產階級綱領的路線上去。並且，俄國許多自由派份子，無論公開的自由派份子或戴着馬克思主義假面具的自由派份子，都竭誠同情恐怖手段，極力贊助目前恐怖主義情緒底高漲，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革命社會主義自由社』產生的時候，正是以各方面幫助工人運動爲己任，但同時又把恐怖手段包括於綱領中，並力求『擺脫』社會民主黨方面的『束縛』，——這一事實也就再次三番證實了阿克雪里羅得具有卓越的遠見，他還在一八九七年末就確切預察到了社會民主黨人的動搖所要產生的這種結果（見現時任務和策略問題），並擬定了他那有名的『兩個前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後來發生的一切爭論和意見分歧，都已包含在這兩個前途中，正如植物包含在種子裏一樣*。

從上述觀點看來，便可明白爲什麼工人事業雜誌既沒能避免經濟主義自發性的影響，也沒能避免恐怖主義自發性的影響。這裏把

*馬爾丁諾夫『認爲有更實在的（？）另外兩種前途』（社會民主黨與工人階級，第一九頁）：『或者是社會民主黨負起責任來直接領導無產階級底經濟鬥爭，藉以（！）將其轉變成革命的階級鬥爭』…所謂『藉以』，顯然是藉直接領導經濟鬥爭。馬爾丁諾夫告訴我們吧：什麼地方見過只須領導職業鬥爭就可把工聯主義運動轉變成革命的階級運動呢？他有沒有想到：要達到這種『轉變』，我們就應當積極着手『直接領導』各方面的政治鼓動？…『或者就是另外一種前途：社會民主黨離開領導工人經濟鬥爭的責任，因而…剪去自己的羽翼』…照上面所引證的工人事業雜誌的意思，『離開』領導經濟鬥爭責任的就是火星報。但我們已經看到：火星報對於領導經濟鬥爭一事要比工人事業雜誌所做的多得多，而且它並不以此爲限，並不以此爲藉口來縮小自己的政治任務。

『自由社』所提出來辯護恐怖手段的那種特別論據拿來說說，是很有意思的。它『完全否認』恐怖手段底恐嚇作用（見革命主義之復活，第六四頁），但是它注重這種手段底『激發作用』。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因為這是表明那種驅使他們拘守恐怖手段的傳統思想（社會民主黨以前的思想）崩壞與衰落階段之一。承認現在用恐怖手段不能『嚇倒』政府，因而也就是不能瓦解政府，其實也就是完全排斥恐怖手段這一鬥爭方式，這一由綱領規定的活動範圍。第二，其所以值得注意，更因為這是不瞭解我們在『培養羣衆革命積極性』方面的迫切任務的一種標本。『自由社』把恐怖手段宣傳爲『激發』工人運動的手段，即對工人運動給予『強大推動』的手段。這種論據之自相矛盾，真是再明顯不過的了！難道在俄國生活中，還缺少足以激發人心的可惡現象，因而需要想出一種特殊的『激發』手段來麼？另一方面，誰要是連俄國的暴政也沒有把他激發起來，也不能把他激發起來，那末他對於政府與一小羣恐怖主義者單獨決鬥，也會採取『袖手旁觀』態度，——這難道不很明顯麼？問題就在於工人羣衆是因俄國生活中的種種可惡現象而十分激動起來，但我們却不善於把民衆憤怒情緒底一切水滴和細流收集——假使可以這樣講的話——和集中起來，而這些水滴和細流是被俄國生活壓榨出來，其數量比我們所想像的不知要更大多少倍，且恰巧是我們所應將其匯集成爲一條巨流的。至於這個任務可能實現，則工人運動大規模的增長以及上面已經指出的那種工人渴望政治刊物的情形，都已十分確鑿地證明了。而號召採用恐怖手段，或者號召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却等於託詞推卸俄國革命家所應擔起的最迫切的責任，即組織各方面政治鼓動工作的責任。『自由社』想以恐怖手段來代替鼓動，而公開地承認說：『當羣衆中的積極強大鼓動工作開始時，恐怖手段底激發作用就算完成了』（革命主義之復活，第六八頁）。這也就是表明：無論恐怖主義者或經濟

主義者都不願有春季事變* 的明證而終於輕視羣衆底革命積極性，前者拚命去找人爲的『激發手段』，後者高談所謂『具體要求』。兩者都不充分注意於發展自己在進行政治鼓動和組織政治揭露工作方面的積極性。而這種工作，無論現在或其他任何時候，都是不能拿別的什麼東西來代替的。

(戊) 工人階級是爭取民主制的先進戰士

我們已經說過，進行最廣大的政治鼓動，亦即組織各方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真正社會民主主義活動中絕對必要，比什麼都更迫切必要的任務。但我們做出這個結論，是單從工人階級對於政治知識和政治教育的最迫切需要方面出發的。然而單只這樣提出問題，就未免過於狹隘，就會是忽略一切社會民主黨特別是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底一般民主任務了。爲要盡量具體說明這個原理，我們且從經濟主義者所感覺最『切近的』方面，即從實踐方面來考察問題。關於必須發展工人階級底政治意識這點，是『大家都同意』的。但試問怎樣來做到這點，要怎樣作才能做到這點呢？經濟鬥爭只能使工人『感觸到』政府對工人階級態度的問題，因此我們無論怎樣努力來解決『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的任務，也永遠不能在這個任務範圍內把工人底政治意識發展起來（發展到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意識的程度），因爲這個範圍本來就是很狹隘的。我們之所以認爲馬爾丁諾夫底公式很有價值，並不是因爲它表明馬爾丁諾夫慣於走入迷途，而是因爲它顯然表明出一切經濟主義者底基本錯誤觀點，以爲從所謂工人經濟鬥爭內部，即僅僅（或主要是）從經濟鬥爭出發，僅僅（或主要是）根據經濟鬥爭，便可以發展工人們底階級

*是指一九〇一年春季開始的那些巨大示威而言。（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政治意識。這種意見是根本錯誤的，——而正因為經濟主義者憤恨我們對他們的駁斥，竟不願仔細想一想意見分歧底來源，所以結果就弄得我們簡直是各講各的話，簡直彼此聽不懂。

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範圍外面，從工人對廠主的關係範圍外面來灌輸給工人。只有從各階級及各階層對國家和政府的關係方面，只有從各階級相互關係方面，才可以吸取這種知識。所以我們對於『要怎樣作，才能給工人灌輸政治知識』這個問題，決不能單只給出一般實際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傾向於經濟主義的實際工作者——往往認為滿足的那種回答，即所謂『到工人中去』。社會民主黨人爲要向工人灌輸政治意識，就應當到民間一切階級中去，應當把自己的隊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我們故意選定這樣一個笨拙的說法，故意說得這樣簡易淺鮮，並不是因為我們想說些強詞奪理的話，而是想使經濟主義者好好『感觸到』他們所無理忽略的任務，『感觸到』工聯主義政治和社會民主主義政治之間的區別，即他們所不願瞭解的那種區別。所以，我們請讀者不要着急，而仔細聽我們說到底。

請拿近年來最盛行的那種社會民主黨人小組爲例來考察它的工作吧。這種小組因『與工人有聯系』而心滿意足，只是印發傳單來抨擊工廠黑幕，抨擊政府偏袒資本家和警察橫施壓迫的情形；在會議上與工人進行談話時，通常也是不越出，或幾乎不越出這一類題目的範圍；而關於革命運動史，關於我國政府對內對外政策問題，關於俄國和歐洲底經濟進化問題以及現代社會中各個階級底地位等等問題的報告和談話，是極少舉行的；關於在其他社會階級內有系統地取得和擴大聯絡的問題，是誰也沒有想到的。其實，這種小組組員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像是工聯會的祕書，而不像是社會主義的政治領袖。須知，任何一個工聯會，例如英國工

聯會的祕書，始終都幫助工人進行經濟鬥爭，組織揭露工廠黑幕的工作，說明那些限制罷工自由，限制自由佈置糾察隊員（佈置的目的是在預告大家說該廠工人已經罷起工來了）的法律與辦法不合正義，說明屬於資產階級的那些仲裁人偏袒一方等等。總而言之，每個工聯會的祕書都進行和幫助進行『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因此，我們應當始終堅持說：這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民主黨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不應該是工聯會的祕書而應該是人民的代表，他們要善於反應所有一切專橫與壓迫的行動，而不管這種行動是表現在什麼地方，涉及那一個階級或那一個階層；他們要善於把這一切表現都綜合為一幅警察強暴和資本主義剝削的情景；他們要善於利用一切瑣屑小事來向大家說明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義要求，向大家解釋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底全世界歷史意義。試把羅伯·拿依特（他是英國一個最強大工聯會，即製鍋工人聯合會底著名祕書和領袖）和威廉·李卜克內西這樣兩位活動家拿來比較一下，試將馬爾丁諾夫用來形容自己與火星報的意見分歧的那些對照詞句應用到他們身上去。你們就會看到（我開始來摘錄馬爾丁諾夫底文章）：拿依特多半『號召羣衆去作某種具體行動』（第三九頁），而李卜克內西則多半是從事於『用革命精神來說明整個現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現』（第三八至三九頁）；拿依特『規定了無產階級底切近要求而且指出了實現這種要求的手段』（第四一頁），而李卜克內西雖也作了這點，但並沒有拒絕『同時領導各反政府階層底積極行動』，『替他們指出積極的行動綱領』*（第四一頁）；拿依特正是努力於『盡量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第四二頁），而且極善於『向政府提出能給予鮮明結果的具體要求』（第四三頁），而李卜克內西則多注意於『片面的』『揭露』（第四〇

*例如李卜克內西在普法戰爭時提出了整個民主派底行動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對於此事作得更多。

頁)；拿依特多半是注重『日常平凡鬥爭漸進行程』(第六一頁)；而李卜克內西則多注意於『燦爛完備思想宣傳』(第六一頁)；李卜克內西把自己所指導的報紙變成了『革命反對派底機關報，它揭露現存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為政治制度是與各種人民階層底利益相抵觸的』(第六三頁)；而拿依特則『與無產階級鬥爭發生密切有機聯繫來為工人事業努力』(第六三頁)，——如果所謂發生『密切有機聯繫』，就是我們上面已在克里切夫斯基和馬爾丁諾夫那裏看見過的那種崇拜自發性的態度的話，——並『縮小了自己影響底範圍』，同時當然是和馬爾丁諾夫一樣，相信他『因而就使這種影響複雜化了』(第六三頁)。總之，你們就會看到，馬爾丁諾夫 de facto* 是把社會民主運動降到了工聯主義運動地步，雖則他這樣作當然不是因為他不想使社會民主黨得到益處，而只是因為他沒有設法去瞭解普列漢諾夫底意思，却太急於去加深普列漢諾夫底意思。

讓我們言歸正傳吧。我們上面已經講過，社會民主黨人若不只是口頭上主張必須從各方面發展無產階級底政治意識，就應當『到民間一切階級中去』。由此就發生幾個問題：要怎樣才能做到這點呢？我們有沒有力量做到這點呢？有沒有在其他各階級中進行這種工作的機會呢？這是不是放棄或趨向於放棄階級觀點麼？我們且來講講這些問題。

我們應當是既以理論家資格，又以宣傳員資格，又以鼓動員資格，又以組織者資格『到民間各階級中去』。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工作是要用來研究各個階級所處社會政治地位底一切特點，這是誰也不會懷疑的。但在這一方面的工作還做得很少很少，而與用去研究工廠生活特點的工作相比是未免太不相稱了。各委員會和小組中

*意即『其實』。——譯者。

有些人甚至埋頭於專門考察某種製鉄部門情形的工作，但是在參加這些組織的（往往是因爲某種關係而不得不脫離實際工作的）人們中間，對於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某種迫切而使社會民主黨人能乘機到其他人民階層中去進行工作的問題的材料，却又幾乎沒有一個人去加以專門的研究。當我們說到現今大多數工人運動領袖缺少素養時，我們也不能不提到這方面的素養問題，因爲這也是同『與無產階級鬥爭發生密切有機聯繫』的『經濟主義』見解相連的。但主要的任務當然是要在各個人民階層中間進行宣傳鼓動。西歐社會民主黨人易於執行這種任務，因爲那裏有凡是願意的人都可參加的各種羣衆集會，有社會民主黨人可以利用來在各階級底議員面前講話的國會。我國既沒有什麼國會，又沒有什麼集會自由，——但我們還是善於把那些願意聽社會民主黨人說話的工人召集來開會。我們還是應善於把各階級中間凡是願意聽民主主義者說話的人都召集來開會。因爲誰在實際上忘記『共產黨人應贊助一切革命運動』，忘記我們因此也就應該向全體民衆說明和強調一般民主任務，當然一分鐘也不隱瞞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誰忘記這一點，那他就不是社會民主黨人。誰在實際上忘記社會民主黨人在提出，加劇和解決任何一般民主問題時應該走在大家前面這一點，那他就不是社會民主黨人。

不耐煩的讀者插嘴道：『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啊！』，而『聯合會』最近一次代表大會⁷³所通過的對於工人事業雜誌編輯部的新訓令，也就直接說到，『凡社會政治生活中所有直接涉及無產階級這一特別階級地位，或涉及無產階級這一爲一切爭自由的革命勢力先鋒隊地位的現象和事變，都應利用爲進行政治宣傳和政治鼓動的緣由』（兩次代表大會，第一七頁；着重點是我們加的）。是的，這些話是說得很正確而且說得很好的；假使工人事業雜誌懂得它這些話底意思，假使它不是在說這些話時又說過一些與此相矛盾

的話，那我們是會很滿意的。要知道，單祇以『先鋒隊』自稱，單祇以先進部隊自稱還不够，——還要幹得使其餘一切部隊都能看出並且不能不承認我們確實是在前頭行進着。於是我們就要問問讀者：難道其餘各『部隊』中的人物竟是如此愚蠢，居然會單憑我們空口說白話就相信我們是『先鋒隊』麼？試想像這樣一種具體情景吧。假定有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忽然跑到俄國有學問的急進派或自由主義立憲派的『隊伍』中去說道：我們是先鋒隊呀；『現時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要儘量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那末一個多少聰明的急進派份子或立憲黨人（在俄國急進派份子和立憲黨人中間有很多聰明人）聽了這話，就只會微微一笑地說道（當然是心理暗想道，因為他往往是胸有成竹的外交家）：『咳，你這個『先鋒隊』真優透了！你甚至不瞭解，賦予工人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乃是我們的任務，乃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先進份子底任務。我們也如西歐各國資產者一樣想把工人捲入政治哩，不過我們正是要把工人捲入工聯主義的政治，而決不是捲入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工人階級底工聯主義政治也就是工人階級底資產階級政治。而這個『先鋒隊』對於工人階級任務的說法也就是工聯主義政治的說法！因此，聽憑他們去隨便自稱為社會民主黨人吧。我又不是個小孩子，決不會爲了招牌問題爭鬧起來的！只要他們不受那班可惡的正統教條派所誘惑，只要他們給那些不自覺地把社會民主黨拖到工聯主義軌道上去的人們留下『批評自由』就是了！』。

當我們的這位立憲黨人一旦知道，那些空談社會民主黨先鋒隊的社會民主黨人在我們運動幾乎完全由自發性獨佔統治的今天竟是極其害怕『過份忽視自發成分』，極其害怕『輕視平凡日常鬥爭漸進行程而偏重燦爛完備思想宣傳的傾向』等等的時候，於是這位立憲黨人底微笑就會轉爲哈哈大笑了！一個『先鋒』隊居然害怕覺悟性超過自發性，居然害怕提出一個使思想不同的人們也只得齊聲表

示尊敬的『大退計劃』來！咳，他們莫不是把先鋒隊一語與後衛隊一語混淆起來了麼？

例如，請你們思索馬爾丁諾夫所說的如下一段議論吧。他在第四〇頁上說，火星報底揭露策略是片面的，『不管我們怎樣散佈不信任和仇恨政府的種子，但我們若不能發展充分積極的社會力量來推翻它，便不能達到目的』。我們順便說一說，這又是關心於提高羣衆積極性而降低自己積極性的那套老生常談哩。但現在問題並不在此。馬爾丁諾夫這裏當然是指革命力量（即『實行推翻』政府的力量）而言。但他所得出的結論又是怎樣呢？既然在平常的時候，各社會階層一定是各走各的路，『所以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當然不能同時領導各種反政府階層底積極行動，不能給他們指示出具體行動綱領，不能替他們指明應用那種方法來經常爲本身利益而鬥爭…自由主義階層自己會設法進行擁護自己迫切利益的積極鬥爭，而這種鬥爭就會使他們直接感觸到我國政治壓迫制度』（第四一頁）。由此可見，馬爾丁諾夫開始是說革命力量，說進行積極鬥爭來推翻專制制度，但他馬上就偏向於說什麼職工的力量，說什麼擁護迫切利益的積極鬥爭！我們當然不能領導學生、自由派及其他各種份子爲其『迫切利益』而鬥爭，但可敬的經濟主義者啊，我們所說的並不是這個問題哩！我們所說的是各種社會階層可能參加而且必然參加推翻專制制度的問題；我們不僅可以領導『各種反政府階層底這種積極行動』，並且絕對應當領導它，如果我們想做『先鋒隊』的話。至於使我國學生，我國自由派及其他各種份子『直接感觸到我國政治壓迫制度』，那末不僅他們自己會設法作到這點，並且警察和專制政府官僚自己首先就會特別努力設法作到這點的。但『我們』——如果我們想做先進民主主義者的話——應當設法使那些只對大學現狀，或只對地方自治局現狀⁷⁴等等表示不滿的人們感觸到全部政治制度惡劣不堪。我們應當負責組織這種在我們黨領導

下進行的全面政治鬥爭，使得所有一切反政府階層都能够貢獻，並且確實爲這個鬥爭和這個黨貢獻力所能及的幫助。我們應當把社會民主黨的實際工作者培養成爲政治領袖，使他們善於領導這種各方面鬥爭底一切表現，善於在必要時向憤激的學生，不滿意的地方自治派，忿忿不平的異教徒和受辱的國民教員以及其他種種份子，『指示出積極行動綱領』。所以馬爾丁諾夫所說『對於這些人，我們只能盡一種揭露現存制度的消極作用……我們只能打破他們對於各種政府專門委員會的種種希望』等語（着重點是我們加的），是完全不正確的。馬爾丁諾夫這樣說，便是證明他全不懂得革命『先鋒隊』底真正作用。讀者注意到這點，就會懂得馬爾丁諾夫所說的如下一段結語底真實意思：『火星報是革命反對派底機關報，它揭露我國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爲政治制度是與各種人民階層底利益相抵觸的。而我們現在和將來都要與無產階級鬥爭發生密切有機聯繫來爲工人事業努力。我們縮小自己影響底範圍，因而就使這種影響複雜化了』（第六三頁）。這個結論底真正意思是說：火星報想把工人階級底工聯主義政治（即我們的實際工作者由於誤解以及缺乏素養，或是由於信念而往往以此爲限的政治）提高到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地步，而工人事業雜誌則想把社會民主主義政治降低到工聯主義政治地步。並且它還硬向大家說，這是『在共同事業上完全可以相容的兩種立場』（第六三頁）。O, sancta simplicitas!*

再講下去吧。我們有沒有力量來把自己的宣傳鼓動推廣到民間一切階級中去呢？當然是有的。我們的經濟主義者常想否認這點而忽略了我們的運動從一八九四年（大約說來）至一九〇一年所達到的長足進步。他們是十足的『尾巴主義者』，往往還保持着運動剛才開始的那個早已過去的時期的觀念。當時我們的力量確實是非常之

*何等純潔的天真啊！——譯者。

少，當時決意專在工人中間工作而嚴厲斥責離開這項工作的一切企圖原是很自然而且正當的；當時全部任務都是要在工人階級中間鞏固起來。現在已有極廣大的力量捲入運動，智識階級中的一切優秀青年份子都趨向於我們方面來了，在外省各地都有許多參加過運動或願意參加運動而不得不留在那裏的人，有許多傾心於社會民主黨的人（而在一八九四年，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還是屈指可數）。我們運動中政治上組織上的基本缺點之一，就是我們還不會運用這一切力量，還不會給予大家適當的工作（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一章內要詳細說到）。這些力量極大多數都完全沒有機會『到工人中去』，所以根本就談不到什麼能使力量離開我們基本事業的危險。但是要為工人供給真正的，各方面的和生動的政治知識，就須使到處各地，在一切社會階層中，在各種陣地上，都有『自家的人』，即社會民主黨人，以便探知我國全部國家機構底內幕。這樣的人不僅在宣傳鼓動方面，而且尤其在組織方面是需要的。

有沒有在民間一切階級中進行工作的機會呢？誰看不見這點，那他就是在表明他自己的覺悟程度又落後於羣衆自發高潮。工人運動已經引起，並且現時還在引起一部份人對政府發生不滿，另一部份人希望反政府態度會得到援助，第三部份人感覺到專制制度不能存在和必遭破產。如果我們不瞭解我們自己的任務是要利用所有一切憤慨表現，是要收集和發展所有一切甚至尚屬微弱的抗議表示，那我們就會只是口頭上的『政治家』和口頭上的社會民主黨人（實際上常常有這種情形）。更不待說，所有千百萬勞動農民、家庭手工業者和小手工業者等等羣衆，始終都是極願來聽任何一個多少善於鼓動的社會民主黨人講演。可是，試問民間哪一個階級裏沒有一些不滿意於無權地位和當局專橫，因而易於接受代表一般最迫切民主要求的社會民主黨人宣傳的份子，集團和小組呢？誰想具體認識社會民主黨人在民間一切階級和階層中進行的這種政治鼓動，我們

就向他指明說，廣義的政治揭露便是這種鼓動底主要（而當然不是唯一的）手段。

『我們應當，——我在從何着手？一文（火星報第四期，一九〇一年五月）寫過（關於這篇論文，我們以後要詳細說到），——在民間一切稍有覺悟的階層中間激起從事政治揭露的熱情。決不要因現在政治揭露的呼聲尚嫌脆弱，尚嫌稀少，尚嫌微小而心慌意亂。其所以尚嫌脆弱等等，並不是因為大家都容忍警察專橫，而是因為那些能夠並且願意從事揭露的人還沒有一個說話的講壇，還沒有熱心聽講演人說話並鼓舞講演人精神的聽衆；他們在民衆中間還完全看不見值得向之控訴『萬能』俄國政府的那種力量… 現在我們已經能夠並且應該建立一個向全體民衆揭露沙皇政府的講壇，而社會民主黨的報紙也就應當成爲這樣的講壇』。

工人階級就是愛聽政治揭露言論的最好的聽衆，因為工人首先需要並且最爲需要各方面的具體政治知識，因為工人最能把這種知識變成積極鬥爭，那怕這種鬥爭不能給予任何『鮮明結果』。而能成爲全民揭露講壇的却又祇有全俄的報紙。『沒有政治機關報，在現代歐洲便不能有配稱爲政治運動的運動』，而俄國在這一點上無疑也是歸入現代歐洲的。刊物在我國早已成了強大的力量，否則政府就不會拿成千累萬的盧布來收買它，來資助加特可夫和米徹爾斯基一流的人了。祕密的刊物衝破檢查局的障礙，逼使那些合法的和保守派的機關報來公開說到它，——這在專制的俄國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事。在七十年代，甚至在五十年代已有過這樣的事情。但在現時，願讀祕密刊物，願意從這種刊物中間學習——用一位工人致火星報（第七期）的那封信上所說的話來說——『怎樣生活和怎樣死去』的民衆，要比過去不知深廣多少倍。正如經濟揭露是向廠主宣戰一樣，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戰。這種揭露運動愈廣闊強大，

爲了開始戰爭而宣戰的那個社會階級人數愈多且愈堅決，則這種宣戰舉動所發生的精神上的作用也愈大。因此，政治揭露工作本身就是瓦解敵人制度的一種強有力的手段，是使敵人所有那些偶然或暫時的同盟者離開出去的一種手段，是挑激那些經常參加專制政權的份子互相仇恨和互相猜忌起來的一種手段。

現時只有組織真正全民揭露工作的黨，才能成爲革命勢力底先鋒隊。『全民』一語含有很豐富的內容。絕大多數由非工人階級出身的揭露者（而爲要做先鋒隊，正應吸引別的階級），都是些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靜的求實人物。他們很知道：甚至『控告』下級官吏都不免有危險，更不要說『控告』『萬能』俄國政府了。但他們只有看到向我們控告真能發生作用，看到我們真是一種政治力量的時候，才會來向我們控告。我們要想在旁人眼裏顯現爲這樣一種力量，就要非常堅忍努力地來提高我們自己的覺悟性，首創精神和毅力；但要做到這點，單只在後衛隊底理論和實踐上掛起一塊『先鋒隊』招牌是不夠的。

既然我們應當負責組織攻擊政府的真正全民揭露工作，那末我們運動底階級性質又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那位狂熱崇拜『與無產階級鬥爭發生密切有機聯繫』的人一定會這樣質問我們，並且已在這樣質問我們了。我們回答道：我們運動底階級性質是表現於這種全民揭露工作恰恰由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來組織，是表現於進行鼓動時所提出的一切問題始終都要本着社會民主黨精神來加以說明而決不對一切有意或無意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企圖表示寬容，是表現於負責進行這種各方面政治鼓動的黨將把如下各種事情集成爲一個分不開的整體：代表全民攻擊政府；用革命精神教育無產階級，同時保護無產階級底政治獨立性；既領導工人階級底經濟鬥爭，又利用工人階級和剝削者之間自發產生的那些能把一批一批無產階級羣衆激起並吸引到我們營壘中來的衝突！

經濟主義者底最明顯特點之一就在於他們不瞭解無產階級底最迫切要求（從政治鼓動和政治揭露中獲得各方面的政治教育）與一般民主運動底要求彼此這樣緊相聯繫，甚至互相符合。而他們的這種不瞭解又不僅是表現於『馬爾丁諾夫式的』辭句，並且還表現於意思與這些辭句相同的援引所謂階級觀點的論調。例如，請看火星報第十二期上發表的那封『經濟主義者』來信* 底作者們論到這點時所說的話吧：『火星報底這個主要缺點（即誇大思想體系作用的觀點），同時也就是它在社會民主黨對於各個社會階級和派別的態度問題上的觀點不徹底的原因。它根據理論的計較…』（而不是根據『與黨發展過程並行的黨任務發展過程…』），『來處決立刻轉而進行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的任務，但因為它大概也感覺到這個任務在現今實際情形下對於工人十分困難…』（不僅感覺到，而且很清楚知道：工人覺得這個任務並不如那些關心小孩子的『經濟主義』智識份子們所想像的那樣困難，因為工人甚至決意來為那些——用大名鼎鼎的馬爾丁諾夫底話來說——並不能給予什麼『鮮明結果的』要求而鬥爭）… 『同時又因為火星報沒有耐性等待工人繼續積蓄力量來做這種鬥爭，於是它就開始去找自由派和智識階層中間的同盟者…』。

是的，我們真是已經沒有任何『耐性』『等待』一切『調和者』老早答應賜給我們的那個幸福時候，即我們的經濟主義者停止把自己的落後性卸到工人身上，停止用什麼工人力量不足的話來辯護自己缺乏力量的時候到來了。我們要問問我們的經濟主義者：

*因為篇幅有限，我們曾不能在火星報上對這封最足代表經濟主義者觀點的信作一個詳盡的回答。這封信的出現使我們非常快樂，因為我們早已從各方面聽見過責備火星報不一貫遵行階級觀點的流言，而我們當時正要等到一個良好的機會或這種流行責備的確定說法出現時來加以答覆。但在回答攻擊的時候，我們所慣用的方法却不是防衛，而是反攻。

『工人積蓄力量來做這種鬥爭』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豈不明明是要在政治上教育工人，要在他們面前把我國萬惡專制制度所有各方面揭露無餘麼？正是爲了這點，我們就需要有『自由派和智識階層中間的同盟者』，需要這些決意同我們一塊去揭露當局方面對地方自治派、小學教員、統計員和學生等等所舉行的那種政治進攻的同盟者，這難道還不明顯麼？難道這真是很難瞭解的一種非常『巧妙的祕密』麼？難道阿克雪里羅得不是從一八九七年起就已向你們反覆說明：『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非無產階級中間奪取信徒以及直接或間接同盟者這個任務，首先而且主要是取決於在無產階級隊伍本身中間宣傳工作底性質』麼？而馬爾丁諾夫及其他經濟主義者畢竟認爲起初工人應常用『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的方法去積蓄力量（來實行工聯主義的政治），然後才『過渡到』，——大概是從工聯主義的『培養積極性』『過渡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積極性！

『…火星報在尋找同盟者的時候，——經濟主義者繼續說道，——往往離開階級觀點，抹煞階級矛盾，把大家都對政府心懷不滿的共同點放在第一位，雖然這種不滿底原因與程度在各種『同盟者』方面是極不一致的。例如火星報對地方自治派的態度就是如此』…彷彿火星報『對那些不滿意於政府小惠的貴族答應由工人階級予以援助，同時一個字也沒有提到這些人民階層間的階級矛盾』。讀者只要看一看（在火星報第二第四兩期上）標題爲專制制度與地方自治運動的兩篇文章（該信作者們所說的想必就是這兩篇文章），就可看到：這些文章*所談論的是政府對『等級官僚地方自治派所進行的那種溫和鼓動』，對『甚至有產階級所表現出來的那種自

*在這兩篇文章之間（在火星報第三期上）還登載有一篇專論我國鄉村階級對抗的文章。

動性』所持的態度。在文章中說工人對於政府反對地方自治運動的鬥爭決不能採取觀望態度，同時要號召地方自治派拋棄溫和的言詞而在革命社會民主黨用全力反對政府的時候作出強硬激烈的表示。該信作者們所不同意的究竟是什麼呢？——我們不得而知。他們是不是以為工人『會不懂得』『有產階級』和『等級官僚地方自治派』這些字眼呢？是不是以為推動地方自治派拋棄溫和的言詞而去作激烈的表示，就是『誇大思想體系作用』呢？他們是不是以為工人即使不知道專制政府對地方自治派所持的態度怎樣，也能『積蓄力量』去與專制政府鬥爭呢？所有這些都是我們還不知道的。我們知道的只有一點：就是該信作者們對於社會民主黨政治任務的見解是很模糊的。這點從他們所說的下面一句話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得出來：『火星報對學生運動的態度也是如此』（即是說，也是『蒙蔽階級對抗性』）。照他們的意見，我們大概不應當號召工人用示威手段來當衆指明那實施暴力、橫行暴戾的真正罪人不是學生，而是俄國政府（火星報第二期），——倒應當刊載工人思想報式的議論哩！這種意見竟是社會民主黨人在一九〇一年秋天，在二三兩月事變之後，在新的學生運動高潮前夜發表的，而這個學生運動高潮表明這一方面發生的反專制制度的『自發』運動，也超過了社會民主黨對於運動的自覺領導哩。工人援助那些慘遭軍警毒打的學生的自發趨向，超過了社會民主黨組織底自覺活動！

『在別的文章裏，——該信作者們繼續說道，——火星報却又嚴厲責備任何妥協，而擁護——舉例來說——黑得派底激烈行爲』。我們勸那些評論現代社會民主黨隊伍中意見分歧時通常都極端自信而輕浮地妄說這些意見分歧並不重要，並不能成爲分裂理由的人們來仔細想一想這幾句話底意思吧。試問：既然有一種人說我們在說明專制制度對於各階級的敵對性這方面，在使工人認識各種社會階層對專制制度所持的反對態度這方面，工作還做得非常之少；另外

有一種人則以爲做這個工作就是『妥協』，大概是同『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這種理論妥協，——試問這兩種人能否共同在一個組織內順利進行工作呢？

我們論到農民解放⁷⁵四十週年時曾說必須把階級鬥爭灌輸到鄉村中去（火星報第三期）；我們論到維特秘密奏摺的時候會說自治制度和專制制度根本不能相容（第四期）；我們論到新頒佈的法律的時候攻擊了地主以及替地主服務的政府所施行的農奴制政策（第八期），而歡迎了秘密舉行的地方自治派代表大會，鼓勵了地方自治派拋棄卑屈請願運動而去進行鬥爭（第八期）；我們鼓勵了那些已開始瞭解必須進行政治鬥爭並已轉而進行政治鬥爭的學生（第三期），同時又指斥了主張『純粹學生』運動而勸學生不要參加遊行示威的那些人所表現的一種『極不善於瞭解』的態度（第三期，論二月二十五日莫斯科學生總會宣言一文）；我們揭露了俄羅斯報中那些自由派狡猾份子底『無謂夢想』與『虛偽騙人手段』（第五期），同時又指出了政府刑訊室『對和平作家，老教授和學者，以及著名自由主義地方自治派橫施摧殘』的狂暴行爲（第五期，警察高壓文藝一文）；我們揭穿了『政府負責改良工人生活』這一綱領底真正意義而歡迎了所謂『與其等待從下面提出要求改革，不如從上面實行改革來預防這種要求』的『寶貴的自供』（第六期）；我們鼓勵了表示反抗的統計員（第七期）而斥責了甘作工賊的統計員（第九期）。誰把這個策略看作是蒙蔽無產階級底階級意識，看作是同自由派妥協，那他就是暴露自己完全不懂《Credo》綱領底真實意義，並且事實上正是實行這個綱領，而不管他怎樣表示拒絕這個綱領！因爲他這樣就是把社會民主黨拉到『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的道路上去，屈服於自由派，而放棄了積極干預每個『自由主義』問題和規定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社會民主主義態度的任務。

(己) 又是『誹謗者』，又是『捏造者』

讀者記得，這兩個客氣字眼，是工人事業雜誌聽見我們責備它『間接準備基礎使工人運動變為資產階級民主派工具』時用來回敬我們的。工人事業雜誌社中的人由於頭腦簡單，竟認為這個責備不過是論戰中的一種謾罵手段，以為那班惡意的教條主義者打算用一切難堪的話來罵他們；的確，還有什麼比做資產階級民主派工具更難堪的呢？於是他們就用頭號字來刊登『闢謠』聲明，說這是『毫無掩飾的誹謗』（兩次代表大會，第三〇頁），『捏造』（第三一頁），『耍把戲』（第三三頁）。工人事業雜誌也像雷神一樣（雖然它本身很少像雷神），它之所以生氣，正因為它自己不對；它的急躁的謾罵，恰巧是證明它自己不善於思索對方底意思。其實，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瞭解，為什麼任何一種崇拜羣衆運動自發性的行爲，任何一種想把社會民主主義政治降低為工聯主義政治的企圖，都是準備基礎使工人運動變為資產階級民主派底工具。自發的工人運動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聯主義，而工人階級底工聯主義政治也就是工人階級底資產階級政治。工人階級參加政治鬥爭，甚至參加政治革命，也還是絲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為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哩。工人事業雜誌是否會想來否認這點呢？究竟它是否會想要向大家公開爽直說出自己對於國際以及俄國社會民主運動迫切問題的見解呢？——咳，不會有的事，它絕對不會想這樣作，因為它堅決地遵行着一種可說『一味抵賴』的辦法，說什麼一切都與我們無干，說什麼我們並不是經濟主義者，工人思想報並不是經濟主義，俄國根本就沒有什麼經濟主義。這真是很圓滑和很『外交的』手段，不過它有一點不便的地方，就是凡採取這種手段的機關報通常都被罵作『順風氣』呵。

在工人事業雜誌看來，資產階級民主派在俄國根本就是一種『幻景』（兩次代表大會，第三二頁）*。真是紅運亨通的人！他們好像鴛鴦一樣，把頭縮在翅膀裏，以為周圍所有的東西就消滅了。有許多自由派政論家，他們每月向大家唱一次凱歌，說馬克思主義衰落了，甚至消滅了；有許多自由派報紙（如聖彼得堡新聞，俄羅斯新聞及其他許多報紙），它們鼓勵那些把布連坦諾式的⁷⁸階級鬥爭觀和工聯主義的政治觀傳授給工人的自由派份子；有許多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專家，他們的真實傾向已由《Credo》表現得非常明顯，他們的文藝貨物獨可通行無阻，暢銷於全俄各地；非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派別活躍起來，尤其是在二三兩月事變之後，——所有這些大概都是一種幻景哩！所有這些都是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毫不相干的哩！

工人事業雜誌以及發表於火星報第十二期上的那封經濟主義來信底作者們應當『想一想，為什麼春季事變不是使社會民主黨底威信和影響提高起來，反而使非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派別這樣活躍起來呢？』——原來是因為我們沒有勝任得了自己的使命，因為工人羣衆底積極性超過了我們的積極性，因為我們沒有充分諳練的革命領導者和組織者，即熟悉各反政府階層情緒，善於領導運動，把自發示威變成政治示威，使示威運動底政治性質加強起來等等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於是，我們的落後性也就必然會被那些比較活動和比較積極的非社會民主主義革命者所利用，而工人則無論怎樣奮勇，怎樣努力與軍警肉搏，無論他們的行動怎樣革命，終究只會成為幫

*這裏他們又以『俄國具體條件必然推動工人運動走上革命道路』為論據。他們不願意瞭解：工人運動底革命道路也還可能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哩！整個西歐資產階級在君主專制時代都是『推動』過，都是自覺地推動過工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却不能以此為滿足。所以，我們只要稍微把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降低為自發的工聯主義的政治，也都是恰巧幫助資產階級民主派。

助這些革命者的力量，成爲資產階級民主派底後衛隊，而不會成爲社會民主主義的先鋒隊。且拿我們的經濟主義者只想仿效其弱點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來說吧。爲什麼德國每次政治事變都一定使社會民主黨底威望和信用更加增高呢？就是因爲社會民主黨比任何人都更積極地用最革命的態度來估計這種事變，都更積極地擁護一切反對專橫暴政的運動。它並不以說什麼經濟鬥爭定會推動工人感觸到他們全無權利問題，說什麼具體條件必然推動工人運動走上革命道路的議論來妄自安慰。它干預社會政治生活底一切部門和一切問題，例如德皇威廉不批准資產階級進步黨人當市長的問題（可見，我們的經濟主義者還沒有來得及開導德國人，說這其實就是與自由派妥協哩！），頒佈法令禁止『不道德的』圖書的問題，政府干預大學教授入選問題以及其他等等。他們在在都比大家先進，激發各個階級中間的政治不滿情緒，喚醒睡夢沉沉的人，振奮落後份子，供給各種材料來發展無產階級底政治意識與政治積極性。結果，甚至那些自覺的社會主義敵人也不得不對這個先進政治戰士發生敬畏之心；所以不僅是資產界方面的重要文件，甚至官僚和朝廷方面的重要文件，也不知是怎樣往往落到前進報編輯室裏來。

這就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矛盾』情形所由發生的底蘊，工人事業雜誌根本不能領會這種『矛盾』，所以它只好束手叫苦，大喊大叫，說有人在那裏『玩把戲』！試想像看：我們工人事業雜誌最爲重視的是羣衆工人運動（並且我們用大號字刊載這點！），我們警告大家不要忽視自發成分底意義，我們再三聲明說我們想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我們想保持我們與無產階級鬥爭間的密切有機聯系！可是有些人却責備我們，說我們是在準備基礎來使工人運動變爲資產階級民主派底工具。究竟是誰在那裏責備我們呢？原來就是那些實行去與自由派『妥協通融』，干預每一『自由主義』問題（這該是多麼不瞭解『同無產階級鬥爭發生有機聯系』啊！），

對於大學生和甚至（這還了得！）對於地方自治派也深加注意的人！原來就是那些一般想要多（與經濟派相較）花一分力量到各個非無產者階級的民衆中間去進行工作的人！難道這還不是『耍把戲』麼？

倒霉的工人事業雜誌！它是不是有個時候也會猜想出這種巧妙事情底底蘊呢？

（四）經濟派底手工業方式與革命家底組織

我們上面已把工人事業雜誌說經濟鬥爭是政治鼓動最普遍適用的手段，說我們目前的任務是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等等的斷語，都一一分析過了。這些斷語就是表明不僅對於我們的政治任務，而且對於我們的組織任務也持着狹隘的見解。爲了『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當然是全不需要有——因而憑靠這樣的鬥爭也就產生不出——全俄的集中化的組織，即能把所有一切反政府運動、抗議和義憤等等表現都集合成爲一個總攻擊的組織，亦即由革命職業家組成而由全體人民底真正政治領袖所領導的組織。而且這是當然的。任何一個機關底組織，其性質自然並且必然取決於它所進行的那種活動底內容。因此，工人事業雜誌所說的上述斷語，不僅是要把政治活動底狹隘性，而且把組織工作底狹隘性推崇爲正當合理的現象。在這個問題上，也如在其他一切問題上一樣，工人事業雜誌是個表示覺悟性屈服於自發性的刊物。而崇拜自發形成的組織形式，不瞭解我們的組織工作尙是何等狹隘而原始，不瞭解我們在這個重要工作方面還是怎樣一些『手工業者』，在我看來乃是我們運動底真正病態。當然，這並不是衰落過程中的病態，而是發展過程中的病態。但正是在現今自發的怒潮簡直把我們這些運動領導者和組織者淹沒掉的時候，特別必須作最不調和的鬥爭來反對一切擁護落後性的主張，反對任何想把這方面的狹隘性推崇爲正當現象

的企圖：特別必須使每個參加實際工作或預備進行這種工作的人都對現在我們中間盛行的手工業方式表示不滿，下一番大決心來拋棄這種手工業方式。

(甲) 什麼是手工業方式呢？

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且拿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間的一個標本社會民主黨人小組底活動情景來做例子。我們已經講過，當時的青年學生都紛紛傾心於馬克思主義。自然，他們這樣傾心不僅是，並且與其說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理論看待，不如說是把它當作對於『做什麼？』這一問題的回答，當作向前去進攻敵人的號召。而這些新的戰士也就帶着非常原始的軍裝和準備程度去實行進攻。甚至往往是幾乎沒有任何軍裝，沒有絲毫準備的。他們跑去作戰，正好像一些種地農夫只是拿起一根木棒去幹一樣。這個學生小組與別地，甚至本城他區（或別個學校）小組沒有絲毫聯系，絲毫沒有把革命工作底各個部分組織起來，沒有任何一個較爲長期而有系統的活動計劃，就逕直去與工人接洽，着手工作。這個小組漸漸開展着規模日廣的宣傳和鼓動，以自己發動的事實博得頗廣大工人羣衆方面的同情，有一部分智識階層也對它表示同情，捐出一些金錢，提出一批一批青年交給『委員會』支配。委員會（或鬥爭協會）底威信是增長了，它的活動範圍也擴大了，但它擴大這種活動完全是自發的：一年或幾月以前在學生小組中講過話，解決過『往何處去？』的問題，同工人建立過並維持過聯系和編印過傳單的那些人，現在已與其他某些革命家團體建立聯系，設法取得宣傳品，着手出版地方報紙，開始講到舉行示威，以至採取公開軍事行動（而且依情況爲轉移，甚至第一號鼓動傳單，第一期報紙和第一次示威，都可成爲這種公開的軍事行動）。通常是這種行動一開始，就立刻和完全遭受失敗。其所以立刻，其所以完全，是因爲這些軍事

行動並非有系統的，預先想好和早有準備的一種長期堅決鬥爭計劃底結果，而祇是因循慣例進行的那種小組工作自發增長起來的表現；因為警察機關自然是差不多常常知道所有那些領導本地運動而在求學時代就已『露過頭角』的主要人物，專門等待良機來圍捕他們，故意讓小組充分發展擴大起來，以便獲得明顯的罪證，並且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幾個人物留在獄外『繁殖』（據我所知，我們的人和憲兵雙方都使用着這個術語）他們的種類。我們不能不把這一種戰爭來與農民羣衆拿着木棒反對現代軍隊的行動比擬。令人驚奇的是運動很有生氣，那怕作戰的人這樣全無準備，但運動還是擴大起來，增長起來，並且往往獲得勝利。誠然，從歷史的觀點看來，軍裝底原始性，在開始的時候，不僅是必不可免，而且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是普遍吸收戰士的條件之一。但是，嚴重的軍事行動一開始的時候（而這種行動實際上是從一八九六年夏季罷工時起就已開始了的），我們的軍事組織方面的缺點就日益暴露出來了。政府雖在第一個時期表現過慌張，作過許多錯誤（例如向社會訴說社會主義者如何行兇作惡，或是把工人從首都驅逐到外省工業中心去等等），但它很快就適應了新的鬥爭條件，把自己那些擁有一切精良武器的奸細、偵探和憲兵隊伍佈置到相當的地方。摧殘的行動日益常見，牽連的人日益增多，往往把地方小組剷除得乾乾淨淨，竟使工人羣衆簡直失去所有的領導者，使運動帶有非常突變的性質，使任何工作上的繼承性和連貫性都無法建立起來。各地方活動家異常散漫，小組成份變換無常，以及在理論、政治和組織問題上毫無素養和眼界狹小，便是上述情形底必然結果。有些地方，由於我們缺乏堅定性和祕密性的結果，工人竟根本不相信智識份子而離開他們，說智識份子非常粗心浮氣，動不動就引起破獲！

至於一切有頭腦的社會民主黨人都已感覺到這種手工業方式是一種病態，——這是稍微認識運動實況的人都知道的。爲使不熟悉

運動實況的讀者不要以為我們故意『造出』運動底特殊階段或特殊病態起見，我們就來引證上面已經提到過的那位見證人所說的話。不過請讀者不要埋怨我們引證得太長了。

『如果說逐漸過渡到更廣大實際行動的現象，——伯…夫在工人事業雜誌第六期上寫道，——這直接由俄國工人運動現在所處一般過渡時期所決定的現象，是目前運動底一個特點…那末同時在俄國工人革命底總機體中還有另一個同樣值得注意的特點。我們所說的就是不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也都感覺到一般缺少能做工作的革命人材的情形*。由於工人運動一般活躍，由於工人羣衆一般發展，由於罷工事件日益頻繁，由於工人羣衆鬥爭日益帶有公開形式而使政府日益加緊採取追究、拘捕、流放和驅逐手段，於是缺少優良革命人材的情形就愈加明顯，而且當然不能不影響到運動底深度和一般性質。許多罷工都沒有受到革命組織方面的強大直接的影響…鼓動傳單和祕密刊物均感不足…工人小組內沒有鼓動員進行工作…經費也常感缺乏。總而言之，工人運動底增長程度超過革命組織底增長和發展程度。現有的革命活動家人數太少，不能把對於全部騷動工人羣衆的影響集中在自己手裏，至少使一切騷動事件帶有幾許嚴密和有組織的性質…單個小組，單個革命家，沒有集合起來，沒有統一起來，沒有組成爲一個力量強大，紀律堅強，各部分都發展得有條不紊的組織』…接着作者說明，舊小組一遭破壞，便馬上有新小組產生出來的事實『祇是證明運動富有生氣…並不是證明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動家人數已經足夠』，然後就作出結論說：『彼得堡的革命家在實際工作方面缺乏素養，也反映在他們的工作結果方面。最近的

*所有的着重點都是我們加的。

審判案，特別是『自力解放社』和『勞工反資本鬥爭社』審判案很清楚地表明了：青年鼓動員既不熟悉本工廠內的勞動條件以及鼓動工作條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則，而祇領會了』（真領會了麼？）『社會民主黨底一般觀點，所以只能做四五六個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拘捕，結果往往使整個組織或至少是其中一部分遭受破獲。既然一個團體祇能存在幾個月之久，試問它的活動能有成就和效果麼？現有各個組織中的缺點，顯然不能說是完全由於過渡時期的關係…現有組織底成份在數量上尤其在質量上的不足，顯然是對此發生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底首要任務…就是要在嚴格挑選黨員的條件下把各個組織切實統一起來』。

（乙）手工業方式與經濟主義

現在我們就要來講講每個讀者想必都自然發生了的一個問題。可不可以說，全部運動發展過程共同病態的手工業方式是與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派別之一的經濟主義有聯系呢？我們認為可以這樣說。缺乏實際工作素養，不善於做組織工作，這確實是我們大家底通病，甚至一開始就堅決擁護革命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人也不是例外。當然，誰也不能說實際工作者缺乏素養是他們的罪過。但是，『手工業方式』這一概念，除了表示缺乏素養而外，還有別的含義：全部革命工作規模狹小，殊不知單靠這種狹小工作還是根本不能造成良好的革命家組織，最後——並且最重要的——就是企圖辯護這種狹隘性，把它推崇為一種特別的『理論』，即是說在這一方面也崇拜自發性。自這種企圖暴露時起，手工業方式與經濟主義相聯系的事實就很顯然了，所以我們如不先擺脫一般經濟主義觀點（即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民主黨作用及其政治任務的狹隘見解），便不能擺脫我們組織工作底狹隘性。這種企圖是表現在兩方

面。有的說：工人羣衆自己還沒有提出革命家『強加於』他們的那些戰鬥的廣闊政治任務，工人羣衆還應當爲迫切的政治要求而奮鬥，實行『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而與這種羣衆運動『所能勝任』的鬥爭相適應的，當然就是那種最缺乏素養的青年也『能勝任』的組織）。另一些人絲毫不贊同什麼『漸進主義』，却說：可以並且應當『實現政治革命』，但爲要做到這點，完全不必建立什麼用堅忍頑強鬥爭來教育無產階級的堅強革命家組織，只要我們大家拿起『所能勝任』和已經用慣的木棒來幹就行了。直截了當地說，就是祇要我們舉行總罷工**，或是祇要用『激發的恐怖手段』來振作工人運動底『萎靡』過程就行了***。這兩派人，即機會主義者和『革命主義者』，都屈服於盛行的手工業方式，不相信有擺脫它的可能，不瞭解我們最迫切的首要實際任務是要建立一個能使政治鬥爭具有力量，具有穩固性和繼承性的革命家組織。

我們剛才摘引了伯…夫底話：『工人運動底增長程度超過革命組織底增長和發展程度』。這一位『切近觀察者底寶貴通知』（工人事業雜誌對於伯…夫那篇文章的評語），對於我們有雙重的價值。它表明出：我們一向所說現今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危機底基本原因是領導者（『思想家』，革命家，社會民主黨人）落後於羣衆自發高潮這一斷語原是正確的。它表明出：經濟主義者來信（載於火星報第十二期）底作者們，克里切夫斯基和馬爾丁諾夫之所謂輕視自發成分與日常平凡鬥爭意義的危險，所謂過程策略等等的一切議論，正是讚揚和擁護手工業方式。這些人除非裝出鄙視的面容就講

*見工人思想報，工人事業雜誌，尤其是給普列漢諾夫的答覆。

**見誰來實現政治革命呢？一書——刊載於俄國出版的無產階級鬥爭論叢，並由基也輔委員寄贈印本。

***見革命主義之復活一書和自由雜誌。

不出『理論家』這個名詞來，並把他們崇拜欠缺實際經驗的態度稱爲『識時務』的態度，其實他們不過是暴露自己不懂我們最迫切的實際任務而已。他們向那些落伍的人喊道：按步就班地走吧！不要搶到前面去！他們向那些苦於欠缺組織工作毅力和首創精神，苦於欠缺廣闊大胆工作『計劃』的人高喊所謂『過程策略』！我們的主要過失是把我們的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降低到適應迫近『鮮明』『具體』日常經濟鬥爭利益的地步，而人們却繼續向我們高唱什麼要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我再重複說一遍：這種『識時務』的態度，真與民間故事中所說的那個人物遇見人家送葬時高喊『恭喜恭喜』一模一樣哩。

請你們回憶一下這些聰明才子用高傲無比，真是『拿爾茨斯』式的自矜態度教訓普列漢諾夫時所說的一段話吧：『切實的，實際的政治任務，即爭取政治要求的適當而有成就的實際鬥爭，根本上（請注意！）工人小組所不能勝任的』（工人事業雜誌編輯部底答覆，第二四頁）。但是先生們呵，有各種各樣的小組哩！尙未覺悟到自己患着手工業方式病症，尙未擺脫這種病症的那些『手工業者』小組，對於政治任務自然是不能勝任的。如果這些手工業者又迷戀於自己的手工業方式，如果他們寫到『實際』二字時定要加上着重點，妄以爲實際性要他們把自己的任務降低到羣衆中最落後階層底瞭解程度，那末這些手工業者當然是無可救藥的，政治任務真正是他們根本不能勝任的。但阿列克塞也夫，梅實金，哈爾士林和熱略波夫這樣一些健將底小組，却是對於最切實最實際的政治任務也能勝任的。其所以如此，正是並且只是因爲他們的熱烈宣傳始終獲得自發覺醒起來的羣衆方面的反應，因爲他們的沸騰毅力總有革命階級底毅力來響應和擁護。普列漢諾夫作得萬分正確，他不僅指出了這個革命階級，不僅證明了它自發覺醒底必然性，並且還向『工人小組』提出了崇高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你們却想藉口從那時

候起發生的羣衆運動來降低這個任務，來縮小『工人小組』活動底毅力和規模。這豈不正是表明手工業者迷戀於自己的手工業方式麼？你們愛以實際精神自誇，却沒有看見俄國每個實際工作者所知道的那種事實，即是在革命事業上不僅小組底努力，甚至個別人物底努力也能作出莫大奇蹟來的事實。也許你們以爲在我們的運動中不能有七十年代那樣的健將麼？爲什麼？是不是因爲我們缺乏準備呢？但我們已在努力準備，還會努力準備，而且定能準備好的！固然，不幸在『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的銹水上面形成了一層泡沫，出現了一些俯伏跪拜自發性，虔誠注視俄國無產階級『臀部』（照普列漢諾夫底說法）的人。但我們定能擺脫這一層泡沫。正是現在，以真正革命理論爲指南的俄國革命家，倚靠着真正革命和自發覺醒起來的階級，是終究（終究！）能伸直腰背，儘量展開起自己全部強大力量的。要做到這點，祇要使一切想降低我們政治任務和我們組織工作規模的企圖，都在實際工作者中間，在那些還在學生時代就夢想做實際工作而人數更多的份子中間，受到嘲笑與鄙視就行了。先生們，放心罷，我們定能做到這步的！

我在從何着手？一文中寫過一段反對工人事業雜誌的話：『在二十四小時內可以改變黨組織對於某一專門問題的鼓動策略，可以改變對於實現某一枝節事情的策略，但如果要改變自己對於一般，始終和絕對需要建立戰鬥組織和在羣衆中間進行政治鼓動工作這一問題的觀點，那末且不說在二十四小時內，即使在二十四個月以內也只有那些毫無主見的人才能辦到了』。工人事業雜誌回答道：『火星報所提出的這個唯一彷彿含有事實性質的罪狀，原是毫無根據的。工人事業雜誌底讀者很清楚地知道，我們未曾等待火星報出現，自始就不僅號召過大家進行政治鼓動…（同時又認定不僅工人小組，『並且羣衆工人運動也不能把推翻專制制度一事當作首要政治任務』，而只能把爭取最近政治要求的鬥爭當作首要政治任

務：認爲『最近的政治要求經過一次罷工或充其量是經過幾次罷工後就會成爲羣衆所能認識的要求』…『並且還從國外用自己的出版物來爲當時在俄國境內活動的同志們供給過唯一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鼓動材料』…（順便說說，你們在這唯一的材料中不僅極普遍地運用過單祇根據經濟鬥爭進行的政治鼓動，並且終於想到要把這種被縮小了的鼓動看作『最普遍適用的』手段。難道你們諸位先生竟不明白你們這種論據恰巧是證明在只有這類唯一材料的情形下需要有火星報出現並需要有火星報來同工人事業雜誌進行鬥爭麼？）…『另一方面，我們的出版工作在事實上準備了黨在策略方面的一致』…（是說一致認定策略乃是隨同黨增長而增長的黨任務增長的過程麼？多麼寶貴的一致啊！）…『因而也就準備了實行建立『戰鬥組織』的可能；爲建立這樣一個組織起見，聯合會作過一般爲一個旅外團體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第一五頁）。真是一種徒勞的躲閃企圖呵！你們確實作過你們力所能及的一切，我連想也沒有想要否認這點。可是我曾斷言並且現在還要斷言，你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因你們見解偏狹而縮小。至於所謂成立『戰鬥組織』來爭取『最近的政治要求』或爲『同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這種說法，那就是可笑已極了。

假使讀者要想看見『經濟主義者』迷戀於手工業方式的顯著例子，自然應該撇開不穩定的折衷派的工人事業雜誌而去看看澈底堅決的工人思想報。『關於所謂革命智識份子問題，——P.M.在附刊第一三頁上寫道，——我們現在要講一兩句話』。誠然，革命智識份子已屢次實際表明自己有『與沙皇制度作堅決鬥爭』的充分決心。只是可惜我們的革命智識份子受到政治警察方面的殘酷壓迫，使把反對這個政治警察的鬥爭看成了反對專制制度的政治鬥爭。所以他們至今還不知道究竟要『從什麼地方獲得力量來與專制制度作鬥爭？』。

自發運動底崇拜者（壞的崇拜者）這一種輕視反警察鬥爭的態度，豈不是妙極了麼？他爲辯護我們不善於做秘密工作的情形，竟硬說在羣衆運動自發的條件下，反政治警察的鬥爭其實對於我們是不關重要的！！這種駭人聽聞的結論，一定是很少有人表示贊同，因爲大家都已深深感覺到我們革命組織方面的缺點。但如果——舉例說——馬爾丁諾夫對這種結論也不表贊同，那就只是因爲他不善於或沒有勇氣來澈底思索自己的議論而已。例如，爲了執行由羣衆提出能給予鮮明結果的具體要求這樣一個『任務』，難道還要特別關心建立什麼強固集中的戰鬥革命家組織麼？——豈不是那些絲毫不『與政治警察作鬥爭』的羣衆也執行着這個『任務』麼？況且，這樣的任務，難道不是除少數領袖而外，還要有絲毫不能『與政治警察作鬥爭』的工人（絕大多數的工人）參加，才可實現的麼？這樣的工人，羣衆中的中等份子，在罷工中，在反對軍警的巷戰中，能够表現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犧牲精神，能够（並且也祇有他們才能够）決定我們整個運動底結局，——可是，爲要與政治警察作鬥爭，却就需要有特別的品質，需要以革命爲職業的革命家。所以我們不僅要設法使羣衆『提出』具體要求，而且要設法使工人羣衆多多『提出』這樣的革命職業家。於是我們就講到了革命職業家組織與純粹工人運動的相互關係問題。這個問題在刊物上雖然很少反映，但在我們『政治派』與那些或多或少傾心於經濟主義的同志們談話和爭論時却講得很多。這個問題值得特別說明一下。不過我們首先還要引一段話來結束我們認爲手工業方式與經濟主義有聯系的這一意見的說明。

『『勞動解放』社要求與政府進行直接的鬥爭，——N.N.先生在自己的答覆中寫道，——却沒有計算一下這種鬥爭所需要的物質力量何在，沒有指出鬥爭底道路何在』。作者把最後一句話加上了着重點，然後就對『道路』二字加了個註釋：『這件事實決不能以

保持秘密的目的來解釋，因為綱領中所說到的不是陰謀而是羣衆運動。但羣衆是不能走秘密道路的。難道能有秘密的罷工麼？難道能有秘密的示威運動和秘密的請願運動麼？』“Vademecum”，第五九頁）。作者是把鬥爭底『物質力量』（舉行罷工和示威運動的人）和鬥爭『道路』都講到了，但他終究還是茫然不知所措，因為他『崇拜』羣衆運動，即認為羣衆運動是使我們不必表現革命積極性的東西而不是鼓勵和督促我們表現革命積極性的東西。罷工對於那些參加罷工以及親身與罷工接觸的人，是不能成爲秘密的。但罷工對於俄國工人大眾，却是可能成爲（而且多半成爲）『秘密的』，因為政府總是設法斷絕外界與罷工者的任何關係，總是設法使罷工消息毫無傳佈出去的機會。於是也就需要有專門『反政治警察的鬥爭』，這種鬥爭是永遠不能由參加罷工的那樣廣大的羣衆來積極進行的。以革命活動爲職業的人應當『盡善盡美』地組織這種鬥爭。組織這種鬥爭的工作不會因羣衆自發捲入運動而成爲較不必要。恰巧相反，它會因此而成爲更加必要，因為我們社會主義者若不能防止警察把一切罷工和一切示威運動變成秘密的（並且我們自己有時若不秘密地準備罷工和示威運動），那我們就不能執行自己對於羣衆所負的直接責任。我們之所以定能做到這點，是因為自發覺醒起來的羣衆也會從自己隊伍中提出一批一批的『革命職業家』（只要我們不想方設法使工人們始終停留在一個地方就行了）。

（丙）工人組織與革命家組織

假使一個社會民主黨人認為政治鬥爭概念是『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的概念所能概括的，那他自然也就會把『革命家組織』這一概念當作多少是『工人組織』這一概念所能概括的了。事實上真有這種情形，所以我們談到組織問題時，也就簡直是各講各的話。例如，我記起了我同從前不認識的一位頗爲澈底的經濟主義者

談話的情形。當時我們講的是誰來實現政治革命呢？一書，我們兩人立刻就一致認為該書底基本缺點是忽視了組織問題。我們滿以為我們彼此是意見相同了，——誰知… 繼續談下去，就看出我們竟是各自講着不同的東西。我的對話人責備該書作者忽視了罷工基金儲蓄會和互助會等等，而我所講的却是為『實現』政治革命所必需的革命家組織。這種意見分歧一暴露後，往下我就記不起我和這位經濟主義者在某個原則問題上表示過什麼同意了。

我們意見分歧底根源究竟何在呢？就在於經濟主義者無論在組織任務方面或在政治任務方面，總是從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滑到工聯主義道路上去。社會民主黨底政治鬥爭要比工人們與廠主及政府作的經濟鬥爭廣泛得多，複雜得多。同樣（並且因此），革命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也一定要與進行這種鬥爭的工人組織不同。第一，工人組織應當是職業的組織；第二，它應當是儘量廣泛的組織；第三，它應當是儘量少帶祕密性的組織（自然，我在這裏以及下文中都祇是指專制制度的俄國而言）。反之，革命家組織中所應包括的却首先並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所以我講革命家組織時，是指社會民主黨人革命家而言）。既然所有參加這個組織的人都有這種共同的特徵，那末工人與智識份子之間的任何區別都應完全消除，更不必說他們彼此間的職業上的區別了。這種組織必須是不很廣大而又儘量祕密的組織。現在我們就來談談這三種區別吧。

在有政治自由的國家內，工會組織和政治組織之間的區別，也如工會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區別一樣，是十分明顯的。當然，後者對於前者的關係，在各個國家內不免要因歷史、法律以及其他種種條件不同而有所不同——這種關係底密切程度和複雜程度等等可能是各不相同（在我們看來，這種關係應當儘量密切，儘量簡單），但在自由國家內，工會組織和社會民主黨組織混同是根本談不到的。在俄國，驟然看來，專制制度的壓迫似乎是把社會民主黨

組織和工會之間的區別抹煞了，因為任何的工會和任何的小組都被禁止，因為工人經濟鬥爭底主要表現和主要手段即罷工，根本就認為是一種刑事罪（有時甚至認為是政治罪！）。於是，我國的條件一方面很能『推動』那些進行經濟鬥爭的工人『感觸到』政治問題，另一方面又能『推動』社會民主黨人把工聯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混為一談（我們的克里切夫斯基和馬爾丁諾夫之流，拚命談論第一種『推動』，而沒有看到第二種『推動』）。例如，就拿一味從事於『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的那些人來說吧。其中有一部分人在他們活動底整個時期中（四個月至六個月之久）都一次也不會感觸到必須建立更複雜的革命家組織的問題；另一部份人大概會『感觸到』較為盛行的伯恩施坦主義的著作，於是藉以得出認為『日常平凡鬥爭漸進行程』極其重要的信念；其他一部份人也許沉醉於一種迷人的思想，硬要向世人作出一個『同無產階級鬥爭發生密切有機聯系』，職工運動和社會民主運動聯系的新榜樣來看。這種人也許認為：一個國家走上資本主義舞台，亦即走上工人運動舞台的時期愈晚，則社會主義者也就愈能參加職工運動並贊助職工運動，非社會民主黨的工會也就可能而且應當愈加少見。單只這樣推論是完全正確的，可惜人們還要更進一步，妄想把社會民主主義和工聯主義完全混合起來。我們拿聖彼得堡『鬥爭協會』章程做例，就可看出這種妄想對於我們的組織計劃發生了怎樣有害的影響。

為進行經濟鬥爭而建立的工人組織應當是職業的組織。每個社會民主黨工人都應當儘量幫助這種組織，並在這種組織內積極工作。這是對的。但是要求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才能成為『行業』工會會員，那就完全不合我們的利益了，因為這會縮小我們影響羣衆的範圍。讓每一個瞭解必須統一起來同廠主及政府作鬥爭的工人，都來參加行業工會吧。行業工會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是能達到這種初步瞭解

程度的份子統一起來，如果不是一種很廣大的組織，就不能達到行業工會底目的。這種組織愈廣大，我們對於它們的影響也就會愈廣大，而這種影響的發生又不僅是由於經濟鬥爭『自發的』發展，並且是由於參加工會的社會主義者對各工友們施行直接和自覺的激勵。但是，組織裏的成份既很廣泛，也就不能嚴守祕密（嚴守祕密所需要的準備，要比參加經濟鬥爭所需要的多得多）。一方面需要有廣泛成份，同時又需要嚴守祕密，這種矛盾怎樣才可解決呢？怎樣來使行業組織盡量地少帶祕密性呢？要做到這點，一般說來，只有兩種方法：或者是使行業工會合法化（在某些國家內是先有行業工會合法化，然後才有社會主義團體和政治團體合法化），或者是使組織保持祕密，但同時又必須使它非常『自由』，形式無定，如德國人所謂 lose 那樣，務使祕密性對於會員羣衆幾等於零。

在俄國，非社會主義和非政治的工人團體底合法化已經開始實現起來，並且我們迅速增長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每步進展都一定會增加和鼓勵這種合法化的企圖，——這種企圖主要是從擁護現制度的人們方面出發，但一部分也是由工人自己和自由派智識份子方面出發的。合法化這一旗幟已由瓦西里也夫輩和祖巴托夫輩樹立起來，奧則洛夫和沃爾姆斯先生一流的人也已經答應贊助合法化，而且已經來實行贊助了；在工人中間已有了新潮流底信徒。我們從此已不能不顧到這個潮流。究應怎樣顧到呢？——對於這點，在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未必能有兩種意見。我們應該努力揭露祖巴托夫輩和瓦西里也夫輩，黨兵和教士參加這個潮流的任何行動，把這些參加者底真正用意解釋給工人聽。同時我們又應該揭穿自由派活動家在工人公開大會上說話時一定會流露出來的一切調和『協和』論調——無論他們提倡這些論調是由於真心認為階級和平合作要好些，還是由於想巴結上司，或者只是因為自己笨拙，那都是一樣。最後，我們還應該警告工人，使他們不要陷入警察經常安設的羅網中

去，因為警察常在這種公開大會上和合法團體內探查『激烈份子』，並想經過合法組織把奸細安插到秘密組織裏來。

但我們這樣來作，並不是忘記工人運動合法化歸根到底祇會使我們獲得益處，而絕不會使祖巴托夫輩獲得益處。恰恰相反，我們正是用自己的揭露運動來分清稗子和麥子。關於稗子，我們已經說過了。所謂麥子，就是吸引更廣泛和最落後的工人階層來注意社會政治問題，就是使我們革命家卸除那些實際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發合法書籍，組織互助會等等），這一工作底發展必然會供給我們一批一批新鮮鼓動材料。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對祖巴托夫輩和奧則洛夫輩說：先生們！努力幹吧！努力幹吧！既然你們想設置羅網來陷害工人（無論是直接奸細告密手段也好，或是用『司徒盧威主義』來『誠實地』腐化工人也好），那我們就要設法揭穿你們。既然你們作出一個真正的前進步驟，——雖然是表現得極『畏縮迂迴』的步驟，但終究是個前進的步驟，——那我們就要說：請你們作吧！祇有給工人真正擴大——那怕只是稍微擴大——活動範圍，才能是真正的前進步驟。凡屬這樣的擴大都有益於我們，並且會引起一種不是奸細找到社會主義者而是社會主義者找到信徒的合法團體出現。總而言之，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要排除稗子而不是在溫室裏面培植麥子。我們把稗子排除去，就是掃清地皮使麥芽大大發育起來。讓阿仿拿西、依凡諾維奇和普立海里亞、依凡諾福娜⁷⁷在溫室裏從事栽培吧，而我們却要訓練出一些既會刈今天的稗子，又會割明天的麥子的刈手*。

*工人事業雜誌看見火星報在那裏同稗子作鬥爭，就來向火星報進行忿怒的攻擊：『在火星報看來，現今時局中的主要標幟不是這種大事變（春季事變），而是祖巴托夫的奸細想使工人運動『合法化』的那些可憐的嘗試。火星報竟不知道，這種事實正是表明火星報意見錯誤；這種事實正是證明工人運動已具有深使政府感到可怕的範圍』（兩次代表大會，第二七頁）。一切的不幸都是由於這班『對於

總之，用合法化來解決建立盡量少帶祕密性，盡量廣泛的職工組織的問題，我們是辦不到的（但是，假如祖巴托夫輩和奧則洛夫輩爲我們造成雖然只是局部的可能來解決這個問題，那我們是會很高興的，但是爲了這一點，我們就要盡量堅決地同他們鬥爭！）。因此祇有一條建立祕密職工組織的道路可走，而我們對於已經走上（這是我們所確切知道的）這條道路的工人却應當給以各方面的幫助。職工組織不僅能大大促進經濟鬥爭底發展和鞏固，並且能大大幫助政治鼓動和革命組織工作。爲要達到這種結果，爲要把正在開始的職工運動引上社會民主黨所願意的軌道，首先就必須明白認識彼得堡經濟主義者幾乎已鼓吹了五年之久的那個組織計劃底荒謬性。這個計劃載在一八九七年七月的工人儲金會章程上（工人小刊第九第十兩期合刊，第四六頁——轉自工人思想報第一期），以及一九〇〇年十月的工人聯合會章程上（在聖彼得堡印成專號出版，火星報第一期上講過它）。這兩個章程底主要缺點，就是很詳細規劃廣泛工人組織並把這種組織與革命家組織混爲一談。且拿較爲完滿的第二個章程來看吧。這個章程內容共分五十二條：其中二十三條是說明組織結構，辦事細則，以及設在每個工廠內的『工人小組』權限，這種小組（『每組不得過十人』）並且選出『中央全廠幹事會』。章程第二條上說：『中央幹事會應考察本廠所發生的一切事變，並將其一一記錄下來』。『中央幹事會每月應向全體會員報告錢庫狀況』（第十七條）等等。有十條專講『區組織』，有十九條專講『工人組織委員會』和『聖彼得堡鬥爭協會委員會』（由各區選出的代表，以及由各『執行組』，即宣傳組，外省組織聯合組，國外組織聯合組，貯藏組，出版組和儲蓄組所選出的代表）極其複雜的結構。

實際生活底迫切要求熟識無視的』正統派持着『教條主義態度』。他們死也不願看見尺高的麥苗，却一味去同寸高的稗子作鬥爭！這難道不是表明他們『對俄國工人運動前途持着謬誤見解麼』（同上，第二七頁）？

社會民主黨等於專為工人經濟鬥爭服務的『執行組』！這就是再顯然不過地證明，經濟主義者已完全離開社會民主主義立場而滑到工聯主義立場上去，根本不懂得社會民主黨首先應當設法建立一個能領導無產階級全部解放鬥爭的革命家組織。口裏說什麼『工人階級政治解放』，說什麼反對『沙皇專橫』的鬥爭，而筆下却寫出這樣的組織章程，那就等於絲毫不懂社會民主黨底真正政治任務。在五十多條章程中間，沒有一條證明他們稍微懂得必須在羣衆中進行極廣大政治鼓動，來揭示俄國專制制度所有各方面和俄國各個社會階級底全部面目。在這樣的章程下，不僅政治目的，甚至工聯主義目的，也無法實現，因為工聯主義目的是要求按職業標準來實行組織，而在章程裏却完全沒有提到這點。

最令人注目的，是這全部『體系』在措詞上驚人瑣屑，企圖在三重選舉制下，用單調而瑣屑得可笑的種種規則作為經常線索把每個工廠同『委員會』聯繫起來。備受經濟主義狹小眼界限制的思想，沉溺於充滿着十足官樣文章和官場氣味的瑣屑條文中。其實，這些條文四分之三當然是永遠也不會實行，而在每個工廠內都設有中央團的這種『秘密』組織系統倒使憲兵易於進行極其廣泛的破獲。波蘭的同志已經渡過了大家都傾心於普遍設立工人儲金會的這一運動階段，但當他們一明白這祇能使憲兵們得到豐富收穫，就馬上把這種念頭拋棄了。假使我們真想有廣大的工人組織，同時又不願意遭受大規模的破獲，不願意取悅於憲兵，那我們就應當設法使這些組織完全不具什麼確定的形式。這樣來作，它們能不能執行其職任呢？你們來看看這些職任吧！『…考察本廠所發生的一切事變，並將其一一記錄下來』（章程第二條）。難道這一定要有固定的組織形式麼？不組織特別團體而單只用秘密報紙上的通信方法來做這項工作，難道不是更好麼？『…領導工人鬥爭以改善他們在工廠內的狀況』（章程第三條），也是用不着什麼固定組織形式的。

工人所想提出的要求，每一個稍有才幹的鼓動員都可從普通談話中確切探知；探知之後，就能把這點傳達給那個狹而不廣的革命家組織，以便供給工人相當的傳單。『…組織工人儲金會…由每一盧布工資繳出兩個哥比作為會費』（章程第九條）——以及每月應向全體會員報告錢庫狀況（章程第十七條），把不繳會費的會員開除出去（章程第十條）等等。這在警察看來，真是如登天堂了。因為要洞悉這些『工廠中央儲金會』底一切祕密，沒收他們的金錢，拘捕一切優秀份子，是再容易不過的了。發行價值一兩個哥比的印花票，蓋以某個（很狹小很祕密的）組織底圖章；或者不用印花票而實行募捐，在祕密報紙上用某種暗號把捐款賬目報告出來，這難道不是比較好些麼？所要達到的目的仍然可以達到，而憲兵要找到線索，却就困難百倍了。

我本來還可用舉例方法把這個章程繼續分析下去，但是我以為我所講過的也就很够了。最可靠，最有經驗，最有鍛鍊的工人所組成的一種人數不多，團結堅固的核心，在各主要區域都有自己的代表，並用嚴守祕密的辦法同革命家組織發生聯系，在羣衆極廣大的贊助下，不必有任何確定的形式，也能够充分執行工會組織所應盡的一切職任，並且執行得恰如社會民主黨所希望的那樣。只有採用這種方法，才能違反一切憲兵詭計而使社會民主主義的職工運動鞏固和發展起來。

有人會反駁說：一個組織這樣鬆散，根本就沒有什麼確定的形式，甚至連明知的和登記過的會員都沒有，根本就不配稱為組織。也許是如此。我並不重視名稱。但這種『無會員的組織』能把我們所要作的一切都作成功，並且一開始就保證我們將來的工聯會能與社會主義發生堅固聯系。誰想在專制制度下成立採用選舉制，實行報告工作和全體表決制等等的廣大工人組織，那他就簡直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空想家了。

結論是很簡單的：我們若從切實成立強固革命家組織來開始工作，我們就能保障整個運動底穩固性，就能同時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和純粹工聯主義的目的。而我們若從建立一些好像是羣衆所最能『勝任』的（其實只是使憲兵最易破獲的，使革命家最易被警察拿獲的）廣大工人組織來開始工作，那我們就不能實現任何一種目的，就會擺脫不了手工業方式，就只會因自己這樣渙散和這樣常遭破獲而讓祖巴托夫式或奧則洛夫式的工聯會成爲羣衆所最能勝任的了。

這種革命家組織底職任究竟是什麼呢？——關於這點，我們馬上就要來詳細談談。但我們首先還要來考察我們的那位恐怖主義者底一段極標本式的議論，他在這裏（真是命途多乖啊！）又成了那個經濟主義者底親友。在供工人閱讀的自由雜誌（第一期）上載有一篇標題爲組織的文章，該文作者是想爲他那些在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城工作的工人經濟主義者朋友們辯護。

『羣衆一聲不響，——他寫道，——沒有覺悟，運動不是從下層發動起來，真壞極了。你看，學生們離開大學所在的城市，四散回家去過節或過暑假了，工人運動也就停頓下來。難道這種從旁推動的工人運動能夠成爲一種真正的力量麼？那裏能夠呢……它還沒有學會用自己的腳來走路，專靠人家牽着它走。一切事情都是這樣：學生散回家去了，工人運動也就停止了；牛奶一失去精華，立刻就變成酸味；『委員會』被破獲了，當新委員會尚未建立起來時，又是寂靜無聲；將來建立成功的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委員會，又還不得而知，——也許完全不像先前的委員會那樣；先前的委員會這樣說，而新成立的委員會又會那樣說。過去和將來失掉聯系；過去的經驗不能傳給將來。這都是由於在深處，在羣衆中間沒有根蒂；做工作的不是百多個傻子，而是十來個聰明人。十來個人常可一網打盡，但

是如果組織能够包含大眾，一切事情都由大眾來幹，那就無論誰怎樣想方設法也不能傷害我們的事業了』（第六三頁）。

事實倒也描寫得很對。我們的手工業方式底情景倒還繪畫得不錯。但所作的結論却是極不合理，在政治上極不妥當，恰與工人思想報相當。其所以極不合理，是因為作者把『深處』的運動『根蒂』這一哲學的和社會歷史的問題同怎樣對憲兵進行最順利鬥爭的技術組織問題混淆起來了。其所以在政治上極不妥當，是因為作者並不棄絕壞的領導者而訴諸好的領導者，却想根本棄絕任何領導者而訴諸『大眾』。這是一種想把我們在組織方面拉往後退的企圖，正如在政治方面主張用激發的恐怖手段代替政治鼓動工作的思想把我們拉往後退一樣。我真是應付不暇：自由雜誌賞賜給我們這樣一大堆糊塗觀點，真使我不知從何處開始分析是好！為明顯起見，我且從列舉例證來開始說起。且拿德國人來講吧。他們的組織包括有羣衆，一切事情都是由羣衆發動起來，工人運動已經學會自動行走，——我想你們一定不會否認這點吧？可是，這百萬羣衆又是怎樣善於重視自己的『十來個』有鍛鍊的政治領袖，怎樣堅決擁護這些領袖呵！在國會中往往聽見敵黨議員譏諷社會黨人說：『好漂亮的民主主義者！你們祇是口頭上空講工人階級運動，實際上上台說話的總是這一班頭領。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還是這個伯伯爾，還是這個李卜克內西。你們的那些好像是從工人中間選舉出來的議員，真是比皇帝任命的官吏還難得調換些哩！』。這是企圖把『羣衆』與『頭領』對立起來，想激發羣衆底劣根性和虛榮心，想以破壞羣衆對於『十來個聰明人』的信仰來奪去運動的穩固性和堅強性，——但德國人對於這種蠱惑人心的企圖，却只是加以鄙笑而已。德國人底政治思想發展程度和政治經驗已足使他們懂得：在現代社會內，若無『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出來的）、久經鍛鍊、擁有專門訓練、受過長期教育而聲應氣

投的領袖，無論那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強的鬥爭。在德國人自己的隊伍中間，也有過一些蠱惑人心的人誇張『幾百個傻子』，把『傻子』捧在『幾十個聰明人』之上，誇張羣衆底『筋肉發達的拳頭』，激起他們（像莫斯特和加雪爾曼那樣）來幹輕浮的『革命』行動，散播不信任堅定剛毅領袖的心理。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祇因為它與社會主義運動內部一切蠱惑人心的份子始終作了毫不調和的鬥爭，才這樣發展和鞏固了起來。可是，現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全部危機恰巧是由於自發覺醒起來的羣衆還沒有充分諳練、充分發展、經驗豐富的領導者，而我們的聰明才子却竟如民間故事中那位不識時務的著名角色一樣，帶着深思神情說道：『運動不是從下層發動起來，真壞極了』！

『學生所組成的委員會毫不中用，因為它不穩固』，——這話完全公正。但由此所應得出的結論是需要有革命職業家所組成的委員會，不管他們是學生也好，工人也好，只要他們能把自己造成爲革命職業家就行了。而你們所作出的結論，却是說不要從旁邊去推動工人運動！你們由於政治上幼稚的關係，根本就不知道你們這樣主張只是替我們的經濟主義者和我們的手工業方式助威。我們倒要問問你們：我們的學生『推動』我們的工人運動，究竟表現於什麼呢？其唯一的表現就是學生把他們所有的一點點政治知識和他們所獲得的一些社會主義觀念碎片（因為現代學生底主要知識養料是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而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却只能給出一些初步的知識和碎片）傳給工人。在我們的運動中，像這樣的『從旁推動』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真是少得不得了，少得可恥，因為我們太熱心於自恃己力，太崇拜那種初步的『與廠主及政府作的經濟鬥爭』。這樣的『推動』，我們革命職業家應當而且定會加強百倍來幹。但正因為你們用出『從旁推動』這樣可鄙的字眼來，在工人中間（至少在像你們這樣落後的工人中間）必然要引起他們不信任一切從旁給

予他們政治知識和革命經驗的人，必然會引起他們對所有這些人都表示反抗的本能上的衝動，——於是你們就成了蠱惑人心的人，而蠱惑人心的人却是工人階級底最壞的敵人。

正是呀！你們不要馬上叫喊起來，說我進行爭辯時採取了『非同志的方法』吧！我根本不想懷疑你們心境良善。我已經說明過：一個人僅因政治上幼稚，也可以成爲蠱惑人心的人哩。但是我已指明出：你們墮落到了蠱惑人心的地步。而且我始終都要重復說：蠱惑人心的人是工人階級底最壞的敵人。其所以最壞，是因為他們可以激發羣衆底劣根性，因爲落後工人不能識破這些裝作工人朋友，有時甚至是真想成爲工人朋友來講話的敵人。其所以最壞，是因為在渙散與動搖的時期，在我們運動的面貌剛剛形成的時期，最容易敗壞羣衆的莫過於蠱惑人心的宣傳，祇有後來最苦痛的經歷才能使羣衆覺悟到自己的錯誤。所以，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目前的口號應當是進行堅決鬥爭，既反對墮落到蠱惑人心地步的自由雜誌，又反對墮落到蠱惑人心地步的工人事業雜誌（這點以後還要詳細地說到*）。

『捉拿十來個聰明人，要比捉拿百多個傻子容易些』。這一個很漂亮的真理（你們說出這個真理，百多個傻子始終都會拍手稱讚），只是因爲你們在推論時從一個問題跳到了另一個問題上去，才好像是不言而喻的。你們開始是講，並且繼續講着捉拿『委員會』，捉拿『組織』的問題，而現在你們却已跳到捉拿什麼『深處』的運動『根蒂』問題上去了。當然，我們的運動之所以不可拿獲，祇是因為它在深處有成千成萬的根蒂，但現在所談的並不是這

*這裏我們僅僅指出：上面我們論到『從旁推動』一語以及自由雜誌對組織問題往後一切議論時所說的一切，都是與一切經濟主義者——包括『工人事業派份子』在內——有關，因爲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積極宣傳和擁護這種組織問題觀點，另一部分人已滑到這種觀點上去了。

點。就『深處的根蒂』這一點來講，現在也無法『捉拿』我們，那怕我們有很盛行的手工業方式；雖然如此，但我們大家都在埋怨，並且不能不埋怨『組織』被拿獲的情形，這種情形把運動中的任何繼承性都破壞掉。你們既已提出了組織被拿獲的問題，並且不願離開這個問題，那我就告訴你們說：捉拿十來個聰明人，要比捉拿百來個傻子困難得多。無論你們怎樣煽動羣衆來反對我，說我是『反民主主義者』等等，但我終要堅持我這個意見。組織方面的所謂『聰明人』，正如我已經屢次講過的那樣，無非是些革命職業家，而這些革命職業家不管是由學生或是由工人造就出來，都是一樣。所以我認定：（一）無論那一個革命運動，若沒有一種穩定而能保持繼承性的領導者組織，便不能鞏固起來；（二）自發捲入門爭，構成運動基礎和參加運動的羣衆愈廣大，則這種組織也就愈加迫切需要，也就應當愈加堅固（因為各種蠱惑人心的人們誘惑羣衆中落後份子也愈容易）；（三）參加這種組織的主要應當是以革命活動爲職業的人；（四）在專制制度的國度內，我們愈縮小這種組織底組員成份，一直縮小到只許那些以革命活動爲職業並在反政治警察的鬥爭藝術上受有專門訓練的人參加，則這種組織也就會愈難『捉拿』；（五）則工人階級和其他社會階級裏有機會參加這個運動，有機會在運動中間積極工作的人數也就會愈多。

我請我們的經濟主義者、恐怖主義者、『經濟主義者兼恐怖主義者』*來駁斥這幾點原理，現在我祇想把其中最後兩點拿來講一講。捉拿『十來個聰明人』和捉拿『百來個傻子』的難易問題，

*這個名詞也許比前面那個名詞更適宜於形容自由雜誌，因為在革命主義之復活中所擁護的是恐怖主義，而在我們分析的這篇文章內所擁護的却是經濟主義。事與心違！——這句成語一般可以用來形容自由雜誌。極好的志向和極好的用意，但結果卻是一場糊塗。其所以糊塗，主要是因爲自由雜誌一方面擁護組織底繼承性，同時却又不願承認革命思想與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底繼承性。極力想把革命職業家復活起來（革命主義之復活），同時却又主張：第一，採取激發的恐怖手段；第二，

歸結到我們上面已分析過的那個問題：在必須嚴守祕密的條件下，羣衆的組織是否可能呢。我們永遠不能把廣泛的組織提到應有的祕密程度，沒有這樣高度的祕密就談不到什麼能保持反政府鬥爭繼承性的堅固組織。並且，把所有祕密的職任集中在數量儘量少的革命職業家手裏，這並不是說他們將『替大家操心』，並不是說羣衆不必積極參加運動。恰恰相反，這些革命職業家將由羣衆中間不斷增多地產生出來，因為那時羣衆就會知道，單只幾個學生和幾個幹經濟鬥爭的工人集合起來還不能成立一個『委員會』，而是還需要費多年工夫來把自己造就為革命職業家才行；那時羣衆就會不只是為手工業式的活動『操心』，而會正是為這一種造就工作『操心』了。把組織底祕密職任集中起來，這並不是說要把運動底一切職任集中起來。最廣大的羣衆積極參加祕密刊物工作的程度，不但不會因『十來個』革命職業家把這件事情方面的祕密手續集中起來而減少下去，反而會因此加強十倍。這樣，並且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到使閱讀祕密刊物，向祕密刊物投稿，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連散發祕密刊物的工作都幾乎不成其為祕密的事情，因為警察很快就會懂得，對於散發到成千累萬份的每一份刊物都施行司法上和行政上的官樣麻煩手續，是很愚蠢而且是辦不到的。不僅刊物如此，而且運動方面的一切職任，直到示威為止，也莫不如此。『十來個』按其豐富經驗以及所受專門訓練可與我國警察相匹的革命家，把一切祕密手續——如準備傳單，規定大致計劃，為全城各區域，各工廠區，各學校等等指定領導工作人員——集中起來，這不但不會使羣衆最積極最廣泛參加運動的事情受到損失，反而會使其獲益不淺（我知道有人會來反駁我，說我的觀點『不合民主原則』，但我在下面就要詳細來答覆這個極不聰明的反駁）。革命家組織把最祕密的職任

『組織中等工人』（自由雜誌第一期，第六六頁及以後各頁），儘量少受『從旁推動』，——這就真是為溫暖自己的房子而把房子本身拆掉當柴燒了。

集中起來，這決不會削弱，而只會擴大其他許許多多組織底活動範圍與內容；這些組織既打算包括廣大羣衆，就應當是些盡量少帶固定形式，盡量少帶祕密性的組織，如職工會，工人自修組，祕密書報閱讀組，社會主義小組以及其他一切人民階層中的民主主義小組等等。這樣的小組，協會和團體，必須在各地極普遍地組織起來，並且要使它們負有各種各樣的職任；但如果把這些組織同革命家組織混爲一談，抹煞這兩者之間的界線，那就非常愚蠢而且有害了，因爲這就會把羣衆本來已很模糊的一種認識消滅下去，使他們全然忘記：爲了『供應』羣衆運動，需要有一些致全力於社會民主主義活動而應當堅忍不拔地把自己造就成爲革命職業家的人。

的確，羣衆對於這點的認識已是模糊得不堪了。我們在組織方面上的基本過失，就是我們由於我們的手工業方式而喪失了俄國革命家底威望。在理論問題上萎靡不振，動搖不定，眼界狹小，藉口羣衆自發性來辯護自己的萎靡性，多像工聯會祕書而少像民衆代表，不會提出廣闊大胆的計劃來使敵人也生敬畏之心，而對於自己的專門手藝，即反政治警察的鬥爭，又作得不熟練，甚至作得很拙劣，——對不起！這樣的人決不是革命家，而是一種可憐的手工業者。

請任何一個實際工作者都不要埋怨我用這個苛刻的字眼，因爲這裏所講的是缺乏訓練的問題，並且我用這個字眼首先就是指我自己說的。我曾在一個抱定有非常廣泛，包羅盡致的任務的小組內工作⁷⁸，當時我們這個小組中全體組員深覺難過和深感痛苦的就是我們明知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可把一句名言改個樣子，說『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而我們却竟表現爲一些手工業者！後來我愈是常常回想起我當時所感到的灼膚的慚愧，就愈加痛恨那些假社會民主黨人，他們用他們的宣傳來『玷污革命家資格』，却不瞭解我們的任務不是要去辯護革命家降低爲手工業者，而是要把手工業者提高爲革命家。

(丁) 組織工作底規模

我們上面已聽見伯…夫說過：『不僅在彼得堡，並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覺到缺少能做工作的革命人材』。這件事實是未必有人否認的。可是問題就在於怎樣來解釋這件事實？伯…夫寫道：

『我們不去說明這種現象底歷史原因，而僅僅指出：被長期的政治反動所敗壞，被那些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經濟變化所腐蝕的社會，從自己隊伍中所提拔出來的能做革命工作的人材極其寡少；工人階級提拔出一些工人革命家來局部地補充秘密組織中的隊伍，但這種革命家人數還不能滿足時代需要。況且，在工廠內作十一點半鐘工的工人，按其地位來說多半只能執行鼓動員的職任；至於宣傳和組織工作，運送與翻印秘密宣傳品，印發傳單等等方面的工作，却多半是不免要由人數極少的智識份子來擔負』（工人事業雜誌第六期，第三八至三九頁）。

我們有許多地方不同意伯…夫底這種意見，尤其是不同意我們加了着重點的語句，因為這些語句特別透澈地指明出：伯…夫雖因我們大家患有手工業主義毛病而深覺難過（也如一切有些腦筋的實際工作者一樣），但他因受經濟主義束縛，終究不能找得解脫這種難堪情況的出路。不，社會提拔出極多的能够『作事』的人材，但我們卻不會盡量利用他們。在這方面，我們運動底危急過渡狀態可以用兩句話來表示：沒有人，而又人很多。人很多，因為工人階級以及日新月異的社會階層一年比一年提拔出更多心懷不滿，願意反抗，決意盡力幫助反專制制度鬥爭的人，而專制制度令人難堪的情形雖還沒有為一切人所意識到，但已為日益廣大的羣衆所日益厲害地感覺到了。但同時又沒有人，因為沒有領導者，沒有政治領袖，沒有長於組織的人材，來舉辦規模廣大而且統一嚴整的工作，使每

一份力量——甚至極小的力量——都有運用的機會。『革命組織底增長和發展程度』不僅落後於工人運動底增長程度（這是伯…夫也承認的），並且落後於民間各階層中一般民主運動底增長程度（順便說說，現在伯…夫想必會承認這個意見也是對他那個結論的一個必要補充吧）。革命工作底規模與運動底自發廣大基礎比較起來實在是太狹隘了，它受『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這種可憐理論的束縛實在是太厲害了。但是現在社會民主黨人中不僅做政治鼓動的人，而且那些做組織工作的人，也都應當『到民間一切階級中去』*。未必有一個實際工作者會懷疑，社會民主黨人本來能夠把自己的組織工作方面的千百種零星職任分配給屬於各種各樣階級的單個份子去担任。缺少專門化是我們工作技術上的最大缺點之一，這個缺點是伯…夫非常悲痛而且非常正確地表示不滿的。整個事業底單個『手續』愈瑣細，能夠執行這些手續的人（而且大半是完全不能成爲革命職業家的人）也就會愈易找到，警察要『捉拿』這一切『零碎工作人員』也就會愈感困難，警察也就會愈難把根據某件瑣事捕人的事情構成『案子』來報銷國庫所耗費於『偵察局』的經費。至於那些願意幫助我們的人數，我們在上一章裏已指出了單是五年來在這方面所發生的巨大變遷。但是另一方面，爲要把這一切零星細小事情集成一體，爲使運動本身不會因運動職任分散而分散，爲要激起執行細小職任的人確信自己工作重大和必要的信心（沒有此種信心，他是永遠也不會工作的）**——爲要做到這一切，就需要有

*例如近來在軍人中間可以看見民主精神顯然活躍起來的現象，一部份是由於對工人學生這種『敵人』進行巷戰的事件日益常見的結果。祇要我們有充分的力量，我們一定要特別認真注意兵士和軍官中的宣傳鼓動工作，建立加入我們黨的『軍人組織』。

**我記得有一個同志會轉告我說，有一位願意幫助並且確實幫助過社會民主黨的上廠檢查員常哀訴說，他不知道他的『報告』是否能傳達到真正的革命中心，他

堅強的諳練革命家組織。有了這種組織的時候，那末這種組織愈祕密，則確信黨有力量的信心也就會愈加堅固，愈加廣佈起來，——而大家知道，在戰爭時，最重要的是不僅要使自己的軍隊相信自己力量強大，並且還要使敵人和一切中立份子也相信我方力量強大；友誼的中立有時可以決定全局。既有這樣一種建立在穩固理論基礎上而擁有社會民主主義機關報的組織，就不必懼怕許多捲入運動的『局外』人會把運動引入迷途了（恰恰相反，正是在現今手工業方式盛行的時候，有許多社會民主黨人趨向於《Credo》方面，不過是以社會民主黨人自居罷了）。總而言之，專門化必須有集中化為前提，並且同時還絕對需要有集中化。

然而伯·夫自己雖無微不至地描寫了專門化的必要，但我們認為他在上述那段議論後半部份內却沒有充分估計到專門化底意義。他說工人出身的革命家人數不足。這話完全正確，於是我們又要特別着重指出：『一位切近觀察者底寶貴通知』完全證實了我們對於現今社會民主黨內危機底原因以及消除這種危機的方法的意見。不僅一般革命家落後於羣衆自發高潮，就是工人革命家也落後於工人羣衆底自發高潮。這件事實甚至從『實踐』觀點上看來也是顯然證明，人們在討論我們對於工人的義務時所常常提出的那種『教授

的幫助是否需要，以及他那些細小零碎的幫助是否有被利用的機會。每個實際工作者都知道，我們的手工業方式往往使我們喪失了同盟者。能夠並且真正會給予我們這種集腋成裘的幫助的不僅有工廠方面的職員和官吏，而且有郵政、鐵路、稅關、貴族、僧侶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的職員和官吏，直到警察和法庭方面的職員和官吏為止！假使我們已經有了真正的黨，真正戰鬥的革命家組織，那我們就不會使這一切『幫手』都處於生死關頭，就不會時時急於絕對要把他們吸收到『祕密活動』底中心裏來，恰恰相反，我們會特別保重他們，並且會特別造就一批人來担負這樣的職任，因為我們知道，很多學生以『幫手』的官吏資格所能貢獻給黨的益處，要比他們以『短期』革命家資格所能貢獻的多些。但是——我再重複說一遍——祇有業已充分堅固而不感積極力量缺乏的組織，才可運用這個策略。

法」不僅非常錯誤，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動的。這一件事實證明：我們最首要最迫切的義務，是要幫助造就在黨的活動方面能與智識份子革命家處於同一水準上的工人革命家（我們所以要着重『黨的活動方面』一語，是因為在其他各方面雖然也必須把工人提到同樣的水準，但却遠不這樣容易，遠不這樣迫切）。因此，我們所應首先注意的是要把工人提高到革命家的程度，而決不是如經濟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一定要把自己降低到『工人羣衆』的程度，決不是如自由雜誌所希望的那樣一定要把革命家降低到『中等工人』的程度（在這方面，自由雜誌已降到經濟主義『教授法』第二級了）。我並不想否認必須為工人寫通俗書籍，為特別落後的工人寫特別通俗的（不過當然不是庸俗的）書籍。但使我憤懣的，是人們常常把教授法和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混在一起。你們這些關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開口講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組織時就把腰兒彎下去，實際上倒是侮辱了工人哩。你們把腰兒直起來講正經的東西吧，你們把教授工作交給教書先生，而不要交給政治家和組織家去作吧！難道在智識份子中間不是也有先進份子，『中等人』和『大眾』麼？難道大家不是認為智識份子也需要通俗書籍麼？難道這種書籍不是有人寫着麼？假定說，有一個人在他所寫的一篇論大學生或中學生組織問題的文章中，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再三說明必須首先組織『中等學生』。這樣的作家一定會受到譏笑，並且是應該受到譏笑。人們會告訴他說：假如你有什麼組織意見，那末就請你拿出來給我們看看吧，至於我們中間誰是『中等人』，誰個高些，誰個低些，那我們自己也是弄得清楚的。但如果你沒有自己的組織意見，那末你高談什麼『大眾』和『中等人』的論調就不過是些枯燥無味的玩意。你要知道，『政治』問題，『組織』問題，根本就是不能不以很嚴正的態度來講的嚴正問題：可以而且應當訓練工人（以及大學生和中學生），以便有可能同他們來談這些問題，但你既然

談到了這些問題，那你就應當拿出真正的回答來，而不應往後退到『中等人』或『大眾』那裏去，不應拿一些花言或空話來支吾搪塞*。

爲了能充分執行自己的任務，工人革命家也應成爲革命職業家。因此伯爾所說工人既然在工廠中做十一點半鐘工，所以其餘各種（除鼓動而外）革命職任『多半是不免要由人數極少的智識份子來担負』等語，是不正確的。其所以這樣作，並不是因爲『不免要』這樣作，而是因爲我們落後，因爲我們不瞭解我們的義務是要幫助一切才能特出的工人變爲職業的鼓動員，組織員，宣傳員，交通員等等。在這一方面，我們簡直是很可恥地濫費着自己的人材，不會愛惜我們所應特別懇勸培養撫育的人材。你們看看德國人吧：他們所有的人材要比我們多一百倍，但是他們非常知道：由『中等人』中間提拔出真正能幹的鼓動員等等，並不是常有的事。所以他們設法把每個能幹的工人立刻安置在相當的條件下，使其才能有充分發展和充分運用的機會：使他成爲職業的鼓動員，激勵他擴大自己的活動範圍——從一個工廠擴大到全部行業，從一個地方擴大到全國各地。他在自己的職業中獲得經驗和技能，他擴大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知識，他親眼看見其他地方和其他政黨底卓越政治領袖，他自己也力求提到與他們同樣的高度，力求一身兼備有熟悉工人羣衆的知識，新鮮的社會主義信念以及無產階級同它那些訓練有素的敵人隊伍作堅強鬥爭時所絕對必要的職業的技能。伯爾和阿宛爾

*自由雜誌第一期上所載組織一文（第六六頁）中說：『雄強的工人大衆將以其沉重的脚步來支持用俄國勞動界名義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勞動界』一語總是一定要用大號字排印的！該文作者又高喊道：『我並不仇視智識份子，但是…』（這個『但是』也就是謝德林用『耳朵不會生在額角以上去』一語來表示的那個『但是』哩！）…『但是當一個人跑來講一些很漂亮的和美妙的東西，而要求別人只因其（他的？）漂亮和其他種種美質便加以接受的時候，我總是異常氣憤』（第六二頁）。是的，這使我也『總是異常氣憤』哩…

一類的人，就是這樣並且祇是這樣從工人羣衆中間提拔出來的。但是，在政治自由的國家內多半是自然而然做成的事情，在我們俄國却應由我們的組織來有系統地設法實行。凡是有某些才幹和『有本事的』工人鼓動員，都不應當在工廠內做十一點鐘的工。我們應當設法使他靠黨底經費來維持生活，使他能夠及時過渡到祕密狀態，使他能夠隨時更換自己的活動地點，否則他就不能獲得豐富的經驗，不能擴大自己的眼界，在與憲兵鬥爭中甚至不能支持到幾年之久。工人羣衆底自發高潮愈深愈廣，他們所能提拔出來的能幹人材也愈多，不僅是能幹的鼓動員，而且是能幹的組織員，宣傳員以及良好的『實際工作者』（這樣的實際工作者，在我們那些多半帶有一點俄國式的懶散呆板性的智識份子中間，是很少見的）。當我們有了受過專門訓練，經過長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當然是『所有各個兵種的』革命家）隊伍的時候，那末世界上任何的政治警察都不能勝過這些隊伍，因為這些由無限忠誠於革命的人組成的隊伍定會獲得極廣大工人羣衆方面同樣無限的信任。我們的直接罪過，就是我們很少把工人『推』到他們應與『智識份子』共同學習革命職業技能的軌道上去，却往往用一些專說工人羣衆和『中等工人』只能『勝任』什麼什麼的愚蠢議論把工人拉往後退。

在這幾方面，也如在其他各方面一樣，組織工作規模狹小的現象，是與縮小我們理論及我們政治任務的觀點有不容置疑而不可分離的（固然是絕大多數『經濟主義者』和新起的實際工作者所不瞭解的）聯繫。人們既懷有崇拜自發性的心理，就害怕稍微離開羣衆『所能勝任的』事情，害怕昇到太高出於簡單適應羣衆目前直接要求。先生們，不要害怕吧！要記着：我們現時在組織方面站的地位低到極點，根本就談不到我們可能昇得太高哩！

(戊)『陰謀』組織與『民主主義』

可是，在我們中間還有很多人非常深諳『時務』，以至最怕昇得太高而責備主張上述意見的人，說他們懷有『民意主義』思想，說他們不懂『民主主義』等等。我們必須把工人事業雜誌當然也立刻響應了的這種責備拿來說說。

本書作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彼得堡的經濟主義者在批評工人報時就已提出過民意主義的罪名（把工人報與工人思想報比較一下，就可知道這是當然的事）。因此，在火星報一成立以後，我們很快就聽見一個同志說某城的社會民主黨人稱火星報為『民意主義』機關報的時候，也就一點都不感覺奇怪。我們當然樂於接受這種責備，因為試問有哪一個嚴正的社會民主黨人不被經濟主義者罵為民意黨人呢？

這種責備是由兩種誤解引起的。第一，一般人很不熟悉革命運動史，竟把凡是主張建立戰鬥集中而向沙皇制度堅決宣戰的組織的思想都稱為『民意主義』思想。但是，七十年代革命家所具有而為我們大家所應奉作為模範的那種優良組織並不是民意黨人所建立起來，而是後來分裂為土地平分黨人和民意黨人的那些土地自由黨人所建立起來的。所以，把戰鬥的革命組織看作是民意黨人所特有的東西，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荒謬絕倫的，因為任何革命派別若是真想作嚴重鬥爭，就非有這樣的組織不行。民意黨人底錯誤並不在於他們極力想把一切心懷不滿的份子吸收到自己的組織中來，引導這個組織去與專制制度作堅決鬥爭，恰恰相反，這正是他們的偉大歷史功績之所在。他們的錯誤却在於他們依靠着實質上並非革命的理論，不善於或不能夠把自己的運動與在發展着的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發生的階級鬥爭密切聯繫起來。祇有絲毫不瞭解馬克思主義的人（或按『司徒盧威主義』精神來『瞭解』馬克思主義的人），才

會認為：羣衆自發工人運動的發生，就解除了我們必須建立如土地自由黨人那樣良好的組織，建立更好得無比的革命家組織的責任。恰恰相反，這個運動正是責成我們這樣作，因為無產階級底自發鬥爭若沒有堅強革命家組織底領導，便不能成爲無產階級底真正『階級鬥爭』。

第二，有許多人——克里切夫斯基大概也在其內（見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第一八頁）——不正確地瞭解社會民主黨人向來所進行的反對『陰謀主義的』政治鬥爭觀的論戰。當然，我們一向都反對，並且始終都要反對把政治鬥爭縮小到陰謀地步的企圖*，但這當然並不是否認堅強革命組織之必要。例如在附註中所指的那本書上，除反對把政治鬥爭歸結爲陰謀行動的那種企圖而外，還擬定了（作爲是社會民主黨理想的）一種非常堅固，能够『爲對專制制度實行致命打擊』而採取『起義』以及任何『其他進攻手段』的組織**。在專制制度的國家裏，這種堅強革命組織按其形式來說可以稱爲『陰謀』組織，因爲法文中的『祕密』一語等於俄文中的『陰謀』一語，而祕密性是這種組織所絕對必需的。祕密性對於這種組織是最必要的條件，其餘一切條件（如組員人數，組員選擇原則，

*參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一書第二一頁，反拉福洛夫的論戰。（見本卷第一六八至一六九頁。——譯者）。

**參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一書，第二三頁。（見本卷第一七〇頁。——譯者）。這裏我們還要順便舉出一個例子，來證明工人事業雜誌或是不懂得自己所講的話，或是『隨波逐流地』改變自己的觀點。在工人事業雜誌第一期上，有一段加有着重點的話：『該書所闡述的基本思想與工人事業雜誌編輯部底綱領完全相合』（第一四二頁）。真的麼？難道那認爲羣衆運動不能以推翻專制制度作爲首要任務的觀點，真與任務一書底基本思想相合麼？難道『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的理論真與任務一書底基本思想相合麼？難道階級論真與任務一書底基本思想相合麼？請讀者判斷一下：像這樣奇特瞭解『相合』一語的機關報，是不是有什麼原則上的穩定性呢？

職能等等)，都應與之相適應。因此，害怕他人責備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想要建立陰謀組織，那就未免是幼稚已極了。這種罪名，也如『民意主義』罪名一樣，是每個反對經濟主義的人所應十分樂意接受的。

有人會反駁我們說：這樣一種嚴守祕密，把一切祕密活動線索都集中在自己手裏的强大組織，這樣一種不得不集中化的組織，也許會過分輕易實行過早的進攻，也許會在政治不滿情緒增長程度，工人階級中間憤怒醞釀程度等等還沒有使此成爲可能和必要的時候，就輕率地把運動加劇起來。我們答覆道：抽象說來，當然不能否認，戰鬥組織也許會引導羣衆去作輕率的戰鬥，這種鬥爭也許會遭受在另種條件下不必遭受的失敗。但是在這樣的問題上決不能以抽象的理由爲限，因爲任何一次戰鬥都含有招致失敗的抽象危險，而除了有組織地準備戰鬥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減少這種危險。但我們根據現代俄國具體條件來提出問題，就會要作出一個肯定的結論：堅固的革命組織之所以絕對必要，正是爲了使運動具有穩定性，使它不致作輕率的進攻。正是在現今缺乏這種組織，而革命運動迅速自發增長的時候，我們已看見有兩個相反的極端（理應『異道同歸的』兩個極端）：一個是毫無根據的經濟主義和穩健主義宣傳，另一個是同樣毫無根據的『激發的恐怖手段』，竟想『在雖已發展鞏固起來，但還近於開端而不近於結局的運動中，用人工方法引起運動結局底徵兆』（引自查蘇利奇所著一文，見曙光雜誌第二第三兩期合刊，第三五三頁）。工人事業雜誌底例子，就是表明現在已經有一些屈服於這兩個極端的社會民主黨人。這種現象之所以毫不足怪，除了其他原因之外，還因爲『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一事永遠也不能使革命家感覺滿意，而兩個相反的極端也就會時而在此地，時而在彼處發生。祇有集中化的戰鬥組織，堅定實行社會民主黨政策而能滿足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志願』

的組織，才能使運動不致舉行輕率的進攻而能準備好必操勝券的進攻。

其次，有人還會反駁我們說：這種組織觀點是與『民主原則』相抵觸的。如果說前面那個罪名是俄國特殊的產物，那末這個罪名就帶有僑外組織的特性。祇有僑外的組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才能除其他各種指令外還向自己的編輯部發出如下一個指令：

『組織原則。為順利發展和統一社會民主黨起見，務必強調，發展和力爭社會民主黨組織底廣泛民主原則，其所以特別必要，是因為在我們黨內發現了反民主傾向』（見兩次代表大會，第一八頁）。

至於工人事業雜誌究竟怎樣與火星報底『反民主傾向』作鬥爭，我們在下一章中便要講到。現在我們且來仔細考察經濟主義者所提出的這個『原則』。大概誰都同意，『廣泛民主原則』包含有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第二，一切職位經過選舉。沒有公開性而來談民主主義是很可笑的，並且這種公開性又不只以對黨員公開為限。我們稱德國社會黨組織為民主的組織，因為在德國社會黨內一切都是公開進行，甚至黨代表大會底會議也是公開舉行；然而一個對所有非組織以內的人都嚴守祕密的組織，却是誰也不會稱之為民主組織的。試問在祕密組織無法執行『廣泛民主原則』基本條件的時候提出這種原則，又有什麼意思呢？『廣泛原則』原來不過是一句雖很響亮但毫無意思的空話。不僅如此。這句空話還證明人們完全不瞭解目前組織方面的迫切任務。大家知道，在我們『廣泛』革命者大眾中間所盛行的不祕密性是十分厲害的。我們已看見伯…夫怎樣悲痛地抱怨這點，他完全公道地要求『嚴格選擇黨員』（工人事業雜誌第六期，第四二頁）。誰知有一些以『談時務』自誇的人，竟認為在這樣的實際情形下特別重要的不是必須嚴

守祕密和極嚴格地（因而也就是比較狹隘地）選擇黨員，而是『廣泛民主原則』！真是胡說八道啊！

關於民主主義底第二個標誌，即選舉制，情形也並不好些。這個條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國家內是不成問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組織章程第一條上寫道：『凡承認黨綱原則並盡力幫助黨者，皆得爲本黨黨員』。既然整個政治舞台都公開擺在大家面前，正如戲台搭在觀衆面前一樣，於是某人承認或不承認黨綱，幫助黨還是反對黨，大家都可以從報紙上，從民衆大會上看得出來。大家都可以知道：某一個政治家起初做過什麼工作，後來又經歷過什麼變化；他在困難時候表現得怎樣，他的一般特點又是什麼，——因此，全體黨員自然都能很有把握地選舉或不選舉他來擔任黨底某種職位。對於黨員在政治舞台上的一舉一動作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監督，就可造成一種能起生物學上所謂『適者生存』作用的自動機構。完全公開性，選舉制和普遍監督底『天然淘汰』作用，使每個活動家都能『各得其所』，各人擔負適合於各人能力的事情，親身嘗到自己錯誤的一切惡果，並在大家面前證明自己能夠認識錯誤和避免錯誤。

試把這種情形應用到我們的專制國家內來吧！要所有『承認黨綱原則並盡力幫助黨』的人都來監督革命家祕密工作者底一舉一動，這在俄國是否可能做到呢？既然一個革命家爲工作利益計，務必使這『全體』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麼人，試問是否可能要求大家選舉某一革命家祕密工作者擔任某種職務呢？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工人事業雜誌所講的那些響亮話底真正意義，就可以知道在專制制度底黑暗局面下，在憲警到處表現淘汰作用的情形下，黨組織底『廣泛民主制』祇是一種毫無意思而且有害的兒戲。其所以是毫無意思的兒戲，是因爲實際上任何一個革命組織從來也沒有實行過廣泛民主原則，而且即使它自己極願意這樣作，也是作不到的。其所以是有害的兒戲，是因爲實行『廣泛民主原則』的企圖，祇能幫助

警察來廣泛破獲我們的組織，永遠保持現時盛行的手工業方式，轉移實際工作者底視線，使其放棄把自己造成爲革命職業家這種嚴重迫切的任務，而去擬製關於選舉制度的詳細的『紙上』章程。這種『民主主義的兒戲』祇有在那些找不到真正實際事體來作的人們常常聚集的僑外條件下，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別是在各種小團體中間流行起來。

爲了向讀者表明工人事業雜誌提出主張在革命事業方面實行民主制的這種雅觀『原則』的慣用手段極不雅觀，我們又要援引一個見證人。這個見證人就是倫敦前夜雜誌編者色列普略可夫，他是個非常同情工人事業雜誌而極端仇恨普列漢諾夫和『普列漢諾夫派』的人。前夜雜誌在專論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分裂問題的文章中，很堅決地站在工人事業雜誌方面，用滔滔不斷的無聊語句來攻擊普列漢諾夫。正是因此，所以我們認爲這個見證人在本問題上更有價值。在前夜雜誌第七期（一八九九年七月）所載論工人自力解放社宣言一文中，色列普略可夫指明說，提出什麼『妄自尊大，領袖地位以及嚴重革命運動中的所謂元老院』問題是『不體面的』，同時他寫道：

『梅實金，洛加却夫，熱略波夫，米海洛夫，貝洛福斯卡婭，斐格涅爾及其他等人，從來也沒有以領袖自命，而且誰也沒有選舉過他們，沒有委任過他們，但他們確實是些領袖，因爲無論在宣傳時期或在與政府鬥爭時期，他們都擔負着最艱苦的工作，總是到最危險的地方去奮鬥，並且他們的活動也最有成效。他們的領袖地位並不是由於他們自己希望所得的結果，而是由於周圍同志對於他們的智慧、毅力和忠誠精神都表示信任的結果。害怕什麼元老院（如果不害怕，又爲什麼要寫它呢），以爲它可以獨斷獨行地指揮運動，那就未免太幼稚了。誰會聽從它呢？』。

我們要問問讀者：『元老院』與『反民主傾向』有何區別呢？工人事業雜誌底『雅觀』組織原則也是既很幼稚，又不體面的，——其所以很幼稚，是因為『元老院』或懷有『反民主傾向』的人物，除非有『周圍同志對他們的智慧，毅力和忠誠精神都表示信任』，是誰也不會聽從他們的。其所以不雅觀，是因為這是利用一部份人愛好虛榮，利用另一部份人不熟悉我們運動實況，以及利用其他一部份人沒有經驗和不熟悉革命運動歷史情形來做投機生意的一種蠱惑手腕。我們運動中的活動家所應進行的唯一鄭重的組織原則是要嚴守祕密，嚴格選擇黨員，造就革命職業家。只要具備有這些品質，就能保證有一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的東西，即革命者間充分的同志信任。而這是我們絕對必要的，因為用民主普遍監督來代替這種信任，在我們俄國是談不到的。若以為無法實行真正『民主』監督，便會有使參加革命組織的人成為不受監督者的危險，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們沒有餘暇去想什麼民主主義（在由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們所構成的狹小核心內部的民主主義）底兒戲形式，但他們非常親切地感覺到自己的責任，並且他們從經驗中知道，真正革命家底組織，為了剷除其中不良的份子，是不擇手段的。況且我們有俄國（以及國際）革命界中頗為發展，由來已久的輿論，這種輿論對於一切離開同志關係（而真正的——不是兒戲的——民主主義，也就是同志關係這個總概念中的一部份哩！）義務的行為，都要予以嚴厲的制裁。你們注意到這一切，就會知道，這些妄談『反民主傾向』的論調和決議所發出的那種為僑外人物所愛鬧的領袖把戲的臭氣，該是多麼濃厚啊！

還須指出，這種論調底另一種來源，即幼稚性，也是因人們對民主制觀念模糊不清而造成的。在維伯夫婦論英國工聯會的書上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章：原始的民主制。作者在那裏敘述說，英國工人在其工會存在的初期曾認為民主制底必要特徵是要由大家來分担工

會管理方面的一切工作：不僅一切問題應由全體處決，並且工會職位也應由全體會員輪流擔任。只有經過了長期歷史經驗以後，工人才知道這種民主制觀念根本虛偽，而明白必須成立代表機關和設置專門負責人員。只有當工會錢庫發生了幾次財政破產以後，工人才明白：所繳會費和所得津貼間的比例問題不能單用民主表決來解決，而是還要有保險事業專家來參加意見。其次，你們讀一讀考茨基論代議制度與國民立法一書，就知道馬克思主義者理論家底結論與『自發』聯合過的工人底多年實踐教訓相合。考茨基堅決指斥里亭豪生對於民主制的鄙陋見解，嘲笑那些藉口實行民主要求『國民報紙直接由國民編輯』的人，證明說專門記者和專門國會議員等等是社會民主黨領導無產階級鬥爭所必需的人物，攻擊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和著作家底社會主義』，說他們因『專求動人觀聽』而鼓吹國民直接立法制，殊不知在現社會中很少有實現這種制度的可能。

凡是在我們運動中實際工作過的人，都知道對於民主制的『鄙陋』見解在青年學生和工人羣衆中間流行很廣。所以，在章程和作品中都有這種見解浸入進去，也就毫不足怪了。伯恩施坦派的經濟主義者在自己的章程上寫過：『第十條：凡與整個協會利益有關的一切事宜，都應由全體會員大多數表決處理之』。恐怖主義派的經濟主義者也隨聲附和地說：『委員會的決議只有經由各小組通過後，才可算是真正的決議』（自由雜誌，第一期，第六七頁）。請你們注意，這樣廣泛實行全民公決制的要求，還是除要求把整個組織均按選舉原則建立以外而提出的哩！當然，我們並不想因此責備實際工作者，因為他們是很少機會認識真正民主組織底理論和實踐的。但當那妄想擔負領導作用的工人事業雜誌在這種條件下竟是單以主張實行廣泛民主原則的決議為限的時候，那我們又怎能不說不過是『專求動人觀聽』而已呢？

(己) 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我們已經看見，凡以這裏所敘述的組織計劃不合民主原則而帶陰謀性質爲藉口來反駁這個計劃的言論，都是毫無根據的，不過還有一個常常被人提出的問題也值得詳細考查一下。這就是地方工作與全俄工作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有人擔心：建立集中制的組織，結果不會使重心從地方工作移到全俄工作上去麼，不會削弱我們與工人羣衆聯繫底堅固性以及一般地方鼓動工作底穩固性，而使運動受到損傷麼？我們答覆道：近年來我們的運動，恰恰因爲地方工作人員過分偏重地方工作而受到損失；因此，把重心稍稍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絕對必要的；這樣移動決不會減弱，而只會加強我們聯繫底堅固性以及我們地方鼓動工作底穩固性。且拿中央機關報和地方機關報問題來說，並請讀者不要忘記：我們不過把辦報的事業當作一個例子來說明更廣泛更複雜得無比的一般革命事業而已。

在羣衆運動第一個時期（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年），地方活動家力求建立全俄機關報，即工人報；在往下一個時期（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年），運動已有一大進步，但領導者底注意力完全耗費在地方機關報底工作上。假使把一切地方機關報合共計算一下，那末結果就是平均每月大約只有一期*。這難道不是顯然表明出我們的手工業方式麼？這難道不是明明證實我們的革命組織落後於運動底自發高漲麼？假使同樣的報紙期數不是由各個散漫的地方團體而是由全國統一的組織來出版，那末我們就會不僅節省了大批的人力，並且會保證了我們工作更大得無比的穩固性和繼承性。這個簡單的理

*見向巴黎國際代表大會的報告，第一四頁：「從那時候起（一八九七年）到一九〇〇年止，各地總共出版了三十期地方報紙…平均每月大約出版一期」。

由，無論是幾乎專為地方機關報（可惜現在還是多半如此）積極工作着的實際工作者，以及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吉訶德先生癡想的政論家，都往往忽略過去了。實際工作者通常都是妄自安慰說：地方工作人員要辦全俄報紙是很『困難』的*；有地方報紙總比沒有任何報紙要好些。後一意見當然是很公正的，而且我們之承認地方報紙一般重要和很有益處，並不亞於任何一個實際工作者。但現在所說的並不是這點，而是說可否擺脫全俄各地方報紙在兩年半內總共只出三十期的事實十分明顯反映出來的那種渙散性和手工業方式呢？請你們不要單只說什麼地方報紙一般是有益處這種雖然無容置辯，但是過份籠統的議論，而要也有勇氣公開承認兩年半時期的經驗所指示出來的地方報紙底短處。這種經驗證明：在我國現今條件下，地方報紙往往是在原則上不堅定，在政治上沒有意義，在耗費革命力量方面非常不經濟，在技術方面絲毫不能令人滿意的（我所指的，當然不是印刷底技術，而是出版底次數和經常性）。所有這些缺點都不是什麼偶然發生的現象，而是必然從一方面可以說明為什麼地方報紙在這時期中佔主要地位，另一方面全靠地方報紙佔主要地位來維持着的那種組織渙散狀態中產生的結果。單個的地方組織，簡直無力保證自己報紙具有原則堅定性和把它提到政治機關報的高度，無力收集並利用充分的材料來說明我國全部政治生活。在自由國家內通常用來擁護必須出版許多地方報紙的理由，即由本地工人印刷時價錢便宜些，並且為地方居民供給消息也更完備更迅速些的這種理由，而在我們俄國據經驗證明却變成了反對地方報紙的理由。這種地方報紙在革命力量耗費上是貴得不堪，出版次數特別稀少，其原因是很簡單的：秘密報紙，無論規模怎樣小，總要有

*這種困難祇是表面上的。其實，沒有哪一個地方小組不能積極擔負全俄事業方面的某種職任。『請不要說我不能作，而祇說我不願作吧』。

一種龐大的祕密機關，而這種機關又需要有大規模的工廠生產，因為在手工作坊中是根本製造不出這種機關來的。祕密機關底原始性，往往（每個實際工作者都知道有許多這類的實例）使警察能利用一兩期報紙底出版和推銷來實行大批的破獲，結果是把一切都剷除得乾乾淨淨，使我們又不得不從頭開始。要建立良好的祕密機關，就要革命家有很好的專門訓練和極澈底的分工，而這兩個條件都是單個地方組織——無論它當時怎樣強固——所辦不到的。且不說我們整個運動底共同利益（給工人以原則上堅定的社會主義的和政治的教育），就是特殊的地方利益，也是要以並非地方性的機關報供應得更好：這驟然看來似乎不近情理，但實則我們所指出的那兩年半的經驗已十分確鑿地證明了這點。誰都會承認：假使把出版了三十期報紙的一切地方力量都用來辦一個報紙，那末這個報紙就一定會很容易出版到六十期之多，甚至能出版到一百期之多，因而一定會更充分地反映出運動中的一切純粹地方性質的特徵。這種共同的組織工作當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須使我們大家都瞭解這種工作的必要。必須使每個地方小組都關懷並積極從事這種工作，不要等待外來的推動，不要迷信地方機關報有容易辦理和接近地情的優點，其實這種優點根據我們的革命工作經驗看來大部分都是虛幻的。

所以，那些自以為特別與實際工作人員接近的政論家實在是妨害着實際工作，他們看不見這種虛幻性，却用一種極便宜和極空洞的議論來支吾搪塞，說需要有地方報紙，需要有省區報紙，需要有全俄報紙。當然，一般講來，所有這些都是需要的，但你既着手來解決具體的組織問題，也就需要想一想環境和時局底條件。例如，自由雜誌（第一期，第六八頁）專門『談論報紙問題』的時候，竟說『我們認為，凡是稍大的工人集居地點都應有本地的工人報——不是從別地運來而是本地出版的工人報』，這難道不是吉訶德先生

的癡想麼？假使這位政論家不願思索他自己所說的這些話底意義，那就請讀者來替他思索思索吧：俄國有幾十個——甚至幾百個——『稍大的工人集居地點』，如果真是每個地方組織都來創辦本地的報紙，那就會使我們的手工業方式永遠繼續下去了！這種渙散現象就會使我國憲兵十分容易捉拿——不費『稍大的』力量來捉拿——地方活動份子，在他們一開始活動時就把他們拿獲，不讓他們發展成爲真正的革命家！該文作者又繼續寫道：在全俄的報紙上敘述某某廠主齷齪勾當和『各個城市的（不是本城的）工廠生活中的瑣事』是沒有趣味的，而『奧勒爾城的人讀到奧勒爾本城的消息時，却就不會感覺無趣了。他一知道把誰『罵了一頓』，把誰『揍了一頓』，便會精神大振起來』（第六九頁）。不錯，奧勒爾城的人是會精神大振起來的，可是我們的這位政論家底思想未免也太『大振』了。這種辯護小氣政策的態度是否適當呢？——這才是他所應當思索思索的問題哩。在承認揭露工廠黑幕的工作必要和重要這一點上，我們並不遜於任何人，可是要記着：我們的情形已弄到這種地步，甚至彼得堡人讀到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思想報上的彼得堡通訊時，也都感覺無趣了。對於揭露各地工廠黑幕的工作，我們一向都印發過傳單，並且始終都要印發這種傳單，但是報紙式的刊物，我們却應把它提高而不應把它降低到工廠傳單的地步。我們在『報紙』上所要揭露的主要並不是什麼『瑣事』，而是工廠生活中巨大和標本的缺點，這種揭露既然是以特別顯著的事實爲例證，也就能使全體工人和所有領導運動的人都感覺興趣，能真正充實他們的知識，擴大他們的眼界，開始激動起新的區域和新的行業工人。

『其次，在地方報紙上能把工廠當局或其他當局底一切罪行都就地拿獲，立刻揭破。等到一個消息傳至遠在異地的全國報紙的時候，本地地方的人早已把它忘記了：『究竟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唉，記不起來了！』。是啊，記不起來了啊！同時我們又聽見那個人說：兩年半所出版的三十期報紙是在六個城市裏印行的。這就是說，一個城市平均半年出版一期報紙！即使我們的這位輕浮的政論家在自己的設想中把地方工作底生產率提到三倍（這對中等城市來說是絕對不正確的，因為在手工業方式範圍內是無法大大提高生產率的），——那末結果也不過是兩個月出版一期，即絲毫也不像什麼『就地拿獲』。但是，如果十個地方組織聯合起來，派遣自己的代表去積極辦理一個全國報紙，那就可以每兩星期把全俄各地發生的一些並非細小瑣事而是真正顯著的標本的惡現象通通『拿獲』一次。這是任何一個熟悉我們各地組織中的實況的人都不會懷疑的。至於就地拿獲敵人，假使我們是講正經話而不是空口說白話，那就根本不是祕密報紙所能做到的事情：這樣的事情祇有用及時散發的傳單才可做到，因為實行這種拿獲的最大期限往往是不能超過一兩天時間的（例如普通的短期罷工，或是工廠中的鬥毆事件，或是示威遊行等等）。

『工人不僅是在工廠內生活，並且是在城市內生活』，——我們的這位作者用一種甚至比克里切夫斯基也要更加澈底一貫的態度來從局部問題談到一般問題時繼續寫道。於是他就指出城市杜馬，城市醫院，市立學校等問題，並要求工人報紙干預一般城市事宜。這一要求本來是很好的，但它特別明顯地表明人們在談論地方報紙問題時往往是單以一種空泛的抽象見解為限。第一，如果真是『在一切稍大的工人集居地點』都出版一種關有自由雜誌所想的那樣詳細的本城消息欄的報紙，那末這在我們俄國的條件下就不免要變成真正是小氣的政策，不免要削弱人們對於必須向沙皇專制制度舉行全俄革命攻擊這一點的覺悟，不免要使那因說過一句責備革命家們的名言，即因責備他們關於尚不存在的國會談得太多和關於已經存在的城市杜馬講得太少而聲名大振的那個派別底幼芽加強起來，

這種幼芽還很有生氣，祇是暫時隱藏起來或受到壓抑而遠未連根拔除。我們所以說『不免』，是要藉以着重指出：自由雜誌顯然不願意有這種結果而願意有相反的結果。可是，單靠一種善意願望還不够。爲要使對於城市事宜的說明適合於我們全部工作的方向，首先就要不是單用一些推論，而且要根據許多實例把這個方向充分明確規定出來，確切規定起來，使其成爲堅固的傳統。我們現在還遠沒有做到這一點，而這一點却是我們首先就要具備，然後才可想到，才可談到廣泛地方報紙問題的。

第二，要真正很好而有興味地描寫城市事宜，就要熟悉這些事宜而不是單從書本上知道這些事宜。但具有這些知識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全俄各地差不多完全沒有。要在報紙上（而不是在通俗的小冊子上）敘述城市的和國家的事宜，就需要有新鮮的，各方面的，由能幹人收集起來並整理過的材料。但爲要收集和整理這樣的材料，憑靠原始小組中所實行的那種原始『民主制』，即大家共同料理一切，並愛以全民表決制爲兒戲的『民主制』，當然是不够的。爲此就需要有專門作家，專門記者所組成的大本營，需要有社會民主黨人訪員隊伍，這些訪員到處都建立聯繫，善於探悉所有各種『國家祕密』（俄國官吏時常以這種『祕密』自傲，而且時常隨便將其洩露出來），善於混進一切『後台』裏去，——需要有『因職務關係』而應該無孔不入和無所不曉的人所組成的隊伍。我們這個反對任何經濟、政治、社會和民族壓迫的政黨，能够而且應當去找到，收集，訓練，動員並調派這支通曉一切的人員所組成的軍隊向前去作戰，——但這還是尚須做到的事哩！我們在絕大多數地方不僅沒有採取實現這點的一切步驟，甚至常常沒有覺悟到實現這點的必要。你們試試在我們社會民主黨的報紙上去尋找生動有趣的論文，通訊以及揭露我國外交、軍事、教會、市政、財政以及其他等等方面大小事宜的文字吧，——那末你們不是幾乎完全找不到，便是很少能

找到*。所以『當一個人跑來講一些很美妙動聽的話』，說什麼必須『在每一個稍大的工人集居地點』出版一個揭露工廠方面，城市方面以及國家方面一切黑幕的報紙的時候，『我總是異常氣憤』！

地方刊物比中央刊物佔優勢，這若不是貧乏底表現，便是奢華底表現。當運動還沒有創造出充分力量來從事大生產時，當運動還拘泥於手工業方式，差不多還沉溺在『工廠生活瑣事』中間的時候，就是貧乏底表現。而當運動已完全能執行各方面揭露工作和各方面鼓動工作的任務，因而除掉中央機關報之外，還需要有許多地方機關報的時候，就會是奢華底表現。現時我們地方報佔優勢的情形究竟是表明什麼，讓每個人自己去判斷吧，而我只是想把自己的結論確切表述出來，以免引起誤解。我們的大多數地方組織至今都是幾乎祇想到地方機關報，幾乎是專為地方機關報而積極工作。這是不正常的情形。其實是應當恰巧相反：大多數地方組織首先應關懷全俄報紙，首先應為全俄報紙而工作。在沒有做到這點以前，我們就辦不成一個多少能夠用刊物上的全面鼓動來幫助運動的報紙。而當這一點已做到時，必要的中央機關報與必要的地方機關報的正常關係就會自然建立起來了。

* * *

驟然看來，關於必須把工作重心從地方工作移到全俄工作上去的結論，似乎是不能適用於專門經濟鬥爭的範圍，因為工人在這裏

*所以甚至那些非常優良的地方機關報工作的例子，也能完全證實我們的觀點正確。例如南方工人報本是一個很好的機關報，它在原則堅定性方面是完全無可非難的。但是，它所想給予地方運動的東西却因出版次數稀少並常遭大批破獲而沒有做到。目前對於黨比什麼都更迫切的事情，即原則上提出運動底根本問題和進行各方面政治鼓動工作，原來是這種地方機關報所無力做到的。而它所給予的特別好的東西，如論礦業主代表大會，論失業問題的文章等等，却又不一種純粹地方性的材料，並不只是南俄所需要而是全俄各地都需要的東西。這樣的文章，是在所有我們社會民主黨刊物上都從未見過的。

直接遇見的敵人乃是單個企業家或單個企業家集團，這個敵人沒有結成強固的組織，絲毫不像我們在政治鬥爭中所直接遇見的敵人，即俄國政府那樣擁有十分集中，連極瑣細事情都由統一的意志來指揮的純粹軍事組織。

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我們已經屢次指出：經濟鬥爭是一種職業性的鬥爭，因此它需要有按工人職業標準而不只是按工人工作地點組成的團體。我國企業家結合成為各種公司和新迪加的過程來得愈迅速，工人的這種職業團體也就愈加迫切必要。我們的渙散現象和手工業方式直接妨礙這種聯合，因為這種聯合需要有能夠領導全俄一切職工會的全俄統一的革命家組織。我們上面已經講過為此目的所必須建立的那種組織，現在我們只想在講到我們的刊物問題時補充幾句。

在每個社會民主黨報紙上都應關有職工鬥爭（經濟鬥爭）一欄，這是誰也不會懷疑的。但是職工運動底增長，也使人不得想不到職工刊物問題。但我們覺得，俄國除了極少的地方，暫時還談不到職工報紙問題。這是一種奢侈品，而我們往往連糊口的麵包都沒有哩。在我國適合於秘密工作條件並且現在已成為必要的職工刊物形式，應當是職工小冊子。在這種小冊子裏必須把一切說明某行職業中勞動條件，本行勞動條件在俄國各個地方的區別，本行職業工人底主要要求，凡與本行職業有關的立法方面的缺點，本行工人經濟鬥爭中的顯著事件，他們職工組織底萌芽、現狀、需要及其他等等問題的公開發表的*和秘密的材料都收集起來，並加以有系統的整

*在這一點上，公開發表的材料特別重要，而我們經常收集和利用這些材料的工作却特別落後。可以毫無誇大地說：單是根據公開發表的材料，還可以勉強寫一本職工小冊子，而單是根據秘密材料，却就辦不到了。我們從工人那裏來收集像工人思想報所發出的那些問題的秘密材料，便要空費革命家底大批力量（在這方面，公開的活動家是能很容易代替革命家的），而且始終得不到好的材料，因為工人

理。這種小冊子，第一，能使我們的社會民主黨刊物不必記載許多祇會引起某一行業工人注意的職業詳情；第二，這種小冊子能把我們的職工鬥爭經驗底結果記載起來，能把我們所收集而現時簡直沉沒於許多傳單和片斷通訊中的那些材料保存起來，並加以綜合；第三，這種小冊子能成爲鼓動員底一種工作指南，因爲勞動條件變更得較爲緩慢，某一行業工人們底基本要求非常穩定（請參照一八八五年莫斯科區織布工人底要求和一八九六年彼得堡區織布工人底要求），這種種要求彙集起來，便可成爲在多年內對於落後地方或落後工人階層中進行經濟鼓動的良好參考材料；某區罷工勝利的例子，某地生活水準較高以及勞動條件較好的消息，都能鼓勵別地工人奮起鬥爭；第四，社會民主黨既然負起了要把職工鬥爭綜合起來的首倡責任，並以此把俄國職工運動與社會主義間的聯繫鞏固起來，就會同時注意使俄國工聯運動的工作在我們社會民主黨全部工作中所佔的地位不致太大，也不致太小。地方的組織若與其他城市中的組織隔離，就會很難，甚至幾乎不能保持這一方面的正確比例（而且工人思想報底例子，證明在這方面竟可把工聯運動誇大到不

往往只知道大工廠中的某一部分，差不多始終只知道自己勞動底經濟結果，却不知道自己勞動底一般條件和標準，所以他們根本無法獲得工廠職員、檢查員和醫生等等所具有的那些知識，以及散見於報上所載無數細小通訊與專門論述工業問題，論述衛生問題的出版物和自治局刊印的出版物等等的那些知識。

我很清楚地記得我永遠也不會去重複的那個『初次嘗試』。我當時費了好幾個星期的工夫，無微不至地『盤問了』一個常到我處來的工人，要他把他在做的那個大工廠內的一切種種情形告訴我。不錯，我費了很大的力量，終究勉強寫了一篇關於這個工廠（僅僅關於一個工廠哩！）情形的文章，可是這個工人在我們談話完結時往往一面擦汗，一面對我微笑地說：『回答你的問題，比作加工還難！』。

我們愈是積極進行革命鬥爭，則政府也就會愈加迫不得已而承認一部分『職工』工作爲合法工作，因而卸去我們身上的一部分負擔。

堪設想的地步)。但全俄的革命家組織既然始終站在馬克思主義觀點上，領導着全部政治鬥爭，且擁有專門的鼓動員大本營，所以它在決定這種正確比例時永遠也不會感到什麼困難。

(五)全俄政治報『計劃』

『火星報在這方面的最大錯誤』，——克里切夫斯基責備我們有『使理論脫離實踐而將其變為死板信條』的傾向時這樣寫道（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第三〇頁），——『就是它那個全黨組織『計劃』』（即從何着手？一文）。馬爾丁諾夫也附和他說：『火星報傾向於輕視日常平凡鬥爭漸進行程底意義而偏重燦爛完備思想底宣傳… 結果就在第四期上所載從何着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全黨組織計劃』（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第六一頁）。末了，拿齊金近來也響應了對此『計劃』（括弧想必是表示對這個計劃的諷刺）表示憤懣的人們。我們剛收到了他所著的革命前夜一書（這本書是我們已說過的那個『革命社會主義的』自由雜誌社出版的），其中說道：『現在來說什麼以全俄報為中心的組織，就是培植研究室內的思想 and 研究室內的工作』（第一二六頁），就是『文人習氣』底表現等等。

我們的恐怖主義者與『日常平凡鬥爭漸進行程』擁護者原來是志同道合，——這在我們論政治輿論組織的那幾章內考察過他們這樣接近的根源以後已經不能使我們驚奇了。但我們馬上就應當指出：拿齊金，並且祇有他一人曾企圖用誠意態度來考察他所不喜歡的這篇文章底內容，曾企圖切實回答這篇論文，——而工人事業雜誌却沒有講一句切實話，祇是極力用一大堆無聊的蠱惑人心的胡言暴語來模糊問題。於是，無論我們怎樣感覺不快，也只好費些時間來首先清洗這間骯髒的馬廄。

(甲) 誰因從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氣呢？

我們且把工人事業雜誌用以攻擊我們的那一大堆字眼和感嘆詞句摘引如下。『並不是一個報紙可能建立黨的組織，而是相反』…『一個站在黨上頭，不受黨監督並因擁有自己的代辦員網而離黨獨立的報紙』…『爲什麼火星報居然忘記了它自己所屬的那個黨內實際存在的社會民主黨人組織呢？』…『擁有堅定原則和相當計劃的那些人，同時也就是全黨實際鬥爭底最高支配者，他們命令全黨去執行他們的計劃』…『這一計劃把我們一切生動和富有生命能力的組織都趕入陰司地府，並想把一個幻想性的代辦員網呼喚到人世上來』…『火星報底計劃若被實現起來，那它結果就會使我們這個已在確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踪跡盡被剷除』…『一個宣傳性的刊物竟成爲對於全部實際革命鬥爭擁有不受監督的專制權柄的立法機關』…『我們的黨對於強迫它完全服從一個自治編輯部這點，究竟採取何種態度呢』等等，等等。

讀者從上述一段引證底內容和口氣中可以看出，工人事業報是生了氣了。但它之所以生氣，並不是爲自己抱不平，而是爲我們黨內彷彿是火星報所想驅進陰司地府，甚至想根本剷除其踪跡的那些組織和委員會抱不平。真了不起呀！不過有一點令人覺得奇怪。從何着手？一文是發表於一九〇一年五月，工人事業雜誌上的那些論文是發表於一九〇一年九月，而現在則已是一九〇二年一月中旬了。在這五個月間（無論是在九月以前或在九月以後），黨內沒有一個委員會和沒有一個組織提出過正式抗議來反對這個想把各個委員會和各個組織驅進陰司地府的怪物！同時，在這期間內，無論是在火星報上，亦無論是在許多其他的地方出版物或非地方出版物上，却又發表過數十百篇從俄國四方八面寄來的通訊。爲什麼人家

所想將其驅進陰司地府的那些人居然沒有覺察到這點，沒有因此生氣——而生了氣的却竟是第三者呢？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各個委員會以及其他的組織都忙於真正的事業，並不玩弄『民主』把戲。各個委員會都讀過了從何着手？一文，都認定這乃是想『製定出一個相當的建立組織的計劃，使大家都能從各方面一齊着手建立這個組織』的一種嘗試，同時又因為它們都很清楚地知道並且分明看見，『這各方面』中的無論哪一方面在還沒有相信這個建築的必要和建築計劃的正確以前是決不想到要『着手建築』的，所以它們也就自然沒有想到要因有人在火星報上擅敢說過如下一段話而表示生氣，這段話就是：『因為本問題迫切重要，所以我們特向各同志提出一個計劃草案來請大家討論，我們刻正準備付印的小冊子將把這個計劃詳細加以發揮』。如果同志們將採納這個提供他們討論的計劃，則他們執行這個計劃就不是由於『被迫服從』，而是由於相信它為我們共同事業所必需；如果他們不採納這個計劃，則這一計劃底『草案』（你看這是個多麼奢望的字眼啊？）就會始終不過是個草案，——難道這不是每個誠懇看待問題的人都容易瞭解的事情麼？如果在攻擊一個計劃草案時不只是局限於『譴責』這個計劃並勸請同志們拒絕這個計劃，却竟唆使那些對於革命事業很少經驗的人去攻擊計劃起草人，其所以實行攻擊，又只是因為該計劃起草人擅敢『立法』，擅敢充當『最高的支配者』，即擅敢提出一個計劃草案，——難道這不是一種蠱惑人心的手段呢？如果人們對於一種想把地方工作者提高到更廣闊的見解、任務、計劃等等水準上來的企圖提出反駁，並不是由於自己認為這種見解不正確，而只是因為『埋怨』人家『想』把大家『提高』一步，——試問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黨怎樣會發展，怎麼會向前進展呢？拿齊金也曾『譴責』過我們的計劃哩，然而他沒有使用過並非單只由於政治見解幼稚或政治見解粗俗所致然的蠱惑手段，

而是自始就毅然決然排斥了所謂『監察全黨』這一罪名。因此談到拿齊金對於本計劃所作的批評時，我們可以並且應該給他一個切實的回答，而談到工人事業雜誌所提出的批評時，我們却就只能以鄙視答之了。

雖然我們對於一個墮落到叫喊起什麼『專制』和『被迫服從』來了的作家應該表示鄙棄，但這還不是說我們因此就不應該去打破這種人供給讀者們的糊塗觀念。只有這樣去作，才能使大家明白認識這種空談『廣泛民主』的流行議論究竟是怎樣一種貨色。人家責備我們，說我們忽略了各個地方委員會，說我們要想或企圖把它們驅進陰司地府等等。既然我們迫於目前祕密工作條件，幾乎連任何一件涉及我們對各個地方委員會真實關係的事實也不能向讀者說明，試問我們又怎能回答這種責難呢？信口提出一種能於激動愚衆的責備的那些人居然站到了我們前面，因為他們無所顧忌，因為他們根本鄙視革命者必須把自己所擁有，所建立或力圖建立的一切關係和一切聯系都仔細隱諱起來的責任。所以，我們也就根本拒絕在『民主制』方面去同這班人競爭。至於說到那些不諳黨內一切事務的讀者，那末我們執行我們對這種讀者應盡義務的唯一辦法，就不是要敘說現有的情形和處 *in Werden** 的情形，而是要敘說一小部分早成過去，因而可以當作已往事實敘述出來的情形。

崩得暗指我們『擅自稱王作霸』**，旅外『聯合會』責備我們企圖把黨底踪跡剷除。諸位先生！好吧。我們只須向讀者敘說出已成過去的四件事實，就能使你們心滿意足了。

第一件***事實。一個『鬥爭協會』中直接參加過我黨成立事業

*意即『在生長過程中』。——譯者。

**見火星報第八期所載一文：『俄波猶太工人總同盟』中央委員會對我們論民族問題一文的答辯。

***我們故意把這些事實列舉得與其實際發生次序不合⁹⁰。

以及派代表出席我黨成立大會一舉的幾位會員，曾同火星社中一份子商定要出版一批專供全部運動需要的工人叢書。出版工人叢書的計劃沒能實現，但預備印成工人叢書出版的兩本書，即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和新定的工廠法令，終於由第三者帶到國外去付刊了。

第二件事實。崩得中央委員會幾個委員向火星社中一份子建議，說要共同成立一個如崩得當時所說的『著作實驗所』。同時他們還說，假如這件事情辦不到，那末我們的運動就會大大退步。談判結果便是俄國工人事業一書**。

第三件事實。崩得中央拜託一個外省市鎮組織來向火星社中一份子接洽，說要請他負責編輯準備復刊的工人報，結果當然是獲得了同意。後來這一建議有所改變：此時已是請他擔任撰稿工作，因為關於編輯人員問題已有一種新的計劃。這一提議當然也獲得了同意。接着就寄去了如下幾篇論文稿子（這幾篇論文稿子是保存下來了的）：我們的綱領——內容是直言不諱地聲討伯恩施坦主義，反對合法刊物及工人思想報上所發生的轉變；我們的最近任務（內容是說要『組織經常出版而與一切地方團體密切聯繫的全黨機關報』；揭露目前盛行的『手工業方式』上的弊病）；迫切的問題（批判認為在着手出版共同機關報以前必須先發展各個地方團體工作的這種反駁意見；堅決認定『革命組織』有頭等重要意義，即認為必須『使組織、紀律和祕密工作技術臻於完善地步』）。工人報復刊計劃沒有實現，於是這幾篇論文也就沒有刊載出來。

*參看本卷第一五七至一七四頁。——譯者。

**順便說說，該書作者託我代他聲明一句，說他該書底手稿也如他先前所寫幾本書底手稿一樣——寄交『聯合會』，原來是料想『聯合會』出版物仍由『勞動解放』社編校（由於某些客觀原因，他當時，即在一八九九年二月間還不能知道負責編輯人員變史的事實）。這本書很快就會由同盟⁸¹負責重版。

第四件事實。一個委員會中有一個負責籌備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委員將大會開會大綱通知給火星社中一個成員，並把該社推舉為擔負預備復刊的工人報編輯責任的候選人。他採取的這一所謂預備步驟，隨後又經他本人所屬的那個委員會以及崩得中央委員會正式批准；火星社接到了關於大會召集地點和日期的通知，但它恐怕由於某些客觀原因不能派遣代表去參加這次大會，於是就也寫了一個提交大會的書面報告。這個報告所包含的意思是說：在目前離散狀態盛行的時候，我們單祇選出一個中央委員會是不僅不能解決統一問題，並且會不免使偉大的建黨思想喪失信用，因為在目前大家都不闡秘密工作的情況下一定很快又會遭到全部破獲；所以，第一步工作應該是號召一切委員會及其他一切組織來支援已經恢復的共同的機關報，這個機關報將使一切委員會彼此用事實上的聯繫真正聯成一氣，並真正造就出一個全部運動領導者集團，而當這樣一個由各委員會所造成的集團充分成長和鞏固起來的時候，各委員會和黨就能很容易把它變成爲中央委員會了。可是，代表大會竟因有幾次破獲事件發生而沒有召集成功，於是這個報告也就由於必須保守秘密而被銷燬了，讀到這個報告的只有很少幾位同志，包括一個委員會所派出的幾位特派員在內。

現在且請讀者自己來判斷，如崩得暗指我們擅自稱王作霸，或如工人事業雜誌硬說我們想把各個委員會驅進陰司地府，硬說我們想用傳播一個報紙思想的組織事業來『代替』全黨組織事業這一類手段，究竟是怎樣一種手段吧。其實，我們正是按照各個委員會再三提出的申請而向各個委員會作過報告，說必須採取一定的共同工作計劃。正是爲了全黨組織事業，我們在寄給工人報發表的論文以及提交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發揮過這個計劃，並且我們這樣來作，又是根據於那些在黨內站有很隆重地位，因而敢於擔負舉辦我黨恢復（事實上恢復）事業發起責任的人們所提出的請求。只是在黨組

織想和我們一同來正式恢復黨中央機關報的兩次嘗試均遭失敗後，我們才認為絕對應該創辦一個非正式的機關報，使得同志們在作第三次嘗試時有相當實驗結果可以拿來參照，而不只是從事於憑空的推測。現在這一實驗所提供的某些結果已是有目共觀，所以全體同志都能作一判斷：一方面可以判明究竟我們是否把我們應盡的責任瞭解得正確；另一方面又可以判明，那些埋怨我們不該指出其在「民族」問題上態度不澈底，或埋怨我們不該指摘其懷有無原則傾向，因而企圖把一些不悉不久以前情形者引入迷途的人究竟是些什麼人。

(乙) 報紙能否成爲集體的組織者呢？

從何着手？一文底全部要點，正在於提出這個問題並給以肯定的回答。我們知道，只有拿齊金一人才企圖過切實分析這個問題，並證明必須給以否定的回答。我們且把他的論據全部引錄如下：

「…我們很喜歡火星報（第四期）提出全俄報紙必要的問題，但我們絕對不能同意說這種提法與從何着手？一文底標題相合。這當然是一種極重要的工作，但能奠定革命時期所需要的戰鬥組織始基的並不是這種工作，並不是連篇累牘的通俗傳單，並不是浩如煙海的宣言。必須在各地着手建立強有力的政治組織。我們還沒有這種組織，我們主要是在有知識的工人中間工作過，而羣衆差不多祇進行過經濟鬥爭。如果不在各地培養出強有力的政治組織，那末縱使辦得有極好的全俄報紙，又會有什麼意思呢？自焚樹老是在那裏燒着，總燒不完，但也不會燒熟任何人！火星報以爲民衆一定會在全俄報周圍，在爲建立全俄報的事業上集合起來，組織起來。其實民衆在更具體的事業周圍是會更親切得多地集合和組織起來的！普

遍創辦地方報，立刻準備工人力量去作示威遊行，由地方組織在失業工人中間經常進行工作（努力不斷地在他們中間散發小刊和傳單，召集他們開會，號召反抗政府等等），——這就是可以成爲而且應當成爲上述那種更具體事業的工作。我們要在各地佈置生動的政治工作，而當在這個實際的基礎上統一成爲必要的時候，那它就會不是什麼人工造成的統一，不是紙上的統一了。這樣把各地方工作統一成爲全俄事業的任務，決不是用報紙可以辦到的！」（革命前夜，第五四頁）。

我們在這一段鮮明議論中所着重指出的那些字句，最明顯不過地表明出，該文作者對我們計劃的估計，以及他在此地拿來與火星報對立的一般觀點，都是不正確的。假使不在各地培養出強有力的政治組織，那末極好的全俄報紙也不會有什麼意思。——這話完全正確。但問題就在於除了利用全俄報紙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培養成強有力的政治組織。作者忽略了火星報在說明它的『計劃』以前所作的那個極重要的聲明：必須『號召大家來造就革命組織，使其不僅按名稱而且在事實上能夠統一所有一切力量，領導運動，即是要隨時都能很有準備地援助一切抗議和一切發動，藉以增加和鞏固可供決戰用的軍事力量』。現時，在二三兩月事變後，——火星報繼續寫道，——在原則上大家都會同意這一點，但我們並不是需要在原則上而是需要在實際上解決問題，我們必須立刻提出一個明確的建築計劃，使大家都能立刻從各方面來從事這種建築工作。但人們又把我們拉向後退，使我們離開實際解決問題的事情，回轉去空談那個原則上正確的，不容置辯的，偉大的，然而全不充分的，爲廣大工作人員羣衆所全不懂的真理：『培養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可敬的作者呵，現在問題已不在此，而是在究竟要怎樣來培養並養成這種組織！

『我們主要是在有知識的工人中間工作，而羣衆差不多祇進行過經濟鬥爭』這一說法，是不正確的。這種說法恰與自由雜誌慣於把有知識的工人和『羣衆』對立起來的那種根本錯誤觀點相合。近幾年來，我們的有知識的工人也『差不多祇進行過經濟鬥爭』。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是我們不幫助有知識的工人和智識份子培養成爲政治鬥爭底領導者，那末羣衆永遠也學不會進行政治鬥爭的；而爲要養成這種領導者，又祇有憑靠經常和隨時估計我國政治生活底各方面，估計各個階級因各種緣由實行反抗和鬥爭的一切企圖，才可做到。所以一方面說『培養政治組織』，同時又把政治報底『紙上事業』與『各地方的生動政治工作』對立起來，那就簡直是可笑之至！火星報也就是把自己的辦報『計劃』引伸爲養成一種『戰鬥準備性』來援助失業工人運動，農民騷動，地方自治派不滿情緒以及『民衆反沙皇暴吏的怒潮』等等的。凡熟悉運動實況的人，都十分知道：絕大多數地方組織連想也沒有想到這點；這裏所擬定的『生動的政治工作』任務有許多還沒有由任何一個組織實行過一次，例如當有人試圖要大家注意地方自治派智識份子中的不滿和反對情緒增長事實時，拿齊金（他說，『上帝呀，這個機關報莫不是爲地方自治派出版的麼？』，——見革命前夜，第一二九頁），經濟主義者（火星報第十二期上所發表的那封信），以及許多實際工作者都感到茫然莫解。在這種情形下，也就祇能這樣來『着手』工作，即首先喚起人們想到這一切，喚起人們來歸納和綜合所有一切風潮和積極鬥爭底表現。現在當社會民主黨任務被人降低的時候，『生動的政治工作』祇能從生動的政治鼓動工作着手，而生動的政治鼓動工作却又非有時常出版和準時推銷的全俄報紙不可。

把火星報『計劃』視爲『文人習氣』表現的人，完全沒有懂得計劃底實質，竟把提作目前最適當手段的東西當成目的。這些人沒有

用心想一想我們所用來說明這一計劃的兩個比喻。出版全俄政治報的工作，——在火星報上說道，——應當成爲我們所能藉以不斷發展、加深和擴大這個組織（即隨時都能很有準備地援助一切抗議和一切發動的革命組織）的基本線索。請你們說吧：當石匠在各個地點放置石頭，以建造一座非常巨大而前所未見的建築的時候，牽引出一根線來指明放置石頭的適當地點，指明全盤工作底最終目的，不僅使每一塊石頭而且使每一小片石頭都能一一運用，使其相互銜接起來構成一座完整而包括一切的大廈輪廓，這是不是『紙上的』事情呢？我們黨的生活現在所處的情形，豈不正是既有石頭，又有石匠，但是缺少一根使大家都能看見，使大家都可把握住來進行工作的引線麼？讓人家去叫喊，說我們牽出一根引線是想號令一切吧！先生們，假使我們真想號令一切，那我們就不會標明爲『火星報第一期』，而會標明爲『工人報第三期』了，——有些同志會勸我們這樣來作，並且我們在上述那些事件發生後本來有十足的權利這樣作。但我們並沒有這樣作，因爲我們是想留下一雙毫無束縛的手來與一切假社會民主黨人作不可調和的鬥爭；我們當時希望，如果我們的引線牽得正確的話，那末人們尊重這根引線就是因爲它牽得正確，而不是因爲它由一個正式機關報所牽引出來。

『將地方活動統一到中央機關內的問題，——拿齊金這樣教訓我們說，——真是在一個迷堂裏兜圈子；要造成統一，就需要成份一致，而這種一致又祇能由某種具有統一作用的東西才可造成，但這種有統一作用的東西，又祇能是強大地方組織底產物，而目前各個地方組織又是並不一致的』。這個真理，也如說什麼要培養強大政治組織的真理一樣可敬，一樣不容置辯，而又一樣無聊。任何問題都可以說是『在一個迷堂裏兜圈子』，因爲全部政治生活都是由茫無終極的一串連環組成的一條茫無終極的鏈條。政治家底全部藝

術也就在他能找到並緊緊握住最不容易從手中脫去，目前最關重要，且最能保障握住它的人去握住整個鏈條的那個環節*。假使我們有一大批老練的石匠，彼此都聲應氣投，同心協力工作，即使沒有什麼引線，也能把石頭放置在適當的地點（抽象地說來，這並不是不可能的），那時候我們也許可以去握住另一個環節了。但是不幸我們現在還沒有一些老練而聲應氣投，同心協力工作的石匠；石頭往往放置得全不適當，不是按一根總的引線來放置，而是放置得非常參差，竟使敵人很易把它們拆散，好像這不是什麼石頭，而是一堆沙子。

第二個比喻：『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在後面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把報紙比作建築架：它指出建築物底輪廓，便利着各建築匠間的聯絡，幫助他們分配工作並考察有組織的勞動所達到的總成績』**。這豈不真好像是文人，坐在研究室裏的人誇大自己的作用麼？建築架對於住房本身並不需，它是用很壞的材料架設起來的；它樹立起來，只是供一個很短時期的使用，祇要住房大體完成，人們就會把建築架拆掉當做柴燒的。至於革命組織底建築問題，則經驗證明，有時候，即使沒有建築架，也可把它建築成功，——七十年代的例子就是一個明證。但在現時，我們沒有建築架，便根本不能建築起我們所需要的房屋。

拿齊金不同意這點，而說道：『火星報以為民衆一定會在全俄

*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和馬爾丁諾夫同志！你們注意到這種橫蠻表現『專制』，『不受監督的威權』，『最高支配權』等等的情形吧。你看，有人想要握住整個鏈條哩！！趕快寫申明書去控告吧。工人事業雜誌第十二期可以用這個現成題目寫出兩篇社論來了！

**馬爾丁諾夫在工人事業雜誌上引證了這段話底第一句（第十期，第六二頁），而恰巧刪掉了第二句，正好像是要藉以着重說明他不願講到問題實質或不能瞭解這個實質似的。

報週圍，在爲建立全俄報的事業上集合起來，組織起來。其實民衆在更具體的事業週圍是會更親切得多地集合和組織起來的！』。對呀，對呀，『在更具體的事業週圍是會更親切得多』…俄國俗話說：不要把痰吐到可以用得着的井裏去。但是也有人甘願去喝吐進了痰的井裏的水。爲了這種更大的具體性，我們的那些很漂亮的合法的『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人』和祕密的工人思想報崇拜者，竟說出了怎樣卑鄙醜惡的話來了呵！你看，我們的全部運動竟被我們的狹隘眼界、消極態度和怯懦心理所壓抑到何等地步，公然有人用什麼『在更具體的事業週圍是會更親切得多』的傳統理由來辯護這種病態現象！拿齊金自以爲是特別深諳『時務』，特別嚴格地斥責『坐在研究室裏的』人，責備（以自作聰明的神情來責備）火星報愛把什麼都看作經濟主義，而自以爲是比正統派和批評派雙方都高超得多，却不知道他提出這些論據只是幫助了他所深引爲憾的那種狹隘性，只是喝着痰涎吐得最滿的井裏的水！假使一個人沒有一定的方向，沒有一定的原則，却像七十年代的革命家那樣『自發地』亂幹『激發恐怖』，亂幹『土地恐怖』，亂敲『警鐘』等等，那末，即使他極誠懇地對狹隘性深表憤慨，極熱烈地想把崇拜狹隘性的人們救拔出來，也是無濟於事的。請看看他所認爲民衆將在其周圍『更親切得多地』集合和組織起來的那些『更具體的』事情吧：（一）地方報紙，（二）準備示威運動，（三）在失業工人中間工作。我們一看就知道，所有這些事情都完全是偶然和隨便拿來當作說話資料的，因爲無論我們怎樣來觀察這些事情，若要把它們看作什麼特別適於『集合和組織』民衆的東西，就會是極不合理的了。我們知道，同是這位拿齊金在兩頁以後又這樣說過：『現在我們該要簡單指出一件事實：各地進行的工作真是薄弱得可憐已極，各委員會甚至沒有做到它們所能做到的十分之一…而現在我們所有的那些應負統一責任的中心却又是一種虛構，是一種革命的官樣文章，互相吹噓捧場的把戲，並且在強有力的地

方組織尚未長成以前，這種情形是不會消滅的』。這些語句中間雖有很多誇張之處，但無疑也是含有許多辛酸的真情；難道拿齊金竟看不見各地工作薄弱得可憐已極的事實是與那些局限於地方組織範圍內的工作人員尚無素養時所不可避免的眼界狹小和活動規模狹小現象有聯繫麼？難道他也如自由雜誌上那篇論組織問題的文章作者一樣，忘記了過渡到廣泛地方刊物的工作（從一八九八年起）是與經濟主義和『手工業方式』特別加強的現象同時並進的事實麼？即使多少能够令人滿意的『廣泛地方刊物』是可能辦到的事情（我們在上面已經指明：除掉那些完全是特別的情形外，這種事情是無法辦到的），但這種地方機關報還是不能『集合和組織』所有一切革命家力量去對專制制度作總的進攻，去領導統一的鬥爭。不要忘記：這裏問題祇是講到報紙底『集合』作用，即組織作用，而我們也就可以請擁護渙散性的拿齊金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那個諷刺問題：『我們有沒有從什麼地方得到二十萬個革命組織家這種遺產呢？』其次，火星報計劃正是把最廣大示威運動當作目的之一，所以決不能把『準備示威運動』一事與火星報計劃對立起來；而問題却在於選擇實踐手段。這裏拿齊金又弄糊塗了，殊不知要『準備』示威運動（示威運動至今大半都是自發進行的），只有已經『集合和組織』成了的軍隊才可做到，而我們恰恰就不善於『集合和組織』哩。『在失業工人中間工作』。還是那種糊塗觀念，因為這個工作也是已經動員了的軍隊底一種軍事行動，而不是實行動員的計劃。這裏拿齊金又是如何忽視了我們的渙散性底害處，如何忽視了我們缺乏『二十萬個組織家』的情形，——這從下面一件事實中便可以看出。許多人（拿齊金也在其內）責備過火星報，說它關於失業工人的消息登載得太少，說它關於鄉村生活只是間或登載了一些說明極平常現象的通訊。這種責備是公道的，但火星報在這方面真是『無罪受懲』。我們也曾極力想使『引線』穿過鄉村，但那裏差不多全然

沒有石匠，於是我們只得鼓勵每一個甚至只以平常事情通知我們的人，希望這會增加這一方面的記者人數，終究會教我們大家來選擇真正特出的事實。但可供學習的材料恰巧少到極點，若不將全俄各地獲得的材料都綜合起來，那就完全沒有什麼可供學習的材料。當然，凡屬多少像拿齊金那樣善於鼓動和熟悉浪人生活的人，都能以其在失業工人中間進行的鼓動工作來為運動貢獻出無限寶貴的幫助，但是這樣的人若不設法把自己每一步工作都通告全體俄國同志，藉以教訓和表率大半還不會幹新事業的人，那他就算是埋沒了自己的才幹了。

現在真是所有的人都說需要統一，都說必須『集合和組織』起來，但人們對於究應從何着手和怎樣進行這種統一的問題往往沒有任何明確的觀念。想必大家都會同意：假使我們要把一個城市中的單個的——假定是區的——小組『統一起來』，那就須要有共同的機關，即是說不僅要有共同的『聯合會』名稱，並且要有真正共同的工作，互相交換材料，經驗和人員，不僅要按區來分配職務而且按全城工作各專門部分來分配職務。每個人都會同意：巨大的祕密機關所花費的『本錢』（當然是指物力和人力兩方面而言）不是在一區範圍內可以賺回的（假使可以用商業名詞來表示的話），專門家底才能在這樣狹小的場所內是無法施展的。幾個城市聯合起來的組織也是如此，因為這樣局限於一個地方的場所也是顯得過分狹隘，而且在我們社會民主黨運動史上已經有過這樣顯得過分狹隘的情形：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用政治鼓動和組織工作的例子來詳細加以證明了。必須，絕對並且首先必須擴大這個場所，以經常共同的工作為基礎來建立各個城市間的實際聯繫，因為渙散性壓制着人們，使他們『好像是坐井觀天』（致火星報的一封信上所說的話），不知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知從什麼人那裏可以學習一下，怎樣求得經驗，怎樣滿足從事廣泛活動的志願。所以我繼續堅持說：這種實際

聯系只有倚靠着共同的報紙，作為唯一經常進行，把各種各樣的工作綜合起來，因而推動人們循着所有通往革命的許多道路——好像俗話所說條條道路通羅馬一樣——不斷前進的全俄事業，才可着手建立起來。假如我們不只是口頭上說願意統一，那我們就要使每個地方小組立刻分出——假定說——四分之一的力量來積極參加共同的事業，於是報紙立刻就會向它*指明這個事業底概況，範圍和性質；就會指明，在整個全俄工作中究竟有哪些缺點表現得最厲害，什麼地方缺乏鼓動工作，什麼地方聯繫不夠，在總的巨大機器中究竟有哪些小輪盤是某個小組所能修補一下或拿好的去替換的。凡在現時還沒有做過工作而祇在找尋工作來做的小組，在開始工作時就能不是以一個既不知道先前『工業』發展情形又不知道該項工業生產狀況的單個小作坊手工業者資格，而是以一個反映着對專制制度舉行的全面革命進攻這一廣大事業參加者資格來工作。每個小輪盤修琢得愈完善，參加共同事業的零碎工作人員數目愈多，則我們的組織網也就會愈密，而不可避免的破獲所能在我們的總行列中引起的慌亂情形也就會愈少。

單是推銷報紙的工作（假使這個報紙真是名符其實，即是經常出版，不是像厚本的雜誌那樣每月只出一期，而是每月出版四五期），就會開始把實際聯繫建立起來。現在，各城市彼此因革命事業需要而發生聯繫是極稀罕的事情，至少是例外的事情，而到那時候，這種聯繫就可成為一種常例，自然不僅能保證報紙底推銷，並且還能保證（這更重要得多的）經驗，材料，人員以及經費底交換。那時

*保留條件：如果他同情於該報方向，認為參加該報工作是對事業有益處，同時並不祇是把這種參加看作參加文字工作，而是看作一般參加革命工作的話。專供工人事業雜誌社參考的註釋：在重視事業而不是重視民主主義兒戲，並認為『表示同情』是與最積極具體參加工作分不開的革命家看來，上述保留條件是不言而喻的。

候，組織工作底規模就會馬上擴大許多倍，某一地方底成功就會能經常鼓勵在別一角落裏活動的同志去更加改善自己的工作，急求利用現成的經驗。那時候，地方工作就會比現在豐富而完備得多：從全俄各地收集得來的政治揭露和經濟揭露的事實，就會供給各項職業和各種發展程度的工人以精神食糧，就會供給我們許多材料和緣由來舉行關於各種各樣問題的談話和講演，況且合法刊物上的種種暗示，社會中的種種議論，政府機關『差答答』公佈的種種消息，也往往提出同樣的問題來。那時候，每一次發動，每一次示威，都會在全俄各處遇到各方面的評判和討論，使大家都不願落後他人而想要比他人作得更好——（我們社會主義者並不籠統反對任何競賽，任何『競爭』！），——自覺地準備那種初次是自發地發生了的事件，利用當地或當時的順利條件來斟酌變更進攻計劃等等。同時，地方工作這種活動也就不會引起現時常有的情形，即每次示威或每期地方報紙都往往使所有一切力量緊張到『最後掙扎』地步，使所有一切人員都處於生死關頭的情形：一方面，警察機關要查明『根底』，將要困難得多，因為它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探查；另一方面，經常的共同的工作能教人們把某次進攻力量與整個軍隊中某一部隊底實力互相策應（現在，差不多誰也沒有想到過這樣互相策應，因為進攻十之九都是自發的），使得不僅書報，就是革命工作人員都容易從別地『調遣過來』。

現在這些工作人員往往是完全消耗在狹隘的地方工作上面，而那時則會有可能，並且常有機緣把頗有才幹的鼓動員或組織員從甲處調到乙處。人們起初爲了黨的事情，用黨的錢作短程的來往，後來他們就完全習慣於由黨給養，變成革命職業家，造就成爲真正的政治領袖。

如果我們真能使所有一切或絕大多數地方委員會，地方團體和小組，都來積極着手進行共同的事業，那末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就能

創辦一個週報，每期出版數萬份，經常銷行於全俄各地。這個報紙就會成爲巨大鼓風爐底一部份，把階級鬥爭和人民怒潮底每個火星吹成大火。那時在這個本來還很平常，還很細微，但是經常進行的真正共同的事業周圍，就會有系統地挑選和訓練出一支老練戰鬥員常備軍隊。在這個共同組織底建築架上，很快就會從我們的革命家中間提拔出一些社會民主黨的熱略波夫，從我們的工人中間提拔出一些俄國的伯伯爾，他們會指揮那已經動員的軍隊，發動全體人民去剷除俄羅斯可恥可咒的制度。

這便是我們所要幻想做到的事情！

* * *

『要幻想！』。我寫了這幾個字之後，不覺大吃一驚。我彷彿是坐在『統一代表大會』⁸²上，坐在我對面的是工人事業雜誌底編者和記者。於是馬爾丁諾夫同志站立起來，威風凜凜地向我質問道：『請問你：如不事前向各黨委請示，自治的編輯部還有權去幻想麼？』接着就有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立起來，並（用哲學家態度來加深本來早已加深了普列漢諾夫同志意思的馬爾丁諾夫同志底意思）更威風凜凜地繼續說道：『我還要進一層來問你：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忘記，照馬克思底意見，人類始終祇是抱定可能實現的任務，沒有忘記策略就是那些與黨發展過程並行的黨任務發展過程，那末他是否根本有權幻想呢？』。

我一想到這種威風凜凜的問題時就不寒而慄，於是我暗自思量：要找個地方躲藏一下才好。好吧，我就試試躲在皮薩略夫背後吧。

『有各種各樣的分歧，——皮薩略夫論到幻想與現實分歧問題時寫道，——我的幻想可能追過自然事變進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自然事變進程始終達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種情形下，幻想是沒有什麼害處的；它甚至能幫助和加強勞動者底毅

力……這種幻想中並沒有什麼可以敗壞或麻痺勞動能力的東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這樣來幻想的本事，如果他不能間或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像力來完滿周到地推想剛才開始在他手下形成的作品，——那我就真是不能設想：究竟有何種刺激力量會驅使人們在藝術、科學和實際生活方面舉行廣大而勞苦的工作，並把它貫徹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細地考察生活，把自己的閱歷與自己的空中樓閣相比較，且一般就誠懇努力實現自己的幻想，那末幻想與現實分歧就不會有什麼害處。當幻想與生活有多少接觸時，那就一切都會順利了」。

不幸的是這樣的幻想在我們的運動中未免太少了。對此應負最大責任的，便是那些以頭腦清醒和『熟悉』『具體情形』自炫的合法批評家和祕密『尾巴主義』份子。

（丙 我們究竟需要何種樣式的組織？）

讀者從上文中間可以看到：我們的『計劃策略』是反對立刻號召總攻擊，是主張組織『正確地包圍敵人砲台』，換句話說，是主張用全力來集合，組織和動員常備軍。當我們因工人事業雜誌從經濟主義跳到高喊（是於一九〇一年四月在工人事業雜誌副刊第六期上）衝擊而加以嘲笑的時候，它當然就極力攻擊我們，罵我們為『學理主義者』，罵我們不懂革命職責，罵我們號召大家謹慎從事等等。當然，從一些毫無定見而專用深奧的『過程策略』敷衍了事的人們口裏發出這樣的責備，是絲毫也不能使我們驚奇的；同樣，根本就對堅定綱領和策略原則持極高傲藐視態度的拿齊金重複這種責備，也是絲毫不能使我們驚奇的。

據說歷史是不會重複的。但拿齊金拚命想來重複歷史，極力模倣特卡却夫，大罵『革命文化主義』，高喊什麼『撞響鐘』，什麼

特別的『革命前夜的觀點』等等。他顯然忘記了一句著名的格言：假使歷史事件底原本是一齣悲劇，那它的抄本就會只是一齣醜戲。用特卡却夫底宣傳所準備起來，用『嚇人的』並且真正嚇過人的恐怖手段實行過的奪取政權的嘗試本來是很莊皇偉大的，而小特卡却夫底『激發』恐怖却就只是可笑，尤其是在加上一個組織中等人的理想時顯得特別可笑。

『假使火星報跳出了它那種文人習氣的圈子，——拿齊金寫道，——那它就會看見，這（即如火星報第七期上所載的一位工人來信等等的現象）是很快很快就會有『衝擊』開始的徵兆，所以現在（請注意！）來談什麼以全俄報紙為中心的組織，就是培植研究室的思想和研究室的工作』。你看這是多麼難以設想的糊塗觀念呵：一方面，認為人們在『更具體的事情』，如地方報週圍，會『更親切得多地』集合起來，同時主張採用激發的恐怖手段與『組織中等人』；另一方面，又認為『現在』來談全俄的組織就是培植研究室的思想，而更直爽簡單些講起來，就是『現在』已經太遲了！請問可敬的拿齊金，『普遍地創辦地方報』，豈不是也遲了麼？請你們把這一點與火星報底觀點和策略比較一下，火星報說：激發的恐怖手段是句空話，至於說正是要組織中等人和普遍創辦地方報，就無異是替經濟主義大開方便之門。其實，正是要說全俄統一的革命家組織，並且一直說到真正的——不是紙上的——衝擊開始的時候，都不算遲哩。

『的確，——拿齊金繼續說道，——我們在組織方面的情形非常不好。火星報說我們的軍事力量大部份都是些義勇隊和游擊隊，這話完全正確…你們很清醒地估量我們的實力，這是很好的。但同時你們為什麼要忘記，羣衆並不是我們的，因此他們不會來向我們請示究竟要在什麼時候開始軍事行動，而會自動『騷動起來』的…羣衆自己用自發的破壞力量發動起

來，就可能擾亂和排擠掉我們早已預備把極有條理的組織性灌輸進去，但至今還沒來得及灌輸進去的那個『常備軍隊』(着重點是我們加的)。

真是奇怪的邏輯！正因為『羣衆不是我們的』，所以此刻高喊『衝擊』是不聰明不體面的，因為衝擊是常備軍底攻擊而不是羣衆底自發騷動。正因為羣衆可能擾亂和排擠常備軍，所以我們絕對必須趕快把『極有條理的組織性』灌輸到常備軍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來得及』趕上自發高潮，因為我們愈能『來得及』灌輸這種組織性，就愈能担保常備軍不會被羣衆所擾亂，而會走在羣衆前面，領導羣衆。拿齊金之所以糊塗，是因為他以為這種有系統組織起來的軍隊幹着一種使它脫離羣衆的事情，其實它却只是幹着包羅盡致的全面政治鼓動，即幹着使羣衆底自發破壞力量與革命家組織底自覺破壞力量互相接近和溶合成爲一體的工作。先生們，你們真是嫁罪於人，因為『自由』社自己把恐怖手段載在綱領上也就是號召組織恐怖主義者，而這種組織確實會使我們的軍隊離開設法同羣衆接近的事情，但這個羣衆可惜還不是我們的，可惜還不向我們或很少向我們請示究竟要在何時和怎樣開始軍事行動。

『我們會把革命本身也錯過去，——拿齊金繼續恐嚇火星報說，——正好似我們把目前簡直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變錯過去了一樣』。我們把這句話和我們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話聯繫起來觀察一下，就可明白知道，『自由』社臆想出來的所謂特殊的『革命前夜觀點』* 是很荒謬的。老實說，特殊的『觀點』就是認爲『現在』來推論和準備已經是遲了。既然如此，那我就要問問最可敬的反對『文人習氣』的先生：你爲什麼寫了一百三十二頁『論述理論問

*革命前夜，第六二頁。

題『與策略問題』的文章呢？你是不是以為出版十三萬二千份簡短號召『殺呀！』的傳單，更與『革命前夜觀點』相合些呢？

最不會把革命錯過去的，正是如火星報那樣把全民政治鼓動工作放在自己全部綱領、策略和組織工作首位的人。在全俄各地以全國報紙為中心來牽引組織線索的那些人，不僅沒有把春季事變錯過過去，反而使我們能預料到這些事變。火星報第十三和第十四兩期上所記載的那些示威運動，他們也沒有錯過過去：恰恰相反，他們參加了這些示威運動，他們切實感覺到自己必須去幫助羣衆底自發高潮，同時以報紙來幫助一切俄國工作同志去認識這些示威運動並利用其經驗。只要他們還會活着的話，那他們是連革命也不會錯過過去的，革命首先和主要是要我們善於進行鼓動工作，要我們善於幫助（用社會民主黨的方法幫助）一切抗議，善於指導自發運動，使其既不為朋友底錯誤所牽累，又不為敵人底詭計所陷害！

於是我們就講到了最後一個使我們特別堅決主張在全俄機關報周圍，用一齊為共同報紙努力的辦法來建立組織的計劃的理由。祇有這樣來建立組織，才能使社會民主黨的戰鬥組織具有必要的敏捷性，即是能够立刻適應形式紛繁而變更得迅速的鬥爭條件，『一方面，在敵人將一切力量集中於一個地方而擁有優越勢力的時候，善於避免與這個敵人作公開的鬥爭，另一方面，又善於利用這個敵

*順便說說，拿齊金在其理論問題評論上，差不多沒有拿出半點關於理論問題的東西來，只是說了如下一段從『革命前夜觀點』看來很覺奇怪的議論：『在我們所處的時期，整個伯恩施坦主義都已沒有什麼迫切意義了，正好似不管阿達讓維奇先生能否證明司徒盧威先生應當隱退也好，或是——反過來說——司徒盧威先生將駁倒阿達讓維奇先生而不同意辭職也好，那都是毫無關係的，因為革命底時刻到來了』（第一一〇頁）。拿齊金之絕頂忽略理論，在這裏是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我們既已宣告了『革命前夜』——所以正統派是否能澈底擊破批評派，那都是『毫無關係』的！我們的這位聖人竟不知道：正是在革命時期我們需要與批評派作理論鬥爭的成果，以便與他們的實踐立場作堅決的鬥爭！

人底遲鈍性，在敵人最難料到能受攻擊的地方和時候突然攻其不備』*。專為應付爆發和巷戰，或專為應付『日常平凡鬥爭漸進行程』來建立黨的組織，便是極大的錯誤。我們應當時刻進行平凡工作，同時又應當時刻準備應付一切，因為爆發時期轉變為平靜時期往往是幾乎無法預料的，而在可能預料的場合，却又不能利用這種預料來改造組織，因為這種轉變在專制制度的國家裏發生得非常迅速，有時竟會因沙皇衛兵一晚上的襲擊而發生。並且革命本身，也決不可想像為單一的動作（拿齊金之流大概就是這樣懂憬的），而應看作是幾次多少猛烈爆發時期和多少靜寂消沉時期迅速交替的總和。因此，我們黨組織活動底基本內容，這種活動底中心，應當是在極猛烈爆發時期與極靜寂消沉時期都可能並且必須進行的工作：即闡明各方面生活，深入極廣大羣衆並在全俄範圍內統一起來的政治鼓動工作。在現代的俄國，沒有一個出版次數頻繁的全俄報紙，便絕對無法進行這種工作。在這個報紙周圍自然形成起來的組織，參加這個報紙工作的同事們（是按這個字底廣義來說，即是說一切為這個報紙而工作的人）所構成的組織，就會真能應付一切：從在革命情形最『蕭條』時期救全黨底名譽，威望和繼承性起，直至準備，指定和實行全民武裝起義為止。

例如，試想像一下我們時常在一個地方或幾個地方遭到的那種全部破獲情形吧。在各個地方組織缺乏一種共同的經常工作時，這

*見火星報第四期所載從何着手？一文。『不站在革命前夜觀點上的革命文化主義者，是絲毫也不會以長久工作為憾事的』，——拿齊金這樣寫道（第六二頁）。關於這點，我們要說，假使我們不能規定出一種預定要進行很長久的工作，同時又藉這種工作過程本身來使我黨在任何意外情況下，在事變進程無論怎樣加速的情形下，都能站到自己崗位上履行所負職責的政治策略和組織計劃，那我們就會簡直成為可憐的政治冒險主義者。祇有從昨天起才以社會民主黨人自命的拿齊金，才會忘記：社會民主黨底目的是要根本改造全人類底生活條件，因此社會民主黨人決不應以長久工作問題為『憾事』。

樣的破獲事件往往使工作間斷至數月之久。當大家有一件共同的事業時，那末雖遭極厲害的破獲，也祇要有兩三個積極份子來做幾個星期的工作，就能使新的青年小組與總的中央聯繫起來，而大家知道，這種青年小組甚至在現時也產生得很迅速；——而當這件常感破獲痛苦的共同事業擺在大家面前的時候，新的小組之產生及其與中央建立聯繫，就會來得更加迅速了。

另一方面，且拿民衆起義來說吧。現在想必大家一致認爲我們應當想到起義並準備起義。但是怎樣準備呢？當然不是由中央委員會指定代表到各地去準備起義呵！即使我們已有了中央委員會，那它在現代俄國情形下採用這種指定辦法也會得不到絲毫結果的。恰恰相反，在爲辦理和發行共同報紙而工作的過程中自然形成起來的代辦員網*，不應當『坐着等候』號召起義的口號，而是一定會進行最能保證它自己在起義時獲得勝利的經常事業。進行這一事業就會鞏固與最廣大的工人羣衆及一切不滿意專制制度的階層的聯繫，而這對於起義是很重要的。根據這一事業就可養成一種善於正確估計一般政治形勢，因而也就善於選定起義適當時機的能力。進行這一事業就會使所有一切地方組織都善於同時響應那些激動全俄的同一政治問題，事件和變故，並盡量積極，盡量一致，盡量適當地回答這些『變故』，——而起義一事其實也就是全體人民對政府所作

*咳，咳！我又說出『代辦員』這一在馬爾丁諾夫底民主主義耳朵聽來怪難受的可怕的名詞來了！我很覺奇怪的，是爲什麼這個名詞未曾使七十年代的健將們感到氣憤而却使九十年代的手工業者們感到氣憤呢？我喜歡這個名詞，因爲它很明白確切地指點出一切代辦員所應盡心竭力進行的共同事業；假如必須把它用另一個名詞來代替，那我也許只會選定『參加者』這一名詞，只是可惜這一名詞令人覺得它有文人習氣的風味，並且意思上有點模糊不清。而我們所需要的却是軍事式的代辦員組織。不過，那班爲數甚多（特別是在國外方面）而愛幹『互封官職』把戲的馬爾丁諾夫，儘可不說『辦護照的代辦員』而說『革命家護照供給事宜專局總辦』等等。

的最積極，最一致和最適當的『回答』哩。最後，進行這一事業就會使全俄各個地方革命組織都習慣於彼此發生一種能使黨在實際上統一起來的最經常而又最祕密的聯繫，——若沒有這種聯系，便無法來集體討論起義計劃，並且無法在起義前夜採取應當嚴守祕密的必要準備步驟。

總而言之，『全俄政治報計劃』，不但不是沾染了學理主義和文人習氣的人在研究室內幻想出來的東西（如對它沒有加以仔細思索的人所想像的那樣），恰恰相反，它是個最切實的，從各方面立刻開始準備起義，而又絲毫不會忘記日常迫切工作的計劃。

結 束 語

俄國社會民主運動底歷史，顯然是分成爲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包括有約近十年，大致是從一八八四年起，至一八九四年止。這是社會民主派底理論和綱領產生鞏固的時期。當時俄國站在新思潮方面的人數還是寥寥無幾。當時社會民主派是沒有工人運動而存在的，它作爲一個政黨還是處在胚胎發展過程中。

第二時期包括有三四年，從一八九四年起，至一八九八年止。社會民主派已成爲社會運動，成爲民衆高潮，成爲政黨出現於世。這是童年時期和幼年時期。智識份子紛紛加入反民粹派鬥爭，紛紛趨向於到工人中間去工作的心理，工人紛紛趨向於罷工的心理，有如時疾，傳佈得異常迅速。運動有了極大的成效。大多數領導者都是些很年輕的人，還遠未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認爲是一種天然界限的那個『三十五歲的年紀』。他們因爲年紀很輕，所以往往對於實際工作沒有準備而異常迅速地退出舞台。但他們的工作規模多半是很廣闊的。其中有許多人開始發生革命思想時，是抱着民意黨人那樣的觀點。他們在幼年時代，差不多全體都熱烈崇拜過從事恐怖的英雄。當時要拋棄這種英雄傳統底動人印象，必須經過鬥爭，必須與那些無論如何都想始終忠實於『民意主義』而深受年輕社會民主黨人敬重的人們決裂。鬥爭迫使他們從事學習，閱讀各種派別所祕密刊印的著作，努力研究合法民粹主義底問題。在這個鬥爭中

訓練出來的社會民主黨人走到工人運動中去工作，同時『一分鐘』也沒有忘掉用明光照耀着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推翻專制制度的任務。一八九八年春天成立黨一舉是這一時期社會民主黨人所作的一件最鮮明，同時又是最後的事情。

第三時期，我們已經說過，是在一八九七年開始準備起來，而於一八九八年完全替代了第二時期的（這第三時期是從一八九八年起，至？年止）。這是思想離散，組織瓦解和意識動搖的時期。人在幼年時代，嗓子常可嘶啞起來的。同樣，這個時期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嗓子也嘶啞起來而發出了一種怪異的聲調：一方面是表現在司徒盧威和普羅科坡維奇，布爾加科夫和別爾加也夫等先生底著作中，另一方面是表現在依一興和P.M.，克里切夫斯基及馬爾丁諾夫底著作中。但是分途向後退走的祇有領導者，而運動本身還是繼續增長，向前大步邁進着。無產階級的鬥爭日益普及於新的工人階層，伸展於全俄各地，同時又間接促使學生及其他人民階層中間的民主精神活躍起來。但領導者底覺悟程度却在廣闊強大的自發高潮面前顯得軟弱無力；此時在社會民主黨人中閥佔優勢的已是另外一種活動家，他們差不多單只是靠『合法』馬克思主義的作品教育出來的，而羣衆底自發性所要求他們表現的覺悟程度愈高，則這種作品也就愈加顯得不够。領導者不僅是在理論方面（表現於『批評自由』）和實踐方面（表現於『手工業方式』）都落在運動之後，並且還企圖用各種響亮的論據來辯護自己的落後性。社會民主主義被那些出版合法刊物的布連坦諸派份子和出版祕密刊物的尾巴主義者降低到了工聯主義地步。「Credo」綱領已開始實現起來，特別是在社會民主黨人底『手工業方式』使那些非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潮活躍起來的時候。

因此，假使讀者責備我把什麼工人事業雜誌問題考查得太詳細了，那我就要回答說：工人事業雜誌之所以具有了『歷史』意義，是

因爲它最鮮明地反映了這第三時期的『精神』*。此時真能代表思想離散和意識動搖，真能代表那種決意對『批評』、『經濟主義』以及恐怖主義表示讓步態度的並不是徹底的P.M.，而是飄蕩無定的克里切夫斯基輩和馬爾丁諾夫輩。這一時期的標本現象並不是什麼『絕對原則』崇拜者傲然輕視實踐，而正是小氣的實際主義與全然忽視理論的態度相結合。這一時期的角色所幹的事情，與其說是直接否認『偉大字眼』，不如說是把它們庸俗化：科學社會主義已不成其爲完整的革命理論，而變成爲人們『自由』把各種德國新教科書內的液體滲加進去的混合物；『階級鬥爭』的口號不是推動人們向前去作日益廣闊，日益積極的活動，却竟成爲安慰人心的手段，因爲『經濟鬥爭是與政治鬥爭有分不開的聯繫』的理；政黨觀念不是號召人們去建立革命家戰鬥組織的口號，却竟成爲替一種『革命官樣文章』和『民主』兒戲作辯護的口實。

第三時期什麼時候完結，第四時期（現在至少已有許多標誌預示其到來的時期）什麼時候開始，——我們還不知道。這裏我們已從歷史的領域進到了現在的，一部份是將來的領域。但是我們深信，第四時期一定會使戰鬥的馬克思主義鞏固起來，深信俄國社會民主黨渡過危機時更會堅固強壯起來，深信一定會有最革命階級底真正先鋒隊來『替代』機會主義者的後衛隊。

爲表示號召實現這種『替代』並爲歸納以上所述一切起見，我們對於『做什麼？』這一問題可以作個簡明的回答：

要結束第三時期。

*我還可用一句德國諺語來回答：Den Sack schlägt man, den Esel meint man（約與俄國民間所說『打貓嚇媳婦』一語相當）。不僅『工人事業』社，而且大批的實際工作者和理論家都傾心於時髦的『批評』，在自發性問題上弄得糊塗不清，在對於我們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的見解上離開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而陷入工聯主義的觀點。

附 錄

火星報想與工人事業雜誌實行統一的企圖

我們還要把火星報在組織方面對工人事業雜誌所採取並一貫執行過的策略說明一下。這一策略在火星報第一期所載論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聯合會中的分裂一文中已經充分表白過了。我們立即認定：由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承認爲我黨駐外代表機關的真正的『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已分裂成爲兩個組織；我黨駐外代表問題正是一個懸案，至於在巴黎國際代表大會上由俄國方面選出兩個代表，即由已經分成兩部份的『聯合會』中每一部份各選一人參加國際社會主義常務局的事實，只是使這一問題得到暫時和相對的解決。我們已經聲明說工人事業雜誌底立場實際上是不正確的，我們堅決地站上了原則上擁護『勞動解放』社的立場，但我們同時又拒絕去考察分裂詳情，並指出了『聯合會』在純粹實際工作方面的功績*。

由此可見，我們的立場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觀望等待的立場：我們對當時流行於大多數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意見作了一種護

*我們這樣估計分裂情形，不僅是依據於我們所讀過的出版物，並且是依據於我們組織中某些到過國外的份子在國外所收集的種種實際材料。

步，這種意見就是認為連最堅決反對經濟主義的人也可以去同『聯合會』協力工作，因為『聯合會』曾屢次聲明，說它在原則上同意『勞動解放』社底立場，說它在基本的理論和策略問題上並不想具有什麼獨立的表現。我們所採取的這種立場底正確性，已由如下一件事實間接證實，就是差不多適值火星報第一期出版的時候（一九〇〇年十二月）有三個人脫離『聯合會』而組成爲一個所謂『發起團』，並向（一）火星社國外部，（二）向革命的團體『社會民主黨人』社以及（三）向『聯合會』建議，意思是說他們願意充當進行調解談判的中介人。前兩個組織馬上就對這一建議表示同意，第三個組織却表示拒絕。誠然，當去年『統一』代表大會上有一個發言人申述了這些事實的時候，『聯合會』管委中一個委員會提出聲明，說他們對這一建議表示拒絕，只是由於『聯合會』不滿意該發起團底成分。我認爲我應該指出這種說法，但我却不能不指出我認爲這種說法不能令人滿意，因為『聯合會』既知道兩個組織已表示同意進行談判，那它本來是能夠經過另一個中介人或直接去同這兩個組織接洽的。

一九〇一年春，曙光雜誌（第一期，四月刊）和火星報（第四期，五月）都發表言論來直接批評工人事業雜誌。火星報特別激烈地攻擊了工人事業雜誌底『歷史轉變』，該雜誌在其四月份的副刊上，即在春季事變已經發生後，對醉心於恐怖手段和『血的』號召的傾向表現了不穩定的態度。雖然遭到了這一批評，但『聯合會』終於表示同意由新組成的『調解團』擔任中介來恢復調解談判。於是上述三個團體就選出代表來在同年六月間舉行過一次籌備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製定了以極詳細的『原則協定』爲基礎的條約草案，這個『原則協定』是由『聯合會』編在兩次代表大會一書中並由同盟編在『統一』代表大會底文件一書中公佈了的。

這一原則協定(或如大家時常稱呼的六月代表會議決議案)底內容極其明顯地指明出，我們當時所提出的實行統一的必要條件是要最堅決地排斥一般機會主義以及俄國機會主義底一切表現。『我們——在第一條上說道——反對一切要想把機會主義思想灌輸到無產階級階級鬥爭中去的企圖，即反對表現於所謂經濟主義、伯恩施坦主義、米勒蘭主義等等的企圖』。『社會民主黨底活動範圍包含有… 同一切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人進行的思想鬥爭』(第四條丙項)；『社會民主黨在一切組織工作和鼓動工作方面都是一分鐘也不應忽略俄國無產階級最近的任務，即推翻專制制度的任務』(第五條甲項)；…『鼓動工作應該不僅是在僱傭勞動反資本的日常鬥爭基礎上進行』(第五條乙項)；…『我們並不承認…什麼純粹經濟鬥爭和為局部政治要求而鬥爭的階段』(第五條丙項)；…『而認為對於運動重要的是必須批評那些把運動低級形態底初步性和狹隘性推崇為原則的流派』(第五條丁項)。甚至一個完全旁外的人，只要稍微仔細讀過這些決議案，都能從這些決議案底條文中間看出，這些決議案所攻擊的正是那些會是機會主義者和『經濟主義者』的人，正是那些即令只是一分鐘忘記過推翻專制制度的任務的人，正是那些承認過階段論，曾把狹隘性等等推崇為原則的人。誰只要稍許認識『勞動解放』社，曙光雜誌和火星報所發表的攻擊工人事業雜誌的言論，那他就一分鐘也不會懷疑到，這些決議案逐條逐條攻擊的正是工人事業雜誌所陷入的那些錯誤觀點。所以，當『聯合會』中一個人在『統一』代表大會上提出聲明，說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上所載的論文並不是由於『聯合會』發生了新的『歷史轉變』而是由於這些決議案內容過分『抽象』*所引起的時候，於是就有一個發言人完全公允地譏笑過這種說法。決議

*這種斷語在兩次代表大會一書第二五頁上也重複說過。

案內容不但不抽象，——這位發言人當時回答說——而且是非常具體：只要瞧一瞧這些決議案，便可看出這裏『是想要捉住什麼人』了。

後面這句話激起了代表大會上一次很能表徵當時情景的趣事。一方面，克里切夫斯基馬上抓住了『想要捉住』一語，以為這是把我方卑劣意圖（『佈設羅網』）洩露出來的一種失言，並高聲叫喊道：『究竟是要想捉住什麼人呢？』。當時普列漢諾夫就來譏諷式地問道：『真不知是要捕捉什麼人咧？』。克里切夫斯基當時回答說：『讓我來幫不善猜測的普列漢諾夫同志來猜測一下吧；我可以向他說明，這裏是想要捉住工人事業雜誌編委啊（全場哈哈大笑）。可是我們却並沒有讓人家把我們捉住！』（左邊有人插嘴說：這對你們更壞哩！）。另一方面，『鬥爭』社（調解團）中有一個人發言反對『聯合會』對決議案所提出的修正時，因想要替我們那位發言人辯護而聲明道：『想要捉住』一語顯然是在辯論激烈時破口說出的。

我認為這種『辯護』對於用過此語的那位發言人是很難受的。我認為『想要捉住某某人』一語是『嘻笑說出而認真想過』的，因為我們向來都責備工人事業雜誌立場不穩定和態度動搖，所以我們當然不免要設法把他捉住，使得往後再不能有動搖發生。關於卑劣的意圖一層是根本談不到的，因為當時所談到的是原則上的不穩定性。結果是我們終能用這樣一種同志態度*『捉住了』『聯合會』，以至克里切夫斯基本人以及還有『聯合會』管委中其他一個委員也對六月決議案表示了贊同。

*其表現就是：我們在六月決議案導言中聲明說，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整個說來是一向就站在『勞動解放』社原則基礎上的，『聯合會』底功績特別是表現於它所進行的出版和組織方面的工作。換句話說，我們會表示完全願意把過去一切付諸遺忘，並承認我們那些參加『聯合會』的同志們所進行的工作有益處（對於事業有益

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上所載的那些論文（我們的同志只是已經到達代表大會開會地點的時候，即在代表大會開幕幾天以前的時候，才看見了這一期雜誌），很明顯地表明出，從夏天到秋天的時期內，『聯合會』中已經發生了新的轉變：經濟主義者又佔了上風了，隨波逐流的編輯部又來實行辯護『最激烈的伯恩施坦主義者』和『批評自由』，辯護『自發性』並以馬爾丁諾夫為代言人來鼓吹主張把我們的政治影響範圍（彷彿是爲了使這種影響複雜化）『縮小的理論』了。這樣又再次證明了巴烏斯所說的一句很中肯的話：要用什麼公式去捉機會主義者是很難辦到的，機會主義者對於任何一種公式都輕易表示同意，同時機會主義者對於同是這一種公式又輕易實行背棄，因為機會主義底特色正在於缺乏任何明確和堅定的原則。今天機會主義者排斥了任何一種灌輸機會主義思想的企圖，排斥了任何一種狹隘性，冠冕堂皇地答應說『一分鐘也不忘記推翻專制制度的任務』，說『鼓動工作應該不僅是在僱傭勞動反資本的日常鬥爭基礎上』進行等等。明天他們却又會改變說法，實行擁護自發性，擁護日常平凡鬥爭漸進行程，提倡能給予鮮明結果的要求等等的名義來幹那套老把戲。『聯合會』在那裏繼續斷言，說它在第十期所載的那些論文中『始終看不出什麼邪異背叛代表會議草案所定一般原則的地方』（兩次代表大會，第二六頁），其實它這種說法只是暴露它完全不能或不願瞭解意見分歧底實質。

在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出版以後，我們已只須作一個最後的嘗試：開始舉行普遍的討論，以期查明是不是整個『聯合會』都對這

處），只要他們完全停止我們用『捕捉』手段攻擊過的那種動搖態度就行了。每一個公正爲懷的人讀過六月決議案以後，都只會如此瞭解這些決議案。如果目前『聯合會』以其從新轉向到經濟主義方面的轉變（見第十期所載的論文以及它所提出的修正）引起了分裂之後，公然責備我們，說我們當時講出這些承認其功績的話來是一種掩護辦法（兩次代表大會，第三〇頁），那末這種責備當然是只能令人發笑的。

些論文以及對它那個編輯部表示同情。『聯合會』對我們這種作法特別表示不滿，責備我們企圖在『聯合會』中引起齟齬，說我們干涉旁人事情等等。這種責備顯然沒有理由，因為在一個選出的編輯委員會隨風『飄蕩』的情形下，一切都是由風向決定的，我們就在關門會議上確定過這一方向，這種會議上除了立意統一起來的那些團體中的份子而外，便沒有任何旁人參加。用『聯合會』名義對六月決議案所提出的修正使我們對於可能達到協議一事所抱的最後一綫希望也完全消失了。這種修正很確鑿地證明『聯合會』已從新轉到經濟主義方面去，證明『聯合會』大多數都是對工人事業雜誌第十期內容表示同情的。從那些確定機會主義具體表現形式的文句中，他們要求勾去『所謂經濟主義』一語（理由是說此語『意思不確』，其實根據這一理由也只能得出結論說必須把這一很廣闊流行的迷誤思想底實質更明白地確定一下），同時又要求把『米勒蘭主義』一語也一筆勾銷（雖則克里切夫斯基在工人事業雜誌第二三兩期合刊第八三至八四頁上分明擁護過這一主義，並且他在前進報上還更直爽地擁護過這一主義*）。雖然六月決議案已很確定地指明了，社會民主黨底任務是要『領導無產階級為反對所有各種政治壓迫經濟壓迫和社會壓迫而進行鬥爭底一切表現』，因而要求把所有這一切鬥爭表現變成爲有條不紊的和統一的鬥爭，然而『聯合會』却還要求加進一些絕對多餘的字句，如說『經濟鬥爭乃是羣衆運動底強大刺激』（這些字句本來是無可爭論的，但它們在有狹隘『經濟主義』存在的條件下却不能不使人可以藉口作出一種曲解）。並且，他們還對六月決議案加進一種簡直公開縮小『政治』概念內容的修正，其方法就是刪去『一分鐘也』（不要忘記推翻專制制度的

*在前進報上已經開始了該報現今編輯部，考茨基和曙光雜誌彼此對於這個問題的辯論。我們一定會使俄國讀者認識這次辯論。

目標)幾字，另一方面是添進『經濟鬥爭乃是吸引羣衆參加積極政治鬥爭的最普遍適用的手段』一語。當然，聽到這樣一些修正之後，我們這方面的所有一切發言人都相繼拒絕發言，認爲繼續同一些重新轉到經濟主義方面要求保證自己有動搖自由的人們進行談判是毫無益處的。

『『聯合會』認爲是保證將來協定鞏固 sine qua non* 條件的東西，即保全工人事業雜誌獨立面目及其自治地位的條件，火星報却認爲這是阻礙達到協議的障礙物』(兩次代表大會，第二五頁)。這種說法是很不確切的。我們從來也沒有謀害過工人事業雜誌底自治地位**。至於『聯合會』面目底獨立性，那我們確實是無條件地排斥過的，因爲這種『獨立面目』是要在理論和策略原則問題上講『獨立』：六月決議案底內容正是無條件地反對這種獨立面目，因爲這種『面目獨立性』在實踐上始終是意味着——我們重複說一遍——一種思想動搖，並用這種動搖把我們這裏盛行而爲黨性所絕對不可容忍的思想離散狀態維持下去。工人事業雜誌在其第十期上所登載的那篇論文及它所提出的『修正』，便是很明顯地表明它想要保持的正是它的這種面目獨立性，而這種願望也就自然必然要引向到決裂和實行宣戰。但我們大家都曾決意承認工人事業雜誌在把它的活動集中於一定出版職務上這種意義上的『獨立面目』。這種職務底正確分配自然是有如下述：(一)科學雜誌，(二)政治機關報，(三)通俗的文集和通俗的小冊子。工人事業雜誌只有同意這種分工法，才能證明它真心願意澈底拋棄它那些受到六月決議指斥

*意即『絕對必要』——譯者。

**如果不把專爲建立各個實行統一的組織底共同最高委員會而召集的編輯會議認爲拘束自治權的一種辦法的話，但召集這種編輯會議是工人事業雜誌在六月間也表示贊成的。

的迷誤思想；也只有這種分工法，才能完全消除任何發生磨擦的可能性，真正保證協定底穩固性，同時又能成爲保證我們運動達到新高漲和新成功的基礎。

現在無論那一個社會民主黨人都不能懷疑到，革命派之所以同機會主義派最終決裂，並不是由於什麼『組織上的』情況，而是由於機會主義者想要鞏固機會主義底獨立面目，企圖繼續用克里切夫斯基輩和馬爾丁諾夫輩底議論來淆亂人們底頭腦。

一九〇二年在斯多德牙爾印成單行本。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一九至四九二頁。

對做什麼？一書所作的一個更正

我在做什麼？一書第一四一頁*上所述說的那個『發起團』，請我把敘述他們參加設法調解旅外各社會民主黨人團體一舉經過情形的那段文句加上如下一段更正：『該團三人中只有一人在一九〇〇年末退出了『聯合會』，其餘兩人直到一九〇一年間才退出去，因為此時他們已經深信無法使『聯合會』對於發起團所提出的建議表示同意，這一建議就是要『聯合會』和火星社駐外部及『革命社會民主黨人』社舉行代表會議。對於這一建議，『聯合會』管委起初表示拒絕，並說它拒絕舉行代表會議的理由是由於擔任調停的『發起團』成份『不孚衆望』，同時又表示願意去同火星社駐外部直接接洽。可是過後不久，『聯合會』管委却又通知『發起團』說，管委讀了火星報第一期上所載論『聯合會』分裂的短評之後，已經改變了自己先前的決定而不願去同火星報發生關係了。既然如此，那末『聯合會』管委中一個委員先前所說『聯合會』拒絕舉行代表會議一舉完全是由於不滿意『發起團』成份等語，又應怎樣來解釋呢？誠然，『聯合會』管委在去年六月同意召集代表會議一事也是令人難解，因為火星報第一期上所載的那篇短評仍然有效，並且火星報對『聯合會』所持『否定』態度在出版於六月代表會議以前的曙光雜誌第一期和火星報第四期上已表現得更為明顯。

尼、列寧

一九〇二年四月一日載於火星報第十九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四九三至四九四頁。

*見本卷第三三八至三三九頁。——譯者。

進一步，退兩步

(我們黨內的危機)

序 言

每當進行持久頑強激烈鬥爭的時候，通常是經過某些時間就會顯露出一些中心基本爭論點來，戰役底最終結局是依這些爭論點的解決如何為轉移，而鬥爭中所有各種細小瑣屑的枝葉問題和這些爭論點比較起來，都日益退到後面去了。

我們黨內的鬥爭情形也是如此，而這個鬥爭引起全體黨員深切注意，迄今已有半年之久了。正因為我在這本敘述全部鬥爭的概論中不得不涉及許多很少趣味的細節，許多實質上沒有任何趣味的無謂爭鬧，所以我想一開始就使讀者注意到真正是中心基本要點，含有莫大趣味，顯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並且是我們黨內目前最迫切政治問題的兩點。

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黨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劃分成爲『多數』和『少數』兩派這一事實底政治意義問題，這一劃分是將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先前所有一切劃分都遠遠推到後面去了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新火星報在組織問題上所持立場底原則意義問題，當然是就這個立場真正是一種原則立場的限度來說。

第一個問題乃是關於我們黨內鬥爭底出發點，鬥爭底根源，鬥爭底原因，鬥爭底基本政治性質的問題。第二個問題乃是關於這一

鬥爭底最終結果，鬥爭底結局，關於把一切涉及原則的成分總合起來而把一切涉及無謂爭鬧的成分減去以後所得到的原則總結問題。第一個問題應以分析黨代表大會上所發生的鬥爭來解決，第二個問題則應以分析新火星報底新原則內容來解決。這兩種分析一共佔去本書十分之九的篇幅，使我們得到如下一個結論：『多數派』是我們黨內的革命翼，而『少數派』則是我們黨內的機會主義翼；現時使這兩翼分立的意見分歧主要不是歸結於綱領問題，也不是歸結於策略問題，而只是歸結於組織問題；新火星報愈是努力加深自己的立場，這個立場愈是脫離由於補選問題所引起的無謂爭鬧，則在新火星報上也就愈益明白顯露出來的那個新的觀點體系，乃是組織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

論述我們黨內危機的現有出版物底主要缺點，就是在研究事實和闡明事實方面幾乎完全沒有分析黨代表大會底記錄，而在闡明組織問題底基本原則方面又沒有分析到一件事實，即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兩同志提出黨章第一項條文和擁護這個條文時所犯的根本錯誤，顯然是與火星報現在對於組織問題所持原則觀點的全部『體系』（當然是就這裏可以說得上有什麼體系的限度來說）互相聯系的事實。雖然關於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爭論底意義在『多數派』刊物上已經指出過很多很多次了，但現今的火星報編輯部却似乎甚至看不見這種聯系。其實，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兩同志現在祇是加深着，發展着和擴大着自己先前在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其實，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者底全部立場，還在討論黨章第一項條文時就已開始顯現出來了：他們當時已擁護過鬆懈渙散而非團結堅固的黨組織；他們當時已反對過從上而下，即從黨代表大會及其所建立的機關出發來建立黨的思想（即他們稱為『官僚主義的』思想）；他們當時已主張要從下而上地建立黨，讓任何大學教授、任何中學生以及『每個罷工者』都能自行列名為黨員；他們當時

已反對過每個黨員必須加入黨所承認的某一個組織的所謂『形式主義』要求；他們當時已表現過傾向於只願『虛玄承認組織關係』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心理；他們當時已表現過易受機會主義奧理和無政府主義空談所惑的劣根性；他們當時已表現過反對集中制而主張自治制的趨向，——總而言之，現時在新火星報上鮮花盛開而愈益完備具體顯露出原先所犯錯誤的一切，在當時就已開始顯現出來了。

至於說到黨代表大會底記錄，那末人們對它所持的那種真不應有的忽視態度，就可說是因為我們的爭論被一些無謂爭鬧所模糊，也許是還因為這些記錄含有太多而又太辛辣的真情實話吧。我們考察黨代表大會底記錄，便可看見一幅表明我們黨內真情實況的唯一無二、確切、完整、周備、豐富和正確得無可替代的圖畫，由參加運動的人們自己描畫出來而表明各種觀點、各種情緒和各種計劃的圖畫，表明我們黨內所有各種政治色彩及其對比力量、相互關係和相互鬥爭情形的圖畫。正是黨代表大會記錄，並且也只有這些記錄，才能向我們表明究竟我們已在何種程度內真正掃除了一切舊的純粹小組關係的聯繫底殘餘，而代之以統一的偉大的黨性的聯繫。每一個願意自覺地參加自己黨內事務的黨員，都應該仔細研究我們黨代表大會，——正是說應該研究，因為單只把記錄所包含的一大堆生硬材料閱讀一遍，還不能認識代表大會底情景。只有用仔細和獨立研究的方法，才可以（而且應當）使簡短的演說概要，從討論中抽出來的簡要略記，關於小問題（似乎是小問題）的小衝突匯合為一種完整的東西，使每個出色的發言者都在黨員面前呈現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物，使黨代表大會上每一個代表集團底全部政治面貌都明白表現出來。本書作者只要能推動大家去獨立研究黨代表大會記錄，也就會認為自己這番工作不是白費的了。

還有一句話要向社會民主黨底敵人們說說。他們看見我們爭

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起來；他們爲着自己的目的，自然會極力來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黨種種缺點的小冊子中的個別句段。可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久歷戰鬥，飽受風霜，決不會爲這區區針刺所驚嚇，却能够不顧這些針刺而依然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是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發展而被克服的。讓敵人老爺們試拿出他們『黨』內真實情況的圖畫，那怕只是拿出稍微近似我們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所表明的圖畫來給我們看看吧！

尼、列寧 序於一九〇四年五月。

(一)代表大會之準備

常言道，每個人都有權在二十四小時內咒罵自己的審判官。我們的黨代表大會，正如任何一個黨底任何一次代表大會一樣，也成了某些覬覦領導者位置而遭到失敗的人們底審判官。現在，這些『少數派』份子以天真絕頂的神情『咒罵自己的審判官』，並極力想破壞代表大會底威信，減低其意義和權威。這種傾向在實際工作者那篇發表於火星報第五十七期的論文中可以說是表現得最爲鮮明，該文作者對於認定代表大會是不可侵犯的『神像』的思想表示憤激。這是新火星報底一種很標本的特色，我們決不能把它緘默過去。大多數人員都是遭到代表大會否決者的一個編輯部，一方面還繼續自稱爲『黨』編輯部，另一方面却又極力歡迎那些硬說代表大會不是神像的人。這豈不真是妙到極點麼？先生們！對的，代表大會當然不是神像，然而關於那些在代表大會上遭到失敗後『譴責』起代表大會來的人，又該作何感想呢？

例如，請回想回想代表大會準備史中那些基本事實吧。

火星報自始就在其一九〇〇年發表的出版預告中說過，我們在實行統一以前必須劃清界限。火星報曾設法把一九〇二年的代表會議⁵³變爲非正式的會議而不是變爲全黨的代表大會*。火星報在一九〇二年夏秋間設法把這次代表會議上所選出的組織委員會恢復起來，原是作得非常謹慎的。最後，劃清界限一舉已告結束了，——

*見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二〇頁。

我們大家都認為它已告結束了。組織委員會在一九〇二年末正式宣告成立。火星報歡迎該委員會底鞏固，並在第三十二期社論中宣稱，召集黨代表大會一舉已是刻不容緩的最迫切必要的事情。可見，誰也沒有什麼理由責備我們，說我們對於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一舉表現過什麼匆忙草率態度。我們正是按照七次量衣一次裁的規則來動作的。我們有過完全的道義上的權利指望同志們在裁剪以後是不會哭訴和重新度量起來的。

組委製定了一個非常細密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規章（現時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字眼來掩蓋自己在政治上毫無氣節的那些人，也許會說這個規章是個形式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東西哩），把它交由所有各委員會加以通過，最後又將其正式批准，其中在第十八項內議決如下：『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一切決議及其所實行的一切選舉，都是全黨一切組織必須服從的全黨決定。這種決定，無論何人和無論在何種藉口下都不能加以抗辯，只有下屆黨代表大會才能將其取消或加以更改』*。可不是麼，這幾句話從前被視為不言而喻的東西默然通過時，豈不是很平常的麼，而現在聽起來恰好似專為『少數派』所下的判詞一樣，却就很令人奇怪了！這樣一項條文究竟是為着什麼目的而製定的呢？是專為遵照形式手續麼？當然不是。這個決議當時看來是必要的，而且真正是必要的，因為當時黨所包括的是許多散漫和各自獨立的集團，它們可能對代表大會持不承認的態度。這個決議正是表示着所有一切革命家底自願意志（現在人們關於這種意志未免講得太多而又講得太不恰當，竟娓娓婉婉地用『自願』一語來形容那不如用『逞性』一語來表示的東西）。這個決議等於俄國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相互說出的一句老實話。這個決議應該担保所有一切與召集代表大會相關連的巨大勞

*見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二二至二三頁以及第三八〇頁。

作、巨大危險以及巨大費用都不致白費，應該担保使代表大會不致變成一幕滑稽劇。這個決議事先就把任何不承認代表大會決議及其選舉的態度估計為破壞信任的態度。

試問，新火星報好似發現新大陸一樣宣稱代表大會不是神像和大會底決定不是聖經，究竟是在譏笑着誰呢？它的這種發現中究竟是含有什麼『新的組織觀點』，還是只包含有一些想掩蓋舊痕跡的新企圖呢？

(二)代表大會上派別分立底意義

總之，代表大會是經過一番極細密準備工作以後按絕頂完備的代表制原則召集起來的。大家承認代表大會成份正確並認為全黨應無條件執行代表大會決議，是代表大會主席在代表大會正式宣告成立以後所作的聲明裏（見記錄第五四頁）也加以表示過的。

代表大會底主要任務究竟是什麼呢？就是要根據火星報所提出所擬定的那些原則的和組織的基礎來建立真正的黨。火星報三年的活動以及大多數委員會對火星報的承認，已預決了代表大會正應按這個方向來進行工作。火星報所確定的綱領和方針應該成為全黨底綱領和方針，火星報所擬定的組織計劃應該在全黨底組織章程內明文規定。可是，要達到這樣的結果，當然不免要經過鬥爭，因為召集代表大會時所採用的完備的代表制，使那些堅決反對過火星報的組織（崩得和『工人事業』社）以及那些口頭上雖承認火星報為領導機關報，事實上却別有所圖，並在原則方面顯得很不堅定的組織（『南方工人』社以及對它表同情的某些委員會代表），都能出席參加。在這樣的條件下，代表大會也就不能不變成爲火星方針勝利而鬥爭的戰場。至於代表大會確實成了這樣的鬥爭場，那是每一個稍微用心閱讀代表大會記錄的人，都能立刻明白看出的。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詳細考察代表大會上討論各種問題時所暴露出來的最主

要的派別分立，並根據記錄上的準確材料把代表大會上每一個基本派別底政治面目都重新揭示出來。應該在代表大會上由火星報領導溶合成爲一個統一的黨的那些集團，派別和色彩底真實面目究竟怎樣呢？——這就是我們應以分析討論經過和表決情形來加以闡明的問題。闡明這個問題，這無論對於研究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底真正面目，或對於瞭解意見分歧底原因，都有根本重要的意義。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以及在我致新火星報編輯部的信裏，也就最注重於分析派別分立情形。『少數派』份子當中出頭反對我的那些人（以馬爾托夫爲首）完全沒有瞭解問題底實質。他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辯駁』那責備他們轉向機會主義方面的罪名時只是提出了一些局部的更正，甚至未曾企圖描繪出任何另一樣的關於代表大會上派別分立情形的圖畫來和我對立。目前，馬爾托夫在火星報（第五十六期）上，公然想把一切確切區分代表大會各種政治集團的嘗試叫作一種簡單的『小組政客手腕』。馬爾托夫同志，你說得多麼厲害呵！可是新火星報底厲害語句含有一種奇特的屬性：當我們把全部分歧底經過情形——從代表大會說起——確切重述出來時，這一切厲害語句就會完全掉轉過來首先反對現今的編輯部自身了。請你們這班提起小組政客手腕問題的所謂黨編輯員先生們瞧一瞧自己的面孔吧！

現在馬爾托夫一想到我們在代表大會上鬥爭的事實就極感不快，所以他極力想把這些事實完全抹煞下去。『所謂火星份子，——他說道，——就是在黨代表大會上和在黨代表大會以前對火星報完全表示過同情，擁護過它的綱領和組織觀點並贊成過它的組織政策的那些人。在代表大會上，這樣的火星份子計有四十多個，——當時投票贊成火星報綱領並贊成承認火星報爲黨中央機關報決議的就是這樣多的人數』。只要打開代表大會記錄來看看，就可看出綱領是除阿期莫夫一人表示懷疑而外由全體代表（第二三三頁）

通過的。這樣，馬爾托夫同志就是硬要我們相信，無論崩得份子，布魯克爾以及馬爾丁諾夫，都曾證明他們『完全同情』火星報並擁護火星報底組織觀點哩！這是很可笑的。這是把所有一切參加過代表大會的人都在代表大會以後變成爲享有同等權利的黨員（並且還不是所有一切參加過代表大會的人哩，因爲崩得份子退出了的）的事實和在代表大會上引起過鬥爭的派別分立混爲一談。這是用所謂『承認過黨綱』這一句正式話來暗中代替了對於在大會以後的『多數派』和『少數派』究竟是由哪些份子所構成的問題的分析！

試看看關於承認火星報爲中央機關報的表決情形吧。那你們就可以看出，馬爾丁諾夫，即現在被馬爾托夫同志大膽誣指爲擁護過火星報底組織觀點和組織政策的那個馬爾丁諾夫，曾堅決要求把決議案分作兩部分來付表決：一部分是僅僅承認火星報爲中央機關報，另一部分則是承認火星報底功績。在表決決議案前一部分時（承認火星報底功績，對它表示同情）表示贊成的僅有三十五票，表示反對的有兩票（阿期莫夫和布魯克爾），表示懷疑的有十一票（馬爾丁諾夫，五個崩得份子，以及編輯部五票：我和馬爾托夫各兩票，普列漢諾夫一票）。由此可見，反火星份子集團（五個崩得份子和三個工人事業社份子）在這裏，在這一對於馬爾托夫現今的觀點最爲有利並且是他自己所選定的例子上，也是暴露得極其明顯的。試看看對於決議案後一部分的表決，即對於毫不說明理由並且不必表示同情而單祇承認火星報爲中央機關報的表決情形（見記錄第一四七頁）：贊成者四十四票，亦即現今的馬爾托夫一概算作火星份子的四十四票。總共有五十一票，除放棄表決權的五個編輯員而外，還剩有四十六票；有兩票（阿期莫夫和布魯克爾）投票表示反對；可見，其餘四十四票是包括所有五個崩得份子在內的。那末，崩得份子在代表大會上就是『對火星報完全表示過同

情』了，——你看，正式的火星報就是如此撰述正式歷史的啊！我們現在且預先向讀者來解釋解釋這個正式真理底真正動機：如果崩得份子和工人事業社份子沒有退出代表大會，那末現今的火星報編輯部就會能成爲而且會真正成爲事實上的黨編輯部（而不是現今這樣一種 quasi* 黨編輯部）；正因爲如此，所以也就不免要把現今的所謂黨編輯部底這些最忠實衛士們陞擢爲『火星份子』。不過我們暫把這個問題留到下文裏去詳細說明。

其次，請問：如果代表大會是火星份子與反火星份子間的鬥爭，那末當時是否還有過一些動搖於火星份子和反火星份子間的中間的不穩定份子呢？凡稍微認識我們黨並稍微認識一切代表大會底通常面貌的人，都會 a priori** 對這個問題給一肯定式的回答。馬爾托夫同志現在很不願意回憶到這些不穩定的份子，於是就把『南方工人』社以及趨向於該社的那些代表描繪成爲標本的火星份子，把我們與他們間的意見分歧描繪成爲區區不足道和不重要的事情。幸虧現在我們面前擺着有大會記錄全文，所以我們可以按證據確鑿的材料來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是個事實問題。上面我們關於代表大會上一般派別分立情形的說明，當然還不能算是解決了這個問題，而只能算是正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若不分析各個政治派別分立，若不把代表大會當作某幾種色彩間鬥爭的圖畫來看，那就絲毫不能瞭解我們的分歧。馬爾托夫企圖把崩得份子也算作火星份子，藉以抹煞色彩區別，其實不過是迴避問題罷了。只要看看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代表大會以前的歷史，就可 a priori 看出（然後又可加以檢查和詳細研究）三個主要集團：火星集團，反火星集團以及不穩定的、猶疑的、動搖的集團。

*意即『冒充的』。——譯者。

**意即『預先』。——譯者。

(三)代表大會底開始。——組委事件

分析代表大會上的討論經過和表決情形，最好是按代表大會開會次序來作，以便循序指出那些愈益鮮明表露出來的政治色彩。只有在絕對必要時，我們才離開這個時間次序來綜合考察彼此緊相聯系的問題，或性質相同的派別。爲着公正無私起見，我們將勉爲指出一切最重要的表決，同時當然要把許多關於枝節問題的表決撇開不說，這些表決佔去了我們代表大會過多的時間（其所以如此，一部分是由於我們當時因缺乏經驗不善於使各專門委員會和大會全體會議分工討論問題，另一部分是由於受到了一些幾乎是故意搗亂的阻撓）。

第一個引起爭論而使各種色彩間的差異開始暴露出來的問題，就是應否把『崩得在黨內地位』一項提到首位（作爲代表大會『議事日程』第一項）來討論的問題（見記錄第二九至三三頁）。從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托洛茨基以及我所擁護的火星報觀點看來，對於這個問題是根本不容置疑的。崩得退出黨的事實，也就顯然證明了我們的想法是正確的：既然崩得不願意同我們一道行進，不願意承認黨內大多數和火星報一致主張的那些組織原則，那末『裝模作樣』，好像我們是一道行進，那就會是荒謬無益，只能阻延代表大會底工作（如崩得份子阻延過它那樣）。問題是早已就在刊物上完全弄清楚了的，所以每個稍微用心思索的黨員都知道，當時所剩下要作的事情只是要公開提出問題，爽直誠懇地作一選擇：是自治制（那時我們就一道行進），還是聯邦制（那時我們就分道揚鑣）。

崩得份子在其全部政策方面都是以支吾搪塞爲能事，所以他們這次也想一味支吾搪塞，故意把問題拖延下去。阿期莫夫同志當即對他們表示贊同，並——大概是代表着整個『工人事業』社——馬上就提出了他在組織問題上與火星報分歧的意見（見記錄第三一頁）。起來擁護崩得和『工人事業』社的有馬合夫同志（他代表着

尼古拉也夫城委員會底兩票，而這個委員會不久前還是對火星報表示過同情的哩！）。當時馬合夫同志覺得問題還完全沒有弄清楚，並且他認為『關於民主制，或反之（請注意此字！）關於集中制的問題』也是個『礙難之處』，恰如我們現今的『黨』編輯部中多數人所說的那樣，但他們在代表大會上却還沒有覺察到這個『礙難之處』哩！

總之，當時表示反對火星派的有崩得，『工人事業』社和馬合夫同志，合共計算起來也就恰巧構成當時反對我們的那個十票的數目（見第三三頁）。表示贊成的有三十票，而這也就是——如我們往下就會看見的——火星派方面的票數時常在它上下不遠的那個數目字。當時有十一票表示懷疑，——大概是不願站在互相鬥爭着的兩『黨』的任何一方面吧。值得指出的，是當我們實行表決崩得章程第二條時（對於這第二條的否決，結果就使崩得退出了黨），表示贊成第二條以及表示懷疑的也等於十票（見記錄第二八九頁），而且表示懷疑的又是三個工人事業社份子（布魯克爾，馬爾丁諾夫和阿期莫夫）以及馬合夫同志。可見，表決崩得問題在議事日程上討論的次序問題時所形成的派別分立，並不是偶然的。可見，所有這些同志都不僅在關於本問題討論次序的技術手續問題方面，並且在關於本問題底實質方面也是與火星報意見分歧的。『工人事業』社在關於本問題實質方面所持的分歧意見是每個人都很明白的，而馬合夫同志在其論崩得退出一舉的演詞中却妙不可言地說明了自己的態度（見記錄第二八九至二九〇頁）。這個演詞是值得來說說的。馬合夫同志說，在通過了否決聯邦制的決議案後，『關於崩得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的地位問題，在他看來已由一個原則問題變為一個對待歷史上已經形成的一個民族組織的現實政策問題了；當時——這位發言人繼續說道——我不能不顧計到我們的表決所能引起的一切後果，因此我會想投票贊成整個第二條』。馬合夫同志很清楚地領會了『現實政策』底精神：他在原則上已經否決了聯邦

制，因此他在實踐上也就想投票贊成章程內實行這個聯邦制的那一條！於是這位『求實的』同志就用如下的語句來解說其深刻原則的立場：『但是（好一個有名的謝德林式的『但是』呵！），由於代表大會所有其餘一切參加者幾乎一致表決的關係，我的任何一種表決都只能帶有原則的意義（!!）而不能有什麼實際的意義，於是我也就寧願放棄了表決權，以便原則地』…（天呀，我們不要這樣的原則性呢！）…『表明我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立場與投票擁護該條的崩得代表們所持的立場有所不同。反之，如果崩得代表如同他們自己預先主張過的那樣對這一條放棄了表決權，那我就會投票贊成這一條了』。誰能懂得這個呵！一個講原則的人不肯放聲說『是』，因為這在事實上是沒有益處的，因為大家都在說『不是』呵。

表決了關於崩得問題的討論次序後，接着在代表大會上又湧出了『鬥爭』社問題，這個問題也引起了極有趣味的派別分立，並且是與代表大會上那個最『礙難的』問題，即與中央機關人選問題緊相聯繫的。負責決定代表大會成份的委員會，依據組委兩次決議（見記錄第三八三和第三七五頁）以及組委代表在這委員會中的報告（見第三五頁），反對邀請『鬥爭』社來參加代表大會。

組委委員葉哥羅夫同志說『『鬥爭』社問題（請注意：這裏所說的是『鬥爭』社而不是該社某一份子）對於他是一個新的問題』，所以他請求休會。爲什麼一個由組委解決過兩次的問題對於組委委員竟是一個新的問題呢，——這是始終令人莫明其妙的。在休會時，組委將其當時偶然列席代表大會的委員（有幾個是火星組織中的老組員的組委委員，沒有列席代表大會）*召集起來開會（見記錄第四〇頁）。關於『鬥爭』社問題的討論開始了。工人事業社份子發言表示贊成（馬爾丁諾夫，阿期莫夫和布魯克爾，見第三六至

*關於這次會議，請參看組委委員並在代表大會前一致選舉爲編委信託人兼編委第七個委員的帕夫洛維奇所寫的一封信（見同盟記錄第四四頁）。

三八頁)。火星派份子（帕夫洛維奇，索羅金，蘭格，托洛茨基，馬爾托夫等等）發言表示反對。代表大會又分裂為我們已經熟識的那些派別。『鬥爭』社問題引起了頑強的鬥爭，馬爾托夫同志當時作了一個特別有力的（見第三八頁）和『戰鬥性的』演說，公正地指出說俄國國內團體和僑外團體底『代表名額不均等』，說給予僑外團體一種『特權』的辦法未必有什麼『好處』（真是至理名言，這在現時從代表大會以後所發生過的事變看來，是特別值得玩味的！），說不應當鼓勵『黨內組織上的混亂狀態，即絕非根據什麼原則理由發生的分散現象』（真是毫釐不爽地打中了…我們黨代表大會上的『少數派』呵！）。除『工人事業』社而外，直到停止報名發言時為止，誰也沒有拿出過什麼理由來公開表示擁護『鬥爭』社（見第四〇頁）應該給阿期莫夫同志及其朋友們說句公道話：他們至少是沒有支吾和沒有閃躲過，而是公開地執行了自己的路線，公開地說出了他們自己的願望。

在停止報名發言以後，按問題實質發表意見已經是不容許的了，而葉哥羅夫同志却『堅決要求宣佈組委剛才通過的決議』。無怪乎代表大會參加人對於這種手段表示憤慨，大會主席普列漢諾夫同志表示『茫然莫解，究竟葉哥羅夫同志怎樣還堅持自己的要求』。看來是二者必居其一：或是在代表大會全體代表面前按問題實質來公開肯定地發表自己的意見，或是完全不發表意見。可是，既已同意停止報名發言，忽然又以作『結論』為藉口來向代表大會捧出組委底新決議，並且正是關於已經討論過了的這個問題的決議，那就無異是暗裏放冷箭了！

午後又繼續開會，此時還是茫然莫解的主席團乃決定放棄『形式手續』，而去採用最後的，在代表大會上只有萬不得已時才運用過的方法，即所謂『同志解釋』方法。組委底代表頗坡夫宣讀組委決議，這個決議原是除帕夫洛維奇（見第四三頁）一人反對而外由組

委全體委員通過的，其內容是向代表大會建議邀請梁贊諾夫出席代表大會。

帕夫洛維奇提出聲明，說他過去和現在都不承認組委會議為合法會議，說組委底新決議『和組委底先前決議相抵觸』。這一聲明引起了莫大的風波。另一個組委委員，『南方工人』社份子葉哥羅夫同志迴避切實回答問題，却想把重心轉移到紀律問題上去。他說帕夫洛維奇同志違背了黨的紀律（！），因為組委討論過帕夫洛維奇底抗議以後便決定『不把帕夫洛維奇底單獨意見通知給代表大會』的。於是辯論就移到黨紀律問題上去，當時普列漢諾夫在代表大會熱烈鼓掌聲下用教訓口吻向葉哥羅夫同志解釋說：『我們這裏是沒什麼絕對委任狀制的』（見第四二頁，參看第三七九頁所載代表大會章程第七項：『代表們不應以絕對委任狀來限制自己的職權。他們在執行自己的職權時是完全自由和完全自主的』）。『代表大會是全黨最高機關』，因此違背黨紀律和代表大會章程的正是設法妨礙任何一個代表把所有一切黨生活問題直接請求代表大會解決的人。於是，爭論問題就歸結於二者必擇其一：是小組習氣呢，還是黨性呢？是為種種團體和小組捏造出來的權利或章程來限制大會代表底權利，還是不僅口頭上而且事實上在代表大會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級機關和舊的小團體，一直到建立真正黨的正式負責機關為止呢？讀者由此就可看出，在負有實際恢復黨的使命的代表大會開始時（第三次會議）發生的這次爭論，該有何等重大的原則意義呵。這次爭論可以說是舊時小組小團體（如『南方工人』社）與復興着的黨之間衝突集中的表現。於是各個反火星派的集團也就立刻暴露了自己的面目：無論是崩得份子阿伯拉姆松，無論是馬爾丁諾夫同志，即火星報現時編輯部底熱烈同盟者，亦無論是我們所熟識的馬合夫同志，都曾發言擁護葉哥羅夫和『南方工人』社而反對帕夫洛維奇。現在同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競相以組織上的『民主主

義』自炫的馬爾丁諾夫，當時甚至拿…軍隊來做比擬，說軍隊中只有經過下級長官才可向上級長官申訴哩！！這個『團結緊密的』反火星派立場底真正意思，是任何一個參加過代表大會，或在代表大會以前仔細注意過我黨內部歷史的人，都完全明白的。這個反對派底任務（也許不是常常都爲該派所有一切份子所意識到，不過是依惰性作用來堅持着的任務），就是要捍衛各個小團體底獨立性、獨存性以及狹隘門戶利益，使其不致被根據火星原則建立起來的廣大政黨所吞食。

當時還沒有來得及與馬爾丁諾夫聯合起來的馬爾托夫同志，也就是從這個觀點上看問題的。當時馬爾托夫同志堅決地實行攻擊，並且是公正地實行攻擊那些『認爲黨紀律僅僅是意味着革命家應服從其所參加的那個下級團體的義務』的人。『在統一的黨內決不容許有任何強制的（着重點是馬爾托夫加的）派別分立』，——馬爾托夫當時這樣向拚命擁護小組習氣的那些人解釋，却竟沒有料想到他說這些話就是指斥了他自己在代表大會末尾和代表大會閉會後的政治行爲哩…強制性的派別分立對於組委是不可容有的，而對於編輯部却就完全是可以容許的了。當馬爾托夫還是從中央來看問題的時候，他是反對強制性的派別分立的，而當馬爾托夫一對中央人選表示不滿的時候，他却立刻就來堅持這種派別分立了…

值得指出一件事實，就是馬爾托夫同志在自己的演詞中，除指出葉哥羅夫同志底『莫大錯誤』而外，還特別着重指出過組委所表現的那種政治上的不穩定性。『用組委名義提出的建議，——馬爾托夫公正地憤然說道，——與委員會底報告（我們要補充一句：根據組委委員底報告所作的報告：見第四三頁，科爾鑿夫底話）以及組委先前的建議相抵觸』（着重點是我加的）。你們可以看出，馬爾托夫當時，即在自己尚未『轉變』以前，曾明白瞭解，用梁贊諾夫代替『鬥爭』社是決不能消除掉組委行動方面的絕頂矛盾性和

絕頂動搖性的（黨員們在同盟代表大會記錄第五七頁上可以看出，馬爾托夫在自己已經轉變以後又是怎樣來觀察問題的）。馬爾托夫當時並沒局限於分析紀律問題；他直接詢問過組委：『究竟發生了什麼使這種改造成為必要的新事情呢？』（着重點是我加的）。的確，組委提出自己的建議時，甚至沒有充分勇氣如像阿期莫夫等人那樣公開擁護自己的意見。馬爾托夫現在否認這點（見同盟記錄第五六頁），但讀到代表大會記錄者却可看出馬爾托夫是弄錯了。頗坡夫用組委名義提出建議時，一句話也沒有說明過理由（見黨代表大會記錄第四一頁）。葉哥羅夫把問題中心轉移到紀律問題上去，但他按實質却只是說『組委方面可能想出一些新的理由』…（究竟想出過沒有呢，以及究竟是什麼樣的理由呢？——却不得而知）…『它可能忘記提出某人以及其他等等』（這『以及其他等等』幾字就是該發言人所留下的唯一後路，因為組委決不會忘記它在代表大會以前討論過兩次以及在決定代表大會成份的委員會以前討論過一次的那個『鬥爭』社問題）。『組委之所以通過這個決議，並不是因為它已改變了自己對於『鬥爭』社的態度，而只是因為它想排除將來黨中央機關一開始活動時就能碰見的多餘障礙』。這並不是說明理由，而正是迴避說明理由。任何一個態度誠懇的社會民主黨人（我們連想也沒有想到要懷疑任何一個參加代表大會者態度底誠懇性）都想要排除他所認為是暗礁的東西，想要用他所認為適當的方法來排除這種東西。所謂說明理由，就是要解釋並確切說出自己對於事情的觀點，決不是用一些不言而喻的道理來支吾搪塞。但為要說明理由，却非『改變自己對於『鬥爭』社的態度』不可，因為組委從前所通過的那些相反的決議也是想要排除暗礁，但那些決議所認定的『暗礁』却恰巧是在相反的方面。所以馬爾托夫同志也就非常激烈並且非常有理地攻擊過這種論據，說這是一種『小氣的』論據，是因想『抵賴』而提出的論據，並奉勸組委『不要害怕』

他人怎樣去議論』。馬爾托夫同志所說的這句話真把那在代表大會上起過巨大作用的政治色彩底實質和意思形容得唯妙唯肖，因為這種色彩底特徵正在於欠缺獨立性，小氣小節，沒有自己的路線，害怕他人議論，永遠動搖於兩個肯定方面之間，害怕公開說出自己的 credo* 等等，——總而言之，就是帶有『泥潭性』**。

正因為這個不穩定集團在政治上如此沒有氣節，所以結果除崩得份子尤金而外（見第五三頁），誰都終於沒有向代表大會提出過邀請『鬥爭』社某一份子來出席代表大會的決議案。投票贊成尤金決議案的有五票，——顯然都是崩得份子；動搖份子又變卦了！至於中派票數底大概數目究竟多麼大，這可從大會代表投票擁護科爾鑿夫和尤金兩人各自關於這一問題所提出的兩個決議案的表決結果中看出：擁護火星份子提案的有三十二票（見第四七頁）；擁護崩得份子提案的有十六票，就是說，除反火星份子所有的八票而外，有馬合夫同志底兩票（見第四六頁），『南方工人』社份子底四票以及還有其他兩票。我們往下就要指明這樣分配絕非偶然的事，但我們首先要簡略指出馬爾托夫現在關於那次組委事件的意見。馬爾托夫在同盟中揚言，說『帕夫洛維奇等人態度激烈過火』。只要把大會記錄拿來考證一下，就可看出，當時為反對『鬥爭』社和組委而發表最詳盡、最熱烈、最激烈言論的正是馬爾托夫自己。他企圖把『罪過』卸到帕夫洛維奇頭上，其實不過是暴露他自己的不穩定

*意即『信條，綱領，世界觀』。——譯者。

**現時我們黨內有人一聽見此語就大驚小怪，拚命叫喊，說人家用非同志的態度進行論戰。人們竟因太愛講究（講究得不得當的！）正式氣派弄得知覺錯亂到奇怪已極的地步！未必有一個經歷過內部鬥爭的政黨沒曾用過這個名詞，因為這個名詞始終是用以形容動搖於各種戰士間的不穩定份子的。所以那些善於把黨內鬥爭限制在極穩健範圍中的德國人，並不因聽見 «versumpft»（即泥潭性的。——譯者）一語而生氣，並不大驚小怪，並不表現出一種可笑的正式的 Pruderie（嚴謹氣派。——譯者）。

性罷了：在代表大會以前由他投票選舉到編輯部去的第七個委員正是帕夫洛維奇，在代表大會上他是完全站在帕夫洛維奇方面（見第四四頁）來反對葉哥羅夫的；後來當他從帕夫洛維奇那裏遭到失敗後，他就來責難帕夫洛維奇『態度激烈過火』。這祇是令人發笑而已。

馬爾托夫在火星報（第五十六期）上諷刺說人家把邀請某某人的問題看成了有重要意義的問題。這個諷刺又是反對馬爾托夫本人的，因為正是組委事件成了對於如像邀請某某人參加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問題這樣『重要』問題爭論底伏線。看事情是涉及自己的『下級團體』（對黨而言）還是涉及他人的『下級團體』而用不同的尺度來度量，——這是很不好的。這正是庸人習氣和小組習氣，而決不是黨性態度。只要把馬爾托夫在同盟中的演詞（見第五七頁）與他在代表大會上的演詞（見第四四頁）拿來對照一下，就可充分證明這一點。『我真不瞭解，——馬爾托夫在同盟裏說道，——爲什麼人家無論如何都要以火星份子自命，同時却又恥於成爲火星份子』。不瞭解『自命』和『成爲』之間的區別，不瞭解言行之間的區別，——這倒是一種很奇怪的不瞭解哩。馬爾托夫自己在代表大會上曾以反對強制派別分立者自命，而在代表大會以後却又成爲了主張強制派別分立者了…

（四）解散『南方工人』社

也許有人覺得討論組委問題時所形成的代表分立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但這種觀念是錯誤的。爲了排除這種錯誤觀念起見，我們就暫且離開時間次序，而去分析那在代表大會末尾發生，但與上項事件緊相聯系的事件。這一事件是因解散『南方工人』社問題而發生的。在這裏與火星報所定組織方針對立起來，即與主張團結全黨力量排除那種分散力量的混亂狀態的方針對立起來的，是一個集團

底利益，這個集團在還沒有真正的黨時曾作過有益的事情，而當工作已按集中制原則來進行時，却就成爲多餘的了。從各個小組底利益着想，『南方工人』社與火星報舊編輯部一樣有權要求保存『繼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從全黨底利益着想，該社却應服從大會關於將該社力量調派到『相當的黨組織』中去的決定（見第三一三頁，代表大會決議案末尾一段）。從小組利益和『庸人習氣』方面來看，解散一個也是如火星報舊編輯部一樣不願解散的有益團體不能不令人覺得是一件『礙難的』事情（魯索夫同志和捷依契同志底話）。而從黨底利益方面來看，解散這個團體，使其『溶化』（古塞夫底話）到黨內去，却是必要的。『南方工人』社當時公開聲明，說它並『不認爲必須』自行宣告解散，而要求『代表大會決然表示自己的意見』，並且要代表大會『立刻說個是或不是』。『南方工人』社當時直接援引了火星報舊編輯部…在解散以後所援引過的那種『繼承性』！『雖然我們大家都是以個人爲單位來組成一個統一的黨，——葉哥羅夫同志說道，——但黨終究是由許多組織所組成，這種組織應被尊重，因爲它們是些歷史單位…如果這樣一個組織無害於黨，那就用不着把它解散』。

這樣就完全肯定地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問題，當時所有一切火星派份子由於他們自己的小組利益還沒有湧到前面來，都曾堅決表示反對那些不穩定的份子（此時崩得份子以及兩個工人事業社份子已經退出了代表大會；不然他們是一定會拚命來主張必須『尊重歷史單位』的）。表決結果是三十一票贊成，五票反對，五票表示懷疑（其中有四票是『南方工人』社份子，其餘一票大概是別洛夫，這點可從他先前的聲明中推測而知，見第三〇八頁）。這個佔有十票，激烈反對火星報一貫組織計劃，捍衛小組習氣反對黨性的集團，在此地已是表現得十分確定了。在討論時，火星派份子正是原則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參看蘭格底演詞，見第三一

五頁），並發言反對手工業方式和離散狀態，並不認為必須顧及個別組織底『同情』，而是直截了當地說，『如果『南方工人』社中的同志們早在一年或兩年前就已持着較為原則些的觀點，那末黨底統一事業和我們在這裏所批准了的綱領原則底勝利就會早已達到了』。奧爾洛夫，古塞夫，略多夫，穆拉維也夫，魯索夫，帕夫洛維奇，格列波夫和哥林等人，都是本着這種精神來發表意見的。『少數派』方面的火星份子，當時不僅沒有表示反對代表大會上屢次提出過的這些肯定指明『南方工人』社，馬合夫等等欠缺原則政策和『路綫』的意見，不僅沒有對此提出過什麼附帶聲明，反而以捷依契為代言人堅決贊同了這些意見，斥責『混亂狀態』，歡迎魯索夫同志『直截提問題的態度』（見第三一五頁），但這個魯索夫同志在同一次會議上却又居然——這還了得！——擅敢把舊編輯部問題也『直截提』到純粹黨的立場上來哩（見第三二五頁）。

解散『南方工人』社的問題引起了該社方面莫大的憤怒，其痕跡在記錄中也可看出（不要忘記，記錄祇能約略表明出討論情形，因為記錄上並沒有記載演詞全文，而只寫上其最簡略的概要和精華）。葉哥羅夫同志甚至一聽見有人提起『工人思想』社底名字來和『南方工人』社並列，就說這是『造謠』，——由此就可明顯地看出代表大會上一般人對於澈底經濟主義所持的態度了。葉哥羅夫甚至在更晚得多的時候，即在第三十七次會議上，還極端憤慨地說到過解散『南方工人』社的問題（見第三五六頁），並請求在記錄上載明：在討論『南方工人』社問題時，無論關於出版經費或關於中央機關報和中央委員會底監督問題，都沒有詢問過該社社員底意見。頗坡夫同志在討論『南方工人』社問題時提出一種暗示，說有一個團結緊密的多數似已預先解決了關於該社命運的問題。『現在，——他說道，——當古塞夫同志和奧爾洛夫同志發言以後，一切都已經明白了』（見第三一六頁）。這些語句底意思無疑是說：現

在，當火星派份子已經發了言並提出了決議案以後，一切都已經明白了，換句話說，『南方工人』社將違反其意志而被解散是已經明白的了。『南方工人』社底代表自己在這裏把火星份子（並且是如古塞夫和奧爾洛夫這樣的份子）與自己的同派人分開，作為兩種不同的組織政策『路線』底代表。所以現今的火星報把『南方工人』社（大概也還把馬合夫？）形容為『標本式的火星份子』，就不過是很具體地證明，新編輯部忘記了代表大會上最大的（從這個團體底觀點來看）事變，却要想把表明所謂『少數派』究竟是由怎樣一些人所組成的罪證抹煞下去。

可惜，代表大會上沒有提起關於出版通俗機關報的問題。所有一切火星份子，無論在代表大會以前或在代表大會時期——在會議以外——都非常熱烈地討論過這個問題，並一致認為在黨生活目前情形下實行出版這樣一個機關報或把某一現存刊物變為這樣的機關報是極不合理的。反火星份子在代表大會上發表了相反的意見，『南方工人』社在自己的報告中也表示過這樣的意見，當時祇是由於一種偶然原因或是由於不願提出『沒有希望的』問題，才沒有由十個人署名提出過相當的決議案。

（五）因語言平等問題而發生的事件

我們又來按代表大會開會次序敘說吧。

現在我們已經確實知道，代表大會上尙未切實討論各種問題以前，就不僅是顯現出了一個完全確定的反火星集團（八票），並且顯現出了一個決意贊助這個八人團而使它增加到約十六票至十八票的中間動搖集團。

代表大會上對於崩得在黨內地位問題所進行的那種非常詳細而且過份詳細的討論，只是達到了對於原則提綱的解決，但實際的解決却一直拖延到了討論組織關係問題的時候。既然與此有關的種種

問題早在代表大會以前就在刊物上很詳細解釋過了，所以代表大會上的討論所提供的新東西也就比較的少。不過要指出一點，就是『工人事業』派（馬爾丁諾夫，阿期莫夫和布魯克爾），雖表示同意馬爾托夫所提出的決議案，但同時却又聲明，說他們認為這個決議案不充分，並且他們不贊成從這個決議案中所作出的結論（見第六九，七三，八三，八六等頁）。

討論崩得地位問題以後，代表大會接着就討論到綱領問題。這次所討論的大部分都是些很少有趣味的局部修正。在原則上，反火星派底反對態度只是表現於馬爾丁諾夫同志激烈反對所謂自發性和覺悟性問題提法的言論。崩得份子和『工人事業』社份子當然是全體一致來擁護馬爾丁諾夫底意見。順便說說，關於馬爾丁諾夫底異議毫無根據這點，馬爾托夫和普列漢諾夫也曾加以指摘。很可笑的，是現在火星報編輯部（大概是經過一番思索之後）已轉到馬爾丁諾夫方面而說出與它在代表大會上所講過的相反的話來了！大概這是適合於所謂『繼承性』原則吧…我們只好靜待編輯部把問題完全弄清楚時再向我們說明一下，究竟它是在何程度內同意了馬爾丁諾夫底意見，究竟在哪一點以及究竟是從什麼時候起開始同意的。在等待這個時，我們只想問一問，究竟什麼地方看見過一個黨機關報底編輯部在代表大會以後竟會說起一些恰巧與它在代表大會上所說過的相反的話來了呢？

現在我們不去檢討關於承認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問題的爭論（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過這些爭論），以及對於黨章問題辯論的開端（關於這些辯論，最好是留到分析對於黨章問題的全部討論時去說），而要說說在討論綱領時所暴露出來的那些原則色彩。我們首先就指出一個非常標本的細節，即關於比例代表制問題的討論。『南方工人』社中的葉哥羅夫同志堅決主張把這一項加進到綱領中去，於是坡薩多夫斯基（少數派方面的火星份子）就公正地指出，

說這裏存在有『嚴重的意見分歧』。『毫無疑義，——坡薩多夫斯基同志說，——我們對於如下一個基本問題持有不同的意見：究竟是要把我們將來的政策服從於某些基本民主原則而承認這些原則有絕對價值呢，還是要認爲所有一切民主原則都應專一服從於我們黨底利益呢？我是堅決擁護後一種意見的』。普列漢諾夫當時『完全贊同』坡薩多夫斯基底意見，並用更肯定更堅決的語句來反對那認爲『民主原則有絕對價值』的說法，反對『抽象』看待民主原則的觀點。他說：『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在相當場合也許會要表示反對普選制。意大利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曾有一個時候褫奪過貴族底政治權利。革命無產階級也許會要限制各上層階級底政治權利，也如各上層階級限制過無產階級政治權利一樣』。普列漢諾夫底發言遇到了鼓掌聲和斥叫聲，而當普列漢諾夫抗議『你們不應當斥叫』的Zwischenruf*，並請同志們不要拘謹時，葉哥羅夫同志馬上就站立起來說道：『既然這種發言引起了鼓掌聲，那我就一定要斥叫了』。葉哥羅夫同志和哥里德卜拉特同志（崩得代表）一同發言反對坡薩多夫斯基和普列漢諾夫底意見。可惜辯論被打斷了，所以在這些辯論過程中湧現出來的問題也就立即消聲匿跡了。但馬爾托夫同志現在徒然企圖減弱，甚至想完全抹煞這個問題底意義，居然在同盟代表大會上聲言說：『這幾句話（即普列漢諾夫所說的幾句話）激怒了一部分代表，要是普列漢諾夫同志當時補充過一句，說自然很難設想出一種可悲狀況使無產階級爲着鞏固自己的勝利必須踐踏如出版自由一類的政治權利，那末這種憤怒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普列漢諾夫說：«merci»**）』（見同盟記錄第五八頁）。這種解釋根本與坡薩多夫斯基同志在代表大會上完全肯定認爲在『基本問題』上存在有

*意即『座上喊聲』。——譯者。

**意即『謝謝』。——譯者。

『嚴重意見分歧』和不同意見這一聲明相矛盾。關於這個基本問題，所有一切火星份子都在代表大會上發言反對過『右派』反火星份子（哥里德卜拉特）以及代表大會上的『中派』份子（葉哥羅夫）。這是事實，並且我們可以大胆担保：假如『中派』（我想，這個字該比其他任何一個字都更少能使『正式』溫柔主義者感覺難堪吧…），假如『中派』（以葉哥羅夫同志或馬合夫為代表）當時『隨意』發表過自己對於這個問題或此類問題的意見，那末嚴重的意見分歧是立刻就會暴露出來的。

這種意見分歧，在討論『語言平等』問題時暴露得更為明顯（見記錄第一七一以及往下各頁）。關於這一條的最顯著的事情，與其說是討論情形，不如說是表決情形：把表決次數計算一下，我們便可得出一個難以置信的數目——十六次！導火綫是什麼呢？導火綫就是：究竟是只須在黨綱中指明全體公民不分性別等等以及語言一律平等就够了呢？還是必須指出『語言自由』或『語言平等』才行呢？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頗為正確地描寫過這一事件，他說：『關於黨綱一項條文措詞的細小爭論，竟具有了原則的意義，因為代表大會上半數代表都決意推翻黨綱委員會』。正是如此*。引起衝突的導火綫確實很小，但衝突畢竟具有了真正是原則

*馬爾托夫補充說：『在這裏，普列漢諾夫關於驢子的挖苦話使我們受到了很大的害處』（當講到語言自由時，彷彿有一個崩得份子列舉各種機關而提到了養馬機關，當時普列漢諾夫就自言自語道：『馬是不講話的，而驢子有時却會講話哩』）。我當然不認為這種挖苦話特別柔和、特別謙讓、特別慎重和特別圓活。但我終於覺得奇怪的，是馬爾托夫既然承認爭論具有原則的意義，為什麼完全不來分析此處的原則性究竟何在以及此處究竟暴露出了怎樣的色彩，却以指出挖苦話底『害處』為限呢。這才真是官僚主義的和形式主義的觀點哩！激烈的挖苦話確實『在代表大會上發生過很大的害處』，其中不祇有指着崩得份子說的挖苦話，並且還有指着那些有時受到崩得份子們贊助和甚至由他們從失敗危險中救出過的人們所說的挖苦話哩。但是，既然已經承認事件有原則的意義，也就不能用指出某些挖苦話『不可容許』（見同盟記錄第五八頁）的說法來敷衍了事了。

的性質，因而也就具有了異常殘酷的形式，一直到有人企圖『推翻』黨綱委員會，一直到猜疑有人想要『欺騙代表大會』（葉哥羅夫就是這樣猜疑過馬爾托夫的哩！），一直到彼此以最含…諷罵意味的語句相加（見第一七八頁）。甚至頗坡夫同志也曾『表示惋惜，說爲着一些小事而竟造成了這樣緊張的空氣』（着重點是我加的，見第一八二頁），這種空氣佈滿了一連三次（第十六次，第十七次和第十八次）會議。

所有這些語句都是極其肯定確切地指明一件極重要的事實：充滿『猜疑』和最殘酷鬥爭（『推翻』）的那種空氣（即後來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有人硬說是由火星多數派製造成的那種空氣！），其實是遠在我們分裂爲多數派和少數派以前就早已造成了的。我再重複說一遍，這是一件極重要意義的事實，這是一件基本事實，許多人往往因不瞭解這件事實而發生一種極輕浮的觀念，以爲在代表大會末期所形成的多數是勉強造成的。根據現在硬說代表大會參加者中十分之九都是火星份子的馬爾托夫同志觀點看來，由於一些『小事』，由於一個『細小的』導火綫爆發出一件具有了『原則性質』並幾乎弄到了推翻代表大會黨綱委員會地步的衝突這一事實，是絕對無法解釋和絕對荒誕的。用一些對『發生過害處的』挖苦話表示埋怨惋惜的說法來搪塞這件事實，是很可笑的。衝突是不能因任何激烈的挖苦話而具有原則意義的，這樣的意義只能由代表大會上政治派別分立底性質所造成。並不是由於什麼激烈話或挖苦話引起了衝突，——這些激烈話和挖苦話只是表明代表大會上的政治派別分立形勢本身含有『矛盾』，含有一切引起衝突的前提，含有一種能依其潛力，沿着每一個甚至很細小的導火綫爆發出來的內在分歧。

反之，根據我所用以觀察代表大會，並且我認爲我應該將其作爲對於事變的某種政治見解——那怕有些人也許覺得這種見解是一種侮辱的說法——而加以堅持的觀點看來，由於一個『很細小的』

導火綫爆發出極端劇烈的原則衝突，原是完全自然而且不可避免的。既然在我們代表大會上，時刻都有火星份子與反火星份子的鬥爭，既然在他們之間站立有一些不穩定的份子，既然這些不穩定份子與反火星份子共同擁有三分之一的票數（八票加上十票，即是在五十一票中佔有十八票，這當然是按照我所作的大約計算），那末從火星份子方面有任何一部分人，那怕只是很小一部分人分離出去，都不免要使反火星份子有可能獲得勝利，因而引起『瘋狂』鬥爭，也就是完全可以解釋而且當然的了。這並不是由於什麼過分激烈的胡言暴語或攻擊所引起，而是由於政治的分化所致然。並不是什麼激烈語句造成了政治衝突，而是代表大會上的派別分立形勢本身所包含的政治衝突造成了激烈語句和攻擊，——這種相反的解釋，也就是我和馬爾托夫彼此在估計代表大會政治意義及其結果方面的基本原則意見分歧之所在。

在整個代表大會期間，有過很少數火星份子脫離大多數火星份子的三次最大事件，即語言平等，黨章第一項和選舉問題，並且在所有這三次都造成了終於引起現在黨內嚴重危機的殘酷鬥爭。爲了在政治上理解這個危機和這個鬥爭，就不應該局限於空談什麼有人講過一些不可容許的挖苦話，而是應該去考察在代表大會上彼此衝突過的種種色彩間的政治派別分立。所以，『語言平權』事件對於說明分歧原因一舉實有雙重的作用，因爲馬爾托夫當時還是（還是！）個火星份子，並且幾乎比任何一個人都更爲起勁地攻擊過反火星份子和『中派』。

戰爭是由馬爾托夫同志與崩得首領李伯爾同志間的爭論開始的（見第一七一至一七二頁）。馬爾托夫當時證明說，只要提出『公民平等』要求就夠了。『語言自由』要求被否決了，但立刻就有人提出『語言平等』的要求，於是葉哥羅夫同志就和李伯爾一起加入了戰爭。馬爾托夫當時說這是拜物教，『因爲發言人堅決主張民族平

等，而把不平等現象移到了語言問題方面。其實，問題正是應從另一方面來觀察：存在有民族不平等現象，其表現之一就是屬於某一民族的人沒有使用本族語言的權利』（見第一七二頁）。馬爾托夫當時說得完全對。的確，李伯爾和葉哥羅夫毫無理由地妄想辯護他們自己的說法而企圖證明我們不願意或不善於施行民族平權原則，這真正是一種拜物教的態度。其實，他們正是好像『拜物教徒』那樣堅持字句而不是堅持原則，他們所持的動機不是害怕作出什麼原則錯誤，而是害怕別人議論。這種不穩定性的心理（恐怕『別人』提出責備），即我們在分析組委事件時已經指出過的心理，也就是我們的整個『中派』在此處表現得十分明顯的那種心理。另一個中派份子，即與『南方工人』社接近的礦區代表李沃夫，『認為邊區所提出的關於壓迫語言的問題是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在我們黨綱中必須規定關於語言的條文，以便完全排除別人猜疑社會民主黨人懷有俄羅斯化主義的可能性』。你看這是多麼美妙的說明問題『嚴重』的理由呵。問題所以很嚴重，是因為必須排除邊區方面可能表示的猜疑哩！這個發言人根本沒有說出什麼涉及問題本質的話，根本沒有回答過他人所提出的拜物教的罪名，而是完全證實了這個罪名，暴露出自己完全缺乏本人的論證，只是藉口說邊區可能怎樣議論這點來敷衍了事。當時有人對他說：他們可能說出的一切議論都是不對的。而他並不去分析這話究竟說得對不對，却回答說：『別人可能猜疑』。

這樣一種裝模作樣硬說問題非常重要的問題提法，就真正具有了原則性，不過這完全不是李伯爾輩、葉哥羅夫輩、李沃夫輩所想賦予的那種原則性罷了。當時成了原則性問題的那個問題，就在於究竟我們是應該讓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們去運用黨綱上所規定的一般基本原理，把這些原理應用到具體條件上去並按照這樣運用的方向加以發展呢，還是我們單只因為恐怕他人猜疑而就應該用一些瑣屑細

小的條文，局部的指示，輾轉重複的語句，萬應靈丹的公式來塞滿黨綱篇幅呢。當時成了原則性問題的那個問題，就在於社會民主黨人怎能把反對萬應靈丹式的公式主義的鬥爭看成爲（『猜疑爲』）想縮小起碼民主權利和自由的企圖呢。我們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會棄絕這種迷信公式的拜物教心理呢？——這就是我們看見爲了『語言』問題進行鬥爭時所發生的感想。

由於進行過多次記名表決，所以這個鬥爭中的大會代表派別分立情形表明得特別明顯。這樣的表決一共有三次之多。始終極力反對火星派中堅的有全體反火星份子（八票），以及（只有一些極小的變動）整個中派（馬合夫，李沃夫，葉哥羅夫，頗坡夫，墨得維結夫，依萬諾夫，察列夫，別洛夫，——只有後面這兩個人起初表示過動搖，時而投懷疑票，時而投票贊成我們，直到實行第三次表決時才完全確定了自己的態度）。火星派方面有一部分人，主要是高加索人（一共擁有六票的三個人）脫離出去，於是『拜物教』派就終於獲得了優勢。在舉行第三次表決時，當兩種對立趨向方面的人雙方都已十分確切表明自己的立場時，從火星派多數方面脫離出來轉到敵對方面去的是一共擁有六票的三個高加索人，而從火星派少數方面脫離出去的是一共擁有兩票的坡薩多夫斯基和科斯迪契；在頭兩次表決中轉到敵對方面或投懷疑票的：在火星派多數方面有連斯基、斯切泮諾夫和哥爾斯基，在火星派少數方面則有捷依契。火星派方面有八票（從三十三票總數裏）脫離出去，結果就使反火星份子和不穩定份子的聯盟獲得了優勢。這就是代表大會派別分立中的基本事實，這一事實在表決黨章第一項以及在進行選舉時也是重複過的（不過當時脫離出去的是別的火星份子罷了）。無怪乎那些在選舉時遭受了失敗的人現在極力想抹煞他們遭到這種失敗的政治原因，極力想抹煞各種色彩向鬥爭底出發點，而這個鬥爭却在黨面前愈益厲害地暴露了和愈益無情地揭露了那些不穩定的和政治上

沒有氣節的份子。語言平權事件所以極爲明顯地向我們說明這個鬥爭，是因爲當時就連馬爾托夫同志也尙未獲得阿期莫夫和馬合夫兩人底誇獎和嘉許哩。

(六)土地綱領

反火星派和『中派』在原則上不堅定的態度，在討論土地綱領時也表現得很明顯，這次討論佔去了代表大會不少的時間（見記錄第一九〇至二二六頁），並引起了許多非常有趣的問題。果然不出所料，馬爾丁諾夫同志（在李伯爾和葉哥羅夫兩同志發表了一些小小的詰難意見以後）發動了反對綱領的進攻。他提出那個舊論據，說我們要求改正『歷史上這個不公平的現象』⁸⁴就是間接『尊崇了歷史上其他不公平的現象』等等。葉哥羅夫同志也表示擁護這一意見，說他甚至『不明白這個綱領底意義。這個綱領究竟是供我們自己遵行，即應規定我們所要提出的那些要求呢，還是我們想使它成爲大家歡迎的呢』（!?!?）。李伯爾同志『也想提出葉哥羅夫同志所已提出的意見』。馬合夫同志本着他所固有的那種堅決精神出來發言，說『大多數（？）發言人都絕對不瞭解這個綱領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及其所持目的何在』。據他說，這個綱領『很難認作是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它…『含有一些以改正歷史上不公平現象爲兒戲的氣味』，它帶有『一種蠱惑人心和冒險主義的色彩』。而他用來證實這種奧理的理論根據，就是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所慣用的那種誇大其辭和簡單化手段，說火星派『想把農民當作成份一致的東西；既然農民早已（？）分化爲幾個階級，所以提出單一的綱領，也就必然使整個綱領都成爲蠱惑人心的東西，而它實行起來的時候，就會成爲一件冒險的事情了』（見第二〇二頁）。馬合夫同志在這裏『洩漏了』許多社會民主黨人對我們土地綱領持否定態度的真正原因，這些社會民主黨人雖也決意『承認』火星報（如馬

合夫自己也承認了它一樣），可是全然沒有思索過它的方向，它的理論和實踐立場，正因為他們在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觀察俄國農民經濟現代結構這樣一種複雜紛繁現象時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所以他們始終不瞭解這個綱領，而決不是因為對於個別枝節問題持有不同的意見。於是，反火星派首領（李伯爾和馬爾丁諾夫）和『中派』首領（葉哥羅夫和馬合夫），馬上就在這個庸俗馬克思主義觀點上趨於一致了。葉哥羅夫同志又直爽表現了『南方工人』社以及所有一切傾向於它的團體和小組底一個標本特徵，就是他們不瞭解農民運動底意義，殊不知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在第一批有名農民起義⁸⁵時期的弱點，並不是由於誇大了這個運動底意義，而多半是由於沒有充分估量到這種意義（並且是由於沒有充分力量來利用這個運動）。『我絲毫不像編輯部那樣抱着迷戀農民運動的傾向，——葉哥羅夫同志說，——在農民騷動以後有許多社會民主黨人都陷入這種傾向』。只是可惜葉哥羅夫同志絲毫也沒有向代表大會準確指明編輯部底這種傾向究竟有何表現，絲毫也沒有具體指陳過火星報所發表的文章。此外，他還忘記了，我們土地綱領底一切基本條文是在火星報第三期上，即在農民騷動很久以前就已發揮了的。誰如果不是祇在口頭上『承認過』火星報，那他就不妨稍微多注意一下火星報底理論和策略原則！

『我們在農民中間是絕對作不出多少事情來的！』——葉哥羅夫同志這樣感歎說，且隨即說明這種感歎的用意不是表示反對某一個別『傾向』，而是否認我們整個立場：『這也就是說，我們的口號不能與冒險主義口號去競爭』。這真是把一切都歸結於各個政黨口號『競爭』的那種非原則態度底最標本式的表述哩！並且這還是在他宣佈自己已『滿足於』理論解釋以後說出的，在這些理論解釋中指出過：我們力求在鼓動工作中得到堅固的成功而不害怕暫時的失敗，但要得到堅固的成功（不管那些『競爭者』——…片刻的『競

爭者』——如何喧嚷叫喊），就非有綱領底穩定理論基礎不可（見第一九六頁）。既然說自己已『滿足於』這種理論解釋，而立刻又重複從舊經濟主義那裏繼承下來的庸俗原理，以爲『口號競爭』不僅可以解決土地綱領底一切問題，並且可以解決全部綱領以及整個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策略底一切問題，——這該是何等糊塗的觀點呵。葉哥羅夫同志說：『你們決不能強迫僱農去同富農一起爲有不小一部分已落到這種富農手裏的割地⁸⁶而鬥爭』。

又是那樣一套無疑是與我們的機會主義經濟派有血統關係的簡單化的論調，經濟派會堅持說，不可『強迫』無產者去爲現在有不小一部分已落到資產階級掌握和將來還會有更大一部分落到資產階級掌握的東西而鬥爭。又是那樣一套庸俗化的論調，忘掉俄國僱農和富農間的一般資本主義關係底特點。現在事實上受到割地重壓的也有僱農，他們爲求擺脫盤剝制而鬥爭是根本無須什麼『強迫』的。所要『強迫』的只是某些智識份子——要強迫他們來廣泛一點兒瞧瞧他們所負的任務，要強迫他們在討論具體問題時拋棄死板公式，要強迫他們顧到使我們的目的複雜化並改變其形態的歷史情況。正因爲懷有認爲農民是傻子的偏見，即——如馬爾托夫同志（見第二〇二頁）底公正評語所說——在馬合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對土地綱領者底發言中吐露過的偏見，所以這些反對者也就忘記了我國僱農生活底現實條件。

我們的『中派』份子既把問題簡化到單只是工人和資本家對立的地步，當然也就力圖把自己的狹隘觀點推到農民頭上。馬合夫同志說：『正因爲我認爲農民就其狹窄階級觀點限度來說是聰明的，所以我以爲他們會擁護奪取和分割土地的小資產階級理想』。這裏顯然是把兩件事情混爲一談：一件事情是把農民底階級觀點估計爲小資產者底階級觀點，另一件事情是縮小這個觀點，把它歸結爲『狹窄度量』。葉哥羅夫輩和馬合夫輩底錯誤正在於此（也如馬爾

丁諾夫輩和阿期莫夫輩底錯誤是在於把無產者底觀點歸結爲『狹窄度量』一樣）。其實，無論邏輯或歷史都教導說，正因爲小資產者地位含有兩重性，所以小資產者的階級觀點可能是相當狹窄或相當進步的。所以，我們的任務決不是要因農民眼光狹窄（『蠢笨』）或滿懷『偏見』撒手灰心，而是恰巧相反，是要始終不倦地擴大農民意見，促使他的理智去戰勝他的偏見。

對於俄國土地問題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觀點，可說是在忠實擁護火星報舊編輯部的馬合夫同志那篇原則演說底結論中得到了最高的表現。難怪這些話博得了鼓掌……固然是表示譏諷的鼓掌。『我真不知道要把什麼東西叫作不幸』，——馬合夫同志聽見普列漢諾夫所說我們絲毫不害怕土地平分運動⁸⁷，我們不會障礙這個進步（資產階級的進步）運動等語而表示憤慨時說道。——『可是，這個革命即使可以稱呼爲革命，也會是一個不革命的革命，更正確些說，不是革命而是反動（笑聲），類似騷動的革命……這樣的革命將把我們拉往後退，並要有相當時間才可使我們回到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況。而我們現在却有比在法國革命時更多得多的東西（帶譏諷性的鼓掌），我們有社會民主黨（笑聲）』……。是呀，如果社會民主黨是個按馬合夫方式來看問題，或者是個由靠馬合夫輩支持的中央機關來主持的黨，那它就會果然只值得令人發笑了……

由此可見，就是在討論那些由土地綱領所掀起的純粹原則問題時，也立即顯現出了我們所已熟識的派別分立。反火星份子（八票）爲擁護庸俗馬克思主義而出馬討伐；『中派』首領——葉哥羅夫輩和馬合夫輩——尾隨於反火星份子，總是在那裏瞎碰，也是迷誤到那個狹隘觀點上去。所以很自然的，在對土地綱領某些條款舉行表決時，贊成者是三十票和三十五票（見第二二五頁和二二六頁），即恰巧是我們在爭論崩得問題討論次序時，在組委事件時以及在討論南方工人報停刊問題時所看見過的那個大概數目。每逢有

稍微超出尋常成規舊套範圍，稍微要求把馬克思理論獨立運用於新的（對於德國人講來是新的）特殊社會經濟關係的問題發生時，真正勝任的火星份子立刻就顯得只佔五分之三的票數，而整個『中派』立刻就轉向到李伯爾和馬爾丁諾夫一班人方面去。但馬爾托夫同志却還拚命抹煞這件明顯的事實，畏畏縮縮地迴避那些顯然暴露出各種色彩的表決！

從土地綱領問題的討論中，顯然看得見火星份子反對那在代表大會上足足佔有五分之二的人數的鬥爭。高加索的代表們在這裏採取了完全正確的立場，——這大概是因為他們熟悉他們那裏無數農奴制度殘餘的表現，所以他們沒有陷到馬合夫輩所認為滿意的那種抽象而幼稚的簡單對立法上去。當時發言反對馬爾丁諾夫和李伯爾，反對馬合夫和葉哥羅夫的，有普列漢諾夫，有古塞夫（他證實說，『對於我們在鄉村中工作所持的這種悲觀態度』…即葉哥羅夫同志所持的那種態度…他『常在俄國境內工作的同志中間遇見過』），有科斯特洛夫，有卡爾斯基，有托洛茨基。後者正確指出說，土地綱領批評者底『各種忠告』『含有十足的庸俗氣味』。不過我們談到研究代表大會上政治派別分立問題時必須指出一點，就是他的演詞（見第二〇八頁）把蘭格同志與葉哥羅夫和馬合夫兩人相提並論的說法是未必正確的。誰只要仔細讀讀記錄，那他就能看出，蘭格和哥林兩人所站的立場完全不是葉哥羅夫和馬合夫兩人所站的那種立場。蘭格和哥林兩人不喜歡關於割地問題條文的措詞，但他們完全瞭解我們土地綱領底思想，不過他們企圖用另一種方式來實現這一思想，積極努力尋找一個在他們看來更為完善的條文，提出自己的決議草案來說服土地綱領起草人，或是站到土地綱領起草人方面去反對所有一切非火星份子。例如，只須把馬合夫關於否決全部土地綱領的提議（見第二一二頁，九票贊成，三十八票反對）以及關於否決這個綱領個別條款（見第二一六頁等等）

的提議，拿來和蘭格提出自己關於割地條款的條文（見第二二五頁）的那種立場比較一下，就可明白看出這兩種立場根本不同了*。

托洛茨基往下講到那些含有『庸俗氣味』的理由時，指出說，『在臨來的革命時期，我們應當與農民聯繫起來』…『在這個任務面前，馬合夫和葉哥羅夫底懷疑態度與政治『遠見』要比任何一種近視更加有害』。另一個火星少數派份子，即科斯迪契同志，很準確地指出了馬合夫同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原則堅定性底態度』，——這個估計真是毫厘不爽地打中了我們的『中派』。『馬合夫同志在悲觀態度方面是與葉哥羅夫同志一致的，雖然他們彼此有不同的色彩，——科斯迪契同志繼續說道。——馬合夫同志忘記了，社會民主黨人現時已在農民中間進行工作，已在可能範圍內領導着農民運動。而他們却用他們這種悲觀態度來縮小我們工作底規模』（見第二一〇頁）。

爲要結束代表大會對綱領問題討論的情形，還應該指出關於贊助反政府派問題的簡短辯論。我們的綱領上說得很清楚，社會民主黨贊助『一切以反對俄國現存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爲目標的反政府派的和革命的運動』。看起來，『以反對俄國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爲目標』這一限制條件，已充分確切指明我們所贊助的究竟是那些反政府派別了。然而我們黨內早已形成的各種色彩底區別就在此處也立即暴露了出來，雖然本來很難設想到在這樣一個已經再三反覆說明過的問題上也還可能發生『疑惑和誤會』！顯然，此中原因並不是由於什麼誤會，而是由於存在有各種不同的色彩。馬合夫，李伯爾以及馬爾丁諾夫立刻就撞起警鐘來，結果又是落到了『團結』少數的地位，馬爾托夫同志大概要認爲這也是由於有人玩過陰謀、傾軋、外交手腕以及其他種種齷齪把戲（見他在同盟

*參看哥林演詞，見第二一三頁。

代表大會上的演詞），而那些不善於思索少數派和多數派『團結』集團所由形成的政治原因的人們就是慣於拿這些把戲來解釋問題的。

馬合夫又是從庸俗式地簡化馬克思主義開始說起。『我國唯一革命的階級是無產階級，——他聲言說，但立刻就從這個正確原理中作出不正確的結論：——其餘的階級都是些不重要的階級，都是些不相干的東西（全場哄笑）…是的，它們是些不相干的東西，只是想來利用一下機會罷了。我反對那種主張贊助它們的意見』（見第二二六頁）。馬合夫同志對於自己立場的這種絕妙表述，使許多人（他的許多同道者）都懊惱起來，但按實質來講，李伯爾和馬爾丁諾夫兩人都是與他意見一致而提議要把『反政府派的』字樣取消，或添上『民主的反政府派』字樣來加以限制。普列漢諾夫給了馬爾丁諾夫這個修正一個公正的反駁。『我們應當批評自由派，——他說道，——揭破他們的半途性。這是對的…可是我們揭露一切非社會民主運動底狹隘性和局限性時必須向無產階級解釋說，同專制制度比較起來，就連不保證有普選權的那種憲法也是一種進步，所以無產階級決不應寧願保留現存制度而不願有這種憲法』。馬爾丁諾夫，李伯爾和馬合夫三同志不同意這個意見而堅持着自己的立場，當時表示反對這個立場的有阿克雪里羅得，斯塔羅維爾，托洛茨基等人發言，以及普列漢諾夫第二次發言。馬合夫同志在這裏又把自己打了一頓。起初，他是說其餘的階級（除無產階級而外）都『不重要』並且說他『反對那種主張贊助它們的意見』。後來，他却又大發慈悲而承認說，『資產階級按實質雖是反動的，但往往又是革命的，——例如在反對封建制度及其殘餘的時代』。『可是，——他又越改越壞地自行更正着說，——有些集團始終（？）是反動的，——這樣的集團就是手工業者』。你看，後來拚命賣力擁護過舊編輯部的那些『中派』首領們竟已說出原則方面多

麼珍奇的東西來了！正是手工業者，甚至在行會制度非常盛行過的西歐，也如城市中其他小資產者一樣在專制制度崩潰時表現過特別革命的作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不加思索而重複西歐同志關於專制制度崩潰時代有一百年和五十年之久的現代手工業者所講的那些話，是特別荒謬的。在俄國，說什麼手工業者在政治問題方面和資產階級比較起來有反動作用，就不過是背誦一種陳腔爛調而已。

可惜記錄中間完全沒有載明馬爾丁諾夫，馬合夫和李伯爾對這一問題提出的那些被否決了的修正案所獲得的票數。我們只能指出一點，就是反火星份子底各個首領和『中派』底一個首領*在此場合也結成了我們所已熟識的反對火星份子的集團。在總結對於綱領問題的全部討論經過時，不能不作出如下的結論：沒有哪一次較為熱鬧而引起過普遍興趣的辯論不是暴露出了馬爾托夫同志和火星報新編輯部現在極力隱瞞的那些色彩區別的。

(七)黨章。馬爾托夫同志所提出的草案。

代表大會在討論綱領問題後，接着就來討論黨章問題（我們把前面已經提到過的中央機關報問題以及各個地方代表所作的報告撇開不談，這些報告，可惜大多數代表都未能用可以令人滿意的形式提供出來）。不待說，黨章問題對於我們大家都有巨大的意義。須知，火星報自始就不僅是以一個文字宣傳機關資格，而且是以一個組織細胞資格活動的。火星報在第四期社論（從何着手？）中提出

*該派即『中派』底另一個首領葉哥羅夫同志，在別一個地方討論到阿克雪里維得所提關於社會革命黨人的決議案時，發表了他對於贊助反政府派問題的意見（見第三五九頁）。葉哥羅夫同志認為：在綱領上要求贊助一切反政府派的和革命的運動而又說要對社會革命黨人以及自由派持反對態度，就是『自相矛盾』。葉哥羅夫同志在這裏雖然是以另一種形式，稍微是從別一方面來觀察問題，但同樣是暴露自己也像馬合夫，李伯爾及馬爾丁諾夫三同志那樣狹隘瞭解馬克思主義，那樣不穩定，那樣對（他『所承認了的』）火星報立場持着半敵視的態度。

了一個周備的組織計劃*，並在三年以內始終一貫地執行了這個計劃。當第二次黨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承認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時，說明這一決議理由的三項條文中（見一四七頁）有兩項所論及的正是火星報底這個組織計劃和組織思想：火星報在領導黨實際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它在統一工作中的領導作用。所以，火星報底工作和我黨組織方面的全部事業，即事實上恢復我黨的全部事業，若不得到全黨承認並把相當的組織思想正式規定，當然不能算是已經完成。而黨底組織章程也就是應當完成這個任務。

火星報所力求奠定為黨組織基礎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如下兩點。第一個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在原則上確定應如何解決所有一切局部和枝節的組織問題的方法。第二個思想，即認為思想領導機關報有特殊作用的觀點，正是估計到俄國社會民主工人運動在政治奴役環境進行的暫時的和特殊的需要，即在必須把最初的革命進攻動作根據地建立於國外的條件下的需要。第一個思想是唯一原則性的思想，應該貫徹於整個黨章；第二個思想是由行動地方和行動方式底暫時情況所產生的局部性的思想，表現於表面上離開集中制而成立兩個中央機關，即中央機關報和中央委員會。火星報關於組織黨的這兩個基本思想，我在火星報（第四期）社論從何着手？一文內以及在在做什麼？一書中就已發揮過了，後來我在給一位同志的信裏又幾乎是用黨章形式把它詳細解釋過了。其實，當時為要規定黨章條款，只須做一番審編工作就夠了，因為如果對火星報

*頗坡夫同志在其論承認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的演詞裏還說過如下一段話：『我現在回憶起火星報第三期或第四期上所發表的從何着手？一文。有許多在俄國境內活動的同志認為它是不適宜的，另一部分人覺得這個計劃是一個幻想的計劃，而大多數人（？大概是頗坡夫同志周圍的大多數人吧）則說它不過是由於食求功名的結果』（見第一四〇頁）。讀者自己可以看出，這種以食求功名心理來解釋我的政治觀點的說法，這種在目前又受到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兩同志鼓揚的說法，我是早已就聽慣了的。

的承認不是紙上虛文，不只是一句應酬語，那末黨章就應當把這些思想實現出來。我在給一位同志的信一書再版序言中已經指出，說祇要把黨章和本書對照一下，就足以查明前後兩處的組織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了。

講到黨章上表述火星組織思想的條文審編工作時，我要提到馬爾托夫同志所激起的一次事件。『…你們從事實的考證中，——馬爾托夫在同盟代表大會上說道（見第五八頁），——就知道我關於這一項（即第一項）陷入機會主義立場是如何出乎列寧意料以外。在代表大會一個半月至兩個月以前，我把我的草案交給列寧看過，那裏把第一項敘述得恰與我後來在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條文一樣。當時列寧表示反對我這個草案，說這個草案未免寫得太詳細了，並說他只喜歡第一項所說明的那個思想，即關於黨員的定義，說他會把這個思想改變一個樣式採納到自己的黨章中去，因為他覺得我的條文不妥當。可見，列寧早已就知道我的條文，知道我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你們由此就可看出，我是絲毫沒有隱藏本人觀點而帶着一副坦白面孔去參加代表大會的。我曾預先聲明說我要反對相互補選，反對在實行補選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委員時必須取得一致同意的原則等等』。

關於預先聲明說要反對相互補選一層，我們在相當地方就會知道當時實際情形究竟怎樣。現在我們就要講一講馬爾托夫所提章程底這副『坦白面孔』。馬爾托夫在同盟裏憑靠記性敘述他那個不妥當草案的故事時（馬爾托夫在代表大會上自己把這個草案當作不妥當的草案收回了，而在代表大會以後，他却又本着他所特具的那種一貫精神把它重新拖出來了），又是照例忘記了許多事情，因而也就又把問題模糊了。看起來，警告大家不要援引私人談話和本人記憶（人們總是心不由主地只會記憶起有利於自己的那些事情的！）來說明問題的事實已經是够多了，但馬爾托夫同志却終究因為沒有

其他材料可用而來利用惡劣的材料。現在甚至普列漢諾夫同志也模倣起他來了——大概是近墨者黑吧。

馬爾托夫草案第一項底『思想』是不能爲我所『喜歡』的，因爲他的草案中根本就沒有過後來在代表大會上出現的那種思想。是他記錯了呵。我僥倖在紙堆中找到了馬爾托夫底草案，那裏『第一項是敘述得恰巧不合他在代表大會上提出的條文一樣』哩！你看這是怎樣的『坦白面孔』呵！

馬爾托夫草案中的第一項條文是：『凡承認黨綱，並在黨機關（*sic*）監督和指導下爲實現黨任務而積極工作者，皆得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

我的草案中的第一項條文是：『凡承認黨綱，並以物質辦法和親自參加黨內某一個組織的辦法來幫助黨者，皆得爲黨員』。

馬爾托夫在代表大會上提出並由代表大會通過的第一項條文是：『凡承認黨綱，用物質辦法幫助黨，並在黨內某一個組織指導下經常親自援助黨者，皆得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

從這一對照中可以明白看出，馬爾托夫底草案中根本沒有什麼思想，而祇有空洞文句。至於說黨員應在黨機關監督和指導下進行工作，這是自不待言的，這是只能如此的，只有愛說空話，愛用無限多的空洞的廢話和官僚主義的（就是說，爲了事業是不需要的，只有爲了裝飾門面才似乎是需要的）公式來充斥『章程』的人，才會來贅述這點。第一項底思想祇有在提出如下一個問題時才會出現：黨機關在事實上是否能對那些不加入黨內任何一個組織的黨員實行指導呢。這樣的思想在馬爾托夫同志底草案中是連踪跡也沒有的。所以我也就不能夠知道馬爾托夫同志『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因爲馬爾托夫同志底草案中對於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過什麼觀點。可見，馬爾托夫同志所作的事實考證竟是一筆糊塗賬。

反之，正是關於馬爾托夫同志應該說，他從我的草案中『知道我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並且無論在編輯委員會內——雖然我的草案在代表大會兩三個星期以前就給大家看過的——或在那些僅僅看過我的草案的代表們面前，都沒有抗議過，沒有反駁過我的這種觀點。不僅如此。甚至在代表大會上，當我提出自己的黨章草案*並在選舉黨章委員會以前擁護這個草案時，——馬爾托夫同志還直截聲明過：『我贊同列寧同志底結論。僅僅在兩個問題上我和他意見分歧』（着重點是我加的）——即關於總委員會構成方法和一致同意補選的問題（第一五七頁）。關於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上的不同意，這裏是一句話都還沒有講到的。

馬爾托夫同志在其論戒嚴狀況的小冊子裏，居然又把自己的黨章草案再次並且特別詳細地回憶過一遍。他在這本小冊內硬說，他的黨章草案，——對於這個草案，除了某些次要的枝節而外，他現時（一九〇四年二月，——不知道經過兩三個月後又是怎樣）也是完全擁護的，——『充分明白表明了他對於過份集中制的否定態度』（見序言第四頁）。這個草案之所以沒有提交代表大會討論，據馬爾托夫同志現在解釋是因為：第一，『火星教育授給了他藐視章程的態度』（當馬爾托夫同志喜歡如此作時，那他就把『火星』字樣看作狹隘的小組習氣而看作最堅定的方向了！可惜三年的

*順便說說。記錄委員會在第十一號附錄上刊載了『由列寧提交代表大會的』黨章草案（見第三九三頁）。記錄委員會在這裏也糊混了一些事情。它把我那個交給全體代表們（並且是在代表大會開會以前給很多代表）看過的原先的草案與我提交代表大會的草案混為一談，並把第一個草案當作第二個草案刊載出來了。我當然絲毫也不反對人家把我的草案所有各個準備階段上的條文一概公佈出來，但製造混亂觀念畢竟是不應該的。而混亂觀念却終於造成了，因為頗坡夫和馬爾托夫（見第一五四頁和第一五七頁）批評我實際提交代表大會討論的草案中的那些條文，原是記錄委員會所刊載出來的草案中所沒有的。（請參看第三九四頁，第七項和第十一項）。如果比較仔細對待事情，那末只要把我剛才指出的那些頁數對照一下，就很容易發現這個錯誤了。

火星教育沒有授給馬爾托夫同志藐視不穩定的智識份子（在辯護其違背共同通過的黨章的行爲時慣用的那種無政府主義辭藻的態度）。第二，原來是因爲他，即馬爾托夫同志，總想避免『把任何異調滲進到如火星報這樣一個基本組織中堅底策略裏去』。說得多麼圓滑呵！在關於黨章第一項機會主義條文或關於過份集中制的原則問題方面，馬爾托夫同志竟是如此害怕異調（只有從最狹隘的小組觀點來看才是可怕的異調），甚至在編輯部這樣一個中堅面前都沒有提出過自己的分歧意見！當談到關於中央機關人選的實際問題的時候，馬爾托夫同志却就逃避火星組織（這個真正基本組織中堅）大多數人底意見而去求助於崩得和工人專業社份子了。馬爾托夫同志暗中運用小組習氣擁護quasi編輯部而責備說最通曉問題者在估計問題時似乎表現了『小組習氣』的那種言論，分明是含有一種『異調』，但馬爾托夫同志却竟看不見自己這些言論中的異調。爲了懲罰他起見，我們現在就把他那個黨章草案全部引來，並指出它究竟含有怎樣的觀點和怎樣的過份性吧*。

『黨章草案。——（一）黨員。（1）凡承認黨綱，並在黨機關監督和指導下爲實現黨任務而積極工作者，皆得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2）黨員犯有違反黨利益的行爲時，由中央委員會決議開除其黨籍。〔說明開除理由的判詞，應保存在黨底檔庫中，並得按每個黨委員會要求而通知該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關於開除黨籍的決議，在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委員會要求時，可提交代表大會控訴〕]…。我將以方括弧來表明馬爾托夫草案中那些顯然沒有什麼意思的議論，即不僅沒有包含什麼『思想』，而且也沒有包含任何一個肯定的條件或要求的議論，——例如曠世無雙地在『黨章』裏指明判詞究竟要保存在

*我要指出，可惜我不能找得馬爾托夫草案第一種稿本，這種稿本彷彿有四十八項，含有更厲害的無謂形式主義『過份性』弊病。

什麼地方，或說中央委員會關於開除黨籍的決議（而不是它的所有的一切和任何決議麼？）可提交代表大會控訴。這正是過份堆砌的文句或十足的官僚形式主義，專門從事於杜撰一些多餘的，顯然沒有益處或顯然只能延擱問題的款項。『…（二）地方委員會。（3）黨委員會是黨在其地方工作中的代表…』（真是既新穎，又聰明呵！）。『…（4）[凡有代表出席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委員會在代表大會期間現有的成份，皆認為是黨底委員會]。（5）除在第四項內所指出的委員會以外，新的黨委員會應由中央委員會指定之[中央委員會或承認該地方組織底現有成份為委員會，或以刷新該地方組織來構成地方委員會]。（6）委員會得用補選方法補充自己的名額。（7）中央委員會有權用相當數量的同志（它所知道的同志）補充地方委員會名額，其人數不得超過該委員會原有名額總數三分之一…』。好一個官樣文章底標本呵：為什麼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呢？究竟有什麼意思呢？這種根本限制不了什麼東西的——因為補充是可以重複實行許多次的——限制究竟有什麼意思呢？『…（8）[凡遇地方委員會自行瓦解或被取締手段打破]（就是說不是全體被捕麼？）『時，中央委員會即將其恢復之』]…（已經不顧及第七項麼？馬爾托夫同志是否覺得第八項恰與飭令平日作工和節日休息的俄羅斯品行法律相似呢？）『…（9）[每屆黨代表大會都能委託中央委員會革新某個地方委員會成份，如果該地方委員會底活動被認為是違反黨利益的話。在這種情形下，現屆委員會即認為已被解散，而該委員會所屬地區中的同志便可不受其節制*』]…本項所定的規則，是如迄今載在俄羅斯法律中的所謂『禁止

我們請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注意這個字眼。這還了得！你看這就是甚至…甚至擴政更換編輯部成份的那種『雅可賓主義』底根源所在哩…

任何人酗酒』的條款一樣大有益處的。『…(10) [黨地方委員會領導該地全部黨的宣傳工作，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並儘力協助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執行其所應執行的一般黨的任務。]…』。咳！試問這究竟有什麼意思呢？

(11) [『地方組織底內部規則，在委員會與其所屬』（阿克雪里羅得同志，你聽見了麼，你聽見了麼？）『各集團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各該集團底權限範圍和自治範圍』（難道權限範圍和自治範圍不是一個東西麼？）『由委員會自己規定並報告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編輯部』]…（這裏有一點缺陷：沒有指明這種報告應保存在什麼地方）…

(12) [委員會屬下的各個集團和各個黨員，均有權要求將其對於任何問題的意見和願望通知給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 (13) 地方黨委員會務須從自己的收入項下按中央委員會所攤派的數目繳款給中央委員會會計處。(三) 爲用其他語言（除俄文而外）進行鼓動而設的組織——(14) [爲了用某種非俄羅斯語言進行鼓動並將此種鼓動工作所涉及的工人組織起來，得在特別需要把鼓動工作專門化並把該種組織劃分出來的地點設立特別的組織]。

(15) 關於是否確實有這種需要的問題由黨中央委員會解決之，而遇發生爭論時，則提交黨代表大會解決之…』。如果我們注意到這個章程往後的規定，則此項第一部分就是多餘的，

而關於爭論情事的第二部分，則又簡直是滑稽得可笑的…『(16)

[第十四項內所規定的地方組織在其特殊事務方面是自治的，但它們在地方委員會監督下工作並受其節制，這種監督底形式以及該委員會與該特殊組織間的組織關係底標準，由地方委員會規定之…』（謝天謝地！現在我們已可看出所有這一大堆話都是些完全無聊的廢話了）。『…在對於黨底一般事務方面，這種組織應以委員會組織中的一部分的資格進行工作。』（17）

[第十四項內所規定的地方組織，爲順利執行其特殊任務起見，可以成立自治聯盟。這種聯盟可有其特殊的刊物機關和執行機關，但這種刊物機關和執行機關都應受黨中央委員會直接監督。這種聯盟底章程由它自己規定，但須經黨中央委員會批准。](18) [黨地方委員會適應地方條件多半從事於用該地語言進行的鼓動工作時，亦得加入第十七項所規定的自治聯盟。附註：這種委員會雖是自治聯盟中的一部分，但並不因此停止其爲黨委員會』]…（整項都非常有益和絕頂聰明，附註更有甚於此）…『(19)[凡加入自治聯盟的地方組織與該聯盟中央機關間的一切交際關係，應受地方委員會監督。](20)[各自治聯盟所有中央刊物機關和執行機關對黨中央委員會的關係與黨地方委員會對黨中央委員會的關係相當。](四)黨中央委員會和刊物機關。(21)[黨中央委員會和刊物機關——政治的刊物機關和科學的刊物機關——乃是全黨底代表。](22)中央委員會負責對黨全部實際活動實行一般指導，關心正確利用和正確分配全黨一切力量，監督全黨所有各部分底活動，供給各地方組織以刊物，建立黨底技術機關，召集黨代表大會。(23)黨刊物機關負責對全黨生活實行思想上的指導，宣傳黨綱，用科學和政論研究方法闡發社會民主黨底世界觀。(24)所有各地方黨委和自治聯盟都與黨中央委員會和黨機關報編輯部發生直接關係，並將本地運動和組織工作進行情形定期通知它們。(25)黨機關刊物編輯部由黨代表大會指定，一直工作到下屆代表大會時止。(26)[編輯部在其內部事務方面是自主的]，並且能在兩次代表大會相距期間補充和更換自己的人員，但每次都須通知中央委員會。(27)所有由中央委員會發出的聲明或經它批准的聲明，都應按中央委員會要求在黨機關報上刊載。(28)黨中央委員會經黨機關報編輯部同意

後，得成立專門進行某種文字工作的著作團體。(29)中央委員會在黨代表大會上指定，一直工作到下屆代表大會時止。中央委員會可用補選辦法——人數無限——補充自己的名額，但每次都須通知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五)黨底旅外組織。(30)黨底旅外組織主管黨在僑外俄國人中間進行宣傳並組織其中所有社會主義份子。黨底旅外組織由其所選執行機關主持之。(31)加入黨的各個自治聯盟可以在國外設置自己的支部來協助執行其特殊任務。此種支部以自治團體資格加入總的旅外組織。(六)黨代表大會。(32)黨代表大會是全黨最高機關。(33)[黨代表大會規定黨綱，黨章以及全黨活動底基本原則；監督全黨各個機關底工作並審理它們彼此間所發生的衝突。](34)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由下列組織和機關選派之：(甲)各地方黨委；(乙)所有加入黨的各個自治聯盟底中央執行機關；(丙)黨中央委員會和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丁)黨底旅外組織。(35)委任狀可以實行轉託，但每一代表至多只能代表三個實在的代表資格。一個委任狀可以由兩個代表分配。絕對委任狀制是不容有的。(36)中央委員會認為吸收某同志參加代表大會是有益處時，得邀請該同志以有發言權者資格參加代表大會。(37)凡關於變更黨綱或黨章的問題，須有全體出席代表總數三分之二的多數表決時方可解決之；其餘的問題則按普通多數表決解決之。(38)代表大會只有列席代表能代表現存黨委員會過半數時，方可認為有效。(39)代表大會應儘可能每兩年召集一次。[凡遇有不依中央委員會意志為轉移的障礙而不能如期召集時，中央委員會得自行決定延期召集代表大會]。

讀者如果萬一能有充分耐性來讀完這個所謂章程，大概不會要我們特別分析如下幾個結論吧。第一個結論：這個章程患有難於醫

治的水腫病。第二個結論：這個章程裏根本沒有什麼對過份集中制持否定態度的特別組織觀點。第三個結論：馬爾托夫同志把自己這個章程三十九分之三十八以上都隱瞞起來不許世人知道（並且不許在代表大會上加以討論），是作得極其高明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不知他爲什麼居然把這種隱瞞態度說成爲坦白面孔。

（八）火星派內部發生分裂以前關於集中制問題的討論

在尚未說到黨章第一項條文這個確實有趣，且無疑是表明有各種色彩的觀點存在的問題以前，我們還要稍微說說對於黨章問題的簡短的一般討論，這種討論佔去了代表大會第十四次會議全部時間和第十五次會議一部分時間。這種討論是具有相當意義的，因爲它是在火星組織還未因中央機關人選問題發生完全分離以前進行的。反之，後來那些一般關於黨章問題的討論，特別是關於補選問題的討論，却是我們已經在火星組織內部發生分離以後進行的。自然，在尚未發生分離以前，我們還能比較不偏頗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即能比較不去計較我們大家所關懷的中央委員會人選問題而發表自己的意見。前面我已經指出，馬爾托夫同志當時贊成（見第一五七頁）我的組織觀點，不過聲明說他對於枝節問題有兩點歧異的意見。反之，不論是反火星派或『中派』，都馬上來實行攻擊火星報整個組織計劃（亦即整個黨章）中的兩個基本思想：既反對集中制，也反對『兩個中央機關制』。李伯爾同志把我的黨章稱爲『有組織的不信任』，把兩個中央機關制看作分權制（頗坡夫和葉哥羅夫兩同志也是如此）。阿期莫夫同志主張擴大地方委員會底權限，尤其是賦予它們自行『變更自己成份的權利』。『必須賦予它們更大的活動自由… 地方委員會應由當地積極工作人員選出，也如中

中央委員會是由俄國所有一切積極組織底代表選出一樣。如果這也不可容許的話，那就要把中央委員會指定加入地方委員會的委員人數限制一下。』（見第一五八頁）。可見，阿期莫夫同志是在那裏提出反對『過份集中制』的理由，但馬爾托夫同志此時還沒有因在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上遭到失敗跟着阿期莫夫跑，所以對於這些有權威的指示還是充耳不聞。甚至當阿期莫夫同志把馬爾托夫同志自己那個章程底『思想』（第七項——限制中央委員會指定委員加入地方委員會的權利）說給他聽的時候，他也還是充耳不聞哩！馬爾托夫同志當時還不願意唱出與我們意見不合的『異調』，所以他也就忍耐了他與阿期莫夫同志以及與他本人意見不合的異調… 當時發言攻擊『猙獰可怕的集中制』的還只有那些覺得火星報所主張的集中制對於他們顯然不利的人，即阿期莫夫、李伯爾、哥里德卜拉特三人，小心謹慎地（其所以如此，是爲了可以隨時向後轉）跟着他們走的有葉哥羅夫（見第一五六頁和二七六頁）等等。當時黨內絕大多數都還明白，崩得、『南方工人』社等等正是根據它們那種狹隘門戶小組利益來反對集中制的。順便說說，現在黨內絕大多數也是看得很明白，火星報舊編輯部正是根據自己那種小組利益來反對集中制的…

例如拿哥里德卜拉特同志（見第一六〇至一六一頁）底演詞來說吧。他拚命攻擊我所主張的『猙獰可怕的』集中制，說這種集中制是要『消滅』下級組織，『完全是想使中央機關有無限權力來隨便干涉一切』，而各個組織却『只有權俯首服從上級命令』等等。『按這個草案組織起來的中央機關將落到真空世界裏去，它周圍不會有任何的外藩，只會有一種無定形的散漫人羣，而它那些唯命是聽的代辦就會在這個散漫人羣中活動着』。這也就是馬爾托夫輩和阿克雪里羅得輩在代表大會上遭到失敗以後拿來款待我們的那套虛偽的清談哩。代表大會上的人們譏笑過崩得，因爲它一方面反對我

們的集中制，同時又使自己那裏的中央機關擁有更肯定劃明的無限權力（例如有自由增添和開除委員，以至於不許代表出席代表大會的權力）。人們查明事情真相以後，也會嘲笑少數派底號泣，因為少數派當他們自己還佔少數時大聲疾呼地反對過集中制和黨章，而當它自己抓得了多數地位時，却就立刻倚據黨章來幹了。

在兩個中央機關制問題上的派別分立，也表現得十分明顯：當時發言反對全體火星份子的既有李伯爾，又有阿期莫夫（他首先唱出了現在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愛唱的調子，說中央機關報在總委員會內壓倒了中央委員會），又有頗坡夫，又有葉哥羅夫。根據舊火星報向來所發揮的（而且是頗坡夫和葉哥羅夫一流的同志們在口頭上贊成過的！）那些組織思想，自然要得出兩個中央機關並存制的計劃。舊火星報底政策，是與『南方工人』社主張建立一個平行的通俗機關報而將其變為事實上佔主要地位的機關報的計劃相抵觸的。這就是當時全體反火星派和整個泥潭派都主張一個中央機關，即主張似乎是更厲害的集中制的那種彷彿很奇怪的矛盾現象底根源。當然也會有過（特別是泥潭派中間）一些代表，他們當時未必明白瞭解到『南方工人』社底組織計劃將會引起，並且由於客觀進程一定會引起怎樣的結果，可是他們那種優柔寡斷和心無主宰的天性，却把他們推到反火星派方面去了。

在火星份子當時（在火星派尚未分裂以前）參加黨章問題爭論的發言中，馬爾托夫底發言（『贊同』我的組織思想）和托洛茨基底發言特別值得注意。後者當時回答阿期莫夫同志和李伯爾同志時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把『少數派』在代表大會以後的行動以及他們在代表大會以後的種種理論底全部虛偽實質揭露無餘。『他（阿期莫夫同志）說，黨章上把中央委員會權限規定得不充分確切。我不能同意他這種意見。恰巧相反，黨章上把這點規定得很確切，說既然黨是一個整體，也就必須保證它對於各地方委員會的監督。』李伯

爾同志運用我所用過的字眼來表示，說黨章是『有組織的不信任』。這是對的。但我當時運用這個字眼，是指着崩得代表們所提出的那個章程說的，因為他們的章程乃是意味着黨內一部分人對全黨表示有組織的不信任。而我們的黨章』（當時，即尚未在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上遭到失敗以前，這個章程還是『我們的』哩！）

『則是意味着黨要對其所有各個部分都表示有組織的不信任，即要對所有各地方組織，各區組織，各民族組織以及其他組織實行監督』（見第一五八頁）。是的，我們的黨章在這裏是被估計得正確的，我們要奉勸現在公然說『有組織的不信任』制度或所謂『戒嚴狀況』制度是由惡作劇的多數派想出並加以施行的人們多回憶一下這種估計。祇要把上面引證的演詞和人們在旅外同盟代表大會上的演詞對照一下，就可看出人們在政治上多麼沒有氣節，就可看出馬爾托夫及其同伴怎樣依事關他們自己的下級團體還是別人的下級團體為轉移而改變自己的觀點了。

（九）黨章第一項

上面我們已經引錄了在代表大會上引起有趣爭辯的那些不同的條文。這種爭辯幾乎佔去了兩次會議，並且是以兩次記名表決來結束的（我記得，在整個代表大會期間，彷彿祇舉行過八次記名表決，因為這種表決使時間上受到巨大損失，所以祇是在特別重要的場合才採用過）。當時所涉及的問題無疑是個原則性的問題。代表大會對於爭辯的興趣是極大的。全體代表都參加過表決——這是我們代表大會上（也如在任何一個大的代表大會上一樣）罕有的現象，同樣又是證明所有參加爭論的人都很關懷這個問題。

試問，爭論問題底實質究竟何在呢？我在代表大會上已經說過，並且後來還屢次重複說過：『我並不認為我們的意見分歧（關於黨章第一項的分歧）有決定全黨生死存亡的重要意義。我們決不

會因爲黨章有一項條文不好而陷於滅亡哩！』（見第二五〇頁）。這種意見分歧，雖然揭露出各種原則不同的色彩，但它本身無論如何也不能引起在代表大會以後所形成的分離（其實——如果老實不客氣地說——是分裂）。可是，任何一種小的意見分歧，如果有人堅持它，把它提到首位，極力探索它的一切根源和一切支脈，那它就會成爲大的意見分歧。任何一種小的意見分歧，如果它竟成爲轉變到某種錯誤見解方面去的出發點，如果這些錯誤見解又因有新的和附加的意見分歧而加上一些把黨引向分裂的無政府主義行動，那它就會具有莫大的意義。

這一次也正是如此。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所引起的一種比較不大的意見分歧現在竟具有了莫大的意義，因爲正是這種意見分歧成了少數派（特別是在同盟代表大會上以及後來在新火星報上）走向機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清談的轉變點。正是這種意見分歧奠定了火星少數派與反火星份子以及泥潭派聯盟底始基，這一聯盟臨到選舉時已具有很確定的形式，不瞭解這一聯盟便不能瞭解在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上所發生的根本主要分歧。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在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上所犯的那個小錯誤，原是我們的器皿中形成的一個小罅隙（如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所說出的那樣）。這個器皿本來可以用一根繩子把它捆緊（而並不是要用一根絞索把它拉破，如同在同盟代表大會上陷於幾乎發瘋狀態的馬爾托夫所聽錯了的那樣）。但也可以拚命設法使這個罅隙更加擴大起來，以便打破這個器皿。結果——由於馬爾托夫份子拚命採取抵制等等一類無政府主義手段的結果——所得出的正是後一種情況。黨章第一項條文所引起的意見分歧在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馬爾托夫在這個問題上所遭到的失敗，也就使他走到了用極機械的，甚至是鬧架式的（在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人旅外同盟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手段進行的『原則鬥爭』。

現在，經過這一切事變之後，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已經具有了莫大的意義，所以我們應該確切認識代表大會上表決這項時派別分立底性質，同時還應該確切認識——這點更重要得無比——早在討論黨章第一項時就已經暴露或已開始暴露出來的各種觀點色彩底真實性質。現在，當讀者所熟知的種種事變已經發生後，問題已經是這樣提法：究竟是馬爾托夫獲得阿克雪里羅得擁護的條文，正如我在黨代表大會上所說的那樣（見第三三三頁）表明他的（或他們的）不穩定性、動搖性和政治模糊性，或如普列漢諾夫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所指出的那樣（見同盟記錄第一〇二以及其他各頁）表明他（或他們）傾向於饒勒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呢？還是我獲得普列漢諾夫擁護的條文表明我在集中制問題上持有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獨斷獨行，非社會民主主義的錯誤觀點呢？是機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呢，還是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呢？——現在，當小分歧已變成爲大分歧的時候，問題就是這樣提法了。而我們切實討論那些贊成我的條文和反對我的條文的理由時所應當注意到的，正是事變所強加於我們大家的——甚至可以說（如果聽起來不是覺得有點誇大的話）是由歷史行程決定的——這種問題提法。

我們且從分析代表大會的討論來開始解剖這些理由吧。第一個演詞，即葉哥羅夫同志底演詞之所以有趣，只是因爲他的態度（non liquet，我還不明白，我還不知道真理何在）很可表明當時難於認清一個確實是新的問題，頗爲複雜而精細的問題的許多代表們底態度。隨後一個演詞，即阿克雪里羅得底演詞，却立刻就原則地提出了問題。這是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所發表的第一個原則性的，其實甚至根本就是他在代表大會上第一次發表的一個演詞，而且很難說他拿那個鼎鼎大名的『教授』做例來作的開場白是很妥當的。『我認爲，——阿克雪里羅得同志說，——我們必須分清黨和組織這兩個概念。而這裏却有人把這兩個概念混淆了。這種混淆是危險

的』。這就是用來反對我那個條文的第一個理由。請你們仔細看看這個理由吧。如果我說，黨應當是組織*底總和（並且不是什麼簡單的算術式的總和，而是一個整體），那末，這是否是說我把黨和組織這兩個概念『混淆了』呢？當然不是。我只是以此來十分明確表明自己的願望，自己的要求，要身為階級先鋒隊的黨成為盡量有組織的，要它只容納至少是能接受最低限度組織性的份子。反之，我的論敵却把有組織的份子和無組織的份子，接受領導的份子和不接受領導的份子，先進的份子和落後得不可救藥的份子——因為落後得尚可救藥的份子是能加入組織的——混淆在黨內。這樣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險的哩。隨後，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援引『從前那些十分秘密集中的組織』（『土地與自由』黨和『民意』黨）為例證，說這些組織周圍『團結有許多雖沒加入組織，但却以某種方式幫助過它，並且認為是黨員的份子…這個原則在社會民主黨組織裏應當更加嚴格實行』。於是我們就談到了問題底關鍵之一：『這個原則』，即容許不加入任何一個黨組織而只是『以某種方式幫助黨』的那些人自稱為黨員的原則，果然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原則麼？普列漢諾夫當時對這個問題給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說：『阿克雪里羅得舉出七十年代做例是不正確的。當時存在有組織嚴密和紀律極高的中央機關，在它周圍存在有它所成立的各種組織，而在這些組織以外盡

*『組織』一語底通常用法有兩種含義，即廣義和狹義。按其狹義說，它是意味着人類集體，至少是具有最低限度確定形式的人類集體中的一些細胞。按其廣義說，它是這種細胞團結為一個整體的總和。例如，海軍，陸軍，國家，既是許多組織（按此語底狹義來說）所構成的總和，同時又是社會組織（按此語底廣義說）中的一種組織。教育主管機關是一個組織（按此語底狹義說），同時教育主管機關又是由許多組織（按此語底狹義說）組成的。同樣，黨也是一個組織，且應當是一個組織（按此語底廣義說）；但同時黨又應當是由許多各不相同的組織（按此語底狹義說）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羅得同志說要分清黨和組織這兩個概念時，第一，他沒有注意到組織一語底廣義和狹義之間的這種差別；第二，他竟沒有覺察到他是把有組織的份子和無組織的份子混為一談了。

是混亂狀態和無政府狀態。這一混亂狀態中的份子雖也自稱為黨員，但這並沒有使事業獲得益處，反而使事業受到了損失。我們決不應做七十年代的無政府狀態，而要避免這種狀態」。由此可見，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所想假冒為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的『這個原則』，其實乃是無政府主義的原則。誰想推翻這個結論，就須證明在組織以外有實現監督，領導和紀律的可能；就須證明有使『混亂狀態中的份子』獲得黨員稱號的必要。擁護馬爾托夫同志條文的那些人，對於前後兩點都沒有加以證明，而且也不能加以證明。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拿了一個『自認是社會民主黨人並聲明這點的大學教授』做例子。爲要把這個例子所包含的思想引伸到底，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就應當更進一步地說：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人是否承認這個大學教授爲社會民主黨人呢？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既沒有提出這個更進一步的問題，也就是在中途拋棄了自己的論據。的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人承認這位大學教授爲社會民主黨人，那末他們爲什麼又不可把這位大學教授編進某一個社會民主黨組織中去呢？只有把他編進去時，這位大學教授底『聲明』才會適合於他的行動，才不致成爲空話（而大學教授們底聲明就往往是這樣的空話哩）。或者是：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人不承認這位大學教授爲社會民主黨人，那末他們給予這位大學教授享有光榮重大的黨員稱號的權利，便會是妄誕無謂並且有害的了。所以，歸結起來說，問題正在於究竟是一貫實行組織原則，還是尊崇離散狀態和無政府狀態。我們究竟是應當根據已經形成，已經團結起來的社會民主黨人中堅——譬如說，已召集過黨代表大會並應當擴大和增殖各種樣式黨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人中堅——建設黨呢，還是我們應以妄說所有一切幫助黨者都是黨員的空話自慰呢？『我們採納列寧底公式，——阿克雪里羅得同志繼續說道，——就會把一部分雖然不能直接接受到組織中來，但終究還是些黨員的人拋棄到門外去』。在

這裏，阿克雪里羅得同志自己十分顯然地犯了他想加到我頭上的那種混淆概念的錯誤：他竟把認為所有一切幫助黨的人都是黨員的說法當作既成的事實，其實正是這個問題引起了爭論，而我的論敵還應來證明這種解釋是有必要和有益處的。所謂『拋棄到門外去』這樣一個驟然看來似乎可怕句子，究竟有何內容呢？如果說只有已被承認為黨組織的那些組織中的組員才得稱為黨員，那末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個黨組織的人，也是能在接近於黨的非黨組織中工作的。所以如果所謂拋棄到門外去，是指取消其工作機會，取消其參加運動的機會而言，那就根本談不到什麼拋棄到門外去。反之，我們容納真正社會民主黨人的黨組織愈加堅強，黨內的動搖性和不穩定性愈少，則黨對於它周圍的，對於它所領導的工人羣衆份子的影響，也就會愈加廣闊，愈加周備，愈加豐富，愈加有效。把身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和整個階級混淆起來，顯然是絕對不行的。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既然說『當然我們所要建立的首先是黨內最積極份子底組織，即革命家組織，然而我們既是階級底黨，就應當想法不把那些雖不十分積極而却自覺地接近於這個黨的人遺棄在黨外』，那他就未免犯了這種混淆的錯誤（這種錯誤，根本就是我們的那個機會主義經濟派所有的特徵）。第一，列入社會民主工黨積極份子的，不會僅僅只有革命家組織，而且會有許多被承認為黨組織的工人組織。第二，究竟是由於什麼原因，由於什麼邏輯，竟能以我們是階級底黨這一事實為根據來作出結論說無須把加入黨的份子與接近於黨的份子分別開來呢？恰巧相反：正因為人們有覺悟程度和積極程度上的區別，所以必須區別其接近於黨的程度。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甚至完全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下行動，都應當盡量密切地接近於我們黨；可是，如果以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者整個階級都能升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即自己的社會民

主黨底覺悟程度與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洛夫精神⁶⁸和『尾巴主義』了。還沒有過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民主黨人會懷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職工組織（較爲原始，比較容易爲落後階層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是整個工人階級。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它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責任是要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水準，那就只是欺騙自己，故意漠視我們的巨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了。抹煞接近黨的份子與加入黨的份子間的區別，抹煞自覺的積極的份子與幫助黨的份子間的區別，也就是這樣的故意漠視和遺忘。

以我們是階級底黨爲藉口來辯護組織渙散性，來辯護把組織和無組織現象混淆起來的觀點，那就是重複拿齊金『把『深處』的運動『根蒂』這一哲學的和社會歷史的問題和技術組織問題混淆起來』的錯誤（見做什麼？一書，第九一頁）*。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所首倡出來的這種混淆，後來擁護馬爾托夫同志條文的那些發言者把它重複過幾十次。『黨員名稱散佈得愈廣愈好』，——馬爾托夫這樣說道，但他却沒有說明這個不符合實在內容的名稱底廣闊散佈究竟有何益處。監督那些不加入黨組織的份子，這難道不是一種假話麼？假話廣闊散佈是只會有害處，而不會有益處的。『如果每個罷工者，每個示威者，都能自作主張地宣佈自己爲黨員，那我們就會只能對此表示快感』（見第二三九頁）。真的麼？每個罷工者都應有權宣佈自己爲黨員麼？馬爾托夫同志說出這種議論，立刻就把自己的錯誤引伸成爲謬論，把社會民主主義降低爲罷工主義，重蹈阿期莫夫輩底覆轍。如果社會民主黨能够領導每一次罷工，我們當然只能對此表示快感，因爲社會民主黨底直接和絕對責任是要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一切表現，而罷工就是這個鬥爭最深刻最強有力的表

*見本卷第二八二頁。——譯者。

現之一。可是，如果我把這種初步的 *ipso facto** 不過是工聯主義鬥爭形式和全面的自覺的社會民主主義鬥爭看作一個東西，那我們就會是尾巴主義者了。如果我們給每個罷工者『宣佈自己為黨員』的權利，那我們就是以機會主義態度來法定一件分明是虛假的事情，因為這樣的『宣佈』在大多數場合都是虛偽的。如果我們竟想自欺欺人，以為當那些『沒有受過教訓的』不熟練的極廣大工人階層在資本主義統治下必然處於極端零散，受壓迫，愚鈍無知狀態的時候，每個罷工者都能成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員，那我們就是自安於馬尼洛夫妄想了。正是根據『罷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出力求用社會民主主義精神領導每個罷工的革命意向與把每個罷工者宣佈為黨員的機會主義辭藻間的區別。我們是階級的黨，因為我們在事實上是用社會民主主義精神領導幾乎整個無產者階級或且真正整個無產者階級的，然而只有阿期莫夫輩才能由此作出結論，說我們在口頭上應當把黨和階級看作一個東西。

馬爾托夫同志在同一個演詞中說，『我不害怕密謀組織』，可是，——他補充說道，——『在我看來，密謀組織，只有當它是由廣大的社會民主工黨所圍繞着的時候，才是有意思的』（見第二三九頁）。為說得確切起見，本來應當說：只有當它是由廣大的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所圍繞着的時候，才是有意思的。如果馬爾托夫同志底意見是以這種形式來表示，那它就會不僅是不容置辯，並且簡直是不言而喻的定論了。我之所以要講到這一點，只是因為以後的發言者把馬爾托夫同志這個不言而喻的定論變成很流行的和很庸俗的論據，說列寧想以『密謀者總和來局限全部黨員總和』。當時作出這個可笑結論來的既有坡薩多夫斯基同志，又有頗坡夫同志，而當馬爾丁諾夫與阿期莫夫發言附和這個結論時，這個結論底真正性

*意即『按事實講來』。——譯者。

質，即機會主義辯護性質，就完全暴露出來了。目前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在火星報上又是發揮着這個論據，目的是想使讀者們認識新編輯部底新組織觀點。還在代表大會討論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的第一次會議上，我已經覺察到我的論敵想要利用這種賤價的武器，所以我當時在發言中預告說（第二四〇頁）：『不要以為黨的組織祇應由革命職業家組成。我們需要有一切式樣，一切種類，一切色彩而極其紛繁的種種組織——從非常狹隘的和祕密的組織起，一直到很廣泛的，自由的 lose Organisationen 為止』。這本來是個無須解釋，不言而喻的真理，所以我當時認為這是無庸贅述的。可是，在現今這個時期，當人們在很多很多方面都已把我們倒推轉去時，就得在這裏也把『舊事重提』一下哩。因此我要從做什麼？和給一位同志的信中摘出如下幾段：

…『像阿列克塞也夫和梅實金，哈爾士林和熱略波夫這種健將底小組，就是對於最切實最實際的政治任務也能勝任，其所以如此，正是而且只是因為他們的熱烈宣傳始終獲得自發覺醒起來的羣衆方面的反應，因為他們的沸騰毅力總有革命階級底毅力來響應和擁護』*。為要成為社會民主黨，也就必須取得本階級底擁護。並不是黨應該去圍繞密謀組織，如馬爾托夫同志所想的那樣，而是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應該圍繞着既包含有密謀組織又包含有非密謀組織在內的黨。

…『為進行經濟鬥爭而建立的工人組織應當是職業的組織。每個社會民主黨工人都應當儘量幫助這種組織，並在這種組織內積極工作…但是要求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才能成為行業工會會員，那就完全不合我們的利益了，因為這會縮小我們影響羣衆的範圍。讓每一個瞭解必須統一起來同廠主及政府作鬥爭的工人，都來參加行業工會吧。

*見本卷第二六九頁。——譯者。

行業工會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是能達到這種初步瞭解程度的份子統一起來，如果不是一種很廣大的組織，就不能達到行業工會底目的。這種組織愈廣大，我們對於它們的影響也就會愈廣大，而這種影響的發生又不僅是由於經濟鬥爭『自發的』發展，並且是由於參加工會的社會主義者對各工友們施行直接和自覺的激勵』（見第八六頁）*。順便說說，爲了估計關於黨章第一項條文的爭論，職工會的例子是特別值得注意的。至於說職工會應當在社會民主黨組織『監督和指導下』工作，這是對於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都會沒有疑問的。可是，如果根據這點就給予職工會全體會員以『宣佈自己』爲社會民主黨黨員的權利，那就顯然妄誕無稽而且勢必引起雙重的害處：一方面是能縮小職工運動底範圍並削弱工人在職工運動基礎上的團結。另一方面是能讓渙散和動搖成分自由湧進社會民主黨內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漢堡做包工的石匠有名事件發生時，會具體解決過這種問題。當時社會民主黨毫不遲疑地認定工賊行爲是爲社會民主黨人所不齒的無恥行爲，即認爲領導罷工和援助罷工是自己的切身事業，但同時它又十分堅決地否決了把黨利益與職工會利益混爲一談的要求，把對於個別職工會單個步驟的責任加在黨身上來的要求。黨應當並且定會努力用自己的精神浸染職工會，使其服從於自己的影響，但正是爲這種影響着想，黨應當把這些職工會內完全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加入社會民主黨的）份子與那些不完全自覺和政治上不完全積極的份子區別開來，而不是如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樣把他們混爲一談。

…『革命家組織把最祕密的職任集中起來，這決不會削弱而只會擴大其他許許多多組織底活動範圍與內容，這些組織既打算包括廣大羣衆，就應當是些盡量少帶固定形式，盡量少帶祕密性的組

*見本卷第二七五至二七六頁。——譯者。

織，如職工會，工人自修組，祕密書報閱讀組，社會主義小組以及在其他一切人民階層中的民主主義小組等等。這樣的小組，協會和團體，必須在各地極普遍地組織起來，並且要使它們負有各種各樣的職任；但如果把這些組織同革命家組織混為一談，抹煞這兩者之間的界線，那就非常愚蠢而且有害了…』（見第九六頁）*。從這種考證中可以看出，馬爾托夫同志提醒我說革命家組織應由廣大工人組織圍繞起來這一真理是很不恰當的。我在做什麼？一書中已指出過這點，而在給一位同志的信中又更具體地發揮了這個思想。工廠小組，——我在那封信內寫道，——『對於我們是特別重要的，因為運動底全部主要力量都在於大工廠工人底組織性，因為大工廠所包含的那部分工人階級不僅在數量上佔着優勢，而且尤其是按其影響，按其覺悟程度，按其進行鬥爭的能力來講，佔着更大的優勢。每個工廠都應當成為我們的堡壘… 工廠支部委員會應當努力用各種各樣的小組網（或者代辦網）來包括整個工廠，包括盡量衆多的工人…一切團體，小組，支部委員會等等，應當成為委員會的機關或委員會的分部。其中有一部分將直接表示自己願意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並在委員會批准的條件下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將擔負（按照委員會底委託或取得其同意）一定的職務，將承認服從黨機關命令的義務，將取得一切黨員所享有的權利，將被認為是加入委員會的最近的候補者等等。另一部分不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而應成為由黨員所設立的小組，或接近於黨內某個集團的小組等等』（見第一七至一八頁）。從我所着重指出的語句中，就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出，我的第一項條文底意思在給一位同志的信中就已充分表明了。那裏已直接指出了入黨條件，即：第一，相當程度的組織性；第二，由黨委員會批准。在往後一頁上，我又大致指出究

*見本卷第二八六至二八七頁。——譯者。

竟什麼樣的團體與組織，究竟根據什麼理由應當（或不應當）編入黨內：『散佈刊物者底團體應當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並應當知道某些黨員及某些負責人員。研究勞動職業條件和擬定某種職業要求的團體，不一定要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一兩個黨員參加下從事自修的大學生，軍官，公務員團體，有時甚至完全不應當知道這個黨員是黨員，以及其他等等』（見第一八至一九頁）。

你看，這又是一種可供說明『坦白面孔』的材料哩！馬爾托夫同志所提出的草案上的條文甚至完全沒有講到黨對於組織的關係，而我却幾乎在代表大會一年以前就已經說過，一部分組織應該加入黨，另一部分組織不應該加入黨。在給一位同志的信裏已經很明顯地表現出了我在代表大會上所擁護的思想。這點可以具體表述如下。一般按各個組織底組織程度，尤其是按它們的祕密程度來說，可以將其大概區分為如下幾種：（一）革命家組織；（二）盡可能廣泛而形式紛繁的工人組織（我只說到工人階級，而認為其他階級中某些份子在一定條件下也會參加這些工人組織是不言而喻的）。這兩種組織就構成爲黨。其次，（三）接近於黨的工人組織；（四）不接近於黨，但事實上服從於黨監督及其領導的工人組織；（五）工人階級中間的無組織的份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階級鬥爭底巨大表現發生時——也是服從於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從我的觀點看來，情形大致就是如此。反之，從馬爾托夫同志底觀點看來，黨底界線還是極不確定的，因爲『每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爲黨員』。試問這種渙散性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使『名稱』廣闊散佈而已。它的害處就是造成一種把黨與階級混爲一談的破壞組織的思想。

爲解釋我們所提出的一般原理起見，我們還要大略看看代表大會上往後討論黨章第一項的情形。布魯克爾同志發言（這點使馬爾托夫同志感覺滿意）贊成我的條文，但他和我聯盟原來是與阿期莫夫同志和馬爾托夫聯盟不同，而不過是由於誤會的結果。布魯克

爾同志『不贊同整個黨章及其整個精神』（見第二三九頁），但他擁護了我所提出的條文，認為這是『工人事業』社份子所願意的那種民主制底基礎。布魯克爾同志當時還不知道在政治鬥爭中有時不得不選定害少路線：布魯克爾同志還沒有覺察到，在我們代表大會這樣的會議上擁護民主制，是徒勞無益的。阿期莫夫同志却就較為精明了。他完全正確地提出問題，而承認說，『馬爾托夫同志和列寧同志是在爭論究竟哪一種（條文）更能達到他們共同的目的』（見第二五二頁）。『而我與布魯克爾，——他繼續說道，——却想選定一個較少能達到目的的條文。於是我就選定了馬爾托夫底條文』。阿期莫夫同志又坦白地解釋，說他認為『他們的目的』（即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和我三人底目的，即建立擔任領導的革命家組織）『是無法實現而且有害的』；所以他也如同馬爾丁諾夫同志*一樣，堅持着經濟主義者認為不需要有『革命家組織』的意見。他『完全相信，實際生活終究會闖進到我們黨的組織中來，不管你們是用馬爾托夫底條文來阻擋它的道路也好，或是用列寧底條文來阻擋它的道路也好』。本來，這種『尾巴主義的』『實際生活』觀是值得說及的，如果我們沒有在馬爾托夫同志那裏也遇見這種觀點的話。馬爾托夫同志第二個演詞（見第二四五頁）一般講來非常有趣，所以值得拿來詳細分析一下。

馬爾托夫同志所持的第一個理由是說：黨組織對於不加入組織的黨員的監督是『可能實現的，因為委員會既委託某人擔負某種職

*不過，馬爾丁諾夫同志想與阿期莫夫同志分別開來，他想證明，說『密謀』並不等於『秘密』，說這兩個名詞字面上的差別包含有概念上的差別。但究竟是什麼樣的差別，這是馬爾丁諾夫同志以及現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羅得同志都始終沒有向我們說明的。馬爾丁諾夫同志『裝模做樣』地說，似乎我例如在做什麼？一書中並沒有堅決（如在任務一書中那樣）反對『把政治鬥爭縮小成爲密謀』。馬爾丁諾夫同志想使聽衆忘記一件事實，就是我當時所攻擊的那些人不認為需要有革命家組織，正如阿期莫夫同志現在不認為需要有這種組織一樣。

任，也就有可能去監察其執行』（見第二四五頁）。這個提綱非常值得注意，因為它可以說是『洩漏了』馬爾托夫底條文究竟是誰所需要，它在事實上究竟是効勞於誰的祕密：是効勞於單個智識份子，還是効勞於工人集團和工人羣衆。原來，馬爾托夫底條文是有兩種解釋的可能：第一，凡在黨某一個組織領導下經常親自援助黨者，皆有權『宣佈自己』（這是馬爾托夫同志自己所用的字眼）為黨員；第二，每一個組織都有權承認凡在它領導下經常親自援助黨者為黨員。只有第一種解釋才真正使『每個罷工者』能自稱為黨員，所以也只有這種解釋才立刻博得了李伯爾輩，阿期莫夫輩以及馬爾丁諾夫輩底衷心同情。可是，這種解釋顯然是一句空話，因為這樣就會是把整個工人階級都包括進去，而把黨與階級間的區別抹煞掉；所謂監督和指導『每個罷工者』是只能『象徵式地』說說的。正是因此，所以馬爾托夫同志第二次發言時立刻就滑到了第二種解釋（不過，順便說說，這種解釋是由代表大會直接否決了的，因為代表大會否決了科斯迪契所提出的決議案，見第二五五頁），即認為委員會將委託人們擔負各種職任並監察其執行。這種專門的職任當然永遠也不會委託工人羣衆去擔負，不會委託成千的無產者（即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和馬爾丁諾夫同志現在所說的那些無產者）去擔負，而恰巧是會往往委託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所想念過的那些大學教授去擔負，委託李伯爾同志和顛坡夫同志所關懷過的那些中學生去擔負（見第二四一頁），委託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在第二次發言中所指出過的那些革命青年去擔負（見第二四二頁）。總而言之，馬爾托夫同志底條文若不是一種死的字句和空洞的辭藻，就會多半並且幾乎完全只有利於那些『為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所浸透了的』，並且不願意加入組織的智識份子。馬爾托夫底條文在口頭上是擁護無產階級廣大階層底利益，但這個條文在事實上却是効勞於害怕無產階級紀律性和組織性的那個資產階級智識界底利益。誰也

不敢否認：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特別階層的智識界，其特點，一般和整個說來，正是個人主義而不能接受紀律和組織（例如參照考茨基論智識界的著名論文）；這也就是這個社會階層弱於無產階級的一種特徵；這就是智識份子意志萎靡動搖而使無產階級常受其害的一種原因；智識界底這種特性是與其通常生活條件，即與其非常接近於小資產階級生存條件的謀生條件（單獨作工或在很小的集體內工作等等）密切相連的。末了，擁護馬爾托夫同志條文的那些人恰巧必須拿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來做例子的事實，也不是偶然的！在對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發生爭論時，並非如馬爾丁諾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兩同志所想像的那樣是堅決主張廣大無產階級鬥爭者實行反對堅決主張急進密謀組織者，而是擁護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個人主義者碰到了擁護無產階級組織性和紀律者。

頗坡夫同志當時說：『在彼得堡各處，也如在尼古拉也夫城或敖德薩城那裏一樣，據當地的代表們說，有數十個散佈刊物和進行口頭鼓動的工人都不能成為組織中的成員。可以把他們編進到組織中去，但不可把他們認定為組織中的成員』（見二四一頁）。為什麼他們不能成為組織中的成員呢？這始終是頗坡夫同志所沒有說明的一種祕密。上面我已從給一位同志的信裏引證過一段話，表明正是可能而且必須把這一切工人編進（不是以數十計，而是以數百計地）組織中來，並指明這些組織中有許許多多組織能夠而且應該加入黨。

馬爾托夫同志所持的第二個理由是說：『列寧認為黨內除了黨組織以外便不能有其他什麼組織』… 完全對啊！…『反之，我却認為這樣的組織應該存在。實際生活非常迅速地建立和繁殖着組織，將使我們來不及把它們一一歸併到我們革命職業家戰鬥組織體系中來』…這種說法在兩方面都是不正確的：第一，『實際生活』繁殖真正能幹的革命家組織，要比我們所需要的數量，要比工人運動所需

要的数量少得多；第二，我們黨應該是一個不僅包含着革命家組織，並且還包含着許許多多工人組織的體系…『列寧以為中央委員會只會批准那些在原則方面完全可靠的組織為黨的組織。可是，布魯克爾同志很瞭解，實際生活（sic!）一定會如願以償，於是中央委員會爲了不致把許多組織留在黨外起見，也就會要不管它們有不完全可靠的性質而都加以批准；因此，布魯克爾同志也就附和了列寧底意見』…你看，這才真是尾巴主義的『實際生活』觀哩！當然，如果中央委員會一定要由一些毫無主見而專看別人議論怎樣爲轉移的人（參看組委事件）組成，那末『實際生活』就真正會『如願以償』，就是說，黨內最落後的份子就會佔得優勢（現在因爲黨內存在有由落後的份子所組成的『少數』，結果正是弄出了這樣一種情形）。可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一個合理的原因能迫使一個有腦筋的中央委員會把那些『不可靠的』份子引進到黨內來。馬爾托夫同志援引『繁殖』不可靠份子的『實際生活』，也就是昭然若揭地暴露了他那個組織計劃底機會主義性質哩！…『而我則認爲，——他繼續說道，——如果這樣的組織（不完全可靠的組織）同意接受黨綱，接受黨方面的監督，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納入黨裏來，而不一定就把它變成爲黨組織。舉例說，如果某個『獨立派』協會決定接受社會民主黨底觀點和黨綱並加入黨，那我就會認爲這是我們黨底一大勝利，然而這還不是說我們就把這個協會列入黨組織中來』…你看，馬爾托夫底條文竟得出何等混亂的結論來了：納入黨裏來的非黨組織！請你們看看他的方案吧：黨就是（一）革命家組織，加上（二）承認爲黨組織的工人組織，再加上（三）沒有承認爲黨組織的工人組織（多半是『獨立派』組織），再加上（四）執行各種職任的單個份子，如大學教授，中學生等等，再加上（五）『每個罷工者』。可與這個燦爛計劃並列的只有李伯爾同志所說的一段話：『我們的任務不僅是要組織一個組織（!!），我們能够並且應該組

織黨』（見第二四一頁）。是呀，我們當然能夠並且應該做到這一層，但爲此所需要的並不是什麼『組織一些組織』的無謂辭句，而是向黨員直接要求，要他們在事實上組織起來。說什麼『組織黨』，同時又擁護用『黨』字掩護一切無組織性和一切離散狀態的企圖，那就是專說空話了。

『我們的條文，——馬爾托夫同志說，——是表示着一種想使革命家組織與羣衆間存在有許多組織的意圖』。實際上恰巧不是如此。馬爾托夫底條文恰恰不是表示着這種確實必要的意圖，因爲它並不是推動大家組織起來，不是要大家組織起來，不是把有組織的東西和無組織的東西分別開來，而只是給予大家一個稱號*。說到這裏，不能不回憶起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所說的一段話：『無論用什麼命令都不能禁止它們（革命青年小組等等）以及單個份子自稱爲

*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又爲辯護自己的條文而提出過一種應該受到譏笑的論據。『我們可以指出，——他說，——列寧底公式按字面來瞭解，是把中央代辦員排除於黨外的，因爲這些代辦員並不組成爲一個組織』（見第五九頁）。這一論據在同盟代表大會上也曾受到譏笑，這點可從記錄上看出。馬爾托夫同志以爲他所指出的那種『困難』，只有在中央代辦員加入『中央委員會組織』時才可解決。可是要點並不在這裏。要點是在於馬爾托夫同志所用的例子具體表明他完全不瞭解黨章第一項底意思，表明那種純粹是咬文嚼字而確實值得嘲笑的批評方式。在形式上說，只要成立一個『中央代辦員組織』，起草一張要把這個組織編進黨來的決議，那末馬爾托夫同志焦心的『困難』就會立刻消失的了。而我所提出的黨章第一項條文底意思，則是要推動大家『組織起來！』，是要保證實在的監督和指導。從實質方面來看，中央代辦員應否加入黨的問題是根本可笑的，因爲對於他們的實在監督，單只由於他們是被委任爲代辦員，單只因爲他們被留在代辦員職位上，就已有完全的和絕對的保證了。所以這裏根本談不到什麼把有組織的東西和無組織的東西混爲一談（而馬爾托夫同志那個條文中錯誤底根源也就是在於把這兩種東西混爲一談了）。馬爾托夫同志那個公式之所以要不得，也就是因爲它容許每一個機會主義者，每一個專說廢話的人，每一個『大學教授』和每一個『中學生』宣佈自己爲黨員。這就是馬爾托夫同志那個條文底胎生弱點，而馬爾托夫同志却枉然企圖用一些根本談不到什麼自行列名爲黨員，根本談不到什麼自行宣佈爲黨員的例子來蒙蔽這種胎生弱點。

社會民主黨人』（十足的真理啊！），『以至於自命爲黨底一部分』（這就絕對不正確了！）…禁止人們自稱爲社會民主黨人是不可能並且是沒有必要的，因爲這個名詞所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種信念體系而不是一定的組織關係。當個別小組和個別份子危害着黨事業，敗壞和破壞黨組織時，禁止這些個別小組和個別份子『自命爲黨底一部分』，却就是可以並且應該的了。如果黨竟不能『以命令來禁止』小組『自認爲』整體底『一部分』，那末說黨是個整體，是個政治實力，就很可笑了！如果這樣，那又何必規定開除黨籍的手續和條文呢？阿克雪里羅得同志顯然已把馬爾托夫同志底基本錯誤引伸成了謬論；他甚至把這個錯誤發揮成了機會主義的理論，因爲他竟補充說：『按列寧底條文來說，黨章第一項是根本和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底實質(!!)及其任務相抵觸的』（見第二四三頁）。這恰巧是等於說：向黨提出比要求於階級的更高的要求，就是根本和無產階級任務底實質相抵觸。無怪乎阿期莫夫就來拚命擁護這個理論。

必須說句公道話，阿克雪里羅得同志現在想把這個顯然有機會主義傾向的錯誤條文變成爲新觀點底種子，但他在代表大會上却是相反，表示願意來『講講生意』，他說：『但我覺察到，我原來是敲着沒有關閉的門哩』…（目前我在新火星報上也覺察到這點）…『因爲列寧同志既承認外藩小組是黨組織底部分，也就是迎合了我的要求』…（不僅承認外藩小組，並且還承認各種各樣的工人聯合會哩：參照記錄第二四二頁所載斯特拉合夫同志底發言，以及上面已從做什麼？和給一位同志的信裏摘引來的話）…『所剩下的還有許多單個的份子，然而就在此處也還可以講講生意哩』。我當時回答阿克雪里羅得同志說，講講生意，一般說來，我並不反對，但我現在應當解釋一下，當時說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正是關於單個的份子，關於這班大學教授和中學生等等，我是決不會同意來作什麼讓步的。可是，如果當時引起疑惑的是工人組織問題，那我就

會同意（雖然上面我已經證明，這種疑惑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來對我的第一項條文加一個大致如下的附註：『凡承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綱和黨章的工人組織，應盡量使其加入到黨組織行列中來』。當然，嚴格說來，這種願望是不宜在應以法律定義為限的黨章中規定，而應在那些帶說明性質的註解裏，小冊子中加以說明的（並且我已指出過，還在製定黨章很久以前，我就已經在自己的小冊子中這樣解釋過了）；可是，這樣的附註至少也絲毫不會含有可能引起破壞組織的謬誤意思，絲毫不會含有機會主義的推論*和『無政府主義的觀念』，但馬爾托夫同志所提出的條文却顯然包含有這種意思，推論和觀念。

我所放在引號內的最後那個字眼，是帕夫洛維奇同志說出的。

*屬於這種在企圖論證馬爾托夫條文時必然要湧現出來的推論之列的，特別是托洛茨基所說的一段話（見第二四八和第三四六頁），他說：『機會主義是由一些要比黨章中某一條款更複雜的原因所造成的（或者說：由比這更深刻的原因所決定的），——它是由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和無產階級底相當發展水準所引起的』……但問題並不在於黨章條款能造成機會主義，而是在於要利用黨章條款來鍛煉較為銳利的反對機會主義的武器。機會主義底根源愈深刻，則這種武器也就愈銳利。因此，以機會主義有『深刻根源』為理由來辯護開門接納機會主義的條文，就未免是十足的尾巴主義了。當托洛茨基還在反對李伯爾同志時，他曾瞭解黨章乃是整體對部分，先進部隊對落後部隊所表示的『有組織的不信任』；而當托洛茨基已落到李伯爾同志方面時，他却忘記了這點，並且甚至於用『複雜的原因』以及『無產階級底發展水準』等事，來辯護我們所用以表示這種不信任（對機會主義表示不信任）的組織形式尚嫌薄弱鬆懈的情形了。托洛茨基底另一個論據是說：『已有某種組織的青年智識份子，是能更容易得多地自行列入（着重點是我加的）黨員名冊的』。正是呀。所以，患着智識份子模糊性病症的，正是那容許甚至無組織的份子自行宣佈為黨員的條文，而不是我的絕對不許人們『自行列入』名冊的條文。托洛茨基說，中央委員會『不承認』機會主義者底組織，只是因為注意到這些人底性質，但既然大家都知道這些人底政治面貌，那他們就沒有什麼危險，因為可以用全黨抵制辦法把他們驅逐出去。這只有在必須把某某人逐出黨去的場合才是正確的（並且在這種場合也不完全正確，因為有組織的黨不是用抵制手段而是用表決方法實行驅逐的）。這在更常見得多的場合，即在只需要加以監督而絕對不可實行驅逐時，是完全不正確

他當時很公正地把承認『不負責任和自行列名入黨的份子』爲黨員的主張看作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如果翻譯成爲普通的語言』，——帕夫洛維奇同志向李伯爾同志解釋我所提出的條文時說道，——那末這個條文就是說：『你既然想做一個黨員，那你對於組織關係也應當不只是予以虛玄的承認』。這種『翻譯』雖很簡單，但它（正如代表大會以後的事變所已證明的一樣）却不僅對於那些可疑的大學教授和中學生說，並且對於最真實的黨員，對於上層人物說也原來不是多事之舉哩…。同時，帕夫洛維奇同志又很公正地指出過，馬爾托夫同志底條文與馬爾托夫同志引證得很不中肯的那個不容置辯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是相抵觸的。『我們黨是不自覺過程底自覺表現者』。正是如此。但正因爲如此，所以力求使『每個罷工者』都能自稱爲黨員的傾向是不正確的，因爲假使『每次罷工』都不只是強大階級本能以及必然引向於社會革命的階級鬥爭底自發表現，而是這個過程底自覺表現，那末…那末，全盤總罷工就會不是一句無政府主義的空話，那末我們黨就會立刻和一下子包括整個工人階級，因而也就會一下子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消滅掉。爲了在事實上成爲自覺的表現者，黨就應當善於造成一種能保證具有相當覺悟程度並一貫提高這個程度的組織關係。『按照馬爾

的。中央委員會爲着監督起見，可以故意把某一個雖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組織在其執行某些要求的條件下編入到黨裏來，以便考驗它，試圖把它引入正確道路，用自己的領導來克服其局部的偏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許『自行列入』黨員名冊，那末這樣納入是沒有危險的。爲了使人能公開和負責，即在受監督的條件下表白（並討論）其錯誤觀點和錯誤策略起見，這樣納入往往是會有益處的。『但是，如果說法律上的定義應當適合於事實上的關係，那末列寧同志底條文就應被否決了』，——托洛茨基這樣說道，但這又是機會主義者底說法。事實上的關係並不是僵死的，而是生活着和發展着的。法律上的定義能適合於這些關係底進步發展，但也能（如果這些定義是些壞定義的話）『適合於』退化或停滯。後一場合也就是馬爾托夫同志所主張的『場合』。

托夫底道路走去，——帕夫洛維奇同志說，——首先就會要勾去承認黨綱的條文，因為要接受黨綱，首先就須領會和瞭解這個黨綱……承認黨綱是要有頗高的政治覺悟程度才可辦到的』。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容許用任何要求（領會，瞭解等等）來勉強限制人們贊助社會民主黨，以及參加它所領導的鬥爭的可能，因為單是這種參加也就能提高覺悟程度和組織本能，但我們結合為一個黨，是爲了進行有計劃的工作，所以我們也就應當設法保證這種計劃性。

帕夫洛維奇同志關於黨綱問題的警告原來不是多餘之舉，這在同一會議過程中就立即暴露出來了。保證馬爾托夫同志底條文得以通過的阿期莫夫同志和李伯爾同志*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公然要求（見第二五四至二五五頁），說對於黨綱也只須（爲獲得『黨員資格』）虛玄承認，也只須承認其『基本原理』就够了。『阿期莫夫同志底提議，從馬爾托夫同志底觀點來看，是完全符合邏輯的』，——帕夫洛維奇同志當時這樣指出說。可惜我們從記錄中看不出贊成阿期莫夫這個提議的究竟有多少票數，——大概是下七票（五個崩得份子，再加上阿期莫夫和布魯克爾）。正因爲這七個代表退出了代表大會，所以原先在討論黨章第一項時形成起來的『固結的多數』（反火星份子，『中派』和馬爾托夫份子）終於變成了固結的少數！正因爲這七個代表退出了代表大會，所以主張批准舊編輯部的提議才遭到了失敗，才使得火星報編輯工作上

*投票贊成這個條文的有二十八票，投票反對這個條文的有二十二票。八個反火星份子中有七個贊成馬爾托夫底主張，有一個贊成我的主張。若沒有機會主義者底幫助，馬爾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機會主義條文通過。（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毫無成就地企圖駁倒這件不成問題的事實，不知爲什麼只指出了崩得份子底票數，却把阿期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們忘掉了，——正確點說，只有在必須拿出可以用來攻擊我的證據——即布魯克爾同志有一次對我表示過同意的事實——時，才回想起過這些人）。

的『繼承性』彷彿受到了極厲害的破壞！而這個特異的七人團却是火星報『繼承性』底唯一救星和担保：這個七人團就是崩得份子以及阿期莫夫和布魯克爾，即那些會投票反對承認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的理由的代表，而他們的機會主義立場是經代表大會肯定指出過幾十次，並且是經馬爾托夫和普列漢諾夫兩人在討論緩和黨章第一項關於黨綱的條文問題時肯定指出過的。反火星份子所捍衛的火星報『繼承性』！——這就是代表大會以後那齣悲喜劇底伏線。

* * *

表決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時所形成的派別分立情形，也與表決語言平等問題時所暴露的那種情形完全相同；由於火星多數派方面有四分之一（大概數目）的人數脫離出去，結果就使中派所贊助的反火星派有了獲得勝利的可能。當然，這裏也曾有過擾亂情景完整性的個別票數，——在像我們代表大會這樣一個大規模的會議上，一部分『野』票偶然由此方轉入彼方是在所不免的，尤其是在討論黨章第一項條文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因為當時在這個問題上所發生的意見分歧底實質還剛開始顯現出來，有許多人簡直還沒有來得及把問題弄清楚（因為問題沒有預先在刊物上研究過）從多數派火星份子方面脫落出去的有五票（各擁有兩票表決權的魯索夫和卡爾斯基以及擁有一票表決權的連斯基）；同時却又有一個反火星份子（布魯克爾）和三個中派份子（墨得維結夫，葉哥羅夫和察列夫）歸附到火星多數派方面來；結果是一共有二十三票（ $24-5+4$ ），即比後來在進行選舉時最終形成的集團少一票。反火星份子使馬爾托夫得到了多數，反火星份子中有七個人贊成馬爾托夫底主張，有一個人贊成我的主張（『中派』方面也有七個人贊成馬爾托夫底主張，三個人贊成我的主張）。火星少數派和反火星份子以及『中派』間的聯盟——即在代表大會未和在代表大會以後組成爲固結少數的那個聯盟——已開始形成起來。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在提出黨

章第一項條文中，特別是在擁護這個條文時所犯的那個無疑是走向機會主義和無政府個人主義步驟的政治錯誤，因有代表大會這樣一個自由的公開的舞台而立刻和特別明顯地暴露了出來，其具體表現就是最不穩定的和原則上最不堅定的份子馬上發動了自己的所有一切實力來擴大革命社會民主派觀點中所形成的罅隙或漏洞。在組織方面公開追求着不同的目的（見阿期莫夫底演詞）的人們共同參加代表大會的事實，立刻就推動了原則上反對我們所提組織計劃和反對我們所提章程的那些人去擁護馬爾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底錯誤。而在這個問題上也仍然忠實於革命社會民主派觀點的火星份子却竟佔了少數。這是一件具有極重大意義的事實，因為誰如果對這件事實沒有明白認識，那他就會根本無法瞭解那因爭論黨章枝節問題發生的鬥爭，也無法瞭解那因爭論中央機關報和中央委員會人選問題發生的鬥爭。

(一〇) 冤枉受到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的人

在尚未談到關於黨章問題的繼續討論情形以前，必須講講火星組織在代表大會期間所舉行的幾次非正式會議，藉以說明我們在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上所發生的分歧。這四次會議中最後的和最重要的一次會議正是在表決了黨章第一項條文以後舉行的，所以火星組織在這次會議上發生的分裂，無論在時間方面或邏輯上都是以後鬥爭底先聲。

火星組織非正式會議* 是在組委事件發生以後不久開始召集的，因為這一事件激起了對於中央委員會底可能候選人問題的討

*爲免除無法解決的爭論起見，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已經勉力盡量縮小我對於非正式會議上所有種種事實的敘述。基本的事實是在我致火星報編輯部的信（見第四頁）中也曾敘述過的。馬爾托夫同志在其『答覆』中並沒有抗議過這些基本事實。

論。由於絕對委任狀制已被廢除，所以這幾次會議也就當然只帶有一種協商而對任何人都沒有什麼拘束作用的性質，然而這幾次會議底意義畢竟是極為重大的。中央委員會人選問題在許多代表看來是個頗難解決的問題，因為他們既不知道秘密名字，又不知道火星報組織底內部工作情形，雖則這個組織造成了黨在事實上的一致，並實現了那成爲正式承認火星報的理由之一的對於實際運動的領導。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火星份子在他們自己團結一致的時候總有充分保證能在代表大會上獲得多至五分之三的大多數，並且全體代表都很瞭解這一點。所有一切火星份子都正是期待火星組織提出一個關於中央委員會一定人選的名單，並且火星組織中誰也沒有絲毫表示反對預先在這個組織中討論中央委員會人選問題，誰也沒有絲毫提到要批准組委全體委員，即將其變成爲中央委員會，甚至沒有絲毫提到要與組委全體委員來商議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問題。這件事實也是異常重要而且千萬必須注意到的，因為現在馬爾托夫份子事後竭力擁護組委，其實不過是再次三番證明自己在政治上沒有氣節罷了*。當中央機關人選問題所引起的分裂還沒有使馬爾托夫去和阿期莫夫團結起來時，代表大會上所有的人都明白每一個公正爲懷的人可以從代表大會記錄和火星報全部歷史中看出的事實，即：組委主要是一個負責召集代表大會的委員會，是故意用直到崩得爲止的各種色彩的代表組成的一個委員會；而真正建立黨在組織上的一致實際工作，則完全是由火星組織擔任完成的（同時還須注意到，有幾個火星派的組委委員沒有列席代表大會，

*試仔細想像一下這幅『風俗畫』吧：火星組織底代表在代表大會上只和火星組織商議過，並且甚至連提也沒有提到要去和組委商議。而當他自己在這個組織內以及在代表大會上遭到失敗以後，他却對組委沒被批准一事表示惋惜，事後讚美組委，並傲然忽視給予了他以代表委任狀的那個組織！我敢担保說，這樣的事實在任何一個真正社會民主主義的和真正工人的政黨底歷史中都是我不到的。

這完全是件偶然的事情，是由於被捕以及其他種種『客觀』情況)。列席代表大會的火星組織成份已由帕夫洛維奇同志在他那本小冊子中列舉過了(見他論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信，第一三頁)⁵⁹。

火星組織內部熱烈辯論的最終結果，就是我在致編輯部的信裏已經引證過的那兩次表決。第一次表決是『九票對四票並在三票表示懷疑下否決了馬爾托夫所擁護的候選人中的一個人』。看起來，經火星組織所有列席代表大會的十六個組員一致同意後共同討論關於可能的候選人問題，並以大多數來否決馬爾托夫同志所提出的候選人之一(這個候選人就是現在馬爾托夫同志自己也忍耐不住而將其洩漏出來了的史騰同志，見戒嚴狀況第六九頁)——這豈不是最簡單和最自然的事麼？須知我們聚會起來開黨代表大會，也就是爲了討論並解決究竟把『指揮棒』交給誰掌握的問題，而我們大家共同的黨的義務也就是要對議事日程上這一項給以極嚴重的注意，要根據事業利益來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根據『庸人溫存態度』——如魯索夫同志後來十分公正地指出過的那樣——來解決這個問題。自然，在代表大會上討論候選人問題時，特別是在非正式的和狹小的會議上，不能不涉及某些個人品質，不能不表示自己的贊同態度或不贊同態度*。我還在同盟代表大會上已經預告說過：把不贊同

*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辛酸地訴苦，說我表示不贊同時態度激烈，但他卻沒覺察到從他的訴詞裏所得出的結論是反對他自己的。列寧當時舉動——又用他自己所運用的字眼來表示——狂暴(見同盟記錄第六三頁)。真的。他把門關閉得發響。不錯。他的舉動(在火星組織第二次或第三次會議上)激怒了當時留在會議上的那些組員。這是實情。但由此究應得出什麼結論來呢？結論只是我對於各個爭論問題實質的證據是正確有理而爲代表大會進程所證實了的。真的，如果火星組織十六個組員中畢竟有九個組員贊成了我的立場，那末這就顯然是不管並且違反着這種態度激烈成分而發生的。可見，如果沒有這種『態度激烈』成分，那末當時站到我方面來的也許還要比九個更多哩。可見，當時證據和事實所應克服的『怒火』愈大，這些證據和事實也就顯得愈加確鑿哩。

候選人的態度當作『侮辱』（見同盟記錄第四九頁）是很荒謬的；爲了一件分明是直接履行黨員義務——自覺地審慎地選擇負責人員——的事情而『鬧脾氣』和裝瘋作癩是很荒謬的。我們的少數派也就是爲了這件事情而大鬧起來的哩，他們在代表大會以後開始叫喊起來，說什麼『毀壞名聲』（見同盟記錄第七〇頁），並在刊物上向讀者大眾硬說史騰同志是過去組委底『主要人物』，說他被人誣指爲懷有『什麼萬惡計謀』（見戒嚴狀況第六九頁）。你看，在事關贊同候選人或不贊同候選人時叫喊什麼『毀壞名聲』——這難道不是裝瘋作癩麼？人們當自己既在非正式的火星組織會議上又在正式的最高的全黨會議即代表大會上遭到失敗以後，就向街頭人衆叫冤訴苦，並把落選的候選人當作『主要人物』來介紹給尊貴的人衆——這難道不是無謂爭鬧麼？人們後來竟用實行分裂和要求補選的辦法迫使黨接受他們的候選人，——這難道不是無謂爭鬧麼？在我們這個腐臭的僑外的氣氛中間，政治概念已混淆到如此地步，以至馬爾托夫同志已分辨不清什麼是黨員義務，什麼是小組習氣和戚友關係了！人們居然以爲主張說候選人問題只宜於在代表大會上討論和解決便是一種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態度，誰則誰都知道代表們舉行大會是爲了首先討論重要原則問題，誰也知道在這裏聚會起來的是從運動中的代表，他們能够大公無私地看待人選問題，能够（而且應當）爲了投票表決而要求和收集關於候選人的一切材料；誰也知道在這裏爲指揮棒問題而發生相當爭論原是自然而且必要的。誰知現在我們這裏却已爲代替這個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態度而施行了另外一種風俗：我們將在代表大會閉會後信口開河，說某某人在政治上被埋葬了，說某某人底名聲被毀壞了等等；候選人將由一些文人在小冊子裏加以介紹，而且這些文人還指手畫脚地裝出一副偽善面孔，硬說這不是小組而是黨哩…那些喜歡鬧架的讀者大眾就會如渴思飲地歡迎這種動人的新聞，說

什麼據馬爾托夫自己揚言，某某人曾是組委底主要人物*。這個讀者大眾要比按多數通過極機械決議的代表大會一類形式主義機關有更多得多的本事去討論和解決問題啊…是的，還有許多僑外習氣的無謂爭鬧把戲要我們真正的黨的工作人員來盡情打破哩！

* * *

火星組織所舉行另一次表決是：『十票對兩票並在四票表示懷疑下通過五人名單（即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由我提議列入這個名單的有一個非火星派首領和一個火星少數派首領』。這次表決極為重要，因為它很明顯而不容爭辯地證明：後來在無謂爭鬧的氣氛中滋生出來的那些謠言，說什麼我們想從黨內驅逐或革除非火星份子，說什麼多數派只以代表大會半數來選舉半數裏的候選人等等的謠言，是毫無根據的。所有這些都完全是謊話。從我所引證的這次表決情形中可以看出，我們不僅沒有想把非火星份子從黨內革除出去，甚至沒有想把他們從中央委員會內革除出去，而是讓我們的對方佔有很大的少數。全部問題就在於他們想獲得多數，而當這種奢望沒有實現時，他們就吵鬧起來和完全拒絕參加中央機關了。至於事實真相正是如此，而適和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中所說的相反，那末這從下述一封信裏就可看出，這封信是我們即火星組織中的多數（而在七個人退出代表大會以後，則已成為代表大會上的多數）在代表大會通過黨章第一項以後不久從火星組織中的少數方面接到的（必須指出，我所說過的那次火星組織會議乃是最後的一次會議：

*我也在火星組織裏提出過一個中央委員會候選人，並且也如馬爾托夫一樣沒能使這個候選人當選，而我關於這個候選人也能鼓吹說他在代表大會以前和在代表大會開始時有過可用特有事實來證實的極好的名聲。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這樣去作。這個同志有充分自重精神，決不會容許任何人在代表大會閉會後再在刊物上提出他的候選資格或訴說什麼政治上被埋葬，什麼名聲毀壞等等。

在這次會議以後，火星組織事實上已經瓦解，於是雙方都去設法說服代表大會其餘各代表來相信自己有理）。

以下就是這封信底全文：

『我們聽到了索羅金和薩普林娜兩位代表關於編輯部和『勞動解放』社底多數願意參加會議（某某天）*問題的解釋；同時我們又在這兩位代表幫助下查知了，原來在上次會議上宣讀過一個似乎是由我們提出的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這個名單被人們利用來對我們整個政治立場作出不正確的估計；加之，我們既注意到，第一，這個名單是人們絲毫沒有企圖檢查其來源怎樣而就當作是由我們提出的；第二，這一情況分明是與那加在火星報編輯部和『勞動解放』社多數頭上的公開散播的機會主義罪名有聯繫；第三，我們很明白知道這個罪名是與改變火星報編輯部成份的完全確定的計劃有聯繫，——因此，我們不能以我們所聽到的關於不允許參加會議的原因的解釋為滿意，並認為不願意允許我們參加會議就是證明不願意讓我們來消除上述那些誣加的罪名。

說到我們彼此可否協定提出一個共同的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的問題時，我們茲特聲明：我們可當作協定基礎來接受的唯一名單就是頗坡夫、托洛茨基、格列波夫三人，同時我們着重指出這個名單是一個妥協性的名單，原來我們把格列波夫同

*據我計算，這封信內指出的日期是星期二。會議是在星期二晚上，即在代表大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以後舉行的。這種時間上的考證極為重要。它證據確鑿地推翻馬爾托夫同志所謂我們彼此分離是由於中央機關構成問題而不是由於中央機關人選問題的意見。它證據確鑿地證明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和致編輯部的信裏敘述是正確的。在代表大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以後，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兩同志極力談論什麼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同時却又一句話也沒有說到總委員會人選或中央機關補選問題所引起的分歧（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是在第二十五次，第二十六次以及第二十七次會議上爭論過的）。

志列入這個名單只有爲了向多數方面的願望表示讓步，因爲我們在代表大會上認清格列波夫同志底作用以後，我們已不認爲格列波夫同志能滿足中央委員會候選人所應滿足的要求了。

同時，我們要特別着重指出一點，就是我們進行關於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問題的談判時，並沒有把此事聯繫到中央機關報編輯部成份的問題，因爲我們決不同意對這個問題（編輯部成份問題）進行任何談判。

代表各同志署名者：

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

從這一封確切反映着爭論雙方情緒和爭論情形的信中，可以明白看出當時開始發生的分裂底『中心』，以及這一分裂底真實原因。火星組織中的少數雖不願同意多數底意見而寧願在代表大會上自由進行鼓動（他們當然完全有權這樣作），但他們終究想要從多數底『代表』方面取得參加其非正式會議的應允！當然，這種滑稽可笑的要求在我們的會議上（這封信當然是在會議上宣讀過的）只引起了微笑和詫異，至於他們因『冤枉受到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而發出的那種可以說是發瘋式的叫號，則簡直已引起了哄笑。可是，我們首先還是來逐條剖解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那些辛酸的訴詞吧。

他們說：人們不正確地把名單當作了他們提出的名單；人們不正確地估計了他們的政治立場。可是，——馬爾托夫自己也承認這一點（見同盟記錄第六四頁）——我並沒有懷疑過他說這名單不是由他所提出等語底真實性。一般說來，關於名單究竟是由誰所提出的問題在這裏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爲名單究竟是由火星份子中某個人所擬定還是由『中派』代表中某個人所擬定等等，那是根本不關

重要的。重要的是完全由現在少數派份子所構成的這個名單在代表大會上傳佈過，即使它不過是當作一種推測或假設的東西傳佈過。末了，最重要的是馬爾托夫同志當時在代表大會上竟只好拚命表示拒絕他現在不免要表示歡迎的這種名單。你看，他在兩個月內就由大聲叫喊『恥辱傳聞』一躍而強求黨把這個似乎是恥辱的名單* 中的候選人接受到中央裏去，——他這樣一躍也就再明顯不過地證明他對於人物和色彩的估計該是怎樣不穩定啊！

這個名單，——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說道，——『在政治上是意味着我們以及『南方工人』社同崩得實行直接協定性的聯盟』（見第六四頁）。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第一，崩得無論何時也不會同意實行關於沒有一個崩得份子加入的名單的『協定』；第二，當時不僅同崩得，並且同『南方工人』社，也沒有談到並且也不能談到什麼直接的（當時在馬爾托夫看來是可恥的）協定。當時所實行的恰巧不是協定而是聯盟，當時的問題並不是說馬爾托夫同志締結過什麼協約，而是說那些在代表大會前半期內曾遭到馬爾托夫同志反對，爾後却拚命抓住馬爾托夫同志在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上所犯錯誤來利用的那些反火星份子和動搖份子不免要贊助馬爾托夫同志。上面我所引證過的信就是極確鑿地證明出，他們所以『生氣』的根本原因正在於人家公開並且冤枉加予了他們一個機會主義罪名。這些會使人們大鬧起來而現時馬爾托夫同志不管我在致編輯部的信中提醒還是極力迴避不說的『罪名』，是歸結為如下兩點：第一，在討論黨章第一項條文時，普列漢諾夫直截聲明說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就是把『各種機會主義份子』和我們

*當我們得到關於古塞夫同志和捷依契同志衝突事件的通知時，本書已經排好了。關於這次事件，我們將在本書附錄中專門加以分析。（參看本卷第五五七至五六六頁。——編者）。

『分開』的問題，說我所提出的草案是防禦他們侵入黨內來的堡壘，說『單是這一點就應該使一切反對機會主義的人投票擁護』這個草案（見代表大會記錄第二四六頁）。這些剛強的語句雖然由我加進過一些緩和性的成分（見第二五〇頁），終於引起了很明顯地表現於魯索夫同志（見第二四七頁），托洛茨基同志（見第二四八頁）和阿期莫夫同志（見二五三頁）演詞中的那種強烈印象。當時在我們『國會』底『遊廊』裏，大家都在關於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的無數爭論過程中熱鬧地評註過普列漢諾夫所提出的這一意見，並把它解釋得莫衷一是。但我們那些貴重的同志却不僅不按實質來辯白，反而陷入了可笑的氣憤狀態，一直到用書面來訴說什麼『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

拘泥於小組習氣和非常缺乏黨性而經不起當衆公開爭論的新鮮空氣的心理，在這裏表現得極為明顯。這正是俄羅斯人所熟識的心理，這種心理是可用『或是反目，或是接吻』這一古諺來表示的！人們已很厲害地習慣於在一小羣親熱夥伴的狹小範圍內生活，一看見有人在自由公開的舞台上由自己負責說話，就陷入了不省人事的狀態。歸罪，歸罪於誰呢？歸罪於『勞動解放』社，何況是歸罪於該社多數，說他們是機會主義者，——這還了得麼？或是爲了這一不可洗滌的侮辱而實行把黨分裂，或是以恢復狹小範圍中『繼承性』來消釋這種『家醜』——這就是在上述那封信裏已經頗爲明顯確定提出的兩種辦法。智識份子個人主義和小組習氣的心理碰到了必須在黨面前公開說話的要求。你能設想在德國黨內竟會有可能出現如訴說什麼『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這樣一種荒唐現象，這樣一種無謂爭鬧麼！在那裏，無產階級的組織和紀律早已教人棄絕了這種智識份子的劣根性。例如，李卜克內西是誰都只會對他表示最大敬意的，但如果李卜克內西在一八九五代表大會上關於土地問題落到歸併機會主義者福里馬爾一流人惡劣伙伴中時因被『公開罵作機會

主義』（和伯伯爾一塊）而表示訴苦，那末大家該會多麼厲害地加以恥笑啊！李卜克內西底名字與德國工人運動史緊密聯系而分離不開，當然不是因為李卜克內西在這樣一個比較細小的和局部的問題上犯過機會主義錯誤，而是那怕他犯過這種錯誤。同樣，不管鬥爭如何令人氣憤，然而例如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底名字現在並且將來還會經常受到每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尊敬，不過這並不是因為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在我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擁護過機會主義的所謂思想，而是那怕他擁護過這種思想；不是因為他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過老舊的無政府主義謬論，而是那怕他提出過這種謬論。只有那些拘守最頑固的小組習氣而以『或是反目，或是接吻』一語為邏輯的人，才會因『勞動解放』社多數『冤枉受到機會主義罪名』而裝瘋作賴，掀起無謂的爭鬧和黨內的分裂。

這種可怕罪名底另一根據是與前一根據有最緊密聯繫的（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見第六三頁）極力企圖迴避和抹煞過這件事情底一方面）。這一根據就是反火星份子以及動搖份子與馬爾托夫同志在討論黨章第一項時已經顯現出來的聯盟。自然，當時馬爾托夫同志並沒有而且也不能同反火星份子成立什麼直接協定或間接協定，並且誰也沒有猜疑他成立過什麼協定：這不過是他自己慌忙中發生的一種感想罷了。可是，那些顯然趨向於機會主義的人們在他周圍實行組成爲一個愈趨緊密的『固結』多數（現在只是由於有七個代表『偶然』退出才變成了少數）這一事實，却正是暴露了他那個錯誤底政治意義。對於這個『聯盟』，我們在討論黨章第一項條文以後就立刻——當然也是公開地——指出過，既在代表大會上指出過（參看我們已在上面引證過的帕夫洛維奇同志那個評語，見代表大會記錄第二五五頁），又在火星組織裏指出過（我記得普列漢諾夫特別着重指出過這點）。這正好似蔡特金在一八九五年間曾向伯伯爾和李卜克內西兩人提出過的指示和嘲笑一樣，„Es tut

mir in der Seele weh, daß ich dich in der Gesellschaft seh'“（我看見你（即伯伯爾）落在這樣一伙人中間（即與福里馬爾及其伙伴一塊），該是多麼傷心呀）。說也奇怪，當時伯伯爾和李卜克內西兩人並沒有向考茨基和蔡特金寫過發瘋式的說什麼冤枉受到機會主義罪名的信哩……

關於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的問題，我們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中說他們當時還沒有最終表示拒絕同我們磋商等語是不符事實的，——我們從這裏又可看出，在政治鬥爭中企圖憑記性來重述種種談話而不按文件來從事考證，該是如何不合理呵。其實，『少數派』當時絲毫沒有講過什麼客氣，公然向『多數派』提出了一個最後通牒：由『少數派』提出兩個候選人而由『多數派』提出一個候選人（作為妥協辦法，並且只是為着表示讓步哩！）。這是駭人聽聞的，但這是事實。而從這件事實中就可明白看出，現在所散佈的謠言，說當時『多數派』彷彿想由代表大會半數選出單祇這個半數中的代表等語，該是多麼荒唐呵。恰巧相反：馬爾托夫份子只是為了表示讓步才主張讓我們在三個位置中佔有一個位置，因而也就是打算當我們不同意這個新奇『讓步』時就完全選出自己的人！我們在自己的非正式會議上譏笑過馬爾托夫份子底這種謙遜態度，並為自己擬定了一個名單：格列波夫，特拉文斯基（他後來是被選進中央委員會的）以及頗坡夫。而我們隨後（也在二十四人舉行的非正式會議上）之所以用瓦西里也夫同志（他後來被選進了中央委員會）來代替了頗坡夫同志，只是因為頗坡夫拒絕加入我們所提出的名單，起初是在私人談話中表示拒絕，後來又還在代表大會上公開表示拒絕（見第三三八頁）。

事實真相就是如此。

謙遜的『少數派』本來是抱有過一種想要佔得多數位置的謙遜的願望。當這種謙遜願望沒得到滿足時，『少數派』就公然完全表

示拒絕而鬧起架來了。但現在却有人居然帶着藐視神情高談闊論，說什麼『多數派』『不肯讓步』哩！

『少數派』出馬到代表大會上去進行自由鼓勸的時候，曾向『多數派』提出過滑稽可笑的最後通牒。而當他們自己遭到了失敗的時候，這班英雄們就嚎啕大哭並叫喊起戒嚴狀況來了。Voilà tout*。

對於所謂我們立意改變編輯部成份這一可怕罪名，我們（即二十四人舉行的非正式會議）也是一笑置之，因為大家從代表大會最初開始時起，甚至早在代表大會以前即已很清楚知道了關於要以選舉原先預定的三人團來革新編輯部的計劃（關於這一點，我往下講到代表大會上選舉編輯部的情形時還會詳細說到）。至於『少數派』看見它同反火星份子聯盟是表明這個計劃正確的明顯證據後就被這個計劃嚇倒，那是我們絲毫沒有感覺奇怪的，那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我們當然不能嚴重看待那種要求我們尚未在代表大會上進行鬥爭以前自願變成少數的提議，我們當然不能嚴重看待那封信，因為那封信底作者們公然氣憤到如此不可思議的地步，以至於說起什麼『冤枉受到機會主義罪名』來了。我們堅信黨員的職責是很快就會戰勝那種想要『洩洩憤火』的自然願望的。

（一一）繼續討論黨章。總委員會底成份

黨章往後各條所引起的爭論多半是關於枝節問題，很少涉及組織原則。代表大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就完全是討論到選派代表出席黨代表大會的原則問題，當時堅決肯定進行鬥爭來反對全體火星份子共同計劃的又只有崩得份子（哥里德卜拉特和李伯爾，見第二五八

*意即『如斯而已』。——譯者。

至二五九頁)以及阿期莫夫同志，後者以值得稱讚的坦白態度承認他自己在代表大會上的作用說：『我每次說話時都完全意識到，我所提出的論據不會影響到同志，反而會危害到我所擁護的那個條款』（見第二六一頁）。這段中肯的評語在緊接討論黨章第一項條文以後來講是特別適當的；只是『反而』一語在這裏用得不完全正確，因為阿期莫夫同志當時不僅善於危害到相當的條款，並且還善於『影響到同志』……即影響到那些傾向於機會主義辭令而很不澈底的火星份子中的同志。

總之，黨章第三項——規定選派代表出席代表大會的條件——是由大多數贊成和在七票表示懷疑下通過了（見第二六三頁），表示懷疑的顯然都是些反火星份子。

關於總委員會成份問題的爭論佔去了代表大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大部分的時間，這一爭論暴露了在許多彼此不同的草案周圍所形成的非常零碎的派別分立。阿布拉姆松和察列夫根本反對成立總委員會的計劃。帕寧硬想使總委員會成爲一個純粹仲裁性的法庭，因此他也就完全合乎邏輯地提議把認定總委員會是最高機關以及總委員會可由其中任何兩個委員召集開會等語取消*。格爾茨和魯索夫兩人堅持着各種構成總委員會的方法，因為他們認爲黨章委員會五個委員所提出的三種方法不甚妥當。

爭論的問題首先是歸結於要決定總委員會底任務：是仲裁法庭還是全黨最高機關呢？我已經說過，一貫贊成前一種定義的有帕寧同志。但他是孤獨無援的。馬爾托夫同志堅決表示反對這一定義：

*斯塔羅維爾同志顯然也傾向於帕寧同志底觀點，其不同處只在於後者知道自己所想達到的目的究竟何在，所以他完全合乎邏輯地提出要將總委員會變成一個純粹仲裁性調解機關的決議案；斯塔羅維爾同志雖說總委員會按草案規定了『只應按雙方願望』（見第二六六頁）召集，但他却不知道他自己所想達到的目的究竟何在。然而他這種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

『我提議否決那主張把『總委員會是最高機關』一語取消的建議，因為我們的條文』（即我們在黨章委員會內一致同意的關於總委員會任務的條文）『正是要想使總委員會有可能發展成爲全黨最高機關。在我看來，總委員會並不只是一個調解機關』。但是按馬爾托夫同志底草案來說，總委員會底成份完全和僅僅適合於『調解機關』或仲裁法庭底性質：兩個中央機關各選派兩個委員，第五個委員由這四個委員聘請之。不僅這樣的總委員會成份，就是按魯索夫同志和格爾茨同志提議而由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總委員會成份（第五個委員由代表大會任命），也只適合於調解或中介底目的。總委員會底這種成份是根本與其應該成爲全黨最高機關的使命相矛盾的。全黨最高機關在成份方面應該固定不變，決不應依中央機關成份中的偶然（有時是因爲遭受破獲）變動爲轉移。最高機關應當與黨代表大會有直接的聯系，從代表大會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權，而不應從其他兩個服從代表大會的黨機關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權。最高機關應該由黨代表大會所熟知的人物組成。末了，最高機關構成的方式決不應使它本身的存在都取決於偶然的情況：在兩個委員會對於選舉第五個委員的問題缺乏一致意見時，黨就會陷於沒有最高機關的地位！反駁這個意見的那些人則說：第一，當五個委員中有一個委員表示懷疑，而其餘四個委員又分成兩對時，也會形成沒有出路的狀況（葉哥羅夫）。這種反駁意見是沒有根據的，因爲無法通過決議的場合有時是任何一個委員會都不能避免的，然而這完全不是說委員會無法構成。第二種反駁意見是說：『如果像總委員會這樣的機關尙不能選出第五個委員，那就是說這個機關根本沒有活動能力了』（查蘇列奇）。然而，這裏的問題並不在於沒有活動能力，而是在於最高機關不存在：沒有第五個委員就不會有什麼總委員會，就不會有任何『機關』，於是也就會根本談不到什麼活動能力。末了，如果說無法構成的只是某一個服屬於另一個委員會——上級委

員會——的黨委員會，那還是一種可以設法糾正的弊病，因為這個上級委員會在非常情形下隨時都能用某種方法來彌補缺陷。可是，在總委員會以上，除代表大會而外，便沒有任何委員會，所以如果在黨章內留下一種使總委員會甚至無法構成的可能性，那就顯然是不合邏輯了。

我在代表大會上對於這個問題所發表的兩個簡短演詞，也就正是單祇剖解（見第二六七頁和第二六九頁）馬爾托夫本人及其他同志用以辯護馬爾托夫草案的這兩種不正確的反駁意見而作的。至於總委員會中究竟是以中央機關報還是以中央委員會佔優勢這一問題，我甚至沒有提到過。最先提到這個問題而說中央機關報有佔得優勢危險的乃是阿期莫夫同志，他還在代表大會第十四次會議上發言時就已經提到過這點（見第一五七頁）；至於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及其他同志在代表大會以後製造蠱惑人心的荒唐謠言，說什麼『多數派』要想把中央委員會變為編輯底工具等語，那就不過是步武着阿期莫夫底後塵罷了。馬爾托夫同志在其戒嚴狀況中涉及這個問題時，竟把這個問題底真正發起人輕輕迴避過去了！

誰要是想認識關於中央機關報對中央委員會佔優勢這一問題在黨代表大會上的全部提法，而不是局限於斷章取義地摘引個別語句，那他就能很容易發現馬爾托夫同志是把事實真相歪曲了。還在第十四次會議上，不是別人，正是頗坡夫同志開始發言時就表示反對阿期莫夫同志底意見，說他竟想要『在黨底高峯上擁護『最嚴格的集中制』，以便減弱中央機關報底影響』（見第一五四頁，着重點是我加的），『這樣的（阿期莫夫的）體系底全部意義就在於此』。

『對於這樣的集中制，——頗坡夫同志補充說道，——我不僅不會表示擁護，並且要極力反對，因為它是機會主義底旗幟』。這也就是關於中央機關報對中央委員會佔優勢這一所謂問題底根源之所在，所以無怪乎馬爾托夫同志現在只好把這個問題底真實起源隱諱

起來。當時甚至頤坡夫同志也不能不覺察到阿期莫夫這些說什麼中央機關報佔優勢的議論含有機會主義的性質*，所以頤坡夫同志爲了要把自己和阿期莫夫同志好好分別開來，便堅決聲明說：『就讓這個中央機關（總委員會）由編輯部提出三個人和由中央委員會提出兩個人組成吧。這是個次要的問題（着重點是我加的），重要點是要全黨底最高領導同出一源』（見第一五五頁）。阿期莫夫同志反駁說：『按照草案，中央機關報在總委員會內的優勢，單是因爲編輯部成份固定而中央委員會成份變動無常，也就有了保障了』（見第一五七頁）——這一論據所說及的只是原則領導底『固定性』（這是正常和符合願望的現象），絕不是具有干涉或侵犯獨立性意義的『優勢』。於是頤坡夫同志——他當時還沒有隸屬於那以說什麼中央委員會沒有獨立性的讒言來掩蓋其不滿意中央機關成份心理的『少數派』——就完全正當地回答阿期莫夫同志說：『我提議把它（總委員會）當作全黨底領導中心，那時總委員會內究竟是以中央機關報代表佔多數還是以中央委員會代表佔多數的問題，就會完全不重要了』（見第一五七至一五八頁。着重點是我加的）。

當在第二十五次會議上重新討論到總委員會成份問題時，帕夫洛維奇同志繼續着先前的辯論發言擁護中央機關報對於中央委員會的優勢，『因爲前者具有穩定性』（見第二六四頁），而他所指的

*無論頤坡夫同志或馬爾托夫同志都未曾害怕把阿期莫夫同志稱呼爲機會主義者，他們只有當人們對他們自己應用了這個稱呼，並且是因爲『語言平權』問題或因爲黨章一項問題而公正地應用了這個稱呼時，才生起氣來和發起怒來的。然而馬爾托夫同志所已步武其後塵的阿期莫夫同志在黨代表大會上的舉動，却要比馬爾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的舉動莊重和有胆量些。『在這裏，——阿期莫夫同志在黨代表大會上說，——人們把我稱呼爲機會主義者；我個人認爲這個字眼是一個罵人和侮辱的字眼，並且我以爲人家這樣來稱呼我是完全不應該的；然而我並不來抗議這一點』（見第二九六頁）。也許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兩同志曾向阿期莫夫同志建議簽名擁護他們爲反對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而提出的抗議書，但阿期莫夫同志却拒絕了這個建議吧？

正是原則的穩定性，正如緊接着帕夫洛維奇同志以後登台發言的馬爾托夫同志所瞭解的那樣，馬爾托夫同志在發言中認為用不着『規定一個機關對於另一個機關的優勢』，並指出可能使一個中央委員會委員留在國外：『這樣就能使中央委員會底原則穩定性在一定程度內保持下去』（見第二六四頁）。這裏還絲毫沒有什麼用蠱惑口吻把關於原則穩定性以及保持這種穩定性的問題與關於保持中央委員會獨立自主性的問題混淆起來的意味。在代表大會以後幾乎已成為馬爾托夫同志主要法寶的這種混淆，在代表大會上還只有阿期莫夫同志一人才頑強地鼓吹過，阿期莫夫同志當時已經說到什麼『黨章底阿拉克切也夫精神⁹⁰』（見第二六八頁），說『如果黨總委員會內有三個委員是由中央機關報提出，那末中央委員會就會變為不過是編輯部意志底執行者了（着重點是我加的）。三個住在國外的人就會取得無限制地（!!）支配全（!!）黨工作的權柄。他們在安全方面是有保證的，因此他們的權力就會是終身的』（見第二六八頁）。正是爲了反駁這些完全荒唐的蠱惑人心的詞句，爲了反駁這些竟把思想上的領導曲解爲對於全黨工作的干涉的詞句（這種詞句在代表大會以後供給了阿克雪里羅得同志一個賤價的口號來大談所謂『神權政體』），於是帕夫洛維奇同志又登台發言，着重聲明說他『擁護火星報所代表的那些原則底堅定性和純潔性。我主張使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佔得優勢，也就是要鞏固這些原則』。

關於中央機關報對中央委員會佔所謂優勢這一問題底真相，就是如此。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兩同志指出這一有名的『原則意見分歧』，無非是把阿期莫夫同志當時說出的那些機會主義的和蠱惑人心的詞句重複一遍，而這些詞句底本質是頗坡夫同志也曾看得很清楚的，當然只是當他自己還沒有在中央機關成份問題上遭到失敗以前才看得很清楚啊！

* * *

總委員會成份問題底總結是：不管馬爾托夫同志在其戒嚴狀況中怎樣企圖證明我在致編輯部的信內有自相矛盾和不正確的說法，可是我們從代表大會底記錄中却能明白看出，這個問題和黨章第一項比較起來確實只是個枝節問題，而我們的代表大會一文（見火星報第五十三期）說當時我們所爭論的『幾乎只是』關於黨中央機關底組成方法問題等語，原是完全歪曲事實的。這種歪曲所以更加豈有此理，是因為該文作者竟把關於黨章第一項條文的爭論完全迴避過去了。其次，火星份子在總委員會人選問題上並沒有過什麼確定的派別分立，這點也可拿代表大會記錄來證實：沒有舉行過記名表決，馬爾托夫和帕寧意見不合，我和頗坡夫意見相同，葉哥羅夫和古塞夫兩人採取特別的立場等等。末了，我最近（在旅外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同盟代表大會上）認定馬爾托夫份子與反火星份子間的聯盟已經鞏固起來這一斷語，也可由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兩同志在這個問題上也轉到阿期莫夫同志方面去了這一現今誰都看得清楚的事實來證實。

（一二）關於黨章問題討論底終結。中央 機關補選問題。『工人事業』 社代表退出大會

講到黨章問題繼續討論經過（代表大會第二十六次會議）時值得指出的，只有限制中央委員會權力的問題；從這個問題中可以窺見馬爾托夫份子現在攻擊過份集中制的用意。葉哥羅夫同志和頗坡夫同志企圖限制集中制的立場是較為確信一些，他們沒有依他們自己的候選資格或他們所擁護的候選人為轉移。他們早在黨章委員會裏就已經提議要限制中央委員會解散地方委員會的權力，其限制的條件就是總委員會底同意以及特別列舉的種種場合（見第二七二

頁，註釋第一)。黨章委員會內有三個委員(格列波夫，馬爾托夫和我)反對這種限制，並且馬爾托夫同志在代表大會上也曾擁護我們的意見(見第二七三頁)，並反駁葉哥羅夫和頗坡夫兩人說：「即令沒有這些限制，那中央委員會在決定採取如像解散組織這樣一種嚴重步驟時也是會預先加以討論的」。由此可見，當時馬爾托夫同志對於一切反集中制的企圖還是充耳不聞，結果代表大會就否決了葉哥羅夫和頗坡夫底提議，——只是可惜我們不能從記錄中查明究竟是由多少票數否決的。

在黨代表大會上，馬爾托夫同志也曾「反對以批准一語來代替組織一語(在黨章第六項內說：中央委員會負責組織各委員會等等)。必須也給它以組織的權力」，——馬爾托夫同志當時這樣說道，當時他還沒有想到那個只有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才發現出的妙到極點的思想，即認為「批准」不包括在「組織」概念以內的思想。

除這兩點以外，其餘一切關於黨章第五項至第十一項種種瑣屑枝節問題的辯論(見記錄第二七三至二七六頁)，都沒有多大趣味可言。第十二項——是一般關於一切黨委員會補選以及中央機關補選的問題。黨章委員會提議把補選所必要的標準多數從三分之二提高到五分之四。報告人(格列波夫)提議：補選中央委員會需要有一致通過。葉哥羅夫同志認為不宜留下一些粗刺，因而主張在沒有什麼人提出理由充分的 veto* 意見時只需要過半數通過。頗坡夫同志既不同意黨章委員會底意見，也不同意葉哥羅夫同志底意見，而要求或是過半數通過(沒有 veto 權)，或是一致通過。馬爾托夫同志既不同意黨章委員會底意見，又不同意格列波夫、葉哥羅夫以及頗坡夫底意見，而反對一致通過，反對五分之四(贊成三分之二)，反對「相互補選」，亦即反對中央機關報編輯部

*意即「否決」。——譯者。

有權對中央委員會補選表示抗議，反之亦然（即反對『相互監督補選權』）。

讀者由此可以看出，這裏派別分立極為複雜，意見分歧幾乎是表現於每個代表底見解上都是『一致』有其特殊之點！

馬爾托夫同志說：『我承認，要同你所嫌惡的人一起工作是心理上很難堪的。然而我們必須使我們的組織具有生命能力和工作能力…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在補選方面的互相監督權是不需要的。我所以反對這一點，並不是因為我認為它們彼此不深知彼此的事情。決不是！例如，在關於是否應把拿齊金先生納入中央委員會去的問題上，中央機關報編輯部能向中央委員會貢獻良好的意見。我所以表示反對，是因為我不願意弄出一種互相激怒的延擱』。

我反駁他說：『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關於標準多數的問題，我反對把這種標準從五分之四減成三分之二。說明理由的抗議制不宜採用，所以我反對這點。第二個問題，即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對於補選的相互監督權問題，却較為重要得多。兩個中央機關相互間的同意，乃是保證協和的必要條件。此刻談到的是兩個中央機關決裂的問題。誰不願意分裂，那他就應該關心維持協和。大家從黨底生活中知道會有過一些製造分裂的人。這是個原則問題，是個重要問題，是黨底整個將來命運攸關的問題』（見第二七六至二七七頁）。這就是我那次發言內容撮要載在黨代表大會記錄中的全文。馬爾托夫同志對於這篇演詞特別重視。可惜他雖重視這篇演詞，但他提起這篇演詞時却絲毫沒有聯系到這篇演詞發表時的全部討論情形和代表大會上的全部政治局勢。

這裏首先就要問到：為什麼我在自己最初的草案中（見第三九四頁，第十一項）僅以三分之二的票數為限，却沒有要求中央機關在補選問題上相互實行監督呢？在我以後發言的托洛茨基（見第二七七頁）也就立刻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的演詞以及帕夫洛維奇同志論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信對這個問題給了一個回答。黨章第一項『把器皿打破了』，所以我們必須用『雙重結子』把它捆綁起來，——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這樣說過。這就是說：第一，馬爾托夫在純粹理論問題方面已暴露自己是個機會主義者，而李伯爾和阿期莫夫又保持了他所犯的錯誤；第二，馬爾托夫份子（即火星份子中的區區少數）與反火星份子聯盟的事實使他們有可能在代表大會上選舉中央機關人員時獲得多數。我強調說必須維持協和並預告說必須防範『製造分裂的人』時所談到的正是中央機關人選問題。當時這樣預告確實是有重要原則意義的，因為火星組織（它在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上無疑是個更有權威的組織，因為它最熟悉實際工作方面一切事務和所有一切候選人）已表示了它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已通過了關於它所引為焦慮的那些候選人的相當決議。無論在道德上或按事情實質（即按提出決議者底權威程度）來說，火星組織在這個細賦問題方面都應起決定的作用。可是，馬爾托夫同志在形式上說當然有十足權利去請求李伯爾輩和阿期莫夫輩幫忙反對火星組織中的多數。阿期莫夫同志在其關於黨章第一項的燦爛演詞中已經非常明白而聰明地申述過，說他看見火星份子中間關於達到其共同的火星目的的方法上發生意見分歧時，他就自覺地和故意地來投票贊成較壞的辦法，因為他——阿期莫夫——所持的目的是與火星目的正相反對的。所以，毫無疑義，甚至不管馬爾托夫同志底意志和意識如何，正是較壞的中央機關人選將會得到李伯爾輩和阿期莫夫輩投票擁護。他們能夠投票，他們一定會投票（不是按他們的言詞，而是按他們的行事，按他們對於黨章第一項的投票來判斷）擁護包括『製造分裂的人』在內的名單，並且他們這樣來投票的目的正是爲了『製造分裂』。在這樣的情勢下，我說這個問題是黨底全部將來命運所繫的重要原則問題（兩個中央機關底協和），又會有什麼奇怪麼？

凡是稍許熟悉火星思想、計劃以及運動歷史，稍許誠懇贊同過這些思想的社會民主黨人，都不會片刻懷疑到，由李伯爾輩和阿期莫夫輩解決火星組織內部對於中央機關成份問題的爭論在形式上雖算正確，但却一定會造成最壞的結果。這些最壞的結果是我們當時絕對要用鬥爭來預防的。

試問：究應怎樣進行鬥爭呢？我們進行鬥爭時所採用的當然不是裝瘋作賴的手段，不是吵嘴鬧架的辦法，而是完全忠順的和完全正當的手段：當我們感覺到我們處在少數地位時（如在討論黨章第一項條文時那樣），我們就向代表大會請求保護少數底權利。接受委員時採取更嚴格的標準多數通過制（以五分之四代替三分之二），進行補選時要有一致同意，中央機關相互監督補選，——所有這些辦法，我們在關於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上一落到少數地位時都一一堅持起來了。有些人總是把這件事實忽略過去，他們喜歡在作過一兩次戚友談話以後就來憑空評判代表大會，却不肯把一切記錄和一切關係人底『口供』都拿來認真研究一下。誰願意把這些記錄和這些口供拿來認真研究一番，那他就必然會遇到我所指出的一件事實：在代表大會當時局勢下，爭論底根源正是中央機關人選問題，而我們當時所以力求規定更嚴格的監督條件，也就是因為我們處於少數地位，想用『雙重結子來捆綁』馬爾托夫在李伯爾輩和阿期莫夫輩欣然讚賞下並在他們欣然參加下打破了的那個『器皿』。

『如果事情不是這樣，——帕夫洛維奇同志講到代表大會當時的局勢時說道，——那就只可設想，我們主張在實行補選時需要有一致同意，就等於替敵人操心，因為對於在某個機關中佔居多數的黨，一致同意不僅是不需要，並且是不利的』（見論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信第一四頁）。可是，現在人們總是忘記事變發生的先後次序，忘記現今的少數在代表大會整整一個時期內都曾佔多數（因有李伯爾輩和阿期莫夫輩參加），忘記關於中央機關補選問題的爭論正是

發生於那個時期，並且這次爭論底內幕就是火星組織內部對中央機關人選問題發生的分歧。誰認清了這一情況，那他就會懂得我們爭論激烈的原因，那他也就不會對一個似是而非的矛盾表示驚異：爲什麼一些細小的枝節的意見分歧居然引起了真正重要的原則的問題。

捷依契同志在同一次會議上（見第二七七頁）發言時說得頗爲正確：『毫無疑義，這一提議是針對着目前局勢提出的』。的確，只有瞭解當時局勢底全部複雜性以後，才能瞭解爭論底真實意義。同時千萬必須注意到，當我們處於少數地位時，我們總是用任何一個歐洲社會民主黨人都認爲正當合理的那種方法來擁護少數底權利，即向代表大會請求規定對於中央機關人選的更嚴格的監督。葉哥羅夫同志在同一次代表大會上——不過是在另一次會議上——也說得頗爲正確：『使我極端驚奇的是我在辯論中又聽見有人援引原則』…（這是在代表大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論到中央委員會選舉時說的，即——我記得是如此——在星期四早晨說的，而我們現在所說的第二十六次會議則是在星期一晚上舉行的）…『看來，大家都應該明白，在最後幾天內，所有一切爭論都不是在某種原則問題週圍，而只是在究應怎樣保證或阻止某人加入中央機關的問題週圍兜圈子。我們大家應該承認，原則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早已就喪失了，我們應該把事實真相照實說出才是。（全場大笑。穆拉維也夫說：『請寫上記錄，馬爾托夫同志發笑了』）（見第三三七頁）。無怪馬爾托夫同志以及我們大家聽見葉哥羅夫同志這些實在可笑的怨言時都哈哈大笑起來。是的，『在最後幾天內』，許許多多東西都是在中央機關人選問題週圍兜圈子。這是對的。這在代表大會上確實是大家都明白的（只是現在少數派才力圖模糊這件明顯的事實）。末了，說應該把事實真相照實說出，這也是對的。可是，天老爺呵，試問這究竟與『原則喪失了』有何相干呢？須知我們所以聚集起來開代表大會，正是爲了（見第一〇頁，代表大會議事日程）

要在頭幾天內談談綱領、策略、黨章並解決相當問題，在最後幾天內（議事日程第十八項至第十九項）談談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並解決這些問題。人們把代表大會最後幾天用來為指揮棒進行鬥爭，這原是一種自然而然，並且完全正當的現象。（至於在代表大會閉會後為指揮棒打架，那却就是無謂的爭鬧了）。誰在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上遭到失敗（如葉哥羅夫同志那樣）以後來講什麼『原則喪失』，那他就不過是鬧笑話罷了。所以無怪大家都笑過葉哥羅夫同志。同樣也無怪穆拉維也夫同志當時請求把馬爾托夫同志參加這個嘻笑的事實寫到記錄上去：馬爾托夫同志笑葉哥羅夫同志，就是自己笑自己哩……

爲了補充穆拉維也夫同志所作的諷刺，也許還不妨舉出如下一件事實。大家知道，在代表大會閉會後，馬爾托夫同志到處揚言，說引起我們意見分歧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央機關補選問題；說『舊編輯部中的多數』極端反對過兩個中央機關在補選方面相互監督的辦法。在代表大會以前，馬爾托夫同志接受我關於選舉兩個三人團以及按三分之二的多數實行相互補選問題的草案時，關於此事向我寫過：『在接受這樣的相互補選形式時，應當着重指出，在代表大會以後，每個委員會人員底補充都將按稍微另外一種原則來實行（我的意見是：每個委員會在補選新委員時都要把自己的意向通知給另一個委員會；後者可以提出抗議，那時爭論就由總委員會來解決。爲避免延擱起見，這種手續必須用來處置那些已預先確定的候補人（至少是對於中央委員會應該如此作），拿這些候補人來實行補充，是會簡便一點的）。爲要着重指明將來的補選應按照黨章所規定的手續實行，必須在第二十二項*內補充一句：

*這是指我最初提出而通知過全體代表的那個大會 Tagesordnung（議事日程。——譯者）草案以及對該草案所加的說明而言。這草案第二十二項所說的正是關於選舉兩個三人團爲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和中央委員會，關於由這個六人團按三

『…所有業已成立的決定均應由它批准』』（着重點是我加的）。
這是用不着說明的。

* * *

解釋了關於中央機關補選問題進行爭論時的那個局勢底意義以後，我們就要稍微說說對於這個問題的表決；至於討論情形則不必說及，因為在我已引證過的兩個演詞——馬爾托夫同志底演詞和我自己的演詞——發表後已經只有很少幾位代表提出過一些簡短的質問了（見記錄第二七七至二八〇頁）。說到表決情形時，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硬說我在自己的敘述裏作出了一個『最大的曲解』（見同盟記錄第六〇頁），『因為他竟把當時在黨章週圍進行的鬥爭』…（馬爾托夫同志無意中說出了一個很大的真理：在黨章第一項以後，熱烈的爭論正是在黨章週圍進行的）…『描寫成了火星報對那些已同崩得結成聯盟的馬爾托夫份子進行的鬥爭』。

我們來仔細考查考查這個很有趣味的關於『最大的曲解』的問題吧。馬爾托夫同志把對於總委員會成份問題的表決與對於補選問題的表決連接起來，並舉出了八次表決：（一）由中央機關報和中央委員會各推選二人加入總委員會——贊成者二十七票（馬），反對者十六票（列），表示懷疑者七票*。（順便說說：在記錄第二七〇頁上指明表示懷疑者有八票，但這是小事情）；（二）由代表大會選舉總委員會第五個委員——贊成者二十三票（列），反對者十八票（馬），表示懷疑者七票；（三）由總委員會自行補選新委

分之二的多數來實行『相互補選』，關於由代表大會來批准這個相互補選以及關於後來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和中央委員會各自單獨實行補選的問題。

*括弧中『馬』字和『列』字，是表示我（列）和馬爾托夫（馬）當時站在哪一方面。

員來替代總委員會離職委員——反對者二十三票（馬），贊成者十六票（列），表示懷疑者十二票；（四）在補選中央委員會委員時要有一致同意——贊成者二十五票（列），反對者十九票（馬），表示懷疑者七票；（五）只要有一個說明理由的抗議時就不能實行接受委員——贊成者二十一票（列），反對者十九票（馬），表示懷疑者十一票；（六）在補選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委員時需要有一致同意——贊成者二十三票（列），反對者二十一票（馬），表示懷疑者七票；（七）允許把總委員會有權取消中央機關報和中央委員會關於不接受新委員的決議的問題提出付表決——贊成者二十五票（馬），反對者十九票（列），表示懷疑者七票；（八）關於這問題的提案本身——贊成者二十四票（馬），反對者二十三票（列），表示懷疑者四票。『這裏，——馬爾托夫同志最後說道（見同盟記錄第六一頁），——顯然有一位崩得代表投票擁護過提案，其餘的崩得代表是表示懷疑的』（着重點是我加的）。

試問，當時既沒有進行過記名表決，馬爾托夫同志究竟是根據什麼認為顯然有一位崩得份子投票擁護過他即馬爾托夫底主張呢？

原來是因為他注意到了表決人數，而當這個人數指明崩得參加過表決時，那他馬爾托夫同志就不懷疑這種參加是有利於他馬爾托夫的了。

試問我在這裏究竟作過什麼『最大的曲解』呢？

總共有五十一票，除崩得份子外只有四十六票，除工人事業社份子外只有四十三票。馬爾托夫同志所舉出的八次表決中有七次是四十三，四十一，三十九，四十四，四十，四十四和四十四個代表參加表決，有一次是四十七個代表（更正確些說，四十七票）參加表決，並且馬爾托夫同志自己承認在最後這次表決時有一位崩得份子投票擁護過他的主張。可見，馬爾托夫所描繪的（而且是描繪得很不完備的，這點我們往後就會看出）情景原來只是證實並加強我

對於鬥爭的描寫哩！原來在很多場合放棄表決的票數都是很大的：這恰巧指明整個代表大會對於某些細節的興趣是比較的少，火星份子在這些問題上沒有發生過什麼明顯的分化。馬爾托夫所說崩得份子『放棄表決顯然是幫助了列寧』一語（見同盟記錄第六二頁），恰恰是反對馬爾托夫本人的；這就是說，只有當崩得份子缺席或放棄表決時，我才間或有過獲得勝利的機會。每逢崩得份子認為值得來干預鬥爭時，他們總是幫助了馬爾托夫同志，而他們這種干預又不只是在有四十七個代表參加的那次表決中實行過哩。誰願意參考大會記錄，那他就能看出馬爾托夫同志所描繪的情景是不完備得非常奇怪的。馬爾托夫同志簡直把崩得所參加過的整整三次表決都遺漏掉了，而所有這三次表決結果當然都是馬爾托夫同志獲得勝利的。這三次就是：（一）採納佛明同志主張把標準多數從五分之四減至三分之二的修正案。贊成者二十七票，反對者二十一票（見第二七八頁），即有四十八票參加過表決。（二）通過馬爾托夫同志關於取消相互補選制的提議。贊成者二十六票，反對者二十四票（見第二七九頁），即有五十票參加過表決。末了，（三）否決我主張只有取得總委員會全體委員同意時方能補選中央機關報和中央委員會的提議（見第二八〇頁）。反對者二十七票，贊成者二十二票（甚至是記名表決，可惜這次表決在記錄中沒有保存下來），即有四十九票參加過表決。

總結：對於中央機關補選問題，崩得份子只參加過四次表決（有三次是我剛才所引證過的，其中有四十八、五十和四十九票參加，還有一次是馬爾托夫同志所引證過的，其中有四十七票參加）。所有這四次表決的結果，都是馬爾托夫同志獲得了勝利的。我的敘述原來在各方面都是正確的，無論是在指出馬爾托夫份子與崩得聯盟方面，無論是在指明問題具有比較枝節性質（在許多場合都有許多人放棄表決）方面，亦無論是在指出火星份子沒有明顯

確定的派別分立（沒有舉行過記名表決；參加討論的人數極少）方面。

馬爾托夫同志想在我的敘述中找出自相矛盾處的企圖，原來是用一種不中用的手段來幹的企圖，因為馬爾托夫同志斷章取義地摘取了單個的字句，却沒有花點氣力把全部情景重述出來。

* * *

黨章專論旅外組織問題的最後那一項，又引起了能充分表明代表大會派別分立情形的討論和表決。當時所談到的是關於承認同盟爲我黨旅外組織的問題。阿期莫夫同志當然馬上就來表示反對，叫大家記起第一次代表大會所批准的旅外聯合會，並指出這個問題具有原則的意義。『我首先應當聲明，——他說，——我並不認爲對於這個問題的某種解決法有什麼特別重大的實際意義。迄今我們黨內所進行的思想鬥爭顯然尚未結束，但它會在另一種範圍內和在另一種力量配置下繼續進行…。黨章第十三項乃是想把我們代表大會由全黨大會變爲派別大會這一傾向再度而且極爲鮮明的表現。人們並不是要俄國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爲着黨內一致來服從黨代表大會底決議，把所有的一切黨組織統一起來，而是要代表大會消減少數方面的組織，硬要少數消失不見』（見第二八一頁）。讀者從這裏可以看出，馬爾托夫同志在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上遭到失敗後極爲愛重的那種『繼承性』，原是阿期莫夫同志也極爲愛重的。然而當時在代表大會上，那些對自己 and 對他人採用不同的尺度的人却會很熱烈地表示反對阿期莫夫同志。雖然黨綱已被通過，火星報已被承認，黨章幾乎是全部被通過了，但此時終於湧現出正是一個『原則上』把同盟和聯合會分開的『原則』。『如果阿期莫夫同志想把問題放在原則基礎上來，——馬爾托夫同志高聲說道，——那我們是一點也不反對的；特別是因爲阿期莫夫同志說到了在與兩個派別鬥爭中的各種可能的勾結。我們所以要批准一種方針底勝利（請你們注意，這

是在代表大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說的咧！）並不是說要再次向着火星報恭維一下，而是說要最終辭別阿期莫夫同志所提到的所有一切可能的勾結』（見第二八二頁，着重點是我加的）。

當時的情景是：馬爾托夫同志在代表大會上一切關於綱領問題爭論已經完結以後，還在繼續最終辭別一切可能的勾結…直到他還沒有在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上遭受失敗時止！馬爾托夫同志在代表大會上『最終辭別着』他在代表大會以後第二天就很平安地實現着的那種可能的『勾結』。然而，阿期莫夫同志早在當時就已顯得要比馬爾托夫同志遠見得多；阿期莫夫同志援引了『照第一次代表大會意志負有委員會名稱的一個老大的黨組織』五年以來的工作，並以非常毒辣的預言式的警句作結：『至於說到馬爾托夫同志認定我是枉然希望我們黨內將有另外一種派別發生這一意見，那我就說，連他自己也使我有所希望哩』（見第二八三頁）。

是呀，應該承認，馬爾托夫同志確實是完全沒負阿期莫夫同志所望啊！

當一個算是作過三年工作的老舊的黨委員會底『繼承性』遭到破壞時，馬爾托夫同志就深信阿期莫夫同志有理而跟着阿期莫夫同志走去了。可見，阿期莫夫同志獲得勝利是沒有花過多大代價的呀。

可是，在代表大會上擁護過——而且一貫擁護過——阿期莫夫同志的只有馬爾丁諾夫同志，布魯克爾同志和崩得份子（八票）。身爲『中派』真正領袖的葉哥羅夫同志採取了最合意的中間立場：你看，他贊同火星份子底意見，他對火星份子表『同情』（見第二八二頁），並爲證明這種同情而建議（見二八三頁）要把當時已被提出的原則問題完全避開不說，要把同盟和聯合會都丟開不說。他的這一建議是由二十七票對十五票被否決了。顯然，除了反火星份子（八票）外，幾乎所有一切『中派』份子（十票）都和葉哥羅夫同志一起投票擁護過這一提議（參加表決的總共有四十二票，可見

當時有許多人是放棄表決，或——如在舉行沒有興趣而其結果是毫無疑義的表決時所常見的那樣——缺席的）。每逢問題是要在事實上實行火星原則時，立刻就暴露出『中派』底所謂『同情』原來只是口頭上的同情，而擁護我們的原來只有三十票或稍微超過三十票。關於魯索夫提案（承認同盟為唯一旅外組織）所舉行的辯論和表決情形，更加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反火星份子和『泥潭』已經逕直採取了原則的立場，發言擁護這一立場的有李伯爾和葉哥羅夫兩同志，他們說魯索夫同志所提出的建議是不可提付表決的一種非法的建議，因為『這一建議是要殺害其餘一切旅外組織』（葉哥羅夫語）。他既不願意參加『殺害某個組織』，所以他不僅拒絕表決，並且退出了會場。可是我們要給『中派』首領說句公道話：他表現了超過馬爾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們十倍多的確信精神（確信自己的錯誤原則）和政治勇氣，他並不只是在事關自己那個已在公開鬥爭中遭到失敗的小組時才擁護過『被殺害的』組織。

魯索夫同志底提議由二十七票對十五票認為可付表決，然後又由二十五票對十七票加以通過了。我們若把缺席的葉哥羅夫同志加到這十七票中去，結果就會得出全套（總共十八票）反火星份子和『中派』。

黨章關於旅外組織的第十三項全部條文，是只由三十一票對十二票並在六票表示懷疑下通過的。三十一票這個數目就是指明代表大會上大約有多少火星份子，即約有多少人一貫擁護並且事實上執行着火星報觀點，——這個數目，我們在分析代表大會表決情形時已經碰見過不下六次（崩得問題在議事日程上的地位，組委事件，解散『南方工人』社問題，以及關於土地綱領的兩次表決）。而馬爾托夫同志却硬要我們相信把這樣一個『狹隘的』火星派集團劃分出來是毫無根據的！

同時還要指出，在黨章第十三項通過後，立刻就因阿期莫夫和

馬爾丁諾夫兩同志聲明『拒絕參加表決』而引起了極值得注意的討論（見第二八八頁）。當時大會主席團討論了這個聲明，並完全正當地認定，甚至把聯合會乾脆實行封閉也不能使聯合會代表有任何理由拒絕參加大會工作。拒絕參加表決是絕對不近情理和絕對不可容許的，——這就是當時整個代表大會都同主席團一起主張的觀點，其中也包括有屬於少數派的火星份子，他們在第二十八次會議上還激烈指斥過他們自己後來在第三十一次會議上所幹的那種事情哩！當馬爾丁諾夫同志實行辯護自己的聲明時（見第二九一頁），起來反對他的既有帕夫洛維奇，也有托洛茨基，也有卡爾斯基，也有馬爾托夫。馬爾托夫同志特別明白意識到心懷不滿的少數份子底義務（是在他自己還沒有成爲少數以前哩！），並在講台上用特別嚴重的口吻教訓過他們。『或則你們是代表大會底成員，——他指着阿期莫夫和馬爾丁諾夫兩同志高聲說道——那你們就應該參加大會上的一切工作』（着重點是我加的；當時馬爾托夫同志還沒有覺察到少數服從多數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哩！），『或則你們不是代表大會底成員，那末你們就不能留在大會會場上…聯合會底代表們所提出的聲明使我不得不提出兩個問題：他們是不是黨員呢，是不是代表大會底成員呢？』（見第二九二頁）。

馬爾托夫同志那時還在教訓阿期莫夫同志認識黨員義務哩！可是，阿期莫夫同志那時說他對馬爾托夫同志懷有某種希望，畢竟不是枉然的…不過這種希望只是到馬爾托夫在選舉中遭到失敗以後才見諸實現罷了。當問題還沒有涉及他自己而只涉及別人時，馬爾托夫同志甚至對那第一次（我記得是如此）由馬爾丁諾夫同志運用起來的所謂『非常法令』這一嚇人字眼，也是充耳不聞的哩。『我們所得到的解釋，——馬爾丁諾夫同志回答那些勸他收回本人聲明的人們說，——並沒有解釋明白，究竟這是個原則的決定呢，還是用來對付聯合會的一種非常辦法呢。如果這是一種非常辦法，那我

們就認為這是加予聯合會的一種侮辱。葉哥羅夫同志也如我們一樣認為這是用來對付聯合會的非常法令（着重點是我加的），所以甚至於退出了會場』（見第二九五頁）。當時馬爾托夫和托洛茨基兩同志都和普列漢諾夫一起堅決反對把代表大會表決結果看作一種侮辱的荒謬思想，反對這種真正荒謬的思想；托洛茨基在擁護代表大會根據他提議通過的決議案（說阿期莫夫和馬爾丁諾夫兩同志可以認為自己已得到完滿的解釋）時聲稱，『這個決議案具有原則而非庸俗習氣的性質，所以我們決不會顧忌到有誰會因這個決議案通過而感到屈辱』（見第二九六頁）。然而不久以後的事實就證明出小組習氣和庸人觀點在我們黨內還十分濃厚，而我用着重點強調指出的那些高傲語句原來不過是些空洞響亮的辭句。

阿期莫夫和馬爾丁諾夫兩同志拒絕收回自己的聲明，並在大會代表一致說他們『真是枉然哪！』的嘆息聲下退出了代表大會。

（一三）選舉。代表大會之終結

通過黨章之後，代表大會接着又通過了關於各個區組織的決議案以及好幾個關於黨內個別組織的決議案，然後，大會進行了上面我已加以分析的關於『南方工人』社的那種很可玩味的討論之後，就轉而進行黨中央機關選舉事項。

我們已經知道，整個代表大會都曾盼望火星組織作出一個富有權威的介紹，但是火星組織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分裂，因為其中少數份子居然想在代表大會上用公開自由鬥爭手段來試圖爭得多數。同時我們還知道，早在代表大會很久以前以及在代表大會上，全體代表都曉得關於經過選出兩個三人團為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和中央委員會來刷新編輯部的計劃。為了闡明代表大會上的討論情形起見，我們且把這個計劃詳細分析一下。

我在代表大會 Tagesordnung 草案上加了一段說明這個計劃的註

釋，其原文是如下述*：『代表大會選出三個人爲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委員並選出三個人爲中央委員會委員。在有必要時，這六個人得按三分之二的多數共同用補選方法補充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和中央委員會成份，並向代表大會作相當的報告。在代表大會批准這個報告以後，將來的補選就由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和中央委員會各自單獨實行』。

從這個註釋中可以十分肯定明確地認識上項計劃底內容是：由最有威信的實際工作領導者參加來實行刷新編輯部。該計劃所包含的這兩個特點，是每一個願意稍微仔細留心閱讀上述文句的人都能立刻看出的。可是，在現今這個時候，就連最粗淺的道理也得加以解釋哩。該計劃底內容正是說要刷新編輯部，並不是一定要擴大，也不是一定要縮減其委員人數，而正是要加以刷新，因爲關於可能擴大或可能縮減的問題是個尚未解決的問題：補選是只預定在有必要時才實行的。在每人關於這種刷新問題所說出的種種假設中，也曾有人預定可能把編輯部委員人數縮小或把它擴大到七個人（我個人向來都認爲七人團要比六人團適當得多）以至於擴大到十一個人（我曾認爲這在我們同一切社會民主主義組織，特別是同崩得以及波蘭社會民主黨和平聯合的情形下，是可以實行的）。但最主要而爲談論『三人團』的人們所通常忽略的一點，却是關於要中央委員會委員參加解決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將來補選問題的要求。『少數』方面所有身爲本組織中的成員並以代表資格出席代表大會的同志，都曾知道並擁護過這個計劃（有些人是用特別表示贊同的方式，有些人是用緘默方式表示贊成這個計劃），但他們中間誰也沒有費過一點氣力來說明這種要求底意義。第一，爲什麼正是要把三人團並且只是把三人團當作刷新編輯部的出發點呢？顯然，如果提出這一計劃的用意完全是或主要是要擴大委員會，如果當時大家都認爲這

*見我致火星報編輯部的信第五頁並見同盟記錄第五三頁。

個委員會是個真正『協和的』集體，那末上項計劃就會根本沒有什麼意思了。在實行擴大一個『協和的』委員會時不以這個委員會底全體人員爲出發點，而只是以其中某一部分人員爲出發點，那就未免很奇怪了。顯然，並非這委員會中所有的一切委員都被承認爲完全合格來討論和解決刷新這委員會成份的問題，亦即將舊編輯員小組變爲黨機關的問題。顯然，當時甚至那些想用擴大辦法來進行刷新的人也承認舊有成份是不協和的，也承認舊有成份是不合於黨機關底理想的，否則就會沒有什麼必要來爲擴大六人團而先把六人團縮減爲三人團了。我再重複說一遍：這原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因爲問題暫被『個人意氣』所蒙蔽的關係，才使人們忘記了這一點。

第二，從上面所引述的那段文句中可以看出，即令有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三個委員一致同意，也還是不能逕直實行擴大三人團。這點也是人們常常忽略的。爲了實行補選，需要有六人中三分之二的票數表示同意，即需要四票表示同意；這就是說，只要中央委員會三個當選委員說個「veto」時，編委三人團就根本不能實行擴大了。反過來說，即令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三個委員中有兩人反對實行補選，而補選還是能在中央委員會所有三個委員表示同意的場合實現的。所以很明顯的，當時的用意是要讓那些由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實際工作領導者在變舊時小組爲黨機關這點上表現決定的作用。至於我們當時大致提出的究竟是哪些同志，那末這從如下一件事實中便可看出：編輯部在代表大會以前曾一致選舉帕夫洛維奇同志爲編輯部中第七個委員，使他在代表大會上遇有必要時能用編委名義表示意見；除帕夫洛維奇同志而外，又有火星組織中一個擔任組委委員的老組員曾被提出充任第七個委員，這個老組員後來是當選爲中央委員會委員了的。

這樣，選出兩個三人團的計劃顯然是打算要：（一）刷新編輯部，（二）把編輯部裏某些爲黨機關所不宜有的舊時小組習氣特點

剷除掉（假如沒有什麼東西需要剷除，那就根本用不着籌劃出始初的三人團了！），最後，（三）剷除這個著作家集體底『神權』特點（剷除之法就是吸收卓越的實際工作者來參加解決廣大三人團問題）。這一交給全體編輯員看過的計劃，顯然是依據於三年來的工作經驗並完全適合於我們所一貫實行的革命組織原則：在火星報出台活動的那個離散時代，各個團體往往是偶然和自發地形成起來的，所以它們不免帶有某些有害的小組習氣的色彩。建黨一舉就是預定剷除這種特點並且需要剷除這種特點；吸收卓越的實際工作者來參加這種剷除工作是必要的，因為編輯部中有些委員始終擔任過組織方面的事務，並且編輯部加入黨機關系統中去不應當只是個著作家的集體，而應當是個政治領導者的集體。至於讓代表大會選定始初的三人團，這從火星報歷來政策方面來看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極為慎重地籌備了代表大會，等候大家完全明白認識綱領、策略和組織方面的原則爭論問題；我們未曾懷疑到代表大會一定會是個火星主義的代表大會，即絕大多數代表在這些基本問題上一定會是意見一致（這是承認火星報為領導機關報的決議案也相當證實了的）。所以我們應該讓那些擔負了散佈火星報思想並準備把火星報變成爲黨這全部工作重擔的同志們自己去決定，究竟誰是最適宜於加入新的黨機關中去的候選人。只是因爲『兩個三人團』計劃完全是個理所當然的計劃，只是因爲這個計劃完全適合於火星報底全部政策和完全適合於多少熟悉事情者關於火星報所知道的一切，所以這個計劃才博得了大家一致的贊同，並沒有碰到過任何一個同它競爭的計劃。

所以，魯索夫同志在代表大會上首先就提議選出兩個三人團。雖然馬爾托夫曾用書面通知過我們，說這個計劃是與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有聯繫，但那些擁護馬爾托夫的人却連想也沒有想到要把關於六人團和三人團問題的爭論移到這個罪名是否正確的問題上去。

他們中間誰也沒有開口提到這一點！他們中間誰也沒有敢於絲毫說到那些與六人團和三人團相連的種種色彩底原則區別。他們寧願採取更流行更便宜的手段——意氣用事，說什麼可能令人感到屈辱，並裝模作樣說編輯部問題已因任命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而被解決了。後面這一由科爾鑿夫同志提出來反對魯索夫同志的論據，是簡直虛偽的。在代表大會議事日程上規定有——當然不是偶然規定有——兩個單獨事項（見記錄第一〇頁）：第四項是『黨中央機關報』，第十八項是『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底選舉』。這是第一。第二，在任命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時，全體代表都曾堅決聲明，說這還不是批准編輯部而只是批准一定的方向*，誰也沒有抗議過這種聲明。

因此，認定代表大會批准一定的機關報其實也就批准了編輯部這一說法，即少數派方面的人所重複過許多次（科爾鑿夫，見第三二一頁，坡薩多夫斯基，見同上頁，頗坡夫，見第三二二頁，以及其他許多人）的說法，是根本不符事實的。這是誰都看得明白的手腕，人們玩弄這種手段是要把他們背棄自己在大家都還能真正大公無私地看待中央機關人選問題時所採取過的那種立場的行為掩蓋起來。這種行為決不能用原則動機來辯白（因為少數派明知在代表大

*參看記錄第一四〇頁：阿期莫夫發言稱『…據說我們將把中央機關報選舉問題留在末尾去講』；穆拉維也夫發言反駁阿期莫夫，說阿期莫夫『對於未來的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問題極為關心』（見第一四一頁）；帕夫洛維奇發言稱，我們既任命了機關報，也就得到了『我們所能藉以施行阿期莫夫同志所關懷的那些手術的具體材料』，至於火星報應該『服從』『黨底決議』，那是不能有任何懷疑的（見第一四二頁）；托洛茨基發言稱，『既然我們不是批准編輯部，那我們究竟是批准火星報中的什麼東西呢？…我們不是批准名稱而是批准方向…，不是批准名稱而是批准組織』（見第一四二頁）；馬爾丁諾夫發言稱，『…我——也如其他許多同志一樣——認為我們現在討論關於承認代表一定方向的火星報為我們中央機關報的問題時，不應當涉及究應如何選舉或批准其編輯部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在往後輪到議事日程相當事項時就會講到的』…（見第一四三頁）。

會上提起『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問題，是於自己很不利的，所以他們也就沒有開口提到這點），也不能用援引關於六人團或三人團真正工作能力的事實材料來辯白（因為只要一涉及這些材料，就會給出無數種反對少數派的證據）。所以他們也就只好用所謂『嚴密的整體』，『協和的集體』，『嚴密而如結晶般完整的整體』等等辭藻來堵塞。無怪乎這些論據立刻就被人照實稱呼爲『無聊的語句』（見第三二八頁）。三人團計劃本身就是顯然證明『協和性』不夠，而代表們在一個月以上的共同工作中獲得的印象又顯然給予了他們以獨立判斷問題的大批材料。當時坡薩多夫斯基同志暗示到這種材料（這從他的觀點看來是由於出言不慎和未加思索的結果：見第三二一頁和第三二五頁，那裏他說他是『有條件地』使用了『粗刺』一語），於是穆拉維也夫同志就直截了當地說道：『我認爲現在代表大會上的多數已十分明白，這樣的*粗刺無疑是存在着的』（見第三二一頁）。當時少數派寧願把『粗刺』一語（此語並不是由穆拉維也夫而是由坡薩多夫斯基初次採用起來的）瞭解爲僅僅是涉及個人關係的東西，不敢接受穆拉維也夫同志所發出的挑戰書，不敢按問題實質提出任何一種理由來擁護六人團。結果就弄出了一種徒勞得極端可笑的爭論：多數派（以穆拉維也夫同志爲代言人）聲明，說他們十分明白六人團和三人團底真實意義，而少數派却根本不願聽到這一點，硬說『我們沒有可能來從事分析』。多數派不僅認爲可能從事分析，而且已經『在從事分析』，並說這種分析已有他們看得十分明白的結果。少數派大概是害怕分析，所以他們就

*坡薩多夫斯基同志所指的究竟是什麼『粗刺』，我們在代表大會上始終沒有知道。穆拉維也夫同志却在同一次會議上（見第三二二頁）提出過抗議，說人家把他的思想轉述得不正確，爾後他在批准記錄時又直截了當地聲明，說他『所講的是在代表大會討論各種問題時暴露出來的粗刺，這是原則性質的粗刺，目前有這些粗刺存在，可惜已是誰也不會來否認的事實』（見第三五三頁）。

用一些『無聊的語句』來掩蓋自己。多數派勸人『注意到，我們的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不只是個著作家的集體』，多數派『希望，當選來主持中央機關報的都是些完全確定並為代表大會所知悉的人物，即符合於我所說過的那些要求的人物』（即符合於不祇是對著作家提出的那些要求的人物，見第三二七頁，蘭格同志底演詞）。少數派又不敢接受挑戰書，絲毫沒有說明它究竟認為誰適宜於參加不祇是個著作家集團的委員會，究竟誰是『完全確定並為代表大會所知悉的』人物。少數派仍舊以所謂『協和性』為護符。不僅如此。少數派甚至運用原則上絕對不正確，因而引起了公正嚴厲回擊的那些理由來作論據，如說『代表大會既沒有道德權利，又沒有政治權利來改變編輯部』（托洛茨基語，見第三二六頁）；說『這是一個很碍難的（sic!）問題』（也是他所說的話）；說『那些落選的編輯部委員又應怎樣對待代表大會不願意把他們留在編輯部內的事實呢？』（察列夫語，見第三二四頁）*。

這樣的理由已是把問題完全移到哀憐和侮辱方面去，這樣就是公開承認他們在真正原則的論證上，在真正政治的論證上遭到了破產。多數派立刻就用適得其當的字眼——庸人觀點——來表徵這種問題提法（魯索夫同志）。『從一個革命家口中——魯索夫同志很公允地指出——居然說出了這樣一些根本與黨工作概念相反，根本與黨道德概念相反的奇怪言論。反對選舉三人團的那些人所持的基本理由是歸結於以純粹庸人觀點來看待黨的事務』（所有的着重點都是我加的）…『我們如果站上這個不是黨性而是庸人的觀點，那我們在每次選舉時都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不選舉甲而選舉乙，那末甲不會表示生氣麼；如果我們不選舉組委某某委員而選

*請參看坡薩多夫斯基同志底演詞：『…如果你們從舊編輯部六個人當中選出三個人，那你們就是認為其餘三個人都是用不着的，都是多餘的。而你們這樣作，是既無權利，又無根據的』。

舉另一個人爲中央委員會委員，那末組委某某委員不會表示生氣麼。同志們，這會把我們引到什麼地步呢？如果我們集聚到這裏來不是爲了說些相互捧場的言辭，不是爲了表示庸人情誼而是爲了建立黨，那我們就絕對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我們既然必須選出負責人員，那末這裏也就完全談不到什麼對於某個落選者不信任的問題，而只能談到對於事業是否有益和當選人是否適合於他所被選舉來擔任的職務的問題』（見第三二五頁）。

每一個願意獨立認識使黨陷於分裂的原因並在代表大會上探出這個分裂根源的人，都應該把魯索夫同志底演詞閱讀和熟讀一番，而魯索夫同志所提出的理由不僅是少數派沒有推翻，並且是他們沒有抗辯過的。這樣起碼的初步的真理原是無法抗辯的；魯索夫同志自己已很公允地指出過，說人們之所以忘記這種真理，不過是由於『神經激發』罷了。這樣來說明少數派怎樣能從黨性觀點滑到庸人觀點和小組習氣觀點上去，確實是最不會使少數派感覺不快的*。

*馬爾托夫同志在其成嚴狀況中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實與他對於自己所涉及的其他種種問題的態度一樣。他並沒有費點氣力來把這次爭論情形作一完整的敘述。他居然迴避了在這次爭論中湧現出來的唯一的真正原則的問題：是專講庸人情誼還是選擇負責人員呢？是黨性觀點還是免使某某人生氣呢？馬爾托夫同志在這裏也只局限於從整個事變中隨便取出一些單獨的沒有聯繫的片段，並且還加上許多用來攻擊我的譏罵語句。馬爾托夫同志，這是有點不夠的呀！

馬爾托夫同志特別拿來向我搗亂的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麼代表大會上沒有選舉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和斯塔羅維爾三同志。他所站上的那種庸人觀點使他看不出這種問題不體面的地方（爲什麼他不去質問自己編輯部中的同事普列漢諾夫同志呢？）。他硬說我有自相矛盾之處，理由是說我一面認爲少數派在代表大會上對於六人團問題的行爲『不合宜』，同時又要求全黨公論。其實這裏並沒有什麼自相矛盾之處，馬爾托夫同志若願意花點氣力把問題底全部經過拿來作一個首尾一貫的敘述，而不只是敘述問題底個別片段，那他自己也能認識這點的。用庸人觀點處置問題，意氣用事，這當然是不合宜的；而爲全黨公論辦法着想，却必須按實質來估計六人團究竟有什麼優越於三人團的地方，估計負責職務候選人，估計各種色彩，但少數派在代表大會上却連提也沒有提到這點。

可是，少數派根本無法找出一種合理切實的理由來反對選舉，所以他們除了把庸人觀點滲進黨的事業中來而外，還公然採取了一種簡直是無謂爭鬧的手段。例如，顏坡夫同志勸穆拉維也夫同志『不要担承碼難的委託』（見第三二二頁），他這種手段豈不是只能稱為無理取鬧的手段麼？這豈不是正如索羅金同志很公允地指出過的那樣『籠絡人心』麼？（見第三二八頁）這豈不正是在缺乏政治理由時希望利用『個人意氣』麼？索羅金同志所說『我們向來都反對這種手段』一語，是不是說得正確呢？『難道捷依契同志公然企圖把那些不同意於他的同志們釘上恥辱牌的這種行為是可以容許的麼？』*（見第三二八頁）。

馬爾托夫同志只要仔細看看記錄，就會知道代表們在發言中提出過許多反對六人團的理由。試從這些演詞中摘出幾段來看看吧：第一，舊六人團中間顯然含有原則色彩方面的粗刺；第二，最好是把編輯工作技術手續簡單化一點；第三，事業利益高於庸人情誼；只有實行選擇才可保證當選人適合於他們所應擔任的職務；第四，決不可限制代表大會選擇人員的自由；第五，黨現時所需要的中央機關報不應該是個著作家的團體，中央機關報裏不僅需要著作家，而且需要行政人員；第六，中央機關報裏應該有完全確定並為代表大會所知悉的人物；第七，六個人組成的委員會往往顯得沒有工作能力，它的工作並不是賴有一個不合常態的章程，而是不管有這個章程而見諸實現的；第八，辦報工作是黨的（而不是小組的）事業等等。如果馬爾托夫同志對於六人團沒有當選的原因問題很感興趣，那末就請他細心思索這些理由中的每一個理由，並把其中某一個——那怕是一個——理由駁倒下去吧。

*索羅金同志在同一次會議上是把捷依契同志底語句瞭解成這樣的（參看第三二四頁——『與奧爾洛夫進行的激烈對話』）。捷依契同志解釋說（見第三五一頁），他『根本沒有講過類似這樣的話』，但他自己却又立刻承認說他講過一種非常『類似這樣的話』。『我並沒有說看誰敢這樣去作，——捷依契同志解釋道，——而只是說過：我很想看看究竟是哪些人敢（sic! 捷依契同志越說越糟地自行更正！）擁護像選舉三人團這樣罪惡的（sic!）提議』（見第三五一頁）。捷依契同志不是駁倒，而是證實了索羅金同志所說的話。捷依契同志證實了索羅金同志所說『這裏』（在少數派擁護六人團的理由中）『是把所有的概念都混淆起來了』的責備。捷依契同志證實了索羅金同志提醒大家要記着『我們既是黨員，就應當處處依

現在我們就要把大會對於編輯部問題的討論情形作一個總結。少數派沒能駁倒（而且根本沒有駁斥過）多數派再三援引過的事實，即三人團計劃是代表們在大會最初時候並且在大會以前已經知道了的，因此這個計劃所根據的那些計較和情由是與代表大會上所發生的事變和爭論無關的。少數派在擁護六人團時採取了原則上不正確和不可容許的專從庸人計較出發的立場。少數派暴露自己完全忘記了對於選舉負責人員問題的黨性觀點，甚至絲毫沒有實行去估計每個負責職務候選人以及這個候選人是否適合於該種職務。少數派始終迴避切實討論問題，却一味援引所謂協和性，『流眼淚』和『發脾氣』（見第三二七頁，蘭格底演詞），似乎『有人想要殺害』某某人。少數派甚至不惜採取『籠絡人心』，叫喊說選舉是『罪惡』以及諸如此類不可容許的手段，而這都是由於『神經激發』的結果（見第三二五頁）。

庸人習氣對黨性作鬥爭，最壞的『個人意氣』對政治的計較作鬥爭，無聊的語句對起碼的革命職責觀念作鬥爭——這就是我們代表大會第三十次會議上因六人團和三人團問題而發生的那種鬥爭底實質。

在第三十一次會議上，當代表大會已由十九票多數對十七票並在三票表示懷疑下否決了批准舊編輯部全體人員的提議（見第三三〇頁和刊誤），而舊編輯員們已回到會場上來時，馬爾托夫同志在他『代表舊編輯部多數提出的聲明』中（見第三三〇至三三一頁）又更厲害地表現了他那種政治立場和政治觀念底動搖性和不穩定性。讓我們把這篇集體聲明和我對此聲明的答覆（見第三三二至三三三頁）逐條詳細分析一下吧。

『從今日起，——馬爾托夫同志在舊編輯部未被批准以後說

據政治上的理由』這一起碼真理是完全適當的。叫喊說實行選舉是種罪惡行爲，那就不只是墮落到庸人觀點，並且簡直是墮落到無理取鬧地步了！

道，——舊火星報已停止存在了，所以把它的名稱改變一下，也許更爲一貫些。無論如何，我們總認爲代表大會新通過的決議大大縮小了它在初頭一次會議上對火星報所表示的信任』。

馬爾托夫同志和他的同僚提出了在許多方面確實值得注意和值得玩味的政治一貫性問題。我已經援引過大家在批准火星報時所說的那些話來回答了這一點（見記錄第三四九頁，參看上面第八二頁）*。毫無疑義，我們在這裏看見的是把政治不一貫性表現得最爲明顯的一件事實；至於表現出這種不一貫性的究竟是代表大會底多數還是舊編輯部底多數，那末我們且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吧。同時，我們還要讓讀者自己去解決馬爾托夫同志及其同僚提得適時的其他兩個問題：第一，想要把代表大會實行選擇負責人員加入中央機關報編輯部的決定看作『縮小對火星報所表示的信任』，——這究竟是庸人觀點還是黨性觀點呢？第二，舊火星報究竟是從什麼時候真正停止存在的呢：是從我和普列漢諾夫兩人開始編輯其第四十六期的時候起呢，還是從舊編輯部多數開始編輯其第五十三期的時候起呢？如果說前一問題是個極值得注意的原則問題，那末後一問題就是個極值得注意的事實問題。

『既然現在已經決定——馬爾托夫同志繼續說道——要選定三個人所構成的編委，所以我就要用本人和其他三個同志名義提出聲明，我們當中誰也不會去參加這樣一個新編輯部。至於說到我個人，那我就補充說：假若某些同志真想把我的名字當作一個候選人列入這個『三人團』，那我就應當把這件事情看作是我所不應受到的侮辱（sic!）。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注意到決定改變編輯部時所發生的那種情形。據說這樣決定是因為存在有什麼『磨擦』**，是因為舊編輯部沒有工作能力，可是代表大會按一定意義解決這個問

*見本卷第四五二至四五三頁。——編者。

**馬爾托夫同志大概是指波薩多夫斯基同志所用過的『粗刺』一語而言。我重複說一遍波薩多夫斯基同志始終沒有向代表大會解釋他想說的究竟是什麼，而同樣

題的時候，並沒有向編輯部詢問這種磨擦，甚至沒有指定一個專門委員會來提出關於它的工作能力問題』…（真奇怪，少數派當中誰也沒會想到要向代表大會建議『向編輯部詢問』或指定專門委員會！是不是由於這在火星組織分裂以後以及在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兩同志寫信說過的那次談判無效以後已經沒有益處了麼？）…『在這樣的情形下，我不能不把某些同志以為我會同意在這樣改組了的編輯部中工作的推測看作是有傷本人政治名聲的一種舉動』…*

我故意把這段議論完全摘錄出來，是想使讀者知道在代表大會以後極為盛行的一種行為底標本和開端，而這種行為是只能叫作無謂爭鬧的。我在我致火星報編輯部的信中已經使用過這個名詞，並且不管編輯部怎樣感覺不滿，我都不得不來重複使用它，因為它無

運用過這個字眼的穆拉維也夫同志却解釋過，說他所指的就是在代表大會討論中所表現出來的那些原則性的粗刺。讀者一定記得有四個編輯員（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和我）參加過的唯一真正原則性的討論乃是關於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的討論，一定記得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兩同志曾用書面訴苦說人們把『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當作『改變』編輯部底理由之一。馬爾托夫同志在這封書信中曾認為『機會主義』與改變編輯部的計劃間有顯然的聯繫，而他在代表大會上却祇是作過一些關於『什麼磨擦』的含糊暗示。關於『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他却已經忘掉了！

*馬爾托夫同志還補充說：『這樣的角色恐怕只有梁贊諾夫才會同意來扮演吧，至於你們想必按他的工作而知道他的那個馬爾托夫，却是決不會同意來扮演這種角色的』。既然這是加予梁贊諾夫的一種個人攻擊，於是馬爾托夫同志也就把這一聲明收回了。可是，梁贊諾夫之所以在代表大會上被當作一個普通名詞來用，並不是因為大家注意到了他的某些個人品質（這些個人品質是不宜涉及的），而是因為大家注意到了『鬥爭』社底政治面目，注意到了『鬥爭』社底政治錯誤。馬爾托夫同志收回他所臆想的或他確實加予了的個人侮辱，原是做得很好的，然而決不應因此忘記那些應使黨受到教訓的政治錯誤。『鬥爭』社在我們代表大會上受到指斥是因為它引起了『組織上的混亂』和『不是很據原則理由造成的零散狀態』（見第三八頁，馬爾托夫同志底演詞）。這樣的政治行為不僅在黨代表大會以前，在普遍混亂時期，當它還是在一個小團體中表現出來的時候絕對應該受到指斥，而且在黨代表大會以後，在混亂狀態肅清時期，即令是由『火星報編輯部多數和『勞動解放』社多數』方面表現出來的時候也絕對應該受到指斥。

疑是個用得正確的名詞。有人以為無謂爭鬧一定是出於『卑鄙的動機』（如新火星報編輯部所推論的那樣），但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凡稍許熟悉我們的放逐生活和僑外生活的革命家，都一定會看見過數十百次無謂爭鬧的事實，當時由於『神經激發』以及由於不合常態的腐臭生活條件，人們往往提出並咀嚼着一些最荒謬的責難，猜疑，自責，『個人意氣』等等。不管這種無謂爭鬧表現得如何卑鄙，但沒有一個明白事理的人竟會一定要在這些無謂爭鬧中去尋找卑鄙的動機。只有『神經激發』狀態才可以解釋馬爾托夫同志演詞中的上述那段言論，即將荒唐觀念、個人意氣、幻想出來的恐怖、籠絡人心的行爲、矯揉造作的侮辱和玷污等混成一團糟的言論。腐臭的生活條件在我們這裏產生着成百數的這樣的無謂爭鬧，而一個政黨若不敢照實說出自己的疾病，開出嚴酷的診斷單和找出治療的藥方，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

如果從這一團糟中可以分出某種原則性的東西，那就不免要得出一個結論：『實行選舉是與侮辱政治名聲毫不相干的』，『否認代表大會有權實行新選舉，有權隨便變更負責人員成份，有權改選它自己所委任的委員會』，那就會是把問題弄得混亂不清，而『馬爾托夫同志對於可否從舊委員會中只選舉一部分委員問題的觀點，也就是表明他把政治概念混淆到極點了』（這是我在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見第三三二頁）。

現在我不談及馬爾托夫同志對於三人團計劃究竟由誰提出的這一問題所作的『個人』評論，而只談談他對於舊編輯部沒被批准這一事實所作的『政治』估計：『…現在所發生的事件乃是代表大會後半期內進行的那個鬥爭底最後一幕』…（對呵！但這後半期是從馬爾托夫在黨章第一項問題上陷落到阿期莫夫同志牢籠的時候開始的）…『誰也知道，實行這種改良時所注意到的並不是『工作能力』，而是爭取對於中央委員會的影響』…（第一，誰都知道，當

時既注意到工作能力，又注意到中央委員會成份問題所引起的意見分歧，因為『改良』計劃是在還根本談不到後一種意見分歧，而我們還與馬爾托夫同志一起選出帕夫洛維奇同志為編委第七個委員時提出的！第二，我們已根據證據確鑿的材料指明，當時的問題是關係於中央委員會底人選，當時的問題 *à la fin des fins* * 是歸結於兩個不同的名單：一個名單是格列波夫—特拉文斯基—頗坡夫，另一個名單是格列波夫—托洛茨基—頗坡夫）…『編輯部底多數已表明他們不願把中央委員會變為編輯部底工具』…（又唱起阿期莫夫式的調子來了：問題是在每一個黨代表大會上的每一多數始終和到處都要努力爭取影響，以期在中央機關中爭得多數而把這種影響鞏固起來，但人們却把這個問題轉移到機會主義的謠言範圍中去，說什麼編輯部底『工具』，說什麼編輯部底『簡單附屬物』，如又是這馬爾托夫同志在較晚一些時候所說的那樣，見第三三四頁）…『所以也就必須縮減編輯部委員人數（11）。因此我也就不能加入這樣一個編輯部』…（請仔細看看這『因此』二字：編輯部什麼時候才能把中央委員會變為附屬物或工具呢？豈不是只有當編輯部在總委員會內擁有三票並來濫用這一優勢的時候麼？這難道不是很明顯麼？同樣，當選為第三個委員的馬爾托夫同志可能隨時阻止任何濫用職權的事情，並以自己的一票來消滅編輯部在總委員會內的任何優勢，——這難道不也是很明顯麼？所以問題正是歸結於中央委員會底人選，而關於工具和附屬物的說法却原來不過是一種謊言）…『我與舊編輯部底多數是以為代表大會將會結束黨內『戒嚴狀況』而奠定黨內常態秩序的。誰知用非常法令反對個別團體的這種戒嚴狀況還是繼續下去，並且更加尖銳了。只有在保存舊編輯部全體人員成份時，我們才能担保編輯部根據黨章所享有的那些權利不會使黨受到危害』…

*意即『歸根到底』。——譯者。

以上就是馬爾托夫同志第一次提出所謂『戒嚴狀況』口號的那段言論底全文。現在就請看看我所給他的回答：

『…雖然我反對馬爾托夫所說兩個三人團計劃帶有私人性質這一意見，但我並不反對馬爾托夫認定我們不批准舊編輯部是我們所實行的一個有『政治意義』的步驟的斷語。恰巧相反，我完全和絕對同意馬爾托夫同志說這個步驟有巨大的政治意義，——不過不是馬爾托夫所賦予它的那種政治意義罷了。他說，這是爲爭取對於俄國境內中央委員會的影響而鬥爭的一幕。我還要比馬爾托夫更進一步。火星報迄今以個別團體資格進行的全部活動都是爲爭取影響的鬥爭，但現在的問題已經更進了一步，已經是要在組織上鞏固這種影響，而並不只是爲爭取這種影響而鬥爭了。這裏我與馬爾托夫同志在政治上有極深刻的分歧，證據就是馬爾托夫同志認爲這樣想影響中央委員會是我的罪過，而我却認爲我過去和現在力求用組織辦法鞏固這種影響是我的功勞。原來我們甚至是在各講各的話哩。如果我們的全部工作，我們的一切努力結果仍然是照舊爲爭取影響而鬥爭，而不是完全獲得和鞏固這種影響，那我們的全部工作，我們的一切努力又有什麼意思呢？是的，馬爾托夫同志說得完全對：我們所採取了的步驟無疑是個具有巨大政治意義的步驟，它證明我們選定了現在已經確定的方向之一來做我黨今後工作底方向。所謂『黨內戒嚴狀況』，所謂『專爲對付個別份子和個別團體而施行的非常法令』等等嚇人字眼，是絲毫也恐嚇不了我的。對於那些不穩定的和動搖的份子，我們不僅可以並且應該造成一種『戒嚴狀況』，而我們的全部黨章，我們現在已由代表大會所批准的全部集中制，也就是爲對付許多政治模糊性泉源而造成的『戒嚴狀況』。爲要對付這種模糊性，我們正是需要有一個特別和甚至帶非常性的法令，而代表大會所已實

行的步驟既然爲這樣的法令和這樣的辦法建立了堅固的基礎，也就是正確地規定了政治方向』。

我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這篇演說詞撮要中由我用着重點指出的一句話，是馬爾托夫同志在其戒嚴狀況中（見第一六頁）故意刪去了的。他不喜歡這一句話和不願意瞭解這一句話底明顯意義，原是毫不足怪的。

馬爾托夫同志，『嚇人字眼』一語究竟是意味着什麼呢？

就是意味着嘲笑，嘲笑那些小題大做的人，嘲笑那些用瞎吹的空話來混亂簡單問題的人。

唯一的一件可能引起而且確實引起了馬爾托夫同志『神經激發』狀態的細小簡單事實，就是馬爾托夫同志在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機關入選問題遭到失敗的事實。這件簡單事實底政治意義，是在於黨代表大會上的多數獲得勝利後就實行來鞏固自己所爭得的影響，其方法就是極力使自己在黨領導機關中也佔得多數，建立起一種組織基礎，以期根據黨章去打破凡爲這個多數所認作是動搖性，不穩定性和模糊性的一切*。在此場合用一種目瞪口呆的恐怖神情來說什麼『爭取影響的鬥爭』並訴說什麼『戒嚴狀況』，那就不過是瞎吹的空話，嚇人的字眼了。

馬爾托夫同志不同意這點麼？那末我們就要問問他，天下是否有過這麼一次黨代表大會，是否一般可以設想出這樣一次黨代表大會，說是這次代表大會上的多數竟會不努力（一）使自己在中央機關中佔得多數並（二）使這個多數擁有麻痺動搖性、不穩定性和模糊性的權力來鞏固已奪得的影響呢？

*火星少數派底不穩定性，動搖性和模糊性在代表大會上的表現是什麼呢？第一，是他們在黨章第一項問題上說出一些機會主義辭句；第二，是他們與阿期莫夫同志以及李伯爾同志結成聯盟，這種聯盟在代表大會後半期是增長得很快的；第三，是他們居然把選擇中央機關級負責人員的問題降低到一味表現庸人習氣，專說無聊話，以至於實行籠絡人心的地步。在代表大會以後，所有這些可愛的品質更是變本加厲了。

臨到進行選舉的時候，我們代表大會會必須解決一個問題：究竟是把中央機關報和中央委員會內三分之一的票數給予黨的多數還是給予黨的少數呢？保留六人團和通過馬爾托夫同志所提出的名單，就是給予我們三分之一的位置而給予馬爾托夫同志方面的人三分之二的地位。選舉三人團為中央機關報委員和通過我們所提出的名單，就是給予我們三分之二的地位而給予馬爾托夫同志方面的人三分之一的位置。馬爾托夫同志拒絕同我們實行妥協或向我們實行讓步並用書面挑動我們到代表大會面前去進行戰爭，而當他已在代表大會面前遭到失敗時，他就啼哭並訴說起什麼『戒嚴狀況』來了！難道這不是無謂爭鬧麼？難道這不又是智識份子動蕩性底表現麼？

說到這裏，不能不記起考茨基不久前對於這種智識份子動蕩性所給予的一種燦爛的社會心理學的估計。現在各國社會民主黨都往往患有同樣的病症，我們向更有經驗的同志們學習正確的診斷和正確的醫治方法是很有益處的。所以，我們引證考茨基對於某些智識份子的估計，也就不過是似是而非地離開本題罷了。

『…現在關於智識界* 與無產階級間的對抗問題又使我們極感興趣了。我的同僚們』（考茨基本人是個智識份子，著作家和編輯員）『一定會往往因我承認有這種對抗而表示憤慨的。但這種對抗却是一件確實存在的事實，企圖（在這裏也如在其他場合一樣）用否認事實的辦法來搪塞這種對抗，那就未免是極不適當的策略了。這種對抗是表現於階級而不是表現於個別人物上的社會對抗。個別的資本家和個別的智識份子是不可能完全加入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當有這種情形的場合，智識份子也就會改變了自己的性質。我在往後敘述中所說到的主

*我把德文 Literat, Literatentum 一語譯為智識份子或智識界，因為德文 Literat, Literatentum 一語不只是包括有著作家，而且包括有一切受過教育的人，一般所謂自由職業者，別於體力勞動者的智力勞動者（即英國人所謂 brain worker）。

要並不是這種迄今還是自己階級中的一種例外的智識份子。在往後的敘述中，如果沒有特別的附帶說明，那我就只是把智識份子一語瞭解爲普通的智識份子，他們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爲立腳點並且是智識份子階級底標本代表。這個階級是與無產階級有相當對抗的。

這種對抗與勞資對抗不同。智識份子並不是資本家。雖然他的生活水準是資產階級式的，並且他在尚未變成流民時不得不維持這種水準，但同時他又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產物並且往往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往往遭受資本家方面的剝削和某種社會賤視。所以，智識份子與無產階級在經濟上是沒有什麼對抗的。但它的生活狀況和勞動條件却是非無產階級的，因此在心理方面和思想方面也就有相當的對抗。

無產者在他還是一種孤立的個體時是沒有什麼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進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願望，都是從組織中，從他與同志們的有計劃的共同活動中汲取的。當他組成爲偉大而強有力的機體一部分時，它就覺得自己是偉大而強有力的了。在他看來，這個機體就是一切，而單獨的個體與這個機體相較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無產者以最大的自我犧牲精神，以無名大眾底細胞資格——毫不計較個人利益，毫不圖謀個人榮譽——進行着鬥爭，他在所被指定的任何崗位上都履行着自己的職責，自願服從那浸透其全部感覺，浸透其全部思維的紀律。

智識份子却完全不是如此。他並不是以這樣或那樣運用實力來進行鬥爭，而是利用論據來進行鬥爭的。他所用的武器就是他個人的智識，他個人的能力，他個人的信念。他只有憑靠自己個人的品質，才可獲得相當的意義。因此，在他看來，表現本人個性的完全自由乃是順利工作底首要條件。他作爲某個

整體底服屬部分資格服從這個整體是很勉強的，是迫於必要而不是出於本人意願來服從的。他認為紀律只有羣衆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則是不必遵守紀律的。至於他自己，那他當然是把自己列入上等人物的…

…尼采底哲學及其崇拜超人，即崇拜那認為全部問題都在於保證其自己個性底完全發展，認為自己在任何程度內服從任何偉大社會目的都是下賤可恥事情的超人這種觀點，完全是智識份子的人生觀，它使智識份子完全不中用於參加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

除尼采而外，易卜生也是適合於智識份子情緒的智識份子人生觀底出色代表人物。易卜生底醫生史托克曼（在人民公敵戲劇內）並不如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是個社會主義者，而是標本式的智識份子，這種智識份子必然會與無產階級運動以及一般人民運動發生衝突，如果他竟企圖在這個運動中有所動作的話。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無產階級運動也如任何民主*運動一樣是以尊重多數同志為基礎的。史托克曼一類的標本式的智識份子認為『固結多數』是應被推翻的猙獰怪物。

…李卜克內西乃是社會主義運動所需要的盡善盡美的智識份子模範，他遍身都浸透了無產階級情緒，他雖是個出色的作家，但他却完全失去了智識份子所獨具的心理特點，他毫無怨言地在普通行列中行進，他曾在他所被指定的任何崗位上工作，他使自己通通服從於我們的偉大事業，並鄙棄按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來的智識份子一落到少數地位時就訴說自己個

*最足以表明我們那些馬爾托夫份子把一切組織問題都弄得混亂不堪的事實，就是他們既已轉到阿期莫夫和不適宜的民主主義方面去，同時却又埋怨用民主手續選擇總幹部人員的辦法。即由人家預先擬定而在代表大會上實行的選擇辦法！先生們，也許這就是你們的原則吧？

性受到壓抑的那種頹唐的啜泣 (Weiches Gewinsel)。這裏還可舉出馬克思，他從來也沒有想要出什麼風頭，而是十分嚴格地服從他在那裏不只一次落到過少數地位的國際中的黨的紀律』*。

馬爾托夫及其同僚們只因爲一個舊小組未被批准就拒絕擔任工作，埋怨說人家用戒嚴狀況和非常法令來『對付個別團體』，就不過是智識份子落到少數地位時所發出的這種頹唐的啜泣罷了，馬爾托夫對於這些個別團體在『南方工人』社和『工人事業』社被解散時還是不愛重的，而一到他的集體被解散時却就愛重起來了。

馬爾托夫首倡出來的那些在我們黨代表大會上**（尤其是在代表大會以後）有如河水滔滔不斷傾瀉着的對於『固結多數』訴苦、非難、暗示、叱責、謔言和謗語，也就是智識份子處在少數地位時所發出的這種頹唐的啜泣哩。

少數派辛酸叫苦，埋怨說固結多數舉行過自己的非正式的會議：確實，少數派是需要用某種方法來掩蓋一件於他們不愜意的事實的，這件事實就是那些曾被少數派邀請參加少數派非正式會議的代表們竟拒絕參加這種會議，而那些樂意參加這種會議的代表們（葉哥羅夫輩，馬合夫輩，布魯克爾輩），却又是少數派同他們在代表大會上作過一番鬥爭後所不能邀請的。

少數派辛酸叫苦，說人家提出了『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確實，少數派是需要用某種方法來掩蓋一件不愜意的事實的，這件事實就是那些時常跟着反火星份子跑的機會主義者連同一部分反火星份子組成了一個固結少數，拚命擁護機關方面的小組習氣，擁護言

*Karl Kautsky: „Franz Mehring“, „Neue Zeit“, XXII, I, S. 101-103, 1903, №4 (考茨基著：論法蘭茨·梅林格，見新時代第二十二卷，第一編，第101-103頁，一九〇三年第四期。——譯者)。

**見代表大會記錄第三三七，三三八，三四〇，三五二及其他等頁。

論方面的機會主義，擁護黨務方面的庸人觀點，智識份子的動搖性和動蕩性。

在往下一節內，我們將指明在代表大會末期形成了『固結多數』這一極值得注意的政治事實底原因何在，以及少數派爲什麼不顧一切挑戰而終究小心翼翼地把這個多數形成原因和形成經過問題避開不說。不過我們首先要把我們對於代表大會討論情形的分析作一結束。

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馬爾托夫同志提出了一個非常標本的決議案，（見第三三六頁），我嘗把這決議案底三個基本特點稱爲『三着制勝的棋局』。這三個特點就是：第一，按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而不是按單個候選人來付表決；第二，在宣讀名單以後，必須再放過兩次會議（大概是爲着進行討論）；第三，在缺乏絕對多數時，第二次的表決就算是最終的表決。這個決議案乃是籌劃得非常週到的戰略（對於敵人也要說句公道話才是呀！），這個戰略是葉哥羅夫同志所不同意的（見第三三七頁），可是如果那七個人——崩得份子和工人事業社份子——沒有退出代表大會，那末這個戰略是一定會保證馬爾托夫得到完全勝利的。這個戰略之所以產生，是因爲火星少數派方面不會有並且也不能有『直接協定』（而火星多數派內部則有過這種協定），不僅是和崩得以及和布魯克爾，而且和葉哥羅夫以及馬合夫一班同志也不會有並且也不能有『直接協定』哩。

你們想必記得，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訴過苦，說人家提出『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是以他和『崩得』訂立過直接協定爲前提的。我重複說一遍，這是馬爾托夫同志由於心裏害怕而生的感想，並且當時葉哥羅夫同志不同意按名單來付表決（葉哥羅夫同志『還沒有失去自己的原則』，大概就是使他在估計民主担保底絕對意義時去和哥里德卜拉特打成一片了的那些原則吧），也就是顯

然指明一件極爲重要的事實，即他當時甚至和葉哥羅夫也談不到訂立什麼『直接協定』哩。然而聯盟在當時是可能並且確實有過的，是既和葉哥羅夫又和布魯克爾都可能而且確實有過的，此地所謂聯盟是說每當馬爾托夫份子和我們發生嚴重衝突時，以及每當阿期莫夫及其朋友們須得選定害少的辦法時，馬爾托夫份子總是有獲得葉哥羅夫和布魯克爾兩人贊助的保證。阿期莫夫和李伯爾兩同志一定會把選定六人團爲中央機關報編委，以及選定馬爾托夫所提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當作害少的辦法，當作使火星目的最難達到的辦法（見阿期莫夫關於黨章第一項的演詞以及他寄托於馬爾托夫的『希望』），這是絲毫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什麼疑問的。按名單來付表決，放過兩次會議以及重新實行表決，所有這些手段都是預定要不用任何直接協定而又能以幾乎是機械式的準確性達到此種結果的。

但因爲我們的固結多數仍然是個固結的多數，所以馬爾托夫同志所提出的迂迴辦法也就不過是一種延擱手段，於是我們也就不能不加以拒絕。少數派曾用書面（在申明書中，見第三四一頁）表示埋怨這點，按照馬爾丁諾夫和阿期莫夫兩人底先例拒絕參加表決和對於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理由是『由於有進行選舉時的那些條件』。在代表大會以後，這種埋怨選舉條件不合常態的怨言（見戒嚴狀況第三一頁）是在黨內那些成百數的播弄是非的人們面前滔滔不斷地東說西說過的。可是，這裏究竟有什麼不合常態之處呢？是不是事先已由代表大會規章規定出來（規章第六項，見記錄第一一頁）而決不能認爲其中含有什麼『虛僞』成分或『不公平』成分的那個祕密投票制呢？是不是動蕩智識份子所視爲『猙獰怪物』的那個固結多數底形成呢？抑或是在這班高貴智識份子想違背他們自己在代表大會面前答應承認大會一切選舉（見第三八〇頁，代表大會規章第十八項）的那種諾言的不合常態的願望呢？

頗坡夫同志很巧妙地暗示了這種願望，他當進行選舉的那一天在代表大會上直截發問過：『既然有半數代表拒絕投票，試問主席團是否確信代表大會底決定有效而合法呢？』*。主席團當然回答說它確信這點，並叫大家記起那關係於阿期莫夫和馬爾丁諾夫兩同志的事件。馬爾托夫同志贊同主席團底意見，並直截聲明，說頗坡夫同志弄錯了，說『代表大會底決定是合法的』（見第三四三頁）。且讓讀者自己去判斷一下，看這個在黨面前作的聲明和在代表大會以後的行爲以及戒嚴狀況中所說『還在代表大會上就已開始的黨內半數底暴動』（見第二〇頁）一語相對照時該是暴露出來什麼一種合乎常態的政治一貫性吧。阿期莫夫同志寄托於馬爾托夫同志的希望勝過了馬爾托夫本人轉瞬即去的善念。

阿期莫夫同志，『是你勝利了呵』！

* * *

所謂『戒嚴狀況』一語現時已永遠具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意義，至於它究竟會是一個何等『嚇人的字眼』，那是可由代表大會終結時，即進行選舉以後所發生的表面上似很微小但實質上却很重要的幾點事實來說明的。馬爾托夫同志現在逢人便說這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戒嚴狀況』，煞有介事地硬要自己和讀者相信，似乎他所臆想出來的這個草人是意味着『多數派』對『少數派』施行過什麼不合常態的迫害，攻擊和欺凌。往下你們就會看見代表大會以後的情形究竟怎樣。可是，單拿代表大會終結時的情形來看，也可看出在進行選舉以後，『固結的多數』不僅沒有迫害過這些不幸的、被欺凌的、被侮辱的、被綁上殺場的馬爾托夫份子，反而自動提議（以略

*見第三四二頁。這是指對於總委員會第五個委員的選舉而言。當時投了二十四張選票（總共有四十四票），其中有兩張選票是沒有填寫的。

多夫爲代言人提議)送給他們的記錄委員會三個位置中的兩個位置(見第三五四頁)。你們看看關於策略問題以及其他問題的決議(見第三五五以及往下各頁),就可看出當時完全切實討論問題的情形,當時有許多決議草案往往是由猙獰古怪的固結『多數』份子和『被欺受辱的』『少數』份子混合署名提出的(見記錄第三五五,三五七,三六三,三六五,三六七等頁)。可不是麼,這豈不是很像『革除工作』以及其他什麼『欺凌』麼?

只有在討論斯塔羅維爾所提出的論自由派的決議案時才發生了一番值得注意的,但可惜太嫌簡短的切實爭論。這個決議案之所以終被代表大會通過,按這個決議案的署名來看(見第三五七和三五八頁)是因爲有三個站在『多數派』方面的人(布拉翁,奧爾洛夫,奧西坡夫)既投票贊成了斯塔羅維爾所提出的決議案,又投票贊成了普列漢諾夫所提出的決議案,並不認爲這兩個決議案彼此間有什麼不可調和的矛盾。驟然看來,這兩個決議案彼此間似乎是沒有什麼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爲普列漢諾夫的決議案是規定出一般的原則,是表示在原則上和策略上對俄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所應採取的相當態度,而斯塔羅維爾的決議案則是企圖來規定容許和『自由派別或自由民主派別』訂立『暫時協定』的具體條件。兩個決議案底主題是不相同的。可是,斯塔羅維爾的決議案恰巧患有政治模糊性的毛病,所以它是一個小氣瑣屑的決議案。它沒有判定俄國自由主義底階級內容,沒有指出代表這個自由主義的具體政治派別,沒有向無產階級解釋其對於這些具體派別的基本宣傳鼓動任務,竟把學生運動和『解放』社⁹¹這樣大不相同的東西混爲一談(是因爲它患有模糊性的毛病),却竟過分瑣屑,極端瑣細地規定出了容許訂立『暫時協定』的三個具體條件。政治模糊性在此場合也如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引起了瑣屑小氣的態度。缺乏總的原則並企圖列舉『條

件』，結果就把這種條件規定得非常瑣屑。而嚴格說起來，甚至是規定得不正確的。確實，請你們看看斯塔羅維爾所提出的三個條件吧：第一，『自由派別或自由民主派別』應當『明顯而肯定地聲明，說他們在和專制政府鬥爭時將決然站到俄國社會民主黨方面來』。自由派別和自由民主派別之間的區別何在呢？決議案並沒有提供出任何材料來回答這個問題。其區別豈不就是在於自由派別代表着資產階級中政治進步性最少的階層底立場，而自由民主派別則是代表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政治進步性最多的階層底立場麼？如果是這樣，那末斯塔羅維爾同志難道認為資產階級中進步性最少的（但終究是有進步性的，否則談不到什麼自由主義）階層『將決然站到社會民主黨方面來』麼？這是謬論，即令這樣一個派別底代表人物『明顯而肯定地聲明這點』（這種假定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我們無產階級黨還是應該不相信他們的聲明。做一個自由主義者和決然站到社會民主黨方面來，原是兩件互不相容的事情。

其次。我們就假定『自由派別或自由民主派別』真會明顯而肯定地聲明，說他們在和專制制度鬥爭時將決然站到社會革命黨人方面來吧。這種假定是遠不如斯塔羅維爾同志所作的假定那樣絕對不可思議的（因為社會革命黨人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派別）。若按他那個意思模糊和含有瑣屑小氣性質的決議來說，那末在這種情形下是不可容許去同此類自由派暫時協定的。於是從斯塔羅維爾同志底決議案中所必然得出的這個結論，就引伸出一種簡直不正確的原理。其實，暫時的協定既可以與社會革命黨人訂立（見代表大會論社會革命黨人問題的決議案），因而也就可以與一旦站到社會革命黨人方面來的自由派份子訂立的。

第二個條件：如果這些派別『在自己綱領中不提出一種與工人階級利益以及一般民主派利益相抵觸或模糊其意識的要求』。這裏

又犯了同樣的錯誤：從來沒有過並且也不會有什麼自由民主派別在自己綱領中不提出一種與工人階級利益相抵觸的要求和不模糊其（即無產階級底）意識的。甚至我國自由民主派中的一個最民主的派別，即社會革命黨人，也在其正如一切自由派綱領那樣混亂的綱領中提出了一些與工人階級利益相抵觸並模糊其意識的要求。從這個事實中所應得出的結論，是必須『揭破資產階級解放運動偏狹而不徹底性』，但決不是不容許暫時協定。

最後，斯塔羅維爾同志所要求的第三個『條件』（自由民主派應把普遍，平等，祕密和直接的選舉制作為自己的鬥爭口號）就其一般的提法來說，也是不正確的：如果宣佈說無論如何都不容許和那些以爭得具有資格限制的憲法或一般『畸形』憲法為口號的自由民主派別訂立暫時的局部的協定，那就不合理了。其實，『解放派』先生這一『派別』就可說是這樣的派別，但事先禁止和那些甚至是最胆怯的自由派成立『暫時協定』，因而把自己的手足束縛起來，那就是與馬克思主義原則不相容的政治近視病了。

總之，斯塔羅維爾同志所提出而為馬爾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羅得同志簽名贊成的決議是個錯誤的決議，如果第三次代表大會將其廢除，那就會作得合理了。這個決議，在其理論和策略立場方面帶有政治模糊的毛病，在其所要求的實際『條件』方面帶有瑣屑小氣的毛病。它把兩個問題混為一談：第一個問題是要揭破任何一個自由民主派別所固有的『反對革命和反對無產階級的』特點，務須和這些特點作鬥爭；第二個問題是和這些派別中任何一個派別訂立暫時局部協定的條件。這個決議並沒有作過它所應作的事情（分析自由主義底階級內容），同時却又作了它所不必作的事情（預先規定『條件』）。在黨代表大會上實行擬定這種暫時協定底具體『條件』，根本就是荒謬的，因為這時連確定的訂約對方，即這種可能的協定對象也還不存在；並且就假定這樣的『對象』已經存在了，

也不如讓黨底中央機關去決定暫時協定底『條件』，如代表大會對於社會革命黨人先生底『派別』問題所作的那樣（見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所提決議案中由普列漢諾夫修正過的末尾一段，載於記錄第三六二頁以及第一五頁），要更合理得百倍。

至於『少數派』所提出來反對普列漢諾夫決議案的異議，那末馬爾托夫同志底唯一理由是說：普列漢諾夫底決議案『是以必須揭露一個著作家的淺薄結論作結的。這豈不是『拿斧頭去殺蒼蠅』麼？』（見第三五八頁）。這一用激烈字眼——『淺薄結論』——來掩蓋思想空洞的理由，又是一種胡吹的清談標本。第一，普列漢諾夫底決議案是說要『向無產階級揭露資產階級解放運動偏狹而不澈底性底一切表現』。所以馬爾托夫同志所謂『全部注意力都應集中於一個司徒盧威，集中於一個自由主義者身上』的論斷（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論斷，見記錄第八八頁），完全是一句廢話。第二，說到可否和俄國自由派訂立暫時協定時，把司徒盧威先生比作『蒼蠅』，那就是爲專講激烈話而忽略了一件極明顯的政治事實。不，司徒盧威先生不是蒼蠅而是一個政治力量，其所以是一個政治力量，又不是因爲他本人是什麼大得了不起的人物，而是因爲他的立場是在秘密活動界中唯一代表着俄國有些許活動能力和些許組織性的自由派。所以，說到俄國自由派份子以及我們黨對於他們的態度時，正是要注意到司徒盧威先生，正是要注意到『解放』社，不然就是空口說白話了。也許馬爾托夫同志想要向我們證明說俄國有另一個——那怕只是一個也好——『自由派別或自由民主派別』在目前能些微比得上『解放』派麼？看看這樣的嘗試，倒是不無興趣的！*

*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駁斥普列漢諾夫同志決議案時還提出過如下一個理由：『其所以必須反對這決議案的主要理由，這決議案底主要缺點就在於它完全忽略了一點，即忽略了我們的義務是要在和專制制度鬥爭中不迴避同自由民主

『司徒盧威底名字對於工人說來是毫無意思的』，——科斯特洛夫同志擁護馬爾托夫同志底意見時說道。這就未免是（請科斯特洛夫同志和馬爾托夫同志不要發怒吧）阿期莫夫式的理由了。這就未免好像是關於無產階級一語所有格問題的議論了⁹²。

『司徒盧威底名字』（以及在普列漢諾夫同志底決議案中和司徒盧威先生名字列在一起的『解放』社名字），究竟對於什麼工人說來是『毫無意思的』呢？是對於那些極少認識或完全不認識俄國『自由派別或自由民主派別』爲何物的工人說。試問，我們的黨代表大會究應怎樣對待這樣的工人呢：是應責成黨員們向這些工人說明俄國唯一確定的自由主義派別呢？還是要把某些工人由於自己不熟悉政治而不熟悉的那個名字隱瞞不說呢？如果科斯特洛夫同志跟着阿期莫夫同志走了第一步而不願再跟着他走第二步，那他就一定會按前一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而他若按前一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那他就會知道他當時所持的理由毫無根據了。無論如何，普列漢諾夫決議案中所提到的『司徒盧威』和『解放』社字樣，要比斯塔羅維爾決議案中所講的『自由派別和自由民主派別』字樣能給予工人多過許多倍的東西。

份子實行聯盟。列寧同志也許要把這種迴避叫作馬爾丁諾夫傾向。在新火星報上，這種傾向已經表現出來了』（見第八八頁）。

這一小段文字是豐富得罕見的『珍珠』彙集。第一，所謂同自由派實行聯盟一語乃是極端糊塗的觀念。馬爾托夫同志呵，誰也沒有說要實行聯盟，而只是說要成立暫時或局部的協定。這中間是有很大差別的。第二，如果普列漢諾夫在決議案中忽略了不可思議的『聯盟』而只一般說到『贊助』，那就不是該決議案底缺點，而是該決議案底優點。第三，馬爾托夫同志是否會費點氣力給我們解釋『馬爾丁諾夫傾向』底一般特徵呢？他是否會給我們敘說這些傾向對於機會主義的關係呢？他是否會考察這些傾向對於黨章第一項的關係呢？第四，我實在萬分急於想從馬爾托夫同志那裏聽見『馬爾丁諾夫傾向』究竟表現在『新火星報什麼地方呢？馬爾托夫同志呵，請你趕快把這點說出而使我能免除焦急等待的煩惱吧！

現在俄國工人不閱覽解放雜誌，就不能實際認識我國自由派表現得較為坦白的政治趨向。合法的自由主義刊物在這裏毫不中用，這正因為它的論調曖昧模糊。所以我們應當極力（並在極廣大的工人羣衆面前）運用自己的批評武器去反對解放派，使俄國無產階級在臨來的革命發生的時候，能用真正的武器批評去打破解放派先生們必然想把革命底民主性質削弱的企圖。

* * *

除我已在上面指出的葉哥羅夫同志關於我們『贊助』反政府運動和革命運動問題表示『疑惑莫解』而外，對於決議案的討論並沒有提出過什麼有趣味的材料，並且差不多根本就沒有進行過什麼討論哩。

* * *

當代表大會結束時，主席簡短地提醒說，代表大會底決議是全體黨員都必須遵照執行的。

(一四)代表大會上鬥爭底一般情景。

黨內的革命翼和機會主義翼

上面我們已經結束對於代表大會討論和表決情形的分析，現在我們就應當來作一個總結，以便根據代表大會全部材料來回答一個問題：在選舉過程中顯現出來的暫時成爲我黨基本劃分的最終的多數派和少數派，究竟是由什麼份子，集團和色彩所組成的呢？必須把代表大會記錄中所有關於原則上，理論上以及策略上各種色彩的豐富材料拿來作一總結。若不作出一個『總覽』，若不把整個代表大會以及在表決時一切最主要的派別分立情形拿來作個全面的觀察，那這些材料就會仍然是些非常零碎散亂的材料，以致驟然看來，

特別是在那些不願費點氣力從各方面獨立研究代表大會記錄的人們看來（而用過這番氣力的讀者難道很多麼？），某些單個的派別分立就會好像是偶然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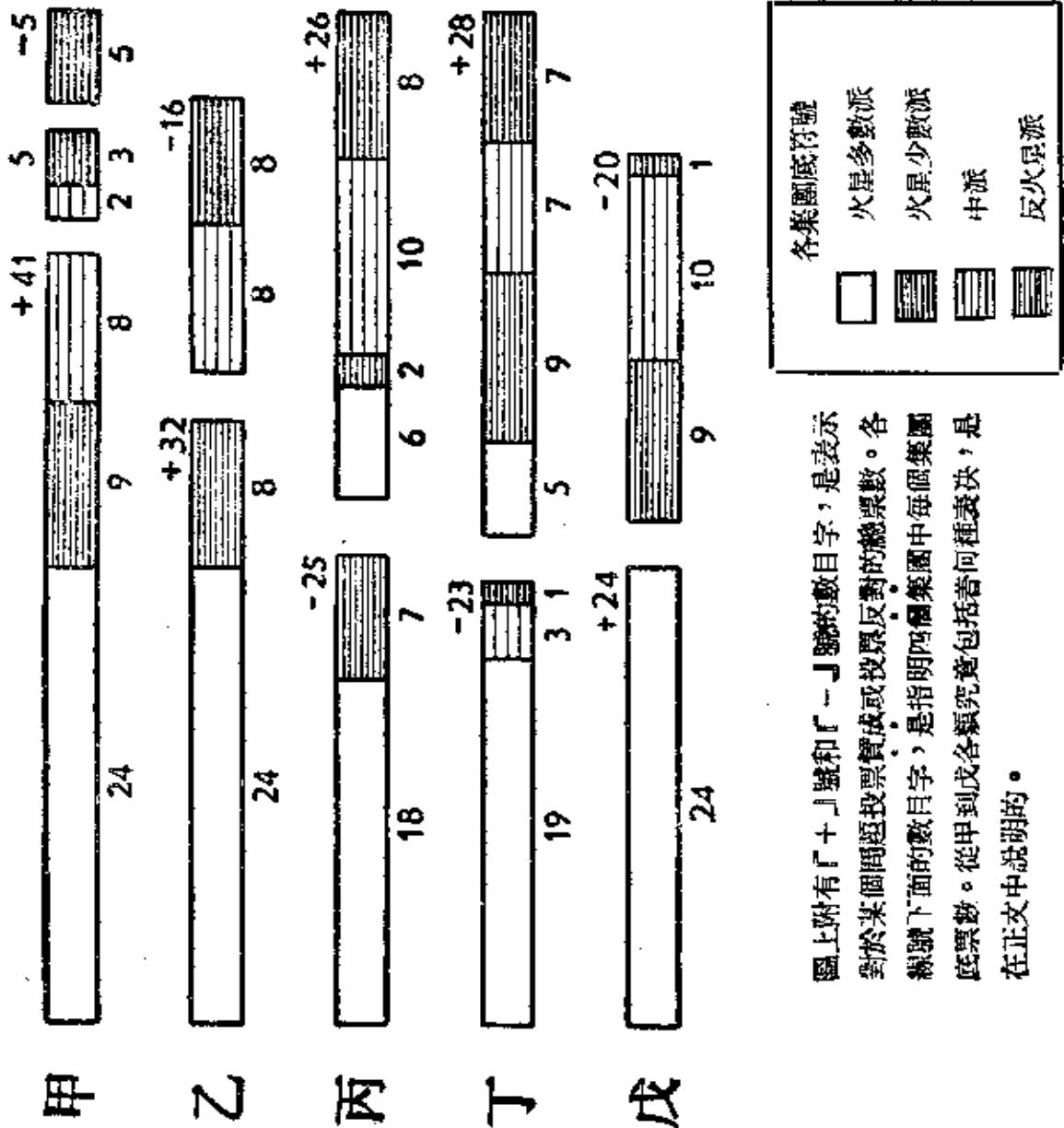
在英國國會記錄中時常遇見一個標本的字眼 *division*，意即『劃分』。一般人講到對於某個問題的表決情形時，就說議院『劃分』為怎樣一種多數和少數。我們社會民主黨議院按代表大會上所討論的種種問題所發生的『劃分』，給我們描繪出一幅唯一無二，十分完備準確的表明黨內鬥爭情形，黨內各種色彩和集團的圖畫。為使這幅圖畫鮮明起來，為要得到一幅真實圖畫，而不是一堆沒有內在聯系的零碎孤立的事實和細節，為要結束對於個別表決的許多無謂爭論（誰投票擁護過誰，誰贊助過誰？），我就決定用圖表形式來表示我們代表大會上所有各類基本的『劃分』。這樣的方法想必有許許多多的人感覺奇怪，但我很懷疑可以找到另一種真正具有綜合性和總結性，盡量完備準確的敘述方法。某個代表究竟是投票贊成某個提議，還是反對某個提議，這都可以按記名投票結果來絕對準確地判明，而關於某些重要的不記名的表決，也可根據記錄來作出一種頗為正確，很近真情的判斷。同時如果把所有一切記名表決以及所有涉及較為重要（例如按討論底詳細程度和熱烈程度來判斷）問題的不記名的表決都一一注意到，就可以把我們黨內鬥爭情形作出一個在現有材料下所能辦到的儘量客觀的描寫。並且我們不來從事於照相式的描寫，換句話說，我們不去單獨描寫每一個表決，而是設法作出一幅圖畫，即舉出所有一切表決的基本種類，把那些比較不很重要而只能混亂事情的細枝末節撇開不談。無論如何，根據記錄，每個人都能檢查我們圖表中的每一線號，用任何個別的表決來加以補充，總而言之，不只是用想像、懷疑和指出單個偶然事情的方法來批判它，而是用根據同一材料製定另一幅圖畫的方法來批判它。

當我們把每一個參加過表決的代表放上圖表時，我們便以特別的線號標出我們已在代表大會整個討論過程中詳細考察過了的四個基本集團，即：（一）火星多數派；（二）火星少數派；（三）『中派』；（四）反火星派。這些集團在原則色彩上的區別，我們已從許多例子中看見了，如果有人因這些集團底名稱太使愛好迂迴行徑的人聯想到火星組織和火星方向而不喜歡這些名稱的話，那我們就要向他們說明，問題並不在於名稱。現在，我們既已根據代表大會一切爭辯來查明了各種色彩，就容易用估計各個集團色彩實質的評語來更換那些已經用慣聽慣的黨內的別號（使某些人聽來刺耳的別號）。作了這樣的更換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四個集團底名稱如下：（一）激底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二）小的機會主義者；（三）中等的機會主義者；（四）大的（按我們俄國的尺度來講是大的）機會主義者。這種名稱想必不會使近來公然說什麼『火星份子』只包括一個『小組』而不是意味着一種方向的那些人聽見時不很感到刺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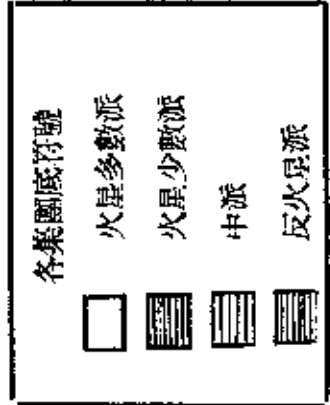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就來詳細敘述，在圖表上（參看『代表大會上鬥爭底一般情景』圖表）究竟『攝下了』什麼種類的表決。

第一類（甲類）所包括的，是『中派』和火星派一起反對反火星派或反對其中一部分的表決。屬於這類表決的有關於整個黨綱的表決（除阿期莫夫同志一人表示懷疑而外，其餘的人都是投贊成票的），關於反對聯邦制的原則決議的表決（除五個崩得份子而外，大家都是投贊成票的），對崩得章程第二項問題的表決（反對我們的是五個崩得份子，表示懷疑的有五票，即馬爾丁諾夫，阿期莫夫，布魯克爾以及擁有兩票的馬合夫，其餘的人是贊成我們的）；這次表決也就是在圖表『甲類』中所表示的。其次，關於批准火星報爲黨中央機關報問題的三次表決，也屬於這一類表決；編輯部（五票）表示放棄表決，有兩票（阿期莫夫和布魯克爾）在所有

代表大會上鬥爭底一般情景



圖上附有「+」號和「-」號的數目字，是表示對於某個問題投票贊成或投票反對的總票數。各線號下面的數目字，是指明四個集團中每個集團底票數。從甲到戊各類究竟包括着何種表決，是在正文中說明的。



三次表決中都投反對票；除此而外，在表決批准火星報的理由時，有五個崩得份子和馬爾丁諾夫同志表示懷疑*。

這一類的表決，回答了一個非常有趣的重要問題，即：代表大會底『中派』在什麼場合是和火星派同行的呢？或是在反火星派也和我們同行的場合，這裏只有很少的例外情形（通過黨綱，不問理由如何而批准火星報）；或是在問題局限於作一些聲明而還不必直接採取一定政治立場的場合（承認火星報底組織工作，還不一定要對單個團體去實現火星報底組織政策；否決聯邦制，還是可以在討論聯邦制具體草案問題時表示懷疑，例如馬合夫同志就這樣作過）。我們在上面一般說到代表大會上派別分立底意義時，已經看見這個問題在正式火星報底正式說明中解釋得極不正確，它（以馬爾托夫同志為代言人）援引反火星派也和我們同行過的場合來抹煞和模糊了火星派與『中派』的區別，澈底革命社會民主黨人與機會主義者的區別。甚至德法兩國社會民主黨內最『右的』機會主義者，也不會在表決承認整個黨綱這樣的問題時投票表示反對。

第二類（乙類）所包括的，是澈底的火星份子和不澈底的火星份子共同反對全體反火星派和整個『中派』時的表決。這類表決主要是涉及實現火星政策底具體確定計劃，要在事實上，而不只是在口頭上承認火星報的那些問題。屬於這一類的，有組委事件**把崩

*爲什麼正是把對於崩得章程第二項問題的表決拿來描畫在圖表上呢？這是因爲關於承認火星報問題的表決是比較不很完備的，而關於黨綱和聯邦制的表決則又涉及了比較不很具體確定的政治決議。一般說來，從一批同一性質的表決中選定某一個表決爲標準，絲毫也不會改變圖畫底基本性質，這是每一個人在作過相當變更後就會知道的。

**這次表決正是我們列在乙類上的：火星派當時擁有三十二票，贊成崩得份子所提出的決議案的有十六票。我們要指出，在這類表決中沒有一次記名表決。頗爲確切指明代表分佈情形的有如下兩種材料：第一，在討論中，火星派中兩個集議底發言人都表示贊成，而反火星派和中派底發言人則表示反對；第二，表示『贊成』

得在黨內地位問題提到議事日程首位討論，解散『南方工人』社，對於土地綱領問題的兩次表決，以及第六，反對『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工人事業』社），即承認同盟爲黨在國外唯一組織的表決。在這裏和革命社會民主派底原則堅定澈底政策對抗的，是在黨尚未成立以前盛行過的那種舊時小組習氣，機會主義組織或小團體底利益，以及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狹隘見解。火星少數派在許多場合，在許多極重要的表決（從組委，『南方工人』社以及『工人事業』社底觀點看來極關重要的表決）中…當問題還沒有涉及他們自己的小組習氣，他們自己的不澈底性時，是和我們同行的。這一類的『劃分』很顯然地指明，在關於實現我們原則的許多問題上，『中派』是和反火星派同行；他們接近於反火星派的程度，要比接近於我們的程度大得多；他們在事實上趨向於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翼的程度，要比趨向於社會民主黨革命翼的程度大得多。那些雖稱爲『火星派份子』，但恥於成爲火星派份子的人，隨時都暴露出自己的本性，而不可避免的鬥爭又引起不少的忿怒，結果便使最欠思慮而最富於感應性的人看不見這個鬥爭所暴露出來的各種原則色彩底意義。可是現在鬥爭烈火已稍微平息，而記錄上又保留有許多熱烈戰鬥底客觀概覽，只有閉着眼睛的人才看不見馬合夫和葉哥羅夫一流人與阿期莫夫和李伯爾一流人的聯合並不是偶然發生，而且不能是偶然發生的事情。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只好躲避周備確切分析記錄，或是只好事後企圖用各種表示惋惜的說法來改製自己在代表大會上的行爲。彷彿用表示惋惜的辦法就可以消除觀點上的區別和政治上的區別啊！彷彿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現在同阿期莫

的票數始終都很接近於三十三票的數目字。同時也不要忘記，在分析代表大會上的討論時，我們除指出表決情形而外，還指出了『中派』和反火星派一起（即和機會主義者一起）反對我們的許多別的場合。屬於這類場合的，有民主要求底絕對價值問題，資助反政府派份子問題，限制集中制問題等等。

夫、布魯克爾以及馬爾丁諾夫結成聯盟，就能迫使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恢復起來的我們黨忘掉火星份子在幾乎整個代表大會期間與反火星份子進行的那種鬥爭啊！

代表大會上第三類表決所包括的，是圖表五部分中的最後三部分（即丙丁戊），其特徵就是有不大一部分火星派份子脫離出去而轉到反火星派方面，結果就使反火星派獲得勝利（當他們還留在代表大會時）。爲要十分確切考查火星少數派同反火星派結成的這一著名聯盟發展情形，爲要考查馬爾托夫在代表大會上一聽見有人提到就發狂起來致書訴苦的這一聯盟發展情形，我們且把此類記名表決所有三個基本類別列舉出來。丙類是關於語言平等問題的表決（此地所舉出的是對本問題舉行的三次記名表決中最完全的那最後一次表決）。全體反火星派和整個中派都聯成一氣來拚命反對我們，同時從火星份子方面又有多數派中的一部分人和少數派中的一部分人脫離出去。當時還看不出，究竟哪些火星派份子將與代表大會上的機會主義『右派』結成最終的和堅固的聯盟。其次，丁類是對於黨章第一項問題的表決（此地所舉出的是兩次表決中最確定的，即誰也不表示懷疑的那次表決）。聯盟已表現得更明顯和構成得更堅固了*：火星少數派全體都已站在阿期莫夫和李伯爾方面，火星多數派中間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站在他們方面去補償當時轉到了我們方面來的三個『中派』份子和一個反火星份子。只要看看圖表，就可知道究竟

*按照所有的材料來看，屬於此類的還有對於黨章的四次表決：在第二七八頁上載明——贊成佛明的二十七票，反對我們方面的二十一票；在第二七九頁上載明——贊成馬爾托夫的有二十六票，贊成我們的有二十四票；在第二八〇頁上載明——反對我的有二十七票，贊成我的有二十二票，以及在同一頁上載明——贊成馬爾托夫的有二十四票，贊成我們的有二十三票。這乃是前面我已提到過的對於中央機關補選問題的表決。沒有載明記名表決（舉行過一次，但已遺失了）。崩得份子（全體或部分）顯然是在救助馬爾托夫。馬爾托夫（在同盟中）關於此類表決的種種錯誤斷語，在上面已被糾正了。

哪些份子_是偶然和暫時轉來轉去，時而轉到這一方面來，時而轉到另一方面去的；哪些份子又是一往直前地跑去與阿期莫夫輩結成堅固聯盟的。根據最後一類表決（戊類——中央機關報編委，中央委員會以及黨總委員會的選舉），即表明最終分為多數派和少數派的那次表決，就可顯然看出火星少數派與整個『中派』以及與反火星派殘餘完全溶合的事實。從八個反火星派份子中，此時留在代表大會上的已只有布魯克爾同志一人（當時阿期莫夫同志已對布魯克爾解釋了他的錯誤，於是布魯克爾就在馬爾托夫份子中間佔據了他應有的地位）。七個最『右的』機會主義者的退出，就決定了選舉底命運而使馬爾托夫遭到失敗*。

現在我們就要根據各類表決的客觀材料來對代表大會作一個總結。

人們往往說我們代表大會上形成的多數派帶有『偶然』性質。馬爾托夫同志在其再一次處於少數地位中就是專以這種論據來安慰自己的。從圖表中可以顯然看出，在一個意義上，並且也只是在一個意義上可以說多數派是種偶然現象，即只有在硬說七個最『右的』機會主義份子_是偶然退出了代表大會的意義上。只有在可以認為他們退出是一種偶然現象的範圍內（一點也不多），才可以說我們多數派也是種偶然現象。只要看看圖表，就能比閱讀任何長篇議論更為明白地知道，如果這七個人沒有退出，那他們就會站在誰人方面，就一定要會站在誰人方面**。但試問究竟在什麼程度內真正可

*退出第二次代表大會的那七個機會主義者，就是五個崩得份子（崩得是當第二次代表大會否決聯邦制原則以後退出黨的）和兩個『工人事業社份子』，即馬爾丁諾夫同志和阿期莫夫同志。他們兩人是當代表大會承認火星派的同盟為黨底唯一旅外組織以後，即當代表大會把工人事業派的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解散以後退出代表大會的。（這是列寧在一九〇七年版上所加的附註。——編者）。

**我們下面就會看見，在代表大會以後，阿期莫夫同志以及和阿期莫夫同志最有血統關係的沃龍皇委員會，都是公然對『少數派』表示了同情的。

以認爲這七個人退出是一種偶然現象呢？這就是那些愛說多數派是『偶然』現象的人們所不願理會的問題。這就是他們所不愜意的問題。退出代表大會的正是我黨右翼中最激烈的份子而不是左翼中最激烈的份子，——這難道是一種偶然現象麼？退出代表大會的正是機會主義者而不是徹底革命社會民主黨人，——這難道是一種偶然現象麼？這種『偶然』退出，難道不是與在整個大會期間所進行並在我們圖表中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了的反機會主義翼的鬥爭有一些聯系麼？

只須提出少數派所不愜意的這些問題，就可明白認識那些妄說多數派是種偶然現象的話頭究竟掩蓋着怎樣的事實。這就是那件毫無疑義和不容置辯的事實，即少數派是我黨內最傾向於機會主義的份子所組成的事實。少數派是黨內那些在理論上最不穩定，在原則上最不堅定的份子所組成。少數派正是由黨的右翼所形成。多數派和少數派間的劃分，乃是直接必然繼續着社會民主黨內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間，山岳派和基朗特派間劃分而發生的劃分，這種劃分並不是昨日——而且不僅在俄國工人黨內——出現，並且大概不是明天就會消滅的。

這件事實，對於闡明分離底原因及其變遷問題有根本重大的意義。誰企圖用否認或模糊代表大會上所發生的鬥爭以及這個鬥爭所暴露出來的各種原則色彩的方法來迴避這件事實，那他就完完全全證實自己智慧貧乏和政治貧乏。但若要推翻這件事實，就須證明：第一，我們黨代表大會上各次表決和『劃分』底一般情景，並不是如我所描出的那樣；第二，按代表大會由以發生『劃分』的一切問題底實質來說，那些在俄國博得火星派稱呼的最徹底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原是不對的*。先生們，試向我們證明這點吧！

*專供馬爾托夫同志參考的附註。如果馬爾托夫同志現在已經忘記火星份子這一名詞是表示着一個方向擁護者，而不是表示着一個小組組員，那我們就勸他根據

少數派是黨內最帶機會主義性，最不穩定和最不堅定的份子所組成的這一事實，也就回答了很不熟悉實情或對問題很欠思索的人向多數派所提出的那些疑難和異議。有人向我們說，把馬爾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底細小錯誤看作分離底原因，這不算是小氣麼？是的，先生們，馬爾托夫同志底錯誤，本來不大（而我還在代表大會上，在鬥爭烈火燃熾時，就已指出這點了），可是這個細小錯誤可能產生（而且果然產生了）許多害處，因為那些作了許多錯誤，在許多問題上表現過機會主義傾向，在原則上不堅定的代表把馬爾托夫同志拉到自己方面去了。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兩同志表現不穩定態度，本是一件帶有個人性質而不重要的事實，但所有一切最不穩定的份子，所有一切完全不承認火星方面並直接反對這個方向，或口頭上承認，事實上往往和反火星派同行的人組成了很大很大一個少數的事實，却不是一件帶個人性質的事實，而是具有全黨意義，並且不全是不重要的事實。

把頑固小組習氣和革命庸人觀點在火星報舊編輯部這樣一個小組中盛行的事實看作分離底原因，這不是可笑麼？不，這並沒有什麼可笑，因為起來擁護這種個人小組習氣的有我們黨內所有那些在整個代表大會期間都為擁護任何小組習氣而鬥爭過的份子，所有那些根本不能超出於革命庸人觀點的份子，所有那些以庸人觀點和小組習氣禍害具有『歷史』性為藉口來辯護和保存這種禍害的份子。

代表大會記錄看看托洛茨基給阿期莫夫同志所作的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釋。代表大會上有過三個小組（按其對黨而言）——『勞動解放』社，火星報編輯部，火星組織——是火星派的小組。這三個小組中有兩個小組作得極為合理，即自行宣告解散了；第三個則表現自己沒有充分黨性來這樣作，於是就被代表大會所解散了。最廣大的一個火星派的小組，即火星組織（它既包括編輯部又包括『勞動解放』社在內），在代表大會上只有十六人，其中只有十一個人是有表決權的。那些只按方向是火星份子而不屬於任何一個火星派『小組』的份子，據我計算在代表大會上有二十七人，一共擁有三十三票。這就是說，火星份子中屬於火星派小組的不滿半數。

狹隘小組利益在單只一個火星報編輯部小組內超過黨性，這也許還可算是一件偶然的事實。但起來極力擁護這種小組習氣的正是同樣（也許是更加）重視有名沃龍涅什委員會底『歷史繼承性』，以及所謂彼得堡『工人』團體⁸⁸底『歷史繼承性』的阿期莫夫和布魯克爾一流同志，正是也如惋惜舊編輯部『被殺』事件那樣悲痛地（也許更加悲痛地）惋惜過『工人事業』社『被殺』事件的葉哥羅夫一流同志，正是馬合夫一流同志等等，這一切都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實。處世箴言說得好：『請你告訴我，你和誰相識，那我就告訴你，你是什麼人』。請你告訴我，誰是你的政治同盟者，誰投票贊成你，那我就告訴你，你的政治面目怎樣。

馬爾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底小錯誤，當它尚未成爲他們與我們黨內整個機會主義翼結成堅固聯盟底出發點時，當它尚未因有這個聯盟而使機會主義死灰復燃，使那些遭受火星報反對而在現時極願以向激底革命社會民主派洩憤出氣爲快的人實行報復時，仍然是而且可能仍然是一個小錯誤。代表大會以後所發生的事變，其結果恰巧就是在新火星報上有機會主義死灰復燃，有阿期莫夫輩和布魯克爾輩實行報復（見沃龍涅什委員會底小刊*），有馬爾丁諾夫輩歡天喜地，因爲他們終究（終究呵！）已得到允許來在可恨的火星報上用自已的驢蹄踢打可恨的『敵人』，藉以報復所有一切舊仇夙怨了。這就特別明顯地告訴我們，爲保全火星『繼承性』而『恢復火星報舊編輯部』（摘自斯塔羅維爾同志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三日最後通牒）是何等必要呵…

代表大會（以及黨）劃分爲左翼和右翼，劃分爲革命翼和機會主義翼的事實，本來是不僅還沒有絲毫可怕，沒有絲毫危險，而且甚至於沒有絲毫不合常態的。恰巧相反，俄國（而且不僅是俄國）

*見本卷第五四九至五五〇頁。——譯者。

社會民主運動史中最近十年來的事實，都是必不可免地引到了這一劃分。至於成爲這一劃分底基因的竟是右翼所犯的許多細小的錯誤，許多很不重要的（比較說來）意見分歧，那末這個情況（這個使膚淺的觀察者和頭腦庸俗的人們驚奇的情況）就是表明我們全黨都往前大進了一步。從前我們是因爲大問題而發生分離，爲着這些大問題甚至可以發生分裂，但現在我們在一切重大問題方面都已經取得一致，現在我們已經只有一些色彩上的分別，爲着這些色彩可以而且應當進行爭論，可是爲着這些色彩而實行分離，却就未免是妄誕無稽和幼稚了（正如普列漢諾夫同志在其值得注意的不應當做什麼？一文中已經完全公正地說過的那樣，這篇文章我們往下還會回頭說到）。現在，當少數派在代表大會以後的無政府行爲幾乎已經使黨陷於分裂時，往往可以遇見一些哲人，他們說：一般講來，爲了如像組委事件，解散『南方工人』社或『工人事業』社，黨章第一項，解散舊編輯部等等一類細小事情，是否值得在代表大會上進行鬥爭呢？誰這樣來推論*，那他就是把小組觀點滲進到黨的事業中去：黨內各種色彩間的鬥爭，當鬥爭還沒有引向無政府行動和分裂時，當鬥爭還是在全體同志和全體黨員所共同認可的範圍內

*說到這裏，我不能不記起我在代表大會上和『中派』某一代表的談話。『在我們代表大會上該是佈滿着多麼沉重的空氣呵！——他向我這樣訴說道，——這該是如何殘酷的鬥爭，這該是如何互相反對的鼓動，這該是如何激烈的論戰，這該是如何非同志的態度呵！..』。『我們的代表大會是多麼美妙的東西啊！』——我當時這樣回答他說，——『公開的，自由的鬥爭。各種意見都已說出。各種色彩都已暴露。各種集團都已顯現。手已經舉過了。決議已經通過了。階段已經渡過了。前進吧！——這是多麼好啊。這才是生活啊。這才不是無窮盡的討厭的習識份子的無謂辯論，人們結束這種無謂辯論並不是因爲他們已解決了問題，而只是因爲他們已說得疲倦了...』。

這個『中派』同志用疑惑莫解的眼色來望着我，並聳着肩膀表示驚奇。原來我們是在各講各的話哩。

進行時，是不可避免而且是必要的。而我們在代表大會上與黨底右翼，與阿期莫夫和阿克雪里羅得，與馬爾丁諾夫和馬爾托夫鬥爭，是絕對沒有超出這範圍的。只要舉出兩件最確鑿地證明這點的事實就够了：（一）當馬爾丁諾夫同志和阿期莫夫同志聲明說要退出代表大會時，我們大家都決意多方排除關於什麼『侮辱』的念頭，我們大家當時通過了（以三十二票通過了）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決議案，勸這兩位同志以所聽到的解釋為滿足而收回他們的聲明。（二）當問題談到中央機關選舉時，我們是讓代表大會底少數（或機會主義翼）在所有兩個中央機關中佔少數位置：讓馬爾托夫加入中央機關報，讓頗坡夫加入中央委員會。既然我們還在代表大會以前就已決定要選舉兩個三人團，我們從黨的觀點來看也就不能作另外的處置。如果說代表大會上所暴露出來的色彩區別不大，那末我們由這些色彩鬥爭中所作出來的實際結論也是不大的：這個結論不過是說兩個三人團中三分之二的位置應歸大會多數所佔有。

只是由於黨代表大會上的少數不同意成為中央機關中的少數，才使遭到失敗的那些智識份子始則從事於『頹唐的發泣』，然後又從事於無政府主義的空談和無政府主義的行動。

在作結束時，我們還要再從中央機關成份問題方面來看看圖表。自然，除了色彩問題而外，代表們在進行選舉時還注意到某某人是否中用、工作能力如何等等的問題。現在少數派很樂於把這兩個問題混淆起來。至於這兩個問題彼此不同，却是不言而喻的，是從一件簡單事實中也可看出的，這件事實就是選舉原先三人團為中央機關報編委的計劃是還在代表大會以前，即當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與馬爾丁諾夫和阿期莫夫的聯盟還是任何一個人都不能預料到的時候已經擬定了的。問題既不相同，答案也就應該用不相同的方法求得之：對於色彩問題的回答，應該是在代表大會記錄中，在

對一切種種問題的公開討論和表決中去尋找。關於人底適當與否問題，大家在代表大會上一致決定要用祕密投票來解決。爲什麼整個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這樣的決定呢？——這是一個十分淺顯，無庸說明的問題。可是，少數派（當其在選舉中遭受失敗以後）甚至連淺顯道理也開始忘記起來了。我們聽見過無數熱烈的，狂熱的，興奮到幾乎發瘋的擁護舊編輯部的言詞，可是我們簡直絲毫也沒有聽見說過代表大會上那些與擁護六人團和擁護三人團的鬥爭相關連的色彩。我們從一切角落裏都聽見說什麼被選進中央委員會的人們沒有工作能力、不中用、心懷惡意等等的閑話和流言，可是我們簡直連半句話也沒有聽見說過代表大會上那些爲中央委員會中的優勢而鬥爭的色彩。我覺得，在代表大會以外說些關於各人品質和行動的流言和閑話，是不體面的和不莊重的（因爲這種行動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些只能向全黨最高機關揭露的組織祕密）。運用這種流言來在代表大會以外進行鬥爭，這按我的信念說來就是一種製造謊言的行爲。我所能給予公衆的對於這些閑話的唯一回答，就在於指證代表大會的鬥爭：你們說，中央委員會是由不大的多數選舉出來的。這是事實。但這個不大的多數是由所有那些本着最一貫的精神，不是口頭上而是事實上爲實現火星計劃而鬥爭過的人組成的。因此，這個多數底道義威信應該是比其形式威信更加高得無比，——是在凡屬把火星報方向底繼承性看得比火星報某個小組底繼承性更貴重的人們看來更加高得無比。究竟是誰能更通曉事情地判斷某人是否適用於實行火星報政策呢？是那些在代表大會上實行過這個政策的人們，還是那些往往反對過這個政策而捍衛一切落後性、一切廢物以及一切小組習氣的人們呢？

(一五)在代表大會以後。兩種鬥爭手段

我們已將代表大會上的討論情形和表決情形分析完結，這一分析已經 in nuce (探本求源地) 說明了代表大會以後所發生的一切，所以我們對於我們黨內危機往後各個階段也就可以說得簡短些。

馬爾托夫和頗坡夫拒絕參加選舉的事實，立刻就使黨內各種色彩間的黨鬥爭滲進一種無謂爭鬧的空氣。格列波夫同志既不相信那些落選的編輯員真想轉到阿期莫夫和馬爾丁諾夫方面去，並以爲問題首先是由於氣憤的關係，於是他在代表大會閉會以後第二天就向我和普列漢諾夫提議要和平了事，在保證編輯部有相當代表參加總委員會的條件下（即一定要使在兩個代表中有一個代表屬於黨的多數）把所有四個人『補選』進去。這個條件當時在普列漢諾夫和我看來是合理的，因爲他們如果同意這個條件，那就是表示他們默然承認他們在代表大會上所犯的錯誤，就是表示他們願意和平而不是願意戰爭，就是表示他們願意來和我以及普列漢諾夫接近，而不是去和阿期莫夫以及馬爾丁諾夫接近，不是去和葉哥羅夫以及馬合夫接近。於是，『補選』方面的讓步就帶有個人的性質，而在個人問題上表示讓步，藉以平息怒火而恢復和平，却是我們不應拒絕的。於是我和普列漢諾夫就對此表示了同意。但編輯部底多數拒絕了這個條件。格列波夫離此他往了。於是我們就來等待結果：是馬爾托夫將能支持他在代表大會上（在反對中派代表頗坡夫同志時）所表示過的忠順立場，抑是他已開始步武其後塵的那些不穩定的和傾向於分裂的份子們將佔得上風。

當時我們面臨着兩種可能的辦法：或者是馬爾托夫同志想把自己在代表大會上的『聯盟』當作一個間或的政治事實（猶如伯伯爾在一八九五年和佛里馬爾聯盟是個間或的事實一樣——*si licet*

parva componere magnis*)，或者是他想把這個聯盟固定起來，極力想證明我和普列漢諾夫在代表大會上犯過錯誤，因而變成我們黨內機會主義翼底真正魁首。換言之，當時有如下兩種可能辦法：或則進行無謂爭鬧，或則進行政治的黨的鬥爭？我們三個人中間（中央機關在代表大會閉會後第二天只有我們三個人在那裏），格列波夫最傾向於這個問題底前一解答，並最努力於調解互相爭吵過一頓的兒童。最傾向於後一解答的是普列漢諾夫同志，他的態度萬分堅決。我在這一次站着『中派』或『泥潭』立場，並試圖採用說服方法。如果現在企圖把口頭上的說服追憶出來，那就等於幹一種極倒霉的事，所以我也就不去重蹈馬爾托夫和普列漢諾夫兩同志底覆轍。不過我終究認為必須從我所寄給一位『少數派』火星份子的一個書面勸告中引證幾段。

…『馬爾托夫拒絕加入編輯部，他以及黨內其他著作家拒絕參加報館工作，一整批人拒絕替中央委員會工作而宣傳實行抵制或消極反抗的思想；所有這些，都必然——甚至於違反着馬爾托夫及其朋友們底意志——會引起黨底分裂。即使馬爾托夫將支持着忠順的立場（他在代表大會上很堅決表示過的立場），那末其他的人們是會支持不住的，——於是我所指出的那個結局就會必不可免…

…於是我就捫心自問：究竟我們將是爲了什麼發生分裂呢？我再三分析代表大會底一切事變和印象，我自己意識到我往往在很氣憤的狀態中『瘋狂似地』動作過，我無論在什麼人面前都願意承認我自己這個過錯，如果真應把那些由當時的空氣、反感、責備、鬥爭等等所自然引起的東西叫作過錯的話。可是，現在毫無瘋狂意味地觀看我們所已達到

*——如果可以拿小東西和大東西相比擬的話。——譯者。

的結果，來觀看用瘋狂鬥爭實現出來的東西時，我却根本不能不認定這些結果中沒有絲毫，簡直沒有絲毫有害於黨的東西，絕對沒有絲毫對於少數派含有侮辱或凌辱意味的東西。

當然，落在少數地位一事本身也就不能不令人感覺難過，但我絕對反對那以爲我們『玷污過』某某人，以爲我們想欺侮或侮辱過某某人的念頭。絕對沒有這麼一回事。決不應因政治上發生分歧而用所謂居心不良、行爲奸滑、傾軋等類在臨來的分裂氣氛中更爲流行的好聽的罪名加到對方頭上的辦法解釋事變。決不應這樣去作，因爲這至少是 *nec plus ultra** 不合理的。

我在政治上（以及組織上）和馬爾托夫發生了分歧，正如我會和他分歧過幾十次一樣。我既在關於黨章第一項的問題上遭到了失敗，也就不能不極力設法利用我（以及代表大會）所剩下的機會來實行報復。一方面，我不能不設法成立十分火星主義性的中央委員會，另一方面我又不能不力求選出三人編輯委員會……我認爲只有這個三人團能够成爲負責的機關而不會變成一個基於私人感情和怠慢習氣的團體，能够成爲唯一真正的中央機關，其中每個人可以隨時提出並捍衛自己的黨的觀點，根本不滲進絲毫額外的成分，*irrespective*** 任何個人意氣，任何關於侮辱，關於退出等等的計較。

在代表大會上所發生的事變以後，這個三人團一定能法定在一個方面來反對馬爾托夫的那個政治和組織路線。這是毫無疑義的。爲了這一點而實行撕裂黨麼？爲了這一點而破壞黨麼？

*意即『極端』。——譯者。

**意即『不顧及』。——譯者。

難道在示威問題上，馬爾托夫和普列漢諾夫不是反對過我麼？難道在黨綱問題上，我和馬爾托夫不是反對過普列漢諾夫麼？難道任何三人團不總是以其一方面來反對某一個參加者麼？固然火星份子多數無論在火星組織內或在代表大會上都認為馬爾托夫路線這一特別色彩在組織上和政治上是錯誤的，可是企圖以什麼『陷害』和『攻擊』等等來解釋這點，豈不果然是狂妄的舉動麼？難道以辱罵這個多數為『惡棍』來搪塞這件事實，不是一種狂妄舉動麼？

我重複說一遍：我也如代表大會上的火星份子多數全體一樣深信馬爾托夫採取了不正確的路綫，所以認為必須把他糾正一下。因受到這種糾正而表示氣憤，由此作出結論說受到了侮辱等等，那就不合理了。我們過去沒有『玷污』過任何一個人，並且現在也不想實行『玷污』任何一個人，不想排除任何一個人參加工作的機會。因被排除出中央而掀起分裂，那就是我絕對不解的一種狂妄舉動了』*。

我認為現在必須把我這些書面聲明重述出來，因為這些聲明確切指明多數派極力想一舉分清兩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可能因攻擊底激烈性和『瘋狂性』等等發生的（而且是在熱烈鬥爭時所必然發生的）個人氣憤和個人怒火；另一件事情則是一定的政治錯誤，政治路綫（即與右翼的聯盟）。

從這些聲明中可以看出，少數派底消極反抗舉動在代表大會剛剛閉會後就已立刻開始，因此我們馬上就預告說這是一個走向於使

*這封信（一九〇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公曆九月十三日）致波特列索夫的信。——編者）是早在九月間（公曆）就已寫好的。此地刪去了我所覺得於事無關的語句。如果收信人認為正是刪去的語句重要，那他是很容易把刪掉的地方填補起來的。順便說說。我要乘此機會一勞永逸地許可我所有一切論敵們來公佈我所有一切私信，只要他們認為這點有益於事就是了。

黨分裂的步驟；說這適與那些在代表大會上表示忠順服從的聲明相矛盾；說這僅僅是爲了被排除出中央機關以外（即因爲沒有當選）而進行分裂，因爲誰都根本沒有想要排除任何一個黨員參加工作的機會；說我們彼此間的政治分歧（這種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爲關於究竟是馬爾托夫在代表大會上的路線錯誤，抑是我們在代表大會上的路線錯誤這一問題尚未闡明，尚未解決）已在愈益變成爲一種用咒罵、猜疑等等東西進行的無謂爭鬧。

但預告並沒有什麼補益。少數派底行爲表明出，最不穩定和最不重視黨的份子在他們中間佔着優勢。於是我和普列漢諾夫就不得不收回我們對於格列波夫那個提議所表示的同意：既然少數派所採取的行動證明他們不僅在原則方面而且在起碼的黨員的忠順服從方面也是政治上不穩定的，那末關於所謂『繼承性』的言詞又能有什麼意義呢？當時普列漢諾夫比誰都更爲巧妙地譏笑過硬要人家把公開聲明說自己持有新的和步步增加的分歧意見的大多數人『補選』到黨編輯部中去的荒唐至極的要求……試問天下那裏有這樣的怪事，說是當新的意見分歧尚未在刊物上向黨闡明以前，中央機關裏的黨的多數竟會自動把自己變成少數呢？讓人們先把意見分歧申述出來吧，讓黨去討論這種意見分歧底深度和意義吧，讓黨自己糾正它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犯的錯誤吧，如果它確實犯過什麼錯誤的話！爲了一些尚未說明出來的意見分歧而提出此種要求，就已經是表明提出要求的人完全不穩定，表明他想用無謂爭鬧來完全壓倒政治分歧，表明他既完全不尊重整個黨，又完全不尊重本人信念。天下還沒有過——並且永遠也不會有——什麼原則堅定的人拒絕在他們想使其改變信念的機關裏獲得（按非正式手續獲得）多數以前實行說服的。

最後，十月四號，普列漢諾夫同志宣稱，說他要最後試圖來結束這種荒謬現象。召集了舊編輯部所有六個委員底會議，有一個新

中央委員也曾列席參加*。普列漢諾夫同志費了足足三個鐘頭來證明，說那想從『少數派』中間『補選』四個人來和屬於『多數派』的兩個人作對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他提議補選兩個人，以便一方面排除那恐怕我們想『欺凌』、壓制、圍攻、殺戮、埋葬什麼人的任何顧慮，另一方面則保障黨『多數派』底權利和陣地。補選兩個人的提議也遭了拒絕。

十月六日，我和普列漢諾夫寫了一封正式信給火星報全體舊編輯員以及同事托洛茨基，其內容如下：

『尊敬的同志們！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不得不因你們拒絕參加火星報和曙光雜誌工作而正式表示惋惜。雖然我們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剛剛閉會以後就立刻邀請過你們，然後又多次重複邀請過你們來參加工作，可是我們始終沒有從你們方面收到任何一篇作品。中央機關報編輯部聲明，它認為你們拒絕參加工作的態度絲毫不是由它方面所引起的。任何一種個人怒火，都當然不應該成為妨礙你們參加黨中央機關報工作的障礙。但如果你們的拒絕是由於你們和我們彼此間有某種意見分歧，那末我們就認為詳盡敘述這種意見分歧是非常有益於黨的。不僅如此。我們認為趕快在我們所編輯的刊物上把這些意見分歧底性質和深度向全黨闡明清楚，是非常符合心願的』**。

讀者由此可見，我們當時仍然完全不明白，究竟『少數派』底行動是由於他們意氣用事，還是由於他們願意給予機關報（以及

*除此而外，這個中央委員又特別和少數派舉行過幾次私人談話和集體談話，駁斥過一切荒誕的流言，並勸大家不要忘記黨員職責。

**在致馬爾托夫同志的信裏，還補充有一段關於一本小冊子問題的話，以及如下的語句：『最後，為事業利益計，我們再次通知您，我們在現時也還是決意補選您為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委員，使您完全可以在高級黨機關裏正式申述並擁護自己的一切觀點』。

黨)以新的方針，究竟是怎樣的方針，其內容究竟何在。我想，就在現時，即使指定七十個解釋員根據無論什麼刊物和無論什麼見證人口供來闡明這個問題，那他們也是永遠弄不清這筆糊塗賬的。無謂爭鬧的結子是未必有什麼時候可以解開的：應該是把它斬斷，或者是把它擱棄*。

接到我們十月六日的信以後，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斯塔羅維爾、托洛茨基以及科爾鑿夫給了我們一個總共不過兩行文字的答覆，說自從火星報轉入新編輯部手裏的時候起，他們是不對火星報作任何參加的。馬爾托夫比較願意說話，於是就賞賜了我們一個如下的答覆：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收。 尊敬的同志們！爲回答你們十月六日的來信，我特聲明如下：我認爲我們彼此用不着再來磋商我們在一個機關報內共同工作的問題了，因爲你們在十月四日由一個中央委員參加的會議上已拒絕回答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即究竟爲什麼你們收回了你們要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斯塔羅維爾以及我在我們担承選舉列寧同志爲參加總委員會的『代表』的條件下加入編輯部的提議。既然你們在這次會議上再三推諉而不願表述你們自己當着見證人所發表的聲明，我也就不認爲需要在給你們的信裏解釋我拒絕在現今情況下參加火星報工作的理由。遇有必要時，我將在全黨面前詳細說出我關於此事的意見；黨從第二次代表大會底記錄中已可看出，爲什麼我拒絕了你們現時重複提出的要我在編輯部裏和在總委員會裏佔一個位置的提議…**

馬爾托夫』。

*普列漢諾夫同志大概會在這裏補說一句：或者就要滿足那些挑起無謂爭鬧的人們底一切種種奢望。往下我們就會看出，爲什麼這是不可能的。

**往下一段話是馬爾托夫關於當時翻印他那本小冊子問題的答覆，此地從略。

這封信以及上述幾個文件，不容反駁地闡明了馬爾托夫同志在其戒嚴狀況中極力（用感嘆號和刪節號）迴避的關於抵制、搗亂、無政府狀態、準備分裂的問題，即關於忠順性的和不忠順性的鬥爭手段問題。

人家向馬爾托夫同志等等提議要他們敘述其意見分歧，請他們爽直說出事情底蘊以及他們的意向究竟怎樣，勸他們不要再鬧脾氣而要虛心分析他們關於黨章第一項的錯誤（這個錯誤是和他們轉向右方去的錯誤緊相聯系不可分開的），——但馬爾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們公然拒絕說話，却叫喊着說：人們在圍攻我呀，人們在欺凌我呀！對於『嚇人字眼』的譏笑聲，並沒有使這些滑稽可笑的叫喊聲底怒火平息下去。

究竟怎樣可以圍攻一個拒絕共同工作的人呢？——我們這樣質問過馬爾托夫同志。怎樣可以侮辱、『欺凌』、擠壓一個拒絕少數地位的少數呢？須知，任何一種少數地位，都一定和必然對於處在少數地位的人們有某些不利之處哩。這種不利之處就是只得加入關於某些問題將會用多數來實行強制的委員會，或是站在委員會以外來對它舉行襲擊，因而也就會遭受到那些由築得很好的炮壘方面射出的炮火。

馬爾托夫同志叫喊着說什麼『戒嚴狀況』，是想說人們用不公平不忠順手段進行鬥爭反對他們這些落到少數地位的人們或管理他們這些落到少數地位的人們麼？只有這樣的提綱，才（在馬爾托夫心目中）也許有半點合理的影子，因為——我重複說一遍——少數地位是一定和必然招致某些不利之處的。然而滑稽可笑的，是當馬爾托夫同志還拒絕說話時，用無論什麼手段也是不能進行鬥爭反對他的！當少數還拒絕站在少數地位時，用無論什麼手段也是不能管理它的！

馬爾托夫同志沒能證明任何一件可以表明中央機關報編輯部——當我和普列漢諾夫兩人在編輯部內工作時——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的事實。少數派底實際工作者也沒能證明任何一件可以表明中央委員會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的事實。不管馬爾托夫同志現時在其戒嚴狀況裏如何支吾搪塞，然而在那些說什麼戒嚴狀況的叫喊聲中，除了『頹唐的啜泣』而外，完全沒有任何其他什麼東西，——這却始終是完全不容反駁的事實。

馬爾托夫同志及其伙伴根本缺乏合理的論據來反對代表大會所任命的編輯部，這最好是用他們自己所說『我們不是農奴！』——（見戒嚴狀況第三四頁）一語來說明。這樣就非常明顯地暴露出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心理，他們把自己看作超乎羣衆組織和羣衆紀律的『上等人』。以『我們不是農奴』爲論據來解釋拒絕在黨內工作的理由，那就是把自己揭露無餘，那就是承認自己完全沒有什麼論據，完全不能論證，完全沒有什麼表示不滿的合理原因。我和普列漢諾夫兩人聲言說，我們認爲他們拒絕工作的態度完全不是由我們方面所引起的，並且請他們說出自己的分歧意見，而他們却回答我們說：『我們不是農奴』（並補充說：我們關於補選問題的生意還沒有講好）。

那些在爭論黨章第一項時已暴露自己傾向於機會主義推論和無政府主義辭藻的智識份子個人主義者看來，總覺得任何一種無產階級組織和紀律，都好像是農奴制。讀者大眾很快就會知道，新的黨代表大會，在這些『黨員』和黨『負責人』看來，也會是爲『上等人』所不堪忍受的可怕的農奴制機關哩……這個『機關』對於那些樂於利用黨的招牌而又覺得這個招牌不合黨利益和黨意志的人們看來，確實是可怕的。

我在致新火星報編輯部的信裏所列舉過並由馬爾托夫同志在戒嚴狀況裏刊印出來的那些委員會決議，就是在事實上證明少數派

底行爲是一貫違抗代表大會決議，一貫搗亂積極實際工作。由機會主義者和仇恨火星報的人們所組成的少數派實行撕裂黨，破壞並搗亂工作，因爲他們想報復自己在代表大會上所遭到的失敗，並感覺到他們用誠實忠順手段（在刊物上或在代表大會上解釋問題）永遠不能駁倒人家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責備他們爲機會主義者和不穩定智識份子的罪名。他們既意識到自己沒有力量說服黨，就來用搗亂黨組織和妨碍任何工作的手段實行要挾。人家責備他們是說他們（因在代表大會上弄出錯誤）把我們的器皿打穿了一個罅隙，而他們對於這種責備的回答則是拚命設法把這個已經損壞的器皿完全打破。

概念已是混淆到如此地步，居然把抵制和拒絕工作宣佈爲鬥爭底『誠實*手段』。馬爾托夫同志現在極力迴避這個碍難地點。馬爾托夫同志竟是如此『愛講原則』，以至當抵制手段是由少數派進行時，… 他是擁護抵制手段的，而當抵制手段威脅着落到多數地位的馬爾托夫本人時，他就來斥責抵制手段了！

我想，關於這究竟是無謂爭鬧還是對於社會民主工黨內誠實鬥爭手段的『原則意見分歧』的問題，是可以不加分析的。

* * *

在想要從那些掀起『補選』糾紛的同志們方面得到解釋的兩次企圖（十月四日和十月六日）失敗以後，中央機關就只得試看分明，看那些同志們在口頭上約許用忠順手段鬥爭的態度在事實上將是怎樣。十月十日，中央委員會向同盟發出一個通告（見同盟記錄第三至五頁），聲稱中央委員會正在擬定章程並邀請同盟會員們予以贊助。同盟管委當時否決了（以兩票對一票，見同上記錄第二〇頁）

*礦區委員會底決議（見成嚴狀況第三八頁）。

召集同盟代表大會的建議。少數派份子對這個通知所作的答覆立刻就指明出，所謂忠順服從和承認代表大會決議不過是一句空話罷了；其實，少數派是立意絕對不服從黨中央機關，却以充滿詭辯和無政府主義辭藻的敷衍語句來回答中央機關關於共同工作的號召。收到管委委員捷依契那封所謂公開信時（見第一〇頁），我和普列漢諾夫以及其他多數派份子當即堅決表示反對，說我們『抗議同盟負責人用橫蠻違背黨紀律的手段阻碍黨機關底組織活動並號召其他同志違背紀律和章程的行爲。所謂『我認爲自己沒有權利響應中央委員會號召參加這種工作』，所謂『同志們！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應當讓它（中央委員會）來爲同盟擬定新章程』等等一類語句這樣一種鼓動手段，當然只能引起每一個稍微懂得什麼是黨、什麼是組織、什麼是黨紀律的人方面的憤慨。這種手段所以更加令人憤激，尤其因爲人們運用這種手段來對付剛剛成立的黨機關，所以毫無疑義是一種想在黨員同志中間破壞對於這個黨機關的信任的企圖，並且是貼有同盟管委委員商標和背着中央委員會眼睛來運用的手段』（見第一七頁）。

在這樣的條件下，同盟代表大會當然只能成爲一幕醜劇。

馬爾托夫同志自始就繼續運用其在代表大會上運用過的『籠絡人心』的策略，不過這一次他是向普列漢諾夫同志運用的，其方法就是曲解私人談話內容。普列漢諾夫同志表示抗議，於是馬爾托夫同志就只得收回（見同盟記錄第三九頁和第一三四頁）他那些輕浮的或氣頭上的非難。

輪到做報告的時候了。代表同盟參加過黨代表大會的是我。讀者只要把我那個報告大綱（見第四三以及往下各頁）拿來參照一下，就知道我當時已把大會歷次表決情形作了一個大致的分析，而本書內容就是由發揮這種分析所構成的。報告底全部重心就是要證明馬爾托夫及其伙伴們因自己犯過種種錯誤而落到我們黨內機會

主義翼裏的事實。雖然這個報告是在大多數最懷恨心的論敵面前作的，然而那些論敵却不能在它中間發現絲毫違反黨內鬥爭手段和辯論手段忠順精神的成分。

反之，馬爾托夫底報告，除了對於我的敘述所作的那些細小的枝節的『修正』而外（這些修正之不正確性，我們在上面已指出過了），却是… 一種病態神經底產物。

無怪乎多數派拒絕了在這樣的氣氛下進行鬥爭。普列漢諾夫同志提出抗議來反對『鬧脾氣』（見第六八頁）——這確實真正是『鬧脾氣』哩！——同時他表示不願申述他已預備好的對於該報告實質的反駁，接着就退出了代表大會。其餘的多數派份子，也差不多全體都提出了對於馬爾托夫同志那種『無理行爲』的書面抗議（見同盟記錄第七五頁）並退出了代表大會。

少數派底鬥爭手段已經是衆目昭彰了。我們責備少數派是說他們在代表大會上犯過政治錯誤，是說他們轉向到機會主義方面，是說他們和崩得份子、阿期莫夫輩、布魯克爾輩、葉哥羅夫輩以及馬合夫輩結成聯盟。少數派在代表大會上遭到了失敗，現在已『製定了』兩種鬥爭手段，其中包括有一切無窮紛繁的單個襲擊、衝擊、進攻等等形式。

第一種手段就是搗亂全部黨的工作，敗壞事業，阻碍所有一切而『不解釋原因』。

第二種手段就是『鬧脾氣』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我已經指出過，這些在僑外生活和流放生活空氣中所常見的無謂爭鬧底最下賤表現形式，都不宜歸因於下賤動機。這是如瘟疫般流行於一定的不合常態的生活條件下，流行於一定的神經失常狀態等等情形下的一種病症。我只得在此地把這種鬥爭方式底實質重提一下，因為馬爾托夫同志在其成嚴狀況裏完全重複了這種鬥爭方式。

這『第二種鬥爭手段』在同盟那些所謂『原則』決議案裏也有其表現，『多數派』當然是沒有參加過對於這些決議案的討論。我們來仔細看看馬爾托夫同志現今在其戒嚴狀況裏轉載出來的這些決議案吧。

第一個決議案是由托洛茨基、佛明、捷依契等老同志署名，其中包含有專為反對黨代表大會『多數派』而提出的兩個提綱：

(一)『同盟深深惋惜的是代表大會上出現了一些實際上是和火星報原先政策背馳的趨向，致使在製定黨章時沒有充分注意到造成一種維護中央委員會獨立性和威信的充分保障』（見同盟記錄第八三頁）。

這個『原則』提綱，正如前面已說過的那樣，是歸結於阿期莫夫的辭藻，其機會主義性質是甚至頗坡夫同志也在黨代表大會上揭露過的！照實講來，那些說『多數派』似乎不想維護中央委員會獨立性和威信的斷語始終不過是一種謊言罷了。別的不說，只須指出一點，就是當我和普列漢諾夫兩人在編輯部裏工作的時候，總委員會裏並沒有過什麼中央機關報對於中央委員會的優勢；而當馬爾托夫份子加入了編輯部的時候，却已果然造成了中央機關報對於中央委員會的優勢了！當我們兩人在編輯部裏工作的時候，總委員會裏是俄國實際工作者多過於國外作家；而當馬爾托夫份子加入了編輯部的時候，情形却已適得其反了。當我們兩人在編輯部裏工作的時候，總委員會連一次也沒有企圖干涉任何一個實際工作問題；而自從按一人意見實行了補選的時候起，却已開始實行起這種干涉來了。這點是讀者們在很短時間就會透澈知道的。

該決議案底另一提綱是說：『…代表大會在成立黨正式中央機關時忽略了和那些事實上已形成的中央機關的繼承聯系…』。

這個提綱是完全歸結於中央機關人選問題。『少數派』寧願迴避舊中央機關在代表大會上已證明自己毫不中用並幹出許多錯誤的

事實。但最滑稽可笑的却是在組委問題上援引『繼承性』。上面我們已經看見，代表大會上誰也根本沒有提到要批准組委全體委員。馬爾托夫在代表大會上甚至氣憤到不省人事地叫喊過，說包含三個組委委員的名單使他感到可恥。『少數派』在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最後名單包含有一個組委委員（頗坡夫，格列波夫或佛明，托洛茨基），而『多數派』所提出並使其通過了的名單，則是組委委員在總共三個人中間佔有兩個位置（特拉文斯基，瓦西列夫，格列波夫）。試問，這樣援引『繼承性』難道可以叫作『原則意見分歧』麼？

我們現在來說另一個決議案，即由舊編輯部以阿克雪里羅得同志爲首的四個委員署名的決議案。這裏我們看到所有一切用以反對『多數派』而後來又屢次在刊物上重複說過的主要罪名。這些罪名最好是按其由編輯員小組諸組員所表述的那樣來加以考察。這種罪名所反對的是『專制的官僚主義的治黨制度』，是與『真正社會民主主義的集中制』不同的『官僚主義的集中制』；其『所最重視的不是內部的統一，而是外表的，形式上的，用純粹機械性手段，藉一貫鎮壓個人首創性與一貫鎮壓社會自動性的辦法實現和保持的一致』；所以，這個集中制『根本不能有機性地統一社會成員』。

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及其伙伴們在這裏所說的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呢，——真是只有老天爺才曉得。大概，阿克雪里羅得同志自己也不很明白他究竟是寫着地方自治派請求實行合意的行政管理改良的呈文，還是在那裏叨叨訴說『少數派』底怨言。心懷不滿的『編輯員』所叫喊着的黨內『專制』，究竟含有什麼意思呢？所謂專制，就是一個人擁有最高無上的、不受監督的、不負責任的、非經選舉的政權。從『少數派』底刊物中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他們認作這個專制魔王的正是我，而並非其他什麼人。當該決議案起草和通過時，我是同普列漢諾夫一起在中央機關報裏工作的。那末，

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及其伙伴們就是認爲普列漢諾夫以及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都不是依照自己對於事業利益的觀點，而是依照專制魔王列寧底意旨來『治黨』的了。既然歸罪說什麼專制的統治，那就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認爲所有其餘一切參加統治者——除專制魔王一人而外——都不過是些由別人御用的工具，唯命是聽的兵卒，執行他人意旨的人罷了。我們又要再三問問：難道最尊敬的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底所謂『原則意見分歧』就在於此麼？

其次。我們的『黨員』，這些剛從黨代表大會——即他們曾冠冕堂皇承認其各個決議爲合法決議的代表大會——回來的『黨員』在這裏所說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呢？他們是不是知道在一個根據多少是堅固的原則組織起來的黨內，除黨代表大會而外，竟有什麼另外一種可以達到一致的方法麼？如果說是，那末爲什麼他們不敢爽直聲明說他們已不承認第二次代表大會爲合法的代表大會了呢？爲什麼他們不試來向我們說出自己的新意見和自己要想在似乎是個有組織的和似乎是個黨的黨內達到一致的新方法呢？

再其次，我們的智識份子個人主義者，這些剛剛在此以前還被黨中央機關報勸請敘述他們的意見分歧，但他們却爲代替此事而講起『補選』生意來的智識份子個人主義者，在這裏所說的究竟是什麼樣的『鎮壓個人首創性』呢？一般說來，試問我和普列漢諾夫或中央委員會怎樣能把根本拒絕和我們進行任何共同『活動』者底首創性和自動性鎮壓下去呢！試問在被鎮壓者拒絕參加的一個機關或委員會裏，怎樣可以『鎮壓』什麼人呢？試問，落選的編輯員既已拒絕『做被統治者』，那末他們又怎樣可以訴苦埋怨『統治制度』呢？我們根本不能在領導我們這些同志方面作出什麼錯誤，因爲這些同志根本就沒有在我們領導下做過什麼工作。

所以，很明顯的，人們高喊所謂官僚主義，不過是要掩蓋他們

對於中央機關人選的不滿心理，不過是要掩飾他們違背自己在代表大會上冠冕堂皇說過的那種諾言的醜惡行爲罷了。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為你是代表大會不根據我的意志而違反着我的意志所委任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為你是倚據着代表大會底形式決議而不是倚據着我的同意；你幹得粗暴機械，因為你是倚據着黨代表大會底『機械的』多數而不顧及我想得到補選位置的願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為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舊時的親熱伙伴，他們是因代表大會選直指斥他們那種小組習氣的態度愈使他們感到不快而愈益努力堅持他們那種小組習氣『繼承性』的。

除以上所述而外，這些關於官僚主義的喊聲中就沒有過並且也不會有任何實在的內容了*。這樣的鬥爭手段不過是再次證明少數派底智識份子不穩定性罷了。它曾想使黨信服，似乎中央機關人員選舉得不妥當。究竟是想用什麼手段來使黨信服呢？是想用批評我和普列漢諾夫所編輯的火星報的手段麼？不是的，這是他們沒有力量來幹的。他們是想用一部分黨員拒絕在他們所仇視的中央機關領導下工作的手段來使黨信服。可是，世界上任何一個黨內的任何一個中央機關，都不能證明自己有本事來對那些不願服從領導的人們實行領導。拒絕服從中央機關領導，就等於拒絕留在黨內，就等於把黨毀壞，——這不是一種說服辦法，而是一種擊破辦法。這樣用擊破方法來代替說服方法，也就是表明自己沒有原則堅定性，也就是表明對於自己的思想沒有信念呵。

人們在那裏暢談官僚主義。官僚主義一語是可用地位主義一語來表示的。官僚主義就是使事業利益服從於升官思想，就是極注重地位而忽視工作，以爭奪補選位置來代替思想鬥爭。這種官僚主義

*別的不說，只須指出一點，就是普列漢諾夫同志在已實行神效的補選以後，已不復被少數派看作『官僚主義集中制』底擁護者了。

確實是絕非黨所願有並且是對黨有害的，於是我就平心靜氣地讓讀者自己來判斷，究竟現時我們黨內鬥爭兩方中間哪一方患有這種官僚主義病症……。人們在那裏說什麼粗暴的機械式的統一手段。粗暴的機械式的手段當然是有害處的，可是我又要讓讀者自己來判斷，如果新方向在和舊方向鬥爭時，竟在尚未使黨信服新觀點正確以前，在尚未向黨敘述這些觀點以前，就硬把自己方面的一些人列入黨機關中去，那難道不是絕頂粗暴，絕頂機械的鬥爭手段麼？

但也許少數派所愛用的字眼具有某些原則意義，表現着某一批與顯然成了這次『轉向』起點的細小局部誘因無關的特別思想吧？也許——如果把爭奪『補選』位置撇開不說——這些字眼終究是另一個觀點體系底反映吧？

我們就從這一方面來觀察問題。這裏我們首先要指出：在同盟裏最先着手作出這種觀察的是普列漢諾夫同志，他當時指出了少數派轉向於無政府主義和機會主義方面的事實，而馬爾托夫同志（他現在感覺氣憤的是並非大家都願意承認他那個立場為原則*立場）在其戒嚴狀況裏却寧願完全迴避這一事件。

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掀起了一個總問題：同盟或某一委員會為自己製定的章程不經中央委員會批准，或違反中央委員會意見，是否能有效力呢？看來，問題是再明顯不過的了：章程乃是組織性底正

*新火星報這樣因列寧似乎不願看見原則意見分歧或否認這些原則意見分歧而感覺氣憤，是再滑稽可笑不過的。如果你們較為原則地對待問題，那你們就會較為迅速地考察我再三指出你們轉向於機會主義方面的聲明。如果你們的立場較為原則一點，那你們就不會如此厲害地把思想鬥爭降低為地位主義的計較。既然你們自己竭力妨礙他人把你們當作講原則的人物看待，那末就請你們埋怨自己吧。例如，馬爾托夫同志在戒嚴狀況裏說到同盟代表大會時，隱瞞了他和普列漢諾夫關於無政府主義的爭論，但同時却又叨叨敘述，說列寧是超中央，說列寧閃一閃眼睛就能使中央發出一道命令，說中央委員會是以得勝的姿態衝進同盟的等等。我毫不懷疑，馬爾托夫同志這樣選擇題材就是證明了他自己的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則性哩。

式表現，而實行組織每一委員會的權力按我們黨章第六項規定是應無條件地屬於中央委員會的；章程要求確定各委員會自治的界限，在確定這種界限方面擁有決定權力的乃是黨底中央機關，決不是黨底地方機關。這是初步道理，而那些說什麼『實行組織』並不常常都以『批准章程』為條件的深奧推論却是純粹幼稚的想法（實則同盟自己也曾表示想要成為一個根據正式章程組成的團體哩）。可是馬爾托夫同志甚至忘記了（也許是暫時忘記了）社會民主主義底初步道理。照他的意見，要求批准章程，只是表明『原先的革命的火星主義的集中制已由官僚主義的集中制所替代』（見同盟記錄第九五頁），同時馬爾托夫同志在同一演詞裏又說他認為這正是『原則問題』所在的地方（見第九六頁），而他在其戒嚴狀況裏却寧願把這個『原則問題』迴避過去了！

普列漢諾夫同志立刻就來回答馬爾托夫，請他不要使用如官僚主義、瞎官習氣等等一類『有傷代表大會體面』的字眼（見第九六頁）。於是他就和馬爾托夫同志對辯起來，因為馬爾托夫同志認為這些字眼是『對於一定方向的原則表述』。當時普列漢諾夫同志也如全體多數派份子一樣，曾按這些字眼底具體意思來加以觀察，明白瞭解到這些字眼並沒包含有什麼原則性的意思，只是包含有所謂『補選性的』意思。雖然如此，但他還是對馬爾托夫輩和捷依契輩那種堅持態度表示讓步（見第九六至九七頁），甘願對他們那些似乎是原則性的觀點來作原則性的觀察。他說『如果真是這樣（就是說，如果各委員會在建立其組織方面，在製定其章程方面，竟是自治的話），那末它們就會是在對整體關係上，對黨關係上實行自治了。這就會甚至不只是崩得派的觀點，而且簡直是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了。確實，無政府主義者是認為各個個體底權利沒有限制，認為它們可能彼此發生衝突，認為每個個體都自行確定自身權利底界限。自治底界限不應當是由該集團自己去確定，而應當是由

它爲其一部分的那個整體來確定。崩得就可作爲如此違背這個原則的明顯的實例。可見，自治底界限是要由代表大會或由代表大會所成立的最高機關來確定的。中央機關底權力應當以道義的和理性的威信爲基礎。這一點我當然是同意的。組織中的任何一員，都應當關心於使機關擁有道義的威信。然而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既然需要有威信，就不需要有權力…把思想底威信和權力底威信對立起來，——這是在此地所不容有的無政府主義辭句』（見第九八頁）。這些原理本來是再淺顯不過的，這原是不容置辯的定理，根本就用不着付什麼表決（見第一〇二頁），至於這種定理之遭到人們懷疑，那就只是因爲『在現今這個時候，各個概念都混淆起來了』（同上）。然而，少數派既滿懷着智識份子的個人主義思想，也就不免要想企圖把代表大會底成果推翻，違抗多數底意志；但這種企圖是只能用無政府主義的辭句來辯白的。非常可笑的是少數派除訴說普列漢諾夫不應該使用如機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等一類過分厲害的名詞而外，再也不能向普列漢諾夫提出任何其他的責備。普列漢諾夫很公正地譏笑這些訴苦聲而質問道：爲什麼『饒勒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字樣不便使用，而 *a lèse-majesté*（得罪陛下）和瞎官習氣字樣則便於使用呢』？這一質問始終沒有得到答覆。這種特異的 *qui pro quo**原是馬爾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及其伙伴們那裏常有的事：他們的新字眼帶有鮮明的『心火』痕跡；當人家指出這一點時，他們就感覺氣憤——說什麼我們是講原則的人兒哩；但是，——人家對他們說道，——如果你們按原則來否拒部分服從整體的制度，那你們就是無政府主義者了。於是他們又因人家使用厲害名詞而感覺氣憤了。換句話說：他們想和普列漢諾夫撕殺，不過硬要普列漢諾夫不去認真攻打他們！

*意即『誤會』。——譯者。

馬爾托夫同志及其他一切『孟什維克』企圖用同樣幼稚的手段揭露我如下一個『自相矛盾』處，已不知幹過多少次了。他們從做什麼？或從致一位同志的信裏引出一些說到思想影響，說到爭影響的鬥爭等等的語句，來同經過黨章實行的『官僚主義』影響，以及倚據於權力的『專制』趨向等等對立。多麼幼稚的人啊！他們已經忘記了，從前，我們黨還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各個部分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掉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為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說造成了一種權力，思想威信變成了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應該服從黨的上級機關。真的，向自己那些老同志來諄諄解釋這樣一個初步道理，甚至是令人覺得不好意思的，特別是當你感覺到，問題僅僅歸結於少數關於選舉問題不願服從多數！然而，在原則上，所有這些滔滔不斷瞎說我有自相矛盾處的責難，完全是歸結於無政府主義的辭句。新火星報並不拒絕利用黨機關底招牌和權力，只是不願服從黨底多數。

如果說這些談論官僚主義的辭句中含有什麼原則，如果說這不是用無政府主義態度否認部分必須服從整體，那這原則就是機會主義底原則，因為機會主義就是要想削弱智識份子對於無產階級黨的責任，削弱中央機關底影響，加強黨內最不堅定份子底自治，認為組織關係不過是要口頭上虛玄承認這種關係。這點我們在黨代表大會上已經看見過，當時阿期莫夫輩和李伯爾輩恰如後來馬爾托夫及其伙伴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那樣大談『猙獰古怪的』集中制。機會主義並不是偶然而是在依其本性，不僅是在俄國而且是在全世界上都引向於馬爾托夫式和阿克雪里羅得式的組織『觀點』，這是我們往下分析到新火星報所載阿克雪里羅得同志一文時就會看出的。

(一六)勿因小節而亂大謀

同盟對認為同盟章程必須由中央批准這一決議案的否決（見同盟記錄第一〇五頁），正如黨代表大會上多數全體所立刻指出的是種『橫蠻違背黨章的舉動』。如果把這樣一種違背黨章的舉動看作是一些講原則者底行動，那它就完全是無政府主義的行動，這一行動在代表大會以後的鬥爭環境中必然要令人發生一種感想，以為黨內的少數是在向黨內的多數『實行報復』（見同盟記錄第一一二頁），這一行動是意味着黨內的少數不願服從黨和不願留在黨內。同盟既拒絕根據中央所作的聲明通過必須改變章程的決議案（見第一二四至一二五頁），結果同盟大會也就不免要被認為是一個非法的大會，因為這個大會雖想算作一個黨組織底大會，同時却又不服從黨底中央機關。黨多數方面的人們也就立刻離開了這個 quasi *黨大會，以便不來參加這齷齪污苟賤的滑稽劇。

於是，那種只願虛玄承認組織關係而在討論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時暴露於觀點錯誤的智識份子個人主義思想，在實踐上就走到了我早在九月間，即在一個半月以前已經預言過的那種邏輯上的結局，即走到了破壞黨組織的地步。恰在這個關頭，即在同盟代表大會完結的那天晚上，普列漢諾夫同志居然向兩個黨中央機關的同事們聲明，說他不忍『射殺自家人』，說他『寧願自盡，不願分裂』，說為着避免更大禍害必須最高限度地在個人關係上實行讓步，實則當時那種極殘酷的鬥爭正是為着爭取這種讓步哩（其程度要比為着擁護那些表現於對黨章第一項條文所持不正確立場中的原則大得無比）。普列漢諾夫同志所實行的這種轉變已經獲得了關係全黨的相當重大意義。為了確切說明他這種轉變，我認為最好不是

*意即「冒充的」。——譯者。

拿私人談話做根據，也不是拿私人信札（這只是在萬不得已時才值得援引的）做根據，而是拿普列漢諾夫自己在全黨面前所作的實情敘述，即拿他發表於火星報第五十二期的不應當做什麼？一文做根據，此文正是在同盟代表大會以後，在我退出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一日）以後，在補選馬爾托夫份子（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寫的。

不應當做什麼？一文底基本意思，就是認為在政策方面不應採取太激烈太不讓步的直綫式的態度，認為有時候無論對修正主義者（即那些和我們接近或態度不一貫的份子中的修正主義者）或無政府個人主義者都必須實行讓步，以求避免分裂。這種抽象普泛的議論當然使得火星報讀者大眾疑惑莫解。普列漢諾夫同志那些漂亮高傲的聲明（在以後各論文中所作的聲明），說人家因不能瞭解他的新穎思想和不懂得辯證法而沒有懂得他的意思等語，真是令人讀之不禁發笑。其實，當不應當做什麼？一文寫成的時候，能够懂得它的只有十來個住在日內瓦附近那兩個名稱開首字母相同的村莊中²⁴的人。普列漢諾夫同志底不幸處，就在於他把僅僅只是向這十來個參加過代表大會後全部反少數派鬥爭的人們發出的一切暗示、非難、代數符號和謎兒，都在成千累萬讀者面前運用起來。普列漢諾夫同志之所以遭到這種不幸，是因為他違背了他所提得很不恰當的那個辯證法底基本原理：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正因為如此，所以用抽象形式把想在同盟代表大會以後向馬爾托夫份子讓步的這種極具體的意圖包裹起來，是不適當的。

普列漢諾夫同志當作戰鬥新穎字眼提出的讓步政策，只有在兩種場合才是正當和必要的：或是在讓步者已相信那些要求讓步者觀點正確的時候（在此種場合，正直的政治活動家總是公開坦白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或是在為了避免更大禍害而向那不合理和有害

於事的要求實行讓步的時候。從該論文中可以完全明白看出作者是指後一場合而言：他爽直地說要對於修正主義者和無政府個人主義者（現在全體黨員已從同盟代表大會記錄中知道這就是馬爾托夫份子）實行讓步，即爲了避免分裂而必須實行讓步。由此可見，普列漢諾夫同志底所謂新穎思想不過是歸結爲一句並不新穎的處世箴言：勿因小節而亂大謀，細小的機會主義蠢事和不大的無政府主義辭句勝於巨大的黨內分裂。普列漢諾夫同志寫這篇論文的時候，分明知道少數派是我們黨內的机会主義翼，並且少數派是用無政府主義手段進行鬥爭的。普列漢諾夫同志主張在同這個少數派鬥爭時要採取在個人問題上表示讓步的手段，猶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同伯恩施坦作鬥爭時作過的那樣（又是 *si licet parva componere magnis*）。伯爾在他自己黨底數次代表大會上曾屢次當衆聲明，說他不知道有什麼人比伯恩施坦同志（並不是如普列漢諾夫同志從前所愛稱呼的那樣稱呼爲伯恩施坦先生，而是稱呼爲伯恩施坦同志）更善於接受周圍人們底影響：我們要把他拿到自家人中間來，我們要把他選派爲國會議員，我們將進行鬥爭來反對修正主義思想，但不是用太激烈的手段（如薩巴克維奇 *Parvus*⁹⁵）來反對這個修正主義者，我們『定能用仁柔手段殺死』（kill with kindness）這個修正主義者，正如瑪、伯爾（*M. Beer*）同志——我記得彷彿是他——在有一次英國社會民主黨人大會上擁護德國人樂於讓步、愛講和平、仁柔、圓滑和慎審態度而反對英國那個薩巴克維奇——漢德曼底攻擊時所說的那樣。同樣，普列漢諾夫同志也是想『用仁柔手段殺死』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兩同志底小無政府主義和小機會主義思想。固然，普列漢諾夫同志完全明顯地暗示到『無政府個人主義者』時故意把修正主義者說得模模糊糊，彷彿他所指的是由機會主義方面轉向於正統派方面來的工人事業社份子，而不是已開始由正統派方面轉向於機會主義方面去的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但這終究是一種幼稚的

軍事計策*，是築得很不高明的工事，根本擋不住全黨公論底砲火。

所以，誰只要認識當時政治時機底具體情況，誰只要仔細考察一下普列漢諾夫同志底心理，那他就會懂得我當時不能有什麼別的作法。我這段話是專對多數派方面說我不應該讓出編輯部的那些人說的。普列漢諾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後已改變態度，已由一個贊成多數派意見的人變成一個堅決主張實行調和的人，但我當時不能不把他這種轉變瞭解為用意極好的轉變。也許普列漢諾夫同志在其論文裏是想提出一個達到善心誠意和平的綱領吧？凡是這樣的綱領都歸結於由雙方誠懇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當時普列漢諾夫同志究竟指出了多數派所犯的什麼錯誤呢？——他指出了只有薩巴克維奇慣於採取的那種太激烈的對待修正主義者的態度。不知普列漢諾夫同志在這裏究竟指的是什麼：是他自己關於驢子的那些挖苦話呢，還是當阿克雪里羅得在場時未免講得極不謹慎的關於無政府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那些話呢，普列漢諾夫同志寧願使用『抽象』說法，並把罪過推到別人頭上。這當然是各人胃口的問題。可是，我無論在致一位火星份子的信裏以及在同盟代表大會上發言中，都公開承認過

*在代表大會以後根本就沒有人談到要對馬爾丁諾夫、阿期莫夫、布魯克爾等同志實行讓步。我未曾聽見說他們也要求『補選』。我甚至懷疑，斯塔羅維爾同志或馬爾托夫同志在他們兩人以『黨內半數』名義遞給我們紙條和『通牒』時，未必和布魯克爾同志商量過……在同盟代表大會上，馬爾托夫同志用剛毅政治戰士義憤填胸的神情提出抗議，說他根本沒有想到要「同梁贊諾夫或馬爾丁諾夫聯合」，說他根本沒有想到要和他們『勾結』，甚至沒有想到可能同他們一起（以編輯員資格）『為黨服務』（見同盟記錄第五三頁）。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嚴厲地指斥了『馬爾丁諾夫的趨向』（見第八八頁），而當奧爾托多克斯同志巧妙暗示說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也許「承認阿期莫夫、馬爾丁諾夫及其他同志同樣有權隨心所欲召集會議，為自己製定章程並依此章程動作起來」（見第九九頁）時，馬爾托夫份子馬上就來否認這點，好似彼得否認他是耶穌底徒弟一樣。（見第一〇〇頁，「奧爾托多克斯同志關於阿期莫夫、馬爾丁諾夫等等的顧慮」，「是毫無根據的」）。

我說話激烈的過失；難道我能不承認多數派方面的這種『錯誤』麼？講到少數派時，普列漢諾夫同志很明白地指出，說他們的錯誤是修正主義的思想（參照他在黨代表大會上關於機會主義和在同盟代表大會上關於饒勒斯主義的評語），以及走到了分裂地步的無政府主義行爲。難道我能阻撓想以在個人問題上表示讓步以及一般用種種“kindness”（慫恻態度，仁柔手段等等）來使大家承認這種錯誤並消除其害處的企圖麼？既然普列漢諾夫同志在不應當做什麼？一文裏直接勸大家『饒恕』『只是由於稍許不一貫』才成了修正主義者的那些修正主義者中的『敵人』，那末我又怎能阻撓這樣一種企圖呢？既然我不相信這種企圖能有什麼良好結果，那末我當時除了在中央機關報方面表示個人問題上的讓步，並爲保護多數派立場而轉到中央委員會裏去以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當時我決不能絕對否認這種企圖可能成功而獨自担起對於分裂危險的責任，因爲我自己在十月六日的信裏也曾想把撕殺解釋爲『個人氣憤』的結果。至於擁護多數派立場一舉，我當時而且現在還認爲是我自己的政治職責。在這方面指靠普列漢諾夫同志是很困難而且很危險的，因爲當時普列漢諾夫同志顯然是決意把他所說『一個無產階級領導人當自

*馬爾托夫同志很中肯地形容了這一點，說我是 avec armes et bagages（帶着武器和行李。——譯者）轉過去的。馬爾托夫同志喜歡使用軍事譬喻：對同盟進行討伐，戰役，不可醫治的創傷等等等等。老實說，我也很愛用軍事譬喻的癖性，特別是在現今從太平洋方面傳來的消息⁹⁶惹人注意的時候。可是，馬爾托夫同志，如果按軍語來說，那末當時事實真相就如下述。我們在黨代表大會上奪得了兩座砲台。你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轟擊了這兩座砲台。在第一次輕易對擊以後，我的一位同僚——一座砲台上的司令官——立刻就實行開門迎敵。於是我當然就帶着我的一尊小砲轉到另一座幾乎尙未鞏固的砲台上去——『避開』人數優越的敵軍。我甚至提議講和：難道可以和兩個強國作戰麼？可是，新的聯軍却拒絕同我講和，逕直實行轟擊我這座『殘存的』砲台。於是我就來開砲自衛。而我的那位過去的同僚——司令官——却帶着堂皇的憤怒神情高喊道：善人君子們，爾看這個張伯倫多麼不愛講和呵！

己的好戰癖性和政治計較相抵觸時便沒有權利迷戀於自己的這種癖性」一語，用辯證法口氣來解釋成爲：如果真要射擊，那就以射擊多數派較爲合算些（按日內瓦十一月間的天氣來說⁹⁷）…。當時必須捍衛多數派立場，因爲普列漢諾夫同志公然違反必須具體周密觀察問題的辯證法要求，說到革命家底善（？）意時居然迴避了對一個革命家的信任問題，對一個領導了我們黨內一個相當翼的『無產階級領導人』的信任問題。普列漢諾夫同志講到無政府個人主義，並勸告大家說『有時』應該優容違背紀律的行爲，說『有時』要向『完全不是由忠實於革命思想的情感所引起的』智識份子放蕩行爲表示讓步，但他顯然忘記了同時也必須顧到黨多數所表示的善意，忘記了關於究竟在何種限度內可能對無政府個人主義者讓步的問題應由實際工作者去解決。和那種幼稚的無政府主義謬說進行文字上的辯論是很容易的，但要和無政府個人主義者在一個組織裏進行實際工作却就很困難了。如果一個著作家公然負責決定對於無政府主義實行可能實際讓步的限度，那他就只是暴露出自己過份的、十足學理主義的、文人的高傲習氣了。普列漢諾夫同志一方面堂皇地宣稱（是如巴查羅夫⁹⁸所說的那樣爲着擺擺資格），說在新分裂一旦發生時工人們將不復瞭解我們，同時他自己却又在新火星報上實行刊載許多論文，其真正的具體的意義是不僅工人們始終不能瞭解，並且根本是天下任何一個人都不能瞭解的。難怪有一個中央委員早在不應當做什麼？一文付印前讀到它時就預告過普列漢諾夫同志，說他這篇文章恰巧打破了他自己想把某些文件（黨代表大會記錄和同盟代表大會記錄）公佈範圍稍微縮小的那個計劃，因爲這篇論文激起一般人底好奇心，把一些含有刺激性而又完全曖昧不明的東西提交街頭人衆去裁判*，必然引起一些疑惑莫解的問題：『究竟是發生

*我們在一所關着門的房屋裏進行了非常熱烈的爭論。忽然我們中間有一個人竟跳起來把兩扇面朝大街的窗門打開，並開口叫罵什麼薩巴克維奇，什麼無政府個

了什麼事情呢？』。無怪乎普列漢諾夫同志底這一篇論文也就因其議論抽象和口吻模糊而使社會民主黨敵人們喜形於色：既使革命俄羅斯⁹⁹方面的作家手舞足蹈，又使解放雜誌方面澈底修正主義者讚揚不已。所有這些可笑而又可悲的誤會，所有這些是普列漢諾夫同志後來很可笑而又很可悲地企圖擺脫過的誤會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他違背了對於具體問題應該完全具體去分析的基本辯證法原理。例如，司徒盧威先生表示歡喜是完全自然的：他根本不願理會普列漢諾夫同志所追求的（但是未必能夠達到的）那些『良好』目的（kill with kindness）；司徒盧威先生歡迎並且也不能不歡迎此時誰都看見已在新火星報上開始發生的那種轉向到我黨機會主義翼方面去的轉變。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不僅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如此——都歡迎各該國社會民主黨內所發生的每一次即令是最小規模和暫時轉向於機會主義方面去的轉變。聰明敵人所作的估計很少是純粹的誤會；請你告訴我說讚揚你的是誰，那我就能告訴你說你錯在什麼地方。普列漢諾夫同志真是枉然指望讀者極不細心，公然說多數派是根本反對在補選方面表示個人問題上的讓步，而不是反對從黨底左翼轉變到右翼方面去。問題實質並不在於普列漢諾夫同志為避免分裂起見實行了個人問題上的讓步（這是很值得褒獎的事情），而是在於他雖完全承認必須和那些態度不一貫的修正主義者以及無政府個人主義者爭論，但他却又寧願來和多數派爭論，而他所以和多數派發生分歧，又只是由於對無政府主義可能實行實際讓步的限度

人主義者，什麼修正主義者等等。自然，在大街上就有一羣好奇的游蕩人集合起來，而我們的敵人就來幸災樂禍。那時，其他參加爭論的人也走到窗門近前，表示願把問題從頭到尾敘說清楚，不去暗示那些誰也不知道的事情。此時却忽然有人把窗門關上；說什麼用不着說及無謂爭鬧（見火星報第五十三期，第八頁，第二欄，倒數第二十四行）。普列漢諾夫同志呵，如果說本來用不着在火星報上開始說起『無謂爭鬧』來，那才真對了！

問題。問題實質並不在於普列漢諾夫同志改變了編輯部底人員成份，而是在於他已經叛變他自己要和修正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爭論的立場，已經停止在黨中央機關報上捍衛這個立場。

至於說到當時算是多數派唯一有組織的代言機關的中央委員會，那末普列漢諾夫同志當時和它（中央委員會）發生分歧，就只是由於對無政府主義可能實行實際讓步的限度問題。自我於十一月一日退出編輯部而讓 kill with kindness 政策可以自由進行的時候起，幾乎已有一月之久了。普列漢諾夫同志有充分可能用各種往來方法考驗這一政策是否中用。普列漢諾夫同志在這時期內發表了自己所著不應當做什麼？一文，這篇論文曾經是而且現在還是馬爾托夫份子走入編輯部裏去的唯一所謂入場券。兩個口號——修正主義（應該用饒恕敵人的條件來同這個修正主義進行爭論）與無政府個人主義（必須用仁柔辦法殺死的手段來使這個無政府個人主義馴服就範），在這個入場券上刊印得特別鮮明。諸位先生，請進吧，我會以仁柔手段殺死你們，——普列漢諾夫同志在這個請帖上向其新編輯部同僚們所說的話就是如此。自然，中央委員會只得說出自己的最後一言（而最後通牒也就是關於可能和平的最後一言哩）說從它的觀點來看，究竟在何種限度內可以容許對於無政府個人主義實行實際的讓步。或者是你們願意和平，那時我們就會給你們一定數量的位置，來證明我們態度仁柔、愛講和平、願意讓步等等（我們為保障黨內和平所能給予你們的不過如此，和平並不意味着沒有爭論，而是意味着不許無政府個人主義來破壞黨）。請你們接受這些位置和漸漸從阿期莫夫方面回轉到普列漢諾夫方面來吧。或者是你們想保持並發展你們自己的觀點，最終地轉到（那怕單祇是在組織問題方面）阿期莫夫方面去，想使黨信服你們理直和普列漢諾夫理曲，——那時就請你們組織你們自己的著作團體，取得參加代表大會的代表資格，並開始用誠實鬥爭和公開論戰的手段爭得多數吧。中央委

員會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最後通牒內（見戒嚴狀況和同盟記錄評註*）向馬爾托夫份子們提得完全明白的這個二中擇一的問題，實與我和普列漢諾夫兩人於一九〇三年十月六日寫給前編輯員們的那封信底內容完全相合：或者是個人的怒火（那時就也可以——在萬不得已時——實行『補選』），或者是原則性的分歧（那時就須起初把黨說服，然後才談得到改變中央機關人員成份問題）。中央委員會當時有理由讓馬爾托夫份子們自己來解決這個二中擇一的難題，尤其因為正是當時馬爾托夫同志在其 profession de foi**（再一次處在少數地位）裏寫過如下一段話。

『少數派只希圖獲得一種榮幸，即想在我黨歷史中破天荒第一次作出一個榜樣來看：在落到『敗北者』地位時可以不組織新黨。少數派底這樣一種立場是導源於他們對黨組織發展過程的全部見解，是導源於他們對他們自己和已往黨工作間的堅固聯系的認識。』

*至於馬爾托夫在戒嚴狀況裏用援引私人談話等等胡亂歪曲中央這個最後通牒的那套把戲，我當然不會加以分析。他這套把戲就是我在前一章裏已經描寫過的『第二種鬥爭手段』，這套把戲是只有神經醫生才有本事把它弄明白的。別的不說，只須指出一點，就是馬爾托夫同志在那裏硬說他們和中央訂立過關於不公布談判情形的協定，實則這樣一種協定不管怎樣探求也是至今沒有找到的。當時代表中央進行過談判的特拉文斯基同志曾用書面通知我，說他認為我有權在火星報以外的刊物上發表我致編輯部的信。

馬爾托夫同志那裏只有一個字眼是我特別喜歡的。這個字眼就是『最壞的拿破崙主義』。我覺得馬爾托夫同志把這個概念提得十分湊巧。讓我們來冷靜地看看這個概念究竟是意味着什麼吧。在我看來，這個概念是意味着用形式上合法而實質上違反人民（或黨）意志的手段來獲得政權。馬爾托夫同志，你難道認為不是這樣麼？如果是這樣，那我就平心靜氣地讓公眾來判斷，究竟是誰表現過這種『最壞的拿破崙主義』：是本來能夠倚據第二次代表大會意志運用自己可以不容許馬爾托夫份子進來的形式權利，但卻沒有運用過這種權利的列寧和依格勒克呢；還是在形式上正當地佔據了編輯部（『一致意見的補選』），但明明知道這在實質上是不符合第二次代表大會意志，並害怕由第三次代表大會來測驗這種意志的那些人呢？

**意即『信條錄，綱領，世界觀』。——譯者。

少數派不相信『紙上革命』底神祕力量，認為自己的志願有其深刻的生命的根據，能確保他們在黨內用純粹思想宣傳手段來使自己的組織原則獲得完全的勝利』（着重點是我加的）。

多麼漂亮，多麼高傲的言辭呵！我們根據經驗確信這些言辭只是些言辭時，又是多麼感覺沉痛呵… 馬爾托夫同志呵，對不起，現在我要代表多數派表示希圖獲得你們沒能獲得的這種『榮幸』了。這種榮幸真是偉大，值得爲它而爭鬥一下，因爲小組習氣的傳統給我們留下了非常輕易進行分裂和非常熱心運用『或是反目，或是接吻』這一慣例的習氣。

* * *

大謀（保證有統一黨）本應壓倒並且果然壓倒了小節（爲補選問題進行無謂爭鬧）。我退出了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依格列克同志（他是由我和普列漢諾夫推舉爲代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參加總委員會的）退出了總委員會。馬爾托夫份子用一封等於宣戰的信（見我們所已引錄過的那本書）來回答了中央委員會關於和平的最後一言。那時，並且直到那時，我才向編輯部寫信（火星報第五十三期）說到公論問題。我說，如果真要談到修正主義問題，真要爭論到不一貫性和無政府個人主義行爲問題，真要爭論到各種領導人底失敗問題，那末就讓我們大家照實說出，毫不隱諱地把全部事實真相敘說出來吧，——這就是我那封談到公論問題的信底內容。編輯部對這封信所給的回答是肆口謾罵，並堂皇訓誡道：切不可掀起『小組生活中的瑣事和無謂爭鬧』…（見火星報第五十三期）。那時，我就暗想道：啊，原來是『小組生活中的瑣事和無謂爭鬧』…， es ist mir recht，諸位，這點我倒是同意的。那末你們就是把『補選』糾紛公開叫作小組性的無謂爭鬧了。這是真情實話。可是，當同一個（彷彿是同一個）編輯部在同一期——第五十三期——社論上又談起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來時，那就令人覺得是唱『異

調』了*。你不應掀起關於爲中央機關報編輯部補選而鬥爭的問題，因爲這是無謂爭鬧。我們却要掀起關於中央委員會補選的問題，並且認爲這不是無謂爭鬧，而是關於『形式主義』問題的原則分歧。——不呀，親愛的同志們，對不起，這樣的事情，我可不會讓你們來幹了。你們要想向我這座砲台開火，同時又要我把大砲交給你們。真是開玩笑的人兒呀！於是我就寫了一封『致編輯部的信』（爲什麼我退出了火星報編輯部？），並在火星報以外把它發表出來；我在這封信裏簡略敘說事實真相，並再三查問可否按你們領得中央機關報而我們領得中央委員會的分配原則奠定和平。任何一方都不會覺得自己在自己黨內『人地生疏』，至於向機會主義方面的轉變，那末我們且來爭論爭論，首先在刊物上爭論，然後也許還要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上去爭論。

一聽見我提及和平，於是所有敵人的砲壘——一直包括總委員會在內——立刻就開起砲來回答。砲彈如冰雹一般落下來。專制魔王，施維采爾，官僚主義者，形式主義者，超中央，片面性的人，直線式的人，生性執拗的人，眼光狹小的人，疑心多端的人，不講和氣的人…好極了，我的朋友們呀！你們射完了麼？在你們的武庫內再沒有什麼東西了麼？你們的砲彈原來很不中用呀…

現在要由我來說話了。現在我們來看看新火星報所謂新組織觀點底內容，以及這些觀點對於我們黨劃分爲『多數派』和『少數派』的關係；至於這種劃分底實質，那我們在分析第二次代表大會討論情形和表決情形時已經說明過了。

*後來事實證明這種『異調』只是因爲中央機關報編輯部成份裏有異調。論『無謂爭鬧』的文章是普列漢諾夫寫的（見他在可悲的誤會中的自供，第五十七期），而社論我們的代表大會則是馬爾托夫寫的（見成嚴狀況，第八四頁）。真是各唱各的調子。

(一七)新火星報。組織問題 方面的機會主義

在剖解新火星報底原則立場時，無疑是應把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兩篇雜感文* 當作基本對象來考察。關於他所愛用的那一套字眼底具體意義，我們在上面已經詳加指明，現在我們應當把這種具體意義撇開不說，仔細考察『少數派』（由於某種細小瑣屑的誘因）所由得出正是這些——並非其他什麼——口號的思維歷程，考察這些口號底原則意義，不管其淵源如何，不管什麼『補選』問題。目前我們正處於『讓步』空氣濃厚的時機，那末就讓我們對阿克雪里羅得同志讓一讓步，把他的『理論』『認真看待』一下吧。

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底基本提綱（見火星報第五十七期），是說『我們的運動自始就含有兩種對立趨向，這兩種趨向互相對抗的程度不能不隨同運動本身的發展而發展，並且不能不反映到這個運動上來』。這就是說：『在原則上，運動底無產階級目的（在俄國）是與西方社會民主派底目的相同』。可是，我們這裏影響工人羣衆的是『非工人的異己社會成份』，即急進智識份子。總之，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是說我們黨內存在有無產階級趨向和急進智識份子趨向互相對抗的形勢。

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在這一點上說得絕對正確。這裏（並且不僅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確實是存在有這種對抗。並且，大家知道：現代社會民主運動分成爲革命（亦即正統）社會民主派和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閣員主義，改良主義）社會民主派這一在我們俄國最

*這兩篇雜感文已編進兩年來的火星報論文集，一九〇六年聖彼得堡版，第二冊，第一二二及以下各頁。（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近十年來運動中也已暴露得充分明顯的情形，大部分也正因為存在有這種對抗。同時大家又知道，正統的社會民主派所表現的正是運動中的無產階級趨向，而機會主義社會民主派所表現的則是民主智識份子的趨向。

可是，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接近到這個盡人皆知的事實時就表示畏縮，向後退走。他絲毫也沒有試圖分析分析，究竟上述那種劃分一般地在俄國社會民主運動史上，尤其是在我們黨代表大會上有怎樣的表現，雖則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所論述的正是代表大會！阿克雪里羅得同志也如新火星報全體編輯員那樣，對這次代表大會記錄表現着怕得要死的心理。雖說我們看了上述一切以後已不應對此表示驚奇，然而一個彷彿在研究我們運動中各種趨向的『理論家』表現這種心理，却就是一件害怕真情的奇異事實了。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既因自己具有這個特性避開了關於我們運動中各種趨向的最新穎最準確的材料，於是就到適意的幻想中去尋找救路。『難道合法馬克思主義或半馬克思主義不是給予了我國自由派一個文藝領袖麼，——他說道。——爲什麼慣於惡作劇的歷史，就不可從正統革命馬克思主義學派中間提出一個領袖來賜給革命資產階級民主派呢？』。講到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深覺適意的這種幻想時，我們只能說，如果歷史有時真也惡作劇，那還不能辯護一個儼然從事分析這個歷史者底思想惡作劇。當那位半馬克思主義派領袖顯現成爲一個自由主義者時，願意（並且善於）考察他的『趨向』的人當時所引爲根據的並不是什麼可能的歷史惡作劇，而是這位領袖所有心理和邏輯底數十百種表現，而是他那全部著作家面貌上表明着馬克思主義反映於資產階級作品中的種種特徵。如果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儼然從事分析『我們運動中的一般革命趨向和無產階級趨向』時，竟絲毫——真是絲毫——沒能證明並指明他所仇視的我黨正統翼中的某些某些代表人物所具有的某些趨向，那他就不過是堂皇證實他自己思想貧乏。

罷了。既然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已只好援引什麼可能的歷史惡作劇，那末他的事情想必是糟糕到極點了！

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所持的另一論據，即援引『雅可賓派』的論據，更是值得玩味。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想必知道，現代社會民主運動劃分為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早已——並且不僅在俄國——使人去借用『法國大革命時代底歷史比擬』。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想必知道，現代社會民主運動中的基朗特派隨時隨地都借用『雅可賓主義』，『布朗基主義』等類名詞來形容自己的對方。我們不會去學阿克雪里羅得同志那樣害怕真情，而要去考察我們代表大會底記錄，看這些記錄中間究竟有沒有什麼材料可供我們分析並檢驗現在我們所考察的這些趨向和我們所解剖的這種比擬。

第一個例子。黨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綱問題的爭論。阿期莫夫同志（他是對馬爾丁諾夫同志意見表示『完全贊同』的）發言稱：『論奪取政權（即論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段條文規定得和其他各國社會民主黨黨綱大不相同，有人可能並且普列漢諾夫確實把它作出這樣一種解釋，即認為負有領導責任的組織應把受它領導的那個階級推到後面去，應把它自己和那個階級隔開。因此，我們的政治任務也就表述得完全如『民意』黨一樣』（見記錄第一二四頁）。普列漢諾夫同志及其他火星份子當即反駁阿期莫夫同志，指斥他為機會主義者。阿克雪里羅得同志難道看不出這次爭論是向我們表明（不是在臆造的歷史惡作劇中表明，而是事實上表明）社會民主黨內有現代雅可賓派和現代基朗特派相對抗麼？阿克雪里羅得同志豈不是由於他自己落到（因他犯了那些錯誤而落到）社會民主黨內基朗特派伙伴中去了才說起什麼雅可賓派來的麼？

第二個例子。坡薩多夫斯基同志認為在關於『民主原則底絕對價值』這一『基本問題』上發生了『嚴重意見分歧』（見第一六九頁）。他和普列漢諾夫一起否認民主原則底絕對價值。『中派』或

泥潭派首領（葉哥羅夫）和反火星派首領（哥里德卜拉特）當即堅決表示反對這點，認為普列漢諾夫是『仿效着資產階級的策略』（見第一七〇頁），——這正是阿克雪里羅得同志認為正統派與資產階級趨向相聯系的意見，不過阿克雪里羅得始終沒有把這個意見具體說明，而哥里德卜拉特則把它同一定的辯論連成一氣。我們又來問問：阿克雪里羅得同志難道沒感覺到這次爭論也是向我們具體（在我們黨代表大會上）表明現今社會民主黨內有雅可賓派和基朗特派相對抗麼？阿克雪里羅得同志豈不是由於他自己落到基朗特派伙伴中去了才高喊起反對雅可賓派來的麼？

第三個例子。關於黨章第一項條文的爭論。究竟是誰在捍衛『我們運動中的無產階級趨向』呢，誰在強調說明工人不怕組織，說明無產者不同情於無政府狀態，說明無產者重視『組織起來！』這一口號底興奮作用呢？究竟是誰叫人防備那些浸透機會主義思想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呢？是社會民主黨中的雅可賓派。究竟是誰在暗中把急進智識份子引進黨裏來呢，是誰在關懷大學教授和中學生，關懷着單個人物，關懷着急進青年呢？是基朗特份子阿克雪里羅得和基朗特份子李伯爾。

阿克雪里羅得同志該是多麼笨拙地抗辯我們黨代表大會上公開散播起來指斥『勞動解放』社多數的那個『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啊！他所用的那種抗辯手段，不過是附和伯恩施坦派妄說什麼雅可賓主義，什麼布朗基主義等等的陳腐論調來證實這個罪名有根據罷了！他所以高喊什麼急進智識份子底危險，是爲了掩飾他自己在黨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那些分明暴露他關懷急進智識份子的言論。

運用雅可賓主義等等『嚇人字眼』，不過是暴露自己懷着機會主義思想罷了。與已覺悟到本身階級利益的無產階級底組織緊相聯繫的雅可賓派份子，也就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眷念大學教授和中學生，害怕無產階級專政，迷信民主要求有絕對價值的基朗特派

份子，也就是機會主義者。現在，把政治鬥爭縮小為密謀行動的思想已在刊物上被駁斥過數千百次，早已為實際生活所駁倒所排擠了，羣衆政治鼓動底根本重要意義已被闡明和反覆說明，以至令人聽來作嘔了，因此現在只有機會主義者還會認為密謀組織是一種危險。人們懼怕密謀主義，懼怕布朗基主義，其實並不是（不是如伯恩施坦及其伙伴們早已就在那裏徒然指明的那樣）由於人們在實際運動中發現過某種徵候，而是由於人們懷有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那種常在現代社會民主黨人中間顯現出來的基朗特主義怯懦心理。最滑稽可笑不過的，就是新火星報妄想說出一種新意見（其實這種意見早已有人說過幾百次了），作為一種防範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法國革命密謀家策略的表示（見第六十二期上的社論）。在火星報最近一期上，現代社會民主黨中的基朗特派也許會想來向我們證明，說四十年代法國密謀家中有些人把認為必須在工人羣衆中間進行政治鼓動這一思想，把認為工人報紙是黨用以影響階級的基本工具這一思想看作早已家喻戶曉無須說明了的粗淺道理了吧。

可是，新火星報力圖用發表新意見的神情重述舊事和咀嚼粗淺道理，這並不是由於什麼偶然的原因，而是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落到我黨機會主義翼中去了的那種地位不免要產生的結果。處在怎樣的地位，也就得怎樣來作。所以也就只好重複機會主義詞藻，只得向後退走，以圖在很遠的過去當中找到少許理由來辯護自己的立場，因為這個立場從代表大會鬥爭方面來看，從代表大會上所形成的各種色彩和黨內劃分方面來看，是無法辯護的。阿克雪里羅得同志除運用阿期莫夫式妄談雅可賓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的奧理而外，還運用着阿期莫夫式的怨言，說不僅『經濟派』而且『政治派』也患有『片面性毛病』，也過分『迷戀』等等，等等。當你讀到大言不慚，自命為超乎上述一切片面性毛病和迷戀態度者的新火星報暢談這個題目的高傲言論時，你會惶惑莫解地問道：他們究竟是在模

仿着什麼人，究竟是從什麼地方聽見了這種議論的呢？試問誰不知道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分成爲經濟派和政治派的時期早已過去了呢？你們看看黨代表大會以前一兩年間的火星報，便能看出，反對『經濟主義』的鬥爭早在一九〇二年間就已平息下去，完全停止了；便能看出，例如在一九〇三年七月間（第四十三期），人們已認爲『經濟主義時代』『已最終過去了』，認爲經濟主義『已被最終埋葬了』，認爲政治派底迷戀顯然是一種隔世遺傳的表現。火星報新編輯部究竟根據什麼理由來重複提起這個已被最終埋葬了的劃分呢？難道我們在代表大會上和阿期莫夫輩鬥爭，是因爲他們兩年以前在工人事業雜誌上犯過一些錯誤麼？如果我們這樣來作，那我們就未免是十足的蠢漢了。可是，誰都知道我們並沒有這樣來作，我們在代表大會上和阿期莫夫輩鬥爭，並不是因爲他們在工人事業雜誌上犯過已被最終埋葬了的舊錯誤，而是因爲他們在代表大會上發言和表決時犯了新錯誤。我們並不是以他們在工人事業雜誌上的立場，而是以他們在代表大會上的立場爲根據來判斷，究竟哪些錯誤已經真正消除，哪些錯誤仍然存在着，因而使爭論成爲必要。到舉行代表大會時，經濟派和政治派的舊劃分已不存在，但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趨向仍然存在着，這些趨向會表現於對許多問題的討論和表決情形中，並終於引起了黨分成爲『多數派』和『少數派』的新劃分。全部問題實質，就是火星報新編輯部因某些很明顯的原因力圖模糊這種新劃分和我們黨內現代機會主義派間的聯系，因此也就不得不離開新的劃分而退回到舊的劃分那裏去。既不善於說明新劃分底政治淵源（或者說，既想爲了讓步目的設法蒙蔽* 這種淵源），也就不得不反覆咀嚼早已過去的舊劃分。大家都知道，新劃分底基

*見火星報第五十三期上所載普列漢諾夫論「經濟主義」一文。在該文副題上大概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排印上的錯誤。「論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的幾點公開意見」幾字顯然是「論同盟代表大會」或也許是「論補選」幾字之誤。雖然在相當條件下

因是在組織問題上發生的分歧，其開端是對於組織原則（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的爭論，其結局便是只有無政府主義者才幹得出來的『實踐』。經濟派和政治派間舊劃分底基因主要是在策略問題上所發生的分歧。

這種由黨生活方面真正是當前迫切的更為複雜問題退回到早已解決和現在又被勉強挖掘出來的問題上去的行為，新火星報力圖用一種只可稱為尾巴主義的可笑奧理加以辯護。阿克雪里羅得同志首倡出來的那個始終貫徹於新火星報一切言論的深奧『思想』，就是認為內容重於形式，認為黨綱和策略重於組織，認為『組織底生命力與它所灌輸給運動的那種內容底規模和意義成正比例』，認為集中制不是『自滿自足的東西』，不是『萬應靈丹』等等，等等。這是多麼深刻而偉大的真理呵！黨綱確實重於策略，策略重於組織。識字課重於品詞論，品詞論重於造句學，——可是，關於那些在考試造句學時沒有及格而現在居然搖頭擺尾妄以自己留級誇的人們，又當怎樣說呢？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在組織原則問題上是像一個機會主義者那樣推論了的（關於黨章第一項），在組織中間又是像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那樣行動了的（在同盟代表大會上），現在他却來加深社會民主主義。真是自不量力呵！其實，什麼是組織呢？它不過是一種形式罷了；什麼是集中制呢？它並不是萬應靈丹；什麼是造句學呢？它並不如品詞論那樣重要，而不過是把各個單字結合起來的形式罷了…『如果我們說，代表大會規定黨綱要比它通過無論怎

可以作些關於個人要求的讓步，然而決不可容許——不是從庸人觀點而是從黨性觀點上看來不可容許——把黨所關懷的種種問題混淆起來，不可容許把已經開始由正統派方面轉向到機會主義方面去的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所犯的新錯誤問題，偷換為現時在許多綱領問題和策略問題上也許願意由機會主義方面轉向到正統派方面來的馬爾丁諾夫和阿克莫夫所犯的舊錯誤（即現在只有新火星報才回憶到的錯誤）問題。

樣完善的黨章更能促進黨工作集中化，難道亞歷山大洛夫同志不會同意我們的說法麼？」——火星報新編輯部帶着得勝神情問道（見第五十六期附張）。這個典型句子想必會獲得極為廣大和極為鞏固的歷史名聲，正如克里切夫斯基同志所說社會民主派也如全人類一樣始終只抱定可以實現的任務的那個著名語句那樣。新火星報底這個奧理，正是與此如出一轍哩。爲什麼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底這個語句受到了譏笑呢？原來就是因爲他用了一些假冒哲學的鄙俗議論來辯護某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在策略問題方面的錯誤，辯護他們不會正確提出政治任務的弱點。同樣，新火星報也是用一些妄說黨綱重於黨章，黨綱問題重於組織問題的鄙俗議論，來辯護某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在組織問題上的錯誤，來辯護某些同志陷到無政府主義空談地步的那種智識份子不穩定性！這難道不是尾巴主義麼？這難道不是以落考留級自誇麼？

通過黨綱要比通過黨章更能促進工作集中化。你看，這種冒充哲學的鄙陋議論該是包含有多麼濃厚的急進派智識份子精神，即與資產階級頹廢思想相距極近而與社會民主主義相差極遠的急進派智識份子精神啊！集中化一語在這個名句中完全是瞭解爲象徵式的意義。如果這個名句底作者們不善於或不願意思索，那末他們至少也不妨回憶回憶一件簡單的事實：我們和崩得份子共同通過黨綱一舉不僅沒有使我們共同的工作集中化，並且沒有使我們免除分裂。在黨綱問題方面和在策略問題方面一致是保證黨內統一，保證黨工作集中化的必要條件，但還不是足夠的條件（上帝呵！在現今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時候，是須得咀嚼怎樣粗淺的道理呵！）。爲要保證黨內統一，爲要保證黨工作集中化，還需要有組織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在一個多少超出家庭式小組範圍的黨內若沒有正式規定的黨章，若沒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若沒有部分服從整體的原則，是絕對辦不到的。從前，當我們在綱領和策略的基本問題上還沒

有一致時，我們會直截說明我們是處在離散狀態和小組習氣盛行時代，我們會直截聲明說在統一以前必須劃清界限，我們當時根本沒有說到共同組織底形式，而只談到我們在綱領和策略方面同機會主義鬥爭的那些新問題（這在當時確實是些問題）。現在我們大家都認為這個鬥爭已保證了表述於黨的綱領和黨的策略決議上的充分的一致；現在我們必須實行往下一個步驟，於是我們也就根據我們大家同意實行了這個步驟：我們規定了把所有一切小組溶合為一個統一組織的形式。現在人們却把我們拉轉去了，把這種形式破壞了一半，把我們拉轉去幹無政府主義行爲，拉轉去講無政府主義空話，拉轉去恢復小組以代替黨編輯部，而現在又以說什麼識字課要比造句學更能促進文理通順等語來辯護這種退步了！

三年以前盛行於策略問題方面的尾巴主義哲學，現在又在組織問題方面復活起來了。試看看新編輯部所發表的一段議論吧。『戰鬥的社會民主主義路線，——亞歷山大洛夫同志說道，——在黨內應當不只是用思想鬥爭來實現，而且是要用一定的組織形式來實現』。編輯部教訓我們道：『這樣把思想鬥爭和組織形式相提並論是多麼雅觀呵。思想鬥爭是一種過程，而組織形式却不過是些…形式』（在第五十六期附張第四頁第一欄下面真是這樣刊印着的哩！），『這些形式應當包裹着一種流動着發展着的內容，即發展着的黨的實際工作』。這種說法真與那說鐵球是鐵球而炸彈却是炸彈的笑話毫無二致。思想鬥爭是一種過程，而組織形式却不過是些包裹着內容的形式！問題却在於究竟我們的思想鬥爭是由較高的形式，即由大家必須遵照的黨組織形式所包裹着呢，還是由舊時離散狀態和舊時小組制度的形式所包裹着呢。人們把我們從較高的形式拉轉到較原始的形式上去，並且還來實行辯白說：思想鬥爭是一種過程，而組織形式却不過是些形式。這正好似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從前把我們從計劃策略拉轉到過程策略上去一樣。

試看新火星報爲反對似乎只看見形式而看不見內容的人時所說的這些暢談『無產階級自我修養』的大話吧（第五十八期上的社論）。難道這不是第二號阿期莫夫主義麼？第一號阿期莫夫主義會藉口『無產階級鬥爭』底更『深刻』內容，藉口無產階級自我修養來辯護某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智識份子，在策略任務提法方面的落後性。第二號阿期莫夫主義，也以妄說組織不過是形式而全部問題實質都在於無產階級自我修養等同樣深奧的理由，來辯護某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智識份子在組織底理論和實踐問題方面的落後性。關心小弟弟的先生們呵，無產階級是不害怕組織和紀律的！無產階級是不會焦心於要那些不願加入組織的大學教授先生和中學生先生，只因他們在黨組織監督下工作，就被承認爲黨員的。無產階級由其全部生活養成組織精神，要比許多智識份子澈底得多。凡是對我們黨綱和策略稍有認識的無產階級份子，都不會以形式不如內容重要爲口實來辯護組織方面的落後性。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我們黨內某些智識份子，在組織和紀律方面缺乏自我修養，在仇視和鄙棄無政府主義辭藻方面缺乏自我修養。第二號阿期莫夫輩現在誣蔑無產階級，說它還沒有成熟到組織起來的地步，也如第一號阿期莫夫輩從前誣蔑無產階級，說它還沒有成熟到進行政治鬥爭的地步一樣。業已成爲自覺社會民主主義者並感覺到自己是黨員的無產者，一定會用十分鄙棄的態度排斥組織問題方面的尾巴主義，也好像它從前用十分鄙棄的態度排斥了策略問題方面的尾巴主義一樣。

最後，又請看新火星報方面那位『實際工作者』底深奧思想吧。他說：『如果真正要想建立一個能將革命家活動』（加深意思的着重點）『統一集中起來的『戰鬥』集權組織，那末此種思想就只有在這種活動已經具備時才會自然見諸實現』（真是既新穎，又聰明呵）；『組織本身作爲一種形式』（聽呀，聽呀！），『只能隨同』（這裏以及這段引證中所有其他各處着重點，都是該作者自

已加上的)『構成其內容的革命工作增長而長成』(第五十七期)。這豈不是又和民間故事中那個不識時務的人物遇見人家送葬時高喊『恭喜恭喜』的笑話一模一樣麼？我們黨內想必沒有哪一個實際工作者(不加括弧的實際工作者)不瞭解：我們活動底形式(即組織)早已就落後於內容，並且是極端落後於內容；只有黨內不識時務的人物才會向落在後面的人們叫喊，說什麼『跟着走！』，『不要搶上前去』。例如，試拿我們黨來和崩得比較一下吧。毫無疑義，我們黨底工作內容* 要比崩得底工作內容豐富，周備，廣闊而深刻得不可計量。理論規模更廣大得多，綱領更發展得多，對於工人羣衆(而不僅僅是對於有組織的手工業者)的影響更寬廣更深刻得多，宣傳鼓動工作更周備得多，先進份子和普通份子底政治工作的脈搏更活躍得多，在示威和總罷工時進行的人民運動更宏偉得多，在非無產者階層中進行的工作更堅強得多。可是『形式』怎樣呢？我們工作底『形式』和崩得工作底形式比起來竟是落後得不成樣子，落後到極點，使得每一個不以『袖手旁觀』態度對待自己黨內事務的人都觸目傷心，感覺慚愧了。工作組織比工作內容落後的情形是我們的病痛處，並且遠在召集代表大會以前，遠在組委尚未成立以前，就已經是我們的病痛處了。由於形式不成熟，不堅固，就使我們無法實行繼續前進的重大步驟來發展內容，就引起可恥的停滯，使得力量浪費，使得言行不符。大家都深以這種言行不符爲苦，但阿克雪里羅得輩和新火星報方面的『實際工作者』輩，却竟在這時帶着深思神情鼓吹道：形式只應當隨同內容來自然長成！

*更不必說，我們黨的工作內容在代表大會上按革命社會民主派精神確定(在黨綱等中等中確定)，只是由於鬥爭的結果，只是由於我們與那些在『少數派』內佔大多數的反火星派份子和泥潭派份子鬥爭的結果。同樣，關於『內容』問題，例如還不妨把舊火星報所出版的六期(第四十六至五十一期)與新火星報所出版的十二期(第五十二至六十三期)比較一下。不過這且讓我們另外有機會時再說吧。

你看，當人們忽然想加深荒唐議論並以暢談哲理的神情辯護機會主義辭藻的時候，在組織問題（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上所犯的小錯誤竟引起怎樣的結局來了呵。慢慢兒走，畏縮不前地迂迴行走！——從前我們聽見人家用這個調子處置策略問題；現在我們又聽見人家用這個調子處置組織問題。無政府個人主義者開始實行把自己的（起初也許是偶然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推崇為觀點體系，推崇為一種特別原則意見分歧時，從他的心理中間就自然必然要產生出組織問題上的尾巴主義思想。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我們已看見了這一無政府主義底開端；在新火星報上，我們又看見人家企圖把這一無政府主義推崇為觀點體系。這種企圖十分明顯地證實了我們在黨代表大會上已經表示過的意見，即認為歸附於社會民主運動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觀點和覺悟到本身階級利益的無產者底觀點迥然不同。例如，我們已認識其深奧思想的新火星報上那位『實際工作者』揭發我的罪狀，說我把黨想像成爲一個以中央委員會爲廠長來主持的『龐大工廠』（見第五十七期上的附張）。這位『實際工作者』根本沒有料想到，他所提出來的嚇人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他既不知無產階級組織底實踐，又不知無產階級組織底理論爲何物的那種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心理。工廠在有些人看來不過是個可怕的怪物，實則工廠正是把無產階級統一起來，使它紀律化，教它學會組織，使它成爲其餘一切被剝削勞動民衆首腦的那個最高的資本主義協作形式。馬克思主義乃是受到資本主義訓練的無產階級底思想體系，它正是教導了並教導着那些不穩定的智識份子要怎樣把工廠底剝削作用（基於飢餓威脅的紀律）和工廠底組織作用（基於由技術高度發展的生產條件統一起來共同勞動的紀律）辨別清楚。正因爲無產階級在工廠『學校』中受到訓練，所以它特別容易領會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所很難領會的紀律和組織。害怕這個學校如洪水猛獸，完全不瞭解這一學校底組織作用，便是反映小資產階級生活條件的

一種標本觀點，由此就產生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所稱爲 *Edelanarchismus* 的無政府主義，即所謂「貴族式的」無政府主義，我則認爲不如把它稱爲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這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俄國虛無主義者所特具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兇惡可怕的「工廠」；部分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見阿克雪里羅得底雜感文），他們一聽見在中央領導之下實行分工，便發出可憐而又可笑的狂吠，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絲釘」（而他們認爲變得特別嚇死人的，就是變編輯員爲同事），他們一聽見有人提起黨底組織章程，便裝出看不起人的樣子，發出鄙視的（向「形式主義者」發出的）意見，說完全不耍章程也是可以的。

這是難於置信的，但這是事實：馬爾托夫同志在火星報第五十八期上正是向我提出這樣一種訓誡式的意見，並爲更加使人信服而援引我在給一位同志的信裏所說的話。援引離散狀態和小組習氣盛行時代的例子來辯護在黨性確立時代保存讚美小組習氣和無政府狀態的行爲，這難道不是「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麼，這難道不是尾巴主義麼？

爲什麼從前我們用不着章程呢？因爲當時黨是由一些彼此沒有任何組織聯系的單個小組所組成的。當時由這一個小組轉到另一個小組裏去只是某一個人「自願意志」的事情，並沒有任何正式規定的整體意志爲其行動的準繩。解決各個小組內部的爭論問題時不是根據章程行事，而是採取着「鬥爭和以退出相要挾」的手段，正如我在給一位同志的信裏根據許多小組以及當時我們六人編輯團底經驗來形容過的那樣。這種現象在小組時代原是自然不可避免的現象，可是誰都沒有想到要讚美它，沒有想到要把它當作理想；大家都會埋怨這種離散狀態，大家都會引以爲苦，大家都會渴望把各個零星小組溶合爲一個正式形成的黨組織。現在這種溶合已經實現

了，可是有人硬把我們拉往後退，用假冒爲最高組織觀點的無政府主義辭藻來款待我們！在那些過慣了家庭式小組安閑逸樂生活的人們看來，正式規定的章程是太狹隘，太窄狹，太繁重，太粗鄙，太帶官僚主義性，太帶農奴制度性，拘束自由思想鬥爭『過程』的。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派不瞭解，正式規定的章程之所以必要，正是爲了用寬廣的黨性聯系來替代狹隘的小組聯系。一個小組內部或各個小組彼此間的聯系，當然是不必並且也無法正式規定的，因爲這種聯系是以朋友關係或以單憑情感而不講理由的『信任』爲基礎的。黨性聯系却不能並且也不應該靠這兩種東西來支持。黨性聯系一定要以正式規定，『用官僚主義方式』（從放蕩智識份子的觀點看來）校訂的章程爲基礎，也只有嚴格遵守這個章程才能使我們免除小組式的剛愎自用習氣，免除小組式的逞性妄爲態度，免除那些美其名爲自由思想鬥爭『過程』的小組爭鬧現象。

新火星報編輯部拿出法寶來反對亞歷山大洛夫，用誥誡式的口吻說道：『信任是一件細膩的東西，決不可勉強釘進人們腦袋和心靈裏去』（第五十六期的附張）。編輯部不瞭解，它如此提出信任——赤裸裸的信任——這一概念，恰巧就是再一次把它那種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和組織上的尾巴主義思想暴露無餘。當我還只是一個小組——無論火星報六人編輯團或火星組織——中的組員時，譬如我爲辯護我不願同某某人一起工作起見，我有權以我單憑情感而不講理由的不信任爲唯一藉口。當我已成爲黨中的一員時，我就沒有權利單憑感情來表示不信任態度了，因爲我這樣來作，便是爲舊日小組習氣盛行時代所有那些逞性妄爲和剛愎自用態度大開方便之門：我務必用正式理由，即援引我們黨綱，我們策略，我們黨章中某一正式規定的原則爲根據來說明我爲什麼表示『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以出於情感的『信任』或『不信任』爲限，而務必承認我自己的決定以及黨內任何一部分所有一切決定都應受全黨監督；我

務必遵照正式規定的手續來表示自己的『不信任』，來實行從我這個不信任中所得出的觀點和願望。我們已經從以出於情感的『信任』為根據的小組觀點，升到了要求遵照受監督的和正式規定的手續來表示和審查信任的黨性觀點，可是編輯部却硬把我們拉往後退，並把自己的尾巴主義稱呼為新的組織觀點！

請看我們的所謂黨編輯部怎樣議論那些也許會要求派遣代表參加編輯部的著作團體吧。『我們不會發怒，我們不會叫起紀律來』，——隨時隨地藐視紀律的老爺式無政府主義者教訓我們道。假如提出此種要求是一個有價值的團體，我們就可以去同它『磋商』（請注意！）；不然我們就可以把它那些要求置之一笑。

你看這該是多麼高尚的貴人態度和粗鄙的『工廠』形式主義對立呀！其實，這是感覺到自己並不是什麼黨機關，而不過是一個舊時小組碎片的編輯部所用來款待黨的一套稍加刷新的小組習氣的辭令。這個立場底內部虛偽性，也就必然引起無政府主義的真理，以至於把離散狀態推崇為社會民主黨組織底原則，同時却又在口頭上用假仁假義態度，宣佈說這種離散狀態早已成為過去。根本不需要什麼由上下各級黨機關所構成的嚴密體系，因為這種體系，在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看來，是在公事房裏擬製出來的官場廳司科股等等（見阿克雪里羅得底雜感文）；根本不需要什麼部分服從整體的原則；根本不必用什麼『官僚主義形式』手續規定出『磋商』和分離的一定的黨性辦法，而是要讓人用妄談『真正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方法的手段去推崇舊式小組爭鬭現象。

在這方面，受過『工廠』訓練的無產者正可以而且應當來教訓那些無政府個人主義者。覺悟的工人早已走出了畏避一般智識份子的童年時期。覺悟的工人善於尊重他在社會民主黨人智識份子那裏遇見的更豐富的知識，更廣闊的政治眼界。可是，隨着我們真正政黨之形成，覺悟的工人應當學會辨別無產階級軍隊的戰士底心理和

愛說無政府主義辭令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心理，應當學會不僅要求普通黨員，而且要求『上層人物』來履行黨員責任，應當學會如像他從前鄙棄過策略問題方面的尾巴主義那樣鄙棄組織問題方面的尾巴主義！

新火星報在組織問題方面的立場底最後一個特點，是與基朗特主義和老爺式無政府主義緊相聯系的：這就是反對集中制，擁護自治制。這也就是大罵官僚主義和專制制度，惋惜『非火星派份子』（在代表大會上擁護自治制的非火星派份子）『受到不應有的忽視』，滑稽可笑地叫喊說有人要求『唯命是聽』，辛酸訴說有人表現『瞎官態度』等等一類詞句所包含的原則意思（如果可以說它包含有什麼原則意思的話*）。任何一個黨底機會主義翼總是捍衛和辯護任何一種落後性，黨綱方面，策略方面以及組織方面的落後性。新火星報擁護組織方面落後性（尾巴主義）的立場，是與擁護自治制的立場緊相聯系的。固然，一般說來，自治制已為舊火星報三年的宣傳揭露得信用掃地了，所以新火星報還羞於公開加以擁護，却向我們担保說它同情於集中制，不過它所用以證明這種同情態度的只是把集中制一語加上着重點而已。其實，只須稍微觀察新火星報所謂『真正社會民主主義的』（莫不是無政府主義的麼？）所謂集中制的『原則』，就可隨時揭露出擁護自治制的思想。難道現在不是大家都看見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在組織問題方面已轉到阿期莫夫那裏去了麼？難道他們自己不是用所謂『非火星份子受到不應有的忽視』的名句堂皇承認過這一點麼？難道阿期莫夫及其朋友們在我們黨代表大會上所擁護的不是自治制麼？

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所擁護的正是自治制（甚至是無政府主義），當時他們用一種令人發笑的熱心聲明，

*這裏我也如在本章其他地方一樣把這些叫鬧詞句底『補選主義』意思撇開不說。

說部分不應該服從整體，說部分在決定自己對整體的關係時應享有自治權，說旅外同盟所用以確定這些關係的章程不管黨內多數意志如何，不管黨中央機關意志如何都能發生效力。現在馬爾托夫同志在新火星報上（第六十期）說到中央委員會指定地委委員問題時所公開擁護的，也正是自治制。我不來說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以及現時在新火星報上所以用擁護自治制的那些幼稚可笑的詭辯*，我認為在這裏必須指出的是他無疑持有反對集中制擁護自治制的傾向，這種傾向乃是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所固有的原則特徵。

在新火星報（第五十三期）上拿『形式民主主義原則』（着重點是這位作者自己加的）來和『形式官僚主義原則』對立，要算是分析官僚主義一語的唯一嘗試了。這種對立（可惜這種對立也如他們對非火星份子的指證那樣沒有加以發揮，沒有加以闡明），確實含有一些真理。官僚主義與民主主義相對立，也就是集中制與自治制相對立，也就是革命社會民主派底組織原則和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者底原則相對立。後者力求自下至上地動作，因此就在凡屬可能的地方和凡有可能的程度內堅決主張自治制，主張弄到（在那些狂熱堅持這點的人們那裏）無政府主義地步的『民主主義』。前者力求從上層出發，堅決主張擴大中央機關對於部分的權力和權限。在離散狀態和小組習氣盛行時代，革命社會民主派力求在組織上由以出發的這種上層機關，必然是個由於自己的活動和自己的革命一貫性擁有最大威信的小組（在我們這裏就是火星組織）。在恢復黨的真正統一並以這個統一為基礎來解散各個陳舊小組的時代，這種

*馬爾托夫同志列舉黨章各項時，恰巧遺漏了那說明整體對部分的關係的一項：中央委員會『分配全黨人材』（第六項）。若不實行把工作人員從一個委員會調到別一個委員會裏去，怎樣可以分配人材呢？關於這種淺顯道理，真是不好意思來說。

上層機關必然是黨代表大會，即全黨最高機關；代表大會儘可能把各個積極組織內所有一切份子統一起來，任命中央機關（其成份往往是多使黨內先進份子滿意而少使黨內落後份子滿意，往往是多使黨內革命翼喜歡而少使黨內機會主義翼喜歡），使其成爲在下屆代表大會以前的全黨最高機關。至少在歐洲社會民主黨人那裏是如此，目前這種根本爲無政府主義者所仇視的習尚在亞洲社會民主黨人中間也開始流行起來，雖則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難，不免要遇到鬥爭，不免要遇到無謂爭鬧。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組織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所有的上述原則特徵（自治主義，老爺式的或智識份子的無政府主義，尾巴主義和基朗特主義），在世界各國社會民主黨內，在有革命翼和機會主義翼分立的地方（試問在什麼地方沒有這種分立呢？）都可看見，不過 *mutatis mutandis*（具着相當特點）罷了。這種情形最近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暴露得特別明顯，近來在第二十號撒遜選區選舉運動中遭受的那次失敗（所謂覺勒事件*）把黨的組織原則提到日程上來了。在這一事件發生時激起原則問題，主要是由德國機會主義者瘋狂努力的結果。覺勒（他從前是一個牧師，他是不無名聲的 „Drei Monate Fabrikarbeiter“** 一書底作者，他是德勒斯登代表大會上的『主人公』之一）本人是個露骨的機會主義者，於是澈底德國機會主義者所主持的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社會主義月刊）馬上就來『袒護』他。

黨綱方面的機會主義，自然是與策略方面的機會主義以及組織

*覺勒曾於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六日在第十五號撒遜選區裏被選爲德國國會議員，但他在德勒斯登代表大會以後辭去了議員職任。第二十號選區選民在該區議員羅津諾夫逝世出缺後又想把覺勒推舉爲候選人。黨中央管理局和撒遜中央鼓動委員會對此堅決表示反對，雖然它們沒有權利來正式禁止推舉覺勒爲候選人，但它們終使覺勒不得不拒絕候選資格。在這次選舉中，社會民主黨人遭到了失敗。

**在工廠裏作工三個月的印象。——譯者。

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相聯系的。當時出面敘述『新』觀點的是海涅同志。爲要向讀者說明這個歸附社會民主運動而隨身帶來機會主義思想習慣的標本智識份子底面目，只須指出海涅同志是比較德國的阿期莫夫同志小一點而比較德國的葉哥羅夫同志大一點的人物就夠了。

海涅同志在社會主義月刊上，也如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在新火星報上那樣赫然大舉進攻。論文標題爲『對於覺勒事件的幾點民主意見』（見„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第四期，四月號），已經是了不起。內容也同樣是聲勢浩大的。海涅同志堅決反對『侵犯選區自治權』，捍衛『民主原則』，抗議『委任的上司』（即黨中央管理局）干涉人民自由選舉議員的舉動。問題並不是由於偶然的事件，——海涅同志教訓我們道，——而是由於一般『在黨內有一種官僚主義和集中主義的趨向』。他說，這種趨向從前也表現過，但現時已成爲特別危險的了。必須『原則地承認：黨底地方機關是黨生活底體現者』（是從馬爾托夫同志所著再一次處在少數地位一書中剽竊來的說法）。不要『讓一切重要政治問題都由一個中央機關處決』，而是要警戒黨防備『脫離實際生活的學理主義政策』（簡直是從馬爾托夫同志在黨代表大會上大談『實際生活一定會如願以償』的那篇演詞中借來的說法）…『如果細看事物底根源，——海涅同志加深自己的論據說，——如果把這次也如任何時候一樣起過不小作用的種種個人衝突撇開不談，那末我們認爲對修正主義者所持的殘酷態度（着重點是該作者自己所加的，用意大概是要暗示說『對修正主義的鬥爭』和『對修正主義者的鬥爭』這兩個概念有區別吧），主要是證明黨內正式代表人物不信任『局外人』（海涅顯然還沒有讀過論反對戒嚴狀況的小冊子，因此就來借用英國名詞：Outsidertum），傳統對一切非尋常現象表示不信任，無個性機關對一切個性東西表示不信任』（見阿克雪里羅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

提出的關於反對壓制個人自動性的決議案），「總而言之，就是證明有前面我們已經估計為黨內官僚主義和集中主義趨向的那種趨向」。

「紀律」一語在海涅同志心坎中，也如在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心坎中一樣引起了極高尚的憤怒。他寫道：「…人家指斥修正主義者欠缺紀律，只是因為修正主義者在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上發表過論文，人家甚至不願承認這個刊物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刊物，因為它是不受黨監督的。單是這樣企圖縮小『社會民主主義』一語底含義，這樣要求在應以絕對自由佔統治的思想工作方面遵守紀律』（請回憶所謂思想鬥爭是過程，而組織形式不過是些形式的那種說法吧）『就已經證明人家持有一種官僚主義和壓制個性的趨向』。接着海涅又還滔滔不斷，百般攻擊這種力求造成『一個包羅萬象的儘量集中化的巨大組織，一個策略，一個理論』的可惡趨向，反對『絕對服從』，反對『盲目服從』，反對『簡陋的集中主義』等等，真是一字不差地『仿照阿克雪里羅得』。

海涅所激起的爭論熾烈起來了；既然德國黨內沒有什麼補選問題的無謂爭鬧把這個爭論遮蓋起來，既然德國的阿期莫夫輩不僅在代表大會上而且經常在其特有的機關刊物上闡明着自己的面目，於是這次爭論很快就歸結於分析正統派和修正派在組織問題上的原則趨向。以革命派（它當然也如我們這裏一樣被人加上『獨裁主義』和『宗教裁判』等等可怕的罪名）代表之一的資格出頭說話的，是考茨基（新時代雜誌，一九〇四年第二十八期所載一文 „Wahlkreis und Partei“——選區與黨）。他說：『海涅底論文表明出整個修正派底思路』。不僅德國而且法國和意大利的機會主義者，也是到處都拚命擁護自治制，力圖削弱黨的紀律，力圖把黨的紀律化為烏有，他們的趨向到處都是要搞亂組織，把『民主原則』歪曲為無政府主義。『民主並不是說沒有政權，——考茨基教訓那些組織問題

方面的機會主義者說，——民主並不是表示無政府狀態，民主是表示羣衆統治自己所委任的人員，而與那些冒充人民公僕者在實際上成爲人民統治者的政權形式相反」。考茨基詳細考察了各國機會主義自治派搗亂組織的作用，說「大批資產階級份子」* 歸附社會民主派是使機會主義，自治主義以及違背紀律的趨向加強起來的原因，並再三提醒說「組織乃是無產階級爭取本身解放的武器」，「組織乃是無產階級所特有的階級鬥爭武器」。

德國那裏的機會主義要比法意兩國弱些，所以那裏「自治主義的趨向至今所產生的還不過是一些表示反對獨裁者和反對大宗教裁判者，反對革除教籍**和反對追究異教徒的憤慨聲明，還不過是許許多多吹毛求疵的議論和無謂的爭鬧，分析這種議論和爭鬧是只會引起許許多多口角的」。

在俄國方面，黨內機會主義要比德國那裏更弱，所以俄國這裏的自治主義趨向所產生出來的思想成分更少，「憤慨聲明」和無謂爭鬧成分更多。

無怪乎考茨基要作出結論說：「也許世界各國修正主義在任何其他問題方面，都不如在組織問題方面表現得這樣性質一致，雖則形態很不相同，雖則色彩差異很大」。說到正統派和修正派在這方面的基本趨向時，考茨基也用「嚇人字眼」來表示說：官僚主義與民主主義相對立。「據說，——考茨基寫道，——給予黨中央權力來影響各地方選區選擇候選人（國會議員候選人），就是「無恥地侵犯民主原則，因爲民主原則是要全部政治活動自下至上經過羣衆自動性進行，而不是從上至下用官僚主義辦法進行…但是，如果說

*考茨基把饒勒斯拿來做例證。這種人意是傾向於機會主義，他們也就「必然覺得黨紀律對於他們的自由個性是一種不可容許的拘束」。

**Bannstrahl——革除教籍。這是德國人用以表示俄國人所謂「戒嚴狀況」和「非常法令」等語意思的名詞。這是德國機會主義者底「嚇人字眼」。

有什麼真正民主的原則，那它就是表明多數應比少數佔優勢，而不是相反』… 任何一個選區選舉 國會議員都是關係全黨的重要問題，所以黨應該經過本黨信託人（Vertrauensmänner）去影響指定候選人的事情。『如果誰覺得這太帶官僚主義性質或太帶集中主義性質，那就請他試提議由全體黨員（sämtliche Parteigenossen）直接表決指定候選人吧。既然這是做不到的，那末上述職能也如其他許多有關全黨的職能一樣由一個黨機關或幾個黨機關來執行時，就根本不要埋怨說這是缺乏民主主義了』。按照德國黨底『習慣法』，從前個別選區也是和黨中央『按同志協議原則』提出某某人爲候選人的問題。『可是，現在黨已經大大增長，於是這一不言而喻的習慣法已經不夠了。當人們已不復承認習慣法爲不言而喻的東西時，當這個習慣法定義所含的內容以至這個習慣法本身的存在都受駁斥時，那它就不復成爲法制了。於是也就絕對必須正式確立這個法制，明文規定這個法制』…以至『用正式章程更確切規定（statutarische Festlegung）*，亦即加強組織底嚴格性（größere Straffheit）』。

於是，你們就在另一種環境中看出同樣的鬥爭，即黨內機會主義翼和革命翼在組織問題上的鬥爭；看出同樣的衝突，即自治主義和集中主義的衝突，民主主義和『官僚主義』的衝突，削弱組織嚴格性與紀律嚴格性的趨向和加強組織嚴格性與紀律嚴格性的趨向的衝突，不穩定智識份子底心理和堅定無產者底心理的衝突，智識份子個人主義和無產階級團結精神的衝突。試問，資產階級民主派——不是惡作劇的歷史還只私下約許在將來某某時候拿出來給阿克

*把考茨基這些關於用正式規定的黨章法制來替代不言而喻的習慣法制問題的評語，拿來和一般是我們黨尤其是編輯部自黨代表大會時起所還遇着的全部『更換』對照一下，是非常有益的。請參看查蘇里奇底演詞（在同盟代表大會上，見第六十六及往下各頁），她未必能領會現在發生着的這種更換底全部意義吧。

雪里羅得同志看看的那個資產階級民主派，而是在德國也有其猶如我國解放派先生們一樣聰慧精明的代表人物的真正實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當時又是如何對待這個衝突的呢？德國資產階級民主派馬上就來響應這個新爭論，並且也如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派那樣，也如無論何時何地的資產階級民主派那樣拚命袒護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翼。德國交易所資本底出色機關報——法蘭克福報——發表了一篇聲勢浩蕩的社論（見法蘭克福報一九〇四年四月七日，第九十七期，晚刊），其中表明厚顏剽竊阿克雪里羅得言論簡直已成為德國出版界底一種流行病。法蘭克福交易所中威風凜凜的民主主義者拚命反對社會民主黨內的『專制制度』，反對『黨內獨裁』，反對『黨內上司底絕對統治』，反對『專門懲罰整個修正主義』（請記起『誣加的機機會主義罪名』一語）的『革除教籍』手段，反對『盲目服從』『死硬紀律』，反對『唯命是聽』，反對把黨員變為『政治死屍』（這比螺絲釘和機輪更厲害得多哩！）。『據說，任何個人特性，——交易所中的騎士們在社會民主黨那裏看見反民主主義的制度時憤然叫道，——任何個性都應受取締，因為這種個性可能產生出法國所流行的現象，即產生出饒勒斯主義和米勒蘭主義，如會德爾曼講演這個問題時所爽直說過的那樣』（即指他在撒遜社會民主黨人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而言）。

* * *

總之，如果說新火星報關於組織問題的新字眼含有什麼原則的意思，那末這個意思就顯然是機會主義的意思。證實這個結論的有對於我們那個分成爲革命翼和機會主義翼的黨代表大會的全部分析，也有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底實例，在這些社會民主黨內，組織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也是表現於同樣的趨向和同樣的責難，並且往往是表現於同樣的字眼。當然，各國黨底民族特點以及各國政治條件上的區別都不免要發生相當的影響，使得德國機會主義與法國機會主義全然不同，法國機會主義與意大利機會主義全然不同，意大利

機會主義與俄國機會主義全然不同。雖然有以上所說條件上的區別*，但所有這些黨內革命翼和機會主義翼間的基本劃分顯然是相同的，機會主義在組織問題方面的思路及趨向顯然是相同的。由於從前在我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和目前在我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存在有許多急進智識份子，所以我們這裏始終不免有此種智識份子心理所產生的機會主義在各個不同的問題和各種不同的形式中表現出來。從前我們與機會主義鬥爭是在世界觀底基本問題即綱領問題方面進行的，所以在目的方面的完全分離也就不免引起了那些把我國合法馬克思主義弄得聲名掃地的自由派和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彼此間無可挽回的分野。後來我們與機會主義鬥爭是在策略問題方面進行的，所以我們與克里切夫斯基和阿期莫夫兩同志在這個比較次要問題上的分離也就自然只是暫時的分離，並沒有引到各自成立政黨。現在我們應當在組織問題方面克服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底機會主義，這些問題當然更不如綱領問題和策略問題那樣有根本意義，但它們在現今時機內却湧現到我們黨生活底前台上來了。

說到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時，一分鐘也不要忘記現代機會主義在無論什麼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一個標本特徵：不肯定性，模糊性，不可捉摸性。機會主義者底天性就是極力躲避肯定直接的問題提法，總想找出一種合成力，在兩個水火不相容的觀點中間周旋，設法裝成對這兩種觀點都表『贊同』的樣子，說自己的歧異意見不過是幾點點修正，不過是些懷疑，不過是些良善天真的願望等等，

*現在誰也不會懷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策略問題上分成爲經濟派和政治派的舊劃分，實與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運動分爲機會主義派和革命派的劃分相同，雖然馬爾丁諾夫和阿期莫夫兩同志是與羅里馬爾和愛里遜兩同志或饒勒斯和米勒蘭兩人有很大的區別。同樣，按組織問題的基本劃分也毫無疑義是相同的，雖然民衆沒有政治權利的國家與有政治自由的國家間的條件大不相同。極值得注意的，是講原則的新火星報編輯部走馬看花式地涉及考茨基和海涅的爭論時（見第六十四期），畏縮地迴避了一切機會主義派和一切正統派在組織問題方面的原則趨向問題。

等等。綱領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同志是『贊同』黨底革命綱領的，雖然他本來顯然是要想『根本改良』這個綱領，但他却認爲這樣作是不合時的，是不適當的，是不如闡明『批評』底『一般原則』（其內容主要是用非批評態度來向資產階級民主派借用原則和字眼）那樣重要的。策略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者福里馬爾同志也是贊同革命社會民主黨底老策略，也是多半只提出某些憤慨聲明，只提出一點點修正，只講幾句兒譏諷話，但並不提出什麼『閣員主義的』肯定策略。組織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者馬爾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羅得同志，也是不管人家直接勸請，至今都沒有提出什麼可以『用黨章手續規定的』肯定原則提綱；他們本來也願意，絕對願意『根本改良』我們的組織章程（見火星報第五十八期，第二頁，第三欄），但他們却寧願先來講『一般組織問題』（因爲如果按新火星報精神來把我們這個不管第一項條文如何而終究是個集中主義的章程實行一個真正根本的改良，那就不免要引到自治主義，但馬爾托夫同志當然是連在自己面前也不願承認自己持有原則上走向自治主義的傾向這點的）。因此他們在組織問題方面的『原則』立場，也就顯現得五光十色：多半是些天真而憤慨的聲明，什麼專制制度和官僚主義，什麼盲目服從，螺絲釘和機輪等。——這種聲明非常天真，使人很難很難辨別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則性的意思，哪些真正是補選問題的意思。可是每況愈下：他們既企圖把他們所仇視的『官僚主義』加以分析並下一個確切定義，也就不免走向自治主義；他們既企圖『加深』和論證自己的觀點，也就必定走到辯護落後性，走到尾巴主義，走到基朗特主義的辭藻。最後，以唯一的，真正是肯定的，因而在實踐上表現得特別顯然的（因爲實踐總是走在理論前面的）原則資格出現的，乃是無政府主義原則。藐視紀律，要求自治，無政府主義——這就是我們那個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派翻來覆去玩耍着的一套戲法，多方搪塞而根本不

肯把自己的原則肯定表述出來*。在綱領和策略方面的機會主義派那裏，我們同樣也可看見這套戲法：藐視『正統思想』、忠實信仰、狹隘性和死板性；提倡修正主義『批評』和閹員主義；鼓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

現今世界各國機會主義者以及我國少數派所有一切作品中間所發出的那種延綿不斷的埋怨聲調，都是與仇恨紀律的心理密切相聯的。據說，有人在追究他們，擠壓他們，驅逐他們，圍攻他們，欺侮他們哩。這些字眼中間所包含的心理上政治上的真情，大概要比造出這種談論某某人被人欺侮和某某人欺侮他人的談諧動聽笑話來的作者本人所意料到的多得多哩。例如，拿我們黨代表大會底記錄來看，就可看出少數派盡是些在某個時候和因為某件事情被革命社會民主派欺侮過的人。這中間有崩得份子和工人事業社份子，他們是被我們『欺』得退出了代表大會的；這中間有南方工人社份子，他

*現在，誰回想起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爭論的情形，便能明白，馬爾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羅得同志關於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的錯誤發展和加深下去，就必然要引到組織上的機會主義。馬爾托夫同志底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黨的思想，正是虛偽的『民主主義』，自下至上建立黨的思想。反之，我的思想之所以是『官僚主義性的』，就是因為我主張自上至下，由黨代表大會到各個黨組織來建立黨。無論是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心理也好，無論是無政府主義的辭藻也好，無論是機會主義的尾巴主義深奧思想也好，都是在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的爭論中就已顯露出來了的。馬爾托夫同志在戒嚴狀況一書（第二〇頁）中說新火星報上『開始了思想工作』。這種說法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因為他和阿克雪里羅得確實是從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開始來把思想按新方向推進的。只是不幸這個新方向是機會主義的方向，他們愈是循着這個方向『工作』下去，他們的這種工作愈是脫出補選問題上的無謂爭鬧成分，則他們也就會愈益深陷到泥潭裏去。普列漢諾夫同志在黨代表大會上已經看出了這點，並且他在不應當做什麼？一文中又再次警告過他們說：我甚至情願把你們補選進來，不過你們不要循着這條祇會走到機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方面去的道路走去。——但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兩人並沒有接受這個忠告，却說道：什麼話？不循着這條路走？要贊同列寧所說補選不過是一種無謂爭鬧的意見麼？絕對不行！我們要向他表示我們是些講原則的人啊！——果然表明了。他們已經向大家具體表明出，如果說他們有什麼新的原則，那就不過是機會主義底原則。

們是因一切小組以及他們自己的小組被殺害受到厲害得要命的侮辱的；這中間有馬合夫同志，他是在每一次說話時都受到侮辱的（因為他每一次都是照例丟醜哩）；最後，這中間有馬爾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羅得同志，他們是因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受到『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並因在選舉時陷於失敗受到侮辱的。所有這些難堪的羞辱，都不是如像許多庸夫俗子至今還在想像的那樣由於什麼人說過不可容許的挖苦話，由於有人說過激烈的胡言暴語，由於什麼瘋狂的論戰，由於有什麼人把門關得發響，由於有什麼人捏起拳頭來威脅過等偶然引起的結果，而是由於火星報整個三年思想工作所必然產生的政治結果。如果我們在這三年間不僅僅是說了一些空話，而是表示了一種應該轉為行事的信念，那末我們在代表大會上也就不能不進行鬥爭來反對反火星派和『泥潭』派。當我們已和坦然站在前列鬥爭過的馬爾托夫同志一起把這樣一大堆人再三欺侮過後，我們只須稍微把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和馬爾托夫同志侮辱一下，就使得他們忍無可忍了。數轉變成質了。發生了否定之否定。所有一切受到侮辱的人都忘記了相互間的嫌隙，嚎啕大哭，互相擁抱起來，並樹起了『反列寧主義的起義』* 旗幟。

當先進份子起義反對反動份子時，起義本是一件極好的事情。革命翼實行起義反對機會主義翼，本是很好的。機會主義翼實行起義反對革命翼，那就很壞了。

普列漢諾夫同志可說是只得以軍事俘虜資格參加這種惡劣勾當。他努力在這個或那個擁護『多數派』的決議案起草人那裏尋找個別拙劣語句來『洩憤出氣』，並高聲歎息道：『窮得可憐的列寧同志呵！他的那些正統擁護者真妙呵！』（見火星報第六十三期附張）。

*這個奇怪語句是馬爾托夫同志說出來的（見戒嚴狀況一書第六八頁）。馬爾托夫同志總想等到他自己方面湊成五個人時實行『起義』來反對我一個人。馬爾托夫同志所採用的論戰手法並不巧妙：他分明是想用絕頂恭維敵人的辦法消滅敵人。

可是，普列漢諾夫同志呵，如果說我窮得可憐，那末新火星報編輯部就未免是一貧如洗了。無論我怎樣窮，但我總還沒有窮到絕對一貧如洗，沒有窮到只好閉眼不看黨代表大會，而到某些地方委員底決議案中間去尋找材料練習本人機智的地步。無論我怎樣窮，但我總比那些受到並非偶然說出某句拙劣言語，而是無論在組織，策略以及綱領等一切問題上都死守着恰和革命社會民主派原則相反的原則的份子擁護的人們富裕百倍。無論我怎樣窮，但我總還沒有窮到只得在公衆面前把這樣一些擁護者賞賜給我的頌詞隱瞞不說的地步。但新火星報編輯部却竟只好這樣去作。

讀者，你知道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沃龍涅什委員會是什麼東西麼？如果你不知道，那就請你讀讀黨代表大會底記錄吧。你從那裏可以看出，這個委員會底方向完全由阿期莫夫和布魯克爾兩同志表現出來，這兩位同志在代表大會上進行過反對我黨革命翼的全面鬥爭，並且有幾十次被大家——從普列漢諾夫同志起至頗坡夫同志止——當作機會主義者看待過。正是這個沃龍涅什委員會在其一月份的小刊（第十二期，一九〇四年一月）內說過：

「去年在我們不斷增長的黨內發生了一件對於黨有重要意義的巨大事變：舉行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即有全黨一切組織底代表參加的大會。召集黨代表大會本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而在帝制條件下更是一件很危險，很困難的事情，因此難怪召集該次代表大會的工作執行得遠不完善；代表大會本身雖然完全平安舉行過了，可是並沒有滿足黨對它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一九〇二年代表會議所委任來召集代表大會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於是召集代表大會的事情就由僅僅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一個派別——火星派——所指定的那些人去担任。許多屬於社會民主黨而不屬於火星派的組織，都沒被吸收來參加代表大會工作；在某種程度內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使代表大會關於製定黨綱和黨章的任務執行得極不完善，至於黨章裏含有『能引起危險誤會的』巨大缺點，那是參加代表大會的人自己也承認的。在代表大會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於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許多從前似乎完全

接受過火星社所定行動綱領的重要人物，此時也都覺悟到該社許多主要由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兩人所主張的觀點不切於實際。雖然他們兩人在代表大會上也曾佔過上風，可是實際生活底力量，實際工作——即一切非火星派份子也參加的實際工作——底要求，却很快就糾正了理論家底錯誤，並在代表大會一開完後就提出了嚴重的修正。火星報大大改變了，並已答應細心聽從社會民主黨內一般活動家底要求。於是，雖然代表大會底工作應由下屆代表大會來修正，並且——這是代表大會參加者自己所明白看見的——不能令人滿意，因此也就不能由黨採納為不可變移的決議，可是代表大會闡明了黨內的實況，給予了對於黨今後理論和組織工作以巨量的材料，成了對於全黨工作的一個巨大而有教益的經驗。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以及代表大會所製定的黨章，將被一切組織所注意到，但許多組織都會不肯專以它們為指南，因為它們含有顯而易見的缺點。

沃龍涅什委員會瞭解全黨工作底全部重要性，所以熱烈響應了關於組織代表大會的一切問題。它意識到代表大會上所發生的事情底全部重要性，歡迎已經成為中央機關報（主要機關報）的火星報上所發生的轉變。雖然黨內和中央委員會內的實況還不能使我們滿意，但我們相信，為建黨目的進行的困難工作，是會在共同努力下臻於完善的。為闢謠起見，沃龍涅什委員會特向同志們聲明，關於沃龍涅什委員會退出黨一事是根本談不到的。沃龍涅什委員會十分瞭解，像沃龍涅什委員會這樣一個工人組織退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該會是一個多麼危險的先例，該會是加於黨的一種多麼厲害的責備，該會使那些能效尤這種先例的工人組織遭到多麼厲害的損失。我們並不是需要造成新的分裂，而是需要堅決努力使一切覺悟工人和社會主義者統一成為一個黨。並且第二次代表大會乃是一屆普通大會，並不是一個建黨大會。開除出黨只可按全黨裁判來實行；任何一個組織，甚至中央委員會本身，也沒有權力開除某一個社會民主黨人組織出黨。況且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黨章第八項上規定，任何一個組織都在其地方事務方面享有自治權（自主權），因此沃龍涅什委員會就有完全的權利來把自己的組織觀點實行到實際生活和黨內去。

新火星報編輯部在其第六十一期上援引這個小刊時，轉載了所引這段文句底後一部分，即用大號字排印的一部分；至於前一部分，即用小號字排印的一部分，則編輯部已寧願將其刪去了。

大概是害起羞來了吧。

(一八) 稍微談談辯證法。兩個變革

把我們黨內危機底發展經過作一總括的觀察，就知道鬥爭雙方底基本成份，除了很小的例外，是始終如一的。這是我們黨內革命翼和機會主義翼間的鬥爭。可是，這個鬥爭經過了各種各樣的階段，其中每一階段底特點是每一個想瞭解已有的浩繁作品的人，每一個想瞭解許許多多摘錄的指證，斷章取義的引句，個別的責難等等的人所必須確切認識的。

我們且把各個顯然不同的主要階段列舉出來：（一）關於黨章第一項問題的爭論。關於基本組織原則問題的純粹思想上的鬥爭。我和普列漢諾夫兩人處在少數地位。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兩人提出機會主義條文，因而落到機會主義者懷抱中去。（二）火星組織因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問題——是佛明還是瓦西列夫列入五人團，是托洛茨基還是特拉文斯基列入三人團——而發生分裂。我和普列漢諾夫爭得多數（九票對七票），——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我們在黨章第一項問題上佔着少數。馬爾托夫實行同機會主義者聯盟這一事實，具體證明了我因組委事件而發生的一切焦慮。（三）關於黨章細節問題爭論的繼續。機會主義者又來拯救馬爾托夫。我們又處在少數地位中，並捍衛着少數在中央機關內的權利。（四）七個極端機會主義者退出代表大會。我們成了多數並在選舉中戰勝了聯盟（即火星少數派、『泥潭』以及反火星份子的聯盟）。馬爾托夫和頗坡夫拒絕接受我們所提出的兩個三人團中的位置。（五）在代表大會閉會後因補選問題而發生無謂爭鬧。無政

府主義行爲和無政府主義辭句橫行一時。最不堅定和最不穩定的份子在『少數派』中佔得上風。(六)普列漢諾夫爲避免分裂而採取“kill with kindness”政策。『少數派』佔領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和總委員會，並用全力來攻擊中央委員會。無謂爭鬧仍然籠罩一切。

(七)對於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攻擊是被打退了。無謂爭鬧似已開始在稍微平息下去。從此已有可能來較爲平心靜氣地討論兩個純係思想性質而深使我黨關懷的問題：(甲)我黨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區分爲『多數』和『少數』兩派而一切舊有區分情形從此失效這一事實底政治意義和原因何在呢？(乙)新火星報在組織問題上所持新立場底原則意義怎樣呢？

每一個階段都有其根本特異的鬥爭情勢和特殊的直接攻擊目標，每一個階段都可說是一個總戰役中的單個戰鬥。不研究每個戰鬥底具體環境，便絲毫不能瞭解我們的鬥爭。我們把這點研究清楚後，就可明白看出，發展過程確實是按着辯證法道路進行，經過矛盾進行的：少數變爲多數，多數變爲少數；每一方面時而轉守爲攻，時而轉攻爲守；思想鬥爭底出發點（黨章第一項）『被否定』，讓位給籠罩一切的無謂爭鬧*，但以後就開始『否定之否定』，而我們既然在各佔一個中央機關的情形下勉強『同房共居』，就復歸到純粹思想鬥爭底出發點上去；但這個『正題』已由『反題』底一切成果所充實而變成了最高的『合題』：此時，對於黨章第一項問題的單獨偶然的錯誤，已長成爲對於組織問題的機會主義觀點的所謂體系；此時，這個現象與把我們黨分成爲革命翼和機會主義翼的根本劃分間的聯系，已日益明析地顯現於大家面前了。總而言

*把無謂爭鬧和原則分歧意見分開的這個困難問題，現在已自行解決：凡涉及補選問題的東西都是無謂爭鬧；凡涉及代表大會鬥爭情形分析，涉及黨章第一項問題以及機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趨向問題的爭論，都是原則分歧。

之，不僅鈴璫麥是按黑格爾法則生長着，而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鬥爭也是按黑格爾法則進行的。

可是，無論何時都不應把馬克思主義使其脚朝地後才加以接受的黑格爾偉大辯證法，拿來和那種辯護從我們黨革命翼滾到機會主義翼方面去的政治活動家迂迴行徑的庸俗手段混爲一談，不應把它和那種硬將各個聲明，單一過程中各個階段發展上所發生的個別事件混成一團的庸俗態度混爲一談。真正的辯證法並不辯護個人錯誤，而是研究必不可免的轉變，根據十分詳細研究發展過程全部具體情形來證明這種轉變必不可免。辯證法底基本原理是：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同時也不應把這個黑格爾偉大辯證法和那個可用意大利諺語 *mettere la coda dove non va il capo*（腦袋鑽不進去的地方，就把尾巴塞進去）表示的鄙陋的處世妙訣混爲一談。

我們黨內鬥爭辯證發展過程底總結是歸結爲兩個變革。黨代表大會是個真正的變革，如馬爾托夫同志在其再一次處在少數地位中所公正指出的那樣。少數派裏愛說俏皮話的人也說得正確：世界是由革命推進的，所以我們也就實行了一次革命！他們在代表大會以後，果然實行了一次革命；同樣，一般而論，說世界由革命推進，也是正確的。可是，每一次具體革命底具體意義，却還不能用這個普泛成語來斷定：如果把永誌不忘的馬合夫同志那個永誌不忘的句子改個樣子來說的話，也能有類似反動的革命。爲要判明某次具體革命究竟是向前還是向後推動了『世界』（我們黨），就必須知道究竟是黨內那一翼成了實行變革的實在力量；是革命翼呢，還是機會主義翼呢。就必須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則鼓舞了戰士：是革命原則呢，還是機會主義原則呢。

我們黨的代表大會是全部俄國革命運動史上唯一無二，空前未有的現象。祕密的革命黨第一次從黑暗地下室裏出現於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們黨內鬥爭底全部行程和結局，我們黨以及其

每個多少顯著的部分在黨綱、策略和組織問題方面的全部面貌。我們第一次擺脫了小組放蕩性和革命庸人習氣底傳統，把幾十個極不相同的團體集合在一起，這些團體往往是彼此極端仇視，彼此單只由思想力量聯系起來，決意（在原則上決意）為裨益於我們第一次在事實上創立起來的偉大整體——黨——而犧牲所有一切團體獨存性和團體獨立性。可是，在政治上，戰利品並不是可以白白獲得，而是要從戰鬥中爭得的。為殺害小組而進行的戰鬥，不可避免地成了異常殘酷的戰鬥。公開自由鬥爭底新鮮風，變成了狂風。這個狂風掃除了——掃除得真妙呵！——所有一切小組習氣的利益，情感和傳統底餘孽，第一次創立了真正黨性的負責集體。

然而，稱呼為什麼，是一回事；而真正成為什麼，却是另一回事。在原則上為黨利益來犧牲小組習氣是一回事；而放棄自己的小組却是另一回事。新鮮的風，對於那些習慣於腐臭庸人觀點的人，原來是還太新鮮了。『黨沒有經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全國大會』，如馬爾托夫同志在其再一次處在少數地位中所公正說過的（偶然公正說過的）那樣。因小組被殺害而氣憤的心理未免太厲害了。狂風把我黨巨流底下的全部混泥都掀起來了，而這團混泥就來實行了報復。老舊的頑固的小組習氣壓倒了尚屬年輕的黨性。黨內已被打得一敗塗地的機會主義翼，用偶然的阿期莫夫的勝利品來加強了自己的力量，又對革命翼佔得了——當然是暫時的——優勢。

結果就得出了新火星報，這個新火星報不得不發展加深其編輯員們在黨代表大會上所犯的錯誤。舊火星報曾教導人們領會革命鬥爭底真理。新火星報却教導人們領會處世妙訣：讓步與和睦相處。舊火星報是戰鬥性的正統派底機關報。新火星報使機會主義死灰復燃——主要是在組織問題方面。舊火星報博得了深受俄國機會主義者以及西歐機會主義者方面痛恨的光榮。新火星報『變聰明了』，很快就會不復以備受極端機會主義者稱頌為恥了。舊火星報勇往直前地

朝着目標行進，言行相符。在新火星報上，因其立場底內部虛偽性而必不可免地產生着——甚至不管什麼人底意志和意識如何——政治上的偽善態度。它大罵小組習氣，以求掩護小組習氣對於黨性的勝利。它假裝慈善，斥責分裂，似乎除少數服從多數而外，還可設想出什麼其他手段來防止一個多少是有組織，多少是一個黨的黨內發生分裂。它聲言說必須顧及革命輿論，同時却又隱瞞着阿期莫夫輩讚頌它的言論，而製造一些無聊的謠言來誣衊我黨革命翼方面的委員會*。這是何等可恥呵！他們把我們的舊火星報糟踏到何等地步了呵！

進一步，退兩步。這是各個人底生活，各民族底歷史，以及各政黨底發展中都可看見的現象。革命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無產階級組織和黨紀律，必然會獲得完全的勝利，——懷疑這點，即令只是一分鐘懷疑這點，就會是一種罪大惡極的意志薄弱態度。我們已爭得了很多東西，我們應當繼續奮鬥，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喪氣；我們應當堅定地奮鬥，鄙棄那些庸俗性的小組爭鬧手段，儘最後的可能來保衛用極大精力造成的全俄所有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統一的黨性聯系，用堅忍而有系統的勞作，使全體黨員，特別是工人完全而且自覺地認識黨員義務，認識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的鬥爭，認識我們分離底一切原因和變遷，認識機會主義底全部致命危險性，這機會主義在組織事業方面也如在我們的黨綱和我們的策略方面一樣可憐地屈服於資產階級心理，一樣用非批評態度接受資產階級民主派底觀點，一樣挫弱無產階級鬥爭武器底鋒銳。

無產階級，在為政權鬥爭中，除組織而外，再沒有別的武器。無產階級既然被資產階級世界裏的無政府競爭制底統治所分散，既然被那替資本作的奴隸式的工作所壓抑，既然經常被拋到完全貧

*爲了這一可愛的業務，甚至已製出一個固定的格式：據我們自己某某通信員報告，多數派某某委員會虐待了少數派中的某某同志。

困、粗野和退化的『底層』，所以無產階級之能够成爲而且必然會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就只是因爲它由馬克思主義原則所造成的思想統一，有組織底物質統一把它鞏固起來，這個組織把千百萬勞動者團結成爲工人階級底大軍。在這支大軍面前，無論俄國沙皇專制已經衰頹的政權，無論國際資本正在衰頹的政權，都是支持不住的。這支大軍將不顧任何迂迴曲折和後退步驟，不顧現代社會民主黨中基朗特底機會主義辭藻，不顧那對於落後小組習氣的自滿自足的讚美，不顧智識份子無政府主義底自炫和喧鬧，而日益緊密地團結自己的隊伍。

附 錄

古塞夫同志和捷依契同志間的衝突

這一事件是與本書正文第十章中所引錄過的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兩同志那封信裏提到的所謂「偽造」（據馬爾托夫同志所說）名單密切相聯着的，其實質有如下述。古塞夫同志曾通知帕夫洛維奇同志，說由史騰、葉哥羅夫、頗坡夫、托洛茨基、佛明五同志構成的這個名單是捷依契同志轉交給他古塞夫同志的（見帕夫洛維奇同志底信，第一二頁）。捷依契同志因古塞夫同志作過這一通知，就罵他是「故意誣贗」，後來同志仲裁法庭認定古塞夫同志底「通知」『不正確』（見火星報第六十二期所載法庭批示）。當火星報編輯部把法庭批示登載出來後，馬爾托夫同志（已不是編輯部）又印發了一個標題為『同志仲裁法庭底批示』的傳單，他在這個傳單上不僅刊印了法庭批示全文，並且刊印了關於此案全部審理經過的記錄全文以及他自己所寫的跋言。在這篇跋言中，馬爾托夫同志說『假造名單以謀派別鬥爭利益的事實』是件『可恥的』事情。爲了回答這張傳單，第二次大會代表略多夫同志和哥林同志刊印了一張標題為『仲裁法庭中的第四個人』的小刊，在這裏，他們『堅決表示反對馬爾托夫同志底行爲，因爲馬爾托夫同志居然超過法庭判詞硬說古塞夫同志懷有不良動機』，雖則法庭並沒認爲這裏有什麼故意

誣蔑的成分，只是認定古塞夫同志所作的通知不正確。哥林和略多夫兩同志詳細解釋說古塞夫同志底通知可能是出於一種完全自然的誤會，並把馬爾托夫同志底行爲估計爲『無理的』行爲，因爲馬爾托夫同志自己作過（並且在自己的小刊中還作着）許多錯誤聲明，隨意罵古塞夫同志懷有不良動機。他們說，這裏根本不能有什麼不良的動機。據我所知，關於這個問題的全部『文獻』就是如此，我認爲自己應盡的責任是要幫助闡明這個問題。

首先必須使讀者完全認識這個名單（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出現底時間和條件，我在本書正文裏已經指出過，火星組織在代表大會時期召集會議商量過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問題，以便共同向代表大會提出一個相當的名單。這次會議結果是發生了分裂：火星組織底多數通過了由特拉文斯基、格列波夫、瓦西列夫、顏坡夫、托洛茨基五人構成的名單，但少數不願讓步，而堅持着由特拉文斯基、格列波夫、佛明、顏坡夫、托洛茨基五人構成的名單。火星組織中的兩部分人在提出並表決過這兩個名單的那次會議以後就不再沒有共同集會過了。雙方都在代表大會上進行自由鼓動，想藉整個黨代表大會底表決來解決這一引起他們分離的爭論問題，並且雙方都極力想把盡量多的代表人數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在代表大會上進行的這種自由鼓動，立刻就暴露了我在本書正文裏十分詳細分析過的那件政治事實，即：火星少數派（以馬爾托夫爲首）要戰勝我們，就必須倚據『中派』（泥潭）和反火星份子。這確實是必須的，因爲絕大多數反對反火星份子和『中派』底攻擊而一貫捍衛火星綱領、策略和組織計劃的代表都是很快很堅決地站到我們方面來了。從既不屬於反火星份子，又不屬於『中派』的三十三個代表（更確切些說：三十三票）中，我們很快就奪得了二十四個，並和他們訂立了『直接協定』，組成了『固結的多數』。而馬爾托夫同志方面却只留下九票；爲要取得勝利，他就必須獲得一切反火星份

子和『中派』底票數，然而他和這兩派雖能一同行進（如在黨章第一項條文問題上），雖能實行『聯盟』，即能取得他們的贊助，但並不能同他們訂立直接協定，其所以不能，是因為他在代表大會期間始終都如我們一樣激烈進行過反對這兩派的鬥爭。這也就是馬爾托夫同志處境可悲而又可笑的原因！馬爾托夫同志在其戒嚴狀況內想用一個毒辣得要命的問題來消滅我，說什麼『我們敬請列寧同志爽直回答一個問題：『南方工人』社在代表大會上究竟對於誰是局外人呢？』（見第二三頁，附註）。我恭敬而爽直地回答道：對於馬爾托夫同志是局外人。證據就是：我很快就同火星份子們訂立了直接協定，而馬爾托夫同志當時却無論是同『南方工人』社，無論是同馬合夫同志，無論是同布魯克爾同志，都沒有訂立過，並且也不能訂立直接協定。

只有明白認識這一政治形勢以後，才可瞭解所謂『偽造』名單這一麻煩問題底『關鍵』。請具體設想一下當時的實在情形吧：火星組織是分裂了，我們雙方都在代表大會上自由鼓動擁護各自提出的名單。在許多個別私下談話中進行這種鼓動時把名單配合得五光十色，時而提出三人團來代替五人團，時而又用此一候選人來代替彼一候選人。例如，我很清楚地記得：在多數派底私下談話中曾提出過魯索夫、奧西坡夫、帕夫洛維奇、捷多夫諸同志為候選人，而經過討論和爭論以後又把他們取消了。也許還提出過我所不知道的其他候選人。大會上每一個代表都在談話中表示過自己的意見，提出過某些修正，參加過爭論等等。很難假定這種情形只是在多數派中間才發生過。甚至不容置疑的是在少數派中間也發生過同樣的情形，因為我們從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兩同志底信中可以看出，他們原定的那個五人團（頗坡夫，托洛茨基，佛明，格列波夫，特拉文斯基）後來已用三人團——格列波夫、托洛茨基、頗坡夫——替代了，並且格列波夫又不為他們所中意，於是他們就很樂意地用佛

明來把他代替了(見略多夫和哥林兩同志所印發的傳單)。不要忘記，我在本書正文內把大會代表劃分成各個集團，是根據 *post factum** 所作的分析實行的。其實，這些集團在進行競選鼓動時還剛才開始形成起來，當時各個代表間的意見交換是進行得完全自由的；我們彼此間並沒會有過任何「牆壁」，當時每一個代表只要想去同其他任何一個代表私下交談，就可隨便去同他交談。當時情況既是這樣，那末在各種配合和名單中除了火星組織底少數所提出的名單（頗坡夫，托洛茨基，佛明，格列波夫，特拉文斯基）之外，又還有過一個與它無很大區別的名單，即由頗坡夫、托洛茨基、佛明、史騰、葉哥羅夫五人構成的名單，也就毫不足怪了。這樣一種候選名單底產生原是極其自然的，因為我們的候選人——格列波夫和特拉文斯基，明明是火星組織底少數所不中意的（見他們那封載於本書正文第十章裏的信，在這封信裏，他們把特拉文斯基從三人名單中取消，而關於格列波夫則直接說這是一種妥協辦法）。用組委委員史騰和葉哥羅夫兩人來代替格列波夫和特拉文斯基，原是完全自然的事；反之，如果從黨少數各代表中未曾有一個人想到要實行這樣一種更代，那就會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現在我們就來考察以下兩個問題：（一）由葉哥羅夫、史騰、頗坡夫、托洛茨基、佛明五人構成的名單，究竟是誰提出來的呢？（二）為什麼馬爾托夫同志一聽到有人把這樣一個名單推在他頭上就大發雷霆呢？為要準確地回答第一個問題，就會必須實行向全體大會代表詢問一遍。但這在現時是辦不到的。就會——特別是——必須查明，黨少數（不要把黨少數和火星組織少數混為一談）中，究竟有哪些代表在大會上聽見過那兩個引起了火星組織分裂的名單

*意即「事後」。——譯者。

呢？他們究竟怎樣對待了火星組織多數和火星組織少數所提出的這兩個名單呢？他們沒有提出過，沒有聽見過什麼要想對火星組織少數底名單作一種愜意變更的假設或意見麼？可惜，這些問題在仲裁法庭上彷彿也沒有提出過，仲裁法庭（按法庭判詞全文看來）甚至始終不知道火星組織究竟是因爲怎樣的兩個『五人團』發生分裂的。例如，別洛夫同志（我認爲他是『中派』中的一份子）『曾供稱：他和捷依契有很好的同志關係，捷依契對他說過他自己關於代表大會工作的感想，所以如果捷依契進行過什麼擁護某種名單的鼓動，那他一定會把此事通知過別洛夫』。可惜始終沒有查明，捷依契同志在代表大會上是否和別洛夫同志說過自己關於火星組織那些名單的感想？如果說過，那末別洛夫同志對於火星組織少數所提五人團名單的態度又該是怎樣呢？他沒有提出過或沒有聽見過對於這個名單的愜意的變更麼？既然這個情節沒有查明清楚，所以別洛夫和捷依契兩同志底口供中也就含有哥林和略多夫兩同志所指出過的那個矛盾，即：捷依契同志——恰和他自己的斷語相反——『曾經鼓動擁護』火星組織所擬定的『某些中央候選人』。然後別洛夫同志又供稱，『關於在代表大會上流行的那個名單，他是大約在代表大會閉幕以前兩天遇着葉哥羅夫同志、顏坡夫同志以及哈爾科夫委員會各代表時私下聽見的。當時，葉哥羅夫曾表示驚奇，爲什麼人家竟把他列入中央候選人名單上去了，因爲他——葉哥羅夫——認爲把他推舉爲候選人是不能在大會代表中間——無論是在屬於多數的代表中間或在屬於少數的代表中間——博得同情的』。極可注意的，是這裏顯然是指火星組織底少數而言，因爲在黨大會其餘少數中間，把葉哥羅夫同志——組委委員和『中派』出色演說家——推舉爲候選人的提議是不僅能够，並且一定會受到同情的。可惜，正是關於黨少數內不屬於火星組織的那些份子同情與否問題，我們從別洛夫同志口中根本沒有聽見什麼消息。而

這個問題却正是一個主要問題，原來捷依契同志是埋怨人家不應該把這個名單推在火星組織少數頭上，但這個名單却可能是出自不屬於這個組織的少數方面哩！

當然，現在很難記起，究竟是誰最初主張提出這樣一個候選名單，以及我們中間每一個人究竟是從誰的口中聽見這個名單的。例如，我就不僅記不起這一點，並且也記不起多數中間最初提出上述那個包括魯索夫、捷多夫等人的候選名單的究竟是誰；從許多關於各種候選名單的談話、假設以及傳聞中，我只牢牢記得那些直接提在火星組織中或提在多數底非正式會議上表決過的『名單』。這些『名單』，多半都是經過口頭傳達的（我在致火星報編輯部的信第四頁倒數第五行裏所稱呼的那個『名單』，也就是指我用口頭方式在會議上提出過五個候選人而言），但往往也會寫在字條上，這種字條一般是在代表大會各次會議時由這一個代表遞交給另一個代表，並且通常是在散會以後就銷燬了的。

既然沒有準確的材料可以說明這個所謂名單底淵源，於是我們也就只好假定或者是有一個為火星組織少數所不知道而屬於黨少數的代表曾主張提出這樣一個候選名單，於是這個提議也就經過口頭和書面方式在代表大會上流行起來；或者是火星組織少數中某一份子在代表大會上曾主張提出這樣一個名單，但後來他却把這點忘掉了。我覺得後一段話更為可信，原因就是：提出史騰同志為候選人的意見是在代表大會上就顯然受到過火星組織少數底同情（見本書正文），而提出葉哥羅夫同志為候選人的意見又是這個少數在代表大會閉會後顯然發生了的（因為無論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或在戒嚴狀況中都對組委未被批准為中央委員會一事表示惋惜，而葉哥羅夫同志便是一個組委委員）。既然如此，既然這一想把組委委員變為中央委員的主張顯然在某些人腦海中盤旋過，那末假設少數中某一份

子在私下談話和在黨代表大會上提出過這種主張，又難道不是理所當然麼？

可是，馬爾托夫同志和捷依契同志不願作出這種當然的解釋，總想認定這裏有齷齪意向，有人蓄意陷害，有不誠實的成分，有人散佈過『明明虛假的以中傷爲目的的謠傳』，有人幹過『專謀派別鬥爭利益的偽造』等等。這個病態的傾向只可說是由於僑外生活條件不健全或由於神經失常的結果，如果事情沒有弄到無理傷害同志榮譽的地步，那我就甚至根本不會談及這個問題。你們只要想想：捷依契同志和馬爾托夫同志究竟能有什麼根據認定不正確的通知或不正確的傳聞中含有齷齪的不良的意圖呢？他們顯然是由於神經失常，所以覺得多數派『詆毀』他們的名聲不是由於指出了少數派底政治錯誤（黨章第一項條文以及和機會主義者聯盟），而是由於把一個『明明虛假的』『偽造的』名單推到了少數派頭上。少數派寧願說問題不是由於他們犯了錯誤，而是由於多數派採取了什麼齷齪的不誠實的可恥的手段！想在『不正確的通知』找出惡劣意向原是極不合理的，——上面我們敘述當時情況時已經指明過這點；同志仲裁法庭也明白看見過這點，它並沒有認定這裏有什麼誣讒成分，什麼惡意成分，什麼可恥的東西。最後，還有一件事實也非常明顯地證實了這點，即早在黨代表大會上尚未進行選舉以前，火星組織底少數派就同多數派解釋過這種謠傳，而馬爾托夫同志甚至在他那封在多數派二十四個代表全體會議上被宣讀過的信中解釋過這種謠傳！多數派根本就沒有想要在火星組織底少數派面前隱瞞關於有某一個名單在代表大會上流行的事實：連斯基同志將此事通知過捷依契同志（見法庭判詞），普列漢諾夫同志對查蘇里奇同志說過這點（『同她是不能說話的，她彷彿是把我看作特列坡夫』——普列漢諾夫同志會這樣告訴我說，而這句重複過許多次的笑話也就再次證明少數派神經失常）。我曾向馬爾托夫同志聲明，說我認爲他所

作的解釋（說這個名單不是由他——馬爾托夫——提出等語）是已算足夠了的（見同盟記錄第六四頁）。當時，馬爾托夫同志（我記得他是同斯塔羅維爾同志一起）向我們主席團遞了一個內容約如下述的字條：『火星報編輯部中的多數請求允許他們參加多數派底非正式會議，以便闢除那些散佈起來反對他們的可恥謠傳』。當時我與普列漢諾夫兩人就在這張字條上寫了個答覆，其內容是說：『我們並沒有聽見過任何可恥的謠傳。如果需要召集編輯部會議，那末關於此事就須特別約定。列寧，普列漢諾夫』。我們晚上到場列席多數派會議時，就將此事叙說給所有二十四個代表們聽過。當時爲了免除一切誤會，就決定由我們二十四個人全體共同推選代表去與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兩同志解釋一番。被選出的兩個代表，即索羅金同志和薩普林娜同志，就跑去向他們解釋了一下，說誰也沒有把這個名單專門加在馬爾托夫同志或斯塔羅維爾同志頭上，特別是聽過他們兩人所作的聲明之後；說這個名單究竟是出自火星組織少數方面還是出自不屬於這個組織的大會少數方面，都是不甚重要的。的確，難道可以在代表大會上舉行一次普遍盤問麼！難道可以爲查明這個名單而把所有一切代表詢問一遍麼！可是，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兩同志又向我寫了一封正式闢謠的信（見本書正文第十章）。這封信由我們的代表索羅金和薩普林娜兩同志在二十四人會議上宣讀過。看起來，這件事情可算是已經結束了，——其所以說已經結束，並不是說已找出了名單底來源（如果有人對此點發生興趣的話），而是說完完全全排除了以爲有什麼人蓄意『危害少數派』或『中傷』任何人，或蓄意利用『假造以謀派別鬥爭利益』的任何念頭。雖然如此，但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大會上（見記錄第六三至六四頁）又拖出了這個由病態心靈中勉強臆造出來的齷齪意向，並作出了許多不正確的通知（顯然是由於他自己神經激發的結果）。他說，列入名單的有一個崩得份子。這是不對的。仲裁法庭

上所有一切見證人——連史騰和別洛夫兩同志在內——都證實說這個名單包括有葉哥羅夫同志。馬爾托夫同志說，這個名單是意味着直接協定性的聯盟。這是不對的，——上面我已經解釋過這點。馬爾托夫同志說，其他的什麼由火星組織少數方面提出的（並能使代表大會多數棄絕這個少數的）名單，『甚至連假造也沒有假造過』。這是不對的，因為黨代表大會多數全體都知道，由馬爾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們提出而沒有得到多數贊同的至少有三個名單（見略多夫和哥林兩人刊印的小刊）。

一般說來，爲什麼這個名單竟使馬爾托夫同志氣憤到如此地步呢？原來是因爲這個名單是意味着他們轉到我黨右翼方面去了。當時馬爾托夫同志會大喊大叫反對『誣加的機會主義罪名』，憤恨人家『把他那個政治立場估計得不正確』，但現在誰也看得清楚，關於相當名單是否屬於馬爾托夫同志和捷依契同志的問題並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其實，不管這個名單或其他什麼名單如何，罪名終究不是誣加而是確符實情的，對於政治立場的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從這一勉強造成的關於所謂假名單的難堪案件所應得出的總結有如下述：

（一）馬爾托夫同志藉叫喊『爲謀派別鬥爭利益僞造名單的可恥事實』來傷害古塞夫同志名譽的行爲，我們不能不與哥林和略多夫兩同志一起稱之爲無理的行爲。

（二）爲使氣氛健全化並使黨員們不必認真對待任何一種病態的胡言暴語起見，也許應當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規定一個在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組織章程內載明的規則。該章程第二項中載道：『凡顯係違背黨綱原則或犯有齷齪行爲者，即無立足於黨內的餘地。關於開除此類份子黨籍的問題應由黨管理局所召集的仲裁法庭解決。審判

員成份由提議開除者和被提出開除者各指定半數組成，主審員由黨管理局指定。對於仲裁法庭判詞的控訴，可提交監察委員會或黨代表大會審理」。這樣的規則可以成爲一種良好的鬥爭武器去反對那些輕意控告說（或散佈謠言說）他人犯有什麼醜態行爲的份子。在規定有這樣的規則時，凡屬這樣的控告，如果控告者沒有道義胆量用控告者資格在黨面前說話並力求得到相當黨機關判決時，即永遠算作無理的謔言。

寫於一九〇四年二月至五月間。

一九〇四年五月在日內瓦印成單行本。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八五至三九二頁。

日俄戰爭與第一次
俄國革命時期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 兩個策略

序 言

在革命時期，事變發展得異常迅速，供給人們非常豐富的新材料來估計各革命政黨底策略口號，令人很難跟上。本書是在敖德薩事變*發生以前寫就的。我們已在無產者報上（第九期，革命教導着人們）指出，這些事變甚至使那些造出了過程起義論並否認了宣傳臨時革命政府口號的社會民主黨人，也只好在事實上轉到或開始轉到自己的論敵方面來。革命教導人們，無疑是在和平的政治發展時代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那樣迅速，那樣澈底。而特別重要的，是革命不僅教導着領導者，並且也教導着羣衆。

毫無疑義，革命一定會教導俄國工人羣衆領會社會民主主義。革命一定會在事實上證實社會民主黨底綱領和策略，會表明各種社會階級底真實本性，會表明我國民主派底資產階級性質和農民底真正趨向，農民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性，但它本身所含有的並不是什麼『社會化』思想，而是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間的新的階級鬥爭。舊民粹派所持的那些例如在『社會革命黨』綱領草案中所很顯然透露出來的舊幻想，即是在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上，在我國『社會』底民主主義性問題上，在農民起義完全勝利底意義間

*指『波將金侯爵』鐵甲艦上的起義而言。（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題上所持的一切幻想，都一定會被革命無情地澈底吹散。革命將第一次給予各階級以真正的政治洗禮。這些階級將在革命過程中表現出自己一定的政治面貌，不僅會在其思想家底綱領和策略口號中，而且會在羣衆底公開政治行動中表示出自己的本性。

革命將教會我們，將教會民衆，——這是毫無疑義的。但現時擺在我們這個奮鬥着的政黨面前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能教會革命一些東西呢？我們是否能利用我們社會民主主義學說底正確性，利用我們和無產階級這個唯一澈底革命階級間的聯系，來給革命刻上無產階級的標記，不是口頭上而是事實上使革命達到真正澈底的勝利，麻痺民主資產階級底動搖性，半途性和叛賣性呢？

我們應當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於這個目的。但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一方面需要我們對政治局面有正確的估計，有正確的策略口號；另一方面，又需要工人羣衆用實際戰鬥力量來擁護這些口號。我們黨所有一切組織和團體每天經常進行的全部日常工作，即宣傳鼓動以及組織方面的工作，都是以鞏固擴大我們與羣衆間的聯系爲目標。這種工作始終都是必要的，但它在革命時期更是特別要加緊進行。在這樣的時期，工人階級本能地奮起進行公開的革命發動，而我們就應當善於正確提出這種發動底任務，然後就在羣衆中間儘量廣闊宣傳這些任務，使他們認識，使他們瞭解。不要忘記，對於我們與羣衆間聯系問題所持的一種流行的悲觀主義態度，特別是在現今這個時期，往往是掩蔽着人們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作用問題所持的那種資產階級觀念。毫無疑義，我們在教育工人階級和組織工人階級方面還有許許多多的工作要做，但現時全部問題卻在於究應把這種教育工作和組織工作底主要政治重心放置在什麼地方：是應放置在職工會和合法社團方面呢，還是應放置在武裝起義，放置在創立革命軍隊和創立革命政府的事業方面呢？在前後兩種工作方

面，都可以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當然，前後兩種工作都是必要的。但在現時，在現今革命中，全部問題都歸結於究應把我們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的工作重心放置在什麼地方：是應放置在前一方面呢，還是應放置在後一方面呢？

革命底結局將依工人階級究竟是會成爲資產階級底一個在攻擊專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的助手，抑或是會成爲人民革命底領導者這一點來決定。資產階級中的覺悟份子非常明白這點。所以解放雜誌也就讚揚着阿期莫夫派¹⁰⁰，即社會民主黨內現時把職工會和合法社團提到首要地位的「經濟派」。所以司徒盧威先生也就歡迎（解放雜誌，第七十二期）新火星派¹⁰¹中阿期莫夫主義的原則趨向。所以他也就拚命攻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中所表現的那種可恨的狹隘革命性。

現在，社會民主黨底正確策略口號對於領導羣衆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革命時期輕視原則上堅定的策略口號底意義，是再危險不過的。例如，火星報在第一百零四期上，事實上已轉到了它在社會民主黨內的論敵方面去了，但同時却又輕視了走在生活前面，爲運動指出它所應循着進行的（雖也難免遭到一些挫折，作出一些錯誤等等）道路的那些口號和策略決議底意義。恰恰相反，擬定出正確的策略決議，這對於一個想要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堅定原則來領導無產階級而不僅僅尾隨於事變的黨，實有莫大的意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和從黨內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所開的代表會議底決議*，便是對那些並非由個別著作家偶然說出，而是由社會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五月在倫敦舉行）只有布爾什維克參加。『代表會議』（同時在日內瓦舉行）只有孟什維克參加，在我這本書裏往往把他們稱爲『新火星派』，因爲他們雖然繼續出版着火星報，但他們以他們當時的同道者托洛茨基爲代言人宣佈過，在舊火星報和新火星報之間，橫着有一條無底的深淵。（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民主主義無產階級底負責代表通過的策略主張所作的一種最確切，最周到，最完備的表述。我們黨是比其餘一切政黨都要先進的黨，它有全黨所通過的精確黨綱。它就是在用嚴格態度對待自己的策略決議方面，也應當作出一個榜樣給其他政黨來看看，以對抗『解放』社民主資產階級底機會主義立場，以對抗直到革命時期才匆忙提出自己綱領『草案』，才開始研究目前發生的革命是否是資產階級革命問題的社會革命黨人底革命詞句。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認為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底最迫切工作就是要仔細研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策略決議和代表會議底策略決議，判明其中那些決議有離開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偏向，而領會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具體任務。本書也就是專為這一工作而寫的。同時，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和革命教訓來檢閱我們的策略，這對於那些不願局限於口頭勸說，而想切實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黨將來完全統一基礎的人，也是必要的。

尼、列寧 一九〇五年七月

(一)一個迫切的政治問題

在現今革命時期的日程上，擺着有召集全民立憲會議的問題。這個問題究應如何解決，意見極不一致。現在顯現有三個政治趨向。沙皇政府雖認許有召集人民代表會議的必要，但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容許這個代表會議成爲全民和立憲的會議。按報紙所載關於布里根委員會¹⁰²的消息來看，沙皇政府似乎同意召集一個按資格限制極嚴或等級限制極嚴的選舉制，並在不許鼓動自由的條件下選舉出來的諮議性的會議。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革命無產階級，要求使政權完全轉歸立憲會議，並爲此目的而不僅力爭普選權，不僅力爭完全鼓動自由，並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而代之以臨時革命政府。最後，由所謂「立憲民主黨」領袖們表示其願望的自由資產階級，並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成立臨時政府的口號，不要求切實保障選舉完全自由和完全正確，使代表會議能成爲真正全民和真正立憲會議。其實，「解放派」所倚靠爲唯一嚴重社會支柱的自由資產階級是力謀使沙皇和革命人民達到儘可能和平的妥協，並且要這種妥協使它自己即資產階級能獲得最多的政權，而使革命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只能獲得最少的政權。

這就是目前的政治形勢。這就是適合於現代俄國三個主要社會勢力的三個主要政治趨向。至於「解放派」怎樣用一些假民主主義辭句來掩飾他們那種半途性的政策，直截而簡單些說，就是他們那種叛變革命，出賣革命的政策，那末我們已在無產者報上（第三，

四，五期）屢次說過了。現在我們且來考察社會民主黨人怎樣估計目前任務吧。最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以及從該會公報中取出的節要（如公報中『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決

『論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注意到：

(一)無產階級底直接利益，以及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終極目的而鬥爭底利益，都需要有儘量完備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是需要用民主共和制度來替代專制政體；

(二)在俄國只有經過人民勝利起義才有可能實現民主共和制度，而成爲人民勝利起義機關的將是臨時革命政府，只有這個政府才能保證選舉鼓動可以完全自由進行，並按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來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憲會議；

(三)這個民主革命在俄國現存社會經濟制度下不會削弱，而會加強資產階級底統治；資產階級在相當時機一定會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以圖儘量奪去俄國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獲得的勝利品，——

所以代表大會決定：

(甲)必須在工人階級中間推廣宣傳，使其具體瞭解革命最可靠的進程，使其具體瞭解在革命發展到相當時機就必然有臨時革命政府出現，對於這個政府，無產階級將要求實現我們黨綱內所提出的一切最近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即最低限度綱領）；

(乙)依實力對比關係以及其他不可預先確切判定的因素爲轉移，我黨代表可以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以便無情打破一切反革命企圖，而捍衛工人階級底獨立利益；

(丙)這樣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必要條件，就是黨對於自己的代表施行嚴格的監督，並堅決不移地保存社會民主黨底獨立性，因爲社會民主黨力求實現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對一切資產階級政黨都取毫不調和的敵視態度；

(丁)無論社會民主黨 是否有可能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都
得在極廣大無產階級羣衆中間進行宣傳，使其瞭解，社會民主
黨所領導的武裝無產階級爲保護、鞏固和擴大革命勝利起見，
必須經常逼迫臨時政府」。

(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 論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給予 了我們什麼呢？

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底標題來看，就可知
道它是完全和專門論述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這就是說，社會民主黨
人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這個問題底一部分。另一方面，這裏只是
說臨時革命政府，而不是說什麼其他的東西，因此這裏完全沒有提到
例如關於一般『奪取政權』問題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代表大會把後
面這個問題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撇開不說，是否作得正確呢？當然
作得正確，因爲這類問題是俄國現今政治形勢尚未提到日程上來的。
反之，現在全體人民所提到日程上來的問題，是推翻專制制度和召
集立憲會議。黨代表大會所應提出來解決的並不是某個作家適時
或不適時涉及的問題，而是時局條件和客觀社會發展進程使其具有
嚴重政治意義的那些問題。

臨時革命政府在現今革命中以及在無產階級一般鬥爭中有什麼
意義呢？代表大會底決議解釋了這個問題，它在頭一段裏就指出
說，『儘量完備的政治自由』，無論從無產階級底直接利益方面來
看，或從『社會主義底終極目的』方面來看，都是必要的。而爲要
達到完備的政治自由，就必須用民主共和制度來替代專制制度，正
如我們黨綱早已認定的那樣。在代表大會決議中着重指出民主共和
制度這一口號，在邏輯上和原則上都有必要，因爲無產階級是爭取
民主的先進戰士，它正是力求爭得完備的自由；除此而外，這樣着

重指出，在現今時機尤其適當，因為恰巧現時在我國掛起『民主主義』幌子出台活動的有君主派，即所謂立憲『民主』黨或『解放』黨。爲要建立共和制度，就絕對要有人民代表會議，並且一定要它是全民的（按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產生的）和立憲的會議。而代表大會底決議接着就是認定必須這樣的。可是，這決議並不以此爲限。爲要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單是把代表會議稱呼爲立憲會議還不够。必須使這個會議擁有實行『立』出什麼東西來的政權和力量。因此，代表大會底決議也就不以『立憲會議』這一形式口號爲限，而還補說到唯一能担保這個會議真正執行本身任務的種種物質條件。指出這些能使口頭上的立憲會議變成事實上的立憲會議的種種條件是絕對必要的，因爲正如我們已經屢次指出過的那樣，以君主立憲黨爲其代表的自由資產階級，故意曲解全民立憲會議口號，而將其變成一句空話。

在代表大會底決議中說道：只有臨時革命政府能保證選舉鼓動完全自由進行並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會議，而且這個政府應當是人民勝利起義底機關。這個原理是否正確呢？誰想駁倒這個原理，那他就應當斷言，說沙皇政府不一定要援助反動勢力，說沙皇政府能在選舉時守中立，說沙皇政府能關心於民意底真正表現。這類斷語真是荒謬絕倫，誰也不會公開加以擁護，然而我們的解放派正是暗地裏在自由主義幌子下偷運着這類東西。立憲會議是應當有人來召集的；選舉底自由和正確性是應當有人來保證的；這個會議是應當有人來賦予它以全部政權和力量的；只有身爲起義機關的革命政府才能完全誠心願意來作這點，也只有它才有力量採取一切辦法來實現這點。沙皇政府必然會反對這點。自由派政府既和沙皇妥協分贓而不完全憑藉於人民起義，決不能誠心願意來作這點，而且即使它極其誠心願意這樣作，也不能實現這點。因此，代表大會底決議所給予的口號，是唯一正確和十分澈底的民主口號。

可是，在估計臨時革命政府底意義時若不注意民主革命底階級性質，就會估計得不完備，而且會估計得不正確。所以決議就補充說，這個革命會使資產階級底統治加強起來。這在現存的，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但資產階級對於多少享有政治自由的無產階級的統治一加強起來，結果就必然會引起這兩個階級爲爭奪政權而拚命進行的鬥爭，而資產階級就會拚命企圖『奪去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獲得的勝利品』。所以，無產階級走在大家前面，領導全體民衆爲民主制奮鬥時，一分鐘也不應忘記潛藏在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裏面的新矛盾，一分鐘也不應忘記新鬥爭。

可見，我們所考察的這一部分決議是把臨時革命政府底意義估計得完全周到的：無論是按其對於爲自由爲共和制度鬥爭的關係來說，或按其對於立憲會議的關係來說，或按其對於爲新的階級鬥爭掃清地基的民主革命的關係來說，都是完全估計到了的。

其次，試問，無產階級對於臨時革命政府的一般態度應當怎樣呢？代表大會底決議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首先就直接勸告全黨，說必須在工人階級中間推廣宣傳，使其確信有成立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工人階級應當覺悟到這種必要。『民主』資產階級把推翻沙皇政府的問題掩蔽起來，而我們却應把這個問題提到第一位，並堅決主張必須成立臨時革命政府。除此而外，我們還應當指出這個政府所應採取而適合於現今歷史時期客觀條件和無產階級民主派任務的行動綱領。這個綱領就是我們黨底全部最低限度綱領，即最近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綱領，一方面，這些改革在現存社會經濟關係基礎上完全可能實現，另一方面，它們又是爲繼續進展，爲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

於是，決議就完全闡明了臨時革命政府底性質和目的。按其淵源和基本性質來說，這個政府應當是人民起義底機關。按其正式使命來說，它應當是用來召集全民立憲會議的工具。按其活動內容來

說，它應當實現無產階級民主派底最低限度綱領，因為只有這個綱領才能保障起義反對專制制度的人民底利益。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臨時政府是個臨時性的機關，不能實行尚未得到全體人民批准的積極綱領。這樣的反駁就會不過是反動派和「專制派」底一種詭辯。不實行任何積極綱領，就無異是容忍腐敗專制制度下的農奴制關係繼續存在下去。能夠容忍這種關係的，只有叛變革命事業者底政府，而決不是人民起義機關的政府。如果有人竟以立憲會議也許會不承認集會自由為藉口，而主張在立憲會議尚未承認這種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實上實現這種自由，——那就是一種欺人之談了！反對臨時革命政府立刻實現最低限度綱領，也就是這種欺人之談哩。

最後，我們還要指出，決議上提出實現最低限度的綱領作為臨時革命政府底任務，就把那些主張立刻實現最高限度的綱領，主張奪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等等的半無政府主義謬論，完全排斥了。俄國底經濟發展程度（即客觀條件），以及廣大無產階級羣衆底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即與客觀條件緊相聯系的主觀條件），都使工人階級無法立刻獲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無常識的人，才能忽視現今民主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只有最幼稚的樂觀主義者，才能忘掉現時工人大衆尚很少知道社會主義底目的及其實現手段。而我們大家都確信，工人底解放是全靠工人自己來實現的；假如羣衆還沒有充分覺悟性和組織性，假如羣衆還沒有在與整個資產階級進行公開階級鬥爭中獲得充分訓練和教育，那就根本談不到什麼社會主義革命。而對於妄以為我們遷延社會主義革命的那種無政府主義反駁意見，我們就要回答說：我們並不是遷延社會主義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按唯一正確可靠的道路，即按民主共和制度的道路來實行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誰想不經過政治民主制，而按其他道路走向社會主義，那他就必然會得出一種無論在經濟上或政

治上都是反動的荒謬結論。如果某些工人在相當時候質問我們爲什麼不可實現最高限度綱領，那時我們就會回答他們說，懷着民主主義情緒的民衆尚很漠視社會主義，階級矛盾尚未充分發展，無產者尚很缺乏組織性。試在全俄各地組織數十萬工人吧，在數百萬羣衆中間推廣宣傳而使其同情於你們的綱領吧！你們試去進行這件事情，而不以說些響亮而空洞的無政府主義辭句爲限，那你們馬上就會知道，爲了實現這一組織任務，爲了推廣這種社會主義教育，就必須儘量完備地實現各種民主改革。

再往下說去吧。臨時革命政府底意義以及無產階級對它的態度既已闡明，於是就發生如下一個問題：我們參加這個政府（即從上面來動作），是否可以容許，以及在什麼條件下才可以容許呢？我們應當怎樣從下面來動作呢？決議對於所有這兩個問題都給了明確的答覆。在決議上堅決聲明說，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在民主革命時代，在爲共和制度而鬥爭時代），在原則上是可以容許的。我們作了這樣的聲明，就是決然表示既和那些在原則上反對這種參加的無政府主義者分開，又和社會民主黨內那些以我們勢必要參加這個政府來恐嚇我們的尾巴主義者（如馬爾丁諾夫和新火星派份子之類）分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這樣聲明，就決然推翻了新火星報認爲社會民主黨人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策略是變形的米勒蘭主義，是一種尊崇資產階級制度而在原則上不可容許的態度等等的意見。

但是，說原則上可以容許，當然還不是說實際上一定適當。究竟在什麼條件下，代表大會所承認的這個新的鬥爭方式，即『從上面』來鬥爭的方式，才算適當呢？當然，關於各種具體條件，如實力對比關係等等，現在還無法說到，所以決議自然也就不來預先規定這些條件。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不會在現時對這個問題預下什麼斷語。但我們參加底性質和目的，却是可以而且應當斷定的。

決議也就這樣來作，而指出我們參加底兩個目的：（一）無情打破反革命企圖；（二）捍衛工人階級底獨立利益。自由派的資產者正開始熱烈談論着反動派底心理（請看司徒盧威先生發表於解放雜誌第七十一期上的那封極可玩味的公開信），力圖嚇倒革命民衆，並引誘他們對沙皇制度讓步，——在這個時候，無產階級黨指出必須和反革命勢力進行真正戰爭的任務是特別適當的。政治自由和階級鬥爭底偉大問題歸根結底只能由強力來解決，所以我們也就應當設法準備並組織這種強力，設法積極運用這種強力，不僅運用它來實行防禦，而且運用它來實行進攻。從巴黎公社失敗以來，幾乎毫無間斷地籠罩歐洲的長期政治反動，太使我們習慣於僅僅『從下面』來動作的思想，太使我們習慣於觀察單是防禦性的鬥爭了。我們現在無疑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政治震動和革命的時期開始了。在俄國現時所處的這樣的時期，決不可局限於陳舊死板公式。必須宣傳從上面來動作的思想，必須準備去作最堅強進攻性的動作，必須研究這種動作底條件和形式。代表大會底決議認為這些條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兩個：一個是關係於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一事底形式方面（黨對於自己的代表們施行嚴格的監督），另一個是關係於這種參加底性質本身（一分鐘也不忘記完全社會主義革命底目標）。

決議既從各方面闡明了黨『從上面』來動作時的政策，黨在運用這個幾乎迄今未見的新的鬥爭方式時的政策，又還估計到我們將來無法從上面來動作的那種場合。從下面來逼迫臨時革命政府，我們在任何場合都是應該的。無產階級爲要實行這樣從下面來逼迫的辦法，就應當武裝起來，——因爲在革命時期可能特別迅速地發生直接內戰，——並應當受社會民主黨底領導。無產階級武力逼迫底目的就是要『保護、鞏固和擴大革命底勝利』，即那些按無產階級底利益來看應以實現我們全部最低限度綱領爲內容的勝利。

我們就以此來結束我們對第三次代表大會論臨時革命政府問題決議的簡要分析。讀者從上文中可以看見，這個決議是把新問題底意義，無產階級黨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以及黨從臨時革命政府裏面和外面來動作的政策，都一一闡明了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代表會議』底相當決議吧。

(三)什麼是『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呢？

『代表會議』底決議是專論『奪取政權與參加臨時政府』問題的*。我們已經指出，在這種問題提法中就包含有一種糊塗觀念。一方面，問題提得很窄狹：僅僅說到我們參加臨時政府，而不是一般說到黨對於臨時革命政府的任務。另一方面，又把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混為一談：一個是我們參加民主革命一個階段的問題，另一個是社會主義革命問題。要知道，社會民主黨『奪取政權』，如果被這幾個字底直接通常意義來說，恰巧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決不會是什麼其他的東西。如果把這幾個字解作不是為社會主義革命，而是為民主革命奪取政權，那末不僅說到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並且還一般地說到『奪取政權』，又有什麼意思呢？顯然，我們的『代表會議派』自己沒有弄清楚，究竟他們應當說什麼：是要說民主革命，還是要說社會主義革命。誰若留心觀察過論述這個問題的作品，就會知道，這種糊塗觀念是馬爾丁諾夫同志在他那部有名的兩個專政中開始提出的：新火星派不樂意提起這一標本尾巴主義著作中所發表的（還在一月九日事變¹⁰³以前發表的）問題提法，但這一著作對於代表會議有思想上的影響，却是不容置疑的。

*讀者把本書第四〇〇，四〇三，四〇七，四三一以及四三三頁（按本卷次序是第五八三，五八七至五八八，五九二至五九三，六二四，六二八頁。——譯者）上所引各段集合起來，便可得到這個決議底全文。（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但是，我們且把這個決議底標題撇開不說。這個決議底內容向我們表明出更深刻更嚴重得無比的錯誤。以下便是這個決議底第一部分：

『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既可能表現於從勝利的人民起義中產生的臨時政府，也可能表現於某個代表機關在人民直接革命逼迫下決定召集全民立憲會議的革命發起』。

總之，他們是說，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既可能表現於勝利的起義，又可能表現於… 代表機關決定召集立憲會議！這是什麼話呢？怎麼會這樣呢？澈底勝利可能表現於『決定』召集立憲會議麼？而且還把這樣的『勝利』拿來和成立『從勝利人民起義中產生的』臨時政府等量齊觀哩！！代表會議竟沒有覺察到，勝利人民起義和成立臨時政府是表示革命在事實上勝利，而『決定』召集立憲會議却只是表示革命在口頭上勝利。

孟什維克新火星派底代表會議，陷入了自由派即解放派所常犯的錯誤。解放派空談『立憲』會議，害羞似地閉眼不看力量和政權保存於沙皇手中的事實，而忘記了爲要『立』出什麼東西來，就需要有力量來立的道理。代表會議也忘記了，無論怎樣一些代表底『決定』都是與實現這個決定相距尚遠的。代表會議也忘記了，當政權還保留在沙皇手中時，無論怎樣一些代表底無論怎樣一種決定，也會如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蘭克福國會底『決定』一樣成爲無謂而可憐的空話。當時，革命無產階級底代表馬克思在他主編的新萊茵報上，非常刻薄地譏笑了法蘭克福的自由主義『解放派』，因爲他們說了一些好聽的言辭，通過了種種民主主義的『決定』，『立了』種種自由，而事實上却讓政權留在國王手中，並沒有組織武裝鬥爭去反對當時操在國王手中的武力。當法蘭克福的解放派還在那裏從事空談時，而國王却已等得了良機，鞏固了自己的武力，於是反革命憑藉着實際的力量，便把民主派及其一切美妙的『決定』打得粉碎了。

代表會議所拿來和澈底勝利等量齊觀的東西，恰巧就是缺乏勝利基本條件的東西。爲什麼承認我黨共和綱領的社會民主黨人竟能陷入到這種錯誤中去呢？爲要瞭解這個奇怪現象，就須看看第三次代表大會專論脫離了黨的那一部分人的決議*。在這個決議裏指出，現在我們黨內還有各種『與經濟主義有血統關係的』派別。我們的『代表會議派』（可見，他們並不是枉然受了馬爾丁諾夫底思想領導的哩）關於革命的推論，實與經濟派關於政治鬥爭或八小時工作制的推論一模一樣。經濟派開口閉口都是說什麼『階段論』：（一）爲權利而鬥爭；（二）政治鼓動；（三）政治鬥爭，——或是（一）十小時工作制；（二）九小時工作制；（三）八小時工作制。這個『過程策略』所引起的結果，是大家都充分知道的。現在，『代表會議派』勸我們把革命也預先好好分成幾個階段：（一）沙皇召集代表機關；（二）這個代表機關在『人民』逼迫下『決定』召集立憲會議；（三）…關於第三階段，孟什維克還沒有商妥；他們忘記了，人民底革命逼迫將碰到沙皇制度底反革命逼迫，所以結

*茲將決議全文引錄如下：

『代表大會指出，在俄國社會民主黨裏，自從與經濟主義鬥爭時起，直到現在，都還在各種程度上和各方面問題中保存着種種與經濟主義有血統關係的色彩，其特徵就是一般趨向於降低無產階級鬥爭中覺悟成分底意義而使其服從於自發成分。在組織問題方面，這些色彩底體現者在理論上提出一個與本黨按計劃規定的工作不相符合的過程組織原則，在實踐上往往實行着一貫離開黨紀律的辦法，且時常向黨內最少覺悟的一部分人鼓吹，不顧俄國實際客觀條件如何都要廣泛應用選舉原則，企圖以此破壞目前唯一可能的黨性聯系底基礎。在策略問題方面，他們力圖縮小黨工作底規模，反對我們黨對各自由資產階級政黨採取完全獨立的黨性策略，否認我們黨可能並宜於担负起組織人民起義的使命，認爲我們黨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不應參加臨時民主革命政府。

代表大會責成全體黨員到處都要進行堅決思想鬥爭反對這種局部離開革命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的傾向，但同時代表大會認爲這樣或那樣附和這種觀點的人，在一個必要條件下，即在他們承認黨代表大會和黨章而完全服從黨紀律的條件下，可以參加黨的組織』（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果不是這個『決定』始終不能實現，便是問題又得由人民起義底勝利或失敗來解決。代表會議底決議也與經濟派底這樣一種議論完全相同：工人底徹底勝利，可能表現於用革命手段實現八小時工作制，或表現於恩賜十小時工作制和『決定』過渡到九小時工作制……真是一模一樣哩。

也許有人會來反駁我們說，決議底作者並沒有想把起義底勝利和沙皇所召集的那個代表機關底『決定』等量齊觀，而只是想要預先規定黨在前後兩種場合的策略。我們回答道：（一）決議原文是直截了當而毫不含糊地把代表機關底決定叫作『革命徹底戰勝沙皇制度』。也許這是由條文措詞疏忽的結果，也許它本來可以根據記錄來糾正一下，可是當它還沒有糾正以前，它却只能有一種意思，即完全是解放派所主張的那種意思。（二）決議底作者所陷入了的『解放派的』思維歷程，在新火星派其他作品中表現得更加鮮明無比。例如，在梯弗里斯委員會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用格魯吉亞文出版；火星報在第一百期上誇獎過它）上所登載的縉紳會議和我們的策略一文，簡直說出了如下的話來：『把縉紳會議』（我們要補充一句，關於這縉紳會議底召集，我們連半點確切消息也還不知道）『選定為我們行動中心』的『策略』，是比武裝起義和成立臨時革命政府的『策略』，『對於我們有利些』。我們往下還要回頭說到這篇論文。（三）預先討論黨在革命勝利時以及在革命失敗時，在起義成功時以及在起義不能擴展為嚴重力量時的策略，是一點也不容反對的。也許沙皇政府竟能召集代表會議來和自由資產階級妥協分贖，——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也就預測到這點，而直接說到『虛偽的政策』，『假冒的民主主義』，『如所謂縉紳會議一類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機關』*。可是，問題就在於這點不應在

*以下就是關於在政變前夜對政府策略的態度問題的這個決議底全文：

機關社會民主黨人報在第一百期上誇獎過它）上所登載的縉紳會議和我們的策略一文，簡直說出了如下的話來：『把縉紳會議』（我們要補充一句，關於這縉紳會議底召集，我們連半點確切消息也還不知道）『選定為我們行動中心』的『策略』，是比武裝起義和成立臨時革命政府的『策略』，『對於我們有利些』。我們往下還要回頭說到這篇論文。（三）預先討論黨在革命勝利時以及在革命失敗時，在起義成功時以及在起義不能擴展為嚴重力量時的策略，是一點也不容反對的。也許沙皇政府竟能召集代表會議來和自由資產階級妥協分贖，——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也就預測到這點，而直接說到『虛偽的政策』，『假冒的民主主義』，『如所謂縉紳會議一類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機關』*。可是，問題就在於這點不應在

論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中去說，因為這點與臨時革命政府沒有關係。這個場合能把起義和成立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推延下去，使其改變形態等等。但現在的問題並不是說有各種可能場合，可能獲得勝利，也可能遭到失敗，可能走直路，也可能走曲路的場合，而是說社會民主黨人決不可淆亂工人對於真正革命道路的觀念，決不可像解放派那樣把欠缺勝利基本條件的東西叫作澈底勝利。也許我們連八小時工作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而是只有經過長遠曲折的道路才能得到；但如果有人竟把無產階級不能阻止那種遷延、展期、妥協分贓、叛變、反動等現象的軟弱無力情形叫作工人勝利，那末你關於這樣一個人會要怎樣說呢？也許俄國革命將——如前進報*

見，一面加緊其通常高壓手段，以反對無產階級覺悟份子爲其主要目標，同時又實行：（一）企圖用讓步並約許改良來在政治上腐化工人階級，因而引誘工人階級離開革命鬥爭；（二）爲着同一目的而用假冒的民主形式把自己的虛偽的讓步政策裝飾起來，從邀請工人選派代表參加各種委員會和各種諮議會起，一直到成立如所謂精神會議一類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機關爲止；（三）組織所謂黑幫，掀起人民中間所有一切不覺悟或爲種族惡感和宗教惡感所迷惑的反動份子來反對革命，——所以代表大會責成各級黨組織：

（甲）揭破政府讓步辦法底反動口的，同時在宣傳和鼓動工作中間，一方面要着重說明這些讓步辦法迫不得已的性質，另一方面又要着重說明專制政府絕對無法實行什麼可以滿足無產階級的改良；

（乙）利用選舉鼓動來向工人們解釋政府這類辦法底真實意思，並說明無產階級必須用革命手段來按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召集立憲會議；

（丙）組織無產階級立刻用革命手段來實現八小時工作制以及工人階級其他迫切要求；

（丁）組織武裝抵抗來回答黑幫以及所有一切由政府領導的反動份子底發動』（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日內瓦前進報是我們黨內布爾什維克部分底機關報，於一九〇五年一月開始出版。從一月至五月，總共出版了十八期。從五月起，就有無產者報替代前進報開始出版，無產者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同年五月間在倫敦舉行；孟什維克沒有到會，却在日內瓦舉行了自己的代表會議）決定刊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有一次說過的那樣——以『立憲流產』而結束，但這難道可以辯護在決鬥前夜把這種流產叫作『澈底戰勝沙皇制度』的社會民主黨人麼？也許在最壞的結局下，我們不僅爭不到共和制度，而且憲法也會是一個虛幻的『施坡夫式的』憲法¹⁰⁴，但這難道就可容許社會民主黨人抹煞我們的共和制度口號麼？

固然，新火星派還沒有走到抹煞這個口號的地步。但他們已把革命精神喪失無餘，他們因全被毫無生氣的學究習氣蒙蔽而看不見當前戰鬥任務，這從他們在其決議中恰巧忘記說及共和制度這一事實中就可特別看得清楚！這真是難以置信，但這是事實。代表會議在其各種決議中都把社會民主黨底一切口號追認、重複申述、解釋、詳細說明過了，甚至沒有忘記工人應按各企業選舉首長和代表的事情，只是沒有找到機會來在論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中提及共和制度。說到人民起義底『勝利』，說到成立臨時政府，而又不指出這些『步驟』和動作對於爭取共和制度的關係，這就是表明他們擬製決議並不是要去領導無產階級鬥爭，而是要跟在無產階級運動底尾巴後面拐着腿兒行走。

總結起來說，決議第一部分就是：（一）完全沒有從爭取共和制度並保證召集真正全民和真正立憲會議的觀點上闡明臨時革命政府底意義；（二）把恰巧欠缺真正勝利基本條件和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等量齊觀，因而就是用簡直糊塗不堪的觀念去淆亂無產階級底民主意識。

（四）剷除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決議底第二部分：

『…無論在前一場合或後一場合，這樣的勝利都會是革命時代新階段底開端。

客觀的社會發展條件自發地提在這個新階段面前的任務，就是要在政治上獲得了解放的資產階級社會內各種成份爲實現本身社會利益和直接佔取政權而相互鬥爭的過程中，澈底剷除全部等級君主制度。

因此，臨時政府既負起責任來實現這個按其歷史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底任務，就會要調節獲得了解放的民族內各對立階級相互的鬥爭，不僅要推進革命發展過程，而且要極力反對其中危及資本主義制度基礎的那些因素」。

我們且把這段構成爲決議一個獨立部分的議論分析一下。這段議論底基本內容，是和代表大會決議第三條所敘述的內容相當的。可是，如果把兩個決議中的這一部分拿來對照一下，就可立刻看見這兩個決議有如下的根本區別。代表大會底決議簡括說明了革命底社會經濟基礎之後，便把全部注意力用來考察各階級爲爭奪一定勝利品而進行的非常確定的鬥爭，並把無產階級底戰鬥任務提到第一位。而代表會議底決議則冗長，模糊，混亂不清地描寫着革命底社會經濟基礎，非常含糊地談論爲一定勝利品進行的鬥爭，而絕對抹煞了無產階級底戰鬥任務。代表會議底決議是說在社會內各種成份相互鬥爭的過程中剷除舊制度。而代表大會底決議則是說我們無產階級黨應當實行這種剷除，只有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才是真正剷除舊制度，我們應當爭取這個共和制度，我們將爲這個共和制度和爲完全自由而鬥爭，不僅是要反對專制制度，並且當資產階級企圖（且一定會企圖）從我們手中奪去我們的勝利品時，還要反對資產階級。代表大會底決議號召一定的階級去爲明白確定的最近目的而鬥爭。而代表會議底決議則談論着什麼各種勢力底相互鬥爭。一個決議表示着積極鬥爭底心理，而另一個決議則表示着消極觀望底心理；一個決議充滿着從事活潑行動的號召，而另一個決議則充滿着死氣沉沉的學究習氣。兩個決議都說現在發生的革命對於我們只是

進到第二步的第一步，但其中一個決議由此作出的結論是說因此必須更迅速經過這第一步，必須更迅速結束它，爭得共和制度，無情擊潰反革命勢力，以便造成基礎來走第二步。而另一個決議則簡直沉沒在對於這第一步的冗長描寫中，並一味（恕我說句粗話吧）狂吻着這第一步。代表大會底決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底萬古常新的舊有思想（認為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把它當作序言或前提來作出既為民主革命，又為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的先進階級負有先進任務的結論。而代表會議底決議則始終只是停留在序言上，咀嚼着這個序言，並賣弄聰明才學來談論這個序言。

這個區別也就是向來都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分成爲兩翼的那個區別：在先前合法馬克思主義流行的年代是分成爲學究派和戰鬥派，在羣衆運動開始的時代是分成爲經濟派和政治派。經濟派根據馬克思主義認定一般階級鬥爭特別是政治鬥爭有深刻經濟根源的這一正確前提，作出了奇特的結論，說必須忽視政治鬥爭，必須阻滯其發展，縮減其規模，降低其任務。反之，政治派則根據同樣的前提作出另外的結論，說現在我們鬥爭底根源愈深，我們就應當愈廣闊，愈大胆，愈堅決，愈積極地進行這個鬥爭。現時在另一種環境中，在稍有不同的形式中發生的，仍然是那個爭論。我們根據認定民主革命還並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認定民主革命並不只使窮人『發生興趣』，認定民主革命底最深根源潛藏於全部資產階級社會底切身需要和要求中的這些前提，作出結論說，唯其如此，所以先進階級應當更大膽地提出自己的民主任務，應當更明白澈底地說出這些任務，提出共和制度作爲直接的口號，宣傳必須建立臨時革命政府，必須無情擊潰反革命勢力的思想。而我們的論敵新火星派却根據同樣的前提作出了另一樣的結論，認為不應澈底說出民主任務，認為在提出實際口號時也可以不提出共和制度的口號，認為可以不宣傳必須成立臨時革命政府的思想，認為召集立憲會議的決定也可以叫

作澈底勝利，認爲可以不把反對反革命勢力的鬥爭提作我們的積極任務，而可以把它沉沒於模糊不清的（並且是表述得不正確的，如我們馬上就會看見的那樣）什麼『相互鬥爭過程』的口實中。這不是政治家底口吻，而是一種冬烘先生底口吻！

你們愈仔細考察新火星派決議底個別語句，就會愈加明白看出它的這些基本特點。例如，他們說什麼『政治上獲得了解放的資產階級社會內各種成份相互鬥爭的過程』。我們記起決議所論述的題目（臨時革命政府），就要疑惑莫解地問道：既然說到了相互鬥爭過程，那末怎樣可以抹煞那些在政治上奴役資產階級社會的成份呢？『代表會議派』是不是以爲只要他們假定革命勝利，那末這些成份就會消失呢？這樣的念頭，一般說來是荒謬可笑，局部說來是絕頂的政治幼稚和政治近視。在革命已戰勝反革命以後，反革命不僅不會消失，反而會必然開始進行更殘酷的新的鬥爭。我們既以分析革命勝利時的任務作爲自己決議底題目，就應該特別注意到打退反革命攻擊的任務（代表大會底決議就是這樣作的），而不是把戰鬥黨底這些最近緊要迫切政治任務沉沒於談論什麼在現今革命時代以後會怎樣，在將來已有『政治上獲得了解放的社會』時會怎樣的普泛議論中。從前經濟派援引政治服從於經濟的一般真理來掩蔽自己對於迫切政治任務的不瞭解，現在新火星派也如他們一樣，援引關於政治上獲得了解放的社會內部鬥爭的一般真理來掩蔽自己對於在政治上解放這個社會的迫切革命任務的不瞭解。

例如拿『澈底剷除全部等級君主制度』一語來說吧。說得簡明一點，所謂澈底剷除君主制度，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但我們的善良的馬爾丁諾夫及其信徒，却認爲這個語法太簡單明瞭了。他們定要『加深』一下，定要說『聰明』一點。結果，一方面就弄出一種可笑的徒勞的深思。另一方面所得出的又不是口號而是描寫，不是雄壯的前進號召而是一種憂鬱的向後瞻望。呈現在我們眼前的簡

直不是些馬上就想爲共和制度奮鬥的活人，而是一種 *sub specie aeternitatis**，以 *plusquamperfectum*** 爲觀點來觀察問題的僵硬的木乃伊。

讓我們再往下讀去吧：『…臨時政府… 既負起責任來實現這個… 資產階級革命底任務』… 從這裏就可看出我們的『代表會議派』忽略了擺在無產階級政治領導者面前的具體問題。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具體問題，在他們眼簾內竟被什麼將來有許多政府會實現一般資產階級革命任務的問題所遮蔽了。如果你們真想『按歷史眼光』來觀察問題，那末任何一個西歐國家底例子都會向你們指明，正是有許多根本不是『臨時』性質的政府實現過資產階級革命底歷史任務，甚至那些戰勝了革命的政府都畢竟不得不實現這個被打敗了的革命底歷史任務。但稱呼爲『臨時革命政府』的並不是你們所講的那種政府：這樣稱呼的乃是革命時代的政府，它直接來替代被推翻了的政府，它所憑藉的是人民起義而決不是什麼從人民中間產生的代表機關。臨時革命政府是爲了使革命立刻勝利，爲了立刻打退反革命企圖而鬥爭的機關，而決不是爲了實現一般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任務的機關。先生們，且讓將來的歷史家在將來的俄國舊事上去判斷究竟那些資產階級革命任務是由我們大家或某個政府實現的吧，——這是再過三十年以後去作也不算遲的事情，而現在我們却要拿出口號和實際指示來爲共和制度而鬥爭，並使無產階級最積極地參加這個鬥爭。

我們上面所摘錄的那段決議中的最後幾點議論，也由於同樣的原因而不能令人滿意。所謂臨時政府應『調節』各對立階級相互的鬥爭一語，是極不妥當，至少是十分拙劣的：馬克思主義者決不應

*從永恆觀點上。——譯者。

**早已過去的事。——譯者。

當使用這種自由解放派式的說法，因為這種說法會使人們推想，以為有什麼政府可能不成爲階級鬥爭底機關，而成爲階級鬥爭底『調節者』… 政府『不僅要推進革命發展過程，而且要極力反對其中危及資本主義制度基礎的那些因素』。這個『因素』恰恰就是他們的決議假借其名義說話的那個無產階級哩！他們不去指明無產階級目前究應怎樣『推進革命發展過程』（把它推進得比立憲派資產階級所希望的這些），不去號召用一定方法準備起來，等到資產階級掉轉頭來反對革命勝利品時，就與資產階級鬥爭，——他們並不這樣作，却一般描繪着過程，毫不說及我們活動底具體任務。新火星派敘述自己思想時所採取的方法，使人聯想到馬克思對根本和辯證法觀念不相容的舊唯物主義的評語（見馬克思論費爾巴黑的著名論綱）。哲學家只是這樣或那樣來說明世界，——馬克思說，——而問題却是要改變這個世界。新火星派也是能頗爲滿意地描寫和解釋眼前的鬥爭過程，但却完全不能提出進行這個鬥爭的正確口號。他們雖然走得很起勁，但却領導得很不好，他們把認識了革命底物質條件並領導着先進階級的政黨所能够而且應當在歷史上表演的那種積極的領導作用和主導作用忽視過去，因而降低了唯物史觀。

（五）應怎樣『推進革命』呢？

我們且把這個決議往下一段引錄出來吧：

『在這樣的條件下，社會民主黨在革命全部過程中所應當力求保持的立場，是使它最有可能推進革命，而不會在與資產階級政黨不澈底的自私自利的政策鬥爭中陷於束手無策的地位，不會溶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

因此，社會民主黨不應當抱定奪取政權或在臨時政府中

分得政權的目的，而應當始終做一個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態度的政黨」。

忠告我們採取最有可能推進革命的立場，我們當然非常歡迎。不過我們除這個忠告之外，還想得到一種直接指示，就是在現今政治形勢下，在關於召集人民代表會議的議論紛紛和計劃百出的時候，社會民主黨究應怎樣推進革命。試問，不懂得主張人民與沙皇『妥協』的這種解放派理論底危險性的人，把單只『決定』召集立憲會議也叫作勝利的人，不努力積極宣傳必須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的人，是不是能在現時推進革命呢？把民主共和制度口號抹煞不提的人，是不是能在現時推進革命呢？這樣的人在事實上是把革命拉往後退，因為他們在實踐政治方面是停留在解放派立場的水準上。他們在規定黨在革命時期的目前任務和最近任務的策略決議中，既然把爲共和制度而鬥爭的口號抹煞不提，那末單是聲明承認要用共和制度代替專制制度的綱領，又有什麼意思呢？其實，解放派底立場，即立憲派資產階級底立場在現時的特徵，也就是把決定召集全民立憲會議當作澈底勝利，而對於臨時革命政府與共和制度問題則小心謹慎，默然不提哩！要想把革命推向前進，即是說使革命超過君主派資產階級所能把它推到的那個限度，就要積極提出一些絕對排斥資產階級民主派『不澈底性』的口號，強調這些口號，將其提到首要地位。這樣的口號在現時只有兩個，即（一）臨時革命政府與（二）共和制度，因爲全民立憲會議這個口號是君主派資產階級已經接受了（請看解放社底綱領），其所以接受了這個口號，正是要誘騙革命，不讓革命完全勝利，而使大資產階級能與沙皇制度妥協分贓。但我們看見，代表會議把這兩個唯一能夠推進革命的口號中的共和制度口號完全忘掉了，而對於臨時革命政府的口號，又簡直把它拿來與解放派的全民立憲會議口號等量齊觀，把兩者都叫作『革命澈底勝利』！！

是的，這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實，我們相信這件事實定會成爲將來記述俄國社會民主黨歷史者的路標。社會民主黨人在一九〇五年五月舉行的代表會議，通過決議說了一些什麼必須推進民主革命的漂亮話，而事實上却把這個革命拉往後退，事實上並沒有超過君主派資產階級底民主口號一步。

新火星派喜歡非難我們，說我們忽視無產階級溶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的危險。我們很想看看誰能根據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原文來把這個非難證實一下。我們要回答我們的論敵說：在資產階級社會基地上行動的社會民主黨，不在某些具體場合與資產階級民主派並排行進，就不能參加政治。在這方面，我們與你們不同之處就是我們與共和派革命資產階級並排行進，但決不和它打成一片；而你們却與君主派自由資產階級並排行進，也是不和它打成一片。問題本質就是如此。

你們用代表會議名義提出的策略口號，是與『立憲民主』黨即君主派資產階級政黨底口號相合，而同時你們又沒有覺察到，沒有意識到這種相合的情形，於是你們在事實上就成了解放派底尾巴。

我們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名義提出的策略口號，是與民主革命共和派資產階級底口號相合。這樣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在俄國尚未形成爲一個大的人民政黨*。可是，只有完全不知道俄國現今實際情形的人，才會懷疑這樣一個黨底成分已經存在着的事實。我們打算（在俄國大革命順利進行的情形下）不僅要領導已由社會民主黨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而且要領導能同我們並排行進的這個小資產階級。

*『社會革命黨人』與其說是這樣一個黨底萌芽，不如說是一個恐怖主義的智識份子集團，雖然這個集團所進行的活動底客觀意義是要實現共和派革命資產階級底任務。

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是表明代表會議不自覺地自行降到了君主派自由資產階級底水準。而黨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却表明代表大會自覺地把那些只會進行鬥爭而不會去實行妥協的革命民主派份子提到自己的水準。

這樣的份子在農民中間最多。按其政治趨向來劃分各個巨大社會集團時，我們可以大致不差地把革命共和民主派與農民羣衆看作一個東西，同時當然要像我們把工人階級與社會民主黨看作一個東西時那樣，加上一些限語和不言而喻的附帶條件。換句話說，我們還可把我們的結論表述如下：代表會議所提出的那些在革命時期中關係全國的*政治口號是表明代表會議不自覺地自行降到了地主羣衆底水準。黨代表大會所提出的那些關係全國的政治口號，却表明代表大會要把農民羣衆提到革命的水準。如果有人因我們作出這個結論而責備我們愛說怪話，那我們就請他試試推翻下面這個原理：如果我們無力把革命進行到底，如果革命僅僅以解放派式的『澈底勝利』，即以沙皇所召集的那種只是用作譏諷時才可叫做立憲會議的代表會議來結束，那就會是一個以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成分佔優勢的革命。反之，如果我們應分要經過一個真正偉大的革命，如果歷史這次不容許『流產』，如果我們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進行到澈底的勝利（不是解放派和新火星派心目中的那種『澈底勝利』），那就會是一個以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成分佔優勢的革命。

也許會有人認為我們假定革命將以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成分佔優勢，就是拋棄了確信當前革命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信念吧？像火星報現在那樣濫用這一概念，這種疑難是完全可能發生的。因此把這個問題拿來分析一下，也就完全不是多事之舉。

*我們在這裏不來說那些用特別決議說明的專門關於農民的口號。

(六)無產階級在與不澈底資產階級鬥爭
中陷於束手無策地位的危險，
究竟能從何處發生呢？

馬克思主義者絕對相信現今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那些在俄國已是必須實現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以及社會經濟上的改革，就其本身說來，不僅不會破壞資本主義底基礎，不僅不會破壞資產階級底統治，反而會第一次切實掃清基地，使資本主義能廣闊迅速發展起來，是按歐洲方式而不是按亞洲方式發展起來，反而會第一次使資產階級這一階級底統治成爲可能。社會革命黨人不能瞭解這個思想，因爲他們一點也不知道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底規律，他們不知道甚至農民起義完全成功，甚至爲着農民利益和按照農民願望來重分了全部土地（『平分土地』或其他類似辦法），也是絲毫不會消滅資本主義，反而會促進資本主義發展，加速農民本身底階級分化。社會革命黨人由於不瞭解這個真理，所以他們就成爲不自覺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家。堅持這個真理，對於社會民主黨不僅在理論方面而且在實踐政治方面都有莫大的意義，因爲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說無產階級政黨在現時『一般民主的』運動中必須保持完全的階級獨立性。

但是，從這裏絕對不能得出結論，說民主革命（按其社會經濟內容是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沒有巨大的益處。絕對不能從這裏得出結論，說民主革命不能有兩個可能的實現形式：或是以主要有利於大資本家、財閥和『開明』地主的形式來實現，或是以有利於農民和工人的形式來實現。

新火星派對於資產階級革命這一概念底內容與意義，根本瞭解得不正確。在他們的議論中經常透漏着一種見解，以爲資產階級革命只能產生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結果。這種見解是最錯誤不過的。資

產階級革命乃是不超出資產階級即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範圍的革命。資產階級革命表現着資本主義發展底需求，它不僅不會消滅資本主義底基礎，反而會擴大並加深這種基礎。因此，這個革命不僅表現着工人階級底利益，而且表現着全部資產階級底利益。既然在資本主義下，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是不可避免的現象，於是我們也就有充分理由來說，資產階級革命與其說是表現着無產階級底利益，不如說是表現着資產階級底利益。可是，若以爲資產階級革命完全不表現無產階級底利益，那就是完全荒謬的想法了。這種荒謬想法不是歸結爲老朽的民粹主義理論，便是歸結爲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前者認爲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利益相矛盾，因此我們也就不需要資產階級式的政治自由，後者認爲無產階級絕對不應參加資產階級政治，不應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不應參加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在理論上，這種想法就是忘却馬克思主義認爲在商品生產基礎上必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步原理。馬克思主義教導說，以商品生產爲基礎並與文明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交換關係的社會，在發展到相當階段時，它自己也不免要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馬克思主義堅決不移地排斥了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底夢囈之談，例如妄說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妄說除了經過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及其範圍內進行階級鬥爭的道路而外，似乎還可以經過其他什麼道路來跳出或跳過這個資本主義一類的夢囈之談。

所有這些馬克思主義原理，一般說來，特別是對於俄國說來，都是已經十分詳細證明，並反覆說明了的。而從這些原理中得出來的結論，就是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而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如俄國這樣的國家裏，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階級毫無條件是利於要資本主義獲得最廣闊，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消滅國內所有一切障礙資本主義廣闊自由和迅速發

展的舊制殘餘，毫無條件是對於工人階級有利的。資產階級革命就是最堅決地掃除全國舊制殘餘，即農奴制殘餘（屬於這種殘餘的不僅有專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而最充分地保證資本主義最廣闊、最自由和最迅速發展的革命。

因此，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是十分有利的。從無產階級底利益着想，資產階級革命是絕對必要的。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得愈完全，愈堅決，愈澈底，則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也就愈有保證。祇有那些不懂得科學社會主義初步的人，才會覺得這個結論是個新奇或怪誕的結論。而從這個結論中間，同時又得出一個原理，就是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要比對於資產階級更加有利。正是在如下一種意義上可以說這個原理毫無疑義：資產階級是利於倚靠某些舊制殘餘，例如君主制度，常備軍等等來反對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是利於要資產階級革命不過分堅決掃除一切舊制殘餘，而留下其中某些殘餘，即是要這個革命成爲不完全澈底，不進行到底，不堅決無情的。這個意思，社會民主黨人時常用稍微不同的語法來表示，說資產階級自己叛變自己，資產階級叛賣自由事業，資產階級不能實行澈底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是利於要資產階級民主發展方面必需的種種改革辦法實現得緩慢些，漸進些，多所顧忌和不堅決些，經過改良而不是經過革命；要這些改革辦法對於農奴制度各種『尊貴』機關（如君主制度）儘量小心謹慎；要這些改革儘量少去發展小百姓即農民和特別是工人所具有的革命自動性、主動性和毅力，否則工人就會更容易如法國人所說，『把槍枝從右肩移到左肩』，即是更容易用資產階級革命所供給他們的武器，用這個革命所給予他們的自由，用掃除了農奴制度的基地上所產生的那些民主機關，掉轉去反對資產階級本身。

反之，工人階級是利於要資產階級民主方面必需的種種改革辦法恰恰不是經過改良主義道路，而是經過革命道路來實現，因為改

良主義道路是一種遷延遲緩而使人民機體中腐爛部分消亡過程緩慢得引起萬般痛苦的道路。在這些部分腐爛過程中最感受痛苦的首先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道路是迅速開刀，直接割去腐爛部分而使無產階級最少受到痛苦的道路，是對君主制度以及與君主制度相適應的卑污齷齪、腐敗不堪和臭氣薰騰的機關最少讓步，最少顧忌的道路。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刊物，也就不僅是由於顧及書報檢查的條件，不僅是由於畏懼當局，才對革命道路可能性表示惋惜，害怕革命，拿革命一語來恐嚇沙皇，設法避免革命，奴顏婢膝地懇求實行小得可憐的改良，作為改良主義道路底基礎。站在這個觀點上的不僅有俄國新聞，祖國子弟，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時代，並且還有祕密出版的自由的解放雜誌。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處的那種階級地位，就必然使它在民主改革中表現不徹底性。而無產階級所處的階級地位，却使它必然要做徹底的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回顧過去，害怕勢必使無產階級加強起來的民主進步。無產階級只會失去自己頸上的一副鎖鏈，而它利用民主制度所獲得的却是整個世界。所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民主改革愈徹底，也就會愈少局限在僅僅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範圍。資產階級革命愈徹底，也就會保證無產階級與農民在民主改革中獲得愈多的利益。

馬克思主義教導無產者，並不是要他避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要他不關心資產階級革命，不是要他把革命中的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而是要他最努力地參加，最堅決地為徹底無產階級民主制，為徹底完成革命而奮鬥。我們雖不能跳出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民主範圍，但我們能夠大大擴展這個範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個範圍內為無產階級利益奮鬥，為無產階級底直接需求，為準備其實力去達到將來完全勝利所必需的條件而奮鬥。有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擁護上議院，『請求』施行普選制，而暗地裏祕密與沙皇政

府實行關於畸形憲法的妥協的君主派地方自治局紳董，也是資產階級民主派。拿着武器去反對地主官僚，以『幼稚的共和主義態度』主張『驅除沙皇』*的農民，也是資產階級民主派。有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有德意志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也有英吉利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有奧地利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也有美利堅式或瑞士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民主革命時代竟忽略了民主主義底各種程度上的差別，忽略了各種民主主義形式底性質上的區別，却專門『賣弄聰明才學』，說這橫直都是『資產階級革命』，橫直都是『資產階級革命』底果實，那就會是很漂亮的馬克思主義者了。

我們的新火星派，也就是這樣一些以近視自誇的聰明才子哩。恰巧在必須善於區別共和派革命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君主派自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時候和地方，他們竟以談論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為限，更說不上區別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徹底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了。當必須在現時革命中實現民主主義的領導，必須強調先進民主主義口號，以別於司徒盧威先生一流人物底變節口號的時候，必須把無產階級與農民真正革命鬥爭底最近任務直接而明確指示出來，以別於地主和廠主底自由主義妥協行為的時候，他們却彷彿真正變成了『囊中人』¹⁰⁶，而以消極談論『各對立階級相互鬥爭過程』為滿足。現在，問題底實質，即你們各位先生所忽略了的問題實質，就在於我國革命究竟是會以真正的偉大勝利完成呢，還是會以一種可憐的分贓妥協結束呢；我國革命究竟是會達到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呢，還是『疲竭於』一紙自由派施坡夫式的憲法上呢！

驟然看來，也許覺得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就完全離開了我們所討論的題目。但祇是驟然看來才會覺得這樣。其實，現時在俄國社

*見解放雜誌第七十一期，第三三七頁，第二號附註。

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社會民主主義策略與新火星派代表會議所規定策略之間已經完全顯露出來了的那個原則分歧底根源，恰恰就在這個問題上。新火星派現今決定工人黨在革命時期更複雜、更重要和更迫切得無比的策略問題時，又把經濟派底錯誤復活起來，結果就不是退兩步而是退三步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必須十分細心分析上面所提出的問題。

在我們從新火星派決議中所摘來的那段文字內，指出說社會民主黨在與資產階級不徹底政策鬥爭中有陷於束手無策地位的危險，說社會民主黨有溶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的危險。害怕這種危險發生的思想，顯然是貫徹於全部純粹新火星派的作品中，而這一思想也就是我們黨分裂中全部原則立場底真正關鍵（自從在這個分裂中，無謂爭鬪底成分，與向經濟主義方面轉變底成分比較起來，已完全退到後面去了的時候起）。我們毫無隱諱地承認：這種危險確實存在，且正是現在俄國革命燃熾的時候顯得特別嚴重。我們大家，即社會民主黨底理論家或——我對於我自己就寧願這樣稱呼——政論家，担負有一個刻不容緩而非常重大的任務，就是要認清這種危險在事實上究竟會從那一方面發生。因為我們分歧底根源並不是爭論有沒有這種危險存在，而是爭論這種危險究竟會從那一方面發生，是從『少數派』底所謂尾巴主義方面發生呢，還是從『多數派』底所謂革命主義方面發生呢。

為避免曲解和誤會起見，我們首先要指明一下，我們所說的危險並不在於主觀方面，而在於客觀方面；並不在於社會民主黨在鬥爭中所抱定的形式上的態度，而在於全部現今革命鬥爭底物質結局。問題不在於某些社會民主黨人集團是否願意溶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以及他們是否覺悟到這點，因為我們所說的根本不是這件事。我們並不猜疑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有懷着這種願望的人，而且問題完全不在於願望。問題也不在於某些社會民主黨人集團能否在全

部革命過程中保存其形式上的獨立性，獨存性，不依賴資產階級民主派而自立的地位。他們儘可不僅宣佈這種『獨立性』，並且儘可在形式上保存這種『獨立性』，但事實結果還可能是這樣，即他們會在與資產階級不徹底性鬥爭中陷於束手無策的地位。革命底最後政治總結也許會是這樣，就是雖然社會民主黨能夠保持形式上的『獨立性』，雖然社會民主黨能夠保持自己組織上的黨的完全獨存性，但它在事實上也許會不獨立，也許會不能對於事變進程刻上自己無產階級獨立性底標記，也許會是很軟弱，以至一般和整個說來，最後和最終總結起來，它之『溶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畢竟會是一件歷史的事實。

這才是真正危險之所在哩。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危險究竟會從那一方面發生：是如我們所想的那樣從以新火星報爲代表的社會民主黨右傾方面發生呢，還是如新火星派所想的那樣從以『多數派』，前進報等等爲代表的社會民主黨左傾方面發生呢。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個問題的解決要依各種社會力量動作底客觀配合情形如何爲轉移。在理論上，這些社會力量底性質已由馬克思主義者對俄國實況的分析所確定了，而現時在實踐上，它又由各集團和各階級在革命行程中的公開行動所確定着。馬克思主義者在現今時代很久以前所作的全部理論分析，以及對於革命事變發展進程的一切實際觀察，都向我們表明，從客觀條件看來，俄國革命有兩種可能的進程和結局。俄國經濟政治制度按資產階級民主發展方向的改革，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排除的。天下沒有一種能阻止這種改革的力量。但這種改革從現在實行這種改革的各個社會力量動作底配合中，可能得出兩種結果或兩種形式。二者必居其一：（一）或者結果是『革命徹底戰勝沙皇制度』；（二）或者是因達到徹底勝利的力量不够，而結果便是沙皇制度與資產階級中最『不徹底的』，最『自私自利的』份子妥協分贓。一切無窮紛繁的詳情和配

合，雖然誰也不能預先看到，但全盤結算起來，總不外乎上述兩種結局之一：或是前一結局，或是後一結局。

現在我們且把這兩種結局考察一下，第一是按這兩種結局底社會意義來考察，第二是按社會民主黨在前一結局與後一結局時的狀況（社會民主黨『溶化』，『束手無策』）來考察。

什麼是『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呢？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新火星派運用這個概念時，連這概念底最近政治意義都不能瞭解。而他們對於這個概念底階級內容是更不瞭解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都不應當像現在許多革命民主主義者（如加邦之類）那樣，拿『革命』或『俄國大革命』字眼自炫。我們應當確切認識，究竟有哪些實在的社會力量是與『沙皇制度』（這是一個完全實在而且是大家所完全知道的力量）對立，且能把它『澈底戰勝』。大資產階級，地主，工廠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會人士』，決不能成爲這樣的力量。我們看見，他們甚至不願意澈底勝利。我們知道，他們的階級地位就使他們不能與沙皇制度作堅決鬥爭；他們是被私有財產，資本和土地等絆腳纏縛得太緊了，所以不能去作堅決的鬥爭。他們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軍事力量來反對無產階級與農民，所以不能力求消滅沙皇制度。祇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才是能够『澈底戰勝沙皇制度』的力量，如果我們拿基本的巨大力量來看，而把城市小資產階級與鄉村小資產階級（也是『人民』）分配到這兩個力量中去的話。所謂『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就是實現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一早已由前進報指出過了的結論，是我們的新火星派無論如何都逃避不了的。除此而外，便沒有什麼別的力量能够澈底戰勝沙皇制度。

這樣的勝利也就會是專政，就是說，它必不可免地要憑藉於軍事力量，憑藉於羣衆武裝，憑藉於起義，而不是憑藉於某種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來的機關。這只能是專政，因爲實

現為無產階級與農民所立刻需要和一定需要的改革，就一定會引起地主、大資產者以及沙皇制度方面的拚命反抗。沒有專政，就無法打破這種反抗，就無法擊潰反革命企圖。但這當然不會是社會主義的專政，而會是民主主義的專政。它不能（如果不經過革命發展中的許多中間階段的話）觸動資本主義底基礎。它至多也只能實行利於農民的根本重分土地辦法；實行澈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義，直到共和制度為止；把一切亞洲式的、盤剝式的特徵，不僅從鄉村生活中而且從工廠生活中連根剷去；奠定認真改善工人生活狀況，提高其生活水準的基礎，最後 last but not least*，把革命火焰延燒到歐洲去。這樣的勝利還絲毫不會把我國資產階級革命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民主的變革不會直接越出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係的範圍；但這樣一種勝利，無論對俄國或全世界將來的發展，都有極大的意義。除了已在俄國開始的革命底這種澈底勝利而外，再沒有什麼東西能把全世界無產階級底革命毅力提得這樣高，能把達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完全勝利的道路縮得這樣短了。

至於這種勝利底蓋然程度如何，那却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決不對此抱什麼盲目樂觀態度，我們決不忘却這個任務底莫大困難，但我們前去鬥爭時應希望獲得勝利，並應善於指出達到這個勝利的真正道路。能夠引到這個勝利的趨勢是絕對存在的。固然，我們社會民主黨對於無產階級羣衆的影響還非常不夠，對於農民羣衆的革命影響還很小很小；無產階級，特別是農民，還非常散漫，非常不開通，非常蒙昧無知。但是革命很快地團結着他們，很快地啓發着他們。革命發展底每一步驟都喚醒着羣衆，且以不可遏止的力量把他們吸引到革命綱領方面來，因為這是澈底並完全表現其真正切身利益的唯一綱領。

機械學底定律告訴我們：作用與反作用相等。在歷史上，革命

*所謂最後，是按先後次序來講，而不是按重要性來講。——譯者。

底破壞力量如何，也多半是依自由趨向所受到的壓迫如何厲害和如何長久爲轉移，依古老「上層建築物」與現代新生力量的矛盾如何深刻爲轉移。國際政治形勢，也是在許多方面都非常有利於俄國革命。工農起義已經開始，雖然它還散漫，尙帶自發性質，尙屬軟弱，但它不容置辯而毫無條件地證明存在有能作堅決鬥爭，達到澈底勝利的力量。

如果這種力量不够，那末沙皇制度就會能够實行現在已從兩方面，即布里根先生們和司徒盧威先生們兩方面準備着的分贓妥協。那時，事情底結局就會是一紙畸形憲法，甚至會是——壞中最壞的結局——一張憲法諷刺畫。這也會是『資產階級革命』，不過是流產，墮胎，低能兒罷了。社會民主黨不肯自欺，它知道資產階級底變節天性，它就是在最暗淡無光的時日，即在『施坡夫式的』資產階級憲制興隆的時日，也不會灰心，也不會拋棄自己對無產階級實行階級訓練的堅強的耐心的堅定的工作。這樣的結局就會幾乎是與十九世紀歐洲所經過的一切民主革命底結局多少相似；而我們黨的發展就會循着艱難困苦，悠久遙遠，但已爲我們所熟悉，所踏平了的道路進行。

現在就要問：究竟在這兩個結局中的那一個結局下，社會民主黨在反對不澈底的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會真正陷於束手無策的地位呢？會真正『溶化』或幾乎溶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呢？

只要把這個問題清楚提出來，就不難馬上給以回答。

如果資產階級竟能用與沙皇制度妥協分贓的手段來破壞俄國革命，那時社會民主黨就會在反對不澈底的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真正陷於束手無策的地位，那時社會民主黨就會『溶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換句話說，那時無產階級就會不能對革命刻上自己的顯著的標記，就會不能用無產階級手段，或如馬克思說過的一樣『用平民手段』來打破沙皇制度。

如果革命達到澈底勝利，那時我們就能用雅可賓式的手段，或者說用平民手段來打破沙皇制度。馬克思於一八四八年在有名的新萊茵報上寫過：『全部法蘭西的恐怖主義無非是用來打破資產階級底敵人，即打破專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儈主義的一種平民手段而已』（見 Marx' Nachlaß*，由梅林格刊行，第三卷，第二一一頁）。在民主革命時代用『雅可賓主義』這一嚇人字眼來恐嚇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工人的人，是否思索過馬克思這幾句話底意思呢？

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基朗特派，即新火星派，雖不與解放派溶成一片，但事實上他們的口號底性質却使他們成為解放派底尾巴。而解放派，即自由資產階級底代表，是想要用柔和精神，用改良主義方法，用生怕得罪世家、貴族和朝廷的讓步態度，用審慎顧忌而毫不破壞現存制度的辦法，用恭順和氣態度，帶上白色手套（如彼特龍克維奇先生在血腥沙皇尼古拉接見『人民代表』（？）時帶着從一個巴什布祖克手上脫下的手套之類¹⁰⁶，見無產者報第五期），來對付專制制度。

現代社會民主黨中的雅可賓派，即布爾什維克派，前進派，代表大會派或無產者派¹⁰⁷，——我真不知道還可怎樣稱呼，——想要用自己的口號，把共和派革命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提到完全保存着自己階級獨立性的無產階級澈底民主主義水準上來。他們想使人民即無產階級與農民『用平民手段』打破君主制度和貴族，無情地消滅自由底敵人，用強力鎮壓敵人反抗，而決不對可惡的農奴制度、亞洲式暴政與欺壓政策餘孽實行絲毫讓步。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定要仿效一七九三年的雅可賓派，借用他們的觀點、綱領、口號以及行動方式。全然不是。我們的綱領並不是舊的而是新的綱領，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最低限度綱領。我們有

*馬克思遺著。——譯者。

新的口號：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當我們達到革命真正勝利時，我們還會有與力求實現完全社會主義革命的工人階級黨底性質和目的相合的新的行動方式。我們只是想用這樣一個譬喻來說明，二十世紀先進階級即無產階級底代表，即社會民主黨人，也是分成兩翼（機會主義派與革命派），正如十八世紀先進階級即資產階級底代表會分成兩翼，即分成基朗特派和雅可賓派那樣。

只有民主革命完全勝利時，無產階級在與不澈底資產階級鬥爭中才不會陷於束手無策的地位；也只有在那時候，無產階級才不致『溶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而會對於全部革命都刻上其無產階級的標記，正確點說，刻上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標記。

總而言之：無產階級爲要在與不澈底資產階級民主派鬥爭中不致陷於束手無策的地位，就應當具有充分覺悟，充分實力，足以把農民提到革命自覺程度，足以領導農民舉行攻擊，而能獨立實行澈底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

新火星派解決得極不妥當的所謂在與不澈底資產階級鬥爭中陷於束手無策地位的危險的問題，就是這樣。資產階級始終是不澈底的。企圖擬定一些條件或條款*，希望資產階級民主派加以履行來證明他們是誠實無欺的人民之友，那就是再幼稚和再無聊不過的了。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成爲爲民主制澈底奮鬥的戰士。只有在農民羣衆加入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條件下，無產階級才能成爲在爲民主制奮鬥中獲得勝利的戰士。如果無產階級沒有充分力量達到這步，則資產階級就會成爲民主革命底首領而使這個革命成爲不澈底的和自私自利的東西。爲要防止這種危險，除了實行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而外，是別無他法的。

於是，我們就得到一個毫無疑義的結論，即新火星派底策略按

*如斯塔羅維爾曾在他所提出而被第三次代表大會取消了的決議中企圖這樣作過，代表會議在其同樣不妥當的決議中也企圖這樣作。

其客觀的意義來說正是效勞於資產階級民主派。鼓吹組織渙散狀態，以至於主張在黨內實行全民投票制，協定原則，使黨的刊物離開黨；藐視武裝起義底任務；把革命無產階級底全民政治口號與君主派資產階級底口號混爲一談；曲解『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的條件，——所有這些綜合起來，就構成了革命時期的尾巴主義政策，這個政策不僅不指出達到勝利的唯一道路，不僅不把人民中間所有一切共和派革命份子吸引到無產階級口號下面來，反而把無產階級引入迷途，瓦解其隊伍，混亂其意識，降低社會民主黨底策略。

* * *

爲要證實我們以分析該決議爲基礎而得出的這個結論，我們且從其他方面來觀察這一問題。第一，我們來看看一個誠實坦白的孟什維克如何在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人報上解釋了新火星派的策略。第二，我們來看看事實上究竟是誰在現今政治環境中利用新火星報底口號。

(七)『把保守派排斥於政府以外』的策略

我們在上面提到過的那篇登載於孟什維克的梯弗里斯『委員會』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一期）上的論文，其標題是『縉紳會議和我們的策略』。該文作者還沒有完全忘記我們的黨綱，所以提出了共和制度的口號，但他論到策略問題時說：

『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共和制度），可以指出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毫不顧及政府所召集的縉紳會議，而拿着武器去打倒政府，組織革命政府，召集立憲會議；另一條道路是把縉紳會議宣佈爲我們行動底中心，拿着武器來影響其成份和活動，並用實力來強迫它宣佈自己爲立憲會議，或經過它來召集立憲會議。這兩個策略是極不相同的。我們且來看看，究竟那一個策略對於我們有利些』。

你看，俄國新火星派份子就是這樣敘述後來體現於我們所分析過的那個決議中的思想的。請注意，這是在對馬島事件以前寫的，當時布里根『草案』還完全沒有出現於人世哩。當時，甚至自由派都已覺得忍無可忍，並且在合法刊物上表示其不信任的態度，而號稱社會民主黨人的新火星派份子却竟比自由派更為輕信些。他宣佈說縉紳會議『已在召集着』，並且非常信任沙皇，竟主張把這個尚不存在的縉紳會議（也許是『國家杜馬』或『立法諸議會』吧？）當作我們行動底中心。我們的這位梯弗里斯人，要比代表會議所通過的那個決議底起草者們較為坦白直率些，他不是把兩個『策略』（他以絕頂幼稚態度敘述出來的策略）拿來等量齊觀，而是宣佈說第二個策略『有利些』。請聽吧：

『第一個策略。你們知道，當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就是說，它的目標是要把現存制度加以一種不僅對於無產階級，而且對於整個資產階級社會有利的變更。所有一切階級，甚至資本家自己，都對政府持反對態度。奮鬥的無產階級和奮鬥的資產階級在某種意義上是協同行進，並從不同的方面來共同攻擊專制制度。政府在這裏完全是孤立無援，得不到社會方面的同情。因此，要把它推翻是很容易的。整個俄國無產階級底覺悟組織程度還不很高，所以不能單獨來實現革命。如果它能這樣作，那它就會不去實現資產階級革命而要實現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了。所以，我們的利益是要政府找不到同盟者，使它不能把反對派分開，使它不能拉攏資產階級而把無產階級置於孤立地位』…

總之，無產階級底利益是要沙皇政府不能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分開！這個格魯吉亞機關報本來應當叫作『解放』雜誌，莫不是由於誤會才被稱為『社會民主黨人』報的麼？你看，這是何等美妙的民主革命哲理呵！這難道不是顯然證明那位可憐的梯弗里斯人已

被學理主義和尾巴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觀迷惑得不可救藥了麼？他討論着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於孤立地位的問題，可是忘記了… 忘記了一件小事情… 忘記了農民！在無產階級底可能同盟者中間，他知道並且選定了地方自治派的地主，却不知道有農民。而這還是在高加索哩！那末，我們說新火星報底議論並不是把革命農民提高成爲自己的同盟者，而是把它自己降低到了君主派資產階級底水準，——這難道不是說得正確麼？

『…否則無產階級底失敗和政府底勝利就會必不可免。專制政府也就是力圖達到這步哩。它在其縉紳會議中一定會把貴族以及地方自治局、城市自治局和大學等等資產階級機關底代表們拉到自己方面去。它會設法用一些細微讓步辦法來結歡於他們，因而使他們和它協調起來。它用這樣的手段把自己鞏固起來之後，就會集中其全部壓力去打擊陷於孤立地位的工人大衆。我們的責任就是要防止這種不幸的結局。難道這可以按第一條道路做到麼？假定說，我們毫不理會縉紳會議而獨自開始準備起義，並於某一天拿着武器跑上街道去鬥爭吧。那時我們就會不是碰見一個敵人，而會碰見兩個敵人，即政府和縉紳會議。當我們還在準備時，它們早已商妥，成立協定，製定有利於己的憲法，並把政權瓜分掉了。這是直接有利於政府的策略，所以我們應當極端堅決拒絕這一策略』…

說得多麼坦白呵！必須堅決拒絕準備起義的『策略』，因爲否則政府『在這時』就會和資產階級實行妥協分贓的呵！恐怕就是在最頑固『經濟主義』底舊時作品中，也找不到稍微近似這樣玷污革命社會民主運動名聲的論調吧？時而在這裏發生，時而在那裏發生的工農起義和風潮，已是事實。而縉紳會議却只是布里根的口惠。但梯弗里斯城的社會民主黨人報却認定要拒絕準備起義的策略，而等候着『影響底中心』，即縉紳會議哩…

『…反之，第二個策略却是要縉紳會議受我們監督，不讓它按它的意志去動作，不讓它去和政府實行妥協*。

當縉紳會議和專制制度鬥爭時，我們就擁護縉紳會議，而當它和專制制度協調時，我們就和它鬥爭。我們要用強硬干涉和實力來把代表們彼此分開**，把急進派拉到自己方面來，把保守派排斥於政府以外，因而使整個縉紳會議走上革命的道路。我們採用這樣一種策略，就能使政府經常陷於孤立而使反對派實力強大，於是民主制度就會易於建立起來了』。

是呀，是呀！現在，讓人們去說我們誇大了新火星派轉向到最庸俗的經濟主義方面的事實吧。這簡直是和馳名的殺蠅藥粉毫無二致：先把一隻蒼蠅捉住，然後把藥粉撒在它身上，就可以把它殺死了。用實力把縉紳會議代表們分開，『把保守派排斥於政府以外』，那時整個縉紳會議就會走上革命道路了… 根本用不着什麼『雅可賓主義的』武裝起義，而只須隨隨便便，客客氣氣，用幾乎是國會的方式來『影響』縉紳會議底議員就行了。

可憐的俄國呵！人們曾說它總是戴着歐洲早已拋棄了的舊式帽子。我們這裏還沒有什麼國會，甚至布里根也還沒有約許設立國會，而國會迷却已非常流行了。

『…這種干涉應當怎樣實現呢？首先我們要求，縉紳會議須按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來召集。在公佈***這種選舉手續時，必須法定****選舉鼓動完全自由，即集會

*用什麼辦法來剝奪縉紳先生們自己的意志呢？莫不是用特別的試驗紙麼？

**天呀！多麼『深奧的』策略呵！要在街道上鬥爭，是沒有實力來幹的；而要『把代表們分開』，却就可以用『實力』來幹了。梯弗里斯城的同志呵，撒謊也要知道分寸才行哩…

***是在火星報上公佈麼？

****是由尼古拉來法定麼？

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選舉人和被選人不可侵犯，釋放一切政治犯。選舉日期應儘可能指定得晚些，好使我們有充分時間來叫人民認識並有所準備。既然關於召集縉紳會議的條例是委託內務大臣布里根委員會去製定，所以我們也就應當影響這個委員會及其各個委員*。如果布里根委員會拒絕滿足我們的要求**，而只賦予有產者以代表選舉權，我們就應當干涉這種選舉，用革命手段迫使選舉人選舉先進候選人，並在縉紳會議中要求召集立憲會議。最後，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如用示威，罷工以及在有必要時用起義手段，迫使縉紳會議召集立憲會議或宣佈自己為立憲會議。應負責保衛立憲會議的是武裝無產階級，而它們兩者就會一同***走向民主共和制度。

這就是社會民主黨的策略，也只有這個策略才能使我們獲得勝利』。

讀者不要以為這一大篇不可思議的謬論，是某一個不重要和沒有威望的新火星派份子隨便的試作。不是的，這是在新火星派所屬的整整一個的委員會即梯弗里斯委員會底機關報上說出的哩。不僅如此。火星報在其第一百期上直接嘉許過這篇謬論，而把這個社會民主黨人報評論如下：

『第一期編得生動而有天才。編者兼作家顯然具有諳練巧妙的本領…可以肯定說，這個報紙一定會燦爛地執行其它所抱定的任務』。

是呀！如果這個任務是要向大家具體表明新火星派十足的思想腐化，那它就真是『燦爛地』執行了。誰也不能比這更『生動、天才和巧妙』地表示出新火星派墮落到了自由資產階級機會主義地步的事實了。

*『把保守派排斥於政府以外』的策略，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方面既有如此正確而深奧的策略，是決不會發生這種事情的！

***是說武裝的無產階級和『已被排斥於政府以外的』保守派麼？

(八)解放派與新火星派

現在我們就來講另一個具體證實新火星派政治作用的事實。

司徒盧威先生在標題為怎樣認識自己的使命的燦爛輝煌而最可玩味的論文中（解放雜誌第七十一期），猛攻我國各極端黨底『綱領革命主義』。司徒盧威先生對於我個人，更是特別表示不滿*。至於說到我自己，那我當然是對司徒盧威先生非常表示滿意：在我和新火星派那種復活的經濟主義立場以及『社會革命黨人』那種毫無原則的立場進行鬥爭中，司徒盧威先生要算是我的一個最好不過的同盟者了。關於司徒盧威先生和解放雜誌已實際證明社會革命黨人綱領草案上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種種『修正』極其反動這點，且讓我們下次有機會時再說。關於司徒盧威先生每次在原

*『和列寧先生及其各位同志先生底革命主義比較起來，就是伯伯爾以至考茨基底西歐社會民主黨革命主義，都要算是機會主義，然而就連這個已經緩和了的革命主義底基礎也被歷史沖毀沖散了』。真是充滿怒氣的胡言暴語。不過，司徒盧威先生以為可把我當作死人來隨便誣賴，原是徒勞無益的。我只須向司徒盧威先生發出他永遠都不能接受的挑戰書就够了。試問：究竟我曾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把伯伯爾和考茨基底革命主義叫作『機會主義』呢？究竟我曾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希圖在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創立出一種與伯伯爾和考茨基兩人方向不同的特別方向呢？究竟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會暴露過我與伯伯爾和考茨基兩人間的意見分歧，即使是按嚴重性說稍微近似伯伯爾與考茨基彼此例如在布列斯拉夫代表大會上關於土地問題所發生過的那次分歧的分歧呢？讓司徒盧威先生試試來回答這三個問題吧。

不過我們要對讀者指出一點。自由資產階級隨時隨地運用的手段，就是硬要他們的本國同道者相信本國社會民主黨人最無理性，而隣國社會民主黨人則是些『好孩子』。德國資產階級曾數千百次把法國社會黨人形容為『好孩子』來訓誡伯伯爾和考茨基。法國資產階級在不久以前還把伯伯爾形容為『好孩子』來訓誡過法國社會黨人。司徒盧威先生呵，這是老把戲哩！你的這種圈套只能欺弄幼童和愚人。國際社會革命民主派在一切重大的綱領問題和策略問題方面的完全一致，是絕對不容置辯的事實。

則上嘉許新火星派時，總是給我一種誠實可靠和真正的幫助這點，我們已經說過多次*，而現在我們又要來說它一次。

司徒盧威先生這篇論文中有許多極有趣味的聲明，但我們在這裏只能把這些聲明順便指出一下。他打算『創立一個不憑藉於鬥爭，而憑藉於階級合作的俄國民主黨』，而『處於社會特權地位的智識界』（如司徒盧威先生用真正闊綽的… 奴僕莊嚴姿態屈膝恭維的『文化貴族』之類），就會把自己『社會地位』底重量（錢包的重量）帶進到這個『非階級的黨』裏來。司徒盧威先生聲明說，他願意叫青年們認識，『所謂資產階級驚慌起來而叛賣了無產階級和自由事業的這種急進主義濫調』，是毫無根據的（我們竭誠歡迎他這種願望。司徒盧威先生反對這一馬克思主義『濫調』的戰爭，真是最好不過地證實這個『濫調』正確了。司徒盧威先生呵，請你不要把你這個美妙計劃長久擱置下去吧！）。

我們認為在本文中必須指明，這樣一個政治上靈敏機警和極其善於隨機應變的俄國資產階級代表在目前所攻擊的，究竟是那些實踐口號。第一，就是共和主義底口號。司徒盧威先生堅信，這個口號『是民衆根本不瞭解的』（他忘記補充說一句：是資產階級很瞭解，可是於它不利的！）。我們很想看看，司徒盧威先生從參加我們小組和參加我們羣衆大會的工人方面會得到怎樣的答覆！也許工人不是

*請讀者回想一下，解放雜誌十分熱鬧地歡迎過不應當做什麼？（普列漢諾夫作的。——編者）一文（火星報第五十二期），認定它是過渡於對機會主義者讓步的一個『重大轉變』。解放雜誌在其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分裂問題的短評中，特別嘉許過新火星派底原則趨向。解放雜誌論到托洛茨基所著我們的政治任務一書時指出說，該書作者底思想是與工人事業派份子克里切夫斯基，馬爾丁諾夫和阿期莫夫三人以前寫過說過的東西一致（參看前進報所出版的傳單：喜歡替人揀腰的自由主義者）。馬爾丁諾夫所著論兩個專政一書，也受到解放雜誌方面的歡迎（參看前進報第九期所載短評）。最後，斯塔羅維爾事後埋怨舊火星報所提『先劃清界限，然後統一』這一舊口號而發出的言論，也是特別博得解放雜誌同情的。

民衆麼？而農民呢？農民，——據司徒盧威先生說，——往往懷有一種『幼稚共和主義』思想（『驅除沙皇』），但自由資產階級相信，將來替代幼稚共和主義的不是自覺的共和主義，而是自覺的君主主義！司徒盧威先生呵，Ça dépend——這還要依情況爲轉移哩。無論沙皇政府或資產階級，都不能不反對剝奪地主土地來根本改善農民狀況的辦法，而工人階級却不能不幫助農民這樣作。

第二，司徒盧威先生斷言，『在國內戰爭中，進攻方面總是沒有道理的』。這種思想頗與上面所說的新火星派趨向相近。我們當然不會說在國內戰爭中進攻是常常有利；防禦策略有時候也是暫時必要的。但是，把司徒盧威先生所提出的這樣一個論點應用於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那就恰巧是證明出一些『急進主義濫調』（『資產階級驚慌起來而叛賣自由事業』）。現在誰不願進攻專制制度，不願進攻反動勢力，不準備去實行這種進攻，不鼓吹這種進攻，那他便沒有資格來以擁護革命者自命。

司徒盧威先生斥責『嚴守祕密』和『騷動』口號（說這是『小玩意式的起義』）。司徒盧威先生對於前後兩者都表示鄙棄——是以『接近羣衆』的觀點來鄙棄的哩！我們要問問司徒盧威先生，他能在他認爲是一個極端革命主義者的人所著的如做什麼？這樣一本著作中找到鼓吹騷動的言論麼？至於說到『嚴守祕密』，那末試問——譬如說——我們和司徒盧威先生之間的區別難道是很大的麼？豈不是我們雙方都辦着『不合法的』報紙，將其『嚴守祕密地』運到俄國去供給解放社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嚴守祕密的』團體麼？我們的工人羣衆大會確實往往是『嚴守祕密地』舉行的。而解放派先生們底會議又是怎樣的呢？司徒盧威先生呵，你能拿出什麼東西來向擁護這種可惡嚴守祕密原則的可惡份子誇耀誇耀呢？

固然，運送武器給工人一事是要嚴守祕密的。司徒盧威先生在這裏是說得更直率些了。請聽吧：『至於按技術意義來說武裝起義

或革命，那就只有廣泛宣傳民主綱領，才可造成全面武裝起義底社會心理條件。於是，甚至從我所不贊同的觀點，即認為武裝起義是現時解放鬥爭必不可免的結局的這一觀點看來，用民主改革思想來薰陶羣衆，也都是最基本最必需的事情』。

司徒盧威先生力圖迴避問題。他是說起義必不可免，而不是說起義對於保證革命勝利的必要。無準備的自發散漫的起義已經開始了。誰也不能絕對担保它一定成爲完整周密的人民武裝起義，因爲這要依革命實力（只有在鬥爭過程中才可完全確切衡量出來的實力）情況，政府和資產階級底行爲，以及其他許多無法確切預料到的情況來決定。至於必不可免性問題，即司徒盧威先生離開正題而加以贅述的絕對相信具體事變必然到來的問題，那就根本用不着說及。所要說的，——如果你真想成爲擁護革命者的話，——就是起義究竟是否爲保證革命勝利所必需，是否必須積極將其提出，加以鼓吹，並立刻和努力加以準備的問題。司徒盧威先生不能不瞭解這種區別：例如，他豈不是不用在目前革命過程中必然會獲得普選制的問題來蒙蔽必須實行普選制的問題麼，前者在政治家看來是一個可以爭論而不迫切的問題，後者在民主派看來却是一個無可爭論的問題。司徒盧威先生迴避必須舉行起義的問題，就暴露了自由資產階級所持政治立場底內幕。第一，資產階級寧願去與專制制度妥協分贓，而不願把它擊潰；資產階級無論如何都想把武裝鬥爭的重担卸到工人身上（這是第二）。這就是司徒盧威先生所持迴避態度底實在意義。這就是他從必須舉行起義的問題退避到起義底『社會心理』條件，退避到預先『宣傳』的問題上去的原因。正好似一八四八年法蘭克福國會裏的資產階級空談家在必須抵抗政府武力的時候，在運動已使武裝鬥爭『成爲必要』的時候，當純粹口頭影響辦法（在預備時期萬分需要的辦法）已變成爲鄙陋資產階級消極怯懦態度的時候，而竟從事於擬製種種決議和宣言，從事於『廣泛宣傳』

和準備『社會心理條件』一樣，現在司徒盧威先生也是這樣用空話爲護符來迴避起義問題。司徒盧威先生向我們具體表明了許多社會民主黨人絕對不肯看見的一件事實，即：革命時期與歷史上尋常普通預備時期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此時羣衆底情緒、覺醒與信念應當表現於行動，而且確實表現於行動。

庸俗的革命主義者不瞭解『言也是行』的原理。這個原理對於一般歷史以及對於歷史上沒有公開羣衆政治發動（即絕非什麼盲動所能替代，並且是不能勉強造成起來的發動）的時代，都是不容置辯的。尾巴主義的革命家不瞭解：在革命時機已經開始，舊的『上層建築物』已是破綻百出，替自己創造着新上層建築物的階級和羣衆底公開政治發動已成爲事實，國內戰爭已經開始的時候，照舊局限於『言』而不提出轉爲『行』的直接口號，藉口於『心理條件』和一般『宣傳』而不肯行動起來，就會是一種毫無生機，死氣沉沉的學究習氣，或者就是叛賣革命和叛變革命。法蘭克福的民主資產階級空談家，就是這種叛賣行爲或這種學究魯鈍習氣遺臭萬年的歷史實例。

你們要我們根據俄國社會民主運動史來說明存在於庸俗的革命主義者和尾巴主義的革命家間的這個區別麼？我們就來向你們作這樣一個說明吧。請你們回憶那過去還很不久，但現在我們已覺得似乎是遠古時代的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時期吧。示威運動開始了。庸俗的革命主義者叫起了實行『衝殺』的口號（工人事業雜誌），發表了『血的傳單』（我記得彷彿是從柏林發出的），攻擊那主張用報紙來進行全俄鼓動的思想，說它含有『文人習氣』和書房性質（拿齊金）。反之，尾巴主義的革命家在當時却鼓吹着說，『經濟鬥爭是政治鼓動底最好手段』。而革命社會民主派當時又是持着什麼態度呢？它攻擊了所有這兩種潮流。它斥責了輕舉妄動的態度和號召實行衝殺的叫喊聲，因爲當時大家都明白看見或應當看見，

公開的羣衆發動還是明天的事情。它斥責了尾巴主義者，而直接提出了甚至全民武裝起義的口號，當然不是作爲一種直接號召（司徒盧威先生在我們當時的言論中間是找不到關於『騷動』的號召的），而是作爲一種必要結論，作爲一種『宣傳』（關於這種『宣傳』，司徒盧威先生直到現時才記憶起來，因爲我們的可敬的司徒盧威先生常常都是遲誤幾年哩），是爲了準備現在那些驚惶失措，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帶着憂愁態度，不合時節地』叨叨述說着的『社會心理條件』。當時，宣傳和鼓動，鼓動和宣傳，真正是由客觀情況提到了首要地位。當時，可以提出（而且在做什麼？一書內也真正提出來了）作爲準備起義工作核心的就是出版全俄政治報，而這種報紙每週出版一次，都會令人覺得是最好不過的事情哩。當時，進行羣衆鼓動而非從事於直接武裝發動，準備對於起義的社會心理條件而非輕舉妄動等口號，乃是革命社會民主派唯一正確的口號。現在，這些口號已被事變超過，運動已經前進很遠，而這些口號已成爲只可用來掩蓋解放派偽善態度和新火星派尾巴主義的古董廢物了。

也許是我弄錯了麼？也許革命還沒有開始麼？各階級公開政治發動底時機還沒有到來麼？國內戰爭還沒有發生，因而武器批評還不應當立刻成爲批評武器底必要和必需的繼承者，嗣續者，遺志執行者，未竟事業完成者麼？

你們只須看看你們自己周圍發生的事情，只須把你們的頭伸出書房窗兒來張望一下，就能回答這個問題了。難道政府自己不是已經到處大批槍殺手無寸鐵的和平公民而開始了國內戰爭麼？難道武裝黑幫的動作不是專制制度所運用着的『證據』麼？難道資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不是已感覺到成立民警的必要麼？難道司徒盧威先生，難道這位極其溫和客氣的司徒盧威先生，不是已在說着（咳！不過是爲了託辭推諉而說着呵！）『革命行動底公開性

質』（你看，我們現在已能說起如何漂亮的話來了！）『是現時黨陶民衆的最重要條件之一』麼？

誰願用眼睛來看眼前的事實，那他就不能懷疑凡屬站在革命方面的人現在應當如何提出武裝起義的問題。請看那些多少能夠影響羣衆的自由機關刊物上所發表的對於這個問題的三種提法吧。

第一種提法，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它承認並公開宣稱，全面的民主革命運動已使武裝起義成爲必要了。組織無產階級去舉行起義一事已成爲黨在目前的主要和必要的迫切任務之一。各組織應當極力設法武裝無產階級和保證直接領導起義的可能。

*以下就是這個決議底全文：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注意到：

（一）無產階級按其地位是最先進和唯一澈底革命的階級，所以它負有在俄國全面民主革命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的使命；

（二）這個運動現時已使武裝起義成爲必要了；

（三）無產階級一定會最積極參加這一起義，而它參加起義，就會決定俄國革命底命運；

（四）無產階級只有在不僅思想上而且實踐上領導其鬥爭的社會民主工黨旗幟下團結爲統一的和獨立的政治力量時，才能實現它自己在這個革命中的領導作用；

（五）只有實現這種領導作用，才可保證無產階級有最便利的條件，去進行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俄國各有產階級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所以代表大會認爲，組織無產階級用武裝起義進行反對專制制度的直接鬥爭，是黨在現今革命時期的最主要的刻不容緩的任務之一。

因此，代表大會養成所有各級黨組織：

（甲）不僅要用宣傳鼓動來向無產階級解釋當前武裝起義底政治意義，而且要向它解釋這個武裝起義底實踐組織方面的問題；

（乙）在進行這種宣傳鼓動時，要解釋羣衆政治罷工底作用，因爲這種罷工在起義開始時和在起義進程中都能有重要的意義；

（丙）要極力設法武裝無產階級，製定出舉行和直接領導武裝起義的計劃，並爲此——在有必要時——而設立黨工作人員所組成的專門團體』（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第二種提法，就是『俄國立憲黨人底領袖』（這是歐洲資產階級一個很有權威的機關報即法蘭克福報在不久以前給予司徒盧威先生的稱呼），或俄國進步派資產階級底領袖在解放雜誌上所發表的一篇原則論文。他不贊成認為起義不可避免的意見。嚴守秘密和騷動是不合理革命主義底特殊手段。共和主義是一種恐嚇的方法。武裝起義不過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最基本最必需的事情』却是廣泛宣傳和準備社會心理條件。

第三種提法，就是新火星派代表會議底決議。我們的任務是準備起義。起義絕對不能按計劃來進行。順利的起義條件只有靠政府的紊亂，靠我們的鼓動，靠我們的組織工作，才可造成。只有那時，『技術上的戰鬥準備工作才會有多少嚴重意義』。

如此而已麼？如此而已。起義已成為必要麼，——這是新火星派的無產階級領導者還不知道的。組織無產階級去進行直接鬥爭的任務已是刻不容緩麼，——這在他們看來是還不明白的。不要號召採取最積極的辦法；更重要得多的（是在一九〇五年，而不是在一九〇二年哩），是在大體上解釋這些辦法究竟在什麼條件下『才會』有『多少嚴重』意義哩…

新火星派同志們呵，現在你們知道你們因轉向於馬爾丁諾夫主義方面而走到什麼地步去了麼？你們懂得你們的政治哲學原來只是解放派哲學底幫腔麼？你們懂得你們成了（不管你們的意志怎樣，不管你們的意識如何而成了）君主派資產階級底尾巴麼？現在你們明白你們因輾轉重述舊事和練習學理主義，而錯過了——用司徒盧威那篇永誌不忘的論文中的一句永誌不忘的話來說——『革命行動底公開性質是現時薰陶民衆的最重要條件之一』的情況麼？

(九) 什麼是在革命時期做一個持極端 反對派態度的政黨呢？

我們回頭來考察論臨時政府問題的決議。我們已經指出，新火星派底策略並不是把革命推向前進，——雖然他們本來是想用自己的決議來保證這樣推進的可能，——而是把它拉往後退。我們已經指出，正是他們這個策略使社會民主黨在與不澈底的資產階級鬥爭中陷於束手無策的地位，而決不能預防溶化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去的危險。從決議底不正確的前提中，自然也就得出不正確的結論：

『因此，社會民主黨不應當抱定奪取政權或在臨時政府中分得政權的目的，而應當始終做一個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態度的政黨』。請看看這個結論關於目的問題的前半段吧。新火星派是不是把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當作社會民主黨活動底目的提出呢？——是當作目的提出的。他們雖不善於正確表述澈底勝利底條件而陷入了『解放派的』說法，但他們畢竟提出了上面那個目的。其次，他們是不是把臨時政府與起義聯繫起來呢？——是的，他們直接把這兩件事情聯繫起來，說臨時政府是『從勝利的人民起義中產生的』。末了，他們是不是力求領導起義呢？——是的，他們雖然也如司徒盧威先生那樣支吾搪塞，不肯承認起義必要和刻不容緩，但他們同時又與司徒盧威先生不同，而說『社會民主黨力謀使它（起義）服從於自己的影響和領導，並利用它來謀工人階級底利益』。

這豈不是說得非常圓通麼？我們力求使無產階級羣衆以及非無產階級羣衆底起義都服從於我們的影響和我們的領導，並利用它來謀我們自己的利益。於是，我們就力求在起義時既領導無產階級，又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非無產階級的集團』），即由社會民主黨與革命資產階級『分掌』起義領導權。我們力求使起義勝利，以便成立臨時政府（『從勝利的人民起義中產生的』臨

時政府)。因此… 因此我們不應當力求奪取政權或在臨時政府中分掌政權！

我們的朋友無論如何都不能自圓其說。他們動搖於兩種觀點之間：一種是司徒盧威先生託辭拒絕起義的觀點，另一種是革命社會民主派號召着手實現這個刻不容緩任務的觀點。他們動搖於兩個立場之間：一個是原則上把任何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行動都斥責為叛賣無產階級的行爲的無政府主義立場，另一個是要社會民主黨在它對起義有領導影響時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他們沒有任何獨立的立場：既沒有抱定想要與沙皇制度妥協分贓，因而應當對起義問題多方支吾搪塞的司徒盧威先生底立場；又沒有抱定斥責任何『從上面』動作和任何對資產階級革命實行參加的無政府主義者底立場。新火星派把與沙皇制度妥協分贓和戰勝沙皇制度混爲一談。他們想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他們比馬爾丁諾夫底兩個惠政稍進一步。他們甚至同意來領導人民起義——但主張在起義勝利後（也許是在起義快要勝利時？），馬上就放棄這個領導，即主張不要享用這個勝利底果實，而要把一切果實通統奉送給資產階級。這就是他們所謂『利用起義來謀工人階級底利益』哩…

用不着來繼續分析這個糊塗觀念了。倒不如考察『始終做一個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態度的政黨』一語所表述出來的這個糊塗觀念底淵源吧。

這個語句是早已熟悉的國際革命社會民主運動原理之一。這是一個完全正確的原理。它是各代議制國家所有一切反修正主義者或反機會主義者都很熟悉的原理。它是大家公認爲反對『國會迷』，反對米勒蘭主義，反對伯恩施坦主義，反對屠拉梯式意大利改良主義的一種正當而必要的回擊方式。我們的善良的新火星派把這個

*參看無產者報第三期所載第二篇論臨時革命政府的文章。

良好的原理讀得爛熟，且努力把它運用得……完全不合時節。在爲適應於沒有任何國會的條件而寫的決議中，竟提出了國會鬥爭底範疇。『反對派態度』這一概念，本是誰也不認真說到起義時的那種政治形勢底反映和表現，——而現在却機械地搬到起義已經開始，一切站在革命方面的人都想着並且說着要領導這個起義的形勢中來。恰巧是當革命已提出必須在起義勝利時從上面動作的問題的時候，而竟大聲疾呼地表示願意『始終』如從前那樣動作，即僅僅『從下面』動作。

我們的新火星派真是倒霉到極點了！他們甚至在表述出正確的社會民主主義原理時，也不善於正確運用這個原理。他們沒有想想，在革命已經開始的時代，在沒有國會的情形下，當國內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當起義正在爆發的時候，國會鬥爭底種種概念和名詞就會變成自己的反面。他們沒有想到，在這樣的條件下，修正案是用遊行示威手段提出的，質問是由武裝公民用進攻行動提出的，反對政府的態度是用強力推翻政府來實現的。

正好似民間故事中那個有名的角色總是把他背得爛熟的吉祥話用得不得當一樣，我們的馬爾丁諾夫信徒也是恰巧當他們自己都認爲直接軍事行動已經開始時背誦着和平國會鬥爭底教訓。在以指出『革命徹底勝利』和『人民起義』開始說起的決議中，公然提出『持極端反對派態度』的口號來，——這真是再可笑沒有的了！先生們呵，請你們想想吧：什麼是在起義時代『持極端反對派態度』呢？是說揭露政府，還是說推翻政府呢？是說投票反對政府，還是說在公開戰鬥中擊敗政府底武力呢？是說拒絕補充政府國庫，還是說用革命手段來奪取這個國庫，以供起義、武裝工農和召集立憲會議之用呢？先生們呵，你們是否已在開始瞭解『持極端反對派態度』這一概念只是表現着消極動作，即揭露，投票反對，拒絕呢？爲什麼這樣呢？因爲這個概念僅僅與國會鬥爭有關，而且是在誰也

不把『徹底勝利』當作鬥爭直接目的提出的時代才使用的。你們是否已在開始瞭解：當政治上被壓迫的人民爲拚命爭取勝利而舉行的全綫堅決進攻戰已經開始的時候，這方面的情形就根本改變了哩？

工人現在問我們，是否要來努力進行刻不容緩的起義事業呢？應怎樣設法使已經開始的起義成爲勝利的起義呢？應怎樣利用這個勝利呢？那時可以而且應當實現什麼綱領呢？以加深馬克思主義自命的新火星派回答說：始終做一個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態度的政黨……那末，我們把這些騎士叫作庸俗界中的頭等名角，難道不是叫得正確麼？

(一〇)『革命公社』與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新火星派代表會議沒能在新火星報墮落到了的那種無政府主義立場上（僅僅『從下面』，而不是『既從下面，又從上面』動作）支持下去。既容許起義，而又不容許勝利，不容許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這個立場是未免荒謬得太刺眼了。因此，決議就給馬爾丁諾夫和馬爾托夫底問題解決法加上一些附帶條件與限語。我們且來看看該決議在下一段中所敘述的這些附帶條件吧：

『這個策略（『始終做一個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態度的政黨』），當然絲毫不是說，專爲幫助擴大起義並瓦解政府起見，也絕對不宜於在某一個城市裏，在某一個區域裏，局部地暫時地奪取政權，成立革命公社』。

既然這樣，那就是說在原則上不僅容許從下面，而且容許從上面動作了。那就是說，馬爾托夫發表於火星報上（第九十三期）的那篇有名的雜感文中所提出的原理是被推翻了；而前進報底策略，即不僅要『從下面』動作，並且要『從上面』動作的策略，却被承認爲正確的了。

其次，奪取政權（那怕只是局部，暫時等等的奪取），顯然是預定不單有社會民主黨參加，不單有無產階級參加。這是因為不單只無產階級利於民主革命並積極參加這個革命。這是因為起義，如該決議首段中所說的那樣，是『人民的』起義，其中也有『非無產階級的集團』（這是代表會議派論起義問題的決議中的說法），即有資產階級參加。這就是說，社會主義者協同小資產階級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任何行爲都是叛變工人階級這一原理，是如前進報所希望的那樣被代表會議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叛變』是不會因構成這種『叛變』的行動只是局部的暫時的和區域的等等，而中止其爲叛變的。這就是說，把參加臨時革命政府與庸俗饒勒斯主義等量齊觀的觀點，是如前進報所希望的那樣被代表會議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政府是不會因其權力不推行於許多城市而只限於一個城市，不推行於許多區域而只限於一個區域等等，而中止其爲政府的；同樣，政府是不會因你如何稱呼它而中止其爲政府的。於是，新火星報所企圖給出的原則問題提法，就被代表會議拋棄了。

我們且來看看，代表會議對它現在已在原則上容許的成立一些革命政府和參加這些革命政府的主張所提出的那些限語，是否合理吧。『暫時』概念與『臨時』概念究有什麼區別，——我們可不知道。恐怕這裏只是想用一個『新奇』字眼來掩蓋缺乏明確觀念而已。這似乎是說得『深奧一點』，而其實却只是弄得更加曖昧糊塗罷了。『宜於』在某一個城市裏或某一個區域裏局部『奪取政權』，這究竟與參加全國臨時革命政府有何區別呢？難道像彼得堡這樣發生過一月九日事變的地方，豈不也是一個『城市』麼？難道像高加索這樣一個比許多國家都要大的地方，豈不也是一個區域麼？難道關於對待監獄、警察局和國庫等等等等的任務（這些會使新火星報心慌的任務），不是甚至在一個城市裏——更不待說在一個區域裏——『奪取政權』時，也會擺在我們面前麼？當然，誰也不會否認，在力量

不够，起義不能完全成功時，在起義得不到澈底勝利時，是可能有局部，城市等等臨時革命政府的。但是，先生們，這與問題有什麼關係呢？不是你們自己在決議首段中就說『革命澈底勝利』和『勝利的人民起義』麼？社會民主黨人究竟從什麼時候負起了責任來幹無政府主義者底事情：即分散無產階級底注意力與目標呢？即引導它去作『局部的』鬥爭，而不引導它去作普遍、統一、完整和完全的鬥爭呢？既然你們自己假定在一個城市裏『奪取政權』時是說爲了『擴大起義』，那末我們可否設想是爲擴大到另一個城市中去呢？可否希望是爲擴大到一切城市中去呢？先生們！你們的結論是與你們的前提一樣動搖，一樣偶然，一樣矛盾，一樣糊塗呵。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一般地對於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給了一個詳盡而明白的回答。這個回答是把一切局部的臨時政府也包括在內的。而代表會議底回答既勉強和隨意把問題底一部分劃分出來，也就只是託辭逃避（但沒有成功）整個問題而弄出一團糟。

『革命公社』是什麼意思呢？這個概念與『臨時革命政府』概念有區別麼，如果有區別，那末區別何在呢？這是代表會議派先生們自己也不知道的。他們由於自己的革命觀念模糊不清，就弄到——這是很常見的事——說革命空話的地步。的確，在社會民主黨代表底決議中使用『革命公社』一語，就不過是一句革命的空話而已。馬克思屢次斥責過這種用早已過時的『動聽』名詞來遮蓋將來任務的空話。在歷史上起過作用的動聽名詞，在這樣的情形下就會變成空洞而有害的裝飾品，變成玩意兒。我們必須使工人與全體人民完全明白認識：爲什麼我們要成立臨時革命政府？如果我們在已經開始的人民起義得到勝利結局時對政權有決定影響，我們究竟要立刻實現一些什麼改革呢？這就是政治領導者目前所應回答的問題。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對於這些問題給了十分明白

的回答，給了這些改革底完備綱領，即我們黨的最低限度綱領。而『公社』二字却沒有給予任何回答，只是用一片模糊的聲音…或空洞的聲音來弄昏人們底頭腦罷了。譬如說，我們愈重視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就愈加不可不分析它的種種錯誤及其特殊條件而籠統援引它來敷衍了事。這樣來作，就會是重復布朗基派（在他們的一八七四年『宣言』中）崇拜公社每一行動而被恩格斯譏笑過的那種錯誤。若有工人向代表會議派問到決議中所提及的這個『革命公社』時，那末代表會議派將能說些什麼呢？他們就會只能說，在歷史上這樣稱呼的工人政府，不善於，並且在當時也不能瞭解民主主義革命成分與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區別，竟把爭取共和制度的任務與爭取社會主義的任務混在一起，不能解決向凡爾賽實行堅決軍事進攻的任務，犯過沒有佔領法國銀行的錯誤等等。總而言之，你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無論援引巴黎公社也好，或援引其他什麼公社也好，但你們一定要說：這就是我們的政府所不應當模仿的那個政府。這不待說是個很好的回答呵！然而這樣毫不說及黨底實踐綱領，不識時務地在決議內講授起歷史來，難道不是表明書獃子底學究習氣和革命者底軟弱無能麼？難道不是表明你們枉然歸罪於我們的那種錯誤，即將任何一個『公社』都沒有辨別清楚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混為一談的錯誤麼？

提作臨時政府（即人們不識時務地稱為公社的臨時政府）目的的，是『專為』擴大起義與瓦解政府。這『專為』二字，按其本義說來，就是排除其他一切任務，是主張『只從下面』動作的荒謬理論底復活。這樣排除其他任務，又是一種近視和輕浮態度。『革命公社』，即甚至是以一個城市為限的革命政權，也不免要執行（那怕只是臨時地，『局部地，暫時地』執行）一切國家事務；勉強迴避這一問題，就是愚蠢到極點。這個政權必定要法定八小時工作制，必定要建立工人監督工廠制，必定要舉辦免費的普及教育，必

定要施行法官選舉制，必定要成立農民委員會等等，——總而言之，就是一定要實行許多改良。把這些改良歸結爲『幫助擴大起義』一語，就是玩弄字眼，把需要弄得完全明白的地方故意弄得更不明白。

* * *

新火星派決議底結尾一段，雖沒有供給我們什麼新材料來批評我們黨內復活了的『經濟主義』底原則趨向，但它却稍從另一方面證實了以上所說的話。

該段原文如下：

『社會民主黨祇有在一種情形下，即祇有在革命一旦蔓延於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已達到相當（？）成熟程度的西歐各先進國去的時候，才應當自動努力奪得政權，並儘可能長久地把政權保持在自己手裏。在這種情形下，俄國革命在歷史上有限的範圍就能大大展開，那時就會有可能走上社會主義改革的道路。

社會民主黨既以保證自己在全部革命時期對革命進程中所有的一切新陳代謝的政府都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態度，作爲自己的策略基礎，也就能最好地準備去利用政府權力，如果這政府權力會落到（??）它手裏來的話』。

這裏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進報所屢次表述過的那種思想。前進報說過，我們不應當害怕（如馬爾丁諾夫害怕一樣）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獲得完全勝利，即實現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因爲這樣的勝利就會使我們有可能把歐洲發動起來，而歐洲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擺脫資產階級桎梏之後，就會反轉來幫助我們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但請你們看看，這個思想竟被新火星派敘述得壞到什麼地步了。我們且不去說那些枝葉問題，——如妄稱政權可能『落到』一

個把奪取政權看作有害策略的自覺政黨手裏來的無聊議論，——且不去說歐洲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不是達到了相當成熟程度，而是達到了一般成熟程度，——且不去說我們的黨綱根本就不知道什麼社會主義改革，而只知道社會主義革命。我們現在只把前進報底思想與代表會議決議底思想之間的主要和根本區別拿來說說。前進報向俄國革命無產階級指出了積極的任務：在爭取民主制的鬥爭中取得勝利，並利用這個勝利來把革命傳佈於歐洲。而決議既不懂得我們『徹底勝利』（不是新火星派所謂『徹底勝利』）與歐洲革命之間的這種聯系，因此也就不是說無產階級底任務，不是說無產階級底勝利前途，而是說一般可能中的一種可能：『在革命一旦蔓延到了』… 前進報直截肯定地指示——而這些指示是已經載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的，——究竟可以怎樣而且應當怎樣『利用政府權力』來謀無產階級底利益，估計到在現時社會發展階段上可以立刻實現什麼，必須首先實現什麼，作為爭取社會主義的民主前提。而代表會議底決議在這裏也是不可救藥地做事變底尾巴，說什麼『能夠準備去利用』，但不善於說明怎樣能夠，怎樣準備，怎樣利用。譬如說，我們雖不懷疑新火星派『能夠準備去利用』黨裏的領導地位，但問題却在於新火星派這種利用的嘗試和他們的準備，至今都沒有什麼變可能為現實的希望…

前進報曾確切說明，所謂實際『把政權保持在自己手裏的可能』，就是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就是工農羣衆共同動作的力量能夠戰勝一切反革命勢力，就是工農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利益必然相符。代表會議底決議在這裏也沒有給予絲毫肯定的東西，而只是設法逃避問題。要知道，在俄國保持政權的可能，應由俄國本國社會力量底成份，應由俄國現今民主革命底條件來決定。要知道，歐洲無產階級底勝利（而革命傳佈於歐洲與無產階級獲得勝利，是還有相當距離的）一定會引起俄國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方面的拚命抵抗，——新

火星派底決議絲毫沒有說到這個反革命勢力，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則估計到了這個反革命勢力底意義。如果除無產階級以外，我們不能同時倚靠農民來爭取共和制度與民主制度，那末『保持政權』這件事情就會沒有希望了。如果這件事情不是沒有希望，如果『澈底戰勝沙皇制度』就會造成這種可能，那末我們就應當指出這種可能，並積極號召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提出實際的口號，目的不只要應付革命一旦傳佈到歐洲的情形，而且是爲要把革命傳佈到歐洲去。社會民主黨中的尾巴主義者援引『俄國革命在歷史上有限的範圍』，不過是要掩蔽他們對這個民主革命任務與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的領導作用瞭解得有限而已！

反對『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口號的異議之一，就是認爲專政要有『一致的意志』（見火星報第九十五期），而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却不能有一致的意志。這個異議根本不能成立，因爲它是根據『形而上學的』抽象觀點來解釋『一致的意志』這一概念的。有時候，意志在某一方面一致，而在另一方面却不一致。在社會主義問題上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缺乏一致，這並不是說在民主主義問題上和爭取共和制度的鬥爭中也不能有意志底一致。忘記這點，就是忘記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在邏輯上歷史上的區別。忘記這點，就是忘記民主革命底全民性質：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底一致』，正因爲這個革命是實現全民需要與全民要求的革命。超過民主主義範圍，便根本談不到無產階級與農民資產階級間的意志一致。它們彼此間的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民主共和制度基礎上，這個階級鬥爭恰巧就會是爲社會主義而進行的最深刻最廣闊的人民鬥爭。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也如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一樣，有它的過去與將來。它的過去就是專制制度，農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權。在與這種過去鬥爭中，在與反革命勢力鬥爭中，無產階級與農民底『意志一致』是可能的，因爲這裏有利益上的一致。

它的將來就是反對私有制的鬥爭，僱傭工人反對僱主的鬥爭，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在這裏是不能有什麼意志一致的*。那時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就會不是由專制制度進到共和制度，而是由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進到社會主義。

固然，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過去底成分與將來底成分是互相錯綜着，前一道路與後一道路是彼此混雜着。僱傭勞動及其反對私有制的鬥爭，在專制制度下也曾有過，甚至在農奴制度時代就已經萌芽了。但這絲毫也不能妨碍我們在邏輯上歷史上把發展過程底幾大階段分開。我們大家都把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對立起來，我們大家都絕對堅決主張把這兩個革命極嚴格分別開來，但是難道可以否認在歷史上前一革命與後一革命底個別枝節成分互相錯綜的事實麼？難道在歐洲民主革命時代，不是有過許多社會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企圖麼？難道歐洲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還要把許許多多帶着民主主義性質的事情最終完成麼？

社會民主黨人一分鐘也不應忘記，無產階級爲了爭取社會主義，必然要與最講民主共和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這是毫無疑義的。唯其如此，所以社會民主黨也就絕對必須是一個單獨存在，階級性十分嚴格的獨立政黨。唯其如此，所以我們與資產階級『共同殺敵』的行動也就帶有暫時的性質，所以我們也就必須嚴格監視『同盟者，猶如監視敵人一樣』等等。所有這些也是毫無疑義的。但如果從此得出結論，說可以忘記，可以忽略或輕視目前迫切的——那怕只是暫時的，臨時的——任務，就會可笑而且反動了。與專制制度作鬥爭乃是社會主義者底一個臨時的暫時的任務，但對於這個任務的任何忽略或輕視，都是等於叛變社會主義而効勞於反動勢力。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當然只是社會主義者底一個

*資本主義在自由條件下更廣泛迅速的發展，必然使意志一致性很快歸於結束，而且反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被擊潰得愈快，則這種一致性也就會結束得愈快。

暫時臨時的任務，但在民主革命時代忽略這個任務，却就簡直是反動了。

在具體環境中要提出具體政治任務。一切都是相對的，一切都是流動的，一切都是變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沒有把共和制度的要求載入自己的黨綱。那裏的形勢，使共和制度問題在實踐上未必可與社會主義問題分開（雖然講到德國的時候，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所作愛爾福特綱領草案評論中，也曾警告說不要輕視共和制度以及為共和制度而鬥爭底意義！）。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根本就沒有發生過要把共和制度的要求從黨綱和鼓動工作中取消的問題。因為我們這裏簡直談不到共和制度問題與社會主義問題有什麼分不開的聯繫。一八九八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不把專門共和制度問題當作首要問題，原是不會引起驚異和非難的一種自然現象。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如果在一八四八年把共和制度問題擱置不提，就會是直接叛變革命了。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

當與俄國專制制度進行的鬥爭已經完結，而俄國已渡過了民主革命時代的時候，若還說什麼工農『意志一致』，說什麼民主專政等等，那就可笑了。那時候，我們就會直接想到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專政，並且詳細談論這個專政。現在呢，先進階級底黨，却不能不極力設法使民主革命獲得澈底戰勝沙皇制度的勝利。而澈底勝利也就不外是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附 註

（一）請讀者回想起，火星報和前進報論戰時，就中還援引過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一封信，恩格斯在這封信裏警告了意大利改良主義者底（將來的）領袖，叫他不要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為一談。意大利臨來的革命，——恩格斯於一八九四年論到意大利政治狀況時寫道，——將是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革命，而不是社

會主義革命。火星報會責難前進報離開了恩格斯所規定的原則。這種責難是不正確的，因為一般和整個說來，前進報（第十四期）完全承認過馬克思把十九世紀革命中所有三個主要力量嚴格分清的那個理論正確。按照這個理論所說，實行反對舊制度，反對專制制度，反對封建制度，反對農奴制度的，有（一）自由派的大資產階級；（二）急進派的小資產階級；（三）無產階級。第一個力量不過是為君主立憲制度而鬥爭；第二個力量是為民主共和制度而鬥爭；第三個力量是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把小資產階級為完全民主革命進行的鬥爭與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的鬥爭混為一談，就會使社會主義者遭到政治破產。馬克思底這個警告是完全正確的。但恰巧由於這個原因，『革命公社』口號也就是錯誤的，因為歷史上有過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為一談。反之，我們的口號，即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口號，能完全保證不致犯出這個錯誤。我們的口號絕對承認現今這個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認為它決不能直接超出民主革命底範圍，但我們的口號同時又推動現今這個革命前進，力求賦予它最有利於無產階級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高限度利用民主革命來保證無產階級極順利地向前爭取社會主義。

（一一）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某些決議和『代表會議』某些決議拿來作個簡略的比照

現在，臨時革命政府問題是社會民主黨策略問題底中心要點。至於代表會議其餘各個決議，那末現在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詳細去說。我們僅限於簡略指出幾點，來證明我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底策略方向和代表會議決議底策略方向中間的那種原則區別。

試拿在政變前夜對政府策略的態度問題來說吧。你們又會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中找到對於這一問題的完整答覆。這個決議估計到特別時機底一切複雜條件和任務：必須揭破政府讓步底虛偽，必須利用各種『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機關』，必須用革命手段來實現工人階級底迫切要求（以八小時工作制為首要要求），最後，必須回擊黑幫。在代表會議底決議中是把問題分裂成幾部分來敘述的：『回擊黑暗反動勢力』一事只是在說明對其他政黨態度的決議理由的條文中提到過。參加代表機關選舉的問題，是把沙皇制度與資產階級『妥協』問題和它分開來考察的。不是號召用革命手段實現八小時工作制，而只是用標有『論經濟鬥爭』這一響亮题目的特別決議來重複着（在說了一堆所謂『工人問題在俄國社會生活中間佔有中心位置』的響亮而很不聰明的辭藻以後）舊的鼓動口號，即所謂『法定八小時工作制』。這個口號在現時顯得不夠和落後，是一望而知，無須證明的。

關於公開政治行動的問題。第三次代表大會估計到我黨活動行將根本改變的情形。無論如何都不可拋棄秘密活動和發展秘密機關的事情：拋棄這些事情，就會是効勞於警察而極端有利於政府了。可是，現在已不能不想到公開行動。必須立刻預備這樣行動的適當形式，因而也就必須為此目的來預備特別的機關——秘密程度較少的機關。必須利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團體，使其儘可能變為俄國將來公開社會民主工人黨底據點。

代表會議在這裏也把問題分散，而沒有提出任何一貫完整的口號。很可笑的是特別委託組織委員會設法『安置』合法著作家。完全荒謬的是決定『使那些抱定協助工人運動目的的民主報紙服從自己的影響』。我國所有一切合法自由派報紙，按方向來說幾乎盡是『解放派』的報紙，都抱定有這種目的。為什麼火星報編輯部不自行開始執行它這個忠告，給我們作出一個應如何使解放雜誌服從於

社會民主黨影響的榜樣來呢？他們給予我們的並不是利用合法協會來創立黨底據點的口號，而是：第一，單只關於『職業』工會的局部建議（黨員一定要參加這些工會）；第二，關於領導『革命工人組織』，即『無定形的組織』，即『革命工人俱樂部』的建議。而『俱樂部』究竟怎樣落到了無定形組織之列，這些『俱樂部』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却又只有神仙才知道。這不是黨最高機關底確切明顯的指令，而是些著作家底某些思想輪廓和草稿式的隨筆。關於黨應如何開始把自己全部工作轉到完全另一種基礎上的問題，根本沒有加以絲毫完整的說明。

對於『農民問題』，黨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彼此提得完全不同。代表大會製定了『對農民運動態度』的決議。代表會議製定了『在農民中間工作』的決議。前一決議認為首要的任務，是要爲了反沙皇制度鬥爭的全民利益而領導全部廣闊的革命民主運動。後一決議却認為只要在一個特別階層中間『工作』。前一決議認為鼓動工作底中心實際口號，是立刻組織革命農民委員會來實行一切民主改革。後一決議却說『成立委員會的要求』應當向立憲會議提出。爲什麼我們一定要等待這個立憲會議呢？它真正會成爲立憲的會議麼？如果不預先和同時建立革命農民委員會，那末立憲會議是否會堅固呢？——所有這些問題，代表會議都盡行忽略過去了。它的一切決議都是恰巧反映出我們所已考查過的一般思想：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我們只應進行自己專門的工作，而不要力求領導全部民主運動並獨立實行這個運動。正如經濟派常常想要社會民主黨人局限於經濟鬥爭，讓自由派去進行政治鬥爭一樣，現在新火星派在其全部推論歷程中也是想要我們站在資產階級革命旁邊，少管閒事，而把積極實行這個革命的事情讓給資產階級去作。

最後，不能不說說雙方關於對其他政黨的態度問題的決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是說要揭露資產階級解放運

動底任何局限性和不充分性，而並不痴心妄想要在每次代表大會上詳細列舉這種局限性底各種表現，劃出一條辨別壞資產者和好資產者的界線。代表會議却重複着斯塔羅維爾底錯誤，硬想找到這樣一條界線，發揮其有名的『試酸紙』論。斯塔羅維爾是從一個很好的思想出發：要向資產階級提出嚴格些的條件。不過他忘記了，任何一種想要預先把有資格博得贊許協定等等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和沒有資格博得這些東西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別開來的企圖，都只會得出一種馬上就被事變發展進程拋到九霄雲外，而使無產階級階級意識模糊起來的『公式』。結果就把重心從鬥爭中的實在一致，移到聲明、約言和口號上去。斯塔羅維爾當時認為這樣的根本口號就是『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為時尚不及兩年，而『試酸紙』已證明自己毫不中用，普選制的口號已為解放派所採納，但解放派不僅沒有因此而接近於社會民主黨，反而恰巧企圖利用這個口號來迷惑工人，引誘工人離開社會主義。

現在，新火星派提出了更『嚴格的』『條件』，『要求』沙皇制度底敵人『努力而毫無二意地（!?）贊助有組織無產階級底一切堅決行動』等等，一直到『積極參加人民自行武裝的事業』。所劃定的界線是更進步得多了，但這條界線却又已經陳舊了，一下子就證明自己毫不中用了。例如，為什麼不提出共和制度的口號呢？社會民主黨人爲着『用無情革命戰爭來反對等級君主制度一切基礎』起見，『要求』資產階級民主派來幹各種各樣的事情，怎麼獨把爭取共和制度的鬥爭除外呢？

至於這個問題並非吹毛求疵，至於新火星派底錯誤具有最實際的政治意義，——這是有『俄國解放協會』可作證明的（請看無產者報第四期）*。這些『沙皇制度敵人』完全能適合於新火星派底一

*在一九〇五年六月四日出版的無產者報第四期上發表了一篇標題爲『新的革命工人協會』的長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敘述了這個協會所發表的宣言底內容，這

切『要求』。可是，我們已經指明：在這個『俄國解放協會』底綱領中（或在其無綱領的立場中）完全充滿解放派精神，解放派是能很容易把它牽着走的。而代表會議則在其決議末尾一段中聲稱，『社會民主黨將照舊反對虛偽的人民之友，反對所有一切雖標榜自由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但拒絕真正贊助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政黨』。『俄國解放協會』不僅不拒絕，而且自己熱心表示願意給予這種贊助。這是否就能担保它那些領袖雖然是解放派而終究不會是『虛偽的人民之友』呢？

由此可見：新火星派既預先臆造一些『條件』並提出一些外強中乾得滑稽可笑的『要求』，也就馬上自陷於令人發笑的地步。他們的條件和要求，一下子就顯得不能適合具體實際的情形了。他們那種徵逐公式的狂熱，真是徒勞無益，因為無論你用什麼公式，都捉摸不住資產階級民主派表現其虛偽性、不徹底性以及局限性的各種各樣的情形。問題並不在於什麼『試酸紙』，並不在於形式，並不在於寫好印好的要求，並不在於預先辨別什麼是虛偽的『人民之友』和非虛偽的『人民之友』，而是在於鬥爭中的真正一致，在於由社會民主黨人對資產階級民主派每一『不堅定』步驟都實行毫不減弱的批評。爲了『真正團結所有一切利於民主改造的社會力量』，並不是要像代表會議那樣賣力那樣徒勞地規定種種『條款』，而是要善於提出真正革命的口號。爲此就要提出把共和派革命資產階級提到無產階級水準上來的口號，而不要提出一些把無產階級任務降到君主派資產階級水準上去的口號。爲此就要最努力地參加起義，而不是用學究口吻來推諉刻不容緩的武裝起義任務。

個協會採取了『俄國解放協會』底名稱，並說它力求利用武裝起義來召集立憲會議。其次，在這篇論文中決定了社會民主黨人對於這種非黨協會的態度。至於這個協會實在情形如何以及它在革命中的命運怎樣，那我們是全不知道的。（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一二)民主革命底發展規模是否會因 資產階級退出而減弱呢？

當以上各節已經寫好時，我們接到了火星社出版的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會議的決議。Pour la bonne bouche（爲了作一個好的結束），我們真是想都想不出比這更好的材料了。

火星報編輯部很公正地指出：『在基本的策略問題上，高加索代表會議通過了恰與全俄代表會議』（即新火星派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相似的』（真話！）『決議』…『在社會民主黨對臨時革命政府的態度問題上，高加索的同志所通過的決議，堅決反對前進社以及附和它的所謂代表大會代表們所宣傳的新方法』。『代表會議對於無產階級黨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策略，給了一個非常妥當的定義』。

對的還是對的。關於新火星派底根本錯誤，真是誰也不能給出比這更『妥當的』定義來了。我們現在且把這個定義全部抄錄於下，先在括弧中指出它的花朵，然後再來指出它末尾所結出的那些果實吧。

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會議論臨時政府問題的決議上說：

『代表會議認爲自己的任務，是要利用革命時機來加深』（當然呵！不過還要加一句：是用馬爾丁諾夫精神來加深！）『無產階級底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只是用來加深意識，而不是用來爭得共和制度麼？這是對於革命的一種何等『深刻的』見解呀！），『而爲保證本黨對於正在產生的資產階級國家制度有十分完全的批評自由起見』（保證共和制度並不是我們的事情！我們的事情祇是要保證批評自由。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產生了無政府主義的語調：『資產階級國家』制度！），『代表會議反對成立社會民主主義的臨時政府，並反對加入這個政

府』（參閱恩格斯在西班牙革命十個月前所引證的巴枯寧派底決議，見無產者報第三期）『而認為最適宜的莫如從外面』（從下面，而不是從上面）『逼迫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來使國家制度達到可能辦到的（？）民主化。代表會議認為由社會民主黨人成立臨時政府或加入這個政府，一方面就會使無產階級廣大羣衆對社會民主黨灰心失望而離開社會民主黨，因為社會民主黨雖然奪得政權，但不能滿足工人階級一直到實現社會主義爲止的要求』（共和制度不是迫切的要求！決議起草人竟因頭腦簡單而沒有覺察到他們是在用純粹無政府主義的口吻說話，彷彿他們已否認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了！），『另一方面就會迫使資產階級退出革命事業，因而減弱革命底發展規模』。

這就是問題實質所在的地方。這就是無政府主義思想與十足機會主義思想互相錯綜（也如在西歐的伯恩施坦派中常見的一樣）的地方。只須想想：不要加入臨時政府，因為加入臨時政府就會迫使資產階級退出革命事業，因而減弱革命底發展規模！這完全是新火星派哲學純粹而澈底的表現，說什麼既然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於是我們就應當崇拜資產階級的鄙陋思想，把路讓給它走。如果我們——那怕只是部分地，那怕只是一分鐘——從害怕我們參加臨時政府就會迫使資產階級退出的計較出發，那我們就會因此而把革命領導權完全讓給各資產者階級。那我們就會因此而把無產階級完全交給資產階級去支配（雖然還保留着完全的『批評自由』!!），迫使無產階級採取溫和柔順的態度而使資產階級不致退出。那我們就會閹割掉無產階級最迫切的需要，即它那些爲經濟派及其後裔們從來沒有好好懂得的政治需要，——是爲了使資產階級不致退出而閹割這些需要。那我們就會完全離開在無產階級所需要的範圍內爲實現民主制而進行革命鬥爭的立場，而轉到與資產階級講買賣的立場，以叛變原則，叛變革命來換得資產階級方面自願的同意（『不致退出』）。

高加索的新火星派在區區兩行文字中，竟把叛賣革命，變無產階級爲各資產階級可憐走卒的策略底全部實質都表明出來了。我們在上面從新火星派底錯誤中發現出來的一種趨向，現在這裏已發展爲一個明確肯定的原則：做君主派資產階級底尾巴。因爲實現共和制度就會迫使（且已經迫使着——司徒盧威先生就是一例）資產階級退出，所以就要打倒爭取共和制度的鬥爭。因爲無產階級方面提出任何一個堅決澈底的民主主義要求，無論在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始終會迫使資產階級退出，所以工人同志們呵，你們要深深躲藏起來，只要從外面動作，不要想爲着革命去利用『資產階級國家』制度底種種工具和手段，而只要給自己保留着『批評自由』。

對於『資產階級革命』這一名詞的根本謬誤見解，在這裏是十分顯然暴露出來了。對於這一名詞的馬爾丁諾夫『見解』或新火星派『見解』，逕直引到了把無產階級事業叛賣給資產階級。

誰忘記了舊時的經濟主義，誰不去研究它，誰不回想到它，誰也就很難瞭解現時復活起來的經濟主義。試一回想伯恩施坦主義的„Credo“¹⁰⁸吧。當時人們從『純粹無產階級的』觀點和綱領中得出結論說：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只需要經濟，只要幹真正工人事業，只要有對任何政客手腕進行批評的自由，只要真正加深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作。讓他們自由派去幹政治吧。請上帝保佑我們不致陷入『革命主義』，因爲這會迫使資產階級退出呵。誰把„Credo“全文或工人思想報第九期（一八九九年九月）單行附刊閱讀一遍，便可看出這全部推論歷程來。

現在也是這一套，不過範圍較大，應用於估計整個俄國『大』革命，——哎，這個革命事先就已被正統庸俗主義底理論家們所庸俗化而降低到滑稽可笑的地步了！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只需要『批評自由』，加深意識，從外面動作。讓它們資產者階級享有作事的自

由，享有從事於革命領導（請讀作『自由主義』領導）的自由，享有從上面實行『改良』的自由吧。

這些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人，從來也沒有思索過馬克思所說必須用武器批評來代替批評武器的指示。他們只是枉然接受馬克思底名字，但其實他們擬製策略決議，却完全是模仿着法蘭克福資產階級空談家，模仿着這些自由批評過專制制度，加深過民主意識，殊不知革命時期是動作時期，是要從上下兩方面動作時期的空談家那樣來幹的。新火星派既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學理主義，於是也就將最徹底最堅毅的先進革命階級底思想變成了這階級中最落後階層，即逃避艱難革命民主任務而將其交給司徒盧威一流先生們去作的那些落後階層底思想。

據說，各資產階級一旦因社會民主黨加入革命政府而退出革命事業，就會使『革命底發展規模減弱』的。

俄國工人們，你們聽見了麼：如果革命是由沒被社會民主黨人嚇退，不想戰勝沙皇制度而只想和它分贓妥協的司徒盧威一流先生來實行，那末革命底發展規模就會強大些哩！如果從我們在上面所概述過的俄國革命兩個可能的結局中實現第一個結局，就是說，如果君主派資產階級能與專制制度以施坡夫式的『憲法』為條件妥協成功，那末革命底發展規模就會強大些哩！

社會民主黨人在指導全黨的決議中寫出這樣可恥的東西來，或嘉許這樣『妥當的』決議，也就是表明他們已被那種剝去馬克思主義全部活潑精神的學理主義迷惑到了極端盲目的地步，甚至看不出這些決議怎樣把他們其他一切好聽的言辭都變成了空談。隨便拿火星報上所載的那一篇論文來看，甚至就拿我們鼎鼎大名的馬爾丁諾夫所寫的那本鼎鼎有名的小冊子來看，都可看見一些說什麼人民起義，什麼把革命進行到底，什麼力圖憑藉人民下層來與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鬥爭的議論。但是，當你們接受或嘉許認為『革命底發展規

模』會因資產階級退出而『滅弱』的思想時，你們的一切好聽的言詞就立刻成爲可憐的空談了。先生們，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們應當不管那個不澈底，自私自利，畏首畏尾的資產階級，而協同人民去力謀實現革命，完全戰勝沙皇制度；或者是我們不容許這『不管』二字，而惟恐資產階級『退出』，那時我們就會把無產階級和人民出賣給資產階級，出賣給不澈底，自私自利和畏首畏尾的資產階級。

請你們不要曲解我的意思。請你們不要瞎叫，說有人責備你們自覺地叛賣呀。不是的，你們向來都是不自覺地爬往泥潭，而現在果然已爬進了泥潭，也好似舊時經濟派那樣順着『加深』馬克思主義的斜坡而一直往下飛滾到了專門從事於反對革命，毫無心肝和毫無生氣的『賣弄聰明』一樣。

先生們呵，你們是否思索過『革命底發展規模』究竟取決於什麼實在社會力量這一問題呢？我們且撇開現今國外政治與國際配合方面的勢力對比情形不說，這種勢力情形雖很有利於我們，但我們大家都把它們除開，不去加以考察，而且這樣來作是正確的，因爲這裏所說的是俄國內部勢力的問題。請看看這些內部的社會勢力吧。與革命爲敵的，是專制制度、朝廷、警察、官吏、軍隊和一小羣顯貴人物。人民中間的義憤愈深，軍隊也就會愈不可靠，官吏中間的動搖也就會愈加厲害。其次，資產階級現在一般和整個說來是贊成革命，熱心談論自由，時常假借人民名義，甚至假借革命名義說起話來了*。但是，我們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從理論中知道，並且每日每時都從我國自由派，地方自治派和解放派底實例中看見，資產階級贊成革命是不澈底，自私自利，畏首畏尾的。資產階級

*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司徒盧威先生寫給饒勒斯的一封公開信。這封信已於不久以前由饒勒斯刊登於人道報上，並且司徒盧威先生自己也把它登在解放雜誌第七十二期上發表過了。

當其私有的狹隘利益得到滿足時，當它『退避』了澈底民主主義時（而它現在已在退避澈底民主主義哩！），其中極大多數份子就會必然轉到反革命方面，轉到專制制度方面去反對革命，反對人民。所剩下的只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只有無產階級能够堅決走到底，因為它走得比民主革命更遠得多。因此，無產階級也就站在最前列為共和制度而鬥爭，它輕蔑地拒絕它所鄙視的那些勸它設法不使資產階級退出的愚蠢意見。農民除包含有很多半無產者份子外，同時又包含有小資產階級份子。所以它也不穩定，而使無產階級必須團結成爲一個階級性十分嚴格的黨。但農民底不穩定性與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根本不同，因為現在農民與其說是需要絕對保存私有制，不如說是需要奪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農民雖不會因此而成爲社會主義者，雖不會因此而停止其爲小資產階級，但它能成爲完全和最急進擁護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啓發農民的革命事變進程不會因資產階級叛變和無產階級失敗而中斷得太早，那末農民就必然會成爲這樣擁護民主革命的力量。在上述的條件下，農民必然會成爲革命與共和國底堡壘，因為只有獲得了完全勝利的革命才能使農民獲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農民獲得他們所想有所希望而且是他們真正必需的一切，其所以必需，並不是如『社會革命黨人』所臆想的那樣要消滅資本主義，而是要擺脫半農奴制的束縛，擺脫被壓迫被賤視的黑暗地位，以便在商品經濟下可能的限度內儘量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

況且：不但急進的土地改革，就是農民所有一般和經常的利益，也使農民趨向於革命。農民甚至在與無產階級作鬥爭中也需要有民主，因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確切表明農民底利益，使他們能以大衆資格，以大多數資格佔得優勢。農民愈開明（而從日俄戰爭發生時起，他們的開明程度提高得非常迅速，甚至是許多慣於單用學校尺度來丈量開明程度的人所想像不到的），他們也就會愈澈底愈

堅決主張完全的民主命革，因為他們並不是如資產階級那樣害怕人民統治，而是利於人民統治。農民一開始擺脫幼稚虛幻的君主制度思想時，民主共和制度就會立刻成爲農民底理想，因為妥協成性的資產階級自覺擁護帝制（連同上議院等等）的思想，是要農民照舊處於沒有權利，備受壓迫和黑暗無知的地位，不過用歐洲憲制的油漆來稍加塗飾罷了。

正因為如此，所以資產者階級自然必然趨向於接受自由君主黨保護，而農民大眾却自然必然趨向於接受革命共和黨領導。正因為如此，所以資產階級不能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而農民却能把革命進行到底，於是我們也就應當竭力幫助農民來這樣作。

也許有人會來反駁我說：這是用不着證明而爲所有一切社會民主黨人都十分懂得的普通常識。不，這是那些竟能妄說資產階級一退出革命就會使革命發展『規模減弱』的人所不懂得的人。這樣的人只知背誦我們土地綱領底語句，却不懂得這些語句底意義，否則他們就不會害怕必然要從全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我們黨綱中產生出來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一概念，否則他們就不會以資產階級底規模來限制俄國大革命底發展規模。這樣的人用自己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反對革命的具體決議，來推翻了自己那些抽象馬克思主義革命辭句。

誰真正瞭解農民在勝利俄國革命中的作用，那他就不會說革命底發展規模將因資產階級退出而減弱。因為事實上祇有當資產階級退出，而農民群眾以積極革命者資格來同無產階級一起奮鬥時，俄國革命底真正發展規模才會開始起來；祇有那時，才會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可能的那種真正最廣大的革命發展規模。我們的民主革命要一貫進行到底，就應當倚靠於能把資產階級必不可免的不徹底性麻痺起來的力量（即恰巧能做到『迫使它退出去』，即做到使火星報底高加索信徒們因欠缺思索而害怕的那個地步的力量）。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在其一切關於革命發展規模的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狹隘到極點了。

只是不要忘記人們談論這個「發展規模」時往往忽略的一種情況。不要忘記，這裏所說的並不是任務方面的困難，而是究竟要在那一條道路上尋找並求得這一任務的解決。問題並不在於是否容易把革命發展規模擴大到十分雄偉和不可戰勝的地步，而是說究應怎樣設法加強這個發展規模。意見分歧恰恰是關於行動底根本性質，是關於行動底方向本身。我們所以着重指出這點，是因為有些不細心或不誠懇的人時常把兩個不同的問題混為一談：一個問題是道路底方向，即從兩條不同的道路中選擇一條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在這條道路上，目的是否容易實現，或目的是否很快就會實現的問題。

對於後一問題，我們在上面完全沒有加以分析，因為這個問題在黨內沒有引起什麼爭論與意見分歧。不過，這個問題本身自然是極其重要，一切社會民主黨人都應當予以十分嚴重的注意。忘記吸引群眾——不僅工人階級群眾，而且農民群眾——加入革命運動這一事業的困難，便是一種不可寬恕的樂觀主義態度。正是這種困難常使力求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的鬥爭遭到失敗，而使不澈底和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獲利最多：既「賺得了一筆資本」，即藉君主制度來抵禦人民，又「保持了」自由主義…或「解放主義」底「貞節」。但是，說任務困難，這還不是說任務無法實現。只要具有認為路線選定得正確的信心，就能把革命毅力與革命熱忱加強百倍，作出驚人奇蹟了。

至於現時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在選擇路線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究竟深刻到何種程度，那末只須把高加索新火星派底決議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對照一下，便可馬上看出了。在代表大會底決議上說：資產階級是不澈底的，它一定會力圖把我們手裏的革命勝利品奪去。所以，工人同志們，必須更加努力準備鬥爭，必須武裝起來，必須把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除非經過決戰，我們決不會把我們的革命勝利品讓給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在高加索新火星派底決議上說：資產階級是不澈底的，它可能退出革命。所以，工人同志們，不要想參加臨時政府，否則資產階級就一定會退出而使革命底發展規模減弱的！

一個決議上說：要把革命推往前進，推進到底，而不管不澈底的資產階級如何反抗或採取消極態度。

另一個決議上說：不要想獨立把革命進行到底，免使不澈底的資產階級退出革命。

這難道不是兩條根本相反的路線麼？這難道不顯然是兩個水火不能相容的策略麼？前一策略是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唯一正確的策略，而後一策略其實純粹是解放派的策略，——這難道不是很顯然麼？

(一三) 結論。我們敢不敢取得勝利呢？

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實際情形認識膚淺的人，或不知道我們從經濟主義時期以來的全部黨內鬥爭史而從旁判斷的人，談到現在——特別是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以後——已經顯現出來的策略分歧時，也常常以簡單援引任何一國社會民主運動中都存在有兩個自然而然，必不可免而且彼此完全可以調和的傾向來敷衍了事。據說：一方面是強調尋常的目前的日常的工作，說必須發展宣傳和鼓動，

準備力量，加深運動等等；另一方面是強調運動底戰鬥的，一般政治的，革命的任務，指出實行武裝起義之必要，提出革命民主專政和臨時革命政府口號。無論這方面那方面都不應加以誇大，無論這裏那裏（猶如天下任何一個地方那樣）都不宜走極端等等，等等。

這類議論中間無疑是含有一些處世（以及括弧裏的『政治』）祕訣底廉價真理，但這種真理常常都用來掩蓋不瞭解本黨迫切緊急需要的態度。試拿俄國社會民主黨中間現時的策略分歧來看吧。新火星派談論策略問題時特別強調普通日常工作的這件事實本身，當然還不能成爲什麼危險，還不能引起策略口號方面的什麼分歧。但是，只要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和代表會議決議比較一下，便可立刻看見這種分歧了。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原來就是：第一，僅僅籠統抽象地指出運動中有兩個潮流存在，指出各走極端的害處，還是千萬不夠的。必須具體知道，這個運動在現今時期究竟有什麼弱點，黨所能遭遇的實在政治危險究竟會從那一方面發生。第二，必須知道，究竟那些實在政治力量會因我們提出某些策略口號——也許是因我們缺乏某些口號——而得到便益。你們假如聽信新火星派底說法，就會得到一種結論，以爲社會民主黨所能遭到的危險是拋棄宣傳鼓動工作，拋棄經濟鬥爭工作，拋棄批評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工作，而過分迷戀於軍事準備，武裝攻擊與奪取政權等等。其實，黨所能遭到的真實危險是完全從別一方面發生的。凡是稍微熟悉運動情形，仔細留心觀察運動情形的人，都不能不看見新火星派這種恐懼心理可笑的地方。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全部工作都已完全納入了一個固定不移的範圍，這個範圍絕對能保證把工作重心集中於宣傳和鼓動，集中於飛行集會和羣衆大會，集中於散發傳單與小冊子，集中於協助經濟鬥爭和及時提出它所要求的口號。沒有那一個黨委員會，沒有那

一個區委員會，沒有那一個中心會議，沒有那一個工廠小組，不是常常都用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心思、力量與時間去執行所有這些早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就已確定的職能的。只有完全不認識運動實況的人，才不知道這一點。只有很幼稚或不諳實情的人，才能把新火星派用特別莊嚴神情重提舊事的把戲當作真貨看待。

其實，我們不但沒有過分迷戀於起義任務，一般政治口號，領導全部人民革命的事業，反而是恰巧在這一方面落後得特別刺眼，而這也就是最大的弱點，也就是能——並且在某些地方已經開始——使運動由真正革命運動墮落為口頭革命運動的真實危險。在執行黨工作的成百累千的組織、團體和小組中間，沒有一個不是從產生時起就從事於新火星報中的才子們當作新發現的真理來高談闊論的那種日常工作的。另一方面，在這些團體和小組中間，又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已經覺悟到武裝起義任務，已經着手執行這些任務，已經明白必須領導全部反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已經明白因此也就必須提出某些先進口號的。

我們真是比那些先進的和真正革命的任務落後得不堪設想了，我們往往還沒有覺悟到這些任務，我們往往沒有覺察到革命資產階級民主派因我們在這方面落後而加強起來的事實。但新火星報底作家們絲毫不願事變行程與時勢要求，却固執着說：不要忘記舊的事情呵！不要迷戀於新的事情呵！這是始終貫注於代表會議所有一切重要決議中的基本論調，而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中所始終貫注的思想，則是我們雖確認舊事情（但不去咀嚼它，正因為它是已經解決過了，已經由出版物、決議和經驗確定了的舊事情），但同時又提出新任務，注意這個新任務，提出新口號，要求一切真正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立刻為實現這個新口號而工作。

社會民主黨策略方面兩派分立的問題，事實上就是如此。革命時代提出了只有十足的瞎子才看不見的新任務。一部分社會民主黨

人也就堅決承認這些任務，將其提到日程上來：武裝起義刻不容緩，要立刻努力來準備它，要記着它是爲澈底勝利所必需的，要提出建立共和制度，臨時政府以及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另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却往後退縮，踏步不前，不是提出口號而是一味講述序言，不是除確認舊的事情外還指出新的事情，而是冗長和乾燥無味地咀嚼這種舊的事情，千方百計地推諉新的事情，不善於判定澈底勝利底條件，不善於提出唯一適合於力求達到完全勝利意向的口號。

這個尾巴主義底政治結果已經是表現得很明顯的了。妄說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多數派』與革命資產階級民主派接近的流言，始終是些流言，因爲沒有那一件政治事實，沒有那一個由『布爾什維克』負責機關通過的決議，沒有那一個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作出的行動可以證實這種流言。而解放雜誌所代表的機會主義君主派資產階級，却久已歡迎着新火星派底『原則』趨向，現在更直接利用他們的水來推自己的磨，採納他們的一切字眼和所謂『思想』來反對『嚴守祕密』和『騷動』，反對誇大革命底『技術』方面，反對直接提出武裝起義口號，反對極端要求底『革命主義性』等等，等等。高加索『孟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人整個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以及新火星報編輯部嘉許這個決議的事實，對於這一切都作了一個絕對肯定的政治總結：不要使資產階級因無產階級參加革命民主專政而退出呵！這樣就把一切都已透澈說出了。這樣就把變無產階級爲君主派資產階級走卒的方針完全確定了。這樣就在事實上證明了——不是由某一個人底偶然聲明，而是由整個派別所特別嘉許的決議證明了——新火星派尾巴主義底政治意義。

誰仔細思索這些事實，那他就會懂得援引社會民主運動有兩個方面和兩個趨向的這種流行說法底真正意義。試以伯恩施坦派

爲例來在更大範圍中研究這兩個趨向吧。伯恩施坦派過去和現在都恰恰是這樣瞎吹，說只有他們才瞭解無產階級底真正需要，以及發展無產階級力量，加深全部工作，準備新社會原素，進行宣傳和鼓動的任務。我們要求公開承認現有的東西！——伯恩施坦這樣說，因而也就是推崇沒有『終極目的』的『運動』，推崇單純防禦性的策略，鼓吹『不要使資產階級退出』的恐懼策略。伯恩施坦派也曾大罵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底『雅可賓主義』思想，大罵不懂『工人自動性』的『著作家』等等，等等。其實誰也知道，革命社會民主黨人根本沒有打算拋棄日常細小的工作，準備力量的工作等等，等等。他們僅僅要求明白認識終極目的，確切提出革命任務；他們是想把半無產階級和半小資產階級羣衆提到無產階級革命立場上來，而不是把無產階級底革命立場降低爲『不要使資產階級退出』的機會主義觀念。Dürfen wir siegen? 『我們敢不敢取得勝利呢？』，我們獲得勝利是許可的麼？我們獲得勝利是不是有危險呢？我們應當爭取勝利麼？——這個問題可說是把黨裏智識份子機會主義翼與無產者革命翼間的這一分歧表明得最顯然不過了。驟然看來，這個問題似乎是很奇怪，但這個問題是提出過並且是應當提出的，因爲機會主義者害怕勝利，恐嚇無產階級，使它不敢去爭取勝利，預言說勝利能引起種種不幸，嘲笑逕直號召爭取勝利的口號。

現在我們這裏也有分成智識份子機會主義趨向與無產者革命趨向的這一基本劃分，不過有一點很重要的區別，就是我們這裏所談到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民主革命。我們這裏也提出了一個驟然看來似乎荒謬的問題：『我們敢不敢取得勝利呢？』。這個問題由馬爾丁諾夫在他所著兩個專政中提出過，他在那裏預言說，我們好好準備並十分順利實現起義，就會遭到種種不幸。這個問題由新火星派在他們論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一切作品中提出過，而且他們向來都極力——但是沒有什麼成功——企圖把米勒蘭參加資產階級機

會主義政府與瓦倫參加小資產階級革命政府混爲一談。這個問題是由主張『不要使資產階級退出』的決議所確定了的。固然，例如考茨基現在企圖譏諷一下，說我們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爭論，猶如還沒有把狗熊打死就來爭分其皮一樣，但這種譏諷話只是表明，甚至聰明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說到祇憑傳聞知道的事情時也是要陷入窘境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距打死狗熊（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時間尚遠，但他們關於『敢不敢』打死這個狗熊的爭論，却已具有莫大的原則和實際政治的意義。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距能於『打死自己的狗熊』（實現民主革命）的時間尚遠，但我們『敢不敢』打死這個狗熊的問題，却對於俄國整個前途以及俄國社會民主黨前途都有着極重大的意義。我們若不相信我們『敢於』取得勝利，就根本談不到努力順利集合軍隊，就談不到好好指揮軍隊。

就拿我們的老經濟派來說吧。他們也會大叫特叫，說他們的對方是陰謀家，是雅可賓派（參看工人事業雜誌，特別是第十期，以及馬爾丁諾夫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討論黨綱時的演說）；說他們的對方因專幹政治而脫離羣衆，忘却工人運動底基礎，不顧及工人自動性等等，等等。其實，他們這些擁護『工人自動性』的人，却是把自己對於無產階級任務的窄狹庸俗見解勉強加在工人頭上的一些智識份子機會主義者。其實，誰都能從舊火星報上看到，反對經濟主義的人並未放棄過，並未忽視過社會民主主義工作底任何一方面，絲毫也沒有忘記經濟鬥爭，同時又善於盡量廣濶提出各個緊急和迫切的政治任務，反對把工人黨變爲自由資產階級底『經濟』附屬品。

經濟派讀熟了政治是以經濟爲基礎的原理，把這個原理『瞭解』爲必須將政治鬥爭降低爲經濟鬥爭。新火星派讀熟了民主革命按其經濟基礎說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原理，把這個原理『瞭解』爲必須將無產階級底民主任務降低到資產階級溫和立場的水準，降低到不致使『資產階級退出』的限度。經濟派口頭上說什麼加深工作，

說什麼工人自動性和純粹階級政策，事實上是使工人階級聽憑自由資產階級政治家支配，即是把黨拖上客觀意義正是這樣的道路。現在新火星派也是口頭上說着這些東西，事實上是要把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出賣給資產階級，即是把黨拖上客觀意義正是這樣的道路。經濟派認為領導政治鬥爭根本不是社會民主黨人底事情，而是自由派底事情。新火星派也認為積極實行民主革命根本不是社會民主黨人底事情，而是民主資產階級底事情，因為無產階級實行領導與首要性的參加就會把革命底『發展規模減弱』的。

總而言之，新火星派不但按其在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發源來說是經濟主義底後裔，而且按其現今對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策略任務的提法來說也是經濟主義底後裔。他們也是黨內的智識份子機會主義翼。在組織方面，他們開始於智識份子底無政府個人主義而終結於『過程搗亂』，他們在代表會議上所通過的『章程』中明文規定了出版物離開黨組織的制度，規定了幾乎是四級的間接選舉制，規定了以拿破崙式的全民投票¹⁰⁹來代替民主主義的代表制，最後還規定了部份與整體『協定』的原則。在黨底策略方面，他們也是沿着這樣的斜坡滾下去了的。在『地方自治運動計劃』中，他們把在地方自治局紳董面前的發言叫作『高級形式的示威』，認為在政治舞台上只有兩種積極的勢力（是在一月九日事變前夜哩！），即政府與資產階級民主派。他們把迫切的武裝任務『加深』，而將這個直接實踐的口號改換成所謂用自我武裝的熱望武裝起來的號召。武裝起義，臨時政府，革命民主專政等任務，他們都用自己的正式決議來加以曲解和鈍化了。所謂『不要使資產階級退出』，就是他們最後一個決議底結語，完全表明他們那條道路究竟是把黨引到什麼地方去。

俄國民主革命按其社會經濟實質說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單只反覆背誦這個正確馬克思主義原理，還是不夠的。要善於瞭解它，要

善於把它應用於政治口號。一般說來，現代生產關係，即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基礎上的全部政治自由，都是資產階級的自由。自由這一要求，首先就是表現着資產階級底利益。資產階級底代表就是最先提出了這個要求的。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的人到處都以主人資格來利用所得到的自由，把它局限於溫和客氣的資產階級的範圍，在和平時期將其和最精巧鎮壓革命無產階級的手段配合起來，在大風暴時期將其和殘忍橫暴鎮壓革命無產階級的手段配合起來。

但是，只有民粹主義騷動派，無政府主義者和『經濟派』，才能由此得出否認或輕視爭取自由的結論。強迫無產階級接受這種智識份子庸俗學說的企圖，始終都只得到過暫時的效果，而不免受到無產階級底反抗。無產階級總是本能地覺察到，政治自由雖然會直接把資產階級鞏固和組織起來，但它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東西，是無產階級所最需要的東西。無產階級求得解放的道路並不是離開階級鬥爭，而是發展階級鬥爭，擴大其範圍，加強其覺悟性，組織性和堅決性。輕視政治鬥爭任務，便是把社會民主黨人由人民代表變為工聯祕書。輕視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任務，便是把社會民主黨人由人民革命底領袖變為自由工會底頭目。

是的，正是說人民革命。社會民主黨人過去和現在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派濫用『人民』一語，都是完全正當的。他們反對利用這個字眼來掩蓋不瞭解人民內部階級對抗性的企圖。他們堅決主張無產階級黨保持自己完全的階級獨立性。但他們把『人民』分解為一些『階級』，並不是要先進階級固步自封，局限於狹小眼界，因顧慮世上經濟主人翁退出而閹割自己活動中的精髓，而是要先進階級不致沾染中間階級底半途性、不穩定性和不堅決性，使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熱情領導全體人民去為全體人民事業奮鬥。

這也就是現今新火星派往往不瞭解的道理，他們不提出民主革

命中的積極政治口號，却用學究口吻來輾轉重複『階級的』這一形容詞，將其用法變來變去不已！

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平分土地的口號或土地與自由的口號，即在閉塞無知，但渴望光明幸福的農民群眾中間最普遍流行的口號，乃是資產階級性的口號。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知道，除了經過資產階級自由和資產階級進步的道路而外，便沒有，並且也不會有其他可使工農獲得真正自由的道路。我們不應當忘記，現在除了完全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度，除了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而外，便沒有，並且也不會有其他可以加速社會主義到來的手段。我們是毫不推託，毫不猶豫，毫不返顧的唯一革命先進階級底代表，應當用大胆和首倡精神，儘量廣闊地向全體人民提出民主革命任務。輕視這些任務在理論上是譏諷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而在實踐上政治上則是讓一定會退避革命澈底實現的資產階級去支配革命事業。在革命完全勝利的道路上有許多巨大的困難。如果無產階級底代表盡其力所能及，但其一切努力終因反動勢力抵抗，資產階級叛變以及群眾蒙昧無知而受到挫折，那是誰也不能斥責他們的。可是社會民主黨若因害怕勝利，因顧慮資產階級退出而削弱民主革命底革命力量，削弱革命熱情，那末所有的人——尤其是覺悟的無產階級——都會要斥責它了。

革命是歷史底火車頭，——馬克思這樣說過。革命是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底盛大節日。民衆在其他任何時候都不如革命時期這樣能表現爲新社會制度底積極創造者。在這樣的時期，人民能夠作出從市儈漸進主義狹小眼光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蹟。但在這樣的時，必須使革命黨底領導者也更廣闊更大膽地提出自己的任務，必須使他們的口號始終能發揚群眾底革命自動性，成爲他們的燈塔，表明出我們的民主理想和社會主義理想底全部偉大與全部光彩，指明出達到絕對完全澈底勝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讓『解放派』資產

階級底機會主義者因害怕革命，因害怕走直路而臆造出一些彎曲迂迴和妥協的道路吧。如果我們將被迫循着這些道路遲遲行進，那我們就是在細小尋常工作中也能盡自己應盡之責的。但是，首先且讓無情的鬥爭來解決選擇道路的問題吧。如果我們不利用群眾這種異常興奮的毅力及其革命的熱情來為直接堅決道路進行無情而奮勇的鬥爭，那我們就會成為叛變和出賣革命的人了。讓資產階級底機會主義者畏首畏尾，想像將來的反動吧。工人是不害怕反動勢力想要成為可怕力量，也不害怕資產階級想要退出的。工人並不期待什麼妥協分贓，並不請求什麼小惠，而是力謀無情打碎反動勢力，即力謀實現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不用說，我們黨的大船在大風暴時期是要比它在自由主義進化的平靜『航行』時期，即工人階級血汗被那些剝削者吮吸慢得痛苦不堪的時期所遭遇的危險更多。不用說，革命民主專政底任務是要比『持極端反對派態度』和單純國會鬥爭的任務困難千倍，複雜千倍。但是，誰在現今革命時期故意選定平穩航行和安然『持反對派態度』的道路，那他最好是暫時離開社會民主主義工作，坐待革命結束，坐待盛大節日過去，坐待尋常生活重新開始，而他那種尋常狹小的度量不會顯得這樣醜惡，不會把先進階級任務歪曲到這樣畸形地步的時候到來吧。

領導全體人民，特別是領導農民來為完全自由，為澈底民主革命，為共和制度而奮鬥！領導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來為社會主義而奮鬥！革命無產階級底政策，事實上就是應當如此；工人黨在革命時期中應當用以貫徹和決定每個策略手段和每一實際步驟的階級口號，就是如此。

書 後

——再論解放派，再論新火星派——

解放雜誌第七十一至七十二期和火星報第一百零二至一百零三期，供給了我們說明本書第八章所專論的那個問題的非常豐富的新材料。我們在這裏絕對無法全部利用這些豐富材料，而只是要把最主要的部分考察一下：第一，是要考察解放雜誌究竟褒獎着社會民主黨內的何種『現實主義』，以及它爲什麼要褒獎這種『現實主義』；第二，是要考察革命和專政這兩個概念底相互關係。

(一) 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現實主義者爲什麼要褒獎社會民主黨內的『現實主義者』呢？

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分裂和健全頭腦底凱旋這兩篇論文（解放雜誌第七十二期），是自由資產階級底代表人物給社會民主黨所作的一個對於覺悟無產者非常寶貴的評判。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都絕對應該把這兩篇論文從頭到尾讀一遍，並周密思索其中每一語句。現在我們首先且引出這兩篇論文底主要原理：

『由局外人看來，——解放雜誌說道，——那些使社會民主黨分裂爲兩派的意見分歧底真實政治意義是頗難捉摸的。說

『多數派』是個更急進的和直綫式的派別，『少數派』是個爲事業計而容許實行某些妥協的派別，——這樣的定義並不完全確切，無論如何也不是詳盡無遺的。至少，少數派也許比列寧派更熱心遵守着馬克思主義正統思想底傳統教條。我們覺得更確切的定義是如下述。『多數派』底基本政治情緒是抽象的革命主義，騷動主義，趨向於不擇手段來在民衆中間掀起起義，並假借民衆名義來立刻奪取政權；所以『列寧派』是與社會革命黨人相當接近，偏重俄國全民革命思想而忽視階級鬥爭思想；『列寧派』雖在實踐上棄絕了社會民主黨學說中的許多狹隘成分，但同時又浸透了革命主義底狹隘性，他們只求準備立刻起義，而拒絕進行任何其他實際工作，原則上蔑視所有各種合法的鼓動和半合法的鼓動，以及所有各種對其他反政府派別進行的實際有益的妥協。反之，少數派雖固守着馬克思主義底教條，但同時也還保存着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底現實主義成分。這一派底基本思想就是把『無產階級』利益和資產階級利益對立起來。但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底鬥爭又想像得——當然是社會民主黨不可變移的教條所要求的一定限度內——現實清醒，明白覺悟到這個鬥爭底一切具體條件和任務。兩派都不完全一貫地實行自己的基本觀點，因爲它們在其思想和政治的創作中受到社會民主主義教理底嚴格公式的拘束，這些公式妨碍『列寧派』成爲直綫式的騷動派，如至少像某些社會革命黨人那樣，同時這些公式又妨碍『火星派』成爲工人階級現實政治運動底實際領導者』。

解放雜誌底作家接着引出了各個主要決議底內容，然後就以其對於這些決議的幾點具體意見來說明自己的一般『意思』。他說，和第三次代表大會比較起來，『少數派底代表會議是用完全另外一種觀點看待武裝起義問題的』。『由於對武裝起義的態度不同』，

所以彼此關於臨時政府問題的決議也就有所不同。『這樣的意見分歧是在對於職工會問題上也暴露出來了的。『列寧派』在自己的決議中，一句話也沒有提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階級和組織工人階級的這個最重要的出發點。反之，少數派却製定了很鄭重的決議』。在對自由派的態度方面，據說兩派意見一致，但第三次代表大會『幾乎逐字逐句重複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根據普列漢諾夫提案通過的對自由派態度問題的決議，並推翻了也是第二次代表大會根據斯塔羅維爾提案通過的對自由派較表好感的決議』。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雙方關於農民運動問題的決議雖然大體相同，『但『多數派』更強調了用革命手段沒收地主等等土地的思想，而『少數派』則想把要求實行國家行政方面的民主改良當作自己鼓動底基礎』。

最後，解放雜誌從火星報第一百期上引證了一個孟什維克決議，其主要條文是：『因為現時單靠祕密工作已不能使群眾充分參加黨內生活，並且在某種程度內又使真正羣衆和祕密組織的黨對立起來，所以黨必須負責主持工人在合法基礎上進行的職工鬥爭，並嚴格把這個鬥爭和社會民主主義任務聯繫起來』。論到這個決議時，解放雜誌高喊道：『我們熱烈歡迎這個決議，因為它是健全頭腦底凱旋，是社會民主黨內一部分人在策略上省悟的表現』。

現在讀者已看見了解放雜誌所作的一切重要評判了。如果以為這些評判符合客觀真理，那當然是極其錯誤的。在這些評判中間，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都容易到處發現出錯誤來。如果忘記，所有這些評判都完全浸透了自由資產階級底利益和觀點，所以這些評判完全充滿着這種性質的偏頗精神和傾向，——如果忘記這點，那就是幼稚了。這些評判之反映社會民主黨底觀點，正如凹鏡或凸鏡反映物體一樣。但是，如果忘記，這些按資產階級精神歪曲真相的評判，歸根到底總是反映着資產階級底真正利益，而資產階級這一階級無疑是正確瞭解社會民主黨內何種趨向對它——資產階級——有

利，與它親近，與它有血統關係，爲它所喜愛，何種趨向對它有害，與它疏遠，與它毫不相容，爲它所嫌惡，——如果忘記這點，那就更加錯誤了。資產階級的哲學家或資產階級的政論家，始終也不會正確瞭解社會民主派，無論孟什維克的社會民主派也罷，無論布爾什維克的社會民主派也罷。但他如果是一個多少懂事的政論家，那末他的階級本能是決不會騙他的，所以社會民主黨內各個派別對於資產階級的意義，他在實質上總是覺察得正確的，雖然他對於這種意義不免要作出一種歪曲的說明。因此，我們的敵人底階級本能，他所作的階級評判，是每個覺悟無產者始終應當予以最嚴重注意的。

那末，俄國資產階級底階級本能，究竟是用解放派底口舌向我們說出了什麼東西呢？

它十分肯定地表示其對於新火星派趨向的滿意，褒獎新火星派具有現實主義精神，頭腦清醒，健全頭腦底凱旋，決議底鄭重，策略上的省悟，求實精神等等，——同時他又十分肯定地表示其對於第三次代表大會趨向的不滿意，斥責第三次代表大會態度狹隘，拘守革命主義，騷動主義，否認實際有益的妥協等等。資產階級底階級本能恰巧使它覺察到我們的出版物上已用最準確的材料再三證明過的情形，即新火星派是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翼，而其反對者則是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革命翼。自由派不能不同情前者底趨向，不能不斥責後者底趨向。自由派是資產階級底思想家，所以他們非常瞭解，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是工人階級底『求實精神，清醒頭腦和鄭重態度』，即在事實上把它的活動場所限制在資本主義、改良辦法和職工鬥爭等等範圍內。對於資產階級危險而可怕的是無產階級底『革命主義的狹隘性』，是無產階級爲着自己的階級任務而力求謀得俄國全民革命中的領導作用的趨向。

至於『現實主義』一語在解放派心目中的意義果然如此，這是從解放雜誌和司徒盧威先生過去對於此語的用法中也可看得出來

的。火星報自己也曾不能不承認解放派所謂『現實主義』一語含有這樣的意義。例如，請記起火星報第七十三和七十四期附張上所載的那篇標題爲時候到了！的論文吧。該文作者（他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泥潭派』觀點底一貫表現者）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見，認爲『阿期莫夫在代表大會上所表現的，與其說是機會主義真正代表者底作用，不如說是機會主義幻影底作用』。火星報編輯部不得不立刻來糾正時候到了！一文作者底說法，而在附註中宣稱：

『我們對於這個意見不能表示同意。阿期莫夫同志底綱領觀點含有很明顯的機會主義色彩，這是解放雜誌中的一位批評者也承認的。這位批評者在該雜誌最近一期內指出，說阿期莫夫同志歸附於『現實主義的』——請讀作修正主義的——趨向』。

可見，火星報自己十分知道，解放派的『現實主義』也就是機會主義，而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如果火星報現在攻擊『自由派的現實主義』時（見火星報第一百零二期），竟毫不說及自由派褒獎過它的現實主義的事實，那就是因爲這種褒獎比任何斥責都更要辛辣了。其實，這種褒獎（並非偶然而且並非第一次由解放雜誌表示出來的褒獎）證明，自由派的現實主義與社會民主黨人的『現實主義』（請讀作機會主義）趨向，即新火星派因其全部策略立場錯誤而顯現於他們每一個決議中的那種趨向，是血脈相連的。

俄國資產階級確實完全暴露了它在『全民』革命中的不徹底性和自私自利性，——既暴露於司徒盧威先生底議論中，又暴露於許多自由派報紙底全部論調和內容上，又暴露於許多地方自治派、許多智識份子以及所有一般站在杜魯別茨可義、彼特龍克維奇、羅吉澈夫一流先生方面的人們政治言論底性質上。資產階級當然不是常常都明白瞭解，但一般和整個說來，它憑着自己的階級本能，總是很好地覺察到：一方面，把無產階級和『人民』當作砲灰，當作摧毀

專制制度的衝車去用，是有益於它的革命的；但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澈底戰勝沙皇制度』而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又是對它非常危險的。因此資產階級也就極力使無產階級以在革命中表現『平常』作用爲滿足，使無產階級清醒些、務實些、現實主義些，使無產階級底活動以『不要使資產階級退出』的原則爲標準。

有學識的資產者非常知道，工人運動是他們避免不了的。因此，他們並不表示反對工人運動，並不表示反對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不，他們甚至極力讚美罷工自由，讚美所謂文明的階級鬥爭，把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解釋爲布連坦諾式或基爾什、董克爾式的東西。換言之，他們完全甘願把罷工結社自由（事實上幾乎已由工人自己爭得的自由）『讓給』工人，只要工人拋棄『騷動主義』，拋棄『狹隘革命主義』，拋棄其仇視『實際有益的妥協』的態度，拋棄其想在『俄國全民革命』上面刻下自己階級鬥爭標記，刻下無產階級一貫性、無產階級堅決性、『平民雅可賓主義』標記的願望和企圖就是了。因此，有學識的資產者在全俄各地都用盡千方百計——書籍*、講演、演說和談話等等，等等——來拚命向工人們灌輸（資產階級的）清醒態度，（自由主義的）求實精神，（機會主義的）現實態度，（布連坦諾式的）階級鬥爭，（基爾什、董克爾式的）職工會等等思想。後面兩個口號對於『立憲民主』黨或『解放』黨的資產者特別方便，因爲它們在表面上符合於馬克思主義口號，因爲稍加隱諱，稍加曲解，就很容易把它們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口號混淆起來，有時甚至很容易把它們假冒爲社會民主主義的口號。例如，合法的自由派的黎明報（關於它，我們以後還要來和無產者報底讀者們詳細談談），關於階級鬥爭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可能被資產階級所驅的問題，關於工人運動的問題，關

*參看普羅科波維奇所著俄國工人問題一書。

於無產階級自動性的問題等等，往往說出非常『大胆的』東西，使那些不經心的讀者和無見識的工人們很容易把該報底『社會民主主義』當作真貨來看待。其實，這是按資產階級精神來偽造社會民主主義的把戲，用機會主義精神來歪曲和曲解階級鬥爭概念的伎倆。

這全套規模巨大的（按其影響於群眾的廣度來說）資產階級偷換把戲底基本動機，都是企圖把工人運動歸結為主要是職業性的運動，使工人運動遠遠離開獨立的（即革命的和以實現民主專政為目標的）政策，『用階級鬥爭的觀念來蒙蔽工人意識中的俄國全民革命觀念』。

讀者由此可見，我們是把解放雜誌底公式翻轉過來了。這是個絕妙的公式，它非常明白表示出觀察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兩種觀點，一種是資產階級的觀點，另一種是社會民主黨的觀點。資產階級想使無產階級只作職業性的運動，並以此而『用（布連坦諾式的）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蒙蔽工人意識中的俄國全民革命觀念』，——這完全和伯恩施坦主義的 „Credo“ 作者們用『純粹工人』運動的觀念來蒙蔽工人意識中的政治鬥爭觀念相同。反之，社會民主黨則想把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對於俄國全民革命的領導參加，即把這個革命進行到實現工農民主專政。

我國革命是全民的革命，——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說道。——因此，你既是一個特別階級，就應當局限於自己的階級鬥爭，就應當為着『頭腦健全』而專心注重職工會和使其合法化，就應當正是把這些職工會當作『在政治上教育和組織你自己的最重要的出發點』，就應當在革命時期製定如新火星派決議那樣多半是『鄭重的』決議，就應當愛惜那些『對自由派較表好感的』決議，就應當甘願受那些企圖做『工人階級現實政治運動底實際領導者』的人們領導，就應當『保存着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底現實主義成分』（如果可惜你已被這個『不合科學的』教理底『嚴格公式』所薰染的話）。

我國革命是全民的革命，——社會民主黨對無產階級說道。——因此，你既是最先進的和唯一澈底革命的階級，就不僅要最努力參加這個革命，而且要力求領導這個革命。因此，你就不應當局限於被瞭解成爲主要是職工運動的那個狹隘的階級鬥爭範圍內，而應當力求擴大自己階級鬥爭底範圍和內容，一直到使這個範圍不僅包括着俄國現今全民民主革命底一切任務，而且包括着今後社會主義革命底任務。因此，你雖不忽視職工運動，不拒絕利用任何一點合法活動的機會，但你同時又應當在革命時代把實行武裝起義、成立革命軍隊和革命政府的任務提到第一位，作爲保證人民完全戰勝沙皇制度，保證爭得民主共和制度和真正政治自由的唯一手段。

於是，新火星派的決議究竟因其『路線』錯誤而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了怎樣半途性，怎樣不澈底，因而自然是資產階級所喜愛的立場，也就無庸贅說了。

(二) 馬爾丁諾夫同志又來『加深』問題了

現在我們來講馬爾丁諾夫發表於火星報第一百零二期和第一百零三期上的論文。我們當然不去回答馬爾丁諾夫企圖證明我們把許多從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摘引來的言論解釋得不對，而他却把這些言論解釋得正確的說法。這種企圖是很不莊重的，馬爾丁諾夫底遁辭是一望而知的，問題是很明顯的，如果再來加以分析，就未免毫無趣味了。任何一個用心思索的讀者，都很容易自行識破馬爾丁諾夫在實行全綫退却時所玩弄的那種不很巧妙的詭計，何況無產者報館中一部分人現在準備付印的恩格斯所著巴枯寧派底行動一書和馬克思所著共產主義者同盟管委底通告（一八五〇年三月）一書全文譯本，很快就要出版了。只須從馬爾丁諾夫論文中引出一段文字，就可使讀者明白看見馬爾丁諾夫實行退却的情景。

『火星報，——馬爾丁諾夫在第一百零三期上說道，——認為成立臨時政府是發展革命的可能和適當道路之一，而否認社會民主黨人參加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適當性，正是爲了要在將來完全佔有國家機器來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換言之：火星報現在已承認，它恐怕革命政府必須對國庫和銀行負責，恐怕把『監獄』拿到自己手裏來會有危險而且會不可能等等的焦慮，是毫無根據的。火星報只是照舊觀念糊塗，把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專政混爲一談。觀念糊塗是爲掩護退却而不可避免的。

但在新火星報底糊塗虫中間，馬爾丁諾夫是個特出的角色，是個頭等的糊塗虫，甚至可以說是個天才的糊塗虫。他幾乎每次大賣氣力『加深』問題而把問題弄糊塗時，總是『想出』一些新公式，使他所持的那個立場底全部虛偽性暴露無餘。請你們記起，他在經濟主義時代如何『加深』過普列漢諾夫，而獨出心裁地創造了『與廠主及政府作經濟鬥爭』的公式。這真可說是經濟派全部作品中最能恰當表明該派全部虛偽性的說法。現在也是如此。馬爾丁諾夫很奮勉地替新火星報効勞，並幾乎每次說話時都給予我們一些揭露新火星派虛偽立場的絕妙新鮮的材料。在第一百零二期上，他說『列寧偷偷摸摸地用專政概念來代替了革命概念』（第三頁，第二欄）。

其實，新火星派用來反對我們的一切罪名都是歸結於這個罪名哩。而我們是應如何感謝馬爾丁諾夫提出這個罪名的盛意呵！他把罪名這樣表述出來，就是給了我們一種反對新火星派極寶貴的幫助呵！我們真要請求火星報編輯部多多放出馬爾丁諾夫來反對我們，『加深』他們所用以攻擊無產者報的議論，並按『真正原則精神』把這些議論表述出來。因爲馬爾丁諾夫愈是努力企圖推論得原則些，便說得愈糟糕，便愈加顯然表明出新火星派底毛病，便愈加中肯地對他自己以及對他自己的朋友們施行大有教益的解剖：把新火星報底原則 *reductio ad absurdum*（引伸成爲荒誕已極的謬論）。

前進報和無產者報用專政概念『代替』了革命概念。火星報不願這樣『代替』。最可敬的馬爾丁諾夫同志，正是如此呵！你無意中道出了一件重大的真情。你用新說法證實了我們的意見：火星報是在作革命底尾巴，滑到了像解放派那樣表述革命任務的觀點上去，而前進報和無產者報則提出了要把民主革命引向前進的口號。

馬爾丁諾夫同志，你不懂得這點麼？因為這個問題很關重要，所以我們不妨費點氣力來給你作一個詳盡的解釋。

民主革命底資產階級性的表現之一，就是有許多完全以承認私有制度和商品經濟爲立腳點而不能超出這種範圍的社會階級、集團和階層，都爲情勢所迫而承認專制制度和整個農奴制度腐敗不堪，都附和於要求自由了。同時，『社會』所要求，地主資本家們用滔滔不斷的言詞（僅僅是言詞！）來擁護的這種自由底資產階級性，又暴露得日益明顯。同時，工人爭取自由的鬥爭和資產階級爭取自由的鬥爭，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自由派的民主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也是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工人階級及其覺悟代表是向前行進着，向前推進着這個鬥爭，不僅不怕把它進行到澈底的結局，並且力求走到比民主革命最澈底的結局還要遠得多的地步。資產階級是不澈底而自私自利的，是僅僅局部地和虛偽地接受自由口號的。任何想用特別界線，想用特別擬定的『條款』（如斯塔羅維爾決議或代表會議派決議內所載的那些條款之類）來劃定一種界限，藉以鑑別這種冒充自由之友的資產階級份子虛偽的態度，或這種冒充自由之友的資產階級份子叛賣自由的行爲，——任何想劃定這樣一種界限的企圖都要必遭失敗，因爲處在兩團烈火（專制制度和無產階級）中間的資產階級是能千方百計地變更自己的立場和口號，能玩弄遷就手腕，時而稍微向左，時而稍微向右，經常從事妥協分贓勾當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底任務不是要臆造這種死板的『條款』，

而是要毫不倦怠地批評不斷發展着的政治形勢，揭露資產階級日新月異而不可預先察知的不徹底態度和變節行爲。

你們只須回憶司徒盧威先生在不合法刊物上發表政治言論底歷史，只須回憶社會民主黨和他交戰底歷史，便可明白看見爲無產階級民主主義而奮鬥的社會民主黨實現這些任務的情形了。司徒盧威先生開始是提出純粹施坡夫式的口號，即所謂『有權力，有政權的地方自治局』——（參看我發表於曙光雜誌的論文：地方自治局底追究者和自由主義底安尼巴）。社會民主黨揭露了他，並推動他提出明確的立憲主義綱領。當這些『推動』已因革命事變特別迅速進展而發生了作用時，鬥爭就指向於民主主義底往下一個問題：不僅是要有一般憲法，而且一定要有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當我們把這個新陣地也從『敵軍』方面『佔領』時（即解放社已接受普選制的要求時），我們就來更向前進逼，指明兩院制底虛偽和虛假，指明解放派對於普選制承認得不完全周到，並用他們的君主主義立場爲例證來揭露其民主主義底妥協性質，或——換句話說——揭露這些保護錢包的解放派英雄們企圖廉價出賣俄國大革命利益的手腕。

最後，專制制度冥頑固執，國內戰爭大步進展，君主派使俄國陷入絕境的情形，已開始衝破最頑固守舊的頭腦。革命已成爲事實了。此時爲要承認革命，已不一定要做革命家了。專制政府事實上已在腐朽，並且是在衆目昭彰下腐朽着。當時，正如一個自由派份子（格列德斯庫爾先生）在合法刊物上公正說過的那樣，已造成了事實上不服從這個政府的情形。專制制度雖然表面上還很強大，但它已是無能爲力；發展着的革命事變已經是簡直把這個活生腐朽着的寄生機體拋到旁邊去了。自由派的資產者既不得不以事實上形成着的現有關係爲立腳點來進行其活動（或更正確些說——進行其政治投機勾當），就開始覺得必須承認革命。其所以這樣來作，並不是

因為他們是革命家，而是那怕他們不是革命家。他們這樣來作，是迫不得已，是違反着自己的志願，他們目視革命進展而忿怒，責斥專制制度助長革命，因為這個專制制度不願實行妥協，却想拚命鬥爭。他們是天生的買賣人，當然也就仇恨鬥爭，仇恨革命，但客觀情勢迫使他們站到革命基地上來，因為他們沒有另外一種基地可以立腳。

我們親眼看見一種非常值得玩味和非常滑稽可笑的情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娼妓竟企圖披上一套主張革命的花衫。解放派，——*risum teneatis, amici!**——解放派已開始以革命名義說起話來了！解放派已開始揚言（司徒盧威先生在解放雜誌第七十二期上）說他們『不怕革命』了!!! 解放派已表示希圖『領導革命』了!!!

這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它不僅是表明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底進步，並且尤其是表明革命運動獲得實際成功而使人們不得不加以承認的進步。甚至資產階級也開始感覺到站在革命基地上來是較有利益的了，——足見專制制度已被震撼到何等地步了。可是，另一方面，這一現象又證明整個運動已升到新的更高的階段，向我們提出一些也是新的，也是更高的任務。不管資產階級某個思想家個人態度誠實與否，但資產階級承認革命是不會誠心誠意的。資產階級對於運動底這個更高階段，也是不能不隨身帶進一種自私自利和不澈底成分，慣於妥協勾當和從事小氣反動詭計成分的。我們現在為遵行我們的綱領並發揮我們的綱領，應當另行規定革命底最近具體任務。昨天足够的東西，今天已不足够了。昨天把要求承認革命作為先進民主口號也許是足够的。現在它已經不够了。革命甚至使司徒盧威先生也不得不來承認它了。現在，先進階級已必須把這個革命所有刻不容緩的迫切任務底內容本身明白確定出來。司徒盧威

*請看官不要馬上發笑吧！——譯者。

一流的先生們雖然承認革命，但立刻又露出馬脚來，又唱起陳腔舊調來，說什麼可能達到和平的結局，說尼古拉¹¹⁰將召請解放派先生上台執政等等，等等。解放派先生們承認革命，目的是要使自己能比較安全地誘騙這個革命，叛賣這個革命。現在，我們應當向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指出『革命』這一口號之不够，指明有把革命底內容本身明白剝切，堅決一貫地確定出來之必要。這樣的確定也就是那個唯一能正確表示革命『澈底勝利』的口號，即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濫用字眼原是政治方面最普通的現象。例如，往往自稱爲『社會主義者』的既有英國資產階級自由派方面的份子（『現在我們大家都是社會主義者了』——“We all are socialists now”——哈爾科爾特會這樣說過），又有俾斯麥底信徒和教皇列夫十三世底朋友。『革命』一語也是完全可供人們濫用的，而當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甚至是不免要被人們濫用的。我們聽見司徒盧威先生假借革命底名義說起話來，就不禁回想到梯也爾。在二月革命幾天以前，這個窮兇極惡的矮人，這個絕頂標本的資產階級政治騙徒，嗅到了人民風暴將臨的氣息。於是他從國會講台上宣佈，說他是個革命黨中人哩！（見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一書）。現在解放派轉到革命黨方面來這一事實底政治意義，也與梯也爾底這種『轉變』完全相同。當俄國的梯也爾輩已說起他們是革命黨中人的時候，那就是說明『革命』這一口號已成了一個全然不够，毫無意義和根本不能確定出什麼任務來的口號了，因爲此時革命已成了事實，而各種各色的份子都已紛紛跑到革命方面來了。

革命從馬克思主義觀點方面來看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其意思就是用強力來打破陳舊的政治上層建築物，即打破那因與新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而在一定時機遭到了破產的上層建築物。現在，專制制度已因它與資本主義俄國全部機構相矛盾，即與這資本主義俄國需

要按資產階級民主方面發展的全部趨勢相矛盾的這種情形會被勉強阻延得特別長久而遭到特別厲害的破產了。上層建築物已是破綻百出，經不住攻擊，日益削弱下去了。人民只好由自己，即經過各種階級和各種集團底代表人物來爲自己建造起一個新的上層建築物。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舊的上層建築物底腐敗無用已成了盡人皆知的事實。革命已是大家都承認的了。目前任務是要確定清楚，究竟哪些階級，以及究竟應該怎樣來建造新的上層建築物。若不把這點確定清楚，那末革命這一口號在目前階段上就是個空泛而毫無意思的口號，因爲專制制度力量虛弱的事實已使那些親王們和莫斯科新聞報館中人也都變成爲『革命者』了！若不把這點確定清楚，那就根本談不到先進階級底先進民主任務。而這樣的確定也就是工農民主專政口號。這個口號既能確定出新上層建築物底新『建築人』可能而且應該倚據的那些階級，又能確定出這一上層建築物底性質（即『民主』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專政）和建築方式（實行專政，即用強力鎮壓強力抵抗，把民間各個革命階級武裝起來）。目前誰不承認這一建立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不承認建立革命軍隊、革命政府及革命農民委員會的口號，那他若不是根本不瞭解革命底任務，若不是不善於確定革命由目前時局所提出的新的和更高的任務，就會是濫用『革命』這一口號來欺騙人民，叛賣革命。

前一場合是馬爾丁諾夫同志和他的那班朋友。後一場合便是司徒盧威先生和整個『立憲民主主義的』地方自治黨。

馬爾丁諾夫同志真會投機取巧，恰好是當革命底發展進程已使人必須用專政口號來確定革命任務的時候，却竟責備人家爲什麼用專政概念來『替換』革命概念！馬爾丁諾夫同志事實上又不幸停留在尾巴地位上，陷住在已經過去的階段上，墮落到解放派的水準上，因爲目前與解放派政治立場，即與自由保皇派資產階級底利益相當的正是承認（口頭上承認）『革命』而不願承認工農民主專政（事

實上的革命)。自由資產階級現在以司徒盧威先生爲代表來表示贊成革命。覺悟的無產階級以革命民主黨人爲代表來主張成立工農專政。這時却有新火星報方面的一位聖人跑出來干涉雙方爭論而叫喊道：切不要用專政概念來『替換』革命概念呀！你看，這難道還不是表明新火星派所持的虛偽立場註定他們要永遠做解放派底尾巴麼？

我們已經指明，解放派在承認民主主義方面是一步一步上升的（當然不無社會民主黨鼓勵推動底影響）。起初，我們和他們所爭論的問題，是施坡夫主義呢（有權力，有政權的地方自治局），還是立憲主義呢？然後，是有限制的選舉呢，還是普選制呢？後來：是承認革命呢，還是設法去和專制制度妥協分贓呢？最後，現在：是不要工農專政而承認革命呢，還是承認要由這兩個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實現專政呢？也許就連解放派（至於究竟是現今的解放派，還是他們在資產階級民主派左翼中的繼承者，那都是一樣）還要更往上升一步，就是說，經過一些時候（也許是嘗馬爾丁諾夫同志也往上升一步的時候吧）對於專政口號也會表示承認，——這是可能而且蓋然的事情。並且，在俄國革命順利前進並達到澈底勝利時，這甚至是不不可避免的事情。那時，社會民主黨底立場又將怎樣呢？現今革命底完全勝利就會是民主革命底終結和爲社會主義革命而堅決鬥爭底開始。現時農民底要求一實現，反動勢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度一爭得，則資產階級和甚至小資產階級底革命性就會完全終結，而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真正鬥爭就會開始。民主革命實現得愈完全，這個新鬥爭也就會開展得愈迅速，愈廣濶，愈純粹，愈堅決。『民主』專政這一口號是既表明現今革命在歷史上有限的性質，又表明有在新制度基礎上爲求工人階級完全擺脫任何壓迫任何剝削而進行新鬥爭之必要。換言之：當民主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更上升一步時，當不僅革命成爲事實，而且革命底完全勝利也成爲

事實時，我們就會用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專政，即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口號，來『代替』（也許是在將來新的馬爾丁諾夫輩叫苦連天的時候）民主專政口號。

（三）庸俗資產階級的專政觀和馬克思底專政觀

梅林格在所刊印的馬克思一八四八年發表於新萊茵報上的論文中，特別加上一個附註，說是資產階級的出版物還對該報提出過一個責難，即認為新萊茵報要求過『立刻施行專政作為實現民主制的唯一手段』（馬克思遺著第三卷，第五三頁）。從庸俗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專政概念和民主概念是不能相容的。資產者不懂得階級鬥爭論，看慣了資產階級各種細小朋黨會社在政治舞台上的無聊爭鬪，所以他們認為專政就是廢除任何民主自由和民主保障，就是任意橫行，就是隨便濫用權力來謀專政者一己利益的行動。其實，我們的馬爾丁諾夫顯然懷有這種庸俗資產階級的觀念，他在新火星報上舉行的那個『新討伐』底結語中，說前進報和無產者報所以偏向於專政口號，是因為『列寧渴望享福』（火星報，第一百零三期，第三頁，第二欄）。為要向馬爾丁諾夫說明階級專政概念和個人專政概念之間的區別，民主專政任務和社會主義專政任務之間的區別，我們不妨把新萊茵報底觀點拿來分析一下。

『在革命後，任何一種臨時國家制度，——一八四八年九月十四日的新萊茵報寫道，——都要有專政，並且要有堅強果敢的專政。我們自始就責備過康普浩曾（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以後的內閣總理），因為他沒有採用專政手段，因為他沒有立刻打破，沒有立刻剷除舊制度底餘孽。於是當康普浩先生還以憲制幻想來妄自安慰時，而原被打破的黨（即反動黨）却已鞏固了它在官僚機關和軍隊中間的陣地，甚至已擅敢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掀起公開的鬥爭』。

這幾句話，——梅林格公正地說道，——把新萊茵報在其論康普浩曾內閣的長篇論文中詳細發揮過的東西歸納成了很少幾個原理。馬克思這幾句話是向我們說明什麼呢？就是說明：臨時革命政府應當採用專政手段（這也就是躲避專政口號的火星報無論如何都不能瞭解的原理）；這個專政底任務就是要消滅舊制度底餘孽（這也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論鎮壓反革命勢力的決議把它明白指出了，而代表會議底決議則把它遺漏了的那個原理，如我們已經在上面說過的那樣）。最後，第三，從這幾句話中間可以看見，馬克思痛斥了資產階級民主派，說他們不該在革命和公開國內戰爭時代迷戀於『憲制幻想』。這幾句話底意思，可從一八四八年六月六號新萊茵報上的一篇論文中特別明顯地看出。『人民立憲會議，——馬克思寫道，——首先就應當是積極的，革命積極的會議，而法蘭克福會議却在那裏用蒙童態度練習國會主義課程，聽憑政府去動作。就假定這個學者會議在深刻討論一番以後竟能製定出一個最好的日程和最好的憲法來吧。既然德意志各邦政府此時已把刺刀提到日程上來了，那末最好的日程和最好的憲法又有什麼意思呢？』

專政口號底意義就是如此。由此也就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會怎樣對待那些把『決定組織立憲會議』叫作澈底勝利，或號召『始終做一個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態度的政黨』的決議呵！

各國人民生活中的偉大問題只能由強力來解決。各反動階級通常都是自己先動手採用強力，採用國內戰爭，『把刺刀提到日程上』，如俄國專制制度已經作過，而從一月九日起，則已到處各地都一貫而頑強不移地繼續作着的那樣。既然這種局面已經形成，既然刺刀已經真正擺在政治日程首位上來了，既然起義已成了必要和刻不容緩的事情，那末憲制的幻想和蒙童式的練習國會主義課程，就成爲專門掩飾資產階級叛賣革命的屏風，專門掩飾資產階級

『退出』革命的屏風。真正革命的階級在那時所應當提出的正是專政口號。

關於這個專政底任務問題，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就寫過：『國民會議本來應當用專政手段反對各邦腐朽政府底反動企圖，那時它就會在人民輿論中間奪得能於挫折一切刺刀的力量…而這個會議竟用一些枯燥無味的辭句來使德國人民厭倦，却不去引導他們或聽受他們引導』。按馬克思底意見，國民會議本來應當『從德國當時實際存在的制度中剷除掉一切與人民專制原則相抵觸的東西』，然後『鞏固它所藉以立足的革命基地，保證革命所爭得的人民專制不受任何侵犯的危險』。

可見，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向革命政府或革命專政所提出的任務，按其內容來說，首先就是歸結於實行民主改革：抵禦反革命勢力，在事實上剷除所有一切與人民專制相抵觸的東西。而這無非就是革命民主專政。

現在且往下說去吧：馬克思究竟是認為那些階級當時能夠而且應當實現這個任務（在事實上把人民專制原則實行到底，並打退反革命勢力底襲擊）呢？馬克思是說『人民』。但我們知道，馬克思向來都是無情反對那些認為『人民』一致，認為在人民內部缺乏階級鬥爭的小資產階級幻想的。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語時，並沒有用它來抹煞各階級間的區別，而是將那些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定成分統一起來。

在柏林無產階級三月十八日的勝利以後，——新萊茵報寫道，——從革命中間產生出兩方面的結果：『一方面是人民的武裝，結社權以及事實上已經爭得的人民專制；另一方面是保存着君主制度和成立了康普浩曾—漢則曼內閣，即大資產階級代表底政府。這樣，革命有了兩方面的結果；這兩方面的結果是必歸決裂的。人民是勝利了；它爭得了真正民主性質的自

由，然而直接的統治權却沒有轉歸於它，而是轉歸了大資產階級。總而言之，革命沒有進行到底。人民聽憑大資產階級代表去實行組閣，而這些大資產階級代表就立刻向舊普魯士的貴族和官僚建議聯盟，並以此證明了自己的趨向。加入了內閣的有阿爾尼姆，卡尼茨和施維林。

大資產階級從最初起就反對革命，因害怕人民，即因害怕工人和民主資產階級而同反動勢力結成了攻守同盟』（着重點是我加的）。

總之，不僅是『決定組織立憲會議』尚不足以保證革命澈底勝利，就是真正召集立憲會議也還不能保證革命澈底勝利哩！甚至在武裝鬥爭中得到局部勝利後（柏林工人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對於軍隊的勝利），也還可能有『尚未完成的』，『沒有進行到底的』革命。革命進行到底與否，究竟取決於什麼呢？就是取決於直接統治權究竟轉歸於誰：是轉歸彼特龍克維奇輩和羅吉澈夫輩，即康普浩曾輩和漢則曼輩，還是轉歸人民，即工人和民主資產階級。在前一場合，資產階級就會擁有政權，而無產階級就會擁有『批評自由』，即『始終做一個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態度的政黨』的自由。資產階級一獲得勝利，就會立刻和反動勢力結成聯盟（譬如說，如果彼得堡的工人在其和軍隊進行的巷戰中僅僅獲得局部勝利，而聽憑彼特龍克維奇一流先生們成立政府，那末這種情形在俄國也是不免要發生的）。在後一場合，就可能實現革命民主專政，即革命底完全勝利。

現在我們只要更明白確定一下，馬克思拿來和工人合在一起而統稱為人民以與大資產階級對立的那個『民主資產階級』（demokratische Bürgerschaft），究竟是何所指呢？

對於這個問題，在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新萊茵報所載一文中有如下一段來作明白的回答：『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不過是法國一七八九年革命底漫畫。

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在佔領巴士底獄三星期後，法國人民在一天以內就戰勝了一切封建賦役制。

一八四八年七月十一日，在三月巷戰事變發生以後四個月的時候，封建賦役制戰勝了德國人民。Teste Gierke cum Hanse man -no*。

一七八九年的法國資產階級，一分鐘也沒有離棄過自己的同盟者，即農民。它知道，保證它自己統治的基本條件是消滅農村中的封建制度，是建立佔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自由農民階級。

一八四八年的德國資產階級，厚顏無恥地叛賣了農民，即叛變了它自己最天然的同盟者，這些同盟者是和它骨肉相連，而它沒有這些同盟者，便無力反對貴族。

保存封建權利，假借贖買（虛幻的贖買）名義來批准這些權利，——這就是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底結果。真是龍頭蛇尾』。

這是一段極可注意的議論，它給予我們四個重要的原理：

（一）尙未完成的德國革命與已完成的法國革命不同之處，就在於德國資產階級不僅是一般叛變了民主主義，而且尤其是叛變了農民。（二）保證民主革命完全實現的基本條件，是建立自由農民階級。（三）建立這樣一個階級，就是廢除封建賦役制，打破封建制度，但這還完全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四）農民是資產階級，即民

*『有吉爾克先生和漢則曼先生做見證人』。漢則曼是大資產階級黨底黨員（等於俄國的杜魯別茨可義或羅吉澈夫等等）。吉爾克是漢則曼內閣中的農業總長，他擬定了一個『大胆』草案，表面上似乎是要『無代價地』『廢除封建賦役制』，實際上僅僅是要廢除那些不重要的細小的賦役，而把較重大的賦役保存起來，或要求贖買。吉爾克先生很像俄國的卡布魯可夫，曼努依洛夫，格爾村施坦一類冒充農夫之友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先生，他們願意『擴大農民地產』，但不願意得罪地主。

主資產階級底『最天然的』同盟者，沒有這種同盟者，資產階級就『無力』反對反動勢力。

只要加以具體民族特點方面的某些改變而把封建制度換作農奴制度來說，便完全可以把這一切原理應用於一九〇五年的俄國了。毫無疑義，當我們從馬克思所闡明的德國經驗中吸取教訓時，我們所能得出的唯一保證革命澈底勝利的口號就不外是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毫無疑義，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用來與那些實行反抗的反動勢力以及叛賣成性的資產階級相對立的『人民』，其主要組成部分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毫無疑義，在我們俄國，自由資產階級和解放派先生們也叛賣着，並且一定會叛賣農民，就是說，他們會用虛偽的改良來敷衍了事，會在地主和農民決鬥時站到地主方面去。只有無產階級能澈底幫助農民進行這個鬥爭。最後，毫無疑義，在我們俄國這裏，農民鬥爭底成功，即全部土地轉歸農民，也會是完全的民主變革，是進行到底的革命底社會支柱，但這完全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也不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社會革命黨人所說的什麼『社會化』。農民起義底成功，民主革命底勝利，只會掃清在民主共和制度基礎上真正和堅決為社會主義鬥爭的道路。農民是土地佔有者階級，所以他們在這個鬥爭中，也會如資產階級現時在爭取民主制的鬥爭中一樣，起着叛賣的，不穩定的作用。忘記這點，就是忘記社會主義，就是在無產階級底真正利益和任務問題上自欺欺人。

為要詳盡說明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的觀點，還須指出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或無產階級底共產黨，如果用當時的口氣來說的話）和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之間的一個重大區別。且聽梅林格怎樣說吧：

『新萊茵報是以『民主派底機關報』資格走上政治舞台的。不可不看出貫注於它的一切論文中的那條基本線索。但它的直接目標，與其說是擁護無產階級底利益去反對資產階級底

利益，不如說是爲擁護資產階級革命底利益去反對專制制度和封建制度。關於當時革命時期專門工人運動問題的論文，在該報篇幅上很少登載，不過不應忘記，當時和它並排而每星期出版兩次的還有莫里和沙佩爾兩人編輯的一個專門的科倫工會機關報。無論如何，很惹現代讀者注目的，是新萊茵報很少注意到當時德國工人運動，雖然當時德國工人運動中一位最能幹的活動家波仁，曾在巴黎和布魯塞爾兩地向馬克思和恩格斯學習過，並於一八四八年從柏林寫通訊稿供給他們的報紙。據波仁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敘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也沒有絲毫表示他們不贊同他所進行的工人鼓動工作。可是，根據恩格斯後來所作的聲明，便可推想，他們至少是不滿意於這種鼓動工作底方法。他們的這種不滿在某些方面是有根據的，因爲波仁曾不得不對無產階級在德國大部分領土內全未成熟的階級意識作了許多讓步，作了許多從共產黨宣言觀點來看簡直不值一駁的讓步。他們的這種不滿在另一方面又是沒有根據的，因爲波仁畢竟善於把他所領導的鼓動工作維持在頗高的水準上…毫無疑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認爲工人階級底最重要利益首先就是要儘量推進資產階級革命，這在歷史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確的…雖然如此，但有一件事實燦爛證明工人運動底起碼本能善於糾正最英明思想家底觀念，這件事實就是他們在一八四九年四月間已主張成立專門的工人組織，並決定參加特別是易北河東（東普魯士）無產階級所準備召集的工人代表大會』。

總之，只有在一八四九年四月，在革命報紙幾乎出版一年以後（新萊茵報是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開始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才表示主張成立專門的工人組織！在此以前，他們僅僅編輯了一個與獨立工人政黨沒有任何組織聯系的『民主派機關報』！這件事實，——從我們現代觀點來看真是駭人聽聞和不可思議的事實，

——就向我們具體指明當時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和現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有如何巨大的區別。這件事實向我們指明，在德國民主革命中，運動方面的無產階級特徵，運動裏的無產階級潮流，其表現要比在現時俄國民主革命中薄弱得多（是因爲德國在一八四八年時期還很落後，既在經濟方面落後，又在政治方面落後——國家零亂而不統一）。這在估計馬克思當時以及不久以後關於必須獨立組織無產階級黨的多次聲明時，是不可忘記的。馬克思僅僅根據民主革命底經驗，幾乎經過一年以後，才實際作出這個結論來：足見德國當時全部空氣都充滿市儈性，小資產階級性。在我們這裏，這個結論是早已從國際社會民主運動半世紀的經驗中得到的堅固的成果，而我們就是根據這種成果來開始組織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例如，在我們這裏根本不能有無產階級底革命報紙站在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以外的現象，根本不能有這種報紙——那怕只是一分鐘——以簡單『民主派底機關報』資格出台活動的現象。

可是，從前在馬克思和波仁兩人間剛剛開始暴露出來的那種對立性，在我們這裏却已存在於更成熟得多的形式中，而且俄國革命民主巨流中的無產階級支流來得愈雄偉，這種對立性也就來得愈厲害。梅林格說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對於波仁那種鼓動工作所表示的不滿時，是把此事形容得過分柔和，過分含糊了。請看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評論波仁時所寫的一段文字吧（引自科倫共產黨人審案真相記一書序言，一八八五年蘇黎支版）。

『共產主義者同盟』¹¹¹會員到處都領導過極端民主運動，於是就證明『同盟』是個最好不過的革命活動的學校。『排字匠波仁，從前是在布魯塞爾和巴黎積極活動的同盟會員，他在柏林創立了『工人友誼會』（„Arbeiterverbrüderung“），這個友誼會有過廣闊的散佈並一直存在到一八五〇年。波仁雖是位天才的少年，但他未免太急於以政治活動家資格出台活動了。他竟

和五光十色的人衆(Kreti und Plethi)講起『友誼』來，而只圖在自己周圍糾合起一羣人。他完全不是一個能給各個矛盾趨向以統一，能給混亂狀況以光明的人物。因此，在他那個友誼會底正式文告中，就往往弄得糊塗不清，竟把共產黨宣言底觀點和那些行會習性與行會願望，和那些路易勃朗與蒲魯東觀點的碎片，和那種擁護保護關稅政策的立場等等混爲一談；總而言之，這些人是想對人人討好的(Allen allies sein)。他們特別努力於組織罷工，組織職工會以及生產協作社，却忘記了主要任務是運用政治勝利來首先爭得這樣一種場所，只有在這種場所上才可堅固可靠地實現這些東西（着重點是我加的）。當反動勢力底勝利已使這個友誼會底頭目們感覺到必須直接參加革命鬥爭時，於是原先集合在他們周圍的落後羣衆也就自然離開了他們。波仁參加了德勒斯登一八四九年五月的起義，且僥倖得免於死。而工人友誼會則對無產階級偉大政治運動持袖手旁觀態度，成爲一個孤獨的團體，多半是僅僅在紙上存在過，其作用小到極點，所以反動勢力直至一八五〇年才覺得必須封閉它，而其各地方支部則經過許多年以後才被封閉。本來是應當稱爲Buttermilch（酸牛奶*）的波仁，終究沒有變成政治活動家，

*Buttermilch 是波仁底真姓。我在本書第一版內翻譯恩格斯這一段話時，犯了一個錯誤，因爲我當時不是把 Buttermilch 一字當作私有名詞看待，而是把它當作普通名詞看待。這個錯誤當然給了孟什維克們非常多的樂趣。科里堅夫曾發表論文說我『加深了恩格斯』（該文曾轉載於兩年以來文集內），普列漢諾夫至今還在同志報上提起這個錯誤，——總而言之，他們找到了一種絕妙的緣由來抹煞德國一八四八年工人運動中有兩個趨向存在的問題，一個是波仁（是我國經濟派底同胞兄弟）底趨向；另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底趨向。利用論敵底錯誤，——即令是關於波仁姓名問題的錯誤，——原是自然的事情。但利用糾正譯文的手段來抹煞關於有兩個策略存在這一問題底本質，却就是表明自己害怕涉及爭論實質了。（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却成了一個小小的瑞士教授，他現在不是把馬克思譯成行會的文字，而是把溫和的勒南譯成甜蜜的德文』。

你們看，恩格斯就是這樣來估計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的！

我們的新火星派也是用發瘋發狂的熱心傾向於『經濟主義』，而博得君主派資產階級對其『省悟』的褒獎。他們也是把五光十色的人衆糾合在自己周圍，奉承『經濟派』，用所謂『自動性』、『民主主義』和『自治』等等口號來蠱惑拉攏落後的羣衆。他們的工人協會也往往只是存在於他們那個赫列斯塔科夫式的¹¹²新火星報上。他們的口號和決議，也暴露出他們同樣不瞭解『無產階級偉大政治運動』底任務。

寫於一九〇五年六七兩月間。一九〇五年七月在日內瓦初次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一至一一九頁。

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

農民運動在俄國現今民主革命中的巨大意義，是所有社會民主黨刊物千番百次解釋過了的。大家知道，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對於這個問題通過有專門的決議，更加確切地規定覺悟無產階級黨全黨對於目前農民運動的活動方針，並將這種活動統一起來。雖然這個決議是預先準備好了的（第一個草案發表於本年三月十日（公曆二十三日）的前進報第十一期上），雖然它早已由力求把俄國社會民主黨全黨中間確定了的觀點表述出來的黨代表大會仔細考慮過了，但它終究引起了俄國境內許多工作人員同志方面的疑惑。薩拉托夫委員會一致認為這個決議不能接受（見無產者報第十期）。我們當即表示願意得到他們對這一評判的解釋，但可惜這種願望至今未獲實現。我們只知道，薩拉托夫委員會認為新火星派代表會議的土地問題決議也是不能接受的，可見，它所不滿意的是這兩個決議共同的地方，而不是它們不同的地方。

一位莫斯科同志寫給我們的一封信（用膠版印成傳單出版），是關於這個問題的新材料。現在把此信全文轉錄如下：

『致中央委員會和農村工作同志們的一封公開信』

同志們！莫斯科委員會所轄的州區組織，已在農民中間直接開始進行工作了。但因缺乏組織這種工作的經驗，因為我國中部農村情形方面有許多特點，又因為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上對這一問題的指令不大明確，以及在定期刊物和一般刊物上幾

乎完全缺乏農運工作問題的參考材料，所以我們不得不請求中央給我們寄來原則性質和實踐性質的詳細指令，並請求你們各位担任同樣工作的同志，把你們從經驗中得到的那些實際材料通知給我們。

我們認為必須把我們讀到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對農民運動的態度』的決議時所發生的疑惑，以及我們已開始在我們這裏的鄉村中實行的組織計劃告訴給你們。

「（甲）要在廣大民衆中間進行宣傳，說社會民主黨力求用最積極辦法贊助農民所主張的一切改良農民狀況的革命設施，直到沒收地主、官廳、教堂、寺觀和皇室地產爲止」（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

這一條中首先沒有說清楚的，就是黨的組織究應怎樣進行宣傳的問題。爲了進行宣傳，首先就要有一種很接近於所想施以宣傳的那些羣衆的組織。農村無產者委員會是否就是這樣的組織，或是可能還有其他一種組織方法來進行口頭和書面的宣傳，這是一個尙未解決的問題。

所謂實行積極贊助的諾言也是如此。贊助，——何況是積極贊助，——也只有在地有了組織時才可辦到。『積極贊助』的問題，我們根本覺得是極端模糊的。社會民主黨能否贊助沒收用機器以及高度農藝方法等等來實行深耕的地主農場上的土地呢？把這些土地轉交小資產階級私有者，——雖說改善他們的狀況是很重要的，——按各該農場在資本主義方面的發展說，就會是大退一步。所以我們認為，我們既不失爲社會民主黨人，就應當在規定『贊助』的這個條文裏作如下的保留條件：『如果把這些地產沒收來交歸農民（小資產階級）所有的辦法，將是保證各該地產上的農場發展的一種更高形式的話』。

其次：

『（丁）力求把農村無產階級單獨組織起來，把它與城市無產階級在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下統一起來，把它的代表加進到農民委員會中去』。

引起懷疑的是本條最後一句。問題在於『農民聯合會』一類的資產階級民主組織，以及社會革命黨人一類的反動空想主義組織，是在自己的旗幟下把農民中間的資產階級份子和無產階級份子一同組織起來的。我們把農村無產階級組織底代表加進這樣的『農民』委員會，就會是自相矛盾，就會和我們對於聯盟問題等等的觀點相矛盾。

這裏我們覺得必須加些修正，而且是些很重大的修正。

這就是我們對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所提出的一些普遍性的意見。希望大家立刻來詳細加以分析。

講到在我們州區組織中建立『農村』組織的計劃問題時，就要指出我們是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所全未說及的那種條件下工作的。首先必須指出，我們活動的區域——莫斯科省以及與它接壤的隣省各縣——主要是從事於大工業的區域，其中手工業發展程度較為薄弱，專門從事農業的居民為數甚少。這裏有一萬至一萬五千工人操作的巨大工場，也有五百至一千工人操作而散處於偏僻鄉村的細小工廠。看起來，在這樣的條件下，社會民主黨一定是能在這裏找到最適宜的工作基地的了，但實際情形表明，這種輕率的設想是不值一駁的。雖然某些工廠已存在了四五十年之久，但是直到現在，我們的『無產階級』絕大多數還沒有和土地斷絕關係。『鄉村』把無產階級束縛得非常厲害，所以『純粹』無產階級集體勞動過程中所造成的一切心理等等的前提，在我們的無產階級中間是沒有發展起來的。我們的這些『無產者』底農場，是一種混血的東西。工

廠中的職工僱人去耕種他的一小塊土地。他的妻子（如果她不在工廠中工作），兒女，老年人，殘廢人，也在這塊土地上工作，而他自己年老，受了損傷或因粗暴或危險行爲而被逐出工廠的時候，也要到這裏來工作。這樣的『無產者』是很難稱呼爲無產者的。他們按經濟地位來說是些赤貧漢，按觀念形態來說是小資產者。他們毫無學識，思想保守。『黑幫』份子就是從他們中間募集得來的。但近來他們也漸漸覺醒起來了。我們經過『純粹』無產階級的線索，實行把這些愚昧羣衆從歷來沉夢中喚醒過來，而且是不無成績的。線索增加着，有的地方鞏固起來，無論工廠或鄉村中的赤貧漢都漸漸受到我們的影響，接受我們的思想。我們以爲在非『純粹』無產者羣衆中間成立組織，不會是不合正統的。我們沒有別的羣衆，如果我們堅持正統原則，只組織農村『無產階級』，那我們就得解散我們的組織以及與我們接近的那些組織。我們知道，我們對於那種渴望沒收地主所荒廢了的耕地和其他地塊，以及渴望沒收僧侶所不能好好經營的土地的心理，是碍難反對的。我們知道，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從『民主的』帝制派（在盧仔縣有這樣的派別）起，直到『農民』聯合會止，都會同我們爭奪對於『赤貧漢』的影響，但我們却要武裝後者去反對前者。我們要利用州區所有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無論是知識份子或無產階級工人份子，來設立和鞏固我們由『赤貧漢』組織的社會民主黨委員會。我們進行這一工作的計劃如下。我們在每個縣城或巨大工業中心，都要建立直接隸屬於州組織的縣委員會。縣委員會在本區域內，除設立工廠委員會以外，還要建立『農民』委員會。這種委員會爲保守祕密起見，人數不應很多，其成份應以最有革命情緒和很有材幹的貧苦農民爲限。凡是既有工廠工人，又有農民的地方，都必須把兩者組織在一個支部委員會中。

這樣的委員會首先就應當詳細認識當地的實際情形：（第一）土地關係：（甲）農民份地，租地，土地佔有制（公社佔有制，農戶佔有制等等）。（乙）周圍所有的土地：（子）何人所有；（丑）多少土地；（寅）農民對這些土地的關係怎樣；（卯）使用這些土地的條件：（1）工役，（2）為租用『割地』而繳納的過高的租金等等；（辰）積欠富農和地主等等的債務。（第二）賦稅，農民土地和地主土地課稅的高度。（第三）季候工作和手工業，護照，有無冬季僱傭¹¹³等等。（第四）當地的工廠作坊以及其中的勞動條件：（甲）工資，（乙）工作時間，（丙）管理機關對待工人的態度，（丁）居住條件等等。（第五）行政人員：地方官，村長，保正，鄉審判官，巡警，牧師。（第六）地方自治局：農民代表，自治局所屬的小學教員和醫生，圖書館，學校，茶館。（第七）鄉民大會：成份及其主管事宜。（第八）組織：『農民聯合會』，社會革命黨人，社會民主黨人。

社會民主黨農民委員會查明這些情形後，必須在鄉民大會上通過剷除各種不良現象的決議。同時，這種委員會應在群眾中間加緊社會民主黨思想的宣傳鼓動工作，組織各種小組，飛行集會，群眾大會，散發傳單和書籍，募集供黨需要的經費，經過縣支部去與州黨部發生關係。

只要我們能夠建立許多這樣的委員會，那社會民主黨底成功就會有保證了。

州組織員啓』

我們當然不會負責製定這位同志所說的種種詳細的實際的指令，因為這是當地工作人員以及擔任實際領導工作的俄國中央機關底事情。我們只打算利用這位莫斯科同志寄來的一封信內容豐富的

信，來解釋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和黨底一般迫切任務。從信裏可以看見，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所引起的誤會，只有一部份是由於理論上懷疑的結果。引起這些誤會的另一個原因，是一個新的，先前沒有發生過的問題，即『革命農民委員會』和在農民中工作的『社會民主黨委員會』相互關係的問題。單是提出這一問題的事實，也就證明社會民主黨在農民中間的工作已有重大的進步。現在成爲迫切問題的，已是一些較爲細小的問題，是由於『農村』鼓動工作已開始鞏固起來而具有固定形式時的種種實際需要所引起的問題。來信的作者屢次忘記，他責備代表大會決議意思模糊的地方，其實是尋求黨代表大會所沒有提出，而且也不能提出的那種問題的答案。

例如，來信作者所說『只有』在當地建立了組織時才能宣傳我們的思想和贊助農民運動這一意見，是不完全正確的。自然，這種組織是我們所很願意有的，而且在工作擴大的情形下是必要的，但上面所講的那種工作，即使在沒有這種組織的地方，也是可以進行，而且必須進行的。我們甚至單是在城市無產階級中間進行時，都絲毫不應忽視農民問題，而應宣傳第三次代表大會代表覺悟無產階級政黨全體所作的聲明，即我們贊助農民起義的聲明。必須經過宣傳品，經過工人，經過特別組織等等來使農民知道這點，必須使其知道，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極力實行這種贊助，是要一直做到沒收土地（即是無報酬地剝奪私有主的土地）爲止的。

來信作者在這裏提出了一個理論問題：是否要用特別保留條件來限制把沒收來的大地產交歸『農民小資產階級所有』的要求。但作者提出這個保留條件，就是自行縮小了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底意義。決議上一句話也沒有說，社會民主黨應該贊助把沒收來的土地交歸小資產階級私有者掌握。決議上說：我們贊助農民，『直到沒收土地爲止』，即是直到無報酬地奪取土地爲止，但奪來的土地究應

交給誰的問題，在決議上是完全沒有解答的。大會把這個問題留作懸案，並不是偶然的：從前進報（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等期）的文章上可以看見，預先來解答這個問題是很不合理的。例如，在那裏說過，在成立民主共和國的條件下，社會民主黨是不能預先拒絕土地國有，而自縛手足的。

的確，我們與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人相反，認為現在最重要的，是農民起義底革命民主方面，以及把農村無產者特別組織成爲階級政黨的問題。現在問題底實質，並不在於規定一些『平分』土地和實行土地國有的空洞計劃，而是要使農民瞭解並實行用革命手段來破壞舊的制度。所以社會革命黨人強調『社會化』等等，而我們則強調革命農民委員會：我們說，沒有革命農民委員會，一切改造都是空的。只有協同它們一起鬥爭，只有倚靠着它們，才能使農民起義獲得勝利。

我們應當極力幫助農民起義，直到沒收土地爲止，——但決不是直到規定一切小資產階級空洞計劃爲止。當農民運動是革命民主的運動時，我們是贊助農民運動的。我們準備着（現在，立刻準備着），當它一旦變爲反動的運動，反無產階級的運動時，就去和它作鬥爭。馬克思主義底全部實質就在於提出這一雙重任務，而只有不瞭解馬克思主義的人，才能把這一雙重任務簡單化，或把它降低爲單一和簡單的任務。

我們舉一個具體例子來說吧。假定農民起義勝利了。革命農民委員會和臨時革命政府（它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倚靠這些委員會的）能實行沒收任何大地產。我們是主張沒收的，這點我們已經聲明過了。但我們那時主張把沒收來的土地交給誰呢？這裏我們並沒有自縛手足，而且永遠也不會用來信作者所輕浮提出的那些主張來自縛手足。作者忘記了，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那個決議中同時說道：必須把『一切反動的混雜成分從農民運動革命民主內容中清除出去』，

這是第一；第二：必須『在一切場合和一切情況下獨立組織農村無產階級』。這就是我們的指令。農民運動始終含有一種反動的混雜成分，我們也就要預先向這種混雜成分宣戰。農村無產階級和農民資產階級的階級對抗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也就要預先把它揭露出來，把它說明清楚，並準備去應付這個對抗所引起的鬥爭。把沒收來的土地交給誰，以及怎樣給法的問題，很有可能成爲引起這個鬥爭的一個緣由。我們並不去模糊這個問題，並不約許什麼平均分配，『社會化』等等，而是說：那時我們還要鬥爭，又要鬥爭，在新的戰場上聯合另一些同盟者去鬥爭；那時我們一定是和農村無產階級，全體工人階級一起去反對農民資產階級。在實踐上，這種辦法，在盤剝制，農奴制的大地產佔優勢，而實現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的物質條件尚未具備的地方，可能是使土地轉歸小私有農民階級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勝利的條件下，便會是實行國有化；再就是把巨大資本主義地產轉交給工人協會，因爲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恰巧是依照我們的力量爲標準，依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爲標準，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停頓的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如果我們不立即約許各種各樣的『社會化』，那就是因爲我們知道實現這個任務底真正條件，我們並不去模糊現在農民內部成熟着的新的階級鬥爭，而是要揭露這個鬥爭。

起初我們用一切方法贊助一般農民反對地主到底，一直到沒收地主土地爲止，然後（甚至於不是然後，而是同時）我們就贊助無產階級去一般地反對農民。現在來計算革命（民主革命）以後『翌日』農民內部力量的配合，那就是無謂的空想。我們決不陷於冒險主義，決不違背自己的科學良心，決不追求便宜的聲譽，所以我們只能說，而且只是說一點：我們將用全力幫助全體農民去實現民主革命，以使我們無產階級黨更易於儘快過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務，即

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並不約許說，從現今農民起義勝利時起就會有什麼協和，什麼均等，什麼『社會化』；恰巧相反，我們是『約許』新的鬥爭，新的不平等，以及我們所力求實現的那個新革命。我們的學說並不如社會革命黨人所說的童話那樣『甜蜜』，如果有人只想吃些甜蜜的東西，那就請他到社會革命黨人那裏去吧；我們會向這樣的人說：請你們去吧。

我們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觀點也就解答了委員會問題。我們認為，社會民主黨的農民委員會，是不應有的：如果是社會民主黨的，就不會只是農民的；如果是農民的，就不會純粹是無產階級的，不會是社會民主黨的。有很多人愛把這兩件事混為一談，但我們不是這樣的人。凡是有可能的地方，我們都力求組織我們自己的委員會，社會民主工黨的委員會。加入這些委員會的也有農民，也有赤貧漢，也有智識份子，也有娼妓（不久前，一個工人寫信來問我們說，為什麼不到娼妓中去進行鼓動），也有兵士，也有小學教員，也有工人，——總而言之，有全體社會民主黨人，而沒有一個不是社會民主黨人的人。這些委員會將從各方面儘量開展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同時又力求把農村無產階級特別組織起來，因為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底階級政黨。若以為把尚未完全脫離各種舊制殘餘的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是幹『不合正統』的事情，那就是極大的錯誤，所以我們很願意把信上說及這個問題的地方當作只是由於誤會的結果。城市工業無產階級必然是我們社會民主工黨底基本核心，但我們應按黨綱上所說的那樣，把所有一切被剝削勞動份子，包括手工業者，赤貧漢，乞丐，僕役，流浪者以及娼妓在內，都吸收到我們黨周圍，啓發他們，組織他們，——當然是在一個絕對必要的條件下，就是要他們來歸附社會民主黨，而不是要社會民主黨去歸附他們，要他們轉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而不是要無產階級轉到他們立場上去。

這與革命農民委員會有何相干呢？——讀者會這樣問道。那就是說革命農民委員會是不需要的麼？不，它們是需要的。我們的理想，是要在鄉村裏到處都成立純粹社會民主黨的委員會，然後就使它們與農民中間所有一切革命民主份子，集團以及小組締結協定來組織革命委員會。這與社會民主工黨在城市中保持獨立並為起義目的而與一切革命民主份子結成聯盟的情形，完全相似。我們主張農民起義。我們絕對反對把各種不同的階級成份和各種不同的政黨混淆起來，溶合起來。我們認為，為了起義目的，社會民主黨應推動全體革命民主份子，幫助他們全體組織起來，與他們肩並肩地——但決不和他們混合起來——在城市的街壘中實行作戰，在鄉村中一同去反對地主和警察。

城鄉民衆反對專制制度的起義萬歲！現今革命中全部革命民主勢力先鋒隊的革命社會民主黨萬歲！

一九〇五年九月十四日（舊曆九月一日）

刊載於無產者報第十六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二

〇七至二一五頁。

莫斯科起義底教訓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一九〇六年莫斯科版）一書的出現，是再適時不過的了。領會十二月起義底經驗，是工人政黨底迫切任務。可惜，這本書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其材料雖不完備，倒也極有趣味，但其結論却是異常潦草，異常庸俗。關於這些結論我們還要專門來講，現在祇說說現時的政治迫切問題，即莫斯科起義底教訓。

莫斯科十二月運動底主要鬥爭方式是和平的罷工與示威。工人羣衆大多數所積極參加過的祇是這種方式的鬥爭。然而正是莫斯科十二月的發動十分顯著地表明了，總罷工已不復是獨立和主要的鬥爭方式，運動以其不可遏止的自發力量衝破這種狹隘範圍，而產生出更高的鬥爭方式，即武裝起義。

一切革命政黨和莫斯科所有一切工會在宣佈罷工時，已經意識到，甚至感覺到罷工不可免地要轉變爲起義。十二月六日，工人代表蘇維埃通過決議，說『要努力使罷工變爲武裝起義』。但是事實上所有一切組織對於這件事情都未曾準備妥貼，甚至戰鬥隊聯合委員會說到（是在十二月九日呵！）起義，也好像是說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所以巷戰無疑是繞過它，沒有它來參加進行的。各種組織都落後於運動底發展程度和規模。

罷工發展爲起義，首先是由十月以後形成的客觀條件所促成。總罷工已不能使政府張惶失措，政府已組織好了預備去作軍事行動的反革命勢力。十月以後的俄國革命總進程以及莫斯科十二月事變經過情形，都十分顯然地證實了馬克思底深刻原理之一：革命是以

造成團結堅固的反革命而前進的，即是說，革命迫使敵人採用日趨極端的防衛手段，同時自己也定出日益強烈的進攻手段。

十二月七八兩日：和平罷工，和平羣衆示威。八日晚上：包圍亞克瓦留姆戲院¹¹⁴。九日白天：龍騎隊在斯特拉斯奈廣場毆打人羣。晚上——費得列爾房屋被搗毀。民情鼎沸。街上的無組織的人羣，完全是自發而不自信地建築起第一批街壘。

十日：砲隊開始向街壘及街上的人羣射擊。街壘建築動作已成爲很自信的了，已經不是單個的，而顯然是大批的了。全體居民都跑到了街上：全城主要中心地點都佈滿了街壘。在幾天以內，戰鬥隊員與軍隊間進行着頑強的游擊鬥爭，結果使軍隊疲憊不堪，而使杜巴索夫¹¹⁵不得不乞求援兵。直到十二月十五日，政府軍隊才佔有完全的優勢，而十七日謝米諾夫團才把起義底最後一個據點勃列斯尼亞區擊破。

由罷工示威進而建築單個街壘。由單個街壘進而築成大批街壘，再進而與軍隊進行巷戰。無產階級的羣衆鬥爭繞過各個組織而由罷工進到了起義。這就是俄國革命由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事變中獲得的最大的歷史成果，——這種成果，亦如從前所有一切成果一樣，是用極大犧牲代價換來的。運動從總政治罷工升到了更高的階段。它迫使反動勢力採用最後抵抗手段，因此就使革命也採取最後進攻手段的時機大大接近起來。反動勢力在砲擊街壘、房屋及人羣後，已是無路可進。革命勢力在莫斯科戰鬥隊員行動後，却還有路可進，無論在廣度或深度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路可走。革命從十二月事變以後果然走向前面很遠了。革命危機底基礎已是更加廣大得無比，——此時刀鋒應當是磨得更銳利了。

因客觀鬥爭條件變更而必須由罷工進到起義的情形，是無產階級比自己領導者們更先感覺到了的。實踐也如向來一樣走在理論前面去了。和平的罷工示威馬上就不復能滿足工人們底要求，所以他們

當時問道：以後又怎樣作呢？——他們要求更積極的行動。建築街壘的指令到達各區已經很遲，當時在中心區已實行建築街壘了。工人們成羣結隊地執行了這種事業，但是這種事業也不能滿足他們了，於是他們又問道：以後又怎樣作呢？——他們要求積極行動。在十二月事變中，我們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領導者很像一個將官那樣把自己的師團佈置得非常荒謬，而使得部下大多數隊伍都沒有積極參加作戰。工人羣衆尋找過實行積極羣衆動作的指令，可是沒有找到。

因此，普列漢諾夫所持的那種爲一切機會主義者樂於援引的觀點是再近視不過的，他說，本來不應開始舉行不合時宜的罷工，『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恰巧相反，本來需要更堅決、更努力和更採取攻勢地動用武器，本來需要向羣衆解釋說：單靠和平罷工是不行的，還必須進行毫不畏懼和毫不留情的武裝鬥爭。而現在我們終究應當公開當衆承認政治罷工是不夠的了，應當在最廣大的羣衆中間號召舉行武裝起義，而不要用任何『預備階段』來掩蓋這個問題，絲毫不要模糊這個問題。向羣衆隱瞞當前發動的直接任務是要進行毀滅性的流血決死戰爭這一點，就會不僅是欺騙自己，而且是欺騙民衆了。

十二月事變第一個教訓就是如此。另一個教訓是關於起義底性質，進行起義的方法，軍隊轉變到人民方面來的條件。在我們黨右翼中，很流行着一種對於這個轉變的極片面的觀點。據說，同現代軍隊作鬥爭是不可能的，而是需要使軍隊成爲革命的軍隊。當然，假令革命不成爲羣衆性的，不是把軍隊也包括在內，也就會談不上什麼嚴重的鬥爭。當然，軍隊中的工作是必需的。但是決不能把軍隊的轉變想像爲一種平常孤單的動作，以爲它不過是一方面由於說服和另一方面由於自覺的結果。莫斯科的起義昭然若揭地向我們指明出這種觀點底呆板性和死板性。其實，在一切真正的人民運動中軍隊發生動搖，是不可避免的，而一到革命鬥爭尖銳化的時候，

就會引起真正奪取軍隊的鬥爭。莫斯科的起義正是向我們指明出反動與革命兩方面爲奪取軍隊而進行的最拚命最殘酷的鬥爭。杜巴塞夫自己聲明過，莫斯科一萬五千軍隊中祇有五千人是可靠的。政府會用五花八門，各種各樣的極端手段來拉住軍隊中間的動搖份子，如說服他們，阿諛他們，用發錶發錢等等手段收買他們，用燒酒麻醉他們，欺騙他們，威嚇他們，把他們禁閉在營房內，解除他們的武裝，藉叛徒與暴力把那些認爲最不可靠的兵士從他們裏面抓去。我們應該有勇氣來爽直公開地承認，在這方面我們是比政府落後了的。我們沒能運用我們當時所有的力量，像政府那樣積極，大胆，勇往直前，採取攻勢地開展和貫徹奪取動搖軍隊的鬥爭。我們準備過，而且還要繼續更堅強地去準備在思想上『影響』軍隊。但是假令我們忘記在起義關頭同樣還需要進行肉體鬥爭來奪取軍隊，那我們就會成爲學究式的可憐虫了。

莫斯科的無產階級在十二月事變時給了我們在思想上『影響』軍隊的卓越教訓，——例如十二月八日在斯特拉斯奈廣場上，有一大羣人把哥薩克軍隊包圍住，同軍隊混成一團，同他們實行聯歡，結果是使他們開轉回去了。或如，十日在勃列斯尼亞街上，有兩個青年女工，在成萬的人羣中打起紅旗，衝向哥薩克軍隊，大叫道：『打死我們吧！我們活着是不會交出旗幟的！』於是哥薩克就茫然失措，而在人羣高呼『哥薩克萬歲！』聲下馳往一旁了。這些剛毅英勇的模範，將深深印入無產階級意識而永誌不忘。

但是，請看我們落後於杜巴塞夫的例子。十二月九日，有些兵士沿大謝爾普合夫街行進，唱着馬賽曲，要想法聯合起義者。工人們派遣代表到他們那裏去。馬拉哈夫¹¹⁶親身騎馬拚命馳往他們那裏。工人們到遲了，而馬拉哈夫却及時趕到了。他發出了熱烈的演說，他動搖了那些兵士，他用龍騎隊包圍了他們，把他們送回營房中禁閉起來了。馬拉哈夫及時趕到了，而我們却沒有來得及，雖然

在兩天之內就有了十五萬人按我們的號召起來鬥爭，本有可能並且應當在街道上佈置巡哨。馬拉哈夫用龍騎隊包圍了兵士，而我們却不曾用炸彈隊來包圍馬拉哈夫輩。我們當時能夠而且應當這樣做，何況社會民主黨的刊物早已（在舊火星報上）指出，在起義時期，我們應當毫不留情地來誅滅民政長官與軍事長官。在大謝爾普合夫街所發生過的事件，顯然是在涅斯菲錫營房前，在克魯吉茨基營房前，在無產階級企圖『拉攏』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團時，在派遣代表到亞歷山大洛夫城工兵隊去時，在那被派到莫斯科去的羅斯托夫的砲隊中途開轉回去時，在科倫姆娜工兵隊被解除武裝時等等，都曾大致重復過。我們在起義關頭，沒能好好執行奪取動搖軍隊的任務。

十二月事變又很顯明地證實了馬克思另一個爲機會主義者所遺忘了的深刻原理。馬克思寫道，起義是藝術，這個藝術底主要法則就是要拚命勇敢，堅決直前地進攻。我們自己沒有充分領會這一真理。我們自己沒有充分學習，沒有充分教導羣衆學習這一藝術，這一無論如何都要實行進攻的法則。現在，我們應用全力來彌補我們的缺陷；單按人們對政治口號的態度來區別他們已是不夠的了，還必須按人們對武裝起義的態度來區別他們。誰反對武裝起義，誰不去準備武裝起義，誰就該被我們毫不留情地從革命隊伍中驅逐出去，驅逐到革命敵人那裏去，驅逐到叛徒或懦夫那裏去，因爲事變力量和鬥爭環境迫使我們按照這一標誌來辨別友敵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我們所應該鼓吹的不是消極，不是單純地去『等待』軍隊『轉過來』，——不是的，我們應當大聲疾呼地說，必須手執武器，大胆實行進攻與進擊，同時必須誅滅首長人物，並最堅決地進行奪取動搖軍隊的鬥爭。

莫斯科所給予我們的第三個偉大教訓，就是關於起義的戰術及起義力量的組織。軍隊戰術是依軍事技術的水準爲轉移，——恩格斯把這一真理再三咀嚼後，喂到了馬克思主義者口裏。現在軍事技術已不是如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那樣。用人羣的行動，拿着手鎗防守

街壘來反對大砲，是再蠢笨不過的了。考茨基曾說得正確，在莫斯科事變後，已經是要重新審查恩格斯底結論了，因為莫斯科提出了『新的街壘戰術』。這個戰術就是游擊戰爭的戰術。由這個戰術決定的組織，就是動作靈活，人數極少的隊伍，如十人團，三人團，甚至兩人團。現時在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常有一些人一聽說五人團，三人團，就要唏唏冷笑起來。但是這種唏唏冷笑，不過是把現代戰爭技術下巷戰所提出的戰術與組織的新問題抹煞下去的一種便宜辦法罷了。先生們，你們細讀一讀關於莫斯科起義的記述，就會懂得『五人團』與『新的街壘戰術』問題有何聯繫了。

莫斯科雖已提出這個新戰術，但遠未加以發揮，遠未擴展到若干廣泛的真正羣衆的範圍中去。當時戰鬥隊員太少，工人羣衆沒有得到勇敢進攻的口號，也沒有實行這個口號，游擊隊底性質還過於千篇一律，它們的武器與它們的做法尙不充分，它們領導人羣的能力還幾乎沒有發展。我們應當填補這一切缺陷，而且定能填補這一切缺陷，爲此就要研究莫斯科的經驗，把這一經驗散佈到羣衆中去，鼓舞羣衆自身在繼續發展這一經驗方面的創造性。而俄國各地十二月事變以後幾乎沒有間斷進行的那種游擊戰爭，那種羣衆恐怖手段，定能幫助我們教導羣衆在起義時採取正確的戰術。社會民主黨應當承認這種羣衆恐怖手段，並把它採納到自己的戰術中去，當然要加以組織，加以監督，使其服從於工人運動及一般革命鬥爭底利益和條件，要毫不留情地把敗壞這種游擊戰爭而爲莫斯科人在起義時日以及拉脫維亞人在所謂拉脫維亞共和國¹¹⁷時日正大光明，毫不留情地懲治過的『流氓』舉動排除消滅。

最近軍事戰術又有了新的進步。在日俄戰爭中出現了手榴彈。兵工廠製造自動槍出售。這兩種武器都已開始在俄國革命中有成效地運用着，但運用的範圍還千萬不夠。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去利用革新了的技術，教育工人隊大批製造炸彈，幫助他們以及我們的戰鬥

隊去儲存炸藥，引火線與自動槍。在工人羣衆參加城市起義的條件下，在向敵人舉行大規模進攻的條件下，在堅決巧妙奪取那自杜馬以來，自斯維亞波爾格與喀琅施塔得事變¹¹⁸以來愈見動搖的軍隊的條件下，在保證農村一定參加總鬥爭的條件下，下次全俄武裝起義中的勝利定會屬於我們的！

讓我們本着對俄國革命偉大時日教訓的理解來更廣泛地開展我們的工作，更勇敢地規定我們的任務吧。我們的工作是以正確估計現時階級利益與全民發展要求爲基礎。在推翻沙皇政權並由革命政府召集立憲會議的口號周圍，我們正在團結並會繼續團結一批一批的無產階級羣衆，農民與軍隊。發展羣衆底自覺性，現在亦如任何時候一樣，依然是我們全部工作底基礎和主要內容。然而不要忘記，除了這個總的、經常的基本的任務外，俄國現今所處的這種時局還提出了一些特殊的專門的任務。我們決不要變成學究與庸人，我們決不要以空洞無謂地援引我們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是永遠不變的責任來推却現今時局中的這些特別任務，推却現今鬥爭形式中的這些特殊任務。

我們要記着，偉大的羣衆鬥爭快到了。這將是武裝起義。它應當儘可能同時發動起來。羣衆應當知道，他們是去作流血拚命的武裝鬥爭。視死如歸的精神應當在羣衆中散佈起來，以保證勝利。向敵人進攻應當是最奮勇的；應成爲羣衆口號的是進攻，而不是防守，他們的任務是要毫不留情地殲滅敵人；鬥爭組織應當是機動而靈活的；軍隊中的動搖份子將被捲入積極鬥爭。覺悟的無產階級黨應當完成它在這個偉大鬥爭中的職責。

一九〇六年九月十一日（舊曆八月二十九日）刊載於無產者報第二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一卷，第一四五至一五二頁。

論抵制

左翼社會民主黨人應當把抵制國家杜馬的問題重新審查一下。應該記着，我們向來都是依據一定的政治局勢而具體提出這個問題的。例如，我們在無產者報（日內瓦出版）上就已寫過，如果布里根杜馬真能誕生出來，那末『甚至對於布里根杜馬，也是決不可預先拒絕利用的』。至於維特杜馬¹¹⁹，那末在國家杜馬與社會民主黨一書（列寧與唐恩兩人論文集）中所載的列寧論文內已經說過：『我們絕對應當從新來切實討論策略問題… 現在局勢已經改變』而不像布里根杜馬時期那樣了（見該書第二頁）。

革命社會民主派與機會主義社會民主派在抵制問題上的主要區別是如下述。機會主義者對於一切情況，都局限於運用從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特殊時期模印下來的籠統的樣板。我們應當利用代議機關，——杜馬是代議機關，——所以抵制就是無政府主義，而必須參加杜馬。我們的孟什維克，特別是普列漢諾夫對於這個問題的推論，總是限於這樣幼稚簡單的三段論法。孟什維克論代議機關在革命時代意義的決議（參看黨內新聞第二期），非常明顯地表明出了他們的推論所含有的這種刻板的，反歷史的性質。

反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問題重心正是要仔細估計具體政治局勢。決不能把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的教訓忘掉，而片面地

抄襲德國事變最後一個時期的樣板來概括俄國革命時代的任務。假令局限單只把『無政府主義』抵制的策略和社會民主主義參加選舉的策略對立起來，那就絲毫不能瞭解我國革命底進程。先生們，請你們向俄國革命歷史去學習學習罷！

這個歷史證明了，抵制布里根杜馬的策略是由事變完全證實了的唯一正確策略。誰忘記這一點，誰迴避布里根杜馬的教訓（如同孟什維克常常迴避這些教訓一樣）而暢談抵制，那他就是完全暴露自己思想貧乏，而不能說明，不能估計俄國革命中最重要，事變最豐富的一個時代。抵制布里根杜馬的策略既正確地估計到了革命無產階級底情緒，又正確地估計到了那些使總爆發關頭必定迅速到來的客觀時局特點。

現在我們來說第二個歷史教訓，即立憲民主黨的維特杜馬所給予我們的教訓。現在關於抵制這個杜馬的問題，很廣泛地散佈着社會民主主義智識份子的懊悔言論。他們認為，單就維特杜馬確實召集成功，而且無疑是間接幫助過革命的事實來說，就應悔悟我們抵制維特杜馬這一策略底錯誤了。

但這是一種極端片面，極端近視的觀點。這種觀點沒有估計到維特杜馬以前時代，以及在它存在時期和解散之後的許多異常重要的事實。要記得，這屆杜馬選舉法是十二月十一日，即是在爭取立憲會議的起義羣衆舉行武裝鬥爭的時候公佈的。要記得，當時甚至孟什維克的開端報也寫過：『無產階級也會像掃除布里根杜馬那樣把維特杜馬掃除掉的』。在這樣的條件下，無產階級是不可以，而且不應當不經鬥爭就把召集俄國第一屆代議機關的事情讓給沙皇的。無產階級當時應當進行鬥爭，反對拿維特杜馬作担保取得借款來鞏固專制制度的辦法¹²⁰。無產階級當時應當進行鬥爭，反對一九〇六年春天立憲民主黨選舉運動和農民中間選舉所完全賴以進行的那種憲制幻想。當一般人極力誇大杜馬意義的時候，這種鬥爭是

只能用抵制手段來進行的。憲制幻想的流行是與一九〇六年春天參加選舉運動和參加選舉的事實緊相聯繫的，當時我們那些孟什維克底行爲就是極鮮明的例證。例如，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統一的）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中，不顧布爾什維克如何警告，竟把杜馬稱爲『政權』！另外一個例子：普列漢諾夫簡直毫不躊躇地寫道：『政府如果驅散杜馬，那它自己就會墜落到無底深淵裏去』。而我們當時爲駁斥普列漢諾夫而發表的言論，即認爲要準備去把敵人打落到無底深淵裏去，而不要像立憲民主黨人那樣希望他自行『墜落』到深淵裏去等語，是很快就證實了的。

當時無產階級應當用全力來堅持它在我國革命中的獨立策略，即是：同覺悟的農民一起反對動搖的和叛變的君主派的自由資產階級。而這個策略，在實行參加維特杜馬選的條件下，就會無法實行，因爲當時許多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使參加選舉的行動，對於俄國絕大多數地方說來，都是等於工人政黨默然贊助立憲民主黨人。無產階級當時不可以，而且不應當採取半途性的，勉強臆想出來的，出於『機巧』與忙亂的策略，不知爲着什麼而參加選舉的策略，即參加杜馬選舉運動而不是爲實行選舉杜馬代表的策略。當時孟什維克中間任何一個人，甚至普列漢諾夫，也不能在刊物上號召參加杜馬，這是一件毫無疑義的歷史事實，無論孟什維克怎樣隱諱，怎樣迴避，怎樣設詞推諉，也無法推翻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當時在刊物上沒有發出過一個參加杜馬的號召；誰也不能否認，當時孟什維克自己也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中央委員會的傳單上正式承認了抵制，而只是把爭論點歸結於究應在那一個階段上實行抵制。誰也不能否認，孟什維克當作問題重心的，並不是杜馬選舉，而是選舉運動本身，甚至只是選舉過程，把選舉過程當作是爲起義，爲掃除杜馬而進行的組織。然而，事變却證明了在選舉時

進行羣衆鼓動恰恰是不可能的，而祇有從杜馬內部進行羣衆鼓動，才是有某些可能的。

誰真正注意到，估計到這些客觀性和主觀性的複雜事實，誰就會知道高加索的情形祇是證實了一般規例的例外；誰就會知道，那些表示懺悔，說什麼抵制手段是出於『青年鬥志』的言論，實在是對事變所作的一種最狹隘，最膚淺，最近視的估計。

現在，杜馬被解散的事實已經顯然表明，在一九〇六年春天條件下實行抵制，一般說來，無疑是正確的，而且是有過益處的策略。在當時情況下，社會民主黨祇有採用抵制手段，才能執行自己的責任：就是要給人民一個關於沙皇憲制的必要警告，以及對於立憲民主黨人在選舉時所玩欺詐把戲的必要批評，而這種警告與批評是杜馬被解散的事實所燦爛證實了的。

且舉一個小小的例證來說明以上所說的話。半立憲民主黨人兼半孟什維克渥多渥作夫先生，在一九〇六年春天是極力主張參加選舉，主張贊助立憲民主黨人的。昨天（八月十一日）他在同志報上寫道，立憲民主黨人『曾想在沒有國會的國家中做一個國會黨，想在沒有憲法的國家中做一個憲制黨』，『急進的政綱與全不急進的策略間的根本矛盾，也就決定了立憲民主黨底全部特性』。

左派立憲民主黨人或右派普列漢諾夫份子所作的這種自供，要算是布爾什維克所獲得的一種再大不過的勝利了。

我們雖然無條件地責斥那種怯懦而近視的懺悔論調，責斥那種認為抵制手段是出於『青年鬥志』的蠢笨說法，但是我們絲毫也不想否認立憲民主黨杜馬所給予我們的一些新的教訓。害怕公開承認和估計這些新的教訓是十分迂腐的。歷史已經表明：當杜馬召集起來時，就有可能從它內部和在它周圍進行有益的鼓動；和革命農民接近而反對立憲民主黨的策略，在杜馬內部是有可能進行的。看起

來這好像是一種奇談，然而歷史的惡作劇無疑是如此：正是立憲民主黨的杜馬特別顯然向羣衆證明了，這個『反立憲民主黨的』（爲着簡明起見，我們這樣說）策略是正確的。歷史毫不留情地推翻了一切憲制幻想與全部『信任杜馬的心理』，但歷史又無條件地證明了，把這個機關當作進行鼓動，當作揭露各政黨底真正『內臟』等等的講台，是於革命有某些——雖然很微小——益處的。

由此就應得出如下的結論。閉眼不看事實，是很可笑的。現在恰恰到了革命社會民主黨人應該放棄抵制主義策略的時候了。當第二屆杜馬真正召集（或者說：如果召集）起來的時候，我們就不拒絕參加第二屆杜馬。我們不會拒絕利用這個鬥爭舞台，但是決不誇大它所有的那種很微小的意義，恰巧相反，我們將根據歷史所給予我們的經驗，來使它完全服從於另一種方式的鬥爭，即用罷工和起義等等手段進行的鬥爭。我們要召集第五次黨代表大會；我們要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議決，在一旦進行選舉時，必須同勞動派成立幾個星期的選舉協定（不召集第五次黨代表大會，就無法進行和衷共濟的選舉運動，而『與其他政黨實行聯盟』又是第四次代表大會決議絕對禁止的）。那時，我們就能把立憲民主黨完全擊破。

但是這個結論還遠沒有詳盡說明擺在我們面前的複雜任務。我們故意着重指出『在一旦進行選舉時』等等。我們還不知道，第二屆杜馬是否會召集起來，選舉將在什麼時候舉行，選舉制度將是怎樣，那時的局勢將是怎樣。因此，我們的結論也就極端普泛：爲了總結過去，爲了估計這個過去所給予的教訓，爲了正確提出將來的策略問題，這個結論是需要的；但爲了解決最近將來策略方面的具體任務，這個結論却就全然不夠了。

現在，祇有立憲民主黨人和那些『準立憲民主黨人』，才能滿足於這種結論，才能把讚嘆新杜馬的論調變成『口號』，才能勸導

政府火速召集杜馬等等。現在，祇有自覺或不自覺的革命叛徒，才能竭力設法使必不可免的新的革命情緒激動的高潮恰恰表現於選舉，而是不表現於用總罷工與武裝起義手段進行的鬥爭。

於是，我們就說到社會民主黨現時策略問題底關鍵了。現在問題底要點並不在於一般參加選舉與否。現在無論說『參加』或『不參加』，都還是一點也沒有說到當前根本任務的問題。一九〇六年八月的政治情況，在表面上看來，是與一九〇五年八月的情況相似，然而在這一時期內已經有了一大進步：無論是交戰雙方底力量，無論是鬥爭底形式，無論是爲實現某種戰略運動——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所必需的某些期限，都已是更加明確得多了。

政府底計劃是很明顯的。它一方面指定杜馬召集日期，同時又違法地不指定選舉日期，是打算得完全正確的。政府不願自行掣肘，不願洩露自己的計劃。第一，它想藉此贏得時間來考慮變更選舉法的問題。第二，——這是主要的，——它把指定選舉日期這一點留作後備手段，以便應付將來新高潮底性質及其力量可能完全判明的時機。政府想把新的選舉恰恰指定在這樣一個日期來舉行（或許是指定用這樣一種方式來舉行，即舉行這樣或那樣的選舉），以便分散並削弱正在開始的起義。政府很正確地籌劃着：如果今後百事平安，我們也許會完全不召集杜馬，或是恢復布里根法律。如果有強大的運動發生，那就可以用臨時指定選舉日期，藉這種選舉誘騙某些懦夫或愚人離開直接革命鬥爭的手段，來試圖分散這個運動。

自由派的蠢子（參看同志報和言論報）全不懂得實際情況，而自行鑽到政府所佈設的羅網中去。他們拚命『證明』說，必須召集杜馬，最好是把高潮引入選舉軌道。但是甚至他們也不能否認最近鬥爭方式的問題尚待解決。今天的言論報（八月十二日）承認說：『農民在秋天將說什麼話…現時還不知道』。『在九十兩

月之前，即在農民情緒尚未最終表明之前，很難預下什麼普遍斷語』。

自由派資產者底根性始終都是那樣。他們不願而且不能積極幫助選擇鬥爭方式以及把農民情緒確定到某一方面去。資產階級底利益並不要求推翻舊政權，而只要求削弱舊政權，任命自由派內閣。

無產階級底利益要求完全推翻沙皇舊政權而召集全權立憲會議。它的利益要求最積極參預確定農民情緒，選定最堅決鬥爭方式及最適當鬥爭時機的事情。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應取消用革命手段，即經過臨時革命政府來召集立憲會議的口號，或把這個口號模糊起來。我們應當竭力闡明起義條件，即必須使起義與罷工鬥爭匯合起來，並爲此目的而團結並準備一切革命力量等等。我們應當本着十二分堅決精神走上一切革命團體——包括勞動派在內——『聯盟』署名發表的『告海陸軍』和『告全體農民』等著名宣言上所擬定的道路。最後，我們特別要設法使政府無論如何都不能用指定選舉的辦法來分散，停止或削弱正在開始的起義。在這一方面，我們絕對必須領會立憲民主黨杜馬所給予的教訓，即杜馬選舉運動是附屬的次要的鬥爭方式，而主要的鬥爭方式，由於時局的客觀條件的關係，仍舊是廣大民衆底直接革命運動。

自然，這樣使杜馬選舉運動服從於主要的鬥爭，把這一運動放到第二位去應付戰鬥結局惡劣或者戰鬥遷延到第二屆杜馬經驗時止的情勢，——這個策略也許可以稱爲舊的抵制主義的策略。這樣的一種稱呼，在形式上是可以擁護的，因爲所謂『準備選舉』，除了始終必需的鼓動與宣傳工作之外，就無非是些最瑣細的技術準備工作，很少能在選舉以前很久的時候進行。我們不願意去爭論字句，但其實這是舊策略底一貫發展，而不是舊策略底重複；這是由先前那次抵制中得出來的結論，而不是先前那樣的抵制。

讓我來作一總結吧。必須估計立憲民主黨杜馬所給予的經驗，並把它的教訓普及到羣衆中去。必須向羣衆說明杜馬『毫不中用』，立憲會議必須召集，立憲民主黨人動搖不定；必須要求勞動派擺脫立憲民主黨人的束縛，必須贊助前者，反對後者。應當馬上承認社會民主黨必須與勞動派訂立選舉協定以應付將來的新選舉。必須用全力抵抗政府用指定選舉的手段分散起義的計劃。社會民主黨要更加努力擁護自己那些經過了考驗的革命口號，同時應當極力把一切革命的份子與階級緊密團結起來，以便把定會在最近將來發生的羣衆高潮變爲反沙皇政府的全民武裝起義。

寫於一九〇六年八月十二日。

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刊載於

無產者報第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一卷，

第一一八至一二五頁。

革命底教訓

自一九〇五年十月俄國工人階級給了沙皇專制制度第一次強大打擊以來，迄今已有五年了。無產階級在那些偉大的時日，發動了千百萬勞動者去進行反對壓迫者的鬥爭。它在一九〇五年幾個月內爭得了工人數十年來渴望『上司』賜給而沒有得到的那種改良。無產階級爲全俄人民爭得到了——雖然只是暫時地爭得了——俄國空前的出版，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它從自己的前進途中掃除了偽造的布里根杜馬，從沙皇手中爭得了立憲宣言，並且一勞永逸地造成了使政府非有代議機關就不能管理俄國的局勢。

無產階級所爭得的偉大勝利竟是不澈底的勝利，因爲沙皇政權沒有推翻。十二月起義結果遭了失敗，於是沙皇專制政府就隨着工人階級進攻的減弱，羣衆鬥爭的減弱，而把工人階級所獲得的成果相繼奪去了。一九〇六年工人罷工，農民和兵士的風潮雖比一九〇五年薄弱得多，但還是很強大。在第一屆杜馬時期，民衆鬥爭又發展起來，沙皇驅散了第一屆杜馬，但沒有敢於馬上改變選舉法。一九〇七年工人鬥爭更加減弱下去，於是沙皇就把第二屆杜馬驅散，而舉行了國家政變（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違背了他說非經杜馬同意决不頒佈法律的最冠冕堂皇的一切約言，而把選舉法加以改變，使杜馬大多數位置一定會落到地主與資本家，黑幫黨人及其走狗掌握。

革命底多次勝利與失敗，都使俄國人民獲得了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教訓。我們紀念一九〇五年革命第五週年時，便要明白認識這些教訓底主要内容。

第一個和主要的教訓，就是只有羣衆底革命鬥爭，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國家行政制度達到多少嚴重的改良。無論開明人士怎樣『同情』工人，無論單個恐怖者怎樣英勇鬥爭，都不能摧毀沙皇專制制度和資本家專橫勢力。只有工人自己起來鬥爭，只有千百萬羣衆共同鬥爭才能做到這一點，而當這種鬥爭減弱下去的時候，工人所爭得的成果立刻就開始被政府奪去。俄國革命證實了工人國際歌中的語句：

『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
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

第二個教訓，就是僅僅摧壞或限制沙皇政權還不够。必須把它消滅。當沙皇政權尚未消滅時，沙皇所作的讓步總是不可靠的。當革命進攻加強時，沙皇就作些讓步，而當這個進攻減弱時，他就把一切讓步奪回去了。只有爭得民主共和制度，推翻沙皇政權，使政權歸人民，才能使俄國擺脫官僚的強力和專橫，擺脫黑幫黨人和十月黨人的杜馬，擺脫鄉村中地主及其走狗專橫制度。現在革命後農民和工人所遭的不幸比先前更加沈重，就是由於當時革命還嫌軟弱，而沙皇政權沒有推翻的結果。一九〇五年的事變，最初的兩屆杜馬及其被驅散的事實，都給了民衆很多的教訓，首先就是教他們知道必須用共同鬥爭來實現政治要求。民衆覺醒起來參加政治生活，開始是要求專制政府讓步：要沙皇召集杜馬，要沙皇撤換舊的總長，要沙皇『頒賜』普選權。但是專制制度並沒有作這種讓步，而且也不能作這種讓步。專制政府用刺刀回答了請求讓步的行動。於是民衆

開始覺悟到必須進行鬥爭來反對專制政府了。現在斯托雷平和反動老爺杜馬，可說是更加用力把這種覺悟灌進農民腦海中去。他們在努力灌着，並且定會灌進去的。

沙皇專制政府也從革命中間求得了教訓。它已知道不能倚靠於農民相信沙皇的心理了。現在它是與黑幫黨的地主以及十月黨的工廠主訂立聯盟，藉以鞏固自己的政權。現在需要有比一九〇五年更強大得多的革命羣衆鬥爭的攻擊力量，才可推翻沙皇制度。

這種更強大得多的攻擊是否可能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來談談第三個而且是最主要的革命教訓。這個教訓就是我們已看見了俄國人民中各個階級怎樣動作的情形。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有很多人以為全體人民都同樣趨向自由，都願意得到同樣的自由；至少是當時極大多數的人，絲毫也不明白俄國人民中各個階級對於爭取自由的鬥爭的態度各不相同，並且它們所要求的自由也各不相同。革命把疑團吹散了。一九〇五年末，以及後來在第一屆和第二屆杜馬時期，俄國社會所有一切階級都實行公開動作了。他們在實際上表明了自己的面目，暴露了他們的真正趨向，他們究竟能爲什麼而鬥爭，究竟能怎樣堅強，堅忍和努力來鬥爭。

工廠工人，即工業無產階級，進行了反對專制制度的最堅決最頑強的鬥爭。無產階級用一月九日的發動和羣衆罷工來開始了革命。無產階級把鬥爭進行到底了，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舉行了武裝起義，保護了那些被槍殺，被鞭笞拷打的農民。一九〇五年罷工的工人約有三百萬（與鐵路工人，郵務人員等等合共計算，大概有四百萬人），一九〇六年有一百萬，一九〇七年有七十五萬左右。這樣強大的罷工運動是世界上所沒有看見過的。俄國無產階級表明了，在真正的革命危機成熟起來的時候，工人羣衆中間是潛伏有無限巨大的力量。世界上最大的一九〇五年罷工浪潮也還遠沒有把無產階級所有一切戰鬥力量都澈底表明出來。例如在莫斯科工廠區五十六萬七

千工廠工人中，罷工者有五十四萬，而在彼得堡三十萬工廠工人中，罷工者有一百萬。可見，莫斯科區域的工人鬥爭，還遠不及彼得堡的工人那樣頑強。在立夫梁省（里加城）五萬工人中有二十五萬罷工者，即是說每個工人在一九〇五年中參加過五次以上的罷工。現時全俄工廠工人，礦工和鐵路工人總數，至少有三百萬，而且這個數目每年都在增長；如果各地都像一九〇五年里加工人運動那樣強大，那他們就能提出一千五百萬罷工工人大軍。

任何沙皇政權也抵擋不住這樣的攻擊。但是，誰也明白這樣的攻擊不能按社會主義者或先進工人底願望來用人工方法造成。這樣的攻擊，只有當危機，風潮和革命運動普及全國的時候，才能發生。要準備這種攻擊，就必須把最落後的工人階層都吸收到鬥爭中來，必須進行多年頑強，廣泛，一貫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建立並鞏固無產階級底各種團體和組織。

按鬥爭力量說來，俄國工人階級超過了俄國人民其餘一切階級。工人底生活條件就使工人富有鬥爭能力，並推動他們去鬥爭。資本把大批大批工人集合到各個巨大城市裏，使他們團結起來，訓練他們共同動作。工人隨時隨地都與他們的主要敵人，即資本家階級直接衝突。工人在與這個敵人鬥爭過程中，就成爲社會主義者，覺悟到必須完全改造整個社會，完全消滅一切貧困和一切壓迫。工人一成爲社會主義者，就無限勇敢地進行鬥爭，反對橫在他們前進途中的一切障礙，首先是反對沙皇政權和農奴制地主。

農民在這次革命中也進行了反對地主，反對政府的鬥爭，但他們的鬥爭是比工人鬥爭軟弱得多。有人統計過，工廠工人參加過革命鬥爭，參加過罷工運動的佔大多數（約有五分之三），而農民參加過革命鬥爭的，無疑是只佔少數：大概是不過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農民鬥爭得不那樣頑強，而較爲分散，不那樣覺悟，而往往仍然是指望沙皇爺爺慈善爲懷。老實說，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

間，農民不過是把沙皇和地主恐嚇了一下，而其實並不是需要恐嚇他們，而是要把他們消滅，把他們的政府，即沙皇政府根本剷除掉。現在，斯托雷平和反動地主杜馬竭力把富裕農民培養成爲新地主式的單獨田莊主，作爲沙皇與黑幫黨底同盟者。但是，沙皇與杜馬越是幫助富裕農民來掠奪農民大衆，那末農民大衆也就會越加覺悟，而他們對於沙皇的信任，窮苦愚昧農奴對於沙皇的信任，也就會保存得越少。農村工人一年比一年增加，他們除了與城市工人聯合起來共同鬥爭之外，再也找不到別的自救方法。鄉村破產到一貧如洗，忍飢受餓的農民一年比一年增加起來，——當城市無產階級發動起來時，他們中間就會有成千百萬的人去同沙皇和地主作更堅決更激烈的鬥爭。

自由派的資產階級，即是自由派的地主，工廠主，律師，教授等等，也參加過革命。他們成立了『人民自由』黨（立憲民主黨）。他們在自己的報紙上，向人民約許過很多東西，大吹大擂，高喊自由。他們在第一屆和第二屆杜馬中佔有大多數代表位置。他們約許『用和平手段』達到自由，而責備工農革命鬥爭。農民和許多農民代表（『勞動派』）相信了這種約許，並且恭順馴服地跟着自由主義者走，而避開了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這是農民（和許多城市居民）在革命時所犯的一種極大錯誤。自由派用一隻手——而且這也是很稀少的事情——幫助爭取自由的鬥爭，而另一隻手始終都援助沙皇，約許保持並鞏固他的政權，使農民去與地主妥協，實行『安撫』『好鬧的』工人。

當革命進到同沙皇作堅決鬥爭，進到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起義時，自由派就全體一致地卑鄙叛變了人民自由事業，離開了鬥爭。沙皇專制政府利用自由派這樣叛賣人民自由事業的行爲，利用愚昧農民很相信自由派的態度，而擊潰了起義的工人。當無產階級已被擊潰的時候，任何杜馬，立憲民主黨底任何甜言蜜語，他們的任何約許

都沒能阻止沙皇取消一切自由殘餘，恢復專制和農奴制地主的專橫權力。

自由派結果竟是受了騙。農民獲得了沉痛而有益的教訓。當廣大民衆還信任自由派，還相信可能同沙皇政權講『和平』，而躲避工人革命鬥爭的時候，在俄國是不會有自由的。當城市無產階級大衆起來鬥爭，推開那些動搖叛變的自由派，而領導農村工人和破產農民前進時，世界上便沒有一種力量能阻止俄國實現自由了。

至於俄國無產階級定會奮起進行這種鬥爭，定會重新來領導革命，這是有俄國全部經濟狀況，以及革命年代的全部經驗來作担保的。

五年以前，無產階級給了沙皇專制制度第一次打擊。當時在俄國人民面前顯現了第一批自由光綫。現在，沙皇專制制度又恢復起來了，農奴主又來實行宰制，又來實行統治，又是到處對工農羣衆橫施壓迫，又是到處都有亞洲式的官吏專橫，卑鄙侮辱人民的現象。然而沉痛的教訓是不會徒然過去的。俄國人民已不是一九〇五年以前那樣的人民了。無產階級已教會他們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定會把他們引到勝利。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舊曆十月三十日）刊載於工人報第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六卷，第二七〇至二七七頁。



斯托雷平反動時期



布爾什維克正式形成爲
獨立馬克思主義政黨



政治評論

沙文主義者活動不停。他們拚命造謠，說什麼日本人加緊武裝，硬說日本人在滿洲集中了進攻俄國的六百營軍隊。硬說土耳其積極武裝起來，以圖在本年春季向俄國宣戰。硬說高加索有人準備暴動，以圖脫離俄國（只是還沒有叫喊說什麼波蘭人的計劃哩！）。用妄說芬蘭加強武裝的謊話來加緊迫害芬蘭。利用在波斯尼亞建築鐵路的事實來拚命鼓動反對奧國。俄國報紙加緊攻擊德國，說它似乎是在唆使土耳其反對俄國。這個運動不僅在俄國報紙上，而且在法國報紙上也進行着。至於法國報紙被俄國政府收買的事實，那是不久以前已有一個社會民主黨員在杜馬中很湊巧地提到了的。

西歐的莊重資產階級報紙，並不認為這全部運動是新聞家幻想出來的事情，或競求喝采叫絕的人們所玩弄的投機把戲。不，大概是從『當局』方面——請讀作黑幫沙皇政府或如鼎鼎大名的『明星院』一類的祕密宮庭奸黨方面——發出了一種十分確定的暗號，進行着一種有系統的『路線』，採取了某種『新方針』。外國報紙認為把杜馬國防問題委員會工作祕密起來，對所有一切不參加該委員會的杜馬代表，即不僅是對革命政黨，而且對立憲民主黨隱瞞該委員會工作的事實，是與這種沙文主義運動有直接聯繫的；有些外國報紙甚至說，俄國政府爲了最終表明它驕視『憲制』的態度，竟打算不向全體杜馬代表，而只向黑幫十月黨人把持的委員會去諮詢撥款增強邊防的辦法。

現在且從西歐那些並非社會主義的，絕對不能說是對俄國革命抱樂觀態度的報章中引證幾段話：

『德國對於法國的勝利（一八七〇年），如有次俾斯麥所指出的那樣，激動了俄國武人底虛榮心，他們也力圖建立軍功了。人們曾以為土耳其由於政治上，宗教上和歷史上的種種原因，是個特別適宜於實現這一目的的對象（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間的俄土戰爭）。顯然，現在俄國那些忘記了日俄戰爭教訓而不瞭解國家真正需要的人們，也持着同樣的見解。既然在巴爾幹已不必解放什麼『小兄弟』，於是就得想出些旁的方法來影響俄國輿論。而這些方法，實在是要比從前的方法更加拙劣：他們竟想把俄國形容成一個被內外敵人包圍了的國家。

俄國當局用舊的手段，即是用強力鎮壓國內解放運動，以及用激起民族主義觀念和造成一些結果不可逆料的外交衝突的辦法轉移人民對國內慘狀的視線，來試圖鞏固自己的地位』。

反革命專制政府政策中的這個新的沙文主義方針，究竟有怎樣的意義呢？在對馬島事件和瀋陽事件後，只有完全失掉了立足地的人，才能冒險採取這樣的政策。不管人們怎樣努力，但兩年反動的經驗並沒有為黑幫專制制度造成任何多少可靠的內部支柱，並沒有創立起任何一種能在經濟上復興專制制度的新的階級成分。但沒有這點，反革命無論怎樣橫施殘暴，都是不能保持住俄國現代政治制度的。

* * *

無論斯托雷平，黑幫地主和十月黨人，都知道他們除非建立新的階級支柱，便不能保持政柄。於是他們就實行一種把農民弄得完全破產，用強力手段破壞村社，無論如何都要在農業方面給資本主義掃清道路的政策。在這一方面，那些最有學識，最有素養，最『講人道』的俄羅斯自由派，如俄國新聞報中的教授先生們，是要

比斯托雷平派蠢笨得多。該報二月一日的社論寫道：『如果昨天還擁護村社的那些斯拉夫主義者，例如在解決十一月臨時法規問題時，竟贊助內閣把土地變為單個農戶私產，藉以破壞村社的企圖，那是不會有什麼奇怪的… 甚至可以設想到，杜馬中佔多數的保守派和內閣雙方共同的自衛目的，也許會促使杜馬和內閣採取甚至比一九〇六年的著名法令更帶進攻性的辦法… 結果就有一種很奇異的情景：保守派政府在各保守政黨代表贊助下，準備在最不易發生急劇變革的土地關係方面，實行急進的改良，而它決意採取這樣急進的辦法，是以一種佔有制優於另一種佔有制的抽象理由為根據的』。

教授先生呵，醒過來吧，把自己身上的陳腐民粹主義的檔庫灰塵抖抖，而瞧瞧兩年革命時期所發生了的一切吧。斯托雷平不僅是靠體力戰勝了你們，而且是因為他正確瞭解了經濟發展中最實際的需要，即用強力手段破壞舊土地佔有制的必要。革命所永不復返地實現了的偉大『進展』，就在於黑幫專制制度先前能夠憑藉於中世紀的土地所有制，而現在却不得不實行，不得不一心一意，勇往直前地用飛快的速度來破壞這種所有制。因為它已明白，不破壞舊的土地制度，就不能逃出構成爲俄國革命最深原因的矛盾：一方面有最落後的土地所有制和最野蠻的鄉村，另一方面又有最先進的工業的和財政的資本主義！

然則你們是贊成斯托雷平的土地立法麼？——民粹派會驚愕萬分地質問我們道。不是呵！放心吧！我們絕對反對俄國一切舊土地所有制形式，既反對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反對農民份地所有制。我們絕對主張用強力手段破壞這個腐敗的，正在腐朽和毒害一切新東西的陳舊廢物，——我們主張資產階級性的土地國有，認爲這是資產階級革命底唯一澈底口號，唯一實際辦法，這個辦法是把歷史上所必需的破壞手段完全指向於反對地主，而促使農民大眾分化出一些自由的農業主人。

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點，就是黑幫派與工農大眾雙方都在革命基本問題，即土地問題上實行革命政策。而自由主義的律師和教授却擁護着最無生氣，最荒謬，最虛幻的主張：想把兩種互相對立，絕不相容的破壞陳腐制度的手段調和起來，使得根本就不會有什麼破壞。或者是農民起義勝利，完全破壞舊土地所有制，而使革命所革新的農民獲得利益，即沒收地主土地，建立共和國。或者是斯托雷平式的破壞，它雖也能革新，而且確實是革新着舊土地所有制，使其適應資本主義關係，但專門使地主獲得利益，其代價就是無限制地剝削農民大眾，用強力把他們逐出鄉村，迫使他們流離轉徙，死於飢寒，並用監禁，放逐，槍殺和拷打手段殲滅全部農民青年精華。由少數壓制多數來實行這樣的政策雖非易事，但它在經濟上不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設法使人民明白認識這點。企圖以溫和改良辦法，用和平手段，不用強力手段來逃出俄國歷史數世紀來所造成的像一團亂絲般絕頂混亂的中世紀矛盾，就會是頑固的『囊中人』的一種最愚蠢的幻想了。經濟上的必要，定會引起，而且定會實現俄國土地制度中最『急劇的變革』。歷史的問題，只在於誰來實現這一變革：是沙皇和斯托雷平所領導的地主，還是無產階級所領導的農民羣衆。

* * *

『反對派聯合』——這就是在俄國政治刊物上轟動一時的問題。警察斯托雷平的俄羅斯報喜笑顏開：『聯合？那末立憲民主黨人也是革命家了；打殺立憲民主黨人呵！』。立憲民主黨的言論報滿懷着官吏心理，想證明立憲民主黨人也能如十月黨人那樣溫和，於是裝腔作勢，極力表示『道義』的憤懣，說人家企圖責備他們爲革命黨人是不誠實的，而宣稱：我們自然歡迎反對派底聯合，但這個聯合應是『從左向右』的運動（二月二日的社論）。『我們有政治錯誤和失望的經驗。反對派實行聯合時，自然是要以其中最溫和政黨底最低綱領爲基礎來實行的』。

這個綱領是很明顯的：領導權歸資產階級自由派，這就是我的條件，——立憲民主黨這樣說，也好似一八七一年法盧對當時向他求援的梯也爾說：君主制度，這就是我的條件。

首都郵訊¹²¹知道逕直講出這樣的話來，是不體面，不榮譽的，於是它就『不同意』言論報底意見，而以『十月前的情緒』的模糊暗示來支吾搪塞（因為可惡的檢查機關是不許說出明白政治綱領來的呀！），其實是勸大家來講講生意。說什麼言論報想領導，革命家也想領導（領導新結成的聯合），而我所幹的誠實無欺的中介工作可不可以得到一筆酬金呢？

『聯合』麼，——我們熱烈同情這個口號，特別是當人們在這裏暗示——那怕只是暗示！——『十月以前的情緒』的時候。不過要請敬愛的政客老爺們注意，歷史是不會重復的。『三年歷史』所給予我們的那些教訓，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從各階級底意識中除去的。這些教訓異常豐富，既有很多積極內容（一九〇五年工農羣衆鬥爭底形式，性質和勝利條件），也有很多消極內容（兩屆杜馬之破產，即憲制幻想和立憲民主黨領導權之破產）。

誰想來有系統地研究，思索，精通這些教訓，並將其灌輸到羣衆中去，那我們就說，請吧，我們完全贊成『聯合』，——聯合起來進行反對革命叛徒的殘酷鬥爭。你們不喜歡麼？那我們就要分道揚鑣了。

『十月以前的』舊口號是很好的，我們（請我們的思想文集中的門一德一姆不要發怒吧！）並不拋棄它（『立憲會議』口號）。但它是不够的。它未免是太嫌虛浮了。其中沒有反映到實際生活具體提出的各種尖銳問題。我們要以三個偉大年份的偉大教訓來補充它。我們的『最低綱領』，『我們聯合底綱領』是簡單而明瞭的：（一）沒收一切地主土地；（二）共和制度。因此我們也就需要有用來解決這種任務的那樣一個立憲會議。

兩屆杜馬，兩屆立憲民主黨人杜馬的歷史，已經非常明顯地證

明，社會力量的實際鬥爭，雖不是時常都爲人們所意識到，不是時常都顯露於外表，但始終都對一切巨大政治事變結局發生決定影響，始終都把那些幼稚的和機巧狡猾的『憲制主義』門外漢底種種詭計打成粉碎的這個鬥爭，完完全全是由上述兩個『目標』所引起的。並不是什麼抽象的理論，而是我國民衆在俄國地主專制制度現實條件下進行鬥爭底實際經驗，在實際上正是向我們證明了這些口號底必要性。誰能領會這些口號，——我們就向他提議『分途行進』和『共同殺敵』，共同去殺那個已把俄國破壞殆盡，對俄國成千累萬優秀人物肆行摧殘的敵人。

『你們的這種聯合綱領是不會有人響應的』。這種說法全不正確。

你們只要讀讀非黨農民在頭兩屆杜馬中的演詞，便會明白，我們的聯合綱領不過是把他們的願望，他們的需求，以及從這種需求中所絕對必需得出的結論規定出來罷了。對於那些不瞭解這種需求的人，從立憲民主黨人起，至壁舍浩諾夫止（據莫斯科來信上說，他也在那裏宣傳『聯合』），那我們就要爲這個『聯合』而同他們作戰。

這將是一個頑強的戰爭。我們善於在革命以前工作了多年。無怪乎人們稱我們爲堅如鐵石的人。社會民主黨人已建成了無產階級的黨，這個黨決不會因第一次軍事襲擊遭受失敗而頹喪，決不會張皇失措，決不會辭心於冒險行動。這個黨是向着社會主義前進，而不使自己和自己的命運受資產階級革命某個階段底結局所拘束。正因爲如此，所以它也就絲毫不會受資產階級革命底種種弱點所沾染。而這個無產階級黨是朝着勝利前進的。

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舊曆十三日）

刊載於無產者報第二十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三卷，第
四〇四至四〇九頁。

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

我們的——恩格斯關於他自己和他的那位著名友人說，——學說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底指南。在這個典型定義中鮮明而有力地着重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往往被人忽視的那一方面。忽視這一方面，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變成爲一種片面，畸形和毫無生氣的東西，就會剷去馬克思主義底生動靈魂，就會破壞它的根本理論基礎的辯證法，即關於包羅萬象而充滿矛盾的歷史發展的學說；就會打破它與那些隨歷史每一次新轉變而發生變更的一定實踐時代任務之間的聯系。

正是現今在那些關懷俄國馬克思主義命運的人中間，特別容易碰見忽視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方面的人。可是誰都明白，俄國近年來發生了一些急劇的轉變，使客觀形勢，使這個直接和立即決定行動條件，亦即決定行動任務的社會政治形勢發生非常迅速急劇的變化。我當然不是指一般和根本任務而言，因爲這種任務在各階級間的根本關係沒有變更時，是不會隨歷史轉變而發生變更的。俄國經濟（而且不只是經濟）進化的這個總趨勢，也如俄國社會各階級間的根本關係一樣，例如在最近六年以來，顯然是沒有變更的。

但是，在這個時期中，當前直接行動的任務却因具體社會政治情況變更而發生過極明顯的變更，因而馬克思主義這一活的學說中的各種不同的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別提到首要的地位。

爲了說明這個意思，我們且來看看最近六年來，具體社會政治情況有些什麼變更。我們馬上就可看出這個時代劃分爲兩個三年時期：前一時期大約是在一九〇七年夏季終結，後一時期是在一九一〇年夏季終結。從純粹理論的立場來看，前三年底特點是俄國國家制度底根本特徵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些變化底行程極不平坦，而向兩方面擺動的振幅都是很大的。『上層建築物』方面這些變化底社會經濟基礎，就是俄國社會中一切階級在各種各樣舞台上的行動（杜馬內的活動，杜馬外的活動，出版，結社，集會等等），其形式之公開，其力量之雄厚，其規模之宏大，是歷史上所罕見的。

反之，後三年時期底特徵，却是——再聲明一遍，我們在這裏是僅以純粹理論的『社會學的』觀點爲限的——十分遲緩的進化，幾乎是等於停滯。在國家制度方面並沒有發生什麼多少重大的變更。各階級在前一時期作過公開的和多方面的行動的各種『決鬥場』中，現在大半是完全沒有，或幾乎是完全沒有這種行動了。

這兩個時期相類似的地方，就是俄國的進化在前後兩個時期，仍如先前一樣是資本主義性的進化。這個經濟進化與現存許多中世紀封建機構間的矛盾，並沒有消除掉，而是仍如從前一樣，因爲在個別機構中滲進某些局部的資產階級內容的事實，並不會使這個矛盾緩和下去，倒反使這個矛盾加劇起來。

這兩個時期不同的地方，就是前一時期擺在歷史劇場前台上的，是上面所說的那些迅速急劇變化將會引起什麼結果的問題。由於俄國進化是資本主義性的進化，所以這些變化底內容也不能不是資產階級性的。但是有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採取比較溫和的自由主義立場，它們的階級地位就使它害怕急劇的變化，而力圖把農村制度和政治『上層建築物』中許多舊機構殘餘保存起來。農村小資產階級，既與『自食其力』的農民錯綜結合，當然力圖實現另一種資產階級性的改革，即留給各種中世紀

舊物存在餘地更少得多的改革。僱傭工人既然自覺地對待了他們周圍所發生的一切，當然不能不對這兩種不同趨向間的衝突，採取一定的態度，因為這兩種趨向雖然同樣是停留在資產階級制度範圍內，但它們兩者所決定的資產階級制度底形態，發展速度及其進步影響底範圍，彼此全然不同。

由此可見，過去三年時期在馬克思主義中把一般人所通常稱爲策略問題的那些問題提到首要地位，並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如各種路標派¹²²那樣把這些問題所引起的爭論和意見分歧看作『智識份子的』爭論，看作『爭奪對於幼稚無產階級的影響的鬥爭』，看作『智識份子適應無產階級』的表現等等，真是再錯誤沒有的了。恰巧相反，正因為無產階級已經成熟，所以它對於俄國全部資產階級性的發展中的兩種不同趨向間的衝突，始終不能採取漠視的態度，而這個階級底思想家也就不能不作出適合於（直接或間接，正面或反面反映）這兩種不同趨向的理論估計。

在後三年時期，俄國資產階級性發展中兩種不同趨向彼此衝突是不迫切的，因為『野牛』¹²³把這兩種趨向都壓抑下去，推到後面去，逼到內面去，暫時掩沒下去了。中世紀的野牛不僅充滿了前台，而且使資產階級社會中最廣大的階層滿懷着路標派心理，頹喪與背叛精神。此時顯露於表面的，已不是改造舊制度的兩種方式之間的衝突，而是再不相信任何改革的心理，『馴順』和『懺悔』的精神，迷戀於反社會學說，紛紛傾心於神祕主義等等。

這種異常劇烈的變化，並不是什麼偶然的現象，也不單是『外界』壓迫的結果。前一時代十分強烈地激動了那些在許多世代，在許多世紀中沒有參預過政治問題，完全不懂政治問題的民衆，於是『重新估計一切價值』，從新研究各種基本問題，從新注意理論，注意初步原理，注意入門研究的趨向，也就自然而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千百萬人驟然從長久睡夢中覺醒過來，驟然碰到了極重要的問

題，當然不能在這個高峯上長久支持下去，而不免要停頓一下，不免要回轉去復習基本問題，不免要經過一番新的準備工作，好來「消化」那些空前豐富的教訓，而使更廣大無比的羣衆能够更有把握地，更自覺地，更自信地，更堅定地再向前進。

歷史發展底辯證法竟是如此：前一時期中的迫切任務，是要實現全國所有一切生活部門方面的直接改革；而後一時期中的迫切任務，却是要研究經驗，使更廣大的階層領會這種經驗，使這種經驗深入到所謂底層，即各階級落後羣衆中去。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教條，不是什麼一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活的行動指南，所以它不能不反映着社會生活條件方面異常急劇的變遷。而這種變遷底反映，就是深刻的解體，離析和各種動搖，一句話概括說來，就是馬克思主義運動內部的極嚴重的危機。堅決抵抗這種解體傾向，為保衛馬克思主義基礎而進行堅決持久的鬥爭，又成為當前的迫切問題了。在規定本身任務時不能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那些階級中非常廣大的階層，在前一時期領會馬克思主義，是極其片面而畸形的，只熟讀了某些「口號」以及對於某些策略問題的答案，而沒有理解這些答案中的馬克思主義準繩。在社會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計一切價值」，也就引起了對於馬克思主義最抽象最普泛哲學基礎的「修正」。各種各樣唯心派資產階級哲學底影響，表現於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所發生的馬赫主義的流行病¹²⁴。背誦勉強讀熟，但並未理解，未加思索的「口號」，結果就流為專事空談，這種空談在實際上是歸結成為一些全非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如露骨的或畏怯的「召回主義」¹²⁵，或把召回主義認作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一種「正當色彩」。

另一方面，普及於極大部份資產階級中的那種路標主義精神，背叛主義精神，也浸入到企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納入「溫和客氣」軌道的那個思潮中去了。這裏還能算作的馬克思主義東西的，

不過是些掩蓋着一種充滿自由主義精神，說什麼『等級森嚴』和『領導權』等等議論的辭句而已。

本文目的，當然不是要考察這些議論。只要指出這些議論，就足以證明我們上面所說馬克思主義現在發生嚴重危機，以及這個危機是與現今整個社會經濟情況相連的意見了。由這個危機引起的問題，是不可撇開不說的。企圖用空洞辭句來抹煞這些問題，是再有害，再無原則不過的了。現在，因為資產階級影響普及各種各樣馬克思主義『同路人』中的結果，使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和根本原理受到各種相反方面來的曲解，所以團結一切認識了這個危機底嚴重性並瞭解必須將其克服的馬克思主義者來共同捍衛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和根本原理，是再重要不過的了。

前三年所喚醒起來自覺參加社會生活的民衆非常廣大，其中有許多人現在才第一次開始來真正認識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方面，資產階級的刊物，造出了比先前更多得多的錯誤觀念，並且將其傳播得比先前更廣。在這樣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中間發生解體現象是特別危險的。因此，認識目前必然發生這種解體現象的原因，並團結起來澈底反對這種解體現象，也就真正確實是馬克思主義者底時代任務。

一九一一年一月五日（舊曆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刊載於明星報第二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七卷，第二〇至二四頁。

斯托雷平與革命

絞手頭子斯托雷平被殺的事件，正是有許多標誌已在證明俄國反革命歷史第一階段完結了的時候發生的。因此，本來很不重要的九月一日事變，又把我國反革命底內容和意義這一頭等重要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在那些僕役式地讚美斯托雷平，或吹毛求疵地考究統治俄國的黑黨羽傾軋史的反動派合唱歌聲中，在那些對『荒謬愚蠢』刺殺舉動表示惋惜的自由派（生活事業雜誌中使用了加有引號的流行語的那些先前的社會民主黨人，也當然要歸進自由派中去）合唱歌聲中，可以聽見一些真正有重要原則內容的聲調。有些人企圖把俄國歷史中的『斯托雷平時代』當作一種完整東西來考察一下。

斯托雷平是約近五年，從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止的時期反革命勢力政府底首腦。這是個真正特殊的時期，其中充滿了許多值得玩味的事變。從外表上看來，可以把它稱爲準備和實現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國家政變的時期。這次政變底準備，正是一九〇六年夏季斯托雷平以內務總長資格在第一屆杜馬面前演說時開始的，現在這次政變已把它在我國社會生活各方面產生的一切果實都表明出來了。試問，這次政變底人物究竟是倚靠了什麼社會力量，或者說，究竟是什麼力量指揮了這些人物呢？『六三』時期底社會經濟內容怎樣呢？——對於解答這個問題，斯托雷平個人的『陞進』途程，給了值得玩味的材料和很有趣味的例證。

一九〇二年間，地主兼貴族首長的斯托雷平在普列偉¹²⁶當權時代成了省長，因殘酷懲治農民和摧殘農民（在薩拉托夫省）而為沙皇及其黑幫朋黨所『賞識』；——一九〇五年間，他組織黑幫匪夥，舉行蹂躪（巴拉舍夫城的蹂躪事件）；——一九〇六年，他成了內務部長，而從第一屆國家杜馬解散時起就成了內閣總理。簡括說來，斯托雷平底政治履歷就是如此。反革命政府首腦底這個履歷，同時也就是在我國實行了反革命的那個階級底履歷，而斯托雷平不過是這一階級底代表或傭僕。這個階級，就是以第一名貴族和最大地主尼古拉皇帝為首的那個俄國貴族。這個階級就是那三萬個農奴制地主，他們擁有歐俄七千萬俄畝土地，即等於一千萬農戶所有土地的總數。這個階級所佔有的大地產，就是用各種形式和各種名稱（工役，債務等等）普遍於俄羅斯人歷來居住的俄國中部的那種農奴制剝削底基礎。俄國農民『土地太少』（且用自由派和民粹派所愛用的字眼來說），無非是這個階級土地太多底反面而已。成為我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心的土地問題，其實質就是究竟地主土地所有制仍然會保存下去，因而必然使佔居民大多數的農民所處的那種貧窮困苦，飢餓，閉塞，被壓迫地位保持許多年代呢，還是民衆終能爭得多少像人的生活條件，多少像歐洲式的自由生活條件，——而這個目的，除非用革命手段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及與之緊相聯繫的地主帝制，是不能實現的。

斯托雷平底政治履歷，是沙皇專制制度下生活條件底確切反映和表現。專制制度在革命時代所處的那種情況，也就使斯托雷平只能如他當時所作的那樣去作。當事實已充分確切證明，而且是根據經驗證明，根據杜馬以前，即一九〇五年，以及杜馬存在時期，即一九〇六年的經驗證明，絕大多數居民已經瞭解本身利益與保存地主階級的情形絕對不能相容，而力求消滅這個階級的時候，專制制度也是不能不如它當時所作的那樣去作的。立憲民主黨作家所謂攻

擊專制制度是我國『智識份子』革命主義表現的斷語，是再膚淺，再虛偽不過的了。恰巧相反，正是客觀條件使農民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鬥爭必然提出了我國地主專制制度生死存亡的問題。沙皇專制制度只得進行決死的鬥爭，只得除全然喪失了力量的官僚以及為軍事失敗和內部瓦解所削弱的軍隊外，還尋找旁的自衛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沙皇專制制度所能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把居民中間的黑幫份子組織起來，舉行蹂躪。我們的自由派在說到蹂躪事件時所表現的那種高尚的道德憤懣，只能使每個革命者發生一種感想，認為這是再可憐不過和胆怯不過的行爲，——何況他們一方面對蹂躪事件表示這種高尚道德的責難，同時却又完全容許與蹂躪者進行談判和協定哩。專制制度不能不實行自衛去反對革命，而半亞洲式的，農奴制的，俄羅斯的羅曼諾夫專制制度，又是只能用最醜惡，最可惡，最卑賤殘酷的手段來實行自衛的，所以每個社會主義者，每個民主主義者為反對蹂躪政策而能採取的唯一適當，唯一合理的手段，也就是從各方面忠誠贊助革命，組織革命來推翻這個專制制度，而決不是從事於高尚的道德上的責備。

蹂躪者斯托雷平博得內閣位置，正是用沙皇省長所能用的唯一手段博得的：摧殘農民，組織蹂躪事件，巧於用『歐洲式』的外衣和辭句，姿態和手勢來掩蓋這種亞洲式的『實踐』。

我國那些以高尚道德態度責難蹂躪事件的自由資產階級領袖，却與蹂躪者實行談判，不僅承認他們有存在權，而且還承認他們應在組織新俄國和管理新俄國事業上享有領導權哩！斯托雷平被殺的事件引起了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許多揭露和自供。例如，請看維特和古契可夫兩人敘述維特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後與『社會要人』（請讀作：溫和自由君主派的資產階級領袖）談判組閣問題的書信吧。參加這次談判的，有施坡夫，杜魯別茨可義，烏魯索夫，斯達霍維奇，即也有立憲民主黨人將來的活動家，也有『和平復興』

黨¹²⁷將來的活動家，也有十月黨將來的活動家。這次談判大概是很長久的，因為古契可夫在信裏說到『談判久延不決，真令人困憊不堪』。談判破裂的原因，是關於杜爾諾沃的問題，因為『自由派』不願讓杜爾諾沃當內務總長，而維特却用最後通牒方式堅持要他當內務總長。同時，第一屆杜馬中的立憲民主黨巨頭烏魯索夫，是『熱烈擁護杜爾諾沃當內務總長的』。當奧波林斯基侯爵提出斯托雷平為候補人時，『有的贊成，有的說不知道』。『我確實記得，——古契可夫寫道，——誰也沒有像維特伯爵所寫的那樣發表過反對的意見』。

現在，立憲民主黨人報紙想着重指出自己的『民主精神』（不要發笑吧！），也許特別是因為立憲民主黨人在彼得堡第一個選民團中選舉時與十月黨人作過鬥爭的關係，企圖拿當時談判的情形來把古契可夫攻擊一下。『古契可夫所指揮的那些十月黨人先生，——九月二十八日的言論報寫道，——往往爲了逢迎當局而成了杜爾諾沃先生的同流！他們往往是面向當局，背朝輿論的』。同日出版的那期俄國新聞報社論，也是異口同聲地重複着立憲民主黨人責備十月黨人的這種言論。

然而，請問立憲民主黨人先生，你們究竟有什麼權利責備十月黨人呢，你們那些甚至擁護過杜爾諾沃的人不是也參加過這個談判麼？難道當時，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全體立憲民主黨人不都是像烏魯索夫一樣『面向當局』，『背朝輿論』麼？夫婦吵架，總是一家；並不是什麼原則的鬥爭，而是一些同樣無原則的政黨間的競爭，——這就是我們聽見立憲民主黨人現在藉口一九〇五年末的『談判』來非難十月黨人時所必須作出的估計。這種無聊的爭辯，只會模糊歷史上無可爭論的一件真正重要的事實：就是自由資產階級中所有一切派別，從十月黨人起，至立憲民主黨人止，自從我國革命真正具有了人民性質，即按其積極參加者成份來說已成爲民主革

命的時候起，始終都是『面向當局』，『背』朝民主運動的。俄國反革命歷史中的斯托雷平時代底特點，也就在於自由資產階級背棄了民主運動，所以斯托雷平也就能向自由資產階級底這個代表人物或那個代表人物去請求援助，尋找同情和徵求意見。如果不然，斯托雷平就會不能在懷有反革命情緒的資產階級自己協助，同情，積極或消極贊助下實現貴族聯合會對於這個資產階級的領導權了。

這一點值得特別注意，因為我國自由主義的刊物，以及生活事業這樣一種主張自由主義工人政策的刊物，正是忽略了，或是故意地忽視了這一點。斯托雷平不僅是農奴制地主專政底代表人物；單以這樣的估計為限，就是全不知道『斯托雷平時代』底特點和意義。斯托雷平是這樣一個時代的總長，此時整個自由資產階級，直到立憲民主黨人為止，都充滿了反革命的情緒，農奴主能倚靠並且確實倚靠了這種情緒，能夠並且確實曾向這個資產階級底領袖們『求婚』，甚至能把這些領袖中的最『左的』領袖也當作『擁護皇上的反對派』¹²⁸看待，能倚靠並且確實倚靠了自由派思想領袖轉到他們方面，轉到反動派方面，轉到反對民主派和唾棄民主派的立場上去。斯托雷平就是這樣一個時代的總長，此時農奴制地主竭力用極快速度來在農民土地生活方面實行了資產階級的政策，拋棄了指靠農民『宗法心理』的一切浪漫主義幻想和期待，而到俄國一般新資產階級成份中，特別是到俄國農村新資產階級成份中去尋找同盟者。斯托雷平企圖把新酒裝進舊瓶裏去，把舊的專制制度改造為資產階級的君主制度，所以斯托雷平政策底破產，也就是沙皇制度在這最後一條道路上，在沙皇制度尚能走上的這最後一條道路上的破產。亞歷山大第三的地主帝制企圖倚靠『宗法性的』鄉村和一般俄國生活中的『宗法性』；革命把這個政策完全打破了。革命後，尼古拉第二的地主帝制企圖倚靠於資產階級反革命情緒和由地主自己實行的資產階級土地政策；這種企圖底破產，現在連立憲民主黨人也深信無疑，

連十月黨人也深信無疑的這種破產，乃是沙皇制度尚能採取的最後一個政策底破產。

斯托雷平時代農奴制地主專政所反對的，並不是包括整個『第三等級』，即全體資產階級在內的全體人民。不，這個專政是在最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條件下實行的，當時十月黨的資產階級是甘心願意替它服務的；當時地主和資產階級擁有保證他們的聯盟在其中佔多數，並使他們能正式同皇帝進行談判協商的代議機關；當時司徒盧威及其他路標派份子狂熱地糟蹋革命而創立了一種博得瓦倫斯基歡心的思想；當時米留可夫先生把立憲民主黨人反對派宣佈為『擁護皇上的反對派』（擁護農奴主遺孽皇上的反對派）。雖然有這些更便利於羅曼諾夫老爺們的條件，雖然有這些從二十世紀資本主義俄國社會力量對比觀點上看來真是絕無僅有，最便利不過的條件，但斯托雷平底政策終於破產了；斯托雷平是在沙皇專制制度底新的掘墓人——更確切點說，集聚新力量的掘墓人——叩門時被殺害了。

* * *

斯托雷平對資產階級領袖們的態度以及他們對斯托雷平的態度，在第一屆杜馬時期表現得特別明顯。『一九〇六年五月至七月的時期，——言論報寫道，——是斯托雷平陞進途程中有決定意義的時期』。這一時期底重心何在呢？

『這一時期底重心，——立憲民主黨底正式機關報聲明說，——當然不是杜馬中的發言』。

真是一種寶貴的自供呵！當時我們爲了爭論可否把『杜馬中的發言』當作那個時代『重心』所在的問題，是會同立憲民主黨人作過多少撕殺呵！當時立憲民主黨的報紙是對一九〇六年春夏斷言說那個時代底重心不是杜馬中的發言的社會民主黨人，作過多少氣憤的謾罵，多少高傲的學理主義的訓誨呵！當時言論報和杜馬報

因全俄『社會』竟幻想『康文特』而不深以立憲民主黨人在第一屆杜馬的『國會』舞台上獲得勝利爲快，是對全俄『社會』作過多少貢獻呵！過了五年後，到了必須對第一屆杜馬時期作一個總的估計的時候，立憲民主黨人却像他們掉換手套那樣輕易地宣稱說：『當時的重心當然不是杜馬中的發言』。

先生們，當然不是呵！然則重心究竟何在呢？

…『兩派底代表彼此暗地裏進行尖銳鬥爭。——在言論報上寫道。——一派主張設法去與人民代表機關妥協，即成立『立憲民主黨的內閣』，也在所不辭。另一派則要求採取激烈步驟，解散國家杜馬，改變選舉法。於是擁有強大勢力的貴族聯合會也就實行了這樣的綱領』…『斯托雷平曾有一個時候動搖過。聽說他兩次委託克里尙諾夫斯基向穆羅蒙澤夫提議，共同討論組織立憲民主黨內閣而由斯托雷平充當內務總長的問題。同時，斯托雷平又分明是與貴族聯合會有來往的』。

學識淵博，廣見多聞的自由派領袖先生，就是這樣來寫歷史的！原來，『重心』並不是發言，而是黑幫沙皇黨羽內部兩派中間的鬥爭！毫不遲延，立刻實行了『攻擊』政策的，是貴族聯合會，——即是說，並非個別人物，並非沙皇尼古拉、羅曼諾夫一人，並非『上層』中的『一個派別』，而是個一定的階級。立憲民主黨人對於他們那個從右邊來的競爭者，是看得明白清楚的。但立憲民主黨人沒有看見他們左邊所有的一切。創造歷史的，是『上層』，即貴族聯合會和立憲民主黨，而庶民當然是沒有參加歷史創造事業的！當時和一定階級（貴族）對立的是超階級的『人民自由』黨，而上層（即皇上爺爺）則是猶豫動搖的。

這難道不是再自私自利不過的階級盲目病麼？這難道不是絕頂歪曲歷史和忘記歷史科學基本原理的態度麼？這難道不是把階級、黨和個人混淆到極點的一種可憐的糊塗觀念麼？

不願看見民主運動及其力量的人，比任何瞎子還壞。

第一屆杜馬時代底重心，當然不是杜馬中的發言，而是杜馬以外的階級鬥爭，農奴制地主以及他們的君主制度與民衆，即工農羣衆間的鬥爭。羣衆革命運動正是在這個時期又開始高漲起來了：一九〇六年春夏的時候，一般罷工，政治罷工，農民騷動以及軍隊暴動極厲害地高漲起來了。正是因爲這個原故，——請立憲民主黨的歷史家先生們注意，——所以『上層』才表現過猶豫動搖：帝制黨羽內部的各個派別發生爭執的問題，就是能否在現今的革命勢力狀況下立刻舉行政變，抑是還要等待一下，還要把資產階級愚弄一下。

第一屆杜馬的情形，已使地主（羅曼諾夫，斯托雷平及其同黨）完全知道他們不能與農民大眾以及工人們相安無事。而他們這種認識是與客觀實際情形相符的。當時尚待解決的是一個次要問題：究竟什麼時候，究竟怎樣，是一下子，還是逐漸來改變選舉法呢。資產階級猶豫不決，但它的一切行爲，包括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底行爲在內，都是表明它害怕革命，比害怕反動更要厲害百倍。所以地主也就情願吸引資產階級底領袖（穆羅蒙澤夫，格依登，古契可夫及其同黨）來磋商可否共同組閣的問題。而整個資產階級，直到立憲民主黨人爲止，都去和沙皇，和蹂躪人民的暴徒，和黑幫領袖們商量反對革命的手段問題，但資產階級自一九〇五年末起，從沒有派過它的一個黨去和革命底領袖們商量如何推翻專制制度和君主政體的問題。

這就是俄國歷史上『斯托雷平』時代給予我們的基本教訓。當革命還表現得有力時，沙皇政府就吸收資產階級來磋商問題。當革命不復從下面來實行壓迫時，沙皇政府就用兵士靴尖把資產階級所有一切領袖相繼踢打出去：起先是穆羅蒙澤夫和米留可夫，然後是格依登和李沃夫，末了就是古契可夫。米留可夫輩，李沃夫輩與古契可夫輩之間的區別，是全不重要的，問題只在這些資產階級領袖

跑去向羅曼諾夫—普里什克維奇—斯托雷平…『討好』，而結果也就討到這種…『好處』的先後次序罷了。

斯托雷平恰巧是當黑幫君主制度已經把整個俄國資產階級反革命情緒中所有一切有益於它的東西盡量利用過了的時候下台的。現在這個資產階級已被棄絕，已遭唾棄，已因背叛民主派，背叛羣衆鬥爭，背叛革命而弄得身敗名裂，一看見革命新高潮興起的徵候，就呆然自失，疑惑莫解。斯托雷平給予了俄國人民一個很好的教訓：或者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實行推翻沙皇君主制度而達到自由，或者是在米留可夫和古契可夫一流人底思想和政治領導下去受普里什克維奇，馬爾可夫和托爾馬切夫一流人奴役。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舊曆十八日）

刊載於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二十四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七卷，第
二一七至二二五頁。

論取消主義和取消派¹²⁹

代表會議注意到：

(一)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進行堅決反對取消主義思潮的鬥爭迄今已經約有四年了，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召集的黨代表會議認定這個思潮是

『黨內有一部分智識份子企圖取消現有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組織，而代之以一種絕對要在合法範圍內活動，甚至不惜以公然放棄黨底綱領，策略和傳統為代價的渙散團體』；

(二) 一九一〇年一月中央全會繼續對這個思潮進行鬥爭，一致認為它表現着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並認為一定要與取消主義完全破裂，澈底克服這種離開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傾向，才能實現黨內真正的統一，而使先前的布爾什維克派別組織和孟什維克派別組織合併起來；

(三) 團結在我們的曙光雜誌和生活事業雜誌周圍的一部份社會民主黨人，違背黨底一切決議，違背各派別代表在一九一〇年一月全會上所承認的義務，而公開實行擁護全黨一致認為是反映着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的那個思潮；

(四) 前中央委員米一爾，玉里和羅曼，不但在一九一〇年春天拒絕加入中央，而且連一次補選新委員的會議也不肯出席，並公開聲明說黨中央底存在根本就是『有害的』；

(五) 上述取消派主要刊物我們的曙光和生活事業，恰恰在一九一〇年中央全會之後，完全而堅決地轉到取消主義方面去了，它們不但違背全會決議而『降低秘密黨底意義』，並且公然否認它，說黨是一具『死屍』，說黨已被取消，說恢復秘密黨就是『反動的空想』，並在公開雜誌上用誣蔑謾罵手段來攻擊秘密黨，號召工人認定黨底支部和全黨各級組織都是些『死屍』等等；

(六) 全國護黨份子，不分派別，都已一致努力進行召集黨代表會議的迫切工作，而取消派却已形成爲一些完全獨立的小團體，在各個地方，甚至在護黨的孟什維克¹³⁰佔優勢的地方（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基也輔），都脫離了黨，並完全拒絕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各地方組織發生任何黨性聯系；——

所以，代表會議申明，『我們的曙光派』和『生活事業派』底行爲，已使他們自己完全置身於黨外了。

代表會議號召一切護黨份子，不分思潮和色彩，共同進行反對取消主義的鬥爭，解釋它對於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一切害處，用全力去恢復並鞏固秘密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一九一二年刊載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一九一二年全俄代表會議一書。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七卷，

第四三一至四三二頁。

幾個爭論問題

(公開黨和馬克思主義者)

(一)一九〇八年的決議

許多工人覺得，真理報和光線報¹²¹鬥爭是沒有必要，難於瞭解的。散見於各期報紙上的一些關於個別問題，有時甚至只是關於一些頗為枝節問題的辯論文章，自然不能給予一個關於鬥爭對象和內容的完滿觀念。因此，工人表示不滿意，原是正當的。

然而，成爲鬥爭對象的取消主義問題，是目前工人運動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之一。不切實認識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沒有一定的意見，就不能成爲覺悟的工人。凡是願意獨立處決自己黨底命運的工人，都不會漠視初看起來彷彿不甚明瞭的論戰，而會認真去尋找真理，且一定會找到真理的。

怎樣找到真理呢？怎樣弄清互相矛盾的意見和論斷呢？

每一個有理性的人都知道，如果爲着某個問題而發生熱烈的鬥爭，那末要找出真理，就不要只看爭論雙方底聲明，而要自行審查事實和文據，自行考察，有無證人底口供以及這些口供是否確切。

不消說，這不是時常都易做到的事。把湊巧碰到的，偶然聽到，人們較爲『公開』叫喊的東西等等信以爲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爲滿足的人，也就叫作『輕率的』，輕浮的人，誰

也不會認真去理會他。不用相當的獨立功夫，是無論在那一個嚴重問題中也找不出真理來的；誰害怕用功夫，誰就無法找到真理。

因此，我們向之投訴的，只是那些不怕用這種功夫，而有決心去獨立研究和努力找到事實，文據以及證人口供的工人。

首先發生的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叫做取消主義呢？這個名詞是從那裏得來的呢，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光線報說道，所謂取消黨的意思，即解散和破壞黨，拋棄黨的思想，不過是惡意捏造出來的一種名詞罷了。這是布爾什維克『派別組織份子』捏造出來反對孟什維克的一種罪名！

真理報說道，全黨斥責取消主義，與它鬥爭，迄今已經四年有餘了。

究竟誰是對的呢？怎樣去找到真理呢？

顯然，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在最近四年來，從一九〇八年至取消派完全脫離了黨的一九一二年為止的黨史中去找到事實和文據。

這四年，即現在的取消派還留在黨內的四年，就是審查取消主義這一概念從何而來及其產生經過的最重要的時期。

從這裏得出的第一個基本結論就是，誰談論取消主義問題而避開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時期中的事實和黨底文據，誰就是在工人面前隱瞞真情。

這些事實和黨底文據究竟是什麼呢？

首先就是一九〇八年十二月通過的黨決議。如果工人不願讓人家把他們當作小孩子看待，當作可用神話故事來麻醉的小孩子看待，那他們就應當去問問自己的忠告人，領導者或代表：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是否會通過有論取消主義問題的黨決議，以及這個決議底內容究竟怎樣？

這個決議斥責了取消主義，說明了取消主義底實質。

取消主義就是說『黨內有一部分智識份子企圖取消』（即解

散，破壞，廢除，停止）『現有的黨組織，而代之以一種絕對要在合法範圍內活動』（即『公開』存在），『甚至不惜以公然放棄黨底綱領，策略和傳統』（即過去經驗）『爲代價的渙散團體』。

這就是黨在四年多以前所通過的關於取消主義問題的決議。

從這個決議中便可看出取消主義底實質究竟何在，以及它爲什麼受到斥責。取消主義底實質就是背棄『祕密組織』，取消這個組織，無論如何都要在合法範圍內用無定形的聯合來代替它。可見，黨並不反對合法工作，並不反對必須進行這種工作。黨反對（而且絕對反對）用一種決不能稱爲黨的『公開』渙散團體去代替舊有的黨組織。

黨如果不捍衛自己的生命，不堅決反對那些實行取消它，消滅它，否認它，背棄它的人，那它就會不能生存。這是不言而喻的。

誰藉口建立新的黨而背棄現有的黨，那我們就應當告訴他：任憑你去建設新的黨吧，可是你就不能做舊有的，目前的，現存的黨底黨員。一九〇八年十二月通過的黨決議底意思就是如此；而且關於黨的生存問題，當然是不能通過另外一種決議的。

取消主義當然是與叛變行爲，與背棄綱領和策略的行動，與機會主義，都有思想上的聯繫。上述決議底結尾所指出的也就是這一點。但取消主義不僅僅是機會主義。機會主義者把黨引上資產階級的迷途上去，引上自由主義工人政策道路上去，但是他們並不根本背棄黨，並不取消黨。取消主義是走到了背黨地步的那種機會主義。如果黨把一些根本不承認黨生存的人包括在黨內，那它就不能存在，這是不言而喻的。在現今的條件下背棄祕密組織，就是背棄舊有的黨，同樣是不言而喻的。

試問取消主義對於一九〇八年通過的這個黨決議，究竟採取何種態度呢？

這就是問題底關鍵，這就是檢查取消派態度是否誠懇及其政治立場是否坦白的標準。

他們中間無論何人，只要沒有發瘋，就不會否認黨確實通過了這樣的決議而且沒有把它廢除的事實。

於是取消派便玩弄支吾搪塞的手段：或是避開問題，在工人面前抹煞黨在一九〇八年所通過的黨決議；或是叫喊（往往是用許多謾罵語句），說這個決議是由布爾什維克提出通過的。

然而謾罵的語句不過是暴露出取消派軟弱無力罷了。也曾有過由孟什維克提出通過的黨的決議，例如一九〇六年在斯托哥爾摩¹³²所通過的論土地市有問題的決議。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許多布爾什維克都不同意這個決議。然而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否認這是黨底決議。同樣，一九〇八年通過的關於取消主義問題的決議，也是黨底決議。在這個問題上玩弄任何支吾搪塞手段，都不過是想把工人們引入迷途而已。

誰想不僅僅在口頭上承認黨，那他在此地就不會容許任何的支吾搪塞，而一定會找出黨論取消主義問題決議底真理。從一九〇九年起，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一切護黨的孟什維克，都附和了這個決議；普列漢諾夫在他所出版的日記和其他許多馬克思主義刊物上，曾經屢次和十分肯定地解釋過：取消黨的人是不能留在黨內的。

普列漢諾夫過去是，而且將來還會是個孟什維克。可見，取消派通常認為一九〇八年通過的黨決議帶有『布爾什維克』性質的說法，是更加不正確的。

取消派在光線或在我們的曙光上愈是謾罵普列漢諾夫，便愈加顯然證明取消派無理，證明他們只是企圖用喧鬧，叫喊和吵架手段來蒙蔽真情。雖然有時用這些手段也能一下子使幼稚份子茫然失措，但工人們畢竟能自行辨別是非，而且很快就會鄙棄這些謾罵語句的。

工人底統一是否必要呢？當然是必要的。

沒有工人組織底統一，試問能不能有工人底統一呢？當然不能。

阻礙工人黨統一的是什麼呢？是因取消主義問題而發生的爭論。

由此可見，工人應當理解這些爭論，以便自行解決自己黨底命運，捍衛自己的黨。

要做到這一點，第一步就須認識黨論取消主義問題的第一個決議。工人們應當切實知道和細心思索這個決議，而拋棄一切躲避問題或移開問題的企圖。每一個工人把這個決議思索一番，就會開始瞭解：取消主義問題底實質究竟何在；爲什麼這個問題如此重要，如此『麻煩』；爲什麼在四年有餘的反動時代內，這個問題總是擺在黨面前。

在下篇文章內，我們將考察黨論取消主義問題的另一個重要決議，即約在三年半以前所通過的決議，然後就要考察決定問題現狀的種種事實和文件。

(二)一九一〇年的決議

在第一篇文章內（真理報第二百八十九期），我們已經引證了凡想探知目前爭論真情實況的工人所必須認識的第一個基本文件，即黨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間通過的論取消主義問題的決議。

現在我們要引證和考察黨對於這個問題所通過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決議，即三年半以前，一九一〇年一月¹³³所通過的決議。這個決議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因爲它是一致通過的：一切布爾什維克，一切所謂前進派¹³⁴，以及（這是最重要的）一切孟什維克和現在的取消派，一切『民族的』（即猶太的，波蘭的，拉脫維亞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贊成了這個決議。

我們且把該決議最重要的一段完全引錄出來：

『社會民主運動在資產階級反革命時代所處的歷史環境，必然使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有兩種表現：一方面是否

認秘密社會民主黨，降低它的作用和意義，企圖縮小澈底社會民主黨底綱領任務和策略任務以及黨底口號等等；另一方面就是反對社會民主黨在杜馬中進行工作和利用公開機會，不懂得前後兩種工作底重要，不善於使澈底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去適應目前時局中的特殊歷史條件等等。

在這種條件下，社會民主黨策略中的必要成分，就是要在無產階級底一切階級鬥爭方面擴大和加深社會民主黨的工作，說明這兩種傾向底危險，以求克服這兩種傾向』。

從這個決議中就可看出，在三年半以前，一切馬克思主義者，所有一切派別中的份子，都得一致認為有離開馬克思主義策略的兩種傾向，認為兩種傾向都有危險，認為兩種傾向都不是由於什麼偶然原因，不是由個別份子底惡意所引起，而是由現代工人運動底『歷史環境』所致然。

況且，在一致通過的黨決議中，又指出了這兩種傾向底階級淵源和意義。因為馬克思主義者並不以空空洞洞指出分崩離析的現象為限。大家都看得見，在許多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腦海中，充滿着離析、猶疑、消沉、疑惑的思想。單祇承認這一點是不夠的。同時還必須瞭解這種分崩離析思想底階級淵源是什麼，無產階級朋友們中間的這種『混亂』狀態究竟是由那些非無產階級成份中的階級利益所引起的。

黨在三年半以前通過的決議，就對這個重要問題給了一個答覆：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傾向是由『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環境所產生出來的，是由『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所產生出來的。

這些勢必使無產階級去聽憑資產階級支配的傾向，究竟是什麼呢？其中有一個傾向是與『前進主義』根本相聯，它反對社會民主黨人在杜馬中進行工作和利用公開機會，——這個傾向幾乎完全消滅了。現在俄國已沒有一個社會民主黨人鼓吹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

錯誤觀點了。『前進派』份子（包括阿列克新斯基等等在內）已開始來在真理報上與護黨的孟什維克並列工作了。

黨決議中所指出的另一個傾向，就是取消主義。這是可從決議上指明『否認』祕密組織和『降低』它的作用及意義的條文中顯然看出的。末了，我們還有一個最確切的文件，是三年以前發表出來而且誰也沒有把它推翻的文件，即是從一切『民族』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托洛茨基（取消派不能想出比他們更好的證人了）方面產生出來的文件；這個文件公開說：『其實，最好是把決議案中所指出的那個必須與之鬥爭的派別稱呼為取消派』…

總之，每一個願意理解現時爭論的人所應當認識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實是：三年半以前黨一致認為取消主義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危險』傾向，是必須與之鬥爭的傾向，是表現『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的傾向。

具有反民主情緒，具有一般反革命情緒的資產階級底利益，是要求把舊有無產階級政黨取消，要求把它解散的。資產階級極力散佈和援助一切趨向於取消工人階級政黨的思想。資產階級力求散播背棄舊有任務的思想，力求『縮短』，截短，割去和闖割這些任務，力求去與普里什克維奇輩實行調和或妥協，而不願澈底剷除他們的政權基礎。

取消主義也就是把這些資產階級的背叛變節思想傳佈到無產階級中間來的表現。

三年半以前一致通過的黨決議所指出的取消主義底階級意義，就是如此。全黨認為取消主義底最大害處和危險性，它對工人運動，對工人階級獨立（在實際上，而不是在口頭上獨立）政黨團結事業的危害作用，也就在此。

取消主義不僅是要取消（即解散，破壞）舊有工人階級政黨，而且是要破壞無產階級底階級獨立性，用資產階級思想來敗壞無產階級意識。

在下一篇論文內，我們將用一目瞭然的例子來說明對於取消主義的這種估計，把取消派的光線報上最重要的議論，完全引錄出來。現在我們且把以上所述作一簡括的總結。一般『光線派』，尤其是唐恩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企圖把全部『取消主義』都形容為捏造出來的罪名的說法，乃是一種非常虛偽的遁辭，是指望光線報讀者全不知道實情的遁辭。其實，除一九〇八年通過的黨決議之外，還有一九一〇年一致通過的黨決議，這個決議對於取消主義給了完滿的估計，認為它是離開無產階級道路的資產階級傾向，對於工人階級有致命危險的作用。只有工人階級底敵人，才能隱瞞或迴避黨所作的這個估計。

(三)取消派對一九〇八和一九一〇年決議的態度

在前一論文裏（真理報第九十五期（第二百九十九期）），我們已經確切引證了一致通過的那個論取消主義問題的黨決議，認為取消主義是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影響底表現。

我們已經指出，這個決議是在一九一〇年一月通過的。現在，我們就來考察至今還敢於武斷說過去現在都沒有什麼取消主義存在的那些取消派份子底行爲吧。

一九一〇年二月，波特列索夫先生在當時剛剛出版的我們的曙光雜誌第二期上公然寫道：『像一個完整有組織體系』（即層級或『機關』系統）『那樣的政黨是沒有的』，根本也就不能取消『事實上已經不是一個有組織整體』的東西（見我們的曙光，一九一〇年第二期，第六一頁）。

這是在黨一致通過決議以後一個月，而且也許還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寫的！！

一九一〇年三月，取消派所出版的另一個雜誌，也是由波特列索夫，唐恩，馬爾丁諾夫，葉紹夫，馬爾托夫和列維茨基一流人參加撰稿的雜誌，即復興雜誌，又強調了波特列索夫先生所說的話，並加以通俗說明：

『根本也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消，而且——我們（即復興雜誌編輯部）還要補充說——夢想恢復這個機關體系舊有的那種祕密形式，簡直是一種有害的反動空想，它是表明從前最富於現實主義精神的政黨底代表們失掉了政治的感覺』（復興雜誌，一九一〇年第五期，第五一頁）。

黨已經沒有了，要想恢復它，就是一種有害的空想，——這乃是明顯而肯定的言論。這乃是明顯而公然背棄黨的態度。這些背棄了黨（並且勸導過工人來背棄黨）的人，也就是拋棄了祕密組織和『夢想』公開黨的那些人。

其次，一九一二年間，阿克雪里羅得在涅瓦呼聲（一九一二年第六期）和我們的曙光（一九一二年第六期）上，也十分肯定而公開地擁護了這種離開祕密組織的行爲。

『情形既是如此』，——阿克雪里羅得當時寫道，——『那末談論什麼非派別組織，就無異於害怕正視現實，就無異於自欺欺人』。『派別組織的形成和團結，是主張黨內改良者，或正確些說，主張黨內革命者底直接責任和迫切任務』。

總之，阿克雪里羅得公開主張黨內革命，即主張消滅舊有的黨，而建立一個新的黨。

在一九一三年光線報第一百零一期所載的那篇沒有署名的編輯部社論上，公然說道，『在某些工人羣衆中間，甚至有同情祕密組織的心理復活和鞏固起來』，這是『令人痛心的事實』。後來，該文作者色多夫自己承認說，這篇論文甚至在贊成光線報策略的人們

中間也『引起了不滿』（我們的曙光，一九一三年第三期，第四九頁）。而且色多夫自己的解釋又引起了一個擁護光線報的人，即安恩¹³⁵方面的新的不滿，安恩在光線報第一百八十一期上發表文章反對色多夫。安恩反對色多夫所謂『祕密組織能障礙我們運動在政治上形成事業，能障礙工人社會民主黨建立事業』的意見。安恩譏笑色多夫，說他對於是否要有祕密組織的問題，『態度動搖不定』。

光線報編輯部在安恩論文後面加了一篇很長的跋言，表示贊成色多夫，而認為安恩『對色多夫所作的批評是不對的』。

我們在下面還會把光線報編輯部底議論以及安恩本人底取消派錯誤拿來批判一下。現在問題並不在此。現在我們應當仔細估計從我們引證的這些文件中得出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結論*。

無論在一九〇八年或在一九一〇年，全黨都斥責和駁斥了取消主義，詳細而明確地說明了這一派別底階級來源和危險。所有一切取消派的報紙和雜誌：無論是復興（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亦無論我們的曙光（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三年），涅瓦呼聲（一九一二年），光線（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都是在已有最確定的，

*列寧在馬克思主義與取消主義文集中已將此段改變如下（按列寧手稿摘載）：

『在生動的生活第八期上（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九日出版），查蘇里奇數十百次重復取消派議論而寫道：『很難斷定這個新的組織（社會民主黨）究竟是幫助還是妨礙了…工作』。這種說法顯然是等於背棄黨。查蘇里奇認為從黨內脫逃出去是正當的，說人們紛紛退出組織是『因為當時那裏無事可作』。查蘇里奇創出一種純粹無政府主義的理論，認為應該用『廣大階層』來代替黨。在一九一三年教育雜誌第九期上，讀者可以見到我們對於這個理論所作的詳細分析。

從這些文件中應得出怎樣的基本主要結論呢？——編者。

**在馬克思主義與取消主義文集中補充有『無論新工人報（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一語以及如下一段腳註：

甚至一致通過的黨決議之後，還重復着一些包含有明顯取消主義思想的意見和議論。

甚至擁護光線報的人也不得不聲明說不同意這種議論，不同意這種宣傳。這是事實。因此，像托洛茨基、謝科夫斯基及其他許多袒護取消派的人那樣叫喊，說什麼有人『迫害』取消派，簡直是不誠實的，因為這是公然歪曲事實。

我所援引的五年多以來（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三年）的文件所證實的事實，就在於取消派侮蔑黨所通過的一切決議，繼續對黨，即對『祕密組織』，橫施謾罵和攻擊。

每個願意自己十分認真理解黨內爭論問題和麻煩問題，願意獨自解決這些問題的工人，都應當首先明瞭這個事實，並爲此而獨立設法去研究和檢查上述的黨底決議與取消派底議論。祇有細心研究、思索並獨立解決自己黨底問題和命運的人，才配稱爲黨員和建設工人黨的人。究竟是黨犯了『迫害』（即是過分激烈而不正確的攻擊）取消派的『罪過』呢，還是取消派犯了公然違背黨決議，而橫蠻鼓吹取消黨，即破壞黨的主張的罪過呢，——對於這個問題是不能抱淡漠態度的。

很明顯的，黨若不竭力去和破壞黨的人作鬥爭，便不能存在。

上面我們已經引證了關於這個基本問題的種種文件，而我們在下一篇論文內就要把鼓吹成立『公開黨』的這一主張底思想內容估計一下。

『例如，新工人報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期所載新年獻辭中寫道：「設法造成公開行動的政黨也就是設法造成黨內統一」（是說公開黨建立者間的統一麼？）。又如一九一四年第五期上寫道：「克服這些東西（即克服橫在組織工人代表大會途程上的一切障礙），也就完全真正是爲結社自由而鬥爭，即爲工人運動合法權而鬥爭，這工人運動是與爭取社會民主工黨公開存在權的鬥爭分不開的」。——編者。

(四)取消主義底階級作用

我們在前面幾篇論文內（見真理報第二百八十九，第二百九十九，第三百一十四等期）已經指出：無論在一九〇八年或一九一〇年，所有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毅然決然地斥責了取消主義，認為它是一種背棄原有一切的思想。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向工人階級說明，取消主義就是把資產階級底影響傳播到無產階級中去。從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間所有一切取消主義的刊物，都公然違背了而且繼續違背着馬克思主義者底各次決議。

現在我們就要來考察取消派至今還在光線報和我們的曙光雜誌上擁護的那個建立「公開的工人黨」或「為公開黨而鬥爭」的口號。

良，同時又害怕民衆運動。想要排擠農奴主，同時又害怕失去他們的幫助，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權。農奴主執掌全部政權，而資產階級享有種種特權的六三制度，就是建築在這種階級勢力對比上的。

無產階級底階級地位，就使它絕對沒有可能去與任何人『分享』特權或害怕任何人失去這些特權。因此，無產階級根本沒有沾染那種貪求私利，近視，鄙陋和魯鈍的改良主義思想。至於農民大眾，因為他們一方面備受壓迫，只能遭到飢餓而看不見什麼特權，另一方面又因為他們顯然是小資產階級性的，所以必然動搖於自由派和工人之間。

客觀情形就是如此。

從這一情況中也就可以顯然看出，公開工人黨這一口號，按其階級淵源說來，是反革命自由派底口號。其中除改良主義思想而外，再沒有別的東西；其中絲毫也沒有表明無產階級這個唯一澈底的民主階級懂得它必須與自由派爭奪對整個民主派的影響的任務；其中甚至沒有半點想要消滅農奴主、『官僚』等等底任何特權基礎的念頭；其中甚至沒有半點想要奠定政治自由和民主憲制一般基礎的念頭；可是，其中却包含有力圖把舊有一切都默然背棄，因而也就是叛變工人黨和解散（取消）工人黨的思想。

簡而言之：這個口號在反革命時代把恰巧是自由派資產階級在自己隊伍中間所作的事情拿到工人隊伍中間去宣傳。因此，如果沒有取消派的話，那聰明的進步派資產者就一定要找出或僱用一些智識份子來把這種宣傳帶到工人階級中去的！

祇有那些昏庸愚昧的人，才能拿取消派底言論去和取消派底動機對照。其實，應當把他們的言論和自由派資產階級底行動及其客觀地位去對照。

請看這些行動吧。一九〇二年，資產階級是主張秘密組織的。當時它派司徒盧威去秘密出版解放雜誌。當工人運動引起十月十七

日事變¹³⁶的時候，自由派和立憲民主黨人便拋棄了祕密組織，然後就背棄了這種組織，說它是用不着的東西，不合理的事情，作惡犯罪和無法無天的事情（路標）*。此時，自由派資產階級已用爭取公開黨的鬥爭代替了祕密組織。這是一件歷史事實，這件事實是立憲民主黨人（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和進步黨人（一九一三年）始終不斷企圖變成合法組織的行爲所證實了的。

我們在立憲民主黨人那裏看見『公開工作及其祕密組織』；善良的，即不自覺的取消派份子弗拉索夫不過是『用自己的話』把立憲民主黨人的行動轉述出來罷了。

爲什麼自由派背棄祕密組織而採取了『爲公開黨而鬥爭』這一口號呢？是不是因爲司徒盧威成了叛徒呢？不是的。恰恰相反，司徒盧威之所以轉到了另一方面去，是因爲整個資產階級都轉變過去了。而資產階級之所以轉變過去，第一是因爲它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得到了特權，甚至在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¹³⁷得到了做個溫和可忍的反對黨的地位；第二是因爲它自己被民衆運動嚇得要命了。『爲公開黨而鬥爭』這一口號，從『高深的政治』譯成簡單明瞭的語言，就等於說：

——地主老爺們！不要以爲我們想來打倒你們呀。不是的。請你們稍微讓出一點地方，使我們資產者也可以坐下來（公開黨），——那時候我們來保護你們，就會比齊莫石金輩和薩布列爾派的神父們¹³⁸還要『聰明』，狡猾，『科學』許多倍哩。

小資產者，民粹派，也模倣着立憲民主黨人，採取了『爲公開黨而鬥爭』這一口號。一九〇六年八月，俄國財富上的壁舍浩諾夫先生

*在馬克思主義與取消主義文集中已將『路標』一語刪去而添上了如下一段腳註：

『有一部極妙的書，叫作路標集，已重版過多次；它是集這些反革命自由主義思想於大成的總匯』。——編者。

及其伙伴們背棄了祕密組織，宣佈了『爲公開黨而鬥爭』的口號，割去了自己綱領中那些澈底民主主義的，即『祕密組織的』口號。

由於這些庸人改良主義者空談什麼『廣泛公開黨』的結果，於是他們也就衆目昭彰地失去了任何政黨，失去了與羣衆的任何聯系，立憲民主黨人甚至已不願再來幻想這種聯系了。

這樣，且只有這樣來分析各個階級底地位，考察反革命時期底一般歷史，才可瞭解取消主義。取消派就是資產階級派遣來把自由主義腐化毒素傳播到工人中間去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取消派是馬克思主義叛徒和民主運動叛徒。他們（也如自由派或民粹派那樣）提出『爲公開黨而鬥爭』這一口號，不過是要藉以掩蓋他們背棄傳統而脫離工人階級的事實罷了。這是工人選民團選舉第四屆杜馬代表的情形以及工人的真理報產生的經過情形所證明了的事實。大家都看得清楚，只有那些並未背棄傳統而善於專門本着這個傳統精神，並爲加強、鞏固和發展這個傳統來利用『公開工作』和一切『可能性』的人，才是與羣衆有聯系的。

在六三制度時代，本來也非如此不可。

在下一篇論文中，我們就要談到取消派（即自由派）怎樣『截短』綱領和策略的問題。

（五）『爲公開黨而鬥爭』的口號

在前一論文裏（真理報第一百二十二期），我們已經考察了『公開黨』或『爲公開黨而鬥爭』這一口號底客觀意義，即由階級對比所決定的意義。提出這個口號就是盲目仿效資產階級策略；對於資產階級說來，這個口號是正確表明它那種背棄革命行爲或它那種反革命性質的。

現在我們就要考察取消派中間特別流行的幾種擁護『爲公開黨而鬥爭』這一口號的伎倆。無論馬葉夫斯基，色多夫，唐恩以及一切

『光線派』份子，都力圖把公開黨和公開工作或公開活動混爲一談。這樣混淆，簡直是詭辯，耍把戲，欺騙讀者。

第一，就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三年這一時期來說，社會民主黨人底公開活動是一件事實。公開黨却是智識份子所用以掩蔽叛黨行爲的一種詞句。第二，黨已屢次斥責過取消主義，即公開黨這一口號。但是，黨不僅沒有斥責過公開活動，反而斥責過忽視這種活動或背棄這種活動的人。第三，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七年間，所有一切社會民主黨人都特別努力進行過公開活動。但是，當時在社會民主黨人中，無論那個思潮，無論那個派別組織，都沒有提出過『爲公開黨而鬥爭』的口號！

這是一件歷史事實。這件事實是每個願意瞭解取消主義的人所應當思索一下的。

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七年間缺少『爲公開黨而鬥爭』這一口號的事實，是否妨碍過公開活動呢？絕對沒有妨碍過。

爲什麼當時在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沒有發生這種口號呢？正是因爲當時還沒有使一部份社會民主黨人滾到極端機會主義立場上去的反革命勢力猖獗的情形。當時非常顯而易見，『爲公開黨而鬥爭』這一口號是機會主義的詞句，是背叛『祕密組織』的行爲。

諸位先生們，請仔細思索這個歷史轉變底內容吧：在一九〇五年時代，當公開活動蓬勃發展時，是沒有『爲公開黨而鬥爭』這一口號的；在反革命時代，當公開活動發展得比較薄弱時，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就（跟着資產階級）提出了背叛『祕密組織』和『爲公開黨而鬥爭』的口號。

難道這一轉變底內容和階級作用還會不明顯麼？

最後，還有第四個情況，而且是最主要的情況。公開活動可能表現於（而且確實表現於）兩種方式，兩種絕對相反的方向：

一種是要保護舊有傳統，完全本着它的精神，擁護它的口號和策略，另一種是反對這個舊有傳統，背棄它，降低它的作用和口號等等。

這兩種原則上相反而不可調和的公開活動並存的現象，乃是一九〇六年（立憲民主黨人和璧舍浩諾夫先生及其伙伴）至一九一三年（光線報，我們的曙光雜誌）這個時代中極無疑義的歷史事實。因此，當你聽到一個蠢漢（或一個暫時裝作蠢漢的人）說既然雙方都進行公開活動，試問究竟還有什麼可以爭論等等時，能否不發笑呢？我們要向這個蠢漢說：親愛的人呵，這裏所爭論的恰恰是究竟應當如何來進行這個活動：是應當爲着保護『祕密組織』和本着它的精神來進行呢，還是應當爲着降低祕密組織底作用，反對它，不本着它的精神來進行呢！所爭論的只是——不過『只是』！——在於：是本着自由主義的精神，還是本着澈底民主主義的精神來進行這個公開工作。所爭論的『只是』在於能否以公開工作爲限：請記起自由派的司徒盧威先生吧，他在一九〇二年是不局限於這個工作的，而在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三年間却已完全『局限於』這個工作了！

光線報上的那班取消派始終不能瞭解，所謂『爲公開黨而鬥爭』這一口號，就是用『幾乎是馬克思主義的』詞句把自由主義的（司徒盧威主義的）思想裝飾起來，將其傳播到工人中間去。

或者拿光線報編輯部自己在回答安恩時所發揮的議論（第一百八十一期上）來看吧：

「…社會民主黨並不是因被實際生活所迫而不得不祕密進行工作的少數同志所能概括的。其實，如果黨是祕密組織所能概括的話，那末它會有多少黨員呢？兩三百個人麼？而在事實上擔負全部社會民主黨工作的成千的工人——也許有成萬的工人——又到那裏去了呢？」

每一個有腦筋的人，只要聽見這一段議論，就會要認定說這段議論的人們是自由派了。第一，他們關於『秘密組織』所說的話是顯然不符事實的：其中絕對不止『數百個』人。第二，在世界各國，黨員數目比起進行社會民主黨工作的工人數目來，總是『狹小』的。例如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祇有一百萬黨員，而贊成社會民主黨的票數約有五百萬，無產者人數有一千五百萬左右。黨員人數和社會民主主義者數目間的比例，是由各國歷史條件上的差異來決定的。第三，我們並沒有其他一種可以代替『秘密組織』的東西。這就是說，光線報是藉口於非黨工人或黨外工人來反對黨。這也就是極力想使羣衆離開其覺悟先鋒隊的那些自由派份子所慣用的手段。光線報不懂得黨對階級的關係，也如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一年間的『經濟派』不懂得這種關係一樣。第四，現在我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作』，只有本着舊有傳統精神，爲着舊有口號來進行，才是真正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作。

光線報底議論是自由派智識份子底議論，他們不願意加入真正存在着的黨組織中來，而唆使那些散漫，少覺悟的非黨羣衆去反對它，企圖以此來破壞這個組織。德國的自由派也就這樣來幹，硬說社會民主黨人不是無產階級底代表，因爲在他們『黨』內『只有』十五分之一的無產階級份子！

再拿光線報上更流行的一種議論來看吧：『我們』主張公開黨，『如在歐洲那樣』。自由派和取消派願意有憲法和公開黨，『如在歐洲』今日那樣；可是他們不願意走歐洲達到這個今日的那條道路。

取消派份子兼崩得份子的科索夫斯基，在光線報上拿奧國人做例來教訓我們。可是他忘記了，奧國人從一八六七年就有了憲法，而且這個憲法如果沒有（一）一八四八年的運動以及（二）一八五九至一八六六年間的深刻的國家危機——當時只是由於工人

階級力量薄弱，才使俾斯麥一流人能於用所謂『從上面實行的革命』逃出了難關，——是決不會產生出來的。但是從科索夫斯基，唐恩，拉林以及一切『光線派份子』底訓誨中能得出什麼結論呢？

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他們幫助一定要用『從上面實行的革命』來解決我國危機的事情！但他們的這種工作也就是斯托雷平工黨底『工作』哩。

無論我們向什麼地方瞧去，到處都可以看見取消派既背叛馬克思主義，又背叛民主運動。

在下一篇論文裏，我們就要詳細考察他們認為必須截短我們社會民主黨口號的議論。

(六)

現在我們就要來考察取消派怎樣截短馬克思主義的口號。爲了這個目的，最好是拿他們八月代表會議底決議來作根據，但是，由於種種不言而喻的原因，這些決議只可拿到國外刊物上去分析。所以，此地只得拿光線報來作根據，光線報在Л.С.所寫的那篇論文中（第一百零八期（第一百九十四期）），對於取消主義底全部實質，全部精神，都有極確切的敘述。

Л.С.先生寫道：

『…杜馬代表穆拉諾夫暫時只承認三個局部要求，即大家都知道是列寧派底選舉運動綱領所根據的三大要求：國家制度完全民主化，八小時工作制，土地歸農民。真理報仍然站在這個觀點上，但我們也如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一樣』（請讀作：『我們也如那位硬說，謝謝上帝，我國已有憲法的米留可夫一樣』）『認為，提出局部要求，是只有顧到工人羣衆日常鬥爭時，才能發生效果的一種鼓動手段。只有那在一方面對於

工人運動向前發展有原則意義，而在另一方面又能成爲羣衆迫切要求的東西，我們才認爲可以提出來作爲社會民主黨在目前應集中注意的局部要求。真理報所提出的三個要求中，只有一個要求，即八小時工作制，是在工人日常鬥爭中發生作用，而且可能發生作用的。其餘兩個要求在目前能成爲宣傳對象，但不能成爲鼓動對象。關於宣傳和鼓動的差別，可參看普列漢諾夫所著消除飢荒一書中所有的那些燦爛言論』（Л. С. 走錯了路：他『不忍』回憶起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間普列漢諾夫與『經濟派』的論戰，因爲Л. С. 自己的這些議論，就是從經濟派那裏抄來的！）。

除了八小時工作制之外，工人運動底需要和俄國生活底全部行程所提出的局部要求，便是結社自由，各種組織自由，包括集會和言論（口頭言論和出版言論）自由在內』。

你們看，這就是取消派底策略。看呵！Л. С. 用『完全民主化等等』字樣描寫的要求，以及他所稱爲『土地歸農民』的要求，都不是『羣衆迫切要求』，都不是『工人運動底需要』和『俄國生活底全部行程』所提出來的要求！！這是多麼陳腐的議論呵，這是每一個記得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實踐歷史的人，記得馬克思主義者多年與背棄民主運動任務的『經濟派』進行鬥爭的人多麼熟識的議論呵！光線報真是天才獨到地抄襲着普羅科坡維奇和枯斯科娃當時企圖把工人引上自由主義道路的觀點呵！

但我們還是來更仔細地分析分析光線報底議論吧。在頭腦健全的人看來，這個議論簡直是一種發瘋的議論。例如，難道不是只有神經錯亂的人，才敢斷定上面所說的那個『農民』要求（就是說，有利於農民的要求）不是『羣衆迫切要求』麼？才敢斷定它不是『工人運動底需要和俄國生活底全部行程所提出來的』麼？這不僅是謊話，而且是荒謬已極的胡說。俄國十九世紀底全部歷史，全部

『俄國生活行程』都已提出了這個問題，使它成了迫切的和最迫切的問題，這點就在俄國全部立法上也反映出來了。光線報爲什麼會說出這樣駭人聽聞的謊話呢？

光線報理應說出這種謊話來，因爲它被自由派的政策所束縛，而自由派是當然要反對（或如光線報那樣擱置）農民要求的。自由派資產階級所以這樣幹，是因爲它的階級地位使它不能不迎合地主，反對民衆運動。

光線報向工人灌輸自由派地主思想而背叛民主農民。

其次。難道只有結社自由才算『迫切』麼？人格不可侵犯呢？廢除專橫獨裁制度呢？普遍等等的選舉制呢？一院制呢？以及其他等等呢？凡有常識的工人，凡記得不久以前的事實的人，都分明知道這些盡是迫切的。所有一切自由派份子在成千累萬的文章和講演中，都承認這些盡是迫切的。爲什麼光線報只承認一種——就算是最重要的一種——自由迫切，而把政治自由，民主制和立憲制度底根本條件都一筆勾消，擱置一旁，交到『宣傳工作』的檔庫中去，拋棄到鼓動工作範圍以外去了呢？

就是因爲，而且祇是因爲光線不接受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東西。

從羣衆迫切需要程度，工人運動底種種需要，以及俄國生活底行程方面看來，穆拉諾夫和真理報所說的三個要求（簡而言之：徹底馬克思主義者底要求），是沒有什麼差別的。無論工人要求，農民要求以及一般政治要求，都同樣是羣衆迫切需要，同樣是工人運動底種種需要和『俄國生活底全部行程』所提出的。從我們那位愛講溫和客氣的人所歡喜的『局部性』方面看來，所有這三個要求也是同樣的：它們對最終目標說是『局部的』，但它們對——舉例說——一般『歐洲』說，却是很高的。

爲什麼光線報接受八小時工作制的要求，而反對其餘的要求

呢？爲什麼它替工人來斷定說，八小時工作制在他們的日常鬥爭中『發生作用』，而一般政治要求和農民要求則不發生這種作用呢？事實告訴我們：一方面，工人在日常鬥爭中，既提出一般政治要求，又提出農民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們往往爲更細微的縮短工作時間的要求而鬥爭。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就是光線報持着改良主義態度，把自己的這種自由主義的狹隘性，照例卸在『羣衆』和『歷史行程』等等頭上。

一般改良主義底實質，就是只去鼓動實行那些不必消滅舊有統治階級主要基礎的變更，可與保存這些基礎相容的變更。八小時工作制是可與保存資本權力相容的。爲吸引工人起見，俄國自由派自己也決意贊成（『在可能範圍內』）這個要求。至於光線報所不願意『鼓動的』那些要求，則是與保存資本主義前期農奴制度基礎不能相容的。

光線報所排斥於鼓動範圍以外的，正是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東西，因爲自由派不願消滅地主政權，而只願和地主瓜分政權和特權。光線報所排斥的正是與改良主義觀點不能相容的東西。

要點就在這裏。

無論穆拉諾夫，無論真理報以及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是不反對局部要求的。如果說我們反對局部要求，那便是說廢話。保險運動就是一個例證。我們反對用空談所謂局部要求，用改良主義來欺騙羣衆。我們反對現代俄國的自由派改良主義，因爲它是一種空想，欺假自私，基於立憲幻想，充滿着逢迎地主心理的東西。要點就在這裏，而光線報則用什麼一般『局部要求』的空話來蒙混掩蔽這個要點，雖然它自己也承認，無論穆拉諾夫或真理報，都是不反對某些『局部要求』的。

光線報截短馬克思主義的口號，使其適合於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的狹小尺度，這樣把資產階級的思想灌輸到工人中間來。

馬克思主義者與取消派鬥爭，不過是先進工人爲影響民衆，爲在政治上教育訓練民衆而與自由派資產者鬥爭的表現罷了。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舊曆十二日），五月九日（舊曆四月二十六日），五月二十八日（舊曆十五日），六月十一日（舊曆五月二十九日），六月十三日（舊曆五月三十一日），六月十五日（舊曆二日）刊載於真理報第八十五期，第九十五期，第一百一十期，第一百二十二期，第一百二十四期，第一百二十六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九卷，第一二三至一四四頁。

論高喊統一而實則 破壞統一的行爲

現代工人運動中的問題，在許多方面，尤其是在代表着這個運動底昨天（即歷史上剛才過去的階段）的那些人看來，都是些麻煩問題。屬於這類問題的，首先就是關於所謂派別組織以及分裂等等的問題。參加工人運動的智識份子，往往用一種憤激的，急燥的，幾乎是發瘋的口氣請求不要提起這些麻煩問題。在那些經歷過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各派長期——例如從一九〇〇年或一九〇一年起——鬥爭的人聽起來，自然覺得有許多關於這些麻煩問題的議論，都是一種無謂的重復。

但是，參加過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十四年來（更不必說是十八九年來，如果從『經濟主義』表現出最初徵候時算起的話）鬥爭的人，現在已不很多了。現在絕大多數補充馬克思主義者隊伍的工人，對於舊日的鬥爭，不是記得不清楚，便是全不知道。在這絕大多數的工人看來，麻煩問題是特別饒有興趣的（我們的雜誌所舉行的讀者調查，也足以證明這一點）。所以，我們打算把這些似乎是初次（而對於年輕的一輩工人，確實是初次）由托洛茨基底『非派別組織性的工人雜誌』，即鬥爭雜誌提出來的問題講一下。

(一)論『派別組織性』

托洛茨基稱自己的新雜誌爲『非派別組織性的』。他在廣告中把這幾個字放在第一位，他在鬥爭雜誌社論以及他在鬥爭雜誌出版前發表於取消派北方工人報上的一篇專論該雜誌的文章中，都強調着這一點。

什麼叫做『非派別組織性』呢？

托洛茨基底『工人雜誌』是托洛茨基替工人出版的雜誌，因爲在這個雜誌中絲毫看不見有什麼工人方面的發起作用，也絲毫看不見它和工人團體有什麼聯系。托洛茨基爲求通俗起見，就在他替工人出版的雜誌上，對讀者解釋『疆土』和『因素』等等名詞。

這是很好的。但是爲什麼不也替工人解釋『非派別組織性』這個名詞呢？難道它比疆土和因素這些名詞更淺鮮易懂些麼？

當然不是因爲這個原故，而是因爲最壞的派別組織性餘孽底最壞代表人物，用『非派別組織性』幌子來實行欺騙年輕的一輩工人。這點是值得說明一下的。

派別組織性是社會民主黨在一個相當歷史時代的主要特點。究竟是什麼時代呢？就是從一九〇三年起，至一九一一年止。

要儘量明顯地說明派別組織性底實質，必須記起例如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時期的具體條件。當時黨是統一的，沒有分裂，但是當時有派別組織性，即實際上在統一的黨內存在有兩個派別組織，兩個事實上彼此分立的組織。當時下層工人組織是統一的，但對於每個嚴重問題，兩個派別組織都規定出兩種不同的策略；擁護這兩種策略的人在統一的工人組織中互相爭論（例如，在一九〇六年討論杜馬內閣——或說立憲民主黨內閣——口號的時候；或是在一九〇七年選舉倫敦代表大會代表的時候）；當時問題是按多數意見來解

決的：一個派別組織在統一的斯托哥爾摩代表大會上（一九〇六年）失敗了，另一個派別組織在統一的倫敦代表大會上（一九〇七年）失敗了。

這是俄國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史中盡人皆知的事實。

只須回想起這些盡人皆知的事實，就可以知道托洛茨基所宣傳的那些言論絕對不符真情了。

從一九一二年至今已經二年有餘的這一時期，俄國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已沒有什麼派別組織性，已沒有什麼在統一的組織中，在統一的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上爭論策略問題的現象。現在所有的情形，是黨與取消派完全破裂，黨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已正式聲明過，取消派不屬於黨*。托洛茨基往往稱這種情形為『分裂』，關於這個名稱我們將在下面專門講到。但是，『派別組織性』這一名詞之與真情不符，却是毫無疑義的事實。

我們已經說過，這個名詞是把昨天，即在已經過去的時代原是正確的話拿來重復一遍，用非批評的，不合理的，無意識的態度拿來重復一遍，當托洛茨基對我們說到『派別組織鬥爭底混亂狀態』時（見第一期，第五，第六頁及其他許多頁），那就立刻可以看出他所代表的到底是那一種早已過去的東西。

試以俄國年輕工人，即在俄國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佔十分之九者底觀點來觀察現在的情形吧。他看見現在工人運動中有三種普遍表現的見解或思潮：『真理派』（該派所辦的真理報每期出版四萬份），『取消派』（一萬五千份）和左派民粹主義者（一萬份）。報紙出版的份數，可以使讀者明白某種宣傳底普遍性。

試問這與『混亂狀態』有何相干呢？托洛茨基愛講響亮而空洞的話，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混亂』一語不僅是句空話，而且

*見本書第七三五至七三六頁。——編者。

是把過去時代的僑外關係搬到（正確些說，徒勞無益的企圖搬到）現今時代的俄國基地上來。問題底實質就在這裏。

在馬克思主義者反民粹派的鬥爭中，並沒有任何『混亂狀態』。想必甚至托洛茨基也不敢作出相反的斷語吧。馬克思主義者反民粹派的鬥爭，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之久，從馬克思主義運動產生時起，就開始進行這個鬥爭。這一鬥爭底原因，就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農民在利益和觀點方面的根本分歧。如果什麼地方真有『混亂狀態』，那就僅僅是在不懂得這一點的奇怪人底腦袋中。

還有什麼可說呢？馬克思主義者反取消派的鬥爭是『混亂狀態』麼？這又是不符事實的，因為決不可把黨與那個已由全黨認作一個思潮，並且從一九〇八年起就已受到全黨痛斥的思潮所進行的鬥爭，稱爲混亂狀態。而每一個注意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史的人，都知道，取消主義甚至按其領袖和參加人底成份來說，也都是與『孟什維主義』（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八年）以及『經濟主義』（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三年）有不可分離的密切聯系的。可見，這裏我們也看見有幾達二十年之久的歷史。把自己黨底歷史當作『混亂狀態』來看待，就是一種無可原諒的愚蠢見解了。

可是，從巴黎或維也納方面的觀點上來考察現在的情形，那末一切都會是另一個樣子了。除了『真理派』和『取消派』之外，至少還有五個俄僑『派別組織』，即是想要把自己列入同一社會民主黨內的單獨團體：托洛茨基底團體，『前進派』底兩個團體，『布爾什維克護黨派』¹³⁹以及『孟什維克護黨派』。這在巴黎和維也納（我拿兩個特別巨大的中心做例子），是所有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很明白知道的。

在這裏，托洛茨基底話是相當正確的：這確實是派別組織性，這真是混亂狀態！

『派別組織性』，就是說在表面上統一（在口頭上，大家都是在一個黨內），而在事實上則是彼此分立（在事實上，各個團體彼此獨立，彼此進行談判和協商，儼如一些獨立的強國）。

『混亂狀態』，就是說（一）沒有一種可受審查的客觀材料來說明這些派別組織與俄國工人運動的聯繫，（二）沒有什麼材料可用來判斷這些派別組織底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真面目。試拿足足兩年的時期，即一九一二和一九一三這兩年來說吧。大家知道，這是工人運動活躍和高漲底年代，當時任何一個多少類似羣衆性的（而在政治上，是只有羣衆性的東西才會有作用的）思潮或派別，都不能不在第四屆杜馬選舉上，在罷工運動中，在公開的報紙上，在工會中，在保險運動等等中表現出來。在這整整兩年的時期內，這五個僑外派別組織中，無論那一個都是絕對沒有在上述任何一種俄國羣衆工人運動表現中顯出過絲毫作用的！

這是每個人都容易檢查的事實。

而這個事實也就證明了我們認為托洛茨基是個『最壞的派別組織性餘孽』代表人物的說法。

凡是對俄國工人運動狀況有些認識的人，都顯然知道口頭上以非派別組織自命的托洛茨基是『托洛茨基派別組織』底代表，這裏真有派別組織性，因為這裏有派別組織性底兩個重要特徵：

（一）表面上承認統一，（二）事實上是派別獨立。這裏有派別組織性底餘孽，因為這裏根本沒有一點和俄國羣衆工人運動的真正聯繫。

末了，這裏有最壞的一種派別組織性，因為這裏沒有任何思想上政治上的明確性。而這種明確性，無論真理派（甚至我們的堅決敵人馬爾托夫，也承認我們有依據大家知道的關於一切問題的正式決議所建立起來的『團結性和紀律』），無論取消派（他們——至少是他們中間最著名的人物——有十分明確的面目，恰巧

是自由主義的，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面目），都是具備得有的。

那些與托洛茨基派別組織同類，而僅僅從維也納和巴黎方面——但絕不是從俄國方面——看來才是真正存在的派別組織，一部份也是有一些明確性的。例如，馬哈主義的『前進』社所擁護的馬哈主義理論，是明確的；『孟什維克護黨派』堅決反對這些理論，擁護馬克思主義，同時在理論上指斥取消主義的立場，也是明確的。

托洛茨基却沒有任何思想上政治上的明確性，因為『非派別組織性』這一專利特許證，只是特許他在各個派別組織之間完全自由地飛來飛去而已（關於這點，我們往下就要詳細說到）。

結論就是：

（一）托洛茨基不說明馬克思主義中各思潮和各派別組織間思想分歧底歷史意義，並且不瞭解這一點，雖然這些分歧充滿着社會民主黨二十年來的歷史，而且涉及現時各個基本問題（關於這點，我們往下還要說明）；

（二）托洛茨基沒有瞭解，派別組織性底基本特點是表面上承認統一，事實上各自分立；

（三）托洛茨基假借『非派別組織性』這一旗幟來捍衛特別沒有原則，而在俄國工人運動裏沒有任何基礎的僑外派別組織中的一個派別組織。

發光的東西不一定是金子。托洛茨基底詞句雖有很多光彩和響亮聲音，可是沒有絲毫內容。

（二）論分裂

有人會反駁我們道：『如果說你們真理派沒有派別組織性，就是說，沒有表面上承認統一而事實上實行分立的行爲，那末你們却有更壞的行爲，即分裂主義的行爲』。托洛茨基就是這樣說的；他

不會思索自己所說出的意思，不能自圓其說，時而大喊大叫，反對派別組織性，時而又高喊什麼『分裂派接連獲得自殺主義的勝利』（第一期第六頁）。

這段話只能有一種意思：『真理派接連獲得勝利』（這是可以檢查的客觀事實，例如從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俄國羣衆工人運動底研究中便可以確定的事實），但我托洛茨基却要申斥真理派，因為他們第一是分裂派，第二是自殺主義的政治家。

我們來把這點分析一下。

首先我們要感謝托洛茨基：不久以前（從一九一二年八月至一九一四年二月），他跟着唐恩跑，大家知道，當時唐恩曾威脅說要『殺死』反取消派，並號召這樣來作。現在托洛茨基已不威脅說要『殺死』我們的思潮（和我們的黨，——請托洛茨基先生不要生氣，因為這是實話呵！），而只是預言說這個思潮自己會殺死自己！

這是柔和得多的語調哩，——是不是呢？這幾乎是『非派別組織性的』說法哩，——對不對呢？

但是笑話少說吧（雖然說笑話是對托洛茨基那種令人難堪的清談態度作柔和回答的唯一方法）。

所謂『自殺主義』，祇是一種清談，祇是一句空話，祇是『托洛茨基主義』而已。

分裂主義是一個嚴重的政治罪名。取消派以及所有上面列舉的那些從巴黎和維也納方面看來真正存在的集團，都是異口同聲重覆這個罪名來反對我們的。

但是他們大家都把這個嚴重政治罪名重覆得極不莊重。請看看托洛茨基吧。他已承認：『分裂派（請讀作：真理派）接連獲得自殺主義的勝利』；同時又補充說：

『許許多多處於政治上完全迷亂狀態中的先進工人，往往是自行成爲分裂派底積極代辦』（第一期第六頁）。

這幾句話難道不是極不莊重觀察問題的那種態度底表現麼？

現時我們在俄國工人運動舞台上碰見的，只有取消派，而你們却責備我們爲分裂主義者。那末，你們認爲我們對取消派的態度是不正確的麼？的確，所有上面例舉的那些僑外團體，無論它們彼此有多大的差別，但它們全體都認爲我們對取消派的態度是不正確的態度，『分裂主義的』態度。這也就是所有這些團體與取消派相同之點（而且是使他們在政治上彼此接近的重要之點）。

如果說我們對取消派的態度在理論上原則上不正確，那末托洛茨基就應該爽直地說明，肯定地聲明和坦白地指出，他究竟是認爲什麼地方不正確。可是，托洛茨基多年來都躲避這個重要問題。

如果說我們對取消主義的態度是在實踐上，在實際經驗上被推翻了，那就必須分析這個經驗；但這一點，托洛茨基也沒有去做。他承認：『許許多多的先進工人都成爲分裂派底積極代辦』（請讀作：真理派路線、策略、體系和組織底積極代辦）。

爲什麼會發生這種據托洛茨基承認說是被經驗所證實的可悲現象，即先進工人——而且是許許多多的先進工人——都擁護真理報的現象呢？

是因爲這些先進工人『處於政治上完全迷亂的狀態中』，——托洛茨基這樣回答道。

不消說，這種解釋對於托洛茨基，對於所有五個僑外派別組織，對於取消派，都是非常悅耳的。托洛茨基非常歡喜『以博學多聞的神情』，用誇張響亮的辭句，來給歷史現象作一種對於托洛茨基悅耳的解釋。假使『許許多多的先進工人』，都成爲與托洛茨基路線不合的那條政治路線和黨路線底『積極代辦』，那末，托洛茨基就毫不害羞地立刻直截了當地解答說：這些先進工人是『處於政治上完全迷亂的狀態中』，而他托洛茨基則顯然是處於政治路線堅

定明白正確的『狀態中』！..而這個托洛茨基同時却又搥胸大罵派別組織性，小組習氣，智識份子強制工人意志的行爲哩！..

讀到這樣的東西時，真令人不禁自問道：這類的呼聲，莫不是從瘋人院裏喊出來的麼？

關於取消主義和申斥它的問題，黨從一九〇八年起就向『先進工人』提出了，而與一定的取消派集團（即我們的曙光集團）『分裂』的問題，即祇有不要這個集團並且反對這個集團才可以把黨建立起來的問題，則是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即兩年多以前提出的。絕大多數的先進工人恰恰是擁護『一月（一九一二年）路線』的。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認這個事實，他所說的『勝利』和『許許多多的先進工人』等語，便可證明這點。但托洛茨基只是以誣衊這些先進工人爲『分裂派』和『政治上的迷亂者』的說法來搪塞了事！

凡是沒有發瘋的人，都會從這些事實中作出另一種結論。凡是有大多數覺悟工人在明確決議周圍團結起來的地方，就有意見和行動上的一致，就有黨性和黨。

凡是有被工人『撤職的』取消派份子，或兩年來毫未證明自己與俄國羣衆工人運動有什麼聯繫的五六個旅外團體立足的地方，就充滿着迷亂狀態和分裂主義。現在托洛茨基企圖說服工人，叫他們不執行馬克思主義者真理派所承認的那個『整體』底決議，就是企圖搞亂運動和引起分裂。

這種企圖是無能爲力的，可是必須揭破智識份子小團體妄自誇大的領袖，他們自己實行分裂，却又大聲責罵分裂；他們兩年多以來在『先進工人』面前已遭到完全失敗，現在却非常傲慢地侮辱這些先進工人底決議和意志，稱他們爲『政治上的迷亂者』。這完全是諾茲德列夫或猶大什克、果洛孚略夫底手段。

但我們既是政論家，就始終要重復援引誰也沒有推翻，而且誰也不能推翻的確實事實材料，來回答他們反覆說什麼分裂的喊聲。

布爾什維克在第二屆杜馬選舉時由工人選民團選出的杜馬代表中佔百分之四七，在第三屆杜馬選舉時佔百分之五〇，在第四屆杜馬選舉時佔百分之六七。

你看，這就是『先進工人』大多數所在的地方，這就是黨所在的地方，這就是大多數覺悟工人意見和行動上的一致所在的地方。

取消派反駁道（見布爾金在我們的曙光第三期上所發表的論文），說我們是用斯托雷平選舉制度下的事實作根據。這是極不合理，極不誠實的反駁。德國人根據他們在俾斯麥排斥婦女的選舉法下的選舉結果，來測量他們所獲得的勝利。只有喪心病狂的人，才會藉此來斥責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因為德國馬克思主義者雖然根據他們在現有選舉法下的選舉結果來測量他們所獲得的勝利，但是並不辯護這個選舉法中所有的各種反動限制。

同樣，我們根據在現有的選舉法下的選舉結果來測量我們所獲得的勝利，也是不辯護各種選民團或選民團制度。在前後所有三屆杜馬（第二，第三，第四屆杜馬）選舉時，都有選民團的劃分，但在同一工人選民團內部，在社會民主黨內部，發生了趨向於反對取消派的根本變動。誰不願自欺欺人，他就應當承認這件表明工人一致反對取消派的路綫獲得勝利的客觀事實。

另一個反駁也是一樣『聰明的』：『孟什維克和取消派投票擁護過（參加過選舉）某某布爾什維克』。好極了！難道在第二屆杜馬選舉時佔百分之五三，在第三屆杜馬選舉時佔百分之五〇，在第四屆杜馬選舉時佔百分之三三的非布爾什維克代表，不也是如此麼？

如果可以不用關於當選杜馬代表的事實材料，而可以引用關於工人覆選代表或初選代表等等的事實材料，那我們是很願意引用這種事實材料來的。但這種更詳細的事實材料是沒有的，因此『反駁者』不過是藉此淆亂視聽而已。

關於幫助過各派報紙的工人團體的事實材料，又是怎樣呢？在兩年中間（一九一二和一九一三年），有二千八百零一個團體擁護真理報，七百五十個團體擁護光線報*。誰都可以檢查這些事實材料，而且誰也沒有企圖加以否認過。

試問多數『先進工人』行動和意志上的一致表現在那裏，而違背多數意志的行爲又表現在那裏呢？

托洛茨基底『非派別組織性』，恰恰就是最放肆地違背大多數工人意志的那種分裂主義。

（三）論八月聯盟底瓦解

但是，還有一個審查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分裂主義罪名是否正確，是否符合事實的方法，而且是個十分重要的方法。

你們認爲『列寧派』就是分裂派麼？好吧。就假定你們的話是對的吧。

但如果你們的話是對的，那末爲什麼其餘一切派別組織和團體都沒有證明不要『列寧派』並反對『分裂派』，便有可能與取消派造成一致呢？..如果我們是分裂派，那末爲什麼你們統一派自己沒有彼此統一起來，沒有和取消派統一起來呢？你們這樣作，就會真正是向工人證明統一可能而且有益了！..

且把事實經過日期回憶一下。

一九一二年一月，『分裂主義者』的『列寧派』申明道，他們就是不要取消派而且反對取消派的黨。

一九一二年三月，所有一切團體和『派別組織』，其中有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前進派，『布爾什維克護黨派』，『孟什維克護黨派』，都在他們的俄文刊物上以及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前進報上

*按一九一四年四月一日的大概計算，有四千個團體擁護真理報（從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起），有一千個團體擁護取消派及其一切同盟者。

統一起來，反對這個『分裂派』。他們聯合一起，和衷共濟，同心一意，異口同聲地痛罵我們，給我們加上『僭奪派』，『欺騙家』等類溫柔客氣的綽號。

先生們，好極了！試問你們爲什麼沒有統一起來反對『僭奪派』，因而作出一個統一實例來給『先進工人』看看呢？先進工人如果看見一方面有一切反對僭奪者的人統一起來，取消派和非取消派統一起來，而另一方面只有『僭奪派』，『分裂派』等等，那末難道他們不會擁護前者麼？

如果意見分歧，僅僅是由『列寧派』虛構或吹噓起來的等等，而在事實上則有取消派，普列漢諾夫派，前進派和托洛茨基派等等統一的可能，那末爲什麼你們自己兩年以來沒有作出一個實例來證明這點呢？

一九一二年八月，召集了『統一派』代表會議。但立刻就開始了分裂：普列漢諾夫派完全不肯參加，前進派參加了，可是隨即退出而提出了抗議，並揭穿了這全部詭計底虛幻性。

取消派，拉脫維亞人，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和謝科夫斯基），高加索人¹⁴⁰，七人團¹⁴¹『統一起來了』。真正統一起來了麼？我們馬上就說過，他們並沒有統一起來，而不過是企圖把取消主義掩飾起來罷了。事變是否把我們的話推翻了呢？

恰恰經過一年半的功夫，即是在一九一四年二月間，就有了如下的事實：

（一）七人團瓦解了，因爲布里揚諾夫退出了七人團。

（二）留在新的『六人團』內的齊赫芝和土烈科夫或其他某某人，彼此不能協商一致地去回答普列漢諾夫。他們在報紙上聲明說要回答他，但始終不能回答。

（三）托洛茨基事實上是在好幾個月前就已從光線報上消失不見，已經脫離該報而去刊行『自家的』雜誌，即鬥爭雜誌了。托洛茨基稱

這個雜誌爲『非派別組織性的』，於是就顯然地（在一切稍爲明白事理的人看來，是很顯然地）表明，我們的曙光雜誌和光線報，據他托洛茨基看來，畢竟是些『派別組織性的』，即是些毫不中用的統一者。

親愛的托洛茨基呵，如果你是個統一者，如果你說可以和取消派統一起來，如果你和他們共同站在『一九一二年八月所擬定的基本觀點』（鬥爭雜誌第一期，第六頁，編輯部底話）立場上，那末爲什麼你自己沒有在我們的曙光雜誌和光線報上與取消派統一起來呢？

還在托洛茨基底雜誌未出版以前，在北方工人報上發表了一篇惡毒的評論，說該雜誌底面目『還不清楚』，說關於這個雜誌『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談過很多』，當時真理之路（第三十七期）自然就揭破了這種假話，而說『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談過』托洛茨基反對光線派的一篇祕密手札，說托洛茨基底面目及其脫離八月聯盟的行動已經是很『清楚』了。

（四）高加索取消派底著名領袖安恩曾反對過色多夫（並因此而被唐恩一流人當衆譴責過），現在已在鬥爭雜誌上出頭露面了。至今還『不清楚』的，只是高加索人現在究竟願意和托洛茨基一塊兒走，還是和唐恩一塊兒走呢？

（五）拉脫維亞的馬克思主義者，即『八月聯盟』中唯一實在的組織，現在已經正式退出了這個聯盟，而在其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一四年）底決議案上聲明道：

『調和派無論如何都要和取消派統一起來的嘗試（一九一二年八月代表會議），竟是徒勞無功，而且統一派自己也落到了思想上政治上依賴於取消派的地位』。

這段話是採取中立立場而不願和兩個中心機關中任何一個發生聯系的那個組織，有了一年半經驗以後所說的。唯其如此，中立派所通過的這個決議，對於托洛茨基應當是更有權威的！

看來是已經够了。

責備我們爲分裂主義者的那些人，責備我們不願意或不善於和取消派相處的那些人，自己也沒有和取消派相處得來。八月聯盟原來是一個空中樓閣而陷於瓦解了。

托洛茨基把這種瓦解情形隱瞞起來，不讓讀者知道，也就是欺騙了讀者。

我們的敵人所作的嘗試，是證明我們的主張正確，證明不能和取消派一塊兒工作。

(四)一個調和派份子對『七人團』的忠告

鬥爭雜誌第一期上標題爲『國會黨團底分裂』的社論，包含有一個調和派份子對擁護取消主義的（或動搖到取消主義方面去的）杜馬代表七人團的忠告，其要旨就是下面一句話：

『當和其他各個黨團有妥協之必要時，首先就要去和六人團¹⁴²接洽』（第二九頁）。

這個合理的忠告，大概就是托洛茨基與取消主義光線派發生分歧的緣由之一。從杜馬中兩個黨團鬥爭開始時起，從夏季（一九一三年）會議¹⁴³決議案通過時起，真理派恰恰就是站在這個觀點上的。而且在分裂以後，俄國社會民主工人黨團也在報章上屢次聲明說，它不願『七人團』再次拒絕，而仍然是站在這個立場上。

從最初時起，從夏季會議底決議案通過時起，我們就已經認爲而且現在還認爲，關於杜馬中工作問題的協定，是我們願意而且可能的：既然我們和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民主派（勞動派）都屢次實行過這種協定，那末我們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工人政治家實行這種協定，當然是更有可能而且更有必要的。

不要誇大意見分歧，而要正視現實：『七人團』是動搖到取消主義方面去的人，昨天他們完全跟着唐恩跑，今天却又很煩悶地把

自己的視線從唐恩方面轉移到托洛茨基方面，然後又從後者轉移到前者方面去。取消派就是脫離黨而去實行自由主義工人政策的合法派。因為他們否認『秘密組織』，所以在黨的建設和工人運動底事務方面，根本就談不到和他們去實行什麼統一。誰有另外的想法，誰就是大錯特錯，就是沒有估計到一九〇八年以後所發生的那些深刻變動。

但是，在單個問題上，當然可以和這個黨外集團或接近於黨的集團成立協定；我們始終都應當使這個集團如勞動派那樣在工人的（真理派的）政策和自由主義的政策之間作一選擇。例如，在爭取出版自由的問題上，取消派已顯然表明他們是動搖於否認或拒絕出版不受檢查刊物的自由主義立場和與其相反的工人政策之間。

在不直接涉及最重要，即杜馬以外的鬥爭問題的杜馬政策範圍內，可以而且應當和自由主義的工人代表七人團協定。在這一點上，托洛茨基由取消派立場轉到黨的夏季（一九一三年）會議立場上來了。

不過這裏不要忘記，黨外的集團對於協定的見解，是與黨內的人對於協定的通常見解完全不同的。在非黨員看來，杜馬中的『協定』，就是『製定策略決議或路線』。在黨員看來，協定就是企圖吸引他人來實行黨的路線。

例如，勞動派是沒有黨的。在他們看來，協定就是今天和立憲民主黨人一起，明天和社會民主黨人一起『自由』『製定』路線。而我們却認為我們與勞動派協定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對於一切重要策略問題都有黨的決議，我們無論何時都不會放棄這些決議；至於和勞動派成立協定，在我們看來，無非是把他們吸引到我們方面來，使他們相信我們的主張正確，而不拒絕進行共同反對黑幫派，共同反對自由派的動作。

黨員和非黨員彼此對於協定問題的見解上的這種基本區別，竟

被托洛茨基忘記到什麼程度（他到過取消派那裏，畢竟不是徒然的呵！），從他的如下一段議論中就可看出：

『國際代表必須把我們已經發生分裂的國會代表團中的兩部份召集起來，並同他們一起考察他們觀點一致和分歧的地方…那時就能製定一個詳細的策略決議案，規定國會策略底基礎…』（第一期，第二九至三〇頁）。

真是取消派觀點最明顯最標本表現！托洛茨基底雜誌把黨忘掉了：這樣的小事情難道值得記憶麼？

在歐洲方面（托洛茨基是喜歡瞎談歐洲主義的），各種政黨彼此實行協定或統一時，通常是互派代表來開會商量，首先弄清分歧的地方（國際討論俄國問題時所當作迫切任務提出的，正是這一點，但它並沒有把考茨基所謂『舊黨已不存在了』的輕率論斷列入決議案中去）。代表們把各個分歧點弄清以後，就擬出一些應提交兩黨雙方各自舉行的代表大會去討論的關於策略和組織等等問題的決議（決議案，條件等等）。如果能擬定出一致贊成的決議草案，那末各該黨代表大會就來決定是否採納這些決議；如果擬定出來的是兩種不同的提案，那末兩黨分別舉行的代表大會也就同樣給以最後的討論。

取消派和托洛茨基覺得『可愛的』，僅僅是歐洲的機會主義榜樣，而不是歐洲的黨性榜樣。

杜馬代表將製定一個『詳細的策略決議案』!!根據這個例子，俄國『先進工人』——而托洛茨基非常不滿意他們，是不爲無因的——就能明白看出，在維也納和巴黎方面，那些旅外的小團體玩弄異想天開的滑稽把戲，竟達到了何種地步，他們甚至使得考茨基也相信在俄國『黨已不存在了』。不過，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雖然有時候也能欺騙外國人，但俄國『先進工人』（不怕這又會使氣勢汹汹的托洛茨基表示不滿）却要劈面恥笑這些騙徒。

『在我們這裏，——工人會這樣對他們說道，——詳細的策略決議案，是由黨的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例如一九〇七，一九〇八，一九一〇，一九一二和一九一三年舉行的會議製定的（不知道在你們非黨的人那裏是怎樣）。我們很樂意使不知道底蘊的外國人以及健忘的俄國人，來認識我們的黨的決議，而且更樂意請求『七人團』，或『八月聯盟派』，或『左派』¹⁴⁴底代表，或其他任何人，把他們的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底決議案介紹給我們看看，並把他們對於我們的決議案或對於保守中立的拉脫維亞人一九一四年代表大會決議案等等究竟採取何種態度這一明確的問題，提到他們將來的代表大會上去』。

這就是俄國『先進工人』要向騙徒們說的話，這就是彼得堡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舉例說——已經在馬克思主義刊物上說過的話。托洛茨基樂於忽視對取消派提出的這些已經刊印出來的條件麼？讓托洛茨基這樣去作吧。我們的責任是要預先告訴讀者：不願顧及俄國多數覺悟工人意志而玩弄『統一』（是仿照八月『統一會』麼？）把戲，是很可笑的。

（五）托洛茨基底取消主義觀點

托洛茨基在他的新雜誌上，極力迴避切實說明自己的觀點。真理之路（第三十七期）已經指出了，托洛茨基無論關於祕密組織的問題或關於爭取公開黨的口號等等，都是一句話也沒有說過的。正是因此，所以我們也就說他這種行為是最壞的派別組織性，因為他想成立一個沒有任何思想政治面目的單獨團體。

但是，托洛茨基雖不願公開說出自己的見解，而他的雜誌上却有許多地方表明他所暗中偷運，他所設法隱瞞起來的究竟是些什麼思想。

在第一期所載的第一篇社論上，就有如下一段話：

『我們的革命以前的社會民主黨，祇有按它的思想和目的來說才是一個工人政黨。其實，它不過是引導着覺醒起來的工人階級的那些馬克思主義智識份子底組織而已』（第五頁）。

這就是大家早已知道的那種自由主義和取消主義的論調，其實它不過是否認黨的一種緒論而已。這種論調是以曲解歷史事實為基礎的。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的罷工，就已造成了思想上組織上都與社會民主黨有聯系的羣衆工人運動。這些罷工，這些經濟的和非經濟的鼓動是『智識份子引導工人階級』去作的麼！！？

又請看看關於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年的國事犯和前一時代比較的確切統計吧。

每一百個參加解放運動者（被判決為國事犯者）中的職業成份的比例：

時 代	從事農業者	從事工商業者	從事自由職業者 和學生	職業無定者 和無職業者
1884—1890	7,1	15,1	53,3	19,9
1901—1903	9,0	46,1	28,7	8,0

由此可見，在八十年代，當俄國還沒有社會民主黨，而運動還是『民粹主義的』運動時，智識份子是佔有主要地位；當時參加運動的大半是智識份子。

在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年間，當已經有了社會民主黨，而舊火星報已進行着自己的工作時，情形已完全改變了。在參加運動者的總數中，智識份子已佔少數，工人（『從事工商業者』）已比智識份子多得多，而工人和農民一共佔總數一半以上。

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各種思潮鬥爭中，恰恰可以看出社會民主黨裏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翼所起的作用，始則為『經濟主義』（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三年），繼則為『孟什維主義』（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八年）和『取消主義』（一九〇八至一九一四年）。托洛茨基

重複取消派對黨的誣蔑，而害怕提起黨內各種思潮二十年來鬥爭的歷史。

請看另一個例子吧：

『俄國社會民主黨對國會制度的態度，也經過了三個階段…（也如在其他各國一樣）…起初是『抵制主義』…然後是原則上承認參加國會的策略，但是…（這個『但是』真是妙極了，這就是謝德林所譯成爲『耳朵不會生在額角以上去！』一語的那個『但是』哩）…爲了純粹鼓動的目的…最後便是把當前的要求…轉移到杜馬講台上去…』（第一期，第三四頁）。

又是用取消主義的態度來曲解歷史。其所以虛構出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間的差別來，是爲了暗中實行辯護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抵制主義無論在歐洲或俄國，都不曾是『社會民主黨對國會制度的態度』中的一個階段。在歐洲方面，抵制主義始終不過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立場，而在俄國，譬如對布里根杜馬所進行的抵制，又祇是對一定的機關實行的辦法，從來也不是一種對付『國會制度』的政策，而是從自由派和馬克思主義派爲了繼續襲擊這一問題所進行的特殊鬥爭中產生出來的。至於這個鬥爭如何反映到了馬克思主義運動內部兩個派別底鬥爭中，托洛茨基却一字也沒有提到！

如果真要說及歷史，那就要闡明各個具體問題，就要闡明各個派別底階級根源；誰願意按馬克思主義態度去研究階級鬥爭，研究各個派別因爲參加布里根杜馬這一問題而發生的鬥爭，那他在這裏就會看出自由主義工人政策底根源。但托洛茨基『提到』歷史，只是爲了避開具體問題，而想出一種替現代機會主義者作辯護的理由或類似理由的東西來！

…『事實上，——托洛茨基寫道，——所有一切派別都採用着同樣的鬥爭方法和建設方法』。『高喊什麼在我們工人運

動中有自由主義危險存在，就不過是公然用宗派主義態度來曲解現實而已』（第一期，第五頁和第三五頁）。

這就是十分顯然地替取消派辯護，而且是十分憤激地替他們辯護。但是，我們畢竟要舉一件較爲新鮮的細小事實，因爲托洛茨基是專說空話的，而我們却希望工人自己去考察事實。

這件事實，就是三月十三日北方工人報所載的言論：

『人們不去強調擺在工人階級面前的一定的具體任務，即迫使杜馬否決法案（出版問題法案）的任務，却提出力求實現『毫不截短的口號』的模糊公式，同時鼓吹祕密出版物，其實這種鼓吹只能削弱工人爲自己公開刊物進行的鬥爭』。

這就是擁護取消派政策和批評真理派政策的一件明白肯定而證據確鑿的事實。結果怎樣呢？難道一個有常識的人會說兩派在這問題上都採取『同樣的鬥爭方法和建設方法』麼？難道一個有常識的人會說取消派在這裏不是實行自由主義工人政策麼？會說工人運動中的這種自由主義危險是臆造出來的麼？

托洛茨基所以躲避事實和具體證據，正是因爲這些事實和證據無情地推翻他的一切氣憤的喊聲與響亮的詞句。裝腔作勢，說什麼有人『公然用宗派主義態度曲解現實』，當然是很容易的。再添上一些更厲害更漂亮的字眼，說什麼必須『從保守的派別組織主義中解放出來』，也是不難的。

不過這豈不是太便宜了麼？這個武器不是從托洛茨基在中學生面前大出風頭的那個時代的武庫中拿出來的麼？

但是，托洛茨基所憤恨的那些『先進工人』，畢竟希望得到一個直接明白的答覆：你們是否贊成上述對於具體政治運動的估計中所確切表示出來的『鬥爭方法和建設方法』呢？是贊成，還是不贊成呢？如果贊成，那就是進行自由主義的工人政策，就是叛變了馬

克思主義和黨；如果說可與這種政策，可與實行這種政策的集團去講『和平』或『統一』，那就是自欺欺人。

不贊成麼？——那就請你們直截了當地說吧。專講空話是不能使現在的工人驚奇，不能使他們感覺滿意，不能把他們嚇倒的。

順便說說：取消派在上述那段話中所宣傳的政策，甚至從自由派觀點看來也很愚蠢，因為在杜馬中通過法律，是完全要依那些已在法律委員會中公開說出了自己計劃的卜尼仙式的『十月黨人地方自治派』為轉移的。

* * *

參加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老前輩，很熟悉托洛茨基這個人物，所以在他們面前是用不着贅說這個人物了。但是新進的一輩工人却不知道這個人物，所以非說不可，因為他足以代表事實上也是動搖於取消派和黨之間的那五個僑外小團體底面目。

在舊火星報時代（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年），這些動搖不定，時而從『經濟派』方面跑到『火星派』方面，然後又跑轉去的人，博得了一個綽號：『屠申諾村的倒戈份子』（在俄國混亂時代，一般人常把那些由一個營壘跑到另一個營壘中去的軍人稱作屠申諾村的倒戈份子）。

我們考察取消主義的時候，就知道它是個一定的思潮，是個在多年內生長起來，與馬克思主義運動二十年歷史中『孟什維主義』和『經濟主義』根本相連，與一定階級，即自由資產階級底政策和思想相連的思潮。

『屠申諾村的倒戈份子』自命為高超於一切派別組織，其唯一根據，就是他們今天『借用』此一派別組織底思想，明天又『借用』彼一派別組織底思想。在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年的時候，托洛茨基是個激烈的『火星派份子』，所以梁贊諾夫當時把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上的托洛茨基稱為『列寧的棍棒』。一九〇三年末，托洛茨基

是個激烈的孟什維克，就是說，他當時從火星派方面跑到『經濟派』方面去了；他當時宣佈說：『在舊火星報與新火星報間，橫着有一條無底的深淵』。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間，他離開孟什維克而採取了動搖的立場，時而與馬爾丁諾夫（『經濟派』）合作，時而又主張左得不近情理的『不斷革命』。在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間，他接近布爾什維克，而在一九〇七年春天又自稱爲贊同盧森堡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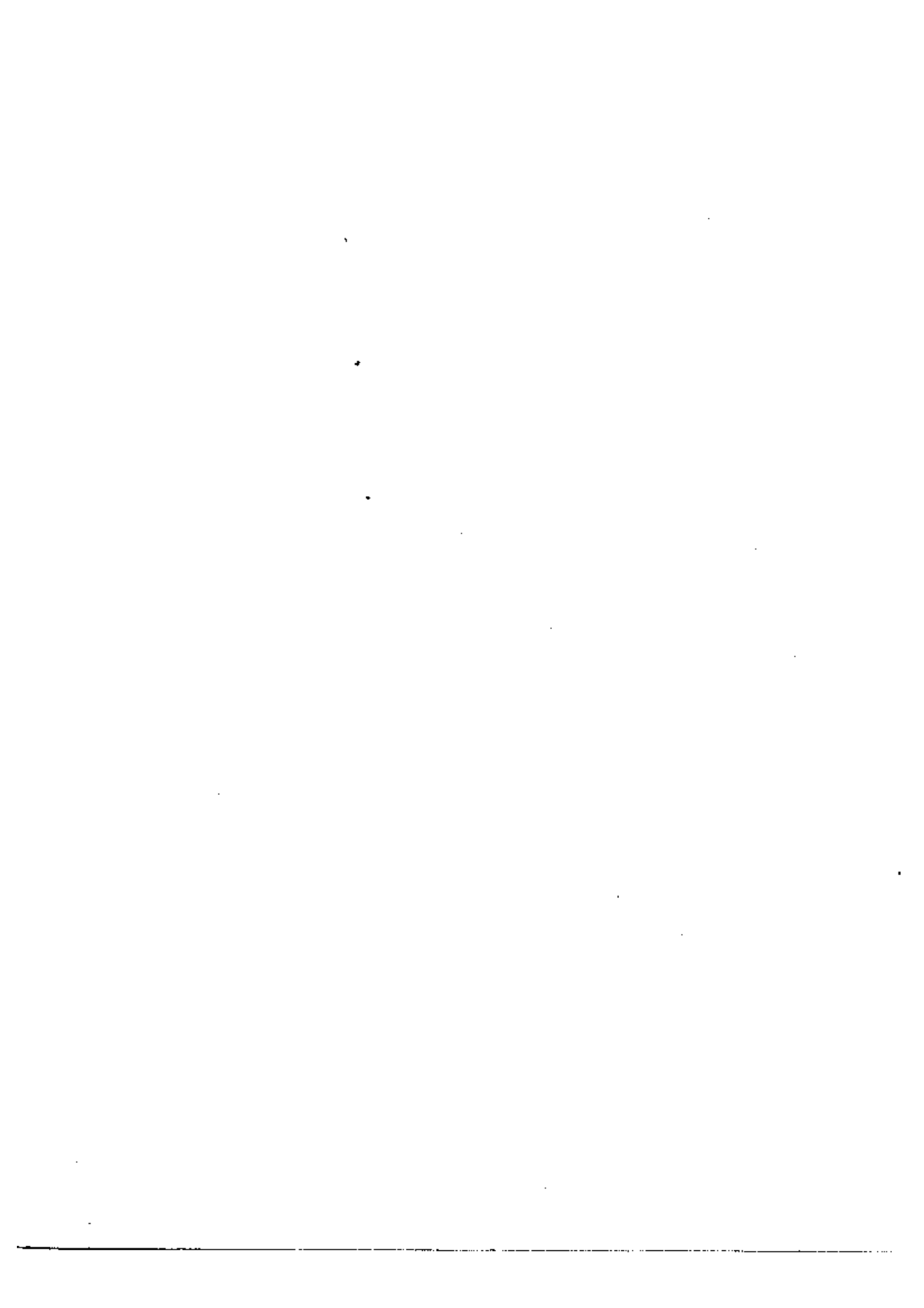
在瓦解時代，他經過長久的『非派別組織性的』動搖之後，又向右跑，並於一九一二年八月與取消派締結聯盟。現在，他又離開取消派，但實際上還是重複着取消派底所謂思想。

這樣的人物是過去歷史階段和形態底標本殘餘，當時俄國羣衆工人運動還處於沉眠狀態，當時任何一個小團體都可『逍遙自在』自命爲一個思潮，集團和派別組織，——總而言之，儼然是一個與他人談判聯合的『強國』。

必須使年輕的一輩工人明白知道，這些抱着一種過分奢望出來講話，既根本不顧顧及黨從一九〇八年起就確定規定了對取消主義態度的那些決議，又根本不顧顧及俄國現代工人運動在事實上已造成了基於完全承認這些決議的大多數統一的人，究竟是些什麼人。

一九一四年五月刊載於教育雜誌第五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三〇一至三二二頁。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前夜
工人運動高漲時期



紀念蓋爾村

自蓋爾村誕生時起，迄今已過去一百年了。全俄國的自由派都表示紀念他，小心翼翼地迴避嚴重的社會主義問題，仔細地掩蓋革命家蓋爾村與自由主義者不同之點。右派刊物也來悼念蓋爾村，撒謊騙人，硬說蓋爾村晚年棄絕了革命。至於僑外的自由派和民粹派紀念蓋爾村的言論，滿篇都是些花言巧語。

工人黨應當紀念蓋爾村，當然不是爲了講些庸俗的頌詞，而是爲了闡明自己的任務，爲了闡明在準備俄國革命中起了偉大作用的這位作家底真正歷史位置。

蓋爾村是十九世紀前半期那一輩貴族地主革命家中的人物。從俄國貴族中間產生了畢龍輩和阿拉克切也夫輩¹⁴⁵，產生了無數『醉酒軍官，鬥雞公，賭徒，鬧集市的好漢，養鷹犬的闊少，打手，用刑人，淫亂之徒』以及愛作幻想的馬尼洛夫輩。『但在他們中間，——蓋爾村寫道，——又生出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¹⁴⁶，如像綸繆拉斯和利瑪那樣由獸奶養大的一大羣英雄…這是些從頭到脚都用純鋼煉成的闖將，是些奮勇的戰士，他們自覺地赴湯蹈火，以求喚醒年輕後輩走向新生活，洗淨那些在劊子手和卑鄙奴才中間生長出來的子弟身上的污垢』。

蓋爾村也就是這些子弟中的一個。十二月黨人底起義喚醒了他，並把他『洗淨』了。他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農奴制的俄國，竟

能達到了與當代最大思想家併駕齊驅的高度。他領會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他懂得辯證法是『革命底代數學』。他超過黑格爾而跟着費爾巴黑走到了唯物主義。一八四四年寫的第一封標題爲『經驗與唯心主義』的論自然界研究的信，向我們表明出，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日也比無數現代經驗主義的自然科學家和一大羣現時哲學家，唯心主義者和半唯心主義者高出一頭。蓋爾村已走到了辯證唯物主義跟前，而在歷史唯物主義前面停住了。

正因爲蓋爾村這樣『停住』了，所以他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之後陷於精神破產。蓋爾村當時已經離開俄國，而親眼觀察過這次革命。當時他是個民主主義者，革命家，社會主義者。但是，他的『社會主義』是盛行於一八四八年時代而被六月事件¹⁴⁷完全擊毀的無數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形式和變態中的一種。其實，這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以及尙未脫離其影響的無產階級所用以表示他們當時革命性的一種虛幻辭句和善良幻想。

蓋爾村在一八四八年以後的精神破產，他當時所抱的深沉的懷疑態度和悲觀態度，是表明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幻想之破產。蓋爾村精神上的悲劇，乃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底革命性已在衰亡（在歐洲），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尙未成熟的那個全世界歷史時代底產物和反映。這種情形，是現在那些以談論蓋爾村懷疑態度的花言巧語來掩蓋自己反革命性的俄國自由主義空談家中的騎士們沒有瞭解，並且也不能瞭解的。在這些出賣了一九〇五年革命而且根本不願再想及革命家偉大使命的騎士們看來，懷疑態度就是拋棄民主主義而轉到自由主義方面，即轉到趨附逢迎，卑鄙齷齪，野獸成性的自由主義方面去，這種自由主義在一八四八年槍殺過工人，恢復過已被打破的皇朝，向拿破崙第三鼓掌稱慶，而蓋爾村却咒詛過這種自由主義，不過沒有瞭解它的階級本質。

蓋爾村底懷疑態度是表明他拋棄『超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主

義幻想，而轉到無產階級森嚴不屈，不可戰勝的階級鬥爭方面去。證據就是蓋爾村致老同志書，即是他在一八六九年，當他逝世前一年寫給巴枯寧的幾封信。蓋爾村與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決裂了。固然，蓋爾村認為這種決裂，只是策略上的意見分歧，而不是相信自己階級勝利的無產階級世界觀與絕望的小資產階級世界觀之間的分野。固然，蓋爾村在這裏又重複了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詞句，似乎社會主義者應當『同樣向工人和僱主，向農夫和市儉作宣傳』。但是，蓋爾村與巴枯寧決裂時，他的視線並不是繫注於自由主義，而是繫注於國際，繫注於馬克思所領導的國際，繫注於已開始『集合』無產階級『部隊』，團結着『離開不勞而獲者的世界』的那個『勞工界』的國際！

* * *

蓋爾村既沒有瞭解一八四八年全部運動以及在馬克思以前各種各樣社會主義思想底資產階級民主實質，也就更其不能瞭解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蓋爾村是『俄國』社會主義，『民粹主義』底創始人。蓋爾村把農民連帶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所有制和農民『地權』思想，看成『社會主義』。他把他所矜矜自喜的這一思想，反覆發揮了千番百次。

其實，蓋爾村底這一學說，也如一切俄國民粹主義——一直到褪了色的現時『社會革命黨人』民粹主義為止——那樣沒有絲毫社會主義成分。它也如西歐『一八四八年社會主義』底各種形式一樣，是包裹着俄國資產階級農民民主派底革命性的一種虛幻辭句和善良幻想。一八六一年農民得到的土地越多，得到的土地越便宜，農奴主地主底權力也就會被破壞得越厲害，俄國資本主義也就會發展得越迅速，越自由，越廣泛。『地權』和『平分土地』的思想，不過是表現着農民力求平等而完全推翻地主權力，完全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那種革命願望而已。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完全證實了這一點：一方面，無產階級創立了社會民主工人黨，而完全獨立地領導了革命鬥爭；另一方面，革命農民（『勞動派』和『農民同盟』）當時力求用各種方式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一直到『廢除土地私有制』，正是以業主資格，以小企業家資格進行鬥爭的。

現在，高談什麼『社會主義的』地權等等，只能模糊和掩蔽真正重大嚴重的歷史問題，即自由派資產階級與革命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利益區別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關於這次革命中自由主義趨向與民主主義傾向，『妥協主義』（君主主義）傾向與共和主義傾向的問題。蓋爾村底鐘聲雜誌所提出的正是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是看問題實質，而不是看辭句，——是把階級鬥爭當作『理論』和學說底基礎來研究，而不是作得相反的話。

蓋爾村在國外創辦了鼓吹自由的俄文刊物，這就是他的偉大功勞。北斗星舉起了十二月黨人底傳統。鐘聲（一八五七至一八六七年）極力提倡了解放農民的主張。奴隸般的沉默被打破了。

但蓋爾村是地主貴族行列中的人。他於一八四七年離開了俄國，他沒有看見革命的人民，所以也就不能相信人民。由此就有他那種訴諸『上層』的自由主義言論。由此就有他在鐘聲上寫給絞手皇帝亞歷山大第二的無數甜蜜書信，現在來讀這些書信，真是令人作嘔。代表着新輩智識份子平民革命家的人物契爾內舍夫斯基，多布洛留波夫，謝爾諾—索洛維約維奇，責備蓋爾村從民主主義轉向自由主義的這些言論，是十二分正確的。可是，平心而論，蓋爾村雖然常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動搖不定，但他畢竟是多半趨向於民主主義的。

當有一個極可惡的卑鄙自由派代表人物，即先前正因為鐘聲雜誌有自由主義傾向而讚賞過它的那個卡維林，極力表示反對憲制，攻擊革命鼓動，反對使用『強力』，反對號召使用強力而開始宣傳忍耐時，蓋爾村就同這位自由主義的哲人決裂了。蓋爾村攻擊了卡

維林專為『暗下替玩弄自由主義手腕的政府策劃』而寫的那些『無聊，荒謬，有害的時評』，攻擊了卡維林硬說『俄國人民蠢若狗彘，政府絕頂聰明』的那些『政治感情主義的警句』。在鐘聲上發表了一篇標題為『祭文』的論文，痛斥『那些鉤心鬥角，造出種種高傲而淺薄的所謂思想的教授，那些先前仁慈寬厚，後來看見健全的青年不會同情他們的腐敗思想而忿怒起來的卸職教授』。卡維林一讀到這篇論文，立刻就看見自己的真面目了。

當契爾內舍夫斯基被捕時，卑鄙的自由主義者卡維林寫道：『這種逮捕事件並不使我憤慨……革命黨為打倒政府而不擇手段，政府也就用相當的手段來實行自衛』。蓋爾村論到審判契爾內舍夫斯基的問題時，彷彿是專為答覆這位立憲民主黨人式的自由主義者而說道：『而那些可憐的人，草木不如的人，軟體動物一類的人，却說不應當咒罵這一夥宰制我們的強盜和敗類』。

當自由主義者屠格涅夫私自上書亞歷山大第二，聲明忠順皇朝，並捐了兩個金幣來救助那些在鎮壓波蘭起義時受傷的兵士時，鐘聲雜誌就發表一篇論文，說『有一位白髮的聖女馬格達林娜（男性）上書皇上，陳訴她夜不成眠，焦慮皇上不知道她誠心懺悔』。屠格涅夫一看見這段文字，就知道是指着他說的了。

當所有俄國自由主義狐羣狗黨，都因蓋爾村辯護波蘭而避開他時，當全體『士大夫階級』都棄絕了鐘聲時，蓋爾村並沒有表示慌張。他仍然擁護波蘭底自由，而攻擊亞歷山大第二左右的鎮壓者，劊子手，絞刑手。蓋爾村救全了俄國民主派底名譽。『我們救全了俄國人底名譽，——他向屠格涅夫寫道，——因此也就吃了佔大多數的奴才們的虧』。

收到一個農奴把一個侮辱了他的未婚妻的地主打死的信息時，蓋爾村就在鐘聲雜誌上補充說道：『作得很好！』。蓋爾村聽說沙皇政府預備委派軍事長官去進行『平安的』『解放』時，便寫道：

『若有一個聰明的上校帶着他的隊伍，不去絞殺農民，而去響應他們，那他就會坐上羅曼諾夫皇朝的寶座』。當一個上校萊特恩不願幫助屠殺人民而在華沙自殺時（一八六〇年），蓋爾村寫道：『如果真要開槍，就要槍斃那些命令槍殺手無寸鐵的人的將軍』。當別斯得納村中打死了五十個農民，而他們的首領安頓、彼特洛夫一同遇害的時候（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蓋爾村就在鐘聲雜誌上寫道：

『俄國的勞動者和受苦的人們喲！如果我的話能使你們聽見，那我就會竭力教導你們仇恨彼得堡的聖教局和德意志血統的沙皇安置在你們頭上的那些牧師… 你們仇恨地主，仇恨官吏，害怕他們，這是很對的；但你們還相信沙皇和主教… 不要相信他們呀。沙皇是與他們一道，他們都是沙皇手下的人。你們現在認識他了，你們是別斯得納村中那個被殺少年底父兄，你們是平茲城裏那個被殺老人底子弟… 你們的首領也同你們一樣無知，也同你們一樣貧窮… 爲了你們而在嘉桑城受害的那個安頓（不是安頓主教，而是別斯得納村的安頓）就是這樣的人… 你們的這位教士底屍體不會作出四十八件奇事，你們向他們禱告也不會治好牙痛；但是你們時刻紀念着他們，就能作出一件奇事——獲得解放』。

由此可見，那些盤據於奴才式的『合法』刊物中的自由主義者，頌揚蓋爾村底弱點而隱瞞他的優點，該是怎樣卑鄙齷齪地誣蔑了蓋爾村呵。蓋爾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國內部看見革命民衆，這並不是他的罪過，而是他的不幸。當他在六十年代看見了革命民衆時，他就大胆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來反對自由主義了。他進行鬥爭，是爲了使人民戰勝沙皇制度，而不是爲了使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去與地主沙皇勾結。他掀起了革命旗幟。

* * *

我們紀念蓋爾村時，分明看見先後在俄國革命中活動的三輩人物，三個階級。起初是貴族和地主，十二月黨人和蓋爾村。這些革命者人數不多。他們與民衆相距甚遠。但是他們的事業並沒有落空。十二月黨人喚醒了蓋爾村。蓋爾村展開了革命鼓動。

響應，擴大，鞏固和加強了這種革命鼓動的，是平民智識份子革命家，自契爾內舍夫斯基起，至『民意』黨的英雄爲止。戰士人數增加了，他們與民衆的聯繫密切起來了。『將來風暴中的年輕舵手』，——蓋爾村這樣稱呼了他們。但這還不是真正的風暴。

風暴就是羣衆自身的運動。無產階級，即唯一澈底革命階級，起來領導羣衆，初次喚起了千百萬農民來進行公開的革命鬥爭。第一次風暴是在一九〇五年發生的。第二次風暴已開始增長起來了。

無產階級紀念蓋爾村時，以他爲榜樣來學習瞭解革命理論底偉大意義；學習瞭解，對於革命的無限忠心，向民衆進行革命宣傳的努力，就是在播種與收穫相隔幾十年的時候，也不算是白費；學習判定各階級在俄國革命和國際革命中的作用。無產階級得到了這些教訓，定會替自己打開一條道路，去與全世界各國社會主義工人自由聯合起來，打死沙皇專制制度這個毒物，而蓋爾村就是用鼓吹自由的俄羅斯言論向羣衆號召，掀起偉大鬥爭旗幟來反對這個毒物的第一人。

一九一二年五月八日（舊曆四月二十五日）

刊載於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二十六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第九至一五頁。

論俄國各政黨

國家杜馬的選舉使各個政黨都來加強鼓動，收集力量，以求使『自己』黨底代表多多當選。

同時，在我國，也如同在其他各國一樣，展開着極不要臉的競選廣告。各資產階級政黨，即是那些保護資本家經濟特權的政黨，極力誇張自己的黨，猶如各個資本家誇張自己的貨物一樣。你們在任何一家報紙所登載的商業廣告上，都可看見資本家爲自己的貨物想出各種最『動聽』最響亮最時髦的名稱，毫無顧忌，甚至不惜百般撒謊臆造來大吹特吹其貨物的優良。

大衆，至少是在各大城市中和各商業地點的大衆，早已看慣了這種商業廣告，知道它的價值。可惜，政治的廣告能誘惑更多的民衆，揭穿它是要困難得多，這裏的欺騙是更牢固得多。政黨名稱——無論在歐洲或我們俄國——常是專爲廣告式的目的來選擇的，政黨『綱領』往往是專門爲欺騙大衆而寫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政治自由越多，民主程度，即人民和人民代表底權力越大，則政黨的廣告式的宣傳也就往往進行得愈加厚顏無恥。

在這種情形下，怎樣來判明政黨鬥爭中的是非呢？這種帶廣告欺騙性質的鬥爭，是否說明各種代表機關，國會，人民代表大會根本無益而且有害，如像頑固的反動派份子，反對國會制度的人竭力武斷的那樣呢？不是的。在沒有代表機關的時候，進行欺騙，政治

撒謊以及各種狡詐詭計的機會更多得多，而人民用以揭穿欺騙，探尋真相的辦法也更少得多。

要判明政黨鬥爭中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詞，而要研究各政黨底真實歷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黨關於自己所說的言論，而要研究它們在解決各種政治問題時所作的事情，所取的態度；要研究它們在處置那些與社會各階級，地主，資本家，農民和工人等等切身利益有關的事情時的行爲。

一個國家中的政治自由愈多，它的代表機關愈堅固，愈民主化，則羣衆也就愈易判明政黨鬥爭中的是非，愈易學習政治，即揭穿欺騙，探尋真相。

在震動全國的深刻危機發生時，任何一個社會分成各種政黨的情形就最爲明顯。那時政府不得不在社會各階級中尋找支柱；嚴重的鬥爭會掃除各種空話，一切細枝末節和附帶成分；各政黨就會竭力投訴於民衆，而有公開鬥爭經驗的民衆，根據正確的本能，就會跟隨着代表相當階級利益的政黨走去。

這種危機時代，總是確定着該國社會力量在幾年間，甚至幾十年間的黨派分化情形。例如，這種危機在德國，是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的戰爭，在俄國是一九〇五年的事變。不回顧這一年的事變，就不能明白我國各政黨底實質，就不能認識俄國各個政黨所代表的是那些階級。

我們在這篇簡述俄國各政黨情形的文章中，且先從極右的政黨說起。

我們看見在極右翼方面的是俄羅斯人民同盟。

這個政黨底綱領在杜布洛文所出版的俄羅斯人民同盟公報俄羅斯旗幟上說明如下：

『俄羅斯人民同盟秉遵皇上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聖諭，應成爲皇朝忠實柱石，處處成爲可供大家效法的確遵法律秩序的

模範，茲特宣佈，爲實現皇上意旨起見，必須：（一）保證與按歷代傳統建設的俄國正教會血肉相連的沙皇專制制度權力能充分表現出來；（二）保證俄羅斯民族不只在內地，而且在邊陲皆佔統治地位；（三）使純粹由俄羅斯人組成的國家杜馬存在，作爲皇帝在國家建設事務方面的主要助手；（四）完全遵行俄羅斯人民同盟對猶太人問題所規定的基本原則；（五）將一切反對沙皇專制政權的官吏一律撤銷國家職務』。

我們把右派這個莊皇的宣言確切抄寫下來，一方面是使讀者能直接認識原文，另一方面因爲這裏所敘述的基本理由，是佔第三屆杜馬多數的各個政黨，即『民族主義黨人』和十月黨人一致主張的。這從下文中間便可看出。

俄羅斯人民同盟底綱領，實際上是重複着農奴制時代的舊口號——正教主義，專制主義和民族主義。談到一般人通常用以區別俄羅斯人民同盟與跟着它走的各個政黨的那個問題，承認或否認在俄國國家制度中必須施行『憲制』原則的問題時，特別必須指出，俄羅斯人民同盟並不反對一般代議機關。從上面所引錄的那個綱領中，就可知道俄羅斯人民同盟主張使充當『助手』的國家杜馬存在。

杜布洛文報館中的人說明了俄國所謂『憲制』底特點，而且說明得正確，即是說明得恰與客觀實際情形相合。無論民族主義黨人或十月黨人，他們在自己的實際政策方面都是站在這個立場上的。這些政黨在『憲制』問題上的爭論，大部份都不過是字句上的爭論：『右派』並不反對杜馬，只是特別強調說它應當成爲『助手』，而絲毫也不確定它的權限；民族主義黨人和十月黨人也不堅持任何嚴格確定的權利，根本不想要有對於權利的實際保障。所以十月黨中的『憲制派』也就在六三憲制基礎上與『反憲制派』相處得十分融洽。

在黑幫黨人綱領上直接，明顯，確切地規定了壓迫一般異族人，特別是壓迫猶太人的政策。他們在這裏，也如到處一樣，把其他各個政府黨較爲『羞怯』或是用外交手腕隱藏起來的事情表明得更爲粗暴，更不客氣，更爲橫蠻。

其實，凡是多少認識第三屆杜馬底活動，認識新時代，光明，莫斯科之聲等等一類刊物的人，都知道民族主義黨人和十月黨人也一樣參加實行壓迫異族人的政策。

試問右派黨底社會基礎究竟是什麼呢？它是代表着那個階級呢？它是替那個階級服務呢？

回到農奴制的口號上去，捍衛俄國生活中所有一切中世紀的舊東西，完全滿足於六三憲制，即地主憲制，保護貴族和官僚所有的特權等事實，都對本問題給了一個明白的回答。右派是代表農奴制地主的政黨，是代表貴族聯合會的政黨。所以這個聯合會也就在解散第二屆杜馬，在改變選舉法以及在六三政變中起了很重大的作用，甚至起了領導的作用。

爲了說明這個階級在俄國所擁有的經濟勢力，只須舉出內務部用政府名義公佈的一九〇五年土地統計表冊中的數目字所證實的一件基本事實。

在歐俄一帶，人數不滿三萬的地主，一共擁有七千萬俄畝土地；一千萬個份地最少農戶所有的土地數量，也只有這樣多。平均計算，每個大地主約佔有二千三百俄畝土地；每個貧苦農戶只有七俄畝土地。

農民靠這樣的『份地』決不能維持生活，而只會慢慢死亡下去，這完全是自然而且必然的。每次歉收之後，都有千百萬人忍飢挨餓，例如今年的飢荒，而使俄國農民經濟更加破壞下去。農民只得用各種工役作担保來向地主租佃土地。農民用自己的馬匹和農具替地主工作，作爲租地的代價。這仍是勞役制，不過不正式稱之爲農

奴法制罷了。地主在二千三百俄畝的土地上，大部分只能用盤剝方式，用工役，即勞役方式經營，而只有很少一部分，才是用僱傭工人經營的。

再則，國家絕大多數高級和中級官吏，又是由這個貴族地主階級中間出身的人。俄國官吏底特權是地主貴族所有特權和土地權力底另一方面。由此可見，貴族聯合會和各『右派』政黨堅持舊時農奴制傳統政策，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並不是由於個別份子底『惡意』，而是由於一個極強大階級底利益所驅使。舊的當權階級，即地主遺孽，仍舊是當權的階級，並且爲自己組織了相當的政黨。這個黨就是『俄羅斯人民同盟』或是國家杜馬和國家參議會中的『右派』。

但是，既然有代表機關存在，既然羣衆已公開走上政治舞台，如像我國民衆已於一九〇五年公開走上政治舞台那樣，於是每個政黨也就必須在某種限度內訴諸民衆。各右派政黨又能用什麼訴諸民衆呢？

當然，公開說保護地主利益是不行的。於是就說什麼保存一般舊東西，拚命燃起不信任異族人，特別是不信任猶太人的心理，引誘那些最不開通，最愚昧的人去實行蹂躪，去摧殘『猶太鬼子』。竭力用妄說俄羅斯人受異族人『壓迫』的言論來掩飾貴族、官僚和地主底特權。

『右派』黨底情形就是如此。它的黨員普里什克維奇，第三屆杜馬中最著名的右派演說家，大賣氣力而且很有成效地向民衆表明了右派所要求的是什麼，他們怎樣活動，他們究竟是爲誰服務。普里什克維奇真是個很能幹的煽動家。

『右派』在第三屆杜馬中佔有四十六個代表位置，與之並列的是佔有九十一個代表位置的『民族主義黨人』。他們與右派不同的色彩十分微弱：其實，這並不是兩個政黨，而是在攻擊異族人，

『立憲民主黨人』（自由主義者），民主黨人等等方面分『工』合作的一個政黨。他們所作的都是一件事情，不過各人作法粗細程度稍有不同罷了。而且讓這些慣幹各種醜事，慣幹蹂躪工作，慣於殺害格爾村施坦，約洛斯和卡拉瓦也夫們的『極』右派站開一點，彷彿他們是從右邊『批評』政府，這對政府是有利的……右派和民族主義黨人的區別，並不能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十月黨人在第三屆杜馬中佔有一百三十一個位置，當然是把『右派十月黨人』也算在內。十月黨人在現今的政策上與右派沒有重大區別，他們與右派不同的地方，就是這個黨不僅服務於地主，而且服務於大資本家，守舊商人以及因工人和農民覺醒起來要求獨立生活而惶恐不安，以至於完全轉到擁護舊制度的立場上去了的資產階級。俄國有很多資本家，完全是與地主對待先前農奴一樣虐待工人；他們把工人和店員當作下賤僕役看待。誰也不能比右派政黨，民族主義黨人和十月黨人更會保護這種舊制度了。還有一些資本家，在一九〇四與一九〇五年舉行的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代表大會上，雖然也曾要求實行『憲制』，但他們爲了反對工人，總是甘願滿足於六三憲制。

十月黨是地主資本家底主要反革命政黨。這是在第三屆杜馬中起領導作用的黨：一百三十一個十月黨人與一百三十七個右派和民族主義黨人合在一起，便組成爲第三屆杜馬中的有力的大多數。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的選舉法，保證地主和大資本家在杜馬中佔有多數；在選舉杜馬代表的一切省選大會上，都是以地主和第一號市民（即大資產階級）選民團複選當選人佔多數。在二十八個省選大會上，甚至是地主複選當選人獨佔多數。六三政府底全部政策都是在十月黨幫助下實行的，第三屆杜馬底一切罪惡都應由該黨負責。

在口頭上，在自己的綱領中，十月黨人是主張『憲制』，甚至主張……種種自由的！在實際上，這個黨贊助過一切反對工人（例如保險

法案，——請回憶一下杜馬工人問題委員會主席梯曾高村男爵當時的態度吧！），反對農民，反對限制專橫壓迫的辦法。十月黨人也與民族主義黨人一樣，是個政府黨。這種情形，絲毫也不會因十月黨人有時——特別是在選舉之前！——發表『反政府派的』言論而有所改變。凡是有國會存在的地方，老早就看見過，並且現在也經常看見資產階級政黨玩弄這種反政府派的把戲，這種把戲對於他們沒有害處，因為任何政府都不會認真看待它，而且有時在那些需要用反政府態度來『寵典』一下的選舉人面前玩弄這種把戲，是不無益處的。

但是最善於玩弄反政府把戲的專家和能手，却是第三屆杜馬中的主要反對派政黨，即所謂立憲『民主黨人』，即『人民自由』黨。

這個黨所取的名稱，就是一種把戲，其實它根本不是民主黨，絕對不是人民黨，不是主張自由的黨，而不過是主張半分自由的黨，甚至可說是主張四分之一自由的黨。

其實，這個黨是自由主義保皇派資產階級底政黨，它害怕人民運動要比害怕反動勢力更厲害得多。

民主派相信人民，相信羣衆運動，極力幫助羣衆運動，——雖然他們對於這種運動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的意義，往往持着一種錯誤的觀念（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勞動派，就是如此）。民主派想與一切中世紀制度斷絕關係的趨向，是較為誠懇些。

自由派害怕羣衆運動，阻碍羣衆運動，自覺地保護某些，並且是主要的中世紀制度，以求獲得一種可以用來反對羣衆，尤其是反對工人的靠山。與普里什克維奇輩瓜分政權，而決不是取消普里什克維奇輩政權底一切根基，——這就是自由派力求達到的目標。一切都爲人民，一切都經過人民，——這就是民主派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和勞動派在內）所說的話，他們真正是想消滅普里什克維奇制度底一切根基，但不懂得僱傭工人反資本鬥爭底意義。反之，自

由主義保皇派資產階級底真正目的，却是要與普里什克維奇輩瓜分統治工人，統治小業主的政權。

立憲民主黨人在第一第二兩屆杜馬內佔有大多數，或是佔有統治地位。他們利用這種地位玩耍了一套無聊而丟醜的把戲：向右邊表示忠順，表示願意幹幹組閣把戲（我們能夠和平解決一切矛盾，既不會敗壞農夫品行，也不會得罪普里什克維奇哩），向左邊表示擁護民主主義。由於玩弄這種把戲的結果，立憲民主黨人從右邊終究受到腳踢，而從左邊博得了人民自由事業叛徒這一適當稱呼。在頭兩屆杜馬內，他們始終不僅是與工人民主派作鬥爭，而且也與勞動派作鬥爭。例如，立憲民主黨人推翻了勞動派所提出的成立地方土地委員會的計劃（在第一屆杜馬中），推翻了這個起碼的民主主義計劃，初步的民主主義計劃，而擁護了地主官僚在土地整理局內宰制農民的辦法！

在第三屆杜馬內，立憲民主黨人玩弄了『負責反對派』的把戲，即表演了御用反對派的作用¹⁴⁸。他們爲此而屢次投票贊成政府預算（好一個『民主派』！），他們常向十月黨人解釋說，他們所主張的『強迫』（強迫農民）贖買，是沒有危險，沒有妨害的（例如別列索夫斯基所說的話），他們把卡拉武洛夫派到講台上去發表『虔誠的』言論，他們背棄了羣衆運動，他們求告『上層』而欺壓下層（立憲民主黨人在討論工人保險問題時反對工人代表）及其他等等。

立憲民主黨是反革命自由派的政黨。它因覬覦充當『負責反對黨』，即充當政府認可的，合法的，受許可去與十月黨競爭的反對黨，不是反對六三制度，而是承認六三制度的反對黨，結果便把自己的『民主黨人』資格完全葬送了。一方面，羅營諾夫和瓦倫斯基¹⁴⁹所崇拜的立憲民主黨思想家司徒盧威和依斯科也夫一流先生們無恥地鼓吹路標主義思想，另一方面，立憲民主黨人在第三屆杜馬中充當『負責反對黨』，這實際上是一回事情。普里什克維奇輩

所認為溫和可忍的自由主義保皇派資產階級，想同普里什克維奇坐在並排的交椅上。

立憲民主黨人同『進步黨人』在現今第四屆杜馬選舉時成立聯盟，更證實了立憲民主黨底十足反革命性。進步黨人絲毫也不希圖以民主派自命，一句話也沒有說要反對整個六三制度，根本就沒有想到什麼『普選制』。這是溫和的自由派，他們並不隱諱他們與十月黨人有親屬關係的事實。立憲民主黨人與進步黨人聯盟，該使那些最昏迷的『立憲民主黨應聲虫』也明白認識立憲民主黨底真實本性了。

代表俄國民主資產階級的，是各種色彩的民粹派，從最左的社會革命黨人起，直至人民社會黨人和勞動派為止。他們都愛講『社會主義』詞句，但覺悟的工人應明白認識這些詞句底意義。其實，什麼『地權』，什麼土地『平分制』，什麼『土地社會化』，都絲毫沒有什麼社會主義的成分。這是凡屬知道在廢除土地私有制和實行土地重新分配，即令是實行最『公平』分配的情況下，商品生產，市場、貨幣和資本底權力，不惟不受到損傷，反而更廣大擴展起來的人，都應當明白的。

但是，關於『勞動原則』和『民粹社會主義』的詞句，是表明民主主義者深刻相信（和誠心要求）可能消滅，並且必須消滅土地所有制方面以及政治制度方面所有一切中世紀特權。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人）力求與普里什克維奇輩瓜分政權和政治特權，而民粹派却是些民主主義者，因為他們現時力求並且應當力求消滅土地所有制方面以及政治方面所有一切特權。

俄國極大多數農民所處的地位，就使他們根本不能夢想與普里什克維奇輩作任何妥協（而在自由派看來，妥協是完全可能，可以辦到而且切近的）。因此，俄國小資產階級底民主主義趨向在頗長一個時期，都會始終有羣衆來擁護，而斯托雷平的農業改良，代表普里什克維奇輩所施行的這種反農民的資產階級政策，直到現在，除

了…三千萬農民挨餓以外，並沒有作出任何堅實可靠的事情來！

千百萬挨餓的小業主不能不力求另一種土地改良，即民主主義的土地改良，這種改良雖不能跳出资本主義範圍，雖不會消滅僱傭奴隸制度，但它能把俄國所有一切中世紀關係掃除乾淨。

勞動派在第三屆杜馬中十分脆弱，但是他們代表着羣衆。勞動派在立憲民主黨與工人民主派間動搖不定的態度，是從小業主那種階級地位中必然產生的結果，同時，由於小業主羣衆團結，組織和教育方面的特別困難，也就使勞動派在黨性方面顯得極端渙散。因此，勞動派在左派民粹黨人那種愚笨的『召回主義』幫助下，就表現自己是個被取消了的政黨底悲慘情景。

勞動派與我們的那些冒充馬克思主義者的取消派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前者之爲取消派是由於軟弱，後者之爲取消派則是由於居心險惡。工人民主派底任務，就是要幫助軟弱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份子，使他們脫離自由派的影響，團結民主派營壘去反對反革命立憲民主黨人，而不僅是反對右派份子。

這個工人民主派在第三屆杜馬中有自己的黨團，——關於這個工人民主派，我們在這裏只能稍微講一講。

工人階級政黨在歐洲各處形成起來的時候總是力求脫離一般民主主義思想底影響，學會把僱傭工人反資本的鬥爭與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分別開來，而且其中一個目的正是爲了加強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爲了使它免除一切動搖畏縮的行爲。在俄國，工人民主派已經是既與自由派，又與資產階級民主派（勞動派）完全分開，而使一般民主運動事業獲益不淺了。

工人民主派內的取消主義思潮（我們的曙光和活的事業）也有勞動派那樣的弱點，讚美渙散性，力求做一個『溫和可忍的』反對黨，背棄工人領導權思想，只是空談『公開的』組織（責罵不公開的組織），鼓吹自由主義的工人政策。這個思潮與反革命時代流行

的那種瓦解頹喪情緒相連的事實是很顯然的，它脫離工人民主派的事實已是日益明顯的了。

覺悟的工人，根本不取消什麼東西，而反對自由主義影響，團結成爲堅強階級組織，發展各種各樣的團結形式，職工會以及其他等等形式，代表僱傭勞動去反對資本，代表澈底民主派去反對俄國全部舊制度，反對向舊制度作任何讓步。

* * *

現在我們借用一九一二年正式公布的杜馬『一覽』中所有的材料，把第三屆國家杜馬政黨成份列成如下的圖表。

第三屆國家杜馬中黨派成份統計表

地主：	
右派.....	46
民族主義黨人.....	74
獨立民族主義黨人.....	17
右派十月黨人.....	11
十月黨人.....	120
各政府黨總計.....	
	268
資產階級：	
進步黨人.....	56
立憲民主黨人.....	59
波蘭政黨聯盟.....	11
波蘭—立陶宛—別洛露西亞集團.....	7
回民集團.....	9
自由黨人總計.....	
	115
資產階級民主派：	
勞動派份子.....	14
工人民主派：	
社會民主黨人.....	13
民主派總計.....	
	27
無黨的代表.....	27
總共.....	
	437

在第三屆國家杜馬中有兩個大多數：（一）右派和十月黨人在四百三十七個位置中佔有二百六十八個位置；（二）十月黨人和自由派在四百三十七個位置中佔有二百三十五個位置（120+115）。這兩個大多數都是反革命的。

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舊曆五月十日）

刊載於涅瓦星光報第五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第二

八至三八頁。

革命高漲

全俄無產階級所舉行的轟轟烈烈的五月罷工，以及與之相連的遊行示威，革命宣言和在工人大眾面前的革命演說，都顯然表明俄國已進入了革命高漲的時期。

這個高漲並不是像晴天霹靂突然而來的。不，它早已由俄國生活底一切條件準備起來，至於與連拿慘案¹⁵⁰以及五一節相連的羣衆罷工，祇是完全確定了這個高漲到來的事實而已。反革命暫時勝利，原是與工人羣衆鬥爭低落緊相聯系的。罷工人數使我們對於這一鬥爭底範圍，能得到一個雖然只是大概，但是絕對客觀而確切的概念。

在革命以前十年，由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四年的時期，罷工人數每年平均有四萬三千人（取其整數）。在一九〇五年，有二百七十五萬人；在一九〇六年，有一百萬人，在一九〇七年，有七十五萬人。三年革命時期底特點，就是無產階級罷工鬥爭高漲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沒有見過的地步。這一鬥爭底低落，開始於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七年，而在一九〇八年間已是完全明顯了：罷工人數只有十七萬五千。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發生，而把勾結着黑幫地主和工商資本巨頭的杜馬的那個沙皇專制制度恢復起來了的國家政變，便是羣衆革命毅力低落底必然結果。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年的三年時期，是黑幫反革命勢力猖獗，自由資產階級背叛以及無產階級消沉瓦解的時代。罷工人數日益低落，在一九〇九年已減少到六萬人，在一九一〇年已減少到五萬人。

但是，從一九一〇年末起，又開始了很明顯的轉變。因自由黨人穆羅蒙澤夫逝世和托爾斯泰逝世而舉行的示威運動，以及學生運動，顯然表明風勢已經變換，民主羣衆底情緒已發生相當的轉變。在一九一一年，工人羣衆漸漸轉爲進攻：罷工人數達到十萬之多。從各方面都可看見，因反革命勝利局面所產生的那種疲勞性和麻木性日益過去，羣衆又趨向於革命了。一九一二年一月間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代表會議，總結它對時局的估計時指出說：『在廣大民主羣衆中，首先在無產階級中表示有政治活躍底開始。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間的工人罷工，示威運動和無產階級羣衆大會之開始，城市資產階級民主派運動之開始（學生罷課）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羣衆反對六三制度的革命情緒增長的表現』（參看代表會議工作通知，第一八頁）。

到本年第二季的時候，這種情緒已經大大增長，而表現爲羣衆行動並造成革命高漲了。最近一年半來的事變進程，顯然表明這個高漲絲毫也不是偶然發生，而是完全合乎規律，由俄國先前全部發展過程所必然引起的。

連拿慘案是由羣衆懷抱革命情緒過渡到羣衆革命運動高漲的導火線。托洛茨基在維也納真理報上跟着取消派重複的自由派虛構論調，說什麼『爭取結社自由的鬥爭是連拿慘案及其在國內引起的那種宏大反響底基礎』，——這真是再虛假不過的說法。在連拿罷工中，並沒有提出什麼結社自由來作爲特殊的或主要的要求。在連拿慘案中所暴露出來的，並不是缺乏結社自由，而是缺乏反對挑撥手段，反對一般無權狀況，反對普遍專橫暴戾制度… 的自由。

我們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二十六期上已經說明了，連拿慘案是整個六三帝制最確切的反映。連拿事變中的標本事實，並不是爭取某一種權利，那怕這種權利對於無產階級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這次事變中的標本事實，是在所有各方面都完全缺乏起碼的法制。這次事變中的標本事實，就是奸細、偵探、暗探以及沙皇巨僕沒有任何政治緣由而實行大批槍殺。在連拿事變中表現得非常鮮明，因而激起了羣衆革命熱情的，正是俄國生活中的這種一般無權狀況，正是爭取個別權利的毫無希望和絕不可能的情形，正是沙皇帝制及其全部制度無可矯正的事實。

自由派始終都想拚命證明連拿事變和五月罷工帶有職工運動和爭取『權利』的性質，然而凡沒有爲自由派的（和取消派的）爭論所蒙蔽的人，都知道這分明是另一回事。羣衆罷工底革命性質是很明顯的，五一節前夜各社會民主黨人團體（甚至有一個工人社會革命黨人團體！）共同在彼得堡發表的宣言，特別着重指出了這個性質；我們把這個宣言完全轉載在紀事欄裏，這個宣言上重複着一九一二年一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代表會議所提出的口號。

而且連拿罷工和五月罷工運動具有革命性質的主要證據還不在口號上。口號祇是種種事實底歸納。羣衆罷工運動由一區蔓延至另一區的事實，罷工大規模的發展，其蔓延之迅速，工人之勇敢，羣衆大會和革命演說之增多，要求取消因工人紀念五一而科收的罰款，以及我們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所熟識的那種政治罷工和經濟罷工配合舉行的情形，——所有這些，都很顯然指明運動底真正性質是羣衆革命運動的高漲。

我們來回顧一下一九〇五年的經驗吧。事變告訴我們，在工人中間保存着革命羣衆罷工傳統，工人們立刻就把這種傳統復興起來了。一九〇五年發生的開世界上未有奇局的罷工高潮，使最初三個月的罷工人數增加到八十一萬，最後三個月增加到一百二十七萬七

千人，同時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互相配合。按大略的計算，參加連拿事件所引起的罷工鬥爭的有三十萬工人，參加五月罷工的有四十萬工人，而罷工運動還在不斷地發展着。每期報紙——甚至自由派的報紙——都載有罷工火焰加劇的消息。一九一二年第二季還沒有完全過去，但現在已很明確地表現出一件事實，就是一九一二年革命高潮開始時的罷工運動規模和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潮開始時相比起來，不是較小，而是更大！

俄國革命第一次大規模發展了這一無產階級式的鼓動、振奮、團結和吸引羣衆參加鬥爭的方法。現在無產階級又來運用，並且以更堅決的手段來運用這種方法了。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能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用這種方法所實現的事情。幅圓廣大，其中所有一萬萬五千萬人口，散居於廣闊疆域，彼此分散，備受壓迫，沒有權利，愚昧無知，被無數官吏、警察和奸細重重包圍，而不能自由接受『惡影響』的一個國家，全部醞釀起來了。工農中最落後的階層，都與罷工者直接間接發生聯系。一下子就有數十萬革命鼓動員出現於舞台，他們的影響是在無限地加強着，因為他們與下層羣衆有密切聯繫，始終留在羣衆隊伍中間，爲一切工人家庭最迫切的要求而鬥爭，並把政治的抗議及反君主制度的鬥爭，與這種直接爭取迫切經濟要求的鬥爭連結起來。因爲反革命已引起數千百萬羣衆對君主制度的切齒仇恨，使他們開始明白君主制度底作用，而現在首都先進工人所提出的口號——民主共和制度萬歲！——就隨着每次罷工，沿着成千的溝渠流到落後階層，流到窮鄉僻壤，流到『民間』，流到『俄國深處』去。

自由派雪維梁寧對於罷工的議論，非常值得注意，他這種議論受到了俄國新聞報方面熱烈的歡迎，並由言論報極表同情地轉載着。

『工人們有沒有什麼理由把經濟要求或其他什麼（！）要求添加在五一罷工中去呢？——雪維梁寧先生這樣問道，隨即

自行回答說：『我敢斷言，他們是沒有這種理由的。任何經濟罷工，只有在嚴格估量到勝利的希望以後，才能够，才應當開始…所以把這樣的罷工恰恰和五一節聯繫起來，也就往往沒有根據…而且在慶祝全世界工人節日的時候，乘機要求把製造某種粗布的工資提高百分之十，更是有點奇怪的』。

這就是自由派底議論！而『優秀的』自由主義的報紙，想自命爲民主主義的報紙，却用同情態度來接受這種絕頂卑鄙，下賤而醜惡的議論！

資產者最粗鄙的私慾，反革命者最下賤的胆怯心理，便是自由派底漂亮言論中所蘊藏的東西。這個自由派想要保全主人的荷包。他想有一種擁護『結社自由』而『規規矩矩』，『毫無妨害的』示威運動！無產階級並沒有這樣作，反而吸引羣衆加入革命罷工，把政治和經濟密切聯繫起來，用立刻改善工人生活的罷工鬥爭勝利吸引最落後的階層，同時激起民衆去反對沙皇君主制度。

是的，一九〇五年的經驗造成了深刻而偉大的羣衆罷工傳統。決不要忘記這種罷工在俄國能引起怎樣的結果。在我們俄國發生的羣衆的持久罷工，是和武裝起義密切聯繫着的。

請不要曲解我這一段話底意思。此地所說的，並不是號召起義。在目前號召起義，是極不合理的。此地所說的，是要考查俄國罷工運動和起義之間的聯繫。

在一九〇五年，起義是怎樣生長起來的呢？第一，羣衆罷工，示威運動和羣衆大會，使羣衆與軍警間的衝突日益加多。第二，羣衆罷工掀起了農民去實行許多局部的，零星的，半自發的起義。第三，羣衆罷工非常迅速地蔓延到海陸軍中去，在那裏引起一種基於經濟要求的衝突（『豌豆』等等的『暴動』），以至於起義。第四，反革命自己用蹂躪手段，毒打民主份子等等方法來開始內戰。

一九〇五年革命之所以遭受失敗，並不是因為它走得『太遠』，並不是因為十二月起義是如自由派方面的叛徒們所想像的那樣用『人工造成的』。恰巧相反，它遭受失敗的原因，是由於起義走得不十分遠；是由於在革命階級中間對於起義必要的思想，還沒有充分普遍的傳佈和確切的領會；是由於當時起義還不是步調一致，堅決實行，組織嚴密，同時發動，採取攻勢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目前是否有起義生長底徵兆吧？爲了不陷於革命狂熱，且拿十月黨人來做證人。彼得堡的德意志十月黨人協會，大半是所謂『左派』和『憲制派』的十月黨人，他們是立憲民主黨人特別喜愛，並且是最能（比之其他的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用『客觀態度』觀察事變，而不立意以革命去恐嚇上司的。

這些十月黨人所出版的德文聖彼得堡時報，在五月六日（十九日）刊載的每週政治評論上寫道：

『五月到了。不管天氣如何，它對於首都居民，通常總是不甚快意的，因為頭一天就是無產階級的『節日』。今年工人還滿懷着連拿示威運動底感想，所以五月一日的情形是特別危險的。在充滿罷工示威謠言的首都空氣中，發出一種火災氣味。我們的忠實的警察機關很是着急，便趕忙實行搜查逮捕某些人，準備了大批武裝隊伍去防止遊行示威運動。警察機關竟只好去搜查工人報館和逮捕它們的編輯，這種情形證明它對於那些推動工人傀儡大隊的線索知道得並不特別深刻。而這些線索是有的。罷工底紀律性以及其他許多事實，都證實這點。因此，這次五月罷工實在可怕，這是空前未有的大罷工，有各大小企業內十萬以至十五萬工人參加。這還只是和平的檢閱，但是這支軍隊底團結性，很足令人注意。況且，隨同不久以前發生的工人怒潮而起的，還有其他各種令人驚惶的現象。在我國海軍各軍艦上有些水兵因作革命宣傳而被捕了。根據報上所載

一切消息來看，我們本來爲數甚少的軍艦上的情形是不很妙的… 鐵路工人也使我們驚惶不安。固然，任何地方都還甚至沒有作過舉行罷工的嘗試，但種種逮捕事件，尤其是逮捕尼古拉鐵路副站長烏夏可夫這樣觸日的事件，便是表明在鐵路上也有相當的危險。

幼稚工人羣衆底革命嘗試，對於杜馬選舉運動結局，當然只能發生有害的影響。這種嘗試是再輕率不過的舉動，何況… 沙皇已經委任了馬奴興，國家參議會已經通過了勞動保險法』！！

這就是德意志十月黨人底議論。我們要指出，關於水兵的問題，我們已從各地得到許多確實消息，證明新時代報把事情誇大了。暗探機關顯然是幹着挑撥的『工作』。過早的起義嘗試是極不合理的。工人先鋒隊應當明瞭，在俄國舉行適時的，即勝利的武裝起義底基本條件，就是民主農民起來援助工人階級，以及軍隊積極參加起義。

革命時代的羣衆罷工運動有其客觀的邏輯。它把千百萬火星散佈到各方面去，——而現在周圍都佈滿有各種引火物：極端的怨憤，空前的飢荒痛苦，暗無天日的橫行無忌，橫蠻無恥凌辱『窮人』，凌辱『莊稼漢』，凌辱兵士的現象。此外又加上黑幫派萬分放肆的反猶太人的蹂躪行動，即由昏暗暴虐的俄皇尼古拉宮庭黨徒暗中驅使指揮的行動…『從前如此，將來也會如此』¹⁶¹——馬卡洛夫總長所說的這一句話，竟成了一句使他自己和他自己的階級以及他自己的地主皇帝均覺不幸而言中了的預言！

羣衆底革命高漲，加予一切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加予一切忠實民主主義者一些偉大而艱鉅的責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代表會議認爲這些責任，就是『要從各方面援助正在開始的羣衆運動（現在已經要說：已經開始的革命羣衆運動）』，並且在完全實行黨所提

出的那些口號的旗幟下去擴大這種運動』。黨的口號——民主共和制度，八小時工作制，沒收一切地主土地——應成爲全部民主運動底口號，人民革命底口號。

爲要援助和擴大羣衆運動，就須極力加緊組織工作。沒有祕密黨，便不能進行這種工作；空談這種工作是毫無意思的。援助和擴大羣衆攻擊時，要仔細顧到一九〇五年的經驗，說明起義必要和不可避免，同時要預防並阻止過早的起義嘗試。羣衆罷工的增長，吸引其他階級參加鬥爭的情形，組織狀況，以及羣衆情緒，都會自行指明，什麼時候一切力量應當聯合起來向沙皇君主制度進行步調一致，堅決澈底，有進無退，奮勇果敢的革命攻擊。

沒有勝利革命，俄國就不會有自由。

不用工農起義推翻沙皇君主制度，俄國就不會有勝利革命。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七日（舊曆四日）刊載於
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二十七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第八
五至九二頁。

兩種烏托邦

烏托邦是希臘語：『烏』按希臘文的意思是『沒有』，『托邦斯』是地方。烏托邦是個沒有的地方，是一種空想，虛構和童話。

政治上的烏托邦就是無論現在和將來都決不能實現的一種願望，是不憑藉於社會力量，也不為階級政治力量增進發展所撐持的願望。

某一個國家內的自由愈少，公開的階級鬥爭表現得愈薄弱，羣衆底教育程度愈低，則政治的烏托邦，通常也愈易發生，其保持的時間也愈長久。

在現代的俄國有兩種政治烏托邦是保持得最牢固，並以其誘惑力對羣衆發生了相當影響的。這就是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和民粹主義的烏托邦。

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協的辦法，不必得罪任何人，不必撤銷普里什克維奇輩，不必用澈底的殘酷階級鬥爭，而就能在俄國，在俄國政治自由方面，在勞動民衆地位方面，達到某些嚴重的改良。這是妄想自由俄國能與普里什克維奇輩和平共處的烏托邦。

民粹主義的烏托邦就是民粹派的智識份子和勞動派的農民所抱的幻想，他們以為可能用公平原則重新分配全部土地的辦法來消除資本底權力和統治，消除僱傭奴隸制，或者是以為在資本統治下，

在金錢權力下，在商品生產下，可能維持住『公平』『均等』分配土地的制度。

這兩種烏托邦是由什麼產生的呢？為什麼它們在現代俄國能頗為牢固地支持着呢？

這兩種烏托邦是由進行着鬥爭反對舊制度，反對農奴制度，反對政治壓迫，總而言之，就是『反對普里什克維奇輩』，而同時又在這種鬥爭中沒有獨立立場的那些階級底利益所產生的。烏托邦，幻想，是這種不獨立性，這種軟弱性所產生的結果。幻想是弱者底命運。

一般自由資產階級，尤其是自由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不能不力求自由和法制，因為沒有自由和法制，資產階級底統治就會是不圓滿，不完整，無保證的。但是資產階級害怕羣衆運動，比害怕反動勢力還要厲害。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現出一種驚人的，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軟弱性，就表現出完全無力。因此，自由派在其全部政策上都極其模稜兩可，極端撒謊，絕頂虛偽，運用怯懦的支吾手段，因為他們定要玩弄民主主義的把戲，以便把羣衆吸引到自己方面來，而同時他們又極端反對民主主義，極端仇視羣衆運動，仇視其首倡發起精神，仇視其『衝天』精神¹⁵²，如馬克思評論前世紀一次歐洲羣衆運動時所說的那樣。

自由派底烏托邦是在俄國政治解放事業上表現軟弱無力的烏托邦，是貪利營私的富豪底烏托邦，他們想要同普里什克維奇輩『和平』瓜分特權，而把這種高尚的願望假冒為俄國民主派『和平』勝利的理論。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就是妄想不使普里什克維奇輩遭到失敗而戰勝他們，不使他們受到苦痛而把他們摧破。這種烏托邦底害處，顯然不僅由於它是烏托邦，而且由於它敗壞羣衆底民主意識。相信這種烏托邦的羣衆，永遠也不會爭得自由；這樣的羣衆不配享受自由；這樣的羣衆完全應該遭受普里什克維奇輩戲弄。

民粹派和勞動派底烏托邦，是表明站在資本家與僱傭工人中間的小業主妄想不必用階級鬥爭而消滅僱傭奴隸制。當經濟解放問題也如現時政治解放問題這樣成爲俄國的迫切當前直接問題時，民粹派烏托邦底害處就會不亞於自由派底烏托邦了。

但現在俄國所處的時代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改革時代，而不是無產階級性的改革時代；最終成熟了的不是無產階級經濟解放問題，而是政治自由問題，即是（其實是）完滿的資產階級自由問題。

在這樣一個問題上，民粹派底烏托邦也就起着一種特殊的歷史作用。這種烏托邦雖然對於重分土地應有（和將有）何種經濟結果的問題是一種幻想，但它同時又是農民羣衆廣闊偉大民主運動高漲底伴侶和徵候，而農民羣衆是在農奴主資產階級的現代俄國佔人口多數的。（在純粹資產階級的俄國，也如在純粹資產階級的歐洲一樣，農民是不會佔人口多數的）。

自由派底烏托邦敗壞羣衆底民主主義意識。民粹派底烏托邦雖然敗壞羣衆底社會主義意識，但它是廣闊民主運動高漲底伴侶和徵候，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這種高漲底表現。

歷史底辯證律是這樣：民粹派和勞動派在俄國土地問題方面，把極澈底堅決的資本主義辦法當作反對資本主義的手段提出來，並加以宣傳。土地重分底『平均性』是烏托邦，但是爲了重分土地而必須實行與一切舊的，地主的，份地的，『官家的』等等土地所有制完全斷絕關係，却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方向上最需要的，經濟上進步的，對於俄國這樣的國家最爲迫切的辦法。

要記着恩格斯底名言：

『在形式的經濟學意義上說是錯誤的那種東西，在全世界歷史意義上說也許會是正確的』。

恩格斯是在分析烏托邦社會主義問題時說出這個深刻原理的：這種社會主義在形式的經濟學意義上說是『錯誤的』，因爲它說剩

餘價值從交換法則觀點來看是不公平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底理論家反對這種社會主義，在形式的經濟學意義上是正確的，因為由交換法則中產生剩餘價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

但烏托邦社會主義在全世界歷史的意義上說是正確的，因為它是由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個階級底徵兆，表現和先聲，這個階級現在，到二十世紀初葉時，已長成爲巨大的力量，能夠消滅資本主義，並且不可遏止地向這方面前進着。

估計俄國現代民粹派的或勞動派的烏托邦時，必須記住恩格斯這一深刻的原理（也許不僅是在俄國，而且在二十世紀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的許多亞洲國家都應當這樣）。

民粹派的民主主義在形式的經濟學意義上說是錯誤的，而在歷史的意義上說却是正確的；這種民主主義之爲社會主義烏托邦，是錯誤的，但它之爲農民羣衆所進行而由歷史限定的特殊民主主義鬥爭底表現，却是正確的，這個鬥爭是資產階級改革事業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同時又是這一改革事業完全勝利的條件。

自由派的烏托邦是教農民羣衆不要去作鬥爭。民粹派的烏托邦却表示着他們努力鬥爭的趨向，約許他們勝利時能享到千萬種幸福，而其實這種勝利只能給一百種幸福。但是，當歷代處在極端黑暗，貧窮困乏，污濁，孤苦和閉塞境況中的千百萬民衆前去鬥爭的時候，豈不是自然要把可能勝利果實誇大十倍麼？

自由派的烏托邦乃是新剝削者想與舊剝削者分享特權這種私慾的掩飾品。民粹派的烏托邦乃是千百萬小資產階級勞動羣衆想根本消滅封建舊剝削者的這種願望表現，同時又是一種以爲可把資本主義新剝削者『一同』消除的一種幻想。

* * *

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一切烏托邦，自然應當堅持工人階級底獨立性，這個階級之所以能奮勇萬分地反對封建制度，正是因爲

它絲毫也沒有陷落到那種使資產階級不能去澈底反對封建主，而且往往去與封建主結成聯盟的私有制深淵裏去。農民是陷落到小商品生產的深淵裏去了的；他們在順利的歷史情況下，能夠做到完全消滅封建制度，但他們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會永遠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在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表現某種動搖的。

所以，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應當從民粹派烏托邦外殼中間，把農民羣衆健全寶貴的誠懇堅決戰鬥民主主義內核細心分辨出來。

在前一世紀八十年代的老馬克思主義書籍中，可以看見一貫實行把這種寶貴民主主義內核分辨出來的趨向。將來歷史家將有系統地研究這種趨向，並看出這種趨向與在二十世紀最初十年內得到了『布爾什維主義』名稱的那個思潮間的聯繫。

寫於一九一二年十月。

一九二四年刊載於生活雜誌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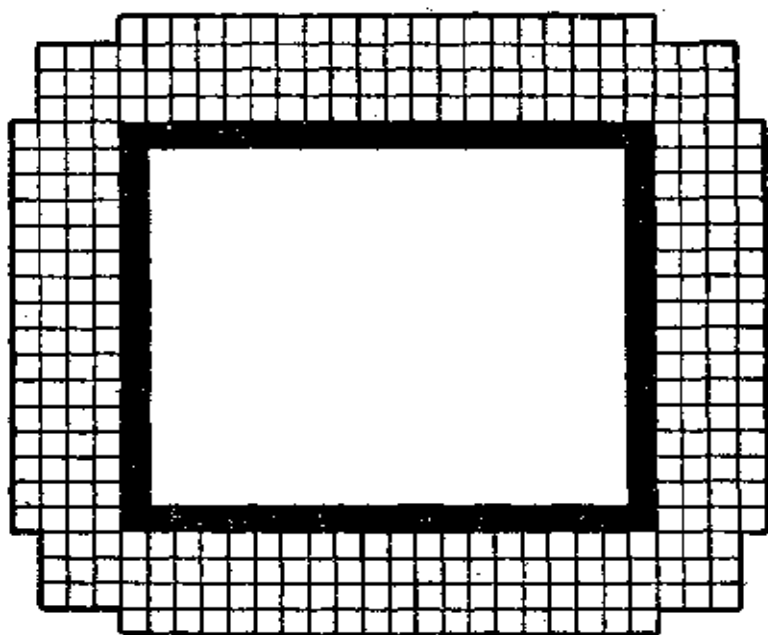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

第三二六至三三〇頁。

俄國地主的大地產和 農民的小地產

講到剛才過去的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事件¹⁸⁶¹紀念時，不妨說說現時歐俄土地分配的情形。

內務部頒佈了關於歐俄土地分配情形的最近的正式統計材料，這些材料是在一九〇五年收集的。



按照這些統計材料，擁有五百俄畝以上土地的大地主約有（整數）三萬戶，他們總共有土地約七千萬俄畝。

約近一千萬貧苦農戶所有的土地，也是這樣的數目。

這就是說，每個大地主所有的土地平均等於三百三十個貧苦農戶所有的土地，其中每戶農民約有七俄畝土地，每個大地主約有二千三百俄畝土地。

爲了具體說明這種情形，在上邊畫了一個圖表。

中間那面空白的大方塊，是表示一個大地主所有的地產。周圍的許多小方塊，便是表示着小的農民地塊。

一共有三百二十四面小方塊，而那面空白的大方塊底面積就等於三百二十面小方塊。

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五日(舊曆二日)刊載於
真理報第五十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第五
四八至五四九頁。

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

本文標題所用的語句，似乎是不近情理的。試問誰不知道歐洲先進，亞洲落後呢？但是用作本文標題的語句，含有苦味的真理。

技術十分發達，文化豐富，憲法周備的文明先進的歐洲，已進到這樣一個歷史時期，此時統治的資產階級因害怕增長強固起來的無產階級，而維持一切落後的，衰亡的，中世紀的東西。衰老的資產階級與一切衰敗了和衰敗着的勢力聯合起來，以求保存陷於動搖的僱傭奴隸制。

在先進的歐洲當權的是維持一切落後東西的資產階級。歐洲在現時之所以先進，並不是因為有資產階級，而是違反着資產階級底意志，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使爭取幸福將來的百萬大軍日益增長起來，只有它才保持着無情仇恨落後，仇恨野蠻，仇恨特權，仇恨奴隸制，仇恨人侮辱人現象的心理，並傳佈着這種心理。

在『先進的』歐洲，只有無產階級才是先進的階級。而尚存的資產階級則甘願去幹一切野蠻，殘忍和罪惡的勾當，以求保持垂死的資本主義奴隸制度。

歐洲資產階級爲了一些財政滑頭和資本家騙子底貪婪目的而維持亞洲反動勢力的事實，要算是證明全體歐洲資產階級這樣腐朽的一件最明顯不過的例子了。

亞洲各處都有強大的民主運動增長，擴大，鞏固起來。那裏的資產階級還同人民一塊反對反動勢力。數萬萬人覺醒起來，趨向於

光明和自由。這個世界運動該使所有一切知道民主制度是達到集體制度所必經之路的覺悟工人何等歡喜啊！一切忠誠的民主主義者是對年輕亞洲多麼表示同情啊！

而『先進的』歐洲呢？它掠奪中國，幫助中國民主自由底敵人！

且舉一個很簡單，但很值得注意的數目字看看吧。借給中國的新公債是反對中國民主派的：『歐洲』贊助準備武人專政的袁世凱。爲什麼它要贊助袁世凱呢？因爲這是個有利可圖的機會。公債數目約計二萬五千萬盧布，按每一百盧布實折爲八十四個盧布的行市計算。這就是說：『歐洲』資產者實付中國人二萬一千萬盧布，同時却要向大家拿去二萬二千五百萬盧布。你看，在幾個星期以內，一下子就賺得一千五百萬盧布的純利！這豈不真是一筆極妙的『純』利麼？

若是中國人民不承認這筆公債呢？中國豈不是有共和制度，而國會中的大多數豈不是反對這筆公債麼？

那時『先進的』歐洲就會要大喊大叫起來，說什麼『文明』，『秩序』，『文化』和『祖國』了！那它就會要把大砲開去，而與那個野心家，賣國賊，反動之友的袁世凱聯合起來壓毀『落後』亞洲底共和制度了！

整個歐洲當權勢力，整個歐洲資產階級，都是與中國所有一切中世紀反動勢力實行聯盟的。

但整個年輕的亞洲，即亞洲數萬萬勞動者，却有各文明國家裏的無產階級爲其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這個無產階級把歐洲各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一同解放出來的勝利。

一九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舊曆十八日）

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一十三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九卷，第七七至七八頁。

論民族自決權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綱領中論民族自決權的第九條，近來引起了（我們在教育雜誌上已經指出了這一點）機會主義者底大舉攻擊。俄國取消派份子謝科夫斯基在彼得堡取消派報紙上，崩得份子李勃曼以及烏克蘭民族社會黨人尤爾克維奇各在自己的機關刊物上，極力攻擊這一條，用極端鄙視的態度來輕蔑它。機會主義向我們馬克思主義綱領所舉行的這種『總同盟進攻』，顯然是與現時一般民族主義偏向有密切聯系的。因此我們認為現在必須把這個問題詳細分析一下。不過我們要指明一點，就是以上列舉的那些機會主義者中沒有一個人拿出過什麼獨立的論據：他們都只是重複盧森堡¹⁸⁴在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間用波蘭文寫的那篇標題為民族問題與自治的長文內所說過的議論。所以我們在這篇論文中所要予以最多注意的，也就是盧森堡底『新奇』論據。

（一）何謂民族自決？

要想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研究所謂自決，自然首先就要提出這個問題。所謂自決應當怎樣瞭解呢？是要在從法權『概念』中得出來的法律定義裏面去找答案呢，還是要在對各國民族運動所作的歷史經濟的研究中去找答案呢？

謝科夫斯基，李勃曼和尤爾克維奇一流先生們甚至沒有想到要提出這個問題，而祇以嘲笑馬克思主義綱領『語意不明』來敷衍了事，原是毫不足怪的，因為他們由於頭腦簡單，大概是甚至不知道民族自決問題不僅在一九〇三年通過的俄國黨綱中說到了，而且也在一八九六年倫敦國際大會決議中說到了的事實（我們往下論到這一點時，還要詳細來講）。至於盧森堡，雖屢次宣佈說這一條似乎是太抽象，太有形而上學的弊病，而她自己正犯了這種抽象和形而上學的錯誤，却就奇怪得多了。正是盧森堡經常迷誤於泛談民族自決問題的一般議論（以至於簡直可笑地暢談怎樣去認識民族意志的問題），而從來也沒有明確提出問題：事情本質究竟是在於法律的定義，還是在於全世界民族運動底經驗呢？

確切提出這個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提出的問題，立刻就會把盧森堡底論據打倒十分之九。民族運動並不是初次在俄國發生，也不是俄國一國特有的現象。在全世界上，資本主義澈底戰勝封建制度的時代，總是與民族運動相連的。這種運動底經濟基礎是在於要保證商品生產達到完全勝利，便必須使資產階級奪得國內市場，必須使同一語言的人民所居住的地域用國家的形式團結起來，同時剷除阻碍這種語言發展及在文藝上鞏固起來的一切障礙。語言是最重要的人類交際工具；語言統一及其無阻碍的發展，是保證商品週轉能適應着現代資本主義而真正自由廣泛發展起來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廣泛地劃分為各個階級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最後，是使市場與所有一切大小經濟主人，賣主及買主密切聯繫起來的條件。

所以組織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這些要求的民族國家，就是一切民族運動底共同趨向。最深刻的經濟因素推動人們來實現這一點，所以民族國家對於整個西歐，而且對於整個文明世界，都是資本主義時代標本的正常的國家形式。

因此，我們要想瞭解民族自決底意義，不去玩弄法律上的定義，不去『發明』抽象的定義，而去研究民族運動底歷史經濟的條件，就必然要得出結論說：所謂民族自決，就是民族脫離外族集體的國家分立，就是組織獨立民族國家。

關於爲什麼只能把自決權瞭解爲國家分立權，而不能瞭解爲任何別的東西的其他各種原因，我們往後再講。現在我們只把盧森堡企圖『推脫』關於成立民族國家的趨向是有深刻經濟原因的這一必然結論的情形，考察一下。

考茨基所著民族性與國際性一書（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新時代第一期副刊，俄譯本載於一九〇八年里加出版的科學思想雜誌上），是盧森堡知道得很清楚的。她知道，考茨基在該書第四節裏詳細分析了民族國家的問題，得出結論說鮑威爾『輕視了建立民族國家的趨向』（見該書第二三頁）。盧森堡自己引用考茨基所說『民族國家是與現代條件』（即跟資本主義以前的中世紀等等條件不同的資本主義的、文明的、經濟上進步的條件）『最適合的國家形式，是使國家最容易實現其任務的』（即能保證資本主義最自由，廣泛，迅速發展的）『國家形式』等語。這裏還要指出考茨基所作的一個更確當的結論，即認爲民族複雜的國家（即與民族國家不同的所謂多民族國家），『始終是由於某些原因而內部結構不合常態或不够發展的（落後的）國家』。考茨基所說的不合常態，當然只是指不適合於那些最適應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條件而言。

現在就要問問：盧森堡對於考茨基所作的這些歷史經濟結論，究竟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呢？這些結論正確不正確呢？是考茨基所提出的歷史經濟理論正確呢，還是鮑威爾所提出的那個根本上是心理學式的理論正確呢？鮑威爾所持的那種無疑是『民族機會主義』的立場，他那種擁護民族文化自治的觀點，他那種民族主義的偏執（如考茨基所說『有些地方強調民族成分』），他那種『極其誇大

民族成分而完全忘記國際成分的態度』（考茨基），究竟與他那種輕視建立民族國家的趨向的態度，有什麼聯繫呢？

盧森堡甚至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她沒有看出這種聯繫。她沒有把鮑威爾理論觀點底整個系統細想一下。她甚至完全沒有把民族問題上的歷史經濟學理論與心理學理論對立起來。她只是用如下一段話來反對考茨基。

「…這個『最好的』民族國家只是一種抽象的東西，容易受到理論上的發揮和理論上的擁護，但不符合於實際情形」

（社會民主主義評論一九〇八年第六期，第四九九頁）。

盧森堡爲要證實這個堅決意見，接着就說，資本主義列強的發展和帝國主義，使弱小民族底『自決權』成爲虛幻的東西。『是否可以——盧森堡驚問道——認真說到形式上獨立的門的內哥羅人，保加利亞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甚至瑞士人底『自決』呢；他們的獨立性根本就是『歐洲音樂會』上政治鬥爭和外交把戲底產物哩』？！（第五〇〇頁）。最適於實際條件的，並『不是考茨基所認定的民族國家，而是強盜國家』。然後她就舉出了說明英法等國所屬殖民地面積大小的幾十個數目字。

看了這些議論，不能不對作者根本不懂何謂牛頭不對馬嘴的本事表示驚訝！用莊嚴的神情教訓考茨基，說什麼小國家在經濟上依賴於大國家，說什麼資產階級國家爲着用強盜手段去征服異族而互相鬥爭，說什麼存在有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等語，就未免是一種令人發笑的賣弄聰明的幼稚氣，因爲所有這些都與問題毫不相干。豈但小國家，而且例如像俄國這樣的大國家，也是在經濟上完全依賴於『富強』資產階級國家底帝國主義財政資本勢力。豈但巴爾幹的幾個蕞爾小國，就連十九世紀的美國，在經濟上說也曾是歐洲底殖民地，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裏面就已經說過的。所有這些，考茨基和

每個馬克思主義者當然知道得十分清楚，但這與民族運動以及民族國家問題是毫不相干的。

盧森堡把資產階級社會裏的民族政治自決問題，民族國家獨立問題，偷換上民族經濟獨立，經濟自主問題。這種聰明說法，正好似一個人討論國會，即人民代表會議在資產階級國家內應有最高權力的這個綱領要求時，却竟發表他認為大資本在資產階級國家任何一種制度下都擁有最高權力的正確見解一樣。

毫無疑義，世界上人口最密的亞洲，大部分都處於『列強』殖民地的狀況，或是在民族關係上極不獨立極受壓迫國家的狀況。可是，這種盡人皆知的情形，難道能絲毫動搖一件無可爭辯的事實，即在亞洲只有日本一國，就是說只有在這個獨立的民族國家裏，才造成了種種條件來使商品生產能夠最完備發展，使資本主義能夠最自由、廣泛、迅速發展的事實麼？這個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壓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亞洲是否來得及在資本主義崩潰以前，也像歐洲那樣形成爲各個獨立民族國家所構成的體系，我們無從知道。但有一點始終是無可爭辯的，就是資本主義把亞洲驚醒起來了的時候，在那裏也是到處都引起了民族運動，而這些運動底趨向是要在亞洲創立一些民族國家，也只有這樣的國家才會保證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好的條件。亞洲底實例，是擁護考茨基，反對盧森堡的。

巴爾幹半島各國底實例也是反對她的，因爲現在誰也看得見，在巴爾幹半島上保證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好的條件，恰巧是隨着這裏建立獨立民族國家而形成起來的。

所以，無論是全體先進文明人類底實例也好，巴爾幹半島底實例也好，亞洲底實例也好，都是與盧森堡所說相反，而證明考茨基立論絕對正確：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底通例與『常態』，而民族複雜的國家，却是一種落後的表現或例外的情形。從民族關係方面看

來，民族國家無疑是保證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好的條件。這當然不是說，這種國家在資產階級關係基礎上能排除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這祇是說，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忽視那些產生建立民族國家的趨向的強大經濟因素。這是說，從歷史和經濟的觀點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綱領上所講的『民族自決』，除了政治自決，國家獨立，建立民族國家而外，便不能有什麼其他的意義。

至於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上看來，究竟要在什麼條件下，才能贊助『民族國家』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要求，這在下面就要詳細說明。現在，我們祇要闡明『自決』概念底定義，不過還應當指出一點，就是盧森堡知道這個概念（『民族國家』）底內容，而她的那些機會主義伙伴，如李勃曼輩，謝科夫斯基輩，尤爾克維奇輩，却連這一點都不知道哩！

(二)歷史的具體的問題提法

馬克思主義理論底絕對要求，就是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都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再則，如果是講到某一國家（例如，講到該國的民族綱領），就要注意到在同一歷史時代以內該國與其他各國不同的具體特點。

若把馬克思主義底這個絕對要求應用到本問題上來，那就會要怎樣作呢？

首先就必須嚴格分清從民族運動觀點看來根本不同的兩個資本主義時代。一個時代是封建制度與專制制度崩潰的時代，是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社會和國家形成的時代，當時民族運動初次成爲羣衆的運動，使民間一切階級用各種方式，如經過出版物，參加代表機關等等加入政治生活。另一個時代，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全形成，立憲制度早已確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相對抗情形已很發展的時代，這個時代可以叫做資本主義崩潰底前夜。

前一時代底標本現象，就是由於爭取一般政治自由，尤其是爭取民族權利的鬥爭，使民族運動活躍起來，使人數最多而『發動最難』的那個居民階層，即農民，加入這種運動。後一時代底標本現象，就是沒有什麼廣大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當時已很發達的資本主義使完全捲入了商品週轉範圍的各個民族愈益接近，彼此雜居，而把國際上溶合了的資本與國際工人運動互相對抗的情形提到第一位。

這兩個時代，當然不是彼此完全隔絕，而是有無數過渡連環聯繫着的；並且各個國家，因民族發展速度，居民民族成份，居民分佈等等差異而各不相同。若不注意到所有這些一般歷史條件和具體國家條件，就根本無法着手製定該國馬克思主義者底民族綱領。

正是在這裏，我們也就遇到了盧森堡底議論中最軟弱的地方。她在自己的文章裏拚命想出一批『厲害』字眼來反對我們綱領第九條，說它『籠統』『死板』，說它是『形而上學的空談』等等，等等。這位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責形而上學觀點（馬克思所指的那種形而上學觀點，即反辯證法的觀點）和空洞抽象觀點，自然也就應該給我們作出一個用具體歷史方法研究問題的榜樣。問題是講到在一個一定的國家和一個一定的時代，即二十世紀初期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民族綱領。大概盧森堡會這樣提出問題：俄國究竟是處在怎樣一個歷史時代，這個國家在這個時代中的民族問題與民族運動究竟具有怎樣一些具體特點呢？

可是盧森堡絲毫也沒有說到這一點！民族問題在現今歷史時代中的俄國究竟是怎樣擺着，俄國在這方面究竟具有怎樣的特點，——在她的文章裏對於這個問題是根本沒有加以分析的！

人們告訴我們，說巴爾幹民族問題與愛爾蘭不同，說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具體條件下怎樣怎樣估計過波蘭人與捷克人的民族運動（整頁都是引證馬克思所說的話），說恩格斯怎樣怎樣估計過瑞士各森林州反對奧地利的鬥爭以及一三一五年的摩耳加騰的戰役（整頁

都是摘引恩格斯底話與考茨基所加的相當評註），說拉薩爾認為十六世紀德國農民戰爭是反動的等等。

當然不能說這些意見與引證有什麼新奇之處，然而叫讀者再三回憶回憶馬克思，恩格斯與拉薩爾用什麼態度分析過各國具體歷史問題，總是有些益處的。你們閱讀她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裏摘來的這些極有教益的引證，就會特別明顯地看到盧森堡自己陷落到了何等可笑的地步。她用流暢的詞句和憤激的神情，鼓吹說必須用具體歷史方法分析各個時代中各個國家的民族問題，但她絲毫也沒有企圖確定一下，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究竟是處在怎樣的資本主義發展歷史階段，這個國家中的民族問題究竟有怎樣的特點。盧森堡舉出一些表明別人怎樣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問題的例子，就好像是故意指明人們往往用善念去鋪砌地獄，用許多善言去掩飾自己不願意或不善於在實際上利用這些善言的事實。

請看一個很可注意的比擬。盧森堡極力反對波蘭獨立口號時，引證她在一八九八年所寫的一篇證明了『波蘭工業發展』迅速並把工廠製造品推銷於俄國的著作。不消說，從這裏絲毫也還不能得出什麼有關民族自決權問題的結論，而不過證明舊時貴族波蘭已經消滅等等罷了。但盧森堡總是不知不覺地作出一種結論，說在那些使俄國與波蘭結合起來的因素中，現代資本主義關係底純粹經濟因素現在已佔優勢。

可是，我們的盧森堡談到自治問題時，——雖然她的文章是標題為一般『民族問題與自治』，——就來證明波蘭王國有特別權利要求自治（參看一九一三年教育雜誌第十二期上對於此點的評論）。爲了證實波蘭有權要求自治，盧森堡就認爲俄國底國家制度——大概是按其經濟、政治、風俗習慣以及社會方面的標誌來說——是構成『亞洲式專制制度』這一概念的種種特徵底總和。（評論，第十二期，第一三七頁）。

大家知道，這種國家制度，當該國經濟完全是以資本主義前期的宗法特徵佔優勢，而商品經濟及階級分化尙很少發展的時候，是極其牢固的。如果在國家制度顯然帶有資本主義前期特質的那個國家內，存在有一個資本主義發展迅速的民族隔絕區域，那末這一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愈迅速，則它與資本主義前期國家制度間的矛盾也就愈厲害，而這個先進區域脫離整體也就愈有可能，因為把這個區域與整體聯系着的不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繫索，而是『亞洲式專制制度』的繫索。

由此看來，盧森堡甚至關於俄國政權底社會結構對資產階級波蘭的關係問題，也完全不能自圓其說，而關於俄國民族運動底具體歷史特點問題，更是提都沒有提起。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正應當來分析一下。

(三) 俄國民族問題底具體特點及 俄國資產階級民主的改革

…『雖然『民族自決權』原則是個極普泛的文句，不但適用於俄國境內各個民族，而且顯然是同樣適用於德國和奧國，瑞士和瑞典，美洲和澳洲境內各個民族，——雖然這個原則十分普泛，但我們無論在那一個現代社會黨底綱領內，都找不到這個原則』…（評論第六期，第四八三頁）。

盧森堡開始攻擊馬克思主義綱領第九條時，就是這樣寫的。她把誤將這一綱領條文看作『十分普泛的文句』的見解加在我們頭上，而她自己却恰巧是陷於這種錯誤，因為她竟大胆得可笑地宣稱，說這一條文『顯然是同樣適用於』俄德等等國家。

我們回答道：盧森堡顯然是打算在自己的文章中寫出一部可以用作中學教本的邏輯錯誤大全，因為她的議論完全是胡說八道，完全是譏笑歷史具體問題提法的。

如果不是用小孩子態度，而是用馬克思主義態度來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綱領，那就很容易猜到，這個綱領是關係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民族運動的。既然如此，——而且無疑是如此——那末，這個綱領『顯然』是『籠統』關係於凡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民族運動的場合的一個『普泛文句』等等。而盧森堡只要稍加思索一下，也是顯然會得出認為我們的綱領僅僅關係於有這種運動存在的那些場合的結論。

盧森堡把這些顯然的理由思索一下，就會知道她所說的話是多麼糊塗了。他責備我們提出『普泛文句』時所用以反對我們的論據，是說在沒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民族運動的那些國家底綱領內沒有民族自決的條文！好一個聰明的論據呵！

拿各個國家底政治經濟發展情形來互相比較，以及拿各個國家內的馬克思主義綱領來互相比較，這從馬克思主義底觀點看來有莫大的意義，因為各個現代國家底資本主義本性以及它們的發展規律顯然是共同的。可是，這樣的比較，必須作得適當。這裏的起碼條件，就是要看清拿來互相比較的各個國家底歷史發展時期究竟是不是可以互相比較。譬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土地綱領，就只有愚蠢不過的人，才會把它拿去與西歐各個土地綱領『比較』（如杜魯別茨可義侯爵在俄國思想上所作的那樣），因為我們的綱領所回答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的土地改革問題，而在西歐各國却已根本談不到這樣的改革了。

民族問題也是如此。民族問題在西歐大多數國家內早已解決了。在西歐各國綱領內去找對於不存在的問題的答覆，是很可笑的。這裏盧森堡恰恰忘掉了一件最主要的事情：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改革早已完成的國家與尚未完成的國家之間的區別。

這一區別就是全部關鍵之所在。正因為盧森堡完全忽視了這一區別，所以她那篇洋洋大文也就成了一堆空洞無謂的普泛文句。

在西歐大陸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所包括的，是一段頗為確定的時期，大約從一七八九年起，至一八七一年止。這個時代恰恰是民族運動及建立民族國家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完結後，西歐便成了一些資產階級國家，而且通常是些單民族國家所構成的體系。因此，誰在現時到西歐社會黨人綱領內去找民族自決權，就是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底起碼原則。

在東歐與亞洲方面，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是在一九〇五年才開始的。俄國，波斯，土耳其以及中國的革命，巴爾幹半島的戰爭等，就是現今時代我們『東方』所發生的一串有世界意義的事變。只有瞎子，才看不見這一串事變是表示着許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民族運動，力求建立民族獨立和民族統一國家的運動興起的事實。正因為，而且只是因為俄國及其隣邦處在這一個時代，所以我們需要在我們的綱領上提出民族自決權這一條。

我們且把上面從盧森堡論文中引證過的那段言論繼續摘引一下：

『…特別是——盧森堡寫道——在民族成份非常複雜的國家內工作，而認為民族問題有首要作用的那個黨，即奧國社會民主黨底綱領內，並沒包含有民族自決權原則』（同上）。

總之，有人想拿『特別是』奧國的例證來說服讀者。我們且從具體歷史觀點上來看看這個例證是否有很多合理的東西吧。

第一，我們且提出關於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這個基本問題。奧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在一八四八年開始，而於一八六七年完結的。從那時到現在幾達五十年之久的過程中，那裏始終是由大體上已經奠定的資產階級憲制統治着，而合法的工人政黨也就是在這個憲制基地上公開活動的。

因此，在奧國內部發展條件中（即是從一般奧國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奧國各個民族中的資本主義發展方面看來），並沒有什

麼產生突變的因素，而這種突變所能引起的現象之一，就是組織民族獨立國家。盧森堡拿俄國來與奧國比擬，以為俄國在這一點上是處在同樣的條件下，於是她就不但作了一個根本不對的反歷史的假定，而且是於無意中滾到取消主義方面去了。

第二，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是在本問題上奧國境內各民族相互關係與俄國境內各民族相互關係完全不同。奧國不僅是在一個長時期內以德意志人佔過優勢的國家，而且奧國的德意志人還懷有過想做一般德意志民族霸主的野心。這種『野心』，——也許盧森堡（她似乎是很不喜歡普泛文句，死板，抽象東西的哩…）願意記起這件事實吧，——是被一八六六年的戰爭所粉碎了。於是在奧國佔統治的民族——德意志人——竟落在一八七一年澈底組成的德意志人獨立國家以外了。另一方面，匈牙利人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的嘗試，早在一八四九年間就被俄國農奴制軍隊打破了。

於是就造成了一種非常特殊的局面：匈牙利人以及捷克人恰恰不是趨向於脫離奧國，而是趨向於保持奧國完整性，其目的正是爲了保持民族獨立地位，以免完全被那些更殘暴更強悍的鄰國所破壞！奧國由於這種特殊情況，便形成爲兩個中心的（二元的）國家，而現在又變成爲三個中心的（三元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國家。

俄國是否有多少與此相像的情形呢？我們這裏的『異族人』是否有因恐受到更壞的民族壓迫而情願與大俄羅斯人合併的趨向呢？

只要提出這一問題，就可看出在民族自決問題上拿俄國來同奧國比較，是非常荒謬，非常死板，非常愚昧的了。

在民族問題上，俄國所具有的特殊條件恰恰是與奧國相反。俄國是以一個民族，即大俄羅斯民族爲中心組成的國家。大俄羅斯民族佔有巨大的集居地區，人口約有七千萬。這個民族國家底特點是：第一，『異族人』（統計起來，佔全國人口多數，即百分之五

十七) 恰恰是住在邊陲區域；第二，這些異族人所受的壓迫比他們在各鄰國（並且不僅是在歐洲各國）所受的更厲害得多；第三，這些居住邊陲區域的被壓迫民族，往往有同族人民住在與俄國接壤的地方而享有較多的民族獨立權（例如住在俄國西南兩方邊界以外一帶的芬蘭人，瑞典人，波蘭人，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就是如此），第四，資本主義底發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準，在『異族的』邊陲，往往高出於中心本部區域。最後，正是在鄰近的亞洲各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運動已經開始發展起來，而蔓延到住在俄國境內的那些同血統的民族。

由此可見，俄國民族問題底歷史具體特點，就使我們在現今時代承認民族自決權有特別迫切的意義。

況且，就是從純粹的事實方面來看，盧森堡所說奧國社會民主黨綱領上沒有承認民族自決權的斷語，也是不對的。只要打開通過了民族綱領的布隆代表大會底記錄一看，就可知道，當時有露新社會民主黨人甘克維赤，用全體烏克蘭（露新）代表團名義（記錄第八五頁），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列格爾用全體波蘭代表團名義（記錄第一〇八頁）提出聲明，說這兩個民族中的奧國社會民主黨人已把他們自己的民族力求民族統一，自由與獨立的趨向，列入自己的要求之內。可見，奧國社會民主黨雖然沒有在自己的綱領內直接提出民族自決權的要求，但它同時又完全容許黨內各部份提出民族獨立的要求。這在事實上當然也就是承認民族自決權！所以，盧森堡以奧國情形爲例的論據，在各方面都是反對盧森堡自己的。

（四）民族問題上的『求實主義』

機會主義者特別喜歡援引盧森堡底論據，說我們綱領第九條中沒有包含一點『實際的』東西。盧森堡自己也非常喜愛這個論據，她在她這篇文章中，常在一頁以內一連把這個『口號』重複八遍。

第九條，——她寫道，——『對於無產階級日常政策沒有給予任何實際的指示，對於民族問題沒有給出任何實際的解答』。

她這個論據又還表述如下：第九條不是毫無所指，便是責成大家贊助一切民族要求。我們且來把這個論據考查一下。

要求在民族問題上表現『求實精神』，這是什麼意思呢？

或是贊助一切民族要求；或是對每個民族分立問題作個『是或否』的具體回答；或是使民族要求一般可能直接『實現』。

我們就來把『求實』要求底這三種可能含義考查一下吧。

在一切民族運動開始時自然充當運動領導者的資產階級，把贊助一切民族要求稱為求實的事情。但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也如在其他問題上一樣）的政策，却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贊助資產階級，而始終不與資產階級的政策相符合。工人階級只是為謀得民族和平（民族和平是資產階級不能完全做到，而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時候才能實現的），為謀得平等權利，為求得最好的階級鬥爭環境，才贊助資產階級。所以無產階級恰恰是反對資產階級求實精神而提出民族問題上的原則政策，始終只是有條件地贊助資產階級。任何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都打算為自己的民族謀得特權，或為自己的民族謀得特殊利益；這也就叫做『求實精神』。無產階級反對任何特權，反對任何特殊利益。要無產階級表現『求實精神』，就等於遷就資產階級，陷入機會主義。

對每個民族分立問題都要作個『是或否』的回答麼？這似乎是個很『求實的』要求。其實它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形而上學的，而在實踐上則是使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政策。資產階級總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在第一位，把它們提作絕對的東西。而無產階級却認為民族要求應服從於階級鬥爭利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該民族分立還是以該民族與別民族平等來結束，這在理論上是不能預先担保的；無產階級是需要在這兩種情形下都保證本階

級底發展；資產階級是需要阻礙這種發展，把無產階級的任務推在『自己的』民族任務後面去。因此，無產階級就以所謂否定式的要求，即以承認自決權爲限，而不向任何一個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個民族約許以侵害別民族利益爲代價的任何東西。

就算這是不合『求實精神』吧，但這在事實上是最能保障用儘可能民主辦法解決問題的；無產階級只是需要有這種保障，而每一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則需要保障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底地位怎樣（不管它們受到何等損害）。

資產階級最注重該項要求底『實現』，——由此就有始終都以損害無產階級爲代價來與其他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妥協分贓的政策。而無產階級則需要鞏固自己的階級來反對資產階級，以澈底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來教育羣衆。

讓機會主義者去說這是不合『求實精神』吧，但這是唯一實在的保障，反對封建主和民族主義資產階級而達到最高限度民族平等和民族和平的保障。

從每個民族中的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底觀點看來，無產者在民族問題上所提出的全部任務都是『不合求實精神』的，因爲無產者仇視任何民族主義，而要求『抽象的』平等，要求根本消除任何特權。盧森堡沒有瞭解這一點，而糊糊塗塗讚美求實精神，這恰巧是爲機會主義者，特別是爲向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讓步的機會主義政策，大開方便之門。

爲什麼是向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讓步呢？因爲大俄羅斯民族在俄國是個壓迫民族，而民族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在被壓迫民族中和壓迫民族中自然是表現得各不相同的。

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將以自己的要求『合乎求實精神』爲藉口而號召無產階級無條件地擁護它的要求。最合求實精神的莫如

直接說個『是』字，贊成某一個民族底分立，而不是贊成所有一切民族底分立權！

無產階級反對這樣一種求實精神。它承認各民族平等，承認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國家的平等權利時，把各民族無產者間的聯合看得高於一切，提得高於一切，而從工人底階級鬥爭方面着眼來估計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分立。求實精神底口號，其實不過是盲從資產階級趨向的口號。

有人對我們說：你們贊成民族分立權，就是贊成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樣說的有盧森堡，隨聲附和她的有機會主義者謝科夫斯基，——順便說說，他是在取消派報紙上對這個問題發表取消派思想的唯一代表人物！

我們回答道：不，在這裏，正是資產階級需要『合乎求實精神的』解決，而工人則認為必須在原則上劃清兩個趨向。當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對壓迫民族進行鬥爭時，我們始終都要比任何人更堅決地予以贊助，因為我們是最大胆，最堅決反對壓迫的。當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擁護自己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時，我們便要反對。我們反對壓迫民族底特權和暴力行動，同時絲毫也不袒護被壓迫民族方面圖謀特權的趨向。

我們不提出，不鼓吹分立權的口號，就會不但是幫助了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而且是幫助了壓迫民族中的封建主和專制制度。考茨基早已提出這個論據來反對盧森堡，而且這個論據是無可爭論的。盧森堡因害怕『幫助』波蘭民族主義資產階級而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綱領上規定民族分立權，事實上就是幫助着大俄羅斯民族中的黑幫派。她在事實上是幫助着容忍大俄羅斯人享受特權（並且是比特權更壞的東西）的機會主義政策。

盧森堡因醉心於反對波蘭民族主義而忘記了大俄羅斯人底民族主義，而這個民族主義正是現時最可怕的東西，正是少帶資產階級

性而多帶封建性的東西，正是民主運動和無產階級鬥爭發展途程上的主要障礙物。每個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都含有反對壓迫的一般民主主義內容，而我們正是無條件地贊助這種內容，同時嚴格地把圖謀自己民族特殊地位的趨向區分出來，反對波蘭資產者壓迫猶太人的趨向等等。

這在資產者和市儈們看來是『不合求實精神』的。但這是民族問題上唯一合乎實際，真能幫助民主運動，促進自由，促進無產階級聯合的原則政策。

承認一切民族都有分立權；用排除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以及任何特殊地位的觀點來估計每一個關於分立的具體問題。

且拿壓迫民族底地位來講。壓迫他族人民的人民，能不能自由呢？不能。大俄羅斯居民*爲要獲得自由，就須反對這種壓迫。鎮壓被壓迫民族運動的長期歷史，數百年來的歷史，『上層』階級一貫宣傳這種鎮壓的事實，造成了大俄羅斯人民的偏見而成爲阻礙大俄羅斯人民本身自由事業的莫大障礙。

大俄羅斯民族中的黑幫黨人故意支持和助長這種偏見。大俄羅斯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容忍這種偏見或迎合這種偏見。大俄羅斯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不一貫反對這種偏見，就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就不能替自己掃清走向自由的道路。

建立獨立自由的民族國家，在俄國暫時還祇是大俄羅斯民族底特權。我們大俄羅斯無產者既不擁護任何特權，當然也就不擁護這個特權。我們在這個國家範圍內奮鬥，把這個國家內所有一切民族的工人統一起來，我們不能担保某個民族按某條道路發展，我們要經過一切可能道路走向自己的階級目標。

*巴黎有一匪名叫 П.Вн. 的人，認爲這是個非馬克思主義的名詞。這個 П.Вн. 是個怪 „superklug“（這個字在諷刺的意思上可譯爲『自作聰明的』）。這個『自作聰明的』П.Вн. 大概要寫一本東西，研究怎樣從我們的最低限度綱領中（根據階級鬥爭觀點！）剷除『居民』『人民』等字。

可是，不反對一切民族主義，不堅決主張各族平等，便不能走向這一日標。例如，烏克蘭是不是一定會組成爲獨立國家，這要依不能預先知道的千百種因素爲轉移。我們並不想來憑空『猜測』，而只是堅決主張毫無疑義的一點：烏克蘭有建立這樣一個國家的權利。我們尊重這種權利，我們不贊成大俄羅斯人統治烏克蘭人的特權，我們教育羣衆承認這種權利，否認任何一個民族底國家特權。

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所有一切國家都遭遇過的那種突變中，爲了建立民族國家的權利問題，可能而且大概一定會發生衝突和鬥爭。我們無產者預先就宣佈說我們反對大俄羅斯人的特權，並照着這個方向來進行全部宣傳鼓動工作。

盧森堡因追求『求實精神』而忽略了大俄羅斯無產階級及其他各族無產階級底主要實際任務，即進行日常宣傳鼓動，反對任何民族底國家特權，擁護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民族國家的同等權利的任務；這種任務是我們在民族問題上的主要（在現時的）任務，因爲祇有這樣，我們才能捍衛民主運動底利益以及各民族所有一切無產者平等聯合底利益。

讓大俄羅斯民族中的壓迫者和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都認爲這種宣傳『不合求實精神』吧（前者和後者都要求給一個『是或否』的肯定回答，而責備社會民主黨人態度『不確定』）。其實，正是這種宣傳，祇有這種宣傳，才能保證對羣衆進行真正民主主義，真正社會主義的教育。祇有這種宣傳，才能保障在俄國仍舊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時，有最大的可能奠定俄國各民族間的和平，而在發生分立爲各個民族國家的問題時，又能最和平地（以及對於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沒有損害地）分立爲各個民族國家。

爲要更具體說明民族問題上這個唯一無產階級的政策，我們且把大俄羅斯自由派對於『民族自決』的態度以及挪威脫離瑞典分立的實例考察一下。

(五)自由資產階級與社會黨機會主義份子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

我們已經說過，盧森堡當作一個主要『法寶』用來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綱領的論據，是說承認自決權便等於贊助被壓迫民族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她繼續說道，——如果把這種權利看成只是反對一切民族壓迫，那末在綱領上就不需要有特別的一條，因為社會民主黨是根本反對一切民族壓迫和不平等現象的。

正如考茨基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就已不容爭辯地指出過的那樣，第一個論據是把自己所犯的民族主義罪過加到別人身上，因為盧森堡自己因害怕被壓迫民族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而在事實上做了大俄羅斯人黑幫民族主義底幫手！第二個論據其實就是胆怯地迴避一個問題，即承認民族平權是不是包括承認分立權在內呢？如果包括在內，那就是說，盧森堡承認我黨綱領第九條在原則上正確。如果不包括在內，那就是說她不承認民族平權。在這裏迴避問題和支吾搪塞，是無濟於事的。

然而對於上述一類論據的最好檢驗，却是研究社會各階級對本問題的態度。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進行這種檢驗。必須從客觀情形出發，必須考察各階級彼此對於這點的態度。盧森堡沒有這樣作，也就恰巧是犯了她在枉然企圖歸罪於她的論敵們的那種形而上學，抽象，普泛文句，籠統等等的錯誤。

此地所說的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綱領，即俄國所有一切民族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底綱領。也許不妨考察考察俄國各統治階級底立場吧？

『官僚』（恕我們用用這個不確切的名詞）和貴族聯合會一類封建地主底立場，是人所共知的。他們無論對民族平等或自決權都持絕對否認態度。他們所喊的是從農奴制度時代拿來的舊口號，即

專制主義，正教主義，民族主義，而且他們所謂民族只是指大俄羅斯民族而言。甚至烏克蘭人也被宣佈為『異族人』，甚至他們的民族語言也受壓制。

我們來看看那『被召來』參加政權，——固然所佔的地位很細微，但總算是參加政權，——參加『六三』立法行政制度的俄羅斯資產階級。十月黨人在這個問題上其實是跟隨右派走，這是用不着多說的。可惜，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大俄羅斯自由資產階級，進步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底立場是注意得太少了。然而，誰不研究這個立場，不考察這個立場，那他在討論民族自決權時就必然要陷入抽象和武斷的錯誤。

去年真理報同言論報進行的論戰，使立憲民主黨底這個主要機關報，這個非常巧於玩弄外交狡猾手段而逃避直接回答『麻煩』問題的機關報終於作了一些寶貴的承認。一九一三年夏天在里沃夫召集的全烏克蘭學生代表大會引起了一場大爭鬧。遐邇聞名的『烏克蘭問題專家』或言論報底烏克蘭記者莫吉梁斯基先生發表了一篇文章，用許多最厲害的罵人字眼（『夢囈』，『冒險主義』等等）攻擊烏克蘭分立思想，攻擊民族社會黨人董鑿夫所擁護而為該代表大會所贊同的這個思想。

工人真理報¹⁵⁸，雖絲毫也不同意於董鑿夫先生，而乾脆地指出他是個民族主義社會黨人，說多數烏克蘭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贊成他的意見，但同時又聲明說，言論報底論調或言論報對於問題的原則提法，是大俄羅斯民主主義者或願意做一個民主主義者的人所完全不應有，完全不容許的。言論報儘可乾脆地反駁董鑿夫一流的先生，但一個以民主派自命的大俄羅斯機關報竟忘記分立自由和分立權利，却就是原則上不容許的了。

過了幾個月之後，莫吉梁斯基先生在里沃夫城出版的烏克蘭文報紙道路上讀到了董鑿夫先生底駁覆意見——其中指出『言論報上

沙文主義的攻擊，只是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刊物上受到了應有的指摘（是痛斥吧？）』，——便在言論報第三百三十一期上發表了一篇『解釋』文章。莫吉梁斯基先生底『解釋』，就是一連三次重複說：『批評董鑿夫先生所提出的辦法』，『是與否認民族自決權毫不相干的』。

『應當指出，——莫吉梁斯基先生當時寫道，——『民族自決權』也不是什麼不容批評的偶像（聽呵!!）：民族生活底不良條件能引起民族自決問題上的不良傾向，而揭穿這種不良傾向並不就是否認民族自決權』。

可見，自由派份子關於『偶像』的論調，是恰與盧森堡底論調相合。很明顯的，莫吉梁斯基先生是想迴避直接回答問題：他究竟是承不承認政治自決權，即分立權呢？

於是，無產階級真理報¹⁵⁶（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的第四期）便向莫吉梁斯基先生和立憲民主黨劈面提出了這個問題。

當時言論報（第三百四十期）就發表了一篇沒有署名的，即編輯部的正式聲明，來回答這個問題，其內容可歸納為如下三點：

（一）在立憲民主黨綱領第十一條上，直接、確切而明顯地說到民族『自由文化自決權』。

（二）據言論報說，無產階級真理報把自決問題同分離主義，即某個民族分立的問題『混淆得一塌糊塗了』。

（三）『其實，立憲民主黨從來也沒有擁護過脫離俄國分立的『民族分立』權』（參看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無產階級真理報第十二期上所載民族自由主義和民族自決權一文）。

我們先來看看言論報聲明中的第二點。它十分顯然地對謝科夫斯基輩，李勃曼輩，尤爾克維奇輩及其他機會主義者先生們指明，他們大喊大叫，妄說『自決』一語意思『不清楚』或『不確定』，

其實，即按俄國各階級相互關係和階級鬥爭的客觀情形來說，不過是附和君主派自由資產階級底言論而已！

當時無產階級真理報向言論報中那些開明的『立憲民主主義者』先生們提出了三個問題：（一）他們是不是否認在全部國際民主運動史上，特別是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民族自決權始終都是恰巧瞭解成爲政治自決，即組織獨立民族國家之權呢？（二）他們是不是否認一八九六年的倫敦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底著名決議也是含有這種意思呢？（三）他們是不是否認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二年論及民族自決問題時，就把民族自決瞭解爲政治自決呢？——當無產階級真理報提出這三個問題時，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便啞口無言了！！

他們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因爲他們無言可答。他們不得不默然承認無產階級真理報絕對正確。

自由派大喊大叫，妄說『自決』概念不清楚，妄說社會民主黨把自決同分離主義『混淆得一塌糊塗』等等，不過是希圖混亂問題，不願承認民主派共同確定了的原則而已。謝科夫斯基，李勃曼和尤爾克維奇一流先生們若不是這樣愚昧無知，就會羞於用自由派口吻來向工人說話了。

讓我們繼續說下去吧。無產階級真理報竟使言論報不得不承認說，立憲民主黨綱領上所講的『文化』自決，就是否認政治自決。

『其實，立憲民主黨從來也沒有擁護過脫離俄國分立的『民族分立』權』，——無產階級真理報把言論報所說的這些話當作我國立憲民主黨人『忠順』底模範，介紹給新時代報和地方自治局日報看，並不是枉然的。新時代報在第一三五六三期上，當然沒有放過機會來罵罵『猶太鬼子』，並向立憲民主黨人說出各種刺耳的話，但同時又聲言說：

『社會民主黨人所認定爲政治哲理定律的東西』（即承認民族自決權，分立權），『現時甚至在立憲民主黨人中間也開始激起意見分歧了』。

立憲民主黨人聲明他們『從來也沒有擁護過脫離俄國分立的民族分立權』，於是就在原則上站到與新時代報完全一樣的立場上去了。這也就是立憲民主黨人所持民族主義自由派立場底基本原則之一，他們與普里什克維奇輩接近，他們在政治思想上和政治實踐上依附於普里什克維奇輩的基本原則之一。『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學過歷史，——無產階級真理報寫道，——分明知道，普里什克維奇輩『只捉不放』¹¹¹的永古權利的實行，在實踐中往往引起了怎樣——柔和些說——『蹂躪式的』行動』。立憲民主黨人分明知道普里什克維奇輩無上權力底封建根源和性質，但他們還是完全站到擁護這個階級所造成的關係和國界的立場上去。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分明知道這個階級所造成的或決定的關係和國界中有極多的非歐洲式的，反歐洲式的（如果聽起來不好像是誣蔑了日本人和中國人的話，那我們就要說是亞洲式的）東西，但他們還是認爲這些關係和國界絕對不可逾越。

這也就是適應普里什克維奇輩，委曲地逢迎他們，惟恐搖動他們的地位，保衛他們不受人民運動攻擊，不受民主運動攻擊。『其實，——無產階級真理報寫道，——這是適應於農奴主利益，適應於統治民族最壞的民族主義偏見，而不願一貫進行反對這種偏見的鬥爭』。

立憲民主黨人熟悉歷史，且以民主主義者自命，所以他們甚至不敢企圖斷言，說現在成爲東歐和亞洲一般特徵的民主運動，力求按各文明資本主義國家模樣改造東歐和亞洲的民主運動，一定要絕對保存封建時代，普里什克維奇輩權力無上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大眾沒有權利的時代所決定的國界。

無產階級真理報同言論報爭論時所提出的問題，並不只是什麼文字上的爭論問題，而是關係於當前真正政治迫切問題的問題，這也是由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召集的最近那次立憲民主黨代表會議證明了的。在言論報（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的第八十三期）敘述這次代表會議工作經過的正式報告中說道：

『民族問題也討論得特別熱烈。基也輔的代表（涅克拉索夫和高留巴金兩人也贊同他們的意見）指出，民族問題是正在成熟的巨大因素，必須比以前更堅決地贊助這個因素。可是』（這個『可是』恰與謝德林所說的那個『但是』——即所謂『耳朵不會生在額角以上去』一語——相合）『科可什金認為無論綱領或過去的政治經驗，都要求我們很小心地對待『民族政治自決』這一『普泛條文』』。

立憲民主黨代表會議上這個極美妙的議論，極值得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和一切民主主義者注意。（附帶指出，顯然熟知內幕並無疑是正確傳達科可什金先生意思的基也輔思想報補充着說，科可什金特別指出過國家『瓦解』的危險，當然是為警告論敵而指出這點的）。

言論報發表的正式報告是用絕頂圓滑的外交筆墨寫成，為的是盡可能少打開些幕布，多隱藏些內情。但從這個報告中，大體上總可看出立憲民主黨代表會議上的經過情形。熟悉烏克蘭情形的自由資產者代表和『左派』立憲民主黨人所提出的，正是民族政治自決問題。不然，科可什金先生就無須號召『小心對待』這一『條文』了。

在立憲民主黨人綱領——立憲民主黨代表會議上的代表們當然知道這個綱領——上所載的，恰巧不是政治自決，而是『文化』自決。可見，科可什金先生是捍衛綱領而反對烏克蘭代表和左派立憲民主黨人底攻擊，是捍衛『文化』自決而反對『政治』自決。科可

什金先生表示反對『政治』自決，指出『國家瓦解』的危險，把『政治自決』條文稱爲『普泛的』（恰與盧森堡底論調相合！），當然就是捍衛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自由派，而反對立憲民主黨內較爲『左傾的』或較爲民主的份子，反對烏克蘭資產階級。

科可什金先生在立憲民主黨代表會議上獲得勝利了，這從言論報底報告上露出狐狸尾巴來了的『可是』一字中就可看出。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自由派在立憲民主黨人中獲得勝利了。難道這種勝利還不能促使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步武立憲民主黨人後塵，而害怕『普泛的民族政治自決條文』的那些糊塗蟲醒悟過來麼？

『可是』我們現在來切實看看科可什金先生底思維歷程吧。科可什金先生援引『過去的政治經驗』（顯然是指一九〇五年底經驗而言，當時大俄羅斯資產階級恐怕喪失掉自己的民族特權，並以它自己的恐懼心理來恐嚇了立憲民主黨）而指出『國家瓦解』危險時，就表明他很知道政治自決權除了實行分立而組織獨立民族國家以外，便不能有什麼別的意思。試問從一般民主運動方面，特別是從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方面來說，究應怎樣來觀察科可什金先生底這種憂慮呢？

科可什金先生硬說承認分立權就會增加『國家瓦解』的危險。這是確遵『只捉不放』這一格言的巡警美穆列曹夫底觀點。而從一般民主運動底觀點來看，却恰巧相反：承認分立權就會減少『國家瓦解』的危險。

科可什金先生底議論完全與民族主義者底精神相合。民族主義者在其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猛烈攻擊了烏克蘭的馬齊伯派¹⁵⁸。烏克蘭的運動，——薩文科先生和他的伙伴們叫道，——有使烏克蘭與俄國聯繫減弱的危險，因爲奧國正利用親烏政策來鞏固烏克蘭人與奧國的聯繫！！令人莫解的，就是爲什麼俄國不可用薩文科一流先生們所歸罪於奧國的那種方法，即給予烏克蘭人利用本民族語言，自

治和自治議會等等自由的方法，去試圖『鞏固』烏克蘭人與俄國的聯繫呢？

薩文科一流先生們底議論是和科可什金一流先生們底議論完全相同，而且從純粹的邏輯方面來看，又是一樣可笑，一樣荒謬的。烏克蘭民族在某一國家內享有的自由愈多，烏克蘭民族與這一國家間的聯繫也就會愈加堅固，這難道不是很明顯麼？我想，不堅決拋棄民主主義底一切原理，是決不能否認這個初步真理的。試問能不能有什麼比分立自由，即組織獨立民族國家的自由更大的真正民族自由呢？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更進一步解釋，被自由派（和那些因為頭腦簡單而附和他們的人）弄糊塗了的這個問題。就拿離婚問題來說吧。盧森堡在她的論文中寫道，中央集權制的民主國家雖完全可與個別部份自治相容，但它應當把一切最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關於離婚問題的立法工作，留歸中央國會處理。這樣關心用民主國家底中央政權來保障離婚自由，是完全正當的。反動份子反對離婚自由，號召大家『小心對待』它，而且大聲叫喊，說離婚自由就是『家庭瓦解』。而民主派則認為，反動份子是有意作偽，其實是擁護着警察官僚專橫，擁護男性享受特權而女性遭受最難堪壓迫的情形；其實離婚自由並不會使家庭關係瓦解，而恰巧會使這種關係在文明社會中唯一可能的堅固民主主義原則基礎上鞏固起來。

罵擁護自決自由，即分立自由的人為鼓勵分離主義者，也如罵擁護離婚自由的人為鼓勵破壞家庭關係者一樣愚蠢，一樣虛偽。在資產階級社會裏，只有擁護資產階級婚姻所賴以支持的特權和買賣性的人，才會反對離婚自由，同樣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否認民族自決，即民族分立自由，就不過是擁護統治民族特權和警察管理手段，反對民主制度。

毫無疑義，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各種關係所產生的政客習氣，有

時也使國會議員或政論家極端輕率地，甚至簡直荒謬可笑地空談某個民族底分立問題。可是，只有反動份子才甘受這種空談恐嚇（或假裝成受這種空談嚇倒的樣子）。凡是站在民主制觀點上，即主張由民衆解決國家問題的人，都明白知道，政客底荒唐空談與民衆解決問題是『相隔天壤』的。民衆根據日常經驗，很知道地理上和經濟上聯繫底意義，巨大市場和巨大國家底優點，所以他們只有當民族壓迫和民族衝突使其絕對不堪共同生活並阻礙所有一切經濟關係時，才會贊同分立。而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發展和階級鬥爭自由底利益是會要恰巧擁護分立的。

總之，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觀察科可什金先生底議論，都可看出這種議論絕頂荒謬，嘲弄民主原則的性質。但這種議論也含有某種邏輯，即大俄羅斯資產階級階級利益底邏輯。科可什金先生，也如立憲民主黨底大多數人一樣，是這個資產階級錢庫底看門狗。他擁護資產階級底一般特權，特別是它的國家特權；他同普里什克維奇肩靠肩地擁護這些特權，不過普里什克維奇多相信農奴制的棍子，而科可什金輩則知道這根棍子已被一九〇五年事變折破得很厲害了，所以多指望於資產階級愚弄羣衆的手段，例如用『國家瓦解』的臆造危險來威嚇市儈和農民，用什麼『人民自由』與歷史基礎相結合的辭句來欺騙他們等等。

自由派反對民族政治自決原則的態度，其唯一實際階級意義，就是民族主義自由派的思想，就是要捍衛大俄羅斯資產階級底國家特權。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的機會主義者，這些恰巧在現今六三制度時代極力反對民族自決權的人，即取消派份子謝科夫斯基，崩得份子李勃曼，烏克蘭小資產者尤爾克維奇等，其實不過是跟着民族主義自由派底尾巴跑，而用民族主義自由派的思想來嚮化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及其反資本主義鬥爭底利益，是要所有各個民族中的工人完全團結和最密切統一起來，是要反對任何一個民族中的資產

階級所實行的民族主義政策。所以，社會民主黨如果否認自決權，即被壓迫民族底分立權，或贊助被壓迫民族資產階級所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就會同樣是離開無產階級政策底任務，而使工人服從於資產階級政策。在僱傭工人看來，不管誰是他的優先剝削者，不管是大俄羅斯資產階級比異族資產階級佔優先地位也好，或波蘭資產階級比猶太資產階級佔優先地位也好，都是一回事情。在覺悟了自己階級利益的僱傭工人看來，無論是大俄羅斯資本家底國家特權也好，無論是波蘭資本家或烏克蘭資本家約許說他們一擁有國家特權時，人間就會有天堂出現也好，都是不足介意的。無論是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或是在分立的單民族國家中，不管怎樣，資本主義底發展總是在前進着，並且會繼續前進。

無論在那一種情形下，僱傭工人總是會遭受剝削，所以無產階級爲了順利進行反對剝削的鬥爭，就要不依賴民族主義而獨立，就要在各民族資產階級爭霸的鬥爭中保持所謂完全中立。任何一個民族中的無產階級稍微擁護『自己』民族資產階級底特權，都必然會引起另一民族中無產階級對它表示不信任，都會削弱工人底國際階級團結，都會分散工人而使資產階級稱快。否認自決權或分立權，實際上就必然是擁護統治民族底特權。

我們拿挪威脫離瑞典分立的具體例證來看，就能更明白認識這一點。

(六) 挪威脫離瑞典而分立

盧森堡正是援引這個例證，並根據這個例證推論說：

『聯邦關係史上最近一次事變，即挪威脫離瑞典分立這一事變發生時，波蘭社會愛國派刊物（見克拉科夫城的前進報）馬上就把它抓住，作爲是表明國家分立趨向含有強大力量和進步作用的一種可喜現象，但這次事變立刻就變成了表明聯邦主

義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國家分立運動決不是一種進步運動或民主運動的鐵證。在挪威發生了這次撤銷驅走瑞典國王的所謂『革命』之後，挪威人就安然用人民投票辦法正式推翻了成立共和國的計劃，而給自己選出了另一個國王。那些崇拜任何民族運動和任何一種獨立趨向的皮相之徒所宣稱為『革命』的事件，原來不過是表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懷有部落主義，想用自己的金錢找一個『自家的』國王，以代替瑞典貴族所強加於他們的國王，因而也就是一種與革命毫不相干的運動。同時，這次瑞挪聯合王國破裂的事實又證明了，迄今存在的聯邦制，就在這裏也不過是純粹王朝利益底表現，因而也就是君主政體和反動底一種形式』（評論雜誌）。

這就是盧森堡論到本問題時所說的一切!!必須承認，盧森堡解釋這個例子時是把自己的脆弱立場暴露得最明顯不過了。

以前和現在所說的，都是民族複雜的國家內社會民主黨應否有承認自決權或分立權綱領的問題。

關於這一問題，盧森堡自己所舉出的挪威實例，究竟向我們說明了什麼呢？

我們的作者轉彎抹角，繞來繞去，玩弄聰明，高聲大喊來反對前進報，但不回答問題!!盧森堡說得天花亂墜，但對於問題實質却不置一辭!!

毫無疑義，挪威的小資產者想用自己的金錢找一個本族的國王，並由人民投票否決成立共和國的計劃，是暴露了最壞的市儈根性。毫無疑義，前進報如果沒有看到這一點，那它就是暴露了同樣壞的，並且是同樣市儈的根性。

但所有這些究竟與問題有何相干呢??

所說的問題，是民族自決權以及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對此權利的態度呵！爲什麼盧森堡不回答問題，而只是兜着圈子呢？

常言道，貓兒是老鼠心目中再兇不過的獸物。大概，盧森堡是認爲沒有比『弗拉克派』更兇的獸物。『弗拉克派』是波蘭社會黨的俗稱，即所謂革命派別組織，而克拉科夫城的可憐的前進報是贊同這個『派別組織』底思想的。盧森堡因爲努力同這個『派別組織』底民族主義立場作鬥爭，竟弄得眼花目眩，以致除了前進報之外，就連什麼都看不見了。

如果前進報說『是』，那末盧森堡就認爲她的神聖天職是要馬上說個『不是』，殊不知她運用這種手段，並不是表明她對前進報的不依賴性，反而是表明她對『弗拉克派』依賴到可笑的地步，表明她不善於用一種比克拉科夫地方鼠目寸光的人稍微深刻，稍微寬廣的觀點去觀察問題。前進報當然是個很不好的，而且根本不是個馬克思主義的機關報，但我們既然舉出了挪威的實例，就應當來分析這個實例底實質。

我們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這個實例時，並不是要說明那些極可怕的『弗拉克派』底劣根性，而首先是要說明挪威脫離瑞典分立這一事件底具體歷史特點，其次是要說明兩國無產階級在發生這個分立時的任務。

使挪威與瑞典接近的那些地理、經濟及語言上的聯繫，其密切程度並不亞於許多非大俄羅斯的斯拉夫民族與大俄羅斯民族的聯繫。但挪威與瑞典結合不是自願的，所以盧森堡說到『聯邦制』實在是毫無理由，而不過是因爲她不知道要說什麼罷了。挪威是在拿破崙戰爭時代由各國皇帝違背挪威人底志願送給瑞典的，而且瑞典人只是把軍隊調到挪威以後，才把挪威征服。

此後在幾十年長的時間內，雖然挪威享有非常廣泛的自治權（有自己的議會等等），但挪威和瑞典經常發生磨擦，挪威人極力設法擺脫瑞典貴族底束縛。一九〇五年八月，他們終於擺脫了這種束縛：挪威議會通過決議，表示再不承認瑞典國王爲挪威國王，後

來舉行的挪威人民全體投票，全民公決，又以絕大多數的票數（約二十萬票與幾百票之比）贊成完全脫離瑞典而分立。瑞典人經過一些動搖之後，只得容忍了分立的事實。

這個實例向我們指明，在現代經濟和政治的關係下，究竟是根據何種原因而可能發生民族分立並實現這種分立，以及在有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情形下，這種分立常是經過何種形式來實現。

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他不敢說政治自由和民主問題對他不關痛癢（否則他自然就會不成其為社會民主黨人了），就不能否認，這個實例在實際上證明覺悟的工人必須一貫進行宣傳和準備工作，使那些因民族分立問題而可能發生的衝突，只是按照一九〇五年挪威與瑞典兩國衝突的解決法那樣去解決，而不是『按俄國方式』去解決。這也就是承認民族自決權的綱領要求所表示的意思。所以盧森堡也就只好用嚴厲攻擊挪威市僧們底市僧行爲和克拉科夫城的前進報的方法來推開這個不利於她的理論的事實，因為她明白知道，這個歷史事實把她妄說民族自決權是一種『空想』，是等於『用金碗吃飯』的權利等等詞句，完全駁倒到無可救藥的地步。這種詞句不過是表示着滿心相信東歐各民族間現有力量對比永不可變的那種貧乏而自滿自足的機會主義思想而已。

我們再往下看吧。在民族自決問題上，也如同在其他一切問題上一樣，我們應當首先注意和認爲最重要的，就是各民族內部的無產階級自決。盧森堡把這個問題也輕易地放過去了，因為她覺得，按她所舉的挪威實例來分析這個問題，是於她的理論不利的。

在因分立而起的衝突中，挪威無產階級和瑞典無產階級究竟採取了何種立場，以及究竟應當採取何種立場呢？在分立之後，挪威覺悟工人自應投票贊成共和制*，而如果有投別種票的社會黨人，那

*如果當時挪威民族中的大多數擁護君主制，而無產階級擁護共和制，那末，一般說來，在挪威無產階級面前就擺着有兩條道路：或是——如果革命條件已經成熟的話——實行革命，或是服從大多數而去進行長期的宣傳鼓動工作。

就只是證明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間還有許多往往是冥頑市儈性的機會主義成分罷了。關於這一點是不能有兩種意見的，而我們之所以提到這一點，只是因為盧森堡想用文不對題的空話來抹煞問題實質。我們不知道，在分立問題上，挪威社會主義的綱領是否責成挪威社會民主黨人持着一個確定的意見。我們就假定他們的綱領並沒有責成這樣作，假定挪威社會黨人是把挪威自治能否充分保證階級鬥爭自由，以及挪威人同瑞典貴族經常發生的磨擦衝突如何妨害經濟生活自由的問題當作懸案吧。但挪威無產階級應當反對這個貴族而擁護挪威農民民主運動（不管這個運動有怎樣市儈性的狹隘成分），却是無可爭辯的。

而瑞典無產階級呢？大家知道，瑞典牧師所協助的瑞典地主們會鼓吹用戰爭反對挪威，同時又因為挪威比較瑞典弱得多，因為它已遭受過瑞典的侵犯，因為瑞典貴族在本國內佔有很大勢力，於是這種鼓吹就成為很嚴重的威脅。可以担保說，瑞典的科可什金輩是長期和竭力用號召大家『小心對待』『民族政治自決這一普泛條文』，拚命描繪『國家瓦解』危險，硬說『人民自由』可與瑞典貴族制度基礎相容等語來蠱惑過瑞典民衆的。毫無疑義，如果瑞典社會民主黨沒有竭力奮鬥，既反對地主思想和政策，又反對『科可什金主義的』思想和政策；如果它除了一般民族平等（科可什金輩也承認的平等）之外，沒有堅持過民族自決權，即挪威分立自由，那它就算是背叛了社會主義事業和民主事業了。

瑞典工人這樣承認挪威人民分立權，結果是促進了挪瑞兩國工人底密切聯合，促進了他們極親密的階級團結。因為挪威工人由此就知道瑞典工人沒有沾染瑞典民族主義，瑞典工人是把他們同挪威無產者親密聯合看得比保全瑞典資產階級和貴族底特權重要些。歐洲各國君主和瑞典貴族所加強於挪威的這種聯繫的破壞，使挪威工人與瑞典工人中間的聯繫加強了。瑞典工人證明他們不管資產階級

政策底一切變遷（在資產階級關係底基礎上，用強力迫使挪威人服從瑞典人的事情，是完全可能重復發生的！），而始終能保持捍衛兩族工人完全平等和階級團結，來同時反對瑞典資產階級和挪威資產階級。

由此可見，『弗拉克派』有時企圖『利用』我們與盧森堡的意見分歧去反對波蘭社會民主黨，是毫無根據，而且簡直是不鄭重的。『弗拉克派』並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是社會主義的政黨，而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政黨，可以說是波蘭的社會革命黨。從來也沒有談到，而且根本也就談不到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與該黨的任何統一。反之，任何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從來也沒有『懊悔過』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接近和聯合的事情。波蘭社會民主黨有重大的歷史功勳，它第一次在澈頭澈尾浸透了民族主義趨向和狂熱的波蘭建立了真正馬克思主義，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但波蘭社會民主黨這一功勳之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為盧森堡說了一些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綱領第九條的荒唐話，而是不管有這件可悲的事實。

『自決權』對於波蘭社會民主黨，自然沒有如像對俄國社會民主黨那樣重大的意義。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因反對醉心民族主義的波蘭小資產階級而特別（有時候也許是稍微過分）努力『矯枉過正』，本是情有可原的。從來也沒有一個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想把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波蘭分立的主張當作他們的罪過。這些社會民主黨人只有當他們如盧森堡那樣試圖否認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綱領上必須承認自決權的時候，才算是犯了錯誤的。

其實，這就是把那種從克拉科夫地方狹隘觀點看來情有可原的態度，搬到俄國所有一切民族——包括大俄羅斯人在內——範圍中來。這就是做『變相的波蘭民族主義者』，而不是做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做國際社會民主黨人。

因為國際社會民主黨人正是主張承認民族自決權的。現在我們就要來說這一點。

(七)一八九六年倫敦國際代表大會底決議

這個決議上寫道：

『代表大會特此宣佈，它主張一切民族有完全自決權 (Selbstbestimmungsrecht)，並對現時所有受軍事、民族或其他專制制度壓迫的國家中的工人表示同情；大會號召所有這些國家中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覺悟的（即覺悟到本階級利益的）工人底隊伍，來共同奮鬥，以求戰勝國際資本主義而實現國際社會民主運動底目的』*。

我們已經說過，我國的機會主義者，謝科夫斯基，李勃曼，尤爾克維奇諸先生，簡直不知道有這個決議存在。但盧森堡知道這個決議，並且引了它的全文，其中也與我們的綱領一樣，載有『自決』一語。

試問，盧森堡是怎樣來剷除橫在她的『新奇』理論路上的這個障礙的呢？

呵，簡單得很：…這裏的重心，是在決議案第二部份…這個決議帶有宣言的性質…祇是出於誤會才可援引它!!

我們的這位作者一籌莫展和狼狽周章，簡直令人吃驚。只有機會主義者，通常都把一貫的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政綱條文指為是宣言性質，而又怯懦地躲避反對這些條文的直接爭論。顯然，這

*參看用德文正式公佈的倫敦代表大會工作報告：各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職工會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一日在倫敦舉行的國際代表大會記錄與決議，一八九七年柏林出版，第一八頁。歷屆國際代表大會決議已印成俄文小冊子出版，那裏把『自決』一語誤譯成爲『自治』了。

次盧森堡陷入謝科夫斯基、李勃曼、尤爾克維奇一流先生們的可憐伙伴中去，並不是偶然的。盧森堡不敢公開聲明，她到底認為她所引來的決議案是正確的呢，還是錯誤的呢。她支吾着，躲閃着，好像指望讀者都是些很不細心，很不懂事，讀到決議案後半節便忘掉前半節的人，或者是從來沒有聽見過倫敦代表大會以前在社會主義刊物上進行的那些爭論的人。

但盧森堡如果以為她在俄國覺悟工人面前能如此容易把國際關於重要原則問題的決議，甚至不願用批評態度去把它分析一下，就隨便加以踐踏，那她就未免大錯而特錯了。

盧森堡底觀點，在倫敦代表大會以前的爭論中——主要是在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底新時代雜誌上——就發表過，而這個觀點其實是在國際面前遭了失敗的！這就是俄國讀者所應當特別注意的問題實質。

當時所爭論的是波蘭獨立問題。所發表的觀點一共有三種：

(一)『弗拉克派』底觀點，代表他們講話的是赫克爾。他們要國際在自己的綱領中承認波蘭獨立的要求。這個提議沒有通過。這個觀點在國際面前遭了失敗。

(二) 盧森堡底觀點：波蘭社會主義者不應當要求波蘭獨立。這個觀點是根本不容許宣佈民族自決權的。這個觀點也在國際面前遭了失敗。

(三) 考茨基當時發揮得最圓滿的觀點；考茨基反對盧森堡，而證明說她那種唯物主義思想是極端『片面性的』。照這個觀點看來，國際現時不能把波蘭獨立作為自己的綱領，但波蘭社會主義者，——考茨基說，——完全可以提出這類的要求。從社會主義者底觀點看來，在有民族壓迫的情形下忽視民族解放的任務，是絕對錯誤的。

在國際底決議中也就採納了最後這個觀點底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則：一方面，完全肯定而不容絲毫曲解地承認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

自決權；另一方面，又同樣毫不含糊地號召工人建立他們階級鬥爭底國際統一。

我們認為這個決議完全正確，而且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東歐和亞洲各國，只有根據這個決議，只有把它這兩部份密切聯繫起來，才可規定出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的階級政策。

現在我們就要詳細分析上述三種觀點。

大家知道，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積極贊助波蘭獨立的要求，是西歐一切民主派，尤其是社會民主派所絕對應該的。對於前世紀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即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俄國「農民改良」時代說來，這個觀點是個完全正確，而且是唯一澈底民主主義的和無產階級的觀點。當俄國和大多數斯拉夫國家中的民衆還在沈眠不醒的時候，當這些國家還沒有什麼獨立羣衆民主運動的時候，波蘭貴族的解放運動，不但從全俄，全斯拉夫的民主運動觀點看來，就是從全歐民主運動觀點看來，都有頭等巨大的意義*。

馬克思底這種觀點，對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說來完全正確，但到二十世紀開始的時候却已不復正確了。在大多數斯拉夫民族的國家，甚至其中最落後國家之一的俄國，都掀起了獨立的民主運動，甚至獨立的無產階級運動。貴族的波蘭已經消逝而讓位給資本主義的波蘭了。在這樣的情形下，波蘭不能不失去其特殊的革命意義。

*如果把一八六三年波蘭起義貴族底主張，全俄民主革命家契爾內舍夫斯基底主張以及烏克蘭市儈德拉果曼諾夫在多年以後所提出的主張，拿來作一比較，倒是一件極有趣味的歷史研究工作：契爾內舍夫斯基也應該（如馬克思一樣）重視波蘭運動底意義，而德拉果曼諾夫則代表着還是極端粗野昏沉，只看見自己一堆糞草的那種農民底觀點，這種農民竟因正當仇恨波蘭貴族而不能瞭解這些貴族底鬥爭對於全俄民主運動底意義。（請看德拉果曼諾夫所著歷史上的波蘭與大俄羅斯的民主派一文）。德拉果曼諾夫後來備受當時已變成民族自主派的司徒盧威先生稱讚，是理所應當的。

『波蘭社會黨』（現時的『弗拉克派』）在一八九六年企圖把另一時代的馬克思觀點『鞏固起來』，就已經是利用馬克思主義底字句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底精神了。因此，當時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實行反對波蘭小資產階級底民族主義狂熱，指明民族問題對於波蘭工人祇有次要意義，第一次在波蘭創立起純粹無產階級政黨，並宣佈俄羅斯工人與波蘭工人在其階級鬥爭方面實行極緊密聯盟的極重要原則，都是作得完全正確的。

但這是不是說，國際在二十世紀初，可以認為民族政治自決原則對於東歐和亞洲是不需要的呢？可以認為民族分立權是不需要的呢？如果認為這樣，那就是荒謬絕倫，就等於（在理論上）承認土耳其、俄國及中國國家制度底資產階級民主改革已經完結，就等於（在實際上）對專制政體採取機會主義態度。

不。對於東歐和亞洲說來，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開始的時代，民族運動激發加劇的時代，在獨立無產階級政黨產生的時代，這些政黨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務應當是兩方面的：一方面要承認一切民族都有自決權，因為資產階級民主改革還沒有完成，因為工人民主派不是用自由派態度，不是用科可什金派的態度，而是徹底、認真、誠懇地主張民族平等；另一方面，要主張該國所有各民族中的無產者建立十分緊密而不分離的階級鬥爭聯盟，而不管該國歷史怎樣變遷，不管資產階級怎樣變更各個國家底界綫。

一八九六年的國際決議案所規定的，正是無產階級所負有的這兩方面的任務。一九一三年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夏季會議所通過的那個決議底原則基礎，正是這樣。有些人覺得這個決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為他們認為決議案在第四條上承認民主自決權，民族分立權，就算是『給了』民族主義最高限度的讓步（其實，承認一切民族有自決權，却是最高限度的民主主義和最低限度的民族主義），而在第五條上，却又預告工人要反對任何一個民族資產階級

底民族主義口號，要各民族中的工人都統一溶合爲國際統一的無產階級組織。可是，只有頭腦簡單到極點的人，才會認爲這裏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爲他們不能瞭解，爲什麼——舉例來說——瑞典工人保持了挪威實行分立而組織獨立國家的自由，結果就是促進了瑞挪兩國無產階級底統一和階級團結。

(八)空想的馬克思與求實的盧森堡

盧森堡說波蘭獨立是一種『空想』，並且再三再四地把這句話重複得令人發嘔，而用譏諷的神情感歎道：爲什麼不提出愛爾蘭獨立的要求來呢？

『求實的』盧森堡，顯然不知道馬克思對於愛爾蘭獨立問題採取了怎樣的態度。這一點值得講一講，以便說明應怎樣用真正馬克思主義觀點而不是用機會主義觀點來分析具體的民族獨立要求。

馬克思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慣於用『探牙齒』的辦法來檢查他所認識的那些社會主義者底覺悟性與篤信心。馬克思認識羅巴庭以後，便於一八七〇年七月五日寫信給恩格斯，極力稱讚這位俄國少年社會主義者，但同時補充說：

『…弱點就是波蘭問題。羅巴庭對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完全同英國人——例如英國舊派憲章運動家——對於愛爾蘭所說的話一樣』。

馬克思向壓迫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者質問他對被壓迫民族的態度怎樣，就能立刻發現統治民族（英吉利與俄羅斯）中的社會主義者底一個共同缺點：不瞭解他們對被壓迫民族所負的社會主義義務，却一味重覆他們從『大國』資產階級方面接受來的偏見。

在沒有講到馬克思對於愛爾蘭問題的積極主張以前，我們就必須附帶聲明一下，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一般民族問題總是採取嚴格

批評的態度，認為這個問題只有相對的歷史意義。例如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說，由於研究歷史的結果，他對於波蘭問題得出了悲觀的結論，認為波蘭問題只有暫時的意義，即只是在俄國土地革命以前才有意義。認為波蘭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種『大胆的荒唐舉動』。『波蘭甚至單對俄國來說，也絕對不能表現什麼進步或歷史意義』。『俄國所有的文化、教育、工業以及資產階級成份，要比『沉眠不醒的貴族波蘭』多些。『華沙與克拉科夫怎能比得上彼得堡，莫斯科和放德薩呢！』恩格斯不相信波蘭貴族底起義能有什麼成功。

可是這些具有極多英明遠見的思想，絕對沒有妨碍恩格斯和馬克思過十二年以後，即當俄國仍在沉眠而波蘭則已沸騰起來的時候，又對波蘭運動表示極深切熱烈的同情。

一八六四年，馬克思起草國際宣言時寫信給恩格斯（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說必須同馬志尼底民族主義思想作鬥爭。他說：『當宣言內說到國際的政策時，我講的是國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國而不是比較次要的國家』。民族問題與『工人問題』比較起來，只有一種從屬意義，這在馬克思看來是無可置疑的。但他的理論與忽視民族運動的觀點絕對不同。

一八六六年到來了。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論到巴黎『蒲魯東派』，說這一派『宣佈民族性為無稽之談而攻擊俾斯麥與加里波的兩人。這一策略當作反對沙文主義的論戰手段來用，是很有益處，而且可以解釋的。可是信仰蒲魯東的人（我這裏的好友拉法格和龍格，也在其內）竟認為全部歐洲都可以而且應當安分守己，坐在那裏等待法國老爺們來消滅貧窮與愚昧… 這難道不是可笑之至麼』（一八六六年六月七日的信）。

『昨天，——馬克思在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寫道，——在國際總委員會裏討論過目前戰爭問題… 果然不出所料，討

論歸結到了『民族性』問題與我們對該問題的態度…『少年法國』底代表（非工人）發表意見，說一切民族性以及民族本身都是陳腐的偏見。這是蒲魯東主義的斯底納思想…全世界都應當等候法國人成熟起來實行社會革命…我開始發言時就說，我們的朋友拉法格及其他廢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們講法語，即是講會場上十分之九的人都不懂得的語言。英國人聽到我這一段話就哈哈大笑起來。後來我又暗示說，拉法格大概是不自覺地把所謂否認各個民族特性瞭解要由模範法國民族來吞併各個民族哩』。

從馬克思所有這些批評意見中可以得出一個很明顯的結論：工人階級是最不會把民族問題當作偶像的，因為資本主義底發展不一定就喚起一切民族都來爭取獨立生活。可是，既然羣衆的民族運動已經產生出來了，那末不理會它，不去贊助其中所有的進步成份，這在事實上就是陷入民族主義的偏見，就是認為『自己的』民族是『模範民族』（或者——我們補充一句——是唯一享有建立國家的特權的民族）*。

我們又來講愛爾蘭問題吧。

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主張，在他的書信裏有如下幾段言論表明得最爲清楚：

『我正極力設法激起英國工人舉行示威來援助芬尼亞運動¹⁵⁹…過去我以為愛爾蘭脫離英國而實行分立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却認為這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怕分立以後又會要結成聯邦』。——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這樣寫道。

*還請參看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六月三日致恩格斯的信。「…我讀了泰晤士報駐巴黎記者底通信，得知巴黎人有親波反俄的表示，真使我感覺滿意…蒲魯東先生和他那個學理主義的小團體決不能代表法國人民」。

他在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寫的一封信裏又補充說：

『我們應勸英國工人怎樣作呢？我以為他們應當在自己綱領內規定要破裂聯盟』（所謂聯盟是指英國與愛爾蘭聯盟，而破裂聯盟就是指愛爾蘭脫離英國分立），——簡言之，就是載明一七八三年的要求，不過要使其民主主義化而適應於現代的條件罷了。這是解放愛爾蘭的唯一合法的形式，因此也就是英國黨底綱領唯一可以採納的形式。以後的經驗一定會指明由一個人治理兩國的聯盟制度是否可以長久存在…

…愛爾蘭人所需要的是：

- （1）自治與離英獨立。
- （2）土地革命』…

馬克思非常重視愛爾蘭問題，他關於這個問題在德意志人職工會中作過幾次一點半鐘的報告（參看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信）。

恩格斯在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寫的信裏，指出『英國工人中間有仇恨愛爾蘭人的心理』，差不多過了一年以後（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他談到這個問題時又寫道：

『從愛爾蘭到俄國只差一步…拿愛爾蘭歷史爲例證，就可以看到，要是一個民族奴役了別個民族，這對於它自己該是何等不幸呵。英國一切卑鄙現象都是從愛爾蘭問題中間發生的。關於克倫威爾時代，我還應當去研究，可是無論如何我認爲有一點是無疑的，就是假如沒有必要在愛爾蘭實行軍事式的統治和建立新的貴族，那末連英國情形也會呈出另一種局面的』。我們還要順便指出馬克思於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八日致恩格斯的信：

『波蘭工人因有他們柏林同志底幫助，在波茲南舉行了勝利的罷工。這種反『資本老爺』的鬥爭雖然還是低級形式，即

罷工形式的鬥爭，但它之能剷除民族偏見，却要比資本家老爺們高談和平的聲明厲害得多。」。

馬克思在國際內對愛爾蘭問題所實行的政策，可從如下的事實中看出：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他在國際總委員會內關於英國內閣對赦免愛爾蘭人的態度問題講了一點一刻鐘的話，並提出了如下的決議案：

『議決如下：

格拉斯頓先生在答覆愛爾蘭人要求釋放愛爾蘭愛國份子時故意侮辱了愛爾蘭民族。

他所提出實行政治大赦的條件，無論對於被惡劣政府所犧牲的人或對於這個政府所代表的人民，都是同樣恥辱的；

格拉斯頓身為政府官吏，以前曾當衆鄭重表示歡迎過美國奴隸主底暴動，而現在却公然向愛爾蘭民族宣傳消極服從的學說；

格拉斯頓先生對於赦免愛爾蘭人問題的全部政策，都是他先前極力加以揭露因而推倒了敵黨（保守黨）內閣的那種『侵略政策』底十足表現；

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對愛爾蘭人民勇敢堅決而高尚地要求大赦的運動表示欽佩；

本決議案應通知國際工人協會一切支部及歐美各國所有一切與它有聯繫的工人團體』。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日，馬克思寫道，他預備要在國際總委員會內對於愛爾蘭問題作一個報告，其內容將如下述：

『英國工人階級底直接的絕對的利益，是要它斷絕現在與愛爾蘭的關係而完全與所謂『替愛爾蘭主持公道』的各種『國際主義的』和『人道主義的』詞句無關，因為『替愛爾蘭主持公道』這點在國際總委員會內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的極深刻的信念，而這種信

念所根據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國工人說明的。我在許久時期內都曾認為可能藉英國工人階級運動底高漲來推倒統治愛爾蘭的制度；我在紐約論壇（這是美國報紙，馬克思在很長一個時期向該報投過稿）上始終都擁護過這種觀點。但是我更深刻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以後，却得出了相反的信念。英國工人階級在未卸脫愛爾蘭以前，便一點也沒有辦法……英國內部的英吉利反動勢力，是以奴役愛爾蘭為其根源的』（着重點是馬克思自己加的）。

馬克思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讀者現在想必已完全明白了吧。

『空想的』馬克思竟是如此『不合求實精神』，公然主張愛爾蘭分立，而這種分立却在五十年後也還沒有實現。馬克思為什麼採取這個政策呢？這個政策是不是個錯誤呢？

馬克思起初以為能解放愛爾蘭的不是被壓迫民族中的民族運動，而是壓迫民族中的工人運動。馬克思並不把民族運動看做有絕對意義的東西，明知只有工人階級底勝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各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與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間各種可能的相互關係（這正是現代俄國民族問題極其困難的地方），是無法預先察知的。

但後來情形改變了：英國工人階級在頗長一個時期內陷於自由派影響下，成了他們的尾巴，因實行自由主義工人政策而割掉了自己的頭腦。愛爾蘭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加強起來而採取了革命的形式。於是馬克思就把自己的觀點重新審查而加以糾正。『要是一個民族奴役了別個民族，這對於它自己是不幸的』。當愛爾蘭尚未擺脫英國壓迫以前，英國工人階級是得不到解放的。英國反動勢力靠奴役愛爾蘭來鞏固和取得營養（也如俄國反動勢力靠俄國奴役許多民族來取得營養一樣！）。

馬克思在國際中提出了對『愛爾蘭民族』，對『愛爾蘭人民』表示同情的決議（聰明的 Л.В.п. 大概要大罵可憐的馬克思忘記階級鬥

爭了！），鼓吹愛爾蘭應脫離英國而分立，『那怕分立以後又會要結成聯邦』。

馬克思這一結論底理論前提是什麼呢？資產階級革命在英國一般是早已完結了。但它在愛爾蘭却還沒有完結；只是現在，經過五十年以後，英國自由派的改良才把它完結起來。如果英國資本主義的顛覆，有如馬克思最初所預料的那樣快，那末愛爾蘭就不會有全民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了。可是這種運動既然產生出來了，馬克思就號召英國工人去贊助它，給它以革命的推動，爲了本身自由而把它進行到底。

愛爾蘭與英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經濟聯繫，當然比現在俄國與波蘭及烏克蘭等等的聯繫更要密切。當時，愛爾蘭脫離英國分立的『不合求實精神』與『不可實現性』（單就地理上的條件，以及英國擁有極大的殖民地勢力來說），是顯而易見的。馬克思雖是個原則上反對聯邦主義的人，但他這次却也容許聯邦制*，只要愛爾蘭的解放不是由改良的道路而是由革命的道路，即由英國工人階級所贊助的愛爾蘭民衆運動來達到就行了。毫無疑義，只有這樣來解決歷史任務，才是最能適應無產階級利益和促進社會迅速發展的。

結果竟不是如此，原來愛爾蘭人民與英國無產階級都軟弱無力。直到現在，才由英國自由派與愛爾蘭資產階級實行一種可憐的妥協分贖辦法，用土地改良（必須繳付贖金的改良）和自治（現時

*順便說說：不難瞭解，爲什麼從社會民主黨的觀點看來，既不能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爲聯邦制，也不能解釋爲自治（雖然抽象地說來，兩者都是包括在『自決』這個概念內的）。聯邦權根本沒有什麼意思，因爲聯邦制乃是雙方的契約。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在自己的政綱內一般地擁護聯邦主義，這是無待說明的。至於自治呢，那末馬克思主義者所擁護的並不是自治『權』，而是自治本身，作爲具有複雜民族成份以及極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條件的那種民主國家底一般普通原則。因此：承認『民族自治權』，也如承認『民族聯邦權』一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還沒有施行的自治)來解決着愛爾蘭問題(阿爾斯特底實例,表明這是很難於辦到的)。究竟怎樣呢?能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馬克思與恩格斯是『空想家』,說他們提出過『不可實現的』民族要求,說他們受了愛爾蘭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芬尼亞運動無疑是小資產階級性的運動)底影響等等呢?

當然不能。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也實行了真正以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教育羣衆的一貫無產階級政策。當時只有這個政策才能使愛爾蘭和英國都不致把必要的改革遲延五十年,不致讓自由派爲取悅於反動勢力而把這種改革弄得殘缺不完。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是至今還有極大實際意義的偉大榜樣,表明各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應當怎樣對待民族運動;叫人認識世界各個國家,各個人種和各個民族中那些奴僕成性的市儈,他們一看見有人實行改變某一民族地主資產階級底暴力和特權所造成的國界,就馬上宣佈說這是一種『空想』。

假如當時愛爾蘭無產階級和英國無產階級沒有採納過馬克思底政策,沒有提出過主張愛爾蘭分立的口號,那他們就會不免要作出最有害的機會主義錯誤,就會是忘記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底任務而向英國反動勢力和資產階級讓步了。

(九)一九〇三年的綱領及其取消者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綱領是由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通過的,這次大會底記錄現在已成了非常少見的珍本,所以現今絕大多數工人運動家都不知道綱領個別條文底理由(尤其是因爲關於本問題的書籍並不是都能公開傳播…)。因此,必須把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上對於本問題的討論情形分析一下。

首先就要指出，俄國社會民主黨關於『民族自決權』問題的文件雖然非常缺乏，但從這些文件中總可完全明白看出，所謂自決權向來都是指民族分立權而言。謝科夫斯基，李勃曼，尤爾克維奇一流的先生之所以懷疑這一點，說第九條意思『不清楚』等等，只是因為他們毫無知識或極不留心而已。還在一九〇二年，普列漢諾夫在曙光雜誌上發表文章擁護綱領草案中的『自決權』條文時，就寫過，這個要求對於資產階級民主派是不一定要有的，而『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却是絕對必要的』。普列漢諾夫寫道：『如果我們把它忘記了，或不敢把它提出來，生怕觸犯我們大俄羅斯人底民族偏見，那末我們口裏所喊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口號，就會成爲一句可恥的騙人謊話了…』。

這是對於擁護這條綱領的基本論據的一個非常中肯的說明，也正因爲它非常中肯，所以那些『忘本的』批評我們綱領的人，總是小心翼翼地迴避它。不承認這一條，不管用何種理由爲口實，在事實上都是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作『可恥的』讓步。既然所講的是一切民族底自決權，爲什麼說是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讓步呢？因爲這裏所講的是脫離大俄羅斯民族而分立。無產者聯合底利益，他們的階級團結底利益，都要求承認民族分立權，——這就是十二年前普列漢諾夫在上述那段話內所承認了的道理；我們的機會主義者如果對這一點稍微思索思索了一下，那末他們關於自決問題，也許不會說出這麼多的荒謬議論吧。

在批准了普列漢諾夫所擁護的這個綱領草案的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上，主要工作是在綱領委員會裏進行的。可惜，綱領委員會底討論沒有記錄下來。而關於這一條的記錄恰巧會是特別值得注意，因爲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底代表華沙夫斯基和甘業茨基只是在委員會內才試圖過擁護自己的觀點，而反對『承認自決權』。讀者把他們的論據（華沙夫斯基底演說，他和甘業茨基底聲明，——見記錄第

一三四至一三六及第三八八至三九〇頁)拿來與盧森堡在上述那篇用波蘭文寫的論文中所持的論據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們所持的論據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次代表大會綱領委員會，——在這裏，普列漢諾夫是駁斥波蘭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發言人，——究竟是怎樣看待了這些論據呢？只是把這些論據無情地嘲笑了一頓而已！向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取消承認民族自決權一項的意見，其荒謬性是被揭示得如此明顯，如此清楚，竟使波蘭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不敢在代表大會全體會議上重複自己的論據！他們一知道他們的主張在有大俄羅斯人，猶太人，格魯吉亞人，阿爾明尼亞人的馬克思主義者共同參加的全黨最高會議面前絕對通不過的時候，就退出了大會。

這一段歷史軼事，當然是每一個認真注意自己黨綱的人所應特別重視的。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底論據在綱領委員會上完全遭受失敗，他們放棄在代表大會上擁護自己觀點的企圖，——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實。難怪盧森堡在她的一九〇八年的那篇文章內很『謙恭地』隱諱了這一點，大概是因為她回想到代表大會，就覺得太難為情吧！同時，她把華沙夫斯基和甘業茨基在一九〇三年用全體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名義提出，而盧森堡及其他波蘭社會民主黨人都始終沒有敢於（而且現在也不敢）再行提出的關於『修改』黨綱第九條的這一錯誤得可笑的意見，也隱諱過去了。

可是，如果盧森堡爲要隱瞞自己在一九〇三年的失敗，所以不肯講出這些事實來，那末關心自己黨歷史的人，却就要設法認識這些事實並思索其意義了。

『…我們提議，——盧森堡底朋友們退出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時向代表大會寫道，——把綱領草案第七條（現在的第九條）寫成如下的文句：第七條——設立保障國內各民族文化發展完全自由的機關』（記錄第三九〇頁）。

總之，波蘭馬克思主義者當時關於民族問題所發表的意見是很不明確的，他們所提出來代替『民族自決』的東西，其實不過是那個鼎鼎大名的『民族文化自治』底別名而已！

這聽起來幾乎很難置信，但可惜這是事實。而在代表大會上，雖然有五個崩得份子共五票，三個高加索代表共六票，而科斯特洛夫¹⁶⁰底發言權還不計算在內，但結果竟是沒有一票贊成取消民族自決這一條。主張把『民族文化自治』添加到這一條上來的，有三票贊成哥里德卜拉特所提出的條文（『設立保障各民族文化發展完全自由的機關』），有四票贊成李伯爾所提出的條文（『各民族有自由發展文化之權』）。

現在，當俄國自由黨，即立憲民主黨出現了的時候，我們知道，在它的綱領中，是把民族政治自決改成為『文化自決』了。因此，盧森堡底波蘭朋友們，在與波蘭社會黨底民族主義作『鬥爭』時所幹的事情，只是提議把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改為自由派的綱領！而他們還責備我們的綱領是機會主義的綱領哩，——難怪這種責備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底綱領委員會內只是受到哄笑而已！

我們已經說過，出席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沒有一個人反對過『民族自決』，試問這些代表究竟是怎樣瞭解這個『自決』的呢？

記錄中的如下三段話，便可說明這點：

『馬爾丁諾夫認為，決不可給『自決』這個名詞以廣義的解釋；它的意思只是說民族有權實行分立而組成爲單獨的政治整體，而決不是地方自治』（第一七一頁）。馬爾丁諾夫當時是綱領委員會底委員，在這個委員會裏，盧森堡底朋友們所持的論據是受到駁斥和嘲笑的。當時，馬爾丁諾夫按其觀點來說是個經濟主義者，是個激烈反對火星報的人，如果他當時發表的意見是綱領委員會大多數委員所不同意的，那當然是會被駁倒的了。

當綱領委員會工作結束以後，在大會上討論綱領第八條（現在第九條）時，首先就有崩得份子哥里德卜拉特起來發言。

『『自決權』，——哥里德卜拉特說，——是完全不容反對的。如果有一個民族爭取獨立，那我們就不能反對它這樣實行獨立。如果波蘭不願與俄羅斯正式結婚，那就隨它的便吧，——如普列漢諾夫同志所說過的一樣。在這個範圍內我同意這種意見』（第一七五至一七六頁）。

普列漢諾夫關於這一條並沒有在大會上發過言。哥里德卜拉特所引用的是普列漢諾夫在綱領委員會上所說的話；在該委員會上，是把『自決權』當作分立權的意思來詳細和通俗解釋過了的。在哥里德卜拉特發言以後講話的是李伯爾，他說：

『如果某一個民族不能在俄國範圍內生活，黨當然是不會阻碍它的』（第一七六頁）。

讀者可以看到，在通過黨綱的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對於自決『只』是意味着分立權這一點，是不會有兩種意見的。當時，崩得份子也會懂得這個真理，而只是在目前反革命繼續猖獗而『背叛之風』盛行的悲慘時期，才出現了一些因無知無識而胆大妄為的人，說黨綱意思『不清楚』。可是，在未講到這些可憐的『也是社會民主黨人』之前，我們且把波蘭人對綱領的態度問題作一結束吧。

他們來參加第二次（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是聲明說絕對必須實現統一的。可是，他們在綱領委員會裏一遭到『挫折』，就退出了代表大會，而他們的最後幾句話就是載在大會記錄內的書面聲明，其內容就是上面所引錄過的那個主張用民族文化自治來代替自決的意見。

一九〇六年，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加入黨了，無論在加入黨的時候，或是在加入黨以後（無論在一九〇七年代表大會上，在一九〇

七年和一九〇八年代表會議上，以及在一九一〇年中央全體會議上），都一次也沒有提出過修改俄國黨綱第九條的意見！！

這是事實。

不管人們怎樣花言巧語，但這一件事實總是顯然證明盧森堡底朋友們認為第二次代表大會綱領委員會中的討論以及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已經把問題完全解決了，證明他們已經默然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改正了它，因為他們在一九〇三年退出大會以後，又於一九〇六年加入了黨，而且一次也沒有企圖用黨性的手續來提出修改黨綱第九條的問題。

盧森堡底文章是在一九〇八年由她自己署名發表的。當然誰都從來沒有打算否認黨的作家有批評黨綱之權，而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同樣也沒有一個波蘭馬克思主義者正式機關提出過修改第九條的問題。

因此，托洛茨基替盧森堡底某些門徒撐腰，真是欲益反損，他以鬥爭報編輯部底名義在第二期（一九一四年三月）上寫道：

『…波蘭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民族自決權』毫無政治內容，應該從黨綱上刪去』（第二五頁）。

喜歡替人撐腰的托洛茨基真是欲益反損！要不是他作了『私談』（即是播弄是非，這是托洛茨基生平的慣技），那它就會找不到什麼證據來把一般『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算作是盧森堡每篇文章底擁護者。托洛茨基把『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描寫為沒有節操，沒有廉恥，連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黨綱都不會尊重的人。喜歡替人撐腰的托洛茨基真是欲益反損呵！

一九〇三年，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底代表爲了自決權問題而退出了第二次代表大會，當時托洛茨基還能夠說，他們認為這個自決權是沒有什麼意思而需要從黨綱上刪去的。

可是，自此以後，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又加入了擁有這樣一條綱領的黨，而且一次也沒有提出過修改黨綱的意見*。

托洛茨基爲什麼在他的雜誌讀者們面前把這些事實隱瞞起來呢？只是因爲他利於藉此投機，挑撥波蘭反對取消派的人與俄國反對取消派的人中間的意見分歧，並在黨綱問題上欺騙俄國工人。

托洛茨基在馬克思主義運動底任何一個嚴重問題上，都未曾有過堅定的意見，只要看見有什麼分歧意見發生，便馬上『乘隙而入』，反覆於兩方面之間。現在他是同崩得派及取消派合在一夥。而這些老爺們對黨是不講客氣的。

請聽聽崩得份子李勃曼所說的話吧：

『俄國社會民主黨』，——這位先生寫道，——『十五年前在自己的黨綱內提出了每個民族都有『自決』權的條文時，每個人（!!）都曾問過自己：這個時髦（!!）名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這個問題是從來也沒有得到過回答的（!!）。這一名詞至今還是（!!）個十分模糊的疑團。實際上，當時是難得解開這個疑團的。當時大家都說：現在還沒有到可以把這一條具體化的時候，暫且讓它留作一個疑團吧（!!）。實際生活本身，就會指明這一條應包含有怎樣的內容』。

這一個侮辱黨綱的『沒有穿褲子的孩子』¹⁶¹，不是漂亮得很麼？

他爲什麼要侮辱黨綱呢？

*有人對我們說，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一九一三年夏季會議上只有發言權，他們對於自決權（分立權）問題完全沒有參加表決，而在發言中一般地反對過這種權利。他們當然有全權這樣行動，並有全權照舊在波蘭宣傳反對波蘭分立。但這與托洛茨基所說的那回事情不完全相同，因爲波蘭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要求『從黨綱上刪去』第九條。

只是因爲他一竅不通，什麼都沒有學過，連黨史都沒有讀過，却簡簡單單地落到了取消派隊伍中，而在取消派隊伍裏面，對於黨和黨性的問題『照例』是赤身裸體，毫不害羞的。

在波米洛夫斯基底著作中，有一個教會學生常以『把痰吐到裝滿了白菜的桶內』¹⁶²而自鳴得意。崩得派先生們更進了一步。他們把李勃曼一流先生們放出來，叫他們來當衆把痰沫吐入自己的桶內。至於國際代表大會通過有某某決議，至於在黨底代表大會上有過崩得自己的兩位代表表現完全能够瞭解（雖然他們是非常『嚴格』批評與堅決反對過火星報的！）『自決』底意義，甚至贊成自決的事實，這一切又與李勃曼一流先生們有什麼關係呢？要是『黨底政論家們』（請不要發笑吧！）像教會學生那樣來對待黨史黨綱，那不是更容易把黨取消麼？

你們再看另一個『沒有穿褲子的孩子』，即鐘聲雜誌方面的尤爾克維奇。尤爾克維奇先生大概是有第二次代表大會底記錄在手邊，因爲他引了普列漢諾夫所說的那一段由哥里德卜拉特轉述過的話，並且還表現他知道只能把自決解釋爲分立權。雖然如此，而他終究在烏克蘭小資產階級中間造謠誣毀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說他們主張俄國底『國家完整性』（一九一三年第七第八兩期合刊，第八三及其他各頁）。當然，尤爾克維奇一流的先生們要離開烏克蘭的民主派與大俄羅斯的民主派，除了這樣造謠誣毀之外，是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來的。『鐘聲』社這個文人團體底全部政策路線，就是實行這樣一種離開，鼓吹烏克蘭工人應當分出去而組成爲特別的民族組織*。

分裂無產階級隊伍的民族主義市儈團體，——而鐘聲雜誌底客

*請特別參看尤爾克維奇爲列溫斯基所著加里細亞區內烏克蘭工人運動發展簡史一書所作的序言，一九一四年基也翻版。

觀作用正是如此，——在民族問題上散佈一些極端糊塗的思想，當然是完全相稱的。不待說，尤爾克維奇和李勃曼一流的先生（他們一聽見人家把他們叫作『在黨近旁鬼混的份子』，就氣得『要命』），簡直是一言半語也沒有提到他們到底打算怎樣在黨綱上解決分立權的問題。

你們再看第三個而且是最主要的一個『沒有穿褲子的孩子』，即謝科夫斯基先生。他在取消派的報紙上，當着大俄羅斯民衆面前『大罵』黨綱第九條，同時他又說『有某些理由使他不能贊成』主張取消這一條的意見！！

這聽來很覺奇怪，但這是事實。

一九一二年八月，取消派代表會議正式提起民族問題。一年半以來，關於第九條的問題，除了謝科夫斯基底文章之外，就沒有看見過一篇東西。而且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反駁黨綱時，又說他『因有某些（莫非是不方便說的病症麼？）理由而不能贊成』主張修改黨綱的意見！！我敢担保說：在全世界上都難找到這種機會主義，甚至比機會主義更壞的背棄黨，企圖取消黨的例子。

至於要知道謝科夫斯基底論據怎樣，那末只要舉出一個例子來看看就夠了。

『如果波蘭無產階級，——他寫道，——想在一個國家範圍內與俄國整個無產階級共同鬥爭，而波蘭社會中的反動階級則與此相反，想使波蘭脫離俄國分立，並在全民公決時獲得大多數贊成分立的票數，那又怎麼辦呢：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中央國會中究竟是要與波蘭同志共同投票反對分立呢，還是爲着不要破壞『自決權』而贊成分立呢？』（新工人報第七十一期）。

由此可見，謝科夫斯基先生甚至不知道這裏所講的是什麼問題。他從沒想一想，分立權的問題，恰巧預定不是由中央國會來解

決，而只是由實行分立的那個區底議會（國民大會，全民公決等等）來解決的。

當無論普里什克維奇輩或科可什金輩甚至把分立的念頭都認作是罪惡的時候，公然有人拋開真正實在的具體政策問題不談，反而像一個小孩那樣發問：如果大多數在民主投票時都贊成反動派，那又『怎麼辦呢』！大概全俄無產階級今天不是要與普里什克維奇輩以及科可什金輩作鬥爭，倒要放過他們，而去和波蘭底反動階級鬥爭吧！！

這類荒謬已極的議論竟寫在取消派底機關報上，而該報底思想領導者之一，就是馬爾托夫先生，就是起草了綱領草案並在一九〇三年努力使它通過了，後來又做了文章來擁護過分立自由的那個馬爾托夫。現在馬爾托夫大概是按如下方式來推論了：

那裏用不着聰明人，
你們派黎亞德去就行，
讓我做個旁觀人¹⁶³。

他把謝科夫斯基這個黎亞德派去，讓他在日報上對那些不知道我們黨綱的新起讀者們曲解黨綱，弄出無窮的糊塗賬來！

取消派實在是跑得更遠了，——連許多從前著名的社會民主黨人都沒有留下一點黨性了。

當然不能把盧森堡拿來和李勃曼，尤爾克維奇及謝科夫斯基一班人等量齊觀，但她的錯誤恰巧為這班人樂意利用的事實，却就特別明顯地證明她是落到怎樣的機會主義深淵裏去了。

(一〇)結 束 語

現在讓我們來總結一下。

從一般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看來，自決權問題並沒有什麼困難的地方。一八九六年倫敦大會底決議不容爭辯，自決權只能瞭解為

分立權，組織獨立民族國家是一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趨勢，這都是毋庸贅說的。

在某種限度內造成困難的，只是俄國境內被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與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正在共同奮鬥，而且應當共同奮鬥的問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堅持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統一，而反對民族主義所表現的一切資產階級性和黑幫性的影響。在被壓迫民族中間，無產階級組成爲獨立政黨的過程，有時竟會引起與該民族底民族主義作異常激烈的鬥爭，以至使人迷失前途，而忘記壓迫民族底民族主義。

但這樣迷失前途，只能是一種暫時現象。各民族無產者共同鬥爭底經驗，極明顯地指明我們不應當從『克拉科夫城的』觀點，而應當從全俄的觀點來提出政治問題。但統治全俄政治的却是普里什克維奇與科可什金一流人。他們的思想籠罩一切，他們因異族人抱有『分立主義』思想，懷有分立念頭而對異族人橫施攻擊，在國會，學校，教會和營房裏，以及千百份的報紙上，宣傳這種攻擊，進行這種攻擊。正是這種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毒素瀰漫於全俄政治空氣。奴役其他民族而使反動勢力在全俄鞏固起來的人民，是不幸的人民。一八四九年和一八六三年的事變所遺留下來的那些印象，構成一種活躍的政治傳統，如果不會有很大的暴風發生，這種傳統恐怕還要在幾十年長久時期內阻礙一切民主運動，特別是社會民主運動。

毫無疑義，雖然被壓迫民族（而被壓迫民族底『不幸』，就是民衆往往沉醉於『自己』民族解放底思想）中某些馬克思主義者所持的觀點往往使人覺得合理，但在事實上，就俄國階級力量底客觀對比來說，拒絕擁護民族自決權，就等於最兇惡的機會主義，就等於拿科可什金輩底思想來腐化無產階級。而這種思想，其實也就是普里什克維奇輩底思想與政策。

因此，如果說最初一個時候，還可以把盧森堡底觀點當作是波蘭的，『克拉可夫城的』一種特殊狹隘觀點* 而加以寬恕，那末到了現在，當民族主義，尤其是政府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到處加強起來了的時候，當這個民族主義已在指揮政治的時候，這樣的狹隘觀點却就成爲不可寬恕的了。其實，現在所有一切民族中的機會主義者都極力利用這種狹隘觀點，逃避『風暴』與『突變』思想，認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終結，而傾向於科可什金一流人底自由主義。

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也同任何民族主義一樣，定會經過幾個不同的階段，而視資產階級國家內部以那些階級佔首要地位爲轉移。一九〇五年以前，我們差不多只知道有民族主義反動派。革命以後，在俄國却產生了民族主義自由派。

其實我國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科可什金），即整個現代資產階級，都是站在這個立場上。

往後就必然會產生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民主派。『人民社會黨』創始人之一的壁舍浩諾夫先生，在一九〇六年俄國財富雜誌八月號上叫人小心對待農夫底民族主義成見的時候，就表示了這種觀點。不管人家怎樣誣衊我們布爾什維克，說我們把農夫『理想化』，可是我們向來都嚴格地分清，並且以後還要分清農夫底理智與農夫底成見，農夫反對普里什克維奇的民主主義立場與農夫想同牧師地主調和的傾向。

無產階級民主派現在就應當顧到大俄羅斯農民底民族主義（不是對它讓步，而是要同它作鬥爭），而且將來大概還要在頗長一個

*當然，全俄馬克思主義者，首先是大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承認民族分立權，絕不排除某個被壓迫民族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去宣傳反對分立，也好像承認離婚權並不排除宣傳反對某個離婚事件一樣。所以我們認爲，波蘭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定會相繼而起，恥笑謝科夫斯基與托洛茨基現在所『煽動起來的』那種莫須有的『矛盾』的。

時期內顧到這點*。一九〇五年以後，被壓迫民族中的民族主義潮流表現得非常厲害（例如第一次杜馬中的『自治聯邦派』，烏克蘭運動，回民運動之增長等等），這種潮流一定會使城鄉大俄羅斯小資產階級底民族主義加強起來。俄國民主改革進行得越慢，各族資產階級底民族迫害和爭執也就會更加頑強，更加粗魯，更加殘暴。同時，俄國普里什克維奇輩底特別反動性將會在那些常在隣國境內享有較多自由的被壓迫民族中間引起（並加強）『分立主義的』趨向。

這種實際情況就使俄國無產階級負有兩重的，或正確些說，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反對一切民族主義，首先是反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不但要一般地承認各民族有完全的平等權利，而且要承認國家建設方面的平等權利，即民族自決權，民族分立權；另一方面，正是爲了與一切民族中的各種民族主義作順利的鬥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鬥爭以及無產階級組織底統一，使其不願資產階級底民族孤立傾向而極密切地溶合爲一個國際整體。

各民族完全平等，民族有自決權，各民族工人溶合起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教導給工人們的民族問題綱領，全世界經驗和俄國經驗教導給工人們的民族問題綱領。

* * *

*例如，把波蘭民族主義變化的情形，由貴族民族主義變成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然後又變成爲農民民族主義的經過情形考察一下，是很有趣味的。彼恩加德在他用德文寫的普魯士境內的波蘭人一書中（有俄譯本），自己站在德國的科可什金派底立場上，而描寫了一種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德國境內的波蘭人組織了一種「農民共和國」，其表現就是波蘭農民的各種合作社及其他種種團體都緊密團結起來爲民族，爲宗教，爲「波蘭人的」領土而鬥爭。德國人的壓迫把波蘭人團結成爲一個單獨的團體，因爲德國人的壓迫在波蘭人中間，起初是在波蘭貴族中間，後來是在波蘭資產階級中間，最後是在波蘭農民羣衆中間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思想（特別是一八七三年德國人開始反對學校內教授波蘭文以後）。在俄國也有這種趨向，而且不僅以波蘭區域爲限。

在本文已經排好了版的時候，我忽然收到了我們的工人報第三期，科索夫斯基在這裏論到承認一切民族有自決權的問題時寫道：

『這個條文是從第一次黨大會（一八九八年）決議中機械抄來，而第一次黨大會又是從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決議中借來的。從當時討論情形中可以看出，一九〇三年代表大會對於這個條文，正是按社會主義國際所賦予它的那種意思來解釋的：解釋為政治自決，即解釋為民族在政治獨立方面的自決。所以，民族自決這一條文既然是指領土獨立權而言，當然也就完全沒有涉及究應怎樣在某一國家機體內部調節那些不能或不願退出現存國家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

由此可見，科索夫斯基先生是有一九〇三年第二次代表大會底記錄在手邊，並且很清楚知道民族自決這一概念底真正（而且是唯一）意思。請你們拿這件事實去同崩得時報編輯部放出李勃曼先生來侮辱綱領並宣稱綱領意思不清楚的事實比照一下吧！！崩得會員先生們那裏的『黨性』道德，真是奇怪得很… 至於科索夫斯基究竟為什麼硬說代表大會通過自決條文是機械的抄襲，那就只有『鬼才知道』了。常有一些人，只是『想要反駁一下』，至於究竟用什麼來反駁，怎樣來反駁，為什麼要反駁以及為了什麼而反駁，那他們是根本不知道的。

一九一四年刊載於教育雜誌第四，第五，第六等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三六五至四二四頁。

表明工人運動中各派力量 的一些客觀材料

覺悟工人最重要的任務，是要認識本階級底運動，認識這個運動底實質，這個運動底目的和任務，條件和實際形式。這是因為工人運動底力量全在於它自己的覺悟性和羣衆性；資本主義發展的每一步，都使無產者，即僱傭工人數量增加起來，並團結他們，組織他們，教育他們，因而造成一個必然要向本身目的走去的階級力量。

刊物上所經常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者綱領和策略決議，幫助工人羣衆認識工人運動底實質，目的和任務。

俄國工人運動各派之間的鬥爭，實有深刻的階級的根源。在俄國工人運動中間同馬克思主義派（真理派）鬥爭而可以稱爲（按其羣衆性及其歷史根源來說可以稱爲）『派別』的兩個『派別』，即民粹派和取消派，都是表現着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屢次解釋過，並在馬克思主義者底許多決議上承認了的，無論是關於民粹派（反對他們的鬥爭已經有三十年了），無論是關於取消派（取消派底歷史約有二十年，因為取消派是『經濟主義』和孟什維主義底直接繼續），都是如此。

現時，表明俄國工人運動中各派力量的客觀材料，日益增加起來了。必須把這些不是表明個別份子或單個集團底行爲和情緒，而是表明羣衆底行爲和情緒的客觀材料竭力收集起來，加以考察和研

究，這些材料是從各種懷有敵意的報紙上拿來的，每個識字的人都可加以檢查。

只有根據這樣的材料，才可以學習和研究自己階級底運動。民粹派和取消派，以及各種智識份子小團體，『前進派』，普列漢諾夫派，托洛茨基派底一個主要缺點，甚至可說是最主要的缺點（或對工人階級所犯的罪惡），就是他們的那種主觀主義態度。他們步步都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意見』，自己的估計，自己的『希望』當作工人們底意志，當作工人運動底要求。例如，他們講到『統一』時，便傲然自大地忽視俄國大多數覺悟工人在兩年半以來，即從一九一二年初起，至一九一四年年中為止這一時期內建立真正統一的經驗。

我們且把現有的一些表明工人運動中各派力量的客觀材料列成一個表。讓樂意相信主觀估計和種種諾言的人到各種『小團體』那裏去吧，而我們只是要請那些願意研究客觀事實的人注意。事實是如下述：

		真理派	取消派	百分數		民粹主義的 左派份子
				真理派	取消派	
杜馬代表選舉投票結果：						
1. 工人選民團所選代表人數	第二屆杜馬，1907年.....	11	19	47	53	—
	第三屆杜馬，1907—1912年.....	4	4	50	50	抵制
	第四屆杜馬，1912年.....	6	3	67	33	
捐過款的工人團體數目：						
3. 捐款給彼得堡各報紙的工人團體數目	1912年.....	620	89	—	—	—
	1915年.....	3181	661	76.9	23.1	364
	截至1914年五月十三日止.....	3873	671	81.1	18.9	524

	真 理 派	取 消 派	百 分 數		民 粹 主 義 的 左 派 份 子
			真 理 派	取 消 派	
工人選進保險機關的代表：					
5. 選進全俄保險機關的代表.....	47	10	83.4	17.6	21—22
4. 選進首都保險機關的代表.....	37	7	84.1	15.9	4
在決議上簽名贊成每一杜馬黨團的人數：					
5. 在兩個報紙上簽名贊成「六人團」（真理派）和贊成「七人團」（取消派）的人數.....	6722	2985	69.2	30.8	—
各派同工人團體的聯繫：					
6. 由工人團體向兩個黨團分別寫信交付捐款的次數（自1913年十月起，至1914年六月六日止）.....	1295	315	85.7	14.3	—
彼得堡各報紙出版份數：					
7. 出版份數（王德威爾得所收集和發表的材料）.....	40000	16000	71.4	28.6	12000 (每週三次)
在外國出版的刊物：					
8. 在取消派八月（1912年）會議後至1914年六月止各派領導機關報出版期數.....	5	0	—	—	9
9. 在這幾期報紙上提到非公開組織的次數（每一處算作一次）.....	44	0	—	—	21
對資產階級的依賴性：					
10. 捐助彼得堡各報紙的款項（從1914年一月一日至五月十三日）。不是由工人捐助的款項所佔的百分數.....	—	—	13	56	50

	真 理 派	取 消 派	百 分 數		民 粹 主 義 的 左 派 份 子
			真 理 派	取 消 派	
11.各報紙在整個期間公佈收支賬目次數.....	5	1	—	—	?(0?)
12.其中由一些來歷不明的款項，即從資產階級方面得來的款項填補虧空的收支賬目所佔的百分數.....	—	—	0	100	?
13.兩杜馬黨團經手捐來的款項數目（從1913年十月起至1914年六月六日止）。不是由工人捐助的款項所佔的百分數.....	—	—	6	46	—
14.冒充工人寫的，其實是從資產階級報上摘來而未註明來歷的通訊數目.....	—	5(在我們的工人報第十七期和第十九期上)			0
職 工 會：					
15.大多數會員（按工會管委委員多數來算）同情某一派的彼得堡職工會數目.....	14 ¹ / ₂ *	3 ¹ / ₂ *	—	—	2

我們先把所引材料簡略說明一下，然後再作結論。

最方便的辦法是逐條說明。第一條。表明複選當選人和初選當選人數目的材料是沒有的。對利用『選民團』材料表示不滿，簡直是可笑的，因為根本就沒有別的材料可用。德國社會民主黨是按俾斯麥排斥婦女而造成『男性』選民團的選舉法來計算其所得成績的。

第二條。關於不僅『在決議上簽名』，而且實行納款的工人團

*在一個工會中，同情真理派與同情取消派的人數相等。

體數目，這不僅是表明某派力量的最正確可靠的標誌，而且是表明組織性和黨性的最正確可靠的標誌。

所以，取消派和各個『小團體』對這種標誌表示出一種主觀主義的憎惡態度。

取消派份子反駁說：我們還有猶太報和格魯吉亞報，而你們却只有一個真理報。這種說法是不對的。第一，愛沙尼亞報和立陶宛報是真理派的報紙。第二，如果拿外省來講，那末是否可以把莫斯科忘掉呢？莫斯科工人報在一九一三年所團結和統一起來的有三百九十個工人團體（工人報，第一期，第一九頁），而猶太人的時報從第二期（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至一九一四年六月一日止的時期內所統一起來的，只有二百九十六個工人團體（其中有一百九十個是至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日為止，一百零六個是自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日起至一九一四年六月一日止）。可見，單是莫斯科一處就能綽綽有餘地『抵銷』取消派份子援引猶太時報的主觀論據！

我們請格魯吉亞的和阿爾明尼亞的同志們收集各種表明取消派在高加索所辦報紙情形的材料。在那裏究竟有多少工人團體呢？需要有各方面的客觀材料。

在計算團體方面，也許有些錯誤，但這是局部的錯誤。望大家檢查糾正。

第三條和第四條是無須說明的。最好是製定一種用以收集外省新材料的調查表。

第五條。在二千九百八十五個取消派份子簽名中，包括有一千零八十六個崩得份子和七百一十九個高加索人。希望當地的同志們檢查這些數目字。

第六條。兩個黨團底會計員都發表有黨團所收到的各種捐款的總結報告。這是一種確切表明與工人聯繫的客觀標誌。

第七條。報紙的份數。這類材料是由王德威爾得經手收集和發表的，可是取消派和自由派（基也輔思想報）把這類材料隱瞞起來了。這是『主觀主義的』態度。希望收集至少包括一個月的更完備的材料。

第八條和第九條。這是表明取消派背棄『祕密組織』，即背棄黨的一個客觀例證。但是在國外，從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五月十三日止，一共捐助了四十九個盧布七十九個哥比（百分之零點二五）給真理派，捐助了一千七百零九個盧布十七個哥比（百分之十四）給取消派。不要說『不能作』，而應說『不願作』！

第十條至第十四條。這是表明取消派和民粹派依賴於資產階級，表明他們帶有資產階級性的客觀證據。主觀上，取消派和民粹派是『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派』。客觀上，他們無論按他們思想底內容來說，無論按羣衆運動底經驗來說，都是個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團體，極力使少數工人脫離工人黨的團體。

請讀者特別注意取消派假造工人通信的事實。這是空前未有，駭人聽聞的欺騙手段！希望各地方馬克思主義者揭穿這種欺騙手段並收集客觀的材料（參看勞動真理報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一日出版的第十二期）。

第十五條。此項材料特別重要，最好是用一種特別調查表來加以補充和檢查。這些材料是我們從聖彼得堡『浪潮』出版局一九一四年刊印的工人伴侶上摘引下來的。屬於取消派職工會的有公務員，製圖員和藥劑師（在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舉行的最近一次印刷工會管委選舉大會上，有一半管委正式委員和一大半管委候補委員是真理派方面的人當選）。屬於民粹派職工會的有麵包工人和製囊工人。會員總數約有二萬二千人。

在莫斯科十三個工會中，有十個工會是真理派的工會，有三個工會是雖不確定，但較爲接近於真理派的工會。取消派或民粹派的工會一個也沒有。

由客觀材料得出的結論指明：只有真理派才真正是個不依賴於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派別，它所組織所統一起來的有五分之四以上的工人（在一九一四年時，它所統一的工人團體與取消派所統一的相比是佔總數百分之八一點一）。取消派和民粹派無疑是資產階級民主份子的派別，而不是工人的派別。

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以及一九一四年上半年的羣衆運動經驗，非常鮮明地充分證實了真理派底綱領思想，策略思想，組織思想，決議和路線。我們應當以確信我們所走的道路正確爲基礎來努力加強我們的工作。

一九一四年七月九日（舊曆六月二十六日）

刊載於勞動真理報第二十五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三五五至三六〇頁。



帝國主義大戰時期



俄國第二次革命



戰爭與俄國社會民主黨

各國政府和資產階級政黨數十年來準備的歐洲戰爭已經爆發了。軍備的擴張，各先進國家在資本主義發展最新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上爭奪市場鬥爭的極端緊張化，東歐各最落後君主國底皇朝利益，都必然要引起這次戰爭，而且真正引起了這次戰爭。奪取領土，征服異族，打破競爭對方民族而掠奪其財富，向勞苦羣衆蒙蔽俄德英及其他各國底國內政治危機，離間工人，用民族主義思想麻醉工人，摧殘工人先鋒隊，以求削弱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這就是現時戰爭底唯一真正內容，作用與意義。

社會民主黨首先就應該揭示出現時戰爭底這種真正意義，無情揭破各統治階級，即地主和資產階級爲辯護戰爭所散佈的各種謠言，詭辯和『愛國主義』辭句。

領導一個交戰國集團的是德國資產階級。它愚弄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硬說它進行戰爭的目的，是要保護祖國，保護自由和文化，解放受沙皇制度壓迫的民族，摧毀反動沙皇制度。其實，這個服役於以威廉第二爲首的普魯土地主的資產階級，向來都是沙皇制度底最忠實同盟者，向來都是俄國工農革命運動底敵人。其實，無論戰爭底結局如何，這個資產階級總是要與普魯土地主一起盡力幫助沙皇帝制來反對俄國革命的。

其實，德國資產階級是向塞爾維亞舉行搶掠的征討，想把它征服下去，並撲滅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革命，同時調用主要兵力去攻

打較爲自由的比利時與法蘭西，以便掠奪更富足的競爭對方。德國資產階級散佈謠言，說它是進行着防禦戰爭，其實它是選定了它所認爲最適當的開戰時機，利用它在軍事技術上的最新成就，而打破俄法兩國已經擬定和預決了的建立新軍備的計劃。

領導另一交戰國集團的是英法兩國資產階級。它愚弄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硬說它進行戰爭的目的，是要保護祖國，保護自由和文化，反對德國軍國主義與暴君制度。其實，這個資產階級早已運用幾十萬萬的金錢，僱用並準備歐洲最反動野蠻君主制度底軍隊，即俄國沙皇制度底軍隊去攻打德國了。

其實，英法資產階級作戰的目的，是要奪取德國所有的殖民地，打破這個經濟發展更快的競爭對方民族『先進的』『民主的』國家爲了這種高尚目的，極力幫助野蠻的沙皇制度加緊壓迫波蘭和烏克蘭等等，加緊壓制俄國革命。

兩個交戰國集團都是同樣進行搶掠，殘暴和殘酷已極的戰爭，可是爲了愚弄無產階級，轉移它的視線，不讓它注意唯一真正解放的戰爭，即反對『本』國和『異』國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爲了這個高大目的，每個國家的資產階級都極力用愛國主義的假話來宣揚『自己』民族戰爭底意義，說它力求戰勝敵人，並不是爲了搶掠財富和奪取領土，而是爲了『解放』其他各國人民，不過要把本國人民除外。

可是，各國政府與資產階級越是努力離間工人和嚇使他們互相摧殘，越是爲了這一高尚目的來實行殘酷的軍事戒嚴和軍事檢查制度(甚至在現在戰爭時期，追究『內』敵比外敵還要嚴格得多)，覺悟的無產階級也就應當越加堅決保持自己的階級團結，自己的國際主義，保持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反對各國『愛國主義』資產階級集團所極力鼓吹的沙文主義思想。覺悟的工人放棄這個任務，就會是放棄自己一切力求解放的民主主義趨向，更不用說社會主義趨向了。

我們不得不十分悲痛地指出，歐洲各主要國家底社會黨沒有執行它們的這個任務，而它們領袖們底行爲——尤其是德國黨領袖們底行爲——簡直是公開叛變社會主義事業。現在的社會主義第二國際（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底大多數領袖，在這全世界歷史上最緊要的關頭，企圖拿民族主義來暗中代替社會主義。由於他們的這種行爲，便使這些國家底工人政黨沒有起來反抗各國政府底罪惡行爲，反而號召工人階級把自己的立場與各帝國主義政府底立場打成一片。國際底首領們叛變了社會主義，投票贊成軍用預算，重複着『本』國資產階級底沙文主義（『愛國主義』）口號，辯護和擁護戰爭，加入交戰國底資產階級內閣等等。現時歐洲最有勢力的社會黨領袖和最有勢力的社會黨刊物，都是站在沙文主義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觀點上，而絕對不是站在社會主義觀點上。首先應對這種污辱社會主義的罪惡負責的，便是第二國際中最強大最有勢力的黨，即德國社會民主黨。但法國社會黨人在叛賣過祖國而勾結俾斯麥鎮壓了巴黎公社的那個資產階級底政府內閣中擔任總長職務，也是一種無可辯護的罪行。

德奧兩國社會民主黨人，硬說他們贊助戰爭就是與俄國沙皇制度作鬥爭，企圖以此辯護他們贊助戰爭的行爲。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特此正式聲明，我們認爲這種辯護不過是一種詭辯。近年來我國反沙皇制度的革命運動，又大規模地擴展起來了。這個運動，向來都是由俄國工人階級領導的。最近幾年來數百萬人的政治罷工，都是在推翻沙皇制度和爭取民主共和制度的口號下進行的。在戰爭前夜，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彭加勒訪問尼古拉第二時，還在彼得堡街道上親自看見過俄國工人自己築成的街壘。俄國無產階級爲使全人類洗去沙皇帝制的污點，是沒有吝惜過任何犧牲的。但我們應當指出，如果說有什麼東西還能在某種條件下延緩沙皇制度滅亡的時刻，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幫助沙皇制度反對全部俄國民主運動，那就只是現今這次

戰爭，因為這次戰爭把英法俄三國資產階級底錢庫都已供給沙皇制度去達到它的反動目的。另一方面，如果說還有什麼東西能阻礙俄國工人階級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鬥爭，那就只是德奧社會民主黨領袖底行爲，即俄國沙文主義刊物始終都叫我們去仿效的那種行爲。

假定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真是非常欠缺力量，不得不放棄任何革命行動，那末就在這種情形下，他們也不應當加入沙文主義的營壘，不應當採取意大利社會主義者理應說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玷污了無產階級國際旗幟的那些步驟。

我們的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由於這次戰爭的關係，已遭受過，而且還會遭受重大的犧牲。我們的一切公開工人刊物都被消滅了。大多數工會被封閉了。有許多同志被逮捕被放逐了。但我們的國會代表團，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杜馬黨團，畢竟認爲絕對必須執行自己的社會主義職責：不投票贊成軍用預算，甚至以退出杜馬會場來更激烈地表示反對，痛斥歐洲各政府底帝國主義政策。沙皇政府底壓迫雖然加重了十倍，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却已刊行着第一批祕密的反戰宣言，履行自己對於民主運動與國際的職責。

革命社會民主派底代表，即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少數份子和中立國內優秀的社會民主黨人，因第二國際這種破產而感覺非常羞恥¹⁶⁴；英法兩國都有社會主義者表示反對社會民主黨內大多數人底沙文主義立場；德國社會主義月刊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一類東西所代表的那些早已站上民族主義自由派立場的機會主義者，當然應該慶祝着自己對歐洲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那些動搖於機會主義派和革命社會民主派之間的人（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中派』）企圖用外交詞句來抹煞或掩飾第二國際破產的事實，却就是一種最有害於無產階級事業的舉動了。

恰恰相反，要公開承認這一破產，要認識這一破產底原因，以求建立新的更堅固的社會主義的全世界工人團結組織。

斯多德牙爾國際大會，哥平加根國際大會和巴塞爾國際大會底決議，責成各國社會主義者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要反對沙文主義，責成社會黨人努力宣傳國內戰爭和社會革命來回答任何一國資產階級和政府所發動的戰爭，而機會主義者却撕毀了這些決議。第二國際底破產就是在已往歷史時期（所謂『和平』時期）特殊環境中生長起來，而近幾年來已在國際中得到了事實統治權的機會主義底破產。機會主義者早已準備着這次破產：他們否認社會主義革命，用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來暗中代替它；他們否認階級鬥爭及其在相當時機轉變為國內戰爭的必然性，而宣傳階級合作；他們在愛國主義和保護祖國底名義下宣傳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而否認或忽視早已在共產黨宣言上敘述過的社會主義基本真理，即工人無祖國的真理；他們在與軍國主義作鬥爭的問題上，並不認為各國無產者必須用革命戰爭反對各國資產階級，却只限於宣傳市儈式感情主義的觀點；他們把必須利用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和合法工作機會的策略，變成爲盲目崇拜這種合法工作，而忘掉在危機時代必須運用祕密組織和祕密鼓動的原則。機會主義底自然『補充』，即同樣是資產階級性，同樣與無產階級觀點，即與馬克思主義觀點爲敵的無政府工團主義思潮，也因爲它在現今危機時代自鳴得意地重複沙文主義口號而遭到了同樣可恥的破產。

現在，不與機會主義思想決裂，不向羣衆說明機會主義思想必遭失敗，便不能執行社會主義底任務，便不能實現真正國際的工人團結。

各國社會民主黨底任務首先就是要與本國底沙文主義思想作鬥爭。在俄國，這種沙文主義思想已薰染了全部資產階級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一部份民粹派，以至社會革命黨人和『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是如像斯米爾諾夫，馬斯洛夫和普列漢諾夫等人底沙文主義言論，應受斥責，因爲這種言論是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刊物所極力贊成和廣泛利用的）。

從國際無產階級底觀點看來，究竟兩個交戰國集團中那一個集團底失敗對於社會主義運動害處較少，這在目前情況下是無法斷定的。可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毫不猶豫地認定，從俄國各族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底觀點看來，最反動，最野蠻，壓迫歐亞兩洲民族和民衆最多的俄國沙皇帝制政府遭受失敗，無疑是對於社會主義運動害處較少的。

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最近政治口號應當是組織共和制歐洲聯邦，但社會民主黨人與決意隨便『約許』什麼，只求把無產階級誘入沙文主義大浪漩渦中去的資產階級相反，而要向羣衆解釋，不用革命手段推翻德奧俄三國君主制度，這個口號便是完全虛偽而毫無意思的。

因為俄國非常落後，還沒有完成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仍舊應當是實行徹底民主改造的三個基本條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同時各民族完全平權和自決），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可是在各先進國家內，戰爭却把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提到日程上來了，戰爭底負擔壓在無產階級肩上愈沉重，在歐洲遭到現代『愛國主義』野蠻行動的浩劫以後，在大資本主義達到巨大技術成功的環境下，無產階級在復興歐洲中所起的作用愈積極，則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也就愈迫切。資產階級利用戰時法律來完全拮住無產階級的口舌，因而使無產階級絕對必須創立祕密的組織形式和鼓動形式。讓機會主義者用叛變自己信念的代價去『保全』合法的組織吧，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却運用工人階級底組織技能和各種聯繫去建立適合於危機時代的祕密的鬥爭形式，以爭取社會主義，並使工人們不去與本國沙文主義的資產階級團結起來，而去與世界各國工人團結起來。無產階級的國際並沒有滅亡，而且也不會滅亡；工人羣衆將打破一切障礙而創立起新的國際。現時機會主義底勝利是不會長久的。戰爭的犧牲愈多，工人羣衆也就

會愈加明白認識機會主義者叛變工人事業的事實，愈加知道必須倒轉槍頭去反對本國政府和本國資產階級。

變現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是由巴黎公社底經驗指出，由巴塞爾國際大會底決議（一九一二年）規定，從發展極高的各資產階級國家間的帝國主義大戰底一切條件中產生出來的唯一正確無產階級口號。戰爭既已成了事實，那就不管這一轉變在某個時候會遇到何等巨大的困難，但社會主義者總不會拒絕爲此目的而堅忍不拔地進行有系統的準備工作。

無產階級只有在這條道路上，才能擺脫依賴於沙文主義資產階級的地位，而在某種形式下或快或慢地實行一些堅決步驟，以求爭得各民族真正的自由，爭得社會主義。

全世界各國工人爲反對全世界各國資產階級沙文主義與愛國主義而建立的國際友愛關係萬歲！

擺脫了機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萬歲！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刊載於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三十三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九至一八頁。

論大俄羅斯人底民族自傲心

現在有許多人大說特說，大談特談，大叫特叫什麼民族特性，什麼祖國！英國的自由派和急進派的總長，法國的無數『先進』政論家（他們原來都是與反動派政論家底意見完全一致的），俄國許多官場的，立憲民主黨的和進步派的（直到某些民粹派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下流作家，都異口同聲鼓吹什麼『祖國』自由與獨立，什麼偉大的民族獨立原則。真使人分辨不出他們中間誰是賣身求榮而努力歌頌劊子手俄皇尼古拉，歌頌摧殘黑人和印度居民者的齷齪份子，誰是因爲冥頑不靈或沒有氣節而『隨波逐流』的庸俗市儈。不過，分辨這點也是不關重要的。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一個很廣泛很深刻的思潮，它的根源與大國民族地主資本家老爺底利益有緊密的聯系。爲了宣傳有利於這些階級的思想，每年花費着幾千萬，幾萬萬的金錢：這一副水磨實在不小，它吸收着各處的水力，從頑固的沙文主義者孟什科夫起，直至那些由於機會主義思想或沒有氣節而成了沙文主義者的普列漢諾夫和馬斯洛夫，路班諾維契和斯米爾諾夫，克魯泡特金和布爾切夫一流人爲止。

讓我們大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也把我們對於這一思潮的態度確定一下吧。我們是位置在歐洲極東部並且佔有亞洲一大部份地區的大國民族中的人，當然不應當忘掉民族問題底巨大意義；——特別是在一般人所公允稱爲『民族監獄』的這個國家內；——特別是當資

本主義把歐洲極東部和亞洲許多『新的』大小民族喚醒起來求生存求覺悟的這個時期；——特別是在沙皇專制制度迫使千百萬大俄羅斯人和『異族人』拿起武器，爲了貴族聯合會和古契可夫，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多爾高魯科夫，庫梯列爾，羅吉澈夫一流人底利益去『解決』許多民族問題的這個時候。

我們大俄羅斯覺悟的無產者是不是歧視民族自傲心呢？當然是不歧視的！我們酷愛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祖國，我們最努力於把祖國勞動羣衆（即祖國十分之九的居民）提高到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覺悟生活的程度。我們因目覩皇朝劊子手，貴族和資本家對我們這個美妙祖國肆行橫暴，壓迫和侮辱而最覺傷心。我們因這種暴行在我們人民中間，在大俄羅斯人民中間受到反抗，因從這些人民中間產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黨人，七十年代平民智識份子革命家，因大俄羅斯工人階級在一九〇五年造成了羣衆的強大革命黨，大俄羅斯農夫在當時已開始成爲民主主義者，開始推翻牧師和地主等等事實而自傲。

我們記得，獻身於革命事業的大俄羅斯民主主義者契爾內舍夫斯基在半世紀前說過：『可憐的民族，奴隸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些奴隸』。公開的和暗藏的大俄羅斯奴隸（對沙皇專制制度盡忠的奴隸），是不喜歡回憶這些話的。而我們却認爲這是本着真正愛國精神所說的話，是因感慨大俄羅斯民衆中間缺少革命性而吐露的愛國心情。當時在民間還缺少這種革命性。現在這種革命性雖也還少，但總算是已經有了。我們滿懷着民族自傲心，因爲大俄羅斯民族也造成了革命階級，也證明它能够向人類作出爭自由爭社會主義的偉大模範，而不只是一些大規模的蹂躪，大批絞架和拷問室，大規模的飢荒，以及向神父、沙皇、地主和資本家逢迎獻媚的極大醜態。

我們滿懷着民族自傲心，且正是因此，我們也就特別痛恨我們自己的奴隸式的過去（當時地主貴族爲了消滅匈牙利，波蘭，波斯和

中國的自由，常把農夫驅去作戰）和我們自己的奴隸式的現在，因為現在這些地主和資本家幫助下，又爲了壓服波蘭和烏克蘭，爲了鎮壓波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爲了加強玷污我們大俄羅斯民族榮譽的羅曼諾夫，波布林斯基和普里什克維奇一流匪幫勢力，而把我們驅去作戰。一個人出身爲奴隸，並不算是他的罪過；但是，身爲奴隸，而又不但歧視自求解放的思想，反而爲自己的奴隸地位辯護掩飾（例如，把壓迫波蘭，烏克蘭等等的勾當，稱爲『保衛』大俄羅斯人底『祖國』）的這樣一種奴隸，却就是理應受到忿恨，鄙視和憎惡的下賤東西了。

『壓迫他族人民的人民，是不能自由的』，——十九世紀激底民主派底偉大代表，革命無產階級底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說過。所以我們滿懷着民族自傲心的大俄羅斯工人，渴望大俄羅斯無論如何要成爲一個自由獨立，民主共和的光榮國家，按人類平等原則，而不是按降低偉大民族價值的農奴制特權原則對待隣邦的國家。正因為我們希望有這樣的大俄羅斯，所以我們才說，在二十世紀，在歐洲一帶（即令是在歐洲極東部），『保衛祖國』的唯一辦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對自己祖國中的專制制度，地主和資本家，即我國最壞敵人；大俄羅斯人『保衛祖國』的唯一辦法，就是力謀使沙皇制度在一切戰爭中敗北，——這是使十分之九的大俄羅斯居民受禍最少的辦法，因為沙皇制度不只在政治上經濟上壓迫這十分之九的人民，並且還使他們墮落，喪失人格，喪失廉恥，喪失節操，教他們壓迫別族人民，教他們用一些彷彿是愛國的偽善言詞來掩飾自己的可恥行爲。

也許有人會反駁我們說：除沙皇制度外，已有另一個歷史力量在它羽翼下誕生並強固起來，即大俄羅斯的資本主義，它幹着進步的事情，在經濟上把各巨大區域集中和團結起來。但是這種反駁並不能辯護我國應稱爲皇朝普里什克維奇御用社會黨人（如馬克思稱

拉薩爾派爲普魯士王朝御用社會黨人那樣)的沙文主義社會黨人，而只會使他們的罪惡更加彰著。就假定歷史對於問題的解決是有利於大俄羅斯的大國資本主義，而不利於一百多個細小民族吧。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爲資本底全部歷史都是一部橫施壓迫掠奪，充滿血腥污濁的歷史。而我們並不是定要主張各個小民族彼此分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我們無條件地主張集中制，反對市儈式的聯邦理想。然而，即令是在這種情況下，第一，幫助羅曼諾夫一波布林斯基一普里什克維奇壓服烏克蘭等等，也不是我們所應作的事情，也不是民主主義者（更不用說社會主義者了）所應作的事情。俾斯麥也用相當方式，用普魯士地主的方式作了歷史上進步的事業，但是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根據這點而企圖證明社會主義者應當幫助俾斯麥，那他就會是個很漂亮的「馬克思主義者」了！俾斯麥所以促進了經濟發展，是因爲他把當時受其他民族壓迫的分散的德意志民族統一起來了。而大俄羅斯經濟繁榮和迅速發展的利益，却要我國擺脫大俄羅斯人壓迫其他民族的政策。這種區別是我國崇拜俄羅斯土產「俾斯麥」的人常常忘記的。

第二，假如歷史解決問題的結果是有利於大俄羅斯大國資本主義，那末由此所得出的結論，就是大俄羅斯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作用更加重大，因爲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共產主義革命底主要動力。爲使無產階級革命獲得勝利，就必須用最完全的民族平等友愛精神來長期教育工人。因此，正是從大俄羅斯無產階級底利益方面來看，必須長期教育羣衆，使他們用最堅決，澈底，大胆，革命的態度主張一切被大俄羅斯人壓迫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權和自決權。大俄羅斯人民族自傲精神（不是奴僕心目中的那種自傲精神）利益與大俄羅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無產者底社會主義利益相合。我們始終都要效法馬克思，他在英國住過幾十年，有一半已成爲英國人

了，但他當時爲英國工人底社會主義運動利益着想，還是要求保證愛爾蘭獲得自由與民族獨立。

我國土產的社會沙文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及其他等人，在我們所假定的第二種情況下，却不僅會成爲叛變祖國，叛變大俄羅斯自由民主事業的罪人，而且會成爲叛變俄國各族人民底無產階級親密合作事業，即叛變社會主義事業的罪人。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刊載於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三十五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八四至八八頁。

論歐洲聯邦口號

我們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四十期上曾通知說，我們黨的國外支部代表會議決定把『歐洲聯邦』口號問題暫時保留，等到在刊物上討論這個問題底經濟方面時再講。

我們的代表會議對於本問題的討論帶有片面政治的性質。這也許有幾分是因為在中央宣言上把這個口號直接提作政治的口號（宣言上說：『最近政治口號…』），而且那裏不但是主張共和制的歐洲聯邦，同時還特別着重指出，『若不用革命手段推翻德奧俄三國君主制度』，則這個口號便會是毫無意思和虛偽的。

在對這個口號作政治估計的範圍內來反對這樣的問題提法，譬如說，以為這個口號能蒙蔽或削弱社會主義革命口號等等，那是完全不對的。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造，尤其是政治革命，無論何時，無論在何種情形與何種條件下，都是不能蒙蔽或削弱社會主義革命口號的。恰巧相反，它們總是促進社會主義革命，替它開展基礎，吸引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羣衆中的新階層來參加社會主義鬥爭。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會主義革命底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決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一舉而成的事業，而要把它看作包括有許多政治上經濟上的大震動，極緊張的階級鬥爭，國內戰爭，革命及反革命的整個時代。

固然，以用革命手段推翻歐洲三個最反動君主制度（特別是俄國君主制度）為條件，把共和制的歐洲聯邦這一口號提作政治口號，

是完全無可非難的，但是還剩下有一個關於這口號底經濟內容與意義的最重要的問題。從帝國主義底經濟條件方面看來，即是由那些佔有殖民地的『先進』『文明』強國輸出資本和瓜分世界的事實方面看來，歐洲聯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是無法實現，便是反動的。

資本已成為國際的和壟斷性的了。世界已被極少數的強大國家，即是在大規模搶掠和壓迫其他民族的事業中獲得成功的強國所瓜分了。歐洲四大強國，即英法俄德四國，共有二萬五千萬至三萬萬的人口以及約近七百萬平方公里的面積，而它們所佔領的殖民地却有約近五萬萬（四萬九千四百五十萬）的人口和六千四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即是差不多佔全地球面積之一半（全地球面積除兩極區域外，共有一萬三千三百萬平方公里）。此外還有亞洲三個國家，即中國，土耳其，波斯，現在被日俄英法這四個進行所謂『解放』戰爭的強盜弄得四分五裂。可以叫做半殖民地的（其實現在十分之九已成了殖民地的）這三個亞洲國家，共有人口三萬六千萬，面積一千四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即差不多等於全歐洲面積一倍半）。

再則，英法德三國在國外的投資不下七百萬萬盧布。爲要從這筆令人快意的款項上得到『正當的』收入，每年三十萬萬盧布以上的收入，就有巨萬富翁們底全國委員會，即所謂政府爲之服務，這些政府掌握有海陸軍隊，而把『巨萬富翁』底子弟『安置』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充當什麼總督，領事，大使，各種官員，牧師以及諸如此類的吸血蟲。

在資本主義最高發展的時代，少數巨大強國搶掠地球上將近十萬萬人口的事情，就是這樣組織起來的。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根本就不能有另一樣的組織。放棄殖民地，放棄『勢力範圍』，放棄輸出資本麼？誰這樣想，誰就是墮落到傳教師的地步，他每逢星期日都向富翁宣講基督教寬大爲懷，勸他們施濟貧民…當然不是拿出幾十萬萬盧布，而是每年拿出幾百盧布就行了。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成立歐洲聯邦，就等於成立瓜分殖民地的協定。可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實力之外，便不能有別一種實行瓜分的基礎和原則。這些巨萬富翁無論與其他什麼人瓜分資本主義國家底『國民收入』時，除了『按資本標準』以外，是不能有其他什麼標準的（而且還要附加一點：務使巨大的資本得到比它所應得的更多）。資本主義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無政府性的生產。在這種基礎上鼓吹『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魯東主義，便是市儈和庸俗人底痴想。瓜分是只能『按實力標準』來實行的。而實力又是隨着經濟發展進程而變動的。一八七一年以後，德國的加強，要比英法兩國快三四倍；日本要比俄國快十來倍。要測驗資本主義國家底真正實力，除了戰爭之外，便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什麼別的辦法。戰爭並不與私有制基礎相抵觸，而是這些基礎底直接和必然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經濟單位和各個國家在經濟上的平衡發展是不可能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工業中的危機和政治中的戰爭而外，便不能有別的什麼辦法來恢復常被破壞的均勢。

當然，各個資本家間與各個強國間的暫時妥協是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講來，建立歐洲聯邦，作為歐洲資本家相互間的妥協也是可能的… 關於什麼問題的妥協呢？不過是關於怎樣共同鎮壓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共同保衛所搶得的殖民地，反對日本和美國，因為這兩個國家在現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極端受屈的，而它們的勢力在最近五十年來加快的速度又要比那因年老而開始腐朽起來的落後的，君主制的歐洲快得無可測量。整個歐洲，與美國比較起來，可說是在經濟上停滯着。在現今的經濟基礎上，即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歐洲聯邦，就會是組織反動勢力去阻礙美國更迅速的發展。民主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只是與歐洲相連的那種時期，已經是一去不返了。

世界聯邦（而不是歐洲聯邦）就是我們認為是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聯合和自由發展的國家形式，直到共產主義底完全勝利使

一切國家，以至民主制的國家都完全消滅的時候為止。但是，把世界聯邦口號作為獨立口號，是未必正確的，因為第一，它與社會主義混合起來了；第二，它能產生一種認為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不正確的見解，以及對於這個獲得勝利的國家與其餘各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上的不正確的見解。

經濟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且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無產階級在其中推翻資產階級而獲得了勝利的那個社會底政治形式將是民主共和國，它日益集中這一民族或這些民族裏的無產階級力量去反對還沒有轉到社會主義方面來的國家。沒有無產階級這一被壓迫階級底專政，便不能消滅階級。若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所進行的較為長期的堅持鬥爭，便無法保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自由聯合起來。

正是由於這些理由，所以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代表會議上以及在會議以後再三討論了這個問題的結果，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便得出了結論，認為歐洲聯邦口號是不正確的。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刊載於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四十四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〇八至三一頁。

機會主義與第二國際底破產

一

第二國際真正不復存在了麼？它的最有威信的代表，如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頑強地否認這一點。除了交通斷絕之外，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一切都平安無事；——這就是他們的意見。

爲要揭明真象，我們且來看一看一九一二年巴塞爾代表大會底宣言，這個宣言正是指着這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而言，並且是由世界各國社會黨通過的。應當指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敢在理論上否認有對每次戰爭作具體歷史估計的必要。

現在，戰爭爆發了，無論公開的機會主義者，無論考茨基派，都不敢否認巴塞爾宣言，也不敢把這個宣言所提出的要求拿來與各社會主義黨在戰時的行爲對照。爲什麼？因爲這個宣言是把公開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派都揭露無餘的。

在宣言中沒有一個字講到保護祖國，也沒有講到進攻戰與防禦戰的區別，沒有一個字講到現在德國和四協約國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派*在衆目昭彰下向世界大吹大擂的那些東西。而且宣言根本也就不能講到這一類東西，因爲它所講的一切都是絕對不容許採用這種

*這裏所講的不是指考茨基在德國的那些信徒個人，而是指成爲國際上標本人物的假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動搖於機會主義和急進主義之間，實際上不過是替機會主義遮羞的掩蓋物而已。

概念的。在宣言上十分具體地指出了許多經濟上政治上的衝突，即是在幾十年內準備了這次戰爭，而在一九一二年間已完全顯露出來，以至引起了一九一四年戰爭的種種衝突。在宣言上提到俄奧兩國因爭奪『巴爾幹霸權』而起的衝突，提到英法德三國（所有這三國！）彼此因『在小亞細亞實行侵佔政策』而起的衝突，提到奧意兩國因在阿爾巴尼亞『爭取統治權』而起的衝突等等。宣言把所有這些衝突都確定為在『資本帝國主義』基地上發生的衝突。可見，宣言十分明顯地確認這次戰爭帶有侵佔的，帝國主義的，反動的和奴隸制度的性質，這種性質也就使保護祖國的思想在理論上成為沒有意思的，在實踐上成為荒謬的。鯨魚為吞食他人『祖國』而鬥爭着。宣言根據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作出了必然的結論：這次戰爭『絕對不能用什麼人民利益為藉口來作辯護』；它是『為了資本家底利潤，為了各國王朝底虛榮心』而準備起來的。如果工人『互相射擊起來』，那就是『犯罪』了。這就是宣言上所說的話。

資本帝國主義時代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而且到了凋謝腐朽的時代，此時資本主義已處在自己崩潰的前夜，已成熟到要讓位於社會主義的地步。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時代是進步的資本主義時代，當時擺在歷史日程上的問題，是推翻封建制度，推翻專制制度，擺脫外國奴役的問題。在這個基礎上，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可以『保護祖國』，即保護它免除壓迫。這一概念，現在也可以應用於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戰爭，可是若把這個概念應用於帝國主義列強彼此間的戰爭，應用於為了誰能更多掠奪巴爾幹各國和小亞細亞等等而進行的戰爭上來，那就是荒謬了。所以，那些認為在這次戰爭中應當『保護祖國』的『社會主義者』極力躲避巴塞爾宣言，猶如盜賊躲避他偷過東西的那個地方一樣，自然是毫不足怪的。因為宣言證明他們是社會沙文主義者，即口頭上是社會主義者，事實上是沙文

主義者，他們幫助『自家的』資產階級去掠奪別人的國家，奴役別的民族。『沙文主義』概念底主要內容，就是甚至當『自己』祖國動作的目標是要征服他人的祖國時，也主張保護『自己的』祖國。

把戰爭認作民族解放戰爭時所應得出的是一種策略，而把戰爭認作帝國主義戰爭時所應得出的，却是另一種策略。宣言所明顯指出的，正是這另一種策略。戰爭『將引起經濟和政治危機』，我們必須『利用』這種危機：不是爲了去緩和危機，不是爲了去保護祖國，而是相反，是爲了『振奮』羣衆，爲了『加速資本統治的崩潰』。歷史條件尙未成熟的事情是不能加速的。宣言認爲：社會革命是可能的，它的先決條件已經成熟，它會正是由於戰爭而到來的：『統治階級』害怕『無產階級革命』，——宣言援引巴黎公社和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例子，即援引羣衆罷工和國內戰爭的例子聲言。像考茨基那樣斷言說社會主義對這次戰爭的態度沒有闡明清楚，便是撒謊。這個問題在巴塞爾大會上不僅討論過，而且加以解決了，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革命無產階級羣衆鬥爭底策略。

完全避開巴塞爾宣言或避開其最重要的部分，而援引個別首領底言論或個別黨的決議，就是最可惡的作偽態度，因爲第一，這些言論和決議是在巴塞爾大會前發表的；第二，這些決議並不是由全世界各國黨共同通過的決議；第三，這是指各種可能的戰爭說的，但並不是指現今這次戰爭說的。問題實質是歐洲各大強國間的民族戰爭時代已由它們彼此間的帝國主義戰爭時代所代替，巴塞爾宣言也就只得初次正式承認了這件事實。

如果以爲巴塞爾宣言是一種空洞的告示，官場的言詞，輕浮的威嚇，那就錯誤了。宣言所揭露的那些人就是想這樣來提出問題的。但這是不對的。這個宣言無非是整個第二國際時代所作的廣大宣傳工作的結果，無非是社會主義者用各種語言向羣衆發表過的數十萬個演說，論文和宣言的總結。舉例說，宣言只是重複

了黑得在一八九九年所寫的言論，當時他抨擊了社會主義者參加內閣去應付戰爭的政策：他當時說過『資本主義海盜』所引起的戰爭（«En garde!», 第一七五頁）；宣言只是重複了考茨基一九〇九年在到政權之路一書中所寫的話，他在那裏承認『和平』時代已經完結，而戰爭與革命時代已經開始了。把巴塞爾宣言當作空話或錯誤，就無異認為近二十五年來的全部社會主義工作都是些空話或錯誤。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派所以極力反對人家指出通過宣言而不實行宣言這一矛盾的事實，就是因為這件事實揭穿第二國際工作中極深刻的矛盾。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時期較為『和平的』性質，養育了機會主義，開始是一種情緒，然後是一種傾向，結果已形成爲工人官僚和小資產階級同路人底集團或階層。這些份子之所以能夠操縱工人運動，只是因為他們口頭上承認革命目的和革命策略，他們之所以能夠奪得羣衆底信仰，只是因為他們賭咒發誓，說全部『和平』工作都不過是準備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而已。這一矛盾是定要破裂的一種膿包，而結果是果然破裂了。全部問題就在於究竟是要像考茨基及其伙伴們那樣，企圖把膿毒又趕進機體去，以求維持『統一』（與膿毒『統一』），還是爲了促進工人運動這一機體完全健康起見，必須趕快澈底剷除這個膿毒，而不管這番手續會引起暫時的強烈的痛楚。

投票贊成軍用預算，參加了內閣並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間辯護衛國思想的人們叛變社會主義，乃是很明顯的事實。只有僞君子才能否認這件事實。必須把這件事實說明一下。

二

若把全部問題都看成是個別人物問題，那就荒謬了。既然普列漢諾夫和黑得等等這樣的人物，也… 試問怎麼說得上機會主義呢？——考茨基這樣問道（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新時代）。既然考茨基這樣的人物，也… 試問怎麼說得上機會主義呢？——阿

克雪里羅得代表四協約國機會主義者回答說（社會民主黨人危機，一九一五年蘇黎支出版，第二一頁）。這都是滑稽劇。爲要說明全部運動底危機，就必須考查：第一，某種政策底經濟意義；第二，這種政策所倚據的思想；第三，這種政策與社會主義運動內各派歷史間的聯繫。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戰爭時期中護國主義政策底經濟實質何在呢？所有各大強國資產階級進行戰爭的目的，都是爲了瓜分和剝削世界，爲了壓迫各族人民。少數工人官僚，工人貴族和小資產階級同路人有分得一些資產階級巨量利潤殘屑的機會。社會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有共同的階級背景：少數享有特權的工人與『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工人階級羣衆，資產階級底奴僕與資產階級本身聯合起來反對受資產階級剝削的階級。

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有共同的政治內容：主張階級合作，拒絕無產階級專政，拒絕革命活動，無條件地承認資產階級法制，不相信無產階級，而相信資產階級。社會沙文主義是英國自由派工人政策，米勒蘭主義和伯恩施坦主義底直接繼續和完成。

工人運動中兩個基本趨向，即革命的社會黨人與機會主義的社會黨人彼此間的鬥爭，充滿着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的整個時代。現時在世界各國中，對於戰爭態度問題也存在有兩種不同的主要派別。我們現在不來講專以個別人物爲口實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機會主義的慣常說法。我們且拿幾個國家裏的派別來說。且拿十個歐洲國家，即德國、英國、俄國、意大利、荷蘭、瑞典、保加利亞、瑞士、比利時和法蘭西來看吧。在前八個國家內，機會主義派與革命派間的劃分，恰與社會沙文主義派和國際主義派間的劃分相當。在德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底據點是社會主義月刊和列金一流的人；在英國是費邊派和工黨（獨立工黨始終是與他們聯盟，擁護他們的機關報，並且在這個聯盟中始終都弱於社會沙文主義派，而國際主義

派在英國社會黨內却佔七分之三)；在俄國代表這一派的是我們的曙光(現在是我們的事業)，『組織委員會』以及齊赫芝所領導的杜馬黨團；在意大利代表這一派的是以比沙拉抵爲首的改良主義者；在荷蘭是土魯里斯特拉底黨；在瑞典是布蘭亭所領導的黨內多數；在保加利亞是『寬廣派』的黨；在瑞士是格雷里哈之流。在所有這些國家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中間都已經發出了頗爲激烈的反對社會沙文主義的抗議聲。只有兩個國家才是例外，這就是法國和比利時，這裏雖也有國際主義派存在，可是力量很弱。

社會沙文主義是已經完成的機會主義。它已成熟到與本國資產階級和總參謀部實行公開聯盟，往往是卑鄙聯盟的地步。這種聯盟也就使社會沙文主義派擁有巨大的力量，擁有獨佔合法刊物欺騙羣衆的壟斷權。至今還把機會主義看作黨內現象，是很荒謬的。打算同達維德和列金，漢德曼，普列漢諾夫，維伯等人一起執行巴塞爾決議，是很荒謬的想法。同社會沙文主義者保持統一，就是同剝削別族人民的『自己』民族資產階級保持統一，就是使國際主義無產階級分裂。這當然不是說，同機會主義者決裂已是到處都可立刻辦到的事情，而只是說這種決裂在歷史上已經成熟起來，它是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必不可避免，已由『和平』資本主義轉變成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歷史所準備好了的事情。
*Volentem ducunt fata, nolentem trahunt**。

三

資產階級底聰明代表明白懂得了這一點。因此他們極力誇獎現今以『保護祖國者』，即保護帝國主義掠奪政策者爲首的社會黨。因此各國政府也就賞賜給社會沙文主義首領們閣員位置(在法英兩

*願從者天引之，不願從者天強之。——譯者。

國)，或合法自由存在的壟斷權（在德俄兩國）。因此在德國，在社會民主黨最強大，而且變成民族主義自由派反革命工黨的事實最爲明顯的德國，檢察廳竟把社會民主黨內『少數』與『多數』的鬥爭當作『階級仇恨激發』的表現！因此，聰明的機會主義者也就極力設法保持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間已對資產階級盡過莫大義務的那些舊黨原先『統一』的局面。一九一五年四月，有一個德國社會民主黨員在反動的普魯士年鑑雜誌上用『莫尼托爾』筆名發表了一篇論文，以值得感謝的坦白精神表明了世界各國聰明機會主義者底觀點。莫尼托爾認爲，如果社會民主黨更向右走，那對於資產階級是很危險的：『它應當保存帶有社會主義理想的工人黨底性質，因爲它一旦放棄這點時，馬上就會有一個新黨出現來接受原先舊黨所背棄的綱領，並把這個綱領表述得更爲急進』（普魯士年鑑雜誌一九一五年第四期，第五〇至五一頁）。

莫尼托爾真是說得中肯。英國自由黨人和法國急進黨人向來都恰巧是想要用響亮的革命詞句來欺騙羣衆，使他們相信路易、喬治、桑巴，倫諾德爾，列金和考茨基之流，相信這些居然在掠奪戰爭中鼓吹『保護祖國』的人。

但是，莫尼托爾不過是代表着一種露骨的，粗魯的，厚顏不慚的機會主義。其他機會主義者底動作是暗藏的，精巧的，『誠實的』。恩格斯說過：『誠實的』機會主義者對於工人階級是最危險的… 舉個例子來看吧：

考茨基在新時代雜誌上（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寫道：『反對多數的情緒正在增長；羣衆懷有反對心理』。『在戰爭以後（只是在戰爭以後麼？——尼、列），階級矛盾定會非常尖銳化起來而使急進主義能在羣衆中佔得上風的』。『在戰爭以後（只是在戰爭以後麼？——尼、列），急進派份子勢必紛紛退出我們黨，而加入到從事反國會的（??應當說：國會以外的）羣衆活動的黨中去』。

『於是，我們的黨就會分裂成兩個彼此毫不相干而極端相反的營壘』。考茨基爲挽救統一起見，極力勸告國會中的多數，要他們允許少數份子在國會裏發表一些急進演說。這就是說，考茨基想利用在國會內發表的一些急進演說，使革命羣衆與機會主義者調和起來，而這些機會主義者是與革命『毫不相干的』，他們早就領導着工會，現在他們又依靠着同資產階級及政府的密切聯盟而獲得了黨內的領導權。其實這與莫尼托爾底『綱領』有什麼差別呢？除了一些糟踏馬克思主義的甜蜜詞句而外，再沒有什麼別的差別。

考茨基份子烏爾木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八日的國會黨團會議上『預告』黨團不要『把琴弦拉得太緊；工人羣衆反對黨團多數的情緒正在增長；必須保持馬克思主義的』（?!大概是印錯了：應讀作『莫尼托爾主義的』）『中派』立場（見„Klassenkampf gegen den Krieg! Material zum „Fall Liebknecht““，一書*，第六七頁）。可見，尙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就有人代表全體考茨基派（即所謂『中派』）承認了羣衆懷有革命情緒的事實!!過了八個半月後，考茨基又發言主張『調解』那些想和反革命機會主義黨鬥爭的羣衆，而且是利用一些響亮革命詞句來作的!!

△ 戰爭之所以往往有益，正因爲它揭破膿包，排除虛文套語。

我們且拿英國的費邊派與德國的考茨基派來比較一下。請看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在一八九三年一月十八日論及費邊派時所寫的一段話吧…『這一夥野心家有充分的判斷力，懂得社會革命必不可免，但無論如何都不願把這番巨大工作交給不成熟的無產階級單獨去作…他們的基本原則就是在革命面前發抖』…（與左爾格通信集，第三九〇頁）。

*「用階級鬥爭反對戰爭！關於李卜克內西案的材料」。非賣品版本。——譯者。

而在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又寫道：『這些妄自尊大的資產者，裝起對無產階級大發慈悲的樣子，說要從上面來解放它，只是要它願意明白，它這樣無知無識的羣衆不能解放自己，若沒有這班聰明律師，著作家和善心老太婆大發慈悲，便什麼也不能達到』…（同上，第四〇一頁）。

在理論上，考茨基用一種鄙視態度看待費邊派，好似慈善君子看待窮光蛋一般。因為他是賭咒發誓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呵。但他們在實踐上有何區別呢？兩者都在巴塞爾宣言上簽了名，並且兩者對待這個宣言都像威廉第二對待比利時中立一樣。而馬克思却終身斥責了力圖撲滅工人革命精神的人。

考茨基拿所謂『超帝國主義』的新理論來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立。他的所謂『超帝國主義』是說『各國財政資本間的鬥爭』將被排除，而由『國際財政資本共同剝削世界的制度』所替代（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但他同時又補充道：『我們還沒有充分的根據來斷定這個新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能否實現』。可見，這個『新階段』底發明家單只以對於這個『新階段』的假定為根據，甚至不敢直接聲明它能『實現』，而就在現時，在危機已經開始，戰爭已經開始，階級矛盾空前尖銳化的『階段』上，推翻自己的革命聲明，推翻無產階級底革命任務和革命策略！難道這不是最可惡的費邊主義立場麼？

俄國的考茨基派底首領阿克雪里羅得認為『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國際化問題底重心是日常實際工作國際化』：例如『勞動保護法和保險法，應當成爲工人國際活動和組織工作底對象』（見阿克雪里羅得所著社會民主黨底危機一書，一九一五年蘇黎支版，第三九至四〇頁）。很明顯的，不但列金，達維德，維伯，就是路易、喬治本人，納烏曼，白里安和米留可夫，也會完全贊成這種『國際主義』。也如在一九一二年那樣，阿克雪里羅得談到很遠很遠將來

的時候，談到將來國際『實行發動（在戰爭一旦發生時反對政府）和掀起革命風暴』的時候，是甘願發表最革命言論的。你看我們是何等勇敢的人呵！但是，一談到現在要幫助並擴展已經開始的羣衆革命醞釀時，阿克雪里羅得便回答道，『如果我們是直接處於社會革命前夜，例如像俄國一九〇一年學生示威運動預示反『專制制度』的決戰快到的情形那樣』，那末這種革命羣衆發動的策略『也許還有某些根據』。但在現時，這全是『空想』，是『巴枯寧主義』等等，——真是與科爾布，達維德，秋得庫本和列金等人同一鼻孔出氣的說法。

可愛的阿克雪里羅得忘記了一點，就是一九〇一年的時候，在俄國誰也不知道，並且也不能知道，第一次『決戰』會在四年以後——不要忘記是在四年以後——來到，並且會是『沒有解決的』。當時畢竟只有我們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作得正確：我們譏笑了號召立刻舉行衝擊的克里切夫斯基和馬爾丁諾夫一流的人。我們只是勸工人們到處驅逐機會主義者，盡力援助，加劇，擴大示威遊行及其他各種羣衆革命發動。歐洲現時狀況也完全與此相似：如果號召『立刻』舉行衝擊，那就荒謬了。但是，一個以社會民主黨人自命的人，竟不勸工人們同機會主義者破裂，竟不盡力來鞏固、加深、擴大和加劇已在開始的革命運動和示威遊行，却就未免可恥了。任何時候也不會有從天上落下現成革命來的事情，所以在革命醞釀開始時，誰也不知道它是否會達到並在什麼時候會達到『真正的』『十足的』革命。考茨基和阿克雪里羅得所貢獻給工人的，是一種陳腐腐朽不堪的反革命意見。考茨基和阿克雪里羅得叫羣衆期待將來國際定會是個革命的國際，而只求現在能保持，掩護並粉飾列金，達維德，王德威爾得，漢德曼一流反革命份子底統治。與列金一流人保持『統一』是準備『將來』革命國際的最好辦法，這難道還不明顯麼？

德國機會主義者底首領達維德回答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發表的宣言時，硬說『力求把世界戰爭變為國內戰爭，就會是發瘋發狂』（見社會民主黨與世界大戰一書——„Die Sozialdemokratie und der Weltkrieg“，一九一五年版，第一七二頁）。這個宣言上所說的有如下一段話：

『戰爭既已成了事實，那就不管這一轉變在某個時候會遇到何等巨大的困難，但社會主義者總不會拒絕為此目的而堅忍不拔地進行有系統的準備工作』*。

（達維德也引證了這一段，見他那本書第一七一頁）。在達維德那本書出現前一個月，我們的黨發表了幾個決議，其中把『有系統的準備』解釋如下：（一）反對軍用預算，（二）打破國內和平；（三）成立祕密組織；（四）贊助戰壕士兵聯歡表示；（五）援助一切革命羣衆發動。

達維德幾乎也像阿克雪里羅得那樣勇敢：他在一九一二年的時候，並沒有認為在戰爭發生時援引巴黎公社是『發瘋發狂』。

普列漢諾夫是協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底標本代表人物，他對於革命策略的評論，也如達維德所作的一樣，把這個策略稱為『愚蠢的夢想』。請聽露骨的機會主義者科爾布發表的言論吧。他寫道：『實行李卜克內西周圍那些人底策略，就會使德國民族內部的鬥爭達到沸點』（見徘徊歧路的社會民主黨一書——„Die Sozialdemokratie am Scheidewege“，第五〇頁）。

而達到沸點的鬥爭又是什麼呢，豈不是國內戰爭麼？

我們中央底策略，大體上是與齊美爾瓦爾得左派底策略相合，如果這個策略真如達維德，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考茨基等人所說那樣是『發瘋發狂』，『空想』，『冒險』，『巴枯寧主

*見本卷第八九五頁。——譯者。

義』等等，就會永遠也不能引起『民族內部的鬥爭』，更不必談達到沸點的鬥爭。無政府主義的空話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引起過民族內部的鬥爭。而事實却表明，正是在一九一五年，由於戰爭引起了危機的關係，各國羣衆中的革命醞釀增長起來了：在俄國有罷工和政治示威運動，在意大利和英國有罷工運動，在德國有飢民遊行和政治示威。難道這不是革命羣衆發動已經開始的表現麼？

援助，發展，擴大，加劇羣衆革命行動，成立祕密組織，沒有這種祕密組織，甚至在『自由』國家內也無法向民衆說出真情，——社會民主黨在這次戰爭中的全部實際策略就是如此。其他一切，不管是用什麼機會主義或和平主義的理論來粉飾，都是些謊語或空話。

當人們向我們說這個『俄國策略』（達維德底說法）不適合於歐洲的時候，我們總是援引事實來回答。十月三十日，在柏林城內，柏林婦女同志代表團來到黨主席團上聲稱道，『現在，我們已有巨大的組織機關，要散佈祕密小冊子和宣言，要舉行『未經准許的會議』，已是比在反社會黨人法令施行時期容易得多了』。『辦法和途徑很多，只是顯然沒有熱心去幹』（見伯恩哨兵報一九一五年，第二七一期）。

難道是俄國『邪教徒』等等使這些不良的同志離開正路的麼？難道代表真正羣衆的不是這些同志，而是列金和考茨基麼？是於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作報告時大罵過成立祕密組織的『無政府主

*我黨中央底女代表們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伯恩國際婦女代表大會上，指出絕對必須成立祕密組織。這個提議被否決了。英國的女代表們譏笑這個提議，而讚美英國的『自由』。但是，過了幾月以後，我們却收到了一些有空白的英文報，例如“Labour Leader”，後來又收到了一些關於警察搜查，沒收小冊子，逮捕以及對那些在英國談論和平，且只是談論和平的同志們判處苛刑的消息！

義』思想的那個列金麼；是成了極端反革命者，竟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即在柏林舉行一萬人遊行示威的四天以前，還說街上示威是『冒險』行動的那個考茨基麼！！

空話已經聽够了，像考茨基之流那樣糟踏『馬克思主義』的事情已經看够了！有了第二國際存在二十五年的歷史之後，有了巴塞爾宣言之後，工人們再不會相信空話了。機會主義已是瓜熟蒂落而最終轉到資產階級營壘中去，變為社會沙文主義了：它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都已與社會民主黨決裂了。它在組織上也是會與社會民主黨決裂的。工人已在要求發行『不受檢查的』刊物和舉行『未經准許的』會議，即要求成立不合法組織來幫助羣衆革命運動。只有這樣『以戰爭反對戰爭』，才是社會民主黨的行動，而不是一句空話。這種行動，不管有怎樣的困難，不管有什麼暫時的失敗，錯誤，迷誤和間斷，而終究是會把人類引到勝利無產階級革命的。

一九一六年一月用德文刊載於預言者
雜誌第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
第九六至一〇八頁。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

(通俗的論述)

序 言

這本小冊子，是我於一九一六年春季在蘇黎支寫成。在那裏的工作條件下，我當然時常感到了相當缺乏英法文參考書，尤其是十分缺乏俄文參考書的痛苦。但我對於霍柏森所著論帝國主義的一部主要英文著作，却是以我認為該書確實值得的那種注意來利用了的。

我寫這本小冊子的時候，是預計到不免要經過沙皇政府底檢查。因此，我不僅必須極嚴格地局限於純粹理論上的——尤其是經濟上的——分析，並且我在敘述我對於政治問題所必須作的幾點意見時，都不得不用極其謹慎的口吻，用暗示的方法，用伊索寓言式的文字，用沙皇制度迫使一切革命者在執筆寫『合法』作品時所不得不採用的這種可惡的伊索寓言式的文字來說明。

在目前自由時期，閱讀小冊子裏那些因顧慮到沙皇政府檢查而不得不說得含糊，緊縮，被壓得不能舒展的頁子，真是很覺難堪了。當時，關於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社會沙文主義（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沙文主義）完全叛變社會主義，完全投奔到資產階級方面去，工人運動底這種分裂是與帝國主義客觀條件有關等等問題，我都不得不用一種『恭順』口氣去說，所以現在我只好請注意這種問題的讀者去看我那部快要再版的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

年國外論文集。此處要特別指出第一一九至一二〇頁上*的一段文字：在那裏爲了要用能受檢查的口吻向讀者說明資本家以及轉到他們方面去了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考茨基與他們鬥爭是作得很不徹底的）在兼併問題上怎樣無恥地撒謊，怎樣無恥地掩飾本國資本家底兼併政策，我曾不得不舉…日本做例！細心的讀者，當然不難用俄國代替日本，用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基發、布哈拉、愛斯特蘭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居住區域來代替高麗。

我希望我這本小冊子能幫助讀者去理解除非加以研究便絲毫不能瞭解現代戰爭和現代政治的那個基本經濟問題，即帝國主義底經濟實質問題。

作者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序於彼得格勒。

*見本卷第一〇二七頁。——譯者。

法文版與德文版序言

一

我在俄文版序言中已經說過，本書是在一九一六年間預計到要受沙皇政府檢查所寫成的。現在，我沒有可能來將全部原文改造一番；而且這樣來改造，也許是不適宜的，因為本書底基本任務，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要根據不容置辯的資產階級統計方面的綜合材料和各國資產階級學者所承認的事實，來說明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二十世紀初期，在第一次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前夜的國際相互關係的總結情景。

而且，把本書原文保存不加改造，這對於先進各國許多共產黨員甚至是頗有益處的，因為他們看了這本被沙皇政府檢查局認為合法的書籍，就會知道，例如在現今美國或法國，雖然不久以前，幾乎全體共產黨員都被逮捕，但他們還是可以——並且必須——利用那一點點還留給共產黨員的公開活動機會，來揭破社會和平主義者所持觀點和『世界民主』幻想底絕頂虛偽性。至於我想在本序言中說到的，便是對於這本受過檢查的書所作的一些最必要的補充了。

二

在本書中已經證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從交戰的雙方說來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即侵略的，劫掠的，強盜式的戰爭），是為瓜分世界，分割與重分殖民地及財政資本『勢力範圍』等等而進行的戰爭。

須知，能證明戰爭底真實社會本質，或正確點說，真實階級本質的，自然不是戰爭底外交歷史，而是對於一切交戰國裏統治階級所處客觀地位的分析。爲要說明這種客觀地位，我們就不應引用單個例子與單個材料（在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的情形下，隨時都可以找得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單個事實來證實任何一種意見的），而是一定要引用所有關於一切交戰國和全世界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的總和。

我在一八七六與一九一四年世界分割情形比較表（第六章）及一八九〇與一九一三年全世界鐵路分割情形比較表（第七章）中所引用的，正是這樣一種無可否認的綜合材料。鐵路情形是資本主義工業中最主要部門，即煤鐵工業底總結，是世界貿易發展與資產階級民主文明底總結和最顯著的指標。在本書最初幾章內已經指明了鐵路與大生產，壟斷組織，新迪加，卡德爾，托拉斯，銀行，財政寡頭制等有密切的聯繫。鐵路網的分配，這種分配的不平衡，鐵路發展上的不平衡性，便是全世界範圍內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底總結。而這種總結也就指明，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尚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建築鐵路，看來似乎是一種簡單的，自然而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事業：因粉飾資本主義奴隸制而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大學教授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庸人，就是如此看待這件事情的。而在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密網，却千絲萬緒地把這種事業與一般生產資料私有制聯繫起來，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爲用來壓迫依賴國裏十萬萬民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共佔世界人口半數以上）和壓迫『文明』國裏資本僱傭奴隸的工具。

以小有產者勞動爲基礎的私有制，自由競爭，民主，——所有這些原由資本家及其報紙用來欺騙工農羣衆的口號，都早已成爲過去的了。資本主義已變成極少數『先進』國用殖民政策壓迫，用財政

資本扼制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雄震全球而全身武裝的惡獸（美英日），它們把全世界都捲入它們自己爲瓜分自己贓物而進行的戰爭。

三

君主制的德國所強迫簽訂的布列斯特和約，以及後來『民主』共和制的美法與『自由主義』的英國所強迫簽訂的那個更加殘忍卑鄙的凡爾賽和約，替人類盡了一種極有益處的義務：這兩個和約，把那些受帝國主義僱傭的刀筆苦力以及那些雖然自稱爲和平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而却讚美過『威爾遜主義』，硬說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可能達到和平與改良的反動市儈，都盡行揭穿了。

因英德兩方財政資本強盜爭奪贓物而發生的戰爭使幾千萬人死亡殘廢的事實，以及後來簽訂的這兩個『和平條約』，都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喚醒數千百萬被資產階級所壓迫，所蹂躪，所欺騙，所愚弄的民衆。於是，在大戰所造成的全世界破壞狀態基礎上，便發展着全世界的革命危機，這個危機不管它會經過怎樣長久嚴重的周折，但結果總是會使無產階級革命爆發並獲得勝利的。

第二國際巴塞爾宣言在一九一二年所估計的戰爭，正是一九一四年所爆發的戰爭，而絕對不是什麼一般戰爭（因爲有各種各樣的戰爭，並且還有革命的戰爭），——這個宣言已經成爲揭露第二國際英雄們底全部可恥破產及其一切叛變行爲的紀念碑了。

因此，我現在把這篇宣言轉載於本版附錄中¹⁶⁶，並再三請讀者注意：在宣言內有許多地方明白確切而直接地說到當前這次大戰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聯繫，而第二國際英雄們總是極力躲避這些地方，正好似盜賊躲避他偷過東西的那個地方一樣。

四

本書特別注意到批評『考茨基主義』這一國際上的思潮，它在世界各國的代表人物，是第二國際底『最著名理論家』與領袖（在奧國有鮑威爾及其同流，在英國有麥克唐納爾等等，在法國有湯姆等等，等等），以及許多社會黨人，改良主義者，和平主義者，資產階級民主派份子和傳教師。

這個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國際解體腐化底結果，另一方面是全部生活環境都使其受資產階級偏見和民主偏見俘虜的那些小資產者所持思想底必然產物。

考茨基及其同流底這種觀點，正是表示他們完全離開了考茨基自己幾十年來擁護過，並且是他和社會黨內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米勒蘭，漢德曼，葛培爾茲等等）作鬥爭時特別擁護過的那些革命馬克思主義原理。因此，現時『考茨基主義者』在全世界上到處都與極端機會主義者（經過第二或黃色國際）及資產階級政府（經過有社會黨人參加的資產階級聯合政府）結成了實踐上政治上的聯盟，也就不是偶然的。

現時在全世界上發展着的一般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特別是共產主義運動，都不免要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義』底理論錯誤。其所以如此，尤其是因為和平主義與一般所謂『民主主義』，還非常厲害地流行於全世界，這些思潮雖毫不假冒馬克思主義的名目，可是它們完全和考茨基一流人一樣蒙蔽帝國主義矛盾底深刻性以及帝國主義所產生出來的那個革命危機底必然性。所以，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和這些思潮作鬥爭，而把那些受資產階級愚弄的小業主和千百萬多少處於小資產階級生活條件下的勞動者，從資產階級那裏奪取過來。

五

關於本書第八章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還要說幾句話。我在本書正文中已經指出：在這個問題上，過去是『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是考茨基底戰友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策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希法亭，比英國公開和平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霍柏森還退後了一步。現在，整個工人運動在國際範圍內發生的分裂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這兩個思潮彼此進行武裝鬥爭和國內戰爭的事實也同樣暴露出來了：在俄國有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幫助高爾察克與鄧尼金來反對布爾什維克；在德國有謝德曼派和諾斯克一流人協同資產階級來反對斯巴達克團¹⁶⁰；在芬蘭、波蘭以及匈牙利等國也是如此。這一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現象底經濟基礎何在呢？

就在資本主義最高歷史階段，即帝國主義所特有的寄生性與腐化。在本書內證明了，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分泌出了極少數（其人口少於全球人口總數十分之一，就是按照最『慷慨的』和誇大的計算，也少於五分之一）特別富強的國家，它們專靠『剪息票』來掠奪全世界。照戰前的價格與戰前資產階級的統計來說，每年從資本輸出上所獲得的收入計有八十萬萬以至一百萬萬之多。現在當然是更多得多了。

從這樣巨量的額外利潤（因為這是超出資本家從『自己』國內工人身上榨取的那種利潤額以外所獲得的利潤）中間，自然是可以拿出一部分來收買工人領袖和上層工人貴族。『先進』國裏的資本家，也就用這種額外利潤來實行收買他們，用數千百種方法，直接與間接的方法，公開與秘密的方法來實行收買他們。

這個已經資產者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按其生活方式，工資份量以及整個世界觀說來，是完全市儈化了的，——他

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底社會（不是軍事）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十足的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傳達者。在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中，他們有不少一部分的人，是必然要站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站到『凡爾賽派』方面去反對『公社社員』的。

不懂得這一現象底經濟根源，不估計到這一現象底政治與社會意義，便絲毫也不能解決共產主義運動和當前社會革命底實踐任務。

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底前夜。從一九一七年起，這一點已在全世界範圍內證實了。

尼、列寧 序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六日。

在最近十五年或二十年以來，尤其是西美戰爭（一八九八年）和英布戰爭（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之後，新舊兩大陸上的經濟刊物以及政治刊物裏，日益常見地運用『帝國主義』這一名詞來表明我們所處這個時代底特質。一九〇二年，在倫敦和紐約出版了英國經濟學家霍柏森所著的帝國主義一書。作者雖然站在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派與和平主義派觀點，即實質是和過去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現時所持立場一樣的觀點上，但他把帝國主義底基本經濟政治特點，作了一番很好很詳細的說明。一九一〇年，在維也納出版了奧國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所著財政資本一書（有俄譯本，一九一二年莫斯科版）。雖然作者在貨幣論問題上犯了錯誤，並且他有一些想把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調和起來的傾向，但這本書對『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最新階段』（希法亭這本書底附題就是如此標法的）作了一個極有價值的理論分析。其實，近年來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論述，特別是在許多專論這一問題報章雜誌論文中以及許多決議，例如一九一二年秋在赫姆尼茲和巴塞爾召集的兩次國際代表大會底決議裏，差不多都沒有超出這兩位作者所敘述的——或更正確些說——所總結的那些觀念底範圍…

我們往下就要用盡量通俗的文字來把帝國主義各個基本經濟特點相互間的聯繫和關係簡括說明一下。關於非經濟方面的問題，不論它怎樣重要，我們都無法說及。參考書目以及其他註釋，因為並不是所有一切讀者都對之感覺興趣，所以我們將其載在本書之末¹⁶⁷。

(一)生產集中與壟斷

資本主義最標本的特點之一，便是工業異常發展，生產集中於日益增大的企業的過程來得非常迅速。現代工業調查簿是說明這一過程的最完備最正確的材料。

例如德國，每千個工業企業中，僱傭工人五十個以上的大企業，在一八八二年有三個，在一八九五年有六個，在一九〇七年有九個。在上述各年間，這種企業所僱傭的工人數目，佔工人總數百分之二二，百分之三〇，百分之三七。但生產集中程度，比工人集中程度更要厲害得多，因為大企業中的勞動生產率要高得多。關於蒸汽機和電力發動機的材料，便可證明這一點。若拿德國所稱為廣義工業，即包括商業與交通機關在內的企業來說，我們便可得到如下的數目字。在三百二十六萬五千六百二十三個企業中，大企業有三萬零五百八十八個，即只佔總數百分之零點九。在一千四百四十萬個工人中，它們佔有五百七十萬個工人，即佔工人總數百分之三九點四；在八百八十萬蒸汽馬力中，它們佔有六百六十萬馬力，即佔總數百分之七五點三；在一百五十萬瓩電力中，它們佔有一百二十萬瓩，即佔總數百分之七七點二。

為數不滿百分之一的企業，佔有總數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與電力！而二百九十七萬個小企業（僱有五個工人以下的企業），即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九一的企業，却只佔有百分之七的汽力與電力！幾萬個巨大企業簡直擁有一切，數百萬個小企業幾乎一無所有。

德國在一九〇七年僱傭一千個工人以上的企業，有五百八十六個。它們所僱傭的工人幾佔總數十分之一（一百三十八萬），而所擁有的汽力與電力，幾佔總數三分之一（百分之三二）*。貨幣資

*按德意志帝國一九一一年年鑑（Annalen des deutschen Reichs, 1911, Zahn）所載材料得出的綜合數字。

本與銀行（我們在下文中還要講到這點），使這少數巨大企業底優勢更加強到真正壓倒一切的地步，就是說，數百萬小企業，中等企業，甚至一部分大企業的『主人』，事實上落到了完全受幾百個富豪財政大王奴役的地位。

在另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美國，生產集中的速度更加強大。美國統計材料特別提出狹義工業，並按全年產品價值份量把企業分成幾類。在一九〇四年，出產價值一百萬美金以上的大企業有一千九百個，佔企業總數（二十一萬六千一百八十個）百分之零點九；它們有一百四十萬個工人，佔工人總數（五百五十萬）百分之二五點六；它們有五十六萬萬美金的生產，即佔生產總額（一百四十八萬萬美金）百分之三八。經過五年之後，即在一九〇九年間，相當的數目字已如下述：三千零六十個大企業，即佔企業總數（二十六萬八千四百九十一個）百分之一點一的企業，共僱有二百萬工人，即佔工人總數（六百六十萬人）百分之三〇點五，並有九十萬萬美金的生產，即佔生產總額（二百零七萬萬美金）百分之四三點八*。

美國全體企業底全部生產，差不多有一半是握在僅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一的企業手裏！而這三千個巨型企業，包括有二百五十八個工業部門。由此可見，生產集中發展到相當程度時，便可以說是自然而然地走到壟斷。因為數十個巨型企業彼此易於成立協定，另一方面，正因為企業規模宏大，又使競爭受到阻難，而產生出壟斷傾向。在最新的資本主義大經濟中，這一競爭變為壟斷的現象，即使不是唯一最重要的現象，至少也是最重要的現象之一，所以我們必須把它詳細研究一下。但是我們首先應當排除一種可能的誤會。

在美國統計上寫着：在二百五十個工業部門中有三千個巨型企業。看起來，似乎是每個工業部門中只有十二個巨大企業。

*見美國一九一二年統計集錄（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第二〇二頁。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並不是每個工業部門都有巨大企業；另一方面，發展到最高階段的資本主義，有一個極重要的特點，這就是所謂聯合制，即是把各種工業部門聯合成爲一個企業，其中有些部門相繼製造同一原料（例如，由鐵礦鑄成生鐵，由生鐵煉成鋼，也許還用鋼造出各種製成品），而另一些部門又彼此執行輔助作用（例如，廢物或副產品的改製；包裹用品的生產等等）。

『聯合制碾平市場行市方面的差別，——希法亭說，——因而使聯合企業能有更穩定的利潤率。第二，聯合制排除交易。第三，它使聯合企業能實行技術上的改良，因而也就能比『單純』企業（即非聯合的企業）獲得多餘的利潤。第四，它使聯合企業地位比『單純』企業穩固得多，因而加強它在嚴重蕭條（業務停滯，危機）時期，即在製品跌價超過原料跌價時期的競爭力量』*。

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黑依曼寫了一部專論德國鋼鐵工業中『混合』（即聯合）企業的著作，他說：『單純企業，因原料價格高昂和製品價格低賤而滅亡下去』。結果就是：『一方面祇剩下幾個巨大煤業公司，每年產煤數百萬噸，共同緊密組織成爲一個煤業新迪加；其次，還有幾個巨型煉鋼廠連同它們的鋼業新迪加，也是與這些煤業公司緊密結合着。這些巨型企業每年出產四十萬噸鋼（每噸等於六十普特），採掘巨量的礦石和煤炭，生產大宗鋼製品，僱有一萬個住在工廠所建宿舍裏的工人，有時且擁有自己私有的鐵路和商港。這種巨型企業便是德國鋼鐵業底典型代表。而且生產集中過程還在繼續不斷地向前進展。個別企業愈變愈大；屬於同一工業部門或屬於各種工業部門的企業相繼結合爲巨型企業的數目日益增加，而五六個巨大柏林銀行，便成爲它們的靠山和指揮者。馬克思關於生產集中的學說，在德國礦業中確切證實了，不

*見財政資本，俄譯本，第二八六至二八七頁。

過，這是專指工業受到保護關稅與保護運率保障的那個國家而言。德國礦業已成熟到可被剝奪的地步了』*。

這便是一個例外的誠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不得不得出的結論。這裏必須指出，他好像是因德國工業受到高度保護關稅保障而把德國當作例外情形看待。但這種保護關稅，祇能把生產集中以及企業家壟斷公司，如卡德爾，新迪加等等形成的過程加速而已。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自由貿易的英國，生產集中也引到壟斷，不過發生得較晚一些，並且所採取的形式也許是有些不同。請看列維教授根據英國經濟發展材料寫成的一部專論『壟斷公司，卡德爾和托拉斯』的著作中所說的話：

『英國正因為企業規模巨大和技術程度很高而發生一種壟斷的趨向。一方面，由於生產集中的結果，必須在企業中耗費巨量的資本；因此，新的企業需要有數量日益增大的資本，所以它們也就很難出現。另一方面（我們認為這更重要），每個新企業，要想與生產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巨型企業並駕齊驅，就得出產為數極巨的過剩產品，只有在需求量非常增加時，才有可能使這些產品得到有利的銷售，否則這種產品過剩就會使價格跌到很低的程度，而使新工廠和各壟斷公司均感不利』。英國與那些用保護關稅促進卡德爾化的國家不同，這裏壟斷性的企業家同盟，如卡德爾與托拉斯等，大半祇是在互相競爭的主要企業數目減至『兩打左右』的時候，才會產生出來。『這裏，生產集中在大工業裏引起壟斷的事實，表現得十分明顯』**。

*見黑依曼所著德國大鋼鐵工業中的混合企業一書（Hans Gideon Heymann: „Die gemischten Werke im deutschen Großeisengewerbe“），一九〇四年斯多德牙爾版，第二五六頁和第二七八頁。

**見列維所著壟斷公司、卡德爾和托拉斯一書（Hermann Levy: „Monopole, Kartelle und Trusts“），一九〇九年耶拿版，第二八六，二九〇及二九八頁。

五十年前，當馬克思著資本論的時候，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以爲自由競爭是一種『自然法則』。官場的學者企圖用緘默抵制辦法埋沒馬克思底著作，因爲馬克思用他對資本主義所作的理論的和歷史的分析證明了：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過程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便會引起壟斷。現在，壟斷已成爲事實。經濟學家們在那裏著作大堆大堆書籍，來敘述壟斷現象底個別表現，而繼續齊聲宣告說，『馬克思主義已被推翻了』。但是，英國俗語說得好，『事實是頑強的東西』，無論你願意或不願意，總不能把它撇開不管。事實證明：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間的差別，例如保護關稅或自由貿易的差別，祇能使各國壟斷公司在形式上或發生時期上有微細的差異，但生產集中引起壟斷，則是資本主義現今發展階段上的一般基本法則。

對於歐洲說來，我們可以頗爲確切地判明新資本主義完全替代舊資本主義的時間：這就是二十世紀之初。在最近出版的一部論述『壟斷公司形成』史的總結著作中，我們看到如下幾段話：

『我們可以從一八六〇年以前時代舉出個別資本主義壟斷公司爲例；在這些實例中，可以發現出現今極爲常見的那種形式底萌芽；但這當然不過是卡德爾發達史前的現象。現代壟斷組織底真正開端，最早也不過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事。壟斷組織發展史中第一個重大時期，是開始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國際工業衰落的時候，一直延長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們按全歐範圍來考察問題，就知道十九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競爭發展底最高點。當時，英國完成了建築它那種舊式資本主義組織的工作。在德國，這種組織已與手工業和家庭工業進行着堅決的鬥爭，而開始造成它自己的生存形式』。

『大的轉變是開始於一八七三年的破產，或更正確些說，開始於破產後的蕭條時期；這次蕭條充滿了二十二年的歐洲經濟史，只是

在八十年代之初，稍有間斷，以及在一八八九年左右發生過異常猛烈，但也只是很短時期的高漲』。『在一八八九至一八九〇年間的短促高漲時期，企業家紛紛組織卡德爾來利用當時的行市。輕率的政策，把價格提高到比沒有卡德爾時更快更大的程度，結果使這些卡德爾差不多全體都不光榮地葬埋於『破產墳墓』中。此後又經過了五年的業務不振和價格低落時期，但此時在工業方面已是流行着另一種情緒了。一般人已不把蕭條視為一件當然的事情，而認為它不過是新的順利行情發生前的一種停頓』。

『於是卡德爾運動便進到了第二個時期。它已經不是暫時的現象，而成了全部經濟生活底一種基礎。它先後佔領各個工業部門，首先便是製造原料的部門。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卡德爾制度在焦煤新迪加——即後來煤業新迪加仿照它的模樣建立起來的那個焦煤新迪加——成立時，已達到了迄今沒有超過的完善程度。十九世紀末的巨大高漲和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發生的危機，至少是在礦業與鋼鐵業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德爾制度下相繼發生的。當時一般人還覺得這是一種新奇的現象，但現在大家都已認為經濟生活底各個重大部份通常不受自由競爭支配，是一種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總之，壟斷公司發達史可以分為如下幾個基本時期：（一）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競爭制發展中的最高的終極階段。當時壟斷公司還只顯露出不甚明顯的萌芽。（二）一八七三年危機之後，有了一個卡德爾廣泛發展的時期，但卡德爾當時還祇是一種例外，還沒有穩固起來，還是一種暫時的現象。（三）在十九世紀

*見福格爾施坦所著資本主義工業底財政組織和壟斷公司底形成一文 (Th. Vogelstein: „Die finanzielle Organisation der kapitalistischen Industrie und die Monopolbildungen“), 載於社會經濟底基礎叢刊 („Grundriß der Sozialökonomik“), 第六冊, 一九一四年杜平根版。參照同一作者所著英美兩國鐵業和紡織工業底組織形式一書 („Organisationsformen der Eisenindustrie und Textilindustrie in England und Amerika“), 第一卷, 一九一〇年, 萊比錫版。

末期的高漲和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的危機時，卡德爾已成了全部經濟生活底一種基礎。資本主義變成爲帝國主義了。

各個卡德爾彼此商定銷售條件，支付期限等等，互相分配銷售場，規定生產品數量，規定價格，把利潤分配於各個企業等等。

德國的卡德爾數目，在一八九六年約計二百五十個，在一九〇五年約計三百八十五個，其中約有一萬二千個企業參加*。但是大家都承認，這些數字是少於實際數目的。上面所引的一九〇七年德國工業統計材料說明，就是這一萬二千個巨大企業，大概也集合有全國半數以上的汽力和電力。美國托拉斯數目在一九〇〇年是一百八十五個，在一九〇七年是二百五十個。美國的統計，把一切企業分爲三類：屬於個人的，屬於商號的，屬於公司的。最後這一類，在一九〇四年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二三點六，在一九〇九年佔百分之二五點九，即四分之一以上。這些企業在一九〇四年所僱用的工人佔全數百分之七〇點六，在一九〇九年佔全數百分之七五點六，即佔全數四分之三；它們的生產量在一九〇四年值一百零九萬萬美金，在一九〇九年值一百六十三萬萬美金，即佔美國生產總量百分之七三點七和百分之七九。

一個工業部門底生產總量，常有十分之七八是集合於卡德爾和托拉斯手中的。『萊茵威斯特發里亞煤業新迪加』，在一八九三年成立時，已集中有全區產煤總額百分之八六點七，而在一九一〇年，則已達到百分之九五點四**。這樣造成的壟斷，保證獲得巨

*見黎舍爾博士所著德國巨大銀行及其因德國全部國民經濟發展而集中的情形一書(Dr. Riesser: „Die deutschen Großbanken und ihre Konzentration im Zusammenhange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Gesamt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第四版(一九一二年版), 第一四九頁; 李甫曼所著卡德爾與托拉斯以及國民經濟組織底繼續發展一書(R. Liefmann: „Kartelle und Trusts und die Weiterbildung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 第二版(一九一〇年版), 第二五頁。

**見克斯特卑爾博士所著強迫加入組織。卡德爾與局外企業鬥爭情形之研究一

額的收入，並造成規模極大的技術生產單位。美國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是於一九〇〇年成立的。『它的資本計有一萬五千萬美金。當時發行了一萬萬美金的普通股票和一萬零六百萬美金的優先股票。優先股票自一九〇〇年起，至一九〇七年止，每年獲得的紅利如下：百分之四八，百分之四八，百分之四五，百分之四四，百分之三六，百分之四〇，百分之四〇，百分之四〇，共計三萬六千七百萬美金。自一八八二至一九〇七年止，實得八萬八千九百萬美金的純利，其中有六萬零六百萬元分作紅利，而把其餘數目化爲準備資本』*。『鋼業托拉斯（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中所有的企業，在一九〇七年，僱傭了二十一萬零一百八十個工人和職員。德國礦業中最大的企業，即『該爾生基爾恆礦業公司』（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gesellschaft）在一九〇八年有四萬六千零四十八個工人和職員』**。美國鋼業托拉斯在一九〇二年就出產了九百萬噸鋼***。它所出產的鋼在一九〇一年佔美國產鋼總額百分之六六點三，在一九〇八年佔百分之五六點一****。它所採掘的礦砂，在一九〇一年佔百分之四三點九，在一九〇八年佔百分之四六點三。

書（Dr. Fritz Kestner: „Der Organisationszwa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Kämpfe zwischen Kartellen und Außenseitern“），一九一二年柏林版，第一一頁。

*見李甫曼所著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關於現代資本主義與有價證券作用的研究一書（R. Liefmann: „Beteiligungs- 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über den modernen Kapitalismus und das Effektenwesen“），第一版（一九〇九年耶拿版），第三一三頁。

**見前書第二一八頁。

***見契爾施基博士所著卡德爾與托拉斯一書（Dr. S. Tschierschky: „Kartell und Trust“），一九〇三年格丁根版，第一三頁。

****見福格爾施坦所著組織形式一書（Th. Vogelstein: „Organisationsformen“），第二七五頁。

美國政府委員會關於托拉斯情形的報告上說：『它們之所以優勝於它們的競爭者，是因為它們的企業規模巨大，技術優良。煙草托拉斯從創立時起，便竭力到處大批實行用機器來替代手工勞動。爲達到此目的，它用巨量款項收買了一切與製造煙草有多少關係的發明品專利權。有許多發明品，起初是不適用的，於是那些在該托拉斯中服務的工程師只得加以研究，加以改良。在一九〇六年末，托拉斯又設立了兩個附屬公司，其唯一目的就是收買發明品專利權。托拉斯爲了同一目的，又建設了自己的鑄鐵廠，機器廠和修理廠。其中一個企業，在布魯克林，平均有三百個工人，專事試驗製造紙煙，小雪茄，鼻煙，錫紙和煙盒等的發明品；同時又實行把各種發明品加以改善』*。『其他各托拉斯，也僱備有所謂 developing engineers（改進技術的工程師），專門從事於發明新的製造方法，試驗改良技術的手續。鋼業托拉斯用很高的獎金付給工程師或工人，報酬他們所作的那些能够提高技術或減少成本費的發明』**。

在德國大工業中，例如近數十年來發展極爲迅速的化學工業，也是這樣進行技術改良事業的。一九〇八年，生產集中過程已在這個工業中產生了兩個主要『集團』。這兩個『集團』也帶有相當的壟斷性質。起初，這兩個集團是由兩對巨大工廠組成的『二元聯盟』，各有資本二千萬至二千一百萬馬克；一方面是霍斯達城的舊『美斯特爾』工廠和美因河岸法蘭克福城的『加舍爾』工廠；另一方面是留威斯哈雲城的安尼林蘇打工廠和愛北斐特城的舊『貝

*煙草製造公司監督委員會委員報告書(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Corporations on the Tobacco Industry)，一九〇九年華盛頓版，第二六六頁，——引自塔費爾博士所著美國托拉斯及其對於技術進步的影響一書(Dr. Paul Tafel: „Die nordamerikanischen Trusts und ihre Wirkungen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Technik“)，一九一三年斯多德牙爾版，第四八頁。

**見前書，第四九頁。

爾』工廠。後來在一九〇五年間有一個集團與其他一個工廠訂立了條約，而在一九〇八年間另一個集團又與另一個工廠訂立了條約。結果便構成了兩個『三角聯盟』，各擁有資本四千萬至五千萬馬克，並且這兩個『聯盟』彼此又開始『接近』起來，『約定』價格等等了*。

競爭變為壟斷。結果就使生產社會化過程有長足的進步。技術發明與改良過程，也社會化起來了。

從前是各個廠主自由競爭，彼此分散，各不相謀，各自生產，以銷售於所不知道的市場，但現在的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了。生產集中程度很高，使人有可能大致計算本國，或如下面所說，幾個國家，以至全世界所有一切原料來源(例如鐵礦產地)。現在不僅有人已在進行這種計算，而且這些富源都由幾個巨型壟斷同盟獨佔起來了。這些同盟已在進行關於市場容量的大致計算，根據協定來互相『瓜分』這些市場。熟練的勞動力都被壟斷起來；最能幹的工程師都被僱去；交通的道路與工具，如美國的鐵路，歐美兩洲的輪船公司，都被奪去。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階段時，使生產達到最完備的社會化地步，它不管資本家底願望與意識如何，而把他們拖進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中去，即從完全自由競爭轉入完全社會化的過渡制度中去。

生產是社會化了，但是佔有制仍然是私人性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仍舊是少數人私有的財產。表面上大家公認的自由競爭底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少數壟斷者對其餘居民施行的壓迫，却比先前更要百倍苦重，百倍顯著，百倍難受了。

德國經濟學家克斯持涅爾著有專書論述『卡德爾與局外企業鬥爭』情形，所謂『局外企業』，是指未加入卡德爾的企業家而言。他把自己的這部著作標題為『強迫加入組織』，其實，為不要掩飾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第三版，第五四七及往下各頁。據報載消息(一九一六年六月)，不久前又成立了一個把德國化學工業統一起來巨型新托拉斯。

資本主義，就應標題為強迫服從壟斷者同盟。簡單看看壟斷者同盟爲了『組織』而進行現代的，最新的，文明的鬥爭時所採取的那些手段，都是很有益處的。這些手段就是：（一）剝奪原料（…『強迫加入卡德爾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二）用『聯盟』方法剝奪勞動力（即資本家與工會間訂立合同，使工會祇接受卡德爾化企業中的工作）；（三）剝奪運輸工具；（四）剝奪銷路；（五）與買主訂約，使他們祇與卡德爾發生貿易關係；（六）有系統地降低價格（以求破壞『局外企業』，即未屈服於壟斷者的企業；耗費數千百萬金錢，來保證在某一時期內，按低於成本費的價格出售商品：例如在汽油工業中，有自四十馬克跌至二十二馬克，即差不多跌落一半的事實！）；（七）剝奪信貸；（八）宣佈抵制。

現在已經不是大企業和小企業競爭，技術落後企業和技術先進企業競爭了。現在已經是壟斷者窒殺那些不屈服於壟斷，不屈服於壟斷者底壓迫及其意志的企業了。且看這種過程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意識中的反映吧。

『甚至在純粹經濟性的活動範圍內，——克斯特涅爾寫道，——也發生着相當的轉變，從先前那種商業活動轉變到組織者投機者活動方面去。獲得最大勝利的，並不是最會根據自己技術和商業經驗來判定購買者需要，找到並『發現』潛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能夠預先估計，或是預先嗅到組織上的發展，預先嗅到某些企業與銀行間有相當聯系的可能性的投機天才（?!）』…

譯成人類普通的語言，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很高程度，結果是商品生產雖還照舊『統治』一切，仍算是全部經濟底基礎，但實際上已被毀壞了，而大半利潤都歸那些慣幹財政勾當的『天才』所獲得了。這種勾當和詭詐行爲底基礎便是生產社會化，但達到了此種社會化的人類所造成的巨大進步，却造福於… 投機者。下面我

們會看到，那些對資本帝國主義作市儈式反動批評的人，『根據這點』而夢想向後退到『自由』，『和平』，『誠實』的競爭上去。

『因組織卡德爾而使價格長期提高的現象，——克斯特涅爾說，——至今祇是在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方面，特別是在石煤，鐵和加里方面看見，反之，在製成品方面，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由此所構成的利潤增加的現象，也是只以製造生產資料的工業部門為限。除此而外，還要指出：製造原料（而不是半製品）的工業，不僅因組織卡德爾而獲得高度利潤的利益，使那些從事於製造半製品的工業部門受到損失，而且它對這些工業還處於相當統治的地位，這是在自由競爭下所沒有的事情』*。

我們加上着重點的那幾個字，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不願承認和很少承認的要點，是現在以考茨基為首的機會主義擁護者極力企圖敷衍而逃避不談的要點。統治關係及由此而生的強力，便是『資本主義發展最新階段』中的標本現象，便是由於萬能的經濟壟斷組織形成所必然發生的，而且已經發生的結果。

我們再舉出一個表明卡德爾支配一切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或主要原料來源奪到手裏的地方，卡德爾也就特別容易產生，壟斷組織也就特別容易形成。但是，若以為在無法奪得原料來源的工業部門中間，不會有壟斷組織發生，那便錯誤了。水泥工業中所用的原料，是到處都有的。但是這個工業在德國也大大卡德爾化了。水泥製造廠都聯合成各區新迪加：如南德新迪加，萊茵威斯特發里亞新迪加等等。規定了壟斷性的價格：每一車箱水泥為二百三十以至二百八十馬克，而成本費却只等於一百八十馬克！企業所付的股息，自百分之一二至百分之一六，而且不要忘記，現代的投機『天才』，除分得股息之外，還能攫取大量的利潤。為要消滅這種有利

*見克斯特涅爾所著前書，第二五四頁。

工業中的競爭，壟斷者甚至於運用各種詐術：散佈謠言，說這種工業中的情形不佳；在報章上刊登匿名廣告說：『資本家們，不要投資於水泥工業呀！』；並且收買『局外企業』（即那些不參加新迪加的企業），給他們六萬，八萬以至十五萬馬克的『出讓費』*。壟斷者到處採用百般方法來爲自己開闢道路，從償付一點『微薄的』出讓費起，一直到按美國方式『運用』炸藥對付競爭者爲止。

所謂用卡德爾消滅危機，這完全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竭力替資本主義粉飾的一種騙語。其實恰巧相反：在某幾個工業部門中形成起來的壟斷，使全部資本主義生產所特有的混亂現象更加緊張，更加劇烈起來。工業與農業發展上不相適應的情形，本是一般資本主義底特點，現在更加厲害了。卡德爾化程度最高的所謂重工業，尤其是煤鐵工業，處於特權的地位，結果使其餘各工業部門，如寫了一部論述『德國各大銀行與工業的關係』問題的優秀著作的愛德思所承認了的那樣，發生『更加厲害地缺乏計劃性』的現象**。

『國民經濟越發展，——拚命辯護資本主義的李甫曼說，——便越趨向於創立更帶冒險性的或國外的企業，越趨向於創立那些需要有長久時間來發展的企業，或者創立那些祇有地方意義的企業』***。冒險程度增加的現象，歸根到底是由於資本非常增加，有如決堤而出，氾濫於國外等等的結果。同時，技術上異常迅速的發展，又使國民經濟中的各個部門更加參差不齊，使紛亂成分以及危

*見愛施維格所著水泥一文，載於銀行雜誌 („Zement“ von L. Eschwege: „Die Bank“), 一九〇九年第一期，第一一五及往下各頁。

**見愛德思所著德國各大銀行與工業的關係，特別是與冶金工業的關係一書 (Jeidels: „Das Verhältnis der deutschen Großbanken zur Industr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Eisenindustrie“), 一九〇五年萊比錫版，第二七一頁。

***見李甫曼所著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等等 (Liefmann: „Beteiligungs etc. Ges.“), 第四三四頁。

機成分更加增加起來。『大約在不遠的將來，——這李甫曼又不得不承認說，——人類又會在技術方面遇到一些影響於國民經濟組織的大變革』… 如電氣，航空… 『在這樣發生根本經濟變動的時候，通常而且照例都有很厲害的投機事業發展起來』…*。

危機——各種各樣的危機，特別是經濟的危機，但並不祇是經濟的危機——又大大加強着集中與壟斷的趨向。我們知道，一九〇〇年的危機，是近代壟斷同盟形成史中的轉折點。且看愛德思論到這次危機意義時所說的一段非常耐人尋味的議論吧：

『在一九〇〇年危機發生時，除了各個主要工業部門的巨型企業外，還有許多在工業高漲時生長到浪頭上面來了的所謂『單純』企業』（即沒有聯合起來的企業），『它們的組織，按現代的概念說來，已經是陳腐不堪了。價格之低落，需求額之減少，使這些『單純』企業陷於巨型聯合企業所完全沒有感受到，或僅僅受到極短時期影響的那種極端困難的境遇。因此，一九〇〇年的危機就比一八七三年的危機，更使工業集中到了大得無可計量的程度。一八七三年的危機，雖也發生了一種使優秀企業保留下來的淘汰作用，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程度下，這種淘汰並沒有使順利逃出危機的企業獲得壟斷地位。首先而且最高限度享有這種長久壟斷地位的，便是現今製鐵工業與電氣工業中的那些巨型企業，因為它們具有很複雜的技術，線索很長的組織與雄厚的資本；其次，在較小的程度上享有這種壟斷地位的，便是製造機器的企業，冶金業中某些部門的企業，交通方面的企業等等』**。

壟斷便是『資本主義發展最新階段』上最高的成就。但是，如果我們不注意到銀行底作用，那我們對於現代壟斷底實力和意義的觀念，就會是極不充分，極不完備而估計不足的了。

*同上，第四六五至四六六頁。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〇八頁。

(二)銀行及其新作用

銀行原先的基本業務，便是担任支付方面的中介。於是，銀行便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為活動的資本，即變為產生利潤的資本，把所有一切貨幣收入集合起來，交給資本家階級去支配。

隨着銀行事業發展及其集中於少數機關，於是銀行便由簡單的中介人變成爲萬能的壟斷者，差不多全體資本家和小業主所有的全部貨幣資本，以及本國和數國內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和原料來源，都爲它們所支配。由無數簡單中介人變爲少數壟斷者的這種過程，便是資本主義轉變爲資本帝國主義的基本過程之一，因此，我們首先必須把銀行事業集中的情形考查一下。

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德國一切擁有資本百萬馬克以上的銀行，共有存款七十萬萬馬克；到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間，這種存款數目已增加到九十八萬萬馬克。在五年以內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且在新增的二十八萬萬馬克存款中，有二十七萬五千萬馬克落在五十七個擁有資本一千萬馬克以上的銀行手中。大小銀行所有存款分配情形如下*：

		各種銀行在存款總數中所佔的百分數			
	九個柏林 大銀行	其餘四十八個擁 有資本一千萬馬 克以上的銀行	一百一十五個擁有 資本一百萬至一千 萬馬克的銀行	資本少於一 百萬馬克 的小銀行	
1907/8年	47	33.5	16.5	4	
1912/3年	49	36	12	3	

小銀行被大銀行所排擠，而大銀行中爲數不過九個的銀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之半數。但是此地我們還沒有說到許多重要

*見蓋斯堡所著五年來的德國銀行一文 (Alfred Lansburgh: „Fünf Jahre d. Bankwesen“), 載於銀行雜誌 („Die Bank“), 一九一三年第八期, 第七二八頁。

的事情，例如無數小銀行事實上變成大銀行底分行等等。關於這些事情，且待我們以後再講。

一九一三年末，據叔爾茨、黑維尼茨估計，在存款總額約一百萬萬馬克中，柏林九個巨大銀行佔有五十一萬萬馬克。這位作者不僅注意到存款，而且注意到全部銀行資本時寫道：『一九〇九年末，柏林九個巨大銀行以及附屬於它們的銀行，支配有一百一十三萬萬馬克，即約佔德國銀行資本總數百分之八十三。『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及其各附屬銀行，幾乎支配有三十萬萬馬克，而與普魯士國有鐵路管理局，同為東半球上資本積聚得最多，而且分權程度最高的企業』*。

我們特別着重指出『附屬』銀行這個名詞，因為這是現代資本主義集中方面最主要特點之一。大企業，尤其是大銀行，不僅直接吞併小企業，並且用『參與』小企業資本的方法，用購買或交換股票的方法，用債務方式等等『拉攏』小企業，征服它們，吸收它們加入『自己的』集團，加入自己的『康采恩』（這是資本主義聯合底術語）。李甫曼教授用一本五百頁的巨『著』來專門描寫現代的『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可惜這本書裏面只有許多往往是沒有分析過的生硬材料，再加上一些十分低劣的『理論上的』推斷。關於這種『參與』制度究竟使集中過程達到怎樣地步的問題，在銀行『活動家』黎舍爾那一本論德國大銀行的著作中說得最好不過了。但是，我們在尚未引用他的材料之前，首先要從『參與』制度中舉出一個具體的例子。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德國信貸銀行一文（Schulze-Gaevern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載於社會經濟底基礎彙刊（„Grundriß der Sozialökonomik“），一九一五年杜平根版，第一二頁，第一三七頁。

**見李甫曼所著從事參與和財政接濟的公司。現代資本主義與證券營業情形概論一書（R. Liefmann: „Beteiligungs- 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über den modernen Kapitalismus und das Effektenwesen“），第一版（一九〇九年耶拿版），第二一二頁。

『德意志銀行』所領導的『集團』，即使不是一切大銀行集團中最大的集團，也是最大的集團之一了。要考察那些把這一集團所有一切銀行聯繫在一塊的主要線索，必須分清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參與』，或者說，較小銀行對『德意志銀行』的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依賴。結果我們便得出如下的情景*：

『德意志銀行』所參與的銀行

	第一級依賴的	第二級依賴的	第三級依賴的
經常參與的	17 個銀行；其中有 9 個又參與 34 個銀行；	其中有 4 個又參與 7 個銀行	
暫時參與的	5 個銀行；	——	——
間或參與的	8 個銀行；其中有 5 個又參與 14 個銀行；	其中有 2 個又參與 2 個銀行	
總計	30 個銀行；其中有 14 個又參與 48 個銀行；其中有 6 個又參與 9 個銀行		

在八個『間或』隸屬於『德意志銀行』的『第一級依賴的』銀行中，有三個是外國銀行：一個是奧國的銀行（維也納『銀行同盟』），其他兩個是俄國的銀行（『西伯利亞商務銀行』和『俄國對外貿易銀行』）。直接或間接，全部或局部加入『德意志銀行』集團的，總計有八十七個銀行，而這個集團所支配的自己的和他人的資本總數，計有二三十萬萬馬克。

一個銀行既主持着這樣一個集團，並與其餘比它稍小的五六個銀行訂立協約，來經營特別巨大和特別有利的財政業務，如國債等，那末這個銀行當然是已經由『中介人』一變而為極少數壟斷者底聯合組織了。

我們且從黎舍爾統計中摘引如下一些簡略材料，來說明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德國銀行事業集中過程進行的速度：

*見蓋斯堡所著德國銀行事業中的參與制度一文（Alfred Lansburgh: „Das Beteiligungssystem im deutschen Bankwesen“），載於銀行雜誌一九一〇年第一期，第五〇〇頁。

柏林六個巨大銀行所有的機關

年 份	在德國 的分行	兌換所和 兌換處	其所經常參與的 德國股份銀行	機關 總數
1895年	16	14	1	49
1900年	31	40	8	50
1911年	104	276	63	450

由此可見，銀行的密網擴展得非常迅速，它包羅全國，集合所有的資本和貨幣收入，把成千累萬個分散的企業變成爲一個全國的資本主義企業，以至於轉變成爲一個全世界的資本主義企業。叔爾茨、黑維尼茨在上述一段話中代表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說到的那個『分權』，實際上是使無數從前比較『獨立的』經濟單位，或正確些說，局限於某一地方的經濟單位，都隸屬於一個中心。其實，這是集權，是把巨型壟斷公司底作用，意義和勢力加強起來。

在較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銀行網』還要緊密一些。英國——包括愛爾蘭在內——一九一〇年所有銀行底分行總數，計有七千一百五十一個。其中四個大銀行，各有四百個以上的分行（自四百四十七個至六百八十九個），另外四個大銀行各有二百個以上的分行，其他十一個銀行各有一百個以上的分行。

法國三個最大銀行，即『里昂信託公司』，『全國匯兌局』和『總公司』所有業務與分行網之擴展，有如下表*：

	分行和支行數目			資本數量 (單位百萬佛郎)	
	在外省各地	在巴黎	總數		
				自己的	他人的
1870年	47	17	64	300	497
1890年	193	66	258	365	1,245
1909年	1,053	196	1,239	887	4,363

*見 考甫曼所著法國銀行一書 (Eugen Kaufmann: „Das französische Bankwesen“), 一九一一年杜平根版, 第三五六頁和第三六二頁。

黎舍爾爲要說明現代大銀行底『聯繫』，引用了『匯兌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 ，即德國和全世界最大銀行之一（它的資本在一九一四年已達三萬萬馬克）所收發信件的統計：

	信件數目	
	收到的信件	發出的信件
1863年	6,135	6,292
1870年	85,800	87,513
1900年	535,109	626,043

巴黎大銀行『里昂信託公司』中所有的清單數目，在一八七五年是二萬八千五百三十五件，而在一九一二年則已增至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九件了*。

這些簡單數目字，也許要比長篇議論更能明顯地表明：資本的集中和銀行活動的擴大，使銀行底作用根本變更了。散處各方的資本家，集合成爲一個集體的資本家。銀行替幾個資本家經營活期存款，似乎只是執行着一種純粹技術性的，完全輔助性的業務。當這種業務範圍擴展得很大的時候，少數壟斷者就支配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所有全部工商業底業務，就能經過銀行的聯繫，經過活期存款及其他種種財政手續，起初確切探知各個資本家底營業情形，然後就實行監督他們，用擴大或減少，便利或阻難信貸的辦法來影響他們，以至於完全決定他們的命運，決定他們的收入，奪去他們的資本，或使他們有可能迅速而大規模地增加他們的資本等等。

我們剛才說過了柏林『匯兌公司』擁有三萬萬馬克資本的事實。『匯兌公司』資本這樣迅速的增加，便是柏林兩個最大銀行，即『德意志銀行』和『匯兌公司』爭奪霸權的一幕。

在一八七〇年間，『德意志銀行』還是個新開設的銀行，只

*見列斯克爾所著法國儲蓄事業一書 (Jean Lescure: «L'épargne en France»), 一九一四年巴黎版，第五二頁。

擁有一千五百萬馬克的資本；『匯兌公司』當時擁有三千萬馬克的資本。在一九〇八年間，前者有資本二萬萬，後者有資本一萬七千萬。到一九一四年時，前者所有的資本已增至二萬五千萬，後者因與另一個頭等大銀行『沙福豪生聯益銀行』聯合起來，便把資本增到了三萬萬。在這種爭奪霸權的鬥爭中，這兩個銀行間的『妥協』，當然也隨着鬥爭而更加增多，更加鞏固起來。而這種發展的進程，便使那些站在絕對不越出最穩健最溫和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範圍的觀點上來觀察經濟問題的銀行事業專家，也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結論：

『其他銀行也會循着這條路線進行』，——德國銀行雜誌論及『匯兌公司』資本增至三萬萬馬克的事實時寫道，——『於是現時在經濟上統治德國的三百個人，就會漸漸減至五十個，二十五個，以至更少的數目。現代的集中運動不會只以銀行事業為限。各個銀行間的緊密聯繫，自然會使這些銀行所庇護的許多新迪加工業家也接近起來… 將有一天，我們醒過來時，忽然看見我們面前盡是些托拉斯而感覺驚異；到那時候，就會必須以國家的壟斷來代替私人的壟斷。雖然如此，但我們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別的事情要責備自己，因為我們不過是聽憑客觀行程自由發展下去，而用股票稍稍把它加速了一下罷了』*。

這便是資產階級政論家毫無辦法底表現，而資產階級的科學界與這種政論家不同的地方，祇是更不誠實，而企圖隱蔽問題實質，想用枝節問題去掩蔽根本問題罷了。看見集中的結果而感覺『驚異』；『責備』資本主義德國的政府或資本主義的『社會』（『我們』）；害怕因採用股票而『加速』集中，如德國『研究卡德爾』的專家契爾施基那樣害怕美國托拉斯，而『寧願』有德

*見蘭斯堡所著資本三萬萬的銀行一文(A. Lansburg): „Die Bank mit den 300 Millionen“，見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四二六頁。

國卡德爾，彷彿卡德爾『不會像托拉斯那樣異常加速技術和經濟的進步』*，——這難道不是表明毫無辦法麼？

但事實還是事實。在德國沒有托拉斯，而『祇有』卡德爾，但統治德國的不過是三百個資本巨頭。而且這種巨頭數目還在不斷地減少。銀行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不管銀行立法如何不同，總是多倍加強加速着資本集中和壟斷公司形成的過程。

半世紀以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過：『銀行在社會範圍中造成了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公共分配制底形式，但祇是形式而已』（見俄譯本，第三卷下冊，第一四四頁）。我們所引用的關於銀行資本增長的統計材料，關於巨大銀行底支行和分行數目及其清單數目等等增加的統計材料，都具體表明出整個資本家階級底這一種『公共簿記』，並且不僅是資本家階級而已，因為銀行收集（雖然只是暫時收集）一切貨幣收入，包括小私有主，職員和少數上層工人底收入。從形式上看來，『生產資料公共分配制』就是由現代銀行中生長出來的現象，這種銀行在法國約有三個至六個，在德國約有六個至八個，支配着無數萬萬資本。但是，從內容上看來，這種生產資料分配制絲毫也不是『公共』的，而是適應於大資本——首先是最大的壟斷性的資本——利益的私有的分配，因為這種大資本是在民衆忍飢挨餓，農業發展程度遠遠落後於工業，而『重工業』從其餘工業部門中收取貢賦的條件下動作的。

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化過程中，儲蓄社和郵政機關開始來與銀行競爭，它們是一種比較更『分權』的組織，就是說，它們的勢力普及於更大的區域，更多的偏僻地方和更多的居民。且看美國專門研究銀行和儲蓄社存款增加情形比較問題的委員會所收集的統計**：

*見契爾施基所著前書，第一二八頁。

**引自美國全國金融委員會底材料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見銀行雜誌一九一〇年第一期，第一二〇〇頁。

存款（單位十萬萬馬克）

	英國		法國		德國		
	銀行存款	儲蓄社存款	銀行存款	儲蓄社存款	銀行存款	信託公司存款	儲蓄社存款
1880年	8.4	1.6	1	0.9	0.5	0.4	2.6
1888年	13.4	2.0	1.5	2.1	1.1	0.4	4.5
1908年	33.2	4.2	5.7	4.2	7.1	2.2	13.9

儲蓄社爲支付四厘至四厘又四分之一的存款利息，就必須替自己的資本找得『有利的』投殖，如從事於兌換期票，典押及其他業務。銀行和儲蓄社間的界限『漸漸失去』。例如波胡姆和愛爾福特兩城的商會，要求『禁止』儲蓄社從事於『純粹的』銀行業務，如兌換期票之類；並要求限制郵政機關所進行的『銀行式的』業務*。銀行大王好像是畏懼國家的壟斷將從意料不及的方面來侵襲他們。但這種畏懼當然不過是好像一個事務室內兩個管事相互競爭而已。原來儲蓄社中數十萬萬的資本，實際上終究還是由那些銀行資本巨頭們支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的壟斷不過是一種替某某工業中將近破產的巨萬富翁，提高並担保其收入的手段罷了。

自由競爭制佔統治的舊資本主義被壟斷制佔統治的新資本主義所替代的事實，還表現於交易所作用底衰落。『交易所之爲流通方面的必要中介，——銀行雜誌寫道，——是從前銀行還不能把它所發行的大部分有價證券分配於它的顧客中間的時候的事，可是那個時候早已過去了』**。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八一一頁和第一〇二二頁；一九一四年，第七一三頁。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三一六頁。

『『一切銀行都是交易所』，——這是一句現代的名言。銀行越大，銀行事業越集中，這句名言所包含的真理也愈多』*。『從前在七十年代時，充滿少年銳氣的交易所』（這是對一八七三年交易所危機和創業舞弊糾紛等事實所作的一種『微妙的』暗示¹⁰⁸），『開闢了德國工業化的新紀元，而在現今的時候，銀行和工業已能『獨自應付』了。我國大銀行統治交易所…便是德意志工業國組織完備底明顯表現。這樣一來，自然動作的經濟法則底活動範圍縮小下去，而經過銀行自覺調節的範圍異常擴大起來，於是少數領導者所負的國民經濟方面的責任，也就因此而大大加重了』——這就是德國大學教授叔爾茨、黑維尼茨所寫過的話**。他是替德國帝國主義作辯護，而為全世界帝國主義者所尊敬的人物，他企圖抹煞一件『小事』，即經過銀行來進行的這種『自覺的調節』就是由極少數『組織完備的』壟斷者來剝刮大眾。資產階級大學教授底任務並不是要揭開全部內幕，並不是要揭穿銀行壟斷家所玩弄的一切勾當，而是要粉飾這些勾當。

比叔爾茨、黑維尼茨更有權威的一位經濟學家和銀行『活動家』黎舍爾也是這樣說法，他用一些毫無內容的語句來搪塞無法否認的事實：『交易所從前含有一種為全部經濟和有價證券流通所絕對必要的性能；它當時不僅是它所匯集的那些經濟運動最準確的度量工具，而且幾乎是那些經濟運動中一個自然動作的調節者。現在呢，它的這種性能已是日漸消失了』***。

*見 史迪里赫博士所著貨幣與銀行一書 (Dr. Oscar Stille: „Geld- und Bankwesen“), 一九〇七年柏林版, 第一六九頁。

**引自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德國信貸銀行一文 (Schulze-Gaevern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 見社會經濟底基礎叢刊 (Grundriß der Sozialökonomik), 一九一五年杜平根版, 第一〇一頁。

***見 黎舍爾所著前書, 第四版, 第六二九頁。

換言之，舊時的資本主義，即自由競爭制的資本主義，以交易所為絕對必要調節者的資本主義，已成為過去了。一個新的資本主義代替了它，這個新的資本主義，包含有某種過渡階段，某種自由競爭制和壟斷制混合物底明顯特徵。這個最新的資本主義究竟是『過渡』到何處去呢，——這就是一個自然要發生，而資產階級的學者却不敢提出的問題。

『在三十年前，自由競爭的企業家，執行了十分之九不屬於『工人』體力勞動範圍以內的經濟工作。現在呢，這種經濟的智力工作十分之九，都由僱員們來擔任了。銀行事業便處於這一發展過程底領導地位』*。叔爾茨、黑維尼茨底這種供認，又使人一定要來發問：最新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究竟是進到何處去的過渡呢。

由於集中過程增進而成為全部資本主義經濟領袖的少數銀行，它們彼此進行壟斷性協定的傾向，組織銀行托拉斯的傾向，自然要日益顯現和加強起來的。美國現在已不是由九個，而是由兩個最大的銀行（即兩個巨萬富豪洛克費爾和摩爾根）統治着一百一十萬萬馬克的資本了**。我們上面所指出的那個德國『沙福豪生聯益銀行』為『匯兌公司』所吞併的事實，在代表交易所利益的法蘭克福報方面引起了如下的評論：

『銀行集中過程的增進，使一般可以向之取得信用借款的機關日益減少，因而使大工業更加依賴於少數銀行集團。工業和財政界彼此聯系日密，於是需要銀行資本的那些工業公司底行動自由，更加受到限制。所以大工業對於銀行托拉斯化（聯合或變為托拉

*引自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德國信貸銀行一文 (Schulze-Gaevernü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 見社會經濟底基礎彙刊 (Grundriß der Sozialökonomik), 一九一五年杜平根版, 第一五一頁。

**見銀行雜誌, 一九一二年第一期, 第四三五頁。

斯)這一事實，發生一種混亂的感覺；真的，我們已屢次看見各大銀行康采恩開始成立某種協定，因而使競爭受到限制」*。

這又是銀行事業發展中最高成就的壟斷。

至於說到銀行和二業間的密切聯繫，那末在這一方面，銀行底新作用是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倘若銀行替某個企業兌換期票，替它經營活期存款等等，那末這種業務，單獨看起來，一點也沒有減少這個企業家底獨立性，而且銀行也沒越出平常中介作用底範圍。如果這些業務擴大鞏固起來，如果銀行把巨量資本「收集」於自己掌握，如果銀行經營相當企業底活期存款而能夠（事實上確實如此）更詳細，更完備地知道它這位顧客底經濟情形，那末結果就是工業資本家日益完全依賴於銀行了。

同時，銀行與工商大企業實行的所謂個人聯合也日益增進，雙方用佔有股票的手段，用銀行經理充當工商企業監察人（或董事），或反之，用工商企業經理充當銀行監察人的辦法，而愈益密切地溶合起來。德國經濟學家愛德思搜集了關於這種資本集中和企業集中過程的極為詳細的材料。柏林六個最大銀行，有它們的經理在三百四十四個工業公司裏當代表，又有它們的董事在四百零七個公司裏當代表，一共在七百五十一個公司裏有它們的代表。由它們佔有兩個監察會會員，或監察會會長位置的公司，共有二百八十九個。在這些工商業公司中，有各種各樣的工業部門，有保險會社，有交通機關，有飯館酒樓，有戲院，美術品製造業等等。另一方面，在這六個銀行底監察會中（在一九一〇年間）有五十一個最大的工業家，其中有「克虜伯」炮廠底經理，巨大輪船公司「哈巴克」（「漢堡美洲定期輪船公司」）底經理等等。六個銀行中，每個銀行從一八九五至一九一〇年間參與了替數百個

*引自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同前一文，見社會經濟底基礎叢刊，第一五五頁。

(由二百八十一個至四百一十九個不等)工業公司發行股票和債券的事業*。

銀行和工業實行的『個人聯合』，又以前後兩者與政府實行的『個人聯合』補充之。『他們自願把監察會會員底位置，——愛德思寫道，——讓給有聲望的人物，以及去職的政府官吏，因為這些人物使公司與當局接洽時，可以得到不少的方便（!!）』…『大銀行監察會，照例有國會議員或柏林市議會議員參加』。

可見，巨大資本家壟斷公司形成和發展過程，是循着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路徑迅速進行的。結果便一貫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幾百個財政大王間相當的分工：

『一方面，個別巨大工業家活動範圍擴大起來』（加入銀行董事會等等），『各外省銀行經理專門負責主持某一個工業區域，同時大銀行底領導者中間的專門化也相當加強起來。這種專門化，一般說來，祇有在全部銀行企業底規模很大，尤其是它與工業的聯繫極廣的時候，才有可能實行。這種分工是按着兩個方向進行的：一方面，把本銀行與工業聯絡方面的事務完全委託給某一個經理去主持，作為他的專門職務；另一方面，每個經理都親自擔任監督幾個或幾組在職業上利益上彼此相近的企業』…（資本主義已發展到用有組織的辦法監督單個企業的程度了）…『某一個經理專門負責管理德國工業，或單只管理德國西部的工業』（德國西部是德國工業最發達的區域），『其他的經理則專門負責與外國政府及外國工業發生關係，收集關於各工業家等等個人的消息，主管交易所事業等等。此外，每個經理又往往專門主管某一地方或某一部門的工業：有的主要是在電氣公司監察會裏工作，有的是在化學工廠，啤酒廠或製糖廠裏工作，有的是在幾個孤立的企業中工作，同時又參加保險公司監察會…一言以蔽之，在巨大銀行中因銀行活動規模擴大與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與聖舍爾所著前書。

種類增多的關係，顯然是形成着各個經理彼此愈益細密的分工，其目的(和結果)是要稍微提高他們活動底程度，使之超出於單純的銀行事務，使他們有更大的判斷能力，更通曉工業中一般的問題及其各個部門中特殊的問題，養成他們在工業方面銀行勢力範圍內活動的能力。除這種辦法外，銀行更竭力邀集熟悉工業的人物，企業家，去職官吏，尤其是在鐵路與礦務機關中供過職的人，來加入監察會。』*。

在法國銀行事業中，也有與此同類的機關，祇是形式稍有不同而已。例如，法國三個最大銀行之一的『里昂信託公司』，專門設立有一個『財政消息收集部』(service des études financières)。其中經常有五十多個工程師，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律師等等工作着。這個機關每年耗費六七十萬佛郎。它自己又分成八科：有一科負責收集專門關於工業企業的消息，另一科負責研究一般統計，第三科負責考察鐵路公司和輪船公司，第四科負責考察證券，第五科負責研究財政報告等等**。

結果一方面是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日益溶合起來，或如布哈林所說得中肯的那樣，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混合生長起來；另一方面是銀行日益轉變為真正『萬有性的』機關。我們認為必須引用一位最有研究的作家愛德思對於這個問題的正確說法：

『我們考察全部工業聯繫的結果，便看見那些專為工業工作的財政機關底萬有性。巨大銀行恰巧與其他銀行形式相反，恰巧與文獻中有時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如說銀行應當專門從事於某一部分業務或工業中某一部門工作，以免喪失自己的立腳點等語的要求相反，而力求把它與工業企業間的聯繫，弄得異常複雜，使其所包含的生產區域與部門盡量廣泛紛繁，力求消滅各個地方或各個工業部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五七頁。

**引自考甫曼所著論法國銀行的文章，見銀行雜誌，一九〇九年第二期，第八五一及往下各頁。

門彼此因各個企業發展情形不同而發生的資本分配不均的現象』。

『一個趨勢是使銀行與工業的聯繫成爲普遍的現象；另一種趨勢是使這種聯繫更加堅固更加緊密起來；這兩種趨勢都在六大銀行中實現了，雖然不很完全，但是已經大規模地並在同一程度上實現了』。

在工商業界方面，往往有人對銀行的『恐怖主義』發出一種不滿的怨言。當大銀行用下述例子中所表明的那種方式去『指揮』其他企業時，這種怨言當然是要發生的。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所謂柏林D字銀行（四個最大銀行底名稱都是以D字母開頭的）之一，給『西北中德意志水泥新迪加』經理部寫了如下的一封信：『根據貴公司在本月十八日所登載於某報的通知看來，貴公司定於本月三十日召集的全體大會，將通過能使貴企業實行爲敝行所不能接受的種種變更的決議。敝行鑒於這種危險，不得不停止發給貴公司一向所享用的信貸，不勝抱歉之至……但如貴公司在這次大會上不通過敝行所不能接受的決議，並且對於將來能給敝行以相當的担保，敝行即願開始談判供給貴公司新信貸的問題』*。

其實，這也是小資本因受大資本壓迫而發出的那種怨言，不過在此地落到了『小』字輩中的，是整整一個新迪加罷了！舊時的大小資本間的鬥爭，又在新的，高得無比的發展階段上重演起來。當然，擁有數十萬萬巨資的銀行企業，也能用空前無比的手段去推動技術的進步。例如銀行設立專門從事技術研究的團體，而研究所得的結果，當然是祇供『友善的』工業企業去享受。屬於這一類團體的，有『電氣鐵道問題研究會』，『中央科學技術研究局』等等。

大銀行底領袖們自己不能不知道這裏所形成的是一種新的國民經濟條件，但他們在這些條件前面祇有表示束手無策而已：

『誰在最近幾年來考察過大銀行經理和監察會會員人選變更的

*見史迪里赫博士所著貨幣與銀行一書（Dr. Oscar Stilleh: „Geld und Bankwesen“），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一四八頁。

情形，——愛德思寫道，——誰就會知道，全部權力漸漸轉到了視大銀行積極干預一般工業發展事業為必要急務的人們手中去，並且這些人和老舊銀行經理間又因此而發生一種基於事務關係，往往是基於個人關係的意見分歧。這裏問題實質就在於銀行既是一種信用機關，那末它是否會因這樣干預工業生產過程而受到損失呢；它是否會因從事於這種和信貸中介作用毫不相干的活動，從事於這種能把它引入比以前更會使它服從於工業行情盲目統治的那個範圍中去的活動，而犧牲掉自己的穩固的原則和可靠的利潤呢。有許多老舊銀行經理都是這樣說。但大部分新進經理却認為積極干預工業問題，也好像隨着現代大工業出現而出現了大銀行和最新工業式的銀行企業一樣，是必不可免的。雙方意見祇有一點相同，就是大家都認為在大銀行底新活動中既沒有什麼穩固的原則，也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

舊資本主義已經過了時了。新資本主義是進到某方面去的一種過渡。尋找『穩固的原則和具體的目的』去『調解』壟斷和自由競爭，當然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情。實踐家底承認，完全不像那些用官場口吻辯護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如叔爾茨、黑維尼茨，李甫曼一流人極力讚美『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一樣。

大銀行底『新活動』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完全確立起來的呢，——關於這個重要問題，我們可以從愛德思那裏找到頗為確切的答覆：

『現時工業企業間的聯繫，有其新的內容，新的形式，新的機關，即同時按集權原則與分權原則所組織起來的大銀行。這種聯繫之形成為特殊的國民經濟的現象，當不早於一八九〇年；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把這個起點移到一八九七年，因為在那個時候，各種企業都實行了大規模的『合併』，並為適應銀行底工業政策而初次造成了新式的分權組織。也許還可以把這個起點移到更遲的時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八三至一八四頁。

候，因為只有一九〇〇年的危機才大大加速了工業方面和銀行事業方面的集中過程，鞏固了這個過程，初次把銀行和工業的聯繫變成了大銀行底真正壟斷，使這種聯繫比從前更加堅強緊密』*。

總之，二十世紀是從舊資本主義進到新資本主義的轉捩點，即是從一般資本統治進到財政資本統治的轉捩點。

(三)財政資本與財政寡頭

『工業資本，——希法亭說，——日益不屬於使用這種資本的工業家了。工業家祇有經過銀行，才得支配資本，銀行對於工業家說來，便是這種資本底所有人。另一方面，銀行也只好日益把自己所有的資本保存到工業中去。因此之故，銀行便日甚一日地變成工業資本家了。實際上變成了工業資本的這種銀行資本，即貨幣形式的資本，我就稱之為財政資本』。『財政資本便是由銀行所支配而由工業家來運用的資本』**。

這個定義是不完全的，因為它沒有指出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即是沒有指出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發展到了很高程度，以致勢必引起，而且真正引起了壟斷的事實。但是，一般說來，在希法亭底全部敘述中，尤其是在我們從而引出這個定義的那一章前面的兩章中，是着重指出了資本家壟斷組織底作用的。

生產集中；由集中而產生壟斷組織；銀行與工業溶合或混合生長，——這便是財政資本產生的歷史和財政資本這一概念底內容。

現在我們就來說明在一般的商品生產和私有財產制的環境中，資本家壟斷組織底『經營』必然變為財政寡頭統治的情形。我們要指出，德國（而且不祇是德國）資產階級科學界的代表，如黎舍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八一頁。

**見希法亭所著財政資本一書，一九一二年莫斯科版，第三三八至三三九頁。

爾，叔爾茨、黑維尼茨，李甫曼及其他等人，完全是帝國主義和財政資本底辯護人。關於寡頭制所由形成的『機構』，寡頭所採用的手段，寡頭所獲得的『正當和不正當的』收入之規模，寡頭和國會間的聯繫等等，他們都不但不加以揭露，反而竭力去加以掩蔽，加以粉飾。他們用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辭句來搪塞『可惡的問題』，而號召銀行經理們提起『責任心』；讚揚普魯士官吏們底『盡職精神』，用嚴重的神情考察那些毫不嚴重的『監督』法律和『條規』草案中的細枝末節，玩弄理論的把戲，例如李甫曼教授就公然寫出了如下的『科學』定義：『…商業是一種業務的活動，專事於收集財富，保存財富，以供應用…』*（着重點是李甫曼教授自己加的）…這樣說來，商業是在尚不知道交換為何物的原始時代就已經有過了，並且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也會存在的哩！

但是，表明財政寡頭駭人聽聞統治的駭人聽聞的事實，是十分明顯的，所以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無論在美國，法國或德國，都出現了一些雖然是本着資產階級觀點，但畢竟還是把財政寡頭制作了一種近於真情的敘述，並對財政寡頭制作了一——當然是市儈的——批評。

首先要提起前面已經略略說過了的那個『參與制度』。德國經濟學家黑依曼，可以說是最先注意到了這件事實要點的人。他把這點敘述如下：

『總經理管理着總公司（直譯為『母親公司』）；總公司又統治着那些依賴於它的公司（『女兒公司』）；後者又統治着『孫女公司』等等，餘此類推。於是，只要握有稍大一點的資本，便可統治許多極大的生產部門。例如通常只要擁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本，便能監督整個股份公司。所以一個總經理只要擁有一百萬的資本，便能支配各『孫女公司』所有的八百萬的資本了。

*見李甫曼所著前書，第四七六頁。

要是這種『錯綜結合』辦法繼續下去，那末擁有一百萬資本，便能支配一千六百萬，三千二百萬等等…的資本了』*。

其實，經驗證明：只要佔有百分之四十的股票，便能指揮股份公司底業務**，因為常有一部分散處各方的小股東，實際上是完全沒有機會來參加股東大會等等的。所謂股票佔有權底『民主化』，雖然資產階級的詭辯家和機會主義的『也是社會民主黨人』希望——或揚言說他們希望——它會造成『資本民主化』，加強小生產底作用和意義等等，其實不過是加強財政寡頭權力的一種手段。因此，在那些較先進或較老的和較為『諳練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法律也就允許發行價值較少的股票。德國法律不許發行少於一千馬克的股票，於是德國的財政大王望見英國法律允許發行少至一個金鎊（等於二十馬克，約合十個盧布）的股票，便羨慕不已。一九〇〇年六月七日，德國最大工業家兼『財政大王』之一的西門子，在德國國會中說道：『價值一鎊的股票，是不列顛帝國主義底基礎』***。這個商人對於什麼是帝國主義這一問題，要比號稱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創始人的卑污作家，有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因為這位卑污作家以為帝國主義祇是某一個民族底劣根性而已…

但是『參與制度』，不僅促使壟斷者底權力極端增加，而且還使他們可以放肆玩弄隨便一種黑暗醜惡的勾當，剝削大眾，因為『母親公司』底領導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是不替『女兒公司』負責的，『女兒公司』算是『獨立的』，但他們經過『女兒公司』

*見黑依曼所著德國大鋼鐵工業中的混合企業一書（Hans Gideon Heymann: „Die gemischten Werke im deutschen Grobbleisengewerbe“），一九〇四年斯多德牙爾版，第二六八至二六九頁。

**見李甫曼所著前書，第一版，第二五八頁。

***引自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同前一文，見社會經濟底基礎彙刊，第五卷，第二期，第一一〇頁。

是什麼都可以『做到』的。我們且從德國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五月號上引出如下的例子：

『加塞爾城的『彈簧鋼鐵股份公司』在數年前算是德國最賺錢的企業之一。因為管理不良的結果，股息從百分之十五落到了百分之零。事實真相原來如下：經理部沒有得到股東底同意，出借了六百萬馬克給該公司所屬『女兒公司』之一『哈西亞』，後者名義上的資本祇有數十萬馬克。這筆借款，幾乎是比『母親公司』底股資大過三倍，而在該公司決算表上却絲毫也沒有提及；在法律上，這種隱瞞的行爲完全是正當的，並且可以延長到二年之久，因為這種行爲並沒有違犯任何一條商業法律。監察會會長，以負責人資格在這種假決算表上簽了一個字，但他仍舊做着加塞爾商會的會長。股東們知道這筆借給『哈西亞』公司的款子，是遠在這筆借款已被證明是個錯誤…』（錯誤二字，作者理應放在括弧以內）…『以及因為洞悉此中祕密的人們開始把『彈簧鋼鐵公司』股票賣出去而使其價格幾乎跌落了百分之百以後…

…在股份公司中極常見的這一個玩弄決算表上收支平衡把戲的標本例子，便能說明爲什麼股份公司董事會要比私人企業家更輕易得多地去幹冒險勾當。最新式的決算表製定法，不但使他們能把冒險勾當瞞過普通的股東，並且使主要的關係人能在所玩的嘗試失利的時候，立刻把股票賣出去，藉以卸去責任，而私人的企業家，却要以自己的皮骨來替自己所做的事情負全部責任…

許多股份公司底決算表，頗與中古時代有名的褪蹟紙本相似；要發見藏於紙裏的原稿真實內容，就必須先把表面上所寫的字跡擦去』（褪蹟紙本是把原先寫在羊皮紙上的基本手稿塗上一層油粉，而在油粉上寫出另外一些文句的稿紙）。

『最簡單，因而也最常用的一種模糊決算表的方法，便是用創立『女兒公司』或合併這種『女兒公司』的手段，把一個企業分成幾

部份。從各種目的——合法的或非法的——上看來，這種制度都顯然是特別有利的，所以現時不採用這種制度的大公司，簡直是一種例外』*。

作者在最大的壟斷公司中舉出著名的『電氣總公司』（即A.E.G.，關於這個公司，我們以後還要講到），作為最大規模地採用這種制度的例子。一九一二年，這個公司參與了一百七十五個至二百個公司，當然是統治了這些公司，並且總共把持了約近十五萬萬馬克的資本**。

懷有好意的——即懷有一番辯護掩飾資本主義的好意的——教授們和官吏們叫一般人注意的那些監督規則，公佈決算，製定一定的決算格式，設立監察機關等等的辦法，都是不會有什麼意思的。因為私有權是神聖的，誰也不能禁止誰去買賣股票，交換股票，典押股票等等。

『參與制度』在俄國各大銀行中究竟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我們根據阿哈德所公佈的材料就可斷定。阿哈德在『道勝銀行』充任僱員至十五年之久，他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出版了一本書，書名不十分確切，叫做大銀行與全世界市場***。作者把俄國大銀行分為兩大類：（甲）在『參與制』下經營的銀行；（乙）『自立的』銀行，但他所謂『自立』，是單憑己意，指其不依賴於外國銀行

*見愛施維格所著女兒公司一文（L. Eschwege: „Tochtergesellschaften“），載於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五四五頁。

**見海尼格所著電氣托拉斯之路一文（Kurt Heinig: „Der Weg des Elektrot trusts“），載於新時代雜誌（„Neue Zeit“），一九一二年（第三十卷），第二期，第四八四頁。

***見阿哈德所著大銀行與全世界市場。大銀行在世界市場上的政治和經濟作用及其對於俄國國民經濟和德俄兩國關係的影響一書（E. Agahd: „Großbanken und Weltmarkt.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der Großbanken im Weltmarkt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s Einflusses auf Rußlands Volkswirtschaft und die deutsch russischen Beziehungen“），一九一四年柏林版。

而言。作者把第一類又分爲三個分類：（一）德國人參與的；（二）英國人參與的；（三）法國人參與的，——這是指各該國最大外國銀行底『參與』和統治而言。作者把銀行資本分爲投入『生產事業』的資本（即投入工商業的資本），和投入『投機事業』的資本（即投入交易所和財政業務的資本），他本着他所固有的那種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認爲在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可以把第一種投資方式和第二種投資方式分開，而把第二種投資方式消滅掉。

作者所引用的統計材料，有如下表：

各銀行所有的資本數量（按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一月間的賬目報告書計算）
（單位百萬盧布）

俄國銀行種類	所投的資本		
	投入生產事業的	投入投機事業的	總計
甲類 一) 四個銀行：西伯利亞商業銀行，俄羅斯銀行，國際銀行，匯兌銀行……	415.7	859.1	1,273.8
甲類 二) 兩個銀行：工商銀行，俄英銀行……	359.5	169.1	408.4
甲類 三) 五個銀行：道勝銀行，聖彼得堡私人銀行，阿速夫海頓河銀行，莫斯科聯合銀行，俄法商業銀行……	711.8	661.9	1,373.0
(十一個銀行) 共計……	1,564.8	1,689.4	3,054.3
乙類 八個銀行：莫斯科商人銀行，窩爾加-喀馬銀行，容克股份銀行，聖彼得堡商業銀行（從前的弗斐堡銀行），莫斯科銀行（從前的梁布申斯基銀行），莫斯科匯兌銀行，莫斯科商業銀行，莫斯科私人銀行……	504.3	391.1	895.3
(十九個銀行) 共計……	1,869.0	2,080.5	3,949.5

按照這個統計表來看，約達四十萬萬盧布的大銀行『活動』資本總額中，有四分之三以上，即三十萬萬多盧布，屬於實際上是外國銀行底『女兒公司』的銀行；在這些外國銀行中佔首要地位的，便是巴黎的銀行（著名的三大銀行：『巴黎聯益銀行』，『巴黎荷蘭銀行』，『總公司』）和柏林的銀行（特別是『德意志銀行』和『匯兌公司』）。俄國兩個最大的銀行，即『俄羅斯銀行』（『俄羅斯國外貿易銀行』）和『國際銀行』（『聖彼得堡國際商業銀行』），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二年的時期中，將其所有的資本由四千四百萬盧布增加到了九千八百萬盧布，而將其所有的準備金由一千五百萬增加到了三千九百萬盧布，『其中四分之三是用德國資本經營的』；前一個銀行屬於柏林『德意志銀行』所領導的『康采恩』，後一個銀行屬於柏林『匯兌公司』所領導的『康采恩』。慈善的阿哈德所深為憤慨的，是柏林銀行握有大部分的股票，致使俄國股東毫無力量。自然，輸出資本的國家總是獲得最多的利益：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銀行』，在柏林發行了『西伯利亞商業銀行』底股票，而把這些股票放在自己的櫃子裏藏了一年之後，便以百分之一百九十三的價格出售，即幾乎是以多一倍的價格出售而『賺得了』約六百萬盧布的利潤，即希法亭所稱呼的『創業利潤』。

據該書作者計算，彼得堡各最大銀行底全部『實力』等於八十二萬三千五百萬盧布，即幾達八十三億之多，同時作者又把各個國外銀行底『參與』，或更正確點說，各外國銀行底統治分配如下：法國銀行佔有百分之五十五，英國銀行佔有百分之十，德國銀行佔有百分之三十五。據作者計算，在這八十二萬三千五百萬活動資本總數中，有三十六萬八千七百萬，即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屬於各新迪加，即『煤炭銷售公司』，『五金銷售公司』¹⁰⁰，煤油新迪加，冶金業新迪加，水泥新迪加。可見，由於資本家壟斷公司形成的關係，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溶合的過程，在俄國也有了長足的進步。

集中於少數人掌握而享有實際壟斷權的財政資本，因從事於創辦企業，發行有價證券，經營國家公債票等等活動，而獲得有加無已的巨量利潤，以鞏固財政寡頭底統治，替壟斷者去向全社會徵收貢賦。以下便是希法亭從美國托拉斯實行『經營』的無數例子中引來的一個例子：一八八七年加福美爾把十五個小公司合併成爲一個糖業托拉斯，其資本總額等於六百五十萬美金。這個托拉斯底資本，如美國人所說的那樣『滲了水』，而估定爲五千萬美金。這樣『提高資本額』是預期到未來的壟斷利潤的，正如同美國的鋼業托拉斯，因預期未來的壟斷利潤而購買了很多很多的鐵礦山一樣。果然，這個糖業托拉斯規定了壟斷性的價格，而獲得了很大的收入，結果竟能爲『滲水』七倍計算的資本支付百分之十的股息，即能爲在創辦托拉斯時實際上所交納的資本支付幾達百分之七十的股息！到一九〇九年時，這個托拉斯底資本已等於九千萬美金。在二十二年以內，資本數量增加了十倍以上。

在法國，『財政寡頭』底統治（『反對法國財政寡頭』一語，是李濟斯在一九〇八年印行第五版的那部名著之標題），只是所取的形式稍有不同而已。四個最大的銀行，在發行有價證券方面所享有的，並不是相對的壟斷權，而是『絕對的壟斷權』。事實上這是『幾個大銀行所組成的托拉斯』。壟斷權也就使它們能用發行證券的辦法獲得壟斷利潤。在締結借款條約時，借債方的國家所得到的，通常不會超過總數百分之九十；其餘百分之十，便由銀行和其他中介人拿去了。銀行從四萬萬佛郎的中俄公債中所得到的利潤是百分之八，從八萬萬佛郎的俄國公債（一九〇四年）中所得到的利潤是百分之十，從六千二百五十萬佛郎的摩洛哥公債（一九〇四年）中所得到的利潤，是百分之十八又四分之三。資本主義底發展是以小規模的高利貸資本開始，而以極大規模的高利貸資本結束的。李濟斯說道：『法蘭西人是全歐洲的高利貸主』。一切經濟生

活條件，因資本主義這種蛻化而發生了深刻的變更。在人口，工業，商業和海運等等停頓時，『國家』却能藉高利貸來發財致富。『拿出八百萬佛郎資本的五十個人，能够指揮四個銀行所有二十萬萬佛郎』。我們所說過的那個『參與』制，也產生出同樣的結果。最大銀行之一的『總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爲『女兒公司』『埃及製糖廠』發行了六萬四千張債券。發行底行市是百分之一百五十，即是銀行從每一個盧布上賺得了五十個哥比。後來這個『女兒公司』底股息結果表明是虛假的時候，『大眾』便損失了九千萬至一萬萬佛郎，而『總公司』底經理之一，便是『製糖廠』底董事。無怪乎這位作者不得不作出結論說：『法蘭西共和國是財政寡頭專制國』。『財政寡頭統治一切，既宰制報紙，又宰制政府』*。

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底主要業務之一，其特別高度的利潤，在財政寡頭制底發展與鞏固中有極重大的作用。德國的銀行雜誌寫道：『在本國內部，沒有那一種事業，能獲得近似於在發行外國公債時作中介所賺得的那樣高度的利潤』**。

『沒有那一種銀行業務，能像發行證券的事業那樣獲得高度的利潤』。據德意志經濟學家所作的統計，因發行工業企業證券而獲得的每年平均利潤數目如下：

1895年	38.6%	1898年	67.7%
1896年	36.1%	1899年	66.9%
1897年	66.7%	1900年	55.3%

『在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〇年的十年間，因發行德國工業證券而『賺得』的金錢，計達十萬萬以上』***。

在工業高漲時期，財政資本獲得無限大的利潤，而在衰落時

*見李濟斯所著反對法國財政寡頭一書 (Lysis. «Contre l'oligarchie financière en France»), 第五版(一九〇八年巴黎版), 第一一頁, 第一二頁, 第一六頁, 第三九頁, 第四〇頁, 第四八頁。

**見銀行雜誌, 一九一三年, 第七期, 第六三〇頁。

***見史迪里赫所著前篇, 第一四三頁; 並見桑巴德所著十九世紀的德國國民

期，小企業和不穩固的企業就陷於滅亡，大銀行便『參與』賤價收買這些企業的事業，或『參與』獲利的『整理』和『改組』這些企業的事業。在『整理』這些虧本企業時，『股票資本跌價，即收入是按照較小的資本量來分配，以後便把這種資本量當作基礎來計算收入了。或者倘若收入降低到零時，便吸收新的資本，把這種新資本與收入微細的舊資本結合起來，便能產生充分的收入了』。『而且，——希法亭又補充道，——現在這一切整理和改組手續，對於銀行有雙重的意義；第一，這是一種獲利的業務，第二，這是迫使窘乏的公司依賴於銀行的一種良好機會』*。

請看如下的例子。多特蒙德的礦業『聯合』股份公司，是在一八七二年創辦的。所發行的股票資本幾乎等於四千萬馬克，而當第一年獲得百分之十二的股息時，股票市價便漲到百分之一百七十。財政資本就揩到了油，而賺得了二千八百萬的『小利』。在創辦這個公司的時候起了重要作用的，又是那個很順利地把自己的資本增加到了三萬萬馬克的最大德國銀行，即『匯兌公司』。後來『聯合』股份公司底股息降低到零了。股東們只好贊成『勾銷』資本，即喪失一部分資本，以免喪失全部資本。於是經過多次『整理』的結果，在三十年以內便從『聯合』股份公司賬簿上消失了七千三百萬以上的馬克。『現在，這個公司原先的股東們手裏所有的股票，只剩下票面價值百分之五了』**，而銀行在每次『整理』中，却繼續『賺錢』。

把發達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拿來做投機生意，也是財政資本所經營的一種特別有利益的業務。在這方面，銀行壟斷權是與地租壟斷權及交通壟斷權結合起來了，因為土地價格的增加，把土地

經濟一書 (W. Som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19. Jahrhundert“), 第二版(一九〇九年), 第五二六頁, 附錄(八)。

*見財政資本一書, 第一七二頁。

**見史達里赫所著前書, 第一三八頁, 以及李甫曼所著前書, 第五頁一。

分成小塊出售獲利的機會等等，首先是依這些土地與城市中心的交通是否便利為轉移，而這些交通纔是操在經過參與制和分配經理位置而與這些銀行相聯繫的大公司掌握中的。結果便形成了銀行雜誌職員，專門研究土地貿易及土地典押等事業的德國作家愛施維格所謂『泥潭』的局面：經營城郊土地買賣事業的投機狂，各建築公司的破產（如柏林的『波斯瓦一克諾爾公司』的破產，這個公司因『最富足和最強大的』『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之助，抓得了達一萬萬馬克的巨款，而這個銀行，當然是經過『參與』制，即暗地裏，在背後動作，並且『不過』損失了一千二百萬馬克，便卸去了一切責任的），從那些浮吹的建築公司方面一無所得的小業主和工人們的破產，以及與『廉潔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機關勾結，用欺騙手段包辦頒發基地證書和市議會關於允准建造的文據等等*。

『美國人的風俗』，本來是歐洲的教授們和慈善的資產者所假意厭棄的，而在財政資本時代，却簡直成了各國一切大城市中流行的風俗了。

一九一四年初，在柏林傳說要組織一個『運輸托拉斯』，即由三個柏林運輸企業（城市電氣鐵路公司，電車公司和公共馬車公司）組成一個『同益』公司。銀行雜誌載道：『當公共馬車公司底大部份股票轉到其他兩個運輸公司手裏的消息傳出時，我們就知道有這一種計劃存在……本來可以完全相信抱這種目的的人所說的話，他們是希望用統一調節運輸事業的方法來達到相當的節省，其中有一部份利益終究是能歸大眾享受的。但這個問題複雜化了，因為站在這個新創的運輸托拉斯背後的，是能隨意利用所壟斷的交通工具去適應其地段貿易利益的銀行。爲要相信這種完全斷語合理，祇須記起一件事實，就是在創辦城市電氣鐵路公司時，鼓勵創辦該公司

*見愛施維格所著泥潭一文（L. Eschwege: „Der Sumpf“），載於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九五二頁；同上，一九一二年第一期，第二二三及往下各頁。

的那個大銀行底各種利益就已經滲合進來了。換句話說，這個運輸企業利益是和地段貿易利益互相錯綜的。原來，這條城市電氣鐵道東面的支線必須經過屬於銀行的那些地段，而當該路建設工程已有保證時，銀行便把這些土地賣出去，結果是使自己和幾個參與人獲得了巨量的利潤』*…

壟斷既然已經形成而操縱着幾十萬萬的資本，便絕對必然要深入於社會生活所有各方面，而不管政治制度或是任何其他『細節』怎樣。在德國經濟文獻上，通常都是阿諛式地讚美自己普魯士官吏的廉潔，而指摘法國人的巴拿馬式舞弊習氣¹⁷⁰或美國人的政治賄賂風氣。但是，實際上，甚至專論德國銀行事業的資產階級作品，也不得不時常遠遠越出單純銀行業務的範圍，例如，因官吏們轉到銀行中去服務的事實增多，而不得不論及『鑽營銀行位置的狂熱』：『在培倫街』（即『德意志銀行』所在地）『暗中鑽營肥缺的德國官吏，還有不受賄賂的麼』**？銀行雜誌出版人藍斯堡在一九〇九年著作了一篇標題為拜占廷式侵略政策底經濟意義的論文，曾說及威廉第二到巴力斯坦的旅行，以及『這次旅行的直接結果，即巴格達鐵道的建築』，而認為『這一件不幸的『德意志進取精神的大事件』，對於德國受到『包圍』一事』（所謂『包圍』是指愛得華第七底政策，他曾企圖孤立德國，而用帝國主義的反德同盟來包圍它）『應負的責任，要比我們所作的一切政治錯誤所負的責任還大』***。我們已經提過的常在這個雜誌上撰稿的作家愛施維格，在一九一一年寫了標題為『財閥和官吏』的論文，其中揭露了一位

*引自運輸業托拉斯一文 („Verkehrstrust“)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八九頁。

**引自鑽營銀行位置的狂熱一文 („Der Zug zur Bank“) ，見銀行雜誌，一九〇九年，第一期，第七九頁。

***見同上一期銀行雜誌，第三〇一頁。

德國官吏菲爾克爾底行爲。菲爾克爾本來是卡德爾問題研究委員會中的委員，嘗以努力作事見稱，而不久以後就在最大卡德爾（鋼鐵新迪加）中獲得了一個肥缺。這一類全非偶然的事件，便使這位資產階級的作家不得不承認說，『德國憲法在許多經濟生活方面所担保的經濟自由，都已成爲毫無意思的紙上空文』，在現有的財閥統治下，『甚至最普遍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使我們避免淪爲不自由人民的厄運』*。

至於講到俄國，那我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夠了。數年前，所有報紙都記載過一個消息，說信貸局經理達維道夫離開政府職務，而在一個大銀行中獲得了一個位置，按照合同，他在數年中所得的薪俸，就要超過一百萬盧布以上。這個信貸局是個行政機關，其任務是『要統一全國一切信貸機關底活動』，並供給了首都各銀行八萬萬以至十萬萬盧布的津貼**。

資本主義底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佔有權與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分離，貨幣資本與工業資本或生產資本分離，單靠從貨幣資本上獲得收入爲生的食利者與企業家及其他一切直接參加資本運用事業的人們分離。帝國主義或財政資本統治，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此時這種分離已達到了極大的程度。財政資本超越於其他一切資本形式的事實，是表明食利者和財政寡頭佔有統治地位，是表明少數佔有財政『實力』的國家超越於其餘一切國家。至於這一過程已經達到了怎樣大的程度，可以從發行證券——發行各種有價證券——的統計中看出來。

賴馬克在國際統計研究所公報***上公佈了關於全世界發行證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一年第二期，第八二五頁；一九一三年第二期，第九六二頁。

**見阿哈德所著前書，第二〇二頁。

***國際統計研究所公報 (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第十九卷，第二冊，一九一二年海牙版。——統計表第二欄，即關於各個小國家的材料，大體上是按一九〇二年的標準擬定而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券最周詳，最完備而且可以比較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後來在經濟書籍中屢次分別引用過的。以下便是四個十年間的總結：

每十年內發行證券的數目(單位十萬萬佛郎)

1871—1880.....	76.1
1881—1890.....	64.5
1891—1900.....	100.4
1901—1910.....	197.8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特別是由於在普法戰爭以及戰後德國創業艱難時代加緊發行公債的關係，全世界發行證券的總數提高了。

一般和大體說來，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個十年間，增加速度比較還不很快，直到二十世紀最初十年間，才大量增加起來，十年之內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見，二十世紀初期，是一個轉變時代，不僅是在壟斷組織（卡德爾，新迪加，托拉斯）增長上發生了轉變（關於這點我們已經說過了），而且是在財政資本增長上也發生了轉變的時代。

據賴馬克估計，一九一〇年全世界有價證券總數，約有八千一百五十萬萬佛郎。他爲了刪去重複的大概數目，便把這個總數減到五千七百五十萬萬至六千萬萬佛郎。以下便是這個數目在各國間的分配情形（此地所引用的總數是六千萬萬）：

一九一〇年有價證券數目表(單位十萬萬佛郎)

英國..... 143	}	荷蘭..... 12.5
美國..... 153		比利時..... 7.5
法國..... 110		西班牙..... 7.5
德國..... 95		瑞士..... 6.35
俄國..... 31		丹麥..... 3.75
奧匈..... 34	瑞典、挪威、	
意大利..... 14	羅馬尼亞及	
日本..... 19	其他國家..... 3.5	
		總 共..... 600

根據這些數字，立刻便可看出，四個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是非常特出的，它們各佔有自一千萬萬至一千五百萬萬佛郎不等的有價證券。其中有兩個是最老而且是——這點我們往下就要說到——擁有殖民地最多的資本主義國家，即英國和法國；其他兩國是在發展速度方面和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在生產中散佈程度方面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即美國和德國。這四個國家一共擁有四千七百九十萬萬佛郎，即約佔全世界財政資本百分之八十。差不多全世界其他各國，都是這樣或那樣成爲這四個國家，這四個國際銀行家，這四個全世界財政資本『棟樑』底債務人和納貢者了。

現在，我們就要來特別考察資本輸出在造成財政資本國際依賴與聯繫網這一事業中所起的作用。

(四)資本輸出

自由競爭佔完全統治的舊資本主義底特徵是商品輸出。壟斷制佔統治的現代資本主義底特徵是資本輸出。

資本主義是發展到了最高階段的商品生產，此時勞動力也成爲商品了。國內交換，尤其是國際交換之發展，就是資本主義底明顯特徵。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工業部門和各個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和躍進性，是必不可免的。英國成爲資本主義國家，比其他各國都早，到十九世紀中葉時，它施行自由貿易，希圖成爲『環球作坊』，成爲供給所有各國製品的承辦人，而所有其他國家就應當供給它各種原料，作爲交換。但英國底這種壟斷地位，至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時期已被破壞了，因爲當時其他許多國家都用『保護』關稅實行自衛，而發展成爲獨立資本主義國家了。二十世紀開始時，已形成了另外一種壟斷制：第一，在所有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都形成了資本家底壟斷聯合；第二，那些資本蓄積達到極大程度的少數最富國家已處於壟斷地位。結果在先進國家裏就出現了巨量的『過剩資本』。

倘若資本主義能把現在到處都遠遠落後於工業的農業發展起來，倘若資本主義能把雖有驚人技術進步發生，而到處都仍然還是半飢半飽，乞丐不如的民衆生活水準提高起來，那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麼資本過剩了。用小資產階級觀點批評資本主義的人，也就是往往提出這種『理由』的。但是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就不會是資本主義了，因為發展上的不平衡性和大衆生活的貧困，是這種生產方式底根本必要條件和前提。當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時，過剩資本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衆生活底水準，因為這樣便會降低資本家底利潤，而是要把資本輸出到落後國家去，藉以提高利潤的。在這些落後國家中，因為缺少資本的關係，利潤通常都是很高，地價較低，工資低廉，原料便宜。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可能，是因為許多落後國家已經捲入世界資本主義流通範圍，鐵道的主要路線已經建設起來或已在開始建設；發展工業的起碼條件已有保障等等。其所以有輸出資本的必要，是因為資本主義在少數國家中已經『成熟過度了』，『獲利的』投資場所已是不够了（在農業不發達與羣衆貧困的條件下）。

以下便是三個主要國家在國外所投資本的大概數目 *：

投在國外的資本(單位十萬萬佛郎)

年份	英國	法國	德國
1869年	5.6	—	—
1873年	15	10(1869年)	—
1889年	33	15(1880年)	?
1893年	43	30(1890年)	?
1903年	62	27—37	13.5
1914年	75—100	60	44

*見霍柏森所著帝國主義一書(“Hobson: Imperialism”)，一九〇二年倫敦版，第五八頁；黎舍爾所著前書，第三九五頁和第四〇四頁；安恩特(P. Arndt)所寫一文，見全世界經濟文匯(„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一九一六年版，第七卷，第三五頁；賴馬克所著一文，見公報(Neymarck, Bulletin)；

由此可見，資本輸出是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的時候，才大規模發展起來的。在大戰前夜，三個主要國家在國外所投的資本，已達一千七百五十萬萬以至二千萬萬佛郎。按最低限度的利率五厘計算，從這一數目上所得的收入，每年當達八十萬萬以至一百萬萬佛郎。這就是帝國主義壓迫剝削全世界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實基礎，也就是少數最富國家中資本主義寄生性底堅實基礎！

這種投在外國的資本究竟怎樣分配於各個國家以及究竟投在什麼地方，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祇能給個大概的回答，但這個大概的回答，也能說明現代帝國主義底某些普遍的相互關係和聯繫：

國外資本分配於世界各洲的大概情形(一九一〇年左右)

(單位十萬萬馬克)

	英國	法國	德國	總數
歐洲.....	4	93	18	45
美洲.....	37	4	10	51
亞洲,非洲,澳洲	29	8	7	44
共計.....	70	55	35	140

希法亭所著財政資本一書，第四九二頁；路易·喬治 (Lloyd-George) 一九一五年五月四日在英國下議院的演說，見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出版的每日電聞 ("Daily Telegraph")；哈爾斯所著全世界經濟問題一書 (B. Harms: „Probleme der Weltwirtschaft“)，一九一二年耶拿版，第二三五及往下各頁；施里德爾博士所著全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一書 (Siegmond Schilder: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Weltwirtschaft“)，一九一二年柏林版，第一卷，第一五〇頁；皮施所著大不列顛資本之投殖等等一文 (George Paish: „Great Britain's Capital Investments etc.“)，見皇家統計學會雜誌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第七十四卷，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號，第一六七及往下各頁；吉烏里奇所著德國底經濟發展與德國銀行在國外的擴展一書 (Georges Dioritch: „L'Expansion des banques allemandes à l'étranger, ses rapports avec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Allemagne“)，一九〇九年巴黎版，第八四頁。

在英國佔居首要地位的，是它的殖民地的領土，它在美洲也有很多的殖民地（例如坎拿大），亞洲以及其他地方更不必說了。英國巨量資本的輸出，是與巨量的殖民地領土有極密切關係的，關於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意義，我們以後還要講到。法國情形却不是如此。它輸到國外的資本，主要是投在歐洲，首先是投在俄國（至少有一百萬萬佛郎），並且多半是借貸資本，國家公債，而不是投在生產企業中的資本。法國帝國主義與佔有廣大殖民地的英國帝國主義不同，可以叫做高利貸的帝國主義。德國帝國主義又是另外一種帝國主義：它的殖民地不多，它投在國外的資本，要比其他各國更為平均地分配於歐美兩洲之間。

資本的輸出，在所輸到的那些國家中，是要影響到那裏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且異常加速這種發展的。因此，資本的輸出，在某種程度上固然是引起輸出國發展上相當的停滯，但這種停滯又只會使資本主義在全世界上擴大加深其向前的發展。

輸出資本的國家，幾乎是常常有機會獲得相當的『利益』，這種利益底性質就能暴露財政資本和壟斷組織統治時代底特性。例如柏林的銀行雜誌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寫道：

『在國際的資本市場上，近來表演着一種很值得亞力斯多芬舉筆描寫的滑稽劇。很多的外方國家，自西班牙到巴爾幹，自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向巨大的貨幣市場公開或祕密地要求借款，有時是十分急迫地要求借款。現在，貨幣市場上的情形並不怎樣美妙，而政治的前途也不可樂觀。但是，沒有一個貨幣市場敢於拒絕發給借款，因為生怕鄰國捷足先登，同意借款，而相繼獲得相當報酬。在締結這種國際契約時，債權人幾乎是常常多沾利益的：商務條約上的優惠條件，開設煤站，建設海港，利益豐厚的租借，定購大炮』*。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三年第二期，第一〇二四頁。

財政資本造成了壟斷組織統治的時代。而壟斷組織到處都施行壟斷的原則；利用『聯繫』來訂立有利的契約，以代替公開市場上的競爭。最普遍的現象，就是規定拿一部份債款來購買債權國底出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作為借款的條件。法國在最近二十年來（一八九〇至一九一〇年）時常採用這種手段。資本輸出成了鼓勵商品輸出的手段。在這種情形下，各個特別巨大企業彼此訂立的契約，往往——如施里德爾所『柔和』描寫的那樣*，——『近於收買行徑』。德國的克虜伯，法國的司奈德，英國的阿姆司脫龍，便是這種商號底標本，它們與巨大銀行和政府皆有祕密的聯繫，在締結借款條約時，是不易『避開』它們的。

法國借款給俄國的時候，便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十六日締結的商務條約上把它『逼迫了』一下，而獲得相當的讓步，直至一九一七年為止；同樣，法國根據它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與日本締結的商務條約，也從日本方面獲得了相當的讓步。奧國和塞爾維亞兩國關稅戰爭，從一九〇六年開始，一直繼續到一九一一年，而只有過七個月的休戰，其一部份原因就是奧國和法國在供給塞爾維亞軍需品方面發生的競爭。德沙尼爾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在衆議院中說道，法國各商號在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一年間供給了塞爾維亞價值四千五百萬佛郎的軍用品。

奧匈帝國駐沙保羅（巴西）領事在工作報告中說道：『巴西鐵道建築工程，大部分是用法比英德等國資本進行的；這些國家在簽訂與鐵道建築工程相關連的財政手續契約時獲得了供給鐵道建築料的特權』。

由此可見，財政資本真可說是把它的密網佈滿於世界各國了。在這方面，建立於殖民地的銀行和分行，實有很大的作用。德國帝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三四六，三五〇及三七一等頁。

國主義者看見『老牌』殖民帝國在這方面特別『順利』的情形，真是羨慕不已：在一九〇四年，英國有五十個殖民地銀行和二千二百七十九個分行（一九一〇年，有七十二個銀行和五千四百四十九個分行），法國有二十個殖民地銀行和一百三十六個分行，荷蘭有十六個殖民地銀行和六十八個分行，而德國却『祇有』十三個殖民地銀行和七十個分行*。美國資本家又妬羨英德兩國資本家，而於一九一五年訴說道：『在南美洲，五個德國銀行有四十個分行，五個英國銀行有七十個分行…在最近二十五年來，英德兩國在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投了四十萬萬美金左右的資本，結果它們支配了這三國裏面全部商業百分之四十六』**。

在假借的意義來講，輸出資本的國家已把世界分完了。但財政資本又達到了實行直接分割世界。

（五）各資本家同盟彼此分割世界

資本家底壟斷同盟，即卡德爾，新迪加，托拉斯，首先就分割國內市場，將本國生產幾乎完全奪入自己掌握之中。但是，在資本主義下，國內市場是必然和國外市場相連的。資本主義早已造成了全世界的市場。所以隨着資本輸出之增加，隨着一切國外聯系和殖民地聯系之擴大，隨着最大壟斷同盟底『勢力範圍』之擴張，便『自然』要發生它們相互間的國際協定，形成國際卡德爾。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第四版，第三七五頁，並見吉烏里奇所著前書，第二八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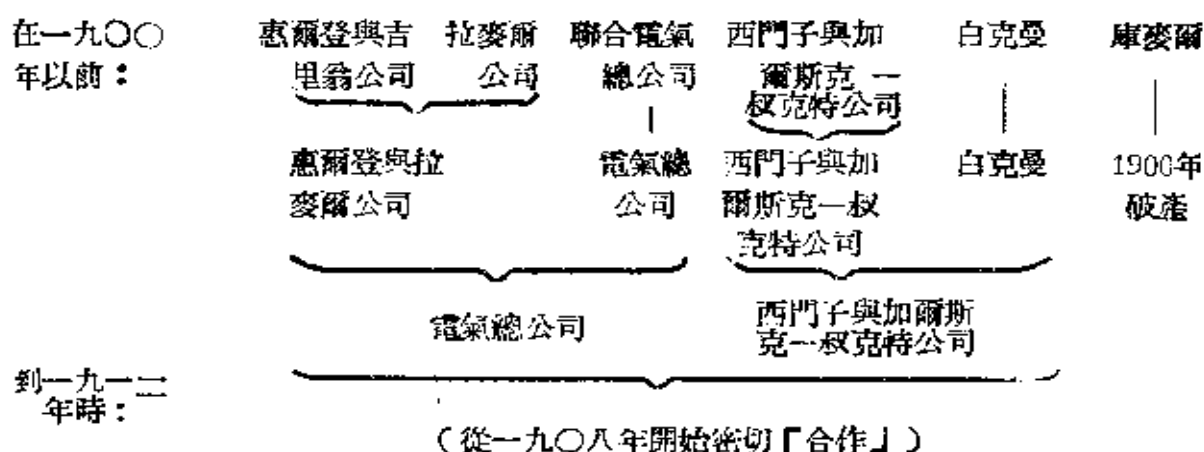
**見美國政治和社會科學研究院紀事刊（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五十九卷，一九一五年五月出版，第三〇一頁。在同卷第三三一頁上又指明說，有名的統計學家皮施在財政雜誌統計家（“Statist”）最近一期上發表的論文中，認為英德法比荷五國所輸出的資本總數，計有四百萬萬美金，即等於二千萬萬佛郎。

這便是全世界資本集中和生產集中底新階段，較先前集中程度高得無比。我們且來看看這種超等壟斷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吧。

電氣工業是最足以代表最新技術進步和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的工業部門。這個工業部門，在兩個最先進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即美國和德國，是最為發達的。在德國，一九〇〇年的危機，特別厲害地加緊了這工業部門的集中。當時那些已與工業充分密切混合生長了的銀行，在這個危機時期更極度加速加深了較小企業崩壞的過程，較小企業被大企業吞併的過程。『凡最需要銀行幫助的那些企業，——愛德思寫道，——銀行恰巧拒絕予以幫助，於是那些和銀行無密切關係的公司，起初雖有過瘋狂的興盛，後來却遭遇了無可救藥的破產』*。

結果，在一九〇〇年以後，集中過程便大步前進了。在一九〇〇年以前，電氣工業中有七八個『集團』，其中每個集團都包含有數個公司（總共有二十八個公司），每個集團背後站着有兩個以至十一個銀行。到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時，所有這些集團都合併成爲兩個或一個集團了。且看這個過程是怎樣發展的：

電氣工業中的集團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二三二頁。

這樣發展起來的著名的『電氣總公司』，一共統治着一百七十五至兩百個公司（經過『參與』制），其所支配的資本總共約十五萬萬馬克。單就它的國外直接代表機關數目來說，就有三十四個，其中十二個是股份公司，分佈於十多個國家中。還在一九〇四年的時候，德國電氣工業在國外所投的資本，已經等於二萬三千三百萬馬克，其中有六千二百萬是投在俄國的。不用說，這個『電氣總公司』是一個極大的『聯合』企業，單就它所有的製造公司數目來說，便有十六個，這些公司製造着各種不同的產品，從被覆線和隔電器起，直至汽車以及航空器具止。

但是，歐洲的集中過程，也就是美國集中過程底一個組成部分。其經過情形如下：

總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

美國	湯姆生、霍斯東公司爲歐洲創設了一個公司	愛迪生公司爲歐洲創設了『法國愛迪生公司』，後者又把專賣權轉讓給德國公司
德國	聯合電氣公司	電氣總公司 (A.E.G.)

電氣總公司(A.E.G.)

這樣便形成了兩個電氣『強國』。『世界上沒有一個完全不倚賴於它們的電氣公司了』，——海尼格在他那篇標題爲電氣托拉斯之路的論文中這樣寫道。關於這兩個『托拉斯』底週轉和企業規模，下列數目字便能使我們得到一個很不完全的大概觀念：

	商品週轉 (單位百萬馬克)	僱員人數	純利 (單位百萬馬克)
美國的『總電氣公司』 (G.E.C.).....	1907年： 259	38,000	35 +
	1910年： 398	52,000	45.6
德國的『電氣總公司』 (A.E.G.).....	1907年： 216	30,700	14.6
	1911年： 563	60,800	21.7

一九〇七年，美國的托拉斯和德國的托拉斯締結了分割世界的條約。競爭便從此停止了。美國的『總電氣公司』『獲得了』美國和坎拿大；德國的『電氣總公司』『分得了』德國，奧國，俄國，荷蘭，丹麥，瑞士，土耳其和巴爾幹。關於『女兒公司』，又締結了特殊的——當然是祕密的——條約，這些『女兒公司』逐漸侵入新的工業部門以及『新的』而表面上尚未分割的國家中去。此外，條約上還規定互相交換新發明和實驗成績*。

要和這個實際上是統一的，全世界的，支配有數十萬萬資本，在天涯地角都有其『支店』，代表機關，代辦處及聯系等等的托拉斯來競爭，不待說是很難很難的。但是，這兩個強大托拉斯分割世界的事實，當然並不能排除在勢力對比因不平衡發展，戰爭，破產等等的關係而發生變更時實行重新分割世界的可能。

煤油工業便是企圖實行這種重新分割，為重新分割世界而鬥爭的一個極可注意的例子。

『世界的煤油市場，——愛德思在一九〇五年寫道，——現在還是由兩個巨大財政集團所割據着，這兩個集團便是美的國洛克費爾『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和俄國的巴庫煤油田主人路特希理德與諾貝爾。這兩個集團彼此有密切的聯系；但是幾年以來，它們的壟斷地位已受到五大敵人方面的威脅**：（一）美國煤油源的窮竭；（二）巴庫的曼德舍夫公司方面的競爭；（三）奧國的煤油源；（四）羅馬尼亞的煤油源；（五）海外的煤油源，特別是荷屬殖民地（極富足的『撒姆爾』公司和『協爾』公司，也是與英國資本有聯系的）。後面三批企業是與最大的『德意志銀行』所領導的那些德國大銀行有聯系的。這些銀行有條不紊地獨自發展煤油業，例如在羅馬尼亞，以求獲得它們『自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吉烏里奇所著前書，第二三九頁；海尼格所著同前一文。

**見愛德思所著前書，第一九三頁。

己的』據點。在羅馬尼亞煤油業中，一九〇七年計有外資一萬八千五百萬佛郎，其中德資佔七千四百萬』*。

經濟作品中逕直稱爲『分割世界』的鬥爭開始了。一方面，洛克費爾底『美孚油公司』想要奪得一切，便在荷蘭境內設立了『女兒公司』，收買荷屬印度的煤油源，想以此打擊它的那個主要敵人，即英荷合資創辦的『協爾』托拉斯。另一方面，『德意志銀行』及其他柏林銀行又力求把羅馬尼亞『保持』在『自己』手裏，而把它與俄國統一起來反對洛克費爾。但是，洛克費爾佔有更大得多的資本，且擁有運輸煤油和輸送煤油給消費者的卓越組織。這個鬥爭結果必然要使『德意志銀行』遭到失敗，而且真正在一九〇七年遭到了完全失敗，此時『德意志銀行』只有兩條出路：或是甘願受到數百萬損失而取消它的『煤油利益』，或是屈服。結果『德意志銀行』選定了後一條出路，而與『美孚油公司』訂結了很不利於自己的條約。照此條約，『德意志銀行』必須『不作任何損害美國利益的經營』，但同時又規定，在德國一旦通過政府壟斷煤油的法律時，這個條約便應失其效力。

『煤油趣劇』從此開始了。德國一個財政大王格文涅爾爵士，即『德意志銀行』經理，委託他的私人書記史道斯開始進行主張煤油壟斷的宣傳。這個最大柏林銀行底全部龐大機關及其所有一切廣泛的『聯系』都一齊動作起來，報章上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喊聲，說要反對美國托拉斯方面的『羈軛』。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五日德國國會幾乎是一致通過決議，請政府製定煤油壟斷法案。政府馬上響應了這個『大衆歡迎的』主張，於是『德意志銀行』想欺騙其美國對手，用國家壟斷的手段來補繕自己業務的這一套把戲，就好像是已經獲得勝利了。德國煤油大王

*見吉烏里奇所著前書，第二四五頁。

已在預嘗着不亞於俄國糖廠主人的那種巨量利潤的滋味……但是第一，德國各大銀行彼此發生了分贓的爭執，『匯兌公司』揭露了『德意志銀行』貪求私利的企圖；第二，政府害怕與洛克費爾鬥爭，因為德國能否不必經過洛克費爾而獲得煤油，是很成問題的（因為羅馬尼亞的生產率不大）；第三，一九一三年德國要花費十萬萬金錢去從事於戰爭的準備。壟斷的法案擱置下去了。鬥爭結果是洛克費爾『美孚油公司』暫時獲得了勝利。

柏林銀行雜誌論到這點時寫道，德國祇有施行電氣壟斷，變水力為廉價的電氣，才能與『美孚油公司』鬥爭。但是，——銀行雜誌補充說道，——『電氣壟斷制，只有生產者需要它的時候，才會成立的；就是說，只有在下一次電氣業大危機已經逼近，而各私家電氣『康采恩』現時在各處所設立，並且已從市政局和政府等等方面獲得了某些部分壟斷權的那些高昂的巨型電站，處於不能獲利的時候，才會成立的。到那時候，就會必須採用水力；但是也不能由政府出資來把水力變成廉價的電氣，而還是必得交給『受政府監督的私人壟斷組織』去經營，因為私資工業已經訂立了許多契約而商定了可以取得巨量的償金……以前加里業的壟斷是如此，現在煤油的壟斷是如此，將來電氣的壟斷也會是如此。我們的那些迷戀於美妙原則的國家社會主義者，畢竟應當瞭解：德國實行的壟斷制，從來也沒有抱定想使消費者獲得利益或給政府一部分企業利潤的目的，當然也就沒有達到過這樣的結果，而始終都是由國家負責來挽救將近破產的私人工業的一種手段』*。

德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不得不作出這種寶貴的供認。在這裏，我們很清楚地看到，私人的壟斷和國家的壟斷在財政資本時

*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二年第一期，第一〇三六頁；一九一二年第二期，第六二九頁；一九一三年第一期，第三八八頁。

代怎樣連成一氣，它們兩者實際上不過是各最大壟斷者爲分割世界所進行的帝國主義鬥爭中的個別環節。

商航事業方面集中過程莫大的增長，也引起了分割世界的結果。德國形成了兩個最大的公司，即『漢堡美洲定期輪船公司』和『北德路易郵船公司』，各有資本二萬萬馬克（股票和債券）和價值一萬八千五百萬至一萬八千九百萬馬克的輪船。另一方面，美國在一九〇三年一月一日成立了所謂摩爾根托拉斯，叫做『海上貿易國際公司』，它把美英兩國九個輪船公司統一起來，擁有資本一萬二千萬美金（四萬八千萬馬克）。德國資本大王們和這個美英兩國托拉斯間，在一九〇三年時就因分配利潤而締結了分割世界的條約。德國的公司放棄了在英美兩國間轉運事業上的競爭。條約上很明確規定那些海港『屬於』誰，並且成立了一個共同的監察委員會等等。條約有效期限是二十年，但規定有一個附帶條件：在一旦發生戰爭時，該約即應失其效力*。

國際鐵軌卡德爾形成的歷史，也是異常耐人尋味的。英比德三國的鐵軌製造廠在一八八四年間，即工業情形極端衰落的時候就第一次作過組織這樣一個卡德爾的嘗試。加入協約的各國工廠，同意彼此不競爭各訂約國內部的市場，而把國外市場按如下標準分割了：英國獲得百分之六六，德國獲得百分之二七，比利時獲得百分之七。印度完全給予英國。爲了反對一個沒有加入協約的英國公司，便合力舉行進攻，而照商品賣價總量中抽取相當部分來補償這一進攻的耗費。但到一八八六年時，就有兩個英國公司退出了同盟，而這個同盟便從此瓦解了。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後來發生的幾次工業興盛的時期中，始終沒能達到過協定。

一九〇四年初，在德國成立了鋼業新迪加。一九〇四年十一

*見黎舍爾所著前書，第一二五頁。

月，又按如下標準而把『國際鐵軌卡德爾』恢復起來了：英國獲得百分之五三點五；德國獲得百分之二八點八三；比利時獲得百分之一七點六七。後來法國也加入了，它在第一，第二，第三年中所獲得的份額是在超過百分之百以上的總數中佔有百分之四點八，百分之五點八和百分之六點四，即是在達到百分之一〇四點八，百分之一〇五點八和百分之一〇六點四的數目中獲得上述的部分。一九〇五年，又有美國的『鋼業托拉斯』（『鋼業公司』）加入進來，隨後奧國和西班牙也加入了。『現在，——福格爾施坦在一九一〇年間寫道，——地球已經分完了，於是大消費者，尤其是國營鐵道，也就因為世界已被分割完結而又沒有顧及它們利益的關係，可以像仙人一樣到天宮裏去隱居了』*。

此外還有一九〇九年成立的國際鋅業新迪加，它在德比法西英五國工廠所組成的五個集團間正確地分配了生產的分量；還有國際火藥托拉斯，它據李甫曼說，『是德國所有一切炸藥製造廠間最新式的密切的同盟，後來這些製造廠與法美兩個同樣組成的炸藥製造廠共同分割了全世界』**。

照李甫曼計算，德國所參加的國際卡德爾在一八九七年約有四十個，而在一九一〇年便有一百個左右了。

有些資產階級的作家（完全叛變了自己所持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例如一九〇九年立場的考茨基，現在也附和他們的意見了）認為：國際卡德爾是資本國際化底最明顯表現之一，它令人能希望在資本主義下達到民族間的和平。這種意見在理論上是絕頂荒謬的，而在實踐上是一種詭辯，是一種辯護最惡劣機會主義的

*見福格爾施坦所著組織形式一書（Vogelstein: „Organisationsformen“），第一〇〇頁。

**見李甫曼所著卡德爾與托拉斯一書（Liefmann: „Kartelle und Trusts“），第二版，第一六一頁。

卑污手段。國際卡德爾表明出現在資本家底壟斷組織已發達到怎樣的程度，各資本家同盟究竟爲了什麼而進行着鬥爭。後面這一點最關重要：祇有它才能向我們說明現時事變底歷史經濟內容，因爲鬥爭形式可能變更，並且確實在經常依照種種較爲次要和暫時性的原因而變更着，但鬥爭底本質，它的階級內容，却是在階級尚存在時始終不能變更的。例如德國資產階級（考茨基在理論上的推論方面實已轉入德國資產階級那裏去了，關於這點，我們以後還要說到）爲了自己的利益，自然要掩蔽現代經濟鬥爭（分割世界）底內容，而強調這個鬥爭底某種形式。考茨基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這裏所說的當然不只是德國資產階級，而是全世界資產階級。資本家實行分割世界，並不是由於他們有特別的惡意，而是因爲現有的集中程度迫着他們走上這條道路去獲取利潤；而且他們分割世界，是『按資本』，『按實力』來作的，因爲在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有別種分割法。實力是隨經濟上政治上的發展而變更的；爲要瞭解現時的事變，必須知道那些問題是由實力變更來解決，至於這些變更究竟是『純粹』經濟上的變更，還是經濟範圍以外的（例如軍事的）變更，那却是次要的問題，絲毫也不能改變對於資本主義最新階段的基本觀點。用資本家同盟相互鬥爭與妥協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不和平的，後天又是不和平的形式）問題去偷換鬥爭與妥協底內容問題，就等於墮落到詭辯家的地步。

最新資本主義時代表明給我們看，各個資本家同盟彼此根據經濟上分割世界的這一基礎形成了相當的關係，而與此同時並存，與此密切相關的，便是各個政治同盟，即各個國家，彼此也根據領土上分割世界的這一基礎，根據爭奪殖民地的這一基礎，根據『爭奪經濟領土』的這一基礎形成了相當的關係。

(六)列強分割世界

地理學家蘇洋在他論歐洲殖民地領土之擴展*一書中，對十九世紀末期殖民地擴張的情形，作了如下一個簡短的總結：

屬於歐洲列強的殖民地面積百分比

(包括美國在內)

	1876年	1900年	增減數
在非洲的.....	10.8%	90.4%	+79.6%
在玻里內西亞的.....	56.8%	98.9%	+42.1%
在亞洲的.....	51.5%	56.6%	+ 5.1%
在澳洲的.....	100.0%	100.0%	—
在美洲的.....	37.5%	37.3%	- 0.3%

『所以，——蘇洋總結起來說，——分割非洲和玻里內西亞，便是這個時代底特點』。因為在亞洲和美洲已經沒有未被佔據，即是不屬於任何國家的領土了，所以我們必須把蘇洋底結論擴大起來而說道：最終分割世界，便是這個時期底特點。所謂最終，並不是說再沒有可能實行重新分割了，——恰巧相反，重新分割是可能的，並且是必不可免的，而是說各資本主義國家底殖民政策已經使佔據地球上所有未被佔據的土地的過程完畢了。世界是第一次已被分完了，所以將來祇有實行重新分割，即是從一個『主人』轉歸另一個『主人』而不是從無主的轉歸『主人』了。

所以，我們是處在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時代，這個殖民政策和『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最新階段』，即財政資本，有異常密切的聯系。因此，我們首先必須詳細考察事實的材料，以便盡量確切地查明這個時代和先前各個時代的區別，以及現在的實際情形。

*見蘇洋所著歐洲殖民地領土之擴展一書 (A. Supan: „Die territoriale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Kolonien“), 一九〇六年版，第二五四頁。

這裏，首先就發生了兩個事實問題：是不是恰巧在財政資本時代，殖民政策加強起來，爭奪殖民地的鬥爭尖銳化起來呢？在這方面，現時世界被分割的情形究竟怎樣呢？

美國作家莫里斯在他的論殖民政策史的著作中*，企圖把英法德三國在十九世紀各個時期所有殖民地領土面積統計材料歸納起來。現在把他所得出的總結簡錄如下：

殖民地領土面積

年份	英國		法國		德國	
	面積 (單位百萬 平方哩)	人口 (單位百萬)	面積 (單位百萬 平方哩)	人口 (單位百萬)	面積 (單位百萬 平方哩)	人口 (單位百萬)
1815至						
1830年……	?	136.4	0.03	0.5	—	—
1861年……	2.5	145.1	0.3	5.4	—	—
1880年……	7.7	267.9	0.7	7.5	—	—
1899年……	9.5	309.0	3.7	56.4	1.0	14.7

英國特別加緊奪取殖民地，是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八〇年時期，並且在十九世紀末葉二十年間也加緊得頗為厲害。法德兩國特別加緊奪取殖民地，正是在這二十年間。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壟斷前期的資本主義，即以自由競爭制佔統治的資本主義發展極廣的時期，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現在我們知道，正是在這個時期以後，便開始了奪取殖民地的巨大「高潮」，並異常加強了分割世界領土的鬥爭。所以，資本主義進到壟斷階段，進到財政資本階段，顯然是和分割世界鬥爭尖銳化的事實聯系着的。

霍柏森在他論帝國主義的著作中，把一八八四年至一九〇〇

*見莫里斯所著殖民政策史一書 (Henry C. Morris: "The history of colonization"), 一九〇〇年紐約版，第二卷，第八八頁；第一卷，第四一九頁；第二卷，第三〇四頁。

年這一時代劃爲歐洲列強加緊擴展領土的時代。據他的計算，在這個時期中，英國奪得了三百七十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五千七百萬人口；法國奪得了三百六十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三千六百五十萬人口；德國奪得了一百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一千四百七十萬人口；比利時奪得了九十萬平方哩的面積連同三千萬人口；葡萄牙奪得了八十萬平方哩面積連同九百萬人口。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十九世紀末，特別是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拚命爭奪殖民地，乃是外交史和對外政策史中有目共觀的事實。

在英國自由競爭最興盛的時代，即在一八四〇至一八六〇年代間，英國佔領導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是反對殖民政策的，他們認爲，解放殖民地，使殖民地完全脫離英國，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貝爾在他發表於一八九八年的論現代英國帝國主義的文章*中指出，在一八五二年的時候，如笛斯勒利這樣一個一般說來是很傾向於帝國主義的英國政府要人，尙且說過：『殖民地是懸在我們頸上的磨石』。而到十九世紀末葉的時候，成爲當代英國主人公的，却已是公開宣傳帝國主義和毫無顧忌地實行着帝國主義政策的羅德斯和張伯倫了！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這些佔領導地位的英國資產階級政治家早在當時已經明白認識了現代帝國主義底所謂純粹經濟根源和社會政治根源間的聯系。張伯倫當時宣傳帝國主義是『真正的，聰明而合理的政策』，並特別指出了英國當時在世界市場上所遇到的德美比方面的競爭。資本家當時說，補救的方法就是壟斷，於是他們就創辦卡德爾，新迪加和托拉斯。資產階級的政治領袖也重複着說，補救的方法就是壟斷，於是他們就急於去奪取世界上尙未分割的土地。羅德斯，據他的密友新聞記者斯特德敘述，

*見新時代雜誌 („Die Neue Zeit“)，第十六卷，一八九八年第一期，第三〇二頁。

在一八九五年論到自己的帝國主義思想時告訴他說：『我昨天在倫敦東隅（工人區）參加了一個失業工人的會議。我在那裏所聽到的粗野的發言，充滿了要求『麵包，麵包！』的呼聲。回家時，我把所看見的情形思考了一番，結果我便比以前更相信帝國主義底重要了…我的宗旨是要解決社會問題，就是說，爲要使聯合王國四千萬人民免除殘酷內戰的危險，我們殖民主義的政治家應當佔領新的領土，以求安插過剩的人口，取得新的區域來銷售我國工廠與礦山所出產的貨物。我常常說，帝國就是飯碗問題。要是你不願意內戰，你就應當做帝國主義者』*。

這就是巨萬富翁，財政大王，英布戰爭罪魁羅德斯在一八九五年所說的話。他擁護帝國主義的言論雖然是粗笨了一點，雖然是公然無恥，但按實質說，這和馬斯洛夫，秋得庫木，波特列索夫，達維德諸位先生和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創始人等等底『理論』，是沒有什麼不同的。羅德斯是一位稍微誠實一點的社會沙文主義者…

爲要對分割世界領土和最近幾十年來在這方面所發生的變動給一個較確切的敘述，我們且來利用蘇洋在上述那部著作中對世界列強殖民地領土問題所作的統計。蘇洋所考察的是一八七六年和一九〇〇年的情形。我們現在就拿一八七六年（他選定這一年是很恰當的，因爲這年正是西歐資本主義壟斷期前發展階段大體上已經完結的時期）和一九一四年的情形來加以考察，並以胡伯納底地理統計表上更新的數目字來替代蘇洋底數目字。蘇洋只考察了殖民地，我們却認爲爲要描寫出一幅完備的世界分割情景，最好是把關於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簡略數目字也都增補進去。我們把波斯，中國和土耳其列入半殖民地，其中第一個國家差不多已完全變成了殖民地，第二第三兩個國家正在變成殖民地。

*見新時代雜誌，第十六卷，一八九八年第一期，第三〇四頁。

結果我們便得到如下的總結：

列強佔有的殖民地領土

(面積單位百萬平方公里，人口單位百萬)

	殖 民 地				宗 主 國		總 計	
	1876年		1914年		1914年		1914年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英國.....	23.5	351.9	35.5	393.5	0.5	46.5	33.8	440.0
俄國.....	17.0	15.9	17.4	53.2	5.4	136.2	23.8	169.4
法國.....	0.9	6.0	10.6	55.5	0.5	39.6	11.1	95.1
德國.....	—	—	2.9	13.3	0.5	64.9	3.4	77.3
美國.....	—	—	0.3	9.7	9.4	97.0	9.7	106.7
日本.....	—	—	0.3	19.2	0.4	53.0	0.7	73.2
六大強國共計.....	40.4	373.8	65.0	535.4	16.5	437.2	81.5	960.6
其他強國(比利時, 荷蘭等)所有的殖民地.....							9.9	45.3
半殖民地(波斯, 中國, 土耳其).....							14.5	361.3
其餘各國.....							38.0	389.9
全地球.....							133.9	1,657.0

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世界是分割『完畢』了。自一八七六年後，殖民地領土已大規模地擴展了：六個最大強國所有的殖民地領土增加了一倍半以上，即由四千萬平方公里增加到了六千五百萬平方公里；增加數等於二千五百萬平方公里，即比各宗主國總共的面積（一千六百五十萬）多至一倍半以上。其中三個強國在一八七六年時還沒有一點殖民地，而第四個強國，即法國，當時也差不多一點都沒有。到一九一四年時，這四個強國已獲得了面積一千四百一十萬平方公里，即約比歐洲面積多至一倍半的殖民地領土，所包含的人口幾達一萬萬人之多。殖民地的擴展是異常不平衡的。例如，我們若拿面積大小和人口數量都相差不遠的法德日三國來比較，便可看出法國所佔有的殖民地領土（按面積說）幾乎等於德日兩國殖民地領土總和的兩

倍。不過，在我們所考察的這個時代初期，法國財政資本底數量大概也要比德日兩國合共數目多幾倍。除開純粹的經濟條件而外，地理及其他等等條件也是以這些經濟條件為基礎而影響於殖民地領土的大小。近幾十年來，在大工業，交易和財政資本發展的壓力下，世界各國均等化，各國經濟與生活條件平等化雖然進展得很快，但各國彼此間的差別還是不小的。在上述六國中，我們看見，一方面是進步得異常迅速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德國，日本）；另一方面，却是老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和英國），它們近年來的進步要比前面幾國慢得多；第三方面，還有一個在經濟上最落後的國家（俄國），這裏最新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可以說是由資本主義前期種種關係所結成的特別稠密的網子籠罩着。

除了大強國底殖民地領土以外，我們在統計表上還列進了各個小國家底小塊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可以說是在可能和一定會實行『重新分割殖民地』時所爭取的最近目標。這些小國家之所以能保持其殖民地，主要是因為各大強國彼此間存在有一種妨礙分贓妥協的利害矛盾和磨擦等等。至於『半殖民地』國家，那它們便是自然界和社會一切部門中所常見的過渡形式的例子。財政資本在一切經濟關係和國際關係方面佔有異常巨大的勢力，可以說是決定一切的勢力，能支配那些享有完全政治獨立地位的國家，並且在實際上已經支配了這些國家；關於這種事實的例子，我們馬上就要說到。但是，對於財政資本最『方便』最有利的，當然是以被支配的國家和民族喪失獨立地位為條件的那種支配。在這一點上，半殖民地的國家便是標本式的『中間』形式。爭奪這些半獨立國的鬥爭，在世界其餘部分已瓜分完結的財政資本時代，當然是不免要特別緊張起來了。

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是在資本主義最新階段以前也有過的，甚至是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就已經有過的。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羅馬進行了殖民政策，實行了帝國主義。但是『一般』

談論帝國主義而忘記或忽視各種社會經濟形態彼此間的根本區別，就必然會流為最空洞的廢話或虛誇，例如把『大羅馬和大不列顛』相提並論*。其實，資本主義過去各階段上的資本主義殖民政策，也是與財政資本底殖民政策大不相同的。

最新資本主義底主要特點便是最大企業家壟斷同盟底統治。當所有原料的來源都掌握於一手的時候，這種壟斷同盟便堅固無比了。我們已經知道，各資本家國際同盟也就因此而拚命集中力量去剝奪敵方一切競爭的可能，購買各種原料來源，例如鐵礦山或煤油源等等。只有佔領殖民地，才可完全保障壟斷組織在與競爭者鬥爭中戰勝各種意外的危險，甚至能戰勝敵方企圖用國家壟斷的法律來實行自衛的那種危險。資本主義愈發達，原料缺乏愈覺厲害，競爭和獵取全世界原料來源的鬥爭愈緊張，於是為佔據殖民地的鬥爭也就愈帶拚命的性質。

『我們，——施里德爾說，——可以提出一個也許使某些人覺得荒誕無稽的斷語：即城市和工業人口的增加，在最近將來與其說會遇到食品缺乏方面的障礙，倒不如說會遇到工業原料缺乏方面的障礙』。例如愈趨愈貴的木材方面的缺乏，皮革方面的缺乏，紡織工業原料方面的缺乏，都日益緊張起來。『工業家同盟企圖在全世界範圍中造成農業和工業相互的平衡；一九〇四年幾個主要工業國家棉織業工廠主同盟所成立的國際同盟便是一個例子；後來在一九一〇年間，歐洲各國 藤績業工廠主同盟也成立了這樣一個同盟』**。

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尤其是他們中間的現今的考茨基

*見劉卡斯所著大羅馬與大不列顛一書(G. F. Lucas "Greater Rome and Greater Britain"), 一九一二年鄂克斯福版，或見克羅麥爾所著古代與現代帝國主義一書(Earl of Cromer: "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 一九一〇年倫敦版。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三八至四二頁。

派，當然企圖把這種事實底意義減輕，硬說原料『可以』不用『昂貴而危險的』殖民政策而能在自由的市場上獲得，說原料供給『可能』用『簡單』改良一般農業條件而使之大大增加起來。但是，這種說法變成了辯護帝國主義的議論，變成了粉飾帝國主義的辭藻，因為它的出發點就是忘記了現代資本主義底主要特點，即忘記了壟斷。自由市場日益成爲過去的事情了；壟斷性的新迪加和托拉斯日益削減自由市場，而『簡單』改良農業條件却就是改善民衆生活狀況，就是提高工資，減少利潤。試問，除了甜蜜改良派底幻想以外，那裏會有能於關懷民衆生活而不去設法奪取殖民地的托拉斯呢？

財政資本不但重視已經發現的原料來源，而且重視那些潛在的來源，因為在現今時代中，技術進步的迅速是不可思議的，今天無利可圖的土地，明天要是發明了新的方法（爲了這一個目的，大銀行能够派遣大批工程師和農業學家等等去進行專門的調查），或是投入了大量的資本，就會變成有利可圖的了。礦源的調查，新的製造方法以及利用各種原料的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財政資本必然企圖擴大經濟領域，甚至企圖擴大一般領域。托拉斯計算將來『可能的』（不是現在的）利潤和計算將來的壟斷結果，而按兩三倍估價的標準把自己的財產資本化；同樣，財政資本估計到可能的原料富源，生怕在爭奪世界上尙未分割的最後幾塊土地，或爲重新分割已經分完了的一些土地的瘋狂鬥爭中落後於他人，所以總想奪得儘量多的土地，而不管要用什麼手段，不管這塊土地好壞如何，不管它位置在什麼地方。

英國資本家極力設法在他們自己的殖民地埃及一帶，發展棉花的生產（一九〇四年埃及二百三十萬公畝耕地中，已經有六十萬公畝，即四分之一強的面積，是種植棉花的），俄國資本家想在他們自己的殖民地土耳其斯坦一帶發展棉花生產，因為他們這樣來作，便能更容易地戰勝國外的競爭者，更容易獲得壟斷原料

產地的地位，更能用『聯合制的』生產，用包攬棉花生產製造方面一切手續的辦法去創立一個更經濟更有利的紡織業托拉斯。

資本輸出底利益也同樣要促進掠取殖民地的舉動，因為在殖民地市場上，更容易（有時甚至祇能在這個殖民地市場上）用壟斷的手段去消滅競爭者，獲得承辦權，鞏固相當的『聯繫』等等。

在財政資本基礎上生長起來的非經濟的上層建築，財政資本底政策和思想體系，都使奪取殖民地的趨向加強起來。希法亭很正確地說過：『財政資本不是傾向於自由而是傾向於統治』。有一位法國資產階級的作家好像是發揮和補充羅德斯上述的意見*而寫道：現代的殖民政策，除有各種經濟原因外，還有許多社會原因：『由於生活日益艱難，不僅使工人羣衆感受痛苦，而且使中等階級感受痛苦，於是在一切老文明國家中，便積累起了一種危及社會安寧的急燥，憤怒和怨恨心理；脫離了一定階級常軌的力量必須找到應用的場所，要讓它在國外去發洩，以免在國內發生劇變』**。

談到資本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政策時必須指出，財政資本和適應於財政資本的國際政策，即歸結於列強爲經濟上政治上分割世界而鬥爭的那個政策，造成許多過渡的國家倚賴形式。這個時代中的標本國家形式不僅有兩種基本國家，即殖民地佔有國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種各樣的依賴國，它們在政治上和表面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却是在財政和外交方面處處依賴於他國的。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各種過渡形式之一的半殖民地。另一形式底標本便是阿根廷。

『南美洲，特別是阿根廷，——叔爾茨、黑維尼茨在他論不列顛帝國主義的著作中寫道，——在財政上完全依賴於倫敦，簡

*見本卷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頁。——譯者。

**見瓦爾所著法國底殖民地領土（Wahl: «La France aux colonies»），摘自鮑西葉所著大洋洲的分割一書（Henri Bussier: «Le Partage de L'Océanie»），一九〇五年巴黎版，第一六五頁。

直可以說是英國底商業殖民地了』*。施里德爾根據駐倍諾斯愛勒的奧匈帝國領事一九〇九年報告，認定英國投在阿根廷的資本計有八十七萬五千萬佛郎。我們不難設想，英國財政資本及其忠實『友人』（外交）已因有這種情形而與阿根廷資產階級及其全部經濟政治生活方面的領導人物間發生了很堅固的聯系。

葡萄牙底例子，又是政治上獨立而財政上外交上不獨立的另一種多少不同的形式。葡萄牙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但事實上，自從進行爭奪西班牙繼承權的戰爭（一七〇一至一七一四年）時起，二百多年以來，始終是處在英國保護之下。英國爲了鞏固它在反對敵人（西班牙和法蘭西）鬥爭中的地位，就實行保護了葡萄牙和葡屬殖民地領土。英國以此換得了商業上的利益，換得了向葡萄牙和葡屬殖民地中輸入商品，尤其輸入資本的優惠條件，換得了利用葡萄牙商港和海島，海底電線等等的可能**。各個大國和小國間的這樣一種關係是一向就有的，但它在資本帝國主義時代已成爲普遍的制度，已成爲『世界分割』體系中的一部份，變爲全世界財政資本活動中的一些環節了。

爲結束世界分割問題起見，我們還要指出以下一點。不但西美戰爭後的美國書籍和英布戰爭後的英國書籍，完全公開而明確地在十九世紀末尾和二十世紀初期提出了這個問題，不但最『美姪』『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德國書籍有系統地估計了這件事實；並且在法國資產階級書籍中也很肯定而廣泛地——當然是從資產

*見 叔爾茨、黑維尼茨 所著不列顛帝國主義與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自由貿易一書（Schulze-Gaevernitz: „Britischer Imperialismus und englischer Freihandel zu Beginn des 20-ten Jahrhunderts“），一九〇六年萊比錫版，第三一八頁；並見瓦特浩曾爵士所著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一書（Sartorius v. Waltershausen: „Das volkswirtschaftliche System der Kapitalanlage im Auslande“），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四六頁。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一卷，第一六〇至一六一頁。

階級觀點上可能做到的那種限度內——提出了這個問題。讓我們來引證歷史家特里沃底言論，他在他所著十九世紀末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一書中論列強與分割世界一章內寫道：『近年來地球上所有的自由土地，除中國以外，都被歐洲列強和美國佔據了。由此已發生了許多衝突以及預示着最近將來就會發生更可怕爆裂的勢力範圍的變動。大家都得趕急來幹，因為凡是沒有及時爭得一份的國家就會永遠也得不到它所應得的一份，也就會不能參加那一定會成爲下一世紀（即二十世紀）主要事實之一的大規模剝削世界的事業。正因爲如此，所以近來歐洲各國與美國也就充滿了擴張殖民地領土，即實行『帝國主義』的狂熱，而這個『帝國主義』便是十九世紀末葉最顯著的特點』。然後，作者又補充說：『在這樣分割世界的情形下，在這種瘋狂獵取地球上的寶藏和巨大市場的角鬥中，在這個十九世紀時代創立起來的各個帝國間的勢力對比，是與創立了各該帝國的民族在歐洲所佔的地位全不相稱的。在歐洲佔優勢的國家，足以決定歐洲命運的國家，並不是在全世界上也同樣佔優勢的。可是，殖民地領土的廣大，佔據尚未查明財富的希望，顯然會反轉來影響到歐洲列強勢力的對比，所以殖民地問題——也可以說是『帝國主義』——這一已經改變了歐洲境內政治局面的問題，一定還會日甚一日地改變這個局面的』*。

(七)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特殊階段

現在我們就要作出相當的總結，把以上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議論歸納起來。帝國主義是作爲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底發展與直接繼續而成長起來的。但是，資本主義祇是發達到了一定的，

*見特里沃所著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一書（J. E. Driault: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一九〇七年巴黎版，第二九九頁。

很高的階段時，才變成了資本帝國主義，此時資本主義底某些基本特性已經變成爲與它們相反的東西，而由資本主義進到更高社會經濟形態上去的那個過渡時代底特點又已經到處形成並暴露出來了。在這一過程中，經濟方面的基本事實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爲資本主義的壟斷所代替。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和一般商品生產底基本特性；壟斷是適與自由競爭相反的東西，但自由競爭分明已開始變爲壟斷而造成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用最大生產來代替大生產，使生產和資本集中達到了很高程度，以至產生了並產生着卡德爾，新迪加和托拉斯等壟斷組織，以及十來個支配着無數萬萬資金的銀行資本與這些壟斷組織溶合起來的現象。同時，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又並不消滅競爭，而是臨駕在競爭上面，與之並存，因而產生出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磨擦與衝突。壟斷是從資本主義進到更高制度上去的過渡。

如果要下一個極簡短的帝國主義定義，那就要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壟斷階段。這樣的定義能包括最主要之點，因爲財政資本是佔壟斷地位的少數最大銀行底銀行資本與工業家壟斷同盟底資本溶合起來的資本，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世界的分割，又是從自由擴展於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強國所佔據的區域中去的殖民政策，進到獨佔已經分割完結了的世界領土的那個殖民政策上去的過渡。

太簡短的定義雖很方便，因爲它能把主要點歸納起來，但是如果你要從它中間特別引伸出所要說明的那個現象底各個極重要的特點，那它就顯得很不充分了。因此，我們並不忘記，所有一般定義都只有一種有條件的和相對的意義，始終不能把現象的全部發展上的一切複雜聯系概括起來，而認爲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比較完滿的定義，其中包括如下五個主要特徵：第一，生產和資本集中已發展到很高的程度，以至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第二，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已溶合爲一，因而

在這個『財政資本』基礎上已造成了財政寡頭；第三，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已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第四，分割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形成起來了；第五，各最大資本主義強國已把世界上的領土分割完畢。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壟斷組織和財政資本底統治業已確立，資本輸出已具有特別重大意義，國際托拉斯分割世界業已開始而各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分割全球領土業已完結的那個階段上的資本主義。

我們往下就會知道，倘若我們對於帝國主義不僅注意到它的純粹經濟上的主要現象（即上述定義所局限的那些現象），並且還注意到資本主義底現時階段在一般資本主義發展中所佔的歷史地位，或注意到帝國主義與工人運動中兩個主要傾向的關係時，我們便可以而且應當對帝國主義下一個另外的定義。現在我們必須指出，按上面那個含義所說的帝國主義，毫無疑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爲了使讀者對於帝國主義能得到一個儘量確切的概念，我們故意儘量引用了對於最新資本主義經濟中特別確切查明的事實不得不予以承認的那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所作的估計。爲了同一個目的，我們又引用了一些詳細的統計材料，使讀者們能明瞭銀行資本已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等等，數量怎樣變成了質量，成熟的資本主義怎樣變成了帝國主義。不待說，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中的一切界線當然都是有條件的，是變動的，所以，如果爭論帝國主義究竟是在那一年或那一個十年『最終』確立，那便是愚不可及了。

但是講到帝國主義定義問題時，首先就要與所謂第二國際時代，即一八八九至一九一四年的二十五年時期的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考茨基進行爭論。

在一九一五年，甚至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考茨基就堅決反對過我們所下的那個帝國主義定義中的基本思想，他說決不應把帝國主義瞭解爲某種經濟底『時期』或階段，而應把它瞭解爲一種政策，即財政資本所『選定』的一種政策；不應把帝國主義與

『現代資本主義』『看作一個東西』；如果把帝國主義瞭解爲『現代資本主義底一切現象』（卡德爾，保護關稅制，財政資本家底統治，殖民政策），那末關於帝國主義是爲資本主義所必需的問題便是一種『毫無意思的贅言』，因爲這樣一來，『帝國主義便會自然是資本主義切身必需的東西』等等。爲了把考茨基的意見表白得特別清楚，我們就來引用他所下的帝國主義定義，而這個定義是根本直接反對我們所發揮的那些思想的（因爲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來宣傳這些思想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一部份人所提出的反駁，正是馬克思主義運動中一個派別所提出的反駁）。

考茨基所下的定義是說：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產物，其內容就是每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趨向於有加無已地兼併或征服農業的（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區域，而不管那裏住的是什麼民族』*。

這個定義是根本要不得的。它片面地，即任意地單只拿出一個民族問題（雖然這個問題本身以及按它對帝國主義的關係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任意而且很不正確地單只把這個問題和兼併其他民族的那些國家內的工業資本聯接起來，並且又同樣任意而不正確地把兼併農業區域這一點着重提了出來。

帝國主義就是趨向於兼併，——這便是考茨基底定義在政治方面的含義。這方面的含義是對的，可是極不完滿，因爲帝國主義在政治方面是一般趨向於壓迫和反動。但我們在這裏要考察考茨基本人所納入他的定義中的經濟方面。在這一方面，考茨基底定義中的不正確處，就十分顯然暴露出來了。帝國主義底特點，恰巧不是工業資本而是財政資本。所以，在法國恰巧是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因工業資本衰弱，財政資本特別迅速發展而使兼併政策（殖民政策）

*見 新時代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三十二卷），第二期（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第九〇九頁。參照同一雜誌一九一五年第二期，第一〇七及往下各頁。

極度加劇起來，也就不是偶然的。帝國主義底特點，恰巧不祇是要兼併農業區域，而且要兼併工業極發達的區域（德國垂涎於比利時，法國垂涎於羅萊因區）：因為第一，地球已經分割完畢了，在實行重新分割的時候不得不伸手於任何一塊土地；第二，對於帝國主義重要的，是幾個巨大強國爭先恐後地力求獲得霸權，即力求爭得領土，其主要目的不是直接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削弱敵方，摧毀敵方霸權（比利時是德國所特別需要用來反對英國的一個據點；巴格達是英國所特別需要用來反對德國的一個據點等等）。

考茨基特別——並且屢次——援引英國人底言論，說英國人確定帝國主義這個名詞底純粹政治上的意義是與他考茨基底意思相符的。我們且舉英國人霍柏森爲例吧。霍柏森在他一九〇二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一書中寫道：

「新帝國主義和舊帝國主義不同的地方，第一，就是它已不是表明一個強盛帝國企圖單獨稱霸，而是表明好幾個帝國受擴大政治勢力和獲得商務利益同樣慾望所驅使，互相爭雄的理論與實踐；第二，就是財政利益或投資利益統治着商業利益」*。

由此可見，考茨基一般引證英國人底言論實際上是絕對沒有理由的（除非他去援引那些庸俗的英國帝國主義者或公開辯護帝國主義的人）。由此可見，考茨基冒充繼續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人，實際上却要比社會自由主義者霍柏森還退後一步，因爲霍柏森還比他正確一點地估計到了現代帝國主義底兩個『歷史具體的』特點（而考茨基所下的定義恰巧是絕對忽視歷史具體性的！）：第一，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競爭；第二，財政資本家統治商人。倘若主要點是工業國兼併農業國，那末商人就要佔主要地位了。

考茨基所下的定義，不僅是錯誤的，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且是成了全面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那一整個思想體系

*見霍柏森所著帝國主義一書（Hobson: "Imperialism"），一九〇二年倫敦版，第三三四頁。

底基礎；關於這點，我們往後還要講到。考茨基所掀起的那種字面上的爭論，是極不莊重的：究竟是把資本主義底最新階段稱爲帝國主義呢，還是把它稱爲財政資本的階段呢。隨你去怎樣稱呼，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要點是在於考茨基把帝國主義底政策和它的經濟割開了，他把『兼併』解釋爲財政資本所『選定』的政策，而拿另一個似乎可能的，也是以財政資本爲立腳點的資產階級政策和它對立起來。照這樣說來，經濟上的壟斷制是能與政治上非壟斷的，非強力的，非掠奪的行動方式相容的。照這樣說來，世界領土恰巧在財政資本時代分割完畢而成爲資本主義各大強國互相競賽特殊形式之基礎的這一局面，是能與非帝國主義的政策相容的。結果就不是暴露資本主義最新階段上各個極深刻的根本矛盾，而是加以掩飾與蒙蔽；結果就是用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去代替馬克思主義。

考茨基同德國一個辯護帝國主義及兼併政策的作家孔諾夫進行過爭論，後者粗笨而厚顏無恥地說道：帝國主義是現代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底發展是不可避免的，進步的，所以帝國主義也就是進步的；因此，必須向帝國主義去匍匐跪拜，歌功頌德！他這種話，令人聯想起民粹派在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間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所描繪的那個諷刺畫：倘若馬克思主義者認爲資本主義在俄國是不可避免和進步的現象，那末他們就應該開設酒店而努力培植資本主義了。考茨基反駁孔諾夫說：這話不對，帝國主義並不是現代的資本主義，而祇是現代資本主義所採取的各種政策中的一種政策，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反對這種政策，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兼併等等。

這種反駁似乎是很雅觀的，而實際上是等於更精細地更隱藏地（因此更危險地）宣傳與帝國主義妥協，因爲『反對』托拉斯和銀行底政策而不觸犯托拉斯和銀行底經濟基礎，就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就是一種善良而幼稚的幻想。迴避現存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不去揭露極深刻的矛盾——這就是考茨基底理論，而這個理論是和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的。這樣的

『理論』當然只能用法辯護那個主張和孔諾夫保持統一的意見。

『從純粹經濟上的觀點看來，——考茨基說，——資本主義不是不可能再經歷一個新的階段，即是把卡德爾政策推廣到對外政策方面去而成爲超帝國主義的階段』*，即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彼此聯合起來而不是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彼此鬥爭的階段，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杜絕戰爭的階段，『由國際聯合的財政資本來共同剝削世界』的階段**。

關於這個『超帝國主義的理論』，我們以後還要說到，以便詳細證明這個理論是與馬克思主義決裂到了怎樣徹底而無可挽回的地步。現在呢，我們就要照本書底一般計劃來考察一下關於本問題的確切經濟統計。『從純粹經濟上的觀點看來』，這個所謂『超帝國主義』究竟是可能實現的呢，抑或只是一種超等廢話而已呢？

倘若把純粹經濟上的觀點看作『純粹』抽象的東西，那末由此可能得出的唯一結論是：發展趨勢是走向壟斷，因而也就要達到全世界統一的壟斷組織，即全世界統一的托拉斯。這是不容爭辯的，但這同時也是毫無意思的；這正好像說：『發展趨勢』是走向於在化學實驗室裏面生產食料。在這點上說來，超帝國主義『論』，也如『超農業論』一樣，是一竅不通的。

倘若所說財政資本時代的『純粹經濟』條件，是指二十世紀初的歷史具體時代的東西，那末對於『超帝國主義』這一死板抽象概念（這個概念只是爲了一個最反動的目的，即使人不去注意現存矛盾底深刻性）的最好的回答，便是拿現代全世界經濟底具體經濟事實與之對立起來。同時，考茨基關於超帝國主義的這些毫無意

*見新時代雜誌，一九一四年（第三十二卷），第二期（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第九二一頁。參照同一雜誌一九一五年第二期，第一〇七及往下各頁。

**見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五年第一期（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第一四四頁。

思的議論，又鼓舞了那種十分錯誤而替帝國主義辯護人助威的思想，似乎財政資本底統治把全世界經濟內部的不平衡性和矛盾削弱下去，實則財政資本底統治正是把這種不平衡性和矛盾加強起來。

卡爾維在他所著的全世界經濟入門* 這一本書裏企圖把一切最重要的純粹經濟的材料綜合起來，以求具體說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的全世界經濟底內部關係。他把全世界分爲五個『主要經濟區域』：（一）歐洲中部區（除英俄而外的全部歐洲）；（二）不列顛區；（三）俄國區；（四）亞洲東部區；（五）美國區。同時他把殖民地列入佔有這些殖民地的國家底『區域』內，而把少數沒有分配於各區的國家，例如亞洲境內的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非洲境內的摩洛哥和阿比西尼亞等等，『擱置一旁』。

他所引錄的關於這些區域的經濟材料，略如下表：

世界上的主要經濟區域	面積 (單位百萬平方公里)	人口 (單位百萬)	交通工具		貿易 進出口 共計 (單位十萬萬馬克)	工業品		棉織業紗錠數目 (單位百萬支)
			鐵道 (單位千公里)	商船 (單位百萬噸)		開採量 煤 鐵 (單位百萬噸)		
歐洲中部區	37.6 **(23.6)	388 (146)	304 —	8 —	41 —	351 —	15 —	26 —
不列顛區	28.9 **(28.6)	398 (355)	140 —	11 —	25 —	349 —	9 —	51 —
俄國區	33	131	63	1	3	16	3	7
亞洲東部區	13	589	8	1	2	8	0.03	2
美國區	30	148	379	6	14	245	14	19

*見卡爾維所著全世界經濟入門一書 (R. Calwer: „Einführung in die Weltwirtschaft“), 一九〇六年柏林版。

**括弧裏所指的是殖民地底面積和人口。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發展得很高的（交通工具，貿易和工業都十分發展的）三個區域，即歐洲中部區，不列顛區和美國區。其中有三個是統治着世界的國家：即德國，英國和美國。它們相互間的帝國主義性的競賽和搏鬥是極端尖銳的，因為德國祇有一塊很小的地區和少許的殖民地，而『歐洲中部區』之形成尚須待諸來日，並且這個『歐洲中部區』是在殊死戰中誕生着的。目前全歐洲底特徵便是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反之，在不列顛區和美國區內，政治上的集中程度是很高的，但它們相互間又有極大的差別：前者所有的殖民地簡直是不可勝數；後者所有的殖民地却異常微小。而在殖民地方面資本主義又剛在開始發展起來。奪取南美洲的鬥爭一天尖銳一天。

有兩個區域是資本主義不很發達的區域，即俄國區與亞洲東部區。前者人口密度極稀，後者極密；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後者全不集中。帝國主義列強分割中國還剛才開始，日美等國為奪取中國的鬥爭日益尖銳起來。

試把考茨基所謂『和平的』超帝國主義那種愚蠢可笑的胡說，與這些實際的情形，與這種經濟政治條件極不一致的情形，與各國發展速度等等極不相稱的情形，與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狂烈的鬥爭的情形等等比較一下。難道他這種說法不是一種喪胆的市儈想逃避險惡實情的反動企圖麼？考茨基認為是『超帝國主義』底胚胎的國際卡德爾（恰好與實驗室裏的藥片生產『可能』稱為超農業底胚胎一樣），豈不是給我們表明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例子麼？豈不是給我們表明由和平分割轉為不和平的分割，再由不和平分割轉為和平分割的例子麼？難道從前協同德國——例如在國際鐵軌新迪加或國際商船托拉斯內——來和平分割了全世界的美國財政資本及其他各國財政資本，現時不是又在按那些用絕非和平的手段變更了的新的勢力對比來重新分割世界麼？

財政資本和托拉斯，並不減弱全世界經濟中各個部分發展速度

上的差異，而是加強這種差異。既然勢力對比變更了，那末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訴諸強力，還能有什麼解決矛盾的辦法呢？在鐵道統計中，我們便可看到說明整個世界經濟中資本主義和財政資本發展速度參差情形的非常確切的材料*。在最近幾十年來帝國主義發展史中，鐵道長度底變更情形如下：

鐵 道 長 度

(單位——公里)

	1890年	1913年	增加數
歐洲.....	234	346	+ 132
美國.....	268	411	+ 143
一切殖民地.....	82	210	+ 128
亞美兩洲的獨立國和 半獨立國.....	43		
	135	347	+ 212
共計.....	617	1,104	+ 487

可見，鐵道發展得最爲迅速的，是亞美兩洲的殖民地和獨立（以及半獨立）國家。大家知道，四五個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底財政資本是在這裏統治一切，支配一切的。亞美兩洲殖民地及其他國家裏建築二十萬公里的新鐵道，便是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有着收入上的特別担保，使鋼鐵廠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的四百餘萬萬馬克的資本。

資本主義在殖民地與海外諸國內發展得最快，其中出現了新的帝國主義強國（日本）。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鬥爭緊張起來了。財政資本從特別有利的殖民地企業和海外企業中徵收的貢款，

*見德意志帝國一九一三年統計年鑑（Stat,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1915）第四六至四七頁；一八九二年的鐵道統計（Archiv für Eisenbahnwesen, 1893）；關於一八九〇年各國殖民地間鐵道分佈方面的某些詳細情形，只能給了一個大約的估計。

日益增加。在分割這種『贖物』的時候，極大一部分是落到那些生產力發展速度並不常居首位的國家掌握中。各最大的強國中鐵道長度，把它們的殖民地包括在內計算，有如下表：

(單位——公里)

	1890	1913	增加數
美國.....	268	415	+ 147
不列顛帝國.....	107	308	+ 201
俄國.....	33	78	+ 46
德國.....	43	68	+ 25
法國.....	41	63	+ 22
五大強國共計.....	491	830	+ 339

總之，佔總數百分之八十左右的鐵路都是集中於五個最大強國手中。但是這些鐵路的所有權集中程度，即財政資本集中程度，還要遠過於此，因為例如有很大數量的美俄及其他各個鐵路的股票和債券是屬於英法兩國巨萬富翁的。

英國因有廣大的殖民地領土，故能把『自己的』鐵路網增加了十萬公里之多，即四倍於德國。但誰都知道，在這一時期內，德國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石煤和鋼鐵出產量的增長，要比英國（更不必說法國和俄國）快得不可計量。一八九二年，德國出產了四百九十萬噸生鐵，英國出產了六百八十萬噸；但到一九一二年時已是一千七百六十萬噸與九百萬噸之比，即趕過英國很遠了*！試問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爲要消除生產力發展和資本蓄積的程度與財政資本所分得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份量互不相稱的情形，除了戰爭以外，是不是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呢？

*還請參照克萊蒙德所著不列顛帝國與德意志帝國間的經濟關係一文（Edgar Crammond: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British and German Empires"），載於皇家統計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一九一四年七月號，第七七七及往下各頁。

(八)資本主義底寄生性與腐化

現在我們還要來考察帝國主義底另一個非常重要而為大部分談論帝國主義問題的人往往沒有充分估計到的特徵。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底缺點之一，便是他在這點上比非馬克思主義者霍柏森還倒退了一步。我們此地所指的，就是帝國主義所具有的寄生性。

我們已經說過，帝國主義最深的經濟基礎，便是壟斷。這是資本主義性的壟斷，即是從資本主義裏面產生出來並且是處於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競爭的一般環境中，同時又與這個一般環境經常發

全不參加什麼企業而專以懶惰爲職業者的階級，或正確點說，食利者階層，就空前增長起來。帝國主義最重要經濟基礎之一的資本輸出，更使食利階層完全脫離生產的現象加強起來，使靠剝削數個海外國家和殖民地人民勞動爲生的國家處處都呈現出寄生性的特徵。

『在一八九三年間，——霍柏森寫道，——不列顛投於國外的資本，約佔不列顛聯合王國財富總數百分之十五』*。我們要指出，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這個資本又大約增加了一倍半。『侵略性的帝國主義，——霍柏森往下又說，——加於納稅人的負擔是很繁重的，對於工商業家所有的意義又是很少的…而對於尋求投資場所的資本家』（這個名詞在英文上是用『investor』，意即『投資者』，食利者一語來表示的），『却是巨量利潤底來源…據統計家季芬計算，在一八九九年間，大不列顛從它的全部對外貿易和殖民地貿易，即輸入和輸出中所得到的純利，等於一千八百萬金鎊（即一萬七千萬盧布左右），是按八萬萬金鎊週轉總額百分之二點五計算所得出的數目』。雖然這個數目很大，但它並不能說明侵略性的大不列顛帝國主義。能把它說明的是從『所投殖的』資本中獲得的收入，即食利者階層底收入，其數目爲九千萬以至一萬萬金鎊。

在世界最帶『商業性的』國家中，食利者底收入竟超過對外貿易方面的收入額四倍！這便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寄生性底本質。

因此，『食利國』（Rentnerstaat），或放債國這一名詞，便成了論帝國主義問題的經濟作品中通用的名詞。世界分成了極少數放債國和極大多數債務國了。『在投放於國外的資本中，——叔爾茨、黑維尼茨寫道，——佔居首位的是投在政治上倚賴的國家或同盟的國家中的資本：英國借債給埃及，日本，中國和南美各國。

*見霍柏森所著前書，第五九頁和第六〇頁。

在必要時，英國底海軍便擔任法庭差役的職務。英國底政治力量保護英國免除債務人方面的反叛』*。瓦特浩曾爵士在他所著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一書中，舉出荷蘭作為『食利國』的標本，並且說現在英國和法國也成為這樣的國家了**。施里德爾認為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和瑞士這五個工業國家，是『很標本的債權國』。他沒有把荷蘭列入進來，祇是因為它『很少帶工業性』***。美國祇在美洲方面才算是債權國。

『英國，——叔爾茨、黑維尼茨寫道，——漸漸由工業國變成放債國了。雖然工業生產和工業品出口有絕對的增加，但是從利息和股息方面，從發行證券，擔任中介和投機事業方面所獲得的收入，在其全部國民經濟中的相對意義却日益增長起來。照我的意見，這個事實也就是帝國主義高漲底經濟基礎。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係，要比賣者與買者的關係更堅固些』****。至於德國，那末柏林的銀行雜誌出版人藍斯堡在他一九一一年發表的德國是食利國一文中寫道：『德國人喜歡譏笑現在法國常有的那種變為食利者的傾向。但是，他們忘記指出，若就資產階級來說，德國情形是日益接近於法國情形的』*****。

食利國是寄生腐化資本主義底國家，這種情形不能不反映到這種國家裏一切社會政治條件上面來，尤其是不能不反映到工人運動中的兩個基本派別上面來。為盡量明顯地說明這一點，我們且來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不列顛帝國主義一書 (Schulze-Gaevernitz, Br.Imp.)，第三二〇頁及往下各頁。

**見瓦特浩曾爵士所著國外投資的國民經濟制度一書 (Sart. von Waltershausen; „D. Volkswirt. Syst. etc.“)，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四冊。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第三九三頁。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前書，第一二二頁。

*****見銀行雜誌，一九一一年第一期，第一〇至一一頁。

引證霍柏森底言論。霍柏森是一位最『可靠的』證人，一則因為誰也不能疑心他偏袒『馬克思主義正統派思想』；二則因為他是個英國人，很知道這個最富有殖民地，富有財政資本和帝國主義經驗的國家中的實際情形。

霍柏森在英布戰爭血跡未乾時敘述帝國主義與『財政家』利益的聯系，敘述『財政家』從各種承辦手續方面所得的利潤數量增加的情形說：『資本家便是指揮這一標本寄生主義政策的人，但是同一動機也影響到了工人中間那些特殊階層。在很多城市中，各個最重要的工業部門是依靠政府定貨的；冶金業中心與造船業中心底帝國主義，大都以這種情形為基礎』。據這位作者底意見，有兩種情況削弱了各老大帝國底力量：第一是『經濟寄生性』，第二是用依賴國人民編制軍隊。『第一種情況是經濟寄生主義的風氣，驅使統治國利用其各個外藩區域，各個殖民地，各個依賴國來增加本國統治階級底財富，來收買本國下層階級，使之安分守己』。我們要補充一句：爲要在經濟上有可能使用這種收買手段，不論其形式如何，便要有壟斷式的高度利潤。

關於第二種情況，霍柏森寫道：『帝國主義盲目症底最奇怪表徵之一，便是英法等等帝國主義國家在這方面所表現的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其中尤以英國爲最甚。我們所藉以佔領了印度帝國的那些戰役，大部分都是由我們用土人編成的軍隊去進行的。印度以及近來埃及方面所有的大量常備軍，都是由英國人擔任指揮；我們征服非洲的所有各次戰爭，除征服南非洲的戰爭外，幾乎都是由土人替我們進行的』。

瓜分中國的前途，在霍柏森筆下得到了如下一種經濟上的估計：『那時，西歐大部分的地面，都會帶有西歐一部分地面現在那樣的面貌和性質，如英國南部，里維拉，以及現在意大利與瑞士那部分爲遊客所常到和富人居住最多的地方，就是說，少數從遠東獲

取股息與年金的富豪貴族，連同人數稍多的職員和商人，為數更衆的家僕，以及在轉運事業和精製品工業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業部門就會消失，而大宗食品和大宗半製造品便會當作貢品從亞非兩洲輸送進來。『更廣大的西歐各國同盟或歐洲列強聯邦所能開闢的前途，就是它不僅不會把全世界文明事業推往前進，反而會造成莫大的西方寄生主義危險：劃分出幾個工業先進的民族，其上層階級由亞非兩洲獲得巨量的貢品，並利用這種貢品來豢養許多馴服的僱員和僕役，他們已不是從事於生產大宗農業品和工業品而是替個人服役，或在新式財政貴族監督下執行一種次要的製造工作。讓那些漠視『這種理論』（應該說：前途）『而認為不值得考察的人去思考一下現在已陷於這種狀態的英國南部各區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吧。讓他們細想一下，當中國一旦屈服於這種財政家，『投資人』及其政治僱員和工商業僱員底經濟監督，使其能從這一個世界上極大的富源地帶汲取利潤而把它用之於歐洲的時候，這種制度又會擴展到怎樣巨大的程度吧。當然，實際的情形極為複雜，世上各種勢力的變動很難逆料，所以也就不能預下斷語，說這種或其他某種前途一定會見諸實現。但是，現在支配着西歐帝國主義的那些勢力，確實是向着這一方面進行的。假如這些勢力不會遇到什麼抵抗，或不會被引到另一個方向上去，那末這些勢力就會正是朝着完成這一過程的方向努力的』*。

作者說得完全對。假如帝國主義底勢力不會遇到抵抗，那末它們就會正是走向這種結局的。他對於『歐洲聯邦』在現代帝國主義情勢下的意義，是估計得正確的。只須補充說，暫時在大多數國家工人運動內部獲得了勝利的機會主義者，也是有系統地，一往直前地朝着這一方面『努力』的。帝國主義既是意味着分割世界而不

*見霍柏森所著一書，第一〇三，二〇五，一四四，三三五及三八六頁。

只是剝削中國一個國家，既是意味着少數最富國家享有壟斷式的高度利潤，於是就造成一種經濟上的可能去收買無產階級的上層份子，藉以養育，形成並鞏固機會主義。只是不要忘掉一般反抗帝國主義和特別是反抗機會主義的力量，而這種反抗力量自然是社會自由主義者霍柏森所看不見的。

德國機會主義者吉爾德布蘭，先前曾因擁護帝國主義而被開除了黨籍，現在却正可以充當德國所謂『社會民主』黨底領袖，他很巧妙地補充了霍柏森底言論，宣傳必須組織『西歐聯邦』（俄國除外），以便『共同』行動…去反對非洲黑人，反對『大回教運動』，以便維持『强有力的陸軍和海軍』，反對『日華兩國聯盟』* 等等。

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一書中關於『不列顛帝國主義』的敘述，也給我們指出了同樣的寄生性特徵。從一八六五至一八九八年間，英國的國民收入大約增至兩倍，而在這一時期中從『國外』所獲得的收入却增加到了九倍。如果說『教育黑人去勞動』（當然是非用強迫手段不行的…）是帝國主義底『功勞』，那末帝國主義底『危險』，就是『歐洲將把體力的勞動，起初把農業勞動和礦業勞動，然後把較重的工業勞動，卸到黑色人類身上，而自己安息於食利者生活，因而就會準備起紅種人和黑種人在經濟上以至於政治上的解放』。

英國離開農業生產的土地面積日益擴大而專門用作為供富人遊戲娛樂的場所。一般人講到蘇格蘭這一貴族化程度最高而專供狩獵及其他各種遊戲用的地方的時候，便說它是『專靠遺產和卡內基

*見吉爾德布蘭所著工業統治地位和工業社會主義之動搖一書（Gerhard Hildebrand, „Die Erschütterung der Industriebherrschaft und des Industriesozialismus“），一九一〇年版，第二二九及往下各頁。

先生』(美國巨萬富翁)『來生活的』。英國每年消耗於賽馬和獵狐遊戲的費用，就等於一千四百萬金鎊(約合一萬三千萬盧布)。英國食利者底數目約計一百萬人。從事生產工作的人口百分數日益減少：

	英國人口 (單位百萬)	主要工業部門 中的工人數量 (單位百萬)	工人對人口總 數的百分比
1851年	17.9	4.1	23%
1901年	33.5	4.9	15%

研究『二十世紀初期不列顛帝國主義』的那些資產階級學者論及英國工人階級的時候，不得不經常說到工人『上層份子』和『真正無產階級下層份子』之間的區別。從上層份子中間產生出大批參加合作社，職工會，遊戲團體和許許多多教門的份子。選舉制是適應於這個階層的。英國的選舉制『還有充分的限制，能把真正無產階級下層份子除外』¹¹爲了粉飾英國工人階級底情形，人們通常只講到這些佔無產階級少數的上層份子：例如『失業問題主要只是涉及倫敦居民，以及很少爲政治家們重視的那些無產階級下層份子的問題』* …其實應該說：很少爲資產階級政客和『社會主義』機會主義者們重視的那些無產階級下層份子。

從帝國主義國家中移往國外的人口逐漸減少，而從落後國和工資較低的國家中移入帝國主義國家的人口(招來的工人和移來的人口)逐漸增加的現象，也是與上述種種現象有關的帝國主義特點之一。據霍柏森說，英國移往國外的人口，自一八八四年起減少的情形如下：一八八四年計有二十四萬二千人，而一九〇〇年祇有十六萬九千人。從德國移往國外去的人口，在一八八一至一八九〇年的十年間，達到了最高的程度，計有一百四十五萬三千人，但在後來二十年以內，却已跌到五十四萬四千人以至三十四萬一萬人。而

*見叔爾茨、黑維尼茨所著不列顛帝國主義一書，第三〇一頁。

從奧，意，俄等國移入德國的工人數量，却增加起來了。照一九〇七年的戶口調查，在德國計有一百三十四萬二千二百九十四個外國人，其中有四十四萬零八百個工業工人和二十五萬七千三百二十九個農業工人*。法國礦業中的工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美國從東歐南歐移入的僑民從事於工資最低的工作，而升充為監工和從事於工資優厚的工作的大部分都是美國工人***。帝國主義又還有在工人中間也造成特權階層並使其脫離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的趨向。

必須指出：在英國方面，帝國主義分裂工人，加強工人中間機會主義思想，引起工人運動暫時腐朽的趨向，遠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很久以前就已表現出來，因為帝國主義底兩個重大特點，即佔有巨量殖民地領土和在世界市場上佔居壟斷地位，從十九世紀中葉起，便存在於英國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數十年之中，有系統地考察了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與英國資本主義底帝國主義特點之間的這種聯系。例如，恩格斯在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致馬克思的信裏寫道：『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是在日益資產階級化，所以全世界上最帶資產階級性的這個民族大概是要終究造成一種與資產階級並列的資產階級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式的無產階級。在一個剝削全世界的國家裏，這種情形在某種程度上是理所當然的』。大約經過二十五年之後，恩格斯在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一日寫的那封信內又說到了『最壞的英國工聯會，它們甘願受那些被資產階級收買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人領導』。後來，恩格斯在一八八

*見德意志帝國統計叢刊(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第二一一卷。

**見耿格爾所著法國資本底投殖一書 (Henger: „Die Kapitalanlage der Franzosen“)；一九一三年斯多德牙爾版。

***見古爾維奇所著移民與勞動一書 (Hourvich: „Immigration and Labour“)；一九一三年紐約版。

二年九月十二日致考茨基的信裏又寫道：『你問我：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究竟是作怎樣的想？他們對於這點的想法也是如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樣。這裏並沒有什麼工人政黨，只有一些保守派的和自由派的急進黨人，而工人也就安然和他們共享着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及其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對英國工人階級底狀況一書第二版所寫的序言中，也是這樣說明了的）。

這裏已經把因果關係明白指示出來了。原因是：第一，這個國家剝削着全世界；第二，它在全世界市場上佔有壟斷地位；第三，它擁有殖民地壟斷權。結果是：第一，有一部分英國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化的份子；第二，有一部分英國無產階級甘願受那些被資產階級收買或至少是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人領導。二十世紀初的帝國主義已經最終完成了極少數國家分割全世界的事情，其中每個國家現時在『全世界』上所剝削的（指吸取額外利潤而言）那一部分，要比英國在一八五八年所剝削的少一點，每一個國家都利用托拉斯，卡德爾，財政資本以及債權債務關係等等而擁有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地位；每個國家都在相當程度上佔有殖民地壟斷權（我們已經說過，在七千五百萬平方公里的全部世界殖民地領土中，有六千五百萬，即百分之八十六是集中於六個強國掌握；有六千一百萬平方公里，即百分之八十一，是集中於三個強國掌握）。

現今情形底特點，就是形成了不能不使機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根本利益絕對相反情形加強起來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條件：帝國主義已從萌芽狀態長成爲統治的體系；資本家的壟斷組織在國民經濟和政策中佔據了首要地位；世界地域上的分割已經完結；另一方面，現

*見馬恩通信集（*Briefwechsel von Marx und Engels*），第二卷，第二九〇頁；第四卷，第四五三頁。見考茨基所著社會主義與殖民政策一書（*K. Kautsky: „Sozial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一九〇七年柏林版，第七九頁；他這本書是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那個很早很早的時候寫的。

在已經不是英國獨佔壟斷權，而是少數帝國主義強國爲參加壟斷而進行鬥爭，這也就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特點。現時機會主義已不能如它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英國那樣在某一個國家內獲得幾十年之久的完全勝利，但它在許多國家裏都已經最終成熟，已經成熟過度，已經腐化，以至於變爲社會沙文主義而與資產階級的政策完全溶成一體了*。

(九)對帝國主義的批評

我們現在是把對於帝國主義的批評當作廣義的批評來說，即是指社會上各個階級根據各自的一般思想體系對待帝國主義政策的態度而言。

一方面，巨量的財政資本集中於少數人掌握，造成異常廣泛而稠密的聯系和關係，不僅使中小資本家和中小業主受其支配，而且使最小資本家和最小業主也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一國財政資本家集團與其他各國財政資本家集團，爲分割世界和統治其他國家而進行尖銳的鬥爭，——結果便使一切有產階級都紛紛轉到帝國主義方面去。『普遍』迷戀於帝國主義底前途，瘋狂擁護帝國主義，多方粉飾帝國主義，——這便是當代的標誌。帝國主義的思想體系，並且已侵入到工人階級中間去了。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之間並沒有隔着一條萬里長城。如果說現今德國所謂『社會民主』黨底首領，是理應稱呼爲『社會帝國主義者』，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帝國主義者，那末霍柏森早在一九〇二年，就已經指出了有屬於機會主義『費邊社』的英國『費邊帝國主義者』存在的事實。

*波特列索夫，齊赫克爾，馬斯洛夫 諸先生所代表的俄國社會沙文主義，無論是它的公開形式也好，無論是它的暗藏形式也好（齊赫芝，斯科別列夫，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 諸先生所代表的形式），也都是從俄國式機會主義即取消主義中長成的。

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論家，通常是用較為暗藏的方式來辯護帝國主義，抹煞帝國主義佔有完全統治地位並有深厚根源的事實，竭力把細枝末節提在前列，而拚命用一些毫不莊重的『改良』計劃，如由警察機關來監督托拉斯或銀行等等計劃，去引誘人們離開重要的問題。至於那些敢於承認說改良帝國主義基本特質的思想是一種荒謬思想的公然無恥的帝國主義者，却是很少發表意見的。

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說說。德國帝國主義者在所出版的全世界經濟文庫中，企圖考察殖民地中民族解放運動的情形，當然特別是那些非德屬殖民地中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指出印度的騷動和抗議，納塔耳（非洲南部）的運動，荷屬印度的運動等等。其中有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來評論一部記載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舉行而有亞非歐三洲各國被外族統治的民族所派代表參加的附屬民族種族代表會議情形的英文書籍。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對於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詞作了如下的估計：『他們說，必須與帝國主義鬥爭；統治國應當承認附屬民族的獨立權；國際法庭應當監督各強國與弱小民族所訂條約的履行。代表會議並沒有越過這些幼稚願望範圍以外。他們毫不瞭解，帝國主義是與資本主義現今的形式緊相聯結的，因此（!!）與帝國主義作直接鬥爭是沒有希望的，至多也只能局限於反對某些特別可惡的過火現象』*。既然用改良主義的方法修改帝國主義基礎的企圖是一種欺騙，是一種『幼稚的願望』，既然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代表沒有『越過』它前進，所以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代表就要『越過』它後退，而走向於用冒充的『科學』來巧加掩飾的那種崇拜帝國主義的立場了。這也是一種『邏輯』呵！

用改良主義方法改變帝國主義基礎究竟是否可能做到呢，究竟

*見全世界經濟文庫（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第二卷，第一九三頁。

是要向前進去使帝國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矛盾繼續加緊加深起來呢，還是要往後退而使其減弱下去呢，——這便是批評帝國主義時所應注意的根本問題。既然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的特點是各方面的反動，是因財政寡頭底壓迫和自由競爭底消除而使民族壓迫加強起來，於是在二十世紀初期，幾乎所有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都有對帝國主義持反對態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反對派思想發生。考茨基以及廣大國際考茨基主義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決裂的表現，就在於考茨基不僅沒有設法，沒有實行去與這個經濟上根本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反對派思想對立起來，反而在實踐上與它打成一片了。

一八九八年帝國主義性的美西戰爭，在美國引起了『反帝國主義者』，即資產階級民主派最後一批戰士底反對運動。他們稱這次戰爭為『萬惡』的戰爭，認為兼併異國領土是違背憲法的行爲，宣佈說美國對菲律賓土人領袖阿奎納多的舉動是『沙文主義者底一種欺騙手段』（最初，美國向阿奎納多允諾給予菲律賓自由，後來却派美國軍隊登陸而把菲律賓佔領了），並引用了林肯底言論：『白人統治自己，便是自治；白人統治自己而又統治他人，便不是自治而是專制了』*。但是，既然這全部批評都是害怕承認帝國主義與托拉斯——亦即與資本主義基礎——有不可分離的聯系，害怕響應由大資本主義及其發展過程所產生出來的力量，那末這種批評也就不免是一種『幼稚的願望』。

霍柏森在批評帝國主義時所取的基本立場，也是如此。霍柏森比考茨基更先表示否認了『帝國主義底必然性』，而主張必須『提高人民底消費力』（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哩！）。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批評帝國主義，批評銀行專橫勢力，批評財政寡頭統治等等的，也有我們屢次援引過的阿哈德，藍斯堡，愛施維格，以及

*見巴士德所著美國帝國主義一書（J. Patonillet: «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一九〇四年吉戎版，第二七二頁。

法國作家白拉爾，即一九〇〇年出版的那部標題爲英國與帝國主義的淺薄著作底作者。所有這些人並不想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而是以自由競爭和民主制去與帝國主義對立，批評了勢必引起衝突和戰爭的巴格達鐵道建築計劃，發表了維持和平的『幼稚願望』等等，而那位研究國際證券發行情形的統計學家賴馬克，在一九一二年計算價值數千萬萬佛郎『國際』財富時，甚至大聲驚嘆道：『難道可以假定說和平竟會受到破壞麼？…在這樣巨大的數目字下，竟會有人冒險挑起戰爭麼？』*。

從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方面表示出這樣的幼稚氣，當然是沒有什麼奇怪，並且他們本來就利於扮作這種幼稚模樣，而『煞有介事地』談論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可能達到和平。但是，既然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間，也站上這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說什麼在和平問題上，『大家』（帝國主義者，偽社會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都是意見一致的』，試問這個考茨基還有什麼馬克思主義氣味呢？結果便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國主義矛盾底深根，而只是用改良主義的『幼稚願望』來逃避這些矛盾，堵塞這些矛盾。

以下便是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經濟批評的標本。他舉出一八七二至一九一二年英國對埃及輸出輸入的統計材料，結果得出這方面的進出口數量竟比英國進口出口總額增加得慢些。於是考茨基便作出結論說：『我們並沒有任何根據來假定說，英埃貿易若不用武力佔領埃及的手段而單靠經濟『因素』底作用，就會要發展得慢些哩』。『資本實行擴展的趨向』，『最好是能不用帝國主義強力辦法而用和平民主制辦法去實現』**。

*見國際統計學研究所公報（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第十九卷，第二冊，第二二五頁。

**見考茨基所著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國家以及國際同盟一書（Kautsky, „Nationalstaat, imperialistischer Staat und Staatenbund“），一九一五年羅林堡版，第七二頁和第七〇頁。

考茨基底這番議論獲得了他的俄國跟班（以及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掩護人）斯皮克塔托爾先生方面拚命的擁護。這番議論正是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下批評底基礎，所以我們必須把它詳細考察一下。我們且從引證希法亭底言論開始，因為希法亭底結論，據考茨基屢次——其中有一次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宣佈，是『一切社會主義理論家一致同意的』。

『無產階級底任務，——希法亭寫道，——並不是要用已成過去的那個自由競爭時代和仇視國家的政策去與更進步的資本主義政策對立。無產階級對財政資本所施行的經濟政策的答覆，對於帝國主義的答覆，決不會是自由貿易，而只會是社會主義。現在，無產階級政策底目的決不能是實現什麼恢復自由競爭的理想——因為這種理想現在已變成爲反動的理想了，——而只能是用消除資本主義的手段來完全消滅競爭』*。

考茨基與馬克思主義決裂了，他在財政資本時代擁護『反動的理想』，什麼『和平民主制』以及『單靠經濟因素底作用』，因為這個理想在客觀上是向後轉，是從壟斷的資本主義回轉到非壟斷的資本主義上去，是一種改良主義的騙局。

如果沒有採用武力佔領的辦法，如果沒有帝國主義，如果沒有財政資本，那末英國與埃及（或與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貿易就『會增長』得快些了。這是什麼意思？這豈不是說，如果自由競爭沒有受到一般壟斷組織方面的限制，沒有受財政資本底『聯系』或壓迫（即也是壟斷）所限制，沒有受各個國家壟斷式佔據殖民地的情形所限制，那末資本主義就會發展得快些麼？

考茨基底議論不能有什麼別的意思，而他這個『意思』又是毫無意思的。我們就退一步說吧：是的，如果沒有任何壟斷組織，自由競爭就會把貿易與資本主義發展得快些了。但是，貿易與資本

*見財政資本，第五六七頁。

主義發展得愈快，則產生着壟斷的那個生產集中與資本集中也就會來得愈厲害。而且壟斷已經產生出來了，正是從自由競爭中產生出來了！雖然壟斷組織現時已阻礙着發展，但這也不能成爲擁護自由競爭的理由，因爲自由競爭既已產生出壟斷，於是自由競爭也就成爲不可能的了。

無論你把考茨基底議論怎樣翻來覆去，但是在它中間除了反動思想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而外，便找不到什麼其他的東西。

如果把這種推斷改正一下而說得如像斯皮克塔托爾所說的那樣：現在英屬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貿易，要比英屬殖民地與其他各國之間的貿易發展得慢些，——但這也是挽救不了考茨基的。因爲打擊英國的也是壟斷，也是帝國主義，不過是其他國家（美國，德國）方面的罷了。大家知道，卡德爾引起了一種新奇的保護稅制，其所保護的（這是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上就已經指出了的）恰巧是那些便於出口的貨物。其次，大家知道，卡德爾和財政資本所有的特性，是那種『按拋賣價格輸出』的制度，即英國人所稱爲『拋出』的制度：卡德爾在本國按壟斷式高價出賣生產品，而在國外却以賤幾倍的價格銷售，以求打倒自己的競爭者，把自己的生產擴大到最高限度等等。如果說德國對英屬殖民地的貿易是比英國對英屬殖民地的貿易發展得快些，那就只是證明德國帝國主義要比英國帝國主義新鮮些，強大些，有組織些，高一些，而決不是證明自由貿易底『優越』，因爲這裏並不是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制或殖民地隸屬制鬥爭，而是一個帝國主義與另一個帝國主義鬥爭，一個壟斷同盟與另一個壟斷同盟鬥爭，一個財政資本與另一個財政資本鬥爭。德帝國主義對英帝國主義勢力上的優越，要比殖民地界線和保護關稅牆垣厲害些：由此而得出一個擁護『自由貿易』與『和平民主制』的『理由』，便是一種鄙俗思想，便是忘掉帝國主義底根本特點與特性，便是用市儈的改良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

有趣得很，甚至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藍斯堡，雖也如考茨基那樣用市儈態度來批評帝國主義，但他對貿易統計材料所作的研究，却要比考茨基底研究較為科學一點。他並不是單用一個隨便拿來的國家和其餘各國比較，並不是單拿殖民地和其餘各國比較，而是把帝國主義國家輸出到兩種國家中去的出口統計材料拿來比較：第一種是財政上依賴於它而向它借款的國家，第二種是財政上獨立的國家。所得到的結果有如下表：

		德國輸出量（單位百萬馬克）		
		1889年	1908年	增加的百分數
輸出到財政上依賴於德國的國家	羅馬尼亞	48.2	70.8	+ 47%
	葡萄牙	19.0	53.8	+ 73%
	阿根廷	60.7	147.0	+143%
	巴西	48.7	84.5	+ 73%
	智利	28.5	53.4	+ 85%
	土耳其	29.9	64.0	+114%
共 計		234.8	451.5	+ 93%
輸出到財政上不依賴於德國的國家	大不列顛	651.8	997.4	+ 53%
	法蘭西	210.3	437.9	+108%
	比利時	137.9	322.8	+135%
	瑞士	177.4	401.1	+127%
	澳大利亞	31.3	64.5	+205%
	荷屬印度	8.8	40.7	+363%
共 計		1,206.6	3,264.4	+ 87%

藍斯堡並沒有作出什麼總結，所以他也就很奇怪地沒有看到：如果這些數目字真能證明些什麼，那也不過是證明他自己不對而已，因為輸出到財政上依賴的國家中去的數量，畢竟要比輸出到財

政上獨立的國家中去的增加得快些，雖然是快得不多（我們把『如果』兩字加上着重點，因為藍斯堡底統計還是很不完全的）。

藍斯堡考察商品輸出與借款間的聯系時寫道：

『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一年間，由幾個德國銀行作中介締結了發行羅馬尼亞公債的條約。其實，在締約幾年以前，這些德國銀行就已經以這筆公債作担保而發給過借款了。這筆公債主要是用來向德國購買鐵路材料的。一八九一年德國對羅馬尼亞的輸出量，計值五千五百萬馬克。第二年就跌到了三千九百四十萬馬克；中間經過一些起伏，到一九〇〇年時已跌至二千五百四十萬馬克了。直到最近幾年內，才因發行兩筆新公債而重新增加到一八九一年的水準。

『德國對葡萄牙的輸出量，在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間因發行幾次公債而增加到二千一百一十萬馬克（一八九〇年）；在此後兩年內又跌至一千六百二十萬馬克和七百四十萬馬克，直到一九〇三年時才恢復到原先的水準』。

『德國與阿根廷貿易的統計材料，尤其表示得明顯。由於一八八八年和一八九〇年發行兩次公債的結果，德國對阿根廷的輸出量，在一八八九年計達六千零七十萬馬克。過兩年後，輸出量降到一千八百六十萬馬克，即不到原先輸出量三分之一。直到一九〇一年間才又達到並超過一八八九年的水準，其原因是由於德國那時又貸給了阿根廷幾次國家公債和市政公債，供給了建築電氣工廠用的款項，以及其他各種信貸』。

『德國對智利的輸出量，因發行一八八九年公債而增加到四千五百二十萬馬克（一八九二年），過一年後又跌至二千二百五十萬馬克。一九〇六年間，因由德國幾個大銀行作中介締結了新公債的結果，輸出量又增加到八千四百七十萬馬克（一九〇七年），但到一九〇八年時，又跌至五千二百四十萬馬克了』*。

*見銀行雜誌，一九〇九年第二期，第八一九及往下各頁。

藍斯堡從這些事實中作出一種很滑稽的市儈道德式的結論：與公債相連的出口是很不穩固，很不平衡的；把資本輸到國外去而不『自然而然地』『和諧地』發展祖國工業，是很不妥當的；發行外國公債時，克虜伯工廠必須付出價值數千百萬的『高昂』賄款等等。但這些事實却很明白地告訴我們：輸出量底增加，恰巧是與財政資本底欺詐勾當聯結着，財政資本絲毫也不顧及什麼資產階級的道德，而只圖盡量剝削，從一條牛身上剝下兩層皮：第一是從公債上取得一筆利潤，第二是當這筆公債用來購買『克虜伯』工廠底產品或鋼鐵新迪加底鐵路材料等等時，又是從這筆公債上取得許多利潤。

我們再重說一遍，我們並不認為藍斯堡底統計是個完備的統計，但我們畢竟要把他的統計引用一下，因為他的統計是比考茨基和斯皮克塔托爾兩人底統計較為科學得多，因為藍斯堡指出了觀察問題的正確方法。為要推論財政資本在出口事業等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於把輸出事業與財政家欺詐事業的聯系特別拿來單獨說明，就要善於把輸出事業與卡德爾貨物銷售等等的聯系特別拿來單獨說明。單只拿一般殖民地與非殖民地比較，拿一個帝國主義與另一個帝國主義比較，拿一個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與其餘一切國家比較，就會恰巧是迴避和掩蓋問題本質了。

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理論批評，其所以與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共同點，其所以只可用作宣傳和機會主義者及社會沙文主義者講和平講統一的門徑，也就是因為這種批評恰巧迴避和掩飾了帝國主義最深刻的根本矛盾：壟斷組織和與之並存的自由競爭間的矛盾，財政資本底巨大『業務』（以及巨量利益）與自由市場上『誠實無欺的』貿易間的矛盾，卡德爾和托拉斯（一方面）與沒有加入卡德爾的那些企業（另一方面）間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所臆想出來的那個鼎鼎大名的『超帝國主義』論，也含

有完全同樣反動的性質。試把考茨基在一九一五年關於這一問題的論斷和霍柏森在一九〇二年的論斷比較一下。

考茨基說：『…難道現在的帝國主義的政策不能由一種新的，超帝國主義的政策，即用國際聯合財政資本共同剝削全世界的辦法代替各國財政資本相互鬥爭的政策所排擠麼。無論如何，資本主義底這一個新的階段是可以設想的。至於它能否見諸實現，那末我們現在還沒有充分根據來解決這一問題』*。

霍柏森說：『現在很多人認為，在各自佔有許多不文明殖民地和依賴國的少數巨大聯邦帝國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是現代趨勢最正當發展的道路，而且這種發展道路是最有希望在堅固的聯帝國主義基礎上達到永久和平的』。

考茨基所稱為超帝國主義的東西，也就是霍柏森比他更早十三年時所稱為聯帝國主義的東西。考茨基除了用一個字冠代替另一個字冠來臆造出一個怪深奧的新字眼外，其『科學』意見底進步處就只在於他企圖把霍柏森所描寫的東西——其實是英國牧師玩弄的騙局——假冒為馬克思主義。在英布戰爭以後，英國牧師這一高貴等級極力安慰那些在南非洲戰爭中喪失了不少生命，並為保證財政資本家獲得更高利潤而繳付了更高捐稅的英國小市民和工人，這本來是理所當然的。說帝國主義並不很壞，說它很快就要變為能夠保障永久和平的聯（或超）帝國主義，——這難道不是最好不過的一種安慰麼？無論英國的牧師或甜蜜的考茨基抱有怎樣慈善的目的，但他那個『理論』底客觀的，即真正的社會意義，却不過是用極反動的辦法來安慰羣衆，叫他們癡心妄想在資本主義下可能達到永久和平，轉移羣衆視線，使其不注意那些劇烈矛盾與現代緊張問題，而去注意虛偽的所謂新的未來的『超帝國主義』前途。在考茨基底『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除了欺騙羣衆而外，是一無所有的。

*見新時代雜誌，一九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第一四四頁。

例如，只要把那些人人皆知而不容爭辯的事實拿來與考茨基竭力誘惑德國工人（和各國工人）的那種前途明白對照一下，便可知道他所說的這種前途極端虛假了。試舉印度、安南和中國爲例。誰都知道，這三個一共有六七萬萬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是受幾個帝國主義強國，即英法日美等國財政資本剝削的。假定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組成爲彼此敵對的聯盟，以求保持或擴張它們在上述亞洲諸國中的領土，利益和『勢力範圍』。這就會是『聯帝國主義』或『超帝國主義』聯盟了。又假定所有的帝國主義強國共同組成爲一個聯盟來『和平』分割上述亞洲諸國，那就會是『國際聯合的財政資本』了。這種聯盟底實際例子，在二十世紀歷史中已經有過了，例如列強在共同對付中國時就締結過這樣的聯盟。試問是否『可以設想』，說這種聯盟在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而考茨基恰巧就是以這樣的條件爲前提的）不會是短時期的呢？說這種聯盟能除去各種各樣的磨擦，衝突和鬥爭呢？

只要明明白白提出這個問題，便可知道只能給以否定的回答。因爲在資本主義下，爲實行分割勢力範圍，分割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計算各個參與分贓者底實力，即它們各自擁有的一般經濟，財政，軍事等等實力而外，再也不能設想出什麼其他的根據。而這些參與分贓者所有的實力又變更得各不相同，因爲在資本主義下，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彼此平衡發展是決不可能的。半世紀以前，德國底資本主義實力與當時英國底實力相較起來，還是小得可憐；日本當時與俄國比較起來，也是如此。過了一二十年之後，難道還『可以設想』帝國主義列強相互實力對比照舊沒有變更麼？絕對是不可這樣設想的。

所以，資本主義現實中的（不是英國牧師或德國『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鄙俗的市儈的幻想中的）『聯帝國主義的』或『超帝國主義的』聯盟，不管這些聯盟採取那種形式，不管是一個帝國主義

聯盟去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聯盟，還是一切帝國主義強國結成一個總聯盟，都不可避免地只會是前後兩次戰爭中間的『暫時休戰』。和平的聯盟是準備戰爭，同時又是從戰爭中脫胎而來，互相制約，根據同一種帝國主義聯系，同一種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相互關係而引起和平鬥爭形式與不和平鬥爭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而聰明絕頂的考茨基，爲了安撫工人並把他們與投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調和起來，便把一條鍊子上的某一環節與另一環節割開，把今天的一切強國爲共同『安撫』中國（請回憶它們鎮壓義和團起義事件吧）所締結的和平的（與超帝國主義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國主義的）聯盟，與明天的那個不和平的衝突，與那個準備在後天又由所謂『和平的』總聯盟去分割——譬如說——土耳其等等的不和平的衝突割開。考茨基不願提到帝國主義和平時期與帝國主義戰爭時期間的活生生的聯系，而寧可把僵硬的抽象觀念介紹給工人，把工人和他們那些僵死的領袖調和起來。

美國人喜爾在他所著歐洲國際關係發展中的外交史一書序言中，把近代外交史分爲以下三個時期：（一）革命時代；（二）立憲運動時代；（三）現代『商業帝國主義』時代*。另一個作家又把一八七〇年起的大不列顛『全世界政策史』分爲四個時期：（一）第一個亞洲時期（反對俄國在中亞細亞一帶向印度的進展）；（二）非洲時期（約自一八八五年起，至一九〇二年止），即爲分割非洲而與法國進行鬥爭的時期（一八九八年的『法紹達』事件，那時險些要與法國開戰）；（三）第二個亞洲時期（與日本訂約反對俄國）；（四）『歐洲』時期，主要是反對德國**。銀行『活

*見喜爾所著歐洲國際關係發展中的外交史一書(David Jayne Hills „A History of the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第一卷, 第一〇頁。

**見施里德爾所著前書, 第一七八頁。

動家』黎舍爾早在一九〇五年時，便指出法國財政資本在意大利進行活動以準備法意兩國在政治上的聯盟，德英兩國爭奪波斯的鬥爭以及所有歐洲各國資本爲借款給中國問題所進行的鬥爭開展起來等等事實，而寫道：『前鋒隊底政治衝突，是在財政基礎上開展起來的』。這便是『超帝國主義的』和平聯盟與普通的帝國主義衝突密切相聯的具體實際情形。

考茨基掩飾帝國主義最深刻矛盾，因而也就必然要粉飾帝國主義的這種思想，是在他批評帝國主義底政治特性時也表現出來了的。帝國主義是財政資本和壟斷制底時代，財政資本和壟斷制到處散佈的都是統治趨向而不是自由趨向。這統治趨向底結果，便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發生全面的反動，便是政治制度方面的矛盾也極端尖銳化起來。民族壓迫和兼併傾向，即破壞民族獨立的傾向（因爲兼併無非是破壞民族自決而已），也特別尖銳化起來了。希法亭很正確地指出了帝國主義與民族壓迫尖銳化的聯系：『至於新開闢的國家，——他寫道，——那末輸入這裏來的資本就使種種矛盾加緊起來，引起那些發生民族覺悟的人民來進行有加無已的反抗，反對外來的敵人；這種反抗很容易發展成爲反對外資的危險行動。舊式的社會關係根本革命化起來；各『史外民族』數千百年來的農村閉塞性日益破壞下去；它們日益捲入於資本主義的漩渦了。而且資本主義本身也漸漸授予各被征服民族求得解放的工具和手段。於是它們也就提出歐洲民族曾經認爲最高尚的那個目標，即創造統一民族國家，作爲獲得經濟文化解放的工具。這種獨立運動，將危及歐洲資本在其所剝削的那些最寶貴而含有最優美前途的區域中的地位；於是歐洲資本也就只有經常增加自己的武力，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

*見財政資本，第四八七頁。

這裏尚須補充一點。帝國主義不僅要在新開闢的國家中，而且要在舊的國家中實行兼併，加緊民族壓迫，因而也就使反抗加緊起來。考茨基表示反對帝國主義加緊政治反動的事實，而抹煞了一個已經是特別迫切的問題，即在帝國主義時代決不能與機會主義者講統一的問題。他表示反對兼併政策，同時又把自己的這種反對意見，用一種最不傷害機會主義者而為機會主義者所最易接受的形式表示出來。他是直接對德國大眾說話的，但他終究恰巧把最重要最迫切的事實，例如德國兼併亞爾薩斯和羅來因的事實，掩飾起來。我們且舉一個例子來估計考茨基底這種『偏向』吧。假定說日本人指斥美國人兼併菲律賓的行動，試問是否會有很多人相信日本人這樣來作，是因為他根本反對兼併，而不是因為他自己想要兼併菲律賓呢？是否要承認，只有當日本人起來反對日本兼併高麗，要求讓高麗自由脫離日本的時候，才能把日本人反對兼併的這種『鬥爭』看作是誠心的和政治上誠懇的態度呢？

考茨基對帝國主義作的理論上的分析，以及他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經濟上政治上的批評，都是浸透了與馬克思主義絕對不能相容的一種蒙蔽掩飾帝國主義最主要根本矛盾的精神，浸透了力圖把歐洲工人運動中陷於破壞的那種與機會主義者統一的局面保持起來的傾向。

(一〇)帝國主義底歷史地位

我們已經說過，帝國主義按其經濟本質來說，是壟斷性的資本主義。這一點也就決定了帝國主義底歷史地位，因為在自由競爭基礎上，而且恰巧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乃是從資本主義制度進到更高一個社會經濟制度上去的過渡。必須特別指出現代所特有的四種主要壟斷形式，或壟斷性資本主義底四種主要表現。

第一，壟斷是在生產集中過程發展到很高階段的時候長成的。

這便是資本家的壟斷同盟，即卡德爾，新迪加與托拉斯。我們已經說過，這些壟斷同盟在現代經濟生活中起着莫大的作用。到二十世紀開始時，它們已在各先進國家中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地位。固然，最先開始走上組織卡德爾道路的，是那些實行高度保護稅則的國家（德國和美國），但實行自由貿易的英國也表明出了壟斷制是從生產集中過程中產生出來的這個基本事實，不過時間上稍遲一點罷了。

第二，壟斷制使奪取最主要原料來源，尤其是為供給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主要的，卡德爾化程度最大的工業部門，即煤炭業和鋼鐵工業所需要的原料來源的鬥爭，加緊起來了。壟斷性的佔有主要原料來源，使大資本底權力加強到了可驚的地步，使卡德爾化了的工業和沒有卡德爾化的工業間的矛盾異常尖銳化了。

第三，壟斷是從銀行中長成的。銀行已由平凡的中介企業，變成了財政資本的壟斷者。在任何一個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由三五個最大的銀行實現了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間的『個人聯合』，把佔全國資本和貨幣收入總數大部分的數百萬萬資本，都一手包攬起來。財政寡頭制把依賴關係的密網籠罩於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一切經濟和政治機關，——這便是這種壟斷底最明顯的表現。

第四，壟斷是從殖民政策中長成的。財政資本在無數『舊有的』實行殖民政策的動機上，更加上了一個新的動機，即為爭奪原料產地，爭奪資本投殖民地，爭奪『勢力範圍』（即成立有利契約，獲得租讓，取得壟斷性利潤及其他等等的範圍）以及爭奪一般經濟領土而鬥爭的動機。例如，當歐洲列強還只把非洲十分之一的面積佔領為自己的殖民地時（在一八七六年時還是如此），殖民政策還能不用壟斷手段而按所謂『自由奪取』領土的方式去發展。但是，當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積已被佔領的時候（到一九〇〇年的時候），當全世界都已分割完了的時候，便必然開始了一個壟斷式佔有殖民地，亦即是為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特別尖銳起來的時代。

壟斷性資本主義把所有的資本主義矛盾弄到了如何尖銳的程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價高漲和卡德爾壓迫這兩件事實就够了。這種矛盾尖銳化，便是歷史過渡時期中最強大的推動力，而這個過渡時期是在全世界財政資本完全勝利時就已經開始了的。

壟斷，財政寡頭，趨向統治而不趨向自由，極少數最富強國家剝削一批一批弱小國家——所有這些便產生了使人必須把帝國主義解釋為寄生腐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特點。帝國主義底趨向之一，即造成『食利國』或放債國，使這些國家中的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專靠輸出資本和『剪息票』為生的現象，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若以為這一腐化趨向排除了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可能，那就是錯誤的想法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個別工業部門，個別資產階級階層，個別國家，在帝國主義時代，各以多少不一的強度，時而表現着此種趨向，時而又表現着彼種趨向。整個說來，現在資本主義發展得比先前快得不可計量，但這種發展不僅一般地成為更不平衡，並且這種不平衡又特別表現於資本最雄厚的國家（英國）底腐化。

研究德國大銀行問題的作家黎舍爾論到德國經濟發展底速度時寫道：『德國在前一時代（一八四八至一八七〇年）進步得並不很慢，但是和德國現今時代（一八七〇至一九〇五年）全部經濟及其銀行發展底速度比較起來，便好像昔日郵車速度和近代汽車速度相比較一樣，而近代汽車駛行之快，對於不謹慎的步行者和汽車上的乘客本身都是很危險的』。這個異常迅速發展了的財政資本，正因為它是這樣迅速發展起來了，所以又很想更『安然』把那些必須從更富足的國家方面奪取過來的殖民地佔領起來，而這種奪取又不是單只用和平手段所能做到的。在最近幾十年來，美國經濟的發展要比德國來得更快，而現代美國資本主義底寄生性也就因此而表現得特別明顯。另一方面，例如把共和派的美國資產階級和君主派的日本資產階級或德國資產階級比較一下，便可以看出：在帝國主義

時代，這些資產階級之間極大的政治上的差別，也都極度減弱下去，其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這種差別根本就不重要，而是因為所有這些資產階級都帶有相當的寄生性的特徵。

許多工業部門中某一部門裏的資本家，許多國家中某一國家裏的資本家等等，既獲得壟斷性的高度利潤，在經濟上便有可能收買工人階級中某些階層，暫時且能收買其中頗大的一個少數，吸引他們站在某一部門或某一國家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其餘一切部門或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彼此因分割世界而緊張起來的對抗，更使這種趨向加強起來。於是便形成了帝國主義與機會主義間的聯系，這種情形在英國表現得最早而且最鮮明，因為發展過程中的某些帝國主義特點在英國要比其他各國出現得更早得多。有些作家，如馬爾托夫，愛用一種『官場樂觀主義的』（如考茨基與鳩思曼一樣）議論來否認帝國主義與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相聯系這一現時特別觸目的事實，如說什麼假若先進的資本主義恰巧加強了機會主義，或是說假若領薪最多的工人恰巧傾向於機會主義，那末反資本主義者底事業就未免毫無希望了。切不要看錯這種『樂觀主義』底意義：這是對機會主義抱樂觀的態度，這是用來掩飾機會主義的樂觀主義呵。其實，機會主義特別迅速和特別討厭的發展，並不能保證機會主義底勝利臻於鞏固，也正好似一個健康身體上的膿瘡迅速的膨脹，只足以加速膿瘡爆裂而使身體恢復健康一樣。

在這方面最危險的，倒是那些不願意瞭解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若不和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密切聯系起來便是一種空洞而虛假的廢話的人。根據以上關於帝國主義底經濟本質問題所說的一切，便要把帝國主義估計為過渡的資本主義，或更正確點說，垂死的資本主義。在這點上特別耐人尋味的，便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敘述現代資本主義時所常用的字眼：『互相錯綜』，『沒有孤立性』等等；說

而日益超出私有經濟調節範圍的企業』。而講了後面這句話的那個黎舍爾，同時却又非常鄭重地說道，馬克思主義者關於『社會化』的『預言』是『沒有實現的』！

『互相錯綜』一語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它只是抓住了現在我們眼前發生的那個過程中最觸目的一點。它證明觀察者只看見單個樹木而沒有看見樹林。它證明人們盲從式地模寫着外表的偶然的紛亂的現象。它證明觀察者爲一大堆生硬材料所壓倒，完全不能瞭解其中所含的內容和意義。股票佔有關係，即私有主關係，是『偶然互相錯綜起來的』。但是隱藏在這種錯綜現象底下的，構成這種現象基礎的，却是那些變動着的社會生產關係。既然大企業規模已擴展得十分龐大，以精確估計巨量事實爲根據來有條不紊地設法取得數千萬人民所必需的總額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原料；既然有系統地設法把這些原料轉運到各個最便利的生產地點，有時甚至是彼此相距數千百里的地點；既然由一個中心來指揮一切順序製造的階段，一直到製成許多種類的熟製貨品爲止；既然這些生產品是按照一個總的計劃來分配於數千萬數萬萬的消費者（美德兩國的煤油銷售，都是由美國『煤油托拉斯』支配的），——那末擺在我們面前的，就顯然是生產底社會化，而決不是什麼簡單的『互相錯綜』；那末私有經濟關係和私有權關係也就顯然已變成一種不合於內容的外殼，而假如用人工方法來延緩其必被消除的時日，那它就必然要腐化起來；它也許能在腐化狀態中存留一個比較長久的時間（如果割治機會主義膿瘡的事情竟不幸而遷延下去的話），但它終究還是必然會被消除掉的。

熱烈崇拜德國帝國主義的叔爾茨、黑維尼茨驚嘆道：

『倘若德國銀行底領導工作歸根到底是擔負在十來個人身上，那末他們的活動之關係於國民福利，在現時已經是要比大多數政府總長底活動更爲重大了』（這裏把銀行家，總長，工業家以及食利

者『互相錯綜』的事實忘掉，當然是較為有利的) …『倘若把我們所說過的那些傾向底發展事實澈底推想一番，那末結果便會是：一國底貨幣資本統一於銀行之中；銀行又互相聯合成為卡德爾；全國急需投殖的資本都化作有價證券。那時便會實現聖西門底天才預言：『現在生產中因經濟關係不是按一個調節計劃發展的事實所引起的無政府狀態，定會讓位於有組織的生產。那時生產便不會再由那些彼此孤立，各不相謀，不知道民衆經濟要求的企業家去指揮，而會由相當的社會機關去主持。中央管理委員會既有可能從更高的觀點上去觀察廣闊的社會經濟領域，就會把這個社會經濟調節得有利於全社會，並把生產資料轉交給適當人物去支配，特別是會設法使生產和消費經常處於彼此協調的狀態。現在有一種機關已把相當組織經濟勞動的作用包括於自己的職務以內，這種機關便是銀行』。我們現在雖實現聖西門底這些預言的時候還遠；但我們已經是在實現這些預言的道路上走着：這是和馬克思本人所設想的不同的馬克思主義，但也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這不消說是對馬克思學說所作的一種漂亮的『反駁』，從馬克思底精確科學分析倒退到聖西門底猜想上去了，而聖西門底猜想雖然是個天才的猜想，但終究只是一種猜想。

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拉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三至二九〇頁。

*見社會經濟底基礎叢刊(„Grundriß der Sozialökonomik“)，第一四六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

在荷蘭，斯堪的那維亞和瑞士，有些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宣傳要在現今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祖國』的謊話時，主張取消社會民主黨最低限度綱領中的『民警』或『武裝人民』這一老條文，而代之以『廢除武裝』的新條文。青年國際雜誌已開始了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並在第三期上發表了一篇主張廢除武裝的社論。可惜，在格里姆所提出的最新的提綱中也對『廢除武裝』的主張作了一種讓步。在新生活雜誌和預言者雜誌上也開始了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

現在我們要把主張廢除武裝者底立場仔細考察一下。

一

主張廢除武裝者所持的基本論據，是認為要求廢除武裝，就是最明顯，最堅決，最徹底表示反對任何軍國主義和任何戰爭。

可是，在這個基本論據中，恰巧又包含有主張廢除武裝者底基本錯誤。社會主義者若不背棄社會主義，便不能對任何戰爭都表示反對。

第一，社會主義者從來沒有，並且始終也不能表示反對革命戰爭。各個『大』帝國主義強國中資產階級已是澈頭澈尾反動的了，因而我們認為這個資產階級現在所進行的戰爭是反動的，奴隸主的和罪惡的戰爭。而反對這個資產階級的戰爭，又是怎樣呢？例如，受這

個資產階級壓迫，受它支配或殖民地民族爭取自己解放的戰爭，又是怎樣呢？『國際』派提綱第五條上所謂『在這個橫行無忌的帝國主義時代，已不能有任何的民族戰爭了』這一說法，顯然是不正確的。

在二十世紀這個『橫行無忌的帝國主義』世紀底歷史中，充滿了殖民地戰爭。但我們歐洲人，壓迫全世界大多數民族的帝國主義者，本着我們固有的一種可惡歐洲沙文主義精神來稱爲『殖民地戰爭』的，却往往是這些被壓迫民族底民族戰爭或民族起義。帝國主義最主要的特性之一，也就是它在最落後的國家內加速資本主義發展，因而就使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擴大和加強起來。這是事實。由此就必然要得出結論：帝國主義往往要產生民族戰爭。尤尼烏斯¹⁷在其所著一書中擁護上述『提綱』時說：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反對一個帝國主義大強國的民族戰爭，都會引起另一個與之競爭，並且也是帝國主義的大強國方面的干涉，於是任何民族戰爭都會變成爲帝國主義戰爭。但這個理由也是不正確的。這種情形可能發生，但並不是常常如此發生。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四年時期中有許多殖民地戰爭，都不是循着這條道路進行的。舉例說，假使我們聲言在現時戰爭結束後，——如果這次戰爭是弄到各參戰國精疲力竭而結束，——『不會』發生『任何』民族的，進步的，革命的戰爭，譬如中國與印度，波斯，暹羅等國聯合進行的反對大強國的戰爭，那就簡直是說笑話了。

根本否認在帝國主義時代有發生民族戰爭的可能，這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歷史上顯然是錯誤的，而在實踐上就是鼓吹歐洲人中間所流行的沙文主義思想：我們是屬於壓迫歐非亞等洲數萬萬人民的那些民族的人，所以應當對各個被壓迫民族說，它們進行戰爭來反對『我們的』民族是『不可能的』！

第二，國內戰爭也是一種戰爭。誰承認階級鬥爭，誰就不能不承認國內戰爭，因爲國內戰爭在任何階級社會中都是階級鬥爭繼

續，發展和尖銳化的自然的表現，在一定情形下並且是其必然的表現。所有的大革命都證實了這一點。否認或忘記國內戰爭，便是陷入極端機會主義立場而背棄社會主義革命。

第三，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並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戰爭。恰恰相反，它是預定會有戰爭的。資本主義底發展在各個國家內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下也只能是這樣。由此就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切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餘國家在某些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前期的國家。這就不僅會引起磨擦，而且會引起其他各國資產階級公開企圖撲滅社會主義國家中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的行動。在這種情形下發生的戰爭，在我們方面便是合理的和正義的戰爭，便會是為社會主義，為求其他各國人民從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的戰爭。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致考茨基的信中直接認定已經獲得勝利的社會主義進行『防禦戰爭』的可能，是完全正確的。他所說的防禦，正是指已經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防禦其他各國資產階級而言。

只有當我們在全世界——而不僅是在一國內——已經推翻，最終戰勝並剝奪了資產階級之後，戰爭才會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把鎮壓資產階級反抗行動這一件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最困難最需要鬥爭的事情避開不說，或加以塗飾，那末從科學觀點看來便是完全不正確的，完全不革命的。『社會』牧師和機會主義者始終都甘願幻想什麼未來的和平的社會主義，但他們與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也就在於他們不願想到，不願思索為實現這個燦爛未來而必須進行殘酷階級鬥爭和階級戰爭。

我們決不應容許人家用字句來欺騙我們。例如，有很多人仇視『保護祖國』這一概念，因為露骨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用這個概念來遮蓋和掩飾資產階級在這次強盜戰爭中所說的謊話。這是

事實。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應當忘掉對政治口號意義的思索。在這次戰爭中承認『保護祖國』的口號，就不過是，絕對不過是把這次戰爭看作『正義的』，適合無產階級利益的戰爭，因為軍隊侵入別國在任何戰爭中都是可能的事情。被壓迫民族方面在它們反對帝國主義大強國的戰爭中，或已經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方面在它反對資產階級國家裏某個加利非¹²²的戰爭中否認『保護祖國』的口號，那就簡直是愚蠢了。

如果忘記任何戰爭都不過是政策用別種手段的繼續，那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現時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兩個大強國集團所進行的帝國主義政策底繼續，而這個政策是由帝國主義時代各種關係總和所產生所滋養着的。但這個時代又必然要產生出並且滋養着反對民族壓迫的政策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政策，因此也就可能並且必然會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義和戰爭；第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和起義；第三，這兩種革命戰爭底匯合等等。

二

此外還要注意到如下一個概括的理由。

一個被壓迫階級若不力求學會使用武器，獲得武器，便只配讓人把它當作奴隸看待。我們若不願做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便不能忘記我們是在階級社會中生活着，除了階級鬥爭外，再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其他一種擺脫這個社會的出路。在任何一種階級社會中，不管它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上，農奴制度上，或如現今這樣建立在僱傭勞動制度上，壓迫階級總是擁有武裝的。不僅現時的常備軍，而且現時的民警——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例如在瑞士，——都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武裝。這是無須特別說明的最淺鮮不過的道理。只須指出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用軍隊來反對罷工者這一事實就夠了。

資產階級用武裝來反對無產階級，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最巨大，最重要的基本事實。當有這樣一件事實存在的時候，却有人勸革命社會民主黨人提出『廢除武裝』的『要求』！這就等於完全放棄階級鬥爭觀點，棄絕任何革命念頭。我們的口號應當是：武裝無產階級來戰勝和剝奪資產階級，並解除其武裝。這是革命階級所能採取的唯一策略，是從資本主義軍國制度底全部客觀發展中產生出來的策略，是這種發展所絕對要求的策略。無產階級只有把資產階級解除武裝以後，才能根本廢除武裝，而不背叛其全世界歷史的任務；無產階級無疑是會這樣作的，但是只有在那個時候，無論如何也不會在那個時候以前。

現今的戰爭，在反動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和慣於流淚的小資產者那裏所引起的只是悽慘和驚慌，只是厭惡任何一種運用武器的行爲，厭惡流血，厭惡死亡等等的心理，而我們却應當說：資本主義社會向來而且始終都是沒有終結的悽慘。如果現今這次最反動的戰爭給這個社會準備着悽慘的終結，那我們是沒有任何根據來感覺絕望的。當人人都看見資產階級親自引起唯一正當的和革命的戰爭，即以反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爲目標的國內戰爭時，廢除武裝的『要求』，更正確些說，廢除武裝的夢想，客觀上無非是絕望底表現。

假如有人說這是脫離實際生活的理論，我們就要請他注意兩件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一方面，是托拉斯底作用和婦女在工廠中作工底作用，另一方面，是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和俄國一九〇五年的十二月起義。

資產階級底事情是要發展托拉斯，把兒童和婦女驅進工廠去。在那裏折磨他們，腐化他們，使他們陷於極端窮乏的境遇。我們並不『要求』這種發展，並不『贊助』這種發展，我們是反對這種發展的。可是怎樣來反對呢？我們知道，托拉斯和婦女在工廠中作工是進步的。我們不願意退轉到手工業，退轉到壟斷以前的資本主

義，退轉到婦女專在家裏工作的時代去。而是要經過托拉斯等等前進，並且越過它們而進到社會主義！

把這個議論稍微改變一下，便可用來論斷現時把人民軍事化的制度。今天，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不僅把全體成年壯丁軍事化，而且把青年軍事化。到明天，它大概就會把婦女也實行軍事化。對於這種情形，我們應當說：那就更好了！快點前進呀！進行得愈快，則為反對資本主義而舉行武裝起義的時機也就會愈加接近。如果社會民主黨人不忘記公社底例子，那他們怎麼能為青年軍事化等等的形態所嚇倒呢？這並不是什麼『脫離實際生活的理論』，並不是什麼空想，而是事實。如果社會民主黨人竟不顧一切經濟和政治的事實，而否認帝國主義時代和帝國主義戰爭必然會使這些事實重演的趨勢，那就真正糟糕到極點了。

有一位目觀過公社情形的資產階級份子曾於一八七一年五月間在一個英國報上寫過：『如果法蘭西民族盡是些婦女，那它該會是何等可怕的民族呵！』。婦女和十三歲的兒童在公社時期，曾與男子並肩作戰。在將來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鬥中，也必然會是這樣的。無產階級的婦女，決不會消極觀望，聽憑那些武裝精良的資產階級去槍殺武裝惡劣或毫無武裝的工人的。她們也會像在一八七一年那樣拿起武器來動作，於是現時這些被嚇倒了的民族，更正確些說，現時這個與其說是被政府所破壞，不如說是被機會主義者所破壞了的工人運動，毫無疑義——遲早雖不可知，但絕對是毫無疑義——就會發展成為革命無產階級『可怕民族』底國際同盟。

現在全部社會生活都在軍事化。帝國主義就是各大強國為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而進行殘酷的鬥爭，因此它就必然會在全世界各國，包括各中立國和各小國在內，引起更進一步的軍事化。無產階級的婦女應怎樣對付這種情形呢？只是去咒罵一切戰爭和一切軍備廢，只是去要求廢除武裝麼？真正革命的被壓迫階級中的婦女，無

論如何也不會甘心充當這種可恥的角色。她們會對她們的兒子說：『你快長大成人了。人們將給你武器。你要拿起這個武器來好好學習軍事。這種學識是無產者所必需的。你學習軍事，不是爲了開槍反對你的兄弟，即其他各國的工人，如同在現時戰爭中所作的那樣，如同社會主義叛徒們教導你作的那樣，而是爲了進行鬥爭去反對本國的資產階級，以使用戰勝資產階級並把它解除武裝的手段——而不是用善良的願望——來最終消滅剝削，貧困和戰爭』。

如果拒絕進行這種宣傳，在現今戰爭時期拒絕進行這種宣傳，那就最好是完全不講什麼國際革命社會民主運動，什麼社會主義革命和什麼以戰爭反對戰爭的大話了。

三

主張廢除武裝者反對『武裝人民』這條綱領要求的理由之一，是說這個要求容易引起向機會主義讓步的結果。我們在前面已考察了最重要的問題，即廢除武裝的要求對於階級鬥爭和對於社會革命的關係。現在再來考察廢除武裝的要求對於機會主義的關係問題。這個要求之所以不可採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這個要求以及由此產生的幻想，必然會削弱和軟化我們同機會主義的鬥爭。

這個鬥爭顯然是國際底當前主要問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若不與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緊密聯結起來，便是一種空話或騙局。齊美爾瓦爾得和昆塔爾¹⁷³底主要缺點之一，第三國際底這些萌芽可能遭受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也就在於那裏甚至沒有公開提出同機會主義作鬥爭的問題，更不用說以主張必須同機會主義決裂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了。機會主義在歐洲工人運動內部獲得了一——暫時獲得了一——勝利。在一切巨大國家內都形成了兩種主要的機會主義派別：第一，是普列漢諾夫，謝德曼，列金，湯姆和桑巴，王德威爾得，漢德曼，亨德孫等等一流先生們露骨的，無恥的，因而也是危

險較少的社會帝國主義。第二，是暗藏的，考茨基主義的：如德國的考茨基與哈阿茲一夥人，以及『社會民主勞動派』；法國的雷格，普列斯曼和馬依拉斯等；英國的麥克唐納爾及其他『獨立工黨』首領；俄國的馬爾托夫和齊赫芝等等；意大利的特列維斯及其他所謂左派改良主義者。

露骨的機會主義公開和直接反對革命，反對正在開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爆發，而公開同政府聯盟，不管這種聯盟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從參加內閣起，直到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在俄國）為止，但實質總是一樣的。暗藏的機會主義者，考茨基主義者，對於工人運動是更有害得多，更危險得多，因為他們用一切漂亮的，好聽的，也算是『馬克思主義的』詞藻與和平主義的口號為護符，而暗中辯護他們與前者聯合的行爲。反對這兩種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的鬥爭，應該在無產階級所有一切政治活動場中，在國會工作，職工會，罷工，軍事及其他等等範圍中進行。這兩種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共有的主要特點，就是它們對現時戰爭與革命相互聯系的具體問題以及革命方面的其他具體問題，默不作聲，隱諱掩蓋，即或談談，也是戰戰兢兢，惟恐違犯警察禁令。而他們這樣幹，又是不願在戰前對於臨來的這個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間的聯系，已指出過無數次，並且還在巴塞爾宣言中正式地指出過。廢除武裝這一要求底主要缺點，也就在於它避開了革命底一切具體問題。也許主張廢除武裝的人是主張一種完全新式的，不要武裝的革命吧？

其次，我們無論如何都不反對為改良而鬥爭。我們不願意忽略一種可能發生的悲慘情形，即是雖然有多次羣衆醞釀和羣衆不滿底爆發，雖然有我們的努力，但革命仍不會由這次戰爭中長成起來，而人類又不幸會遭遇着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情形。我們主張的那個改良綱領，也應當是反對機會主義者的。如果我們讓機會主義者單獨去為改良而鬥爭，而自己却跑到什麼要求『廢除武裝』的渺茫

天空上去，逃避悲慘的現實，那末，機會主義者是只會歡天喜地的。『廢除武裝』正是逃避惡劣的現實，而完全不是進行反對悲慘現實的鬥爭。

在這樣的綱領中，我們大概會這樣說：『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帝國主義戰爭中承認保護祖國的口號並提出這個口號，只是用資產階級的謊言去敗壞工人運動而已』。這樣具體地回答具體問題，比要求廢除武裝和拒絕『任何』保護祖國，在理論上就會更為正確，對於無產階級就會更有益得多，而使機會主義者更難堪得多了！我們還可以補充說：『所有一切帝國主義列強，即英法德奧俄意日美等國資產階級都成了極端反動的，處心積慮力圖達到世界統治，所以由這些國家底資產階級方面所進行的任何戰爭，都只會是反動的戰爭。無產階級不僅應當反對這樣的一切戰爭，而且應當希望『自己的』政府在這樣的戰爭中遭受失敗，並且如果為阻止戰爭而舉行的起義沒有成功，便要利用這種失敗去舉行革命的起義』。

關於民警問題，我們要說：我們不贊成資產階級的民警，而只贊成無產階級的民警。因此不僅『不用一文錢和一個人』去幫助常備軍，而且對於資產階級的民警也應如此，甚至在美國或瑞士，挪威這樣的國家裏也應如此。況且我們看見，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國家內（例如在瑞士）都日益使民警普魯士化，——特別是在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一年，——日益使它腐化，以便動員武力去反對罷工工人。我們可以要求：軍官由人民選舉，取消一切軍事裁判，外國工人與本國工人平權（提出這一條，在瑞士這樣一個日益無恥地剝削日益衆多外國工人，而使他們處於無權地位的帝國主義國家中，是特別重要的）；其次：要求使國內——譬如說——每百個居民都有權組織一種自由團體，自由選舉這些團體的教練員，由國庫支付這些教練員底薪資等等。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無產階級，才能真正為自己——而不是為自己的奴隸主——研究軍事，而這樣的研究是無

產階級利益所絕對要求的。俄國革命已證明出，革命運動底任何一個勝利，那怕只是部分的勝利，例如奪取了某個城市，某個工廠區域和某一部分軍隊，——都必然會迫使這個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樣的綱領。

最後，當然不能單用綱領去同機會主義作鬥爭，而是要始終不懈地去監督這些綱領底真正實現。破產了的第二國際所犯的最嚴重的，最不可挽救的錯誤，就是言行不符，而養成了假仁假義和專說昧心革命空話的習慣（請看現在考茨基及其伙伴們對巴塞爾宣言的態度）。廢除武裝的要求，作為一種社會思想來看，——即是由相當的社會環境所產生出來，並且能夠影響相當的社會階層，而不只是一種個人的奇思異想，——大概是由某些小國所處的那種特殊而例外的『安靜』生活條件所產生出來的，因為這些國家在很久一個時期內都站在世界流血戰爭之外，而希望始終袖手旁觀下去。為要認識這一點，只須舉個例子，想想挪威那些主張廢除武裝的人所提出的論據就夠了。他們說，『我們是個小國，我們的軍隊弱小，我們無法去反對強大的國家』（因此也就無力反對迫使我們去與某一強國集團結成帝國主義聯盟）…『我們想始終安居在自己的偏僻角落裏繼續進行偏僻的政策，要求廢除武裝，成立強迫的仲裁法庭，維持永久的中立』等等（大概是如比利時那樣『永久的』？）。

小國家想要始終站在戰爭旁邊的那種小氣願望，小資產階級妄想遠遠離開世界歷史上偉大搏戰，而利用自己所享有的相當壟斷地位來過着停滯不變的消極生活的心理，——這就是使廢除武裝的主張能在某些小國內受到相當歡迎和某些傳佈的客觀社會環境。當然，這種願望是反動的，並且完全是建築在幻想上的，因為帝國主義總是會把各小國捲進到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漩渦中去的。

試舉瑞士為例。它的帝國主義環境，客觀上預定有兩條工人運動路線：機會主義者力圖與資產階級聯合起來，把瑞士變成民主共

和的壟斷聯盟去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遊客手中取得利潤，以便儘量獲利地，儘量平安地利用這個『平安的』壟斷地位。

瑞士的真正社會民主黨人，力圖利用瑞士所有的相對自由和『國際』地位來幫助使歐洲各國工人黨中革命份子間的親密聯盟獲得勝利。幸而瑞士人所講的不是一種『自己獨有的』語言，而是三種世界語言，並且正是與瑞士為鄰的那些交戰國家中所講的語言。

如果瑞士黨內的兩萬個黨員每週能拿出兩個生丁，作為『戰時特別捐』，那我們每年就能得到二萬佛郎，——這個數目就能使我們不顧各國總參謀部底禁令，而印行三種語言的定期刊物，在各交戰國的工人和兵士中間傳播所有關於工人已開始表示憤激，他們在戰壕中實行聯歡，他們希望以革命方式運用武器去反對他們『本』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等等的真情實話。

凡此種種都不是什麼新奇的事情，而是各種優秀報紙，如哨兵，民權，伯恩哨兵所正在進行的，只是可惜還進行得不充分。只有用這樣的活動，才能使阿阿拉烏黨大會¹⁷⁶所通過的那個美妙決議成為比簡單一個美妙決議多一點的東西。

現在我們所注意的問題是：廢除武裝的要求是不是適合於瑞士社會民主黨人中間的革命方向呢？顯然是不適合的。因為在客觀上，『廢除武裝』這一要求乃是各個小國家底一個絕頂民族性的，專門民族性的綱領，而絕對不是國際革命社會民主派底一個國際性的綱領。

寫於一九一六年秋

一九一七年九月和十月用德文刊載於
青年國際雜誌，第九第十兩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
第六五至七六頁。

遠方來信¹⁷⁶

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底第一階段

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第一次革命已經爆發了。這第一次革命大概不會是最後的一次革命吧。

這第一次革命底第一階段，即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俄國革命底第一階段，根據瑞士這裏所有很簡略消息來說是已經結束了。這第一階段大概不會是我國革命最後的一個階段吧。

怎麼會發生了這樣一件『怪事』，即一個支持了數世紀並且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間三年偉大的全民範圍的階級搏戰中又不顧一切保持下來的專制制度，竟會在區區八天——在由米留可夫先生致俄國一切駐外使節的誇張電文中所指出的這樣一個期間——以內傾覆了呢？

怪事在自然界裏和歷史上是不會有的，但歷史上任何一次急劇的轉變，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內，總是顯示出極為豐富的內容，表現出極為出人意料特殊的鬥爭形式配合情形和鬥爭實力對比關係，以致在一班頭腦庸俗者看來有許多東西都彷彿是種怪事哩。

爲了使沙皇專制制度可能在幾天以內傾覆下去，曾經需要有許多帶全世界歷史重要性條件的配合。茲將其中幾個主要條件列舉如下。

若沒有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間三年偉大的階級搏戰和俄國無產階級非凡的革命努力，則第二次革命就不會實現得如此迅速，即這次革命底開始階段就不會在幾天以內完成。第一次（一九〇五年）革命深深地掘鬆了土壤，剷除了歷代的偏見，喚醒了數百萬工人和數千萬農民去參加政治生活和政治鬥爭，使俄國社會中一切階級（以及一切主要政黨）都彼此並向全世界表明了它們各自所具的真實本性，表明了它們各自所有利益、各自所具力量、各自所取行動方式、各自所持當前和將來目標間的真實相互關係。第一次革命以及爾後到來的反革命時期（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暴露了沙皇專制制度底全部實質，把它逼到了『盡頭』，揭穿了它的全部腐敗不堪和醜惡至極的內臟，揭破了由窮兇極惡拉斯普庭領頭的朝廷狗黨全部橫蠻無恥和荒淫無度的黑幕，揭破了羅曼諾夫家族這班惡徒殘殺全國各處猶太居民、工人和革命家的全部罪行，揭破了這班佔有千百萬俄畝土地的『首要』地主爲保全自己以及自己階級底『神聖所有權』而無惡不作和任意荼毒公民的全部罪狀。

若沒有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間的革命，若沒有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間的反革命，則俄羅斯民族和俄國境內其他民族中所有一切階級底『自決』，這些階級相互間以及它們對沙皇專制制度所持態度底決定，就不會像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革命八天內表現得這樣明確。這八天的革命——如果可以用譬喻來表示的話——好像是經過十來次主要次要預演後『表演』出來的『一齣戲』；各個『戲子』對於彼此的面貌，對於各人自己所扮的角色，自己所處的地位以及自己所處的境遇，都極爲熟悉，連一切政治傾向和行動手段上稍微有點意義的色彩，都是洞燭無遺的。

但如果說古契可夫輩和米留可夫輩這班老爺們及其跟班們所指斥爲『大叛亂』的一九〇五年第一次偉大革命，經過十二年就引起了一九一七年『燦爛的』『光榮的』革命，——它所以被古契可夫

輩和米留可夫輩稱呼爲『光榮的』革命，是因爲它（暫時）給予了他們政權，——那就必須知道當時還需要有一個偉大的，雄強的，萬能的『導演』，他一方面能大大加速全世界歷史進程，另一方面能產生出空前嚴重的全世界危機，即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國際的危機。除了異常加速全世界歷史進程以外，當時還需要有全世界歷史進程中發生的特別急劇的轉折，使得遍體血污的羅曼諾夫帝制車子碰到這樣一次轉折就一下子顛覆了下去。

這個萬能的『導演』，這個雄強的加速者，便是全世界的帝國主義的戰爭。

現在已經不能否認這次戰爭是全世界的戰爭了，因爲美國和中國今天已有一半捲入了這次戰爭，明天就會完全捲入這次戰爭的。

現在已經不能否認這次戰爭從雙方來說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了。只有資本家及其跟班社會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換言之——如果我們不是用一般批評性的定義而是用大家熟悉的俄國政治人名來表示——就是一方面只有古契可夫輩和李沃夫輩，米留可夫輩和盛加略夫輩，另一方面只有格沃茲結夫輩，波特列索夫輩，齊赫克爾輩，克倫斯基輩，齊赫芝輩等等，才能否認或抹煞這件事實。無論德國或英國資產階級方面進行這次戰爭的目的，都是爲了掠奪別的國家，爲了窒殺弱小的民族，爲了確立對於世界的財政統治，爲了分割和重分殖民地，爲了用愚弄和拆散各國工人的手段來挽救瀕於滅亡的資本主義制度。

帝國主義戰爭依其客觀的必然性不免要異常加速和空前加劇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免要轉變爲各敵對階級間的國內戰爭。

這一轉變過程已由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革命開始了，而這次革命底第一階段所告訴我們的第一件事實，就是當時共同對沙皇制度施行打擊的有兩種力量：一方面是俄國全部資產階級和地主連同他

們所有一切不自覺的跟班，加上他們所有一切自覺的領導者，即英法兩國的使節和資本家；另一方面是已開始在吸收農民和兵士代表參加的工人代表蘇維埃。

這三個政治陣營，這三個基本政治力量：（一）身為農奴主地主首腦，身為舊有官僚將軍首領的沙皇專制政府，（二）十月黨和立憲民主黨的俄國地主資產階級以及跟着他們跑的小資產階級（其主要代表人物為克倫斯基和齊赫芝），（三）在整個無產階級中間和全體貧苦民衆中間尋找同盟者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這三個基本政治力量甚至在『第一階段』八天以內就把自己的面貌十分明顯地暴露了出來，甚至在本信作者這樣一個離事變發生地點很遠，只好局限於外國報章所載簡略電訊消息的觀察者看來，也是一目瞭然了。

但在詳細說明這點以前，我應該回頭說到我這封信內論述頭等重大因素，即論述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那一部分。

戰爭已把各交戰國家，把各交戰資本家集團，把各國資本主義制度『主人』，把各國資本主義奴隸制度奴隸主彼此都用鐵鏈連結在一起了。一團血污——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歷史時期底社會政治生活情景。

在戰爭開始時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的社會主義者，如德國的達維德輩和謝德曼輩，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格沃茲結夫等等一班人，久已拚命叫罵過革命家底『幻想』，叫罵過什麼巴塞爾宣言底『幻想』，叫罵過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一舉底『夢想性』。他們百般頌揚過資本主義似乎表露出來的力量，堅實性和適應性，——正是他們這班人幫助過資本家實行在各國工人階級中間培養『適應性』和馴服性，實行愚弄和拆散各國工人階級。

但是『誰在最後笑，才算笑得妙』。資產階級沒能把戰爭所引起的革命危機長期推延下去。這一危機在所有各個國家都無可遏止

地增長起來，從那據一位不久前訪問過德國的考察家所說正遭遇着『組織得英明的飢荒』的德國起，直至也有飢荒逼來而組織得遠不及德國那樣『英明』的英法兩國止。

所以，在解體程度最爲厲害而無產階級最爲革命的（其所以最爲革命，並不是因爲它有什麼特別的品質，而是因爲它有『一九〇五年』底生動傳統）沙俄境內，革命的危機也就自然最先爆發出來了。這一危機是因俄國及其盟邦受到多次最嚴重失敗而加速到來的。這種失敗動搖了全部政治機構和全部舊制度，引起了全國所有各個階級對它的仇恨，激起了軍隊方面的憤怒，大批消滅了帶有頑固貴族性和特別是腐敗官吏性的舊有軍官，而代之以年輕的，新鮮的，多半是資產階級出身的，平民智識份子出身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軍官。那些乾脆服役於資產階級或簡直毫無氣節而大聲叫喊反對過『敗北主義』的份子，現在已是面臨着最落後最野蠻沙皇帝制底失敗與革命火燄底開始彼此有歷史聯系這一事實了。

但如果說戰爭開始時的失敗是起過加速爆發的消極因素作用，那末英法兩國財政資本，英法帝國主義勢力與俄國十月黨立憲民主黨資本勢力勾結，却就是直接經過組織反尼古拉、羅曼諾夫陰謀加速了這一危機的因素。

對於這一異常重要的事實，英法報章由於不言而喻的原因極力加以抹煞，而德國報章則幸災樂禍式地加以強調說明。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冷靜地正視現實，既不爲前一交戰帝國主義者集團中那些外交官和總長們底假仁假義官場外交謊語所惑，也不爲後一交戰帝國主義集團中那些在財政軍事方面與之競爭者底嘻笑暗示伎倆所迷。二三月革命底全部事變進程都很明顯地表明出，英法兩國使館帶着它們那些走狗和『門徑』早已就拚命設法阻止尼古拉二世（我們希望並要設法使他成爲末世）去與威廉第二『單獨』協商及單獨媾和，而此時他們便直接協同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協同一部

分將領以及軍隊中和特別是彼得堡防軍中一部分軍官組織了陰謀，以期撤換尼古拉、羅曼諾夫。

我們決不要自作幻想。我們決不要陷入某些人所犯的那種錯誤，他們現在猶如一部分動搖於格沃茲結夫、波特列索夫思想與國際主義思想間，動不動就墮入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立場的『組委份子』和『孟什維克』一樣，歌頌工人黨同立憲民主黨『妥協』，歌頌前者『贊助』後者等等。這些人們爲了辯護他們自己那套陳舊的背熟了的（全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學理，公然來抹煞英法帝國主義者勾同古契可夫輩和米留可夫輩一起舉行的陰謀，這一陰謀目的是要把『主要打手』尼古拉、羅曼諾夫撤銷而代之以較爲強硬的，新鮮的，較有能力的打手。

革命之所以能够勝利得如此迅速和這般——從表面上看來，驟

一流人專爲把一個君主換成另一個也是從羅曼諾夫皇室中抬出的君主所進行的鬥爭來援助過他們，那是既不會使他們感到歡喜，也不會使他們感到慌張的！

實際情形就是如此，並且也只是如此。一個不害怕真情，善於冷靜權衡革命中社會力量對比關係，善於在估計任何『局勢』時不祇顧及其今天現有特性，而且還顧及其更深邃底蘊，顧及俄國和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利益與資產階級利益間更深邃對比關係的政治家，就應當如此並且也只會如此觀察問題。

彼得城工人以及全俄各地工人英勇爲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爲爭取自由，爲使土地歸農，爲和平，爲反對帝國主義大屠殺而進行了鬥爭。英法帝國主義資本爲繼續並加緊這種大屠殺而製造了宮庭傾軋，同近衛軍官一起組織了陰謀，慫恿並鼓勵了古契可夫輩和米留可夫輩，暗中佈置了一個完全準備妥貼的新政府，這個政府在沙皇制度一受到無產階級鬥爭方面最初打擊時就奪得了政權。

這個新政府，——其中所有真正重要位置，緊要位置，決定性位置，即軍隊和官吏機關位置，都是由昨天還幫助過絞手斯托雷平的十月黨人與『和平復興黨人』佔據着，即由李沃夫和古契可夫佔據着，而米留可夫及其他立憲民主黨人坐在這個政府裏多半是爲了裝飾門面，爲了充當招牌，爲了發表甜蜜的教授式的演說，而『勞動派』克倫斯基在這個政府內不過是當一個專用空話欺騙工農的醜角，——這個新政府並不是偶然湊合起來的一羣人。

這乃是已經提升到執掌俄國政權地位的新階級，即資本主義地主和資產階級底一批代表人物，這個階級在經濟上早已統治着我國，並且它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時期，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反革命時期，最後——而且是用特別大的速度——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戰爭時期，已經在政治上非常迅速地組織了起來，一

手包辦着地方自治機關，國民教育機關，各種各樣的代表大會，杜馬，軍事工業委員會等等。這個新階級到一九一七年初已是『幾乎完全』在執掌政權，所以沙皇制度一經受到打擊就傾覆下去而讓位給資產階級了。帝國主義戰爭既使各種力量極度緊張起來，結果就使落後俄國底發展進程大大加速，使得我們『一下子』（其實不過是彷彿一下子）就趕上了意大利和英國，幾乎趕上了法國，獲得了所謂『聯合的』，『民族的』（即適應於進行帝國主義大屠殺和愚弄人民的）『代議制的』政府。

除這個政府而外，除這個從現今戰爭方面看來實際上不過是擁資億萬名叫『英法』的『洋行』僱用夥計的政府而外，同時還產生了一個主要的，非正式的，尙欠發展的，較為脆弱的工人政府，它代表着無產階級和城鄉全體貧苦民衆底利益。這就是彼得城工人代表蘇維埃，它正在努力聯繫着兵士和農民，同時也努力聯繫着農業工人，並且當然特別是和首先是努力聯繫着農業工人，比聯繫農民更要密切地聯繫着農業工人。

實際的政治形勢就是如此，我們首先就應該用儘量客觀明確的態度努力判明這一形勢，以求把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建立在它所應依據的唯一穩固的基礎上，即建立在事實基礎上。

沙皇專制制度被打破了，但它還沒有完全被打破。

想把帝國主義戰爭進行『到底』的十月黨立憲民主黨的政府，即資產階級的政府，其實是名叫『英法』的財政資本洋行中的一個夥計，它不得不答應給予人民一些自由和小惠，而這種自由和小惠充其量也是不致妨礙它保持其統治人民的權力和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可能性的。

工人代表蘇維埃這一工人組織，乃是工人政府底萌芽，它代表着全體貧苦民衆即十分之九居民底利益，它爭取着和平，麵包與自由。

這三種力量間的鬥爭決定了現有的形勢，即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的形勢。

第一第二兩種勢力間的矛盾是不深刻的，暫時的，單祇由一時特殊情況引起的，即由帝國主義戰爭中的事變急劇轉折情況引起的。整個新政府都是保皇黨人，因為克倫斯基口頭上所講的共和主義是簡直不莊重的，是為一個政治家所不容許的，客觀上是種政治手腕。新政府還沒有把沙皇專制制度完全打破，就已開始同羅曼諾夫地主皇朝實行勾結了。十月黨立憲民主黨的資產階級需要專制制度，作為領導官僚和軍隊的首腦來保護資本特權，反對勞動羣衆。

誰在那裏說什麼工人應該贊助新政府，以求反對沙皇制度反動勢力（而這樣說的顯然有波特列索夫輩，格沃茲結夫輩和齊赫克爾輩，以及——雖然口吻極為支吾——齊赫芝輩），那他就是叛變了工人，叛變了無產階級事業，叛賣了和平自由事業。因為其實正是這個新政府已經連手帶腳都受帝國主義資本束縛，受帝國主義的戰爭的掠奪的政策束縛，它已經開始實行同（並沒有詢問過人民！）皇朝勾結，已經在為恢復沙皇專制制度努力工作，已經在迎請新君候補人米海依爾、羅曼諾夫，已經在設法為他鞏固寶座，設法把合法的（依據舊法規維持的）帝制調換為拿破崙式的，全民公決式的（用偽造的人民投票辦法維持的）帝制。

為了真正進行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鬥爭，為了真正——不只是在口頭上，不是靠花言巧語的米留可夫和克倫斯基空口允諾——保證自由，決不是工人應該贊助新政府，而是這個政府應該『贊助』工人！因為唯一能保障確立自由而把沙皇制度破壞到底的條件，乃是實行武裝無產階級，鞏固、擴大和發揮工人代表蘇維埃底作用，意義和力量。

其餘一切都是空話和謊語，都是自由派和急進派陣營中的政客們自欺欺人之談，都是些騙人的把戲。

只要幫助工人武裝事業或至少是不妨礙這件事情，——則俄國境內的自由就會不可戰勝，專制制度就會無法恢復，共和制度就會有保證了。

不然，古契可夫輩和米留可夫輩就會恢復專制制度，就絲毫也不會，真是絲毫也不會實現他們所允諾的『自由』。一切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一切資產階級政客，都是用諾言『喂過』人民的，都是愚弄過工人的。

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因此工人應該贊助資產階級，——波特列索夫輩，格沃茲結夫輩，齊赫芝輩這樣說道，也如普列漢諾夫昨天這樣說過一樣。

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說道，——因此工人應該使民衆認清資產階級政客底騙局，教民衆不要相信空話，而祇是倚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組織，本身的團結，本身的武裝。

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的政府，即古契可夫輩和米留可夫輩的政府，縱然誠心願意這樣作（只有幼童才能妄想古契可夫和李沃夫有誠意），都是既不能給予人民和平，也不能給予人民麵包，也不能給予人民自由的。

這個政府不能給予人民和平，因為它是個主戰的政府，是個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是個從事掠奪的政府，是想掠奪阿爾明尼亞、加里細亞和土耳其，想奪取君士坦丁堡，想重新侵佔波蘭、庫爾蘭和立陶宛邊區等等的政府。這個政府連手帶腳都是受英法帝國主義資本束縛的。俄國資本乃是操縱數千萬萬盧布資本名叫『英法』的那個環球『洋行』底一個支行。

這個政府不能給予人民麵包，因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它至多也只能像德國那樣給予人民『組織得英明的飢荒』。可是人民決不願忍飢挨餓。人民會知道，並且大概很快就會知道麵包是有的

並且是可以取得的，不過只有採取不崇拜資本與地產神聖性的手段才可取得。

這個政府不能給予人民自由，因為它是地主資本家的政府，它畏懼人民並且已開始同羅曼諾夫皇朝實行勾結了。

關於我們最近對這個政府所應採取的行動上的策略任務問題，我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去講。那裏我們將指出現今這個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的局勢底特點究竟何在，將說明為什麼在這個局勢下的「當前」口號應該是：工人們，你們在反對沙皇制度的國內戰爭中已經表現了無產階級的，民衆的英勇精神底奇蹟，你們現在應當表現出無產階級和全民組織底奇蹟，以準備自己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勝利。

現在我們只限於分析革命現今階段上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力量對比關係，不過我們還應該提出一個問題：無產階級在現今這次革命中有怎樣的同盟者呢？

它有兩個同盟者：第一，俄國廣大的，數千百萬的，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半無產者的和一部分是小農的民衆。這些羣衆需要和平、麵包、自由與土地。這些羣衆必然會受着資產階級方面和特別是按其生活條件與之最爲接近的小資產階級方面的相當影響，會動搖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戰爭底殘酷教訓，這些將因古契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一班人愈堅決進行戰爭而愈見殘酷的教訓，必然會推動這些羣衆歸附無產階級，迫使他們跟着無產階級走。正是對於這些羣衆，我們現在應該首先並最努力利用新秩序下的相對自由以及工人代表蘇維埃來加以啓迪和組織。成立農民代表蘇維埃，成立農業工人代表蘇維埃，——這就是最重大任務之一。同時，我們努力的目標不僅是要農業工人成立自己獨立的蘇維埃，而且要窮困貧苦農民離開富裕農民單獨組織起來。關於現時所急需的這種組織底特殊任務和特殊形式問題，我們將在往下一封信內去說。

第二，俄國無產階級底同盟者是一切交戰國內以及所有一般國家內的無產階級。目前它大受戰爭壓制，而那些在歐洲也如普列漢諾夫、格沃茲結夫和波特列索夫在俄國一樣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的社會沙文主義者開口閉口都用它的名義來說話。可是無產階級脫離他們影響的過程已因帝國主義戰爭繼續下去而與月俱進，並且俄國革命又必然會大大加速這一過程。

無產階級既擁有這兩個同盟者，利用着現今過渡局勢底特點，就可能實行而且一定會實行起初爭得民主共和制度和農民對地主的完全勝利以代替古契可夫米留可夫的半專制制度，然後爭得唯一能給予備受戰爭苦痛的各族人民和平、麵包及自由的社會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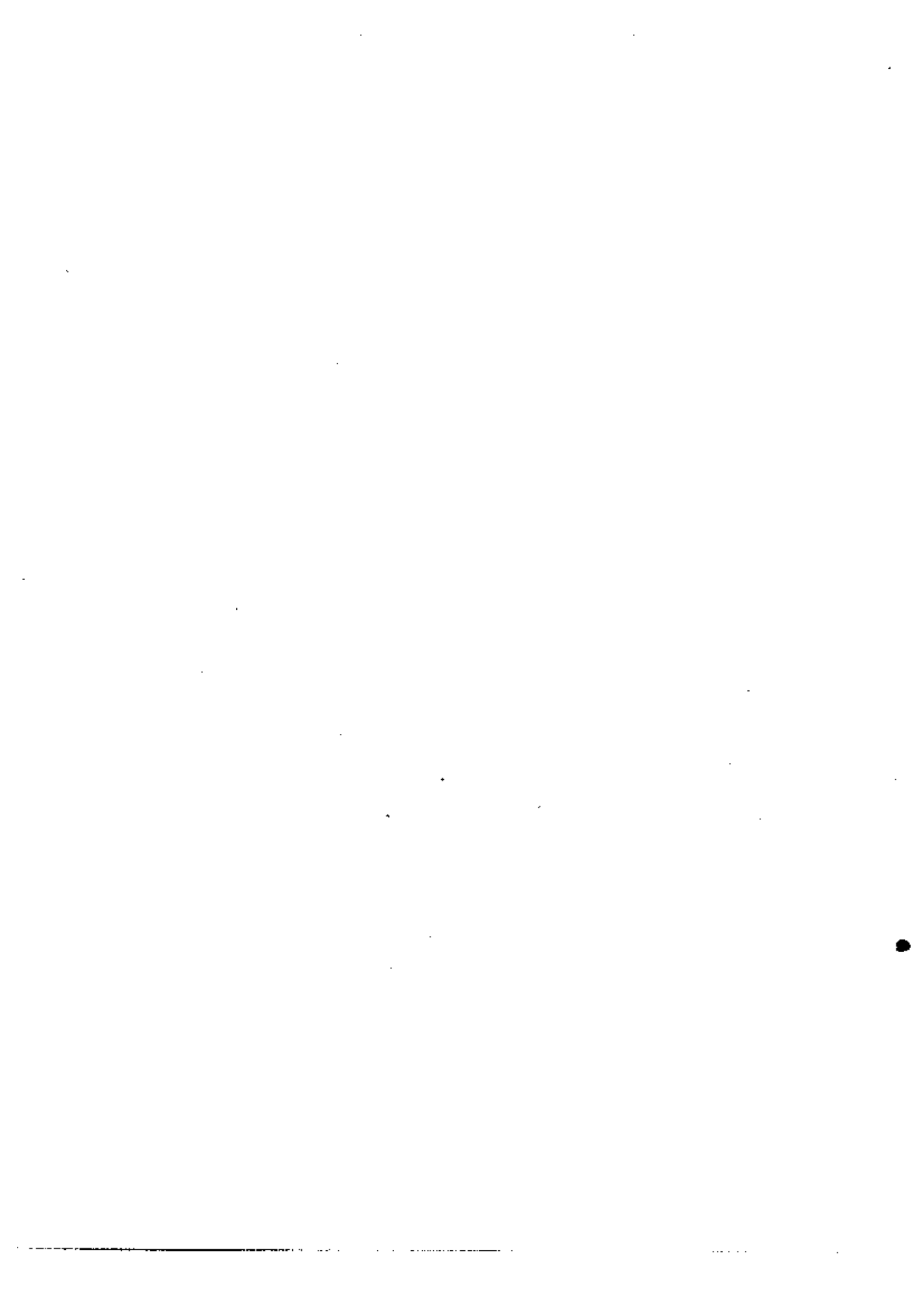
尼·列寧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至四日（舊曆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發表於真理報第十四期和第十五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二九一至三〇一頁。



簡 要 註 釋



¹ 第二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是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在莫斯科舉行。在代表大會專為追悼列寧舉行的首次會議席上，斯大林同志代表布爾什維克黨發表了確守遵行列寧遺訓的偉大誓言。在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因列寧逝世告勞動人類的宣言。同時代表大會又為表示紀念列寧通過如下的決議：刊印列寧全集，將彼得格拉城改名為列寧格拉城，規定每年追悼日，在莫斯科的紅場上建築列寧陵，在各盟員共和國首都以及在列寧格拉和塔什干城內建立列寧紀念像。代表大會討論了蘇維埃政府工作報告，蘇聯預算問題以及成立中央農業銀行問題。一月三十一日，代表大會批准了由斯大林領導擬定的最初一個蘇聯憲法（根本法）。代表大會選出了由聯盟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斯大林當選為聯盟蘇維埃委員。——（見正文第二五頁）。

² 德國危機是指德國一九二三年經濟和政治危機而言。當時在德國展開了廣大的革命運動，結果是在薩克森和圖林根兩州成立了工人政府，在漢堡發生了武裝起義。德國革命運動被鎮壓後，全歐各國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更加囂張，同時對蘇維埃共和國進行新干涉的危險也加強起來了。——（見正文第二八頁）。

³ 倫敦代表大會，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於一九〇七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倫敦舉行。——（見正文第三〇頁）。

⁴ 此地所謂三個黨，是指舊有德國社會民主黨分裂後組成的那三個黨而言，即：社會民主黨，獨立社會民主黨以及德國共產黨。——（見正文第三三頁）。

⁵ 所謂克倫斯基執政時的七月危機，是由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至五日彼得格拉事變引起的。這幾日內彼得格拉工人和兵士羣眾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自發舉行示威。雖然這次示威運動帶有和平性質，但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所領導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還是調用軍隊來對付了示威羣眾。臨時政府既將示威運動鎮壓下去，便實行來取締布爾什維克黨，當即封閉了布爾什維克中央機關刊物真理報，頒佈了逮捕列寧的通令，結果使他不得不轉入秘密狀態，逮捕了布爾什維克黨內許多著名活現家等等。可是，黨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終能在這種困難條件下準備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見正文第三三頁）。

⁶ 所謂布列斯特時期的危機是指與布列斯特和約相關連的嚴重局勢而言。這一掠奪性的和約是帝國主義德國及其盟邦奧匈帝國、土耳其、保加利亞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強迫當時尚未強固的年輕蘇維埃共和國簽訂的，因它是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簽訂，故稱布列斯特和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凱撒德國傾覆後，布列斯特和約就由蘇維埃政府宣告廢除了。——（見正文第三三頁）。

⁷ 布里根杜馬是沙皇政府預定在一九〇五年間召集的諮議性代表機關。關於成立諮議性國家杜馬法案和杜馬選舉條例，係由沙皇內務大臣布里根主持的委員會擬定，並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六日連同沙皇宣言一起頒佈。布爾什維克曾對布里根杜馬宣佈積極的抵制。「…布里根杜馬始終沒有召集成功。它還沒有召集的時候就被革命巨浪掃除了」（列寧語）。——（見正文第三五頁）。

⁸ 火星報是列寧在一九〇〇年末創辦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最初一個全俄機關報，在國外出版而秘密散佈於俄國各地。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間的列寧的火星報起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它準備了俄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創立。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即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閉會後不久，該報（從第五十二期起）就轉到孟什維克手裏去了。孟什維克的火星報被稱呼為新火星報，以別於舊的，即列寧的火星報。——（見正文第三七頁）。

⁹ 斯托雷平黨（或斯托雷平工黨），乃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反動勢力橫行時期，人們用以譏諷取消派孟什維克的一種稱呼，因為取消派孟什維克主張拋棄無產階級革命秘密黨，號召成立在斯托雷平制度（因內閣總理斯托雷平得名）範圍內活動的「公開」黨。——（見正文第四二頁）。

¹⁰ 斯達漢諾夫（一九〇五年生）係頓涅茨煤區礦工，發起了蘇聯工農業方面爭取高度勞動生產率的光輝燦爛的羣衆運動，因有斯達漢諾夫運動之稱。——（見正文第六〇頁）。

¹¹ 巴巴寧（一八九四年生）係北極考察家，曾領導『北極』流動冰站漂流數月之久（從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起，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止）。——（見正文第六〇頁）。

¹² 列寧不久後就寫了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其中給了波格丹諾夫等修正主義者及其哲學老師阿萬那留斯和馬赫一個殘滅性的批評。——（見正文第八二頁）。

¹³ 一八七一年春的巴黎事變是指一八七一年巴黎工人起義而言，這次起義結果是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政府」（馬克思語），即建立了巴黎公社。法國反動政府在普魯士佔領軍幫助下把巴黎公社淹入血海了。

一九〇五年冬的俄國事變是指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工人起義而言，這次起義是被沙皇政府殘酷鎮壓下去了。——（見正文第八四頁）。

¹⁴ 法國米勒蘭主義是個機會主義流派，得名於法國「社會主義者」米勒蘭，因為他於一八九九年間加入法國反動資產階級政府，幫助資產階級執行其政策。——（見正文第八五頁）。

¹⁵ 是指米海洛夫斯基所著在柔科夫斯基先生裁判下的馬克思一文而言，該文係於一八七七年十月在祖國紀事雜誌（參看註¹⁹）第十期上發表。——（見正文第九三頁）。

¹⁶ 引自馬克思所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序言。——（見正文第九七頁）。

¹⁷ «Contrat social»（社會契約）係盧梭基本著作之一（一七六二年出版），該書中心思想是認為任何社會制度都應該是人們彼此自由協約的結果。在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夜提出的這個「社會契約」論，雖然基本上是種唯心主義的理論，但在當時終究起過革命的作用。這個理論是表示要求實現資產階級性的平等，號召消滅封建等級特權制度而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制度。——（見正文第九七頁）。

¹⁸ 卡列夫（一八五〇——一九三一）係俄國唯心主義派的史學家，編著有歷史哲學多卷，進行過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激烈鬥爭。——（見正文第一〇一頁）。

¹⁹ 物種變化論是達爾文關於動植物形態可變性的學說。——（見正文第一〇三頁）。

²⁰ 這是指馬克思致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一封信而言，這封信是一八七七年末馬克思讀到米海洛夫斯基所著在柔科夫斯基先生裁判下的馬克思一文後寫的。——（見正文第一〇三頁）。

²¹ 此地提到的著作係指德國思想體系而言。這部著作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間寫成，其原稿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檔庫中擱置了數十年之久，直到一九三二年間才由蘇聯馬恩列學院用德文刊行於世。——（見正文第一〇四頁）。

²² 摩爾根所著一書是指古代社會（Lewis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一書而言。——（見正文第一〇五頁）。

²³ 食邑制度係俄國十五世紀中葉確立的一種特殊的封建土地佔有制度。食邑算是封建君主所有產，起初是由封建君主暫時賜給担任軍事或朝廷職務的貴族們的一種有條件的地產。——（見正文第一一〇頁）。

²⁴ 布勒寧是反動派新時代報方面的撰稿人，會對社會思想界中一切進步份子橫施誹謗。列寧把這個名字用作普通名詞來形容卑鄙齷齪的論戰手段。——（見正文第一一三頁）。

²⁵ 引自俄國有名寓言作家克爾洛夫所寫的寓言巨象與哈巴狗。——（見正文第一一六頁）。

²⁶ 瓦龍維夫（一八四七——一九一八）係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自由主義民粹派思想家之一。——（見正文第一一六頁）。

²⁷ 引自恩格斯所著反杜林一書。有中譯本。——（見正文第一二八頁）。

²⁸ 引自同書。——（見正文第一三〇頁）。

²⁹ 祖國紀事是從一八一八年開始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種社會文藝雜誌，周圍圍繞有許多著名的革命民主派智識份子，一八八四年間被沙皇政府封禁。——（見正文第一三一頁）。

³⁰ 局外人是米海洛夫斯基所用的假名。——（見正文第一三一頁）。

³¹ 此地提到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上所規定的如下一段原理：

『共產黨人底理論原理絲毫也不是以某個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發現出來的思想或原則為根據。它們不過是現時進行着的階級鬥爭真實關係底概括表現，現時在我們眼前發生着的歷史運動底表現』（參看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第五二至五三頁）。——（見正文第一三四頁）。

³² 所謂改良以後的歷史，是指俄國一八六一年間實行了廢除農奴制的『農村改良』，接著又施行了行政司法等方面種種改良辦法以後的時期而言。——（見正文第一四七頁）。

³³ 這是指『勞動解放』社而言。該社係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於一八八三年由普列漢諾夫在瑞士創立；該社在俄國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方面進行過巨大的工作。——（見正文第一五〇頁）。

³⁵ 民意主義是以『民意』黨得名。『民意』黨是個秘密革命團體，於一八七九年間在民粹派團體『土地與自由』黨分裂後成立。『民意』黨把反對專制制度個別代表人物的個人恐怖手段當作主要鬥爭手段。白亞歷山大第一於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公曆十三日）被民意黨人刺死後不久，『民意』黨便被沙皇政府粉碎了。自此以後，大多數民粹份子放棄了反沙皇制度的革命鬥爭，實行鼓吹同沙皇專制政府調和妥協的思想。當時這班民粹派後裔，即十九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間的自由主義民粹派，已成為代表富農利益的份子了。——（見正文第一五四頁）。

³⁶ 『民權』黨是個秘密的民主主義智識份子組織，於一八九三年間由先前民意黨人參加成立；一八九四年春被沙皇政府粉碎。這個團體發表了兩個綱領文件：『迫切問題和宣言』。後來大多數民權黨人加入了社會革命黨。——（見正文第一五七頁）。

³⁷ 『民意社』是於一八九一年成立，一八九六年解散。這個團體在當時國內工人運動增長的影響下，漸漸離開民意主義思想，轉向到馬克思主義方面。後來該社中有個別份子已成為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積極活動家。——（見正文第一五七頁）。

³⁸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即『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是於一八九四年由『勞動解放』社發起在日內瓦成立。起初『勞動解放』社領導過該會活動，校閱過該會出版物。後來『聯合會』由機會主義份子（所謂『少年派』，即『經濟主義者』）佔得了優勢。『勞動解放』社最後和『聯合會』決裂並退出其組織一舉，是於一九〇〇年四月在該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實現，當時『勞動解放』社及其同道者退出代表大會而成立了命名為『社會民主黨人』的獨立組織。——（見正文第一五七頁）。

³⁹ 『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是於一八九五年秋由列寧創立，其中統一了彼得堡所有一切馬克思主義工人小組。主持『鬥爭協會』的是列寧所領導的中央組。列寧的『鬥爭協會』領導了革命工人運動，它把工人擁護本身經濟要求的鬥爭與反對沙皇制度的政治鬥爭互相連結起來。『鬥爭協會』在俄國最初第一次開始實現了社會主義與工人階級運動互相結合的原則，開始實現了由在很小一部分先進工人中間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進到在工人階級廣大羣衆中間從事政治鼓動的轉變。『鬥爭協會』出版過許多傳單和專供工人閱讀的小冊子，領導過罷工運動。『鬥爭協會』把自己的影響推廣到了彼得堡範圍以外。『由於彼得堡『鬥爭協會』給了一個強有力的推動，俄國其他各個城市與區域中的工人小組也相繼統一成為這樣的協會了』（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九四八年中文版，第三一頁）。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深夜，『鬥爭協會』以列寧為首的領導核心被捕。列寧坐在監獄時也沒有中

止過革命鬥爭。他常提出意見和指示來幫助「鬥爭協會」，常把自己所寫的傳單和小冊子稿子寄到獄外去發表。同時列寧又在監獄裏擬定了黨綱草案。

「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底意義，正如列寧所說那樣，就在於它是倚靠着工人運動的革命政黨底最初嚴重萌芽」（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九四八年中文版，第三二頁）。——（見正文第一五七頁）。

³⁹ 關於「勞動解放」社，請參看註³⁸。——（見正文第一六六頁）。

⁴⁰ 布朗基主義就是法國革命家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八一）底學說。馬恩列斯一方面認定布朗基是個卓越的革命家和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批評了他那種宗派主義的觀點和密謀主義的活動方法。列寧說過「布朗基主義乃是否認階級鬥爭的理論，布朗基主義期望人類不會是經過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而會是經過智識份子區區少數底陰謀行動免除僱傭奴隸制度」。——（見正文第一六八頁）。

⁴¹ 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頒佈的法律，將各工廠企業和鐵路修理廠工人每日工作時間規定為十一小時半。在此法律未頒佈以前，俄國工人每日工作時間毫無限制，常達十四至十五小時之久。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的法律，是沙皇政府在列寧「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領導的工人運動逼迫下頒佈的。——（見正文第一六九頁）。

⁴² 工人事業雜誌係「經濟派」底機關刊物，由「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在日內瓦出版，一八九九年四月創刊，一九〇二年二月停版。——（見正文第一七七頁）。

⁴³ 工人報係基也輔社會民主黨人底報紙，從一八九七年開始出版，後來由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八九八年）宣佈為黨底中央機關報。總共只出版過兩期。——（見正文第一七八頁）。

⁴⁴ 拉薩爾派和愛森拿赫派係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初德國工人運動中的兩個政黨。拉薩爾派，即拉薩爾思想底擁護者和信徒，以一八六三年由拉薩爾創立的「德意志全國工會」為骨幹。拉薩爾派認為可能藉助於由資本主義政府支持的工人協會用和平手段把資本主義改造為社會主義，主張用爭取普選權的鬥爭與國會內部的和平活動來代替工人階級底革命鬥爭。馬克思很激烈地批評過拉薩爾派，並指出「他們妨碍過無產階級組織事業多年，結果是乾乾脆脆地變成了警察手中的工具」。

愛森拿赫派，即馬克思主義底擁護者，處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思想影響下。愛森拿赫派由威廉·李卜克內西和伯伯爾兩人領導在一八六九年愛森拿赫代表大會上創立了德國社會民主黨。

這兩個政黨彼此進行過激烈的鬥爭。後來由於工人運動高漲和政府壓迫加緊的影響，兩黨乃於一八七五年間在哥達代表大會上合併為一個德國社會主義工黨，而拉薩爾派便是這個黨裏的機會主義翼。——（見正文第一八〇頁）。

⁴⁶ 黑德派和可能派係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兩個派別，於一八八二年間在法國工人黨分裂後產生。

黑德派，即擁護黑德主張者，係法國工人黨中的左派，即馬克思主義派，堅持着獨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政策，於一九〇一年間組成爲法國社會黨。

可能派是個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別，引誘無產階級離開革命鬥爭手段，主張使工人階級底活動局限於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辦到的範圍內。一九〇二年間，可能派同其他的改良主義集團組成爲法蘭西社會黨。

一九〇五年間，法國社會黨和法蘭西社會黨合併爲一個政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間帝國主義大戰時期，黑德和法國社會黨全部領導機關一起轉到社會沙文主義立場上去了。——（見正文第一八〇頁）。

⁴⁷ 費邊派係英國『費邊社』社員。『費邊社』是個機會主義改良團體，於一八八四年由英國一部分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所建立。『費邊社』這個名稱係導源於古代羅馬統帥費邊（「緩進家」）底名字，因費邊素以緩進待機，迴避決戰聞名。費邊派誘導無產階級離開階級鬥爭，宣傳用實行細小改良辦法由資本主義制度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見正文第一八〇頁）。

⁴⁸ 俄國的批評派是指司徒盧威，布爾加科夫而言，他們曾在合法刊物上著文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見正文第一八〇頁）。

⁴⁹ 曙光雜誌係馬克思主義科學政治刊物，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間由火星報編輯部負責在斯多德牙爾城出版，總共只出版過四期。——（見正文第一八四頁）。

⁵⁰ 『無名派』是以無名雜誌得名。這個雜誌是於一九〇六年在彼得堡出版，其組織者和參加人爲普羅科波維奇，枯斯科娃，波古察爾斯基及其他等人。『無名派』公開自認爲修正主義者，擁護孟什維克和自由派，反對無產階級獨立政策。列寧稱『無名派』爲孟什維克式的立憲民主黨人或立憲民主黨人式的孟什維克。——（見正文第一八四頁）。

⁵¹ 依洛瓦斯基是個史學家；編過許多正式頒佈的歷史教科書。他這種教科書在革命前俄國各中小學校裏流行很廣，其中把歷史主要歸結爲帝王將相底活動，把歷史過程歸因於種種次要和偶然性的情況。——（見正文第一八五頁）。

⁵¹ 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令是於一八七八年在德國頒佈施行。依此法令規定，所有一切社會民主黨組織，工人羣衆團體及工人刊物概被封禁，社會主義出版物概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受高壓。一八九〇年間，這個法令在工人羣衆運動逼迫下宣告廢除。——（見正文第一八五頁）。

⁵² 諾茲德列夫是戈果里長篇小說死人口中所描繪的一種地主形象，以喜愛爭吵搗騙爲特色。戈果里稱諾茲德列夫爲『歷史』人物，因爲他每到一處，都要鬧出醜態『歷史』和亂子來。——（見正文第一八六頁）。

⁵³ 此地所謂『陳腐的社會政治世界觀』是指民粹主義思想而言。——（見正文第一八八頁）。

⁵⁴ 『趾高氣揚的作家』一語係高爾基一篇早年著作底標題。——（見正文第一八九頁）。

⁵⁵ 列寧所寫的這篇反對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論文曾刊載在俄國經濟發展狀況資料文集上發表。這個集子是於一八九五年間出版，剛印好時就被沙皇政府書報檢查機關焚燬了。列寧所著的這篇論文標題爲『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所著一書中受到的批評（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作品中的反映）』。——（見正文第一八九頁）。

⁵⁶ 祖巴托夫係當時莫斯科暗探局局長，是所謂警察社會主義底授意人。祖巴托夫創立過受憲容監管的僞工人組織，其目的是要誘導工人離開革命運動。——（見正文第一九〇頁）。

⁵⁷ 此地所謂新了綑領係指當時一部分『經濟主義者』（普羅科坡維奇，枯斯科娃等人，他們後來已成爲立憲民主黨人）所發表的宣言（«Credo»）而言。列寧經過他姐姐葉里扎洛娃接到«Credo»後，就寫了一個激烈的揭露性的抗議書，即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抗議書。

這個抗議書曾由列寧提交由他在米努新斯克州葉爾瑪卡村召集的十七個馬克思主義者政治犯會議上討論，並由這次會議一致通過。當時被流放於土魯汗斯克和奧爾洛夫（維亞得卡省）一帶的政治犯也會對這個抗議書表示附議。

列寧曾把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抗議書寄交國外『勞動解放』社。一九〇〇年初，普列漢諾夫把這個抗議書編在供工人事業雜誌編輯部參考的«Vademecum»（意即了指南書）文集上翻印出來。——（見正文第一九一頁）。

⁵⁸ 『供工人事業雜誌編輯部參考的《Vademecum》』乃是揭露『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及其機關刊物工人事業雜誌編輯部機會主義觀點的文件彙集，前面載有普列漢諾夫寫的一篇序言。這個文集是由普列漢諾夫負責編印，並於一九〇〇年間由『勞動解放』社在日內瓦出版。——（見正文第一九二頁）。

⁵⁹ 標題為《Profession de foi》（『信條錄』）的文件是敘述基也輔委員會機會主義觀點的傳單，於一八九九年未編印。——（見正文第一九二頁）。

⁶⁰ 俄國舊事雜誌是一種歷史月刊，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八年間在彼得堡出版。——（見正文第二〇三頁）。

⁶¹ 聖彼得堡工人小刊是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於一八九七年間出版的秘密報紙。總共只出版過兩期。——（見正文第二〇三頁）。

⁶² 列寧所提到的『非正式會議』是於一八九七年二月十四至十七日（公曆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一日）在彼得堡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一方面有列寧，瓦涅夫，克里尚普夫斯基及其他參加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的『老頭子』（他們被遺發到西伯利亞流放所去以前，曾被釋放出獄三天），另一方面有『少年派』（他們是在列寧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間被捕後領導『鬥爭協會』的）。——（見正文第二〇五頁）。

⁶³ 沙俄憲兵穿的是青色制服，因有是稱。——（見正文第二〇六頁）。

⁶⁴ 這是指『經濟主義者』而言。——（見正文第二〇七頁）。

⁶⁵ 叔爾茨、德里奇係德國經濟學家，小資產階級思想家，企圖誘惑工人離開革命反資本主義制度鬥爭而主張建立合作社和儲金會，說這種團體能在資本主義範圍內改善無產階級底生活，能使小生產手工業者免除破產。——（見正文第二一一頁）。

⁶⁶ 基爾什、董克爾工會是由德國自由派資產者基爾什和董克爾兩人在一八六八年創立，他們鼓吹『階級利益協和論』，誘惑工人離開革命反資產階級鬥爭，把職工運動底任務局限在儲金互助會和文化教育團體範圍內。——（見正文第二一二頁）。

⁶⁷ 這是指『工人階級自力解放社』而言，該社是個人數很少和影響很小的經濟派組織，於一八九八年末在彼得堡成立。——（見正文第二一四頁）。

⁶⁸ 別爾托夫是普列漢諾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所用的假名。——（見正文第二二〇頁）。

⁶⁹ 拿爾茨斯·杜波立洛夫（直譯是『矜矜自詡的蠢豬』），是馬爾托夫在他的一篇諷刺詩上所用的戲謔的筆名，這篇諷刺詩標題為現代俄國社會黨人讚，於一九〇一年四月在曙光雜誌第一期上發表，意在譏笑經濟主義者遷就自發運動。——（見正文第二二一頁）。

⁷⁰ 這是指『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而言（參看註³⁷）。——（見正文第二二七頁）。

⁷¹ 地政官係當時俄國鄉村中的政府代表，是指定本地貴族地主份子充任，兼資宰制農民的行政權和司法權。地政官一職是從一八八九年開始設置，一直存在到俄國帝制傾覆時止。——（見正文第二二七頁）。

⁷² 這是指維伯夫婦所著“Industrial Democracy”一書而言，該書曾由列寧譯成俄文。——（見正文第二三〇頁）。

⁷³ 這是指『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代表大會而言。——（見正文第二四九頁）。

⁷⁴ 地方自治局是革命前俄國境內地方自治機關，掌管有關鄉村居民的純粹地方性事宜（修築道路，設立醫院及學校等等）。在地方自治局中起重大作用的是自由派的地主。——（見正文第二五一頁）。

⁷⁵ 所謂『農民解放』是指俄國一八六一年廢除農奴制度而言。——（見正文第二五九頁）。

⁷⁶ 布連坦諾是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擁護所謂『國家社會主義』，說用實行政良辦法和調解勞資利益的手段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實現社會平等。布連坦諾及其信徒假冒馬克思主義詞句，企圖使工人運動服從於資產階級底利益。——（見正文第二六一頁）。

⁷⁷ 阿仿拿西·依凡諾維奇和普立海里亞·依凡諾福娜，乃是戈果里在其中篇小說舊式地主裏所描繪的外省宗法式小地主形象。——（見正文第二七七頁）。

⁷⁸ 這裏列寧指的是他於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五年間在彼得堡進行革命工作的情形。——（見正文第二八七頁）。

⁷⁹ 土地自由黨人（或民粹派）是一八七六年成立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土地與自由」黨黨員。他們持有一種錯誤觀點，即以爲俄國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農民，以爲經過農民村社可能達到社會主義，以爲單靠農民「騷動」就可能推翻沙皇地主政權。他們爲了發動農民反對沙皇政府，便跑到農村中去，即所謂「到民間去」（由此就有「民粹派」之稱）宣傳自己的主張。可是農民並不瞭解民粹派底宣傳，並沒有跟着他們走，於是他們便決定不要人民參加，專靠自己的力量，用暗殺沙皇政府個別代表人物的手段去繼續其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後來，「土地與自由」黨內兩派發生鬥爭，其中一派主張採取新的鬥爭手段，另一派則拘守着舊有民粹主義策略，結果是該黨於一八七九年間分裂成爲兩部分：「民意」黨（參看註⁸⁰）和「土地平分」社。——（見正文第二九四頁）。

⁸⁰ 這個註解是列寧專爲保守祕密加進去的。其實，這裏列舉的事實正是按其實際發生的次序排列的。——（見正文第三一四頁）。

⁸¹ 「同盟」係指「旅外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同盟」而言。這個團體是於一九〇一年十月間由列寧發起建立，其中所包括的是擁護火星報的人（參看註⁸）。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舉行後，「同盟」已變成孟什維克底堡壘了。——（見正文第三一五頁）。

⁸² 「統一代表大會」是於一九〇一年十月在蘇黎支舉行，派代表參加這次大會的都是些旅外社會民主黨人團體（「旅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崩得旅外委員會」，「社會民主黨人」社，「火星與曙光」社，「鬥爭」社），結果是「火星份子」和機會主義者彼此完全決裂了。——（見正文第三二七頁）。

⁸³ 一九〇二年代表會議是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在別洛斯托克城舉行，派代表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各地方委員會。「經濟主義者」和崩得份子曾打算把這次會議宣佈爲一次黨代表大會。由列寧起草而由「火星」社代表在這次會議上申叙的報告中證明出，這次會議沒有充分準備，缺乏代表大會所應有的權力。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負責召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組織委員會，其中大多數委員很快就被捕了。同年十一月間，在普斯可夫會議上重新成立了一個負責召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組織委員會。——（見正文第三五一頁）。

⁸⁴ 這是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土地問題綱領上要求把割地歸還農民而言。所謂「割地」就是地主在一八六一—年農村賦稅實行時期從農民方面奪去的那些土地。——（見正文第三七六頁）。

⁸⁵ 這裏指的是一九〇二年間在俄國許多省份（披爾塔瓦省，哈爾科夫省，沃龍涅什省等等）爆發的農民起義，當時發生過搗毀地主莊園的情事。——（見正文第三七七頁）。

⁸⁶ 關於「割地」一語，請參看註⁸⁴。——（見正文第三七八頁）。

⁸⁷ 土地平分是沙俄農民中間普遍流行口號之一，反映着農民要求普遍平分土地的願望。——（見正文第三七九頁）。

⁸⁸ 馬尼洛夫精神因戈果里所著長篇小說死人口中一個典型地主馬尼洛夫得名，以一味癡心妄想為特色。——（見正文第四〇二頁）。

⁸⁹ 出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有十六個屬於「火星」組織的份子，其中九個是以列寧為首的多數派份子，七個是以馬爾托夫為首的少數派份子。——（見正文第四二〇頁）。

⁹⁰ 所謂阿拉克切也夫精神，是指警察專橫主義而言。阿拉克切也夫是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沙俄反動顯宦，對帕維爾第一和亞歷山大第一時代內政外交起過支配作用。他是俄國史上整個警察暴政和武人專橫時代的主要代表人物。——（見正文第四三四頁）。

⁹¹ 「解放」社是以出版解放雜誌得名，該雜誌是自由保皇主義資產階級所刊印的半月刊，於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五年間在國外出版，由司徒盧威主編。「解放派」後來成了俄國主要資產階級政黨即立憲民主黨底骨幹。——（見正文第四七二頁）。

⁹² 這裏列寧是指着經濟主義者阿期莫夫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而言。阿期莫夫在駁斥火星組織所提出的黨綱時利用的一個主要論據，就是認為「無產階級」一語在這個黨綱條文中不是當作主詞而是當作「黨」字底附加語使用。——（見正文第四七六頁）。

⁹³ 沃龍涅什委員會和彼得堡「工人」團體是經濟主義者所把持的組織，對列寧的火星報及其所規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原理持敵視立場。——（見正文第四八七頁）。

⁹⁴ 當時這兩個地方（大概是 Cluse 村和 Carouge 村）住有多數派份子和少數派份子。——（見正文第五一二頁）。

⁹⁵ 薩巴克維奇是戈果里長篇小說死人口中所描繪的一種地主形象。——（見正文第五一三頁）。

⁹⁶ 當時正是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間日俄戰爭進行的時候。——（見正文第五一五頁）。

⁹⁷ 所謂日內瓦十一月間的天氣，是指普列漢諾夫底『天氣』有所變更而言，因為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間，居然把原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三年七月至八月間舉行）多數否決的三個舊編委委員補選到火星報（在日內瓦出版）編委中去。——（見正文第五一六頁）。

⁹⁸ 巴在洛夫是屠格涅夫所著長篇小說父與子中的主要人物。——（見正文第五一六頁）。

⁹⁹ 革命俄羅斯係社會革命黨底報紙，於一九〇〇年末至一九〇五年間刊行。從一九〇二年一月起成爲社會革命黨底中央機關報，——（見正文第五一七頁）。

¹⁰⁰ 阿期莫夫派是以阿期莫夫（一八七五——一九二一）得名。阿期莫夫是經濟主義者底首領之一。——（見正文第五七一頁）。

¹⁰¹ 新火星派，即孟什維克派，導源於新火星報一語（參看註⁸）。——（見正文第五七一頁）。

¹⁰² 關於布里根委員會一語，請參看註⁷。——（見正文第五七三頁）。

¹⁰³ 係指一九〇五年彼得堡一月九日事件而言。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那天，彼得堡工人羣衆携同妻室兒女前往冬宮，預備向沙皇呈遞訴述本身疾苦的請願書。這次和平示威竟遭到沙皇軍隊殘酷槍擊。一月九日事件乃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底開端。——（見正文第五八二頁）。

¹⁰⁴ 這裏列寧指的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年俄國地方自治派自由派運動首領之一施坡夫所提出的『憲制』綱領，其內容是主張保全沙皇專制制度，只是要用由『沙皇恩賜的憲法』把它稍微限制一下。——（見正文第五八七頁）。

¹⁰⁵ 『囊中人』是柴霍夫所著同名短篇小說中的主人公，以坐井觀天，固步自封，冥頑執拗不顧現實爲特色。——（見正文第六〇〇頁）。

¹⁰⁶ 這裏列寧所指的是如下一段軼事：一九〇五年六月，地方自治局紳董代表團晉謁沙皇尼古拉第二，正待沙皇出來接見時，忽發現自由派份子彼特龍克維奇沒帶白手套，於是當場就有一位身任禁衛上校的巴什布祖克（意即『暴吏』）把自己帶的白手套脫了下來，順手交給彼特龍克維奇帶上了。——（見正文第六〇六頁）。

¹⁰⁷ 前進派，代表大會派或無產者派，乃是布爾什維克底種種稱呼：按他們所出版的前進報來說稱呼爲前進派，按他們所召集的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來說稱呼爲代表大會派，按他們自一九〇五年五月起根據第三次黨代表大會決議出版的無產者報來說稱呼爲無產者派。——（見正文第六〇六頁）。

¹⁰⁸ 關於『伯恩施坦主義的 Credo』一語，請參看註⁵⁹。——（見正文第六四〇頁）。

¹⁰⁹ 所謂拿破崙式的全民投票，是指法皇拿破崙第一（一八〇四——一八一四）和拿破崙第三（一八五二——一八七〇）所採用過的辦法而言。他們採用這種辦法的目的，是想使一般人覺得彷彿民衆贊助他們的政策。——（見正文第六五二頁）。

¹¹⁰ 這是指俄皇尼古拉第二而言。——（見正文第六六八頁）。

¹¹¹ 『共產主義者同盟』是最初一個革命無產階級國際組織，於一八四七年夏在倫敦召集的革命無產階級團體代表大會上成立。『共產主義者同盟』底組織者和領導人爲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受這個組織委託起草了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者同盟』存在到一八五二年止，其中重要人物後來在第一國際中起過領導作用。——（見正文第六七八頁）。

¹¹² 赫列斯塔科夫原是戈果里所著滑稽劇本巡按使（或譯欽差大臣）中的主人公，以拚命吹牛撒謊爲特色。——（見正文第六八〇頁）。

¹¹³ 所謂冬季僱傭，乃是俄國地主富農乘冬天農民急需錢用時按重利盤剝條件（用工役抵債）僱傭農民作工的一種辦法。——（見正文第六八五頁）。

¹¹⁴ 『亞克瓦留姆』是莫斯科城內一座夏季戲園，一九〇五年革命羣衆大會常在此地舉行。——（見正文第六九二頁）。

¹¹⁵ 杜巴索夫係當時莫斯科總督，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武裝起義就是他所鎮壓下去的。——（見正文第六九二頁）。

¹¹⁶ 馬拉哈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起義時期任莫斯科軍區副司令。——（見正文第六九四頁）。

¹¹⁷ 這是指一九〇五年十二月間在拉脫維亞發生的事變而言，當時拉脫維亞許多城市如土庫姆，塔爾遜，盧因，腓特烈施塔得等皆為起義工人、雇農及農民羣衆武裝隊伍所佔據，並且這裏開始了反對沙皇軍隊的游擊戰爭。一九〇六年一月，拉脫維亞各處起義均被沙皇政府鎮壓下去。——（見正文第六九六頁）。

¹¹⁸ 這是指一九〇六年七月間在這兩個地方發生的起義而言。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七日，斯維亞波爾格要塞軍隊中間爆發起義，當時起義羣衆幾乎把該要塞全部佔領起來，但到七月二十日就因受波羅的海艦隊重壓被迫繳械。同時由於斯維亞波爾格起義的影響，七月十九日夜間在喀琅施塔得要塞上也爆發水兵起義，但這次起義也是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了。——（見正文第六九七頁）。

¹¹⁹ 維特杜馬，即第一屆國家杜馬，係於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按內閣總理維特所擬條例召集，一九〇六年七月八日由沙皇政府實行驅散。——（見正文第六九八頁）。

¹²⁰ 這裏指的是一九〇六年春沙皇政府取得的二十萬萬國際借款，其中大部分都是從法國方面借來的。——（見正文第六九九頁）。

¹²¹ 首都郵訊是立憲民主黨左派出版的日報，於一九〇六年十月至一九〇八年二月間在彼得堡刊印。——（見正文第七一九頁）。

¹²² 路標派是以路標集得名。路標集係於一九〇九年間由一批著名立憲民主黨作家出版。在論俄國智識份子的文章中，『路標派』企圖詆譭俄國人民中包括拜林斯基和契爾內舍夫斯基在內的優秀人物底革命民主傳統，同時『路標派』還極力糟蹋一九〇五年革命運動，而感謝沙皇政府『用刺刀和牢獄』替資產階級攔開了『人民底橫暴』。路標集號召智識份子去爲專制制度服務。列寧曾把哲學和政論方面的『路標』綱領比作黑幫派莫斯科新聞報底綱領，把路標集稱呼爲『自由主義叛賣思想大全』。——（見正文第七二三頁）。

¹²³ 『野牛』乃是當時政治刊物用以諷刺貴族地主反動派極右份子的一種雅號。——（見正文第七二三頁）。

¹²⁴ 這是指傾心於馬赫主義（或稱經驗批判主義）而言。馬赫主義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產生於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其創始人爲奧國物理學家兼哲學家馬赫和德國哲學家阿萬那留斯。——（見正文第七二四頁）。

¹²⁵ 『召回主義』是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失敗後反動時期在布爾什維克隊伍中間產生的機會主義派別。他們要求召回社會民主黨參加國家杜馬的代表，反對黨在職工會及其他工人合法組織中進行工作。——（見正文第七二四頁）。

¹²⁶ 普列漢是沙俄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四年間的內務大臣和憲兵總監，進行了反對革命運動的殘酷鬥爭。——（見正文第七二七頁）。

¹²⁷ 『和平復興』黨是大工商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政黨，一九〇六年成立。列寧稱『和平復興』黨為『和平掠奪』黨。——（見正文第七二九頁）。

¹²⁸ 『擁護皇上的反對派』一語是立憲民主黨首領米留可夫說出的。米留可夫於一九〇九年在倫敦市長歐宴會席上發言時說：『當俄國還有監督預算案的立法院存在時，俄國的反對派始終是擁護皇上的反對派，不是反對皇上的反對派』。——（見正文第七三〇頁）。

¹²⁹ 這個決議是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普拉加）代表會議（一九一二年間召集）通過，此次代表會議把孟什維克從黨內驅逐出去，因而也就正式確立了布爾什維克黨獨立存在的地位。——（見正文第七三五頁）。

¹³⁰ 護黨的孟什維克或孟什維克護黨派，是當時由普列漢諾夫領導的一部分孟什維克，他們基本上仍舊站在孟什維主義立場上，但他們在關於保全和鞏固秘密無產階級黨的問題方面表示贊助布爾什維克而與取消派截然分開。——（見正文第七三六頁）。

¹³¹ 真理報是布爾什維克黨公開出版的日報，於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公曆五月五日）在彼得堡創刊，其組織者和領導者為列寧和斯大林。真理報在俄國工人運動歷史上起過巨大作用，它是布爾什維克黨用以鞏固黨組織和奪取羣衆影響的堅強武器。『一九一二年的真理報，——斯大林寫道，——奠定了布爾什維主義一九一七年勝利底基礎』。真理報常受沙皇政府取締，屢遭封禁，但該報始終在先進工人積極贊助下，先後改用『工人真理』，『無產階級真理』等等名稱繼續刊行。自一九一七年三月推翻沙皇制度後，真理報即成爲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和彼得堡委員會底正式機關報。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間，真理報因受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迫害，不得不轉入半公開狀態並再三改換名稱。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真理報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起又實行用原先的名稱出版。從一九一八年三月移到莫斯科出版時起，真理報就作爲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和莫斯科委員會底機關報刊行了。

光線報是取消派孟什維克公開出版的日報，於一九一二年九月至一九一三年七月在彼得堡刊印。——（見正文第七三七頁）。

¹⁸² 這是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而言。——（見正文第七四〇頁）。

¹⁸³ 這是指一九一〇年一月間在巴黎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全會而言。——（見正文第七四一頁）。

¹⁸⁴ 此地所謂前進派，就是一九〇九年間脫離布爾什維克黨而出版前進彙刊的那些召回派份子（參看註¹²⁵）。——（見正文第七四一頁）。

¹⁸⁵ 安恩，即饒爾丹尼亞，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首領。——（見正文第七四六頁）。

¹⁸⁶ 這是指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而言，當時沙皇因被革命所震懾，不得不發表宣言約許種種公民自由權利，包括召集立法性國家杜馬在內。——（見正文第七五〇頁）。

¹⁸⁷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是第一屆國家杜馬選舉法頒佈之日。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政府實行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另行頒佈第三屆國家杜馬選舉法，保證地主資本家在杜馬中佔得多數位置。沙皇政府公然違背自己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發表的宣言，推翻憲制權利，把參加第二屆杜馬的社會民主黨代表交付法庭審判並判處苦役徒刑。這就是所謂六三政變，它是表示反革命勢力獲得了暫時的勝利。——（見正文第七五〇頁）。

¹⁸⁸ 齊莫石金，係杜馬中的反動份子，以右派代表齊莫石金得名。

所謂薩布列爾派的神父，是指遵照聖教局總監反動份子薩布列爾指令積極參加過第四屆杜馬選舉運動的教士而言。其所以動員他們參加選舉運動，是爲了保證選出適合沙皇政府意旨的代表。——（見正文第七五〇頁）。

¹⁸⁹ 所謂布爾什維克護黨派，是人數極少的一個調和派集團，他們爲了表示與站在列寧方面的布爾什維克相對抗，故自稱爲布爾什維克護黨派。列寧稱他們爲「不澈底的托洛茨基派」。他們同取消派、前進派及托洛茨基等等一起進行過激烈鬥爭來反對列寧，反對普拉加代表會議底決議（參看註¹²⁰）。——（見正文第七六三頁）。

¹⁴⁰ 此地所謂高加索人，是指一部分取消派份子，他們以高加索社會民主黨組織底代表資格參加過取消派八月會議（一九一二年）。——（見正文第七七一頁）。

¹⁴¹ 所謂七人團，是指俄國社會民主黨參加第四屆杜馬的七個孟什維克代表而言。——（見正文第七七一頁）。

¹⁴² 所謂六人團，是指俄國社會民主黨參加第四屆杜馬的六個布爾什維克代表而言。——（見正文第七七三頁）。

¹⁴³ 一九一三年「夏季」會議或「八月」會議（這樣稱呼是爲了保守祕密），是中央同各地方黨工作人員舉行的聯席會議，於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一月在坡羅寧諾鎮（克拉科夫城附近）召集。——（見正文第七七三頁）。

¹⁴⁴ 「八月聯盟派」是指「八月聯盟」參加者而言。

「左派」原係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波蘭社會黨中的左翼，一九〇六年間在波蘭社會黨分裂後形成爲一個獨立組織。他們在策略問題上頗與俄國取消派孟什維克相近，並同俄國取消派孟什維克一起進行過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年代，大部分「左派」份子已站上國際主義的立場，並漸漸同波蘭社會民主黨接近，後來他們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間共同組織了波蘭共產主義工黨。——（見正文第七七六頁）。

¹⁴⁵ 畢龍（一六九〇——一七七二）是俄國女皇安娜·約安洛福娜底寵臣，在這個女皇統治時代（一七三〇至一七四〇年）領導過反動恐怖主義制度。

關於阿拉克切也夫，請參看註⁹⁰。——（見正文第七八五頁）。

¹⁴⁶ 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或十二月黨人係俄國貴族革命家，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間舉行過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第一次公開武裝起義。——（見正文第七八五頁）。

¹⁴⁷ 六月事件是指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無產階級起義而言，這次起義是被法國資產階級用殘忍手段鎮壓下去了。——（見正文第七八六頁）。

¹⁴⁸ 關於「御用的反對派」或「擁護皇上的反對派」，請參看註¹²⁸。——（見正文第七九九頁）。

¹⁴⁹ 羅贊諾夫和瓦倫斯基都是極端反動派份子。——（見正文第七九九頁）。

¹⁵⁰ 連拿慘案是指一九一二年四月沙皇軍隊槍擊連拿金礦區（西伯利亞）反對資方殘酷剝削的罷工工人事件而言。當這次慘殺案消息傳出後，俄國全國各地工人立刻就用羣衆政治罷工和遊行示威抗議政府暴行，由此便開始了俄國革命工人運動雄偉高漲的時期。——（見正文第八〇四頁）。

¹⁵¹ 當連拿事件發生後，社會民主黨黨團在一九一二年四月杜馬會議席上向政府提出質問時，內務大臣馬卡洛夫在答話中講過這樣一句話。——（見正文第八一〇頁）。

¹⁵²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馬克思在致庫格曼的信中這樣評論過巴黎公社社員底舉動。——（見正文第八一三頁）。

¹⁵³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係俄皇詔令廢除農奴制度之日。——（見正文第八一七頁）。

¹⁵⁴ 盧森堡（一八七一——一九一九）是波德兩國社會民主黨中卓越的活動家，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熱烈的革命家，始終不渝爲工人階級事業奮鬥的戰士。列寧非常重視盧森堡對於國際工人運動的功績，但同時又嚴厲批評了她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許多問題上，特別是在民族問題上所持的半孟什維主義的立場。——（見正文第八二一頁）。

¹⁵⁵ 關於工人真理報，請參看註¹⁵¹。——（見正文第八四〇頁）。

¹⁵⁶ 關於無產階級真理報，請參看註¹⁵¹。——（見正文第八四一頁）。

¹⁵⁷ 「只捉不放」一語是一句表徵警察專橫的成語，導源於俄國作家烏斯片斯基描寫典型巡警美穆列曹夫的短篇小說崗位。這個美穆列曹夫盡職過火，動不動就把老百姓「捉」到警察局裏去，同時又絕對「不放」他們到所想去的地方去。——（見正文第八四三頁）。

¹⁵⁸ 「馬齊伯派」一語是以烏克蘭首領馬齊伯（約在一六四四年生，一七〇九年歿）得名。馬齊伯曾力圖使烏克蘭從莫斯科國方面脫離出去，所謂「烏克蘭馬齊伯派」是一般人用以稱呼烏克蘭分離派民族主義者的雅號。——（見正文第八四五頁）。

¹⁵⁹ 芬尼亞運動是主張愛爾蘭離英分立的運動，產生於一八五七年。芬尼亞黨人革命團體曾在愛爾蘭和美洲兩地同時進行工作。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馬克思和恩格斯組織過要求赦免被判芬尼亞黨人的國際運動。——（見正文第八六〇頁）。

¹⁶⁰ 科斯特洛夫是饒爾丹尼亞所用的假名，參看註¹⁵⁵。——（見正文第八六八頁）。

¹⁶¹ 『沒有穿襪子的孩子』是薩爾退可夫·謝德林所著在國外紀事小說中的一個人物。——（見正文第八七一頁）。

¹⁶² 是指俄國作家波米洛夫斯基所著中篇小說教會學生一書而言，在這著作裏暴露了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俄國教會學校中盛行的那種荒謬教育制度和粗鄙習俗。——（見正文第八七二頁）。

¹⁶³ 這一段話是從克里木戰爭時期流行的兵士小調中引來的。這個小調是由列夫·托爾斯泰寫作，暗示着麥亞德將軍所部俄國軍隊失利的動作。——（見正文第八七四頁）。

¹⁶⁴ 這裏列寧指的是一九一四年九月十日由李卜克內西，梅林格，盧森堡和蔡特金四人提出並於同年十月三十至三十一日在瑞士報章上發表的聲明書。——（見正文第八九二頁）。

¹⁶⁵ 這篇宣言在本卷中從略。——（見正文第九二二頁）。

¹⁶⁶ 斯巴達克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成立的一個革命團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成立了『國際』團，其領導者為李卜克內西，盧森堡，梅林格，蔡特金等人。後來這個團體又稱呼為斯巴達克團。斯巴達克團團員在羣衆中間進行過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革命宣傳，揭露過德帝國主義底侵略政策和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底叛變行爲。但斯巴達克團團員，即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左派，在許多重要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上並沒有擺脫他們那種半孟什維主義的錯誤：他們曾發揮半孟什維主義的帝國主義論，排斥對於民族自決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解釋（即直到實行分立而組成獨立國家爲止），否認帝國主義時代可能發生民族解放戰爭，忽略革命政黨底作用，崇拜運動自發性。一九一七年間，斯巴達克團加入了中派主義的所謂『獨立』黨，同時仍保持着本身組織上的獨立性。德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發生後，斯巴達克團已與『獨立』黨決裂，並於同年十二月間創立了德國共產黨。——（見正文第九二四頁）。

¹⁶⁷ 本版內所有這一切註釋，均作爲腳註加在本書正文下面。——（見正文第九二六頁）。

¹⁶⁸ 創業的舞科弊紛發生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的德國，當時德國創設股分公司的活動極爲緊張，一班乘機發財的資本家悉力進行舞弊營利勾當，拚命經營土地買賣和交易所證券投機生意。——（見正文第九四九頁）。

¹⁶⁹ 『煤炭銷售公司』，即『俄國頓涅茨區礦產燃料銷售公司』，成立於一九〇六年。

『五金銷售公司』，即『俄國五金冶煉廠產品銷售公司』，成立於一九〇一年。——（見正文第九六二頁）。

¹⁷⁰ 了法國人的巴拿馬式舞弊習氣。一語係產生於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間，因為當時已把那些由法國開辦巴拿馬運河公司收買的政府要人、官員和報館貪污舞弊的重要黑幕揭穿出來。——（見正文第九六七頁）。

¹⁷¹ 尤尼烏斯係盧森堡所用的假名，請參看註¹⁵⁴。——（見正文第一〇三四頁）。

¹⁷² 加利非係法國將官，以殘殺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社員聞名。——（見正文第一〇三六頁）。

¹⁷³ 齊美爾瓦爾得，即齊美爾瓦爾得會議，是於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至八日在瑞士齊美爾瓦爾得地方舉行的國際主義者第一次國際代表會議。這次會議在它所發表的宣言中認定當時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指斥了『社會主義者』投票贊成軍用預算和實行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行為，同時號召歐洲各國工人開展反戰鬥爭，爭取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

昆塔爾，即昆塔爾會議，是於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瑞士昆塔爾地方舉行的國際主義者第二次代表會議。這次代表會議上所通過的宣言和決議在發展國際主義革命反戰運動方面已有一個進步。但昆塔爾代表會議也如齊美爾瓦爾得會議一樣沒有採納布爾什維克的基本主張：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促使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在戰爭中遭受失敗，組織第三國際。——（見正文第一〇三九頁）。

¹⁷⁴ 阿阿拉烏黨大會，是瑞士社會民主黨於一九一五年十一月間舉行的代表大會。——（見正文第一〇四三頁）。

¹⁷⁵ 『遠方來信』（共五封），是列寧於一九一七年三月末至四月初（公曆）在瑞士寫成，以供當時（二月革命後）在彼得格拉復刊的布爾什維克真理報發表的。『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在真理報第十四和第十五期上刊載時有過許多刪改。後來這封信在列寧全集第二第三兩版中仍是按真理報原文刊印的。本譯本所根據的列寧全集第四版上的原文係按原先的打字稿翻譯寫本刊載，同時還參照過真理報原文。其餘四封信是在一九二四年間公佈的。——（見正文第一〇四四頁）。